

# 黑五類憶舊第一到第十七期

## 《黑五類憶舊》第一期 201008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發刊詞 焦國標

古今中外歷史上，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黑五類時代更黑暗、更荒唐的時代。這個時代在政治上已經結束 20 多年了，可是，它在話語上迄今未被充分記載和言說，在實際中雖然特定的黑五類不存在了，而黑五類性質的政治賤民并未在中國絕迹，因而我們有必要打撈黑五類這個現象和話題。

十三億中國人裏，起碼有一半人到死都不會忘記什麼是黑五類，無論其本人是不是黑五類。為另一半人口計，我們解釋一下什麼是黑五類。黑五類又叫五類分子，即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1949 年之後的最初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了四類政治賤民——四類分子，即五類分子中的前四類。1957 年反右之後，右派分子晉升為政治賤民中的“新秀”，四類分子增至五類分子。文革初期，政治賤民的隊伍進一步擴大，又新增四類，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叛徒和特務四類，合為黑九類。文革中後期，新增的黑四類逐漸淡出，“經典性的”政治賤民仍然是黑五類。至 1979 年，右派改正（章伯均、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 98 人未獲改正，以表示反右沒錯，只是擴大化了），政治賤民回復到原先的四類。1984 年，四類分子全部平反。至此，毛澤東中國此前幾十年製造的所有政治賤民都在政治上獲得同等國民待遇。

這只是理論上的黑五類。實際上，黑五類的子女也被稱為黑五類。官方資料稱，中國曾有 2000 多萬名四類分子，有 50 多萬名第五類分子（即右派分子）。有研究者推測，黑五類的子輩和孫輩是黑五類的 5-6 倍，因而受黑五類牽連的人數超過 1 億，占當時總人口的 15%。

其實受黑五類牽連的不止是他們的子輩和孫輩，近親也是受牽連者。比如，我的家鄉（河南開封）那時有“四大親屬”之說，具體指姥娘家、岳家、姑家和姐妹家。一個人，如果他的這四大親屬成分高（是黑五類），那麼他在升學、招工、招幹、尋（xin）媒、當兵、當鄉村教師和村幹部等等方面，都受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受黑五類牽連的絕不止超過 1 億，而可能一半以上的中國人都“不乾淨”。

我們現在隨便拉出一個 40 歲以上中國人“盤查”一下，就會發現他不是黑五類就是黑

五類的親戚。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父親屬於壞分子，以至于父親去世時，他從遙遠的青海回家奔喪，在縣城請客吃飯都請不到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先生，父親屬於反革命，他本人曾連寫十次入黨申請書都不被批准。前總理朱熔基是右派，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范敬宜是右派，著名畫家陳丹青是黑五類子女。劉少奇一家和鄧小平一家，是最黑最高的黑五類。民主黨派領袖、文化精英和學術大師，幾乎個個都是右派黑五類。

絕大部分黑五類實際上是那個時代中國社會各界的精英。地主富農是土地精英，反革命是政治精英，右派是知識精英，壞分子裏固然有地痞流氓惡棍懶漢，也有許多人是具有特立獨行人格、拒絕溜須諂上的人。1949 年以後幾十年中國社會之所以全面沉淪墮落，與各界精英的全軍覆沒息息相關。改革開放的啟動和後勁，某種意義上說，也直接來自這批人的反彈和發功。黑五類遭受的苦難和屈辱，成為黑五類二代（如家電業巨頭張大中、地產大亨潘石屹和藝術家艾未未等）從苦難中奮起拼搏、改變人生命運的不竭動力。

《黑五類憶舊》是一個期刊性的故事匯。當你閱讀其中一個個故事的時候，請不要僅限于故事本身，我希望你也同時走進故事主人公（迫害者和受害者）的內心：在那樣一個荒誕的時代，在那一個個罪惡的時刻，他們的心靈何其荒蕪，何其野蠻，何其淒慘，何其無助！鄧小平曾說，中國近幾十年發生的許多荒唐事，在西方不可能發生。我們不妨接著假設：黑五類現象在基督教世界可能出現嗎？不信上帝的族類，內心像西紅柿一樣多汁。不過這豐沛的汁液不是別的，全是苦毒。

如前所述，雖然黑五類走進了歷史，可決不意味著政治賤民現象在中國徹底消失。1984 年四類分子摘帽以來的二十幾年裏，又有多少中國人成為新的政治賤民？又有多少中國人成為新時代的黑五類？讓我們記住黑五類，讓我們記住政治賤民！我們曾經從那裏走來，我們的災難曾經如此深重，我們的人性曾經如此不堪，我們的墮落曾經如此可恨！然而，我們更要反省、檢討源源不斷製造政治賤民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

黑五類是全中國的替罪羊，是中華民族長大成人的階段性祭品，他為全體中國人背了十字架。

感謝你，黑五類！

黑五類，對不起！

2010-7-30

## 目 錄

表姨爹·····	敖順康（05）
父親的骨灰在哪里·····	丁 香（07）
侯振亞的兒子·····	海 寬（11）
學俄語的林芳·····	金 梅（13）
重重罪·····	季曄峰（16）
革委主任賈作仁·····	老村夫（23）
四類分子有多少·····	李若建（26）
紅、黑五類和中間類·····	李 氏（30）
被遺忘的族群·····	林賢治（32）

知青與書記·····	木華榭 (35)
爺爺的身份·····	潘石屹 (39)
紀念父親齊尊周·····	齊家貞 (41)
淮安席橋記事·····	秦九鳳 (46)
探父親·····	孫雅臣 (50)
苦澀的懷念·····	申 夫 (55)
四舊破到宋慶齡·····	湯 雄 (58)
從平反到下海·····	鐵 流 (61)
換親記·····	鐵 玉 (65)
會六國語又如何·····	王佳佳 (69)
同學相煎何太急·····	王友琴 (74)
記住吳維尊·····	蕭若枝 (86)
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	習近平 (94)
聖女王佩英·····	楊銀波 (96)

## 表姨爹 敖順康

那是 1970 年的春天，表姨爹從一個貧下中農走進了黑五類的行列，成了大隊小隊開批鬥會少不了的重要角色。

表姨爹原是生產隊的保管員。這年春天，表姨爹按照隊長的指示，找來 3 個社員，把谷種從倉裏撮到搭鬥裏，挑來幾挑水，先進行浸泡，撈出懸浮在水面上的秕粒，進行一番清洗篩選，再加點石灰水，給穀種消毒殺菌。消毒完畢，又去燒些溫水再浸泡。待水流盡，再蓋上麻袋，初步的工作就算完畢了。

此後每天都要淋幾次水，待穀種長出淺淺的新芽新腳，就拿到秧地均勻地撒在田地裏。

不知是怎麼回事，穀種竟長不出腳芽來。是天氣太冷？是淋水少了？是倒春寒？是沒注意天氣變化？還是溫度過高穀堆發熱燒壞了？往年也是這樣操作的，是穀種本身有問題？表姨爹還在思索尋找答案的時候，幾個革命者已帶著黑牌闖進他家，上面寫著表姨爹的名字，名字上打著紅叉。

只幾天工夫，表姨爹成了壞分子。說他故意把穀種泡壞，誠心擾亂社會主義，企圖搞垮集體的事業，是藏在群眾中的階級敵人，是專政的對象，要把他批倒批臭，讓他永世不能翻身。

在批鬥中，革命者們叫他交出指示者。可是哪來的指示者呀？表姨爹怎麼也交不出來。真是潑天的冤枉！從此，表姨爹白天在生產隊出工，晚上去接受批鬥。一家老小提心吊膽，在家門口目送親人離家去挨鬥。

“把壞分子揪上臺來！”主持會議的人叫道。兩個彪形大漢押著表姨爹，站上高板凳，腰被壓 90 度。“打倒壞分子！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遠不能翻身！”口號連天。

表姨爹一直想不通，常常獨自仰天長嘆：這是啥世道呀？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貧下中農，世世代代都是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怎麼一下子就成了罪大惡極的壞分子呢？一次工作失誤就成了人民專政的對象，這壞分子的帽子也來得太容易了吧！

表姨爹白天幹活幹得筋疲力盡，晚上還要挨鬥，身體一天一天瘦了下去。不到兩年時間，因積勞成疾，加上精神折磨，就去世了，帶著冤屈，留下遺憾，永遠地走了。

一個壞分子就這樣誕生了，就這樣滅亡了……

補白：那次填寫《中學生登記表》的經歷我永生難忘。放學前，班主任們拿著這張破紙，拉下驢臉，對新生（初中生）第一次大聲嚇唬：“爲了保衛偉大領袖，爲了保衛紅色江山，密切注意階級敵人新動向，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家庭有問題的同學一定要如實填寫，不許錯填，不許漏填，不許隱瞞。

我們這些狗崽子知道自己是“家庭有問題的同學”，個個都嚇壞了，湊在一起，愁眉苦臉地商量：民族出身這一欄最好填，照實寫。可是個人出身和家庭出身欄該怎麼填呢？我們大眼對小眼，個個都傻眼了。有的說：個人出身乾脆填“狗崽子”算了，保證萬無一失。可立馬自己就又否定了：如果這樣填，那家庭出身只能填“老狗”了。老師看了可能會覺得好笑，可我們可能從此就永別校園了。

什麼事都難不倒狗崽子們。最後我們終於做出集體決定：個人出身統一填“小學生”，家庭出身欄各填各的，因爲太亂七八糟了，有走資派、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偽滿官僚、外蒙特務、民族分裂分子，無法統一。鬧了半天，小事一樁，順利解決。狗崽子們臉上陰雲散去，又玩起摔跤、馱馬架的遊戲。直到天黑，狗崽子們玩餓了，才匆匆跑回家吃“狗食”。

孟鐵勇

父親的骨灰在哪里 丁 香

那年春天，我剛滿六歲。天氣很好，中午的太陽在天上亮晃晃的，鳥兒在街道邊的樹上跳來跳去唱得正歡，我提著外婆交給我的菜盒子給爸爸送飯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現在叫飯盒。那是個三層搪瓷盒，藍底紅花。我喜歡那些花朵和明亮的寶藍色，總是一邊走一邊仔細看。有時將掛鉤弄脫，無法再挂上，就只得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地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染合作社當經理，離家不遠，只有一條街的路程。開初是外婆帶我去，後來我就爭著自己去。每次到了爸爸辦公室，他總是誇張地張開雙臂，接過菜盒子聞一聞，放在桌上，然後在我臉上親一下說：“好香！”然後再牽著我的小手，把我送出大門。走到街道拐角處，我總會回過頭去張望，他總站在那株老黃桷樹下向我揮手。

今天却有點不對頭，跟我很熟，喜歡我的叔叔阿姨們，好像都不認識我了。進了大門，又看見牆上貼著一排用毛筆書寫的大字（後來知道這叫大字報）。雖然還沒上學，可爸爸已教我認識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認得爸爸的名字，上面劃了大叉。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走進爸爸辦公室，一個陌生人坐在辦公桌後面。我有點驚慌，不過還是做出勇敢的樣子問他：“我爸爸呢？”那人並不回答我，只說：“把飯給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後一藏：“不！”掛鉤脫落下來，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過來幫我撿起盒子，帶我走出辦公室，拐彎抹角去了一間有點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兒來回踱步。他一下子顯得很瘦，鬍子都冒出來了（過去我從來沒見過他臉上有鬍子），眼睛比平時更大。他看見我，便停止踱步，趕緊走過來抱起我。我覺得他好用勁，抱得我雙臂都發痛了。他在我臉上狠狠地親了一陣，然後放我下地，說了一句：“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裏面分明含有淚光。

當天爸爸沒有回家，此後我和兄弟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從媽媽鐵青的臉上，我們知道出了大事，可誰也不敢問。後來我長大了，回想當時的情景，或許當時爸爸已經意識到和我的那次見面將會成為永訣。

過了幾天，家裏來了一群大蓋帽，叫住媽媽，問了許多問題，又在爸爸書櫃裏翻了好一陣。爸爸書櫃裏大部份是外文書，有英文法文的，還有俄文的。我靠在門邊看他們折騰，心裏却蔑視他們：諒你們也看不懂這些書！

那時，我家院子裏只住著幾戶人家，孩子很少。院裏裏有幾棵樹，其中最大最老的那一株是柚子樹。四五月間柚子花開的時節常有夜雨，早上起來，滿院的落葉，一地的碎花。我仔細地在落葉中尋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絹包好放在枕邊。晚上，爸爸會走來坐在床邊，給我念英文“五十一個少女”的故事，念過英文再講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來越遠的音樂般優美的念書聲中沉入夢鄉。

我家是父親隨和，母親嚴厲。此後的日子裏，我們家再也聽不到父親快樂的哼唱京戲的聲音，變得死氣沉沉。不知道默默等待了多久，終於有一天，媽媽給我穿戴好，帶我出門。她拿個大包袱，先是乘公共汽車，繼而又坐三輪車，最後到了“寧夏街”。這是我從街口的牌子上認得的，是我幾十年來印象最深的一個街名。媽媽沒告訴我，但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去給爸爸送東西。想著就要見到爸爸，我又高興又激動，只是怕媽媽不高興，沒敢顯露出來。

三輪車載著我們在一個很高的門口停下。門前有人站崗，手裏拿著槍。媽媽拎著包袱進了旁邊的小門，片刻之後又空手走出來。我呢，呆呆地望著那兩道高牆夾著的似乎沒有盡頭的通道，眼淚象兩條小蟲在眼角蠕動，最後終於滾下來。我知道，我是再也見不著爸爸了。

記不得我們是怎麼回家的，眼前只是晃動著那條高牆夾著的灰色通道，還有那天爸爸抱我親我的情形。

在以後漫長的艱難歲月裏，生活的艱辛和每次運動來臨時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與爸爸的“問題”有關。在學校和鄰里，我們都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我們不曾怨恨過爸爸，更沒被壓垮。但我和弟兄們也從不提爸爸，像是有種默契，誰都不敢去觸摸那道永在滴血、永不愈合的傷口。我內心深處更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好像我為他所承受的壓力越大，他的壓力就會越輕，這樣才對得起他的愛。

爸爸仍然沒有一點消息，媽媽告訴我們她已辦了離婚手續。雖然年紀很小，我們都明白她是為了保護我們，儘管後來證明那是徒勞的。我們家裏那時有許多爸爸媽媽在教堂結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裝打領帶，媽媽披著雪白的婚紗一臉燦爛。連我們小孩子都知道這離婚是無奈之舉，別人豈能相信？媽媽幾十年單身，再也不曾涉足婚姻。

在那段物質嚴重匱乏的年代，我們4個不到10歲的孩子首先學會了生存。我們撿煤炭割草，抬水拾柴，上房補漏，下河撈魚。上小學時就在寒暑假期間找些零工做，掙點角票分幣補貼家用。我們不僅學習成績名列前茅，並且學會了勤勞簡樸的品行，希望用我們的努力換來與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爸爸的消息是在文革期間。媽媽單位的革委會通過內查外調，將媽媽定為“國民黨師長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屬”。依據是我爸爸在上海讀大學時參加了國民黨，並在抗戰初期擔任過該黨漢口區分部書記和特黨委員，在擔任合作社經理期間又用集體基金給每個職工發了10元困難補助，這是在“挖社會主義牆角”。他們原打算把我爸抓來和媽媽一起批鬥，調查的結果竟是我爸早在進監不到一年的時候已告別了人世（到底真象如何，只有天知道）。缺了我爸，他們只好單獨揪鬥我媽，有些掃興。兩次揪鬥之後，沒什麼新東西，就限制媽媽自由，讓她去車間裏幹最髒最累的活，兩年後媽媽才脫離“牛棚”。

文革過後，許多受迫害的當事人或家屬紛紛奔走于平反昭雪的路上，我們家沒一個人動過這個念頭。1986年，大規模的平反昭雪已接近尾聲。某天下午，我接到母親的電話，讓我趕快回家一趟。原來，法院來了兩個人，帶了一份200多字的文件，聲稱當年把內部矛盾

錯判為敵我矛盾，現予糾正。我很不客氣地問：“他人呢？”他們說，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勞改農場。

“那麼把骨灰交出來，我要看。”

“這個，恐怕找不到了。再說那是監獄方面的事，不歸我們法院管。”

我冷笑一聲：“一條人命和我全家幾十年的苦難，給張巴掌大紙片就一筆勾銷了？”

他們顯然見慣不驚，神態自若地說：“糾正通知書交給你們，一方面可以給你們的單位備案，對你們的政治前途有幫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親原單位作些經濟補償。”

“真是可笑！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 20 多年，還要什麼政治前途！我將繼續背下去，一直到死。至于所謂經濟補償，更不值一提。當初一個婦女帶著 4 個孩子瀕臨凍餓死亡的邊緣，僅靠健康的基因和頑強的性格熬過來，誰考慮過什麼補償？莫說叫我拿這單子東奔西跑上下游說得點恩賜，就算給我送上門，我也不要。我會噁心，覺得我在喝父親的血！”說完，我沖進母親房間，讓存積了多年的泪水在臉上泛濫汹涌。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父親與我最後見面那一瞬間欲說不能的目光，牢牢地定格在我終生的記憶裏。現在我的年齡和當年父親的年齡差不多。讓我耿耿于懷的是我們家已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也沒有他的任何遺物。時近清明，人們都會去祭掃親人的墳墓，可我爸爸的墳呢？我想為他築個衣冠冢，却連照片也沒有。我只能在靜靜的夜裏，獨自重溫那永恒的瞬間……

## 侯振亞的兒子 海 寬

1966 年，我在福建師大附中念初一。當時發生一件很令學校長臉的事兒：一位高中同學被選送進空軍航校。他的父親是當時福建省委組織部部長侯振亞。侯同學在附中也是個風雲人物，大家都很為他感到驕傲。我們班裏有兩位認識他的女同學，那幾天都把頭昂得高高的，大概就是她們的親哥哥當上了飛行員也不過如此。

侯大哥入伍那一天，全校同學敲鑼打鼓把他送到校門口。不知多少愛慕的眼光伴隨著他上了軍車，也不知多少像我這樣的小男孩幻想著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綠軍裝。

文革一來，省委領導們也被打倒了。有時在報紙或者街頭大字報上看到侯振亞的名字時，我心裏會想到我的這個校友，不知他還能不能上天。

大約是 1974 年，我跟姑父到他廠（在閩北山區）裏的澡堂洗澡。他告訴我，隔壁搬來個新鄰居，讓我猜是誰。沒等我開口，他就說了：“我諒你也猜不出來。告訴你吧，侯振亞的兒子。”我當時有點懵了。侯大哥不是在空軍嗎？他跑到這山溝溝裏幹嗎來了？

原來，侯振亞因受“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的牽連，文革後不久即被定為叛徒，關進監獄。當時侯大哥已在長春航校學習一年。由于父親的問題，他被迫離開航校，自己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落戶。1974 年他父親的問題得到了初步解決，他被當做復員或轉業軍人處理，安排到閩北山區這個三綫工廠。

後來在姑媽家我見到了侯大哥。他的臉上已經沒有當年離開學校時的意氣風發，只剩下與年齡不符的滄桑。我跟他說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興地請我到他家坐。他當時已經結婚了，小倆口的小窩可以說是家徒四壁，一窮二白。

當時的我頗有些陰暗心理，對侯大哥的景况很有點幸災樂禍。當年在附中，侯大哥和許多革幹、革軍子弟一樣，家庭出身好，在其他同學面前很有點趾高氣揚。幾十年的中國政治，每次重新洗牌總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經過這樣的家庭變故後，侯大哥們應該會長大許多。中國何時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也不要滿門抄斬株連九族，才算是從這方面擺脫了幾千年來封建主義的影響。

一篇網友跟貼：

我們公社後來還來了一批福建知青，他們都是福建省的幹部子弟。因父母被打成黑幫，當地老鄉不敢接收他們插隊。在福建境內無法分配，他們便跑到內蒙，在錫林浩特靜坐絕食，要求到牧區插隊。他們的行動打動了盟領導，終于同意接收。他們一部分人被分到西烏旗，另一部分被分到東烏旗。分到東烏旗的最終到了我們烏拉蓋公社哈達吐大隊。

來我們隊的福建知青，有一個是已經在長春航校學習了一年的飛行員。他的父親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亞。他人很開朗，會拉小提琴，我們經常聽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歡給我們講他的故事，講他第一次跳傘時的情景，講他從國家的驕子飛行員，一時間成為無人理睬的黑幫子弟時的心情。他想過自殺，他說他沒有想到草原會接納他！

他還帶來他在山東支左時結識的女朋友，一個個子嬌小，皮膚白晰，長著一張圓圓臉的很可愛的山東姑娘。後來他們結婚了。這個山東姑娘是個心地善良而樸實的農村姑娘，是生產隊長的女兒。當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遠離家鄉和親人，追隨著當時已經是黑幫子女的侯，來到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幹。我們每次去她家，她都熱情款待我們，給我們做好吃的，切得一手好土豆絲。正是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他生活的勇氣和安慰。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草原給了他們這對患難夫妻一個栖身之所，讓他們從此遠離白眼和冷漠，過上了普通人應該過的日子。後來他們雙雙回到福建，而且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

學俄語的林芳 金 梅

林芳 1936 年生于重慶。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先抗日，後內戰，從未回過家。1948 年隨部隊去了臺灣，從此再無音訊。林芳自出生以來，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一直與母親相依為命。

林母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為人賢惠，勤奮能幹，以拾廢品、幫人帶小孩、當保姆來維持生計，并送林芳上學讀書。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寧可自己忍饑挨餓，也決不讓林芳輟學。林芳知道母親辛苦，自己讀書不易，因此學習十分勤奮，從小學到高中成績都十分優異。高中畢業後，林芳被保送到北京大學外語學院專修俄語。

在大學裏，林芳仍和過去一樣勤奮學習，成績優異，受到同學的欽佩和老師們的青睞。再加上她人長得也漂亮，很多同學甚至個別老師都對她產生愛慕之情。雖然正當豆蔻年華，但她克制自己，拒絕誘惑，始終以學習為重，把愛情婚姻深深埋在心底。

1962 年大學畢業那一年，林芳的一位高中同班同學小張，突然出現在她的面前。高中時期，他們二人的成績都很好，經常在一起切磋，彼此提携，相處甚好。小張又是班長，品學兼優，加上出身好，社會關係好，沒到高中畢業就被防空部隊招去，加入空軍，并晉升為軍官。小張回重慶探親時得知林芳在北京讀書，便專程前來看望。幾年不見，二人更加親昵。此後時有書信往來，由友情發展成為戀情。

小張是一名軍人，戀愛婚姻必須得到上級允許。小張把同林芳的戀愛關係向首長做了彙

報，并要求允准登記結婚。軍方經過對女方家庭的政審調查，發現女方的父親是反動軍官，母親是反動家屬，女方本人是當然的黑五類子女。小張的結婚申請被拒絕，并受到嚴厲批評。小張十分痛苦，寫信向林芳表示，打算離開部隊，寧可不作官，回家當老百姓種地，也要娶她為妻。

小張的痛苦又何嘗不是林芳的痛苦！經過一段痛苦的思考，林芳決定放棄這段情感。自己是黑五類，不能把小張也拉進黑五類。為了小張的前途，林芳含淚寫了一封絕交信：“小張，這是我給你寫的最後一封信。我不願看到你也成為黑五類。為了你的事業、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拖累你。請原諒我，從今以後，我們就永遠分手了，希望你永遠把我忘記，就好像世界上從來沒有我。假如人生真有來生，就讓我們來生再做伴侶吧，請永遠忘記我……”

畢業後，林芳悄然離開學校，孤身一人到黑龍江省最北邊和蘇聯接壤的一個小縣城工作。她先在這個縣衛生局當統計員，後又被分配到一個醫院搞藥劑。林芳既聰慧又勤奮好學，并且虛心求教，很快精通了業務，常常得到同事們的誇獎。

正當一切都還順利的時候，不幸的事一個接一個地發生了。先是中蘇關係惡化，禍及林芳。林芳會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又恰好在中蘇邊境的縣城工作，故在內部開展全面政治審查時，她被認定是特務嫌疑。原來的工作被停止，留在單位邊勞動邊交待問題。白天打掃衛生、倒痰盂、洗尿盆、沖廁所，晚上寫檢查交待問題。在得知她的黑五類身份之後，對她的管制更加嚴厲，日夜都有人監視。林芳有一個遠方表哥，參加朝鮮戰爭回國後轉業到北大荒。因為相距不太遠，二人見過幾次面。因而在批鬥時，除了強加她是特務、黑五類之外，還侮辱她在外勾引男人，亂搞兩性關係。

面對無情的批鬥、毒打和羞辱，林芳絕望至極，曾一度想自殺，離開這個殘酷無情的人世。幾個平時和她要好的同事背地裏勸慰她，生活上暗中幫助她。這些善良人的關愛給了林芳頑強活下來的勇氣。

1966 年文革開始，黑五類子女林芳的處境比以前更加險惡。她日夜被揪鬥，遭毒打，漸漸變得枯瘦如柴，未老先衰。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林芳母女又被趕出縣城，到鄉下勞動改造，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農村生活雖然很艱苦，但農民很純樸善良，不會苛待這孤女寡母。一位老鄉把自己的草房騰出了一間，讓她們母女安身，大家生活在一起，親如一家。林芳到了這裏，像是獲得解救一樣，沒有了批鬥毒打，沒有了那沒完沒了的交待反省。林芳雖是大學畢業，但并不孤傲，什麼髒活重活都搶著幹。鄉親們都很喜歡她，儘量照顧她，不安排她幹重活。她能幹多少就幹多少，沒有半點強迫。

同一個村裏還有另外一些被下放勞改的“牛鬼蛇神”，其中一個是林業局的幹部，原在部隊當游泳教練。此人出生于上海，資本家家庭，屬於黑五類，又是知識份子臭老九，已經 40 出頭了，還是單身漢。那時林芳也 37 歲了，于是一些好心人開始撮合。這對在接連不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失去了青春的黑五類老男大女，如今終於成為眷屬，在那裏成家落戶。一年後，他們又添了一個小女兒。加上林芳的母親，一家四口，日子過得倒也不錯。

文革結束後，平反落實政策，他們都回了各自的原單位。1982 年，林芳的丈夫在上海一所中學謀到一個教師的職位，林芳也隨丈夫來到上海，開始了新的生活。

補白：教我們語文課的孫秀山老師被打成右派，起于一張大字報。據說有一次吃飯時，老師們正誇贊蘇聯菠菜如何如何好吃，孫老師却在那裏自言自語：“蘇聯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嗎？和我們的灰菜差不多！”結果被人說成是攻擊蘇聯老大哥，大字報貼到教室外的



山牆上。我看過後，隨口說：“就是和灰菜長得一模一樣嘛！未必好吃。”學校菜園裏種著這種菜，從外形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長得有半人高，人們說是蘇聯菠菜。味道究竟如何，我也沒吃過，只是推斷而已。我從小就不喜歡吃灰菜。結果，有積極分子把我隨口一說的話彙報給團支部。團支部請示校團委，組織開了一個小型批判會，硬說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論，要我做檢討。我不肯，最後不了了之。

呂 維

## 重重罪 季曄峰

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時就有了罪。

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聖經·詩篇》

我祖父是蘇北淮安的一個大地主，擁有一座在當地很有名氣的大宅子。土改時，地被分了，房被拆了，一家人來到上海，在虹口區四川路建了一幢三層或四層的樓房。

我的生母 1950 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我的生父 17 歲從上海隨大軍南下，在廈門市計劃委員會任秘書助理。1958 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時年 26 歲），遣回原籍監督勞動，妻子與他離婚。我的生父和生母不是夫妻關係，是叔嫂關係。我生母的丈夫是我的伯父。伯父 1947 年南開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國民政府的稅務部門任職。1958 年大年三十，因其南開同學中有兩個在臺灣國民黨軍隊中服役，他們班留在大陸的 25 個同學悉數被捕，判刑 20 年。當時他們已生了 4 個孩子。爲了活下去，夫婦離了婚，並將孩子改隨母姓（吳）。就在父親被遣回原籍監督勞動，伯父被判 20 年徒刑杳無音信期間，叔嫂二人發生私情，并生下了我。

我大概是 1964 年被生于上海，但迄今爲止我不確知我的生日具體是哪一月的哪一天。當時偌大的上海容不下我這個苦命的嬰孩，約一歲半時我被送回淮安祖籍。這個被當時的主流社會完全拋棄，在社會最底層勉強掙扎活命的家族，爲了讓這個男嬰活下去，并抱著將來有朝一日能給這個家族帶來重新出人頭地機會的願望，把我送給縣城一個最顯赫的家庭去“壓子”（養父當時剛結婚不久）。

一個根本無力主宰自己人生命運的男嬰，承載著這個身處社會底層却仍然渴望重返主流社會的家族的希望，像以色列的先知摩西一樣，開始了在“埃及長老”家的養子生涯。

我養父的舅舅名叫李仲英，時任中共江蘇淮安縣委書記。他爲人正直，反對浮誇，很受當地人敬重，後來升至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小時我聽他講過故事，還與他下過象棋，并且贏了他。

養父的家在淮安市楚州區復興鄉季莊四隊，與原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季劍虹的家同在一個村子。他們也是同一個輩份，相距不過七八戶人家。在我的童年記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人吵架。這是一個信奉階級鬥爭哲學的家庭，一切都以物質利益的多少爲標準，每年春節都會因送年禮的事大吵大鬧一場。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之久。後來爲了躲避這種爭吵，也由于無法忍受一直瀰漫在這個家庭裏許多年的那種虛偽和壓抑的氛圍，我選擇了逃避。寧願自己到外面租房子，也不願意和他們住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過年。

我雖然是一個男孩，又是家裏的老大，可我的地位猶如一個童養媳。我至今不會用漢語拼音，而我的養母當年正是公社裏教漢語拼音的示範老師。每當她帶著親生兒女去教學時，我就被留在家中看門、做家務。小時候我愛畫畫。有一次我畫的一幅畫在公社裏得了獎，我的養母却把我的名字換成她兒子的名字。從記事起，家裏總有做不完的活。直至我後來當兵退伍回鄉，我的養母還要我爲她洗她那骯髒的內褲。那時農村裏流行一種喝生雞蛋長身體的說法，我也曾從雞窩裏拿起剛下的雞蛋喝過。有一次，養母叫我從雞窩裏檢來雞蛋，敲開一

個小口子，遞到她親生兒子手裏，却不允許我再喝家裏的雞蛋。我站在一旁，默默看著她兒子當著我的面把一個雞蛋喝下。從此我再沒有喝過一個生雞蛋。多少年後，我曾以近乎扭曲的心態，幾乎天天晚上要給自己炒一碗蛋炒飯。

我的小學是在季莊讀完的。那時我經常參加學校文藝宣傳隊活動，每次上臺演出都是借別人的紅領巾。戲演完了，又把紅領巾還給別人。小學畢業時，成績不如我的孩子都有了一條屬於自己的紅領巾，惟獨我沒有。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只是感覺到那種因被群體排斥而產生的孤獨感籠罩著我。

1976 年是當代中國歷史開始發生根本性轉折的一年。在離家十幾裏外另一個公社工作的養父，在這一年突然得到升遷，從共青團書記升為公社副主任。我隨養母一家從季莊搬到這個公社大院裏居住，從純農業戶口變成“定銷”戶口，即和城郊菜農的戶口性質差不多的一種戶口。

這年的元旦後，在上學的路上我聽到了周恩來的死訊。不久是朱德的。9 月份的一個下午，在公社大院一條石子路旁，一個瘦高個子的公社幹部對我說毛死了，並且還流了淚。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沒有一點痛苦的感覺。幾天後全公社在電影院舉行追悼會，開始時我與公社另一位副主任家年齡差不多大的兒子扎著武裝帶，各持一杆半自動步槍，在電影院入場處的兩邊站立。可是奇怪的是，很快我就被替換掉了，而那個副主任的兒子仍然持槍站在那裏。我不明白為什麼。

在這個公社大院大約只住了兩個多月，我的養父又得到一次升遷，到與漣水縣相交界的一個公社任副書記。于是我們又一次搬家。天冷的時候，養父的舅舅李仲英在南京醫院病故，骨灰盒送回淮安，縣裏為他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追悼會。這一年，淮安縣城與全國其他縣城有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先後召開了四次大型群眾追悼會。

兩年後的 1978 年，官方開始了“拔亂反正”。右派平反，我的生父也重新恢復了廈門市的工作，帶著他後來又結婚成立的家庭去了那裏。右派們重新粉墨登場，進入中國政治權力中心。“傷痕文學”出現于文壇，右派一時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主角。

這幾年，中國的政治生活在悄然發生變化。公社更名為鄉時，我的記憶就是公社大院的門口重新換了一副招牌。我的養父再一次得到升遷，轉任淮安縣席橋鄉黨委書記。多少年後我才知道，這個鄉正是我的祖籍所在地，鄉政府大院與我的祖宅僅相距幾百米！我養父在這裏做了 8 年鄉黨委書記，而我一點也不知道腳下的這塊土地與我有著怎樣濃厚的血脈關連！那時我原以為只不過是我人生的又一個驛站而已！也根本想不到這 8 年在的我人生中是一段多麼重要的時光！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影響我一生的事——我的生父衣錦歸鄉。搬到這個鄉政府後不久，我就陸續聽到關於他的一些傳說和他所經歷的一些苦難。當然，當時我并不知道他是我的生父。此次回鄉，他帶著司機開著一輛皇冠車回到封閉落後的蘇北農村，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他在那個悲慘年代裏出于無奈忍痛送出去的兒子——接走。然而這一切我當時却渾然不知。我與很多看熱鬧的人一樣，圍在他的皇冠車前。突然，人群一下子散開，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從鄉政府辦公室裏快步走出，徑直走到我身邊，向我伸出雙手，我也很自然地向他伸出雙手。一個右派，一個有著傳奇色彩的人，一個我心目中的英雄，一個我所景仰的人，一個文學作品中常寫的主角，剎那間變成一個具體實在的人，有血有肉地走到我的面前！這一切就象夢境。他把我的雙手緊緊抓在他溫暖的手掌裏，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興奮與激動！沒有人為我們倆做介紹，而他却似乎早就知道我是誰！我們倆的雙手緊緊握在一起！然而，這很可能是我們父子倆一生中惟一的一次握手！！

記不清雙手是怎麼鬆開的。我帶著一種幸福的顫顫，自豪地對鄉黨委秘書張某說我剛才和某某某握了個手。沒想到，我却遭到他一頓莫名其妙的訓斥。他說他不過是一個臭右派，

有什麼好神氣的！有什麼好自豪的！我不知道這位張秘書現在何處，也不知道當年他那般理直氣壯、鏗鏘有力的教訓我是出于什麼原因。我心裏默默地告誡自己：我不會與這個右派有什麼瓜葛，但我一定要做一個像他這般榮耀的人！

記得當時我的養父曾以一種很隨意的口吻問我是否願意跟這個人走。可是他並沒有告訴我與和這個人是一種什麼關係，我怎麼可以不明不白跟一個陌生人走呢？真是問得莫名其妙！到 80 年代中期，我養父母一家的戶口全部都轉為城市戶口了，我的戶口却直到今天仍落在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淮城鎮環城村九組。戶口本上沒有父母，戶主和家庭成員只有我一個人。

那個右派走了，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別到再相見，竟然整整相隔了 23 年之久！

1982 年有兩個軍區（北京和上海）來淮安徵兵，分到席橋鄉來接兵的是上海軍區的部隊。我至今不明白當年入伍去上海究竟是天意還是有人從中作為。

當滿載新兵的輪船停靠到上海十六鋪碼頭時，我和第一次出遠門的其他新兵一樣，對這個陌生的城市充滿好奇心。惟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對漂白粉味兒很大的自來水一點也不反感，而有些新兵第一次喝時差點吐了出來。還記得我第一次經過外灘福州路時，面對一幢舊式樓房，一種非常強烈地似曾相識感清晰地衝擊著我的心……

我很快厭倦了軍隊生活，大量時間花在閱讀文學作品上。在一次文學講習班裏，我結識了愛寫詩的上海人盛國鈞。盛家距我們的營房只有幾分鐘的路。那一年上海流行甲肝，盛國鈞帶我去看望他的一個剛剛病愈的朋友吳立寅。我原以為只是朋友間的普通來往，而實際上吳立寅就是我的同母大哥，也是我的堂兄（伯父的兒子）。這一切當時我被蒙在鼓裏。從他們含糊其詞、欲言又止的談話中，我隱約感到某些事情與我有牽連，可又沒有發現實實在在的破綻。但是自那時起，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世。

三年兵役期滿，既然我不喜歡軍隊生活，只有退伍回江蘇。但是在離開上海前夕，又一件奇事發生了。

我的養父來到部隊，把我帶到上海某電扇廠一位副廠長家。那時我只知道這位副廠長與在廈門市工作的那個席橋右派有親戚關係。我清楚地記得，快進門時我的養父特意關照我說：“這家人因我以前曾幫助過他們，現在他們想把你留在上海。但是上海人瞧不起蘇北人，你不要答應他們。”在那個年代，能有一個留在上海的機會，對於一個來自蘇北的鄉下人來說，純粹是天上掉餡餅的事。進屋後，那個副廠長果然提出叫我留在上海。因有養父此前的“叮囑”，我還是找了個藉口婉拒了對方的好意。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位副廠長原來是我的三姐夫。當時屋裏還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是另一位姐姐的兒子，現在已經讀研究生了。

過了兩天，我養父又告訴我，席橋那個右派家裏的另一位親戚要見我，叫我退伍時把行李放在她家。她要我留在上海并住在她家，輔導我考大學。這一次我養父沒有陪我去，至于行前養父“叮囑”我見面時怎樣稱呼她，已經記不清。現在還能想起，在擁擠的四川路口那個破舊的電影院門外，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我與一位慈祥的中年女性相見。她站在路邊等我，我走過去叫她一聲“阿姨”。當時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位上海阿姨就是我的母親。

母親把我又領回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她帶我樓上樓下看了一遍。當時中間的樓層還被外人住著。母親住樓上，她說我的房間安排在一樓。中午，母親按我的口味煮了一條我愛吃的魚，那條魚的香味我至今仍然不忘。兩年多前，我請門頭溝一位道士為我的身世卜卦，突然想起“我的母親是誰”的問題，口中竟奇迹般涌起那條魚的味道……

我的養父最終還是把我騙回了蘇北。生母曾打算回故鄉辦高考補習班，讓我到她的班上復習，再考大學，可是不知為什麼鄉政府沒有同意。母親把我留在上海的行李送回來的那天晚上，是我最後一次見她。如今 20 多年過去了，記憶中的母親已變得模糊不清，聽說她的頭髮從那時就漸漸全白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養父一次次阻撓我與生父母的相認，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絕不是因為愛我或捨不得我才這麼做，更不是為我的前途考慮。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生父母一次次聽任我養父的這種阻撓成功。我相信這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不為我所知的至今仍存在的難以啟齒的罪惡計劃。早些年我隱約聽到過一些有關我的“賣身契”的信息。雖然我至今沒有親見過這個契約，但我相信它一直存在著，並且至今仍然控制著我的命運。這是一張與魔鬼簽訂的契約！

2004 年 5 月，我第一次與四叔家的一個堂弟——在北京工作的張霆見面。他說，似乎確有一份他們當年雙方訂立的如何處置我的協議。我完全被這個事實驚呆了！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竟一直以一個奴僕的身份活著，至今仍然是一個活在 21 世紀的現代“農奴”！父親，你這個曾經備受政治凌辱的人，為什麼在許多年之後又與這些人同流為伍？你為什麼要與魔鬼訂約，賣掉自己的親生兒子？難道權力與政治永遠如此讓你無可奈何嗎？

2004 年 5 月，我第一次去廈門市尋找生父。雖遭遇種種周折，仍未能見上一面。半年後再赴廈門，終於見到生父，卻沒有第二次握手。臨別時我用指尖輕輕地拍了幾下他的手背，那雙當年曾經那般溫暖的手，此時竟然變得如此畏縮、冰冷，我明顯感到我手上的熱量遠遠超出他的手溫……

離開廈門，我決定去上海見一下母親，讓記憶中母親的形象再變得真實、清晰一些！去之前我給母親打了電話，母親問：“你現在知道你的親生父母是誰了嗎？”我答道：“差不多吧！我要去上海出差，準備去看看你。”母親說：“好吧，一天 24 小時，任何時候都可以！”可是等我人到了上海再給母親打電話，她却推說住在女兒家，不方便見面，回避了我……

放下電話，一首撕心裂肺的歌聲在耳邊唱起，那是日本電影《人性的證明》的插曲《草帽歌》：“媽媽你可曾記得，你送給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它飄向濃霧的山巒，耶哎媽媽那頂草帽，它在何方你可知道？它就像你的心兒，我再也得不到……忽然間狂風呼嘯，奪去我的草帽耶哎，高高地卷走了草帽啊，飄向那天外雲霄……媽媽只有那草帽，是我珍愛的無價之寶，就像是你給我的生命，失去了找不到……”

至今為止，我最後一次與母親通話是 2005 年的母親節。拔通電話後，母親在電話那頭問：“你是誰？”我捂著電話沒吱一聲，直到她把電話掛斷——我只想再一次聽聽母親的聲音！

革委主任賈作仁      老村夫

賈作仁是造反派看中的三結合的領導幹部，革委會裏所有的造反派都聽他指揮。群眾專政一開始，賈作仁就讓趙士杰當群眾專政的頭頭，把地、富、反、壞、右、叛、特、走（資派）分子都關了起來。對於那些不肯老實改造的各類分子，可以當場打死。一夜之間，全公社有十四個大隊的專政隊各打死一名四類分子。在縣武裝部主持召開群眾專政現場會議那天，賈作仁還把所謂的牛鬼蛇神和牛放在一起，在稀牛糞和污泥裏浸泡長達一天，並在現場會上作了經驗介紹。

被牛糞污泥浸泡的四類分子，很多人得了皮膚病。一名知青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十分氣憤，說了幾句不滿的話，結果被群眾專政隊打折一條腿，落得終身殘疾。專政隊動用的刑具千奇百怪，挂在房梁上悠，針刺手指，釘子釘太陽穴，打板子，打嘴巴，是最常見的。一名

女知識青年覺得群眾專政做得太過分，說他們好像法西斯，便被定為現形反革命，多次遭到毒打。群眾專政的頭頭趙士杰和賈作仁還對這名女知青進行長期強姦。

群眾專政結束之後，這名女知青投書縣革委會，舉報趙士杰和賈作仁的獸行，而後服安眠藥自殺。

舉報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她十六歲那年到農村插隊落戶，因為不會幹農活，時常想家，在勞動中說過城市孩子不應該下鄉的話。群眾專政一開始，她認為群眾專政的做法太殘酷，更不應該把四類分子和牛放在一起看管，四類分子是人不是牛。當年法西斯也不這麼做，真比法西斯還壞。不經過公安和法院同意，就往死裏整人，真是無法無天。群眾專政負責人就說她是對抗最高指示，反對文化大革命，把她抓去毒打。她的很多頭髮被抓掉，臉被打得又紅又腫，眼睛也腫成一條縫，被關進公社的一個倉庫裏。窗戶很小，四周上著鐵欄護。他們不給她鋪蓋，地上連草都沒有，讓她在水泥地上睡覺。她受不了，就邊哭邊喊。看管她的民兵給他弄了幾捆稻草，一床舊被，就這樣被囚禁在倉庫裏。

過了兩天，原來看管她的人不見了，由公社專政指揮部的趙士杰看管。趙士杰假裝關心她，給她送水送飯。一天晚上，趙士杰和她說，只要她和他好，就可以不批鬥她。那天晚上，趙士杰像野獸一樣強姦了她。從此她不再挨打了，可趙士杰經常來強姦她。她遠離父母，受不了這樣凌辱，不打算活了。可又覺得這樣不明不白死了，讓作惡多端的趙士杰逍遙法外，她個人的冤屈將永遠石沉大海。她要活下來，要控告群眾專政對她的迫害，還自己一個公道。

趙士杰的獸行實在讓她忍無可忍，她就把情況回報給了賈作仁。賈告訴她，不許和任何人講，這是關係個人榮譽的大事。當天賈作仁就把趙士杰調走了，再不許任何人接觸這名女青年，由他本人直接監管。賈作仁告訴她，這個案子沒結案之前，不能和別人講，她要暫時在這裏繼續接受審查。賈作仁給他弄來兩條帶靠背的長椅子，合在一起給她當床。沒想到賈作仁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畜牲，一天夜裏他打開屋門，扒光她的衣服，按在椅子上把她強姦了。

從此以後，只要公社幹部下鄉，賈作仁就趁機對她進行奸污。有時一天兩次，把她折騰得連坐的力氣也沒有了。這樣受折磨的日子過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的痛苦日子裏，她記下兩個畜生對他施暴的日期。屋子裏沒有筆沒有紙，她就撿一根樹棍，把每次施暴的日期都劃在牆上。凡是牆上劃有叉號，下邊寫上日期的，就是趙士杰對他施暴的時間。凡在牆上劃 V 符號的就是公社革委會副主任賈作仁對她施暴的記號，每個記號下邊都記錄了日期。一個 V 符號下記著兩個時間，這就是賈作仁一天兩次對她暴。

賈作仁、趙士杰的胡作非為使這名女知識青年精神上受到極大的折磨和摧殘，肉體上遭受踐踏和蹂躪，失去了生活的勇氣，多次想自殺。

根據這名女知青提供的舉報線索，人們發現公社那間關押女知青的倉庫牆上確有叉號和 V 符號。比如叉號下邊有 7，3，8，30，就意味著是七月三日八點半。

賈作仁奪權之後，盛氣凌人，不可一世。他覺得自己出身好，歷史好，工作有水平，是三結合的工農幹部，造反派也相信他擁護他，因而變得有恃無恐。賈作仁奸污女知青的消息傳出，真有點石破天驚出人意外。經公安局對趙士杰和賈作仁突擊審查，二人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賈作仁臉色鐵青，往日的驕橫沒有了，低著頭走進了警車。

補白：我六十年代出生在一個早已破敗的地主家庭。六歲時母親牽著我的手去村裏的小學校報名上學，那時報名上學的條件是能數一百個數，能完整寫出毛主席萬歲五個字。一百個數倒是背下來了，毛主席萬歲五個字卻沒能完整寫下來。被學校拒絕了。我是開學半年後入學的。入學要帶戶口本，同學們相互傳看著各自家庭的戶口本，主要是看戶口上的家庭成

分。家庭成分是貧農、雇農的同學格外驕傲自豪，是中農的也挺胸昂頭。我們幾個地主、富農的狗崽子就慘了，先是猶猶豫豫不肯拿出戶口本，而後就直接被同學搶了去。自然我們的狗崽子身份也就暴露無疑了。

暴露了家庭成分後我們幾個地富後代總是受貧下中農後代的欺負，老師也堅決站在了他們一邊。日子很難熬，地主富農的後代們陸續轉學走了，最後只剩下我一個被革命的對象。讀小學時我的書包經常被同學們扔出去很遠，每次我都等同學們走遠了再偷偷撿回散落一地的書。記得下雨天家裏的玻璃窗上時常被同學摔上稀泥，有時家門口還被挖幾個陷坑。我實在無法忍受地主成分給我帶來的種種屈辱，在一次學校要學生帶戶口去上學時，我悄悄把戶口上的“地主”成分改成了“工人”。此舉給父親帶來了巨大麻煩，先被派出所抓去關了起來反省，後來經常被批鬥。在階級鬥爭還十分嚴峻的年代裏，改成分成了父親的一大罪狀。

佚 名

#### 四類分子有多少 李若建

四類分子是一個人數以千萬計，實際受影響人口超過 1 億人的龐大社會群體，是一個從 1949 年到 1984 年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 35 年的特殊社會階層。

四類分子當中，人數最多的是地主、富農。這兩類人的界定相對比較明確。但是由于土改從土地革命戰爭到 20 世紀 50 年代持續了 20 多年，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標準差異非常大，實際上也沒有統一的劃分標準。

全國到底有多少地主富農，筆者只見兩份權威數據。一是國家統計局 1952 年土改前的數據，該數據顯示，地主占總人口 4.75%，富農占 4.66%，兩者合計占 9.41%。另一個是根據 1954 年 23 個省、自治區 1.5 萬多戶農家收支調查資料得出的數據，土改結束後地主階級占總人口 2.6%，富農階級占 5.3%，兩者合計占 7.9%。

中國各地土地占有情況相差比較大，一些地區土地分配比較均勻，因此地主富農也不多。以陝西省關中地區為例，地主占有的土地約為總土地量的 4-5%，富農占有的土地約為 10%，遠遠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這種地方後來被認為是土地改革不徹底，又人為製造出一大批地主富農。四清運動中硬套“地主、富農約占農村總戶數 8%”的框框，補定了一大批“漏網地主、富農”。四清的重點地區陝西省長安縣，補定的地主、富農戶數比土改時增加了 1.2 倍。凡補定為地主、富農的戶，多餘的房屋和其他財產一律沒收。這些補定的地主、富農，其實絕大多數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農，有些還是中農。

反革命分為現行反革命與歷史反革命。195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列舉的反革命罪行如下：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進行叛變、持械聚眾叛亂的主謀者、指揮者及其他罪惡重大者；間諜或資敵行為者；參加反革命特務或間諜組織；利用封建會門，進行反革命活動者；以反革命為目的，策謀或執行破壞、殺害行為；以反革命為目的，有挑撥、煽惑行為；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聚眾劫獄或暴動越獄，其組織者、主謀者、積極參加者；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1952 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列舉的是歷史反革命罪：反革命特務分子；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堅持反動立場之地主分子；堅持反動立場之蔣偽軍政官吏；其他應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內含。

關於壞分子的界定，雖然國務院在一個文件中曾經規定壞分子指政治騙子、叛變分子、流氓分子，但是政治騙子、叛變分子可能更多是歸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分子又是一個很難認定的標準。還有一種半官方的定義，殘餘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盜竊、縱火、凶殺、搶劫、詐騙、強姦犯以及那些嚴重違法亂紀和破壞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稱為壞分子。

有的犯罪者的家屬也被當成四類分子看待。1957 年福建省光澤縣因為鄉幹部貪污，引發一場騷亂。政法部門捕判了 39 名“鬧事”群眾，判處有期徒刑 6 人（2 人在服刑期間死亡），判處管制 2 人，另有 1 人自殺。這些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受到慘重損失，家屬子女也受到株連，被作為四類分子看待，不分給自留地，勞動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學、升大學，更不能參軍、招工、招幹（此案于 1962 年平反）。

許多地區對四類分子的劃定相當隨意，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成為四類分子。河北省三河縣 1979 年全縣 1194 名四類分子中，無合法手續宣布無效的 473 人，占當年四類分子總數的 41.17%。1959 年淄博市一公社被錯劃為五類分子的竟超過實際五類分子人數的 3 倍多。被錯劃的多數是五類分子的家屬、子弟，有的把有小偷小摸行為和愛發牢騷、講怪話、頂撞基層幹部的人劃成壞分子，有的把一般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人錯劃為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對四類分子劃分縣管制、區管制、村管制，70% 以上的四類分子是屬於村管制。由此可見，劃定四類分子的權力相當大一部分在基層幹部手中。

從一些地方志中公布的資料來看，當年的公安部門是有四類分子數量統計的。不過這些數據很不理想，一是只統計被管制的，沒有統計那些沒有被管制的，二是當年的統計是在不同年代的政治背景下做出的，數量波動很大。不同時期四類分子的數量大不相同。大躍進與文革期間的數量就比較大。

官方資料稱，中國曾經存在過 2000 多萬名四類分子，但是沒有說明這一數據是否包括所有曾經被冤枉成四類分子的人。據統計，1977 年底全國尚有地主分子 279.7 萬人，富農分子 189.5 萬人，合計 469.2 萬人。由此推斷，1500 萬以上的四類分子在 1979 年以前已經消失，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平反或者摘帽。不過從局部地區的資料來推算，曾經存在過的形形色色四類分子很可能不止 2000 多萬。以山東省聊城地區為例，1956 年有四類分子 102772 人，1978 年被評審的四類分子只剩下 14923 人，1978 年的人數只相當于 1956 年的 14.52%。

實際上無法真正搞清楚四類分子的數量。1958-1961 年間，上海、浙江、遼寧、甘肅、寧夏 5 個省市自治區錯劃四類分子 1.48 萬人，漏劃 1.03 萬人。以此推算，全國錯漏的四類分子應當有數十萬人。這還是根據當年的標準發現的錯漏，如果按後來的標準，錯漏的數量可能更大。在文革中期的 1972-1973 年，福建省糾正錯管四類分子 5587 人，占四類分子總數的 4%。在當年的政治環境下，錯管的比例如此之高，不難推測四類分子當中有相當多是冤枉的。即使在 1983 年全國最後的 79504 名四類分子中，仍有 982 人被搞錯。1979 年 3 月 24 日，廊坊地區共有四類分子 14250 名，經群眾評審，摘帽的有 5984 人，因無法律手續，宣布無效的有 7247 人，糾正錯定、錯戴帽子的有 904 人，繼續戴帽的 115 人。雲南省中甸縣 1958 年全縣五類分子 2565 人，占總人口 3.99%，1959 年查實後為 1396 人。一年之間，數量相差近一倍。

四類分子牽連的人數有多少更加難以估算。根據局部資料推算，數量是相當驚人的。天津市武清縣原有四類分子 5221 人，1979 年時地富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有 18942 人，地富子女的子女 10204 人，後兩種人相當于四類分子的 5.58 倍。雲南省中甸縣 1979 年給 542 名地主富農摘帽，同時把地主富農子女 2079 人和地主富農子女的子女 1715 人改變成分為社員。子輩和孫輩是地主富農人數的 7 倍。如果考慮到反革命分子與壞分子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是地主富農出身，這部分人的子女實際上也受到歧視牽連的話，估計受四類分子影響的人數大體上在四類分子總數的 5-6 倍之間。如果從中國的家庭規模在 4-5 人左右計算，四類分子直接影響其配偶和子女在 3-4 人之間，加上其孫輩人數，也可以推算受四類分子影響的人數大體上是四類分子總數的 5-6 倍。以有 2000 多萬四類分子計算，受牽連的人口超過 1 億，占總人口的 15%。

四類分子的構成可以從兩方面討論：一是四類分子的內部構成，也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各占多少；二是不同地區四類分子占的比重，有城鄉的差別，也有不同

行政區的差別。關於四類分子的內部構成比例，缺乏全國性的數據，無法準確得知。1983年全國剩餘的 79504 名四類分子當中，地主占 35.50%，富農占 18.04%，反革命占 20.45%，壞分子占 26.00%。1983 年時，四類分子中剩下的地主、富農比重可能相對低一些，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比重會相對高一些。

筆者根據各地一些零星資料估計，四類分子的內部結構大體上是地主占 35-45%，富農占 30-40%，反革命占 10-15%，壞分子占 5-10%。這一比重有待今後國家檔案資料公布才可能核實。城鄉之間的四類分子構成也有所不同，農村地主富農占的比重高，城市則是反革命與壞分子占的比重高。

## 紅、黑五類和中間類 李 氏

文革前高校中有一定數量的黑五類子女，也有數量相對多的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子女，還有中間類（教師、銀行職員、中農、城市貧民等）子女。

紅衛兵組織成立之初，嚴格審查參加者，黑五類子女不能參加任何紅衛兵組織，紅五類子女政治態度和表現有問題的也不能參加。支持某派紅衛兵組織的黑五類子女可以在該組織認可下成立外圍組織。哪個紅衛兵組織接納了黑五類子女，那就是授人以柄。中間類子女是否能參加某派紅衛兵組織，主要看本人的態度和人緣，有的教師子女也能成為基層紅衛兵組織首領并被結合進革委會。

文革中除了造反派、革命派、保皇派、保守派之外，還有逍遙派。逍遙派起初是指所有群眾組織都不參與而游離在運動之外的人。他們一般不會受到打擊迫害，但會受到衝擊。有時他們需要對某事表態，表態不合人意就可能被批評教育，但一般不會被武鬥。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逍遙派變為對文革運動不再如初期那樣關注和積極參與的所有人的統稱。

不少黑五類子女和中間類子女始終都自覺不做或不得不做逍遙派，因而他們直接因文革出事的也相對較少。絕大多數紅五類子女文革之初都要義不容辭地站在鬥爭第一綫（并非全都出自本心），所以付出最大代價的還是他們。

每個紅衛兵組織都有自己的作戰部，有作戰部部長及常備的總部武裝保衛人員等少量武裝骨幹。這些人必要時是直接上“戰場”的。黑五類子女絕對不能直接上武鬥戰場，否則，就要出階級報復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大多數武鬥戰場上雙方陣亡者都不會是黑五類子女。

文革前，無論哪一類子弟，家中條件差的都能享受助學金。文革之初工作組進校，一個身為團支部書記的革命幹部子弟率先造班級輔導員老師的反。該老師被關進牛棚後，這位幹部子弟貼出大字報，勒令本班黑五類子女不得與紅五類子女享受同樣的經濟補助，不多久却傳來他本人的家長就是走資派，已被關進牛棚的消息。

文革中一度時興改掉自己帶有四舊色彩的名字，校園裏常見“改名聲明”的大字報：今鄭重聲明，將本人帶有某某色彩的名字“某某貴”改為“某衛東”，“某某富”改為“某衛彪”，諸如此類。一位本不姓毛的黑五類同學，鄭重申明自己改名毛為民，結果招來一陣痛罵，說你黑五類子女怎配與偉大領袖同姓，不許改姓。這位黑五類也挺有骨氣，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寫大字報全用毛為民署名。他的大字報緊跟形勢，沒什麼大錯，反對他改姓的紅五類氣得跳腳，可也拿他沒辦法（只是常在他的署名下加批注泄憤）。不過，這些改名的



同學，到分配工作時還都是用父母親所賜的名字，“毛爲民”同學也一樣。

在我校，有紅五類子女代表無產階級來專紅五類子女政的，也有黑五類子女代表無產階級來專紅五類子女政的，還有黑五類子女代表無產階級來專黑五類子女政的。這種群眾專政時間都不算很長。疾風暴雨之後，我們班上黑五類、紅五類和中間類同學們都還是相安無事，而且還增加了幾分客氣。所以，至少在我們那裏，不能說文革中紅五類子女都怎樣怎樣造孽，黑五類子女又都如何如何遭殃。除了有名的學生領袖和直接的殺人凶手，那些有各種問題的絕大多數學生後來并未受到刑事懲處，而是做過思想檢查後各奔前程。在武鬥中十足展現個人人性惡的個別學生，如將彭德懷揪到學校坐車游街示衆，打老人耳光，又用腳將其從卡車上踹下來，致使老人摔倒在地的某紅五類同學，此後是很難再融入自己的同學群體中了，也羞于再回母校。

## 被遺忘的族群 林賢治

幾年前，我曾問過中山大學歷史系一位青年教師：“什麼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從那時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關於這類子女的書，讓人們記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這樣一個龐大并被遺忘的族群，藉以瞭解一個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時代。

從 1949 年起，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積累了一批又一批階級敵人和階級異己分子。這些人各有名目，後來不知是哪一位天才發明了黑五類一詞，簡明易記，又富含階級感情色彩，于是，人們也就樂于使用。至 1979 年，宣告階級不復存在，這時黑五類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了。我未曾見過有關全國黑五類子女的統計數字，但推算起來是龐大驚人的。作爲一個偶合群體，他們並沒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繫，三十年間一直處在一種自我封閉、互相隔離的狀態。今天看來，其實只是一個“記憶共同體”而已。惟有記憶存在，共同體才有可能存在，雖然是虛幻的存在；但當記憶喪失，整個群體就將長此消亡。名爲群體，實不見群體的存在，這種狀況，大約只有物理學中“蒸發”一詞差堪比擬。

在漫長的三十年間，黑五類子女一開始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對他們來說充滿歧視和不公的世界。他們是在不斷認識自己的身份的危險性，從而不斷地放棄自己和防備他人中成長的。他們必須承認現存的秩序，學習與這個秩序和平共處，學會順從。所以，他們每個人的內心過程，都是一個粗暴的摧毀性過程。文革結束以後情況如何呢？受歧視的生活是一種不可逆的、最終有效的、貫穿一生的生活。只要被侮辱被損害的創痛楔子般進入生活，就進入了內心。雖然種種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爲過去，痕迹無存，甚至連記憶也變得一片空無，然而，那些曾經發生的帶有情緒創傷的體驗早已成爲生命的有機部分，成爲他們的天性，成爲永恒。

在我所認識的衆多這類子女中，除了極少數較爲開朗豁達，願意跟人們交談來往，大多數則形成內傾性格，自卑、畏葸、被動，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他們敏感于周圍細小的變化，對世上的人們，包括自己在內，多抱一種不信任感。明顯地，有一種宿命的悲觀色彩籠罩其間。2002 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小說《無命運的人》寫到集中營世界的幸存者柯韋什的內心感受時，有這樣一段話：“新的生活——我認爲——只有在我重新誕生或是我的大腦出了問題、患了病時才有可能開始，……我們決不可能開始新的生活，我們永遠只能繼續把舊的生活過下去。”讀罷除了感嘆唏噓，實在無話可說！

我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說與這麼多帶著他們的屈辱和創傷生活在我們身邊的黑五類子女沒有關聯。即使我們不曾直接向他們施以暴力和凌侮，那麼，我們有沒有阻止過加害于他們的事情？有沒有拒絕過他們在曠野中的呼告？如果沒有，今天，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我們還能夠像以往一貫的那樣心安理得而不感到羞耻嗎？

如何處理歷史留給我們的這份精神遺產，成了時代的考驗。

如果說我們需要歷史的話，就因為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影像中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歷史首先意味著還原真實。但是，清除了個人記憶，惟以制度文物和公共事件構成的歷史肯定是殘缺不全的，不真實的。魯迅所以說中國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就因為史官單一地從帝王的視點出發，忽略了更廣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他們的精神狀況。在我們的歷史讀物當中，應當有更多的傳記、自傳、回憶錄，更多的個人關係史、遷流史、生活史、心態史，等等。必須有私人性、精神性的內容對歷史的補充。惟有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創傷記憶盡可能地發掘出來，並且形成對於人道主義、社會公正的普遍的訴求，包括文革在內的民族苦難的歷史才能轉化成為有意義的歷史。

剛剛逝世的波蘭裔詩人米沃什曾經援引威爾斯在《時間機器》中描繪的圖景：地球上一個叫作“白天之子”的部族，他們無憂無慮、沒有記憶，當然也就沒有歷史；結果，在遭到地下洞穴中的居民、食人肉的“黑夜之子”時，完全失去抵抗。失去記憶的族群，注定要受到時間的懲罰。可是，在黑五類子女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生活中被抹去以後，我並不曾看到遺下的關於它的存在的記憶。

歷史不可能為沉默的人們作證。說，還是不說？于是成了問題。

關於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我注意到，無論是納粹的子女，還是猶太人中的幸存者，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努力說出事實真相，一種則始終保持沉默。其實，這兩種態度在黑五類子女中同樣存在。不同的民族歷史當然不可一概而論，不過，那種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對於不同國度的青少年來說倒是頗為相似的。

為了履行內心的承諾，去年春節，我曾特意帶上一部小錄音機，打算借回鄉的機會，采訪村裏熟識的地富子女。頭一個被訪者是一個曾經改嫁的農婦，她因為害怕留下自己的聲音，要求把小匣子撤掉，然後訴說她的故事。意外的碰壁，使工作的熱情頗受影響，加上別的事情的壓迫，計劃便擱置了起來，直到年前，才使我在一種追悔的心情中重下了組織書稿的決心。

經過大半年時間，星散于全國各地的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作者，斷斷續續地，總算把他們的聲音彙聚到這裏了。欣慰之餘，頓然生出一種焦慮——對此，世上可有願意傾聽的人？

補白：對於不少黑五類子女來說，與家庭脫離關係是當年擺脫政治歧視的唯一途徑。這種行為造成的傷害，多年之後漸漸露出血痕。著名文學批評家孫郁曾說道：“我不願意回憶那一段歷史，還有著悔愧感在起作用。說出來是一種折磨。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因反革命罪被發配到農場。為了劃清階級界限，我改了姓名。我還記得老師宣布我更名的情形，那一刻，我好像一下子解放了。”

知青與書記 木華樹

高大同是我和李木鷄的同學。他雖然和我們一起來農村，却並不算插隊。他算回原籍，

即通過自己聯繫，回原籍農村。高大同的原籍就是我們插隊的這個村莊。我們面對的是一些素昧平生的農民，而高大同却是回到自己的親人中間。他幾乎與全村的人都沾親帶故。

那時村裏要經常開黑五類的批鬥會，但黑五類與貧下中農多年通婚雜交，血緣關係盤根錯節，很難劃清界限。因此每開批鬥會，村裏誰也不願去得罪人，上臺押黑五類的事就全推給我們知青。當時押黑五類有一定之規，要用噴氣式，因此被批鬥也叫坐飛機。

我們知青也有自己的顧慮。比如柳大瞎子，據說很會占卜測字，號稱柳半仙，他的成分雖是壞分子，却與大隊柳書記是親叔伯兄弟。儘管柳書記嘴上說對柳大瞎子這種宣揚封建迷信的人決不能手軟，可從他的眼神裏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親情。柳書記手上握有我們選調的生殺大權，當然得罪不得。因此，我們每次上臺只是做做樣子，並不真用力去揪柳大瞎子。然而李木鷄的態度却極為認真，有一次在臺上他竟然險些將柳大瞎子的胳膊攔斷，疼得柳大瞎子當場昏死過去。沒想到平時沉默寡言的李木鷄出手會如此狠毒。李木鷄的英勇表現立刻受到公社領導的表揚，但柳書記的臉色却很難看。

批鬥會之後，高大同沖李木鷄大發其火：“你以為發一杆槍你就是基幹民兵了嗎？那不過是讓你臨時背一背！”我知道，高大同發火是做給柳書記看的。高大同對柳書記和柳大瞎子的親緣關係更清楚：柳書記與柳大瞎子兩人的父親不僅是同胞兄弟，他們的母親還是同胞姐妹。也就是說，書記和瞎子二人不僅是親叔伯兄弟，還是親姨表兄弟。

這時柳書記走過來，笑笑，問李木鷄：“聽說，你想上大學？”李木鷄沒有說話，但眼球微微動了一下。柳書記說：“我聽說了，你偷偷跑去公社問過。”柳書記微微一笑，又朝周圍的人看一眼說：“你這個願望當然很好，當大學生嘛，學習科學知識嘛。”然後又點點頭：“但我告訴你，你就是再使勁表現也沒用，就是全世界的知青都死光了，也輪不到你。”最後柳書記心平氣和地說：“你就在這裏扎根吧。”

李木鷄看著柳書記，忽然眨眨眼。柳書記又故作和藹地一笑：“你不用眨眼，眨眼也沒用。”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李木鷄眨眼似乎另有含義。

我至今仍然沒搞清楚李木鷄跟柳大丫是否真有關係。柳大丫是柳書記的獨生女兒，一個俊俏潑辣的農村女孩兒。那時村裏的女孩兒下田都愛跟知青在一起。尤其李木鷄，他越是沉默寡言，反而越招女孩兒喜歡。

當時已是晚夏，正值除草季節。除草要兩人一組，一般是一男一女搭配，男的在田裏除草，女的用籬筐背出去。那段時間，每到分派農活，我就發現柳大丫總是先向李木鷄擠一擠眼，輕輕說一聲“斬草”，然後，兩人就一起鑽進玉米地的深處。

柳大丫為什麼不像當地人一樣說除草，而偏偏說成是斬草？我曾和高大同一起琢磨過這個事。可以肯定，這個說法一定是她從李木鷄那裏學來的。也就是說，在李木鷄與柳大丫之間，應該有著某種只有他兩人知道的默契。

柳大丫出事是在那年的秋後。事後據村裏有經驗的婦女議論，柳大丫的妊娠反應之所以不明顯，很可能是她身體強壯的緣故。總之，直到她的肚子開始顯山露水，才引起柳書記的注意。柳書記極為生氣，甚至怒不可遏，可仍然只是不動聲色地展開調查。柳書記從高大同那裏得知“斬草”的疑點時，極感意外。

他簡直無法相信這件事竟然會牽扯到李木鷄，再想又覺得確實不是沒有可能。李木鷄眉目清秀，戴一副眼鏡，白靜斯文。柳書記知道，這樣的年輕人正是自己女兒喜歡的。如此一來，柳書記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柳書記的心裏很清楚女兒的性格。如果去直接問她肚子究竟是誰搞大的，女兒一定誓死不肯說出來。但作為一個大隊書記，自己女兒的肚子被人家搞大了竟還找不到罪魁禍首，面子又實在說不過去。于是高大同不失時機地為柳書記獻了一計。這時高大同已被推薦去上大學，剛通過政審，正在填寫各種表格。

一天晚上，柳書記把李木鷄叫到自己家裏說：“有一些話要問柳大瞎子，你去把他帶到

我這裏。”然後又特意叮囑：“這件事，不要讓村裏任何人知道。”

關於柳大瞎子占卜測字，村裏有很多傳聞。據說曾經有一次，生產隊裏的豬倌突然丟了一頭小豬。柳大瞎子就讓這豬倌寫一個字。豬倌不會寫字，只在地上畫一個圈，又在中間點了一個點。柳大瞎子一看就笑了，說：“不用找了，這頭豬已經被你吃掉了。”豬倌楞了楞，當然不肯承認。柳大瞎子說：“你畫的這是一口鍋，那鍋裏還煮著肉呢。”豬倌挺一挺脖子，說你怎麼就認定這是一口鍋？柳大瞎子說：“即使不是一口鍋，也是一張嘴，那肉在你嘴裏叼著還沒咽呢。”

豬倌仍然不服氣。柳大瞎子又笑一笑說：“你也不用不服氣，就算不是鍋，也不是嘴，至少應該是一個屁眼兒。你吃的豬肉已經變成屎，眼看就要屙出來咧。”

豬倌一聽這才無言以對。事後在這豬倌家的房後，果然挖出一堆豬毛，中間還裹著白花花的骨頭。

李木鷄將柳大瞎子帶來，柳書記沉著臉說：“今天迷信不迷信就不講了，為什麼叫你來，我也不想細說，只讓你測兩個字。”柳大瞎子沒說話，只是點點頭。

柳書記就在一張紙上寫了“因”和“青”兩個字。這兩個字是高大同事先告訴柳書記的，僅從字面看就有些暗示的意味。柳大瞎子並不動聲色，只是微微想了一下就搖搖頭說：“這青字可不好，它是清字缺水，靜字缺爭，你家是不清不靜——大概是遇上了煩心的事。”

柳書記一楞，連忙說：“你具體說。”柳大瞎子却搖搖頭，又搖了搖頭。柳書記看看他，問怎麼回事。柳大瞎子嘆口氣說：“不敢說。”柳書記說沒關係，你只管說。柳大瞎子這才又小心翼翼地說：“再看這個青字，上邊是生少一撇，下邊是育有一月。這就是說，家裏應該是誰有了身孕，恐怕就要生育了。”

算到這一步，就算已經挑明瞭。柳書記的女人已將近六十，要生育也只能是獨生女兒柳大丫。柳書記的臉色立刻難看下來，看著柳大瞎子說：“你接著算。”柳大瞎子看看柳書記：“算誰？”柳書記說：“你應該知道。”柳大瞎子瞥一眼身邊的李木鷄，“嗯”了兩聲。柳書記擺一擺手說：“你只管說。”

柳大瞎子這才又指了指那張紙上的字，說：“其實不用算，只要看一看這個因字也就清楚了。外邊的方框是一間屋，裏面的大字是一和人。如此看來，應該是這屋裏的一個人啊，可這屋裏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那還能是誰呢？”

柳書記慢慢歪過頭，很認真地看看李木鷄。李木鷄似乎沒聽見，仍然面無表情地站在那裏。我一直不相信柳書記會真的相信柳大瞎子的這些話。

沒過多久，高大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說是他上大學的檔案被上面退了回來。公社考慮到他在村裏一向表現很好，就安排他去一座煤礦。公社領導告訴他，那是一座很大的煤礦，連綿起伏幾百里都是礦山。

更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將高大同取而代之的竟是李木鷄。據說村裏將李木鷄的材料報去公社時，還特意附了一份以全村貧下中農名義寫的鑒定信，信上說：李木鷄同志在村裏一貫表現突出，各方面素質也很好，經貧下中農研究，一致認為應該送去上大學。當時正提倡“成份論，不唯成份論”，強調家庭出身不能選擇，但個人所走的道路可以選擇。因此，李木鷄就作為一個特殊的典型，被批准去上了大學。

父親很嚴肅地找我談了兩次話了，是關於我們家族的事。因我寫的所有文章中，只要提到我的出身，都說我是從西北黃土高坡貧苦農村家庭走出來的，父親說這與事實不符。但我每次找個話題就岔開了。昨天，父親讓本家的叔叔寫來一封信，好讓我正本清源。

我沒有見過爺爺，他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去世了，我六十年代才出生。但爺爺在家裏的影響很大，奶奶、爸爸、叔叔和姑姑常提起他來。

我上小學之後，就很少提起爺爺，也很少對外人講爺爺的事。走出黃土高坡後，就更少提起他了。但我心裏永遠有一個解不開的結。

記得剛上小學時，班上同學打我，說我爺爺是國民黨軍官，解放後被共產黨拉到渭河灘裏槍斃了。我很委屈，跑回家問奶奶。奶奶告訴我，爺爺不是被槍斃的，是病死的。但我去學校爭辯沒有任何用，班上同學都認定我爺爺是被槍斃的，老師也不同情我。

記得小學三年級時，我在一位同學（也是我好朋友）面前炫耀說，我爺爺是國民黨的軍官，他去過外面許多城市。這位同學把我的話告訴了老師。老師在班上開我的批鬥會，一連開了好幾天，還讓同學們往我臉上吐口水，女同學吐的是口水，男同學把鼻涕擦到我的臉上。我的臉像痰盂一樣有泪水、有鼻涕、有口水。開完批鬥會，我就在小河邊上把臉洗乾淨回家。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家人。

四年級時，我們學校裏抓出了 3 個反革命的小學生，整天在他們的脖子上挂著大牌子開批鬥會。我大伯也從村上被帶到小學裏批鬥，批鬥我大伯的理由也是因為我爺爺。爺爺留下了許多照片和黃埔軍校的通信錄，大伯偷偷把它們藏在我們鄰村華南埠的一戶貧下中農家裏，結果被他家的女婿揭發了。這個女婿把照片和通信錄都交給了公社，而我大伯因藏“變天賬”整天被批鬥。當時大伯一直沒有承認是他藏的，說是爺爺藏的。其實據我瞭解，大伯確實有藏點文物家譜的習慣。

在老師和同學們批鬥的發言中，我同時也知道了我爺爺和我們家族的一些事。？

我爺爺的另一個兒子也是一名國民黨軍官，與日本人打仗時，在山西中條山陣亡，沒有找到尸首。爺爺在紙上寫下他的姓名和生辰，然後把這張紙埋在了老家的墳地。其實這座墳是空墳。？

因為有這些經歷，我很少提到爺爺。記得我的第一位女朋友曾問過我：“你爺爺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沒有見過，據說在國民黨的軍隊混過幾年飯吃。”

我爺爺的名字叫潘爾桑，字樂伯。桑字很難認，一般人讀不出。但爺爺告訴爸爸說，他剛到黃埔軍校時，蔣介石點名，桑字讀對了。

本家叔叔的來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潘石屹沒有見過他的祖父，可能只有理性的瞭解，缺乏感性的體認。樂伯先生當年是東泉高小與胡文鬥齊名的高材生，又有北京高等警官大學和黃埔軍校第六期的雙料學歷。他為人忠厚，淡泊名利。1953 年經鄧寶珊提名與我父親一同列入愛國民主人士的行列，納入統戰對象。然，天不假年，他却過早地逝世了。應提醒潘石屹，要講自己是愛國民主人士的家世，是將門之後。強調自己出生地和家庭的貧窮是可以的，但不要忘了自己是從有文化素養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

馬上就到清明節了，我們懷念那些故去的親人們。感謝親人們在護佑著我們大家。？

1998年3月23日上午，父親齊尊周在洛杉磯長堤自己的旅館裏與世長辭，享年86歲。

父親86歲生日時，信心十足地向我們拍胸膛：“別擔心，30年內死不了。”對此，我們毫不懷疑。好像上帝給他打了包票，否則他怎麼會看上去才60出頭？

顯然，這一次，父親沒有遵從他一輩子身體力行的“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做人準則。

父親正在等待女兒家貞從澳洲到美國陪他回中國重慶。家貞趕到，他却先走了。走時，5個兒女沒有一個在他身旁。

他準備好的大箱子，裏面裝的東西和他14年前出國時帶的大同小異：換洗衣物，日常用品，還有一把掉了5根齒的發黃的塑料梳子，那是1946年他從美國回上海時帶給媽媽的禮物。不同的是，現在的箱子裏多了一個大紙包，那是父親在六四期間和之後，陸續捐給民運團體和個人的寄款單、收據等，其中有200美元是寄給林希翎的，她在美國出車禍住院。

大概所有的收款人都不會想到，給他們捐款的竟是一個80上下的老人，出國時已經72歲，囊中羞澀，一窮二白。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是個什麼人？他度過了怎樣的一生呢？

父親生于1912年11月，海南島文昌縣人，12歲背井離鄉隻身去上海求學。13歲父母雙亡，單槍匹馬闖天下。高中畢業後，進入杭江（西）鐵路工作，追隨德高望重的鐵路界老前輩謝文龍先生，決心以鐵路運輸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父親以充沛的精力，吃苦耐勞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廉潔奉公大公無私的品德，以及勤奮好學頑強進取的精神，在短短10年裏，從月薪30元的實習生、列車員，晉升為月薪460元的專員兼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父親出生入死，到最危險的地方為抗日出力。特別是保山搶料，他臨危請命，冒死去保山搶運抗日物資。其時也，所有車輛均從保山往外奔逃，唯獨父親的那輛卡車風馳電掣由內地朝保山飛奔。他帶領的部下員工在槍林彈雨中勝利完成了搶運任務，因功勛卓著受交通部通電嘉獎，獲獎金一萬元。

1945年5月，中國為培養戰後建設人才，由美國“租借法案”撥款，考試選拔各部門優秀人才赴美深造。僅高中畢業的父親，以出類拔萃的成績榜上有名，實現了他去美國求學深造的夢想。踏上美國土地，父親代表500名實習生用英文作了詞情并茂的演講。一年實習結束，他成為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會員。這是一個世界性學術團體，中國只有兩名會員。父親懷著把自己的國家也建設得像美國一樣繁榮富強的赤子之心學成歸國。

回國後，父親曾任首都南京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南京市鐵路管理處處長兼首都公共汽車總經理等職務。上任伊始，他大刀闊斧清除積弊，整治貪污，修訂規章制度，梳理當時國共內戰混亂不堪的交通秩序。他身先士卒吃苦在前，為所有職工安排了住宿，自己則睡辦公室的行軍床，家屬從上海搬去南京後住在玄武湖廟裏。父親在當時貪污腐化的污泥濁水裏潔身自好，保持住自身的一片乾淨，受到全體員工真誠的愛戴與擁護。

父親春風得意青雲直上，曾受邀去總統府參加蔣介石總統宣誓典禮，與蔣總統面對面三鞠躬，是鐵路界最有希望的少壯派。他的理想是當中國鐵道部部長。

1949年2月，父親放棄謝文龍先生提供的去廣州住洋房配小車發港幣待遇優厚的職位，接受重慶鐵路局鄧益光局長之邀去重慶就任運輸處處長。

1949年11月，父親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去臺灣升官、去香港、新加坡做生意發財的邀請，堅留大陸。他對共產黨宣傳的“八項諾言”深信不疑，他被“量才錄用”的許諾深深吸引，他對國民黨貪污腐化深惡痛絕，對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滿懷希望。父親要為生他養他的土地奉獻自己的一腔熱血和一技之長。

共黨建政後，父親曾任西南鐵路局運輸科長兼重慶大學鐵道運輸系正教授。兩件事上，

他觸犯了上司。一件，他當眾站起來反駁駐鐵路局的軍代表：“你講的（國民黨的官吏沒有一個不貪污的）不是事實，我齊尊周就一分錢沒有貪污過！”另一件，所有鐵路局官員，就父親一個人拒絕領公費發的呢制服。他說國家百廢待舉，這是在集體貪污。

1951年1月的一個清晨，父親去上班之後再也沒有回家。在被鐵路局軟禁1年零7個月之後，1952年8月他被開除，未經審理宣判，直接送到二塘公益磚瓦廠勞動改造。之後，他一直在就業隊、集改隊裏開山放炮、修鐵路公路、建橋梁隧道等。

1961年9月，父親被公安局逮捕，從頭腫到腳無法站立的他爬著去受審。儘管對女兒齊家貞“反革命叛國集團”一無所知，仍被裁定為幕後指揮教唆犯，判刑15年。

父親“解放”前順利通過了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兩個人生大關，現在，他要在無產階級的專政機器四川省第二監獄裏，闖過威武不能屈第三關。

???高級知識分子齊尊周的第三關闖得很出色。他的思想不接受改造，從不寫字，只在每年年終借筆在半張草紙上寫個人總結。他拒不“靠攏政府”，只有一次，請求政府釋放他年輕的女兒，剩下的刑期由他來坐滿。他贏得了全監皆知的反改造美名——花崗石腦袋。

在監獄的13年裏，父親每天洗冷水澡，寒冬臘月從不間斷。他利用一切時間鍛煉身體。清晨，圍著球場發瘋地跑步。中午，哪怕是酷暑炎夏別人在休息，他赤腳在滾燙的場壩上奔跑，腳底燙出一層厚繭。50歲出頭的他同二三十歲的青年人打籃球，重重的摔下去，蹦起來再追打。獄吏說，看看齊尊周，他在想什麼，他是在同無產階級專政鬥爭到底。

齊尊周要把身體練成鐵，把意志鑄成鋼，他要跟迫害者比命長，要活下去伸冤。

1974年11月，釋放留隊已63歲的父親從省二監請假回家。跨進家門，床上沒有“病中”的孩子們的母親，牆上挂著黑鏡框的照片，父親恍悟，他的愛妻已經不在人間。母親患胃癌，逝世兩年了。父親老淚縱橫：“媽咪，你不守信用，說好的你比我堅強，讓我先走！”

過去，飛機輪船請不動的齊尊周，現在，正千方百計尋找出國門路。

1984年秋，父親去了巴黎。次年春，他踏上美利堅的國土，參加美國鐵路高級管理人員協會年會。大會上，他用閑置了36年的英文作了3分鐘發言，然後，當了美國黑民。

出國前，父親對送他去廣州的大兒子興國說：“等著吧，你的爸爸72歲第二次出國打天下。”他真的打出了一片天下。父親染發冒充50歲找工，體力活累得尿血，額頭被黑人用棍棒打裂口，肋骨被撞斷兩根……用名副其實的血汗錢，他幫助了一批親人包括女兒齊家貞先後出國定居。

1992年4月，80歲的父親買了旅館。有了自己的產業，他才可以為所有子女兒孫出國搞經濟擔保。一位移民局官員在父親的定居面試時說：“80歲了還有勇氣買生意做，我為能見到你這樣的人深感榮幸。”

父親一生中他以無與倫比的勇氣、智慧和超凡的毅力決心，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創造了不勝枚舉的奇迹。這一次，奇迹沒有出現，瘋狂的癌細胞從胃部轉移到肝臟，經過一年頑強殊死的搏鬥，父親終於倒下。

???1949年“解放”後飛來橫禍，監獄、准監獄裏度過了23年，父親身心長期橫遭摧殘。1984年出國前，他甚至沒有真正吃過一餐飽飯。在他72到86歲生命的最後14年裏，為了後代的出路，父親超負荷運轉，不顧一切地燃燒消耗著自己的健康與生命。上帝即使給了他雙倍的燃料，他已經用到燈盡油幹；上帝即使給了他雙倍的壽延，他已經提前支取使用！

父親啊，你走得太年輕，除去被糟蹋掉的50個春秋，你是才37歲的年輕人！父親啊，你走得太委屈，你是一隻高飛的雄鷹，突然被折斷翅膀，鷄一樣屈辱地苟且偷生！父親啊，你走得太匆忙，還有那麼多想要做的事來不及開始，哪有空閑來面對死亡！父親啊，你走得太不是時候，正當苦盡甘來，打算回國接受中醫治療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你却撒手西去！

但是，父親，你死得那麼平和安詳，像在無憂無慮地靜睡，因為你死得無愧。你無愧于那塊賜予你生命的土地，你無愧于培養你一片忠誠的同胞，你無愧于你身邊所有的人——你

的妻子、兒女、你的親朋好友，以及那些你捐贈給他們總數近萬美元的那些你根本不認識的人們。你對別人慷慨解囊，却單單不這樣對待你自己；你一生中只虧待了一個人，那就是你自己。你掏出你滾燙透亮的心，潑灑你沸騰殷紅的血，都是爲的別人。你的不同凡響之處，天地昭然，人神共知。你用你的血肉和生命實現了自己的信仰：人生的意義是給予。

一個傷痕累累，但是不屈不撓的靈魂升天了。我們懷著無盡的哀痛、無窮的思念向父親告別，向一位不可多得的奇人，一位光芒耀眼的悲劇英雄，一隻折斷了翅膀的雄鷹告別！

父親，安息！

???

補白：父母曾給我講述家鄉的一例真事。那時鎮上有一位文學青年，眼看民衆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就給毛澤東寫信，其中有一句“兩股巾巾摟著球”，意思是褲子爛得連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這封信還沒到毛手裏，市里的幹部就查到鎮上。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永川十二中的操場，當著幾萬人的面，革命者對該青年進行吼鬥。此人嚇得魂飛魄喪，後來被連開數槍，腦漿迸濺。這還沒完，革命者們拉著這個青年的屍體，在操場繞了幾圈，再叫人民群眾紛紛上去踩屍體，以表革命之志。

楊銀波

#### 淮安席橋記事 秦九鳳

1966年文革爆發時，農村最早的響應行動是除四舊。筆者當年25歲，也參加過一次除四舊行動。在大隊黨團支部聯席會議上，共青團支部書記顏慶洲發言說：“人家外地到處都在掃除四舊，搞得轟轟烈烈，難道我們大隊就沒有四舊？我們爲什麼不去除？我們還要不要緊跟毛主席鬧革命？”他這麼一說，立即有人掏出《毛主席語錄》，念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於是會上20幾個青年人一哄而起，會也不開了，就去除四舊。

走出大隊部沒多遠，有人問：“我們到哪家去除？”七嘴八舌一番議論，有人說，五隊程鶴松家有海外關係，他家肯定會有四舊。於是20幾個人到程家翻箱倒櫃，把人家舊時用的捎馬子、錫燙壺、銅火爐、小脚女人穿的釘鞋等統統翻了出來，特別是程家每年端午節都拿出來供奉的判官老爺畫像（當地人稱“老判”）和放在壽材裏的兩個不倒翁等也搜走了。

在回大隊部的路上，老判被放在四岔路口地上，幾個男青年一邊喊著“你們幾個女的臉掉過去”，一邊扯下褲子就往老判臉上撒尿，嘴裏還說著“給您洗洗臉，送您上西天”。那幾件值錢的銅錫器，作爲廢銅爛錫賣給了供銷社的收購站，并當場從供銷社門市部買了一套鑼鼓，交大隊文藝宣傳隊使用。

文革一開始，我還是真心擁護的，後來造反派們打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大幅標語，作爲祖輩種田出身的我這時才在心底悄悄產生動搖。1967年春節前借一次送信的機遇，我到程家向程家二位老人認錯、道歉。程家二老十分通情達理，原諒了我。幾十年過去了，我仍對自己跟別人一起去程家抄家感到痛悔（雖然我不是主謀）。程家二位老人已去世幾十年了，我還感到對不起人家。那也是我在文革中唯一做錯的事。他們的墓和我哥哥的墓在一起，每當我躑躅到他們的墓前，心中愧悔之意便油然而生。回顧以往，只能說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淮安縣席橋鎮秦莊村社員陳友成是個老實巴交的種田人。因家窮，前半生未娶上老婆，40多歲了才與一寡婦同居生活。他不識字，輩分也不高，50多歲了，人們見他還是叫他小名“小成兒”。與人談話中，他也常以“成兒”自稱。



1968 年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深挖階級敵人”最厲害的一年，挖出的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壞分子比比皆是，一時人心惶惶。

1945 年淮安從日偽手中解放之後，成立了共產黨蘇皖邊區政府，進行土地改革。1946 年 9 月，國民黨軍隊又打回蘇皖邊區，勒令在邊區政府當過一官半職的人統統要到國民黨區公所集結自首。陳友成在邊區民主政權期間曾做過幾個月的農民互助組組長，也被要求去自首，否則就得去坐大牢。農民互助組本是由政府基層幹部組織起來的農民互助組織，比如有牛的幫沒有牛的，有勞動力的幫沒勞動力的，還可以以人工換牛工，互相取長補短，根本不是政治組織。但是保長告訴他，自首就是拿一石五鬥（約合 75 公斤）糧食到區公所畫個押，然後就沒事了。實際上這是國民黨基層政權的一次刮地皮行爲。陳友成是一個窮人，既怕事，又拿不出一石五鬥糧，托了熟人，用小毛驢馱五鬥玉米到國民黨淮安縣十一區區公所所在地（蔣家大樓），交了糧食，捺了手印，算是自首了。

1948 年，共產黨再次解放淮安，此後的幾次肅反、鎮反都沒有牽扯到陳友成。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陳友成自首一事竟在檔案中被發現。那天下午，生產隊布置在蘿蔔地裏拔草，做到 3 點多鐘工休時，陳友成一邊悶頭吸旱烟，一邊悄悄對身邊的人說：“成兒一輩子沒丟過人，這回不得了了。”別人不知底細，就說他：“你怕什麼？你又沒做過壞事。”“你沒幹過國民黨，也沒幹過共產黨，投敵自首更靠不上邊！”不說還可，一說他更加膽戰心驚，乘人不備，悄然回家。

工休結束之後，記工員發現陳友成不在，便大聲呼喊，可是左喊不應，右喊還不應。他家就在蘿蔔田邊，記工員就去他家找，發現他已上吊自殺。有人忙跑到大隊部報告。當時我正在大隊部辦公室，立即用大隊的手搖電話通知席橋醫院，請派醫生搶救。隨後我騎車趕到現場，一摸陳友成，身體仍然溫熱。上吊的現場，那拴繩子的橫梁只及我的肩頭高。陳友成個子雖比我小一些，但那個高度也無法使他懸空致死。他完全是倉皇之間尋死，自己收縮自己的身體讓自己氣絕身亡的。這一年他 56 歲。

劉從明醫生趕來用聽診器一聽，心跳已無，陳友成的臉色也完全變了。後來我常想，如果農民中有人會一點急救的技巧，或許還能把他搶救過來呢！

有一年春節，幾個生產隊的男勞力集中到一起搞水利，五隊的張洪樞也拖著一把鐵鍬隨著人流來勞動。張出身地主家庭，1949 年在上海讀高中時隨解放軍南下服務團到廈門，先後任廈門市共青團市委秘書、市工業局代理局長等職，1957 年因在整風會上提意見被錯劃右派，遣回原籍監督勞動。文革期間極左盛行，作為右派分子的張洪樞自然更是低人一等。

那些革命小將們看見張洪樞就紛紛議論：“戴著眼鏡挑河工，淨出洋相！”“可不是，貧下中農哪個戴眼鏡？”“狗改不了吃屎！”“資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就是右派分子！”小將們越說越來氣，有一位竟停下手中的活，一個箭步跨到張洪樞面前，以命令的口氣說：“把眼鏡拿下來！你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張洪樞稍一遲延，小將一棍子把眼鏡敲了下來，險些把張的眼睛打瞎。

張洪樞的二哥叫張洪濤，戴有反革命的帽子。1975 年底，全國農業學大寨工作會議後，上邊給我們大隊派來了學大寨工作組。工作組權力很大，稍不如意就可以把某個幹部挂起來甚至撤職。工作組負責人在公社三級幹部會上公開講：“我們來領導你們學大寨，沒帶錢來，也沒帶農藥和化肥來，只有逮捕幾個人方便些！”真是無法無天。果不其然，筆者僅因向工作組提出“請你們多搞些調查研究，然後再發言”的建議，就被指為矛頭膽敢對準工作組，勒令我交出大隊公章，被挂到一邊。

轉眼就到了 1976 年春天。工作組從外地搞來一頭良種約克夏母豬，給我們大隊的第五生產隊。飼養不多久，這頭母豬發情了。生產隊長派兩個貧農社員和反革命分子張洪濤趕母豬到附近的淮安原種場配種。那頭母豬有五六百斤重，力氣很大，加之發情，根本不聽人使

喚。3 個人無法趕它走，于是經生產隊長陳友高同意，由五六個壯漢將母猪捆起來，抬上平板車，3 人輪流拉車去配種。

到了配種處時，老母猪不知是因為捆綁難受，還是因為見到種猪使性子，兩條前腿繩子還未解開就拼命掙扎，結果從車上重重摔到地上。由于它在離圈時吃得太飽，加之身體太重，結果腸子被摔斷，外部雖沒傷，可是經不住體內流血，不一會就死了。

這下禍闖大了。工作組的劉隊長斷言：“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這一新動向的矛頭是直接對著學大寨工作組的，也就是對著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這個階級敵人就是張洪濤。趕快搞一下材料，把他抓起來！”

能搞專案材料的人不多，于是我這個被挂起來的幹部就又要用了。他們讓我和大隊團支部書記居正興調查張洪濤的反革命罪行。經過兩個多星期的調查，做了十幾份筆錄，我發現這頭老母猪從出圈直到摔死，張洪濤沒碰它一指頭，怎麼也不能說這頭老母猪是張洪濤有意弄死的。

我和居正興如實彙報，那位工作隊隊長竟沖著我拍桌子發脾氣：“思想太右了，這麼明顯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也查不出來，怪不得你們這兒這麼落後！”然後向我們揮了揮手。我當即知趣地起身離去，但身後的話我聽得清清楚楚：“永不重用！”我知道這四個字是沖我說的。

張洪濤後來雖未被抓進監，但還是在全大隊社員大會上挨了一頓惡鬥，被一些革命小將狠狠踢打了一頓。

## 探父親 孫雅臣

1967 年我 7 歲，正是文革浩劫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被定為有歷史問題的當權派、走資派之後，我們舉家遷往距省城 200 多公里的一座小城。剛到那座小城的時候，可能是由于父親在當地資格老、級別高的緣故，全家被安排到一座很安靜的小院居住。我記得那座小院裏有一個不小的葡萄架，上面綴滿了一串串青紫相間的葡萄，幾棵桃樹、梨樹也都結滿了果實。春天來時，院子裏落滿了桃花、梨花，煞是好看。這座小院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此外再也沒有值得我留戀的童年生活了），儘管它非常短暫。在當時暴風驟雨的環境中，這座小院子也顯得格外寧靜。

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父親的問題也進一步升級為“反革命特務、叛徒”案，被押到洛陽龍門山上勞動改造。我們全家也被趕出了那座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童年回憶的小院（造反派新貴霸占了小院，我以後再也沒有回去過），趕進一座破爛不堪的大雜院。

大雜院裏住著幾十戶人家，房屋年久失修。幾年間，單是我家住的房子就倒塌了兩次。吃水靠兩口混濁的水井，廁所是用土坯牆圍起來的大糞坑。住在這座大雜院裏的大都是右派、走資派，還有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三教九流。大雜院裏生活著一大群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有一百多個。與我常在一起玩耍，關係最要好的有兩個。一個叫小強，8 歲。一個叫小寶，比我小兩個月。

小強父親也被關押在龍門山勞改。小強的母親 3 年前因病去世，小強與 13 歲的姐姐相依為命。小強的父親在 50 歲上才有小強，而且是三代單傳，所以小強很得父親的寵愛。在父親未到龍門山勞改前，小強的父親經常讓兒子騎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大雜院裏玩耍、走動。小寶的父親同樣也被關押在龍門山勞改。小寶家裏的人多，有母親、姥姥和幾個哥哥姐姐，小寶是家裏最小的寶貝兒。？

小強是一個很有號召力的孩子，是大雜院裏同齡孩子中的娃娃司令。小強胸前總是挂著

用兩隻小竹筒捆扎成的“望遠鏡”，腰裏插著用小竹板做成的“戰刀”，頭上戴著他父親當年在軍隊時戴過的一頂大蓋帽。他常常煞有介事地舉起“望遠鏡”瞭望一番，再揮舞著“戰刀”，帶領一班小武士們東沖西殺，好不威風。那時文革正在火頭上，學校癱瘓，長期不開學。我和小強、小寶天天在一起瘋玩，無憂無慮。小強是我們的頭兒，我和小寶都很崇拜小強，因為他不但比我們長一歲，更重要的是他懂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那時候沒有玩具可玩，我們就在沙堆上玩造碉堡、壘城牆的遊戲，到河灘裏游泳、打水仗，開心極了。我們3人共有一隻價值3分錢的乒乓球，那可是我們的寶貝。除了我們三人，其他人是別想摸到的。

當時流行一句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在政治上的興衰也自然波及到孩子們的身上。那些憑藉造反起家的政治新貴春風得意，他們的孩子們也同他們的父輩一樣飛揚跋扈，時常到大雜院來騷擾欺負我們這幫孩子。他們來了之後，把我們在沙堆上精心制做的碉堡、城牆踩塌，並且在上面拉屎撒尿。大雜院的孩子們眼睜睜看著他們在那裏使壞，却敢怒不敢言。家裏大人有交待：“這些人我們惹不起。”弄不好在外面受了他們欺負，回到家裏還要挨大人的打，被大人揪著耳朵到那些新貴家裏去賠禮道歉。

每當新貴的孩子們來大雜院騷擾挑釁，小夥伴們都不約而同地圍繞在小強的周圍，期待著他的反應。小強總是眼含淚水，緊緊攥著一雙小拳頭，怒視著這些使壞的孩子們。等他們把我們的勞動成果破壞殆盡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小強再回身安慰身邊的小夥伴們。他總是能找到讓小夥伴高興的話來活躍氣氛。有一次，那些壞孩子又來使壞。當他們看到小強手裏拿著一隻乒乓球時，便一擁而上把小強按倒在地，去搶那只乒乓球。小強的手被抓破了，衣服也被撕爛了，可硬是沒讓把乒乓球搶走。他們走後，小強發現乒乓球被壓扁了，我還看到乒乓球上沾著小強手上流出的血。小夥伴們看到乒乓球被壓扁，都心疼極了。小強說：“沒關係，走，到我家去，放到開水裏煮一下就好了。”我們一群小夥伴就跑到小強家，打開爐子，燒開了水，然後把乒乓球放了進去。不一會兒，只聽“彭”的一聲，乒乓球竟炸開了。許多小夥伴都掉了眼淚。為這只小小的乒乓球，我們難過了好多天。

1968年夏季的一天，小強把我和小寶拉到水井旁一座廢棄的破房子裏，神秘地對我倆說：“我準備明天到龍門山上去看我爸爸，你們倆去不去？”我倆一聽高興得直拍小手：“去呀！去呀！”小強說：“今天早點睡覺，明天早晨6點鐘在大院門口集合。記住，要準備好乾糧，不要告訴家裏的任何人。”

第二天早晨，我們3個小孩子每人懷裏揣著紅薯面混合白麵做成的窩窩頭和花卷饅，準時在大院門口集合後就上路了。我們沿著洛河邊的公路向龍門山方向進發。從小城到龍門山有18公里路程。事先我們都不知道要走多遠的路，只知道只要沿著公路朝北走，就能走到龍門山。我們走啊，走啊，累了坐在公路邊歇一會兒，餓了啃一口乾糧，渴了跑到河邊喝口水。邊走邊玩，邊走邊問，大約在中午時分，終於找到了父親勞改的地方。

順著高大的圍牆，我們找到了大門。在門口，門衛擋住了我們。問明情況後，門衛拒絕我們進入。我們向門衛哭訴著軟磨硬泡了好久，最後還是被攆到了一邊。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小強說：“我有辦法，咱們可以爬到樹上往裏面看呀！”我們一起互相推拉著，爬上牆外的大樹，透過樹枝往大牆裏面張望。裏面是一排排的窑洞，我說這是我爸爸住的窑洞，他說那是他爸爸住的窑洞，越說越興奮，好像是故意氣那個不讓我們進大門的門衛。可能大人們都去幹活了，我們看了好久也沒有看到自己的父親。

太陽已經快下山了，小強說：“我們該回家了，不然天黑路就不好走了。”我們仨戀戀不捨地下了樹，離開龍門山，踏上了返程的路。

返回的路可就不像來時那樣輕鬆了。3個八九歲的孩子，一天要走70多華里的路，又累又餓。早晨帶的窩頭在來的路上已吃完，天色也漸漸黑了下來。渴了我們也不敢離開公路到河邊去喝水了，因為河邊太黑。我們只好忍著饑渴匆忙趕路，再累也不敢停下來歇息一下。後來在學校裏學到“忍饑挨餓”這個詞時，我的體會特別深。

走著走著，看到前面有一輛拉沙石的馬車。小強小聲跟我倆嘀咕了幾句，我們仨就急忙追上去幫助推那輛馬車，目的是討好趕車的把式，讓我們能坐會兒他的車。車把式看穿了我們的小把戲，同意我們坐車，但一次只能坐兩個人，因為要保持馬車的前後平衡。小強提出讓我和小寶坐車，他自己走路，因為他年齡比我們大。這一路他總是像一個大哥哥那樣照顧我們。我們也不示弱，一定要讓他先坐。3 個小夥伴互相推讓一番後決定輪流坐車，倆人坐車，一人走路，依次輪換。小強在車上呆的時間總是最少，他要照顧我們這兩個小弟弟。

馬車行了幾公里後就拐彎了，我們只好沿著公路繼續步行。天色已經很晚了，四周漆黑一片。我們又渴又餓，又累又困，實在是走不動了。這時隱約看到前方路邊有燈光，趕到後發現是路邊農民辦的小飯鋪。我們已經餓得頭昏眼花，兩腿發軟，個個東倒西歪的。飯鋪裏最便宜的食物是一毛錢一碗的“雜個”（一種近似雜燴菜的湯食），我們 3 個湊來湊去只湊了 7 分錢，用這 7 分錢買了大半碗“雜個”。

“雜個”端來後，小強說他一點都不餓，要我和小寶把它吃完。我和小寶說，如果小強哥哥不吃，我們也不吃。最後，3 個小夥伴你一口我一口，互相謙讓著把那大半碗“雜個”吃得乾乾淨淨。當然，小強吃的最少。吃完“雜個”，我們又匆匆上路。大約在晚上十二點的時候，3 個精疲力竭的小夥伴終於回到了大雜院。這一天，如果沒有小強的照顧和鼓勵，我和小寶恐怕無論如何也走不了那麼多的路。

當我們邁著幾乎癱軟的小腿踏進大雜院時，發現很多人都沒有睡覺。小強家門口圍站了很多，一隻很亮的大燈泡挂在小強家門外。這時人們發現了小強，急忙把他拉了過去。我和小寶也隨著跑過去，擠進人群。只見裏面擺了一張小竹床，小強的爸爸穿了一身很破爛的衣服躺在上邊，小強的姐姐趴在小竹床邊上哭得死去活來。

原來，昨天小強的爸爸在龍門山勞改的地方自殺了。上午尸體已經運了回來，而那時我們還在去龍門山的路上。小強站在爸爸的床前，沒有眼淚，只是拉著爸爸冰涼的手反復叫著：“爸！爸爸！…爸爸……！”在場的人們也都跟著留下了眼淚，一片抽泣。

多年後，每想起此情此景，我心裏還是有一種發顫的感覺。

父親平反後，我們全家遷離了那座小城，與小強再也沒有見過面。父親官復原職後，我和姐姐也都安排了 work。大姐在一個研究部門做工程師，二姐在一所大學做教師，我從部隊復員後被安排到檢察院做檢察官。多年後，一位來自那座小城的人到家裏做客。當我問及小強的情況時，他說，小強在父親去世後失去了經濟來源，與姐姐一起靠收破爛維持生計。後來，姐姐下鄉插隊因為生活作風不好，嫁給了一個年齡比她大很多的農民，現在大山裏做農婦。小強因為盜竊被判了兩次刑，刑滿釋放後又參與搶劫，前年“嚴打”時被判了死刑，槍斃了。

聽了小城來客的話，我懵了，腦子一片空白，一夜未眠……

補白：黑五類不能轉換成紅五類，但是紅五類或其他人很容易變成黑五類。劉少奇本是國家主席，紅到極點，因得罪了毛澤東，一瞬間就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成為黑五類之首。北京市一位工人，文革期間呼口號，將“保衛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保衛劉少奇”，馬上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筆者的一位親戚，本身是貧農，在 60 年代初大饑荒時期編了一句順口溜——“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來了吃不飽”，隨即被打成壞分子。因忍受不了批鬥、侮辱、打罵各種殘酷折磨，他選擇自殺，死後被指控為畏罪自殺。

寒坡嶺

小時候第一次參加大隊全體社員大會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大隊部的院子裏搭起高高的會台，台下全體社員或坐或站，聽革委會主任義正詞嚴、聲嘶力竭地在臺上講話。在會台的兩側，十多個黑五類分子在臺上跪著，低頭認罪。他們中間，可能有鄰居家的大叔，有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的大爺，那樣的熟悉，那樣地親切，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怎麼突然之間，他們全變成了我們的敵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過節或有重大慶典活動，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們就被罰去掃大街，搞衛生，這叫勞動改造。記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個比我大不了三兩歲的孩子，聽說是替他年邁多病的爺爺來打掃的。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彎腰弓背掃大街的樣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這種懲罰就像挂牌游街一樣，對心靈和精神的傷害要遠遠超過體力付出的百倍。那種羞辱，那種對人格尊嚴的踐踏，便是成年人也難以承受，更何況一個孩子！

這些黑五類分子所受到的歧視，今天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的，幾乎被剝奪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個年代血統論盛行，這種歧視不僅針對本人，還針對其子孫後代。黑五類的子女也成了黑五類，成了大家鄙視的對象，就連上學都受到限制。小學初中還可以，到考高中的時候就麻煩了。我很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個鏡頭：文革後期（或者是文革剛結束），正上小學的我，有一次到學校辦公室去，正好老師們在看初中畢業生考高中的成績。有位老師指著一個富農的兒子的名字說：“考得不錯，咳，可惜了！”一聲“可惜了”包含著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們的後代連婚姻權都被變相剝奪了——貧下中農、革命群眾的女兒誰願意嫁給一個地富狗崽子呀？我們鄰居有位老太太，那時候人們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兩個兒子拉扯大。等到兒子成年了，却怎麼也說不上媳婦，人家一打聽他們家的出身就吹燈拜拜了。直到文革結束以後，一個兒子才找了個二婚的，另一個兒子現在都五十來歲了，還在打光棍。

父親有位朋友，叫馬家驥，是我們鄰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當地很有聲望的老中醫，他本人則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語文教師。雖然他一直為人謹慎低調，業務又好，但最終也難逃文革的厄運。文革結束後，一次他到我們家做客，跟父親談起往事，仍感到心有餘悸。文革中他不僅被勒令停課靠邊站，而且受盡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們這些反動分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自編自唱所謂“混蛋歌”：“我們都是大混蛋，妄圖復辟來變天……”誰要是不唱或態度不好，紅衛兵的鐵拳甚至皮帶就掄上去了。馬老師文革後被平反解放，又恢復了教師的身份，而且成為一方名師，後來一直做到我們縣級市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我們村還曾經有一個文革前的北大畢業生，名叫邵中。他本來不是我們本地人，滿口普通話非常標準。上小學那會兒還記得他偶爾冒出兩句英語，說得很流利，但村裏人誰也聽不懂，越發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國，或在香港，或在臺灣，海外關係複雜，文革中倒了大黴，被下放到我們那裏。最後他在我們村找了一個姑娘結了婚，平反後被安排在我們縣一中任教，後來做了那個學校的校長。

我上初中時的數學老師張澤民，河北趙縣人，曾經是我爺爺的學生，又曾短期教過我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和善而又才華橫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謂反動言論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蹲過幾年大獄，在建築工地被強制勞動。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時光就這樣白白地荒廢了，直到文革結束才又重操舊業。他是我從小學到大學最為敬重的老師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時候，他調回了原籍，聽說後來相繼擔任趙縣的教育局局長和副縣長。90年代初我在農大讀研的時候我們邂逅過一次，後來就斷了聯繫。

雖然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有人不斷地播種仇恨的種子，而我們也曾跟著別人的調子高喊連自己都沒弄明白的批判口號，但內心裏對那些“反動派”却根本恨不起來，有時候反而心

生一種同情和敬佩感。這些黑五類分子，特別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學問。除了剛才提到的兩位老師外，還記得一位右派，在儒法鬥爭和批《水滸》的時候作為反面教員，被勒令向全體社員講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講得非常形象生動，對於我們這些整天高喊著革命口號，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將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於是，上小學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殺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蓋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邊去了。

補白：2010年5月4日，北京大學舉辦120周年校慶。幾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今已年逾古稀的老校友沈志庸、王書瑤和燕遁符，以及原北大法律系校友，反右中死難者之子俞梅蓀，在主席臺上舉出“右派冤”的字牌示眾，要求為反右運動受害者伸冤昭雪。閻桂勛老校友也在胸前掛著“冤”字牌站在會場大門口。在場的人有的表示同情理解，更多的人則是冷漠麻木，默不作聲，有的甚至說搞不清反右是怎麼回事。

當天在場的名人校友中，有位大名鼎鼎的抗薩斯英雄鐘南山先生。鐘曾就讀於北京醫學院，該校於2000年與北大合併，沾親帶故也算是北大校友。鐘在一片熱烈掌聲中當仁不讓地登臺演講。在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中，除了用大量時間自我表揚外，更不失時機地發表了如下的宏論：“剛才校友們（舉冤牌）的情況，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歷經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我把一切都看透了，這個賬怎麼算？找誰算？共產黨60年其實就30年做了正經事。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條就是要學會忘記，忘記過去，忘記苦難，要有好心態，要滿足現在的好日子。”？  
嚴家偉

#### 四舊破到宋慶齡 湯 雄

1966年夏天，宋慶齡家被紅衛兵與造反派包圍衝擊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的耳朵裏。當天，周總理立即派來了一個加強連（原先只有一個警衛排），分為三班日夜守衛與巡邏在宋慶齡家的內外。

為防不測，宋慶齡還令衛士長隋學芳關閉了兩扇大門，只在緊鄰衛生部的那扇東大門上開了一個觀察小門。

但是，家中依然難以獲得片刻的安寧。警衛連只擋得住狂熱的人們，却擋不住嘈雜的高音喇叭聲。每天都有不少紅小兵的來信送到宋慶齡手中，翻來覆去就是那麼一個意思：強烈要求宋奶奶不要再留那種資產階級的髮型與穿那些資產階級的服飾了。

每每看著這些筆劃稚嫩的來信，宋慶齡只會苦笑著搖搖頭，長長地嘆著氣說：“唉，孩子們不懂事，他們可別害了我們的孩子呀！”???

一天，江青來訪。幾句客套之後，江青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講起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宋慶齡平靜地望著面前這位“第一夫人”，端莊的臉上甚至帶著一絲淡淡的微笑。??? ???

宋慶齡忍不住打斷了江青的發揮，微微笑著提醒對方說：“對紅衛兵的行動應有所控制，不應使用武力，更不應傷害無辜。”江青的臉立即拉了下來，態度一下子變得冷若冰霜。

江青走後，宋慶齡一連幾天不高興。偏偏這時，上海傳來了令宋慶齡五內俱焚的消息：上海萬國公墓被紅衛兵當做埋葬舊社會資產階級的墓園，砸了個稀巴爛。宋慶齡的父母因是蔣介石的岳父母，所以其墳墓更是沒有逃過厄運，被紅衛兵連棺木都翻搗了出來，還來了個暴尸拋骨。

宋慶齡懷著悲憤，連夜向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差隋學芳把信送到了中南海西花廳，請求

保護親人的墳墓。

周恩來獲信後拍案而起，一邊給上海民政局打加急電話，命令民政局領導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做好宋副委員長祖墓的恢復與安置工作，一邊親自起草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在京民主人士的名單。在這份長長的人員名單上，宋慶齡的名字排在了第一位。??

重新修繕的宋氏墓地，原先墓碑上的宋慶齡的兄弟姐妹的名字被刪掉了，重新豎立的墓碑上只剩下宋慶齡一人的名字。

1967 年元旦的第二天，隋學芳因飲酒過量兼席上談及文革動了肝火，導致腦中毛細血管破裂，突然中風半身不遂了，年僅 38 歲。

震驚與惋惜之餘，宋慶齡只好向國務院機關事務局緊急報告，請另派人接替隋學芳的工作。沒幾天，該局給宋慶齡調派來一位 40 歲出頭的警衛秘書。本文姑且稱之為 S 警秘。

文化大革命的熱浪日甚一日，紅衛兵造反派每天都要簇擁在後海北河沿 46 號前，一遍遍地高呼口號，沖著宋慶齡居住的那幢主樓咆哮。本來就有失眠症的宋慶齡，這下更加難以入睡了。她徹夜難眠，坐臥不安。

無奈之下，宋慶齡只好親自下樓，要 S 警秘出面打招呼干預。誰知 S 警秘擺出一付左派的面孔，拒絕執行。“你可以試著勸阻一下的，或是好好地向他們解釋一下。因為整個家中的正常秩序都被這些沒完沒了的嘈雜聲打亂了。”宋慶齡儘量和顏悅色地對 S 警秘說。

“那，我就去試試吧。”S 警秘見宋慶齡臉色不好看，只好模稜兩可地應一句，站了起來。

更讓宋慶齡痛心的是，一些原先對她尊敬有加的工作人員，如今在 S 警秘脅迫下露出了勢利眼，明爭暗鬥，開始背叛，更有甚者竟沖著宋慶齡橫眉冷對，白眼相加。

宋慶齡後院起火了。家中的“濠梁樂趣”、“觀花室”、“聽鸛軒”等處的匾額、楹聯被視作封建的東西取下了下來，砸碎後送到廚房灶間。宋慶齡挂在居室裏的幾幅西洋人體畫，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殘餘，扔進火堆，換上了毛主席語錄。鋪在樓梯上與居室裏的全毛地毯，若不是宋慶齡及時加以阻止，也差點被 S 警秘等人掀起來卷走。就連宋慶齡最喜歡的小動物——鴿子，也受到了嚴重威脅，“如果宋慶齡自己不處理”，S 警秘就準備動手宰殺了。

這段時間裏，家裏再也聽不到宋慶齡彈奏鋼琴的聲音，也看不到她在花園裏閑庭信步的身影，放在臥室唱片盒裏她最喜歡的《可憐的蝴蝶》、《晚安》、《當我們年輕的時候》與《風流寡婦圓舞曲》等一批唱片，也都被她自己塞到了床下。她的臥室裏與床頭上，出現了大紅塑料封面包裝的《毛澤東選集》與《毛主席語錄》。??

補白：沙溪村有兩位姓程的，被劃為地主實在很冤！程家有座祠堂。祠堂名下有些田產，收入用于祭祖和家族活動。這些田由程家各戶輪流耕種，稱為公輪田。解放前一年，公輪田輪到這兩位倒黴蛋耕種管理。在山區，擁有 10 多畝土地就够戴上地主帽子了。他們因此被劃為地主，而此前輪種公輪田的人均為貧下中農。

這倆地主一個光棍，一個無妻但有一子。那孩子大約 13 歲，大家叫他阿谷董。兩家地主日子都過得慘兮兮的。阿谷董沒上學，跟著大人在生產隊勞動。有一天晚上，生產隊開會，不知為什麼，竟然在幾個小孩的起哄下，莫名其妙地把阿谷董吊在梁上抽打。因為“以階級鬥爭為綱”，沒有人敢為他這個地主的兒子講話。後來阿谷董得著逃跑的機會，跑到幾十裏外一個村裏，莫名其妙地死在那裏。生產隊派人把他的棺材用板車拉回來，就這麼埋了。

還有一位呂某，他的父親被劃為地主。地主經常被叫去接受訓話，因為父親病重，未成年的呂某就代表父親聽訓。父親死後，呂某被遞補為地主。呂某有個 10 多歲的兒子，常到清流縣山區幹木匠活兒，希望在那裏找個合適的人家當上門女婿，他說怕被替補為地主。

佚名

從平反到下海 鐵流

我被改正回歸報社的時間是 1980 年底，正是中國改革的起步歲月。先做文藝組編輯，後因受反精神污染的牽連，改行做農村記者，從此與改革糾結在一起。

所謂受反精神污染的牽連，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我寫了一篇反映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出現的新局面的小說《不願出監的人》，發表在 1981 年 4 月的《四川文藝》上。有人就此寫黑信給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說“被共產黨關押了二十三年的曉楓，回歸後寫出的小說仍誣蔑中國是座大監獄，老百姓生活還沒有牢裏犯人生活好”。時為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杜沁源在省宣傳工作會議上便對我橫加指責，同受指責的還有詩人孫靜軒發表在《長安》文藝月刊上的長詩《一個幽靈在大地游蕩》。

反精神污染來勢凶猛，全國反白樺，四川反我和孫靜軒，一時謠言紛紛：“曉楓要重戴右派帽子了”，“要重新抓進監獄了”，等等。我的新婚妻子被嚇得整天坐臥不安。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過去為一篇 8800 字的文章，被整整關押了二十三年，而今我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遂毅然告別文壇，到農業組當記者，跑郊區縣，寫眼見為實的新聞報導。

1981 年的中國農村正處在大變化的前夜，毛留下的人民公社已名存實亡，以隊為基礎的核算分配製早已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替代，廣大農村回到互助合作運動前的單幹形式。共產黨不再提倡以窮為榮，不再割資本主義尾巴，而是天天號召農民富裕起來。政治不再吃香，發展生產，搞好副業，多打糧食多掙錢，成了千家萬戶的奮鬥目標。

當時新聞報導的重點是萬元戶——那些會種莊稼又會搞副業、最先發家致富的農民。我瞄準了時代這個新動向，放開手筆大寫特寫農村涌現出的專業戶、萬元戶。我筆下所寫的這些人物立即成為鄉里縣上的“知名人士”，受到各方支持，銀行還找上門為他們貸款。專業戶、萬元戶的再發展就是鄉鎮企業，也就是“富起來的人要帶動更多的人富起來”的發端。為了鼓勵農民富裕，1982 年春，成都市召開萬元戶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人披紅著彩坐在汽車上，像新科狀元打馬游街招搖過市，威風凜凜光榮極了！

農村倡富，城市也倡富。政府號召人人去做生意，搞活市場，特別提倡無職無業的人去當個體戶，以緩解社會壓力，不再把經商設攤視為投機倒把。這些個體戶多是社會上無固定職業的人，也是過去歷次政治運動打擊的對象，不少人還是被判過徒刑而沒有平反的釋放人員。此時，大家不再講階級成分，也不談過去的災難，只覺得有錢就光榮、就體面，社會思潮向另一個極端發展。就連省委某書記的兒媳婦，為了錢不惜與權貴的兒子離婚，嫁給號稱有百萬資產的楊百萬的兒子。

為了探索這些人發財致富的秘密，我三次採訪楊百萬和許多著名的萬元戶。他們致富的共同特點是：不安於現狀，蔑視傳統，敢于打破框框尋求新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比如楊百萬，過去因投機倒把罪被判過五年徒刑，1979 年回到成都沒有工作。政府號召兩勞（勞改勞教）人員自謀生路，他便從江浙購回尼龍原材料，再分發給當地家庭婦女加工成蚊罩，然後賣給商店。經這番加工，利潤高達百分之五十。其他萬元戶賺錢的方法也大體如此。過去長期推行計劃經濟，視從事商品流通為投機倒把，使得地區差價越來越大，利潤空間也越來越大。溫州生產的小家電產品，只要運到四川就有五倍的利潤。那時敢冒此險的人寥寥無幾，故誰幹誰發財。這種工作，知識分子沒人去做，一是不屑，二是沒這個膽量，只樂於生活在傳統中，在溫飽窩裏打盹，讓別人大發特發。

在這個大潮中，起先我并未想到要下海，因為我活得挺充實，所寫文章全國報刊爭著刊發，每月稿費是工資的三四倍。在我們報社的群體中，我家是最早擁有三大件（冰箱、彩電、



洗衣機)的家庭。但是新聞業的壟斷，掌權者的專斷，最終迫使我做出了下海爭做自由人的決定！

1983 年初，四川出版社二編室的老朋友楊幹廷，邀約我和《四川日報》記者艾風，去成都錦城汽車製造廠採訪，寫一篇該廠廠長劉恩來勇于改革、大膽創新、使一個敲敲打打的生產作坊製造出汽車來的報道。劉恩來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區委組織部長，1957 年劃成右派後作二類處理，開除黨籍送到該廠的前身——成都錦城汽車修理廠當工人。被改正後的劉恩來升為廠長，不到五年把這個修理廠變成汽車製造廠（今天的四川豐田汽車製造廠），聞名全國。楊幹廷是“四川省文藝界二十四人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和劉恩來是難友。為了支持劉恩來，宣傳改革開放政策，我和艾風去錦城廠採訪了半個多月，寫出一篇一萬五千餘字的報告文學《劉廠長闖新路》，發表在《四川文學》上，很受一些讀者歡迎。

文章重點表現銳意創新、堅持改革的劉廠長與保守勢力黨委書記之間的鬥爭，近似天津作家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四川省廣播電臺決定播出，並將播送消息刊登在《四川廣播電視報》上。不知何故，此文牽動了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長許川的神經，竟在播前兩個小時下令撤播。許川對文藝創作的肆意干預引起我強烈不滿，我在電話中罵他是“黨棍”！

在寫劉恩來之前，我發現成都老百姓吃飽穿暖後對休閒場所有了新的追求。過去他們星期天常去的地方不外乎是人民公園、草堂寺、武侯祠、望江公園，而今肚皮填飽了，荷包裏有餘錢了，便想找個有山有水的地方玩。恰在此時我去遠郊蒲江縣採訪。蒲江是四川有名的窮縣，長期以來吃糧靠反銷，用錢靠貸款，連縣委辦公室都是幾間窄窄的平房。縣委鐘書記見面第一句話是：“黃記者，你走南闖北，見的世面多，能不能給我們縣出點主意脫貧？”我問蒲江縣有沒有什麼土特產，他說一是米花糖，二是白菜豆腐乳，還有臍橙。我想了一下又問，有沒有可以玩的地方？他回答有個朝陽湖還不錯，有水有山，有杜鵑花，還有一群一群的野鴨子。

蒲江縣距成都四十公里，當時需要兩個小時車程，來去不算遠，正可做成都的後花園。鐘書記當即帶上我，坐著一條很破舊的鐵皮船，繞朝陽湖游了一周。朝陽湖是個人工湖，座落在群山之中，青山綠水，古藤飄垂，曲徑通幽，野花似火，時有成群的野鳥野鴨起落游蕩在碧綠的湖面上。我立即表態說：“這是個好地方，蒲江的金窩窩。”很快，一大幫中央駐川記者和省市各報記者應邀到蒲江採訪。那時縣級幹部沒有官架子，書記、縣長親自給記者送水送茶，熱情極了，記者也嚴守職業道德，不伸手要紅包。很快，宣傳朝陽湖的文章出現在各報上。我寫的那篇通訊《朝陽山水四時秀》發表在《成都晚報》上，稱此地“景色尤瀘江，幽深勝三峽”。《成都晚報》發行量大，是成都企事業單位必訂的報紙，也是廣大市民喜歡的報紙。不到三個月時間，朝陽湖游客爆滿，一時間所有機關學校的空房全成了旅店，土特產品米花糖、白菜豆腐乳被搶購一空，並且出現了“進出困難”（沒有食品攤點和廁所）的問題，全縣工作重心因此不得不開始向旅游開發轉移。

至此我意識到，報紙不但是黨的喉舌，也是發展經濟的開路先鋒。為了解決成都與蒲江之間的直達客車問題，經劉恩來幫助，我以低於市場價位（一萬元）的價格為他們購買了十台錦城汽車製造廠生產的十三座旅游車。

蒲江的經濟上去了，我却遭到“抓耙爪”的密告。市紀檢部門懷疑我從中得了好處，對我進行調查，害得蒲江縣委五大常委不得不為我寫證明材料，以還清白。我雖然未受到任何為難，却發現有這個專橫體制在，就無法做事，特別不能做與經濟有關的事情。

促使我下決心做自由人的另一件事是我惹上了妻子教書所在的區教委。一位年輕的秦姓女教師，工作一直得不到妥當安排，加之她不能正確對待流言蜚語，竟致憂鬱成疾，自殺身亡。為此我寫了一篇《小秦之死由誰負責》的文章，發表在全國發行量最大的上海刊物《青年一代》上。想不到這篇僅僅 1500 字的新聞特寫竟累及妻子，使她險些不能參予職稱評定。這一連串不愉快事情的發生，說明中國的新聞記者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我價值，沒有法律

保護，僅僅是個工具而已。要不想當工具只能走自己的路，離開衣食父母的“組織”，告別追隨多年的共產黨——下海！

## 換親記 鐵 玉

辛酉大叔是富農，他有個兒子叫蛤蟆，我們住在同一條胡同裏。四類分子除了與大夥一樣下地生產，還要掃大街、掏大糞。辛酉大叔是專掏大糞的，天天拉大糞車，村裏人稱他是開坦克的，蛤蟆哥則被稱為坦克司機的兒子。有一個禮拜天，天下著小雨，我們四五個小孩子到離村很遠的河邊偷青辣椒。四周霧氣騰騰，看不到人影，可是我們却瞧見辛酉大叔和蛤蟆哥正在刨一棵大柳樹。

兩天後，學校操場上舉行批判會，一聲“把富農分子押上臺來”，辛酉大叔被兩個民兵架著胳膊展現在小學生們眼前，“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口號聲響徹雲霄。

民兵發現河坡上多了一個坑，少了一棵柳樹，而辛酉大叔家建房用的一根檩條卻是一棵去了皮的濕柳樹。民兵排長說：“河邊有幾棵樹，都是什麼樹，長什麼樣，我一清二楚，你李辛酉休想抵賴！”辛酉大叔給幹部送一條七分錢一盒的青山牌香煙，想以此逃避懲罰的事，也被檢舉出來，於是又獲得另一個罪名——拉攏腐蝕幹部。辛酉大叔只有低頭認罪。批判會的最後，幹部對反革命分子李辛酉進行宣判：“他刨我們一棵樹，我們就讓他栽一百棵樹！”辛酉家房子沒蓋成，反而把置備的建房木料變賣大半，買了一百棵胳膊粗的柳樹，種在村頭河邊上。

辛酉大叔蓋房本來是娶媳婦用的，地主女兒小鳳願意嫁給蛤蟆。由於偷柳樹案發，小鳳家決定乘人之危，提出要換親，否則退婚。小鳳有個哥哥，小時候玩火槍，有顆鐵砂打到腦子裏，落下左胳膊不聽使喚的殘疾。蛤蟆有個妹妹，叫水仙。小鳳可以嫁蛤蟆，但前提是蛤蟆的妹妹水仙也要同時嫁給小鳳的殘疾哥哥。如今蛤蟆家既蓋不起房，又背著竊賊的罪名，為了傳宗接代，辛酉大叔答應了。

最終媳婦也娶進門來了，可是村裏小夥子大約認為在富農家鬧洞房可以肆無忌憚，竟把新娘子的褲子給脫了。小鳳又羞又惱，掙開手脚，跑回了娘家。想不到娘家不但不為她抱不平，老爹反而把她大罵一頓，趕出家門。小鳳氣性大，一賭氣吃了老鼠藥。可恨那時假老鼠藥不多，小鳳被毒死了。

小鳳娘家不依，來一幫人把蛤蟆家的盆盆罐罐都砸了。嫁過去的水仙不答應了，跑回娘家，死也不跟殘疾過了，說：“誰再要我回去，我就吃藥死給你們看！”話說到這，誰還敢再說和，於是水仙和殘疾的婚事也黃了。

我們村子東北有一個廢棄的大烟囱，陽面寫著“一定要解放臺灣”，陰面寫著“唐縣冶煉一”。很多人不清楚這個“一”是怎麼回事，後來黃鼬姑告訴我，那“一”應該是“廠”字掉了一撇。

黃鼬姑本名黃鶯，原是電影演員，在電影《戰洪圖》裏演過一個不小的角色，因劃為右派，發配回老家。村裏給她起了個綽號叫“黃鼬”，我們小孩子都叫她黃鼬姑。黃鼬姑一家三口，兒子叫三毛，女兒叫四丫，都講標準的普通話，住在我們胡同裏一家地主的舊宅裏。這家人與其他村民不同，天天刷牙，夏日黃昏，黃鼬姑和四丫還穿裙子。有人對這一家三口的京片子看不慣，說他們是階級異己分子。四丫姐生性潑辣，反唇相譏：“那全北京城不都成階級異己分子了？”

村子裏只有結了婚的女人才留短髮，四丫却打破常規，剪得一頭短髮，平常也不避諱說“階級敵人”、“右派”之類的話，仿佛跟她沒有絲毫關係。那時我們小孩子常做一種叫做“天下太平”的遊戲，四丫姐說天下太平是不對的，“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敵人存在一天就一天不會有太平”。

辛西大叔家養一窩豬，豬崽兒常常到地主老宅的碾盤底下拱來拱去。四丫說這些到地主家碾盤底下亂拱的蠢豬就是階級異己分子，一定要把它們趕下歷史舞臺。四丫姐是要把豬哄走，我響應她的號召，拿起推碾的棍子竟一棍子打在一隻小豬的後腿上。天啊！我可沒想弄成這樣：那小豬翻了兩個滾兒，拖著癱了的兩條後腿嗷嗷叫著落荒而逃。小豬是從黃鼬姑家癱著跑出來的，辛西家知道了，兩家鬧起矛盾。也許是報應吧，不久，黃鼬姑的一頭一百多斤的大豬莫名其妙地病死了。

那時除了過年，平時哪能吃上新鮮肉啊！雖然豬是病死的，也不能扔掉。黃鼬姑把死豬煮熟了，分給街坊四鄰，特別是孩子們解解饞。黃鼬姑說：“吃吧，沒事的！我煮了有仨鐘頭，什麼牛鬼蛇神也都煮得魂飛魄散了。”鄰里都吃，怪香的。腸胃也都好，誰也沒吃出個好歹來。因了這死豬肉，黃鼬家與辛西家的矛盾也緩解不少。

有些階級覺悟高的村民却從中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給人家死豬肉吃，等于是給人民群眾注入毒素，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是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躲藏在陰暗角落裏伺機搗亂。于是又是一場批鬥會，也少不了高呼“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散會後，黃鼬一家被趕到村北的大隊馬棚裏吃住，並且要喂馬，打掃馬圈。黃鼬姑常用花椒大料把喂馬的黑豆煮熟了讓我們吃。三毛哥不愛說話，但人很勤快，把馬圈收拾得很乾淨。

轉眼間三毛和四丫也該考慮婚事了。雖然曾經是北京的城裏人，可如今虎落平陽，也只好把條件降低，就近把自己“消化”掉。有人提議黃鼬家和辛西家換親。蛤蟆和水仙倒是沒意見，不論怎麼說他們也算是結過婚的二茬兒了，可是水仙並沒有辦離婚，那門親事還在那裏不清不楚著哩，黃鼬姑家不敢娶。

有媒人給黃鼬提議與唐縣山區一個地主家換親。一聽要到深山老林去扎根，四丫姐說什麼也不從。于是媒人們提出三家轉親：四丫到蛤蟆家，水仙到唐縣山裏地主家，唐縣地主家的女兒嫁給三毛。雖然蛤蟆結過婚，畢竟沒有入洞房，四丫對蛤蟆還是比較滿意的，可是有一條：你蛤蟆必須答應把房子蓋起來，然後才能把人娶過去。水仙沒得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能逃出前一樁令人不堪回首的婚姻就好。見過面後，媒人問三毛滿意不滿意，三毛說：“滿意，滿意，是個蹲著尿尿的就行。”黃鼬姑姑笑罵：“瞧這王八羔子，半點人形沒有。”黑五類臭味相投，也同病相連，三家一拍即合，親事就這麼定了。三毛哥艷福不淺，實際上媳婦長得很漂亮，楊柳細腰，皓齒明眸。村裏人說，已經有個老黃鼬，又多一個狐妹子，一窩子妖精。

不論怎麼說，孩子要成親了，不能再讓人住馬棚，生產隊決定讓黃鼬姑一家又搬回了地主的舊宅裏。

那時在我們農村，成分高、兒女多的家庭換親很常見。要做到換親的當事人個個都稱心是想都甯想的。好在一旦成了家，柴米油鹽，要做的事兒，煩心的事兒，多得很，誰還有閑工夫考慮稱心不稱心。現在大半輩子了，我們胡同裏的大哥大姐們過得還不錯。

補白：1967年10月，廣西全州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民兵骨幹30餘名開會。會上，黃傳言湖南道縣殺地富的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鏟草除

根一掃光”，還宣布“不准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樣”。會議最後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將人推下黃瓜冲山洞摔死。黃要幹部們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務，各村自報名單。會後，黃天輝連夜帶民兵抓人，抓到立即押送黃瓜冲山洞，強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

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說：“天輝，我有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老婆也該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孩 3 歲，小的 1 歲，跳坑而死。1983 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黃天輝被依法逮捕，1985 年元月被處決。

會六國語又如何 王佳佳

我的父親原是國民黨高官，1948 年沒去臺灣。父親是大孝子，他要養活一大家子人。父親是抗日英雄，腿受過傷。他還是搞高科技的學者，非常自信。哪曾想，三反五反中，父親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判刑 2 年，監外執行，接受群眾管制。我們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偽官吏，全家老小成為反屬，受盡歧視。不管怎樣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後來還是在一家工廠找到了一個總工程師的職位。

然而好景不長，反右開始了。他們要父親提意見，不提意見就不散會。這樣的會開了一年多，就等著父親說話。我父親一看拖不過去，就提了一條意見，于是被定為右派，抓走了，而且被判了 10 年徒刑。

1958 年 10 月 8 日下午，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我放學回家，看到大門敞開，人群把我們家圍得水泄不通。我問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大娘告訴我：“你爸爸被抓走了。”我當時如聞晴天霹靂，差點暈了過去。進門一看，母親、兄弟姐妹都在哭，家裏亂作一團。

父親在我心目中是一個最善良、最英俊、最慈愛的父親。他高高大大，是個很帥的男人。他經常帶我們去放風箏，教我們打籃球、滑冰、游泳，好像一個天才、全才。他會英文，通六國語言，會拉小提琴，經常帶我們去買衣服。這樣一個父親，為什麼要被抓走？母親告訴我們：“你們長大了，你們要瞭解你們的父親，他是個好人！”

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了父親，也沒有他的任何音訊。我們一次一次去找，只聽說他是高科技人員，被關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做秘密的工作。他們在利用他一技之長的 10 年裏，我們一直沒有看到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從此我們所有的親戚、朋友都遠離了我們，連我的親姑姑也與我們劃清了界限，怕受株連，斷絕了來往。那時我們 5 個孩子還小，全家 6 口人的生活全落在母親一人身上。母親是大家閨秀，父親在時，她很少出門，從未工作過。我是二女兒，我說我不要上學了，可以幫助她幹點活。母親不讓，她說我們還小，要學習，有了知識才能工作，一切生活由她來承擔。

我媽媽也是知識分子，為了養活全家，不得不放棄了公社記錄員的工作，因為那個工作掙的錢很少。她請朋友幫忙，在環衛局找了一份掃馬路的工作，只因為口糧定量高一點。每天半夜 2 點鐘上班掃路，白天保持，收路邊的垃圾。原來她沒有幹過體力活，我們一再勸她不要幹，可她堅持要去。一天下來，母親累得腰酸腿痛，手上全是大血泡。她不會掄那個大掃帚，可一掃就是 4 小時。她說半夜上班很好，可以看到天上，看到街很靜，可以痛痛快快流淚，沒有人看見。就這樣，她堅持了 10 來年掃馬路的工作，最後她的手完全是厚厚的大繭子。

60 年代初，可怕的大饑荒來了。那幾年餓死了幾千萬老百姓，我們家幸存下來，沒有

被餓死，是母親爲我們付出了最勇敢的代價。那時每人每天二兩糧食，看著幾個孩子餓得是皮包骨頭，母親便在休息的時候背著口袋到菜地裏撿來大頭菜葉子，給我們煮著吃。春天，我們幾個大孩子上榆樹林撿榆錢，撿榆樹葉。母親摻著苞穀面，蒸了好多榆錢、榆葉發糕。我們吃著樹葉，挖著野菜，竟然活過來了。

有一個場面我永遠不能忘記。那時我在中專上學，吃集體伙食，一日三餐只有 3 個黑面饅頭。我每天只吃兩頓飯，早晨那頓黑面饅頭留下來。到了星期日，我就把一周攢下的 6 個黑面饅頭帶回家給弟弟妹妹吃。每到星期天早上，我那又瘦又小的弟弟就早早等在樓下的電綫杆旁。一看到我，他就高興地跑過來抱著我說：“二姐真好，又給我們帶饅頭回來了！”一邊說一邊跑回家送給媽媽，先給媽媽吃。看著他那天真可愛又可憐的身影，我心裏無比的辛酸和難過。

剛剛度過難關，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又來了。文革一開始，母親嚇死了，說：“我們又要開始挨整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我們叫過去說：“你們在外邊要小心，少說話多幹活，不要參加任何造反派，因爲我們家是黑五類。”說著母親點著爐子，把家裏的所有藏書，古今中外的，全拿出來燒掉。當時我們家存了好多世界名著和父親的技術書。母親說，一樣不留，統統燒掉。一本本的書全被扔到火裏了。眼看著我們喜歡的小說就這樣被燒掉，我們只想哭。整整燒了 3 天 3 夜，最後剩一本精裝英漢大辭典。母親抱著它不捨得扔到火裏，呆了半天，最後還是扔了進去。她說：“這一本書是你父親的，我們不能留下。如果叫他們看見了，不知又給我們扣上什麼惡名——最好還是扔在火裏燒了。”過了一會，母親又想從爐子裏拾出來，可是已經晚了。她流著淚說：“這是你爸爸的寶貝啊，將來怎麼和你爸爸交待啊！”這一幕我到現在都不能忘記。

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見我們家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我沒細看就一步邁進家，只見媽媽在傷心地哭。看見我回來了，她說：“剛才街道領了一群紅衛兵把我們家抄了。”我問拿走了什麼，母親說：“家裏破破爛爛，他們看沒什麼可拿的，翻了半天，最後把我給你們出嫁時準備的首飾盒收走了。媽媽對不起你們！”母親越哭越傷心，我一把抱住她說：“我們什麼也不要，只要您健康地在我們身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過火，母親看到我們 5 個孩子，4 個女兒 1 個兒子，越長越漂亮，很高興又很擔心。外邊的風聲越來越緊，打砸搶成風。母親怕我們出什麼意外，趕緊托人給大姐和我找對象，想把我們嫁出去避風險。我們姊妹雖然受很多苦，但在父母的熏陶下都很有特長。可是我們不可以考大學。大姐考音樂學院，術科合格了，最後政審被刷了下來。我三妹鋼琴彈得好，也報了音樂學院，術科也合格了，還是因爲政審給刷了下來。我當時喜歡體育，冰滑得好，想考體院，最後因爲成分不好，還是放棄了。

因爲出身不好，沒人敢要我們。最後，我大姐找了個在外地工作的，清華大學的，是資本家臭老九。我三妹當時中專畢業，因爲家庭問題，受株連被分配到山西一個三綫工廠。母親對我說：“你給我們改改門風吧，還是找個工人吧。”當時工人挺吃香的。我在學校裏處了個男朋友，因爲我成分不好，最後也跟我斷絕了關係。在痛苦之下，我答應嫁給一個工人。我四妹是老三屆，正符合下鄉條件，最後下到農村，當了知識青年。家裏只剩 60 歲的母親和不到 15 歲的小弟。

我成家以後經常回家照看她們。有一天回家，全院的鄰居都在我們家，一個鄰居告訴我：“你媽媽和你弟弟被樓下老馬家的幾個大小夥子給打了。”我說爲什麼，鄰居說他們說你們家是反屬，打的就是你們。我進屋一看，媽媽和弟弟正坐在床上哭呢！我氣得二話沒說，沖下去要跟他們拚命。媽媽一把抱住我：“你不能去，你一個姑娘家你打不過他們。這個世道沒理可講，我們不挨打誰挨打？我們就忍下這口氣吧！”看著媽媽可憐的樣子，我只好忍

了，抱著母親和弟弟痛哭失聲——沒有地方訴苦啊！

1973 年我們突然接到父親被釋放的通知書。這是個震驚我們全家的大喜事。我和大姐去監獄接父親，可是當見到他時，我驚呆了。站在我們面前的是個半身癱瘓，手脚抽搐，不能自理，拖著一條腿的蒼白衰殘的老人。這哪里是 15 年前我的父親，我那英俊瀟灑的父親！我沒有馬上前去相認，還是他先認出了我們。他一瘸一拐地走過來，叫著我們的名字。我們姐妹倆抱著他，叫著他，父女三個哭成一團。在場的所有人都大哭起來。天哪！這是什麼世道！

父親跟我們講，他幾次死裏逃生。有一次他在建築工地幹活，挑著兩大筐磚，走到 4 樓時，眼前一黑，栽了下來。醒來時已經在醫院，他沒有死。他有個心願，他要見到我們。還有一次在水庫幹了 3 天 3 夜，第三天昏倒在水裏，但他又沒死，他活過來了。

他說因為他懂高科技，會 6 國語言，讓他翻譯德文。他一天工作 10 多個小時，頭髮全白了。他們告訴他，好好幹可以提前釋放，可是到頭來不僅沒有得到提前釋放，反而多關押了 5 年，釋放時已被關押了 15 年。父親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見到親人，但是當他真的見到親人時，他失望了。他不甘心讓他唯一的兒子當一輩子農民。在農村是沒有出路的，他心裏痛苦極了。就這樣，到 1976 年，會 6 國外語的父親得腦溢血離開了人世……

補白：我 3 歲時第一次在監獄裏見爸爸巫寧坤。爸爸是抗戰期間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的翻譯。爸爸發來一封信，說趕快來見最後一面。當時 3 年大饑荒，他已經餓得要死了。監獄裏的犯人成片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兒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結果見了 5 分鐘，他就走了。當時以為是最後一面。文革時候看大字報，揭露爸爸的“反動歷史”，我一算，不對呀，他不是我爸爸呀——我 6 月 3 號才出世啊，他 4 月 17 號就被抓走了，怎麼會是我爸爸？所以我那時一直有這個疑團，覺得不是我爸爸。

文革中紅衛兵叫我寫我爸的大字報。我那時候才 8 歲呀，小學 2 年級。不會寫。“沒事，我們教你。你寫。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們來打他。”把著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寫“打倒牛鬼蛇神、紙老虎巫寧坤”。把我那個署名的的大字報擺在全校最顯眼的地方，那個大路口，所有的人來去都看得到。我們全家下放農村期間，夜裏關起門來偷聽美國之音，學英文。1977 年恢復高考，我和哥哥雙雙考上大學。不過，成績優異的哥哥，由于父親是右派，再次受到株連，只能屈就于安徽師範大學阜陽分校。當時人家都羨慕死了，你們家一下子兩個知青兩個大學生。可我們家，哭，對不起我哥哥呀。

後來我衝破重重障礙到美國留學。臨走時，曾經百般刁難我的系黨總支書記還念念不忘教育我，說你現在去美國深造，將來要回來為祖國的四化做貢獻。我心裏說：“回來給祖國四化做貢獻？哈，我死都死在美國！我去要飯，我都不回來！” 巫一毛

同學相煎何太急 王友琴

同學就是一同學習的人。1966 年 6 月以後，同學不再一同學習，而是同學相煎的事時有發生。迫害同學的公開理由，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做錯了什麼，而只因為他們出身于某種家庭。

以《人民日報》和《人民畫報》為首的報刊，當時發表了很多紅衛兵的大幅照片。年輕的學生紅衛兵，身穿黃軍裝，臂纏紅袖章，興高采烈。他們或喜笑顏開地簇擁在毛澤東身邊，

或緊握紅色語錄本，眼含熱淚朝天安門雀躍歡呼。在各地放映的新聞記錄影片中，紅日東升，紅旗招展，紅燈高挂，紅光瀰漫，《東方紅》響徹雲霄，千千萬萬的學生紅衛兵走過天安門廣場，發出驚天動地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呼喊，渲染出一種今天看來很是特別的文革場景。

對於這種文革場景，有人看了覺得煽情、迷狂，透著邪氣，有人認為熱烈紅火，激動人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當時除了這種被報導的文革場景，還存在著另一種從未被報導的文革場景：紅衛兵的許多同學，不但被禁止參加紅衛兵，禁止游行和慶祝，而且被罵，被侮辱，被體罰、拷打，甚至被打死，被打入勞改隊。另有一些同學被迫自殺，無聲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同學稍作抗爭即被同學嚴厲懲罰，甚至被亂棒打死，被判刑，被槍決。

1966年8月，北京的中學裏貼得最多的大標語，除了“毛主席萬歲”，就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一位被訪者說，那時，她的中學裏，大門外大門裏，教學樓門外門裏，教室門外門裏，教室前面黑板兩側和後面牆報欄兩側，貼的都是這副對聯。整個校園，凡有門的地方都貼上這副對聯，包括食堂。其他中學的情況與此相仿。這副對聯由北京貼向全國，一位當時在廈門讀中學的受訪者說，他們那裏的學校裏也貼了很多。

當時官方報紙天天發表熱烈支持紅衛兵的文章，但是有關這副對聯的一切信息（被歡迎程度及其殘酷效果）卻從未見諸報刊。當時這副對聯還被叫做“鬼見愁”。鬼見愁原是北京香山一座山峰的名字，在此指鬼怕這副對聯，或怕這副對聯的人是鬼。很多幹部子弟狂熱宣揚這副對聯，他們認為自己的父親是英雄，自然而然，他們自己就是好漢。

該聯起源于北大附中（該校也是最早開始打老師和同學的學校）。1966年6月，有出身于革命幹部家庭的學生和出身于右派分子家庭的學生發生爭吵，前者自稱好漢，又把後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來，罵後者是混蛋，就這樣形成了這副對聯。7月1日該校開會慶祝共產黨的生日，以前這種會都是以班級為單位來安排座位，可是那天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却被隔離在一個角落裏。文革前也強調家庭出身，也給革命幹部子弟特別的優待待遇，但是至少在公開場合不曾如此赤裸裸地等級分明。

與此同時，一些新詞也開始流行，如紅五類、黑五類、狗崽子。“只許紅五類造反，不許黑五類翻天”的標語到處亂貼。

到1966年7月底8月初，這副對聯廣泛傳開。在北京，紅衛兵曾召開大會和舉行游行，宣揚、鼓吹、推廣這副對聯。在中國音樂學院附中的大會上，誰上臺講話，先報告家庭出身。北京四中的學生牟志京，上臺對對聯表示異議，在臺上就被幾個同學圍著毆打。鋼琴家劉詩昆不認可對聯，在會場上被人把襯衫的後背撕成兩片。在北京五中，有出身不好的學生上臺表示擁護這副對聯，承認自己是混蛋，也被轟下臺去，因為這樣出身的人沒有資格上臺講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的大會上，紅衛兵反復大唱《對聯歌》，歌詞如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滾他媽的蛋！（呼口號）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媽的反！就滾他媽的蛋！”

北京的紅衛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組明確表態支持這副對聯。1966年8月6日，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江青等在北京天橋劇場接見紅衛兵時，非常明確地對紅衛兵的“階級路線”大加支持贊美，但是却客氣地建議把對聯改成“老子英雄兒接班，老子反動兒造反”。實際上，從北京傳遍全國、到處流行的還是原來的對聯。

後來這副對聯成為紅衛兵組織接納成員的標準。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的紅衛兵頭頭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清華大學紅衛兵的負責人是劉少奇和賀龍的孩子。劉、賀後來都被打倒并被關押虐待至死，但那時還在臺上，是最高權力圈中人。革命幹部的定義有變化，起初凡共產黨員幹部都是革命幹部，後來變成1949年前入黨的共黨幹部或者1945年前入黨的共黨幹部才算革命幹部。在紅衛兵的發源地清華附中，1945年以前參加中共的12級以上的

幹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幹部出身。

一位被訪者說：所謂紅五類，其實是紅一類，就是幹部子弟，而且還得是高級幹部，連科長都不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一般的紅衛兵只在廣場上走過，被邀上城樓的是極少數。有幸上天安門城樓的沒有工人子弟。北京石景山區工人最多，石景山區就沒有發起成立紅衛兵組織。

在紅衛兵運動高潮期（1966年8月到11月），紅衛兵做的主要事情是：打黑幫——打校長和老師；破四舊——燒書畫砸文物；橫掃牛鬼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衛毛澤東思想——去天安門廣場接受毛的接見。這些都是特權，不是人人都能參加的。

在上海復興中學，紅衛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門口，要每一個進校門的人都報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學也有過同樣的場景。在北大附中，紅衛兵曾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交叉攔在食堂門口，進門吃飯要報告家庭出身，遇出身好的，舉起木槍讓其經過，出身不好的要從木槍下鑽過。在北京一零一中學，紅衛兵把學校大門隔成兩部分，窄的部分貼著“狗洞”，屬於“混蛋”系列的同學走此小門。一位被訪者說，當時她在大門內側看到這個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親剛被揪出來不久，雖然學校還未知曉，但是她不敢走寬的一邊，同時又不願走“狗洞”，轉來轉去，最後在圍牆上找個缺口跳出了學校。

家庭出身變得空前重要，鑒別家庭出身也變得十分複雜。許多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被迫寫了詳盡的關於父母、祖父母以及親戚的政治歷史狀況的報告，貼在教室裏，公之于衆。有的學生挖空心思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料。是父母一輩還是祖父母一輩的階級成分該算作一個青年人的出身？父親和母親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麼算？城市貧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參加紅衛兵？當時都被當作十分嚴重的問題。

在中國古代，高官子弟享有種種特權是客觀事實，但是社會輿論對此總是持批評態度的。《水滸傳》裏有高衙內的故事，這個名字後來變成依仗父親權勢為非作歹的惡少的代稱。

“老子英雄兒好漢”作為一句熟語，原來只是稱贊父親兒子二者都好的一種說法，并非實指父親好兒子就一定也好。文革中，這個熟語嚴重變質為：革命幹部子弟不但有承接父親權力的特權，而且有迫害同學和同齡人的特權。這在古代文獻中恐怕是沒有先例的。文革的那些罪惡，有些歷史上有先例，有些却是歷史上從不曾有過的，比如在這副對聯影響下所產生的罪惡。

當時既無電傳，又無電子信，大多數人也極少用電話，可是這副對聯却在短時間內迅速傳遍各地各校，個中原因值得深思。部分青年人對這副對聯有特別狂熱的興趣，另有部分青年對這個說法默然承受，這種趨向值得深思。

1966年8月，紅衛兵在社會上打人抄家進入高潮的同時，打同學也更加厲害了。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被打倒，其在清華附中讀初二的女兒，在全校學生排隊去開會時被拉出隊伍，衆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8月26日，清華附中高三631班的紅衛兵，在教室裏集體用銅頭皮帶和棍子毒打班裏4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其中一個是鄭光召，即後來的作家鄭義。這4同學被打成重傷，又被罰勞改。有人至今記得，鄭光召跪在學校操場上拔草，身後有紅衛兵舉著皮帶抽打他。高二學生郭惠蘭，父親是右派分子，被同學鬥爭後喝敵敵畏自殺。還有一位初中女生，因不堪侮辱而臥軌自殺，未死，致終身殘疾。

在北大附中，這幅對聯一出籠，出身好的同學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說話了，見面時理都不理。7月1日開會時，出身壞的同學被用一道糾察綫隔開。再後來，就動手打出身不好的同學。初一四班女生萬紅，父親是右派，該班男紅衛兵要打她，她從教室中逃出，躲進女廁所。男生追來，停在女廁門外。這時同學彭小蒙正在女廁所裏，她要萬紅出來。萬紅在廁所裏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結果却先挨彭一皮帶。萬紅被拉到教室鬥爭，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學生用銅頭皮帶抽她，又有學生把凳子突然抽



走，致使她從凳子上摔下來。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間裏睡覺。她滿臉青紫腫塊，在陽臺上淋雨。高三學生朱同，父親是右派，有一天被毒打，傷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還曾被關在學校廁所旁的小屋裏，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被圍看。

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毛澤東曾寫信對紅衛兵“革命行動”表示熱烈支持，于是其他學校也紛紛跟上，展開折磨同學的競賽。在北京八中，初一實驗班的一位女生被剃了陰陽頭，關在廁所裏打。在女生宿舍，有幾個出身不好的女生被關進廁所，不准回房間睡覺。初一學生李文淥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醫生，不但不能參加紅衛兵，還因批評了紅衛兵一句被鬥，在宿舍被管制，飯裏被撒沙子。

在北師大女附中，不少班裏鬥爭了出身不好的學生。校長卞仲耘被學生打死，成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在初二四班鬥爭出身不好的同學的班會上，教室裏貼了“打倒狗崽子”大標語，全班 45 名學生，10 名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10 名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他們的脖子把他們拴在一起，出身不好不壞的其他學生都坐在地上。每個被鬥者被勒令交代反動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並要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有人打她們，有人把墨水潑在她們身上。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學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動手打她們的耳光，其中一人的眼鏡被打落在地。高一三班強迫一位父母有問題的楊姓同學做以前學生輪流做的清潔工作，黑板上寫著：“楊狗，勒令你每天打掃教室！”該校的學生排球隊長，因為球隊在中學生全國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學校領導人曾和她談過話。文革中校長被當作黑幫打死了，該隊長的父親又有歷史問題，于是同學逼她揭發學校領導，又逼她揭發父母。她服安眠藥自殺。幸虧安眠藥量不夠大，昏迷了幾天。雖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

在北京四中，高二學生開會，強迫黑五類一個一個講自己如何不好、確實是混蛋等等。學生牟志京，還不算黑五類出身，和同年級的紅衛兵發生口角，被幾個紅衛兵按在地上打，一顆門牙被打壞。但是他不敢還一下手，如果還手，會被說成階級報復。在當時這是極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導致嚴重得多的後果。

在北京一零一中學，一個初二女生哭著被一群紅衛兵追打，因據說其家庭出身是資產階級，無人敢出面阻攔或解救。在北京礦院附中，一個富農出身的女生被剪了光頭。北京二中一位初一學生，資本家出身，被罰跪在搓衣板上，後面還有人拿棍子打。北京五中高三學生鄭大力，被迫在胸前整日佩帶一塊香烟盒大小的黑牌子，因為他家與清朝皇族有親戚關係。在北京一中（鼓樓附近），紅衛兵把原來學校食堂冬天用來儲存大白菜的地窖變成關人、打人的地方，有 13 人在那個地窖裏面被打死。學校周邊的地富反壞右資、校長、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學生都被打。

在大多數學校，只有校長和老師被打入全校性的勞改隊，學生則多在年級或班級範圍內被打被鬥。然而在北京一中，有二三百個出身不好的學生被打入學校的狗崽子隊集體關押，強迫勞改。高一三班有兩個學生被打入狗崽子隊，而這個班據說算是比較仁慈的。狗崽子隊的學生白天勞動，晚上到班裏挨鬥，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一個學生，有一天在勞改隊裏不知說錯了什麼話，當晚在班裏被大打。最後還把一隻貓塞進他的褲子裏。貓在褲子裏面又咬又抓，他慘叫了一整夜。慘叫聲傳很遠，可沒人出來為他說話。

打同學之風從北京傳往全國。在上海外語學校，資本家出身的學生王一民被鬥後精神失常，不久死去。在上海復興中學，初一女生李曉琳被吊打。她的父親是教授，算是壞出身。1966 年 9 月“上海市紅衛兵總部”發布通令，規定紅衛兵糾察隊“有權不准黑六類（地富反壞右資）子女任意到處跑”。

在長沙一中，該校紅衛兵到北京受毛澤東檢閱（1966 年 8 月 18 日）回來後，通知所有非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到校內某處開會。一位當時是該校學生的被訪者稱，接近會場時，他聽見裏面有吼叫聲。從門縫裏看，紅衛兵正用皮帶抽打一個黑五類學生。他猶豫再三，終於決

定逃開。

在南京二中，初三的兩個學生吳倩和蔣宜萍，因為父母的問題在班裏被鬥。先命令他倆打掃教室，其他同學坐著看。打掃完以後，又命令他們寫交代，交代家庭問題。此後，他倆被罰天天清掃教室。

在廈門八中（現雙十中學），開會時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命令坐在一個角落裏。有個學生的父親是廈門大學的老師，被勒令寫交代，交代老子幹過什麼壞事。

據一些當年是大學生的被訪者說，大學生對打同學的興趣沒有中學生大。但是比如在清華大學，也貼過很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參加紅衛兵，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陰陽頭，看管教師勞改隊，這些“工作”只有出身好的學生才有資格做。電機系六年級某班學生去抄過班裏兩個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的家，但是沒有打這兩個女同學。

小學裏的情形和中學相仿。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五年級學生劉一之也被揪鬥，因為她不是紅五類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級當作範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嚇得哭。有個出身好的女同學（劉學燕）站到她身邊說：“劉一之的文章拿到別的班念，和她有什麼關係？”劉學燕叫人送劉一之回家，有同學還追著打，西紅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襯衫上滿是紅漿。

北京皇城根小學三年級的一個學生，父親有一點歷史問題，同班的幹部子弟打他。他逃進廁所鎖上門，趁後面追趕的同學砸門時，他爬出窗戶，手扶落水管從三層樓下到平地逃走。此後他幾個月沒敢上學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慘的可能是北京大興縣的地富反壞的子女。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先後殺害四類份子及其家屬共325人。被殺死者中，最老的80歲，最小的38天，有22戶被殺絕。

有的孩子被煽動或被強迫反對父母。1966年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的共產黨書記姜培良在學校被打死，他的在本校學習的兒子參加了打父親。姜被打死後，兒子也精神失常了。更多的情況是，子女想跟“黑”父母脫離關係而不被允許。他們必須跟父母一起受難，一起被鬥，長期充當社會中的賤民角色，甚至被殺害。

在這場同學對同學的大迫害中，理論（那幅對聯）儘管粗糙，但指向（黑五類出身的同學）很是明確。一大批學生由於其無法選擇的血緣關係被無情地從同學這一團體中切割出去，變成殘酷打擊的對象；沒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認為需要理由。

這種迫害各地各校各班的嚴重程度不一樣，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迫害到處都發生，沒有例外。發生這類事，決不是偶然的，必有其深厚的社會文化心理根源。

十幾歲的青年學生遭受同學的侮辱和虐待，有沒有反抗的呢？從收集的事實看，反抗者的人很少，因為對反抗者的懲罰極為嚴厲。以下是四個反抗并遭嚴懲的例子：

例一：直接對抗。1966年8月25日，北師大二附中高三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同學曹濱海的家。曹的出身原來是革命幹部，但此時已被打倒。曹濱海不像大多數黑五類子弟已經受壓多年，在文革更大壓力下還能忍氣吞聲；家被抄時，曹與來抄家的同學發生爭吵，並拿起菜刀砍傷了一個紅衛兵。曹濱海被公安機關帶走並關了起來。紅衛兵把他的母親押往學校。在校內一個磚砌的乒乓球臺上，曹的母親樊希曼被活活打死。同一天，該校紅衛兵在校園裏打死了3個人。另外兩個人是校黨支部書記姜培良和語文教師靳正宇。6天后，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檢閱紅衛兵，這個學校的紅衛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例二：違抗紅衛兵的規矩。王光華是北京六中高三年的學生，該校離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1966年8月，六中紅衛兵在校內建了監獄，監獄牆上寫有紅色大字“紅色恐怖萬歲”，關押毆打學校老師和從社會上抓來的人，長達100多天。王光華在文革前是班長，文革開始後曾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表示異議。王的家庭出身是小業主，不

能當紅衛兵。當北京紅衛兵紛紛拿著免費火車票到全國各地進行“革命大串連”時，王光華不是紅衛兵成員却也外出串連了。這被紅衛兵認為是犯罪作亂。1966年9月27日下午王光華從外地串連回家，一些紅衛兵立刻去把他抓進校內監獄的小院，一進院門就被十幾個紅衛兵用棍棒打得失去知覺。當天夜裏，王光華被關在這個監獄裏，傷勢嚴重，生命垂危。次日早上，王又被打，到晚上就死了，年僅19歲。

例三：自殺。1966年9月，北京紅衛兵抄了大量的人家并驅逐了近10萬人離開北京去鄉下。北師大附中初中學生聞佳和母親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回北京，遭人強姦。絕望中，她來到學校，從窗戶爬進教學樓二樓的一間廁所。這間廁所因在文革中變得又髒又臭而被釘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裏面絕食而死。幾天後，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衛隊發現。根據當時貼出的批判她的大字報，她在被盤問時承認了她恨文革和毛澤東，承認了她在廁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語錄》。她立即被送進西城區的拘留所。10年後，1979年，她和全國所有因“惡毒攻擊”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釋放。

例四：理論上反對。典型代表是遇羅克。遇父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遇羅克1962年高中畢業後，因家庭問題一直考不上大學。針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提出家庭出身不等于階級，家庭出身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思想。這篇文章引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來證明對聯的荒謬。當時正是各種革命造反派群眾組織可以被允許出鉛印小報的時候，《出身論》被印在印有“北京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主辦”字樣的《中學文革報》第一期（1967年1月18日）上，署名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其實并不存在這樣一個司令部，只是幾個中學生佩服這篇文章，以此名義印了這張報紙。1967月，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說成是反動的。1970年，遇羅克被判死刑。

迫害同學的醜行儘管得到最高統治者的縱容、支持和默認，但就其細節和實踐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紅衛兵自己所為。他們為什麼樂此不疲？

原因之一：可以不勞而獲高級地位。以家庭出身來決定等級，一部分人可不須付出任何代價和努力即可獲得高地位。文革中毛澤東用紅衛兵取代共青團。作為青少年組織，二者最大的區別是紅衛兵接納成員首先看家庭出身。共青團雖然也強調家庭出身，至少從未寫進公開的共青團章程。

清華附中初二一班的一些學生在對聯流行前成立一個名叫梅花的小組，參加文革的活動。小組成員是同班同學，同樣年齡，但是家庭出身不同。1966年8月，梅花小組被紅衛兵強迫解散，理由是該小組陣綫不清。文革前，幹部子弟只是在進入了分數綫之後才有優先錄取權。文革開始，中共中央就廢除了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文革前學生幹部就有很多是幹部子弟，但既不全是幹部子弟，而且既有大幹部的孩子也有小幹部的孩子，不像紅衛兵都由高幹子弟任負責人。只要把1966年8月北京各學校紅衛兵頭頭的父親的地位陳列一下，就可知紅衛兵追求平等之說與事實相差有多遠。

這種自然獲得的高等級與紅衛兵對同學和老師的非人道迫害顯然有直接關係，因為他們把這些受害者看作低等的人。

之二：可以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權。紅衛兵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權的青少年。從1966年8月初開始，北京的學校都在紅衛兵組織的控制之下。他們在學校裏開會鬥爭黑幫和牛鬼蛇神，可以動用汽車等設施。1966年8月24日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組織12所中學的紅衛兵到清華大學撕大字報并抄家打人，竟能動用汽車到各學校接人。他們也可動用北京的大型體育館，在那兒鬥人甚至打人。容納十萬人的北京工人體育場，紅衛兵可以用以召開鬥爭“小流氓”的大會。紅衛兵也有權抄家，在1966年8-9月，北京紅衛兵抄了3萬戶，上海紅衛兵抄了10萬戶，武漢抄了2萬1千家。紅衛兵組織還有權發布命令，強迫一大批城市居民離開城市，掃地出門，去農村勞動改造。

紅衛兵得到的至高無上、史無前例的特權是可以打死人。在人類歷史上，自進入文明時代以後，除了戰爭時期，沒有人得到過這種權力。1966年8-9月，紅衛兵在武漢打死62人，游鬥折磨致死32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從8月26日到9月1日的7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3位數。還有一些人在遭返到鄉下的火車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戶籍統計。

之三：暴力壓迫中有快感。好幾位被訪者都談到當時校園裏的狂熱亢奮氣氛。紅衛兵學生腰扎皮帶，高卷褲管，見了往日的老師和出身不好的同學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說起話來，不論男女，開口就是“他媽的”。有一位被訪者說，她班上一個原本嬌氣羞澀的女同學，這時學會了掄開皮帶打人，走路也變得挺胸抬頭，說話帶著粗口，高聲大氣。殘酷的行爲也能使人興奮快樂，對人類來說這是一種最具威脅性的體驗。

之四：虐待同輩可以彰顯自己。有的學生甚至對鬥同學比對鬥老師、鬥黑幫更感興趣。比如，有的學生不厭其煩地四處調查同班同學的家庭情況，爲的是將其打入狗崽子的範圍。紅衛兵到社會上四處抄家的時候，往往對同班同學的家更感興趣。比如上文寫到的北師大二附中的紅衛兵去抄同班同學的家，並打死同學的母親。

有些學生在文革前或因體育好，或因學習成績好，或因在競賽活動中得過獎，或因有特長而出過名，或個性比較外向，活潑，如果出身不好，會因這些長處而挨整。而且，他們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過其他同樣家庭條件的學生。

同輩人之間有比較，有競爭，自然也就可能有緊張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同輩忌恨是一種難以完全避免的情緒。但是，同輩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可以通過自我認識和道德追求來得到克制。學生之間的矛盾衝突，本是可以通過理性的方法來緩和、協調並解決的，但是文革期間却是煽動誇大種種矛盾，並以革命的名義縱容陰暗的忌恨，讓一部分人用鬥爭的方法來對付另一部分人，把同輩間的競爭感轉化成同輩虐待。迫害他人可以顯示出迫害者的優越性，對同輩人的迫害更能顯出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輩虐待相當有誘惑力。

紅衛兵的全盛時代是1966年的8-10月，然而紅衛兵運動導致的體制性變化和心理道德變化，却影響中國社會10多年。影響之一是暴力迫害的大規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眾性打鬥來進行的暴力迫害，隨著紅衛兵的興起達到高峰。這種方式後來被反復運用。1967年，一些共產黨老幹部被殘酷打鬥。煤炭部部長張霖被打死，彭德懷被打斷兩根肋骨。1968年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無數普通人被關押折磨至死。

之二是家庭出身從此被強調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1968年毛澤東還親自發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這一專門術語，用以指稱因父母“有問題”而受歧視的社會群體。與此相應的是，個人的工作態度、專業訓練和才能被蔑視。這對年輕人產生了極爲惡劣的影響。這種情況直到70年代末才改變。

之三是公道毀壞，私德失落。在大規模的暴力迫害中，善與惡的標準不再存在。很多人知道迫害同學是不對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脅面前，無可奈何。生活中較爲平等、歡樂的同學關係被摧毀。壓迫和仇恨成爲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無足輕重。年輕人，有的學會了殘酷虐待同輩人以發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獲取社會地位，有的被迫學會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變得無比冷漠，對同輩人的痛苦視而不見，甚至對權勢者卑躬屈膝，對受難者落井下石。強權就是真理，謊言大話盛行。整個社會被操縱和挑動，成爲人整人的屠宰場，人性墮落了。無數無辜的年輕人曾因家庭出身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直到現在，在訪問中，難以聽到迫害者向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這種靈魂的創傷，何時才能治愈？

吳維尊 1926 年生于浙江東陽，清末名臣袁昶（庚子事變因主和被慈禧太后處死）的外孫，出生時母親爲他取名以巴弗（以巴弗是一位曾與公元一世紀的聖保羅一同坐牢的基督徒）。1949 年畢業于上海中華神學院，一生留下 100 多萬字的牧靈著述。

中共建政後吳維尊爲神打的第一仗是直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史是一派胡言。當時上海虹口區政府組織中小學教師學習社會發展史，學習完畢時，每一個人都要寫總結報告，談自己對社會發展史的認識。作爲該區一名中學老師的吳維尊，經過禱告，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 政治老師說：“你們所信的神，是反對科學的！” 吳維尊回答說：“老師啊，科學規律是哪來的？是人定的嗎？不是，沒有人能制定科學規律。真正的科學規律是神在創造天地萬物之前就制定妥當的。天地萬物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規律運行。既然科學規律是神早已定妥的，爲什麼神要反對自己所定的科學規律呢？今天的問題，不是神反對科學，而是人想利用科學來反對神。”

基督徒飯前必謝恩。1957 年反右運動中，吳維尊仍然堅持每吃飯必謝恩禱告，中午休息時還要拿出《聖經》來默讀。星期天，全校教師要到附近農村勞動，他却要請半天假，理由是《聖經》教導我們要守安息日。不久，吳維尊便被下放到郊區農村勞動改造。在那裏，他反而把勞動場所當作傳福音的禾場。小組學習，要把幹部改造成具有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人生觀的人，吳維尊却公開發言說：“我是一個基督徒，且永遠是一個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轉變自己，成爲馬克思主義者。我沒法響應黨中央對我的號召。”

1964 年四清運動時，吳維尊寫信給一位年輕人：“你既然已經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應該公開承認主的名，退出共青團，走主的路。”

這個年輕人的退團舉動使公安局更加注意吳維尊“與共產黨爭奪下一代”的問題。1964 年 7 月 30 日，他被捕了。從世人的角度看，吳的被捕入監完全是由于不識時務。吳維尊則心中確信，坐牢不是他自己喜歡坐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坐的，而是主的帶領。神要他在犯人這個崗位上做好一個基督徒，以犯人的身份來聽從主的旨意。因此，一進監獄，他就爲自己定了一個在屬靈的爭戰中必須堅持的原則：在被審訊時，“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

入獄一個多月時間裏，他八次被審問，一直持定這個四不原則。第七次審訊時，他被要求用書面形式回答五個問題。他一面禱告，一面寫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個問題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正確貫徹執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這種所謂‘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國許多教會被取締、受打擊，許多神的僕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黨對神教會和神僕人的領導而被捕、下監、判刑等等。我的被捕下監，則是一個新的證明。”

第五個問題是“你對全國基督教界發起的三自愛國運動是如何認識的”，他寫道：“聖靈突然攔阻我，不讓我回答這個問題，并且光照我一節《聖經》。這段經文是：‘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將珍珠丟在豬前，恐怕它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因此，我就不從正面回答了。要說明的是，主耶穌所說的狗、豬，不是指真的狗和豬，而是指不把聖物當作聖物、不把珍珠當寶貝的人。” 第八次審訊時，審問人員惱怒地說：“在我的手心裏不知經過了多少大牧師、大傳道，還沒有見過你這麼猖狂的！”

1967 年 2 月，吳維尊被判無期徒刑。收到判決書後，他心中非常平安，充滿感謝：“僕人決不能大過主人。我的主耶穌，從父手中領受并喝盡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無期，而且是釘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殘酷、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給我喝的杯，不知輕了多少倍，還存留我一條命，身體至今還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時，尚且是心悅誠服地領受，我才是無期徒

刑，爲什麼不能也同主一樣心悅誠服、從父領受呢？主說過，‘我所喝的杯你們也要喝’，今天父神既然憐憫了我，給了我這個杯，我就應當把父所給的杯喝盡，無期到底。”

吳維尊飯前照常謝恩，不避諱，不怕人看見。監獄指導員向他宣布：“你要吃飯，就不許念（謝恩），你若念（謝恩）就不許吃。”吳維尊便把自己的碗筷還給管理員，不再吃飯。四五天后，他們厲聲斥責他：“不吃飯，絕食，是抗拒無產階級專政。”吳維尊堅持說：“我決沒有絕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謝恩吃飯。”

半年後，吳維尊被戴上一副重手銬，他仍然堅持不讓謝飯就不吃飯。獄吏組織七八個犯人教訓他，其中一個犯人一拳打在吳維尊下巴上，致其滿口流血，滴在身上、地上，又左右開弓，狠打他的臉頰。在這種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話一直縈繞在吳維尊的耳中：“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裏路，你就同他走二裏。”主的話成了吳維尊爭戰時手中的得力武器。反復毆打、折磨兩個鐘頭之後，那個犯人打累了，宣布批鬥會結束。看守所長問他：“大家幫助你改造，你覺得怎麼樣？服不服呀？”他回答道：“報告所長，無論政府對我做什麼，或是犯人對我做了什麼，我都沒有怨言，甘心樂意。”

有一次，吳維尊堅持禁食七天之後，獄方數人強行給他進食。他們把一個鐵器塞進他的口中，插下胃管，把食物灌進胃裏。這個過程難受極了，但吳維尊絲毫不反抗。灌完後，膠管一抽去，鐵器一取出，他就站起來，舉目大聲感恩說：“感謝天父用這樣的辦法來養活我！”後來，監獄管理員只要硬往他口裏塞窩頭，他總是舉目望天大聲說：“感謝神用這樣的方法養活我！”

在檢察院對吳維尊的起訴書中有這樣的記錄：“該犯長期在監內，藉口飯前謝恩搞非法活動，破壞監獄紀律，甚至多次長時間以絕食行動對抗無產階級專政。”

後來吳維尊被轉至寧夏服刑當勞改。那時正是文革高潮期，吳維尊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堅決反對改造。他堅持不念毛主席語錄，不答問題，不唱革命歌曲，不喊毛主席萬歲。組長和同組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頭，他拒絕。十多個人對他又踢又打，他乾脆躺在泥土地上，任憑大家踢打。這是他第一次在勞改隊挨打。此後，他無數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帶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雙頰，有人用木棒打他的頭頂，有一個隊長還用燃著的煙頭多次燙他的鼻孔。所有這些，吳維尊都認爲：“既是主所允許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這裏，仍然是“你要吃飯，就不准禱告，你禱告就不准吃飯”。吳維尊決不吃不經謝恩的飯。不吃飯到了第五天，他已極度虛弱，還被迫受罰跑步。到第七天，又遭四個人毆打，直到把他打昏。然後是灌食，嘔吐。勞改隊長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穢物舔乾淨，他就趴在地上把自己的嘔出物舔乾淨。這樣的折磨持續了幾天，被打的創傷一年多後才痊愈。

中國史書記載著獄中各種各樣的酷刑，也記載著許許多多一代又一代受盡酷刑而不屈服的剛強硬漢。吳維尊雖然忍受酷刑，沒有屈服，却不是剛強硬漢，他是柔弱的。那些毆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問他“你恨不恨我們”，吳維尊說：“一點也不恨，也不埋怨誰。因爲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還爲那些釘他的人禱告呢。”

後來監獄政委（最高領導人）對他說：“你要飯前謝恩，我們允許你心中默默禱告。若要表現出來影響別的犯人，我們就不許可。”吳維尊聽了，立刻警覺起來，主光照他，這一步也不能讓！他回答說：“報告政委，我們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與行動表現緊密相聯的。沒有行動表現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與之相應的行動表現。我無法滿足政委所說的條件。”？

1970年9月，吳維尊被調到管制最嚴厲的一個組。再難改造的犯人，到那裏後也都會被改造過來。組長對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一，吃飯前不禱告謝恩；二，念毛主席語錄。不要求兩個都做到，只做到任何一個就行，隨他挑選。他立刻明確告訴組長，這兩個要求，任何一個，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傾刻之間，他成了全組犯人的鬥爭對象，組長和全組犯

人集中火力，想盡各種辦法來刁難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們說，只要吳維尊能念一句毛主席語錄，或是說一句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就可以讓他吃飯謝恩。吳維尊在主面前思考這個問題：《聖經》教導要“敬畏神，尊敬君王”，還教導“我勸你首先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當如此”。想清楚之後，他在小組眾人面前說：“我祝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他們都歡呼起來：“有門兒，有門兒！”也有幾個人不滿意，因為他說的不是萬歲或萬壽無疆。另有人說：“慢慢來，有希望！”那天他們對吳維尊好得不得了，三頓飯都給他吃得飽飽的。

第二天，組長和大家對他說：“今天，你要進一步了，不要說你昨天說的那句話，要說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這麼說。”豈料，勸了半天，等了半天，吳維尊還是不肯改口。他們氣極了，不給吳維尊吃飯。

有人在私下問他：“你為什麼肯祝願毛主席身體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萬歲或萬壽無疆呢？”吳維尊回答說：前者是向至高神禱告，為政治領袖代求，神是喜悅的，因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後者却有把毛主席當作神來敬拜、把領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厭惡，不喜悅。萬歲是不可能的，連活一百歲也很難，毛主席決不會萬壽無疆，而是一壽有疆，我為什麼要說不合神旨意的胡話？”

靠著主的恩典，吳維尊守住了。此後，勞改隊的幹部不再干涉他吃飯謝恩的事，雖然謝恩仍然算是違規。在獄中，吳維尊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說：“感謝主！我是一個自由人。”因為他堅持說“不”，堅持反改造，監獄裏那些種種規矩絲毫不能束縛、捆綁他。

到1979年，一同轉至寧夏的200多個無期徒刑犯人只剩吳維尊一人，其他人都已陸續獲得減刑釋放。許多人勸吳維尊也申訴要求平反，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堅決不申訴。

1981年春季，獄方宣布對他實行減刑，再過6年，他將被釋放。寧夏高級法院的裁定書上說，吳維尊勞動積極，遵守監規紀律，證明他“確已悔改”，因此予以減刑。

吳維尊決不認同這個說法。6年後的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迫出獄。當天他寫了致寧夏高院的《出監日呈文》，文中一再申明自己根本沒有悔改，從來不曾悔改。“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無悔改的行動表現。”

他說他1964年7月30日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自第一次預審起，除了確認了自己的姓名之外，凡涉及所謂“罪行”的詢問，他“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半年後在中級法院審判庭上，“我除了姓名之外，只回答一個提問（問：你是基督徒嗎？答：我是基督徒），其他詢問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服刑20多年至今，凡與“認罪”或“改造”有關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20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只要與改造有關的，（我）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幹部或其他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彙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我）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歷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瞭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至于裁定書上所提到的，我‘服從管教’這一點”，“監獄對我所進行的數不清的改造與管教措施，我是一點兒也沒有服從，通通拒絕，而且頑固地堅持了二十幾年一直到今天”。

吳維尊說，服刑期間所做的一切，沒有一件大事，或小到一句話、一個舉動，“是真正從我悔改出發說的、寫的或做的”。對我“一個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為什麼一定要違反‘實事求是’的原則，硬加上一個虛假的‘悔改’名義，給以減刑并到期釋放呢？何況，

我作為一個基督徒，更不應該趁這個錯誤裁定之機鑽空子，作出將錯就錯，冒‘名’頂替的惡事。我非但不是‘確有悔改表現’，而恰恰是‘確無悔改表現’，全部是不悔改表現，根本不具備可以獲得減刑的最起碼條件，而只能仍是個無期徒刑犯人。”

“既然這六年來，法院沒有收回這個不實事求是的、名不符實的錯誤裁定；而且我作為被專政的犯人，又根本沒有資格硬要法院如何做。在這種兩難情況下，‘逼’得我沒有別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采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牆外邊，但我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後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願）。另一個方面，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干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干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著下列兩個意義：（一）對於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19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我這樣作，是讓法院有充分的足夠時間，進行調查瞭解和重新考慮。如果有哪一天，那個錯誤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當然也意味著恢復了我所原有的無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則我將立即欣然結束這個禁食行動，該幹什麼幹什麼。”

被迫出獄之後，吳維尊拒絕離開監獄。獄方“被逼”無奈，最後只得在大牆外為他收拾一間 14.6 平方米的陋室中，讓他在監獄外“服”無期徒刑。他的邏輯很簡單：他沒有“悔改”，因而不能接受政府強加給他的因悔改而獲得的釋放。

2002 年 11 月 27 日至 30 日，他寫下最後一封給自己的親人的信：我之所以堅持做一個“大牆外的無期犯人”，是神“既要我順服和接受監獄（政府機關）的執法（與我悔改與否無關），出到大牆之外，又要我堅決拒絕和抵制法院的弄虛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說成是‘確實悔改’了）”。“不管我衰老到什麼程度，請你們各家各人都不要來銀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來，謝謝，千萬不要來）。我始終是監獄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窯，都是最正常的事。什麼都擋不住我在末日與眾聖徒一同復活。監獄單位只是我在世上長住又暫住的家，直到復活後穿上與主相似、永不朽壞的靈體，與主一同進入永遠的家。因為必朽壞的肉體只能仍歸土，而永不朽壞的靈體才能與主同進不朽壞之神永遠的國。（出獄）十多年來，監獄一直待我好，照顧我；這一點，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謝政府，特別是感謝監獄單位。”“主若許可，我每年寫一封簡信給你們各家；何時死了，我請多年經常與我交往密切的劉萬新老弟兄，打電話告訴三哥家，並請三哥轉告你們各家。願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與你們各家同在。”

20 天之後的 2002 年 12 月 21 日上午，一對年輕夫婦前往探望吳維尊。敲門，無人應聲，翻矮牆入內，吳維尊服裝整齊，帶著眼鏡，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經被愛他的主接去了。

我寫過十次入黨申請      習近平

我 1969 年從北京到陝北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7 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點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



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另一點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父親要我們從小做講團結和善于團結的人。走上社會後，對這一點的體會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較好；如團結處理不好，事就做不好。特別是當年在陝北，遠在千里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幹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到我這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絡繹不絕，講古今中外，講他們感受到的新鮮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

我剛下鄉的時候，大概有二三十個知識青年，都是軍隊幹部子弟。半年後，大部分都當兵走了。近一年時間裏就我一個堅守在那裏，感到十分孤獨。但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樂。

我先後寫過十份入黨申請書，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獲批准。後來村裏和公社要留我，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黨問題時，當時的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複雜，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來繼續鞏固。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而後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渴望著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給延安地區兩個名額，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裏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工作由劉冰同志主持。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于是我踏進了清華園。

上山下鄉中對學習的渴望，使我與清華大學結下了讀書緣。從政近20年後，我又在職讀清華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問題，進行系列研究，發表文章著書立說。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瞭解，作出了再下基層的選擇。1982年我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到河北正定縣。當時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給耿飈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有劉源和我。我們倆不謀而合，都要求走跟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練人。有了上山下鄉的經歷，我對再下基層充滿信心，并義無反顧地下去了。

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的影響是相當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眾中，會使人感到非常踏實，很有力量。基層的艱苦生活，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想起在那艱難困苦條件下還能幹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戰的勇氣，什麼事情都不信邪，都能處變不驚，克難而進。

聖女王佩英 楊銀波

今年清明節前，500餘人在北京舉行王佩英就義40周年紀念會。會後，部分與會者寫

了一些感受，網上反響強烈。王佩英仿佛重新活過來一般，接受著越來越多的人的敬意。今年 5 月 23 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現王佩英詞條。6 月中旬，我在網刊上閱讀到關於王佩英事迹的紀念專題。影片《我的母親王佩英》製作人胡杰在此發文公告，稱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資料秘書組，負責免費贈送影片和書籍，歡迎索取。

與友人在電腦上一起觀看《我的母親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頂，怒不可遏，以 80 後特有的語言痛罵：“我靠！那時的人怎麼瘋成這樣？一個個跟傻逼似的。毛澤東這種鳥人，要是早十年死掉，中國早就民主了。”也有網友在網上說：“毛澤東的尸體不火化，看來是天意。當年殺這麼多人，冤有頭債有主，總該還一還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個女子撒尿在他尸體的臉上。”當今諸多年輕人，別說不知文革詳情，就連 1989 年的天安門運動，也跟聽天書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運動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這一代，是當前中國的中堅力量。不少人憑藉互聯網，多多少少接觸到了真正的當代史，漸漸將教科書裏的那些謊言抹去。讀文字，看圖片，只是將自己置于旁觀者而已，但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的母親王佩英》這類影片，却使我們無法置身事外，那實在是太直觀了。

影片放到王佩英 17 歲的少女時期，友人感嘆：“美女啊，確實是美女。”這樣一位美女，因自由戀愛認識青年律師張以成，人生從此改變。國家大事最初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直到被日本人逮捕，遭嚴刑拷打，張以成才萌生堅定的報國之志，當了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員，潛伏在國民黨。王佩英比張以成更為“地下”，張以成只要身上沒錢，她就變賣房產資助他，有時還站崗放哨，保護這些地下黨。

自由女神不是一開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從不張揚，直到中共奪權，她才出來工作，當幼兒園保育員。因不小心，開水燙著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調到鐵道部設計院做勤雜工。這時，全國大躍進，農村餓死人的情況相當普遍。有的老鄉到北京找王佩英幫忙，她束手無策：“你們困難，我也困難。”可即使如此，這時的她，家中仍然擺著一尊售價不菲的毛澤東白瓷像。

1961 年之前，王佩英只是一個普通女人。丈夫張以成去世後，她一人要養活 7 個孩子，負擔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轉變，不是因生活壓力而起，而是因毛澤東與劉少奇產生分歧，王佩英贊同劉少奇對毛澤東政策的批判。劉少奇在 1961 年說，全國總體的缺點和成績是 3 比 7，有的地區超過 3 比 7，很嚴重。王佩英當眾說：“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赫魯曉夫說得對。”前一句，在當時已經很驚人。後一句又是如何產生的？一個普通的女人，在中國提赫魯曉夫這種世界政治，為何？原來，赫魯曉夫曾公開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為了鏟除異見，不擇手段，大行殘酷迫使之實。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學蘇聯，說毛澤東就是中國的斯大林。1961 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質疑毛澤東，而是要這個人滾蛋。中國那麼多人，每天都在看這個人的臉色吃飯、說話、行事，腦袋就跟安裝了監控器似的，只有少數人覺醒，而少數人當中又只有極少數人站出來公開表達，其中之一就是普通通的王佩英。

從 1963 年被投進精神病醫院開始，到 1970 年被殺害，王佩英經歷了 7 年的非人折磨。醫生給她打精神病人用的藥，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後是牛棚勞教。再往後，就是殺雞儆猴的游鬥，從這裡拉到那裏，示眾完了再反復示眾，嘴上戴著給馬戴的嚼子，不讓你說話，打你、罵你、折磨你，在消滅你的肉體之前徹底摧毀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還要交給各單位討論。那哪里叫討論？完全沒有任何反對意見，全是出謀劃策：用什麼辦法整死這個人？人死之前，怎麼發揮在民衆中的震懾力？哪些餘孽成了漏網之魚？

公檢法癱瘓了，沒有司法審理，王佩英被拉到工人體育場。判決人不是法院，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由于怕王佩英說話，革命者們用石頭塞滿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脫臼——“把下巴都卸了”。這還沒完，押她的人還用細繩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掙扎，結果革命者們就勒得更使勁，勒進去了。從體育場押走，見王佩英

還有點力氣，沒有死透，押解者就在車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她的屍體究竟被丟在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麼，無人知曉。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謂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達了一份《刑事再審判決書》，判決王佩英“不負刑事責任”。而後，中共鐵道部專業設計院黨委作出平反決定。這平反的邏輯是：王佩英，你沒有罪，你一直是跟我們黨一條心的。但是，這個黨，它自己有沒有罪？它不認罪。反對毛澤東且發出“毛澤東下臺”吶喊的王佩英，不僅僅是為劉少奇打抱不平，也不僅僅是關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關心的是民衆何以瘋狂至此，國家何以苦難如斯。她受過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麼堅定地為中共地下黨賣力，還加入了共產黨。一邊是虔誠與贖罪的良心，一邊是曾經寄予厚望的政黨，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饑荒，而後是整劉少奇，搞階級鬥爭，不顧民衆生死，多少人如螞蟻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瘋子般泯滅人性，喪盡天良，這罄竹難書的災難和罪惡是誰帶來的？

面對舉國高呼“毛主席萬歲”的紅色浪潮，王佩英是公開喊出“打倒毛澤東”的極少數人，也是公開提出退黨的極少數人。王佩英是中華烈士，是民族聖女，這沒有任何爭議，但若說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對王佩英極大的侮辱。她是怎麼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這個暴政在當時的推動者，就是這個黨。她回歸真理，要與中共劃清界綫，不願與之為伍，不願成為歷史的罪人。網上有人說：“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換句話說，如果那時的王佩英能夠跟著撒謊，做些讓步，忍一忍，說不定這事情就過去了。就算看在7個孩子沒有人撫養的份上，這個當母親的人裝一裝、演一演，劫難也許不會降臨在她頭上。但是，她是一個有終極信仰和起碼底綫的人，良心未滅，寧死不屈。7年殘酷迫害，她只掉過一次眼淚，那就是“革命者”們告訴她，以後再也不允許見孩子們的面了，這時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慘，捆綁、饑餓、罰站、勞教、批鬥、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沒哭。這種為信念而生的堅定與勇氣，超越了普遍的恐懼與苟合，永照千秋，實乃我中華之第一流人。

從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公審并殺害（年僅55歲），直到2010年，長達40個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衆遺忘，她的6子1女也隱忍整整40年！

以製作影片的方式隆重紀念母親王佩英這件事，是北京家電市場的龍頭老大，公司董事長，王佩英的第三個兒子張大中一手策劃的。當初平反王佩英時，她的子女們每人拿到1000元撫恤金。張大中就是憑藉這筆1000元的撫恤金開始創業，終至今天富甲一方，名動京城。這既讓人欣慰，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條人命的錢啊！人民幣上流著血，隱約看得見手銬的恐怖閃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時連喊都喊不出來的痛苦呻吟。

尋訪王佩英的過程極其艱難，許多受訪人至今恐懼，也有許多人至今慚愧，回避鏡頭。尋訪前，王佩英的子女們曾試圖搞清楚母親為什麼會落到如此下場。許多細節是在尋訪後才知曉的。他們想不到母親竟死得這麼慘，凶手下手竟如此狠毒。當年懵懂不知的他們，如今回想起來，心如刀割，肝腸寸斷。往事，真的並不如烟，當那些鮮血仿佛從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劇痛難忍，唯有仰望蒼天，嚎啕大哭。

在王佩英就義40周年紀念會上，黃炎培的兒子上臺發言。他重新回顧父親與毛澤東1945年在延安窑洞所講周期律的問題，原來黃炎培當年的警告確實是警告對了，共產黨還是沒有跳出這個周期律，民主的道路沒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見的專制獨裁。其獨裁之惡劣，尤其在文革運動中登峰造極，把黃炎培的家庭打擊得够慘。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也參加了王佩英紀念會。她與張大中並排肅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畫像鞠躬。

文革悲劇看似遠去，其實至今仍在發生。其中之差異，無非是反革命變成了顛覆罪。多少據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監獄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見者處境悲哀，惶惶度日，沒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王佩英的事跡將以幾何級地擴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間，直至被政府高層所知。張大中可以長長地吐一口氣，他已盡了他最大的孝心。他的妹妹張可心，文革時還很小，對母親的許

多印象都很朦朧，從小過得很可憐，穿得破破爛爛，大冬天連雙保暖的鞋都沒有，光著腳搖搖擺擺地走著，總想從街坊鄰居那裏知道母親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麼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穩。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當時還太小，許多事都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的……”這眼淚，有著再也無法改變歷史的深深自責。

這眼淚，只要撕心裂肺地哭過一次，人就真的“立”起來了，再也倒不下去。而這，便是紀念王佩英最大的意義，即搶救民族的精神，恢復人間正氣，將罪惡銘記于心，讓悲劇不再重演。即使悲劇正在重演，中國人也應如當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來，向倒行逆施者發出基于真理與正義的吶喊。

敬告讀者朋友

- 一、本刊為民間交流性半月刊；
- 二、本刊為非賣品，免費贈閱；
- 三、本刊歡迎任何與黑五類話題有關的來稿；
- 四、本刊聯絡方式：
  - 1、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 2、手機：13240468075
  - 3、郵寄地址：100091 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大燕北園 305 甲樓 110 號 陳星宇

其實早在 1997 年前後我就想做這樣一個工作。不過，那時不是編黑五類憶舊，而是為餓殍立傳——編纂六十年代大饑荒餓死者的大型故事集。當時我在一家報紙做副刊編輯，借助工作平臺，我向我的作者和讀者約稿，請他們把自己見聞的大饑荒餓死人的故事寫下來，寄給我。一兩年間，我收到幾百篇來稿，然而最終我未能把它們編成故事集。原因之一是絕大部分來稿寫得不成形，而我又沒有足夠的力量把它們一一處理到位。原因之二是我被工作量嚇怕了。有一天，我看到一個資料，說 78 卷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總字數才 1.26 億字。于是我想，三千多萬餓殍，光名字就是一億多字，與《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總字數相當，這輩子我什麼事都不幹，光他們的名字我到死都寫不完！

那幾百篇稿件我至今珍藏。餓死人的地面兒真是廣啊！從東北到海南，從新疆到江南魚米之鄉，全國各地哪兒的來稿都有。中國人真耐死啊！至今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難怪毛澤東不在乎跟人家打核大戰，也不在乎幾千萬人餓死。為餓殍立傳的宏願雖未實現，那兩三年我却集中寫作和發表了幾十篇關於農民問題的文章。這是大陸大眾媒體上最早的一批為農民權益呼籲的言論文章。某種意義上說，近十幾年來海量的關於農民問題的個人寫作、媒體報道（成為熱門的公共話題）和政府農村政策的改變（廢除農業稅等），都濫觴于我寫的這一批視角獨特、尖辛悲愴的文章。

發願為餓殍立傳的時候，互聯網還未流行，其功能也還很有限。那時所有稿件都經郵寄而來，或是電腦打印稿，或是手寫稿，沒有一篇是通過 Email 發來的，也沒有搜索引擎可用。今天編《黑五類憶舊》與為餓殍立傳一樣，也是一項有限對無涯的事功，可畢竟至少技術上方便多了。現在我不再作貪大求全之想，不奢望記下每個黑五類的名字，只求懷著一份敬虔之心，竭盡所能，把《憶舊》編成一部記錄特定時期中國社會生態狀況的歷史文獻。雖或無補于黑五類同胞曾經遭遇的屈辱、不公和苦難，但求有助于我們所歸屬的這個族群未來的成長、進步和文明。

#### 銀行家康心如先生誕辰 120 周年紀念會公告

原重慶美豐銀行總經理、抗戰時期陪都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誕辰 120 周年紀念會，定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在重慶市重慶歷史名人館舉行。熱誠歡迎海內外尚健在的美豐銀行同仁、美豐同仁的後人、對相關問題有興趣和專門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及媒體記者報名參加。聯繫人：詹康（手機電話 0086-13012367126）。通信地址：重慶渝北區龍溪街道金龍路 92 號 3-16-2。郵編：401147。電子信箱：kgx290920@sina.com。特此公告。

康國雄（康心如之子）

2010 年 8 月 14 日于北京

#### 目 錄

愛在風雨夕·····	海 鷗（04）
美國好公民關惠群·····	林寶慶（09）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	顧延齡（11）
受教育權被奪記·····	李蔭國（15）
少年反革命·····	胡 健（18）

壞人時代·····	甲 乙 (21)
托派子女的夢魘·····	張曼青 (23)
東山谷文昌·····	霍 達 (26)
歸僑生在一九五七·····	黃達維 (28)
蛇灣血案·····	張介山 (30)
探母記·····	從維熙 (33)
亂世恩仇·····	胡喜盈 (37)
四類分子的命運與掙扎·····	李若建 (40)
土地陰謀·····	李 肅 (46)
我家的地主分子·····	呂 維 (48)
愧對宋爾仁·····	馬 波 (56)
巫寧坤的煉獄·····	三 妹 (59)
周扒皮的後人·····	孟令騫 (64)
桃曲舊事·····	許崇平 (69)
暴力土改及其原因·····	楊奎松 (72)
鬥尸記·····	尹曙生 (79)
五字勾魂·····	楊 杰 (88)
倪柝聲的絕筆·····	頌 恩 (89)
在青草地上·····	梁惠珍 (92)
胡錦濤請客·····	佚 名 (99)

## 愛在風雨夕 海 鷗

1966 年春節過後，我剛從大連返回單位上班，同寢室的房師傅就要給我介紹對象。他說：是他的堂妹，師範學校剛畢業。知根知底，問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剛工作，想過幾年再考慮。時間不長，他又問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給你介紹對象？我吃驚于他的消息靈通。“是的。但我還是那句話，過幾年再考慮。”“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別錯過良機。我這個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個日子，你倆見上一面。行就處，不行拉倒，省得我總為她牽挂。”就這樣，他硬性安排我在一個周一的早晨，與乘早班火車回郊區學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車站候車廳見了面。

這樣我就算處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將我在學校寫的一本詩集給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買的一本很漂亮的硬殼筆記本上，然後又把我的詩集還給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嫺熟的漂亮字迹令我感佩，那從字迹中散發出的人品的賢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戀。不久她告訴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農，並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慮與她的交往。那時我在這方面沒受過什麼挫折和打擊，對此不以為然。

這年五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恐怖開始了。我很為她的家庭出身擔心，一再叮囑她要處處謹慎。她告訴我，由于出身政治賤民，從 1957 年 14 歲起她就懂得了世間炎涼，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讓我放心，沒事。我每個周六晚到車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車站。每次走時，她家那條小黃狗都會跟著，一直送到車站，然後讓我摸摸它的頭，轉身跑回家。

說起這條小狗，還有一段故事。那時我倆認識不久。一次我們遛馬路，突然竄出一條小黃狗向她身上撲。我嚇了一跳，趕忙去驅趕，可它還是搖著尾巴向上撲。她蹲下抱起它說：

“這是我家的小狗黃黃，可厲害呢。”“它怎麼跑到這裏了？”“不知道呀。”說完將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腳，那條小狗就跑向我們身後的兩位老夫人身邊。後來她告訴我，兩位老人是她的母親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驗收我。再後來我到她家時，黃黃見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搖頭晃腦，特別親熱。她的母親驚異地說：“俗話說‘狗不咬新姑爺’，你們看真是這樣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說經過多次反復考慮，決定與我分手，今後作為好朋友相處。我很吃驚。最近在一起的時候，她總顯得那樣無精打采，悶悶不樂，還說有老師要給她介紹對象。強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揮筆復函。信寫完後，剛要去郵局，突然覺得這事得與介紹人說一聲，不然他還以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經與房師傅交談，方知單位文革小組已勒令她的父親“限在本周內滾回農村原籍”。十幾天前，看到市里散發的《關於驅逐黑五類分子問題的革命串聯大會決議》，她就有了預感，覺得我倆的愛情沒有未來。為了不影響我，她痛下決心，才提出與我分手。

第二天，我請代休假趕往她家。沿途看到滿載抄家物品的卡車呼嘯而過，時不時有成群的黑五類被紅衛兵從小巷裏打罵驅趕出來，押解遣送。紅色恐怖已從傳單標語上走進現實。

一進大院，我就看到她們全家正在向一輛馬車上搬家具。馬車旁站著她的父親，正與一位滿臉凶相的瘦高個，右臂上戴著“赤衛隊”袖標的人交涉。“老郭，這捆書是老爺子留下的藥書，你們要它幹嘛。”“我看是你家藏的變天賬，必須帶回檢查。”一位身著草綠色軍裝，扎著皮腰帶的學生模樣的紅衛兵走上來說：“郭組長，又搜出幾封信件，怎麼處理？”

“全部帶走。”這時只見她從屋裏跑出來喊道：“那是我個人的信件，你們不能動。”那個紅衛兵立即從腰上抽出皮腰帶，舉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趕忙上前勸阻，並將她拽到一邊說：“咱不要了，我以後再多多給你寫。”她一看是我，以驚異的目光看著我說：“你怎麼來了？”“我不應該來嗎？”她擺了一下頭髮，露出額頭上滲出的晶瑩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經把它撕了。現在什麼也別說了，抓緊搬家。”

等我將最後一件物品（一個收音機），放到車上她父親手中時，她母親把我拉到一邊說：“小汪，情況就這樣，你也都看到了。你倆的事，大孀只有一個要求，我家的成分問題不能連累你，希望你儘早給她一個話，不要猶豫，行嗎？”我拉著她那顫抖的雙手說：“大孀，你放心去吧。弟弟我們會照顧好的。有時間我倆會去看望您老。”在搬家過程中，黃黃被對面屋的劉大娘關在她屋裏，一直狂叫不止。否則它會向生人撲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過它一脚，罵它“真他媽是黑五類的狗崽子”。

她家這個一百多戶的長海大院，先後被攆走四戶人家，其中一個姓胡的寡婦最慘。她因強調曾任國民黨軍隊連長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貧民，因而拒絕被遣送，與紅衛兵吵鬧起來，最後被剃了陰陽頭，當晚上吊自盡。三天後，兩個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兒剛上初二。還有一戶姓李的，70多歲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趕回原籍。但原籍已無任何親人，經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兒子那裏。我們是最後一家被遣送的，時間是1966年9月16日。

他們父母走後，我時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剛初三畢業，課不上了，又不讓參加紅衛兵，整日呆在家裏與黃黃為伴。這時黃黃的眼已瞎了一隻，是上次被那個姓郭的踢瞎的。它見了我更加親熱。聽弟弟講，他十歲那年冬天，家裏的炕爐子夜間反烟，將全家熏昏，是黃黃半夜發現，拼命撓門大叫，把對面屋的劉大娘驚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聽了這些，我將它抱起，貼在臉上。它用那軟軟的舌頭舔我的臉頰，好像是對我款款深情地說話。

她還是周六回來，幫弟弟料理一下家務。沒過多久，街道居委會來了一幫人，拿著一份北京工業大學紅衛兵領袖譚力夫的講話《從對聯談起》，說根據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須走”。弟弟走後，房子被街道居委會一個造反派女頭頭占了。她上了一把鎖，聲稱要辦街道托兒所。當時黃黃已染病在身，被劉大娘留下，說以後再來取。就這樣她徹底沒有家了。

在以後的日子裏，她不敢去鄉下探望父母，因為學校文革小組已找她談話，要她一定劃清階級界限，分清敵我。她也不敢外出，因為全國已刮起出身論的狂風，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車汽車，進商店醫院，都要報出身。

那時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見到我，見我後又總是說“下次不要來了，這走鋼絲繩的日子不能讓你也攤上”。有次我生氣地說：“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處在水深火熱中等待我們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鋼絲繩，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懷中，用右手連連捶著我的前胸說：“你真傻，真傻！”這時的我，真的分不清是愛她還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據了我整個身心。

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由此全國各大、中、小學掀起大串聯運動。起初象她這樣出身的人是不許參與的，後來就沒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給她一份油印的《周總理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的講話》，其中談到驅逐黑五類問題時有這樣一段指示：“你們不能把髒水都潑到農村……不能不分青紅皂白統統遣返農村，已這樣做的要儘快糾正，把他們接回來。”見到這份文件後，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勵下，她與學校同樣出身的幾位老師決定一起以串連的名義去北京。那天他們趕到火車站時，車站已貼出“車已超員，停止進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將她們帶入我的宿舍，打開宿舍後窗，直接送進站臺，並幫助她們一個個從車窗爬進車內。

北京清華園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頭。在那裏，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鉛印文本，即刻買一個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專用信封，將文件寄給鄉下的父母。母親接到後，連夜騎自行車趕往40多裏外的城裏。天剛放亮，這封信就已交到父親的一位叫李長江的徒弟手裏。這個徒弟也是單位文革小組的成員，他高興地說：“這就好啦，一切交給我辦。”他立馬找到那位姓郭的組長。郭一見這帶有“清華大學”字樣的牛皮信封，頓時肅然。在我們那個北疆邊城，在人們的心目中，清華大學就是毛主席的傳聲筒，就是第二個中央文革小組。再抽出文件細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簽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農村那頭則沒這麼順利，那裏的文革頭頭不同意返回。無奈之下，她父親把新買下的房子送給他，才獲得簽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氣格外好。在她父親單位同事的幫助下，全家又回來了。但黃黃沒等到這一天。自弟弟也被攆走後，黃黃的身體就一直沒再好起來，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鎖的房門下，不吃不喝。壞了的那只眼不斷淌出血水，最後終於離開了這個瘋狂的世界。

印度的種姓制度，日本的賤民制度，南非的種族制度，等等，在國際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當年肆虐中華大地的血統論與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統優秀論有何區別？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無須通緝歷史罪人，因為從來無一漏網。

補白：鄉人柳普，少年時放蕩不羈，青年時外出闖蕩，輾轉多地，終無所成，後被抓壯丁，在國民黨21軍充當伙夫。在伙房曾經人介紹，填表一張，說是加入什麼互助組織，後來有沒有什麼活動，他自己也忘了。解放後經查，那是一張加入軍統的表格。經公安部門審查數月，因無確切證據從事過特務活動，被逐回鄉，發證一張，結論欄中寫明“作為反革命”。文革中，柳某成為牛鬼蛇神的一員。在向領袖請罪時，總是自報家門“‘作為反革命柳普’向老人家請罪”。民兵營長大喝：“柳普，你就是反革命，怎好是作為反革命？”柳普慢吞吞地說：“我不是反革命，是作為反革命，我是有派司的。”說完，掏出派司，白紙黑字寫著。眾皆笑，營長無可奈何。後柳普終經不起折磨，投河而亡。海安



沒有上過一天學，連自己幾歲都不清楚的移民關惠群，每天默默為數百位無家可歸者送飯菜，20 餘年如一日。8 月 4 日，歐巴馬總統在白宮為這個關惠群頒發了 2010 年國家公民獎。

關惠群出生于廣東開平的一個富裕家庭。父母均是成功的醫生，但在文革期間成為批鬥對象。六七歲的關惠群，脖子上挂著鐵絲木牌，受批鬥，跪玻璃。她親眼看見哥哥和嫂嫂被槍決，還親見其他家人餓死或受虐死在街上。關惠群獨自一人，流浪街頭，睡馬路，睡垃圾箱，挨餓受凍，在垃圾箱中撿東西吃，度過 4 年無家可歸的生活。沒有人跟她說話，她也被禁止跟別人說話，飽受孤立與貧窮之苦。

11 歲那年，關惠群與家人泅水逃至香港。到香港後，她一度無法適應正常生活。她無法吃普通食物，只能吃垃圾，晚上拒絕睡床。不久，她父親因病在香港去世。14 歲上，她輾轉來美，投靠姐姐。姐姐每天離家上班後，她就在家看公共電視臺的兒童節目《芝麻街》和《Mr. Rogers' Neighborhood》。這兩個節目就是她的學堂，她就這樣學會了英語。也由于 Mr. Rogers，她至今都堅持穿要綁鞋帶的鞋子。

38 年前，經人介紹，關惠群嫁給物理學博士陳伯良，并隨夫搬到加州 Eureka 鎮。大兒子陳溢俊上小學一年級時，關惠群怕兒子如她幼時那樣被人欺負，就每天在教室外觀望。老師知道她不會說英文，後來也請她進教室一同學習。當時班上有一個小女孩，每天向關惠群討食物吃。後來她發現這個小女孩的全家都住在車上，便開始接濟這家人。

關惠群行善不欲人知，連老公都瞞了 10 年。因為無照派發食物，她還被當地警方取締。三年多前，經當地記者報導，關惠群的善行才公諸于世。加州第一夫人也曾跟她一起送飯，還捐了三間浴室。

現在關惠群每天清晨 2 時起床，為加州 Humboldt 郡四五百名無家可歸者打點當天的食物，并且送無家的小朋友上學。她照顧的無家可歸者，都是不符合政府救濟條件的弱勢者，大多數是有心理疾病的退伍軍人，許多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還有幾十名不滿 20 歲的青少年。一些美國家庭，子女一滿 18 歲，就不再負擔他們的生活了。

關惠群說她只是在回報社會。她不願再見到與她當年那樣睡垃圾箱的情況。關惠群至今仍有夢魘，只要聽到華人男子說中文，就會不寒而栗。不過她說她活過來了，她認為是神讓她活下來，她是有使命的。不過，她說，她的哥哥、姐姐以及 103 歲的母親吳德瑾，則從來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補白：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每個生產隊都以揪出幾個牛鬼蛇神為榮，否則就是階級鬥爭覺悟不高。本人所在生產隊沒有地主，僅有的一個富農，文革前就死了。這可急壞了民兵排長，想來想去，發現了幾個富農子女。特別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過富農的生活，“就他了”。但該人是個瘸子，解放前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除了不能挑擔外，耕、耙，揚、種等農活樣樣在行，還能做木工活，走路較常人還快。成為牛鬼蛇神後，此人每天自備高帽，上書“富農子女”外出游街。開始還要人押送到大隊集中，幾天後，婉拒了押送人員，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前面有人敲鑼，後面有人喊口號，煞是有趣。尤其瘸子，總是走在第一個，有時還與其他人拉開一定距離。他自我調侃：“我是一條腿走一條腿推，你們怎走得過我。”長長的隊伍，瘸子打頭，引起眾人爭相觀看，笑聲不斷。

海 安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 顧延齡

本人顧延齡，江蘇南通人，1957 年畢業于杭州大學數學系，為人誠懇正直。當年同學們推選我為班級整風代表，我却沒有寫過一張大字報。早在 1955 年反胡風時，女同學吳xx 曾遭班級批判。在班裏僅有的一次放鳴會上，有人舊事重提，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她又不是胡風分子，批她幹什麼。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尊重，應該同情人，理解人，尊重人。”隨著整風迅速變為反右，我和無數人一樣也落入了毛澤東早已設計好的陽謀陷阱。

從 7 月 24 日起，班級整整批了我七天七夜。7 月 31 日半夜，批判會結束後，我一個人從都克堂出來，黑暗中沿著下山的石階，經健身房，無目的地走到錢塘江邊。一路上，沒有一個同學理睬我，那怕說一句話，點一下頭。

接著，團支部會上，支書宣布我已墮落為右派分子，開除團籍。時年 22 歲！我嚎啕大哭，在同學面前表態說：“三年後，我要重新加入共青團！”那時我是多麼天真、幼稚、無知！右派已經淪為階級敵人，怎麼可能讓你重新加入共青團？

畢業分配名單也是在都克堂宣布的。分配名單中居然沒有我的名字，我意識到問題嚴重，立即給浙江省教育廳寫信，表示“願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希望能分配我一項工作”。省教育廳很快答復，叫我去寧波專署教育科報到。我匆匆整理好行裝，沒有向任何同學告別，無聲無息離開了生活了四年的杭州大學。風景如畫的校園對於我已經絲毫不值得留戀。這一天是 1957 年 8 月 21 日。

省教育廳通知我去寧波報到時，給我一封密件交寧波專署教育科，寧波又給我一封密件交嵊縣教育局人事科。至今我不知道裏面究竟是什麼內容。1957 年 8 月 22 日，我到嵊縣中學報到，任數學教師，直至 1995 年在該校退休。

1957 年 8 月至 1963 年春，學校不發給我工資，每月只給 25 元生活費，而工作量却是一般教師的兩倍。1962 年春，俞忠榮副校長在師生大會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可仍然是每月只有生活費。我寫了申請報告，到 1963 年春才拿到每月 51 元的工資。

1979 年右派摘帽改正時，嵊縣教育局張文槐副局長和人事科吳文兔兩位領導找我談話，說我的檔案中只有 1962 年右派摘帽的文件，有開除團籍的文件，有察看二年處分及延長察看一年處分的文件，卻沒有看見右派戴帽的文件。他們問我：“1957 年杭州大學有沒有戴帽的公文讓你看？有沒有在戴帽公文上讓你簽字？”我懵了，答道：“在杭大，除了批判會上有人說我是右派外，沒有人單獨同我講你是右派，更沒有書面文件給我看，我沒有簽過名字。”他們又問：“你怎麼知道你是右派？”答：“杭大開除我團籍的會上說顧延齡已墮落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開除團籍。到嵊中，每月只給我 25 元生活費，拿了整整 6 年，憑此我就認為自己是右派分子。至于對我察看二年和延長一年的處分，我同樣不知道。老師們也不知道，沒有人同我講過。”

我在杭大的檔案中只有二年察看處分，沒有戴帽批文，這說明杭大並未給我戴右派帽子，只作二年察看處分。可是當初杭大並沒有向我宣布這個二年察看處分。那麼嵊縣是誰把察看二年處分當右派分子處理的呢？肯定是校領導。那麼延長察看一年又是誰做出的呢？肯定是諸丹忱。當時嵊中書記、校長是一個人，就是諸丹忱。諸肯定知道內幕。只有書記、校長有權有膽敢這樣肆無忌憚地幹害人的勾當！我曾問過諸校長：“教育局領導說我的檔案中沒有右派戴帽文件，只有摘帽文件、察看二年和延長一年處分文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諸尷尬地、毫無底氣地說“不知道”後，然後不聲不響地走開了。

事情總要有個結果。我寫信到杭大詢問，同時到杭大數學系盛淑雲教授（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黨員、班團支書）處問當年對我是怎麼處理的。他回答說：“批判你以後，我們把材料上報了。以後如何批復，我們不知道。”

不久，1979 年 3 月 6 日，中共杭州大學委員會發文《關於顧延齡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結論》，正文如下：“顧延齡，男，四十四歲，江蘇省南通市人。原浙江師院數學系一九五七屆學生，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分子，並受到開除團籍的處分。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

子，現在嵊縣中學任教。根據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精神，對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經復查，顧延齡同志沒有右派言論。原劃該同志為右派分子，屬於錯劃，決定給予改正。撤銷原右派處理決定和開除團籍的處分。恢復名譽。關於工作和工資等有關問題，建議所在地區和單位按規定辦理。”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與張鳳圖老師談起我檔案中的怪事。張老師說：文革時，他曾與另一位老師到杭大調查某某某的歷史。查完後，好奇心促使他們順便去看我的檔案，結果檔案中却找不到我是右派的資料。由此可見，我在杭大的檔案中確實沒有戴帽批文！那麼杭大黨委發出的改正我錯劃右派的文件又是憑什麼發出的呢？難道是不管你有沒有檔案，只要事實上你已做了22年右派，就予以“改正”嗎？這一將錯就錯，究竟是誰的責任？

因當權者草菅人命，我冤枉地當了22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我不禁要問：

一、既然我檔案中沒有戴帽文件，那麼當初是誰把我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

二、既然沒有戴帽文件，那麼1962年摘帽時就應發現這個問題。既已發現問題，就應立即糾正，恢復名譽，補發工資。那麼又是誰繼續隱瞞真相，假模假式地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使假右派變成真右派？由於這些人隨心所欲、草菅人命，我過了二十多年提心吊膽、心神不定的日子。帽子拿在他們手中，隨時可以給你戴上，而且禍害父母、弟妹、妻兒一大片！試問這些人是否犯了瀆職罪、故意傷害罪？要不要承擔法律責任？

三、我的檔案中有察看二年處分和延長一年察看處分的材料。如此重大的處分，為什麼不讓我本人知道？連老師們也不知道我有察看處分的事，只知道我是右派分子。那麼誰在一手遮天？誰在瞞天過海？對這種人難道不應該追究行政責任，甚至法律責任？

四、1957年至1962年初的戴帽期間，我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費，却每周要上24節課。摘帽之後，為什麼工作量和工資仍然還是右派標準，沒有一點改善？直到1963年，經本人申請，才拿到轉正工資每月51元。摘帽後一年（1962年初至1963年初）的工資也未予補發，而工作量仍然是以前的工作量。1963年教師加工資，學校加工資的指標用不完，而學校那些當權者竟一手遮天，又剝奪了我增加工資的權利。直到1977年，已工作了20年的我，才平生第一次增加工資（每月加7元）。試問，這22年的經濟損失、精神創傷是誰給我造成的？嵊縣中學的領導、嵊縣教委乃至國家，難道不該承擔責任嗎？1979年，杭大發文說我是錯劃右派，予以改正，經濟上却未補發一分錢。

五、嵊州崇仁中學梁麗英老師檔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單位不把她當右派。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時，她才知道自己曾是右派分子。可是我無右派材料，却當了右派——如此玩忽職守、無法無天、喪盡天良的幹部該不該處理？

反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年憲法第97條明文規定：“由於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取得賠償的權利。”1957年反右完全是對1954年憲法的公然踐踏，中共必須徹底否定反右，必須徹底追究那些傷天害理的具體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向受害人賠禮道歉。按照1954年憲法，我們右派完全可以名正言順地向國家索賠，發還二十餘年所欠的工資，賠償精神損失。現在政府有足够的財力，有人建議財政部應該發行專門的右派賠償債券，打白條子也可以嘛！

受教育權被奪記 李蔭國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濱，家庭成員都是知識分子。父親湖南大學畢業後從政，母親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育事業。我一歲多時，父親出走臺灣，母親劉學熙和姨祖李祥琳（漢

壽縣資深老教師）撫養我在摸爬滾打中長大。1957 年，母親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連，一次次被小學、中學拒之門外。

1959 年 7 月，我初小畢業。參加了升高小考試之後，我便無故心生不祥的預感。張榜後，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頓時頭腦嗡嗡作響。我紅著臉，逃也似地悄悄離開，欲哭無淚。當時我雖未滿 11 歲，却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關係。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這麼低的門坎，學校該不會以家庭出身為欄杆將我拒之門外吧？可是落榜的現實（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無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時初小升高小，考試只是過場，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飽受驚嚇的我，這時更覺得懼怕，不知自己家的問題究竟有多大。十歲孩的童竟幾乎被這個社會公開宣布為敵人，我被自卑感和負罪感完全吞噬了。

從 11 歲到 13 歲半，我荒廢了整整兩年半時間。這是我一生中刻骨銘心、度日如年的兩年半。失學後，我偶爾跟隨姨祖住縣直機關幼兒園。園長餘某，極端仇視我這個右派的兒子。1960 年春，她把 11 歲的我強拉去圍堤湖和幼師們一起割草支農。漢壽圍堤湖是血吸蟲疫區。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高燒四十多度。在極度貧困中，母親和姨祖設法籌錢為我治病（當時治療血吸蟲病不免費），住院一個多月，差點丟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廢學業，十分痛惜，又無可奈何。她要我習碑帖，練毛筆字，看書自學。

1962 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親也在其列。母親命運的轉機，也給我帶來上高小的機會。我上的高小是本鄉有名的鄒家坪完小。班主任鄒憲章老師很有才華，又誨人不倦。令我興奮而又緊張害怕的小學升初中考試到了。1963 年 7 月，升初中的考試在太子廟中心校舉行。我奪得全縣第一名。

然而漢壽縣教育局最後却做出這樣的結論：李蔭國父親是畏罪逃往臺灣的反革命，母親是剛剛摘帽的右派分子。雖過繼給李家，李家也是縣內頭號資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績再好也不予錄取！

全縣第一名却不被錄取。這是我第二次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

涼秋九月，眼看著許多同學帶著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進入漢壽一中、二中，我却再度淪為無業游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懷疑自己還有沒有中國人的人籍。我對自己的前景徹底絕望了。可是這一次我却奇迹般地很快平靜下來。我已經 15 歲，完全懂事了。當時幹什麼都有一道政審關卡。升學、參軍、參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淪為文盲或半文盲。我認命了。

懷著滿腹心酸，我從母親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邊。上街我總是走邊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賊，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學就遠遠避開。姨祖鼓勵我切莫悲觀，要堅持自學，繼續練毛筆字。她讓我讀《古文觀止》，給我講韓柳歐蘇，講《左傳》、《國策》、《史記》、《漢書》裏的故事。“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李陵答蘇武書》中蒼涼的描繪把我帶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當時我的荒涼與無奈的心境。我的泪水往心裏流淌！

姨祖覺得我困在家裏看書寫字也不是個辦法，還是要想辦法接受系統的學校教育。1963 年底，姨祖專程去長沙，找到漢壽籍湖南師範學院（今湖南師範大學）教師鄭英鑄（也因右派問題被困），請他幫我找個中學就讀。鄭先生是漢壽名士，1949 年之前縣孤兒院院長鄭啓濤之子，與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鄭先生十分同情我的處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師（漢壽人）相商。幾經輾轉，終於尋到一所願收“梁山好漢”的民辦中學。這所學校叫長沙清華民辦中學，地址在小吳門下的清水塘，校長賀邦鴻。

別看這個中學招牌大得驚人，却是一所極為簡陋，剛剛開辦不久的學校。三個教室，兩個年級。學生大多為進不了公辦中學的出身不好的學生，還有一些是問題少年。湖南日報社等好幾個單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們班。老師的水平還不錯，他們都沒有公職，幹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會失意者。

經過清華民辦中學一個學期的努力，1964 年暑假過後，我懷著新的希望插班到長沙讀初中二年級。很快，我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師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長。1964 年 12 月，一封漢壽縣教育局并加蓋中共漢壽縣委大印的公函迫寄踪學校。該公函介紹了李蔭國是何許人（家庭背景和漢壽縣不予錄取的事實），稱該生不甘心現狀，隱瞞家庭出身來長沙讀書。按照黨的政策，應辭退出校。請予配合。

據母親回憶，當時株木山聯校教師彭某曾幾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聯校骨幹劉某為主謀，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讀書”當做階級敵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妄圖復辟變天的重大階級鬥爭新動向來抓。漢壽當局高度重視，像追蹤逃犯一樣窮追不捨。

清華民辦中學賀校長找到尚沛老師告知了真相。尚老師和鄭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順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師找我談話，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華書店買一套由周朋壽主編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回去自學。我第三次失學了。這也是最後一次剝奪我受教育的權利。

回到漢壽，我再也無心自學，再也不奢望讀書考什麼大學。我的學校生活就此結束，我的升學夢徹底破滅。算起來，我讀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個月，共六年多。正當求學上進的花樣年華，我却連續三次被學校堅拒于門外，這無異于將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隻腳，叫我們永世不得翻身。

少年反革命 胡 健

走吧  
我們沒有失去記憶  
我們去尋找生命的湖  
——北島詩《走吧》

當時吳續久和我是實驗小學 5 年級同學，我倆的父親又都是被批鬥的當權派，因此我們常在一起。我家有一台紅燈收音機，吳續久來時我們會亂撥電臺挑選節目。一次，我們無意中撥到了莫斯科廣播電臺。那可是敵臺！我們十分驚異，十分恐懼。

敵臺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語，泛指中國境外的華語或英語等語種的廣播電臺，特指當時敵對國家和地區的廣播電臺，如美國之音、BBC 等。當時收聽這些電臺只能通過短波，并在夜裏進行。如果缺乏耳機設備，人們往往需要把聲音調到最小，故曰偷聽敵臺。這種行為一旦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被停職，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重則判刑。在思想禁錮的文革歲月，偷聽敵臺成為一部分中國人瞭解外部世界，滿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娛樂渴望的特殊途徑。

一次，我和吳續久從莫斯科廣播電臺聽到中國作曲家李煥之的《春節序曲》。那麼歡快，那麼喜慶，那麼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聽極了！文革後，中央台哪年春節不播放它呢？可是當年我們却是在心驚肉跳中收聽的它。還有一次，我們聽到當時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的小提琴曲《思鄉曲》。一唱三嘆，好呀！我後來才知道，馬思聰當年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了國外。莫斯科電臺播音的聲音不同于國內電臺，內容則大都是對中國當時被禁的文藝名作的介紹。至于說我們當時偷聽莫斯科電臺有什麼政治居心，那是太抬高我們兩個小孩子了。

不久，複課鬧革命了，我們也上中學了。我在淮中，吳續久在一中。有一天，是個星期天，突然傳來一個消息，說吳續久被抓了。因為寫反動標語，成了現行反革命！我驚呆了。如果吳續久成反革命，那麼我怎麼辦？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脅，晚上睡覺時人在床上就

好像飄起來似的。

次日星期一，我去學校上學。班主任通知我：“早操後你去辦公樓政工組一下。”完了！徹底完了！！無邊的恐懼籠罩著我。我胡裏胡塗做完早操，隨著班級的隊伍從環城路向校園跑去。我整個人好像在隊伍中飄，心中說著：“同學們，再見了！白雲藍天，再見了！”到了政工組，兩個中年模樣的人詢問我關於吳續久的情況。我如實相告。最後，他們兩個好像非常友善地說：“你沒事了，不要害怕！”可我怎麼可能不害怕呢！不久就傳來了吳續久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批鬥勞改的消息。

吳續久後來回憶說：那天早上進教室時，他發現教室窗戶都被用紙糊了起來（神秘），桌椅也變動了。吳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兩名壯實高大的同學就夾在著他坐下，市文教衛系統革委會的頭頭和一中革委會的頭頭也走過來了，當眾宣布：“把現行反革命分子吳續久押起來！”吳續久就這樣收押了。當時他不到 14 歲。

所謂的反動標語根本不是吳續久寫的。“當時我父親、我舅舅都被打成走資派，我怎麼敢寫反動標語呢？我怎麼也不承認，并提出可以通過驗筆迹等方法查出寫標語的人。”革委會的頭兒們先是來硬的：“你父親、你舅舅都被批鬥，你不可能沒有階級仇恨的，反動標語不可能不是你寫的！”後來他們又玩軟的：“你承認了吧，你很小，可以寬大處理，不會影響你的上學、你的前程。”一個不足 14 歲的小孩子，哪里經得起那些橫高豎大的大人們一天一夜的折磨，吳續久終於在審他的人事先寫好的紙上簽了字。（這些成年人欺哄逼供孩子，真是其無後乎！——編者）就這樣，吳續久成了現行反革命，不准再上學，不斷地被批鬥，并在學校裏勞動改造。

那些革委會的頭頭在審問吳續久時還特別提到我：“你成天與叛徒、走資派胡某某的兒子在一起玩，你們幹了些什麼？偷沒偷聽過敵臺？”在我全然不知的情況下，蒙這些大人們如此看重，真是受寵若驚！

1971 年，吳續久被當作三等公民分配到一家社辦廠，我被分配到一家大集體的工廠。我比吳續久要高一等。之後不久，吳續久的父親平反了，又成了革命老幹部，吳續久的現行反革命罪名也因證據不足而從有變無了。吳續久現在生活得還不錯，他說他對當年的事已經不願多想了。

補白：奉節縣城小商販傅吉華夫婦，年近半百，無兒無女。因為朱衣供銷社像機關一樣嚴格執行上下班作息時間，開門晚關門早，還午休，農民買點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華在供銷社門前租了一間農房，通過關係從供銷社批發食鹽、捲烟、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銷。供銷社不開門時，社員可在此購買，免得跑空路。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紅衛兵司令部開成立大會，幾個革命小將將傅吉華揪上臺批鬥，給他戴上紙糊的高帽，令其低頭彎腰。傅吉華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項罪過，莫名其妙，不太馴服。幾個小將上前揪臂按頭，傅吉華向前一躍，一隻腳踢到了揪他的紅衛兵鄧昌友的下身！剛滿 13 歲的鄧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資產階級分子傅吉華毒打紅衛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區公安特派員立即派民兵將傅吉華綁送縣公安局。傅吉華反對毛主席的紅衛兵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現行反革命。傅被判刑入獄，傅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屬，當然不能再開代銷店了，生活無著，長期抑鬱生病，又無錢醫治，死在租住的農房裏。傅吉華在文革後才出獄。陳宗培

壞人曾經是中國社會强行分出的一類人。那時我們是祖國大花園中的花朵，我們被教育眼前的任何一個人人都可能是壞人，因而要睜大眼睛辨認，以免被壞人污染。我們隊就有一個壞人，是右派分子，四十多歲，是從外地押回老家改造的。我家隔壁的老地主也是人人皆知的壞人。他老朽、掉牙、禿頂，見人卑躬屈膝，一副逆來順受的模樣。在人們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思想和肉體批判時，我仿佛享受到自己是個好人的快樂。

但是很不幸，某一天我家也出壞人了。大隊革委會頭頭告訴我：你的父親是反革命，是混進革命隊伍的一個壞人，要與他劃清階級界綫，不能包庇同情。他還動員我響應毛主席號召，帶頭站出來對父親進行揭發鬥爭。我那發育得尚不成熟的大腦，實在無法參透這個複雜的問題。我非常緊張，覺得自己站到了人生的危機關口。我固然很嚮往革命隊伍，不願被革命大潮拋棄，但我並不瞭解父親究竟是怎樣一個壞人。他經常說政府好，從不說反動話，怎麼會是壞人呢？他唯一的問題是幾十年前當過國民黨軍官，可是很快就向新社會自首投誠了啊。

我不瞭解父親，因而無法批判父親。大隊頭頭很失望，把我從“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單中劃去。後來我偶然得知父親竟是區裏政工部門內部監控的對象，感到非常恐懼。如今四十年過去了，父親已逝，不知他這頂特務嫌疑的帽子是不是還在，需不需要平反昭雪。

我 20 歲那年竟差點兒也成了壞人。公社搞圍湖造田，青壯勞力冬天到湖灘挑堤，從早到晚幹十四個小時，很累。有天傍晚，我挑一擔土上了堤壩，倒土，喘氣，不知怎麼想的，竟突然對平時要好的哥們小張冒出這麼一句：“我們挑長城啊。”學毛選小組成員關某聽到了，馬上質問我：“你說這是什麼意思？”我說沒什麼意思。他說：“沒什麼意思？你這是把我們的黨比作秦始皇！”然後怒氣衝衝地走了。就憑這一句話，我也可能被當成現行反革命在工地現場批鬥，然後逮捕坐牢。于是我和小張緊急商議：假如關某真去告密了，我決不承認，而作為證人，他要堅持一問三不知。此後幾天我一直擔心大隊會把我突然揪出來批鬥。可不知為什麼，這事竟有驚無險地過去了。我算親身體驗到差點兒成為壞人的滋味了。

最後徹底動搖了我的壞人觀的人還是父親。父親正派、廉潔、堅強、守信、敬業，做人做事一絲不苟，一生雖苦，却以苦為樂。即使生活窮困不堪，但絕不會有小偷小摸之心。他從不撒謊，不貪他人或公家一點便宜，沒有任何不良嗜好，對青年人總是告誡要學好。他曾當過生產隊保管員，人家想夥同他私下多分一點集體的東西，他却義正辭嚴拒絕。父親一生堅持做他自己，不管頭頂的壓力多大，日子多難，他都依然如故。鄉人因此稱父親為周朝人。據說周朝人最守規矩，對王法說一不二，朝廷可以畫地為牢。如果我們的社會更多一些父親這樣的人，肯定就是一個好社會，好國家。

今夜，在這裏，我在自己內心給父親徹底平反——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寫的至誠之人。我雖是父親的兒子，在人格尊嚴上實不及父親的十之一二。由父親推去，我青少年時代看到的許多壞人，看來其實並不壞，甚至其中不乏極好的人。本來我應該多多感受他們的人生光華和智慧，却錯過了走近他們的機會。在那個彎曲悖謬的年代，人們形成了一種病態的封閉心理，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彼此戒備，很難坦誠待人，很難輕鬆共事共存。

現在我常反問自己：你是一個壞人嗎？似乎不是。你是一個好人嗎？也說不清。起碼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不像一個好人，缺少正義感，缺少血性，缺少悲憫情懷，很多時候蜷縮著軀體，過著甲殼蟲一般生活著。這無論如何不能算是一個好人——好人不該這麼窩囊地活在世上的！

1952 年 12 月 22 日，是獨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裏，我從熟睡中醒來，看見屋裏燈光明亮，還有人說著話。後來知道那是父親被抓走了。爲了向獨裁者斯大林獻禮，中共策劃了這次全國統一的掃蕩托派行動，五百余名托派分子（包括鄭超麟先生）都在當夜被捕。

父親被捕後，母親一個人帶著 5 個子女確實困難，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帶到上海，由大舅撫養，留下大姐曼妮、我、曼雲留在重慶與母親相依爲命。沒想到這一分別就是 10 多年。1966 年 5 月底，曼平哥結束了從北大派往四川峨邊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請假到重慶探親，我們才見了離別後第一面。見曼琳則是 1966 年末大串連時，我去她就讀的北京輕工學院找她，經相互自我介紹才相認。如果路上偶遇，我們這對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見不相識。

父親被捕後關押在松山勞改隊（白公館、渣滓洞一帶）時，每隔一二周或一個月，母親就會帶著我和曼雲乘車去探視父親。那時母親實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車都會打盹。這是我記憶特深的情景。到了勞改隊，母親與工作人員交待之後，就站在露天裏等著父親出來。他們站在一處談話，我和曼雲則在離他們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己玩耍。每次母親總要給父親帶一些香烟或食品。有幾次父親是穿著工裝出來見我們的，頭上戴著白色的如同當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種帽子。帽子後面拖一塊大布，遮住整個肩膀。

不知從何年起，母親就再不帶我們去探視父親了，後來得知父親已轉押到西昌。好像是在 1959 年，國家實行一次大赦，提前釋放了很多罪犯。當時我們也特別期待父親能獲釋，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消息，最後等來一紙通知，說父親早在轉押至西昌時就生病去世了。母親聽到這個消息不禁黯然泪下，我們心裏也十分悲痛。母親對父親被捕前的政治活動渾然不知，只知道父親經營印刷廠時常常印刷魯迅的書籍及一些進步書刊。家裏常有進步人士來往，陳望道等著名學者就來過我家。？

父親被捕，我們成了托派子女。讀小學時，一次因調皮被叫到老師辦公室，老師訓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麼不克制自己的行爲！”這次訓斥使我刻骨銘心，也改變了我的性格。自此我變得沉默寡言，謹小慎微，總怕自己的言行再召來同樣的訓斥。不過，“因禍得福”，我變得學習刻苦，任勞任怨，參加工作後經常被評爲先進生產者或先進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兒園，小學讀的私立達育小學（後改爲公辦中華路小學），小學畢業升不了公辦中學，只能讀民辦初中和高中。1965 年 12 月，重慶 4 所民辦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煉油廠以半工半讀的名義招去。1967 年分配進該廠，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幹了最差的工種。？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讀於重慶市九中，是該校的高材生。高考後比她成績差的同學都被各高校錄取，她却榜上無名。好不容易分到重慶空壓機廠（軍工企業），沒幹多久，廠裏下放人員，她首當其衝被下放，後來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學找了個代課老師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壓機廠工人，因與托派子女戀愛、結婚，被調離該廠，到重慶東風機器廠工作。大姐後來以家屬工身份也進了該廠。長年精神壓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 年服安眠藥自殺。時年 40 歲，留下一雙女兒。當時已退休的母親在北京爲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帶孫女張薇，得此噩耗，悲痛難抑，可也只能是眼淚往肚裏流。

妹妹曼雲 1965 初中畢業，成績優異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當臨時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 年被辭退，長期未分配工作，幹了十幾年臨時工，直到母親退休才頂替成爲正式職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積郁多年，母親於 1995 年過世。曼雲失去精神依托，於 7 月 26 日留下遺書，投嘉陵江自盡，時年 47 歲。妹夫符比奇千辛萬苦，花幾千元雇人打撈，7 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轉彎處找到其遺體。此時是重慶最炎熱的時候，遺體高度腐敗，無法辨認。那時沒有 DNA 鑒定技術，僅從足部一顆痣的位置確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親的遭遇一言難盡。公私合營後沒收了所有的資產，被劃爲資本家，以資方人員的身份進入國營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說，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屬，常被揪鬥、游



街及下放勞動。她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計時間、報酬。由于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臉常常浮腫，也查不出什麼病因。

母親為人真誠。父親被捕後，她一人經營印刷廠。當時廠裏有一名職工，外號聾子（因耳聾得名），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當時稱為癆病。這種病傳染性極大，母親却對聾子十分關心。那時我們住民生路 76 號（印刷廠對面）二樓，他住三樓。我家做了什麼好吃的，母親都讓我和曼雲給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來風言風語，甚至傳到我們小孩子耳朵裏。但母親全然不顧，始終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後來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 76 號還有一段故事。我們住在這裏的是一間不足 10 平方的危房，1970 年被拆重建。當時我已離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結婚住在廠裏，母親和妹妹曼雲只得投親靠友暫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戶籍警竟以我們是托派家屬為由，不准回遷，硬讓我們搬到渝中區打銅街 4 號三樓一間用木板隔出的 11.8 平方的房子裏，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據說趕走我們後，那位戶籍警得到了本應屬於我們的那一套回遷新房。

那個年代還有一件令我常感頭痛的事：無論升學和工作，經常要填履歷表，如何填寫家庭出身一欄，常使我犯難。思考再三，要麼填上小商、商人，要麼填資本家，總之不願填反革命、托派。但無論你怎樣填，在檔案裏我們總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于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黨、入團的申請書是不敢寫的，知道寫了也白寫。我搞不明白什麼是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不同政見者就必然是敵人嗎？難道政治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我期頌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愛的政治。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原 帖 來 自 于 網 易 社  
區:[http://club.163.com/viewArticleByOldUp.m?boardId=religion&articleId=religion\\_12351b671480b26\\_0](http://club.163.com/viewArticleByOldUp.m?boardId=religion&articleId=religion_12351b671480b26_0)  
東山谷文昌 霍 達

在東海和南海的交匯處，東經 117°25′，北緯 23°42′，蔚藍的海水托著一個不規則的多角形小島，像翩翩欲飛的一隻蝴蝶，它就是東山島。這裏距香港 210 海裏，距高雄 110 海裏，距澎湖 98 海裏。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東山自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島上至今留存著戚繼光抗倭和鄭成功、施琅先後揮師收復臺灣的遺迹。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時，孤懸海上的東山島仍然被國民黨軍隊占據。1950 年 5 月 12 日凌晨，解放軍乘木帆船強渡八尺門海峽，國民黨軍隊潰退，共產黨接管東山島。在鬥爭會上，翻身農民、漁民紛紛上臺訴苦伸冤，涕淚橫流。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撲向東山縣委書記谷文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泣不成聲：“同志啊，你們為什麼不早一天來，救救我的兒子？”農民出身的谷文昌，在老家河南林縣當過區長、區委書記，最懂得農民的苦，趕緊扶住她：“老人家，別難過，你慢慢說，你兒子他怎麼了？”

這時，一名當地幹部急忙把谷文昌拉開，低聲說：“老穀，不要理她！這是個反革命家屬。她兒子被國民黨抓走當兵，去臺灣了！”

“啊，反革命家屬？”谷文昌猛地被觸動，不禁沉吟道。如果她也算是反革命家屬，那麼，在東山島，這樣的反革命家屬太多了！國民黨軍隊敗退到臺灣前夕，對東山進行了最後的劫掠，大搜糧、大派款、大抓兵，全縣有 4792 名青壯男子被強行抓走，僅一個銅鉢村就抓了 147 人。現在除了老弱病殘，幾乎見不到男人，成為遠近聞名的寡婦村。礁頭村的黃阿婆，四個兒子被抓走了兩個，黃阿婆像瘋了似地朝著大海痛哭號啕，直到哭瞎了雙眼，也沒見到兒子回來！

按照以往的常規慣例，黃阿婆有兩個兒子在臺灣當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家屬。可是，

她家的階級成分却是貧農，大兒子還是村農會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兒媳是村婦聯主任，鬥霸、土改中的骨幹。那麼，這家到底算什麼？革命和反革命交錯扭結，難分難解。要知道，這樣的情況在東山并非三家五家，而是比比皆是。當時東山全縣不過 12597 戶，而被抓的壯丁多達 4792 名，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了多少新婚少婦、白髮爹娘、無依孤兒！再加上兒女姻親、姑表舊眷，盤根錯節，蛛網縱橫，涉及人員幾乎遍布全島，難道能把他們都推到敵人一邊去嗎？

谷文昌的心像鉛一樣沉重。海灘上，月朦朧，獨守空房的漁家婦女哭聲淒厲，呼喚著被抓去臺灣的丈夫早日歸來。油燈下，意綿綿，年邁爹娘用顫抖的手在年夜飯桌上多擺一副碗筷，默念著未歸游子的乳名。難道這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兒子的母親都有罪嗎？經過深思熟慮，谷文昌向縣委提出：那些壯丁決非心甘情願地為國民黨賣命，而是被强行抓走的。他們的親屬都是窮苦百姓，本應成為我們團結、依靠的對象。翻身解放，他們雖然也和別人一樣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却没有和別人一樣得到本來應該享有的團圓和幸福。他們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已經遭受了雙倍甚至於數倍於常人的浩劫，心靈上留下了永難愈合的創傷，難道我們還能忍心在他們的傷口上撒鹽嗎？國民黨抓兵製造了一場災難，我們應該去救災啊！

中共東山縣委邁出了審慎而勇敢的一步，就此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名詞——稱這些在台國民黨士兵的家屬為“兵災家屬”。對他們，政治上不准歧視，除了不享受只給予軍烈屬“代耕”的優待之外，與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困難戶還予以救濟，孤寡老人由國家供養。這些政策，在階級鬥爭如急風暴雨的上個世紀 50 年代初，簡直是石破天驚！

歸僑生在一九五七 黃達維

1957 年抵達北京後，我們歸僑學生逐漸感覺到中國大陸政治氣氛過分濃厚，深感不慣。據說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指示，不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搞反右鬥爭。但是學校的低層幹部對抗中央，要求我們必須改造思想，反對右傾和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其中一位老師，姓王，是個共產黨幹部，要求每一個僑生必須發言反右。在此情況下，我不得不承認有以下資產階級生活作風：逛夜市買小吃，支持小商小販，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不在飯廳用餐，到校外吃豆漿燒餅；貪圖享受，前往王府井購買義利麵包；逛東安市場（因為當時東安市場被定為反革命家屬、資產階級、遺老遺少出入的地方）；吃饅頭夾芝麻醬；吃炒雞蛋放辣椒；服裝講究，等等。

我們歸僑學生前往王府井東安市場購物，到合作社購買食品，到飯店用餐，請裁縫定做絲棉襖，等等，當時都被批判。我們家族最重要的長輩，原華僑總會理事長張念遺，為了團結華人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60 年代印尼排華浪潮中，身份顯露，面臨險境，拋棄祖祖輩輩百年建立的事業，匆忙逃離印尼，回歸中國。張念遺為中國獻出一切。作為他的長孫，回顧在中國十九年的經歷，我深感中國部分基層幹部以怨報德，嚴重違反並對抗周恩來 1957 年制定的“一視同仁，適當照顧”的僑務政策八字方針。

北京華僑補習學校的低層幹部，還無理沒收中國駐印尼領事館發給我們歸僑學生的純屬個人身份證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沒收他們認為“反動”而我們認為偉大的蘇東中學畢業證書，沒收他們認為是英帝國主義的而我們認為是高級的蘇東中學英文課本《English Essays》。

我們還被警告“出國就是叛國”。如此說來，那麼數以千萬計的海外華人，我們的父母兄弟姐妹，長輩親友，世世代代，以別國為家鄉，豈不是更加叛國？叛國到底何意？難道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美國華人，加拿大華人，印尼華人，馬來西亞華人，新加坡華人，都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嗎？從外交上來看，這種荒謬言論與指責，已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

這些低層幹部，不學無術，自己把自己看成中央領導，至高無上，胡作非為，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信譽，傷害了海外華人的民族情感。

全世界各國人民，包括絕大部分各國華人都永遠不會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請記住：他們是別國公民，他們為別國奮鬥，他們決心世代忠於他們自己所屬的國家。完全或部分帶有漢族血統的各國華人(在東南亞稱為華族)，只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完全或部分地同屬歷史傳下的一個民族，只此而已。我們，1957 年北京華僑補習學校剛剛從海外到達中國的僑生，被警告“出國就是叛國”，是對我們在海外的父母兄弟姐妹、長輩親友的政治自主基本權利的侮辱與攻擊，是無理剝奪外國公民子女的基本人權，是對中華民族五千年傳統的親情倫理、家庭團圓的破壞與踐踏。

此外，有一些歸僑學生因和北京女孩子戀愛，被跟踪監督，嚴厲批判，罪名是與反革命家屬來往。在當時毫無法制的情況下，這些同學根本沒有根據事實申辯的餘地。我至今仍然無法理解，什麼樣的人算是反革命家屬？什麼樣的人才算是革命家屬？我們海外華人熱愛華夏大地，珍惜中華民族情感，懷念祖輩的家鄉和祖先長眠之地。但是在中國的經歷，使我們心中的民族細胞被那些蠻橫無理的中國幹部敲打成億萬碎片。

梅桑榆先生來信：近日有朋友轉來國標編的《黑五類憶舊》電子版第一期，甚好！我也是黑五類子女，希望以後能直接發來此刊的電子版或郵寄印刷版。

#### 蛇灣血案 張介山

鄧保民，邵陽縣黃塘公社蛇灣大隊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學生，解放初參加工作，在縣糧食局搞儲運。鄧保民愛讀書，特別對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愛不釋手。文革一來，三家村挨批，鄧保民成為縣糧食局的小鄧拓，被開除出革命陣營，遣送回老家當農民。

1968 年夏末，從東安縣刮來黑殺風，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鄧家突然沖進來兩個手持梭標、籬索的民兵，將他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幹部們認定他具備參加黑殺隊的思想基礎——出身地主，一貫思想反動，仇視社會主義，又被政府開除回來。民兵用棕籬索擰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綁的鄧保民。當時正是 7 月底，鄧只穿了一件白襯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鄧大喊冤枉，民兵們說他頑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認，民兵便將他雙手反綁起來吊在屋梁上，還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墜，重量加大了，兩隻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從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難忍。最後實在受不了，只好違心承認參加了黑殺隊。

1968 年 8 月 4 日，蛇灣大隊第二次批鬥鄧保民，派民兵去監房提押。那個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馬刀。他把馬刀斜靠在監房牆壁上，雙手去開鄧保民的鐐銬。鄧料定此次批鬥有去無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丟到蛇灣水庫喂魚。與其如此，不如拼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決心下定，等民兵打開鐐銬的一剎那，鄧立即跨前一步，搶先奪過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閃，刀砍落空。鄧保民殺人心虛，奪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邊，碰上該隊貧協主席鄧成茂的四歲的小兒子鄧四清。鄧保民橫下一條心，手起刀落，把鄧四清的脖子砍去半邊。四清血如泉涌，當即死亡。

鄰近的人們見狀急喊：“鄧保民殺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殺隊殺來了！”一時喊聲驚天動地，此起彼伏，大家亂成一團。民兵們馬上手提大刀、梭標、鳥銃、扁擔、鋤頭，從四面八方追來。鄧保民走投無路，跳到一條小溪澗。溪水太淺，淹不死人。

他站立溪中，被團團圍住，很快亂刀砍死。人們餘怒未盡，高聲大喊，不要散夥，到鄧保民家裏算帳。

此時鄧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經得到丈夫殺人的消息。她決定與四個兒女在家坐等追殺的人來。唐桂姣聽到叫喊，立即手牽著兩兒兩女走到屋前的禾場坪，戰戰兢兢地一字排開，勾頭跪地。唐桂姣剛準備抬頭認罪求饒，幾隻梭標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話未出聲，鮮血四濺，立即倒臥在血泊之中。

母親被刺死，孩子們被嚇懵。大女兒鄧愛華年長幾歲，流著熱淚，匍匐在地，向大家哀告：“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爸爸殺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餘辜，殺人償命，現在我媽媽也死了。如果兩條命賠償還不夠的話，我願意把我也賠進去，弟弟、妹妹年齡還小，不懂事，請饒了他們吧，我給你們磕頭啦！”

面對這個殺人流血的可怖場面，又聽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淚了，有人後退了，還有人大喊大叫：“殺了我們貧下中農子弟，十個地主崽也賠不起，對階級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鄧愛華匍匐在地，現出的雪白頸項。有人舉起馬刀，唰的一聲，砍下這個 18 歲少女那長滿秀髮的頭顱，殷紅的血柱噴出幾尺遠。

剩下的兩男一女三個孩子，仍跪拜在地，臉色慘白，涕泗橫流，全身抖得像篩糠。要不要蕪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誅滅？那些殺紅眼的民兵積極分子們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後患無窮，立即向餘下的三個手無寸鐵的小朋友開刀。有的用馬刀砍，有的用梭標捅，有的用扁擔打，有的用石頭砸，不一會，三個小兒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們的爸爸、媽媽、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間禾場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屍體：

鄧保民的妻子唐桂姣的屍體，45 歲

大女兒鄧愛華的屍體，18 歲

小女兒鄧立華的屍體，9 歲

大兒子鄧超雄的屍體，17 歲

小兒子鄧少雄的屍體，7 歲

鄧保民一家被殺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個鄰居提出一個問題：“這些屍體怎麼辦？誰來給他們收尸？”有人說，到鄧家自留地裏挖個大坑埋了。又有人說，他一家死有餘辜，誰願意去給他挖坑埋墳？鄰居說：“不埋也不行，過不了兩天就會臭氣熏天，再說尸首擺在地上也嚇人。”有人提議丟到那邊山上的岩洞裏，既不用挖坑，也不會嚇人，更不會散臭。這是一個好主意。眾人一齊動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殺人現場很快被打掃一光。

該隊在殺了鄧保民一家後，又抓了一些五類分子及其子弟要殺。黃塘公社領導得信後，一面派人下隊勸止，一面將殺人情況上報，要求採取緊急措施。雖然有公社幹部的勸導和干預下，該隊仍然又追殺一人，另有一人自殺。

縣支左辦負責人召開全縣緊急電話會議，說：“階級敵人殺了貧下中農，貧下中農起來殺死幾個階級敵人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要大驚小怪。”於是殺人風席捲全縣，資江河裏漂浮的死尸象放排木一樣，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陽市城區半個多月都不敢飲用河水。縣區周邊鄰近各縣，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果不是 47 軍某部陶柏榮政委在塘田寺檢查國防綫路時發現問題嚴重，挺身而出，與該區靠邊站的區委書記寧斌等磋商，立即召開區、社、隊負責人緊急會議，喝止殺人風，不知邵陽縣及其鄰近各地會亂殺成什麼樣子，又有多少人會死于非命。

儘管我的父親死在國民黨監獄（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妻子張滬都進了勞改隊，文革波及到母親和兒子是必然的。

終於盼到一個休息日，我決定從團河農場回城探個虛實。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騎車到東四人民市場，找到在那兒當售貨員的鄰居劉嫂，詢問我母親的情況。她躲開別的售貨員，用最輕的聲音對我說：“你先不要著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遲。你媽前幾天已經被紅衛兵挂上一塊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裏看過她，她精神還不錯。”“抄家了嗎？”“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沒有啥東西了。”

我不敢在劉嫂身邊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較晚，出了人民市場，我沿著小胡同轉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後才偷偷溜進院子。屋門沒有關。我輕輕一推，就進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兒子的莫過於母親。她聽見我的腳步聲，就從裏屋走了出來。垂挂母親脖子上的那塊大木牌子，完全與囚徒蘇三頸上的木枷一樣。特別使我心痛的是，那塊大木牌子不是用繩子而是用鐵絲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親的脖子被鐵絲勒成一道深深的溝槽。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手去摘她頸上的牌子，母親一下撥開我的手說：“不行！不行！”我說：“晚上沒有人來，您怕個啥！”“隔牆的街坊就是紅衛兵，說來就來。你還是少惹一點是非吧！”

我拗不過母親，只好鬆開手，然後拿來一塊布片，墊在母親的脖子上。這樣可以減輕一點她的疼痛。母親不放心地聽了聽窗外，驚恐地對我說：“沒有打我，就算阿彌陀佛了——你聽，東院吳家正在打人哩！”

我側耳聽了聽，當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剛才我進家時，精神太緊張了，竟然沒有聽見這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我看你還是連夜回農場去吧！”母親央求我說：“一旦他們知道你回來了，是會來抓你的。聽媽的話，你看媽沒傷著胳膊斷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挂牌子就挂牌子，掃街就掃街，只要人在，比什麼都重要。”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兒子不在屋裏。母親告訴我，她不想讓孫子看見奶奶這個模樣，所以運動一來，就把孫兒送到姥爺家去了。母親能如此從容而清醒地面對亂世，使我有些吃驚。我四歲喪父，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我無兄弟姐妹，是獨生子）。上中學時，有一段時光是母親靠當保姆的收入來供我上學。可以說，她從年輕時就受著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從河北老家把她接到北京，沒過上兩天好日子，反右就開始了。我和張滬雙雙被送往勞改隊，家中扔下了不滿一歲的孩子。到1966年，她帶著孫子已經苦度了7個年頭了。也許只有在苦水中泅渡過的人，才有對各種突發苦難的應變能力。我呆呆地望著苦命的母親，泪水立刻盈滿眼眶。我真想把她頸上的那塊反革命家屬的大牌子取下來，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傷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我只好安慰她：“媽，我一定要陪您過一夜。這麼晚了，沒有人會來找我。”

“你進院時，有人看見你沒有？”她神色不安地盯著我的雙眼，似乎是想從我的回答中判斷我的話是否誠實。“外院的一家人，有個中學生當了紅衛兵。紅衛兵來咱家搜查時，她是跟著一塊兒來的。”我繼續寬慰母親說：“我是悄悄溜進門來的，沒有人看見。”

這是一個不眠之夜。不要說隔牆吳家武鬥聲聲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沒有任何聲音，我也不會產生一絲睡意了。母親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塊木牌，我硬是給她取了下來，答應她只要聽見人聲，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親說：“造反的紅衛兵說了，反革命家屬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這個院子裏的，要換城裏的無產階級來住。”我說：“媽，您一切聽他們的，不然會吃虧的。”“總不會送我回鄉吧？”“我一個人回鄉還沒啥，可是我走了小衆怎麼辦？他姥姥、姥爺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學，這不是愁死人嗎！”

“走一步說一步吧。”我滿腹愁腸地對她說：“實在不行，跟著我去勞改。”“那可不行，他還是個小娃兒。”我說：“在茶澱有個帶著兒女進來的，還是個北大的助教。”“寧

可我帶著他去要飯，也不能讓他去你們那兒。”母親的口氣非常堅決：“你們倆就這麼一個孩子，到裏邊學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讓他成人。”直到凌晨3點，我和母親的主要話題，就是一旦發生什麼不測，我兒子小衆的去向問題。其間，母親不斷打開手電筒看桌子上的鬧鐘。她不敢開燈，怕驚動周圍四鄰。

大約到了4點鐘，母親催我立刻回場。在穿過南長街的時候，我見到了慘不忍睹的一幕。此時天剛微亮，一群紅衛兵在鬥爭一個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陣勢，是連夜的批鬥會。無論是鬥人者還是被鬥者，神態都已走形。皮帶、鏈條雖然還在對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顯得有氣無力。那被打的老太太，此時如同一隻死狗，看不清她到底還有沒有呼吸。我猜想她還活著，不然那些紅衛兵應該早已散去。爲了提高鬥志，有一個男紅衛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該你們長頭髮的發揮威力了，半邊天不能只是站腳助威呀！給我上！”

幾個原本站在外圍的女紅衛兵，便一起擠上前去。她們沒有打那個老太太，可是却比用皮帶和鏈條抽打更爲刺激人的中樞神經——其中一個，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個不停。她一邊踩，一邊對那老人喊叫著：“你這死頑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來就踩死你這資本家！”

我大著膽子探頭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來那個被鬥的老人手裏死死攥著一張紙條，可能就是紅衛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車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個女孩，怎麼會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紀算，她不過十六七歲，剛開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師不會教給她，她的父母也不會告訴她，那麼她怎麼會有這種驚人的表演？《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記載，那些以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惡的戰爭，大日耳曼民族狂熱情緒被誘發出來之後，德國人人性中惡的潛能，便被發揮到極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殺人取樂的德國士兵？

補白：鄰人崔某，妻齊氏，真正貧農。崔某早逝，齊氏與五子相依爲命。解放前，五個兒子從沒穿過一件新衣，吃過一頓飽飯。大兒子崔元福，自幼討飯，後經人介紹，到上海拉黃包車，勉強生活。同事阿毛，鹽城人氏，二人相處甚好。一九五〇年，上海解放，元福仍在上海拉車，小有積蓄，娶妻關氏，頗有姿色。一日，阿毛向元福借錢一百，說是急用，元福許之。不多日，公安上門，將元福逮捕。究其原因，阿毛乃潛伏特務，所借元福之錢，用于購買紙張，張貼反革命標語。元福資助特務，罪大惡極，本應逮捕，因其出身貧苦，定爲反革命分子，驅逐出滬，回鄉務農，接受監督。其妻不堪凌辱，拋夫弃子，遠嫁他鄉。三兒子元壽，四七年參軍，四八年參加蘇中戰役，作戰勇敢，光榮犧牲，鄉人集會祭奠。齊氏爲烈屬，每年享受撫恤。元福回鄉後，齊氏又爲反革命家屬。文化大革命中，有時上午召開烈軍屬會議，齊氏要參加；下午召開五類分子家屬會議，齊氏也要參加。若同一時間開會，齊氏則無所適從，鄉人戲稱她爲“雙料家屬”。

海 安

亂世恩仇 胡喜盈

我們村前的那條河，在當地也算是條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來，濁浪滔滔，寬達數裏，真有點“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模樣。平時水並不深，只有村南廟山嘴灣常年水深數丈，黑幽幽的。

1947年下半年，在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的親自訓斥下，被指責犯了右傾錯誤的膠東區黨委，爲了立功贖罪，開始了一系列過激運動。首先是搬石頭——把成分不純的幹部視爲絆腳

石清除掉，然後派出其他立場堅定的幹部，到各村實行“村村點火、戶戶冒烟”，鬥地主惡霸。一切由貧雇農說了算，打擊面逐步擴大，開始亂打亂殺。許多村子的批鬥會臺子兩側都貼著“血流變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對聯，橫幅寫著“打死無論”。有些村莊的牆上寫著大標語“一不做，二不休”，“過大河不怕水淹”，“打破頭使扇子扇”，甚至給各村下達指標，殺不夠數要受罰。

我們村全是本家同宗，沒有一戶外姓，一開始也屬於右傾一類，只把地主富農的房屋、土地、浮財分了，沒有殺人。家中男人，上了幾次訴苦鬥爭大會的台之後，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婦孺蜷縮在家，不敢出門。

來點火的工作組進村後，先組織起一幫積極分子。其中有幾個殘廢軍人，自稱“只要身上有個眼兒（彈孔），就比毛主席小不點兒”，趁勢在村裏橫行霸道，殺氣騰騰，人稱五虎將。可是，空有猛將，沒有敵手——地主富農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務如何是好？于是在工作組的指導下，五虎將們把目光盯向留在家裏的地主富農的老婆。終於有一天，一長串被綁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農婆，在手持大順刀的五虎將們驅趕下，走向村南的廟山嘴灣……

在被扔進墨綠色的灣水裏後，她們居然並不馬上沉底，而是在岸邊水面上團團轉（因被反綁雙手）。這時五虎將們手中的大順刀排上了用場，一頓猛剝，水中綻開一團團血暈。她們終於不再打轉，半沉在水中，慢慢飄向下游。

這一頓殺，我們的村子終於不再右傾，階級鬥爭也終於帶上血腥味。從此以後，拉鋸式的冤冤相報、互相復仇開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國軍支持下組織還鄉團，瘋狂報復。很快解放軍又收復了我村。除了逃到臺灣的，其餘的全部被捉拿回鄉，就地正法，連拉鐵鋤的（當初跟著還鄉團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窮人）也沒放過。唯有一個還鄉團老古被饒了一命，是個例外。

老古還不是地主，只是相對富裕一些，但是有污點，當過一段保長，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裏。他的老婆自然難逃一劫，也被殺死在廟山嘴灣。當時老古還很年輕，聽說妻子被殺，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馬當先，帶領還鄉團殺回了家鄉。五虎將們一看不是對手，帶著老婆孩子跑了。

還鄉團進村後，挨家瘋狂搜查。說也湊巧，此時五虎將頭領的老婆正值分娩，沒法逃難，只好在家聽天由命。老古一夥沖進門來，產婦已經嚇得講不出話，只知道跪炕上磕頭求饒，心知必死無疑。仇人相見分外眼紅，想起自己被殺的老婆，還鄉團們一片聲怒吼：“拉出去！”在旁邊接產的老太太跪下來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剛生下的孩子份上，饒了她吧！”眼睛血紅的老古，看著炕上剛剛出生的嬰兒，楞住了。過了許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腳，聲嘶力竭地喊了聲“走！”便頭也不回地沖了出去。

解放後，老古在外地落網，五花大綁被押解回鄉，他也心知必死無疑。沒想到的是，平時殺人不眨眼的五虎將竟然放過了他，只是給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

以後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來，而且老婆居然還是個老黨員。每逢村裏開大會鬥爭四類分子時，老古在臺上低頭彎腰認罪，黨員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號。散會後，兩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覺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發生後，開會傳達文件，按規定不允許四類分子家庭參加。可是對於這樣一名具有黨員身份的四類分子的老婆，連當時的革委會都不知道該不該讓她參加。

村子裏的一位老雇農說：“咱村本來挺太平的，全讓那幫整天找窮根、拔窮根的人（工作隊）給弄亂了——拔出人命來了，能不亂嗎？”

上海邵純先生來信：郵箱中見到《黑五類憶舊》，正在一篇篇細讀。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但黑五類並不能包括毛時代所有的賤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人，以及階

級異己分子，也都是賤民。

四清運動前，就有人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四清運動中，許多單位都有人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員。本人 1949 年那一年只有 9 歲。原籍老家是貧農，父親因病死于 1952 年，母親是個小學教師，長兄 1944 年參加新四軍。本人 15 歲當童工，16 歲入團，20 歲提幹、入黨，26 歲從天津市支邊到新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個小老左，對毛和黨絕無二心。我離開天津市建築儀器廠兩三個月之後，該廠四清開始。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工作隊把我定為階級異己分子，並將大量的所謂揭發材料寄到新疆。我在新疆工學院實習工廠被揪出，時年 27 歲。從 1966 年 10 月到 1971 年 4 月，我被批鬥、抄家、游街、刑訊、請罪了 220 多次，關押 7 個月，4 次從死亡的邊緣上僥幸逃生。四清那些材料實在太荒唐，比如說我到新疆工作是打算投靠蘇修。

1971 年 4 月我被軍宣隊解放，當工人。我曾把這段經歷寫成《烏魯木齊往事》一文，不久前電傳給辛子陵先生了。我是從思想上的小老左一夜之間變成了階級異己分子。三中全會後官運亨通至正廳級，又因查處基建中的腐敗問題引起軒然大波。法院受賄，我以慘敗被調到另一個單位任閑職。當我看出這個社會的病根時，已到退休之年了。

#### 四類分子的命運與掙扎 李若建

四類分子的命運之一：被歧視與被改造。

從土改開始，對四類分子的歧視就開始了。有一個鄉村，土改時制定 10 條管制地主的辦法，貼在地主家門上：1、掃街鋪路；2、為農民夜校移桌凳；3、撈圳溝污泥；4、六點鐘起床，六點鐘睡覺，不准亂行；5、除勞動割草外，不得超出一裏路，如出一裏路，作通匪辦；6、如有人來地主家走動，就是收買拉攏；7、走路碰到人民，不准當中走，須低頭靠邊走；8、不准提筆亂寫；9、不准親戚來往；10、不准拜佛點香燒紙。在土改過程中，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強迫將地富家的婦女給貧雇農配婚的情況。

讓四類分子佩帶某種侮辱性的標志，是一種常見的歧視，並且由來已久。吉林省幹安縣在土改掃蕩期間，貧雇中農胸前挂紅條，富農挂黃條，地主挂白條，狗腿子挂狗皮條。大躍進時有的地方社員要進行評比，勞動表現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標志佩在胸前，表現一般的則佩“中游”標志。四類分子無論表現好壞，一律佩帶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標志。

1965 年規定，企業中沒有摘掉帽子的四類分子，不得享受企業的勞動保險待遇和退休待遇。在農村中，有的地方規定，四類分子實做的工分要被扣去 3%，上繳大隊。1957 年，閩東福安專區發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農家庭的青年幹部，一夜之間被戴上“不純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幹部隊伍。這批人被開除團籍、黨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成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之後的第六類分子，只准參加生產隊的農業勞動，不准從事其他職業。有人因賣字畫謀生，被押送到農場勞動教養。因不務正業、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勞動教養的有 300 餘人。

一般情況下，四類分子要做公益性的無償勞動，比如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指派強制監督掃街，進行勞動改造。1964 年農業銀行總行規定，信用社發放貸款，對四類分子，原則上不予貸款。北京市對困難救濟戶也執行階級路綫：對孤老戶，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 7-10 元，近郊區、鎮為 6-9 元；對五類分子家屬，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 5-7 元，近郊區、鎮每人為 4-5 元。

四類分子言談舉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災難降臨。1976 年 1 月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別人的奚落，加之喝了點酒，就對取笑者說：“你們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殺你兩個。”結果此人被吊打逼供，製造出一個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亂集團



36 個，成員 1359 人，涉及兩省 5 縣，僅僅個把月時間，就槍殺、打死、摔死、逼死 32 人，預謀殺害未遂的 18 人。

據保守的估計，在 70 年代初期，知識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類分子子女）超過知青總數的 10%。有的農村社隊，對“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記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對“可教子女”長期和普遍歧視。在鄉知青的成分構成因此發生了顯著變化。70 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 10% 上，以後逐年上升。1979 年對貴州省 18 個縣的調查表明，上海插隊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 19.1%，台江縣由原來的 27% 上升到 43%。延吉縣 1976 年 4 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約占 31%。

文革後落實政策，對運動中自殺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殺”的結論。

四類分子的命運之二：被驅逐。

土改時就有驅逐地主富農的現象。文革前，局部地區也有把四類分子及其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從邊境地區強迫遷移的情況。文革期間這種情況發展為全國的普遍做法。

1958 年秋，為了建設“紅彤彤的大上海”，數以萬計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被趕出上海，造成無數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1958 年 10 月，汕頭市一批四類分子共 1789 人被遷于粵北山區。1960 年 11 月，遼寧省海島地區的長海縣，將表現不好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屬、有海外關係的家屬和主要親屬、部分歸俘漁民和有現實危險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共有 273 戶，1541 人，一律強行遷至遼寧省內陸的建平縣。被遷者到那以後，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 年仍在那裏的 131 戶人家中，平均每戶死一人。有 142 戶，810 多人，在那裏生活不下去，先後轉遷到其他地方。有的過乞討、流浪生活，有的甚至賣兒賣女。1963 年新疆發生過將五類分子和逃蘇未遂人員內遷的情況。

文革期間，普遍發生將四類分子驅逐出城市、強迫遷往農村的情況。文革初期北京市有 8.5 萬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驅趕出北京。天津市 1969 年 7 月統計全市有 4.2 萬人被遣送農村，其中各種分子 1.6 萬人，隨遣家屬 2.6 萬人。據估計，當時全國被從城市裏驅逐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超過百萬人。

命運之三：肉體上被消滅。

在早期的土改過程中，東北、華北和華東（主要是山東）的一些地區均發生過比較嚴重的亂打亂殺地主富農，甚至殺死中農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農被從肉體上消滅。吉林省乾安縣整個土改過程中，各種原因致死的 348 人中，地主 247 人，富農 42 人。黑龍江省依蘭縣土改前有 7337 戶，其中地主富農 424 戶，土改後有 8214 戶，其中地主富農 272 戶；土改前後地主富農減少了 152 戶，相當於土改前的 35.85%。為何地主富農戶數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筆者沒有見到文字資料說明。依蘭縣在土改中被槍殺、打死和自殺的地方富農多達 103 人，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農已經從肉體上被消滅。即使在 1949 年後比較溫和的土改過程中，也發生過大批四類分子死亡的事件。廣東省恩平縣土改中自殺的有 950 人，其中地主 570 人（有的一家 7 口全部自殺），富農 108 人。

在文革當中，不少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遭到屠殺。這種屠殺，除了發生在一些比較邊遠的地區，如湖南、廣西、廣東、雲南、江西、陝西之外，甚至發生在作為首都的北京市。根據筆者見到的已經公開出版的文獻資料統計，被殘殺的人數超過萬人。在屠殺的過程中，也有個別面臨死亡威脅的四類分子鋌而走險，反過來殺了其他人，因而激發了更加殘酷的殺戮。有的四類分子被殘殺後，屍體都不被放過，還要對屍體開批鬥會。

文革期間，湖南零陵地區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殺 7696 人，被迫自殺 1397 人。在死亡人員中，四類分子 3576 人，占 39.33%；四類分子子女 4057 人，占 44.63%；貧下中農（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1099 人，占 11.54%；其他成分者 411 人，占 24.44%。

20%。被殺者中，未成年人 826 人，最大年齡的 78 歲，最小的僅 10 天，殺人的手段極其慘無人道。有的殺人者害怕將來被害者子女報復，因此在屠殺中采取令人髮指的株連，連兒童也不放過。株連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在當代中國的內戰中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北京市大興縣在文革中對四類分子的屠殺和株連只是一種歷史的延續。1948 年密雲縣鎮壓反革命，也發生過把地主富農全家殺死的事情。

掙扎之一：與成分好的人家通婚。

在血統論的陰影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要改變命運是非常困難的。爲了讓下一代能夠改變命運，一些四類分子家庭采取與成分好的人家聯姻的方式，期望借此改變命運，但是這種方式往往會連累配偶，同時對方也未必願意在同等條件下與四類分子家庭通婚。有調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願意娶成分高的人爲妻，肯定是對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強，如貌美。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他們還是優先選擇與自己家庭出身地位相當的人。

一些與四類分子聯姻的人被認爲政治上不可靠。與四類分子通婚的問題引起中共高層注意，曾經下文件指導如何應對。1964 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中規定：“對於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階級敵人的圈套。”“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這方面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開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幹部職務。”

文革前有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與一位富農的前妻結婚，被認爲喪失階級立場，支部書記的職務被撤銷，並且要在黨籍與妻子之間做選擇。這位書記選擇要妻子，結果失去黨籍。四川某縣法院院長，因其岳父 1957 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被說成認敵作父，認敵爲友，終被判刑，並被迫與妻子離婚。其妻被定爲拉垮共產黨幹部的壞分子，大會小會批鬥了十多次。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與四類分子通婚的人慘遭殺戮。1967 年 10 月，廣西全州縣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有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 76 人。地主出身的劉某，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不被允許，結果劉被迫抱兩個小孩(大的 3 歲，小的 1 歲)跳山洞而死。

掙扎之二：外流或外逃。

四類分子離開居住地是受到嚴格監控的。早在 1951 年中共中央就規定：地主不論從事什麼職業，不論到什麼地方，均應加以監視，不得改名換姓，不得改變成分籍貫。雖然有風險，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四類分子選擇逃跑。1979 年各地在給四類分子摘帽時，發現均有一部分人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比例還很大。江蘇邳縣四類分子 9603 人，外流 501 人。山東省安丘縣給 4863 名四類分子摘帽，給錯劃錯戴 502 人糾正，另有 487 人因長期外流，無法處理。山東省諸城縣，20.79% 的四類分子外流與外逃。黑龍江省嫩江縣經過歷次運動，全縣共有受管制分子 4016 人，外流的 796 名，占 19.82%。

外流、外逃者要面臨被捉的危險，因爲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時均要審查政治面貌。一般情況下，逃跑的四類分子被抓捕後會受到懲罰。福建省由于經濟生活困難，一部分四類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廳部署各地公安機將其追回。1960 年追回 4816 人，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批評教育、管制或逮捕處理。

編者曰：除通婚和流亡之外，五類分子家庭還有另一個擺脫命運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給成分好的人家。我舅爺（父親的舅舅）家是地主，三個表叔個個一表人才，蟒梁似的大小夥，可就是找不上媳婦。最後，二表叔被送人，娶了媳婦，三表叔轉親轉個媳婦，大表叔在摘帽之後三四十歲才找上媳婦。

補白：1976 年春，全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運動。奉節朱衣公社五湘大隊召開大會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沒想到，退伍軍人鄧昌國聽了幾個積極分子的發言後，站起身大聲說：“你們包穀糊糊吃飽了，有精神打胡亂說了！若不是鄧小平從東北調包穀來救你們，你們早就餓死了！我們鄧家出了一個能幹人，餓了你們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區和朱衣公社機關就設在五湘大隊，無需傳播，領導就知道了。誰敢公開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誰敢反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昌國的言行當即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批判的對象由老鄧變成了小鄧。

鄧昌國的話雖然反動，但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隊姓鄧的人很多，批了幾次，再沒有人發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軍工廠。鄧昌國剛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區公安特派員不知為什麼發善心，只宣布將其交群眾管制，沒將他逮捕法辦。但是，他永遠失去了進廠當工人的機會。

陳宗培

## 土地陰謀 李 肅

據官方文件，土改從 1950 年冬開始到 1953 年結束，將近 3 億的無地農民獲得了 7 億畝土地、近 300 萬頭耕畜、近 4000 萬件農具、3800 萬間房屋和 105 億斤糧食。

1950 年土改時，中共本已控制政權，完全可以通過政府頒布法令，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實現和平土改。但是毛澤東們堅決反對這種方式，主張通過組織農民與地主進行面對面鬥爭，奪回土地，搞流血土改。他們先為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比例，1948 年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 8%，農民總人口的 10%”，然後要各地按這個比例製造敵人。以當時 3 億農民參加土改計，製造出的階級敵人有 900 萬人。

土改工作隊普遍鼓勵農民打地主，甚至親自上陣打人。蘇南 2742 個鄉，有 200 多個鄉發生亂鬥亂打，218 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剝光衣服。新華社記者穆青寫于 1950 年 6 月 2 日的《內部參考》中記載，河南土改，一個多月發生逼死人命案 40 余起，蘭封縣瓜營區 20 天裏逼死 7 人。1953 年春，廣西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殺。當時廣東流行一個口號：“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據保守估計，當年土改殺死了 200 萬地主分子，另有估計可能多達 450 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毛澤東通過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這樣農民就只能跟共產黨走。這種分土地的方式，讓農民有一種感恩思想，覺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是為窮人說話、為農民辦事。毛澤東曾總結他的成功經驗：“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通過殺地主、富農，基層老百姓都處在恐懼和緊張之中，就不得不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它的對立面，就可能會成為鎮壓和專政的對象。如此一來，它的基層政權就鞏固了。殺人立威，你殺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這個政權就穩固了。

除了殺人，還有重組階級隊伍。他要製造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覺，使原來處于下層的一些人翻到上層，把原來處于上層的人壓到下層。這也是它鞏固政權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土改之後為什麼又搞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為什麼一定要走一個把土地分給農民的過場呢？有分析認為，這也是出于政治權謀。當初毛澤東說，將來我們建立政權後，要把土地無償分給農民。這個承諾，對農民，特別是對貧苦農民，非常有號召力。如果他當初說，

將來他建立政權後要把土地收歸國有，恐怕農民誰也不跟他鬧革命了。

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劃分階級，將農村人口劃分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雇農是中共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地主和富農被定為剝削階級，是打擊的對象。從此，中國農村階級陣綫分明，出現了永遠的下等階級——地主和富農。當代文化批評人葉匡政說：“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

土改時，中國農民歡天喜地瓜分了地主、富農的土地。不旋踵，中共又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走，中國貧窮農民的土地夢做了還不到兩年。直到今天，各級官員對土地都有極大的支配權。他們可以隨便征地、拆遷，隨便制定土地價格和補償標準，繼續讓農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損失。農民也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土地是國家的。政府予取予與，農民無話可講，無可奈何。

## 我家的地主分子 呂 維

祖父的大名叫呂吉，從小沒念過一天書，屬於徹頭徹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說法，出生在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從小體格健壯，很有蠻力，又不怕吃苦，七八歲就成了家裏的得力幫手。放牛、拉動軋轆、打坷垃、割草，甚至鋤地，凡是孩子們能幹的活，樣樣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歲以後，祖父便開始參加大田裏的鋤地和收割等勞作。我家祖上屬於世代農耕人家，從沒有出過讀書人。祖父的十幾個同輩兄弟，個個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雖然識幾個字，也僅僅是會寫自己的名字或簡單地記些賬目。

十五歲時，爺爺已經長得成年人那麼高，粗胳膊壯腿的，成為莊稼地裏的一把好手。二十一歲那年，和奶奶結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親。隨後兄弟倆分家，他分得一頭牛和三十多畝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這是世世代代小農的夢想。可是爺爺並不滿足于此，他雄心勃勃要發家。

他的發家本領主要就是吃苦耐勞。自我記事起，爺爺從來沒有午休過，吃飯很少坐著，總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飯扒拉完就走。鋤穀子，在當地，連鋤帶間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鋤一畝多一點，爺爺却要鋤到二畝半。這個效率靠什麼？靠早出晚歸！每年早早鋤完自己地裏的莊稼，就出去攬工，給別人家鋤，掙幾個現錢，然後攢起來。到了冬天，大多數人呆在家裏不出門，他却天天一早起來，挎著籬筐，提著糞叉，急匆匆走在鄉間的土路上，忙著拾糞。

節儉是爺爺發家的另一個主要手段。爺爺節儉到了守財奴的地步。小時候，每逢奶奶和我講起爺爺的事，總是把他稱為樞心鬼。他很少穿過像樣的衣服，總是補了又補。如果奶奶主動給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會大發脾氣，久久不穿。家裏吃的也大多是粗糧，常年不見腥葷。種的香瓜、西瓜之類，從來不讓孩子們隨便到地裏去摘。他給家裏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數拉到城裏去賣，然後把賣掉的錢交給奶奶積攢起來，到一定數目，再買幾畝地。

就這樣，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時，他擁有的土地居然已過百畝。農忙時，開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長工，常住我家，和爺爺、父親一起幹活。

土改時，上級給我們村下達了八個地主富農指標，爺爺榮幸地跨入前八強，被劃成富農。不久又將他關起來，要他交出積蓄的銀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塊。工作組不信，幾次鬥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個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裏的一位親戚家中。不久被人發現，村

裏派民兵將他抓回。爲防備再次逃跑，每晚將他仰面朝天綁在一張八仙桌上，繼續向他索要銀元。後來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說他力氣大，自己掙脫了，也有人懷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爲這人曾多次給他打過短工，關係甚好。再次逃跑後，爺爺一直躲在陽方口一帶，曾在一個刮大風的夜晚，秘密潛回家中，巧妙避開看守人員，刨走一小罐銀元作爲盤纏。那時，他根本不打算遠走，仍然幻想著有一天，風頭過去，靠手頭這點積蓄，再重振家業。他離不開土地啊！由于他的逃跑，工作組甚爲震怒，將成分再次提升一級。于是，爾後我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欄，便永遠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後，爺爺失去了房屋、土地、糧食，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漢，被迫無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謀生。但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進入我村前八強，給全家帶來的那個惡魔般的稱號——地主。從此以後，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纏住他的兒子和孫子們，并且越纏越緊。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爺爺小三歲。嫁給爺爺的時候，身體甚爲虛弱，經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擔落在肩上，只有帶病勞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面。秋收時節，丈夫在地裏忙著，場面上的活兒大都落在她身上。我們家鄉，家家戶戶以穀子和高粱爲主。拉回場面上的莊稼，都是一捆一捆連秸杆帶穗子的。她憑著一把短鐮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來，然後和丈夫一起用連枷打下顆粒。未打淨的，她要放簸箕裏揉下來。帶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滿身塵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飯。爲了這個家，作爲一個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還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這個村裏的人，弟兄四人在他們的父親帶領下，于清朝後半期遷到這個村子。他們搬來的時候，當時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却擁有五千多畝土地，離村較遠的地方還有不少未開墾的荒地。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父子幾個終於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時，曾對兩個兒子說：“我給你們打好了根基，以後的日子就靠你們了。千萬不要抽洋烟，不要賭博，要正正經經過日子”。

爺爺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勞遺風，夫妻倆同心協力做起了發財致富的美夢。做官爲宦的，發財致富往往數年，甚至數月。中國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澆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却需

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據說，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爺爺是個正兒八經的受苦人，才把女兒許配給他。奶奶對爺爺基本是滿意的，

曾多次對我說起，認爲爺爺是個好人，未沾染過任何惡習，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只是那節儉到吝嗇程度的行爲，常常令奶奶不滿。奶

奶天生好心眼，樂善好施，恰好彌補了丈夫的不足。爺爺固然把錢看得很重，但其誠信度極高，從未拖欠過雇工的工錢，因此村上的人都樂于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這樣一年好似一年過著。奶奶進入中年以後，因爲有我母親分擔了大量家務，不再像以前那樣辛苦操勞了，身體竟逐漸健康起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剛剛訂婚還未出嫁的女兒（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擊倒，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有一段時間，奶奶精神錯亂，整天說胡話。母親曾對我講過，姑姑死去的那兩年，奶奶時常一個人坐到村邊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風刮過，她便對著喊叫姑姑的名字，聲音淒慘。常常母親費盡周折，多方勸說，幾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裏。回到家，還是不停地叫著姑姑的名字，飯菜不思。到土改時，奶奶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

奶奶和爺爺不一樣，她對錢財看得很輕，土改被關初期便交代

了所有積蓄。至今我還記得，有一天工作組派人來找我母親，說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麼地方埋著銀元。母親按人家說的地點挖出兩小罐銀元，工作組隨即拿走了。工作組總認為我家還埋著銀元，奶奶因此被捆綁吊打過。有一次還燒紅了烙鐵，動員群眾去烙，然而却始終無人下手，只好作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好人緣。據村裏老人們講，那些年誰家有困難，向她借錢借糧，從未碰過釘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呂成功，曾在村裏當過閭長。任職期間，一個姓白的人因偷盜被抓，被送進城裏看守所。此人本來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從此，死者的弟弟白漢成，便把所有仇恨都歸結在呂成功名下。土改時，白漢成成了積極分子，堅決要求把呂成功處決，並準備將其十六歲的兒子同時置于死地，以便斬草除根。有人將消息透露給呂成功的兒子，這個少年在夜深人靜後越獄逃走。處決呂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個名叫白寬的年輕人被一起押出，戴著高帽子，走在人群裏。前面幾個年輕後生早用繩子將呂成功的雙腳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著繞村轉了一圈。起初呂成功還不斷發出呻吟，拉出村外時，聲音越來越微弱。等到達二裏外的溝邊，大家停了下來，將呂腳上的繩子解開，隨即把奶奶和白寬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簡直嚇傻了，呂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條，背上、臀部和後腦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氣息。工作組的人厲聲喝令奶奶和白寬將呂成功推下溝去。一個女人家多咱見過這樣的場面！奶奶雙手顫抖著，一點也不聽使喚，渾身沒有一絲力氣。工作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們推下！”幸虧有那姓白的年輕人，奶奶幫著總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軀體推了下去。隨即，民兵們搬起預先準備好的兩車石頭，紛紛向下砸去……

當天夜裏，奶奶發起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第二天，工作組通知母親去領人，母親央求隔壁兩位大伯將奶奶抬了回來。幾十年後奶奶對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還不住地發抖，說在爾後的幾年裏，她時常做噩夢，夢見當時的情景，夢醒後渾身發冷，害怕得再也睡不著。

父親只活了四十歲，死在饑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親的死，對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她痛不欲生，臥病在床將近兩年。她把父親的死一股腦兒地怪在爺爺身上。原來，父親在十三歲那年便承擔起爺爺交給他的重任。耕地、播種、趕車、送糞、拉炭、應差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過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于青少年時便累下毛病。微駝的背，瘦小，黑幹，從體質上看，明顯屬於缺乏力氣的角色。父親小時候上了三年私塾，認得一些字。本想繼續念下去，怎奈那時爺爺正做著發家致富的美夢，強行讓他輟學，跟著大人幹農活。

爺爺年輕時屬於有蠻力的人，莊稼地裏的粗活、累活統統歸他幹，却不善犁、耬、耙、耨等與牲畜協同完成的技術性工作。于是，他決心把我父親培養成一個莊稼地裏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頭，每天收工回來，父親還得鋤草，半夜起來給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紀蠻辛苦的。為此，奶奶常常抱怨爺爺，而爺爺從不理會。他年輕時就是這麼辛苦，有啥大驚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嗎？再說，人來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飯吃！爺爺按照自己的邏輯，嚴格訓練著他的兒子。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便真的成為莊稼地裏的一個全面手。

那時，爺爺養著兩頭牛一輛車。這車和牛給父親帶來了沒完沒了的應差。那時城裏住著日僞軍，西山上又有游擊隊，我們村正位于縣城和山脈的中間地帶。兩面都來要糧，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來順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誰派來的差事敢不辦？在這種情形下，父親便常常趕著車，任由別人指揮著到處奔波。有一次被日僞軍征去，一個多月沒有消息，奶奶嚇得整日茶飯不進。日本投降後，又開始抓兵，父親只好躲到幾十裏外的親戚家。為此，爺爺還被民兵痛打一頓。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頂替。那時二叔年僅十五歲。後來從軍營逃回，我父親便帶著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個工地上給人家背石頭。在那裏，只給吃飯，不給

工錢，還不時被斥罵。終於無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寧。

哥兒倆在集寧先是做工，後來父親托一位老鄉，把二叔送到軍營給伙房拉大風箱，他自己則找了個賣苦力的地方糊口。一年後，父親回老家接母親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離家。母親種的幾畝地維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親就挑起擔子做貨郎，每天挑著百十斤重的擔子，早出晚歸，只吃兩頓飯。勞累和飲食不均勻，父親患上胃疼病。公私合營後，經商被取締，再回村裏當社員時，父親已經是滿身疾病，一臉皺紋，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由于不斷看病吃藥，到三年災荒前夕，所有積蓄花光，家裏已是一貧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親便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爺爺、奶奶和父親三人，土改時年齡都超過十八周歲，同屬於地主分子。我們一家三個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麼可惡，那麼沒人性，虐待、打罵、放高利貸殘酷剝削窮人，把許多善良的人逼上絕路。可是另一方面，從小耳聞目睹的是，他們是那麼勤勞，那麼節儉，又那麼樂善好施。在農村管制那些年，接觸到我爺爺的同齡人，也接觸到父親的同齡人，我有時故意把話題引向爺爺、奶奶和父親的為人。大家一致公認，爺爺是村裏最辛苦、最勤懇的人，在勞動方面沒有人能比得過他。奶奶和父親的口碑更好，誰不說他們是頂好的人！我的年輕時代便是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中走過來的。

待我成年後，也就是在瀋陽讀書的那些年，曾經力圖和他們劃清界綫，按照當時的要求，努力讀一些馬列的書和毛澤東著作，學習雷鋒，使自己緊跟時代。然而，當我一想到年老的爺爺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剛剛去世的父親，總是很心酸，對他們怎麼也恨不起來。他們的一生，辛勤勞作，只想把日子過好，該交公糧的時候并不比別人少交，該納稅的時候按規定付錢，他們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們並沒有幹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對現行政府的勾當。有一次我問爺爺：“土改時，沒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嗎？”老人很平靜地說：“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沒收咱一家。”同樣，公私合營後，父親被取締了小商販，回村種地時也顯得若無其事，說：“人家城裏的買賣人都公私合營了，又不是光不讓咱幹！”他們只知道，公家允許幹啥就幹啥，不允許幹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辦法。他們苦苦掙扎著，要活下去，要養活自己和孩子們。他們從來膽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幹部。像這樣的順民，怎麼能說他們是階級敵人呢？

在農村被管制的那幾年，我也接觸過村裏其他的四類分子。被批鬥的那一陣，我甚至還接觸過其他村裏的四類分子。我敢說，這些人都是屬於逆來順受的角色。後來，我被人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兒八經地成了“階級敵人”，並且被稱為是他們忠實的孝子賢孫。至此我才明白所謂“階級敵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補白：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每個生產隊都以揪出幾個牛鬼蛇神為榮，否則就是階級鬥爭覺悟不高。本人所在生產隊沒有地主，僅有的一個富農，文革前就死了。民兵排長想來想去，發現了幾個富農子女。特別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過富農的生活，“就他了”。此人是個瘸子，除了不能挑擔外，耕、耙，揚、種等農活樣樣在行，還能做木工活，走路較常人為快。成為牛鬼蛇神後，此人每天自備高帽，上書“富農子女”外出游街。開始還要人押送到大隊集中，幾天後，婉拒了押送人員，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前面有人敲鑼，後面有人喊口號，煞是有趣。尤其瘸子，總是走在第一個，有時還與其他人拉開一定距離。他自我調侃：“我是一條腿走一條腿推，你們怎走得過我。”長長的隊伍，瘸子打頭，引起眾人爭相觀看，笑聲不斷。

海 安

文革前同學們私下相互交談中也都特鄙視向老師告密的人，雖然背地裏有人幹這事，但在公開場合，告密總還是招人恨、不光彩的。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這個道德律令失靈了。只要他是五類分子階級敵人，就可以檢舉揭發，不僅不是惡行，反而受到鼓勵。告密成為政治覺悟高的表現。一切行爲，只要打著革命的旗號就可以理直氣壯進行。

我們北京四十七中高高二班同學宋爾仁是一個比較複雜、比較特別的人。他家住在門頭溝煤礦，隱隱感覺他出身不會太好。他從不說父親是幹什麼的，似乎刻意隱瞞。他喜歡文學，激動的時候曾經在宿舍裏大聲背誦萊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詩。但有時候又特粗魯，能說些礦工才說的那些髒話。對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軟，也不怕背上欺負弱小的惡名。

無論團幹部怎麼勸，他也不申請入團，不靠近組織。對班主任敬而遠之，政治學習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一句話，他在班裏屬於比較後進的同學。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開大罵女人。周末宿舍裏沒幾個人時，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天底下最壞最壞的是女人！你知道嗎？最毒莫過婦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說這話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唾沫星子四濺。

當時我們正是青春期，對女性充滿了好奇和神往。他這番言論，讓我感到極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這方面受過傷，跟女的有過交往，被女的拋棄過，傷了心，才那麼恨女的。一個高中生，小小年紀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別是個流氓。再加上他很少說自己的經歷，也很少談對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看法，讓人看不透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對他總保持著戒備之心。他平時寡言少語，不愛在人多的地方說話。爲人挺講義氣，自己吃點小虧，別人沾他點便宜，從不計較。

宋爾仁喜歡梳個大背頭，上唇留著一綹小鬍子，又是個三角眼，這些都讓我聯想到壞人。有一次借書，他原形畢露，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不好看法。聽圖書委員說，他要借一本《紅與黑》，但學校規定這種書只借給老師，學生不借。圖書委員好心給他另外借了一本革命小說，他却勃然大怒，跟圖書委員吵了起來，警告圖書委員別把他當猴耍，借什麼書用不著你管，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凶惡異常。

宋爾仁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都比較冷淡，對我却是個例外。那時候我想入團想瘋了，成天掃廁所，一周寫一次思想彙報。有人說我是假積極，動機不純，可宋爾仁對我很好，覺得我比較直率。後來我又因爲打了那位背後說我壞話的同學，挨了個記過處分，同學們都與我疏遠，唯宋爾仁跟我見面依舊打招呼，不嫌不棄。他從家裏帶來的紅薯、花生、瓜子，總主動塞給我。上山摘來的白杏、酸棗什麼的，也都給我吃過。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錯，享受著他對我的信任和友好，內心裏對他卻充滿警覺，覺得他思想複雜，居心莫測，別被他拉攏腐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個周末，他回家了。宿舍裏沒有人，我坐在他床鋪上，發現他枕頭下面放著一本日記。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那正是 1966 年 7 月份，工作組當政的時候。一看大吃一驚。他的日記裏充滿對社會、對形勢的不滿。說什麼“現在烏雲籠罩著祖國天空”，“我們的國家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人民在受苦受難”，等等。好反動啊！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說成是烏雲密布。我當即把這本日記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看。他翻了幾頁後也斬釘截鐵說：“絕對是反動日記。”我問：“怎麼辦？報告工作組？”“對。”

于是我和同學一起很興奮地把這本日記交給了學校工作組，同時很爲自己過去對宋爾仁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而沾沾自喜。工作組馬上派人把宋爾仁從家裏抓了回來，單獨禁閉，并在大會上宣布宋爾仁書寫反動日記，惡毒誣衊我國的大好形勢，誹謗文化大革命，隔離審查。據知情者說，宋爾仁最初表現很老實，蔫不出溜，終日埋頭寫檢查交待。剛開始也沒有人動



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歡拳擊的同學參加審問，冷不防給了他一拳，力量很大，宋爾仁當時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個後滾翻，從椅子上翻了過去。

就在那天夜裏，他逃跑了，以後徹底銷聲匿迹，再也沒有回學校。可惜，我舉報了宋爾仁也沒當上左派，連軍訓也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幾個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學習。自從宋爾仁逃走之後，一晃多少年過去，我們班的同學誰也沒有見過他。

流浪美國期間，倍感孤獨和寂寞，經常回憶過去，宋爾仁的影子也常浮現腦海，我這才感到自己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宋爾仁，幹的最缺德的事就是舉報宋爾仁。同學任道昂說我踩著別人往上爬。在宋爾仁這件事上確實如此。

30 多年之後，當我寫《血與鐵》，想找宋爾仁核實情況，當面道歉之時，才發現他早已不在人世。據同學說他大約 1968 年初到了黑龍江省德都縣黑龍江兵團一師六團，幹過喂豬、種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語，沒什麼朋友。大約 1974 年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他特別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時才看病，但為時已晚。1977 年因肺結核病故於北京，留下一個兒子。

可以說，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幹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惡假你之名。特寫出此故事，讓世人知道，並懇請同學宋爾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諒。

茅于軾先生來信鼓勵：我非常欽佩你的這項工作。我建議不光是黑五類，還有殺關管。如大中電器的王佩英。

### 巫寧坤的煉獄 三 妹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學陸志偉校長的急電，聘巫擔任燕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他毫不猶豫地放下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接受了“祖國的召喚”。上船前，他問來送他的同學李政道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服務。李政道笑著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當時不明白腦子怎麼個洗法，也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到燕大剛六個星期，三十歲出頭的巫寧坤就趕上了全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運動伊始，他們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先去中南海聽周恩來長達七個小時的政治報告，回到學校後便開始了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與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緊下來是三反五反運動。燕大自己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作為運動重點，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在這裏變成反親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來的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全校停課搞運動，陸志偉校長靠邊站，成為美帝國主義分子，無休無止地在大小會議上檢討交代問題。全校師生揭發批判他“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許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溫文爾雅，滿嘴黨八股，上臺批判校長。校長的女兒也慷慨激昂，做大義滅親的發言。批完校長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控組織反動小集團——十人團。被批的教授、講師，有的下跪求饒，有的聲淚俱下沉痛檢討。

巫寧坤想不出自己回國才短短幾個月究竟有什麼錯，可眼看著一個個他平日敬重的前輩都痛心檢討，他也不敢自居另類，便如法炮製，在批判會上痛罵自己，深挖歷史，從家庭出身到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再到迷戀西方文學，諸如此類，都引為罪。他滿以為可以過關了，不料話音剛落，英語二年級的一個男生跳出來，說他的檢討“膚皮潦草，談遠不談

近”。這個學生舉起一本小書，指著封面，義正詞嚴地質問道：“你從美國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談話中散布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該書封面上畫著一隻手，指甲腥紅，手裏舉著一杯香檳。那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從巫教授處借去的。

接下來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必寫一份自傳，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代各自的政治歷史問題和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迫不逼”。巫寧坤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了歷史，接受了盤問，又到文學院教授會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啓發幫助，最後還寫出了一份自傳。他自認為萬里歸國足以證明自己的愛國心迹，誰料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燕京攝政王的歷史系教授剪伯贊約他到府上談話，態度的倨傲無禮令來自自由美國的巫寧坤吃驚”。“只見剪嘴裏叨著香煙，噴雲吐霧，對巫寧坤說：‘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迫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真正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巫寧坤回憶說：“一個同仁竟然如此無禮，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這次談話埋下了巫寧坤以後三十年的苦難，還牽連到他全家跟著受苦。

緊接著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按科系分別并入北大、清華、北師大，兩校的教職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洗腦態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寧坤被發往天津南開大學。

南開將巫寧坤安置在兩間小平房中。他住一間，母親住一間。每周兩三個下午，教師們都要參加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學習材料包括毛澤東的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分子朗讀文件，仿佛聽者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接著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了錯誤，提高了覺悟。任何參加學習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寧坤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彙報。此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寧坤按時到系裏參加政治學習。一坐下來，就聽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到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錯誤。身邊的教師一個接一個發言，揭發批判，把巫寧坤平時私下的不滿言談都翻了出來。散會後，以前經常交往的許多同事都疏遠了他。他的好友，從美國歸來的查良鏞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

值得慶幸的是，這時巫寧坤在南開大學遇到了他的終生伴侶，時為外文系學生的李怡楷，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將。怡楷天生樸實，天真無邪，使巫寧坤覺得南開倒還不是個太壞的所在。他們很快就結婚了。後來的苦難證明寧坤找對了人，怡楷是一個患難與共的好妻子。

婚後好景不長，幾個月後，肅反開始了。全校召開動員大會，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系一百多名教職員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巫寧坤是南開暗藏的頭號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鏞、李天生和一個德語講師。積極分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氣勢汹汹，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儀皇帝俄語翻譯官的俞姓講師，被嚇得當場昏倒。

巫寧坤開完會剛回到家，就來了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闖了進來。他們自稱是公安人員，窮凶極惡地亮出一張搜查證，先對巫寧坤搜身，再對他的母親和懷孕的妻子搜身。一個男的問他：“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巫寧坤說：“沒有，甚麼也沒有，只有一枝筆。”另一個男的又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儿了？”他意識到，他們已把他

當成暗藏的美國特務。緊接著，全校又開了幾天批鬥巫寧坤的大會。

一九五六年二月，黨報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報告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要與知識分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他們更多的自由，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幹部約巫寧坤談話，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開大學人事處通知他調往北京一所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巫寧坤帶著妻子和新出生的兒子又回到北京。

還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與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寧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見的誠懇邀請。在鳴放的激動中，他還用英語高呼：“不自由，毋寧死！”

於是，巫寧坤在各種場合說的話，以及別人無意中聽到他說的話，都被指控為對共產黨內政外交政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攻擊。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寧坤的唯一權利是承認加給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圖解釋或澄清事實的努力，都被大聲斥責為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是堅持右派反動立場死不改悔。南開的一位老同事楊教授，聲嘶力竭地揭發巫寧坤當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女教師揭發說，她曾親耳聽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寧死！”她質問巫：“有沒有這回事？”巫答曰：“有過。”她立即怒吼：“用美國的反動口號進行煽動！”革命群眾也跟著怒吼。一名黨員還指控他曾說過在滾沸的大油鍋裏油炸黨員。群眾吼道：“這是發泄惡毒的階級仇恨！”。

經過眾多同事的無情批鬥後，巫寧坤被定為極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在妻子第二個孩子臨產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寧坤被一輛軍用吉普車押走，關進半步橋監獄（北京市第一監獄）新開業的一個下屬單位北京市勞動教養所。此後的三年勞動教養，趕上三年大饑荒，苦難雪上加霜。勞役、饑餓、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邊沿走過。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處上訪，要求釋放巫寧坤，他會死在勞改營。

三年勞改出來後，巫寧坤作為臨時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學教書。他把這段時間叫做“暫回人間”。好景總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來了。巫寧坤首當其衝，又被揪出來。批鬥大會，下放勞動，歷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單獨下放，妻子帶著孩子被下放到幾十里外的另一個村子。全家在農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安排到安徽師範大學任教，一家人的苦難才大體畫上句號。

巫家苦難的結束并不等于中國所有家庭的苦難也一并結束。一次次不同的政治運動，從來都是打擊百分之五的少數人，利用多數來實行暴政。中共的整人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中斷過，它可能對這個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別的家庭。巫寧坤這樣的知識分子家庭回城之後，中共又製造一系列的整肅運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四人幫運動，整肅六四暴徒運動，整肅法輪功運動，等等，這些運動同樣使許多不同的家庭陷入災難。尤其是為時十年直到現在仍未停止的整肅法輪功百姓的運動，就像當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寧坤和眾多右派一樣，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也被押走。他們只因信仰法輪功，沒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審判，就被非法押送勞改和抓進監獄。而且許多家庭中父母是被雙雙抓走的，孩子不准上學，流浪街頭。電刑以及各種聞所未聞的酷刑也在整肅法輪功運動中普遍出現和使用。無以數計的法輪功百姓家庭遭受非法迫害，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被折磨致死。

香港北大校友岑超南先生來信鼓勵：為民請命，功德無量。

我在 1990 年 9 月 8 日的《大連日報》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還是當今的時代好》，開頭第一段是：“我今年 54 歲。我爺爺周春富是小說《高玉寶》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藝術原型，土改時被鎮壓。我父親周長義是周春富的三子。我 1952 年小學畢業考入初中，1957 年到瓦房店水泥廠當工人，1961 年響應黨的號召還鄉務農，一直到現在。”此文是該報搞的“我愛社會主義徵文”中的一篇，由閻店鄉一個叫王貴新的宣傳幹事採訪整理。

多年後我輾轉找到王貴新，他對十多年前那次採訪記憶猶新。閻店鄉是《高玉寶》作者高玉寶的家鄉。王幹事先是找到高玉寶的弟弟高某某，發現這一家人懶地荒，家裏又窮又髒，簡直無法下腳。王覺得這種人家有悖於徵文的主旨，不適合報道。失望之際，他靈機一動：何不寫寫“周扒皮”的後人？就這樣，大舅這個地富子弟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新農民的代表被報道出來。那年，我把這篇文章帶回家，讀給母親聽。母親聽後說：“你大舅就能白話。”看得出，她語氣裏還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復讀了幾遍，文中的大舅並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爺家族裏最懂政治的人。集體批鬥地富反壞右的時候，大舅舉著拳頭率先大聲喊“打倒階級敵人”，背後却去找給爺爺家扛過活的一位公社幹部，問：“我爺爺真的是那樣（半夜學雞叫）嗎？”生產隊扒廟時，他鼓搗著堂弟裝肚疼，不去扒。可是為公社修水庫時，他却挑著大號筐，一遍遍從公社指揮點幹部的眼皮子底下熱情萬丈地走過。大隊通知地富分子自帶乾糧，參加公社不記工分的修橋勞動，他却每天從生產隊收工回來都要跑去給老爹送餅子鹹菜，好趁機換換累得搖搖晃晃的父親。

富農子弟嫁娶難，可大舅 20 歲就結婚了，而且媳婦很漂亮很能幹。大舅在縣水泥廠幹兩年後，私自將自己的名字周有學改成周明緒，寓意緊跟形勢明事達理。姥爺非常氣氛，爺倆大吵一架。大舅趁熱打鐵，將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婦所在的大隊。遷戶的理由響噹噹——同地富家庭決裂的。公社幹部大為肯定。

大舅的大女兒十七八歲時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畢業不久就有媒婆登門。大舅傾向於一位公社幹部的跛腿兒子，可是女兒却和村裏一個地富後代偷偷好上了。勸說不從，摔杯打碗無效。大舅通過嫁女改變政治命運的交易破產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兒。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兒自殺的遺書。這件事對大舅打擊甚大，陰雨天或者晚上更願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覺，吸煙，喝幾口悶酒，沒完沒了翻看那幾本舊書。天長日久，他背後倚靠的土牆被腦袋磕出一個瓢形的淺坑。後來，那個淺坑被一張報紙裱糊上了。那張報紙有張鄧小平的照片，大舅說他感謝鄧小平。

四類分子摘帽之後，大舅這個外來戶在那個屯子很快當上生產隊長。兩年後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舅更是如魚得水。他是先知先覺的農民，先是圈地墾荒，和兒子起早貪黑開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開家庭會議，商量湊錢買三輪車搞運輸。當年他哈腰流漢種的經濟果樹，如今兒子已經受益。他的小女兒回憶，那時大舅幹什麼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個星期天，早晨起來晚些，突然聽到街上院裏哞哞的牛叫聲，原來兩天沒回家的爹從外地趕著一群牛犢子回家了。他要養牛了。

在大連日報刊登《還是當今的時代好》的第二年，剛剛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擄獲走了。他一定沒活够。

姥爺周長義原來有六個孩子，最小的兩個在大饑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親和小舅。母親在世時每提起這些陳年舊事都忍不住眼圈發紅，不知是為他們那命運多舛的爹媽，還是為那兩個可憐的早亡弟妹。活下來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歲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罵和白眼中度過的。

關於小舅，小時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讓我和弟弟坐在籬笆裏，用扁擔挑著我們

走二十裏路去姥爺家。母親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幾歲時小舅去姑姑家，回來時姑媽給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別人給了他一條小狗，他覺得過意不去，竟隨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還常常吃不飽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書，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個高貴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層褥子上，最底層下麵掖藏個豌豆也能讓她感覺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對象難，老舅快到三十歲才找上媳婦。媳婦一隻眼睛藏著玻璃花，娶親那天，村裏的許多孩子圍著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親，膽子小，自尊心強，做事瞻前顧後，與姥爺有些相似。我三歲時家裏蓋房子，墊地基的黃泥都是她在孩子剛滿月時一筐筐挑回家夯實的。山上地裏農活累的時候，她會回家撕下日曆牌上的半頁紙，卷上一隻旱烟抽幾口。有一次她跟我說，在家當閨女時，從生產隊幹活回來，姥爺常常讓她談談白天上山幹活或者晚上下田搶工的事情。無非是隊長又訓了哪些人，工分能評幾分，或者政治學習點沒點咱家的名，諸如此類。姥爺之所以打聽這些，無非是擔心自己的孩子在隊裏表現不好。母親那時候是十六七歲的小丫頭，白天幹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講著講著就打起了瞌睡。姥爺這時候就把烟袋遞過來，讓她吸幾口提神。她就這樣學會了抽烟。

後來我家裏生活好些，當村小學教師的父親能揣上一盒半盒香烟時，抽時也會給母親一支。母親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幹活累了，才把攢的幾根烟捲拿出來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參加工作後，回家時會給她買幾條烟，可母親却說她已經戒掉了，堅決不讓花這個錢。只有當時還在上學的三弟，參加工作後依然給母親買烟，他知道母親其實還在抽。

大姨年輕時像辣椒一樣厲害。村裏一位當權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勞動時破天荒地給她這個地主後代派了個輕快活。收工時，四處無人，那人突然淫褻地抱住了她。年輕的大姨身子一掙，嗷地一嗓子，掄起鐮刀就向那人砍殺過去。那人嚇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後面追，集體的一棵棵莊稼唰唰倒在憤怒的鐮刀下。這動人心魄的駭人一幕，秋後竟為姥爺家多贏來半袋子好糧食。我十幾歲時，聽說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陰陽兩界的能力。幾年後，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個東西又突然離去，從此她的性格也變得溫順了許多。

大舅的幾個子女大部分在農村務農。我接觸較多的是他的三女兒。聽母親說，我這個三表姐在大連打工，并嫁在那裏。2003年，在報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電話。

她在大連城郊一個山旮旯裏包了荒山溝，有山有水有果園，雇幾個人在那裏養雞照看果樹。她說她想開個雞湯館，問我叫“半夜雞叫”行不行。她覺得，周扒皮的曾孫女開這樣一個雞湯店一定是個不錯的賣點。我告訴她工商局不會批，她在電話那頭笑得很厲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園轉轉。

從市中心開車，一個小時就到了。一百來畝的溝地藏在山坳裏，一派田園鄉野風光。各種果樹在四周高高低低圍合，中間迎面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坡上，依著地勢張起三四米高的漁繩網，裏面圈養著柴雞。突然一聲哨子響，只見坡上坡下數不清的雞，歡叫著飛跑過來啄米叨菜，場景煞是壯觀。幾個雇工在這裏忙活，工頭是個老實厚道的人。他們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開玩笑，先是叫她東家，後來叫她老闆，現在叫她領導。這裏有一座二層小樓，但三表姐大部分時間住在市里，那裏還有個小營生。

三表姐多年來養成了讀書看報聽廣播的習慣，對建設和諧社會、新農村和綠色生態都有著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為這個山莊的出路著急，因為近幾年大連周邊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莊，生意一個比一個火。看了電視劇《劉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動腦筋。搞旅游這裏還不成熟，開飯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討能否搞點綠色生態農業。這裏養了很多雞，全是散養，吃蟲吃螞蚱，在市場上都能賣出好價錢。母雞下的蛋個個是環保綠色的，能不能也讓城裏人像熱衷到櫻桃園采櫻桃一樣上山來撿雞蛋？還有，可不可以給所養的不喂激素的豬打耳環做標記，讓人來認養。城裏的一家人到山溝裏認養一頭豬，定

期來看看，年底來殺綠色年豬豈不快哉？或者在電腦網絡上發照片拍購，何如？

三表姐就這樣“城鄉結合地”生活著。我在她那裏獲知很多周家後人的信息，她還幫我找到了過去太姥爺家的幾張老照片。那年我到瀋陽出差，下了火車，突然想起三表姐說過五姥爺周長武的兒子周俠在南站做生意，並告訴我，隨意打聽一個商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個攤亭詢問。那人連說知道知道，並很快在一個本子裏翻出周俠的電話。周俠幹的是雜貨批發，生意有多大無從知曉，但人緣極好是肯定的。他儀錶堂堂，為人精明爽快。說起爺爺的往事，他說：“我們不記恨，也不提這個。過去我們家可以說是為特殊教育做貢獻了，現在就讓我們做自己吧。”

60 多年過去了，階級鬥爭已經隨著歷史的煙塵漸漸模糊。周家的後人們，有的已經遠走他鄉，有的還生活在原籍。他們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來，今天仍然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富裕人家。傳說中太姥爺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漸漸被人淡忘，相反，他的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憶起來。2008 年 7 月，《先鋒國家歷史》雜誌的一位記者來到黃店村尋訪周扒皮。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他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幹？一天的工錢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幹。”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幾年的長工：“一年掙 8 石糧食，養活全家。”周家的老街坊，83 歲的閻振明說：“周春富腰間常年捆著破布條，就知道勤儉、勤儉，然後買地。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會使鋤、能扛糧就行。”黃店屯 93 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的三間老屋裏。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話：“不是惡人，不霸道。”

## 桃曲舊事 許崇平

我插隊的陝北桃曲村，有兩戶人家，是兄弟倆。弟弟賀廷貴，貧農，一副挺不直的身板上架著似笑非笑的臉，家中零亂齷齪。哥哥賀廷雲，富農，清瘦精幹，透著一股靈氣，普普通通的窑洞收拾得窗明幾亮。這賀廷雲還是村裏第一把種地高手，隊裏僅有的幾塊可以條播麥子的好地，都是他搖耬播種，長出的麥苗壟又直又勻。弟弟賀廷貴好吃懶做一輩子，哪樣農活也提不起來。土改來了，賀廷雲因勤勞致富掙了幾畝地，被劃為富農。弟弟賀廷貴游手好閑，一事無成，落個貧農的美名。

賀廷貴只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養老送終。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無奈之下，從十裏外的丁原村招了一個上門女婿。當時陝北的習俗，娶媳婦男方必須向女方付彩禮。彩禮大約是四百元左右，聽說其中一部分還必須以銀元（袁大頭）支付。這就是陝西十大怪中的一怪：城裏的姑娘不對外，鄉下的姑娘高價賣。付不起彩禮的貧寒人家，或成分不好的人家，兒子只好做上門女婿。

賀廷貴的女婿屬於後者，家裏是富農。他小名叫更令子，姓韓。當地風俗，做上門女婿的人要“賣掉”半個姓。比如更令子入贅到賀家後，要改姓賀，後面再保留自己原來的韓姓。這是很丟面子的事。讓更令子更傷心的是，結婚後雖然有了兩個兒子，但是據說在賀廷貴的調唆下，婆姨和他的關係始終不好，動不動就威脅要離婚。有一次吵鬧之後，更令子為了表示對婆姨的一片痴心和對家庭的責任，竟然用菜刀剃下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希望以此挽救這樁婚姻。1974 年，我們這些北京知青陸續離開桃曲村之後，更令子帶著婆姨離開了賀廷貴的小院子，住進我們知青曾經住過的窑洞。可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又是一場吵鬧之後，喪失理智的更令子再一次揮動了手中的菜刀。他這次不是自殘，而是結束了這個讓他又恨又愛的女人的性命。

以前只是從書本、報紙、電影、戲劇中得知貧下中農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干社會主義。

到了農村才知道，其實只有農民這個群體概念才是真實的，哪里有什麼貧下中農？哪里有什麼地主富農？這些人爲劃分的農村階級成分都是無稽之談。村裏一個姓張的貧農老漢，從河南逃荒而來，60 多歲，滿口牙掉光後又重新長出一口新牙，剛死了第二任婆姨。村裏人都說這老傢伙命太硬，克婆姨。一天在村邊等著上工，說到桃曲村在合作化之前的富裕殷實，一時興起，齜著滿口參差不齊的新牙，扯著喉嚨說：“還是單幹好呀，現在誰要是能讓我單幹，我磕一個響頭，馬上就走！”

更爲浪漫離奇的是一個叫史志平的外來戶，本是延川縣的窮苦人，當年隨土改工作隊來到桃曲。他一邊忙著給桃曲村的人劃成分，鬥地主富農鬧革命，一邊忙裏偷閒看上一個富農的女兒。富農開始不願意女兒下嫁，史志平硬是用駁殼槍成就了這門親事。不過這個人倒也是個情種，不愛革命愛美人，就此解甲歸田，在桃曲村落生根，成年累月守著婆姨，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我已經記不得當時是如何介紹他的成分了，只記得窑洞裏擠滿了他和婆姨生養的漂亮後代。

桃曲村人杰地靈，頗有“儒村”風範。二百多口的小山村，居然能湊出一個戲班子（宣傳隊），吹拉彈唱，一應俱全。村裏有個戲臺，晚上在明亮的汽燈下，能演出一套全本的地方迷糊劇《紅色娘子軍》，周圍十幾裏的村民都來看戲。苦大仇深的吳瓊花的扮演者是桃曲村唯一的地主賀文郁的女兒虎妞。

賀文鬱 60 多歲，留著鬍子，腦袋總是不停的擺動，後來才知道那是帕金森症。他的兩個大兒子曾經都在外面工作，因出身地主，雙雙被舉家遣返回鄉務農。兄弟倆雖然平日裏低眉順眼地勞動生活，但言談舉止間還是不同于其他人。二人是村子戲班裏演奏器樂的大腕。虎妞是戲班的臺柱子。賀文郁最小的兒子小名俚太，是村裏唯一在縣城上中學的孩子，後來考上大學，留在延安市工作。

到桃曲後不久，生產隊在我們借宿的村小學院子裏開了一場批鬥會。批鬥對象是賀文鬱和他的婆姨。批鬥會一開始，先由大隊書記馬雲池鄭重其事地傳達公社的要求：早請示、晚彙報時拿《毛主席語錄》的姿勢要像林副主席那樣。馬雲池右手虎口握住小紅書，恭恭敬敬地放在乾癟的肚皮上做示範，看上去還真有幾分相像。接著副隊長辛全喜就從全國山河一片紅講到農業學大寨，又從農業學大寨講到全國山河一片紅，聽來聽去好像賀文鬱也做了什麼貢獻似的。村裏人在太陽底下都聽得昏昏欲睡，只有地主分子賀文郁在中間搖頭晃腦帕金森地站著。他的婆姨則早已坐在了地上，四周爬滿了一圈孫兒孫女。大約一個小時後，辛全喜的車轆轆話不知轉了多少圈，總算累了，于是隊長賀振國宣告收工。地主婆姨爬起來，拍拍滿身的黃土，在孫子孫女簇擁下回家。

賀文鬱沒走，掏出旱烟袋，朝別人借個火，坐到剛才隊長的位子上，悠閑地抽上一袋。村民走過來，走過去，對賀文郁該叫叔的叫叔，該叫爺的叫爺。維繫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封建禮教、宗法制度又一次戰勝了階級鬥爭觀念。我在桃曲插隊三年，印象中只開過這麼一次批鬥會。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爲綱的年代，我懷疑就這一次還是爲了做樣子給北京知青看的。

桃曲有 52 戶人家，除了馬史范辛蘭張各姓各有一戶人家外，其餘都姓賀，是一個典型的自然村落。地處偏遠，古風依舊，賀氏家族嚴格按照輩分取名字，次序井然。當地習俗，隔輩就可以開玩笑，孫子輩可以拿爺爺輩開涮。村裏輩分最大的是賀永福兄弟五個的老爹，當時大約 70 多歲，羅圈腿，雙手各拄著一個拐杖，走起路來像一條劃槳的破船，全村男女老少（除兒子兒媳）都拿他開玩笑。外姓人可以隨便和任何輩分的賀姓人取鬧，“問候”他們的親人，但絕對不可對姓賀的人說“我日你先人”，那可犯了大忌，就像掘了他們姓賀的公共祖墳。我們也是遭了很多次白眼之後才知道賀姓的先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哪怕意淫也是不可以的。

據 1950 年春的新華社《內部參考》，河南省一些地方的土改頗為極端，搞四追（追親戚、朋友、佃戶、狗腿子）五挖（挖夾牆、地洞、糞坑、竹園、稻垛）。幹部權力無邊，為所欲為，動輒打罵，僅一個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 30 餘條。蘭封縣瓜營區 20 天內接連逼死 7 人。該區區長某日到村上開群眾大會，一區幹部看到有位中農在家裝麥子，便懷疑是地主乘機偷偷隱藏麥子，遂將其拖到會場。區長當場打耳光，並揮槍威脅。七八個區幹部見狀，也動手亂打。有的幹部甚至用槍托亂搗，以致意外走火，當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村農會主任的母親。考城城關區未營村佃戶宋二妮，一向表現積極，被人誣告是地主走狗，該區副區長不加調查就在群眾大會上指名大罵。其子要求為父申辯，該副區長大發雷霆，將其趕走。宋之子回家後憤而自殺。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特別是 10 月間志願軍入朝作戰，對中國政治產生了巨大衝擊。陶鑄後來說：中共中央過去主張土改要溫和一點，那是因為戰爭沒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會震動太大，不利于統戰。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了，戰爭的震動那樣大，我們正好可以著手解決國內鎮反和土改的問題了（不用擔心動靜弄得太大）。10 月中下旬以後，毛澤東開始放手在全國推動鎮反。11 月，毛又全力督促廣東、廣西、福建等省立即開展全面的土改鬥爭。

中共華東局一向注意反對左傾偏向，這時也開始強調放手。于是，江浙各地土改中迅速出現亂捕、亂鬥、亂打傾向。蘇南奉賢、浙江嘉興等地都有被吊打、罰跪的情形，或把大批地主看管起來。無錫一縣遭跪、凍、打的有 872 人，青浦縣龍固區幾天裏就打死 17 人。奉賢縣 5 個區被鬥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打的 13 人，被捆綁的 18 人，被剝光衣服的 80 人，每個人都受多種體罰。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褲兜裏，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常熟縣還發生了割掉被鬥婦女乳頭的事情。蘇南各縣（市）土改期間召開村或聯合村鬥爭會 16841 次，鄉以上鬥爭會 13609 次，鬥爭人數達 28234 人。蘇南區土改期間，僅鬥爭會上就打死了幾十人，並造成 293 人自殺。

西北局因為有 1947 年土改過火的教訓，加上西北地區不少地方沒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較謹慎。這時也出現了幾乎相同的情況。平利縣四區雙河鄉對地主、富農、中農以及工商業者 40 餘戶進行了全面清算和罰沒，連茶缸都不放過。長安鄉王曲區鬥爭地主富農，打、跪、拔鬍子、脫衣服已成習慣。據渭南縣九區一市統計，土改幹部亂施刑罰，疲勞審訊逼供，逼死地主 7 人，普通農民 15 人，富農、小商販、幹部及小土地經營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 81 人。鎮安縣分了富農的土地，竹林管區徵收了半地主式富農的自耕地。石泉縣 7 個鄉鬥了 43 名舊保甲人員，並把他們和地主集中起來強制勞動。南鄭 58 個鄉，半數地主成分者被打，自殺了 96 人。安康縣懲治地主 661 人，管制 357 人，自殺 82 人。紫陽縣一度將地主幾乎全部管制起來。

和華東、西北相比，中南局明顯走得更遠。它一上來就明確提出：此前的土改試點地區普遍因為防左、糾左太多而存在著“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嚴重的“夾生飯”現象，因此必須讓幹部瞭解，土改不是單純分田和得到經濟果實，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後的農村真正成為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鄉村”。為此，不能束手束腳，“不要過早和過分地強調防左”，不要讓群眾感覺規矩太多，對真正群眾大動起來發生的過火行為，不應潑冷水。總之，要搞“鬥爭土改”，“放手發動群眾，掀起一個大規模的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

由于公開強調要敢于放手，並尖銳地提出了反對“和平分田”，中南各省黨政部門層層貫徹，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腳的基層土改幹部，尤其是軍隊和農民出身的土改幹部，自然容



易變得十分激進。湖北潛江重點鄉李家大台、紫月兩村，共 413 戶，工作隊進駐後，硬是劃了 64 戶地主，69 戶富農，地富合計占總戶數 32.2%。他們還將這幾十家所謂的地主（其中多戶實為富農）掃地出門，迫使其全家外出討飯求生。其他的富農（實為中農和貧農）亦多被剝奪財產，只是沒有被逐出家門而已。漢川縣土改工作團亦大張旗鼓地鬥地主、打惡霸，全縣土改、鎮反先後殺了數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簡單激烈，導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緒，許多并無多少劣迹的地主富農，甚至一般農民，紛紛自殺。十一區 3 個多月有 37 人自殺身亡，三區亦在同樣時間裏自殺了 31 人，且多為女性。

中原各地陸續開始土改之際，四川省尚處在退押反霸鬥爭中。雙流縣 1951 年初的兩個月就槍斃了 497 人，141 人（73 男，68 女）因恐懼被鬥、被逼而選擇自殺。郫縣頭兩個多月槍斃了 562 人，222 人以自殺相抗。不少地主甚至捨命不舍財，寧願全家自殺也決不肯拱手交出財產。雙流縣自殺的 141 人當中，捨命不舍財的地主就有 63 人之多。隨著土改開始，一些幹部更習慣性地把上級號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為一個“打”字，“因而在鬥爭中產生放任、暗示和組織打人的情況”。“有的還帶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陽奉陰違，報喜不報憂，在賠罰、鎮反、劃成分等各個環節上交待政策、分別對待不够。有的地方經領導上具體指出來的問題，亦未實際的去做，因而在各個環節上死了一些人，結果大多報為畏罪自殺。”營山縣 30% 的村子發生了吊打和肉刑，全縣被劃地主多達 3760 戶，其中自殺了 261 人（總共自殺 301 人）。榮昌縣七區 4 個鄉，54 個村，共劃地主 663 戶，3376 人。區領導自土改開始，便放手組織亂打亂吊。14 村共劃中小地主 15 戶，打死 15 人，平均每家一個。土改幹部林成雲在鬥爭大會上甚至用刀割斷了被鬥地主的脖子，眾目睽睽下當場將地主殺死。由于地主成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詞，一些農戶得知被劃為地主後，竟絕望自盡。有地主生怕被鬥，硬被拉到鬥爭會場後，即當場以頭撞柱而死。僅這幾個鄉地主富農就自殺了 96 人（男 39，女 57），當場鬥死 16 人（男 9，女 7）；鬥爭後幾天裏又病死、餓死了 66 人（男 42，女 24），加上關押致死的 12 人（男 8，女 4），總共死了 190 人（男 98，女 92）。

廣東東江惠陽縣潼湖區欣樂鄉土改伊始就亂打亂吊地主，亂挖底財。該區發明了 20 種吊打人的方法來逼底財。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 6 天中，打死 6 人，逼死 13 人。增城鬥爭地主中實行吊、打、綁、埋（埋至頸）、關 5 種辦法，還動用火刑，強迫農民簽名參加吊打，否則不分果實。惠陽縣因此自殺了 199 人。僅 5—8 月間，北江地區就造成 614 人自殺。潮汕專區則造成 755 人自殺。興梅專區僅 5 月 20 日至 6 月 7 日就逼死 202 人。全省 5—8 月連打死帶自殺，共死亡 4000 人左右。東江地區在 1951 年上半年土改開始的幾個月時間裏就鬥爭了 5698 人，其中地主成分者 2567 人，富農成份者 1047 人，鎮壓了其中的 3642 人，另有 2690 人因絕望和恐懼自行了斷生命。

對於已經如此激烈的土改運動，中南局仍批評土改太和平了。經中共中央同意，陶鑄等被調到廣東，撤換了“在農民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的華南分局領導人方方，并從各地補派了 1000 名土改幹部。新一輪土改從 1952 年春夏開始，幾個月時間就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傷害。大批過去多少受到保護的華僑被打成地主、富農，許多人被剝奪了財產。惠陽潼湖區欣樂鄉又捉地主 100 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博羅有用小蛇、大螞蟻裝進地主褲襠，還有吊乳頭、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點天燈、假槍斃等刑訊方法。東莞 290 人自殺，230 人是地主成分。僅恩平一縣，在這一輪土改中因重劃階級就多劃了地主 1039 戶，按政策標準等于錯劃了將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錯鬥 1173 戶，2179 人，錯捕了 486 戶，553 人，被吊打 138 戶，278 人，因錯打、錯捕、錯鬥、錯管制致死 122 戶，236 人，錯戴帽子 213 戶，401 人，并導致 830 人自殺，其中地主達 570 人，富農 108 人，有的全家 7 口全部自殺。另據華南分局通報，從 2 月 3 日至 3 月 6 日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裏，因為殘酷吊打，一度竟造成 805 人自殺的慘劇，全區這段時間先後自殺了 1165 人。在這一階段

土改運動期間，廣東全省農村不算被鎮壓的，光是自殺就死了 17000 人之多。

類似的情況在各地檔案中有太多的記載，僅此即不難看出，1950 年，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以後開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區的土改運動中，過度暴力和對富農的嚴重傷害，絕不是偶發的和個別的。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針對地主富農的這種打擊越多，中共基層黨政部門看到的來自地主富農分子的敵意、反抗和報復也就越加明顯和激烈。這種情況反過來也就越發促使中共多數地方領導人高度警覺，絕不相信地富喪失了財產和地位，就應該給其與一般人一樣的待遇，而中共地方實際工作部門的意見，又足以改變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鑒于各地土改走向尾聲，開始從恢復經濟和統戰關係的角度，考慮對多數已經接受了現狀的地主適當採取羈縻政策，并據此發出了一個關於土改後安置地主就業的指示。要求各級幹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區，勸說農民“主動地向那些表示服從的地主和緩一下”，“以便爭取多數地主參加勞動，耕種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維持自己的生活。對於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從事教書或其他職業者，應允許他們從事其他職業，或分配教書工作給他們。對於確實沒有農業勞動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許他們作生意。”要讓他們瞭解：“他們的底財，可以允許他們挖出來，投資生產，不再沒收。他們以後生產所得，不論多少，均不再沒收。”只對那些有勞動力，能從事農業勞動，又無其他職業者，應強制他們勞動，不允許他們游手好閑以討飯為生。對於那些繼續頑抗的地主，除應繼續鬥爭外，“亦可把他們編成勞役隊強迫他們勞動”。

這一指示沒有得到各地的擁護和響應。相反，各中央局對向地主表示緩和的作法多不贊成。他們深信遭到土改嚴酷打擊的地主分子，絕不會安分守己，多半都會懷恨破壞或反攻倒算。華東局因此提出了一個與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稱：“在土地分配已經完成的地區，為了防止地主反攻復辟、竊取農民的鬥爭果實，繼續壓迫農民，必須對他們提高警惕，并嚴格地進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對地主管制期間，應強迫他們參加勞動和經常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同時并進。鄉人民政府和鄉農民協會，應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訓話，檢查其勞動改造及遵行管制規定的情形。”只有“對確實長期安分守法積極勞動并較一般地主表現為好的個別地主”，可以“酌情縮短其管制期限”。對於華東局的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贊同，并轉發各地參考執行。

來自地方上的這種報告看多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變過來了。只過了將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變了在這一個問題上的看法，并且開始修正原定地主勞動滿 5 年、富農不剝削滿 3 年就可以給他們公民權的決定，強調對地富恢復公民權利問題，“根據各地區不少地富的破壞活動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為看，目前似不宜做統一的明文規定”，只可個別試點。毛澤東後來甚至根本反對輕易給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說：“過去規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現在看來，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劉少奇解釋說：因為蘇聯過去是把地富都驅逐了，而我們沒有這樣做，還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綫劃不清會很危險。

中共土改對地主富農簡單一刀切的做法，并不純粹來自于意識形態，它很大程度上與中共的現實考慮相關聯。中共早期的農村政策，只把矛頭對準土豪劣紳和大地主階級，并不主張反對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國主義、軍閥和大地主的壓迫，故相信從統一戰綫的角度應當聯合小地主，共同反對土豪劣紳和大地主階級。1927 年中共明確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針，宣布“無代價地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時，仍公開承諾“屬於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1927 年大革命失敗之後，對小地主的這一政策改變了，因為要發動農民跟隨共產黨，必須給農民好處，而中國南方許多地方沒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開刀，因此就再不提區別大小地主的事情了。

抗戰期間，中共因為放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減租減息和三三制，有了許多開明士紳的統戰對象。因此，當 1946 年中共中央不能再行土改之初，就又一次突出強調其區別的問題。《五四指示》中就明確提出了“對待中小地主的態度應與對待大地主、豪紳、惡霸

的態度有所區別”的具體辦法。1947年2月1日，毛澤東也重申了這一政策，要求“對於一般的富農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後，應有適當的出于群眾願意的照顧”。但這一政策因無法滿足眾多無地少地農民的願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後實際上被負責土改工作的劉少奇放棄了。從1947年10月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到1950年6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區別大小地主的提法和政策。

補白：老先生朱某，有一手好毛筆字，常有大、小隊幹部請其寫標語。老先生來者不拒，分文不取。文革中，老先生也光榮地受到了衝擊，在交代了曾傳授過孔孟之道，打過學生手心後，也就罷了。不過老先生從此更加小心翼翼，謹慎做人了。

一造反派小頭目要老先生為一改造低產田工地寫一標語牌，內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低產變高產”。先生欣然為之，小頭目在一旁看著。不知是由于緊張還是大意，先生竟寫下“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高產變低產”。老先生驚出一身冷汗。小頭目說：“沒事，我藏起來，不讓人知道，你重寫。”老先生千謝萬謝，重寫一幅。以後，每逢該小頭目想要打牙祭，就對老先生說：“你別怕，那東西我藏著呢。”老先生即稱肉打酒，招待一番。

海 安

鬥尸記 尹曙生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通報，批評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違法亂紀，組織群眾對已經畏罪自殺的黨支部書記馬xx的尸體進行批鬥，造成了極大的恐怖氣氛，引起群眾反感，影響到四清工作的進行。

當時我在青海省湟中縣四清工作總團多吧分團政法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秘書答國棟的電話通知，說西北局政法組組長張之軒要到西寧來瞭解湟中縣批鬥尸體的事，要我迅速去調查，寫一個詳細的書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騎著自行車來到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用三天兩晚，將全部情況瞭解清楚。

新莊大隊共有1900多人。大躍進期間，一些大小隊幹部作風十分惡劣，打罵欺壓群眾，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隊餓死500多人，有6戶人家死絕（5戶地富，1戶中農），幹群關係十分緊張。四清工作組進村前，民兵連長和一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組共7人。組長仲xx，是湟原縣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隊員6人，其中3人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該公社的路姓秘書，一位是姓方的農林廳幹部，一位是駐軍部隊的沈排長。

工作組進村後，通過一個多月訪貧問苦、扎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多數四不清幹部在刑訊逼供批鬥下低頭認罪，願意退賠貪污受賄、多吃多占的糧食和錢財（實際是空頭支票，根本退賠不出來），唯有支部書記馬xx被批鬥了十幾次，始終不認罪。為了鍛煉3個大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仲組長下令，把馬xx交給他們，要他們想辦法攻下這個頑固堡壘，並明確表示，不管使用什麼手段，只要能使他低頭認罪就行。“如果你們攻不下這個堡壘，就說明你們無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時可以動武。你們自己如果不願意親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協助。”

可是這3個大學生怎麼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馬xx就是不認罪。堡壘攻不破，大學生們束手無策。仲組長嚴厲批評他們思想右傾，他要親自示範給他們看。馬xx被叫來。馬辯解

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裏的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裏鍋碗盆勺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部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幹的，不幹不行。大隊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裏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3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夥。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可是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一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一粒糧食也沒搜到，然後就不搜了，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占我確實有，作為共產黨員，是很不應該的，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現，可是不這麼幹，我家裏人也要餓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你貪污盜竊還有理！”說著狠狠抽他兩個耳光，踢了他一脚，將他踹倒在地。馬xx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組長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5小時後才讓他回家。

3個大學生目睹了仲組長的厲害，可馬xx仍然沒有認罪。仲組長想，看來要攻破這個堡壘，只能借助那些受到過他迫害的群眾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組在大隊部召開全體社員大會，進行憶苦思甜。社員自帶小板凳坐著，地富反壞分子跪在一邊，四不清幹部站在另一邊，工作組成員面對群眾，圍繞一張大桌子坐在長板凳上。這是仲組長設計的場面。

工作組事先確定了6個訴苦社員。已有3位社員訴說解放前受馬步芳家族剝削、壓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員反映平淡，沒有共鳴。接著，一位叫韓有祿的社員上去訴苦，說1948年他才15歲，被馬步芳軍隊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意，被捆綁吊打，吃盡苦頭。1949年春天在蘭州和解放軍打仗，腿上中了三顆子彈，被俘虜。是解放軍治好了他的腿，還發了路費讓他回家……

韓有祿還沒有訴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員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打斷他的話：“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馬匪捆去當兵，差一點被解放軍打死，那算什麼苦？你下去，聽我訴！”社員對前面幾個人的訴苦不感興趣，聽李秀英這麼一說，跟著起哄：“對，你下去，讓李秀英訴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組指定的訴苦人。出現這個場面，工作組員一時不知如何辦，怕她訴錯了苦。他們都看著仲組長，等他表態。仲組長也感到今天的訴苦會效果不理想，沒有把群眾情緒調動起來，於是揮揮手說：“好！李秀英，你訴吧。”

李秀英說：“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餓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餓死在水利工地，屍體也沒見著。公公婆婆得浮腫病，臥床不起，不能下地勞動。馬書記說不勞動就不給飯吃，結果3天就餓死了。我和女兒拖著浮腫的腿去拼命幹活，一天才給二個糠饅，一碗像水一樣的拌湯。記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實在是餓急了，想到大隊食堂偷饅吃。走到食堂，隔著窗戶看到馬書記和幾個幹部正在吃烙饅，還有炒雞蛋。我聞到香味，心想，無論如何也要偷個饅回去讓我女兒嘗嘗。她已經20歲了，一年多沒有來月經，乳房乾癟，像個男娃。我死了不要緊，要讓她活下去，不然將來誰給我們上墳？我看到炊事員離開伙房，去給大隊幹部上菜，就趕緊溜進去。我看見鍋裏有一個大饅，足有半斤重。我拿起來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剛走到門外，看見馬書記出門解小便。我一慌，絆了一跤，跌倒在地。馬書記問誰。我說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饅揣進破棉襖裏。馬書記走到我跟前問，你來幹什麼？我說我餓了，想討點吃的。這時炊事員在伙房喊：誰把大饅偷去了？馬書記問我，是你偷的吧？跟我來。我跟他走進炊事員的住房。馬書記把門關上，對我說，大饅就在藏在你棉襖裏，你把棉襖給我脫下來！我馬上跪下，給他磕頭求饒，對他說，馬書記，放了我吧，我和女兒一年多沒有吃過大饅。馬書記說，要吃大饅可以，把你那犂丫頭叫來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讓她帶一個更大的饅給你。我說我那犂丫頭腿腳都浮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你就饒了她吧。如果你不滿意，我願意陪你睡覺。馬書記說，你把衣服脫下讓我看。我站起

來，把大饅拿出來，解開破棉襖和裏面破褂子鈕扣，敞開胸膛讓他看。馬書記問，你的奶子呢？我說吃不飽飯，癟啦！我奶丫頭和我一樣。馬書記又叫我把褲子脫下來讓他看。我照辦了。他上、下打量一會，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兒跟我差不多，放棄奸污我母女的企圖，用穿著大頭皮鞋的腳踢了我一下，罵道：滾！誰稀罕你的臭屁。我連滾帶爬回到家。女兒見我那狼狽不堪的樣子，說媽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聽，沒偷到東西，還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塊烙饅沒有帶回來，放聲大哭起來。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說到這，她走到馬xx跟前，指著他的鼻子問：“馬書記，我沒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餓得不像樣子，那天晚上你能放過我嗎？我們全大隊多少女人被你搞過，你說說！”

李秀英邊說邊哭，全場不少社員跟著她哭。馬xx低著頭，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發抖。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站起來走到馬xx跟前，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拉到會場中心，罰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喲”一聲，終於跪下了。仲組長站起來說，大家可以對他批鬥，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見馬xx跪在她跟前，不打不罵也不踢，而是看著他。過了幾分鐘，她突然蹲下身，手伸進馬xx的腰間，雙手使勁一拽，將他褲腰帶拽斷，右手伸進馬xx褲襠裏，并大聲罵道：“我要看看你的騷球咋就那麼壞！”話音剛落，馬xx慘叫一聲，歪倒在地。後來法醫進行尸體檢驗時發現，馬xx的睪丸碎了，無疑是李秀英在訴苦會上捏的。

這時仲組長命令工作隊員將李秀英拉下去。參加會議的社員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馬xx！”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xx，說他裝蒜，命令他跪起來，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腳踢他。仲組長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開會，馬xx有被當場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來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明天下午繼續開。”又故意提告嗓門對馬xx說：“馬xx，你聽著，回家後好好準備，明天徹底向貧下中農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徹底向群眾交代清楚了，求得群眾諒解，才有出路。”

群眾散了，工作組員走了，馬xx却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仲組長叫一位社員通知馬的家人，將他攙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員早起出去挑水，發現馬xx吊死在昨天開會會場旁邊上的一棵榆樹上。憤怒的群眾并不因為馬xx自殺而善罷甘休，要求繼續對他進行批鬥。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批鬥馬的要求更強烈。他們找工作組說，如果不答應，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會議。

仲組長召開工作組員開會，討論如何辦。3個大學生堅決反對鬥尸體，軍人和農林廳幹部不表態，只有公社秘書贊成。仲組長說：“如果我們不答應群眾的要求，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下一階段對敵鬥爭就很難開展。再說，馬xx確實是混進黨內的壞人，全大隊餓死那麼多人，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生活腐化墮落，亂搞女人。這樣的人死了活該，不值得同情。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貧下中農一邊，這可是階級感情問題啊！”

但是尸體該如何批鬥呢？仲組長說：“開會時我們工作組派兩個人把尸體扶起來站著，讓社員批鬥。誰願意扶尸體？”誰也不說話。仲組長說：“小沈、小路，你們兩個人負責扶尸體。”仲組長知道那3個大學生是肯定不會幹的，只好叫他們倆。

沈排長不願意，但是他不直接說，而是找藉口拒絕：“現在階級鬥爭這樣尖銳複雜，要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報復我們。工作組只有我一個人有槍，我要保證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讓我扶尸體不合適。”小路接著說：“要工作組的人扶尸體不太好。鬥尸體是群眾要求的，應當由他們選兩個年輕人來幹這件事。”3個大學生隨聲附和。仲組長改變主意，決定選兩個苦大仇深的群眾來幹。

人選好了。仲組長找他們談話，說明幹這件事的重大意義，并告訴他們，每人發1瓶白酒，開會前喝，以便壯膽。開會那天，會場戒備森嚴，派民兵把守，不准隨意中途退場。儘管是群眾要求批鬥尸體的，但是真正開批鬥大會時，許多人却找藉口不來。工作組派人催了

好幾次，有些人仍然沒有來，來的人也都儘量坐在後面。

隨著仲組長“把死不改悔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馬xx拖出來批鬥”一聲令下，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裏把馬xx屍體拖了出來（馬死後屍體一直放在大隊羊圈裏），花一分鐘時間將屍體扶起站立。絕大多數社員不敢正面看，低著頭，有的用眼睛掃視一下，馬上離開。有的社員悄悄站起來，弓著腰，想溜走，被民兵擋回。兩個喝過酒、臉色通紅的扶屍體的人，一邊一個站著，抓住馬xx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頭扭向一邊，不敢正面看馬xx的尊容。工作組唯一的女大學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屍體。

屍體批鬥會原計劃開一個小時，4人發言，每人15分鐘。可前面兩個發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鐘，而且站得離屍體比較遠，不敢看屍體，而是對著群眾講話。第三個人上去批判時，剛開口講話，扶屍體的人失去平衡，兩人都摔倒了，屍體還壓在右邊那個人身上。只聽一聲慘叫“救命啊”，兩個人爬起來拔腿就跑。整個會場立即像炸了鍋一樣，社員群眾都驚叫著奮不顧身逃離會場。有幾個民兵試圖阻攔，被推倒在地。仲組長站起來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肅靜！”可是誰也不聽他的，只幾分鐘，會場上只剩下跪著的四類分子和站在一邊的四不清幹部。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兩個扶屍體的社員由于驚嚇，當晚發燒，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回家後精神恍惚，半個月後才恢復正常。我在調查時曾單獨問他們為什麼願意扶屍體，為什麼倒了，為什麼害怕。他倆說：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幹這件事，家裏人更不同意他們幹，可是群眾選他們，仲組長找他們談話，不幹不行，不幹就是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沒辦法，是硬著頭皮幹這件事。由于多年沒有白酒供應，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頭重腳輕，站立不穩，加上害怕，手脚抖擻，所以就倒下了。聽老人說，人死了不安靜就會詐尸，所以倒下後，害怕極了，趕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然後受涼發燒。

從當天夜晚起，再沒有人敢從批鬥屍體的場地經過。晚上社員家早早關門閉戶，工作組通知開會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頓狀態。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筆者調查時，沒有見到她。

馬xx死時43歲，祖輩都是雇農出身。他從15歲開始就給化隆縣的一個大地主家當沙娃（淘金沙的工人）、當長工。1948年被馬步芳部隊抓去當兵，忍受不了軍官打罵，兩個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個佛教寺廟打雜。青海解放後，馬回到家鄉，積極參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1952年入黨（新莊大隊最早發展的三個黨員之一），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他沒有歷史問題，是當時共產黨農村工作的依靠對象。

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大家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過去幾年噩夢一樣的日子是怎麼發生的？由于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惡勢力。許多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多吃多占，為非作歹，欺壓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還要壞。這幫人是中共農村工作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出了這麼大亂子，死了這麼多人，群眾非常憤恨，以至于在四清運動中老百姓鬥這些農村幹部就像土改時鬥地主一樣。

為了啓發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工作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在開展這項活動中，幾乎每一個工作組都遇到同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事先要教社員如何憶苦思甜。可是他們一走上前臺，說著說著就聯繫到大躍進，幹部是如何打他們的，家裏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

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臺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許多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該縣在四清運動中有 349 名幹部自殺，包括 16 名脫產幹部。到 1966 年上半年，青海省 13 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 1700 多名幹部自殺，其中縣、社幹部 45 人。

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 1963 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 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筆者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 200 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粑。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刀都沒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

四清工作隊員沒有下鄉之前，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作隊要求每個隊員必須執行八條紀律，比如工作隊員不准帶吃的、喝的，不准下館子，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違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同吃就意味著挨餓和得浮腫病。在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省委書記、省長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叫劉維金的貧苦農民家裏。兩間破屋不能遮風雨，還是工作隊出錢維修了一下，勉強住進。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吃的是發了黴的青稞面饅（缺燃料，蒸一次饅吃十天半月），晚上是乾菜泡後用水煮，然後撒一些雜面，成了雜麵糊，調料是幹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衛人員怕他吃不消，想單獨給他弄點吃的，他堅決拒絕，結果一個月不到，得了浮腫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醫院治療。這一期四清運動中，先後有幾十名隊員得了浮腫病。有的隊員實在餓極了，偷著吃餅乾，怕被人發現，夜裏藏在被窩裏吃，有的隊員偷著到平安鎮下館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發現就倒黴了。在 300 多名工作隊員中，有 7 個人因違反紀律被雙開，還有一位因經常挨餓，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導致胃擴張，又未得及時治療，被撐死。

補白：1969 年冬和平公社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動員大會，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彭學良發表演說：“我們不但要抓面上的階級敵人，還要清查暗藏的階級敵人。我們縣就藏有國民黨的特務。昨晚我在收音機裏聽到臺灣播出的消息，我們奉節兩派武鬥的事臺灣就一清二楚。這足以說明我們這裏有國民黨特務在給他們提供情報……”

彭學良的演說還沒發表完，下麵就響起了呼喊聲：“彭學良偷聽敵臺，是現行反革命，罪大惡極！”動員會立即變成了鬥爭會。

文革初，奉節有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喊的口號是“保衛革委會”，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號是“砸爛偽革委”，稱“砸派”。兩派勢不兩立。彭學良系砸派頭目，被整下臺的保派當然不甘心。這次抓到了彭學良的尾巴，自然不會鬆手，對其狠批狠鬥，既觸及靈魂又觸及皮肉。區公安特派員原屬保派，聽到報告後說，彭學良不僅偷聽敵臺，更嚴重的是當眾擴散敵人宣傳內容，實屬現行反革命罪犯，主張扭送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但彭學良得到縣裏掌權的砸派朋友保護，只給以撤職交群眾批鬥了事。但他那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結束。 陳宗培

五字勾魂 楊 杰

王緒祥是我的同學。小學時我們同在保山縣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學時我們同在保

山一中，他 86 班，我 87 班。緒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號，勞動課上一個頂仨。他還一直是學習標兵，成績優異。這樣品學兼優的學生，打著燈籠也難找。老師們都很器重他，同學們都尊重和信服他。

王緒祥的父親是上海人，多年前定居保山，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縫，家庭成分是工商業兼資本家。1966 年夏，血統論的狂風迅速從北京吹到邊地保山。王緒祥的入團理想破滅了，進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的紅衛兵代表身份也沒他的份，紅五類同學還逼迫他背叛自己的家庭。

他不僅連見都沒有見過自己的“資本家”爺爺，更沒有從他那裏得到過任何好處，憑什麼要為爺爺背黑鍋還債？他想向尊敬的老師訴說委曲，可這時老師們也都面臨著被批鬥的局面，個個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我們校園裏有個儲水池。那幾天工人在水池邊堆了一堆石灰，準備粉刷牆壁。心情極為苦悶的王緒祥吃完飯之後到水池去洗碗，看周圍沒人，拿起一塊石灰，在水池旁邊的水泥路面上寫下“打倒毛主席”五個字，然後離去。

很快有人發現了這條反標，並迅速報告了校領導。公安機關來人偵破，讓每個師生、工友都書寫了“打倒走資派，保衛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了“打倒毛主席”五字。沒費多大周折，王緒祥被捉拿歸案，關進監獄，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勞改。不久，學校接到公安機關的通知，說王緒祥病死獄中。

## 倪柝聲的絕筆 頌 恩

倪柝聲牧師，福州人，1903 年 11 月 4 日生。倪柝聲與王明道先生、楊紹唐牧師和宋尚節博士同屬對現代中國教會影響深遠的人。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為大陸弟兄姊妹預備的一爐煉金的火。倪師母張品惠姊妹是我的姨婆，畢業于燕京大學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師的賢內助。公公倪柝聲牧師入獄後，她也曾一度入獄受審，出來後仍一直受監視。文革中因為公公的緣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非人折辱。婆婆身體很不好，有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但自始至終她一直堅定仰望主，“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無聲”。

1966 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裏晝夜拷打審問。我們在外面只聽到皮帶一聲聲的抽打，並夾雜謾罵恐嚇聲，卻沒有聽見婆婆一聲言語。過了許久，婆婆被押出來，眼睛被打得腫得像青饅頭，身上也多處傷痕。

那期間，她的幾副眼鏡被打碎，多次被揪鬥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舉雙手，手上套著鞋子，頭上戴著紙做的尖頂帽子，項上挂著牌子，被責罵、凌辱，站立數小時之久。紅衛兵要她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但幾個鐘頭下來，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紅衛兵怒不可遏，分別喝問她們：“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她們個個都堅決地說：“信。”紅衛兵氣極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們的身上頭上，說：“帶著你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

感謝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與她們同在，賜力量堅固她們。事後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時，老覺得很喜樂，因為她們算是配為主的名受辱。

紅衛兵把家中所有的《聖經》、讚美詩都抄走了，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藏起來幾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牆，發現屋檐下有兩本《聖經》，婆婆又一次被定罪。我信主之後，一次偶然在大廚櫃後面發現一本小《聖經》，真是歡喜萬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沒有《聖經》的年代，這本小小的《聖經》對我實在太珍貴了。



婆婆被勒令每天早晚兩次打掃弄堂。當時她雖在獄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監內的犯人更甚。任何過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唾她，因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婆婆對我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聖經》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臺上一直默默祈禱，始終靠主站立，沒有羞辱主的名。

1970 年當我被送到農村插隊落戶時，婆婆每天都為我祈禱。臨別上海前，婆婆流著淚對我說：“主耶穌是我們最寶貴的救主，你無論如何總要牢牢跟著主。”在插隊期間，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帶領和極大的恩典。我想這一定與婆婆的代禱分不開。

公公倪柝聲牧師 1952 年被捕前，曾去香港為教會辦事。許多人都勸他不要再回大陸，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堅持回大陸去，與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來後不久即被逮捕，關進上海提籃橋監獄。

1967 年，15 年刑期滿了，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因為他們對外已經公開造謠說倪柝聲放棄信仰了。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得了什麼？主對他實在太寶貴了！為了對主忠誠，他再一次放棄人間的自由，在獄中 15 年之後，甘心為主作囚徒。這一次公開聲明自己從未放棄信仰，引來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關在兩位流氓刑事犯當中。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 年 11 月婆婆中風去世。自發病至去世，僅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別人，也免得自己長時間受苦。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在醫院裏十分平安，全無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後，我們不敢馬上告訴公公，因為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恐怕一下難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擊。過了一個多月，才斷斷續續寫信告訴公公。婆婆的去世使公公萬分痛心，他的同房間的難友告訴我們，公公一直有一個心願，想早點結束刑期出來與婆婆團聚。他知道婆婆身體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為我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入獄前公公為教會的事奉一直奔走在全國各地，入獄後一下又是 20 年，他們夫婦倆在一起的日子實在屈指可數。公公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惡名，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對他最瞭解，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公公為主承受了許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 年 6 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但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難友告訴我們：公公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他們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到 40 裏外的農場醫院。這 40 裏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機載著顛簸，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況是最忌震動的心臟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

臨去世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麵。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它背下來記在心裏。

公公至死忠心地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的妻子團聚，但主却預備了更好的一——他們團聚在主前。“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却從遠處望見，且喜歡迎接。”

他們去了，如同許多殉道者一樣。他們是神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們安息了，但是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果子，却一直在那裏蒙神悅納，起著不息的功效，他們的腳踪激勵我們更加忠心向主。

在青草地上 梁惠珍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

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會的負責人，1958年為主名的緣故被捕入獄。他離開我們將近22年，按人看來，這個家實在是支撐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這個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聖經》詩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實的經歷。

在試煉開始的時候，我心中滿是疑慮煩躁，一直和神講理。“主啊！我丈夫為著你而被捕，這八口人的重擔全落在我一個人身上，實在太重了，我擔不起啊！”我越覺得自己有理，心中的擔子就越重，簡直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前途一片漆黑。感謝主！他竟對我這剛硬的人說話了，我聽見主微小的聲音。“這事是出于我。”這句話一直進到我的心底，使我立刻得著安慰和亮光。我在主前俯伏回答說：“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語。既出于你，求你保守我和家中每一個人不羞辱你的名。”從此，我的心緊貼著主，主的手緊拉著我，那些重擔却仿佛已不在我身上了。在22年漫長歲月裏，我經歷了各樣患難和嚴峻考驗，更經歷了主奇妙的帶領和豐盛的恩典。

丈夫被逮走以後，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屬，人人都怕受牽連，主內弟兄姊妹也回避我，不敢和我來往。我帶著六個孩子，大的17歲，小的只有6歲，和年老的婆婆一同遷到別處住。那時我沒有工作，生活沒有來源，家裏的糧食如基立溪的水一樣，過了些日子就幹了。有一天晚上，米麵都沒有了，婆婆準備第二天去女兒家躲避饑荒，我呢，就默默禱告說：“主啊！明天早晨我們一點吃的也沒有了，你若賜給我們，我們就吃，不然就只喝暖水瓶裏的熱水吧！”我剛一出口，主的話就立刻臨到：“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天父尚且養活它，何況你們是神的兒女呢！”聽了主的話，我心中得到意外的平安，并有說不出的喜樂，安然入睡了。

次日早晨，差五分鐘六點，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一位我不認識的老太太。她問我和我丈夫的名字，我說“正是”。她說：“我找得好苦啊。這幾天聖靈催促我到你家，去到你原住處才知道你們搬家了。”說著，她給我一個鼓鼓的信封。我問她貴姓，她回說：“不告訴你，這是聖靈叫我做的，感謝神就行了。”

她走後，我打開信封一看，是五十元錢。我的眼淚立刻流了出來：主啊！感謝你。你知道我的難處，你背負我的重擔，你不誤事。在那時候，五十元錢是一筆大數目。婆婆不用上女兒家去了，我買了玉米麵、煤球等生活用品，足夠維持一段時間的了。我親身體驗到主實在是又真又活的主。

苦難使我與主越來越親密了。人雖遠離我，主却親近我。每次禱告，都覺得是與主面對面交通。我把需要對主說，主為我成就的超過我所求所想。後來我有了一份工作，每天賺八角錢，可就是出滿勤，一個月不過二十四元。一家八口，除去吃飯穿衣，還要供應孩子們學習，這點錢怎麼够用呢？但是奇妙的主用各種奇妙的方法使我一無所缺。多少次，在我柴米將盡的時候，主供應了我。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我不能一一細說，在這裏只提幾件事。

小四念高中，後來轉為技校，需要一支十六元四角的計算尺。這件東西孩子念書不可缺少，可是我每天才掙八角錢，一家人吃飯尚且不夠，哪能買得起這麼貴的東西！我就禱告仰望主。等下班回家，奇妙的事發生了，家門上有個信封，打開一看是二十元錢。天氣轉冷了，小六沒有棉鞋，我又為這事禱告，下班回來又看見門上有信，其中有十五元。

主愛何等奇妙！主恩何等豐富！在我急需的時候，感動不知姓名的肢體，補足我的缺

乏。這些弟兄姊妹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用代號寄錢給我。我接到了錢按原地址回信道謝，結果信都加上“無此人”的字樣退了回來。這是主叫他們做的，使我不感謝任何人，不仰望任何人，只感謝仰望獨行奇事的主。

在我丈夫即將釋放的數月前，有個女孩子拿著包袱來到我家，問明我的姓名就說“我媽叫我把這包東西給你，大包是寄給你先生的，中包給需要的人，小包是為你生活預備的。”我問她叫什麼名字，她回答說“我媽不讓我告訴你。”在我認識的人中，張、趙兩家有這麼大的女孩，就問她“你姓張？”“不是。”“姓趙？”回答也不是。她轉身就跑，我追不上她，就回來了。打開包袱一看，大包是二十袋奶粉，中包是二十本聖經，小包有二十元錢。當時，正在我家幹活的木匠親眼看見這事，也聽見了我跟女孩子的對話，深受感動地說“我活了三十多歲，從來沒有看見過象你們信耶穌的人這麼真誠友好，送了這麼多東西竟不留姓名。我信耶穌行嗎？”我說“行，行。”于是就傳福音給他聽，教他認罪悔改，又送給他一本聖經。???

我的工作在建黨部門，按說我這個弱女子真無法勝任。我一找到這份工作就禱告主，求主幫助。開始，領導們還是友善的，我只幹了三天重活，就被挑選到辦公室做財物和倉庫工作。靠著主所賜的智慧和力量，我樣樣幹得好，領導和群眾都滿意。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開始，滿屋滿牆的大字報寫著“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屬，不能在辦公室擔任主要工作，應當下放她到第一綫勞動改造。”我就迫切禱告，緊緊靠主，求主加給我力量，應付突如其來的變化。過了不幾日，政工組找我談話了“辦公室不需要這麼多人，要你下去充實第一綫，你願意嗎？”

我說“願意。領導分派我幹什麼都樂意。”工地是流動的，一個地方幹十天半月或兩個月，就要轉移到別處去幹。我先是用小車推磚，自裝自卸有定額。每趟推一百五十塊，每塊五斤重就是七百五十斤，十五分鐘推一趟。這是我有生以來沒有幹過的。繼而篩沙子，也有定額。遇上濕沙子就困難了，篩不下去，身上光出汗，手裏不出活。又推石子，這種活更難，我的汗水淌下來就象洗淋浴一般，圍脖子的毛巾用手一擰就出水。感謝加給我力量的主，使我不但能勝任，而且在各項工作上都超額完成任務。最艱難的一次是在嚴冬臘月，修建游泳池的圍牆。我們需在冰上作業，勾抹牆縫，定額是十米。那些不信主的人凍得直哭，有的人腳凍得站立不住，坐在冰上流眼淚，無法完成任務。有的勾抹八米，有的七米，但是我有主，靠著禱告，雖然寒冷却能忍受得住，不但完成任務而且超額，竟勾抹十三米。我真正體會到“主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

這種壓力不只限于肉體，而是身、心、靈一起絞榨的痛苦。單位上的人既知道了我是反革命家屬，就冷眼看我，甚至白眼向我。素常和我交好的人也都遠離我，甚至走個面對面，竟以脊背朝著我，正如聖經所說“他們不拿我當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許多活動不准我參加，會議不許我發言，連我勞動得來的獎品也不發給我。有一次，全組被評為區先進單位并發了獎。領獎之日，全組十九人排著隊上臺領獎，及至發到我跟前却越而不發。人總是人，我頓時覺得臉上發熱，心中便禱告“主啊！賜我力量，世上名利我都不需要，只要我的名字記在你那裏就够了。”

不但我的權利被剝奪，就連孩子們也受連累。小三畢業分配在城裏，他的同學都從居委會得到通知，去各自的單位報到，惟獨我家小三沒有接到通知。我帶孩子到學校查問，答案是“他父親是反革命，不能留城。”結果被分配去西北。

除了我和孩子們受的一般壓力之外，我個人又承受了更重的壓力。我遭圍攻半年多，叫我批判信仰。十九個人的小組，揚言不把我扳過來誓不罷休。每次圍攻，他們都是氣勢汹汹地嗤笑我，向我撇嘴搖頭說“你這老迷信，坐在反動板凳上跟無產階級對抗。”又問我

“你信耶穌有什麼好處？天上能給你掉餡餅嗎？”他們軟硬兼施：“你若不信耶穌，我們吸收你入黨。”我回答說“信耶穌是我心裏的需要，並不與工作矛盾，反而使我工作做得更好。”他們一聽，火氣就冒上來了，一齊起來朝著我嚷，真如同許多公牛圍繞我，好象吼叫的獅子向我張口。我就閉眼禱告，再也不開口講話。

他們一計不成再生一計，強迫我與丈夫離婚，天天輪班來逼我，要我表明與反革命劃清界綫。我始終不說話，只以搖頭作答。後來他們說“信仰是你心裏的事，離婚不離婚是你自己決定，可是你親手所做的是無法推脫的。根據群眾揭發檢舉，我們掌握了你貪污的確實材料，你要明白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要老老實實徹底交代，爭取人民寬大處理。”這下子可把我蒙住了，我沒有貪污過一分錢啊！當我的心一靠近主就清醒了，《聖經》說“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他所賜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剛強的靈。”主給了我力量，我就理直氣壯地說“我沒有貪污過。”

他們就拍桌子、瞪眼睛、跺著腳氣急敗壞地說“你每個月掙這麼點工資養活八口人，若不貪污，從哪里來的錢？”我仍舊低頭閉眼不作答。他們又說“你是死魚不張嘴，休想蒙混過關”，“你臉皮真厚，不交代問題却閉眼睡覺”。感謝主，他賜我意外的平安，任憑他們爭鬧吼叫，謀算虛妄的事，一齊起來攻擊我，我的心却緊貼在主懷裏，蒙主保守。他們如此折磨我半年多，並沒有從我身上找著什麼把柄，就以“問題沒有完，先挂起來搞別人”作臺階下了台。

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裏，我沒有看見過一張笑臉，都是橫眉豎眼地看我。忽然有一天，一個比我年輕的領導喜眉笑臉地叫我說“你沒有問題了，還要繼續革命，檢舉揭發別人啊！”我說“我自己沒有貪污我知道，別人有沒有貪污他自己知道，我不能胡猜亂說。”

運動過去之後，頂頭上司要我複職，對我說“我們經過屢次多方的內查外調，正如你自己所說，你確實沒有問題。組織上決定仍叫你管理原來的事務。”我說“還是請別人吧，我不管經濟的事了。”他說“運動中的事件你不必記念，你看，某某真的貪污了，某某被下放了，我們請你複職是相信你的。”我滿心贊美，滿口歡呼稱頌我們永活的主，公義的神，他為我伸冤辨屈。

丈夫被判無期徒刑時，我才三十多歲。單位上有人為我介紹對象，說“他既不能回來，你還背著個反革命家屬的包袱幹什麼！”還有不少男人想方設法對我套近乎，表示好感，甚至來到我家。他們所用的方法無非是撒但引誘夏娃用過的伎倆，就是眼目的情欲、肉體的情欲并名利地位。有的送給貴重的衣料、華麗的頭巾，有的送錢，還有人替我寫好離婚證，應許我用一間小破房換一單元樓，并說和他結婚，我掙的工資全歸我養育孩子，等等。弟兄姊妹們！這種考驗是嚴峻的，撒但的手段是惡毒的。一個帶著六個孩子的反革命的妻子，孩子雖有父親却如孤兒，妻子雖有丈夫却象寡婦，孤苦伶仃被人踏在腳下任意蹂躪，充滿了苦難。只要在引誘下一點頭，離婚書上一簽字，馬上就能改變地位，抬高身價，不但能摘去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又能滿足肉體的欲望。但是愛我的主却不允許我那麼做，他的靈在我心中加給我力量，使我不背叛與亞當的約。因為我們結婚的時候，已經在主面前立了約，許了願“無論是福是苦，我都跟從他到底。”對於這些試探誘惑，靠著主我都一一拒絕、一一得勝了。

有一天晚上，我給孩子縫補完衣服，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剛躺下睡覺就有人來敲門，又喊我的名字，聲音像是辦公室裏的一個姓王的男人。這麼晚來叫門，絕沒有正經事。我默默禱告主，不理睬他。他連敲帶叫約三十分鐘之久，終因我不應聲而作罷。第二天在辦公室裏，他一直看著我却不說話，我也裝著沒那麼回事。不久，他病了，打發一個工人來找我替他統計賬目，我又拒絕。以後這人死了。

1979年我退休了，回顧過來的歲月，我深深經歷了主與我同在。“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許多像我這樣遭遇的人，由于心中沒有主，連驚帶怕，加上冤屈艱難，有的成了瘋子，迄今仍住瘋人院，有的病癱在床，還有的自殺。至于我，“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神在他聖所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伸冤者，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

我丈夫被捕的時候，最小的孩子才 6 歲，到他 1979 年回來時，我們的六個孩子都已結婚了，并且各自有了孩子。現在老少三代二十四口，孩子們也因著主的恩典，工作學習都很好。曾有四家公司用高薪聘我，甚至找居委會主任動員我再出來工作，我都拒絕了。我要將餘年完全獻給主，為主而活。我既蒙主這麼大的恩，受弟兄姊妹那麼多的愛，怎能不趁有生之年事奉主，傳揚主的大救恩呢！

補白：老師蔣某，為人坦蕩，記憶超強，知天文，曉地理，熱心公益。文革前，帶領學生在校園勞動，把南瓜田裏蓖麻拔去數株。當時誰也沒在意，只有一剛參加工作的青年教師年某默記在心。文革中，蔣某曾去信南斯拉夫駐華大使館索要郵票，被定為裏通外國，打入牛鬼蛇神隊伍。開批判會時，已是某公社文教助理的年某慷慨激昂，說蔣妄圖毀我長城，破壞人民軍隊。罪名何來？衆人不解。年某闡述得有理有據，演繹得天衣無縫。蓖麻可以榨油，蓖麻油是飛機上用的潤滑油，拔去了蓖麻，就沒有了蓖麻籽，沒有了蓖麻子，就沒有了蓖麻油，我們空軍的飛機就飛不上天或在中途停機，這不是妄圖毀我長城又是什麼？衆皆愕然。

海 安

胡錦濤請客 佚 名

50 元，兩桌酒席，江蘇泰縣飯店，1978 年，這算得上是很大的排場了。這是當年在青海任副處級幹部的胡錦濤，返回故鄉安葬父親時，特意擺下的宴席，希望該縣領導高抬貴手，為亡父平反。胡錦濤的父親胡靜之，祖籍安徽績溪。清朝末年，祖上遷到江蘇泰縣上壩，以賣茶葉為生。胡靜之繼承祖業。胡錦濤的母親李文瑞，泰縣白米鎮胡家店村人。公私合營時，胡記茶葉店難逃厄運，胡靜之本人成為泰縣供銷社的一名職工。文革中，胡得罪了當地的造反派，被扣上貪污盜竊、壞分子的罪名，慘遭迫害，先後被批鬥關押，身體垮了下來。文革結束後，年僅 50 多歲的胡靜之，含恨離世。聽到父親去世的噩耗，胡錦濤從幾千裏外的青海趕回故鄉泰縣奔喪。他們父子情深。錦濤 7 歲喪母，父親一直沒有再娶，而將 3 個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處撫養成人。父親下葬前，胡錦濤找到當時泰縣縣長陸某及供銷社領導，請求為亡父平反。當時有人勸胡在當時泰縣最高檔的泰縣飯店擺兩桌酒，請請縣裏的領導。

然而，宴席從中午擺到下午 3 點，都沒有一個領導露面。3 點多之後，才有一名縣委辦公室的主任來，說縣裏和供銷社的領導今天一直在開會，只能派他一人前來，算是跟胡錦濤打個招呼。胡和親友坐在飯桌旁，面對兩大桌酒席，無可奈何。最後，胡將該飯店所有人員，包括廚房師傅、跑堂的、洗碗的，叫到一起，請他們幫忙，把這兩桌高檔酒菜消費掉。父親新喪，遭此冷遇，人非草木，情何以堪！故鄉泰州從此成為胡錦濤的傷心地。至今三十多年，他再也沒有踏過泰州的土地。胡錦濤本生于泰州，但他今天甚至不認泰州是自己的故鄉。政治因素導致的世態炎涼，令人不堪回首。

編者曰：這是網上一篇佚名文章，姑且就此空議幾句。如果怕回鄉擾民，三十多年不回鄉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出于對鄉人的記恨，則大可不必。耶穌說，這個世界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如果你連自己的鄉人都不饒恕，如何可望藏人饒恕當年頭戴鋼盔提兵上街（拉薩街頭）的你？耶穌還說，要饒恕弟兄七十個七次。若無饒恕，誰能走出恩怨輪回？若不走

恩怨輪回，誰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故鄉是一個客觀現實，不是一個憑個人意志或負氣可以改變的東西。中國官媒每年報道諾貝爾獎，介紹和平獎時總要漏掉達賴喇嘛，介紹文學獎時必定回避高行健，想來與胡不認泰州故鄉屬於同一性質。世態炎涼是極權的伴生物，只有埋葬這個制度，才可能結束世態炎涼。過去我每次回老家，鄉親就到我家閑聊。可自從因討伐中宣部惹事之後，鄉人知道我“倒黴”了，我再回家，幾乎不再有鄉親登門。胡現在無論走到哪里都“炎”得燙手，可是只要不趁著一朝權在手去結束這個醜陋的制度，你或你的後人遲早必有再嘗那份徹骨之“涼”之日。莫恨鄉人，但恨制度。“君王的心在神的手裏如壟溝裏的水隨意流轉。”願上帝感動胡主席！

一、本刊為半月刊，免費贈閱，歡迎來稿。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mailto:xyc1971@gmail.com)。

三、本刊聯絡手機：13240468075。

編者 四、願意捐贈資助“憶舊”半月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提示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北大燕北園  
305 甲樓 110 號陳星宇收，郵編 100091。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工商銀行馬連窪支行，  
賬號 0200251101028450741，戶名陳星宇。

七、我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這項事功，  
或有不到之處，敬請朋友指正。

你是籬上一根條 焦國標

編了三期《黑五類憶舊》，過目的稿子有二百篇。相當比例的故事是運動一來，兒女與父親劃清界限，妻子向丈夫提出離婚。界限劃了，婚離了，而倒黴依舊。所謂文明禮儀之邦，人倫在哪里？親情在哪里？真個如聖經《傳道書》所言，“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然而基督徒袁相忱、梁惠珍夫婦一家，却是這虛空中難得一見的實在。

袁相忱是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人之一，北京家庭教會最有影響力的牧者和主的僕人。因與王明道等教會帶領人拒絕加入三自會，1958 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袁有 6 個孩子，其時最大的 17 歲，最小的 6 歲。系獄 21 年又 8 個月，1979 年底獲假釋時，已是兒孫滿堂。

父親被抓，正讀中學的長子袁福音既不相信父親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會沒有任何理由亂抓人。他含著眼淚，看遍全城批判父親的大字報。一個人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痛苦、迷惘、失望、無助。一周之後，老師告訴他，他的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起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一家八口，全憑袁相忱服侍教會獲得生活來源。父親一走，家裏生活來源斷絕，福音安慰母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

次子袁福聲 1965 年去寧夏生產建設兵團前想見父親一面。因不是接見時間，監獄（右安門北京第一監獄）領導不同意，但福聲不肯走，反復申說：“我這一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您就幫幫我。”袁相忱走進接見室時，看見兒子，很是意外。半個小時的會見中，父子手握著手交談。父親問兒子：“你現在對信仰有沒有信心？”兒子說：“有。”父親又問：“還會不會唱詩？”兒子說：“會。詩篇二十三篇我現在還記得很熟。”父子這一別，再見已是 14 年以後。

袁相忱近 22 年的牢獄人生，有 14 年是在東北度過的。因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的四子袁福樂，1973 年冬有一次到東北出差的機會。他冒著零下 30 度的嚴寒，拎著大包小包，多次輾轉，到黑龍江呼蘭革志監獄去探望已 11 年未曾見面的父親。父親被抓走時他才 11 歲。

不僅自己親生的孩子是如此順服，嫁得的女婿和娶來的兒媳也都很孝敬這個反革命岳父和公爹。1964 年，袁相忱已在獄中 6 年，大女兒袁安湖結婚了。女婿對梁惠珍說：“媽媽，我還沒見過爸爸呢！下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想去看看他。”安湖帶著丈夫到北京監獄探望父親，令父親大為安慰。在袁相忱獲釋前夕，老二福聲的媳婦甚至有一天晚上夢見公爹從監獄回來了。

袁相忱獲釋從東北乘火車到北京那天，一家人派出強大的接站陣容，計有妻子梁惠珍、次子袁福聲、長女袁安湖夫婦。晚上 10 點的火車，8 點他們就去守候了，可最終竟沒接著。午夜過後，4 人還沒回家，袁相忱已照著信中的地址先于接站的摸回位於白塔寺的新家。當 4 人失望地（以為又出了什麼變故）回到家時，袁相忱正在用福聲媳婦端來的熱水洗腳呢。

當初袁相忱被捕時，梁惠珍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自己娘家人。他們很多人還不信主，她怕他們因此更加遠離神。丈夫被捕將滿一年的時候，弟弟來京出差，順道看看姐姐。姐夫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沒見回來。弟弟感覺不對。“大姐夫呢？”梁惠珍有意繞開話題，弟弟問了三次，才說：“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們擔心，才不告訴你們。你別告訴媽媽，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麼不跟我說，自己一個人在這裏受苦！”弟弟邊說邊掏出錢，

交給姐姐：“用這些錢給孩子們買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親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親外甥，我不怕受連累。姐夫不在，我照顧你們是應該的。”此後，弟弟按月都給姐姐寄錢來。每年從年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帶著孩子在娘家過年，直到 1974 年母親去世。

中國諺語雲：“籬笆不扎緊，野狗鑽得進。”籬笆是由一根根枝條編成的，在政治變成咬人

世界人權宣言金句 的野狗時，人人都應該當好自己那根枝條。然而

焦國標書 無數人在該做枝條抵禦政治野狗的時候，却如鬼  
——— 攆著似的從籬上飛逃，放棄了枝條的職責。結果，家庭和個人都門戶洞開，失去藩籬，野狗如入無人之境。更有甚者，自願化為野狗，反身撲向自己的家庭和親人。袁氏一家守住了自己作為枝條的職分，抵擋住了野狗的攻擊，一如聖保羅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那公義的冠冕必為我存留。”

## 目 錄

達夫不達·····	周 舵 (05)	我丟棄了父親的骨灰盒·····	沈雲彪 (10)
父親賀子禎·····	賀承業 (18)		
破產地主·····	鳳 子 (21)		
岳父的家世·····	駱 駝 (23)		
父親的一次粗疏·····	劉斌夫 (25)		
苦命父親·····	小 雨 (27)		
父親永遠活著·····	楊大忠 (30)		
我的倡議書·····	康國雄 (34)		
牛歌王·····	許文舟 (35)		
父親被鎮反·····	姚治邦 (39)		
這樣的右派有多少·····	曾 微 (43)		
父親亡地探訪·····	張曼青 (45)		
父親替我寫作文·····	胡 言 (48)		
父親章乃器·····	章立凡 (50)		
父親是這樣死的·····	周祖德 (53)		
我老漢兒這輩子真冤·····	曹登貴 (55)		
父親的遺著·····	邢詒心 (58)		
陪父親二勞改·····	鄂一雄 (60)		
小地主父親·····	范向東 (63)		
父親認了·····	馮積歧 (66)		
父親到死想不通·····	杰弗瑞 (70)		
離右派就差一厘米·····	廖文偉 (75)		
印花的童年·····	文利桃 (77)		
父親的眼淚·····	楊恒均 (83)		
一張平反證·····	陳 華 (85)		
父親的兩次婚姻·····	陳英賢 (96)		
父親王藥雨·····	王譽虎 (98)		



達夫不達 周 舵

我的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爲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迫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上叫做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什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則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形。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費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憑他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遽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裏想的與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卻沒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爲聰明蓋世。倒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倒興趣極濃。母親說他不象個教授，倒像個失意政客。正是因爲這個緣故，母親從小再三告誡我們遠離政治。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什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爲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却不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裏並不是總有傭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神氣，到了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極愛整潔。不過，我發現，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父親的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的費雯麗就生在那裏。費母懷孕時，醫生讓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點大雪山的靈氣，出生不久，父親的朋友顧鐵鈇見了，非說是抱錯了——抱回來一個外國娃娃。

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于是一家三口回國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父親到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也還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下多少我們玩過家家遊戲時燒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調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解釋則是因爲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但他老人家是個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幹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父親對學術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幾篇象模象樣的研究文章，後來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麼，級別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二字總挂在嘴邊，看在三個兒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奉勸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父親最後

采取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裏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

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

父親政治上的癡狂程度不亞于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還自我感覺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欲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却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却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斯大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對斯大林情有獨鍾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幹出點名堂來了——教育部大學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單。

文革大潮來了，父親一看，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的結果很快顯露出來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單位（中央民族學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裏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游街示衆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幸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干衣物之後，他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務嫌疑。父親被關進單間，監房很潮濕，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先給我打預防針，說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見他時情感要克制一點。也許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一露面，他嘴就沒閉過一分鐘，反反覆複說什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

母親對他深惡痛絕，說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絕招，先是想把父親安置在黃寺（班禪駐京辦事處），大概覺得還是不放心，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的黑山扈，那裏半山坡有民院的一個供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雖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門窗都朽爛了。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裏，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蜂窩煤爐。山風呼嘯，屋子裏冷得象地獄。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

于是我們被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裏。他們在那間大屋子里加一堵牆，隔成兩間。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于休養所與北大（母親的單位）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預支了一點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

著)，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荒山野嶺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裏，爺兒倆一住就是五年。

補白：蘭州有位女士，兩歲時父親被押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死在戈壁荒漠。母親與父親離婚改嫁。她多次打電話給我，想通過夾邊溝幸存者瞭解生父的情況，好去給父親磕個頭燒個紙。每當清明時節，家家戶戶祭掃先人墓地，她的這種思念更為強烈。在電話裏聽她聲淚俱下的訴說，我心痛欲裂。毛澤東時代的罪惡，至今仍然遺禍無數家庭。她說她的繼父雖是工人，可由于生父的關係，當年她仍然被看成狗崽子。如今夾邊溝的真相還被保密，無處可查，我無法告知這位女士她父親到底死在何方，埋在哪里，只能仰望蒼天，面對戈壁，祈求夾邊溝那些游魂野鬼：給你們的家人托個夢吧！

趙 旭

補白：我父親是黃埔軍校 17 期，因爺爺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懷著國難家仇而投筆從戎。四二年在浙江青田的對日戰役中，父親負傷。解放後，父親因參加國軍而無數次挨整，接受勞動改造，至今還是農業戶口。不過，感謝上帝賜給他一位有信仰的妻子。現在二老爹娘都年屆九十，安享晚年。真的很感謝上帝給我家的恩典。抗戰六十周年時，父親非常希望政府肯定他們這一代國民黨將士為中華民族做出的貢獻，給他們頒發一枚抗日勳章。我曾到當地民政和新聞機構聯絡此事，均無結果，甚至聯繫新華社也無下文。看到歐美國家對他們陣亡將士和老兵的供奉和體恤，我真的無語。這個國家究竟是怎麼了？

網 友

我丟棄了父親的骨灰盒 沈雲彪

父親王坪，貴州遵義人。母親沈平，浙江嘉興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輩新聞記者。父親是抗戰期間范長江培養的第一代共產黨新聞工作者，任《大公報》、《文匯報》駐上海的地下黨記者，曾與胡風有工作關係。抗戰結束後，父親響應毛澤東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基地的號召，到中共《東北日報》工作，負責工業口。著名的東北勞動模範王崇倫、孟泰等，就是經他報道走紅的。母親一直是新華社記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級待遇。幾年前，新華社紀念建社五十周年，母親的名字被列入該社五十年來的優秀女記者群。

1953 年，父親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蹲了一年監獄。不久平反，還補發了工資。父親頗念党的好，補發的工資也不要了，全交成黨費，以與党媽媽的好匹配。1957 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這次黨與他就沒有那麼纏綿悱惻了。他不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個孩子（夫妻離婚，孩子跟母親，還改了姓，現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于此），也把 41 歲的年輕生命賠了進去。

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我才十歲多，現在仍然記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靈裏，這很是不祥。1958 年，離了婚的母親從新華社東北分社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不久孩子們也隨她到了北京。獨自留在東北的父親禍不單行，害了絕症，病危時（1961 年）向他的組織請求：一、念其參加革命那麼多年，不要讓他帶著右派帽子死去，請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見家屬一面。組織把話傳到北京，母親與我商量：“你看這怎麼辦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學，學習這麼緊張，你妹妹年紀小，我又跟他離了婚，離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屬了，再說我去可能政治影響也不太好。”母親說了半天，我聽出來了，只能我去了。那

時我剛上初一，在清華附中，坐火車從北京到了東北瀋陽。父親詳細問了家裏的情況，我說我心情很壓抑很鬱悶，媽經常發脾氣，訓這個訓那個，對我的訓斥最厲害，甚至比他在家裏時的脾氣更大。父親說：“你媽一直就是這家裏的女王。”

一個月後，父親離世。父親走時我送的終，至今想起來很慚愧。父親臨終前，我對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除了個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對右派的階級仇恨。父親當時臥床，有癌腫和褥瘡，屁股底下墊了一個氣墊子。氣墊子經常被壓扁，父親讓我給他吹起來，而我覺得噁心，不願做。有時讓我幫他翻身，我也假裝聽不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父親去世後，母親去了一趟瀋陽，處理父親後事，并把骨灰盒連同個人物品帶回北京。當時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單元房裏。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間，裏面放了兩張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張，母親和兩個妹妹睡一張。我家的常住人口實際上是三口，因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親的骨灰盒就放在母親和妹妹們睡覺的大床下。

父親是5月1號去世的。大約是6、7月的時候，有一天母親找我說，父親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裏睡不著覺，你看怎麼辦？我說這事好辦，扔了不就行了嘛。當時我說得乾脆利落，連想都沒想。母親說這合適嗎？我說那有什麼不合適的？一個反革命的骨灰！這事你就別管了，交給我處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著骨灰盒，外面一塊白布包著，拿一把小鏟子，來到了玉淵潭。我家住在離玉淵潭不遠的皇亭子新華社宿舍。那時玉淵潭還屬於荒郊野外，沒什麼人影。可那天很怪，總不時有人路過。可能是做賊心虛，我怕別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所以越怕見人越嫌人多，在那裏轉悠了一圈也沒找到下手挖坑的機會。當天就沒埋成。

第二天決定換個地方。坐37路公交車（現在的337路），往北京西邊走。當時37路是京西最遠的一路車。一直坐到終點，覺得已經很荒涼了，又沿著一條油漆路繼續往裏走一陣。四處靜寂無聲，滿山都是蝸蠅叫。我窺探一圈兒，心想這下差不多了吧，然後就用小鏟子挖坑。記得是在一個臥牛石旁邊。覺得挖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把骨灰盒埋進去，就聽見遠處有卡車駛來的聲音。我很緊張，便驚慌失措地把盒子放進去，胡亂埋了。這時卡車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後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

當時我心裏隱約有一種感覺，也許有一天可能來尋父親的骨灰盒。往回走時，路過一片又是墳地又是葡萄園的地方。走到那裏，我停了下來，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一開始是小聲哭，後來越哭聲越大，反正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得那麼慘。現在想來，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親，而是傳統孝道與黨文化教育的大義滅親之間的衝突，讓只有十來歲的我無法承受。今天自己就這麼把親生父親的遺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好事，還是做了一件喪盡天良的大壞事。

父親的骨灰盒是處理掉了，可它並沒有走出我這個親手將父親骨灰盒丟棄的兒子的心。父親的骨灰盒猶如一片永遠停泊在我心頭的陰雲，又如一塊永生不死的酵母，長久地在我心中發酵。它影響著我對母親的看法和與母親的關係，也影響著我以後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比如婚姻觀和政治觀。

哥哥和妹妹們從來也沒提起過父親骨灰盒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漠然。後來我想過去尋找，但已記不清在哪里了，現在更是早就是高樓大廈了。有一次與母親談起父親，母親說，如果還有來世，她還願意做王坪的妻子。我當時在心裏罵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媽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親爭論時事。每當我發政治牢騷時，她總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親（被政治拋棄）的老路。她說右派與非右派之間其實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個念頭。母親晚年時，每次我去看望她，她會時不時挑一些話題來引蛇出洞，比如說六四不鎮壓不行之類的話。通常剛開始時我總是隱忍著，但她說到一定程度，我的腦子開始膨脹，就绷不住了，甚至會罵罵咧咧地朝母親吼：“共產黨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

到現在你還護著它！”

有時我也能對母親當初的種種做法表示理解。父親去世時，母親也就 30 多歲，還是一個少婦，對前夫的骨灰盒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何況與丈夫離婚本來就是政治強加給她的痛苦選擇，相當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護孩子的唯一辦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動氣的時候，我多半知道退讓一步，忙說：“媽，到點了，我該回去了。”然後揚長而去，戰火就這樣戛然而止。一般情況下都是這麼收場的。多年來我一直都這麼維持著與母親的關係。哥哥和妹妹們從來跟母親沒有這種衝突。我和母親之間建立的這種行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話說是“這倆人都有病！”

親手扔掉父親骨灰盒的我，此時已經把吞噬了父親生命的政治制度視為自己家庭不幸遭際和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我不願自己的母親到晚年還執迷不悟、認賊作父，我希望母親以孔子的嚮往為自己的嚮往，終生追求真理，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賢者。因而我與母親爭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老人家有個覺醒的晚年，認識到是幾十年的罪惡政治把無數中國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決心要轉變母親。母親原來與李銳並不一個交往圈子。為了改變她，我把她帶進了李老的交際圈。有一次給李銳過生日，方實（原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曾是母親的頂頭上司）在宴會上說，有些人是先知先覺，有些人是後知後覺，還有更多人不知不覺。李老就屬於先知先覺，我們屬於後知後覺。當時我母親也在場，我聽了特過癮，覺得這話就好像沖我媽說的。我母親就屬於不知不覺那一類。

我雖然時常跟母親爭執，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親說體己話的孩子。我們可以談論性方面的問題，我甚至曾幫母親出主意結交异性朋友。那時母親每次與某個叔叔或伯伯約會之後，總向我們解釋說他們的關係是純潔的。我就告訴母親，現在是兩頭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們老一輩也需要。你們都是成人，無論什麼關係，都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無須向我們解釋純潔不純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母親的性啟蒙老師。母親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還有許多追慕者。六四槍殺學生，夏衍絕食抗議，家人勸說無效，他的兒女曾找我媽去勸說他恢復進食。母親與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屬於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識。

父母離婚之後，有一段時間，母親與上海民主黨派副市長金仲華的關係已發展到談婚論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華社食堂，有人問我這是誰的孩子，另有人就說，是沈平的老二，并說沈平就要跟金仲華結婚了。此時民主人士對當初跟共產黨合作反蔣已大呼上當，可是母親在政治上實際是糊裏糊塗，看不到這一層，還要催金仲華入黨。姨媽後來說，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識分子，本來就不稀罕入黨，再加當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處於緊張狀態，二人的關係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廣東省政協主席左洪濤與母親是地下黨時期的老相識、老領導。我們稱他左伯伯。母親曾徵求過我的意見，說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時她才十幾歲，左三十來歲，至今記得當年左洪濤的鬍子扎她的感受。我說，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嫁給他唄。左洪濤和母親商量結婚，當時除了我，哥哥和妹妹們都反對。有一天晚上十一點，母親陪左洪濤到我自己的家門口敲門。他這次到北京，是參加十幾大或中顧委的什麼會，說一定要來看看我，誇我說只有我是個好孩子。

母親最終沒有辜負我拯救她的苦心。母親晚年時，我經常拿些資料給她看，我倆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接近了。母親在臨死前兩個月宣布退出共產黨。當時家裏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聲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媽今天耍口出驚人之語，她要退出共產黨。”記得當時母親還加了一句，說還沒想好是信佛還是信基督。這說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經崩潰了。

不久，母親在醫院裏正式歸主。告別母親遺體時，我到得比較晚，看見她身上已蓋上黨旗，我非常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來。母親已經宣告退黨了，蓋黨旗是對母親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于許多人在場，也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當時哥哥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兩個

妹妹，一個在國務院系統工作，一個在農業部系統工作。

離婚後雖然不乏惦記者和追求者，但母親五十年來一直未再婚。辭世前，她留下遺囑，捐獻遺體，供醫學解剖。四個兒女遵囑執行。她也沒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許這樣才與丈夫的人生結局相匹配；或者，也許這樣才對得起被自己拋棄的丈夫；或者，獨身半個世紀的她，不願身後的墓碑繼續獨身；或者，借此向兒女們表達當初與他們慈愛的父親離婚的歉意；或者，也許是早年接受的無私無我政治說教的最後一次呈現。

我雖然對母親當初提出與父親離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對一遇政治上的風吹草動就提出離婚的做法是堅決否定的。我不願意遭遇這樣的妻子、這樣的婚姻。這影響了我對配偶的要求。當初我與妻子戀愛時是女追男，當我答應接受她的愛時，她激動得宣告：“這個世界，我第一忠于黨，第二忠于你！”我不答應。我要她必須把順序顛倒過來。她遵從了這個在那時看來完全反動的膽大妄為的要求，對我發誓：第一忠于我，第二忠于黨。

我甚至與一位同樣有著父親尸骨無存經歷的女士保持過幾年的婚外戀。在大學讀書期間，有一天收到哥哥的來信，說組織上要給父親平反，問家人是否需要經濟補償。家裏說不用，只要給平反就可以了。問是否需要開追悼會，也說不用，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說，母親和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可我看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怒，一種強烈的情感衝擊著我。當時我在教室，嗚咽著，不敢放聲大哭。多年後，有一次與朋友們談起此事，我仍然無法平靜。憑什麼要平反！為什麼不要補償！為什麼不讓開追悼會！本來我活得好好的，現在告訴我那一切都搞錯了，我感覺自己就像莫泊桑《項鍊》中的女主人公，還了一輩子債，結果却發現那項鍊是假的。

我說得很激動，泪流滿面，旁邊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來。後來從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類似的經歷。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監牢，生不見人，死不見尸。母親每月只有幾十塊錢工資，含辛茹苦把四個孩子拉扯大——他們家也是四個孩子，腿都累彎了。聽著她的述說，我心中生出憐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攬在懷裏抱了起來。那些年，我們兩個同病相憐的人，每到清明，就結伴去八寶山附近的老山上，找個僻靜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親。我們假定自己的父親就在那裏。這種關係持續了幾年，因為當時彼此都有家庭，最終還是分手了。

父親雖被打成右派，可我不認為父親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種先知先覺的右派。至今記得小時候父親時常跟匣子（收音機）學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咱們工人有力量》之類歌曲的情形，情緒無比激昂。父親反右挨整，說是因為攻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我看過他的檔案，並沒有具體的攻擊言行記錄。很多右派對當時的政治鬥爭內心是比較清晰的，可是父親好像對反右鬥爭到死也不明白。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來看，好像他覺得自己還是有錯的。信中寫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緊改造，儘快回到革命隊伍，我們還要成為夫妻之類的話。

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了然。父親當年的老朋友們說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挨整。後來聽人說，幕後人物可能是他的領導、《東北日報》主編殷山。殷是從延安來的，資格最老，惟獨黨齡沒有我父親長，便借反右整他。現在想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澤東對待白區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控制使用，降級安排，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父親大約就是毛所謂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的對象。

早年的家庭經歷影響了我和我哥哥的擇偶觀。那時候，幹部家庭兩代人之間缺乏普通工人農民家裏的那種溫情。當學生時，每年春游，工人家庭的孩子帶的都是自家烙的餡餅、蔥花餅之類，幹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帶的都是麵包、汽水之類。我們似乎覺得他們的餡餅更好吃，而他們覺得我們的麵包更好吃。我們就換著吃，彼此都很開心。工人家庭的同學到我們家，往往就是到食堂買幾個菜，他們覺得香極了，而我們到他們家時，往往是他們的媽媽在蜂窩煤爐子上炒兩個菜，也覺得特別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那種家庭氣氛。孩子大人們圍在一起其樂融融的感覺，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為我母親工作特

別忙，基本就沒給我們做過飯，也沒做過什麼家務，我家的家務都落在我們四個孩子身上。做家務我們都有一套，特別是我哥哥，做飯、針綫活之類，都會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將來找什麼樣的老婆，哥哥說一定找個會做飯做家務的，老老實實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幹部子弟、大家閨秀或我媽這樣的。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願。我們哥兒倆基本如願吧，我的嫂子沒多少文化，賢妻良母型的。我妻子雖有文化，也是很老實的那種女人，我就喜歡她那個老實勁兒。

丟棄父親骨灰盒時我 10 歲多一點，今年我已經 64 歲了。年輕時就一心只當一顆螺絲釘，如今更不指望個人能成就什麼了，只希望能為結束中國的一黨專政，推進民主自由，盡一份綿薄之力。凡批毛、講述中共歷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熱心購買，收羅，閱讀，拷貝，送人，常常自己貼錢散發。解體獨裁專制實際上已成為曾被這個制度洗腦涮腸灌狼奶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和自覺的責任。

補白：文革期間，父親作為黑五類子女在劫難逃。挂牌子批鬥，光牌子就幾十斤重，再用細鐵絲系在脖子上，鐵絲勒進肉裏，罰跪、繩吊、挨打是家常便飯。後來我們問父親挨過多少次批鬥，他說太多了，記不清了。我們清楚記得，有一次父親晚上被紅衛兵叫走，第二天早上才回來。換衣服時，我們看見父親身上被打、被叮咬得體無完膚。媽媽哭了，我們小孩子也撲進媽媽懷裏哭，哭得那樣傷心。可是爸爸卻沒有哭，換上衣服，拿起農具，又去上工了。從此，只要有紅衛兵來叫爸爸，我們就心驚肉跳。只要他夜不歸來，我們就徹夜不眠地等待。爸爸呀爸爸，您無罪無錯，您是一個知書達禮，有感情、有道德的好爸爸啊！  
李朝陽

父親賀子禎 賀承業

父親賀漢祥，字子禎，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生，閬中縣崇實中學首屆畢業生，土改時被劃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後來換戶口本時，抄寫的人認為這個成分太長了，索性簡寫成工商業兼地主，并說反正都一樣，于是工商業兼地主的成分就鐵下來了。父親一生善于經商，處事中庸，清貧廉潔，和氣待人，熱心公益，好管閑事，樂于助人。早年參加過四川省公民訓練班，先後兼任縣商會副會長，國立閬中縣平民工廠廠長，閬中縣商會附設初級商業職業中學副董事長，閬中縣城廂鎮名譽副鎮長，縣參議員，縣市民圖書館副館長，縣銀行監事，國民黨員，代理商會區分部書記。1956 年公私合營後，在閬中縣糖業烟酒公司任營業員。

1953 年我考進西南師大數學系。大約 1955 年，從家信中得知，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被關押。我往家寫信，宣告與父親斷決關係，劃清界綫。關押不久，父親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營業員，一直戴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眾管制，過著另冊的生活，直到 1970 年病逝。他在副食店從無假日，難得回家。實際上也沒家，子女們都與他劃清了界限。有時抽空回來看一眼，多半是給母親帶回他省下的捨不得吃的涼麵之類，吃口冷飯就走。家裏大事小事，沒他開口的份兒。子女見他也從不理他，比路人還不如。他的三兒子結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講政治，這是咱中國人祖傳的傳統。

1967 年我們結婚時，我拿著“工商業兼地主”的戶口本，她拿著“工人”的戶口本，去組建一個二人的新家庭。這個新家庭應填寫什麼成分呢？派出所毫不遲疑寫上“工商業兼地主”。我多次寫信詢問各級公安部門直至公安部長。我的理由是：根據這種剝削階級成分優先傳承的做法，我國剝削階級必將越來越多，致使消滅剝削階級的革命任務永遠不可能完

成。這封信轉給了當地派出所，片警蒲光華把我叫去，所長馬洪青回應說：“都是這樣填寫的。在沒有新辦法出來之前，只好按老辦法辦。這已經不代表現在家庭實際成分了。”我問：“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家庭成分一欄印成‘父輩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長回答說：“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動。等中央開了四屆人大後，看看是否會有變動。”

我又問另一個問題：“那麼，我這戶口本上寫的工商業兼地主從何而來呢？”他答：“根據你老家的戶口本。”“是指我父親的戶口本嗎？”“是的。”“可我父親已經死了呀！”

“你母親還在，也就是你母親現在的戶口本。”我說：“據我所知，我母親現在的戶口本上不是這個成份。不信，請你馬上拿出來看看。”他故作驚訝地說：“是嗎，不會吧。”但又不敢當面拿出來看。老家的弟弟妹妹們知道了我追究這個問題，對我大為不滿。原來此前他們早已瞞著我，偷偷從大姐那兒弄來了當年農會開的工商業兼小土地出租的證明，找關係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復為原來的工商業兼小土地出租。這一切他們都不讓我知道，于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繼承著父親的工商業兼地主成分。那個時代，兄弟姐妹的親情就是如此醜陋。

1971 年秋，父親在店鋪裏售貨時，突發頭痛，倒在地上。那時病歷本上不僅印有語錄，還要寫明成分。父親的歷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醫生堅持革命原則，不給他治療。母親無法，只好去請來有表親關係的中醫肖忠輔。肖醫生診脈後，叫準備後事，父親就這樣死了。都說死得好，一則他本人徹底解脫了，二則也減少對家族的株連。沒有任何悼念儀式和喪葬禮儀，就連我母親也沒有哭出聲來。我和四弟到烟灑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錢，請人裝棺入殮，抬到蠶種場後面的無主公地上埋了。

父親在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親親眼看見父親在副食店抬甜麵醬時，半句話沒聽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滿麵醬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臉上帶著帶醬的指印，繼續無怨無言地抬著甜麵醬。除了外來的歧視與侮辱，更深的傷害來自親人的劃清界限。親人們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歸結于他的連累。他無言地承受了這一切。家中每一小點短暫的安適與歡樂他都刻意躲開。活到這個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後，母親把他穿過的一雙還有幾分新的布膠鞋給了我，只有我不會嫌棄。

補白：哥哥是個不甘寂寞的人，文革初就以小學生的身份混入 只有中學生才能參加的紅衛兵組織。在他的倡導下，紅衛兵總部居然成立了小學分部，并同意他自薦當部長。我因字寫得工整，雖讀小學四五年紀，也被他拉進去當上了分部的宣傳部長。我們白天上街搶傳單，黑夜回來刻蠟版、推油印機，第二天到繁華街區撒傳單。雖然上面寫的狗屁內容根本不懂，但我們好歹也算轟轟烈烈風光過。不久父親倒臺，我們都被清除出紅衛兵隊伍，一下子成了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的黑崽子。哥哥豈能甘心？在他帶領下，我和弟弟開始硬幹蠻幹，用不斷的鬥毆來維護自己的尊嚴。只要有人喊我們黑崽子并且嘴硬，兄弟便大打出手。雖然有時打不過人家，鼻青臉腫衣服稀爛地回來，或者被人家告到家中還要挨父親的打，可我們還是屢敗屢戰，愈戰愈勇。慢慢的，我們用拳頭贏得了尊重，欺負我們的人漸漸少了，過去的一些對頭也向我們示好。隨著鬥爭形勢的發展，我們又成了首批玩刀棍之類冷兵器的人，隨時帶著刀子準備打架。有一次從牆上跳下來落地時，弟弟別在腰帶上的刀子插入腹中，肚皮翻開的口子像一張紅紅的嘴。我們既不敢告訴父母，也不敢到醫療所去包紮縫針，還要堅持每天上學，最後居然也沒有感染，自然長好了，真是奇迹。就這樣，我們终于在父親被打翻在地的情況下，依靠好勇鬥狠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很長時間內，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或“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的理論，在我看來千真萬確，入心入腦。

老 文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黨員，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醫生，又是縣醫院的副院長，因而我深深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驕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縣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種單間式的，廁所公用，廚房在走廊。當時我們家住兩間房，幾個小孩和外婆住一間，父母住另外一間，並且兩間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帶幾個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間玩，在父親的抽屜裏翻找抄寫紙時，發現一張父親填寫的表格裏，“家庭出身”一欄竟赫然填著“破產地主”四字。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復翻看那張表格，心裏那個難受就別提了。旁邊有幾個小朋友，我還要佯裝鎮定，儘量不讓小朋友發現我心中的波動。我再也沒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樣。

此後幾天，我一直都有點恍惚，眼前一直晃動著“破產地主”幾個字。直到有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趁家裏只有我和媽媽兩人，悄悄地問媽媽：“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學校每次填表，我怎麼會要你填‘職工’呢！”“那爸爸還有奶奶是不是剝削了貧下中農？”“沒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國時就破產了，要不怎麼叫破產地主呢！你爸爸小時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歲就被送去當學徒，冬天連鞋都沒有穿的，他的腳上至今還有小時候凍傷時留下的疤痕哩！”“是嗎？”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萬不要對人說啊，人家問你家庭出身你就說是職工，記住啊！”家庭出身從此變成了一件比較忌諱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樣以自己的家庭為榮了！

文革後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長們在一起談起爸爸的出身時，一致認為這事很荒唐。既然破產了，怎麼還能算地主？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據說那時我奶奶在他們那個村子裏特別引人注目，在給他們家劃成分時，那些負責劃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劃成破產地主。結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響，奶奶七十多歲了還得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儘管她的兩個兒子都在城裏工作，貧下中農却不許她去城裏安享晚年，而必須呆在農村老家！

補白：我父親（黃萬里，黃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華附小的一個同學就立即給我起外號叫小右派。對於一個 10 多歲的小女孩來說，這是心靈上一個特別大的刺激。1958 年的六一，我們班要選兩個小朋友到景山公園參加全市少先隊員優秀代表會議，我被選上了。結果一個同學就說黃尚路是小右派，不應該選她去。一起哄，後來就不讓我去了。我二哥 1960 年考上大學不被錄取，對我刺激特別大。這一年大饑荒，共產黨讓這些戴著右派帽子的教授們談談心裏有什麼問題。我父親就說，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錯誤，無論受什麼懲罰，你送我去監獄或者勞改，都沒有關係，但是如果影響我的子女上大學，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時已經餓死很多人，共產黨對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管控似乎軟了一點。1961 年快高考的時候，清華統戰部就又給我二哥報了名。1961 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等到我 1965 年考大學的時候，父母認為完全沒有問題，所以就沒把我考大學的事告訴共產黨派來的那個專門做我父親的工作的人。結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錄取。 黃尚路

北京金虹先生來信：

這是沉重的歷史，也是我們經歷過的時代。我們中的那些幸運者雖未嘗狗崽子之苦，也至少目睹了一些同學朋友們是如何變成狗崽子的。記下這些往事，我希望不是仇恨入心要發芽，而是我們要反省，杜絕這樣的歷史重演。

這次國慶去女朋友的家鄉貴陽，某天晚上與未來的岳父一起看電視，老人聊起了他家的歷史。頗有意思，故記錄之。

1949 年下半年，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已經潰敗，岳父的父親（黃埔軍校出身）在湖南帶領一個團開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陽的大地主，家中有 75 公頃田地。岳父的祖父尋思，共產黨來了，很可能要遭殃，於是與哥哥（岳父的大伯）、妻弟（岳父的舅舅）、兒媳（岳父的母親）和孫子、孫女（岳父的哥哥和姐姐）收拾起金條細軟，一起去貴陽投奔岳父的父親。那時還沒有岳父，岳父是解放後出生的。

他們在貴陽約定，一旦大陸失勢，大家就分頭逃到香港聚首。岳父的大伯和舅舅順利到了香港。兩人在香港逗留數月，還在報紙上發尋人啓事，希望能找到岳父的父親一家。實在沒有反饋消息，他們就去了臺灣。實際上岳父的父親的部隊在廣西被共產黨俘虜，壓根兒就沒有逃到香港的機會。共產黨問他是願意加入解放軍，還是要回家，他說要去貴陽與家人相聚。他趕到貴陽，香港已去不成了，最後就定居貴陽。

岳父的父親有文化，進貴陽市商業局工作，任科長。三反五反時，河南老家的公安局想把岳父的祖父作為地主典型弄回去槍斃。幸虧岳父的父親當時已在貴陽市頗有關係，找到公安局的人說：“我乃帶領隊伍起義投誠的團長，怎可將我父親槍斃！”經多方走動，終於沒有被遣返，保住了他老爹的命。但岳父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家人，遭到了當地農民或村幹部的迫害或殺害。整個家族在河南已經離零，土地也收歸國有。

岳父的父親和祖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去世。岳父輩三人，皆是共產黨員。他的大姐、大哥，靠著父親的關係和自己的努力，都在機關或工廠當著不小的幹部。

七十年代末，岳父的大侄子要參軍加入特工部隊，政審時，情報部門的人對他說：“你有兩個親戚在臺灣，所以不能加入特工部隊。”聽到這個消息，全家人，尤其是岳父的母親，特別開心。

八十年代末掀起臺灣同胞探親潮，岳父的伯父與舅舅先回河南老家尋親，循著老家提供的線索又找到貴陽。40 年睽違，一開始岳父的母親都不敢相認，害怕是特務，問了很多家裏的情況後方始相信。岳父的大伯痛哭流涕，痛罵共產黨幾個小時。他留在河南老家的女兒，文革時村幹部想侮辱她，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他的兒子參加了解放軍，因為口號喊得不對，被槍斃了。此後，岳父的大伯沒再回過大陸。倒是其舅舅，每隔幾年都回來一次。

補白：父親成了黑五類，我們就成了黑崽子，所受歧視和侮辱是那個年齡難以承受的。原來整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開始回避我們，在學校也總是被同學指指點點。孩子們之間有了矛盾難免爭吵，現在不管誰對誰錯，只須人家關鍵時刻罵一聲黑崽子，我們立刻就灰溜溜地敗下陣來，以免人家罵出更難以招架的話來。

黑崽子成了握在人家手裏的“短兒”，使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覺得低人一等，根本沒有資格和人家較真兒。有時，那些革命家庭的子女專門挑釁地問：“我們鬥爭你爸，你難道不生氣嗎？”我們雖然心中充滿屈辱，但知道這是套兒，爲了不惹事，也只得按父親教的話乖乖回答：“誰讓他犯了這麼大的錯誤？鬥爭他也是應該的。”即使這樣老實，我們的處境沒有任何好轉，父親的命運沒有任何改變。每次政治運動揪鬥各類壞人時，父親都作為新形勢下的壞人首當其衝地被揪出來挨整。 老 文

開國之初，父親從中學生團幹部直接招入縣政府分管後勤，科局級。當年的縣政府非常簡陋，牆上有縫隙。父親排行老么，生性粗疏，有一次把 150 萬元的後勤發票順手塞進牆縫。不久，辦公室調換桌子的位置，牆縫被遮蔽，發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乾二淨。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父親均表現積極，深得南下的縣長們嘉許。

1953 年搞清查，父親被查出涉嫌貪污 150 多萬元。這是個天文數字，以時價計，可買 60 萬斤大米。父親那時還沒成家，一個單身漢，而且政府實行供給制，有錢也沒處花，賬目究竟錯在哪里呢？由于出身地主，根子有問題，父親被殘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後被雙開（開除團籍，開除公職），遣回羅江鄉下老家務農。至今父親臀部還有一個圓圓的紫黑色的傷疤，終生不散。

父親的父親劉定國，置有三十多畝薄田和十餘間瓦房，土改時劃為地主，被鎮壓。父親的母親成為地主婆，數九寒冬被瘋狂的人們用竹蔑繩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裏灌糞水，活活折磨致死。我從小只隱約聽說過祖父母，無緣見到他們的模樣。土改之後，父親再沒回過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沒收，分給了貧苦農民。父親被遣回原籍，根本沒有住處，只好用爛竹席打個地鋪睡在豬圈裏。正當夏天，惡蚊成群，無法入睡，父親只好摸黑割來野草點燃，烟熏滿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個月後，秋風送爽，縣裏來人通知父親回機關，恢復公職。父親喜出望外，丟掉鋤頭一路小跑，回到縣政府。原來，公務人員搬移父親用過的辦公桌，發現桌子遮擋住的牆縫裏有一卷票據，清點一遍，150 萬元。冤案真相大白，父親得以平反。父親捶胸自責：簡直太粗心大意了，你這個“冤枉人”哪！

縣長問及父親將來的工作打算，父親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書。縣長欣然同意，安排父親去試教。學生反響甚好。縣裏保送父親去省立孝泉師範學校帶職帶薪進修。畢業後，父親長期在山鄉公立小學任教，兢兢業業幾十年如一日，視農民子女為親生已出。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已是 36 歲的大齡青年，與從重慶市中區精減下放回老家的我母親結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多是在破廟改成的公辦鄉村小學校裏度過的。

補白：父親讀中專時，文革來了，學校停辦，學生返鄉。兩年後學校恢復，通知學生回校辦理手續，統一安排工作。此時父親因地主成分，正在家挨鬥，身體遭到嚴重摧殘，全身好幾個關節錯位，無法安排工作。父親的那批同學全都安排了工作。現如今，父親雖然已經平反，可是仍呆在深山農村，自食其力。 網 友

補白：文革時期，一天中午，姐姐披散著被雨打濕的頭髮，踉踉蹌蹌從學校跑了回來。一進門就沖進裏屋，反扣上門，撲在被子上放聲大哭。媽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站在門外哭喊著她。姐姐過了好大一會兒才止哭聲，哽咽著打開門。

原來，他們班上的紅五類同學把他們這些黑五類狗崽子趕到教室的牆角，勒令他們低頭，紅五類們則一邊跺腳，一邊大聲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還把墨水潑在他們狗崽子身上。唱完歌，紅五類讓滿身滿臉流著黑紅墨水的黑五類同學表態與家庭一刀兩斷。姐姐生性倔強，瞪著眼始終不說要與父親劃清界限。被激怒了的紅五類像一群發瘋的獅子，撲上來揪她的頭髮，又打又罵，發泄一陣怒氣後將她連踢帶搯轟出教室。

趙 旭

今天是父親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思念之情象潮水一樣涌來。想寫點東西，聊以寄托一個女兒的哀思，剛開了個頭，泪水就控制不住，滿面流淌。父親啊！女兒想你……

一九一二年春天，豫南邊界的一個小鎮上來了一對年輕的夫婦。男的肩挑著擔子，手牽著挺著大肚子的妻子，沿路乞討，步履艱難。即將臨產的妻子實在走不動了，他們就在鎮外一個破草棚裏住了下來。當天晚上，一個男嬰呱呱墜地，那就是我的父親。

?? 剛生下孩子的產婦，身體異常虛弱，全靠丈夫討飯活命，根本沒有奶水喂養孩子。爲了給孩子留條活命，生下第三天，就把他送給鎮上一戶沒有兒子的黃姓人家。黃家已有三個姑娘，剛生下第四胎，又是一個女兒。黃家狠心害了女嬰，抱養了我父親。不料養母不到一年又因病去世，養父家的姐姐抱著嗷嗷待哺的弟弟，每天滿鎮裏尋奶給他吃。後來，每當姑姑向我們提起往事時總是說：“你父親命可真大，硬是靠吃百家奶長大了。”

父親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寫得一手好毛筆字。二十歲那年，不顧家人反對，毅然離家，參加了國民黨部隊。那時候部隊裏識字的人不多，父親很快升爲軍需上士。抗戰爆發，父親隨部隊奉命守衛黃河大橋，這一守就是八年。解放戰爭時期，父親隨同所在部隊集體投誠解放軍，並參加了淮海戰役。一塊炮彈皮飛來，切斷了他的左手大拇指，攔腰打折了他的槍，却保住了他的命。?

全國解放後，正當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做著還家美夢的時候，最高決策層一聲令下，幾十萬解放軍戰士換上志願軍服裝，跨過鴨綠江，開到冰天雪地的朝鮮戰場。在一次敵後潛伏偵察中，父親和他的一個戰友爲了不讓敵人發現，用厚厚的積雪把身子整個埋了起來。任務完成後，他們的兩條腿和腳嚴重凍傷，不能行走，爬回營地，受到上級嘉獎，榮立三等功，並送回國內療傷。由於是重度凍傷，功能不能完全恢復，被定爲三等乙級殘廢並批准復員。

我看過父親的雙腿，那皮膚是烏青色的，上面擰結著疙疙瘩瘩的黑色動脈血管，看上去瘡痍可怖。父親說，他的腿本來是要截掉的，後來把犧牲的戰友的皮膚剝下來植上才保住。兒時對父親最深的記憶是，每到冬天，氣溫稍有下降，父親就要用火烤腿。一邊烤一邊揉，不然就痛得難受。父親很少和別人說起他的事，但我却知道父親有一個盒子，裏邊裝著各種樣式的勳章。小時候只覺得好玩，長大後才知道那都是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榮譽。

在父親的履歷表中，當初參加國民黨部隊的原因，填的是在強迫的情況下被抓去的。父親曾悄悄告訴我，其實他是自願的。然而作爲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保家衛國，赴朝作戰，父親却告訴我，他其實是很不志願的。當時全國已經解放，內地正在轟轟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父親當了 17 年的兵，吃了很多苦，參加無數次戰鬥，多次負傷，很慶幸自己沒死在戰場上。他和很多戰友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盼著早日回家與親人團聚，討媳婦，過好日子。

1953 年父親退伍返鄉後，政府安排他在商業部門工作，並享受政府的撫恤金待遇。然而好景不長，1957 年反右開始，上級要求人人向黨交心提意見。會議開了 20 多天，領導們再三鼓動，說誰提的意見多誰就是對黨負責，誰就是積極分子，而且對錯不追究。每天還張榜評比，誰提的多，名字上插紅旗；誰不提，名字上插黑旗。父親是久經磨難的人，平時沉默寡言，開會時常常悶不做聲坐在角落裏。會議的最後一天，領導點名讓他說話：“你是老革命了，你還沒提一條呢。”父親仍沒做聲。恰巧這時有人寫了一條厲害的：“刀槍劍戟一片明，一炮轟到北京城，千刀當劊\*\*\*。”領導說：“把你的名字也添上，也算你提一條意見，別讓你當了落後分子。”就因爲這一條，父親成了右派，公職被開除，市民戶口被取消，撫恤金被停發，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父親秉性耿直，說話沒遮擋。家鄉這個鄉村小鎮上流傳著父親的兩句名言。一句是“誰說國民黨不抗日？我們守衛黃河大橋八年，硬是擋著小日本過不來”。另一句是“現在的布

料算啥，我們那時發的將軍呢，洋油潑上也不沾”。文化革命中，父親這兩句話被抖落出來，又被戴上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

??? 每天下地幹活，父親總是抗著一個稻草人糊的活靶子，低著頭悶聲不響地走在前邊，高大瘦弱的身體彎得好像弓。我躲在暗地裏流淚，為有這樣的父親感到羞辱，回到家裏我也不理睬他，從未認真去體會父親內心的感受，從未盡到一個女兒對父親應有的體貼和安慰。其實父親比我們更難受啊！而今每想到這些，我的心就感到難言的刺疼。??

1979 年父親被平反了，撫恤金補發了，工作也恢復了，全家都很高興。但此時的父親已是風燭殘年，聽到消息後，滿臉刀刻一樣的皺紋僵硬著，竟沒有一絲笑容。沒過幾年，父親去世了，臨走前父親只說了一句話：“這兩頂帽子總算沒有帶到墳坑裏去。” ??

父親自從來到這個世界，苦難就伴隨著他。青年從軍，20 年戎馬生涯，出生入死。解放了，人民當家做主了，他却又當了 26 年的反革命，忍氣吞聲，受盡欺辱。他曾為人民流過血，到頭來却受到“人民”幾十年的專政。他幾乎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一輩子就這樣完了……

補白：一個走資派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製造假像，說他畏罪自殺，并在停尸處舉辦現場批鬥會，貼出“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死有餘辜”的大標語。該走資派的家人不僅不哭，他的兒子還當場走過去，狠狠踢了幾腳父親的尸體，用實際行動劃清了與父親的界限。當年這個走資派與他的兒子一樣毫無人性，曾撲到右派分子身上進行撕咬，製造了多起右派人士家破人亡的慘劇。 趙 旭

父親永遠活著 楊大忠

1923 年 10 月，父親出生在三裏鄉二龍灣村一個貧苦農民家裏，9 歲時父母雙亡。成了孤兒的父親，經外婆介紹，給一陳姓地主放牛當長工。1940 年，17 歲的父親來到何坡村楊家灣同母親結婚，當了倒插門女婿。

1941 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紀 50 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讀書。父親風雪天穿著偏耳草鞋，挑著 70 公斤木柴，走 10 公里山路，到三裏壩一斤賣 0.5 分錢，給大哥交伙食費。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賣一次柴。1957 年，正讀初三的大哥和班上 10 多位同學，因為常聚在一起談論《水滸傳》梁山好漢行俠仗義、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學校一位熱衷于階級鬥爭的書記借題發揮，定性為反革命小集團。學校派人將 16 歲的大哥遣送回家，父親抱著大哥號啕大哭。

大哥讀初中時已顯示出眾的才華，寫的詩歌被男女同學傳抄，教室牆上畫的鳳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時才被塗掉。當時像大哥這樣讀過初中的青年人如鳳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學，除了他們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其他幾乎都當上了國家幹部。大哥的滿腹詩書被階級鬥爭消磨殆盡，最大限度的發揮之處是為鄉親寫紅白喜事的對聯。

哥哥被定性為反革命，父親一夜間由給地主放牛的長工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親，合作社會計的職務被撤消，中共預備黨員的資格被取消。

1960 年，大牌小學從五年級中選出 4 名尖子學生，隨同六年級畢業生參加升學考式。2 人被錄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親一邊挖草根、剝樹皮維持生活，一邊打草鞋供二哥讀初中，常常要打完五雙草鞋，雞叫了才睡覺。

初中畢業時，二哥成績優異，被縣高中錄取。誰知，縣高中收到一封檢舉信，說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讀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審不合格為由，將二哥擋在學校大門外。父親緊緊摟抱著二哥放聲大哭，足足哭了個把鐘頭仍然傷心不已。末了，父親噙著泪水勸二哥：“別恨

你哥，這是命中注定。不能讀高中就努力自學。”

??? 泪水未幹，母親積勞成疾，患上肺結核。父親賣豬羊、拆樓板，籌錢送母親到縣醫院治病，但是最終未能留住母親。1964 年冬，母親病逝。心力憔悴的父親找鄰居何老漢借棺材安葬母親，何老漢見父親一貧如洗，擔心父親這輩子無力償還，不肯答應。大哥便找何老漢求情：“大爺，您做個好事，將棺材借給我母親安睡吧。今後認我就是。”何老漢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親後，面對著人財兩空的淒涼慘境，父親失聲痛哭。那時小妹只有一歲多，我和四弟均不滿十歲。

中年喪妻，父親已遭致命一擊，更為可怕的是災難接踵而來。1965 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蓋下的骨肉間化膿長達半年。父親先是千方百計借錢，背著二哥進五家醫院求治，後來又請醫生來家給二哥開刀，刮出毒液膿汁，天天遵照醫囑，用藥拈子從二哥瘡洞拔毒，護理 6 個多月，二哥才漸漸康復。這年 10 月，二哥腿病剛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時間便眼瞼閉緊看不見物體了。父親急得團團亂轉，找到生產隊的出納想借 10 元錢。出納員說：

“你這兩年已經欠下隊裏口糧款 280 多元，再借了錢猴年馬月還得清楚？”父親撲通一聲跪在比自己小十多歲的出納面前，汨如雨下：“我實在沒有辦法，連續轉了兩天，沒有借到一分錢。你行行好積個大恩大德，借 10 塊錢救救我小兒子眼睛，不然就會瞎！”出納員被父親感動，破例借了 10 塊錢。父親背著四弟走了 8 公里路，到三裏壩住院治療。父親早上給四弟買兩個饅頭，等醫生給四弟打針吃藥後，便跑回家吃幾個紅苕，再返回醫院護理四弟。提起這段苦難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說：“父親不下狠心治病，二哥會成癱子終身殘廢，四弟會雙目失明成為瞎子。”

??? 此後 40 年裏，許多好心人要給父親介紹續弦，父親怕娶了後妻帶不得娃兒，全都拒絕了。父親既當爹又當媽，為我們做飯洗衣，挖樹根、葛根當飯。在這種困境下，父親仍然供我們兄妹讀書，六個兒女有五個初中畢業。從小學到讀完初中，我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渾身上下的補丁如寶塔重重疊疊。有一件藍布便衣，上面有 274 個補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 1976 年才扔掉。這補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補的。

??? 家中沒棉衣穿，父親將母親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藍布襖子(從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袄子)要我穿。我說醜得很，穿到學校裏同學要笑話。父親心情沉重地說：“只要穿著身上暖和，管它醜不醜。實在是沒有辦法。等有錢了保證給你們縫新棉衣。”隆冬嚴寒，冰天雪地，父親要我們給腳上裹幾片棕穿進草鞋裏上學。冷風肆虐，全身打寒戰，腳後跟長滿凍瘡，裂開的皸口裏能放進一支鉛筆杆，一走路生血惡流。父親看著心疼，得到幾塊狗皮，自己捨不得用，讓我和四弟綁在草鞋後跟上抵擋冷風。

我在班上最窮，但學習成績一直拔尖，從小學三年級當班長，一直到初中畢業，被稱為老班長。可是，老班長仍然沒有逃脫株連的厄運。畢業時，我的語文老師找到大隊管學領導，請求網開一面，推薦我讀高中，但管學領導不採納。班上 21 名學生，有 16 人被推薦上了高中。通知書發到村裏，一名紅得發紫的貧下中農實話實說：“楊老漢想供兒子讀高中，四個兒子又個個都能讀，政府却不准他們讀；我兒子不想讀，政府却硬要發通知書要他讀。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親聽了這話，慚得兩天沒出工，傷心得號啕大哭。

文革時期，階級鬥爭更加殘酷，父親仍然昂揚著頑強的頭顱，繼續供四弟和小妹讀書。成績優秀的四弟初中畢業後，大隊領導不推薦他讀高中，要他幹生產隊長，後來參軍體檢合格，又被大隊領導以無人幹生產隊長為由，擋在軍營門外。

父親曾經雄心勃勃地捨命供四男二女讀書。他不止一次地對兒女們說：“你們晚上只管點燈看書，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錢。我賣蘿蔔、賣草鞋也要供你們燈油看書。看書是好事，書能化愚啊！只要你們有本事，讀到大學我供到大學。我小時候想讀書都沒人供啊！”如今父親先後有 14 個子孫成為國家幹部，看到孩子們個個幹出了不錯的成績，心裏甜滋滋的。年過古稀，父親歷經磨難的身體開始衰弱。1997 年 10 月，74 歲的父親眼睛患了

白內障，看不清物體。我和二哥籌款將父親送到恩施州醫院住院 20 天，做手術給父親換上晶體，使父親重見光明。

??? 1999 年二月初一，父親不慎從 6 米高的三樓摔下來，右手臂和後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烏紫黑一大片，心腹內遭受到劇烈震蕩，嘔吐不已，一會兒便昏迷失去知覺。我們兄弟姐妹硬是擰成一股鋼索鐵繩，請好醫生精心治療，買雲南白藥、藍田三七和許多貴重藥品勸父親吃。用火熱真情，創造了反哺報恩的孝道奇迹，將 75 歲高齡父親從死神手中搶奪回來，促使父親康復後又延續了 54 個月的快樂生命。2003 年秋天，父親一病不起，終於春蠶絲盡、蠟燭淚幹，帶著他對人世間的無限眷戀和子孫們的無盡牽挂，告別人世。父親走了，但他永遠活著！

補白：父親丁守和，50 年代初調到中央編譯局。文革前父親寫有《從五四啓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傳播》一書，康生說是利用研究歷史搞反黨。父親被批鬥關押，送河南五七幹校勞動。我從東北兵團回京探親，想去河南看望父親，被拒絕。給父親捎點東西，悄悄藏一點瓜子也被掏出來。他給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檢。我家六個子女的單位或學校都被告知我們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畢業不能上高中、技校、中專，不能參軍，不能當工人，只能下鄉。小弟弟上小學，動不動就被老師推出教室。母親去找老師理論，老師說我父親是反革命，他的孩子當然可以被隨意推出教室。 丁燕娣

## 我的倡議書 康國雄

我的父親康心如是原美豐銀行的總經理。抗戰時期，重慶成立臨時參議會，蔣介石欽定他為陪都參議會議長。連任兩屆共八年。1949 年他留在大陸。1950 年 4 月美豐銀行被迫停業。1956 年美豐銀行投資的 90 多家單位全部公私合營。1957 年父親被劃為右派。

中國的民族資本家起始于清末，從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起家、發展直到滅亡，民族資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淚的一生，為中華民族做出偉大貢獻的一生。可是 1949 年以後，他們却逐漸被變成一個敵對階級。五十年代，大陸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謂的“贖買政策”，把自己的企業變成了公私合營企業。當時全國所有的私有資產被假定為共 22 億人民幣，國家每年按 5% 付給他們“定息”，就這樣他們把自己的產業交給了政府。據說 22 億這個數字還不到全國實際資產的十分之一。這個“定息”他們僅領了十年（從 1956 年到 1966 年）就被政府廢止了。也就是說，他們僅領了這 22 億的一半。

當年的資本家，現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後，他們在低人一等的狀態中度過了自己的後半生或餘生。我們這些子孫也在低人一等中度過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們父輩對人民做出的貢獻，如今淹沒無聞，這是很不公平的。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出臺了，承認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議我們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後代，應該弘揚父輩或祖輩為這個民族發展所做的貢獻，還歷史一個公道，也應該為歷史遺留的一些問題討回一個公道。現在我們雖然也老了，但我們仍然有義務讓父輩、祖輩的事跡流芳千古！讓他們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張！

父親是村裏一個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後面唱牛歌。父親十三歲差六個月就學犁田種地了。那時候，爺爺病多，小小年紀的父親看到別家種下的種子已經發芽，而自己家還沒有把種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沒用，父親把念了三課的國文課本交給老先生，回家學做起農活兒。

我家的兩頭大黃牛力大無比，村子裏最強悍的男人也拿它們沒有辦法。第一次下田，兩頭不聽話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會兒鑽進別人的玉米林，一會兒在樹叢中撒野。十三歲的父親肩上扛著三十多公斤的犁，手裏還牽著比他小五歲的妹妹，又要追趕牛，又要照顧妹妹，難為得要死。上犁時，牛不攏扛，村裏的人都來圍，還是圍不過那兩頭牛。有人建議父親狠狠抽打它們，用牛鞭迫使它們就範。可是越打越強，根本無法讓他們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沒有犁成地，父親累成個泥人。晚上喂牛時，父親發現兩頭牛的身上傷痕累累，心軟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劃傷的腳，又摸摸牛身上的傷痕，摸著摸著竟哭了。

正在嚼著稻草的牛把頭偏過來，看看蹲在他們身後大顆大顆掉淚的父親，稻草也不嚼了，瞳孔裏溢出細細的泪水。第二天，兩頭讓村子裏的壯漢們都傷透腦筋的牛，好像改變了。父親叫它們上扛，它們就乖乖上扛。拉起犁來，不僅捨得出力，而且還順著犁溝走。父親高興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穩了。一天下來，別人犁出三分地，父親却能犁出半畝。

父親把強牛教得服服貼貼的消息傳開了，父親會唱牛歌而且唱得牛與人都流眼淚的消息也傳開了。父親的牛歌其實都是一個調，裏面填充的唱詞卻千變萬化。他唱牛的辛苦，唱農事的艱辛，唱家裏揭不開鍋的苦日子，唱地裏的莊稼與山上的愛情。父親的歌不僅教乖了一頭頭強牛，還把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貧窮的小屋。父親的牛歌的動人之處，在於他能將日常生活瑣事通過牛歌反映出來。爺爺唱過地方戲，也許父親遺傳了爺爺的天份吧。父親吃苦蕎，吃野菜，喉嚨磁性十足，隨便一哼就是歌。

無詞的小曲連接著牛和父親，他們相互依存，生活在瀾滄江邊那個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幾年，唱牛歌也得讓生產隊長審定內容，否則可能成為反革命。有一次，生產隊讓父親到山上看苦蕎。到了山上，喉嚨癢癢的，父親想，反正只自己一個人，就隨便唱了兩首。不料有人聽到了，報告給生產隊長。這下慘了！隊幹部上綫上崗，說父親唱黃色歌曲破壞生產，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裏，父親沉默著，不讓在喉嚨裏發癢的牛歌出口。只是夜裏家人睡下時，他才在火塘邊哼哼，聲音極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縫補的母親能聽見。

有一天，住村工作隊長不知從哪里得知我父親牛歌唱得好，找上門來。父親急得直跺腳：“他媽的！誰到公社告我了？”父親木訥地坐在工作隊長面前，小心聽著隊長的形勢報告。父親最終聽明白了，原來工作隊長是想讓父親上省城為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獻歌。父親一下放鬆了許多，畢竟還是顧慮重重。公社派專人來修改歌詞，又在曲調上作了一些潤色加工。

臨出發前總要彩排一下，可是父親一聽到樂器響就慌手腳，一個詞兒也唱不出來。他心懷歉意地對公社領導說：“我只會自己哼哼，一有樂器吵鬧就亂了方寸，還是讓我一個人唱吧。”是啊，父親的聽眾一向是那個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園，那一生耕耘著紅土地的老牛，那與他同樣命運的父老鄉親。公社領導答應了，建議上面考慮取銷合樂這一環。起程時，村裏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為父親激動，為父親鼓勁，為我們一家人能有父親的優美歌聲而感到無比的驕傲。

父親的牛歌居然在省城獲了大獎，給他的獎品是全鋼鋤頭一把，全鋼犁頭一個。公社書記親自來到家中表示祝賀，并把公社宣傳隊的工作機會給了父親。然而父親的聽眾永遠是勞作著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勞作著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興致，找到唱歌的感覺。父親到公社後，最後還是被辭退回來了，因為他怕樂器聲，怕普通話，怕湊熱鬧的鑼鼓，一聽到這些就失聲，無法在公宣隊工作。



父親的牛歌從十三歲唱到六十三歲，從大集體唱到包產到戶，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頂反革命帽子戴在頭上，他還是沒有停止歌唱，只不過是在心裏唱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唱著牛歌心裏好自在。”

可是當父親足足唱滿五十年時，一場小小的感冒却封住了他的喉嚨。他想唱却唱不出來，連說話也說不出來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兩粒克感敏，以為就沒事了。直到感覺喉嚨好像卡著異物時，他才用盡力氣對母親說：“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媽幫我看看，我喉嚨子裏可能卡著一團東西。”母親聽懂了父親的話，叫父親張開嘴。母親驚呆：“真是的，嗓子裏有一個大瘡！”父親有條不紊地安排完農活，才進城來到我家。我沒想到會那麼嚴重，帶他到縣醫院檢查，竟是喉癌晚期！儘管沒有告訴父親病情，儘管我裝得若無其事，但透過滿溢在我臉上的憂傷，父親還是看到了自己為期不遠的人生終點。他還是按部就班買他犁地用的犁頭，砍伐用的大刀，還用嘴努力地說著自己想唱牛歌的心願。

接到母親的信，我回到家。父親表面上看還與扶犁下田時一樣精神，只是說話再也不能擠出一點點聲音。從父親艱難的嘴形裏，我知道父親不想就這麼離開與他一起勞作的耕牛，不想離開聽著他牛歌長大的兒女，不想離開他歌唱了一輩子的土地。但是現代醫術沒有回天之力，我們一家人沒能把父親拉過六十四歲的門檻。

就在父親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圍繞他的墓地位置爭論不已。人們說，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轉病情，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談死談活，還是沒能阻止父親身上癌細胞的脚步。父親聽說我們在談他的墓地問題，來到我們面前，用顫動不已的手寫了一段話：“你們都不要爭扯了，我死後你們就把我埋在我學犁田做活的村子邊，隨便一個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糧食地。只要是在我唱過牛歌的地方，我的靈魂都會找到天堂。”

補白：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下午，只見同學們紛紛往學校門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著跑出校門來到大街上。我從人群外鑽到裏面，只見一隊戴著高帽子、敲著鑼鼓、自報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過來。我往前湊了湊，忽然看見一個戴著黃邊眼鏡的牛鬼抬起頭朝我看了一眼。這一看不要緊，我驚得差點叫出聲來，他竟是我親愛的爸爸。

快初中畢業時，我隨父親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農村。到了這裏我才知道，農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們一樣不許入團、入黨、參軍、招工之外，處境竟和他們的地主富農的祖輩完全一樣，天天挨批，“磨子不轉打驢子，生產不上鬥分子”。沒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鬥爭對象。有一個地主的兒子，解放時才是個 15 歲的中學生。由於他父母解放後早早去世，村裏少了鬥爭對象，抓革命促生產時，他就頭上頂著高帽子，脖子上挂著地主分子牌子，彎著腰供貧下中農唾沫飛濺地謾罵批判。鬥爭他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竟然是他中學的一個同桌，而該同桌那時之所以能上學，還多虧那個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資助。這個地主的兒子一直打光棍，40 歲剛過的人背已駝了，眼神呆滯無光，臉上的皺紋看上去足有 60 多歲，每天低著頭幹隊裏最髒最累的活。 趙 旭

父親被鎮反 姚治邦

解放後一個月，南匯縣成立了治安委員會，並開展了剿匪肅特的鬥爭。一九四九年底，南匯縣泥城地區首先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徐月英、嚴根發。第二年八月，奉賢縣處決了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縣處決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匯縣結合土地改革，對全縣反革命分子進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縣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序幕。第二

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匯縣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惡霸、地主、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幾個月內，南匯縣共處決了反革命分子好幾百人。

周浦鎮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處決了反革命分子多達四十多人。第一個被公審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處決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處決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處決了十七人。聽說有個叫翁必先的人，臨處決前竟然高喊“蔣介石萬歲！”

鎮反的風聲越來越緊，我家熟悉的許多人被抓了起來，全縣每個集鎮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槍斃人。父親在十年前曾當過幾個月的鄉長，會不會被政府抓進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親出去避避風頭。父親說：“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政府是瞭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產黨的。再說，我有幾個年紀很小的兒子，這麼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這年春節，母親挺著大肚子忙著置辦年貨，全家過了最後一個團圓年。

農曆正月二十九，母親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親生下小弟弟後的第三天晚上，厄運降臨到我家。父親被通知去“開會”，就再也沒有回來。父親抓進去的當晚，母親知道情況不妙，爲了今後的生活，在隔壁本家處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來抄家，沒收了店裏的全部大米、一輛自行車、一台收音機及部分家產，還查封了兩間開店的房子。個別人還冒充政府人員多次來我家，把一些值錢的傢具、服裝、財產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們一家大難臨頭的日子。這一天中午，家門口發生的一件事讓我覺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處的小橋邊，放了一條長凳。兩個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緊盯著我家門口張望。我走過小橋回家時，他們指著我的背嚨裏咕嚕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我實在聯想不到父親今天將要被處決，坐在長凳上的人竟是專門負責監視我家的。

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鎮學校的大操場上召開公審大會，參加的群眾有數千名，包括父親在內的十一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執行集體槍決。據參加公審大會的熟人對我們講，父親在被槍決前竟然在刑場上聲嘶力竭地大喊三聲：“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親的慘叫聲響徹整個刑場，引起場內一片喧嘩。爲此，臨刑前的父親挨了不少槍托。

父親死後的第二天，好心的鄉親幫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搖了一條船，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大的孩子去收父親的屍體。在大操場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綁的父親背著臉倒在血泊中。人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慢慢地解散綁在他身上的繩索。父親被翻過身來，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紅了。父親臉色蠟黃，但兩個驚恐的眼睛睜開著，仿佛在向人們吶喊和傾訴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見母親流著眼淚，一面喃喃地說“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會帶大的”，一面用手指輕輕地把父親的眼皮往下抹。父親的雙眼合上了。鄰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親背上皮膚雪白，有一個槍洞。家人用布把槍洞塞住。父親腳上的鞋子是三弟幫助穿上的。

衆人讓大哥和我捧著父親的頭和腳，共同把父親的身子抬放到棺材裏，放上蓋，釘上釘子，然後將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離家三裏地的姚家墳地。挖了個坑，把棺材安放下去并蓋上土，草草安葬了，我們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裏擺起了香案，燒了一個星期的香。祖母對父親的死極度悲傷，天天晚上又哭又訴，哭訴兒子的冤枉，哭訴她的過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門口，監視全家人的一舉一動。他們聽到祖母的哭聲，就會狠敲我家的門，並惡聲狠氣地進行恐嚇。祖母聽到敲門聲，嚇得不敢哭出聲來。這一年，我十一歲。

父親死後不久，政府派人送來一張判決書，上面寫道：姚國璋，于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陳水關橋當過七個月的偽鄉長，爲敵偽政權服務，與人民爲敵，淪爲漢奸。任職期間，勾結敵偽區長郭正章、偽巡警李松文，欺壓百姓，魚肉人民。有一農民向地主交租時，因訛他少交兩升租米，爭執到鄉里，被鄉長姚國璋罰判補交六鬥大米。姚國璋還仗勢欺人，敲詐農民顧六明，後顧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幾條第幾

款，判決姚國璋死刑，執行槍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份從右到左的豎行書寫的判決書很簡單，只是十六開大小的單頁油印紙，全文不足三百字。判決書上所列出的罪錯，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爭執。母親哭著對我們說：“絕對沒有敲詐顧六明這個事。政府實在是冤枉了好人啊！老天爺呀，你太不公了！”從判決書的內容看，父親一無血債，二無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該殺”之列。這張判決書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學裏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時才上交給學校。

當時完全沒有法制觀念，槍斃人不需要確鑿的證據，也不需要上級的批准，一個縣的司法部門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決、自行處決。一時間，凡是新政權成立的地方，從南方到北方，從城市到鄉村，從內地到沿海，到處張貼著一批批政府集中殺人的布告，全社會都籠罩在新政權的紅色恐怖之中。

這場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歷時兩年多，南匯縣被政府作為反革命罪而處決的反革命分子竟然達到八百多名。四年後，政府又開展了第二次鎮反運動，南匯縣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過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發動掃蕩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全縣又搜捕了五百多名反革命分子。通過這幾次鎮反運動，凡是在國民黨政府機構做過事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關押、處決、抄家、管制、整肅。幾十年裏，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苦難。

一個曾在南匯司法部門工作的人，他的兒子是我的小朋友，後來對我說：“你父親真是冤枉的！”據說是隔壁開米店的同行惡意向政府告發了他。

補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裏的批鬥，便坐車到煙臺投奔子女。殊不知兒子正被單位調查出身，不敢收留富農父親，趕緊將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單位也在調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親，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頭兒又急又氣，不幾天就去世了。家中舉行送別儀式，某村幹部大模大樣走來說：“一個階級敵人沒了，我們要慶祝。你們不能哭，你們要笑！不准舉行任何悼念儀式！”兒女們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這是什麼世道！”也沒人制止他。 煙臺山

補白：有個富農的兒子，口齒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寫一筆好字。一個貧下中農出身的女同學愛上了他，人們都說這個姑娘真傻，老師也輪番給該女生做工作。後來那位女同學嫁給一個複轉軍人，而那位富農的兒子與一個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身穿一件破爛黑棉襖，腰裏扎著一條草繩，見了我好像氣短了半截，楞在那裏，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心想，這個社會真能磨人，短短幾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塊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趙 旭

這樣的右派有多少 曾 微

我的父親叫簡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1946年改為政治大學）學會計。不要學費是父親考這個學校的主要原因。該校為國民黨培養文職幹部，相當於中共中央黨校，名譽校長是蔣介石。進入這個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加入國民黨。

解放前父親先後在銀行、學校、偽政府工作，做過天津市偽政府會計處的科長。稱國民黨政府為“偽政府”是毛時代的規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這樣寫。我有很長時間感到不解：如果國民黨政府是偽政府，那麼中國有21年，從1928年到1949年，是沒有真政府的。解放後父親先後在西南貿易部和成都商業學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業學校任教師時被打為

右派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1962年，4年勞動教養結束，要摘帽解除勞教的時候，管教幹部却告訴他，他沒有被打成右派！我父親問究竟是怎麼回事，管教幹部說給他查一查。一查發現，他是歷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親問：“我怎麼被定成歷史反革命的？”管教幹部說：“你在舊社會幹了七八年，哪會不牽挂上一點。”父親問“牽挂上”了什麼，他們不告訴他，也不給他認定歷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麼父親的問題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原來，1956年審幹時，父親頂撞了學校領導。1957年反右，領導決定報復他，想把他打為極右，這樣就可以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于是多次召開批判會，要父親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父親看如果不把這一切莫須有的罪名都招認了，是過不去關的，于是索性心一橫，你們說什麼我都認下，于是被定為極右分子。報告打上去，還沒等上級批准，領導就急急忙忙宣布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結果，因材料實在不足以打成極右，沒被批准。可是領導不願意糾正，還是開除公職，送了勞教。4年勞教結束，檔案裏沒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領導只好找一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繼續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業學校改正他的問題時，又因沒有歷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據，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這麼荒唐！

4年勞動教養期間，父親在四川會理鉛鋅礦采礦，在內江-昆明鐵路工地修鐵路。那時正“三年自然災害”，吃不飽，別人偷食堂的紅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勞教後，他沒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親的53元工資。有時出去“打工”，幹點兒重體力勞動，收入微乎其微，後來就專門在家做飯。他一輩子從事時間最長的工作就是做飯，做了17年飯。

我們姊弟妹三個，受黨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限，不和他多說話。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們的生活、學習。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覺得自己已經連累了我們，擔心自己對兒女施加反動影響。右派家庭的天倫被破壞殆盡。母親作了21年右派家屬，獨自撫養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資養家。我們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學只能讀到初中，就業是最差的工作，當知青難以返城。

改正的時候，成都商業學校給父親補發了700元工資。他給我母親200元，給我們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們被連累的補償。我姨媽在最困難的年代每月給我們家寄5元錢，餘下的200元給了我姨媽，算是對她的感謝。1998年4月父親去世。彌留之際，我趕回重慶照顧他。他表示願意捐獻遺體，但我母親不同意，沒有捐成。去世後，他的朋友問我：“你父親有遺憾嗎？”我說沒有。父親曾經說：“我總吃了20年的安泰（不勞而獲）。”改正之後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親的情況不是孤例。與他一起勞教的一個人，4年勞教結束之後也被告知沒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話劇團有個姓王的演員，也是這種情形。上海師範大學一位老師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右派，1979年改正時發現沒有被打成右派，原單位為了名正言順地改正，就又把現打一次右派！

## 父親亡地探訪 張曼青

父親張維良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22日夜全國統一肅托時在重慶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決書上說：40年代初他曾經是重慶托派最高組織的領導人和托派中央臨時組委會組委。被捕後他先被關押在重慶歌樂山松山勞改隊，1957年被轉往重慶南岸孫家花園監獄，後一直沒有音訊。1960年母親寫信去孫家花園監獄打聽，獄方告知去西昌勞改科查詢。後經查詢，收到短短數字的答復：“查張犯維良已于58年3月22日病亡。西昌勞改科。”

父親為什麼由重慶轉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們心中一直是個疑團。但是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我們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實原因和具體情況。改革開放後，托派問題也一直是個禁區。這樣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學術界對陳獨秀有了一個較為公正和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共中央對陳獨秀的學術研究也有所鬆動，我們才有可能去弄清這個問題。

2006年10月9日，我與哥哥張曼平由重慶啓程，經成都到西昌，去瞭解父親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點多，火車到達西昌。劉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區大門口等我們。1958年劉叔叔離渝時我見過他一面，雖幾十年沒見，却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十分親切。劉叔叔四十年代與我父親在一起工作，後同因托派案于1952年12月被捕，判刑5年，在重慶服刑，1957年刑滿後在西昌勞改科所屬的一個監獄工廠就業。

第二天由劉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當時西昌勞改局的領導，他本人從小在勞改局家屬區長大)帶我們到了現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監獄管理局(過去的西昌勞改科)，找到他過去的鄰居，現任監獄管理局辦公室主任的李曉曦女士。李女士已經50多歲了，她告訴我們，那裏只有當時監獄勞改人員的簡略檔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貫、從何地轉來、轉來時間、關押地點和備注等欄目)，類似花名冊，可以試試看能否找到張維良的資料。

在檔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個名冊，按姓氏排序。從張姓關押人員中找到了父親張維良的名字，欄目所記內容與上述西昌勞改科回信所寫內容大致相同，即1958年3月22日病死。檔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1957年9月25日轉押西昌的，關押地為會理縣通安銅礦勞改隊。

通安銅礦離會理縣城100多裏，距西昌更有300多裏，交通十分不便，與雲南接壤。當地確曾有一個銅礦，至今通安還有個叫銅廠的轄區。1958年時，那裏人迹罕至，十分荒涼。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無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難逃出。檔案上記載，父親就是在通安銅礦勞改隊病逝的。

就名冊看來，凡關押在西昌各監獄的人員，不論是政治犯(反革命犯)還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見，政治犯和刑事犯關押在一起，無任何區別，一律監督勞改。父親當時年已43歲，身體不十分好，在那種惡劣氣候和勞動強度下，難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療，命喪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說，文革結束後，常有犯人家屬來查找其親屬的下落。“你們爲啥不早些來？”如果再晚一二年來，她退了休，這些檔案由誰保管就不好說了。她也並非專管這些檔案的，只是出于責任心代爲保管。我們十分感激她，也慶幸我們來得爲時未晚。我們何嘗不想早點來查找父親的檔案啊！

我們問李女士現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親的遺物或安葬地，她說通安銅礦勞改隊早已撤消，工作人員都分配到其他地方。當時對犯人死後的安葬只是挖一個坑，將屍體放進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標記，所以我們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踪跡。我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父親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來我們的尋訪也只能到此結束了。此後兩天，與劉志超叔叔交談，他介紹了不少父親早年的情況，使我們得以瞭解父親生前不爲我們兒女所知的一些事情。這次西昌之行總算沒有白來。

補白：父母大約1961年結婚。母親對自己的婚姻十分不情願，因爲父親家是富農。母親當年17歲，家庭成分是上中農，當然可以笑傲父親家了。但是這樁婚事我外婆做主，母親一點辦法沒有。母親表達反抗的方式就是好幾年不跟外婆講話，甚至有了我姐姐後，也還不搭理外婆。

蛾子

補白：父親說，有一次上語文課，老師命題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同學們的理想

五花八門，科學家、軍人、警察、工人……，應有盡有，就是沒有農民。作為富農子弟的父親，不敢寫出自己的真實理想。一旦寫出，會被批為痴心妄想，或圖謀不軌。村裏有個與父親同齡的黑五類子弟，叫某某龍，被批為妄想登基坐殿，被責令改名為某某改。父親違心地寫下作文，說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農民。老師予以表揚，說他不浮躁，不好高騖。

青島張曼平先生來信：

曼青正是我弟弟。謝謝你把他的那篇文章編入第二期。原名是《生活在托派子女的陰影下》，你儘管修改，只要基本事實是正確的。現在經過俞梅蓀兄的不斷努力，有了“右二代”的說法。實際上這個右二代是一個幾百萬、上千萬人的大群體。右派、右傾、中右加起來有300余萬。托派在冊的只有500餘人，“托二代”群體要小得多。現存的托一代幾乎要以個位數計算了。我一直在努力，找到了幾十位托二代。

父親替我寫作文 胡 言

我最不怕寫作文。然而，有一類作文却讓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懼，就是“我的家史”。其實這類題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寫作難度。但在文革荒誕的歲月，這類作文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的寫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1949年，春雷一聲震天響，來了救星共產黨，我家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這種寫作模式對於我這樣一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學生來說，顯然是不適宜的。那一次寒假作業，老師就布置了命題作文“我的家史”。假期結束後，我去學校報到，班主任老師將我拒之門外，原因是那篇作文我沒有完成。當我沮喪地回到家裏時，父親已經從我同學口中得知因沒完成作文我未能履行報到。父親以為我懶惰，要我補寫，我沒有從命。憤怒的父親順手操起一根鐵棍向我打來，我只得說我不會寫。父親問我什麼題目，我難以啟齒，因為這該死的題目將會使我和父親都陷入一種非常尷尬和恥辱的境地。

不知情的父親仍以我懶惰，繼續操起鐵棍向我打來。暴力之下，我終於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題目。父親聽後倒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並責罵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他。父親鋪開紙筆，替我捉刀寫了起來。寫完後叫我自己謄好，第二天交給老師。

看了父親寫的作文，我心裏很不滿意，因為文章中只是對家庭成員的工作和學習情況作了流水帳式的介紹，1949年前的家庭狀況則隻字不提。這顯然不符合此類命題作文“政治正確”的要求，可父親也只能這樣寫了。我違心地答應了父親，將文章謄好收進了書包。

第二天去學校的路上，我將父親替我寫好的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後，我仍被班主任拒之門外。當時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異常寒冷、孤獨。聽從教室裏傳來同學們朗朗的讀書聲，我忍不住偷偷哭了起來。

一位中年女老師目睹此景，從我的班主任那裏瞭解情況後，走過來像母親一樣地把我摟在懷裏，輕輕地對我說：“\*\*同學，你就寫雷鋒叔叔的家史吧！”她還囑咐我不要耽誤了上課，並幫我辦了交費和領新課本的手續。辦了這些手續，就意謂著報名成功，我終於如釋重負地走進了教室。至於那篇該死的作文，我最終還是沒寫。

當時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實際是那種陰暗年代的陰暗心理在作怪。他是在故意作弄學生，故意傷害一個兒童的心靈。那位女老師在那樣的年代做出那樣的舉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和正義感的。這種勇氣和正義感，正是人性光輝的閃爍。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這種人

性的光輝彌足珍貴，令人感動。直到今天，每當回想起那位女老師把我摟在懷裏的情景，我的心裏仍然感到一陣暖意。

青島張曼平先生來信

謝謝你把第三期作為父親專號并收入我們的文章。我們不過是幾千萬黑五類子弟之一。我能插空在 1962 年這唯一寬鬆的一年考上北大，在鄧小平當政的 1978 年又考回北大，成為第一屆碩士、博士，在黑五類裏已屬萬幸。你的《黑五類憶舊》辦得不錯，剛兩期就引起了較大反響。期待辦得更好！

夏威夷金俗謙先生來信：

國標兄，謝謝您寄來貴刊第一、二兩期。黑五類的遭遇，像我這種年紀的人，應該知道不少。拜讀貴刊，還是深感震憾。

父親章乃器 章立凡

我母親當時跟我父親（章乃器）已經分居了。父親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聯的副主委。這兩個組織來找我母親談話，要她揭發他。我那時在幼兒園，有一天我母親來接我，要我去參加一個會，并教我一些話，到會上去說。會上，前面有很多人講話，都是父親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發他。我父親本人沒有到場。輪到我講話，講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父親，但是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全場熱烈鼓掌，還有人跟我熱烈握手。

上小學的時候，想進少先隊，我好像比別人慢一二年才進去。那時大家都希望肩上有個一道杠、兩道杠、三道杠，當個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我進了少先隊一直就是隊員。

我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的話是絕對接受和服從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親有錯。既然他錯了，那麼大家就都可以來批判他。那時社會有一種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聽黨的話。這種東西，不管是宣傳教育，還是潛移默化，對於一個兒童來講，他是認同的。

學校開家長會，班主任老師跟我媽談家裏的情況。我媽這個人沒什麼自我保護意識，她就說了我父親是誰。從此以後，老師就對我比較注意。我那時喜歡記點日記，愛好古典文學，也作一點詩詞。後來這些東西都被翻出來了，交給老師，然後組織批判會。我不服，跟老師頂撞。後來這個老師跟我透露說：“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領導要整你。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為一個樣板——這是右派的兒子，他的思想狀況是這樣的。”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有一天，那個老師說：“你不是愛看書嘛，你把你看過的書開個書單給我。我們現在搞教學，很想研究一下學生都看過什麼書。”我呢老老實實開了一個很長的單子。過後不久就發生批判我的事。後來我很厭學，成績下降，還留級了。我那時已經知道我沒前途了，學跟不學一個樣。我父親還是希望我能上大學。我那時比他先知先覺，我知道我沒戲。我跟這套講階級路綫的教育體制格格不入。

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跟我講一些事情，對時局有很多批評，有時候說得還比較厲害。我提醒他說：“您別這麼說。咱們這兒是不是安全啊？”那時讀了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我就老認為我們家隔牆有耳，或者牆上就有耳。但是我父親却說：“我不怕。我的話到大街上也可以說。誰願意聽誰就聽。”

七千人大會前後，統戰政策有點鬆動，知識分子政策也有點鬆動。父親對 1957 年給他

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協提了兩個提案，說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實的，要求重新審查。1963 年吧，那天我上學，班上有報紙，上頭有一條消息，說全國政協常委會開會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協委員職務。那時候小學同學還不太懂事，但是他們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對了。我趕緊

英國首相布萊爾金句      焦國標書

回家。後來父親特別跟我講一句：“我不會有事的。”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是“我不會自殺的”。

記得文革抄家那天是 8 月 23 還是 24 號。一路上就覺得清華園的氣氛特別不對，已經開始有打人的了。清華二校門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領導，什麼何東昌啊，錢偉長、黃萬里這些人，都被趕到那兒搬磚頭。我覺得我們家要出事，就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父親說有人來貼大字報，你留在學校，不要回來。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帳什麼的都被撕了，鋪蓋也被搗毀了。一張大字報墨迹未乾，什麼“資產階級狗崽子滾蛋，快滾蛋！”完了，馬上就來臨了。我當時在學校講了很多對文革的看法，同學就揭發我，然後對我實行專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 13 年。我一共坐了 9 年半，1978 年底放出來。

我心裏曾經埋怨過父親，都怪你們倆當初結合，才有了我，但是我無處訴這個怨。出身不能選擇，誰讓你投胎到這兒呢。一旦你的父親被定為右派，那你就也是賤民。這個就是一種姓制度。地富反壞，它就是種姓。但是我更清楚，是這個制度使我這個無辜的右派兒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傷害。

杭州王其偉先生來信：

非常驚喜《黑五類憶舊》期刊出版。我是黑五類子女，因為父兄都曾是右派分子，父親還戴過歷史反革命帽子。我們都經歷過受盡屈辱的歲月，直到現在還有揮之不去的影響，看來這一輩子都擺脫不了這個烙印了。一言難盡啊！不知《黑五類憶舊》期刊是紙質還是電子版？如果是紙質版的，請郵寄到下列地址；如果是電子版的，請發送到下列郵箱。每期都要！不但自己看，還要給周圍的黑五類子女朋友看。今後我也會投稿的。你們做了一件大好事，黑五類子女要感謝你們，那些幸存的黑五類分子和多數已經上了天國的黑五類亡靈都要感謝你們！

父親是這樣死的      周祖德

1955 年 8 月 22 日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兵教授會派人告訴母親，父親凌晨自殺身亡。教授會協理員見到我們孤兒寡母，毫不客氣地說：“周價在肅反運動中，在‘沒有說清楚’的情況下，于今日凌晨突然自殺，屬於現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僅 15 周歲的我六神無主，去找同住一個大院的南京九中團委副書記周合群談心。他比我大三周歲。他說：“你剛剛于 6 月 22 日通過南京一中團支部審查，現在正值團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組織如實彙報，並要表明與父親劃清界限。”

8 月 23 日，我陪同母親前往鼓樓萬國殯儀館，和父親見了最後一面。8 月 24 日，父親殯出，葬南京卡子門外養回紅村公墓。過了兩天，我專程到南京一中，找到團委委員、原初三班主任張鴻愷老師，在學校中心花園，向他如實彙報了父親死亡的事，以及我與父親劃清界限的態度。



從此以後，我背上了現行反革命家屬這個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團委批准我入團。後來轉學到杭州一中，要求轉團員關係時，南京一中團委却拒絕給我轉。1958年在杭州一中讀高三時，被迫輟學，下鄉參加農業生產。1959年在海寧許村公社教書時，受到全鄉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辦求是初中當教師時，再次申請入團。儘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區團委否決。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險些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1969年杭州城裏出現現反標語，當局率先查我當天晚上在哪里。1979年在校辦農場勞動改造時，全家分居兩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資，身上無一件衣褲沒有補丁。直到1989年，我才還清我們所借的外債。

1987年4月，借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個課題經費（100元），終於在離開南京31年之後重新回到南京，到養回紅村小山坡上找到父親墳地。那裏早已沒有墓地，墳墓的位置成了人們掃祭的道路。隨後我去拜訪父親的老同學、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兵教授會同事、南京軍區退休幹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戰爭時期工兵監同事、解放後南京華東軍政大學同事、南京市當時的政協委員（黃埔同學會會員）、南京市動力專科學校退休教師黃鳳丹叔叔，才知道父親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當時，我父親事實上已經把問題“說清楚”了，教授會領導也準備要父親於8月24日去上課，值班的黨員已知道我父親無事了，就放鬆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時，後一名接班的黨員看管尚未到來，前一個已提前離開隔離審查室。此時我父親對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為問題永遠說不清了，於是乘此空當，悄悄走出隔離審查室，走向軍事學院東門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著水，直撲下去，硬是把自己悶死了。

北京趙萬力先生來信：

國標，您編輯的《黑五類憶舊》創刊號收到了，感謝您又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支持您。祝您越辦越好。

北京季曄峰弟兄來信：

焦老師主內平安！第二期收到了，謝謝你！昨晚我回來看了一些文章。其中一些數據很重要，問題是，準確性有多高？不過，我也理解。在目前情況下，能有權威性的數據也是很難的。這個工作確實很有意義。願上帝賜福并保佑你、陳姊妹以及全家！以馬內利！

我老漢兒這輩子很冤 曹登貴

我老漢兒（爸爸）這輩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寫出來，怕他當年那頂反革命帽子又戴給我。我老漢兒算是個“知名人士”，千千萬萬的人都看過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個槍殺貧下中農的形象。

其實，那根本不是事實。被槍殺的那3人是縣裏通緝的職業土匪，和劉益山是親戚。那天他們來劉益山家，還請裁縫來裁絲綢，量做衣服。附近的農民發現了他們，就跑到鄉公所報告。鄉長劉紹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個土匪都帶著槍，而且槍法很好，劉紹武不敢冒然進去，就叫我老漢兒先進去探虛實。我老漢兒穿著長衫子，把槍藏在衫子下。進去後，一個土匪看見了他，便伸手到口袋裏掏東西（後來證實是掏烟），我老漢以為對方掏槍，便馬上開槍。當場打死了兩人，一人逃出房外後，被外面的治安隊員打死。情況就是這樣。

1949年冬月我老漢兒因此事被抓了起來，後來查明那3個人的確是土匪才把他放了。

這事本來同劉文彩毫無關係，但是劉文彩同劉益山有關係。劉文彩想買劉益山的地來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換，劉益山不幹。劉文彩想軟化他，便給烟館、茶館、飯館打招呼，凡是劉益山來吃喝，不收劉益山的錢。但劉益山還是不幹。

解放後，爲了搞階級教育，把這兩件事扯到一塊兒，說打死那 3 個人是因為劉文彩要霸占劉益山家的產業。上面指示當時的鎮長安海山把我老漢兒找去，說要搞個階級鬥爭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 3 個土匪是貧下中農。之所以要打死他們，是因為劉文彩要霸占劉益山的土地。

後來，他們又要我老漢兒去充當殺人霸產故事裏的泥塑模特。我老漢兒是個貧民，他當年與劉文彩也沒有任何關係，但解放前他參加過袍哥會，因此解放後給他戴了頂反革命帽子。我老漢兒害怕，只得按他們說的辦。上面威脅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勞改！”他沒得法，只得充當“打死了貧下中農的劉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漢兒後來爲這事悔恨得很，最終他也沒有逃脫勞改的命運。

他去勞改是因為另一件事：說劉文彩莊園裏沒有水牢。1958 年，劉文彩莊園被建爲展覽館，展示地主階級的罪惡，我老漢兒也去參觀。當時參觀不要錢，後來要 5 分錢，現在當然很貴了，要 50 元。水牢故事出籠時，本地民衆議論紛紛，都說從未聽說過劉文彩家有過水牢。當年劉文彩家起火，鎮上去了好多人幫忙救火，我老漢兒也去了。火滅後大家又幫忙打掃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劉文彩請他們吃了飯才離開，所有的人都沒有看見那裏有水牢。

有人問我老漢兒：“曹二爸（晚輩喊他二爸），你當年在裏面進出過，裏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過的水牢？”我老漢兒說：“啥子水牢啲，這兒原來是劉文彩裝鴉片的貨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當時沒有抓他。後來爲了把議論水牢的事壓下去，殺雞給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漢兒拿來開刀。他們罵我老漢兒的話我記得清清楚楚：“你龜兒，我們黨做政治宣傳，搞階級鬥爭，教育下一代，你倒來胡亂說，偏要說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鴉片館。你這是造謠！”

其實，文革時有人寫過大字報，說冷月英沒坐過水牢。這個人叫萬紅雲，原來是劉文彩長兄劉文淵家的廚師。解放後，萬紅雲有一次生病，打針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後來要編劉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說手上的疤痕是當年劉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并爲這個故事專門設計製造了一條彈簧鋼鞭。萬紅雲從此就進入了劉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講組，到全國各地去做血淚控訴，成了僅次于冷月英的二號人物。

文革時兩派鬥爭，萬紅雲和冷月英各在一派。萬紅雲先寫出大字報，揭露冷月英不是劉文彩的佃戶，更沒坐過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寫出大字報，揭露萬紅雲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後打針留下的。兩個訴苦明星互相揭短，鬧得安仁鎮人人皆知。

這事讓上面非常尷尬，後來他們考慮到冷月英的影響更大更重要，于是就把萬紅雲驅逐出家史演講組，又把收租院泥塑裏萬紅雲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過，那條專爲萬紅雲訂制的彈簧鋼鞭却被留了下來，編成了另一個故事。

萬紅雲只是被逐出去演講組，我老漢兒則是被抓進監。1966 年 5 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鎮上的幹部王明軒、李銀松來抓他，罪名是造謠，因爲他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當晚就把他捆送大邑縣公安局。他在大邑關了一段時間，不久縣法院就以造謠罪判了他 15 年徒刑。

八十年代，鄧小平上臺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老漢兒去申訴，法院答復：你這個事是搞重了，當時過左。于是，法院將他改判爲 5 年。這個改判已經沒得實際意義，這時我老漢兒已經勞改 14 年多，馬上就要滿刑了。

我老漢兒出獄後，想不通，爲一句真話就勞改 15 年。他去找縣法院，縣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區法院，地區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這一輩子實在冤枉，一時想不通，就在縣法院門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藥。那是 1982 年，他 71 歲。他死前曾對我說過：“你要爲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寫出來，不敢爲他申冤，我怕他當年那頂反革命帽子又給我戴上。

長治馬純孝先生來信：

本人是一名退休老幹部，年近八旬，很想得此刊物，不知可否贈閱。我雖非黑五類，但也算賤民，曾被打成中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還不算，文革初被機關內定為反革命，吃盡政治運動的苦頭。以上函請，望能如願！

父親的遺著 邢詒心

我父親是黃埔軍校十七期，參加過抗戰救亡，後在國民政府廣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政權後返鄉當教師，五二年鎮反時被抓。在內蒙古勞改五年，大難不死。那一批北上勞改的有幾千人，只有幾個人幸存下來，父親即其中之一。出獄後回原籍鄉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監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親在鄉村可謂牛馬不如，任人辱罵毆打，幾歲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鄉村的孩子學著鬥爭會上大人的口吻，見到我父親都會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擲糞便、土塊。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每年至少被批鬥幾十次，貧下中農或工作隊幹部毆打他，民兵把他捆綁起來游村游街。有一天，小學校長要我跟同學們一起參加大隊鬥爭五類分子大會。父親被幾名荷槍實彈的民兵押上鬥爭台。大隊書記和治保主任宣讀強加于父親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厲聲問我父親認不認罪？我父親只嘆一聲“冤枉”。幾名民兵在書記、治保主任指使下冲上鬥爭台，手持木棍槍托，圍著父親一陣亂打。父親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臺上。他們將父親雙手捆綁，用麻繩吊在半空。父親在鬥爭臺上懸空慘叫，尿尿滲出褲子。革命群眾則在台下怒吼打倒父親的口號。不多久麻繩突然斷了，父親從幾米高處跌下，昏迷過去。我回家告訴母親，說父親死了。母親抱著我們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們說，父親不會丟下我們而去的。夜裏，父親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雙腿已不能走路，靠雙手爬了幾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勞動監督，對父親來說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們這些兒女慘受株連。我十二歲就失學回家務農，那時候我的感受是慘絕人寰，絕望人生。

鄧上臺後，我參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後在廣州日報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後，父親重新過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紀九十年代，父親將他三十餘年的勞改生活經歷寫成書稿，真實地將中國大陸那段傷心的歷史記錄了下來。他要我們將來有機會將書稿出版，或者送給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我認為這本書稿有如下幾點歷史價值：一是鎮反運動的罪惡記錄；二是揭露了當年內蒙古勞改營關押幾十萬國民政府工作人員的內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斑斑血淚。

國外沈風雷先生來信：

我身在國外，希望讀到你們出版的《黑五類憶舊》，但是不知你們是否有電子版的刊物？如有，是否可以贈閱？此致 Cheers。

北京張小曼女士來信：

看了黑五類的文稿，感慨良多。我的母親魏希昭 1929 年投身學生運動，1950 年被仇恨父親張西曼的壞人誣陷成特務，從此蒙冤被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機關當作特務嫌疑受盡迫害，至今已六十年。因當事人撒謊掩蓋事實真相，直至今天仍未做最後結論。

北京梅桑榆先生來信：

《黑五類憶舊》第二期收到，謝謝！看你的前言，關於餓殍的文章，不妨選出一些結成文集。楊繼繩的《墓碑》主要反映宏觀上的大饑荒，對具體的個人的經歷和感受，記述不多。

北京葉維佑女士來信：

剛收到《黑五類憶舊》的附件，很感興趣。因多年眼疾，視力有限，故望得到該刊物的免費郵寄，不勝感盼。

陪父親二勞改 鄂一雄

父親是 1949 年參加革命的，湖北省軍政幹校畢業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大軍南下，一直到海南，後來隨部隊返回河南。1954 年我 3 歲，隨母親到洛陽作隨軍家屬。在那裏，母親又生下一個妹妹，取名洛佳（洛陽安家），後又生了個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靜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習慣了吃饅頭、吃麵條、喝小米稀飯。

1956 年，部隊集體轉業。隨後，反右鬥爭開始。在我幼小的記憶中，爸爸好像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有一天，媽媽帶我們到一個農場看爸爸。他在那裏勞動，曬得好黑。1958 年，組織上動員我們家屬返鄉，我們回到湖北天門縣的一個小鎮。離開河南前，爸爸與我、媽媽、弟、妹在照像館照了一張照片，並寫著“歡送王蝦貴（媽媽的名字）同志返鄉合影”。前幾年這張照片還在，近年幾次搬家，把這個珍貴的照片弄丟了。

父親被定為右派去了勞改農場，我們老家的軍屬牌子也摘掉了，媽媽不得不從新參加工作。她每月 27 元的工資根本養不活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祖父祖母。因無錢治療，兩歲的洛兵夭折了。媽媽嚇壞了，忙將洛佳送給鄉下的姨媽，將我寄養在鄉下的外祖母家。

1961 年挖紅薯的時候，父親來到天門鄉下，要將我接到他所在的潛江沙洋二農場二十中隊。外婆聽說我要走，流淚了。這三年我與外婆是在吃樹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過來的。父親刑滿後不願回鄉，要求留下來當農工，俗稱二老改。為了不與其他農工一道睡集體宿舍，父親想出一個良策，將我帶在身邊，這樣就可以分到一間獨立的住房。

那個住房其實就是一個看瓜的棚子，有十來平方米，門口種著各種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電筒回家，因為我無數次發現各種蛇躺在路面乘涼。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頂，各種蟲子經常光顧我們的床，最讓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從上面掉下來。有一次，一隻野狗在我們門前捉了一隻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將獵物放在地上，守在旁邊欣賞。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卻猛然向我撲來，前爪抓進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當即鮮血淋漓。現在還留有傷疤，那年我 11 歲。

父親心情非常不好，脾氣很大，常常以酒澆愁，每月工資還不夠他喝酒。喝醉了就摔東西，經常無端把我打得頭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給他賺一元錢做酒錢，不然就挨打。

我那時讀小學四年級，每天凌晨 4 點鐘就起床，守在牛棚門口，等農場放牛出來。牛有個習慣，早晨一出牛棚就會拉糞。魚塘收牛糞，每斤一分錢。我每天必須完成一百斤牛糞才能賺到一元錢。一次我挨打後逃跑了，跑到一個由兩個勞改犯看管的瓜棚裏。他們收留了我，在那個窩棚裏呆了兩天。旁邊有個即將乾涸的池塘，我幫他們捉了兩腳盆泥鰱。還沒來得及吃，父親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時早上撿的牛糞不夠，就只得離農場很遠的地方去撿。一次我在離農場 3 公里的楊家灘撿了兩大簍子牛糞，由於挑不起，我將其中一簍子埋在路旁溝邊。將另一半挑回去再來時，發現竟被別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後來又撿到同樣多的牛糞，我不敢再埋了，

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 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個小時。到養漁池一過磅，連皮 107 斤。天哪，那時我才 11 歲啊！

在勞改農場的四年中，我似乎沒買過鞋。每年從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從早到晚都光著腳丫。有時被釘子、蚌殼刺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劃個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會發炎，幾天後就好了。過了十一，我就開始打草鞋。草鞋其實並不都是草編的。我平時就注意撿廢布片子，洗淨曬乾，以備編鞋。用布片子編的草鞋是逢市過節穿的，用麻編的草鞋是洗腳後穿的，平時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窩子，沒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圍著。我是跟一個勞改犯學會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長的竹竿登在腳上就行了。

那時父親常常出差，將我暫托給一家姓葉的照看。葉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歲，妹妹比我大兩歲，我與妹妹同班。我那時身體不好，常常發燒（後來當兵檢查身體時才發現肺上有一個很大的鈣化團，可能是那時得了結核病，不知不覺鈣化了），不能去上學，妹妹常將學習的內容帶回，還帶回一些找同學討要的蠶豆、大麥粉之類給我吃。

那年頭同學之間經常互相討要吃的。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們大姐當時正在與沙洋-武漢輪船上的一個船員談朋友。那個准姐夫來看大姐，總是帶一瓶化學醬油來。他們的老媽，一個越劇演員，就用醬油給我們煮飯吃。那種香甜的味道，現在回憶起來都流口水……

陝西李長生先生來信：

我叫李長生，一名退休教師，當年曾是一名受盡磨難的黑五類狗崽子。當我在網上看到《黑五類憶舊》的發刊詞後，憶舊的思緒又把我帶回到 1966 年的文革中。瘋狂、荒唐而又飽受打擊的一幕幕往事，令人渾身顫栗不已。我殷切地期望能够仔細閱讀《黑五類憶舊》的每一期。不久我也將把我的經歷寫出來，把電子稿投給貴刊。希望你們能給我贈閱每期《黑五類憶舊》電子稿！

北京丁東先生來信：

國標，你好！電子刊物收到。你的發刊詞中提到未改正的右派有章乃器，不確。章乃器原在不改正之列，在文件發出前，章立凡找到陳雲，陳雲將章乃器從不改正的名單中撤出。所以章乃器是改正右派。以上意見供參考。

小地主父親 范向東

父親小氣，吝嗇得超常。家裏有個很大的糧倉，裏面擦滿麻袋，有穀子、麥子、豆子、花生，可是難得蒸一回饅頭，每天嚼的都是難以下咽的窩窩。在飯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許的，父親會把臉拉得驢臉一樣長。他的眼睛本來很小，麻雀一樣的黑豆眼珠，可此時會睜得很大，像要撐破眼眶，眼裏透著威嚴，有一種讓人心裏哆嗦的力量。他很少開口罵人，通常是把乾瘦黝黑的手指頭在嘴裏蘸上唾沫，隔著飯桌探過身子，把米粒沾到指頭上，送到你的嘴邊。你不能反抗，那樣會招來他老拳的熱情招待。你得張開嘴，擠出一臉討好的笑，用舌頭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盡。父親縮回手，再把手指伸進自己嘴裏，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聲音很響，像吃著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親指頭上的米粒舔進口，我都強忍著，找個藉口出去嘔吐半天，連腸子都要吐出來。所以吃飯的時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點滴過錯被父親抓住。吃完飯，還要當著父親的面，把飯碗扣在臉上，用舌頭把碗舔得發亮。這時，父親就會露出難得的笑容，還可能從

口袋裏摸出幾顆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開，放在我的手心裏。我會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點一點的散開，直到滿嘴的油香。我會閉了眼，把嘴裏的舌頭轉得像飛旋的輪子。那時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親好苦，家裏幾十畝的土地，他捨不得雇長短工。從父親身上摳一分錢，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從不回家，頭上百年不變地裹一條油乎乎髒膩膩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隨便挂幾件能蔽體的短褲長衫，不是缺扣子，就是少袖子。不瞭解他的人以為他是叫花子。

母親中午要把飯送到田間地頭，父親吃飯的時候從不挪窩。見母親送飯過來，鋤頭一放，席地盤腿而坐。哪怕此時烈日高懸，他也絕不會去尋一處有蔭涼的地方。父親古銅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樣排滿他的脊梁。母親看著心疼，就蹲在父親的旁邊，用手絹不停地給他擦汗。父親一手端著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飯迅疾扒拉到嘴裏。他的嘴總塞得滿滿的，腮幫子總鼓得圓圓的，說話的時候嘴裏噤裏咕嚕，也聽不清他嘟囔些什麼。狼吞虎咽地吃完，很舒服地打個哈欠，伸伸懶腰，又忙開了他的活計。

人家背地裏都叫父親“活不成”，捨不得吃穿，就捨得出力氣。春暖的時候往地里拉灰土糞，父親怕把騾子累著，常常自己架在車轅裏，彎腰弓背累得龜孫子一樣，而讓騾子在後面悠閑踱步。

家裏一年也難得改善一次生活。飯裏偶爾放點雞蛋、豬肉什麼的，父親總指著母親的鼻子罵她敗家子。他氣急敗壞地用筷子把碗裏的飯像犁地一樣深翻好幾遍，把裏面飄著的雞蛋塊塊、豬肉渣渣都挑出來，一股腦扔進我們的碗裏，邊扔嘴裏邊嘟囔：“吃吧，吃吧，喜歡吃肉，把老子也殺了吃掉算了！”每當這時，我們就眼巴巴地盯著父親的碗，才不在乎他怎麼罵呢。

母親總在父親下地的時候偷偷給我們改善生活。有一次我們正在家裏興高彩烈地吃著熱騰騰、香噴噴的豬肉餃子，突然聽見院外有騾子的叫聲。母親也不著慌，隨手在盆裏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門口用力一撒，滿院都滾著白花花的豆子，很是顯眼。父親踏進院門，一眼就瞅見了地上的豆子。他尖著嗓子跳著腳在門口叫罵：“哎呀呀，你們這些吃裏扒外的豬仔子，再有錢也經不住你們這樣糟蹋呀，挨千刀的！”他邊罵邊彎下腰來，一粒一粒撿起來放在衣袋裏。等他撿完進屋，我們都已吃得腸肥肚圓，母親也把所有的痕迹清理完畢。父親盤腿坐在炕上，母親就給他從鍋裏拿出倆個窩頭和一棵大葱。父親一口窩頭就一口葱，笑咪咪的，吃得有滋有味。我們都看著父親偷笑，父親低下頭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沒發現有什麼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麼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時候，因為家裏地多，糧食也多，父親被劃為地主。那些游手好閑，抽大烟把褲子當了、老婆賣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貧農。他們給父親糊了一頂尖尖的紙帽，脖子上挂著一個大牌子，讓父親一邊敲著銅鑼一邊高聲喊：“我是地主，我剝削窮人，我罪該萬死！”游街回來，父親連嚇帶氣，臥床不起，沒幾天，就一命歸西。人家叫我父親“活不成”，他真的沒活成。唉，可憐的父親！可憐的小地主！

杭州王其偉先生來信：

想不到這麼快就收到了您的回信和電子版的《黑五類憶舊》第一期。我一口氣讀完了（用大半天時間），只是通讀，還準備細細精讀。完全理解書中的一切，幾乎用不著琢磨，太真實了，讀得我一遍遍地拭淚。我已經把書轉發給幾個親戚和同學，相信他們一定也會跟我一樣感動。

我希望也能得到紙質版，便于保存收藏。但考慮到你們是做義工免費贈閱，我就不便多增加你們的負擔了。如果方便的話請寄 1-3 本吧，至少 1 本。能讀到電子版已經不錯了。或者收點工本費吧。再一次向您并通過您向編輯出版團隊表示感謝和敬意！我一定會投稿的，

容我有一段準備的時間。

北京季遠新先生來信：

您好，在冷明的博客上看到您的啓示，希望能夠得到這本刊物，瞭解那個時代，謝謝您了。

雲南楊銀波先生來信：

已看到《黑五類憶舊》（民間交流性半月刊），收錄了我的《聖女王佩英》一文節選，很高興。無論是陳兄，或焦國標兄編輯該刊，我皆授權《黑五類憶舊》可任意轉載我的任何文章。

父親認了 馮積歧

那天早晨，生產隊長派父親去犁蕎麥地。蕎麥地兩邊都是深溝，溝邊長滿野草。每犁到溝邊，兩頭牛都會死命伸著頭，舌頭透過牛籠嘴，去攪溝邊的野草吃，全然不計摔到溝裏栽死的危險。一個早晨父親都提心吊膽，生怕牛滑到溝裏去。可是就在他準備收工，犁最後一個來回時，兩頭牛不知哪來的蠻力，只顧攪草，父親怎麼也拉不回它們。眼看牛的前腿一點一點向溝下滑，可它們全然不覺。父親手中攥的牛鼻繩是斷成兩截後接續到一塊兒的，拉了一個早晨，此時從接口處松脫了。兩頭牛沒了束縛，連帶著鐵犁，像箭一樣射向溝底。父親出于本能，一閃跌坐到溝邊……

飼養員老漢等著喂牲口，左等右等不回來，便到地裏來找牛，此時坐在溝邊如一灘爛泥的父親才如夢初醒。一頭牛跌下去當即就死了，另一頭雖然沒有死却跌斷了腰，站不起來，不能再耕地了。

鬥爭會上，生產隊長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頭牛重嗎？牛跌死了，還能吃肉，牛皮還能合成皮繩。你死了，狗都不吃！”上臺發言的革命群眾將蓄意破壞生產的罪名按在父親頭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實交待！”口號聲此起彼伏。父親很後悔當初在驚恐中沒有和牛一同撲下去，這樣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結束了。

那天下午，父親脖子上戴著幾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著一張剝下來的牛皮，弓著腰，被我們松陵村的革命群眾牽著去其他大隊游街。牛皮散發的腥臭味兒被他帶到了全公社的每一個生產大隊。

走到朱家莊時，父親的腰彎得更厲害了。朱家莊是我的外祖父家，披著牛皮的父親看起來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個怪物。他已無顏面對外祖父家的任何一個人。

父親像小學生背課本似的將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眾交待了一遍。他抬起頭時，眼角的餘光竟掃見了母親。母親站在不遠處的一塊石頭上，表情平靜而麻木。仿佛她目擊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臺上的一個丑角。對這個劇中人，她不同情憐憫，也不憎惡討厭。她不過是一個觀眾，一個不參與劇情，只圖熱鬧的觀眾。父親還看到母親身後站著一個男人，那男人像高粱杆一樣細，有一雙尖銳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親談什麼，母親回過頭去看那男人，一個勁兒地點頭。父親的頭使勁向上一仰，掃了母親和那男人一眼，看見那男人將細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親的肩頭。父親突然大叫兩聲，撲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親在炕上躺了兩天，祖母請來村裏的胡大夫。胡大夫捋著花白鬍子對父親說：“娃呀，心病還得心藥治啊！我給你開三服藥，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藥方去公社衛生院抓藥。三服藥總共 1 塊 4 角 6 分，祖母身上只有 1 塊 3 角錢。她求抓藥的年輕人給她欠個賬，抓藥的說：“不能欠賬，一分錢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懇求，抓藥的還是不鬆口。祖母無奈，去找院長。院長來到中藥房，將抓好的三服藥解開，把藥中的白術和茯苓分別取出兩片，然後包好藥包，給了祖母。

哥哥從學校裏回來吃午飯，飯碗端在手中還沒有下口，父親在房間裏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麼回事，就端著飯碗進了房間。父親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于吃畢午飯去學校，端著飯碗正要離開房間，父親叫住了他：“大虎，你說，你爲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沒有料到，父親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飯碗向他摔了過來，隨後自己也一下子撲倒在炕上。

兒子不想母親，是做父親的難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親的心裏，兒子的母親就是有錯誤，做兒子的也要原諒她，絕不能抱怨母親，更不能給母親記仇，這是父親對兒子最起碼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嚇住了，父親從來沒有這樣過呀。哥哥一看父親撲倒在炕上，流著眼淚一聲一聲叫爹。父親擺擺手，叫他走開。祖母聞聲進來，她不知怎麼回事，就責備父親：“世俊啊，你有病，又發啥脾氣呢？是大虎惹你生氣了？”父親抬起埋在被子裏的頭，擦了一把泪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給哥哥擺擺手，叫哥哥快去學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撲通一聲跪倒，哭著說：“爹，怪我，全怪我。”父親拉住兒子的手，用淚眼看看他，一句話也不說。父親整天流眼淚，祖母不在的時候，就放聲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裏哭。

那是一個冰涼的夜晚。天一黑，父親穿戴整齊出門。祖母問他要去哪搭，父親說他要去朱家莊。祖母說：“你身體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會回來的，時間還沒有到哩。”祖母這句話不知觸動了父親的哪一根神經，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說的時間是什麼。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還不是和時間較量嗎？父親知道，人是永遠也較量不過時間的。

“啥時候算是到時間了？”父親仿佛是自言自語。祖母說：“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時間了。”父親苦笑一聲：“時間到了，我看時間到了。”父親出了院門，祖母沒再攔他。

去朱家莊這條路，父親走過無數來回了。脚下那條灰白色的路面像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將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門前，父親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門，手舉起來，抓住了門環。他在圓圓的生了銹的門環上摸了摸，還沒有動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順著門溜下去了。父親趴在門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著母親：“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親的是無邊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莊睡死了。母親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親自殺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莊，不知給母親都說了些什麼。沒幾天，母親回來了。她見到祖母，第一句話就是：“娘，你去給他們說，不要給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說：“娥娥，不會的，不會給你戴帽子的。”母親回來後，寡言少語，神情呆滯，她不和父親爭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說什麼。她一天干三晌活兒，天一黑，就上炕睡覺。每逢晚上生產隊長打鈴開會，母親就慌張，給祖母說：“娘，你去給他們說，不要給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過去，松陵村沒有發生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母親不再驚慌了。生活是平靜的，家是平靜的，即使父親被鬥爭，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驚不詫，都習慣了，好像日子不艱難，不缺吃少穿，父親不上門爭會，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親已經“認”了——既然是地主，就應該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應該在被人欺負中生



活。家裏再也聽不見他的嘆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張臉上的表情都是一樣的，一樣的平靜，一樣的麻木。儘管饑一頓飽一頓，有一頓沒一頓，一家人照常活著，就像太陽每天照常升起一樣。

父親是地主中最年輕的地主。大隊黨支部叫他給全大隊 40 多名四類分子當頭兒，要他監督每一個四類分子的言行，及時向大隊黨支部彙報他們的一舉一動。父親平靜地接受了任務，並且盡職盡責，隔一天晚上就把這幾十個老漢、老太婆召集到一塊兒念報紙，學毛著。誰有病，誰缺席，誰發的什麼言，有什麼思想動向，他都如實向上報告。有一次學習時，地主分子史耀祖一連跑了三次廁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親也把這個情況彙報給了大隊黨支部。

鄭州錢振選先生來信：

昨天，北京的 Kang 先生告知您創辦的刊物。今天，在五柳村網站看到首發目錄和說明。希望讀這一刊物，并向焦國標先生致敬。他的發刊詞，好！

父親到死想不通 杰弗瑞

母親說我出生的時間比預產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頭老母猪，我還不一定能出來。當時我母親正在豬圈裏掃豬屎，挺著大肚子掃得很累，就撐著豬圈的石板牆想歇一歇。老母猪過來親她的腿，她提起腳趕豬，沒想到老母猪一抬頭頂了她一下。老母猪這一頂，把我頂到了臭烘烘的豬屎堆裏。母親說，老母猪從來沒這麼頂過她，是不是它有意幫你快點出來呢？

我生下來沒有多久，老母猪就死了，據說是吃了我的胎盤，吸了母親的經血。母親說，我生下來時好奇地盯著看老母猪，好像我們認識似的，看得老母猪直往後退，不敢抬頭，過幾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後來想，我是不是來到這個世界頂替這頭母猪的呢？這頭母猪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幾十年過去，我發現我原來其實就是一頭豬，或者說我是一頭披著人皮的豬，過去的生活其實跟在豬圈裏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

母親說，我生下來時，有一天時間既沒哭又沒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麼。我母親嚇哭了，對著我的屁股，打呀掐呀，我還是不哭，直到半夜父親回家，我才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哭就哭到大天亮。

我母親並沒有因為我終於活著來到人世而高興，也沒有因為我是一個兒子就高興。其實當時母親的眼裏滿噙著淚水。她用牙咬斷纏在我身上的臍帶，抓豬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後坐在豬圈裏發呆。老母猪吃完了母親清理下身的豬草，舔食了豬圈地上的烏血，拱了母親一下，母親才回過神來，抱著我回家。

我長大後問母親，為什麼要生我呢？母親很無奈地說，沒辦法呀，那時也沒實行計劃生育。母親說得非常難過，我聽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親肚子裏不出來，要是母親根本沒有懷過我，要是母親懷上我又把我打掉，總之，要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該多好，我也不會活得像一頭骯髒的豬了。

我現在不恨那頭把我頂出世的老母猪了，我也不恨生我養我的父親母親了。我的父親母親並沒有一點錯。他們不但沒有錯，還生我養我，于我有大恩大德，我應該感謝他們才是。而且，如果沒有以前像豬一樣的生活，現在我哪能奮鬥到大學副教授的身份，活得這麼輕鬆自在呢？有人說，人的一生，幸與不幸是一半對一半，把不幸的日子過完，幸福就來了。

鋤鋤

鋤鋤我出生那天，母親後來說，天熱得把衣服脫光都不能解暑，太陽就像被潑了一盆經血，紅得讓人難受，紅得讓母親看哪里都是紅圈圈，都是豬圈裏的經血，現在想想還要嘔吐。母

親那天抱著我沖回家，一股腦兒地喝了五大瓢冷水還是感到熱。母親老來四肢酸痛，處處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時喝冷水有很大關係。

我當時確實不樂意出生，我母親也不高興我出生。當時父親正站在生產隊的批鬥會，五花大綁著，低著頭，曲著腰，接受著別人的教育。汗水在父親的身上像蟲子一樣爬著，最初癢得令人想笑。蟲子在身上爬多了，癢得久了，又難受得要命。父親在口水、石子、討伐聲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陽下山了，月亮上來了，別人輪番討伐渴了、累了、餓了，才得以回家。父親疲憊地走進屋，還沒等母親告訴他家中又添了一個討飯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親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這一壓，哇的大叫起來，母親聽到哭聲才終於擠出一絲笑意來。父親一驚，望我一眼，面無表情地朝一邊一倒，又睡去了。

鏗鏘我出生在地主家庭，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並且不願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注定要像豬一樣生活，難怪我一出世，我家那頭老母猪就死了，它不願看到我一個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樣，它已預知到我將來的人生……

鏗鏘生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學就不能帶紅領巾，在各種各樣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欄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現在，我對地主一詞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渾身發緊，神經緊張，惶惶不安。按說，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應該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誰願意還是不願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們的子女有什麼關係呢？就算父母犯罪違法，受處罰的應該是父母，而不應株連他們的子女呀。何況我的父親母親並沒有犯罪違法。他們只是在大家都很窮的時候，自己富得快一點而已。誰不願意日子過得好一點呢？然而在那種荒謬的時代，想過好一點也是有罪的。鏗鏘

我的父親母親，甚至父親的父親母親，我的爺爺奶奶，爲了買那五十畝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節約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頓鹹菜下苞穀稀飯，才終於攢到那麼一罐袁大頭。我的父親母親，甚至我的爺爺奶奶，既不偷也不搶，勤儉持家，樂善好施，連叫花子上門討飯，自己不吃也要賞一碗，這樣的人家在現在說應該評五好家庭呢。他們認爲，我們靠勞動吃飯，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當官的怎麼換，不管哪個黨執政，都應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蕩蕩的良民才是。

鏗鏘父親以前是個石匠，成年累月在外給人修房造屋，節省得吃碗羊肉湯都捨不得，一心想著買田置地，等結婚生子後讓一家人日子過得寬裕一些。我母親過門後，房修了地買了，日子照樣過得緊巴。爺爺奶奶、父親母親節約成習慣了，有了點錢以後照樣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母親說，要是那時捨得吃捨得穿，吃了穿了，被判個地主富農，心裏也還踏實些。既沒吃成又沒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沒收，房產被瓜分，時時刻刻被監督勞動，大會小會上挨批挨鬥，父親母親、爺爺奶奶不甘心呀。爺爺奶奶傷心呀，後悔呀，哭呀，氣呀，解放沒多久就去世了。

鏗鏘父親在彌留之際還喃喃自語，爲什麼同樣是共產黨，四十年前不讓人富，四十年後却鼓勵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過好一些，爲什麼命運就相差十萬八千里呢？爲什麼那個時候是錯的現在却是對的？爲什麼靠勞動掙錢在那個時候就有罪而現在却是一件光榮的事？父親至死也沒想通。

父親背著枷鎖過了半輩子。在生產隊，別人不願去修公路，讓他去修；別人不願在大雨中去守莊稼，守汽車，讓他去守；別人不願挑兩百斤重的擔子步行十幾公里去繳公糧，讓他去挑；別人不願在大熱天挑糞上山，讓他去；別人早早睡了，讓他每天晚上寫思想總結，寫交待書；天寒地凍的時候，別人在溫暖的家中休息，讓他去公社政治學習，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親曾對母親說，他做這些事的時候總在想，難道想把日子過得好一點真的是錯的？難道大家都沒錢、都窮就好嗎？有一天，父親似乎想通了，突然對母親說了一句：“錢哪，魔鬼。”母親莫名其妙地望著父親，可他再沒說話，一聲接一聲地嘆息。

鏗鏘父親並沒有想通，他還在為他的土地、房產惋惜。我們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却不能讀，哭得死去活來也沒用，別人罵她賴蛤蟆想吃天鵝肉。她想不通，一頭栽到古井裏，再也沒爬出來。姐姐死了不要緊，讓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親母親為此在生產隊的祠堂前罰跪兩天兩夜，當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們家的祖宗也被罵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錢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鏗鏘我的哥哥，一個小時候聰明可愛的孩子，淘氣、外向、仗義、不服輸，經常被人打得鼻青臉腫，受的氣最多，吃的苦最多，長到該成家的年齡却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贅到大山裏去，過著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膽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可還是沒少挨打受罵。我曾有近二十個綽號，至今還記得一些，如屎斑鳩、苦檀神、地主仔、四類分子、屎彈子、周扒皮、劉文彩等等。

鏗鏘命運把我變成了一頭冷漠、自私、孤獨、玩世，人見人嫌的肮髒的豬。我已經習慣髒豬一樣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認為就是一頭豬。在沒人的時候，有時我學豬的嘶叫，甚至學著豬的樣子拱地上新鮮的泥土，嗅一嗅土裏別樣的氣息。做這一切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很開心，很痛快。我經常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一隻活蹦亂跳的豬崽。我在睡夢中曾夜游到豬圈，被母親從豬圈里拉回床上睡覺。這一切我渾然不知，直到後來我上了大學，帶著女朋友（現在的妻子）回家，母親把它當笑話講給她時，我才知道。

鏗鏘我母親對我的女友說，我是豬變的，是豬精啣。我的女友看著我，笑得前翻後仰。我後來偷偷問我母親，我真的在豬圈睡過？母親沒說話，眼淚直往外涌。

我大學畢業，做了大學老師後，父親才得以找池塘釣釣魚，謙卑地接受鄉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經常對我說：“人要節欲。還是窮了好，錢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那麼多幹什麼？”我知道，父親話雖然說得通達，實際上他心裏仍然沒有想通過去一直沒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贅到大山裏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幾十畝山地，種水果發了，成了遠近聞名的大款，可我父親却怎麼也不願意踏進我哥哥的家門，甚至還當著全家的面，罵我哥哥不從他那裏吸取教訓。

鏗鏘然而直到父親去世，我哥哥也沒有被揪鬥，而且日子越過越紅火，桑塔納買了兩輛，剛上高中的女兒被送到美國念書。我父親把我哥哥罵了，打了，哥哥仍然不聽，繼續發家。父親到死也沒弄明白，為什麼他不能想把日子過好一點而我哥哥却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膽做，沒有誰把他怎麼樣。

冷明先生來信：

收到貴雜誌電子版很是激動。能出這樣好的刊物太可貴了。我當天就在我的博客裏刊出了此消息，我把《發刊詞》貼上去，被新浪給刪了。我打算寫一些回憶錄給你們，我也是黑五類。希望你們百忙之中能把最新的版本傳給我。祝貴刊越辦越好。

離右派就差一厘米 廖文偉

那一天細雨霏霏，我們正在樓上吃午飯，忽然樓下有人喊“廖老師”。“去看看，是哪個在喊。”父親對我說。我趕緊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門，只見門口站著一個人，打著黃色的油布傘，看不出來是誰。

“不知道是哪個，傘遮著頭。”我趴在窗臺上說。“是何老師的聲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親放下碗筷，快步下樓去了。好一陣子，父親仍沒有上來。母親要我到窗口去催

父親上來吃飯，于是我趴在窗臺上喊：“媽媽喊你吃飯，爸爸！”門口站著的那人移開了傘，是個女老師。她仰臉朝樓上說：“告訴你媽媽，就幾句話，就幾句話。”不一會，父親上樓來了，端起碗繼續吃飯。他說：“是何老師。她寫了張大字報，向學校領導提了幾條意見，問我要不要簽個名。”父親舉著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親，接著說：“意見倒是對，就是口氣不太客氣。有兩件事我也只是聽別人說起過，並不在場。還是不能聽風就是雨，要實事求是。我沒有簽這個名。”“不簽也好，老老實實教你的書。”母親說。

細雨一連下了兩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親快步匆匆回來了，鎖著眉，繃著臉，進門就喊母親：“道香，你看好險！那天何老師來要我簽名，還記得不？”“怎麼啦，你不是沒有簽嗎？”我在做作業，母親正織毛衣，眼都沒有抬一下。“好險好險……”父親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親面前接著說：“何老師打成極右分子了，簽了名的幾個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師生都要參加。你看好險！”望瞭望吃驚地抬起頭來的母親，父親撮起手指，比劃了個一厘米的手勢，加上一句，說：“差那麼一點點，就回不了這個家了！”

第三天上午，學校大操場上扯起一條大橫幅，上書“堅決反擊右派分子向黨進攻”。批判會上領頭喊口號的是學生會的一個學生幹部，他情緒激昂，時不時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門都沙啞了，仍然不肯下火綫，又沖上前臺痛打披頭散髮的何老師。台下激起一片喊打聲，有人沖上去對何老師拳腳相加。何老師高度近視，好幾次眼鏡被打丟了，摸索著從地上撿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臉上滿是驚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後的幾名右派分子，驚恐之色也完全不亞于何老師。

打著黃色油布傘，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師，從此成了階級敵人。1958年，我離開家鄉醴陵一中，進省城當了職業運動員。兩年後回家探親，聽一中教職工子弟說，何老師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幾次被逼得自殺，吞六六六粉，跳淶水河，都被發覺，求死不成。她的幾個女兒中，有一個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學，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妹妹說實在是一言難盡。三十年後右派平反時，何老師已經不在人世了。

當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幹部，不久入了黨，後來留校工作，後來又調往縣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階級覺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後不久，離右派帽子僅僅一厘米的父親，教研組組長的烏紗帽也丟了，從此落下個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名聲。他的一個好學生，叫姚玉蘭，後來在湖南師範學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們的廖老師，總會加上一句：“好老師，就是膽子小。”

甲乙先生來信：

讀過您編輯的《黑五類憶舊》第一期，很受觸動。“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這題旨非常好！又看到你們的約稿啟事。我自己有一篇類似文章，現寄上，供選用。

印花的童年 文利桃

父親成分不好，在城裏找不到媳婦，只好到鄉下找。母親對英俊的父親一見鍾情，不顧外婆外公反對，閃電般迅速嫁給了父親。母親嫁到城裏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她打扮土氣，一口結結巴巴的鄉下話，受盡婆家和鄰居嘲笑。偏偏又連生三個女兒，父親更有對她拳打腳踢的理由。

在家中被視為狗尾巴草的我，兩歲就被送到鄉下外婆家。外婆待我如珠如寶，總能想方設法做出我愛吃的東西。從牆角菜壇裏舀來酸酸的浸水，將生紅薯切成極薄的片，再拌上鮮紅的剁辣椒，就成了一道解饞的美味。即使我犯了錯，把人家男孩打哭，或偷了人家放雞窩

裏的引蛋，她都只是拿幾根稻草迫得我滿村跑，演戲給旁人看，以平民憤。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時光。一晃到了七歲，已是上學的年齡，母親把我接回城。那時她又懷孕了，就在我報名讀書的第一天，母親生下了第三個女兒。父親一看又是個女孩，當場破口大罵。奶奶指著父親的臉說：“你這輩子絕種了！”罵罵趑趑地拖著我去學校報名。我回頭看見床上的母親滿眼都是絕望。

叔叔結婚後，爺爺提出分家，把好的東西都分給了叔叔。父親提出異議，爺爺說：“你要那麼多幹嗎？你兒子都沒有，將來還不是落到外姓人手裏？”父親賭氣遷出城，在郊外一條僻靜的小河邊蓋了三間房子。那一年，我八歲，二妹五歲，三妹一歲。父親做了一條小船，到河裏捕魚來維持生計。哪天多賣了幾個錢，他必定在外面喝得醉醉的才回來，見人罵人，見狗也要追著踢幾腳。我的左耳就是父親打聾的。

那是夏天的一個傍晚，天氣悶熱。母親在廚房做飯，八歲的我，坐在客廳的涼床上，抱著哭個不休的三妹，還要給站在旁邊的二妹撓背心的癢子。父親在隔壁房間喝酒，三妹的哭聲鬧得他心煩。他厲聲罵我：“你是頭豬嗎？不會抱她走動一下？”

我趕緊邊哄三妹邊努力想把她抱到外面去，無奈我個子太小，怎麼也抱不好。手箍得太緊，三妹哭得更厲害了。耳邊傳來父親的罵聲：“吵死啊！小心我出來一脚踹死你！”我終於抱起三妹挪到了大門口，二妹又哭著上來揪住我的衣服。本來就搖搖欲墜的我，沒注意腳下的門檻，抱著三妹一起摔倒了。三妹哭得透不過氣來。

我嚇壞了，剛把三妹從地上抱起，就看見父親從房間氣衝衝地出來了。他手一伸就把三妹從我懷裏奪走了，還沒等我來得及躲避，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外面的水泥坪上，整個人飛出去足有一米多！我嚇得尿了褲子却不知道哭，鼻子和耳朵都流出了血。鼻子倒是沒打歪，但左耳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母親被艱難的生活磨得脾氣暴躁，也喜歡零敲碎打。三姐妹中，只有我體積大一點，就成了父母理所當然的出氣筒。挨了打我也無處訴說，只是朝著外婆住的方向無語凝泣。有一天，我實在無法抑制對外婆的思念，偷偷從家裏跑了，走了三十五公里去看望外婆。外婆在給我洗腳的時候，看到我滿腿的青紫傷痕和布滿血泡的小腳，直掉眼淚，咬牙切齒地說：“天殺的！怎麼下得了手啊！”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班車上，看著窗外漸漸模糊的外婆，眼淚像決堤的洪水，無法控制地流下來。一想到又要回到令人恐懼的家，心裏的絕望無法言表。到了家門口却不敢進去，我不知道要接受怎樣的懲罰。在房子後面的雜草中躺到快天黑，我才壯著膽子戰戰兢兢往裏走。剛走到大門口，正好撞見出來倒垃圾的母親，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就打。

我被打了心裏還很高興，因為平時只要母親先懲罰了我，父親一般就不會再動手。母親也明白這一點，總是搶在父親前面動手，其實她是想讓我免挨父親更殘酷的毒打。可人算不如天算，正被母親推搡著，眼睛卻瞟見父親拿著一根很粗的木棒出來，直朝我奔來！我朝母親大叫：“還不快鬆手，爸爸來了！”母親一回頭，也趕緊鬆了手。我撒腿就往外跑，父親健步如飛追來。我沿著河堤狂奔，幾次差點被他手裏的木棒打到。我邊跑邊在心裏發瘋一樣的祈禱能出現一個人救我！

天從人願！村裏的支書正好從坡下上了河堤，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河堤是他回家的必經之路。我一貓腰從救苦救難的支書大叔褲襠裏鑽了過去，10歲的我身材瘦小，求生的本能又使我行動迅速，動作優美。父親沒料到支書會突然冒出來，朝著我舞出的棒子收不住慣性。好傢伙！那一棒子結結實實砸在了還沒反應過來的支書腿上。支書喊一聲“哎喲”，抱腿坐到了地上。那一棍要打在我身上，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效果。支書在醫院足足躺了一個月，才把被打得骨折的腿骨勉強治好，父親賠了七百多元醫藥費。

從那以後，父親要打人就先把門反鎖，連母親都不准進來。無論冬夏，要打就命令我把衣服全部脫掉，那樣我想跑也跑不了。

他以前用巴掌打，後來嫌打得自己手疼，就規定我定期去河邊竹林裏砍竹子回來做工具。要去掉竹葉，捆緊了，還得用布條把手握的部位一層層纏緊，這樣才好使力。他雙手握著那一大把竹條朝我裸露的身體肆意揮舞時，動作活像秋收時朝穀筒裏用力摔稻穀的農民。竹枝每落下來一次，我的皮膚上就多印出一串紅色的竹子印花，火辣辣的疼。每一串印花的尾梢都會冒出一顆紅紅的血珠，父親美名其曰“紅印花布衣”。

實踐出真知，打的次數多了，我發覺嫩竹枝條的尾梢更容易被打斷。我在被打的時候默默數了，老得發黃的竹枝要揮打 40 多下才全部斷掉，嫩竹枝一般 30 下就光禿禿的了。于是，我再去砍竹子時就專揀嫩枝頭上端的那一部分砍。

在父親的棍棒訓練下，我還練出了幾項特异功夫。兩米多高的窗戶，我一個八九小女孩能在幾秒鐘內爬到最頂端，像一隻小猴子那樣抱著窗戶頂端的欄杆，臉對著窗外的月亮哀嚎。保持這個姿勢的好處是上半身受傷比較少，不過，屁股就多受苦了。上面布滿了重疊的印花，好幾天坐不得凳子。還一個特异功能就是無師自通學會了狼嚎。我發出的狼嚎可以媲美狼群裏叫得最好的領頭狼，叫聲在深夜傳得很遙遠。只要在我發出嚎叫的第二天，住在河對面很遠村子裏的婦女，總會到處繪聲繪色撒播謠言：昨天又有冤魂在嚎哭，叫得那個慘啊！

身體的被虐待不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最痛苦的是夏天被打得滿身紅印花後去讀書。在我們身體沒有體現女性特徵前的夏天，母親都不給我們姐妹穿上衣。一家五口人，只有母親穿上衣。這樣洗起衣服來也簡單——五條短褲加一件上衣，既省了布錢又省了肥皂。

妹妹們還小，無所謂，只苦了我，全校只有我一個女生不穿上衣去讀書。這給老師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都認為我是個沒開化的野孩子。沒花一分錢廣告費，我成了學校的名人。一說起那個打赤膊來讀書的女孩，誰都知道是我。最糟的是，身體被印花以後，沒有上衣遮蓋，就那麼赤裸裸暴露在全校師生的眼裏。被打時，出于自然反應，我都是抱著頭弓著身子蹲在地上。這樣的姿勢就造成了印花的不平均分布，往往是整個背部布滿了縱橫交錯的印花，而前胸則相對較少，不太觸目驚心。

人都有愛美之心，在學校遇見老師，我總是儘量將自認為最美的胸部對著老師。老師一走動，我就像向日葵那樣，始終將前胸對著老師移動，儘量不讓老師看到我醜陋的背後。

曾有一個年輕的女音樂老師，面對我的傷痕落淚，善良的她走訪了我的父親。父親唾沫橫飛，歷數我數十條非打不可的罪狀。在他的描敘中，九歲的我除了沒犯過殺人罪、強姦罪，別的罪基本都犯全了。面對仍喋喋不休勸解的老師，父親惱羞成怒地說：“我生的孩子我愛怎麼打就怎麼打，關你屁事！”氣得音樂老師拂袖而去。

三年級時，我的胸部開始發育，長出硬幣大的小乳房，同學們指指點點令我無地自容。我向母親提出要穿衣，母親許諾明年夏天就讓我穿衣去上學，我聽了絕望得想自殺。一天中午，看見晾衣竹竿上晾著父親的一件白背心，我靈機一動，等母親不注意，把它藏進書包，一路狂奔下了河堤。我把背心往身上一套，呵呵，父親穿的背心套在我身上成了連衣裙。我找根麻繩綁在腰際，自我感覺美不勝收。

放學後我就把背心脫下藏在書包裏，髒了也不敢拿出來洗。沒幾天，白色的背心黃漬漬的，酸臭酸臭。事情還是敗露了。母親路過學校，剛好撞見還沒來得及脫下背心的我。她當場給我兩巴掌，令我幸福的是，第二天她就買了布，給我做了一件襯衣。我終於結束了打赤膊上學的歷史。

父親素來風流，前村後店都有他的情人。母親看不開，尋死覓活地吵鬧。他們打架，我跟著遭殃。母親動不動就朝我口不擇言地吼：“只看見這裏死人那裏死人，怎麼就是不見你去死啊！”受母親的指點，我萌生了自殺的念頭，到處打聽哪種死法不痛苦。自幼極愛看書的我，最後從瓊瑤的書中得到啓發。她書裏的女主人公都喜歡割脈自殺，說這樣的死法既不痛苦，死後臉色還會蒼白凄美。愛美的我覺得能蒼白、秀氣的死去是個不錯的選擇。

說幹就幹，等父母都不在家，我把妹妹們關在房門外，迫不及待地用刀片一下就割開了

手脈。沒想到血會像箭一樣從血管裏射了出來，居然噴到蚊帳頂上！我沒覺得疼，只是有些驚訝，嘴裏不由自主發出了尖叫聲。

我沒死成。巧得很，外婆突然來了。聽到我驚恐的叫聲，她一脚就踹開了門，把我的手捆緊後送進醫院縫了七針。後來聽外婆說起，事情還真玄乎！她前一天晚上剛躺下，就非常清楚地聽見我的聲音在窗戶根下連喊了三聲“外婆”。她以為是我夜裏偷跑去到她家了，起來打開大門一看，外面却一片漆黑，什麼都沒有。外婆覺得不對勁，一夜沒睡好，一早就坐車趕到了城裏，及時挽救了我一條小命。我抱著外婆哭得肝腸寸斷！她才是最親的人，一次次救我于水火之中。

難得發怒的外婆把父母罵得狗血淋頭。她指著父親罵：“教育孩子有你這樣的教育方法嗎？明明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卻把怨恨都發泄在孩子身上，還要找出各種罪名來為自己開脫！虎毒尚不食子呢！孩子今天要有個三長兩短，我非和你拼了這條老命不可！”

住了幾天，見我傷口快愈合了，外婆要回去。我在心裏無數次乞求外婆帶我走，却怕讓她為難而不敢開口。走的那天，我脖子上吊著包扎著綳布的手，依在門口看母親送外婆走。看著外婆老淚縱橫一步一回頭地看我，我終於不顧一切，哭喊著追了過去：“外婆，你帶我走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經過外婆的力爭，加上我以死相挾，我如願以償地跟外婆下了鄉。走的那天，我脚步如飛，頭也沒回……

倫敦嵇偉女士來信：

《黑五類憶舊》讓人想起的是似乎太久遠但永遠不可能忘的事。因為太忙，我現在幾乎不細看任何文章，但你的這本電子雜誌却仔細看了。因為一，我是在右派堆裏長大的；二，我在安徽淮北插隊八年半，所見所聞和文章中的故事一樣殘酷。保持聯繫，謝謝寄給我《黑五類憶舊》。祝好！

？

和田先生來信：

我從友人處讀到了您編輯的雜誌，讀到了“政治賤民”這個熟悉的字眼（我母親生前常說），很震撼啊。這個身份壓了我們太久，這個話題之忌憚也太久太久了。其實我并不願意回憶它，但是它還是緊緊地捆綁在我的心靈深處。附上我寫的一篇回憶文章，還有我老父從牛棚回家時的舊照。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翻譯家，1957年因言獲罪。全家變成了政治賤民，但我母親作為右派老婆是最痛苦的。可她直到83歲辭世，都堅決不肯寫一個字。其痛之深，無可言表。我建議，專題研究黑五類的妻子們。在苦難的人生戰場上，她們比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還英勇。

父親的眼淚 楊恒均

小學二年級時，有一次在外面玩耍，與一個同齡的玩伴吵了起來，還動了手，我稍占上風。我悄悄回到家裏，沒敢告訴父親，以為事情就過去了。大概半個小時的光景，屋外傳來一陣嘈雜聲，由遠及近，不久就聽到了叫罵聲。我聽出是剛剛和我打架的那個孩子的聲音，心中暗暗叫苦。原來那傢伙不服氣，一路叫罵沖我家而來，手裏還捏著一塊磚頭。他身後還跟著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的觀眾。那時孩子打架，哭鬧叫罵是很普通的，通常不會吸引如此多的觀眾。是與我同齡的這個八歲孩子叫罵的內容吸引了大家。他沒罵我，而在叫我父親的名字，每叫一句還加上一句充滿童稚的惡狠狠叫罵聲：“某某某，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親當時雖是管制對象，但還是學校校長，母親是公社醫院婦產科醫生。父親一直老老實實做人，謹小慎微，從不敢惹事。父親也聽到了叫罵聲，小心翼翼地從門縫裏朝外面瞅了一會，然後回頭盯住衣衫不整的我，明白了。他仍然站在門口，一動不動，臉色陰沉沉的。這時門外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這架勢，早已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遍叫喊我父親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來越侮辱性的形容詞。我發現，最讓父親緊張的是“地主”、“大地主”。門外每傳進這兩個詞，父親緊緊握門把手的手都顫抖一下。

那天父親一直沒有開門出去。兩個哥哥也在家，他們都是大孩子了，氣得臉都紫了。足足有半個小時，不知是那孩子罵累了，還是被好心的鄰居勸走了，外面沒有了聲音。可是房間裏却傳出了聲音，是父親害怕鄰居聽到而壓得低低的嗚嗚的哭泣聲。我們兄弟幾個站在那裏，嚇得一動也不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像孩子一樣哭，我原來以為做父親的是不會哭的。哭了一會，父親抬起頭來對兩個哥哥說：“你們的弟弟不懂事，你們也不懂事嗎？你們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你們不知道我們有多難嗎？人家今後打死你們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個小地主。街上每個人都能罵我們，我們要讓著所有的人，知道嗎……”

父親說得很白。他說：“我們是地主，是賤民，就是你弟弟也沒有和別的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權利。他還不懂，但你們今後得看住他。”父親說了很久，而且都是對兩個哥哥說的。其實父親不必說那麼久，當時我已完全懂事了。我只是無法完全控制孩子的天性，在外面玩耍時會不知不覺間和小朋友鬧矛盾。父親的哭聲結束了我的童年時代。後來在整個小學，特別是在隨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學讀書期間，我夾著尾巴做孩子，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最悲慘時，有些高年級的孩子只要喊一聲“地主崽子過來”，我就會收起一個孩子的心，乖乖地過去，甚至曾經被命令從他們的褲襠下鑽過去。

我沒有任何反抗。就在我們家鄉不遠的地方，有人大義凜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丟進水井裏活活淹死，不用負任何責任的。父親是老師，他知道這些事，更知道當時是一個什麼世道。有段時間我一度誤解父親，認為他太軟弱，但後來我理解了他。當時作為我們這類人，壓根兒就沒有軟弱和勇敢之分，我們根本無法和整個強權對抗。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活著，唯一的選擇就是軟弱和屈服。

這是我小時候唯一的一次看到父親在我面前哭泣。後來我再也沒有讓他在在我面前哭過，雖然我付出的代價是整個童年和一個正常人的成長環境。

孤帆先生來信：

焦先生，從朋友傳來的文中逐漸認識了您。我退休後，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了個東西。因許多當事人還在，我怕麻煩，隱去真實的人名地名。小人物的經歷同樣能反映大時代，若蒙不嫌，我發來請您審閱。

一張平反證      陳 華

尊敬的湘鄉市委統戰部領導：

我的父親陳鶴堯，生于民國六年農曆六月一十七日，現年 90 歲，住潭市鎮西田村 10 組。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父親挺身而出，應徵抗戰入伍，上海淞滬抗戰時在國民革命軍工兵第一團團長馬崇六屬下的一個營裏任班長，多次參與對抗日寇作戰。1941 年，父親在江西吉安國軍軍事學校畢業調查處軍官總隊 13 中隊受訓畢業。同年加入國民黨組織，黨證號：軍競字 22713。這年 25 歲，入黨地點：吉安。軍校畢業後，任第 41 補訓處(處長唐光喬)第 2 團中尉連副。後調任部隊番號為浙江蘭嘉師管區(管區司令趙煜)第二團 15 連



連長及蘭嘉師管區上尉附員。

父親奉令率連隊從浙江撤退至江西時，途中多次與日寇遭遇作戰，戰鬥異常慘烈。日寇前堵後追，父親率連隊與之巧妙周旋，從而基本上保住了這支國防部隊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轉戰終於到達集結目的地。民國 36 年，父親在南岳第 27 軍軍官總隊(總隊長蔣伏生)第 5 大隊退役，退役證號：除丙字 007552。

退役回家後務農，土改時劃為中農成分，鎮反運動時，由于民衆對父親口碑極好，才僥幸躲過了殺戮之劫。不久，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接受監督改造，捆綁批鬥，劫難中留一條殘命，至 1984 年才被摘帽。2007 年 5 月 18 日父親高血壓中風幾天後住進了東山醫院，彌留之際，他總結自己的前半生，認為無愧于國家，無愧于中華民族，熱血青年時期，與日寇浴血奮戰，反而認為是“反革命”，這是極不公正的，死也不會瞑目。

彌留之日屈指可數，父親特向統戰部提出 2 點請求：

1、給自己的抗戰歷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為摘帽只是證明摘帽後不屬於階級敵人了，“摘帽”一詞反而認為自己的抗日歷史是屬於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確的。父親打的是日寇，沒有與共產黨放過一槍，何“反”之有？難道去當漢奸反而是革命者嗎？2、生命垂危，正在搶救治療，希望能得到一定的醫療救助，哪怕是一分錢，也體現黨和政府對一個抗戰老兵的關懷。

1949 年秋，國民黨軍事機構曾動員父親隨軍撤退去臺灣，父親對新政權充滿希望，毅然選擇留在家鄉。幸存的抗戰老兵屈指可數，像父新這樣的連長級以上的抗戰老兵更是寥寥無幾了，希望上級領導對父親這樣一個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權要求給予重視解決，再莫讓他帶著傷痕累累的遺憾進入另一個世界。

此致

敬禮

抗日老兵陳鶴堯的兒子陳華

2007 年 5 月 25 日凌晨

于東山醫院父親病床旁

5 月 25 日，星期五，我揣著這份信件報告早早來到湘鄉市委統戰部。早 20 年前我就來過這個地方，那是要求為父親落實政策，同時享受生活補助待遇。當時他們的人答復我：陳鶴堯不是起義投誠軍官，故無法得到什麼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一個副部長看完報告後問：“你父親的摘帽證呢？”我說根本就沒有發下來過什麼摘帽證，只是讓人轉話，對父親說你以後不要去開鬥爭大會了，也不管制你們這些人了。我對副部長說：“當時那些極左幹部們的心態是極不平衡的。一夜之間突然不能對這些五類分子捆打批鬥了，不能當大人老子了，就是有摘帽證也不會發給他的！”副部長默然，隔一會兒突然說：“現在不是沒被管制了嗎，摘帽與平反不是一個意思嗎！”我說：“摘帽與平反絕對不是一個意思。父親對此耿耿于懷，正在病床上翹首盼望能有一個準確的答復，我這就去回復他老人家。”這時進來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長讓她看了報告，女主任一錘定音，說：“上面沒有明文規定，這事我們不能辦！”

父親 17 歲參軍，軍旅生涯 12 年，大部分時間從抗戰中度過。他在東山醫院住了 8 天 7 夜。有一晚他從昏迷中醒來，突然對日夜守在病床邊的我說，抗戰開始時，他隨部隊調到河北，參加了滄州戰役。那一仗打得很慘！正當我想詳細詢問滄州戰役的情況時，他又昏迷了。由于病情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 月 11 日 19 時 45 分，父親與世長辭。關於父親參加滄州戰役的經過，我永無向他問明白之日了。

那時我還小，只記得好多時候，睡到半夜，許多拿著步槍和梭標的民兵就闖進我家住的

低矮草棚，翻箱倒櫃一陣後就喝令父親跪下，然後拿一根帶來的棕繩將他五花大綁地押走。一天放學回家，我看見父親在家中唯一的一張方飯桌上扎幾條籠子，圓錐型的，三尺多高。父親在上麵糊上報紙，拿我書包裏的毛筆寫上“歷史反革命陳鶴堯”，還在“陳鶴堯”三字上打個大x。自製的高帽子若不够高，鬥爭時會受額外的緊索和拶打，游行時還要遭受一些圍觀者的石擊和唾罵。父親怕人說他不老實，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讀小學五年級時，學校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趕在一旁，給那些成份好的孩子每人發一個“毛澤東思想紅小兵”紅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伏在土灶臺上對著母親和父親傷心大哭。父親無奈地抱住我，無聲地撫摸著我的頭，只有嘆氣。又過三年，勒令我回生產隊出工，不准讀書。

父親年齡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隊裏放牛，上午照樣出工幹活。雙搶和晚稻收割時節，就被安排去曬穀。隊裏還有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叫劉樹仁，國軍少尉排長，抗戰時入伍，抗戰勝利時退役。兩人每天為隊裏翻曬幾千斤稻穀。曬穀坪離保管室倉庫有 300 米遠，清早擔出去翻曬，晚上手搖風車吹掉癟穀，再擔著一籮一籮塞進狹小的倉門裏，通常要幹到晚上 9 之後才能回家。然而隊裏給他倆計的工分是成人的 5.5 折。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剝削，無休止的肉體揪鬥，兩人養成逆來順受的畸型人格。父親 60 歲生日那天清早，去向政治指導員請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親可能認為自己 60 歲生日也不准假，爭辯了幾句，政治指導員竟伸手去搥他的耳光。我正在不遠處的秧田裏插秧，沖上前去擋在中間，喝道：“他今天 60 歲生日，你打他，老子跟你拼了！”

父親為人忠厚老實，見識頗廣，好讀史書。從父親口中，我知道了土改和鎮反運動中錯殺濫殺的許多真相。土改對地主婆女人的摧殘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1942 年，國軍軍長彭鏗將軍出資買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灣街口的瓦屋場房地。解放時，彭軍長去了臺灣，他的親妹妹彭福來被劃為地主。冷天裏鬥爭她時，拿一個大桶盛滿水，放入幾條泥鰱，然後將她脫光身子，扔進桶裏，讓她去捉泥鰱。在一片“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中，享受著感官刺激的貧下中農們樂得哈哈大笑。父親由于是中農成份，那時還沒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親避過了那場侮辱和劫難。

發殯父親那天，禮生在靈堂裏讀家奠文時，挨著我跪著的妻子小聲說膝蓋跪得生痛。我說忍忍吧，這麼一會兒也說痛，想想父親在挨批鬥時，常常一跪就是一個上午或一個晚上，而且被捆綁著，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挂著黑牌子，可父親從沒叫過一聲痛。我說著，看著棺木前父親的遺像，眼淚忍不住往下掉。

大隊革委會副主任xxx對父親特別憎恨，每次批鬥發言後，總要慫恿骨幹積極分子們去打父親或緊一陣繩索。那時我多次問過父母，這個人為什麼對父親這般狠，是不是有過什麼仇隙？父母怎麼也不說出來，為的是怕我惹下大禍，真說出去了，父親的命也難保了。早幾年，在我不斷追問下，父親才向我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 年底，日寇占領寶慶(邵陽)後，又大規模進犯新化和安化縣藍田鎮，國軍 73 軍官兵奉令開赴藍田狙擊日寇。1945 年 1 月 17 日中午，一路日軍來到今西田村九組的瓦曹門劉家。家中的豬牛全被鬼子、漢奸殺吃了。劉家的 6 歲孩童劉才方，戴著一個銀項圈。一個鬼子從他項上取下項圈，隨手扔給一個漢奸接住。這時劉才方的母親認出其中一個青年漢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西全村三組杜家屋場人，叫張祝軒，小名滿伢子。他見被人認了出來，就勢說：“二孀子，請你告訴我堂客一聲，我和xxx還要出去好些時日。”21 日夜，73 軍大部隊與日偽軍爆發潮音閣戰鬥。之後，漢奸隨鬼子撤進縣城湘蓮鎮。此後，張祝軒失踪了，xxx却完好無損地活至今日，還當了幾十年的生產隊和大隊幹部，文革時成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

父親 1946 年夏從部隊退役回家，家鄉當時正在大力抓捕和懲治漢奸。湘鄉縣國民政府

將黃惠臻、龍連斌、陳羅生等漢奸公審槍決。潭台鄉鄉民代表會主席謝笏卿，鄉長易堅衷，副鄉長成炳南，見父親退役回家，要求他協助鄉政府抓抓懲治漢奸的工作或當當保長什麼的。父親是抗日軍人，自然對漢奸十分憎惡，xxx被父親審問過多次，但他只承認被鬼子擄夫，痛哭流涕地傾訴受盡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鄉像他這樣的人有 2000 多個。他家有一件鬼子的軍衣，他巧妙地躲過了父親對這件軍衣的盤詰。父親見沒抓到什麼重要證據，就再沒追究下去。

當初這些漢奸無惡不作，跟著鬼子燒殺擄掠，奸淫搶奪。1945 年 5 月 28 日下午，日寇第二次進攻潭市時，18 名鬼子成群地輪奸一個年青女子，有 2 個為日寇帶隊說湘鄉土話的“二鬼子”參與了輪奸。國民政府花大力氣緝捕這些人時，他們大都聞風潛逃了。可當解放時，這些人又跟著解放軍大搖大擺回來跟著鬥地主分田地了。一個窮字成了他們的護身符，成了大紅大紫的貧下中農。父親這些抗日軍人，此時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對象，跌入人生的穀底。

湘鄉還出現過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華、蔣水生槍斃的事件。潘、蔣在抗戰時殺過鬼子漢奸。這些被殺的漢奸，其子女親屬成了貧下中農，土改時便大肆報復，說潘、蔣殺他們的漢奸父親是殺害貧下中農！甚至，大漢奸頭子劉漢良被押至婁底被國民政府槍斃的事，也被他的大兒子在土改中提上議事日程，幾乎被“昭雪”。父親經常對我說，土改時，有不少漢奸、流氓地痞和無知積極分子充斥其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湘鄉的抗戰歷史幾乎是被人倒著寫的，真正的漢奸們反而大紅大紫起來。

6 月 11 日父親去世。第二天，湘鄉市黃埔軍校同學會 86 歲的葉啓福會長，代表湘鄉黃埔軍校同學會，專程赴潭市送了花圈。西全村一組的王國英老人前來吊唁，看到花圈上寫的字，問我葉會長是否走了。他是一個投誠起義的少尉軍官，說現在政府每月只發給他 83 元的生活費，少了，想問問這方面的政策。我將他請到一個避靜處，懇求說：“王老，您對張祝軒滿伢子和xxx的歷史相當熟悉，又都是不太遠的左鄰右舍，請您告訴我，xxx究竟是不是漢奸？”我這一問，把王國英老人嚇了一跳，他說這人還在，爺老子千萬別惹出什麼禍來。我向他保證，我絕不會去惹他，我也沒本事惹他，我只請求您告訴我他是？還是不是！王國英老人這才說：“是順民，他和張家滿伢子是真正的順民！”

順民即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飯帶路，跟著燒殺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發的制服，就是二鬼子。黃泥村的舒棟材老人趕來為父親喪事當禮生，我不失時機地問了他關於順民的事。他說，張祝軒滿伢子這些人都是順民，跟著日本人走，只是具體幹了些什麼就不清楚了。

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為什麼至死時還耿耿于懷，一定要當今政府為他平反才咽得下這口惡氣。我多次勸慰父親想開點，一紙平反證有什麼用？還是少去回憶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親越發執拗了，在東山醫院病床上，非讓我凌晨寫好報告不可。當我寫好大聲念給他聽時，父親眼裏噙著淚花，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得住人民和老百姓。”他對我們說：“是我連累了你們的前程幾十年，但我不能這麼不清不白地死去！”

至此我算是徹底領悟了死不瞑目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父親後面的話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我知道，他想在生前弄一張平反證，在他死後讓我們告訴家鄉人，他是無辜的。同時他也想告訴那些整他、欺侮過他的人，陳鶴堯不是孬種！

幾十年來，我親眼看到父親痛哭過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時期，許多人餓死了，成批成批地餓死，絕戶絕代地餓死，潭市人餓到有幾起吃人肉的程度。我和母親差點在那場人禍災難中餓死。我親眼看著我的奶奶餓死。父親當時正被趕在棋梓橋水庫工地勞動改造，晚上他聞噩耗後請假趕回家，伏在奶奶遺體上哭得驚天動地。

第二次是 1972 年 9 月 30 日早上，這個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父親為生產隊放牛遲遲沒回家吃早飯，我只好去找他。在一個山坳邊上，父親坐在那裏失聲痛哭，我走攏去一問才明白，原來清早在放牛時，遠處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聯合公報》，裏面有中國宣布放棄接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賠償的內容。父親泪流滿面地痛哭一陣後說：“我們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這些年，我找了許多關於這方面內容的資料給父親看。中日恢復邦交那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率領日本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準備了 40 億美元的戰爭賠款，主動提出要對在中國殺死的 3500 萬人進行賠償。9 月 26 日，周恩來向毛澤東請求接受這筆賠款時，毛澤東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說：“要甚麼戰爭賠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國，我們早叫蔣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對日本公明黨、社會黨的朋友們講了。”過了兩天，在接見時，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進行戰爭賠償，毛澤東再三表示：當年日本人若不打到中國來，我們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毛澤東確實說了大實話。當年，蔣介石與毛澤東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對方。電視劇《延安頌》顯示，日本人大舉進攻國民黨區域時，中共領袖們是異常興奮的。因此，無論日寇進攻哪一方，中國內部就會有一方幸災樂禍。窩裏鬥的劣根性展現無遺，而在世人面前却要裝出大義凜然的嘴臉。父親作為一個正直的軍人，他無法去幫襯什麼人的偉大戰略構想，他只知道與日本鬼子真刀實槍地幹，多殺日寇是他們的驕傲，所以父親到死也弄不清自己殺鬼子為什麼反而成為歷史反革命，殺鬼子到底錯在哪根神經上了。

在對待父親這些人的抗戰歷史問題上，我似乎讀懂了某些潛在法則。他們在抗日前綫拼命殺敵，從某種意義說，是不是對那種偉大戰略構想起了不利的作用？後來在對待漢奸的問題上，似乎就可看出某種端倪。

建國後 30 年來，階級鬥爭越抓越嚴厲，甚至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過。在湖南道縣，還對這些人實行全家毀滅屠殺，小到幾歲的兒孫，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 7000 多人捆住趕入河中和大水庫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乾脆就在岸上被殺死。這種大屠殺和抓階級鬥爭，有最奇特的一點，就是對漢奸們不聞不問，從中央至地方，從沒有過要對漢奸實行階級鬥爭的一條。在對父親的無休無止的批鬥中，我家不遠處的一個鄰居劉雲林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對我說：“當年，你父親如果不是在國民黨部隊，而是當了順民，他的前途會好得多，你們這些子女的出路也會好得多！”我反駁他說，父親雖然站錯了隊而成了反革命，連累了我們幾代人，但總比當無耻漢奸的後代好得多。

父親知道了鄰居這話，十分生氣。一天晚上，父親在地坪邊乘涼時對劉雲林說：“我的這個連隊在浙江往江西鷹潭的轉移途中與鬼子遭遇拼刺刀，一個貴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腸子也流出來了。衛生兵為他包扎好抬上擔架繼續轉移，鬼子在後面追。這個貴州兵為不給部隊添負擔，趁人不注意，在擔架上拿出步槍頂住下頷，腳趾挑動扳機自殺。部隊缺少醫藥，許多兵在這次轉移中患瘡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們來不知幸運多少倍。至少，今天我還活著。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還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講，我到死也要討個清白。”

父親認為，日本政府願意給你賠償，你却宣布放棄接受，這是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表態放棄者毛澤東如果代表他個人，那麼一個強大的中國就應該為人民作主，宣布這種表態無效，理直氣壯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如果毛澤東者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有責任和義務對在抗日戰爭中被日寇殺死和傷害的人民進行代替賠償。

父親的這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銘心，將會伴隨著走過我的一生。東山醫院對父親盡了最大的努力，還從湘潭請來胸腦血管專家來會診。父親畢竟年邁，非醫藥所能救。我怕父親死在醫院裏，只好將他接回老家潭市。每當從昏迷中醒來，父親就只嚷這一句：“平反呢？

給我平反呢！”到了6月9日，他的這種叫嚷更加強烈起來。我和哥哥姐姐都一籌莫展。我們拿什麼去安慰父親這顆受傷的心呢！我們十分清楚，父親將會永遠帶著這種遺憾走向另一個世界。

那天我從湘鄉市統戰部出來趕回醫院，父親就迫切地追問關於平反的事。我能說什麼呢，只能說他們要研究，我們聽候通知。父親越是迫切盼望，我就越苦惱。傍晚時分，我想找幾十年的好友和我的寫作老師王柏松談談。他看了我的報告後，搖了搖頭說：“現在這些人呀，都抱著條條框框，半點自主也不敢作。就是平反，也不是一天二天能做好的。其實，人家都快死了，就是去騙一騙他也是好的。”王柏松這句話突然激發我一個念頭：我們做兒女的，為什麼不想辦法安慰一下父親的心呢，騙一騙他也是好的呀。

於是，6月10日下午，父親病榻前悲壯的一幕發生了。既然是騙人，就要裝得象。我們從20公里外的月山鎮請來兩個演花鼓戲的男演員，其中一個還扛著攝像機。我們承諾，只要演得不露餡，父親信以為真了，報酬好說。

我使勁搖醒昏迷狀態中的父親：“爹爹，你看啊，統戰部的人來看您老人家來了！”父親終於被我搖醒。這也是一種半昏迷狀態的醒，眼睛半睜半閉，迷蒙無光。父親的耳朵有些聾，我只好貼近他的耳朵大聲地重述了一遍。父親輕輕點了點頭，似乎聽懂了。我和哥哥把父親的上身扶起一點，墊上被子，好讓他聆聽“統戰部”領導說話。“統戰部”的人說：“老人家，我是湘鄉市委統戰部部長xxx，我代表湘鄉市黨和政府來看望您老人家來了！”我又貼近父親耳朵邊，大聲地把“統戰部部長”的話重述一遍。父親的頭微微地動了一下，眼睛瞳孔裏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統戰部部長”挨坐在父親的病床邊上，雙手握住父親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說道：“老人家，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您緊握手中的槍，與日本鬼子捨生忘死地浴血奮戰，表現了一個中國軍人應有的愛國情懷，我們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父親耳朵邊大聲重述“統戰部部長”的話，父親突然“哇”的一聲大哭，眼淚象斷了線的珠子般從他瘦癯了的臉頰上滾落下來。父親這一哭，哥哥和姐姐們都跟著大聲哭起來，房間裏一片嗚嗚的哭聲。

“統戰部長”繼續說：“老人家，在極左錯誤路線時代，我們錯誤地對您實行監督管制，給您老人家的後半生造成了身心傷害，我們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並決定對您老人家實行平反，而不是摘帽。”父親聽完我大聲轉述的這些話，哇哇哭得更厲害。我也跟著哭起來。哭聲震動整個房間。我們的哭聲與父親的哭聲是大不相同的。父親是感動的哭，他將帶著這種激動的心情進入另一個世界；而我們是一種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們騙了父親，時局騙了父親，歷史騙了父親！

我拿一條毛巾不時給父親擦著眼淚，忽聽得他嘴裏在說些什麼。我貼下耳朵，父親嘴裏在喃喃地說著話。我聽懂了，大意是在問“平反證，平反證”。我們一家人和“統戰部”的人面面相覷，這是我們疏忽了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統戰部部長”很是機敏，說道：“老人家，您的問題已經得到了平反，平反證很快就會發放下來，只是程序問題了。”看來，這場戲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輪值守護。第二天早上我從電話裏得知，父親晚上睡得較安穩，臉上綻著一絲笑意。但到下午6點多鐘，哥哥與姐姐們打來電話，說父親快不行了，讓我火速趕去潭市。

19時10分我趕到父親身邊。父親在張著嘴喘粗氣，已不能言語，眼睛在無神地瞪著，似乎在盼望什麼。我貼在父親耳邊大聲地呼喚著。他知道我趕回來了，微微地點了兩下頭，右手拇指和食指對我亮著一個“圓”。我以為是父親想喝水。姐姐把水端來，他反而把嘴閉緊了。水拿開了，父親嘴裏一個勁地說著什麼，姐姐說：“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證？”姐姐的話提醒了我，我知道父親此刻的心情。此時如果有什麼人能弄一個假平反證來，我們會不惜重金相買。沒辦法，我只好貼近父親耳邊大聲說：“爹爹，平反證過幾天就會發下來，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說到這，我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19時45分，父親永遠

地闔上了眼睛。一個抗日老兵就這樣走了，永遠走了。父親走時似乎沒有太大的遺憾，但給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留下的遺憾和打擊實在太大了……

父親是一個平凡而普通的人，卻是一個命大的人，僅在淞滬抗戰中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彈擊中，留下癰指小傷，並不影響扣動手槍的扳機。他戲謔自己，因為命苦反而命大。父親常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得住人民和老百姓”。我只舉一例，日寇侵占湘鄉僅一年零二個月，殺死湘鄉人民 15216 人，奸淫婦女 1655 人。當初如果沒有像我父親這樣一些人在正面戰場拼死禦敵，節節抗擊，日寇就可能提前幾年侵略到湘鄉，那麼湘鄉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殺害 8 萬或 10 萬。也許，今天那些坐在辦公室的人的爺爺、奶奶或父母早就被日本鬼子殺害了或奸淫了，根本不會有他們出生和坐在辦公室裏當官做老爺了。

我曾無數次地想：如果父親當年參加的是八路軍或新四軍，今天父親該是何等燦爛輝煌？我們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運又會是怎樣的騰達！但再想想，不都是在打鬼子嗎？為什麼到死還要如此殘酷對待一個抗日老兵？我要大聲地說：我的父親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父親是一個抗戰老兵，他是我們兒女永生的驕傲！

#### 父親的兩次婚姻 陳英賢

父親陳忠欽，福建清流縣餘朋鄉蛟坑村人。1947 年，父親長汀師範畢業後被縣教育局委任為清流縣夢溪中心小學校長。這是方圓五六十裏唯一的一所公立學校。

土改時期，我家被劃為地主。1951 年春，父親被集中到永安勞動教養。在此期間，我村的地主分子陸續被槍斃五六個，祖父也差一點被槍斃。當時槍斃人手續很簡單，村公所提議，區公所批准，即可殺人。母親因承受不了家庭成分帶來的各種歧視和強迫勞動，在同村一個貧農未婚青年的離間挑撥下，與正勞教的父親離了婚。

隨後，母親與那個貧農青年結婚。很快她就後悔離婚太草率了。當時外公外婆堅決不同意母親和父親離婚，多方勸阻，甚至提出斷絕父女關係。母親因此好幾年不敢去娘家。

一年多以後，父親勞動教養結束。母親當初沒想到父親能這麼快就回來。她親自到父親和祖母面前賠禮認錯，表示若是父親能重新接納她，她願立即離婚，與父親複婚。父親拒絕了她的要求。

1954 年，經人介紹，父親和我現在的繼母陳銀娥結婚。繼母原嫁芹溪村，結婚多年未生育，男方疑其不能生育，要求離婚。當時介紹人就對祖母、父親聲明：陳銀娥可能不會生育，要有思想準備，不要以後責怪、後悔。

父親認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況身邊已有一個兒子，即便不生育也無所謂。繼母是窮苦家庭出身，雖然身材瘦小，但身體結實，吃苦耐勞。她雖沒讀過書，但精靈賢慧，通情達理，尊老愛幼，勤儉持家，全家老少因此相處和睦。

祖父是鄉里聞名的老中醫，尤其擅長兒科和婦科。繼母到我家後，經過祖父幾個月的調治，身體漸漸轉入正常，沒多久就懷孕了。此後相繼生了三女二男。

1955 年，繼母的前夫控告父親挑撥婚姻。厄運再一次降臨在父親身上。那天晚上，我們家正吃晚飯，村道上連連響起敲鑼聲，通知村民晚上要開鬥爭大會。

不一會兒，我家門口出現了兩個背著步槍的民兵，通知父親立即去開大會。父親請求吃完飯再去，來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兩個民兵一前一後押送下前往會場接受鬥爭。父親被鬥了一夜，關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蕪區公所。父親含冤受屈被判三年徒刑。

事實上，繼母是與前夫離婚很久才由熟人介紹與父親結婚的。可是人家是貧農，父親是地主，一告就贏。

1958 年 5 月，父親刑滿釋放回家。勞改期間，父親自學一些醫療知識，當上了勞改場的衛生員。獲釋的第二年，蛟坑流行麻疹，大隊一時找不到合適的醫生，就調他到大隊保健站，負責全大隊的醫療保健工作，後又調往餘朋公社衛生院和東坑保健站共工作。父親對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對農民百姓格外關愛，深得廣大群眾的贊譽。

文革開始，階級鬥爭的矛頭再次指向父親。1967 年 5 月，父親被開除公職，回蛟坑種田，接受改造。東坑群眾得知父親要離職，百餘人聯名上書，要求父親留職，但無濟于事。

1968 年夏，父親被公社拘捕關押，擬定次日召開大會批鬥他。當晚，父親從關押的房間破窗逃出。1971 年春，隱藏地點被發現，父親被抓捕，再陷囹圄。父親只是畏懼殘酷批鬥才出逃的，出逃期間也未幹任何壞事，縣執法部門無法定罪，一直無限期拘留他，直到 1974 年才無罪釋放回家。

1981 年父親恢復公職，重回餘朋衛生院工作。1984 年 2 月下旬在縣城開會時，突發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辭世，年僅 58 歲。

#### 父親王藥雨 王譽虎

父親王藥雨，1904 年生于天津桃源沽，國人熟知的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爺爺是中醫。父親自幼跟爺爺學醫，後經人推薦，入南開大學任職，并半工半讀選學中醫藥，曾隨美國植物考察團在中國境內考察中草藥物的分布情況。1928 年又師從中醫學泰斗張錫純。張是中西醫學匯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醫結合，有巨著《醫學折衷參西錄》行世，曾列名當時的中國四大名醫。其間，父親還結識了北京名醫孔伯華、施今墨等國手。

1930 年，父親應恩師孔伯華之邀，到北京北國醫學院任教，1932 年轉入施今墨的華北國醫學院任教，主講《傷寒論》，同時主編《明日醫藥》雜誌。該雜誌力倡中西醫結合，名噪一時，影響海內外。抗戰爆發，國府遷都重慶，父親到陪都羅家壩籌辦藥廠，專門研製中成藥。其中健胃靈最為成功，深受軍民好評。不久，藥廠成為日本飛機攻擊的目標，被炸彈夷為平地。父親一身是債，跑到昆明去當坐堂郎中。雲南是中國最大的中草藥生產地和集散地，父親研製的許多著名中成藥都是在這裏完成的。

1954 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請施今墨主持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父親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親自批條，在安定門內前尚家胡同三號撥出三間北房，作為父親的住宅。

父親無論何時都注重儀錶，中式上衣配西褲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頗有紳士風度。1957 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內和小朋友玩彈球，父親腋下夾著一卷草黃色宣紙向我走來，說道：“虎兒，快回家幫我做點事！”回到家中，父親把宣紙攤在桌上，備好筆墨，吩咐說：“替你老爸寫份大字報。”父親書法極好，一手飄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己為什麼不寫？我有些納悶兒。十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張大字報的背景。反右來了，單位領導要父親給共產黨提意見，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黨委書記因此找到父親談話。由于擔心落下抵制運動的罪名，父親無奈之下決定寫一篇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先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後建議主管業務的領導選拔多少懂點醫學知識或學歷高一些的人來學習中醫。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父親的大字報被指控為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惡毒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年底，父親被打成中右，降三級，發配至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父親所在的農工民主黨也馬上開除了父親的黨籍。可笑的是，1979 年初父親臨終前，又接到該黨恢復其黨籍的書面通知。

父親醫術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譽為神醫。1960 年大饑荒，青海少數民族牧區肝炎、黃膽病、浮腫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授意青海省委書記高鋒進行調查，任務落實到省人民醫院。院黨委書記李子彬挂帥，父親王藥兩為考察團技術顧問，一行幾十人迅速奔赴牧區。

半月之後，考察結束（1961 年電影新聞紀錄片有報道）。李子彬讓父親執筆寫考察報告，要如實呈報，不回避饑餓造成死亡的事實。父親不從，堅持從純醫學角度就事論事，力避使用“饑餓所致”之類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為不滿，大談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說敢為。父親無奈之下說出自己的心裏話：“李書記，我為什麼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黨委書記，你比我更清楚反右鬥爭。我吸取教訓了，不想再犯錯誤。”李子彬書記妥協了，決定同時寫兩份考察報告。一份由他本人執筆，直來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饑餓，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饑餓。父親的那份報告則諱莫如深，只說百姓缺乏營養，全篇不見“饑餓”二字。報告轉呈到蘭州時，兩位來此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看到了，將其捅到北京。

此時正當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各地大批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各單位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子彬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留黨查看，貶至黑龍江雙鴨山礦務局當總務處長。父親則因報告避重就輕耍滑頭，得到新任省委書記的賞識和表揚。在舉家遷往東北前夕，李子彬特邀父親到家中吃晚飯。兩人邊喝酒邊傾談，李子彬說：“王醫生，看來我們共產黨是不讓人講真話了！你說真話成了右派分子，我說真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唉，今後誰還敢講真話？這樣下去，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如何得了喲！”父親不接話茬，只是說：“李書記，我們今天只喝酒，不談時事。”從此，一個黨委書記和一個右派知識分子成為終生的莫逆之交。

王中陵挽謝韜詩 焦國標書

- 編者提示
- 一、本刊為半月刊，免費贈閱，歡迎來稿。
  -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 三、本刊聯絡手機：13240468075。
  - 四、願意捐贈資助《憶舊》半月刊的朋友，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北大燕北園 305 甲樓 110 號陳星宇收，郵編 100091。
  -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工商銀行馬連窪支行，賬號 0200251101028450741，戶名陳星宇。
  - 七、期待朋友們的任何意見和建議。



## 《黑五類憶舊》第四期 20100916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為什麼會出現黑五類現象 焦國標

黑五類賤民現象，在中國不以爲非、不以爲罪地合法存在了三十五年（1949-1984）。這一罪惡和苦難涉及的人口超過 1 億人。編了兩個多月的《憶舊》，我不幸地發現，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和文章實在太少了，網上能搜索到的也就三四人篇而已。李若建教授和他的《從贖罪到替罪——四類分子階層研究初步》，楊奎松教授和他的《新中國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農問題》，屬於這三四人篇中的扛鼎之人和之作；而李教授文章中探討四類分子現象的社會成因部分，則更是我所瀏覽到的絕無僅有的幾段探討前後持續了 35 年、使上億人蒙受苦難的醜惡現象的社會政治文化根源的文字。

李教授的這幾段論述，恐怕至今仍然局限在有限的學術圈子裏。今天我做一回學術掇客，把它從學術圈扛到更普羅的讀者面前。當然，這裏的一些尖銳措辭是我的，不是李教授的。這一點是需要告知讀者諸君的。

黑五類現象固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絕非它的唯一根源。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與中國一樣，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可是那裏却不曾存在大規模的類似中國黑五類的政治賤民群體。這就說明，黑五類現象是中國固有傳統文化根性和國民性上長出一個特有的巨型社會政治腫瘤。

首先，中國本來就是一個慣于製造賤民的社會。中國歷史上雖然不像印度那樣有一個龐大的賤民階層，可却從來不缺賤民群體。中共建國後，二流子、破鞋、吸毒者、賭徒、地痞流氓、小偷小摸等等被新政府認定爲新的賤民階層，不問現狀，不加審查，全都列入特殊戶口管理，可以任意剝奪他們的權利和自由。這部分人被歧視、受欺凌，其他大多數人都習以爲常，認爲理所當然。這是黑五類現象之所以能在中國存在 30 多年的社會傳統基礎。

其次，毛澤東工具主義的政治邏輯製造了黑五類賤民。毛幾十年的革命運動，總體說來是屬於工具主義的。說白了就是過河拆橋、卸磨殺驢主義。幾十年來，無論中國社會的哪個階層，毛澤東要用它時就抓來或哄來一用，用過隨手就扔，甚至隨手就殺。中共立國前，許

許多的共產黨員出身于地主、資本家。可是“一闊臉就變”，拿到政權馬上翻臉。建國以後，中共對四類、五類分子的政策和態度也是屢隨其政治需要而改變。想整就整一陣，想松就松一陣，無法無天，目中無人，完全由著自己的政治感覺走。極具代表性的一個個案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平陸“61個階級兄弟”中毒和搶救事件。61人有不少是地主富農子弟，還有個別是反革命家屬，他們當然不是階級兄弟。可是爲了“做文章”的需要，爲了突出社會主義中國的階級兄弟之愛，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都被填成下中農或中農，暫時享受了階級兄弟的待遇。可事件過後，他們又全部被恢復了原來的家庭成分。曾經享受一時的階級兄弟待遇，在後來的階級鬥爭和文革中都被“倒找回來”——有的被毒打致殘，有的被迫自殺，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

再次，追求非法的社會穩定製造了黑五類政治賤民。從土改起，製造敵人就成爲毛控制中國社會的重要手段。在每一個村子、每一個單位都製造出一小批敵人，然後讓每個村子、每個單位內的大多數人與小少數人彼此爲敵，于是中國成爲無數個內部自成敵對關係的小國，于是中南海就在這無數小國的內戰中享受著愜意的穩定統治。每個村子、每個單位的大多數人都高度戒備，避免自己進入敵對的政治賤民群體。黑五類雖然人口數量很大，但相對於全體中國人來說，仍然是少數。在黑五類賤民蒙受苦難和屈辱的同時，百分之八九十的其他中國人仍然認爲他們在政治上是相對幸運的，因此對社會也是相對滿意的。既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感到相對滿意，這個社會能不穩定嗎？

第四，尋找替罪羊的傾向製造了黑五類政治賤民。尋找替罪羊傾向是人類的普遍天性，而在毛澤東的中國，這種天性發揮到極致。1979年四類分子評審摘帽時，有些農村幹部主張：“東莊留個地主，西莊留個反革命，到時候拿出他們來鎮唬鎮唬。”這表明，四類分子已經成爲農村幹部以殺雞嚇猴方式統治農村的那只雞。70年代李若建教授所在的那個村子，某年春耕時節，許多農民在一個集市日去趕集而不到集體田裏勞動，駐村路綫教育工作隊員大爲憤怒。“去趕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過七旬的老地主，儘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可是路綫教育工作隊認定是老地主煽動農民去趕集，破壞春耕生產。第二天晚上，生產大隊召開批鬥大會，老地主站在大隊禮堂舞臺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撐不住，由地主的兒子代替他站在臺上接受一個多小時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體不好，平常對四類分子的訓話和勞役大多數由他們的兒子代替。”“批判老地主的效果很顯著，農民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實農民不出工去趕集，是對大集體消極怠工的一種表現，與老地主完全無關，工作隊只是拿老地主來殺雞嚇猴。黑五類就是這樣的替罪羊。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萬事一收拾黑五類就大吉大利。

四類分子摘帽前，地富分子死了，子女要接班改造。一些公社、大隊開會時，煮飯、取暖用的燒柴全靠四類分子無償背來，老子死了，兒子繼續背。地富子女成爲某些特定領域的生產主力軍，離開他們，社會幾乎無法運轉。某些偏遠地區，馬幫的驛道維修主要靠四類分子。1979年四類分子摘帽後，無人負責維修，道路狀況迅速惡化，摔死摔傷馱馬的事故頻繁發生。中國社會已經離不開政治賤民。今天，社會底層賤民的規模和數量遠遠超過當年的四類分子階層。當年社會對四類分子的歧視與冷漠，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對象改變了，比如變成對貧困者和對農民工的冷漠。今天的北京，引進的海歸或其他人才，孩子可以馬上入學，可以參加北京中考、高考，可是在北京的農民工子弟却長期上不了學，現在可以在北京上小學了，却仍然無法在北京參加中考、高考。中國啊中國，你不製造賤民就無法顯示你的文明和強大嗎？

補白：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幾個同學在學校附近突然發現一個穿風衣的人。五十年代末期穿風衣的非常少。爲什麼呢？在當時的電影裏，穿風衣的全是特務，所以有風衣的人也不太敢穿了。我不知道那位先生爲什麼穿著風衣，在我們幾個小學生眼裏，第一個反應

就是這是個特務。然後我們開始跟踪他，大街小巷跟踪了好半天，越跟踪越覺得他是個特務。差不多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一直跟踪到天都黑了，結果還是給跟丟了。我們非常非常地懊悔，說我們還是沒有經驗，讓他把我們甩了。當時我們就處于這種隨時隨地準備抓特務、抓敵人的情緒當中。

胡發雲

瑪麗有只小羊羔 焦國標書

## 目 錄

平反還是謝罪·····	茅于軾 (06)
母親的自殺·····	周 舵 (08)
我的早年·····	文貫中 (17)
被鬥記·····	張 敏 (20)
十四年的隱私·····	海 鷗 (23)
鄉下的大船哥哥·····	童 話 (26)
五姨媽·····	蔡 楚 (29)
謀害偉人案·····	曉 寒 (31)
他為何瘋了·····	海之鷗 (33)
懷念陶懋順·····	胡顯中 (38)
好險的棒子根·····	林 玉 (41)
同學李大穎·····	佚 名 (43)
憶苦思甜全過程·····	大 隱 (48)
地主仔陳國慶·····	心 聲 (51)
我家是這樣當上地主的·····	侯德喜 (53)
先行者戴潔天·····	溫州人 (55)
恐懼與希望·····	莫 言 (57)
劉義元賣妻·····	林啓山 (59)
我經歷的幾個右派·····	正經人 (65)
知青美女喬獻華·····	周 立 (67)
周立波為何倒黴·····	朱忠康 (71)
四類分子的身份意識·····	李若建 (74)
神佑張乃仁·····	黎學智 (77)
桃園釣客·····	從維熙 (79)
富農兒女的婚姻·····	燕趙客 (82)
地主之殤·····	野 夫 (85)
清華老子和牛·····	瀟 雨 (89)
六叔三案·····	玉壺生 (93)
少年陳丹青·····	曾慧燕 (95)
整人要用二百五·····	朱之泓 (97)
鄧朴方的賤民歲月·····	張士峰 (99)

平反還是謝罪 茅于軾

毛澤東搞了三十年的階級鬥爭，被傷害的人遍及神州大地。這使人想起秦始皇的統治，賦役繁重，刑法苛酷，天下罪人不計其數，黥面、斷肢者絡繹于途。中國那三十年的人鬥人，直接整死的，包括被槍斃的，餓死的，自殺的，武鬥死的，估計有五千萬之譜，間接波及的家屬和親朋好友則超過一億，約占當時全國人口的十分之一。更由于被整的大多是社會精英，因此社會組織遭到極大破壞。這是中華民族的空前劫難。四人幫倒臺後最緊迫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錯案。我就是平反的一個對象。我 1958 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又被抄家，掃地出門，被判定為首都的危險分子，趕去大同。

現在的青年人很難理解平反有什麼意義，不平反又會怎樣。要知道，三十年前中國的一切都被共產黨控制著。每個人的飯碗拿在共產黨手裏。讓你有飯吃就有飯吃，不讓你吃飯，就只好餓死。不像現在政府不雇傭你，可以去私營企業，或者去外企，甚至擺地攤，找口飯吃并不太難。那時候一個“有罪”的人是很難有飯吃的，就算有，也是處處受歧視，一輩子不能入黨，不能參軍，甚至不讓你上大學，是完全沒有前途的。不但你本人，連你的子子孫孫也都被歧視。只有平反才能消除這些問題，使社會恢復生氣，避免人鬥人的內耗，使國家走上發展之路。

當時平反并不是沒有阻力的。許多人認為把大家都平了反，專政機器還專誰的政呢？這種思想至今也還有市場，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仍然被保留在憲法裏即是明證。還有四個堅持之類的變相說法，也都有市場。要不是胡耀邦力主平反，這件事還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天。胡耀邦主張的平反，就是一風吹，也就是一個不留地全部解放。本來嘛，國家有法律，在法律之外搞政治迫害根本就是非法的。後來修改刑法的時候把反革命罪也取消了。不過人的思想總是落後于現實，直到最近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大學的學生還告密說老師在課堂上宣揚反革命觀點。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美國去他未必發動得起來，就因為在中國有許多像上述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大學學生那樣的人。至今我們還沒有把握說中國就不會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之類的事。

平反之于我，除了還欠我兩級工資之外，沒有什麼遺留問題。平反前我在單位（鐵道科學研究院）已經有了能夠立足的學術地位，沒有什麼要乞求于人的事，所以我對平不平反不太關心，而且我對平反這個說法根本上就有不同的看法。今天共產黨給大家平了反，明天還可以給你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權在人家手裏，平反有什麼用？所以我認為更徹底的辦法是從根本上取消統治者能夠整老百姓的權力，恢復百姓的憲法權利。因而我更關心普通百姓的權利，而不是個別人的平反問題，除非把平反和百姓的基本權利聯繫起來，那是我很關心的事。

就個人而言，我也不認為我需要平反。常說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我則實在是被正確地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儘管我當時對什麼是資本主義或初級階段都不太瞭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論中確實有豬肉買不著就應該漲價的主張，還有如果毛澤東要見一位科學家，應該是毛去見他，而不是他去見毛，諸如此類。如果說我當時并不錯，所以要平反，那就說明那時共產黨錯了。可是至今也沒有誰說那時共產黨做錯了。所以它要給我平反，可是邏輯却不許我領這個情。

1978 年已經過去三十年了，那一年最重要的事在我看來就是平反冤假錯案。可是這件事至今還留著尾巴，並沒有徹底解決問題，那就是究竟誰對誰錯。更為根本的問題是，是誰賦予一個政權虐待自己百姓、無端迫害他們的權力。現在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根本不是平反的問題，而是當時整人的人要向受害者謝罪的問題。

母親算不上出身名門，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兒。外婆楊惠敏曾是同盟會會員。外公楊定華也是同盟會員，辛亥後當過縣官，因同情共產黨，放走過共黨嫌犯，沒能升官。四九年以後，也許是由于與毛澤東的表兄兼老師王季范的交情，外公當了一陣國務院參事，六二年病逝于長沙。

母親很孝順，但并不怎麼聽話。母親有一姊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產黨，娶了姨太太之後，外婆與他不和。四九年，外婆和大姨媽楊端淑隨在國民黨空軍供職的舅舅楊長庚撤退到臺灣，從此杳無音信。貞淑姨媽一家八口（夫妻和六子女）五〇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寫信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公正廉明為民擁戴，催他們回大陸。他們聽了外公的話，回來了。沒多久，姨父羅澤榮就被指為潛伏特務（他原是國民黨空軍管電臺的上校），抓起來判了二十年刑，送到北大荒，六九年刑滿釋放，不久病逝于東北。姨媽每說起姨父都極為傷心。她說姨父是她一輩子遇見過的最寬厚善良的人。

母親從小要强，讀書時永遠考第一。她和貞淑姨媽兩人被稱為姊妹花——聰明，功課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畢業以後，外公外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麼大學？母親鬧著非要上，結果在南京女子師範讀了兩年，家裏無論如何不再給學費。一氣之下，母親報考了華僑師資訓練班，三九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馬來亞，日寇入侵後到了印度，在加爾各答、孟買、噶倫堡辦華僑子弟學校，成績斐然，在僑界頗有點名氣。看過她那時照片的很多人都說她像電影明星。那時的母親是男士們爭相追求的目標。

中共建政之初，與蘇聯打得火熱，全國上下都學俄語，母親也自學起俄語來。憑著她的聰明，加上英文的底子，居然學得不錯。母親曾在北京十九中教俄語，頗覺失意，後來費老大勁調到了北大俄語系，當一名資料員。那時母親對毛那一套漸漸走火入魔，腦子裏什麼都不想了，只有一個心思，就是入黨、入黨。對家務和子女越來越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黨聯繫人無止無休地彙報思想。母親這時一切從簡，盡力向勞動人民看齊，向工農兵看齊。“三年困難時期”，物價暴漲，百物匱乏，少許的存款連同母親年輕時積攢下的一點金銀首飾，陸續被通貨膨脹的血盆大口吞吃乾淨。那時一兩黃金的國家收購價僅九十餘元人民幣，簡直是掠奪性的。母親賣時一邊肉疼，一邊自我安慰，說是“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黨不是那麼好入的，那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些人窮畢生之精力，也不得其門而入。不知有沒有人研究過入黨學，我建議創立這門學問，為有志者指點迷津。

我還沒見過比母親更信黨、更愛黨勝過一切的人。入黨，這是她後半生全部生命意義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還有別的什麼價值。丈夫不必說了，需要的話，家庭、子女、親友乃至她的生命，無論什麼，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獻給黨。

黨的大門却對她緊閉著——不是徹底關閉，而是留著一絲絲縫隙，透出一綫綫光明，讓她永遠不至徹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會關係複雜——一大幫親戚朋友在海外、在臺灣；在黨困難的時候，她沒有過絲毫貢獻——儘管她說她年輕時就嚮往進步，結交共產黨朋友，并且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她過去的生活方式可疑——完全是一位資產階級闊太太的模式，儘管她說她不過是個知識分子，從來不是資產階級的一員，但她不敢否認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圈子；更要命的是，她還加入過國民黨——雖說她檢討過一百次以上，說那是生計所迫，不入就去不了那個該死的僑資訓練班，拿不到飯碗，而且一上了開往海外的輪船，她就將國民黨的黨員證撕碎扔進了大海，可是畢竟，誰又看見了這事？再說，那麼多的人都沒有加入國民黨，而他們也要吃飯。只有拼命地工作，拼命地檢討、懺悔、拼命地學習毛主席著作，拼命地彙報思想情況。她若是大有名氣，有些社會影響，出于統戰需要，倒還有可能得到格外關照，可她偏偏並無籍籍名。或者，她若是具有深入入黨學的天賦，不那麼粗直坦率，不那麼缺乏分寸感，不那麼顯得過火而不可信，她的希望也不是絕對沒有。但這些終究是“也許”。于是乎，入黨之于她，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也。

母親并不傻，她理智健全，像她這樣渾身不對勁的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一步不慎，一

句話說錯，都可能招致滅頂之災。因而想必她整天戰戰兢兢，深懷恐懼，這大概就是驅策她拼命向党交心的首要原因。其次，應當歸因于她的理想主義、事業心、爭強好勝。她是個不甘碌碌無為的人，業務上無所成，總得另找發泄通道。其三，她畢竟不是個真正聰明的人，心理構造粗糙得很，從來就簡單化，和那套意識形態愚妄教義有相合之處。其四，母親待人處事的本領并不高明，人情世故從未超出常識水平之上，而毛的極左教育則把這點常識也洗刷得乾乾淨淨，于是入黨成了尋求歸屬感的唯一通道。從天性說，母親其實是個相當任性的女人，粗直、急躁、簡單、任性都是她的致命傷。

文革的血雨腥風夾著山呼“萬歲”的巨雷滾滾而至的時候，母親大概還算是坦然的。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反動學術權威，無論如何鬥不到她頭上。

六七年十二月，一個深夜，七八個穿一身藍警服的公安人員，向母親出示了逮捕證。母親憤怒抗議。當然無用。有一位警察坐上窗臺，探出半身，上下張望，大概是在找電臺之類。我安了幾個電綫插座，他們也要問是幹什麼用的，好像不問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母親這一去就是五年半，直到七三年五月份保外就醫。

剛進去時，她絕食抗議。三天之後，被帶出去，從鼻子裏插橡皮管，硬往胃裏灌稀粥。慢慢的，她的思想覺悟徹底提高，成了監裏的超級模範犯人。不僅生活上處處照顧別人，還現身說法，宣傳毛主席偉大的革命路綫，講述舊社會的黑暗。她有慢性腹瀉，却拒絕吃藥，說是已經給黨和國家添了很多麻煩，不能再多花國家的錢。她說她真心感謝黨和政府給她這樣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說到動情處，還流下淚來。

七三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插隊落戶的地方忽然接到妹妹一封電報，告訴我母親已出獄，讓我速返。聽村裏老鄉講，甲魚大補，我急忙讓人幫我買了兩大鐵桶，趕回北京。母親身體全垮了，住在北大校醫院。我馬上趕到那兒。聽同室的病友說，母親去洗漱間，馬上就回來。我坐在床邊等著。一會兒，就見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身高不足一米二三，一手拄拐，一手扶牆，一步一步往病房裏蹭。病友告訴我母親回來了。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年母親才 56 歲，被捕前還是滿頭黑髮，健步如飛，眼前這畸型的老婦人怎會是我的母親！直到聽母親叫我：“舵兒，是你來了！”我才確信，這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我跑上去，和一位病友一起把她扶到病床邊坐下，只說了一句：“媽媽，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就再也克制不住，不禁痛哭失聲。

自從我長大成人，遇上的事情多了。父母雙雙被捕，自己扒火車，蹲監獄，在內蒙放羊迷了路，羊群被狼咬死九十多隻，在白洋澱獨自一人划船進縣城，在伸手不見五指的蘆葦蕩裏轉來轉去出不來……我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看電影、聽音樂、讀小說時除外）。這回是猝不及防，全然不備。母親自己倒很平靜，直到聽我恨恨地說“我早晚得跟那些人算賬”，才立刻大聲喝斥我不許胡說！接著就是一堂政治課，說監獄裏那些公安同志們對她多麼多麼好，她從內心裏感激黨給了她一個最好的受教育機會，使她能夠徹底改造思想；說她這幾年受益如何之大，臨出獄時對看守的公安人員如何依依不捨。聽著聽著，我的心沉下去，沉下去，沉到無邊的冰冷黑暗中去了，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此後我們天天燉甲魚和雞湯給她送到病房，四處尋醫求藥。她在監獄裏五年半，由于長期曬不到太陽，又逢更年期，特別需要鈣質，本就有慢性腹瀉，又整天坐著，因缺鈣導致骨質疏鬆，骨質疏鬆導致脊椎側彎畸形，身高比原來矮了將近二十厘米。外形變化還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難忍。後來又慢慢發展到大腿麻木，最終使她下定了自殺的決心。

母親的體質一天天好起來，頭髮也由全白慢慢變黑。與此同時，她與我們思想和感情的距離却越來越大。五年多的監獄生活，完全與世隔絕，母親已被徹底洗腦，成了毛極左路綫最堅決、最頑固、最偏執的虔誠信徒。我和妹妹自從七一年林彪摔死之後，就徹底醒悟了，對極左那一套豈止是懷疑、不信，簡直就是恨之入骨。這一左一右，觀念、情感的差距該是多麼巨大！這以後的三年（至七六年毛死四人幫倒臺），我們兄妹三人與母親的關係完全演

變成親子之間的一部鬥爭史。

母親的結論遲遲沒下來。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語系總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親立刻信心百倍起來，拖著一個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歸，比誰都積極。有一天，她滿懷信心地對我們說：“你們看著吧！過不了多久我就能入黨！”我們唯有苦笑。

當初，妹妹經多方奔走，終於從父親供職的中央民族學院爭取到每月 40 元生活費，得以長期帶著小弟在北京，沒去鄉下插隊。出獄後的母親對她大為不滿，堅持讓她下鄉去。這時知識青年們都已開始回城，哪還有往鄉下跑的！這還不算，小弟高中快畢業了，母親同樣堅決要他去插隊，我們則堅決反對。對當時的什麼張鐵生之流，我們是罵不絕口，母親則贊不絕口。總之，沒有一件事我們能跟她談得攏，一見面必是吵架。後來鬧到她要把弟弟、妹妹從她那裏全部趕走，我罵她“不配作個母親”，她打我耳光，我則一怒之下把個暖瓶摔在地上，碰上門發誓再也不想見她的面。

七五年鄧小平出山，大家臉上露出點喜色，稍稍松一口氣。母親則對鄧大為不滿，懷疑他反對毛主席。她堅信只有四人幫才是真正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四人幫倒臺後，母親完全蔫了，懵了，簡直再也辨不清東南西北。這時系裏又叫她退休。這是致命的一擊，母親的全部希望徹底破滅了。家裏系裏，大大小小的矛盾衝突、精神折磨，人世間滄桑的巨變，偶像的倒臺，加上衆叛親離，一切一切，使母親這樣絕對剛強的人也終於精神崩潰了。她開始疑神疑鬼，說是有人跟踪她。半夜裏，她時不時爬起來，伏在窗臺上往外張望，說有人用電臺對著她，罵她。我聽妹妹說起這些情況後，腦子“轟”的一聲，急得冒火，可又毫無辦法。妹妹求我陪她住幾天，我只好白天侍候瘋子父親，晚上跑到北大睡在瘋子母親房間，叫她放心，安慰她沒事，有我在，壞人不敢來。我每次去，她的病情就好些，我一走，又一切如故。

母親從小偏愛我，總是滿懷信心地認定我將來會成為大科學家，會做出大成績。我的生活習慣與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愛整潔的遺傳。我雖然怕她、疏遠她，可又很可憐、很可憐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經常給她煮個荷包蛋，讓她回來吃。她愛吃綠豆（那個年頭，綠豆可是影子也見不到），我只要下鄉勞動，總要千方百計買些回來。出去大串聯，我千里迢迢從四川給她買回她愛吃的南方的腐乳。我知道，母親是深愛我的——儘管她拙于表達。我也知道，她一直希望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試過，不成。我酷愛西洋古典音樂，她却合著四人幫的調門，說那是資產階級趣味。別的還好說，不讓我聽音樂却無論如何也不成。讀書、與朋友交往等等她也管束極嚴，讓我無法接受。妹妹後來出嫁了，小弟却跟她怎麼也合不來。小弟是奶媽帶大的，從沒吃過她的奶——我堅信這對於母子感情至關重要。她被捕時，小弟才十歲，等她出獄，小弟已長成半大小子了。我清楚記得她出獄後初次見到小弟時那驚詫、陌生的表情。小弟又是個出奇髒亂差的典型，與她格格不入。總之，生活中已經沒有一件可令她快慰的事了。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傷了她的心。那是七五年，姨媽退休後從長沙趕來，陪她住了一陣。姨媽是個極富同情心、快活開朗、心胸開闊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來。她總是樣樣要姨媽依著她，總是指責姨媽這也不對，那也不對，搞得姨媽好不傷心。文革期間，姨媽雖不在我們身邊，待我們却如親生母親，關懷備至，不斷給我們來信、寄錢。我和姨媽可以無話不談，非常親近。這顯然深深刺痛了母親。更倒黴的是，一次我和姨媽在房裏說話，我說了些母親的缺點，說她“缺少母愛”。這話說得太苛刻了，話一出口我就自覺失言，可是天下竟有這等巧事，恰恰被她從外面回來後聽了去，登時勃然大怒，并指責姨媽挑撥我們母子的關係。我後來雖一再解釋，但肯定抹不掉這句話在她心上留下的深深傷痛。

七六至七八年，鄧小平的作用開始顯露，國家開始顯現出新氣象。但是，極左派還在左，文革的陰影仍然濃重地籠罩在人們頭上。我家的情況不能說更壞，但也未見得好轉。我假造病歷，“病退”回京，就業無門，街道上分配我去醬油廠。據說共四個車間，分別造醬油、造醋、腌醬菜和做豆製品。我當然不去。小弟正上中學，為父母的問題經常被同學欺負，逼

得我有一次找上門去，要揍那小子。他畢業後似乎除了插隊，也別無出路。妹妹更慘，辦病退都還沒辦成。父親定期發瘋，母親又被逼得成了心因性精神病，迫害妄想。壓斷駱駝的脊背，只差最後的兩根稻草。

七七年，恢復高考制度，我當然不能錯過機會。考得不理想，但仍比錄取綫高出四十多分，可是，連師範學院都沒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處打聽，招生辦只說我是“身體不合格”。我的“身體不合格”，其實是病歷造假，我不能直說那是假造的。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因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此人大模大樣慣了，有一次，進得門來往沙發上一坐，就開始審我。幾句話不合，被我罵了出去。這在文革那個恐怖年代，也算是絕無僅有。那個北大家屬委員會左得厲害，兩下裏合謀，給我檔案裏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狀。

為高考錄取的事，前前後後跑了好幾個月，直到七八年三月。這天，我去家屬委員會詢問原委，只告我別再跑了，沒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懶，到母親那裏吃午飯。母親很關切地問情況，我只說沒希望了。母親半晌沒說話，最後，她認定是因為父母的問題影響了我。我擔保說不是。她不信。

母親這時精神狀況已大有起色。我常去她那裏，長時間地跟她談心，剖析她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說得她泪流滿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話：“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後情況都會好起來，勸她別太難過。我想托人給她找個代英語課的工作，她很高興。但是，這不是容易辦到的。我自己找代課的職位尚且難上難，更何況她一個身體畸形的半殘老人？她怯生生地問了我幾次，我說還得等等，後來她也就不再提起。她肯定也為自己的身體畸形痛苦萬分。

我誤以為母親的精神狀況大體已經康復，自己又在忙高考，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親（出獄後的父親另住他處），對她很難照顧周到，只能有時抽空去匆匆坐上一會兒，無暇與她長談。我每次去，臨走她都依依不捨，問我下次什麼時候再來。

這天的午飯，後來回想起來，才知道母親已下了決心。這頓飯她完全是在拼命強咽，像在嚼蠟，面色灰白。我問她要不要我騎車帶她去醫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搖頭拒絕。飯後，大家無情無緒。我說要走，母親才如夢方醒，送我出門。她站在樓梯口上，嘴唇和手都在微微顫抖，聲音淒楚地照例問我什麼時候再來，我說就在這兩天吧。她站了一會兒，看我下樓，然後猛地回身，進屋去了。我這個粗心的傻瓜，竟然一絲一毫預感都沒有！

第二天，我到底不大放心，特地去科學院中關村糕點部買了幾樣比較精緻的西式糕點去看她。一進屋門，出來的是鄰居，北大物理系教師唐健正。我問我媽呢？他看我平靜的樣子，很驚訝，問我：“你沒接到小弟的電話？”我說沒有啊，什麼事？“你媽出事了。”我一聽大驚，忙問怎麼回事？她人在哪兒？及至聽說母親已自縊，我一下靠到櫃子上，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小弟回來後，告訴我大概情況。是他把母親的遺體解下來，放在床上的。一會兒妹妹也來了，三個人相對無語，我是全然麻木了。一會兒，公安局來了人，忙前忙後，問話。他們走後，過了總有一個小時，我站起來，說要去看看，弟弟妹妹趕忙阻撓，說太可怕了，叫我別去看。我猛地用力推開他們，沖進母親的臥室，跪倒在她床前，掀開她臉上蓋的毛巾。母親臉上一塊塊青紫，嘴角還有淤血。我緊握住母親已經冰涼的手，放聲大哭。直到系裏來了人，把我拉開，把母親的遺體抬走。她的指甲縫裏留有一些血迹，我從未問過別人，但我相信那是她臨終掙扎時，用手握繩子造成的。

在母親的書桌上發現了她用顫抖不止的手寫下的幾句遺言，是留給小弟的。很平靜，很簡單，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只說到政治生命最重要，其他都是身外之物，讓小弟“緊跟華主席，永遠幹革命”，囑咐把她的退還工資及存款五千元全部上交國家。

補白：文革初期，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看見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拖著一輛板車，板車上是非常重的東西，好象是櫃子和書。剛好他過一座小橋，就在我們現在的湖北美院附近，



原來叫雲架橋。我就上去幫他推，因為我們同時也受了另外一種教育，就是雷鋒式的教育。當我推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他是個地主，你幫他推？”這個時候，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還剩一點他就要上到橋頂了，我如果幫他一直推上去，我等于是在明知他是地主的情況下，我還在幫忙，我就失去了階級立場。我如果是不幫他推，他很快就會滑下來，因為他那時候已經在依賴我後面的推動力了。但是我當時還是停了下來，因為當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地主是壞人，地主是黃世仁，是南霸天，是周扒皮。儘管這個瘦弱的老人在我看來一點不像在電影、動畫片或者是雕塑、小人書裏地主的面目。但是，既然有人那麼說了，我就只能表示我要跟這個地主劃清界限。

胡發雲

補白：遠房表哥顏廷勇，三次匿名寫信給中共中央，反映成分論給像他這樣的地富子弟帶來的不公正待遇，明確反對共產黨的階級政策。1977年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游街示眾後被槍殺。此時四人幫已經被粉碎。1979年得到平反，但他寶貴的生命却永遠被絞殺了！讓我們記住極左思想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和不幸，為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不懈鬥爭。

柴會群

## 我的早年 文貫中

淮海戰役的時候，父親在前綫打仗，母親帶著我們全家到了臺灣。次年年初，淮海戰役結束，一個副官輾轉到了臺灣，給母親捎來了父親被俘後的唯一的一封來信。日內瓦公約規定，停戰半年之後，雙方都會釋放俘虜。母親決定回大陸救丈夫。她在淮北、魯南一帶到處打聽父親的下落，吃盡了苦頭。她是穿著高跟鞋，抹著口紅，穿著貂皮大衣走的，却是穿著草鞋回來的。

找了半年，始終沒有得到丈夫的消息。當得知上海就要封港時，她意識到，一旦封港，一家可能會長久分處三地，于是托上海的好友打電報去臺灣，要阿婆快帶孩子們回上海。他們乘坐的是臺灣到上海的最後一趟船。之後，蔣介石命令封港，直到五十八年後的今天兩地仍不通航。

阿婆說，母親從淮北回到上海時，又黑又瘦，蓬頭垢面，衣服破破爛爛，根本認不出來，首飾和好一些的隨身衣服都賣掉了，有一段時間還光著腳，跟要飯的農民搶吃的。這一年我三歲。

母親畢業于復旦大學，婚後不再工作，相夫教子，安心做家庭婦女。現在丈夫身陷囹圄，為了生活，她再次走出家庭，到培養會計人員的立信高級會計學校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

母親從小就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人們不是叫她四小姐，就是叫她文太太。後來在會計學校，師生又叫她文老師，弄堂裏的鄰居叫她文師母。那一段時間大家很尊敬她，她也覺得自己堂堂正正，自食其力，今後還有希望。

可是好景不長，因丈夫的緣故，她很快被管制，放下教鞭，變成一個連學生都可直呼其名、對她頤指氣使的工友。當時還不風行體罰，但是對於一個心氣甚高的人來說，精神的羞辱遠甚于肉體的懲罰。每個星期天她都不得不把孩子們支到公園去，以便戰戰兢兢地接待警察。警察們拿著很厚的一疊照片，要她指認照片上的人，沒完沒了地追問他們的下落。如果說不知道，警察就會大聲訓斥說：你很不老實，你為什麼從臺灣回來？是不是潛伏在這兒的特務？

這段時間她不停地寫信，四處打聽丈夫，但是始終沒有下落。如果她確切知道父親還活著，也許不會那麼快自殺。不過，阿婆說她最終可能逃不過文革。

那天清晨四點多鐘，我被阿婆的哭叫聲驚醒。母親安靜地躺在廚房的大桌子上，身上蓋

著雪白的床單，空氣中充滿了令人窒息的煤氣味。那是 1955 年的早春，天氣很陰冷，窗外仍漆黑一團。我在上小學一年級。

警察來了，問母親有沒有留下文字的東西，然後就到處翻，最後在廚房碗櫃上面找到了遺言，看了宣布道：你們的母親說，所有的小孩送孤兒院，家裏的細軟隨阿婆拿，回老家養老。

但是阿婆捨不得我們三個未成年的孩子，要求由她撫養。阿婆是我母親娘家的一個奶媽，後來我父母把她尊為家裏的長輩，就說是我們的外婆。這時的阿婆已經六十多歲，為了生活，不得不走出家門，幫很多家庭做飯、做菜、帶孩子。寒暑假的時候，我也參加勤工儉學，整個夏天也就拿到幾十塊錢。學校每個月又給我五塊錢助學金。那時候五塊錢也够買橡皮、鉛筆、紙。我不買書，而是向別人借。有的朋友比我高幾個年級，書用完以後就送給我，幫我省了不少錢。

家庭出身困惑我們兄弟。我常常躲到圖書館去看書，周末一泡一天，從書中找到無窮的樂趣。

我對父親沒記憶，最後一次見到他我還不滿兩歲。一九四九年後，母親怕出事，把他所有的照片都燒了，也從來不提父親。母親死後，孩子們從阿婆口中獲知父親還在，便吵著問：父親到底是怎麼樣的人？阿婆竟然在社區裏面找到一個跟父親幾乎一模一樣的牙科醫生，並且在一個晚上帶上我們隔著診所的窗戶指給我們看。啊，原來我們的父親高大英俊，不像當時宣傳的那樣，國民黨的人似乎個個青面獠牙。

小學考初中的時候，年邁的阿婆一度要我報考技校，三年後，做工人，掙工資，養活家裏。我不肯，跟阿婆反復討論，阿婆最後同意了。那時，我哪里想到阿婆為此做出多大的自我犧牲啊！

我報考了上海最好的中學，但不被錄取，不是因為成績，而是因為政審時發現我的檔案完全空白。最後，我被一所名聲很差的學校錄取。該校集中了許多成份不好的學生。所幸這個學校有幾個老師雖然政治上潦倒，但業務非常好。教英文的老師曾在美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他竟然把愚公移山從很短的一個寓言發展成一個英語話劇，裏面有愚公和智叟之間長而風趣的對話，讓我演愚公。他特別喜歡我，願意在課後額外培養。

初中畢業，我考取了徐匯中學。兩年多後，文革風暴降臨。雖然我的出身是整個學校最“壞”的，但是由于人緣好，家裏又窮，所以起初沒受到衝擊。我甚至帶著紅衛兵造反派開的一紙證明到處串連。因學生組織派別對立，我後來被徐景賢宣布為反動學生，在學校的牛棚裏關了差不多一年，好幾次差點被對立派的紅衛兵打死。最慘的一次，我是爬著回家的，衣服都打爛掉了，和血一起凝結在肉上。阿婆想幫我清理，一拉就拉下一塊皮。後來阿婆用溫水先浸透血塊，才將衣服一片片地揭下來。

一九六九年春，我被送到農村插隊，告別了大上海的混亂與喧囂，在吉林農村度過了三年半的放逐生活。在近距離的觀察中，我對幾乎生活在赤貧狀態中的農民產生了無比的同情，但是除了為他們寫信、針灸，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他們。東北的冬天長達半年，冬夜又特別漫長，百無聊賴的農民很早就睡了，我有很多中、英文書，便乘機在煤油燈下博覽群書，思考問題……

1966年8月3日晚，天已全黑，悶熱，大約九點多，突然有三四個從未來過我家的紅五類同班同學進了我家門。我正疑惑她們怎麼找來的，就聽同學非常嚴厲地說：“你明天早晨必須到學校，如果不去，格殺勿論！”確認我聽清後，她們轉身離去。她們說“格殺勿論”時的表情和語氣，足以讓我確信，絕不是說著玩兒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貼在學校大操場邊宿舍樓門口已經好幾天，氣氛恐怖，黑五類人人自危。

28月4日上午，我心懷恐懼地走進教室。課桌靠三面牆擺放，教室當中擺著幾排椅子，也留出一片空地。全班四十多個同學，被分成涇渭分明的三類。紅五類有革命的特權，坐在椅子上。黑五類面對大家，背向黑板，在講臺前站成一排，我在其中。十幾個出身職員家庭，不算紅也不算黑的灰色同學被指定坐在地上，她們只可看批鬥黑五類，可以發言，不能動手。

我們九個黑五類在前面惶惶站定，批鬥會開始，教室門被砰然推開。同學董XX被幾個紅五類推搡著進來，并伴隨著喝斥“你什麼出身？”“革軍。”“革軍？騙人！你生父是反革命！”同學之間原知董的母親是俄語教授，父親是解放軍軍醫，沒有誰知道原來軍醫不是她的生父。我們黑五類雖被命令低著頭，仍能聽見繼續的推搡和董桀驁不馴的分辯，直到她不再作聲，站進我們這一排。

隨後，紅五類頭頭鄭重宣布：“革幹出身的標準是父親在1945年抗戰勝利前加入共產黨，軍幹中從國民黨軍起義的不算革軍出身。”我恍然明白為什麼有的同學一向以為自己出身不壞，今天却與我為伍，看來全班同學已經無一遺漏地被查清了三代。

我們仍須繼續低頭，聽到同學齊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接著又唱：“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末尾喊口號：“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媽的官，就滾他媽的蛋！”

隨後，二十個純牌紅五類圍上來，扯下我們的紅領巾，警告“永遠不許再戴！”毆打開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腳踢，刷大字報用的漿糊、紫色墨汁從頭上澆下來，要我們揭發父母的反動言行，承認自己是狗崽子。接著是紅五類揭發批判每個黑五類的反動言行，并且動員灰色地帶發言參與。我有生以來初次領教世事險惡，從十三歲到十五歲不足兩年的中學生活，我說的很多話被同學記住、憶起、提交，有原話也有斷章取義。

揭批與毆打一再交替。大約兩三小時後，教室門再次被推開。高三學生黃某一腳裏一腳外，與我們班紅五類頭頭低聲嘀咕。我站在離門不遠處，能聽清幾句，大意是時間差不多了，可以結束了。我終於松了一口氣。也許因為黃給我帶來了暫時的鬆弛，所以記住了她的名字。宣布散會前，紅五類頭頭特別要求全班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有重要事情，尤其是黑五類必須來。

相信我們全班同學都忘不了8月4日這一天，無論紅、黑還是灰。心靈的重創刻進我們生命的年輪。並沒有人被打成重傷。我的腳姆指筋受傷麻木，十多年後才漸漸復原。我沒有機會知道另外九位同學受傷的情況。此後，我們沒人願意再提這天。

8月4日這一天，北師大女附中很多班級同時召開了像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那天中午，為躲避見人，我垂頭喪氣，慢騰騰挪到飯廳吃飯時，看到同年級另一班同學吳某也滿面泪痕，在悄悄吃飯。她的父親是著名報人，幾個月前突然被毛澤東嚴厲批評。

班級批鬥會上，黃某的出現，表明全校的批鬥活動是有包括高年級學生在內的校級組織統一指揮的。否則，十五歲的初二女生，怎能得知全班同學的檔案資料？誰決定的把這些資料告訴給各班哪些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級鬥爭會前一天的通知，措辭已露殺機。十五歲的初二女生們，從哪里得到“格殺勿論”的許可？更重要的是，班級鬥爭會結束前，誰有權通知全體同學第二天一定要到校？說明第二天的日程已經排定。如果說8月4日的日程說明一部分學生已被授予處置另一部分學生的絕對權力，那麼8月5日的日程則說明一部分學生已被授予處置某些校領導的絕對權力，于是就有了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我們今天要追究的

是：這個處置權的幕後授予者究竟是誰？或更具體地說，允准學生可以把卞校長打死的那個隱身的權力人究竟是誰？

???

補白：六六年我讀小學四年級。暑假的一天，在富民路(天津)遭遇一次游街批鬥。只見百十個紅衛兵，帶紅袖標，身穿綠軍裝，有的舉著毛像，有的舉著紅旗，有的手持橡皮頭木槍，中間有敲鑼打鼓的，高呼口號：毛澤東思想萬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群情激昂，這是我最早見的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後邊紅衛兵押著兩個牛鬼蛇神。一個頭髮被剪得狼牙狗啃，一個頭髮被推成三道門。正是大熱天，却都穿著了死人的壽衣，被五花大綁捆個結實。我以為那人犯了什麼罪或是現行反革命，紅衛兵揭露其罪行時才知道，兩人都是私開鑲牙診所的大夫，罪名是搞私有制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時我還以為要把他們送進監獄，末了却是紅衛兵分別把他們押送回家了事。中國那時整個是個大監獄，人們在家等於坐牢。另有一個牛鬼蛇神住在天津棉紡三廠職工宿舍，是排房。每排有十幾間房，對臉房兩排之間距離不過兩米。每家壘個放煤球爐子小屋，一個胖子走不過去，每間房子也就是八平米。送到家後，紅衛兵給他松了綁，嚴厲教訓一番。他的家已經被抄，門口貼著一副白對聯，上聯“廟小妖氣大”，下聯是“池淺王八多”，橫批是“牛鬼蛇神窩”。文革發動者身居中海仙境却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住貧民窟的受苦人却還代表著資產階級。真是荒唐透頂！ 李建華

十四年的隱私 海 鷗

1980年1月11日，車間黨支部安排了隆重的公議表決大會。與會的三十多名黨員，一致通過我和房師傅為預備黨員。我倆各自宣讀的自己登記表中社會關係一欄的內容，引起大家的興趣，因為我岳父和我愛人的姓名在我倆的社會關係中都出現了。這一欄的內容顯示，我是他妹夫，他是我妻兄。這個對外保守了十四年的親屬關係的秘密，此時終於大白于天下了。

文革開始那年，春節剛過，房師傅把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堂妹曉玉介紹給我。正當我倆相處得如膠似漆的時候，曉玉告訴我：“不知為啥，我哥想拆散咱倆。他非要再給我介紹一位鐵中的老師。”我十分氣憤，找到房師傅當面質問。他說：“我這都是為你好。最近我聽廠部議論，說你們這批畢業生數你最有發展，群眾口碑好，根紅苗壯，我怕我妹妹的家庭出身影響你的前途。那時你會恨我的。長痛不如短痛，就此拉倒吧。”“要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你還會做下去嗎？”他略作忖度：“你家裏什麼意見？”“還沒到向家裏說的時候。”

“你要認准了曉玉，那我只有祝福你們了，但有兩點你要記住：1、對任何人都不能說我是你們的介紹人；2、任何時候不要說咱倆是親戚關係。”我答應了。

房師傅和曉玉的爺爺有四個兒子。土改時，曉玉的父親被劃為富農，其餘三個兒子皆被劃為地主。房師傅三歲時，父母先後亡故，四叔——曉玉的父親把他接到家裏撫養。

文革期間，我被分到房師傅的車間。為了遵守承諾，我盡力避免與他直接接觸。有時走路迎面碰上，他會突然一拐，走向他處。有時實在有事找我，他會拿一張圖紙做掩護，比比劃劃中與我談私事。不久，他與相處一年多的女友（我廠化驗室的小杜）分手了，原因是二人出身都不好，怕影響下一代。一個星期天，在曉玉家，我倆碰到一起。他說：“我要像曉玉那樣，非找個紅五類出身的對象不可——咱老房家的血脉純度要改變。”曉玉媽媽道：“你還想入黨提幹呀，那麼看重成分？小杜哪點不配你，你跟人家吹了，看你不打一輩子光棍才怪呢。”他說：“孀，你不知道現在是出身決定命運的時代，咱自己的是改不了啦，怎麼也

得設法改變下一代一半的血統吧。”不久，他真的找到了改變老房家血脉純度的人，又很快舉行了革命化的婚禮。這個嫂子，人長得很清秀，父親在抗美援朝中犧牲，媽媽改嫁，與花甲的奶奶靠政府每月那點撫恤金生活。

1966年9月，房師傅偷偷告訴我：“已接到通知，我四叔家今天要被趕回農村。我去不方便，請你去幫他們搬家，好嗎？”說著掏出十元錢，叫我轉交給他的四叔。曉玉的父親很不滿意，埋怨這個侄子在最需要他的關口不露面，拒收那十元錢。78天之後，曉玉全家又被她父親的單位接了回來。

不久我與曉玉結婚。雖然兩家離得不太遠，爲了遵守對妻兄的承諾，平日我們是不串門的。他的三個孩子出生，我和曉玉都是晚間去看望。兩家的孩子也從來不來往。有一次，路上一個童音在背後喊“姑父”。我回頭一看，見一棵大樹背後露出了半張小圓臉。我一注視他，他就又羞怯地縮了回去。

我趕忙走過去，蹲下身拉起他的小手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子？”他抬手指著對面的院子。通過矮牆，我看到開著的窗扇裏，有位老嫗在向我招手。我抱起孩子進了院子。進屋後才發現，這不是嫂子的老祖母嗎！老人趕忙將另外兩個孩子也圈攏過來指著我說：“這是你們的姑父，快叫。”孩子們馬上齊聲喊道：“姑父好。”看著這些長得一個比一個壯實的小小子，我感慨地說：“這可辛苦您老人家了。”“有啥用，一幫小地主。”接著老人抱怨起來：“你們可是實在的親戚，怎麼也不串門走動，是不是有啥隔閡？”我笑著作了解釋，告訴她這是大哥定的規矩。她聽了無奈地說：“小心點也好。”接著又神秘兮兮地說：“毛主席發動的這場運動，時辰選的不好，丙午年的丙午日。老人家翻錯了皇曆，自古以來年逢丙午都被稱爲紅羊劫，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就是雙羊劫，更遭殃了，所以你們得格外小心。”瞅著那三個衣不遮體的孩子，我趕緊掏出身上僅有的幾元錢給了他們。在回廠的路上，憂傷不斷向我襲擊。這下一代孩子，難道也要淪爲低種姓的小賤民嗎？

林彪之後，鄧小平復出，我廠也開始步入正規，妻兄被任命爲車間副主任。這是我廠唯一的一個出身地主的非黨幹部。爲了表示祝賀，我邀他小聚，遭他婉謝。“毛主席說了，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小心爲上。”把我搞得很尷尬，好像我在巴結他。

1970年10月的一天，舅哥打破慣例，一大早高興地告訴我：“昨天區裏的領導一大幫人到我家來看望老太太，還帶來禮品。區長與我握手照相，又給了一套精裝毛選四卷。”我還沒來得及問詳情，他已走開了。後來聽他鄰居說，今年是“紀念抗美援朝勝利20周年”，區領導下來慰問軍烈屬。

1978年冬，我到鐵道部開會，聽說中央馬上要發布《關於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回去後我告訴妻兄，他極爲興奮：“你能不能再說得具體點。”“可以。等我高興時再說吧。”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作爲上次的報復。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達了《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妻兄十分激動，主動邀請我晚間去他家小酌。席間我打趣他：“毛主席對華主席可是有‘你辦事我放心’的政治遺囑。兩報一刊也說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你不怕他們也遵循‘文革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我不管這些。既然今天把我這頂帽子摘了，我堅信不會再給我戴上。哈哈，我終於看到我們房家血統改變的日子了。”當晚，我倆都喝得酩酊大醉。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1949-1979三十年間，因出身而淪爲低種姓、被唾棄的5000多萬政治賤民。

大船哥哥是鄉下伯父的兒子。父親逃出家鄉參加革命，伯父在家打漁，兄弟倆好多年斷絕音訊。家鄉海灣物產豐富，伯父因勤勞能幹，置了一點土地，還買下一挂車。土改一來，伯父被劃成富農。

六十年代初大饑荒時期，故鄉人頑強地找到了父親，伯父的兒子們也一個接一個到北京登門。父親對登門的侄子們很是嚴厲。

鄉下的堂兄們都沉默寡言，飯量極大。大船哥哥却很有靈氣，一來就和我哥哥熟識了，操著鄉音聊天，講水滸談三國。成年的他，喜歡替哥哥做頭疼的算術題和作文。我們瞞著，不讓父親知道。大船哥哥很喜歡看家裏的書，有時看得出神，忘記回避父親，看見父親，總是抱歉地把書放回原處。他寫的小字也比上初中的哥哥強，爸爸氣憤地訓哥哥“還不如鄉下的大船”。

有一次大船哥哥臨摹了一頁小人書，是仙女在瑤池沐浴，畫得像極了，只是瑤池的入口忘了留門。我提了出來，他笑著找橡皮修改。我媽媽看了這張畫感慨地說：“大船沒有念書真是可惜。”可是爸爸却很生氣，說大船哥哥畫仙女沐浴，不知想的什麼，哥哥也陪在旁邊跟著挨了訓。

鄉下的哥哥們返鄉前要採購些糖果點心。這事通常由哥哥代辦。六十年代物資困難，票上的買完只好買高價的。哥哥由于和大船哥哥要好，完成例行採購任務以後，就提議到中山公園去玩。我們歡天喜地去了，可是一玩就忘記照看東西了，竟把給大船哥哥帶的那一大包東西丟了。我們都慌了，找到天黑也沒找著，最後只得回家受罰。大船哥哥那年是空手返鄉的。

文革期間，父親被審查了七年。“解放”以後，在報上看見家鄉修油港，思鄉心切。七七年秋，我隨父親回到了闊別三十多年的故鄉。鄉親們仍然視他為出生入死的抗日英雄。伯父那支人還戴著富農帽子。父親問起大船哥，大家支吾一會兒，終於說剛剛摘了反革命帽子，但還在專制隊裏。父親問是什麼緣由，大家說是因為寫詩。父親嘆口氣，氣急敗壞地說：“他能寫出個什麼？”又問大船哥哥的親事，大家說四十歲的大船哥哥和鄰村一個帶兩個孩子的寡婦剛剛定親。我們沒有去專政隊看望大船哥哥。

時間一晃到了2000年，父親早已去世，大船哥哥的兒子却金榜題名到北京來上大學了。大船哥哥四十二歲得到兒子，精心培養兒子，讓兒子接續他去圓讀書夢。由于家境不好，孩子沒有去大城市讀書，連縣中也去不了，就在漁村的中學上學，竟考了出來。家鄉已經成為旅遊區，不再經營農業或漁業，六十多歲的大船哥哥是市場清潔工，嫂子趕海找些海物賣給游人。我算了算，一年起碼需要八千元供兒子在京讀書。對於他們，這是一大筆錢。

闊別四十年後，在北京我又見到了大船哥哥。他已經是個乾瘦的小老頭，臉是海邊人特有的古銅色，布滿縱橫皺紋，正像名畫《父親》中的老人。強烈的陌生感使我們的談話開始進行得很困難，後來還是他提起六零年在我家的往事，提起那瑤池的仙女，我媽媽的寬容和我爸爸的嚴厲，提起在中山公園丟失的東西，我們之間的距離才漸漸拉近。

大船哥哥雖然是“富農”子弟，但生活其實一直相當困苦。少年時背負出身包袱，中斷學業，饑荒年月挨餓，為了吃飯在北京寄人籬下，青壯年時政治上又出了問題，接受專政，娶不上媳婦，晚年又要為自己引以為自豪的兒子負擔昂貴的學費。但是大船哥哥一點不埋怨命運，話語間流露著知足和感恩。不知為什麼，他在談話中總時不時說“我沒有說過共產黨不好”，“我沒有給老叔（我父親）抹過黑”，“老叔在文革中不是也受苦了嗎，我受的沒有什麼”。我只感到無以名狀的難過。提起一九七七年我和父親回鄉的事，大船哥哥也沒有怨恨我們在他受難的時候不去看他，反而眯起眼睛，回想那天他追跑到大路上去看我們乘坐的汽車背影的情景，讓我好不辛酸。

後來大船哥哥從家鄉來過幾個電話，托付我幾件事。“妹子你要勸你侄子讀研究生，別

怕讀不起。”“妹子你要勸你侄子申請入黨，入黨還是好。”“妹子你要費心幫你侄子在北京找個家境好點兒的女孩子。”我理解大船哥哥的想法，但是却做不了什麼。今年大船哥哥的兒子最終放棄了考研，將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受聘工作，沒有入黨。一個貧困的鄉下孩子，白手起家，獨自在北京創業，找個家境好點兒的女孩子又談何容易？

補白：我的一個同班同學，反右時未被打成右派，可是反右之後總覺得有些彆扭。有一次全班到公社勞動，他發現地上有一本筆記被風吹得嘩嘩響。他撿起來一看，大為光火。那筆記本是黨支部書記的，裏面記載著哪些人是內部控制的“中右分子”。我這個同學還是共產黨員，却也赫然名列其中。這個“中右名單”是絕對保密的，由黨支部書記直接掌控。據估計，“中右分子”全國約有 300 萬眾，比右派分子多五六倍。  
王書瑤

補白：文革初起時，北師大女附中開批判會，有人上臺發言，劉少奇、鄧小平的女兒也如其他同學一樣，齊聲高喊：“開會發言報出身！”那清脆、尖利、威嚴的聲音覆蓋了操場，又被不遠處的高樓反彈回來，餘音不絕，嚇退了想上臺發言的黑、灰二類，也刻進了不少同學的記憶留聲機裏。8 月 7 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因為沒有點名，直到 1966 年 8 月 18 日，劉少奇還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可能他心中已經有數，國人通過電視，看見他神情抑鬱。後來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悲慘而死，鄧小平被打成第二號走資派。劉、鄧和他們的兒女們由紅變黑。文革後，他們又重拾“光榮”。真正是大起大落，荒誕詭譎。  
張 敏

## 五姨媽 蔡 楚

五姨媽出身于書香門第。外祖父丘光第老先生系前清舉人，曾任民國成都市長黃隱的文學顧問，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訓導主任，曾同時應聘于成都石室中學、樹德中學等八所名校，是作家巴金的老師，也是蜚聲四川的學者和書法家。五姨媽畢業于益州女子中學，1932 年與王新培結婚。

王家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在成都學道街建一家書坊，名曰志古堂。由于刻印的書籍選題對路，校勘、制板精美，深受文化學術界好評。四川總督張之洞、吳棠都曾先後捐資志古堂，刻印《許氏說文解字》、《望三井齋》、《韓詩外傳》、《杜詩鏡銓》等典籍。

1945 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後，五姨媽與婆婆一道艱難維持志古堂。大陸易幟後，一系列殘酷運動開幕。在我的親屬中，最早選擇死亡的是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時，外祖父因祖上傳承下二十多畝田地，被劃為職員兼地主。他認為土地被沒收有辱祖宗，遂吊死在位于汪家拐街的家中。二叔父是個游手好閑的川劇滾龍，雖說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但在戒大烟運動中，吊死在小淖壩家中門板後的掛鉤上。好在我家族中沒有被槍斃鎮壓的。

五姨媽因為是志古堂的業主，加之家中有幾畝薄田，被劃為地主。所幸只戴帽管制兩年，沒有像其他地主分子那樣帽子戴到死，還要由子女繼承。當時大表哥在福建前綫保衛祖國，作為現役軍人的“光榮軍屬”，五姨媽若總是戴一頂地主分子的帽子，當局可能也覺得不太光彩吧。

志古堂關門大吉了。抗美援朝時，五姨媽又將志古堂的書版全部捐獻給成都市人民政府。政府派員運走，存于成都文殊院。文革期間，這些書版被作為四舊焚毀，志古堂的匾牌則被五姨媽送到鄉間親戚家。親戚將其反扣在豬圈前，作為糞坑的踏足板，終於得以保存。家中的書籍、字畫全部蕩然無存，剩下破裂的墨硯被墊在破櫃足下作為平衡的支點。

五姨媽被管制得服服貼貼。改革開放初，有親戚從香港來信尋找他們，五姨媽不敢回信，悄悄把來信燒了，怕秋後算帳。1979年，成都市某些人自詡為中華文化傳人，要修成都出版志，千方百計出重金要收購志古堂的匾牌。五姨媽從親戚家的糞坑邊把這塊文化見證物找了回來，但儼然拒絕出賣。

補白：有同學到儲藏室去拿東西，突然間發現有一尊毛主席像，石膏的，就是那種開大會用的，放在主席臺上的，放在那個體育器械室的一個角落裏。可能有一段時間沒用了，上面有一點灰塵。一個同學馬上大叫起來，說我們學校的領導是修正主義分子，把我們偉大領袖放在這樣陰暗骯髒的地方，渾身蒙滿了灰塵。他這一呼一鬧，很多同學也都跟著動感情了。你不動感情還不行，就說明你對毛主席沒有感情。很多人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來，一邊抬著一邊高呼口號游行，圍著操場打轉轉，就那麼開始把矛頭對準校長、校黨支部。

胡發雲

補白：奉節縣萬勝公社清水大隊一個姓楊的社員，出生貧農，平時有點吊兒郎當的，愛和熟人開玩笑。當年男女老少胸前都戴有毛澤東像章。1972年初秋的一天，生產隊出工時，姓楊的看到一個中年女社員豐滿的胸脯上戴了一枚大像章，便指著那婦女的乳房說：“毛娃娃天天吃女人的雞雞（奶水），難怪長得那麼胖。”他的話惹得女人罵，男人笑。事後，這則笑話不知怎麼傳出去了。姓楊的膽敢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當然是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公社革委會組織大會，將姓楊的揪出批鬥後，區公安特派員代表縣公檢法軍管小組，當場宣布對姓楊的逮捕法辦。

陳宗培

## 謀害偉人案 曉 寒

這一天，我們兵團裏召開一個誓師動員大會，照例要我們宣教科去布置會場。大會在露天開，會場是一個農村小學的操場。正前方靠牆砌一個一米來高的臺子，台前左右各樹一根木杆，用來懸掛橫幅會標。作為背景的牆面斑駁陸離，需要撑起一塊蔚藍色的幕布。幕布正中要張貼當時能“請”到的幅面最大的毛偉人像。同事老苟身材高大魁梧，責任心也最強，貼偉人像的工作由他去做。紙質偉人像四周有一道幾指寬的白邊，張貼時往往先用圖釘把四角釘牢，然後再在四周白邊上摠若干個圖釘。在室內，通常8顆圖釘就夠了。然而在室外，尤其新疆風沙很大，一條邊至少就要用五六顆圖釘才能壓得住。這天開會前，狂風大作，老苟雙手壓著偉人像，趕緊在四邊加釘圖釘。左右兩側，容易被風掀起，老苟揪了十來顆圖釘還怕不保險。

會後有人發現偉人畫像身上有細微的釘眼，便向領導報告，說是發現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老苟馬上被停職隔離反省。後來我也看了老苟的罪證——分布在白邊裏邊偉人畫像上中山裝口袋邊的三個釘眼。那是什麼部位？那是偉人的胸部啊，心臟啊！於是謀害偉大領袖的罪名成立了。“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苟xx！”“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誰的狗頭！”“苟xx謀害毛主席罪該萬死！”諸如此類的嚇人標語，剎那間貼滿機關大院。可憐老苟一個眉清目秀的七尺男兒，挂著黑牌佝僂著腰接受了十多場批鬥。有一場就是在那個露天大會場召開的，名曰“再來現場消毒”。老苟的妻子苟大嫂這個現行反革命家屬，也被所在連隊貼了許多低級下流侮辱人格的大字報，還有幾次她胸前挂著破鞋被拉到大會上陪夫君挨鬥。

這個老苟，海軍轉業幹部，從抗美援朝起就在部隊搞文化教育工作，因地主家庭出身，入不了黨，在部隊裏混不下去，只好轉業到新疆兵團。在兵團裏，老苟可算個能人，琴棋書



畫、吹拉彈唱無所不會，運動場上也是個好手，簡直是文武全才，特別是寫得一手好字。在牆上書寫毛主席語錄，不管多大尺寸，都不用打草稿劃邊框，拿起畫筆，仿宋就是仿宋，楷體就是楷體，隸書就是隸書，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從老苟身上學到許多本事，至今我仍然認為他是我這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良師益友。

老苟被關進牛棚強制勞動 6 個月後被放回家了。不知是因為老苟一貫表現良好實屬一時犯迷糊，還是團裏太需要他這樣的人才了，後來師部決定“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帽子，記大過一次。幾個為他擔驚受怕大半年的好朋友又相聚在他家裏。我這個膽小窩囊的書生只會說：“老苟，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要相信群眾相信黨。”老苟卻一臉坦然：“小王，我是罪責難逃啊。我早想通了——要不是我那天多摳幾個圖釘，畫像被風吹落到地上，我不還是這個下場嗎！”

補白：1969 年我 14 周歲，第一次去天津國棉三廠學工勞動。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與一個同學一起往家走，在路上看見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兩個人都想搶那枚像章，同時跑到，我一伸腳把那枚像章踢出一段距離。這位外號毛驢的同學腦子不快腿腳快，他搶到了那枚像章。學工勞動結束後，老師在班上宣布責令我停課，並給我辦學習班，讓我坦白交待問題。我實在想不出自己有什麼罪行，老師最終把那天搶像章我踢毛主席像的問題說了出來。原來那個同學揭發了我。回家後我向父親說了此事。第二天，我父親戴著紅袖章去見老師。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解釋，老師終於同意了我父親的說法：我是由於實在太熱愛毛主席了，才踢了一下毛主席像章。我獲得無罪釋放，得以重回課堂繼續學習毛澤東思想。 李建華

他為何瘋了 海 鷗

孟慶生與我同年由鐵道學院畢業，分配到齊齊哈爾鐵路局。他是車輛專業，沒留在市區，分到郊區一個站段。一到星期天，他就到齊市找我玩，見面總是那句話：“那鬼地方不認足球，生活簡單的每天就剩下了過程。”這裏盛行籃球，不像我們大連痴迷足球。他是學院的足球中鋒。

不久文革開始，再來我這裏，他談得最多的是他單位的一些見聞，並問我參加了哪個派別、什麼觀點。我總是告誡他：“我們是毛主席說的被改造的知識分子。目前全局二百多個派性組織，你知道哪個絕對正確？千萬注意，可以觀注政治，不要投注政治。”

隨著運動的深入，他來我這裏的次數越來越少了。有一次他到鐵路局辦事，來單位看我，興奮地悄悄告訴我，他現在正處對象呢。我當胸給他一拳：“你小子有了媳婦忘了朋友。”他笑嘻嘻地說：“身不由己呀。”接著他從上衣兜裏拿出一張一寸的照片給我。嚙！好漂亮、好青春的一個小妞。女孩子是我們鐵路一中的高三畢業生，學習很好。若沒這場運動，應是大一的學生了，現在只好蝸居在校。這次她們班級到工廠學工，兩人認識了。為了運動過後能再考大學，她一直沒有丟下功課。在輔導功課的往來中，他們相愛了。聽了他們的故事，我只剩下向他們祝福的份兒了。

1968 年夏的一天，我們鐵路各單位接到緊急通知：全部停產，到火車站去接由哈爾濱轉來的毛主席的芒果。只見火車站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大汗淋漓足足等了三個小時，才看見由兩個紅衛兵捧著個玻璃箱子，裏面裝著毛主席送來的芒果。後面有四個解放軍戰士持槍守衛，緩緩出了車站。那陣勢好似超級國寶，就像今天有時電視裏看到迎送佛骨舍利。

散會後我與慶生又見面了，並請他到我剛成立的小家坐坐。席間，他問這芒果是怎麼回事。我說：“你就知道談戀愛，連這都不知道？那是巴基斯坦總統送給毛主席的珍貴水果。老人家不捨得吃，轉送給首都工人宣傳隊。這樣全國就掀起了芒果熱。”“這全國都送需要

多少芒果呀？”“那個玻璃箱子裏的是臘制的芒果。”“啊！就爲接一個假芒果，全市停工停產停課？真是政治壓倒一切呀。”“這算啥，你沒看到，隔三差五，晚間八點中央廣播電臺都要發表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爲了傳達最新指示不過夜，大家馬上就得上街去游行慶賀，敲鑼打鼓放鞭炮，一折騰就是半夜。這可苦了咱們那些調度和司機，第二天沒精神工作，事故層出不窮。昨天南貨場一台機車就因司機打瞌睡，將車開進了絕後綫翻車了。我的一個朋友在局調度所。據他說，咱局管轄的綫路阻塞現象相當嚴重，每天都接到全國各地發來的告急電報。要滿足需要，每天至少要發出五千多個車皮，而目前我們每天只能裝運一千多個。外地運來的物資，每天還有二百多個車皮卸不下來。雖然軍管了，但全局軍代表只有四十多人，又都是外行，到目前發生的行車事故已有三百多起。”他聽後氣憤地站了起來說：“去年我們車站兩列火車相撞，不就是因爲兩個扳道員分屬兩個派別，當列車快進站時還在那兒辯論爭吵造成的！我看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

1968 年春節將至，我給慶生去個電話，想約他一同回大連過年。接電話的是他們技術室的一位同志。他告訴我，孟慶生在一個月前就被抓起來了，罪名是破壞毛主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放下電話我就懵了，這不是給專政了嗎？到底爲啥？我決定去一趟。

他的室主任詳細告知了事情的原委。1968 年 12 月 22 日，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迅速掀起上山下鄉熱潮。慶生的女朋友在所難免。有一次他在外出差時給她寫了封信，說是不是找當醫生的姑父檢查一下身體，若能開出一張有慢性疾病的證明，有可能免于上山下鄉。結果這封信不知怎麼落到革委會手裏，說他與知青搞對象，出謀劃策偽造假證，明目張膽破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遭到公開挂牌子批鬥。

通過主任，我見到了慶生，蓬頭垢面，滿臉胡茬。那張方臉上，顴骨顯得很高，冷丁一看真像獄中方志敏。我勸慰他幾句，并問需要我做點什麼。他只是兩眼呆呆地看著窗外搖搖頭，什麼也不說。分別時，我突然聽到已被押解到走廊另一頭的慶生大喊道：“這個世道整個瘋了、瘋了，徹底瘋了。”他的主任對我說：“看來他的精神出問題了。只要張口就喊這句話，一個剛走向社會的大學生，受到這樣的刺激，受不了呀。你最好能通知他的家人來處理一下。”

春節回大連，我去了離我家不遠他的哥哥家。他從小父母早逝，是哥嫂帶大的。經商定，我們決定初四一同赴齊齊哈爾。幾經交涉，單位認可了醫院的鑒定（間歇性精神病），并同意回家治療。這期間，她那位女朋友再也沒露面。

以後我幾次公出回大連，均沒見到慶生。據他哥哥講，通過一段時間治療，病情已明顯見好。平時哥嫂上班，他一個人到處逛，就是不願意回單位上班。又聽我母親說：有段時間，每到中午他都會來要吃的。那時每人糧食都有定量，他的糧食關係不在大連，全靠單位每月寄來的全國糧票吃飯。有時單位寄得不及時，他就要餓肚子。哥嫂上班，沒人照顧他，挺可憐的，但神智清醒。

1971 年我去上海開會，返程時在大連逗留幾天，見到了慶生。我告訴他：他們單位主管他的案子的齊主任，因生活作風問題已被抓，革委會成員基本全變了。他聽後說：“我決定回去上班。”就這樣他終於又返回工作崗位。

那年剛入秋，慶生手拎一個大油瓶子來到我單位，說：“這是我每月餘下的油票換成的豆油，送給你們。”我說：“你自己留著用吧。”他說：“在大連養病時沒少麻煩你老母親，這就算一點回報吧。”我讓他下班了到家坐坐，他說不行，他要趕晚車去北京，又一再叮囑我：“我的去向一定要保密，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當時我就納悶了。

不久，他的主任到單位告訴我又一件不幸的消息。9·13 林彪叛逃事件未公開之前，已經在知己小圈子裏偷偷傳開了。有一次慶生在廁所關著門大便，進來兩人站在便池臺階上小便。他倆以爲這裏沒有第三者，就大膽議論起林彪叛逃的事件。蹲在裏面的慶生聽到了，從

門板縫中一看，竟是軍代表，嚇了一跳。出來後他越想越不對，并斷定這是在搞反革命串聯，要反林副主席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但他對任何人都失去了信任，便決定親自到北京報告。一到北京，馬上被相關部門扣留，并通知單位取人。回來後可難壞了單位領導，是押還是放？經請示，暫時羈留。

是呀，這寫入黨章鐵板一塊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怎麼會突然叛變呢？一個正常人都難以理解的非正常事件，對於一個精神剛剛復蘇的病人確實是如雷轟頂，無法接受可怕的事實。他的精神天空坍塌了。

當時中央對林彪叛逃事件嚴密封鎖消息。最初，媒體甚至故意製造林彪等人沒有出問題的假相。記得在林彪死後的第 17 天，即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在刊登《人民畫報》第 10 期的目錄時，還在該期畫報的封面登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合影。到後期傳達《中共中央 1971 第 57 號文件》時，還採取了內外有別、分步驟逐級傳達方式：先黨內後黨外，先高幹後一般幹部，先幹部後群眾。這樣一個時間差導致孟慶生的政治誤判。所以該案很快也就結案了，但却大大刺激了當事者那剛理順而又十分脆弱的神經。他再度犯病，被家人接回大連。

1972 年回大連，我又去了慶生的哥哥家。門是鎖的，打聽鄰居，得知慶生就在周圍閒逛。我從胡同的東頭進來沒看到他，所以決定從西頭出去尋找。一出胡同口，就發現讀報欄下站著一個穿戴極為扎眼的人。一身退了色的草綠色舊軍裝，軍帽上一顆紅五星倒顯得很耀眼，腰繫皮帶，胸前戴著一個大像章。這是當年紅衛兵的典型裝束。仔細一看，正是孟慶生。我疾步走過去喊了聲：“慶生！”他沒反應。難道看錯了？這時我已到了他跟前。沒錯，就是他！我推了他一下：“怎麼不認識我了？”他怔怔地看著我傻傻地笑了：“這個世界真瘋了，他們說林副主席反毛主席你信嗎？”他這次病得不輕，連我都不認識了。我剛要再伸手拉他，他突然雙手緊緊護著胸前那個毛主席與林副主席在天安門上的大像章，大喊道：“不許搶，不許搶！”說著飛快地跑了。

這時走過來一位大嬸，說：“你可別碰他的像章。這瘋子把它看得比命還重，急眼了他會與你拼命的。”我看了一眼這位大嬸，問道：“你認識他？”“我們是鄰居。”

補白：1952 年最難忘的是看鬥地主。那是個女地主，田地房屋都沒收了。工作組懷疑她藏有金飾沒交出來。各種毒刑用盡，她還是說沒有。一位天才想出一個妙招——從山上采來黑蟻巢，把它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腳綁緊。她的手被反綁著，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滾。當天晚上，她上吊死了。這一段記憶在我心中總揮之不去。這樣鬥地主也太無人性了吧？土改奪了人家的土地也就罷了，還要奪人家的房屋；奪人家的房屋也就罷了，還要奪人家的錢財；奪人家的錢財也就罷了，還奪人家的尊嚴；奪人家的尊嚴也就罷了，還要奪人家的性命！農村的地主，大部分都是勤勞致富的。很多地主既勤且儉，既不偷又不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積聚了一點財富，却成了罪惡，并且禍及子女，真不知天理何存？

補白：根據蘇聯的經驗，原計劃鎮反運動中要殺掉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鎮服人心。根據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 1954 年 1 月的報告，總共逮捕了 262 萬人，其中判刑勞改 129 萬人，管制 120 萬人，處決 71.2 萬人，處決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千分之 1.31。有人估計，實際處決的人數在 100 萬到 200 萬之間，甚至更多。如果按 150 萬人計算，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 2.78。

陶懋順是我在南昌心遠中學時的同班同學。1947 年他父親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時間告知的那個人就是我。足見我們友誼之深。1948 年我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後來又奉命發展黨員，其中就有陶懋順。解放後，我繼續“革命”，他繼續念書，進大學深造。此後幾十年，我倆雖生死兩茫茫，却不思量，自難忘。

大約是 1979 年，我還在煤礦從事強制勞動。某日一大早，剛下晚班，本應是睡覺時間，一個姓孫的幹事把我叫到辦公室，問：“你認識一個叫陶懋順的嗎？”“認識。”“什麼關係？”“中學同學。”“還有什麼關係？”遲疑片刻，我說：“還有就是，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入什麼黨？”“當然是共產黨了。”

只見他突然用驚異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現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來你還是個共產黨？”“當然。不過現在談這些，似乎沒什麼意義了。”孫幹事叫我馬上寫份材料。他可不管現在是不是我的睡覺時間。我這才知道陶還活著，正在辦理恢復黨籍的事，需要我這個勞改就業分子給他作證。

年底，陶寄來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獲至寶，一字不拉地讀完。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問題比較複雜，為此我曾問計于陶。他早已平反，并且頻繁參加學術會議，非常活躍。他約我定個時間，到北京和他見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等到了參加學術會議剛散會的陶。他建議我寫一份材料，由他轉交胡啓立。

由于交談機會太少，我們一直沒有時間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 1997 年 9 月 3 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麼罪，為何被打成右派。2007 年反右派 50 周年，我先後讀了北大當年的學生右派陳奉孝的《夢斷未名湖》和王書瑤的《燕園風雨鑄人生》兩書，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來是他看了從國外進口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譯了這份重要文件，并加上一篇重要序言，準備在《廣場》上發表。可惜由于形勢急轉直下，沒能實現，陶由此被劃為右派分子。

今天看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劃時代的偉大文獻，足可與法國《人權宣言》相媲美。如果說《人權宣言》宣告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死刑，那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意義在于揭開了自我吹噓什麼“開創了人類歷史新紀元”背後的驚人黑幕，讓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們看清了發生在蘇聯的那些慘烈血腥的大屠殺、大陰謀，從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現代封建極權專制制度“無產階級專政”的死刑。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從巴黎公社算起有 100 多年的歷史，從 1917 年算起也有近一個世紀的實踐歷史，沒有一個成功的先例。相反，慘敗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蘇聯斯大林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將近 4000 萬，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 7000 萬。毛澤東最優秀的學生波爾布特等紅色高棉領導人，在一個僅 800 萬人口的柬埔寨，在 1975-1979 年短短四年時間裏竟殺害了 170 萬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贊揚。所以全世界有識之士一致認為，必需徹底消滅這種吃人、殺人的制度。只是由于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這個死刑判決推遲了 30 多年，直到 90 年代前後才開始執行，到今天仍然沒有執行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還宣告了共產主義理想的虛妄和虛偽，給那些被共黨洗腦洗得神魂顛倒的人們一帖清醒劑。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杆信徒毛澤東害怕了，恐懼了，顫栗了。他斷然採取行動，通過搞陽謀，大批虐殺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報告的巨大影響，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地位。

陶懋順看了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熱血的體現。他還敢譯成中文，傳播開來，更表明他是一個有擔當、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據陶的夫人楊淑敏回憶，陶病危期間，他的學生、中科院學部委員張景中全家特地乘飛機來看望，并給陶老師洗腳。陶過意不去，急忙阻止，說學部委員怎麼能給他洗腳。張却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多麼令人感動啊！這種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發生在像右派這樣的人身上。右派分子幾乎都是最具有人

性、最講人道和師道的人，而不是那種一闊臉就變的人。陶懋顏的膽識、魄力、貢獻，感染了無數人，足可彪炳史冊，與日月爭輝，與天地同壽！勇敢的難友，安息吧！你雖死猶生。你敢于翻譯那份杰出的文獻，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點、最耀眼的火花、最杰出的貢獻。無論經歷幾多歲月、幾多風雨，你的功績都將永存而不磨。

補白：土改劃地主是有政策指標比例的，比如 5%，8%。沒有很富的，就拿較富的湊數。在我家住的一個大屋裏，1950 年土改中劃出 2 戶富農，2 戶佃中農，2 戶中農。那 2 戶富農的生活跟其他 4 家一樣。有一家甚至還差一些，之所以被劃為富農，只因為這家的老人過去當甲長時抓過偷谷的小偷，這小偷的丈夫後來正是貧協骨幹。

補白：我的戰友郭東昆在天津北寧公園與學生聯歡中，和一名女生有了戀情，打了結婚報告。領導一調查，女方父親在鎮反被鎮壓，立即駁回。男方堅持要結婚，被立即清除出軍隊。我另一位戰友孫道明，曾任華北軍區文工團舞蹈隊隊長，近四十歲認識了張家口一位演員，因她的前夫被關押，結婚申請自然被駁回。他為結婚也選擇了離開軍隊，落戶在柴溝堡。筆者的婚姻道路也不平坦。她的父親曾是馮玉祥部下的中校軍械官，因而被分配到河北壩上行醫。我打了結婚報告，領導不說明理由，只告訴我：另找吧！我堅持，也準備步郭東昆和孫道明的後塵。後因我的業務部門首長顧炎替我說了話，才沒有被迫離開軍隊。方影竹

好險的棒子根 林 玉

文革初期我還是一個小學生。恍惚是九十月間，我家一次次被抄，批鬥父母的大字報貼得鋪天蓋地。這時我們黑幫子女接到學校通知，要安排我們到順義潮白河農村參加勞動，改造世界觀。天剛擦黑，我們這群只有十一二歲的孩子，被老師帶到村裏的場院上排隊，立正、向右看齊一頓喊。奇怪，那個時代一切向左，就這條“向右看齊”被忽略了。

一位年輕的農村婦女，手執紅語錄，走上前來對我們朗聲道：“同學們，我是本村的貧協主席（後來得知，這官可不小，對全村黑五類有生殺大權），可以代表本村全體貧下中農對你們進行階級教育！你們來了就要好好地參加勞動！世界觀改造好了，你們還是可以積極參加革命的！下面，我領大家唱個歌兒。”于是大家跟著她唱：“我是貧農的好後代，黨的教導記心懷。踏著前輩的脚印走，把革命的大旗接過來。階級鬥爭永不忘，昂首闊步向前邁！”

學唱之後，有人用一支大手電筒照向另一邊，高叫著：“同學們，階級鬥爭很複雜，下面你們要認清這些壞蛋的醜惡嘴臉！”孩子們在驚恐中齊刷刷地轉過身來，隨著大號手電筒的強光，猛然發現我們旁邊竟蹲著一群人！他們都是黑五類。電影裏的壞蛋面目猙獰，可是這些壞蛋與我們長相差不多，讓我們感到意外和震撼。

這次旨在改造小學生世界觀的三秋勞動為期 1 個半月。有一天，我們小組被分派到玉米田去刨棒子根兒。秋收時，先把玉米秆砍掉，下邊剩的一截就是棒子根兒。滿地的棒子根，一根根斜茬朝上，如同尖刀。貧下中農把這時的田地叫做刀山。

為了表現得好一點，孩子們爭先恐後地下了田。我們負責將刨出來的棒子根兒拉到田頭兒。我使勁抱起幾個刨出的棒子根兒，可哪里走得動啊，好不容易拖到一大堆橫臥的玉米秆兒旁，累得我一個屁墩兒歪倒在那一堆玉米秆上。

沒有想到底下藏著一個沒有刨出來的棒子根兒，尖朝上，一下子杵進我的內褲裏！我哇

的一聲叫起來，老師同學都向我跑了過來。外褲內褲全被杵破了，大腿根內側鮮血如注，疼得發抖。老師讓一位女生幫我扭著外褲，扶著我一步一步往回走。

“什麼出身？你？”一位男赤腳醫生一邊舞動著藥棉棍一邊問。我泪眼巴巴地答：“……貧農。”我瞪著眼撒了個謊。“嗯，貧農後代還哭什麼，沒大問題，過幾天就能好。”一位女赤腳醫生看著流血的大口子說：“幸虧還差那麼一點點！我給你上點兒藥，很快就好了！”上藥時，我疼痛難忍，終於忍不住哭出聲來。

我躺在地鋪上好幾天不能動，每天聽著同學們唱著“我是貧農好後代”的歌曲出工，回來，又出工。有一次，女貧協主席進來了，老師把她帶到我鋪邊。她問：“不疼了吧？”我點頭。她轉頭對老師說：“要說可够危險的。再偏一點，這孩子這一輩子就慘了。”“怎麼就慘啦？”我聽見這話就傻問她。“你就……就……”她看著我，一時竟答不上來。老師接上話茬兒說：“你就不能和同學們一塊鬧革命了！”我一驚。不能革命了，那還真是够危險！

許多年後，我無意中翻出那條被棒子根兒杵破了的舊褲子，當時的情景頓時重現于眼前。我這才意識到那個尖刀似的棒子根兒是多麼可怕，它差點就破壞了我最基本的女性生理器官！

補白：父親有一副好心腸。文革期間，生產隊開社員大會，四類分子是不能參加的，他們必須低頭站在屋檐下請罪。一個冬天的晚上，天氣非常冷，房前站著的四類分子凍得直哆嗦。父親出屋門上廁所，看到其中的一個哆嗦得特別厲害，便冒著自己可能被批鬥的危險，毅然脫下自己的破皮襖給他披上。

博 客

同學李大穎 佚 名

李大穎是我小學時一個同桌的外號。那時他身軀瘦小，却頂著個大腦袋。穎是我們陝西的土話，腦袋的意思，俗曰“穎大心不悶”。李大穎家是地主，其實他家並沒有多少土地，主要是因為他爺爺當過國民政府軍的營長。李大穎兄弟姐妹六人，他是老三。他最小的妹妹出生于 1967 年，因為長期饑餓，母親沒奶水，妹妹整天吊在母親奶上哭鬧。不到三個月，妹妹含著母親的乳頭餓死了。鄰家大叔用一塊破布卷起妹妹，提著一把鐵鍬，抱出去埋了。

一般貧下中農糧食也不够吃，也有孩子衆多的，但是可以申請救濟糧。李大穎家不行，因為這項待遇對地主家庭無效。1967 年餓死孩子是例外，對他家却是必然。他家甚至吃過皂角樹葉子。二月二龍抬頭，農村有吃炒玉米粒的習俗。李大穎放學回家對母親嚷：“今天人家都吃苞穀豆，咱怎麼不炒？”母親什麼也沒說，搬過一個小板凳，放在一口大缸跟前——這口缸是他家盛糧食的唯一器具，讓他站在板凳上踮著脚尖往缸裏看。裏面除了少量的苞穀糝，一粒苞穀也沒有。他不再喊炒苞穀豆了。

1970 年，我們讀三年級，學校排演現代秦腔劇《杜鵑山》，李大穎扮雷剛。在一個水庫工地演出結束時，天色已晚。工地慰勞小演員，每人兩大碗麵條，外加一個杠子饅（長條狀饅頭）。兩碗麵條足以吃飽，杠子饅誰都沒有當場吃掉。回家的路有 15 裏長，每個人背著自己的演出道具往回走。路過村莊，有狗跟著他們亂咬。許多學生掏出杠子饅，一塊一塊掰著打狗，看狗搶食。李大穎却想著哥哥、妹妹在家挨餓，捨不得逗狗，而是緊緊揣在懷裏。到家大概九點多了，屋子裏黑著燈。哥哥和兩個妹妹已躺在炕上，母親坐在炕沿兒發楞。李大穎興奮地對母親說：“媽，你知道我拿了個啥？”說著把杠子饅遞給母親：“這是發的。等明天早晨讓哥哥和妹妹也吃一頓白麵蒸饅。”誰知哥哥餓得並沒有睡著，一轆轤爬起來說：

“媽，我沒有睡著，現在就要吃杠子饅。”

李大穎個子不高，如今也只有 1.66 米。他的學習成績却是班裏最好的，也很有繪畫天賦。四年級時，他曾在演草紙上畫了兩隻豬的交配圖，很生動，貼教室牆上。女同學看了，臉紅心不滿，可又無話可說，因為他在畫上寫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力發展養豬事業”幾個字。進入初中，他的畫畫天賦進一步發展，學校的板報畫多出自他手。有老師提醒他說，光畫粉筆畫是成不了器的，應該用畫筆來畫。可是他沒見過畫筆，不知道畫筆什麼樣子。請教清楚後，知道家裏沒錢買，就尋思著自己製造一支。他把父親吸旱烟的烟嘴偷走，想著再找些豬毛羊毛什麼的栽進去就是一支畫筆。可是沒等他設計成功，父親就在他書包裏翻出了烟嘴，一口咬定他在偷著吸烟，不容分說胖揍一頓，任他怎麼解釋也白搭。他畫畫的興趣由此斷送了。

大約是 1969 年，春節過後，家裏面臨斷炊，十一歲的他與母親以及一個七歲的妹妹走上逃荒討飯的路，目的地是渭水以北的涇陽縣和三原縣。一晚上，無處過夜，一家三口只好睡在一個棄廢的窑洞裏。窑洞靠裏的一半已經完全塌掉，前半邊還可擋風避雨，但頂部却有一塊裂著長長口子隨時可能跌落的大土塊。李大穎讓母親和妹妹睡覺，自己則一直盯著窑頂。如果落下面面土（細末土），就馬上叫醒母親抱著妹妹跑。由于擔心，他一晚上沒睡著。

還有一次，天黑之後，他們來到一個村莊借宿。那個村子家家都養著狗，每到一戶人家門前都引起一陣狂吠。出于對外鄉人的警惕，儘管他們低聲哀求，却沒有人收留他們。無望中，娘兒仨在村邊一個空場地坐下，茫然無措。狗叫的聲音消歇了，妹妹由于行走勞累和饑餓，泣哭聲顯得清晰起來。過了一會，村頭一戶人家吱嚶一聲門開了。夜色朦朧中，一個老婦人站在門口，向他們望瞭望，又退了回去。沒多久，門裏走出一個小夥子，來到他們跟前，把他們領進了家門。這一家偏偏沒養狗。那位老婦人給同學一家騰出一個大炕。妹妹不哭了，却開始對著母親喊餓。老婦人聽到後，立即用大碗滿滿挖了一碗苞穀糝，生火做飯給他們吃。李大穎喝了兩大碗苞穀糝糊糊，喝飽了，倒頭便睡。好幾天沒睡過一個囫圇覺了，他睡得太香也太沉，到下半夜尿了炕。雖說是鋪的葦席子，可總擔心第二天早上怎樣向主人交代，于是不停挪動身子，直到用體溫把尿濕的地方全部暖幹。

那一天，一家三口來到一個鄉鎮。母親和妹妹坐在鎮食堂（當時鄉鎮級的飯館都叫食堂）門外的臺階上，大穎進食堂見機行事要飯。一位上身穿四個口袋幹部服的中年男子，進門坐在飯桌前要了一碗紅肉泡饅。大穎走到幹部面前，膽怯地說：“叔，我跟我媽還有我妹妹都是逃荒要飯的。我們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肚子餓得狠，餓得狠。”幹部沒說話，兩眼盯著同學足足審視了兩分多鐘，也看了看門外的母親和妹妹，似乎是在做思想鬥爭。估計這碗泡饅對他而言也是偶或一次的奢侈享受，只見他猛然間把筷子往桌子上啪的一拍，不說話，起身走出了食堂。李大穎楞了楞，端起那碗飯，走到了門外。

要飯的人都必備著一根打狗棍。李大穎說這並不是打狗棍，應該叫防狗棍。到別人門前要飯，本來就是乞求于人，打了人家的狗，也就要不到飯了。每當有狗圍著他娘仨亂叫時，他只掄著棍子虛張聲勢，以保護妹妹與母親。碰到實在凶猛的狗撲上來，就把棍子塞到狗的跟前，讓它咬住棍頭。近三個月的要飯過程結束，同學提的那根棍子，本來圓圓的棍頭已經讓狗咬成了扁平狀。

中學時期，童年的好友漸漸與他這個地主子弟劃清界限，像躲避瘟疫一樣保持著距離。村幹部的子女也日益顯現出優越感，趾高氣揚，對他不理不睬。他與女生的關係更因其地主成分而變得越發冷漠。同年級同學中，同班同學之中，唯一與他說話的女同學是一位黃姓的女生。黃同學容貌出眾，小時候男同學扯起來找哪個女子當媳婦，我們的首選都是她。有一天晚上，鄰村一個村幹部子弟找到李大穎，問他跟黃同學能不能說上話，知道不知道她家住啥地方。大穎問啥事情，回答說是想把黃同學約出來談一下，和她談對象。李大穎大約對黃同學也有好感，這種為他人牽綫搭橋的事讓他止不住悲從中來，心想自己這輩子怕是要光棍

到老了。

夏天的夜晚，村裏老少爺們兒喜歡在麥場上露天過夜。兩塊磚頭墊一張紙就是枕頭，鋪的是隨手帶的葦席子。一群人湊在一堆，躺在地上邊搧扇子邊諗閑傳。李大穎也歡喜露天過夜，可從不往人堆裏湊，總是一個人坐在邊角處躺下。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一個不受待見的另類，仿佛不讓別人眼裏出現自己，這世界會顯得清靜一些。我們村距秦嶺不遠，那個時候夜裏仍然時常有狼出沒。

李大穎就讀的那所高中，離我們村有三十裏路。每周回家一次，自己帶糧食，來回都是步行。1976年，大穎高中畢業，回到村裏，立即遭遇冰冷的現實——被編入黑五類子弟勞動組，一天12個小時強體力勞動，中午只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他時常尋思，就算我的爺爺有罪，我們這些後代又有什麼過錯，為什麼要遭受這種不公正的待遇？十六七歲的他，開始過早地關心起政治來，心想毛澤東這個造孽的咋還這麼能活呢？四人幫倒臺後，閉塞的農村並沒有刮進多少新的信息。當時村裏放映一部電影《歡騰的小涼河》，是反鄧小平的題材。可是兩個多月後，這部電影突然不再放映。從這個細微的變化上，大穎似乎看到了一丁點曙光。

恢復高考後，大穎仍然在黑五類子弟勞動組上工，境遇並沒有得到改善，頭上的帽子似乎也永遠沒有被摘掉的那一天。但他已經知道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上大學，以改變自己地富子弟的境遇。他知道，對他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拼搏，要麼鯉魚跳龍門，要麼把賤民當到死。白天勞動，沒有時間復習，也怕別人看見；晚上回到家裏，不管多累，他都強迫自己振作精神，在煤油燈下復習功課到深夜。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在外人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他怕別人嘲笑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李大穎是1979年考上大學的。我相信他的實力，寫信鼓勵他參加高考，還買過一套高考復習叢書郵遞給他。有一天他們院子裏一個女孩訂婚，裏裏外外站滿了人。大穎沒有地方復習，就爬上一顆高大的桑樹，在樹上看書。密密的桑葉隱藏了他的身影，入神的復習隔斷了樹下的人聲喧囂。

大穎白天勞動，沒工夫到公社郵電所去，他央求父親去一趟，看沒有錄取通知書。郵電所離家只有兩裏路，父親却勸他別做這白日夢，說這樣的好事不會落到咱這種家庭頭上。直到有人轉告大穎的父親，說在郵電所看到了他兒子的錄取書，這位父親才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去了一趟。在郵電所當場拆開信皮，看到吉林工業大學鮮紅的大印章時，他才相信這真的不是夢，自己的兒子真的是被大學錄取了。這時離入學報到只剩下五天時間。

消息很快傳在村子裏傳開。這是村裏幾十年來唯一的考上大學的新鮮事。當晚，大穎家接踵而來很多人。大隊幹部來了，左鄰右舍來了，同學們和他們的家長來了，平素沒什麼交往的也來了。院子裏擠滿了人，道喜祝賀的，希望也能沾上點喜氣的，甚至盤算著嫁閨女的，都有。熱鬧過去後，大穎還是抱著葦席到麥場上乘涼過夜，但他這次却不是睡在邊邊上。有人盛情安排他睡在麥場中間，周圍再圍睡著其他人，說村裏好不容易出了個大學生，可別讓狼給叼走了。黑五類勞動小組也不用去了。走在路上，鄰村一個漂亮的中學女同學，大老遠就熱情地叫李大穎的名字，請他到家裏坐坐，而以前碰到他時，是看也不看他一眼的。說起錄取後周圍人態度的變化，李大穎深感世態炎涼之起伏突兀，與範進窮困潦倒下的中舉沒什麼兩樣。

幾十年的人生歷經，李大穎說感到最幸福的是大學時代，徹底摘掉了黑五類子女的帽子，能够直起腰板平等地與他人交流。在大學裏，他第一次看到《中國青年報》，還有他認為只有一定級別才能看到的《參考消息》。李大穎曾將他上大學之前的遭遇寫成一篇回憶文章，妻子看了之後以為是其他人寫的小說，兒子說那是荒誕的天書，沒有任何可信度。



“天上布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裏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泪恨。千頭萬緒，千頭萬緒，涌上了我的心。”文革期間，生產隊每年都舉行幾次憶苦思甜大會，唱這首憶苦思甜歌，回憶過去的苦難，念叨今天的甜之來之不易。憶苦思甜活動一般有兩部分內容：一是由苦大仇深的老農做報告，講述在舊社會受苦受難受剝削受壓迫的悲慘遭遇，同時講說解放後過上幸福生活的親身感受；二是吃憶苦飯。有時還召開批鬥大會，場面好不壯觀。

每次憶苦思甜大會都要搭一個很大的會台，會台中央上方懸挂“憶苦思甜大會”橫幅，台兩邊柱子上貼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和“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標語。會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個話筒。會台旁邊設有席位，村革委會成員就坐在那裏。台柱旁站立著荷槍實彈的民兵。大會由村革委會主任主持，通常是挺胸收腹走上主席臺，兩手在桌子沿兒上撐穩了，使用高亢的聲音對著話筒喊：“憶苦思甜大會現在開始！”

“大會進行第一項，齊唱《東方紅》。”主任起頭，全體社員高聲齊唱。

“大會進行第二項，把地富反壞右分子押上臺來。”話音一落，民兵們兩人一組，身後背槍，雙手抓住已經捆綁好的五類分子，快步揪上臺來。民兵的脚步震得臺子轟轟響。五類分子胸前都挂著牌子，牌子上寫著自己的姓名，姓名上打著紅叉。革委會主任先是喝令五類分子“向毛主席請罪”。分子們剛轉過身，身後的民兵便照他們的腿彎處狠踢一脚，他們便咕咚跪下，說：“我是某某（地主、富農等）分子，我有罪……”等他們口中念念有詞請完罪，村主任便喝令他們面向台下的社員跪下。

我村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共有十幾名。如果哪天一早人們走出家門，發現街道被人打掃過了，那麼這一天就是有大集了。天不亮就把大街掃好了的那些人，就是村裏的黑五類。村裏的“義務勞動”都是黑五類的事兒，只要大喇叭一喊，不管他們當時正吃著飯還是正幹著別的什麼活計，必須立即趕到大隊部，一刻都不敢耽擱。

“大會進行第三項，高呼革命口號。”主任喊一句，台下的社員跟著喊一句。有時爲了增加氣氛，就在社員中安排一位領喊者。口號震天，群情激憤，鬥志昂揚，發泄半個小時之後，會場才能清淨下來。

“大會進行第四項，由貧農老大爺某某爲大家憶苦思甜。”于是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上臺了，哭訴舊社會所受的壓迫。情緒到達高潮時，老貧農會走到臺上的地主面前，狠抽兩個耳光，猛踢兩腳。社員們被激發，會場上有人帶頭高呼“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泪仇！”“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堅決打倒地富反壞右！”老貧農繪聲繪色的表演又一次把會議引向高潮。有的社員熱淚盈眶，激動萬分，千仇萬恨都集中到眼前臺上那幾個五類分子身上，仿佛舊社會一切罪惡都是他們幾個犯下的，他們與他們有算不清的賬，解不了的恨。憶苦思甜是一種經常性的活動，很受各級領導重視，于是各村都涌現出一些做憶苦思甜報告的典型、能手。他們述說的遭遇催人泪下，社員深受觸動。也有因事先缺乏準備，鬧出許多笑話的。

“大會進行第五項，吃憶苦思甜飯。”憶苦思甜飯，一般是用糠皮、麩皮和蘿蔔葉子摻在一起做成的菜團，是生產隊爲開憶苦思甜會提前做好的。有時爲了增加難吃的效果，還有意識地往裏添加一些砂子。革委主任宣布吃憶苦思甜飯，另有人就向每位社員分髮菜團，每人一個。我第一次參加憶苦思甜大會時，吃上了這種憶苦思甜菜團，覺得非常好吃，對父親說：“爸爸，這菜團真好吃，舊社會專吃這個多好呀。”爸爸嚇壞了，輕聲地喝斥道：“再胡說就撕爛你的嘴！”我嚇得再不敢開口亂說，悄悄把爸爸分得的那個也吃了。

“大會進行第六項，游行示威。”全副武裝的民兵把五類分子押下臺子。分子們都戴上一頂尖尖的紙帽子，排成一隊，敲打著臉盆或鐵簸箕，脖子挂著牌子，有的脖子上還挂著破

鞋，在民兵的押送下，走在最前邊，廣大社員群眾走在後面。游行的隊伍高呼革命口號，沿著主要街道走一遍之後，一場憶苦思甜大會到此宣告結束。

補白：初，錢偉長在美國著名航空科學家馮卡門手下當工程師，年薪 8 萬美元，比美國總統的還高 5000 美元。他還是回國了。五七年反右，被打成右派。1987 年是反右三十周年。八六年底，右派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和劉賓雁三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建議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並徵詢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錢偉長也在這三四十人之列。看了信，經慎重考慮，錢將此信轉輾交到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中，並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但是與他們是不同的。”1986 年 12 月 30 日，鄧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稱：“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鄧把許良英誤為王若望，於是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被開除出黨。鄧還批評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並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 20 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分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鄧表揚了錢偉長：“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於是後來錢偉長當上政協副主席，一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詩 雲

## 地主仔陳國慶 心 聲

陳國慶是我小學時的一個同班同學。他是國慶節那天出生的，父母便給他取了這個名。我班還有一個同學，個子最大，學習最笨，最愛打架。有一次自習課，他乘老師不在，站起來大聲說：“從今天開始，大家不許叫陳國慶，都得叫他地主仔。誰敢不這麼叫他，就罰誰跪著曬太陽。如果叫他不答應，就罰他當牛騎跑教室五圈。”於是陳國慶的“地主仔”稱號就這麼開始了。雖然他很不喜歡這個稱呼，也不得不接受。

其實平常我們一起玩時，即使他答應了地主仔這個稱呼，我們也同樣拿他當牛騎。而且他也從不拒絕，好像很樂意似的。如果他不給人當牛騎，同學們就不和他玩。為了能和同學們一起玩，他甘願當牛。在全班同學中，我是唯一沒有騎過他的一個。他原是我的同村兄弟，我比較同情他，而且我生來不喜歡欺負人。不過，我怕被班裏的大個子罰曬太陽，所以也跟著大家叫他地主仔。

地主仔家原來在我們村。有一次，他叔叔與村裏的一個人下象棋，不知為何倆人吵了起來。

聖經雅歌金句 焦國標書

由吵而打，最後

引發家族械鬥。

據說他家之所以被劃為地主，就是因為這件事。對方勢力大，土改丈量土地時，有意擴大他家的田地面積，最後把他家定為地主。後來，也是因為這件事，他家便搬到附近的村莊去住了。

儘管搬到了別村，但他家仍然戴著地主帽子。我經常看到他父親在學校門前參加勞動改造。有一次，他的父親寫信給毛主席，訴他的冤屈。公社扣了他的信。公社革委會領導說他不服改造，在學校操場召開專門批鬥他的大會。那天晚上，陳國慶的父親頭上戴著用豬竹籠製成的頭盔，我和陳國慶就站在台下。陳國慶什麼話也沒說，只是暗暗地流著淚。

也許是受家庭處境的影響，陳國慶很寡言。即使有時說話，聲音也很小，人也不大靈活，學習成績也不太好。我與他一起讀到初中畢業，高中就不在一起了。後來聽說他高中畢業後又到瓊中從初中開始讀，最後終於考上中山醫學院預科班。在預科班讀 8 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醫院任眼科主任，成為眼科專家。

有一天，他突然打手機與我聯絡，並到家鄉萬寧找我，表示想義務幫助家鄉的老人做白內障複明手術。

我初看到他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反復問：“你真的是陳國慶嗎？你就是過去那個地主仔嗎？”當從和他同來找我的村人口中得知確是他時，我極為吃驚。想不到他變化那麼大，簡直是換了一個人。不僅模樣變了，而且說話出口成章，話多了，人也比以前活躍了。我問他：“過去家鄉人那樣對你，你不見怪嗎？”他笑著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把，家鄉永遠是我的根，畢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一輩子都報答不完。”

他真的是變了，變得讓我佩服，而我最佩服的是他那堅韌的毅力和寬闊的心胸！

## 我家是這樣當上地主的 侯德喜

我家世代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窪裏鄉窪邊村，衣食無憂，但并不是很富裕。父親侯榮 14 歲那年離家外出學手藝，解放後成了北京五建公司的一名工人。大伯則憑藉著自己經營，在農村買了幾十畝地，靠地租生活，土地時被劃為地主。1959 年，爸爸把媽媽、我、弟弟妹妹接到城裏，住在朝陽門外南下坡爸爸單位的房子裏。

文革開始時，當時我正在讀小學三年級。突然有一天，老家村裏來人，給廠裏遞了材料，隨後就把我這個三年級的孩子五花大綁，戴著近一尺半的高帽子，上書“地主分子侯德喜”，押送回老家窪邊村。和我一起被押送回村的還有我的母親李淑蘭，我的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但是爸爸沒有被帶走。父親不明白，自己是工人，媽媽娘家是清河的貧農，媽媽和我們這 5 個孩子怎麼就突然成了地主呢？後來村裏的人告訴父親，由於大伯是地主，爸爸外出學藝成了工人，脫離了關係，可媽媽和我們 5 個孩子卻沒有和大伯分家，吃的是家族飯，自然就是地主。

我家沒有一畝地，沒有一個雇工，也沒有剝削過任何人，僅僅是因為與大伯沒有“分家”，也就成了地主。實際上大伯在我四歲時就去世了，我根本不記得他長什麼樣。村裏還健在的許多村民稱，當時評地主、富農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一些人因為學了手藝，多賺了點錢，也被劃為富農。那段時間，我們一家，天一亮就參加生產隊勞動，一直幹到天黑，做最苦最累的活，得到的工分卻比貧下中農少。晚上我們還要接受勞動改造。記得天上的“三星”連成八字的一撇狀時，我們就出發去地裏接受勞動改造，直到凌晨兩三點，“三星”變成一捺，才回去休息。有時候活多，要改造到天亮，經常是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除了勞動，我們還經常被綁去參加批鬥大會。我母親經常一綁就是一天，然後是街頭游行。看到母親被批鬥，我和弟弟總是偷偷地哭。有時想給母親送點吃的，但最終還是不敢。到年底，我家分了糧食，往往只能吃三個月。三個月以後，我們吃白薯。白薯吃完了，只好找些野菜、樹皮充饑。

弟弟侯德富當時 20 來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那時他什麼也不想，唯一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夠吃飽飯。有一次村裏組織去一個工地挖沙，三兩的饅頭隨便吃，他一口氣吃下了 13

個。弟弟想找一個能吃飽飯的工作，但是沒有地方肯招他。一聽說他家成分高，就揮手讓他走開。

戴著地主的高帽子，我們一家吃盡了苦頭，一晃就是 13 年。1979 年，聽說中央要給地主和富農摘帽了。然而一個多月過去了，我們卻沒有等來摘帽通知書，我和弟弟于是去鄉里的街道辦詢問。第一、第二次，街道都告訴我們，沒有我們的摘帽通知書。第三次去的時候，我們在鄉街道的檔案室找到了我家的摘帽通知書。我和弟弟把這個通知書拿在手裏，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摘帽之前，我們家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甚至不被允許參加公社組織的大部分活動。我們沒有見過選民證，但是我知道這張選民證關乎我們一家人的待遇。我和母親、弟弟、妹妹拿到選民證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心情很激動，一夜沒睡著。第一次參加選舉之後，弟弟德富說他覺得像是完成了一個家族歷史的轉折，渾身飄起來了。

補白：我有一個鋼琴老師叫做陸洪恩，文革被槍斃的。陸先生說不是貝多芬要向工農兵學習，而是工農兵要向貝多芬學習。在監獄裏，陸先生受盡折磨，最終被殺害，比林昭還早兩天。所以林昭、張志新不是一個兩個，是一群人。 王西麟

先行者戴潔天 溫州人

1955 年，33 歲的戴潔天風華正茂。作為縣委派出的工作隊隊長，他到溫州永嘉縣潘橋集體農莊，幫助農莊進行小社并大社、初級社升高級社的工作。但是，在集體農莊調研了一段時間後，戴潔天困惑地發現：并社之後，人們不僅沒有過上“點燈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難了。問題出在哪里呢？戴潔天開始思考了。他買來很多蘇聯集體農莊生產管理的參考書閱讀，驚訝地發現，即使在蘇聯，對於集體農莊的優劣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集體農莊的生產組織》這本書上明明白白寫著：“把土地撥歸社員個人負責，不但不能削弱隊或小組的力量，反而使它鞏固了。”

戴潔天的探索就這樣開始了。第二年夏天，他來到永嘉縣的燎原社，要在這裏做一個沒有人做過的試驗——包產到戶。1957 年 4 月，實行包產到戶後的第一個收穫季節來到了。燎原社 85% 的農戶都增加了收入，全社春糧增產了 40%。實驗的結果給戴潔天巨大支持。在給浙江省委的報告中，他堅定地寫道：“生產責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個社員的身上，能夠發揮廣大社員的創造性，能夠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然而，1956 年 11 月 19 日，溫州地委的機關報《浙南大眾報》却刊登一篇充滿敵意的文章《“包產到戶”做法究竟好不好？》，并配發一篇社評《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1957 年 10 月 13 日，批判包產到戶的文章也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燎原社的嘗試走到了終點，年輕的戴潔天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穀底。1958 年，他被劃為右派，并以反革命罪被判處管制勞動三年。這一年的 11 月 10 日，戴潔天被押送回老家瑞安農村，執行管制勞動。誰也沒料到，這一走就是 22 年，一個家庭就這樣被生生地拆散了 22 年。

1979 年，一紙平反書結束了戴潔天的戴罪生活，破碎的家庭終於團聚。戴潔天被調到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像當年在農村搞調查一樣，戴潔天又下鄉去了。從農民、供銷員到個體戶、專業戶，他再次走訪了這片土地。他認識到，包產到戶的意義不僅僅在農業領域，事實上，它播下的是市場經濟的種子。

戴潔天的小兒子陳堅，起初在銀行上班。這是一個很多人夢寐以求的職業，但辦公室裏的陳堅却坐不住了，他想下海。父母，尤其是父親戴潔天，堅決反對陳堅的想法。1985年，《解放日報》記者張也平和戴潔天一起到基層調研，文章發表在5月12日的《解放日報》上。該文第一次提出“溫州模式”。戴潔天一方面深深認同溫州人闖蕩市場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對兒子陳堅下海經商。陳堅最終還是像很多溫州人一樣去闖世界了。1992年，陳堅和妻子來到葡萄牙擺地攤。不到一年，夫妻倆幾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鎮的集市。2000年，陳堅占領了整個葡萄牙的小商品市場。

直到今天，戴潔天也很少談起陳堅的生意。偶爾的隻言片語，還是掩蓋不住地流露出一個父親的憂慮。

補白：我們村只有四五十戶，都姓郭。姓郭的都是同一個祖宗，而且沒有出十代。可是就這麼一個村子，却是等級森嚴，人人相欺，戶戶不平等。村裏有三戶地主，而且都是地主已不在世，只是地主的老婆孩子。文革鬥地主，實際鬥的是地主的老婆和兒子，即地主婆和地主羔子。

如今我回老家，每與當年的地主羔子們談起往事，他們都表現出一副不堪回首的樣子，同時他們對D給他們摘帽流露出感恩戴德之情。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至今心懷恐懼，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現在農民的民主意識強了，可是他們好像仍然活在過去的陰影中，一切維權抗爭活動他們都非常消極，不敢參與。 網 友

## 恐懼與希望 莫 言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饑餓和孤獨外，那就是恐懼了。……幾十年來，真正對我造成過傷害的還是人，真正讓我感到恐懼的也是人。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中國是一個充滿了“階級鬥爭”的國家，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鄉村，總是有一部分人，因為各種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壓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為祖先曾經過過比較富裕的日子，而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當然更沒有進入城市去過一種相對舒適的生活的權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為祖先是窮人，而擁有了這些權利。如果僅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懼，造成恐懼的是這些掌了權的窮人和他們的孩子們，對那些被他們打倒的富人和他們的孩子們的監視和欺壓。我的祖先曾經富裕過（而這富裕，也不過是曾經有過十幾畝土地，有過一頭耕牛），所以我只讀到小學五年級就被趕出了學校。

在漫長的歲月裏，我一直小心翼翼，謹慎言行，生怕一語不慎，給父母帶來災難。當我許多次聽到從村子的辦公室裏傳出村子裏的幹部和他們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謂的壞人發出的淒慘聲音時，都感到極大的恐懼。這恐懼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懼都要嚴重許多。這時，我才理解我母親的話的真正含義。我原來以為我母親是說世界上的野獸和鬼怪都怕人，現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獸，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喪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確實有被虎狼傷害的人，也確實有關於鬼怪傷人的傳說，但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萬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讓這些殘酷行為合法化的是黑暗的政治，而對這些殘酷行為給予褒獎的是病態的社會。

雖然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黑暗的時代已經結束三十年了，所謂的“階級鬥爭”也被廢止，但像我這種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還是心有餘悸。我每次回到家鄉，見到當年那些橫行霸道過的人，儘管他們對我已經是滿臉諂笑，但我還是不由自主地低頭彎腰，心中充滿恐懼。

當我路過當年那幾間曾經拷打過人的房屋時，儘管那房屋已經破敗不堪，即將倒塌，但我還是感到不寒而栗。

回顧往昔，我確實是一個在饑餓、孤獨和恐懼中長大的孩子，我經歷和忍受了許多苦難，但最終我沒有瘋狂也沒有墮落，而且還成爲一個作家，到底是什麼支撐著我度過了那麼漫長的黑暗歲月？那就是希望。

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日子裏，我希望能得到食物和衣服。在“紅色恐怖”的年代裏，我希望能得到人們的友誼和關愛。恐懼使我歌唱著奔跑，恐懼使我產生了千方百計地逃離封建落後的鄉村的力量。我們希望人類永遠地擺脫恐懼，但恐懼總是難以擺脫。在恐懼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著我們前進的道路，並使我們產生戰勝恐懼的勇氣。

補白：那時，所有被殘酷鬥爭的人，有嘴不讓申辯，有理無處可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喊毛主席萬歲。革命群眾膽子再大，也不敢怒斥你不許呼喊毛主席萬歲！所以呼喊毛主席萬歲便成了當時的一種喊冤方式了。有個人鬥人很積極，每當被鬥人試圖辯解時，他就憤怒呵斥：“不許放狗屁！”一次，被鬥人一連幾次申辯都被“不許放狗屁”給攔回去。那被鬥人無奈之下高呼“毛主席萬歲！”這位積極分子聽都沒聽，仍然習慣性地怒罵“不許放狗屁！”等他反應過來時已經遲了。他立刻被革命群眾拳打腳踢，並當即被勒令站在被批鬥的位置上。一秒鐘內，河東河西。 朱之泓

劉義元賣妻 林啓山

1971 年秋的一天，邵陽縣河伯公社五洞大隊第八生產隊會計劉義元賣妻的消息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聞，迅速傳遍四面八方。

且說 1968 年秋的一天中午，幾個手拿梭標、鳥銃的民兵，突然闖進屋高聲大叫：“反革命分子劉義元滾出來！”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血氣方剛的劉義元聽到叫他反革命分子，氣得火冒三丈，厲聲質問：“你們不要血口噴人！我是貧下中農，是生產隊會計，誰是反革命？拿證據出來！”“陳良柱就是證據。”劉義元立即被五花大綁，押到大隊部。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忽然有人敲劉義元的門。打開一看，是陳良柱跪在他面前，邊哭邊說：“好兄弟，我們是一起長大的。我雖然出身地主，但哪里也沒去過，一直在隊上搞生產。你當會計最清楚，一年到頭我沒缺一天工，未偷一回懶。有人說我參加黑殺隊，這是天大的冤枉。我不承認，他們就把我吊半邊豬，逼我交代。人總要講天理良心，沒那回事，我拿什麼交代？不說又要吊。承認是死，不承認也是死，唯一的生路只有逃走，可是逃到哪里去？到處在抓黑殺隊，天下老鴉一般黑。你是個好人，請你設法救我一命。我永世不忘！”

劉義元是個有初中文化的人，又是生產隊幹部，想到利用法律來保護他。陳在劉家躲了兩天兩夜之後，劉便對他說：“在我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我有個辦法，你看行不行？”“什麼辦法？”“投案自首。”“那不是自投羅網嗎？”劉義元分析說：“在當前這種形勢下，除了縣公安局，誰也救不了你。你唯一的活路就是跑到縣公安局，就說自己是黑殺隊，特來投案自首。他們就會把你關押起來，你就安全了。”陳良柱覺得有道理，臉上露出了一絲喜悅。

當晚下半夜，劉義元站崗放哨。在劉的保護下，陳悄悄溜出大隊，迅速向縣城塘渡口而去。第二天清早，找到縣公檢法軍管小組，自報投案。軍管小組經查問，知道他是出來逃命的，無法關押，只好把正在縣裏參加會議的五洞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雲松叫來。李馬上掛電話

讓隊裏快來接人。就這樣，陳良柱又被前幾天折磨他的凶神惡煞抓回去了，劉義元窩藏陳良柱的事也暴露了。

劉義元駁斥審問他的人：“誰說他陳良柱是反革命？誰說他是黑殺隊？真憑實據在哪裡？他是我們生產隊的社員，我們一同長大，非常瞭解。他為人老老實實，勞動勤勤懇懇，沒有曠過一天工，沒有偷過一回懶。他在我家住了兩天，我有什麼權力把他趕走？你們說他是反革命、黑殺隊，請證據拿出來，連人一起送到縣公安局去，請政府定罪，該關則關，該判則判，該殺則殺，何必你們勞神費心？如果你們真的成了最高人民法院，有處死人的權力，那麼請問：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的牌子在哪里？大印在哪里？你們這些人代替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嗎？”主審者理屈詞窮，怒不可遏。一杯茶的功夫，劉義元即被打暈，耳膜被打破。

劉義元的妻子陳冬青尚在坐月子，千方百計找熟人拉關係，在傷藥嚴重脫銷的情況下買了四顆跌打損傷丸，抱著嬰兒往公社去給丈夫送藥。丈夫頭腫得象個西瓜，兩口子抱頭痛哭。

幾天後，一夥橫眉怒目、凶神惡煞的人沖到劉義元屋裏，翻箱倒櫃，挖地三尺，尋找劉義元的反革命罪證。劉義元喜歡讀書看報，但又缺錢買不起書，訂不起報，因而在外面看到片紙隻字，就當寶貝一樣撿回來看，碰到一些帶韻味的詞句，還愛引吭高歌。日積月累，家裏集起一堆廢舊字紙。搜查者將這字紙全部抄走，仔細查看，終於在一張格子紙上發現幾行莫名其妙的字：“日出東來月落西，程度不知路高低。得逍遙處且逍遙，騎驢跨鶴過竹橋。”他們左看右看，看不出什麼名堂。就因為這片廢紙，劉義元被關進大牢。劉的岳父陳昌順，原是生產隊長，也因陳良柱案被抓，送到縣監獄，一年後死于獄中。時年 22 歲的陳冬青，也被當做反革命家屬，掛黑牌戴高帽，游街批鬥，被折騰得不像人樣，奶水全無，月子裏的小女兒餓死在爺爺懷裏。

劉義元在牢裏一坐就是 22 個月，進來時是個 25 歲的精壯勞動力，如今是一天三兩米都吃不完，人瘦得皮包骨頭，一雙膝蓋骨一到陰雨天就痛徹骨髓，腰伸不直，腿張不開，頭抬不起，身挪不動，比八十歲的老人還差。有關方面怕他死在牢裏，又定不了罪，只好放他回生產隊接受監督勞動。當他蓬頭垢面拄著一根棍子慢慢挪到自家門口時，家裏人都認不出來了，夫妻又是一場大哭。

劉義元在監裏患上了嚴重的胃潰瘍，出獄後沒錢治療，拖了一年多，病情越來越重。一天晚上，他深情地對妻子說：“我恐怕活不多久了，現在你又有身孕了。如果我死了，你帶著孩子，還有個老爸，生活怎麼辦？再者，我還頂著個反革命罪名，你就是反革命家屬，孩子也是黑五類，長期受欺，永無出頭之日。”冬青問：“你是不是想讓我去做流產？”劉義元解釋說：“我是想給你母子找條活路，找一個有前途的人家！”冬青堅決不同意：“我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要活一塊活，要死一塊死。況且我還懷著你的骨肉！”

在參加完一次四類分子會後，劉義元又乘機試圖說服妻子：“冬青，我倆離婚吧，我不能老讓你背這個反革命家屬的臭包袱。你是貧下中農出身，離了婚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大搖大擺走路，誰也不敢再對你怎麼樣。”冬青最終同意離婚，但“離婚後我仍住在家裏，不能把我趕出去”。

婚離了，劉義元開始琢磨著勸妻子改嫁。他說：“昨夜我做一個夢，夢見我們的兒子和別人的兒子在一起玩耍，不知為什麼忽然吵起來了。別人的兒子罵我們的兒子是反革命崽子，要砸死他。兒子哭哭啼啼跑回來問我：‘你是反革命嗎？你為什麼要當反革命？’我說：‘爸爸不是反革命，是冤枉的。’有人罵我翻案，用索子把我父子雙雙捆了起來。我從夢中驚醒，嚇出一身冷汗。為你自己的前途和我們未來的孩子著想，你必須忍痛割愛，決心改嫁。”

冬青哭起來，越哭越凶，如生離死別：“你病這麼重，爸爸又老了，身邊沒人照顧，日子怎麼過？”劉義元說：“你如果真的關愛我，就向男方提一個條件，要三五百元錢留給我治病。只要病治好了，一切失去的東西都可以掙回來。”這時劉義元已在鄰近的新寧縣為冬

青找到一位大齡青年。這位青年身體健康，長相不錯，心地善良，出身也好，只因家窮，一直找不到老婆。冬青無奈，同意了這門親事，但向男方提出兩個條件：一、她已有身孕，孩子生下來帶滿周歲後讓劉義元接回來；二、因欠賬要 500 元還賬。男方表示：第一條沒問題。第二條，只能拿出 200 元，多了拿不出。最後雙方達成了交錢結婚的協議。劉義元雙手接過沉甸甸的大錢包時，以為對方搞錯了。區區 200 元，怎麼能這麼大一包？打開一看，原來都是一元兩元的塊票和角票！拿著這 200 元錢，住了 20 天醫院，劉義元的病好多了。

一天，有人給送來個好消息：冬青分娩了，是個男孩。劉義元馬上向父親報喜。兒子周歲後的第三天，劉義元去接兒子。見了冬青，尷尬之餘，雙手合十，千恩萬謝：“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冬青悲歡交集。喜的是他身體比原來好多了，悲的是他還是反革命釋放犯。談到接孩子，冬青說：“接回去還是個反革命崽子。再說，兒子尚未斷奶，你接回去如何帶？”劉義元無以回答。“還是等斷奶以後再說吧。”劉義元只好照辦，悻悻而歸。

劉義元空手回來，老父懷疑冬青變卦了。劉義元心病漸重，舊病復發。這時年關漸近，隊裏搞年終結算，兩父子勞動一年，僅得 80 元錢，還被扣除 60 元的杉樹錢，僅餘 20 元。父親從自留山裏砍了幾莛杉樹回來做棺材，隊上却說，反革命家屬沒有砍樹的權力。鑒於砍的是自己栽的樹，從寬處理，不批不鬥，罰 60 元錢算了。劉義元不服氣，砍自家山上的樹為什麼要罰款？找大隊幹部評理，大隊幹部說：“你是勞改釋放犯，你父親是反革命家屬，沒有享受社員待遇的資格。”

聽了這個話，劉義元好比五雷轟頂，差點昏了過去。憑空被扣上的反革命帽子，哪一天才得盡頭？以前賣老婆治病想活下去，如今活著又有什麼意思？老婆改嫁了，兒子又抱不回來，治好的病又犯了，真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哪有出頭之日，不如早死早超生！決心下定，立即到供銷社買了一瓶敵敵畏。

年三十晚上，他把從隊上分來的兩斤臘肉洗淨、煮好、切碎，分成兩大碗，一碗給父親，一碗留給自己，說：“爸爸，今天過大年，我娘死得早，父親又當爹又當娘苦苦把我養大，誰知兒子沒有出息，被誤栽冤枉當了反革命，坐了幾年牢，身體搞垮了，老婆被賣了，孫女餓死了，孫子也接不回來，害得您老人家吃了一輩子苦，受了一輩子罪，實在是對不住。”劉義元泪流滿面。

父親反復安慰他。劉義元則就著昏暗的煤油燈，背著父親，將敵敵畏倒在自己那碗肉裏。老人問：“哪來的農藥味？”他說著“沒有”，便端起碗狼吞虎咽呷起來。很久未吃肉了，父親勸他慢一點，別呷出毛病來。胃開始翻騰了，劉義元對父親說：“爺老子，你要挺住好好過，不要為我傷心。”說著哇的一聲，吃的東西全部吐出來了，農藥味瀰漫一屋子。父親以為是他胃不好，受不起油暈，扶他上床休息。

劉義元躺在床上，因疲勞過度，一覺睡到第二天響午。他很納悶，百思不得其解：是農藥失效了？還是藥量太少了？他走下床來，端起藥瓶子就喝，硬是一口氣把剩餘的敵敵畏全部喝光。誰知藥到肚子裏翻江倒海一陣之後，又全部嘔吐出來了。父親看出兒子是在尋短路，急得全身發戰，不住地說：“菩薩保佑！菩薩保佑！”又說：“傻兒子，新年大節，為什麼尋短路？你甩手走了，我怎麼辦？我知道你心裏苦，好死不如賴活著。你還年輕，沒有過不去的坎，沒有洗不白的冤！”劉義元沒有死成。

一晃又過了五年，1980 年 10 月，邵陽縣公安局發了個 30 號文件——《關於劉義元被拘留一案的復查結論》，稱對劉“拘捕不當，予以糾正”。日夜盼望的平反書，盼了 10 年，終於盼來了。劉義元立即拿了這個文件去新寧縣接孩子。這時兒子已經七歲了，在讀小學一年級。儘管媽媽再三說“這是你親生的爸爸，喊爸爸”，可是孩子怎麼也不能接受這個陌生的爸爸，反而說：“我有爸爸，這個老頭不認識。”說罷就跑開了。冬青很同情劉義元，讓他多住幾天，與兒子交流、培養感情。誰知兒子大了，怎麼也無法認同。強迫不行，硬帶走他也會跑回來的。劉義元滿懷希望而來，滿腹失望而去，只好另找老婆，想重續香火。可是



家裏太窮，年輕的不肯來，拖兒帶女的又養不起，年齡大沒有生養能力的又不想要，找來找去，找了個 39 歲的寡婦。生活了三四年，孩子連影兒也未見。劉義元只怪自己八字差，命中注定。

劉義元仍然想念嫁出的老婆和兒子。兒子長得十分健壯，和自己青少年時一模一樣，可就是不認他這個生身父親。他曾反問劉義元：“你為什麼要把我娘賣了？我娘哪點對不住你？你對我又盡了多少做父親的責任？”劉義元被問得啞口無言，只好打落牙齒往肚裏吞。後來老父也死了，自己身體也一天天地差，人也一天天地老，分了兩畝責任田也無力耕種了。帶著後討的老婆南下打工，可是人家嫌他年齡太大，跑了幾個城市也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回家沒有盤費，生活無著，租不起房，住不起家，只好流落街頭，靠撿破爛為生。

補白：上小學時，我寫作文不經意流露出長大想駕飛機翱翔祖國藍天的夢想，少先隊輔導員嚴厲地告誡說：“你知道什麼叫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嗎？一個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異想天開了。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真正的脫胎換骨，與你的父親徹底劃清界限。”這話像一瓢刺骨的冷水劈頭蓋臉潑在我頭上。那年六一兒童節，我果然成了班上少數幾個沒有戴上紅領巾的小學生之一。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我早早體驗到封建王朝株連九族政策的嚴酷。很多同學故意在我跟前發著怪聲唱：“右派，右派，是個老妖怪。” 趙 旭

#### 我經歷的幾個右派 正經人

我父親就是右派，我家對面住著一個右派，我有一個舅舅是右派，我下放農村時村裏也有一個右派。首先我要說父親回來以後說的一句話：“我要感謝當年我成為右派，不然早死了。”這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為他必定會對自己的遭遇懷恨在心，怎麼反而會說出這樣的話呢？他告訴我，當年他是地主少爺，自幼嬌生慣養，但身體不好。後來被劃成右派，去了西北某地煤礦挖煤，每天勞動，身體反而漸漸好起來了，現在七十多了，看起來還是六十多的樣子。

我問他在煤礦怎麼樣，他說：“不錯啊！落實政策，其實我還不想回來呢！因為在那裏呆慣了。”我還以為他在那裏勞動很苦，他說沒有，其實也就是跟隨大家一樣勞動，好象還讓他做一點文字工作，有點受重用的意思。他也不恨毛澤東，還很佩服毛澤東，說自己當年其實也是少爺脾氣（他上面三個姐姐，所以自小受寵），跟領導說話太張狂了，正好趕上了，成為右派。

我的那個右派舅舅，曾參加過浙南游擊隊，解放時就是區委書記，按說劃右派是輪不到他的。可惜他在 1955 年左右去大學讀書，受右派教授的影響，再加上自己本來就是個地主少爺，有點書生氣，就不幸成為了右派。去了勞改農場，後來自己又逃了回來，在家鄉農村呆著，與其他農民一起種田。他對農業技術還做了一些改良，深受當地農民歡迎。那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呢！後來好像農場那邊來人把他帶回去了。帶回之後究竟怎麼樣，我不太清楚，但是什麼被打得半死之類的事是絕對沒有的。他那個牛脾氣從來沒改過，現在離休了在家呆著，身體也很好。我印象中他的身體就從來沒差過，整天一副自以為是的樣子。

小時候我家對面那戶右派也是離了婚的。我們家也是右派，所以我也跟他家的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沒有什麼顧忌。小夥伴們，有領導幹部的子女，有絕對紅五類的子女。那時沒有人拿成分說事，大人也從不說起，我也是很偶然從母親嘴裏知道對面那家是右派的。當時感覺心裏有點慌，但從來沒有看不起他們。後來在文革中人家貼我母親的大字報，我才知道原

來我的生父也是右派。

我下放農村時村裏那個右派可是有點來頭的，據說當年是南京政府交通部裏的人。當時我們生產隊裏其他農戶都住瓦房，就他一個住在草屋裏，所以我印象特深。他整天穿一件黑呢制服，頭髮花白，昂首向天，一看就與眾不同。

我剛下放到那裏時，一開始很尊敬地叫他老伯伯，後來一幫小夥伴（當時我才 16 歲）告訴我，他是個右派，我就不這樣叫他了。無論多小的孩子，對他都是直呼其名。在農村是很講輩份的，對長輩，即使沒有親戚關係也要叫叔、伯、爺之類的，唯獨對他不是這樣。平常也沒有人到他家來玩。

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他過得都挺瀟灑。生產隊長對他的勞動從來不做要求。我們這些人出工，都是個頂個的，只有他出工是做個勞動的樣子。他體力不行，又無勞動技術，還喜歡聊天，時不時就拄著鋤頭聊開了，自己仰望天空，似是自言自語，又似講給其他人聽，其他人也似聽非聽。什麼以前怎樣吃喝玩樂啦，怎麼賭博啦，南京政府裏的事情如何啦，等等。當時我一心只想表現好點，爭取入團（入黨還不敢想），所以從不理會他。要是換成現在，我一定會去聽，然後寫一本書出來。其實他挺喜歡我的，想跟我聊，無奈我不理他，後來他也就算了。

回到草屋裏他常常光個膀子，點個煤油燈吃飯。我們當時是有電燈的，他不用。有些人家也不用電燈，後來我也不用電燈。沒其他原因，只是想省點錢。他有一個兒子，有時來看他，但很少與我們來往。生產隊開什麼大會時，他會上臺陪著。一排地富反壞右站在台旁邊，也挺有意思，但從來不打他們，更不用繩子捆。

知青美女喬獻華 周立

1957 年冬天，涪陵雪下得好大，年僅 3 歲的喬獻華永遠記住了那場漫天飛舞的大雪。一群人叫喊著“把反革命分子喬俊承揪出來”，沖進家裏，將正在幹活的爸爸往門外拖。家裏沒有其他人，小獻華嚇得躲在牆角，瑟瑟發抖。被拖到門口的爸爸突然掙脫出來，跑回屋將女兒緊摟在懷裏，把臉緊緊貼在女兒滿是淚水的臉上，急切地說：“丫頭，不管發生什麼事，你要記住，爸爸不是反革命，爸爸是打日本鬼子的……”話沒說完，爸爸再次被拖走。

雪地裏，小獻華哭喊著一路追趕，一直追到涪陵地區收容所。“我看見他們把爸爸反手吊起，用棍子打，爸爸發出一聲聲淒厲的叫喊。我不敢看下去，只能跑去找媽媽。”當天晚上，爸爸被幾個人拖回來扔在地上，渾身血肉模糊，凌亂的頭髮上還沾著雪花。爸爸一句“我不是”沒說完就斷了氣。懂事後，媽媽周維清告訴她，爸爸是黃埔軍校畢業的，是國民黨的軍官，上戰場打過日本鬼子。

“接下來的日子可以用暗無天日來形容，走到哪里都有人追著我們喊‘打死小反革命’，沒有娃兒願和我們玩。開批鬥會時，媽媽胸前挂著‘反革命家屬’黑牌，站在臺上，低著頭，台下不時有人向她吐口水、扔小石塊，她不敢躲避。我們在台下哭著不敢出聲。每次開會回來，媽媽都要對我說：‘記住，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你們臉上，也不要說什麼，自己抹了就是。要在忍耐中學會堅強！’”

3 歲以後，喬獻華開始怕雪，怕下雪的日子。背著反革命狗崽子的惡名，喬獻華在忍耐中度過了屈辱的童年。

1968 年 12 月 22 日，毛澤東發出重要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正在體校上學的喬獻華沒等人來動員，就主動申請到艱苦的龍潭區。她是那批知青中年齡最小的。“那年我才 15 歲，按現在的說法，還是未成年人。我想趁機爭表現，表明我想與資產階級決裂的態度是多麼鮮明，希望別人會因此改變對我們的看法。”

1969 年 2 月 8 日，喬獻華和其他知青一道在涪陵燈光球場集中出發，草綠色的軍裝扎著皮帶，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軍用挂挎包上印有“扎根農村幹革命”。人人手持紅寶書，高呼口號，向農村進發。喬獻華插隊落戶在龍潭區太平人民公社復興大隊第 6 生產隊（現涪陵區青羊鎮新元村 6 隊）。那裏距涪陵城 90 公里，一眼望去，除了山還是山。

到達太平後，當地小學生敲鑼打鼓迎接他們，村民們對漂亮的喬獻華表現出特別的熱情。2006 年 12 月，當地村民李順珍對 37 年前喬獻華的印象依然深刻：“我們看她就像是看仙女一樣。當時還有個漂亮女知青，外號叫‘太平一枝花’。但公認喬獻華更漂亮，大家就叫她‘賽太平’。”因為能歌善舞，喬獻華很快成了宣傳隊的文藝骨幹。15 歲的她從沒享受過這種禮遇，她欣慰極了，感到這條知青路走對了，決心死心踏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然而好日子沒過一個月，就因為她黑五類身份被揭穿戛然而止。

一天，喬獻華參加完勞動，興致勃勃往回走，路上遇見生產隊長。隊長說：“我本來以為你是龍是鳳，現在才曉得，你竟然是個混進革命隊伍裏的反革命狗崽子。我要讓貧下中農好好管教你！”喬獻華這時才知道最初的想法多麼幼稚，家庭成分這東西就像遺傳基因，抹也抹不掉，無論你怎樣追求進步，都是白費勁！

喬獻華從小夢想當歌舞演員，穿上舞鞋翩翩起舞。她仍然堅持每天早上 6 點起床，偷偷到屋後山坡上吊嗓子——輕輕的，不敢放開喉嚨。

生產隊最遠的田地在山脚的烟畝溝，單程就要走近兩個小時，天黑才能回家。她幹活特賣力，所謂“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她深怕臉曬得不够黑，手上磨的老繭不够厚，不能顯示自己是多麼擁護“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喬獻華突然感覺左手臂一陣涼意，抬手一看，一條綠蛇纏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聲，怕別人罵她是國民黨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滿螞蝗。“有的正往肉裏鑽。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來。螞蟥一扯就斷，弄得滿腿是血。我忍住噁心，不敢哭出聲。後來，還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螞蟥鬆口了再扯。”

辛苦勞作一天，喬獻華最多可以掙到 7 分，而其他知青幹一天是 8 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糧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別人偶爾還有肉吃，喬獻華沒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領”。這一切，沒人敢公開為她說話，因為她是黑五類的狗崽子。

長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責的原因。一開始喬獻華衣著前衛，當別的女孩穿寬鬆的花棉布上衣時，她却穿著襯衣，還要扎在褲子裏，顯示動人的身材。這些也被當成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典型。

“別人都把我當勞改犯，誰都可以指著我的鼻子罵。這種生活比兒時受歧視更難受。以前畢竟有媽媽在身邊，可以傾訴，不會孤獨。但我記著媽媽的話，要在忍耐中學會堅強。”

1970 年冬天，黑龍江軍區歌舞團到太平慰問演出。作為宣傳隊骨幹的喬獻華，在與他們合作中表現出的歌舞才華折服了歌舞團領導。歌舞團有意召她入團，但因成分問題，未能如願。她也沒有去爭取，她知道，自己這樣的身份是沒有資格去爭取的。

1972 年冬天，隊裏幾個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銷店一塊紅糖，有追求進步的社員舉報喬獻華是同謀。不管她怎麼解釋，沒人相信這個反革命後代說的話。連續一周，她每天下班後都被叫到隊裏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等貧下中農們教育累了，她才能深夜獨自返回 10 裏外的住處。

回住處的途中要經過一個池塘。這天晚上，喬獻華呆呆地坐在泥地上，望著黑暗中的池水，任憑雪雨打在臉上。良久，她找了塊廢棄的磨盤石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來時，喬獻華躺在一戶村民的床上。簡陋的土屋無法遮擋屋外呼嘯的寒風，但她感到特別溫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閨女啊，我們都是可憐人，以後不要再幹傻事了。”田母胥春懷撫摸著喬獻華的臉，心疼地認她作幹女。想到父親臨終不甘心的話和乾媽的關愛，喬獻華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氣。

今年 12 月 6 日，喬獻華重返太平。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後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這個呆了 8 年的山鄉，喬獻華眼淚灑了一路。山還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乾媽胥春懷去世 17 年了，當時未能回來為老人家操辦葬禮，成為她一生的愧疚。她堅持要到乾媽墳上去看看。乾媽埋在塘埡口，喬獻華哭著跪在墳前，直到香燭燃盡。

補白：那年代，老百姓普遍缺衣少吃，只有掌管糧、油、肉的一些單位及其領導有大米飯吃，有肉吃，有酒喝。元旦節，供銷分社出肉和酒，糧店出糧油，食品站出肉，辦了幾桌酒席，幾個單位的職工加上有關領導，共同慶賀新年。三江供銷分社經理廖維相喝得不少，話也多起來。他很得意地講了他昨晚做的一個夢：他接到北京的通知，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接見他。他興致勃勃地趕到中南海，但站崗的人不准他進去。講到此，大發議論：“真是大鬼好見，小鬼難纏；大官好見，又有狗腿子擋路！”一個在場的人，散席後就打電話向區公安特派員報案，說廖維相當眾罵毛主席是大鬼，罵毛主席的警衛員是狗腿子。狗腿子的主人不是地主、官僚嗎？也就是罵毛主席是地主、官僚！公安特派員立即向上報告。第二天，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就派人將廖維相逮捕，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入獄。廖維相本想表示他熱愛毛主席，幾句酒話卻帶來了牢獄之災。廖維相的老婆原是供銷分社的臨時工，一兒一女都在上學。他們過去在三江都很光彩，如今一下成了反革命家屬。他老婆被趕出供銷分社，連住處都沒有，年幼的子女也失學了。

陳宗培

周立波為何倒黴 朱忠康

作家周立波生于 1908 年，湖南益陽人，在上海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為中共黨員。抗戰期間他到前綫做過戰地記者，先後曾任《抗戰日報》、《救亡日報》、《解放日報》編輯，還翻譯過蘇聯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抗日勝利後他在東北參加土改運動，寫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榮獲斯大林文學三等獎。解放後他擔任過全國文聯、中國作協、湖南文聯要職，當選過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合作化運動中，他來到老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十年磨一劍，寫出一部反映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在此期間他的作品大量使用當地農民的方言土語，充滿濃郁的鄉土氣息，開創了當代文學新流派——茶子花派。他還寫過反映工業建設的《鐵水奔流》和《萬里征塵》等作品，看名字就知道都是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寫的。

想不到這個步步緊跟的作家，因寫了一篇只有 4000 字的歌頌毛澤東的散文《韶山的節日》，竟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毛的叛徒，遭到了毒打和折磨。

這篇散文寫的是毛澤東 1959 年 6 月 25 日重返闊別 32 年的故鄉時的情景。這一天傍晚，毛在羅瑞卿陪同下來到老家，并吟成一首七律《到韶山》：“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第二天去看已被茅草遮掩的雙親墳墓，接著又來到韶山學校，看望了這個學校的師生們，晚上就到長沙去了。毛在老家只耽了兩天一夜時間。

周立波在益陽時曾先後六次來韶山參觀採訪。1965 年《羊城晚報》復刊時，編輯找周立波約稿，周就把這篇《韶山的節日》寄了去。編輯很滿意，副刊作家秦牧更是贊不絕口：“文章寫得相當精彩，形象飽滿，栩栩傳神，在政治意義和藝術感染力方面都很出色。”由于涉及領袖活動，編輯部還把打印稿分別給黨政領導審看，甚至還打電話詢問過中央，在得

到了“可以由你們自己處理”答復後，于 1966 年 1 月 21 日在《羊城晚報》刊登出來。韶山毛澤東故居陳列館的人員讀後，對文章中的細節提出了意見，周立波做了修改，又在原來的版面上重新刊登一次（1966 年 4 月 23 日）。

此時文革運動序幕已經拉開，一場大浩劫即將，黨內高層鬥爭已處於白熱化。周立波文章開篇寫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傍晚，毛澤東同志在羅瑞卿同志和其他同志陪同下，來到了自己的故鄉，湖南湘潭韶山沖。”這個曾是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後來擔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此時早已被揪出打倒。羅瑞卿曾是毛的貼身保鏢，自己被打倒時，不僅自己一無所知，連國家主席劉少奇、總理周恩來也不知道。1965 年 12 月 10 日，正在昆明視察部隊的羅被緊急召到上海，一下飛機就被隔離軟禁起來。1965 年 12 月 8 日到 15 日毛澤東親自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黨委擴大會議，把羅瑞卿置于死地。後來又揪出北京市市長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還有一個叫楊尚昆，統稱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1966 年初這場黨內高層鬥爭還沒有擴散到社會，但《羊城晚報》的編輯們已經風聞于羅瑞卿不利的傳言，就把文章中羅瑞卿的名字略去了。當《韶山的節日》第一次在《羊城晚報》發表時，江青正在上海。看了報紙後，她大發雷霆，要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張春橋打電話給中央宣傳部，指責這篇作品很壞，是醜化毛主席的反動作品，勒令全國報刊一律不得轉載。接電話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林默涵，他找來文章一看沒有任何問題啊，但是毛夫人又不敢得罪，只好打電話通知六大區的宣傳局，不得轉載這篇文章。

陰錯陽差的是，主管《羊城晚報》的中南宣傳局沒有接到電話，那份更正性的文章第二次又在《羊城晚報》刊登了出來。這下惹了大禍。中南局負責人陶鑄接到張春橋氣勢汹汹的質問：已經通令全國下了禁令，為什麼還要刊登這篇文章？想為羅瑞卿翻案嗎？

文革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之後，《韶山的節日》這篇作品被當作反毛澤東思想、醜化毛主席的大毒草進行批判，周立波更是罪責難逃。中南局宣傳局、羊城晚報社和同意發表此文的人也都被扣上了不同程度的罪名。但是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歌頌毛澤東的文章也要遭到鞭撻封殺，這算哪門子的道理啊？

周立波遭到大會鬥小會批，挂著牌子戴著高帽游街示眾，在益陽體育場接受萬人批鬥後，再拉到縣劇場看演員的表演，表演的第一句話就是“打！打！打！打倒周立波！”據說在一次批鬥時，造反派的槍走火，子彈從周立波耳邊擦過，險些喪了命。

經過幾番折騰和批鬥，還是秦牧拆穿了這其中的秘密。原來周立波的文章把中國的一隻大醋缸給踢翻了。文章裏曾有一句提到楊開慧的名字，只有短短的幾十個字：“他的夫人楊開慧同志，1930 年就義于長沙，那時候，她只有 29 歲。”而且周立波在引用了毛澤東兩句詩“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後，又寫道：“詩人歌咏的是一切革命的家庭，一切殉節的同志，自然也包括了她的壯烈犧牲的可愛的家人。”這些內容對於當時炙手可熱、不可一世的江青來說都是特別忌諱的。在一次講話中，江青曾六次點了周立波的名字。

1979 年 9 月 25 日，作家周立波因病在北京逝世。數十年後，他在美國的孫女周仰之為祖父寫了一部傳記，想在國內出版，托朋友找了許多出版社，開始聽到周立波的名字都很感興趣，但一瞭解，此周立波非彼周立波（上海清口相聲演員），都婉言謝絕了。經過許多周折，總算找到了團結出版社并于年初出版了此書。現在問題是誰肯花“清口”周立波票價的九分之一來買這本書？如今在穀歌的搜索引擎上輸入演員周立波幾個字，有 45 萬條結果，而輸入作家周立波幾個字，17 萬條結果，而這 17 萬條可能也是借了現代周立波的光才有如此豐碩的成果。

儘管各類四類分子之間沒有太多共性，但是在 30 年的歧視之下，一些人還是萌發了一定程度的群體意識。從當年一些地下組織的成員結構中可以發現，少量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有組織起來的傾向。山東茌平縣 1957 年成立的一個地下組織，148 名成員中，地、富、反分子 63 人，占成員總數的 43.5%。其中，有正在管制、解除管制和刑釋分子 21 人。26 名首要分子中有地、富、反分子 16 名，占首要分子總數的 60%。1959 年雲南蘭坪縣破獲的一起地下組織案，成員達 64 人，其中四類分子 51 人。文革初期福建龍岩縣形成一個擁護劉少奇的地下組織，在近 200 名成員中，其成員三分之二為貧農、中農，三分之一是有過各種問題的人，包括四類分子。

一些四類分子產生一種反叛意識是難以避免的。文革中有一位中學生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現在對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來就鬥，拳打腳踢，戴高帽子游街。我們認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於我們這樣長期嚴酷的專政壓出來的。這樣搞，他們誰不盼望蔣介石來？因而，報復行為不可避免。特別是地主、富農，因為財產損失，不滿的程度更加突出。四類分子被指控的現行罪惡中有幾條是常見的，比如記“變天賬”，向子女進行報復教育。當時中國有一個政治術語叫反攻倒算。實際確實存在反攻倒算的情況，也確有一些所謂的反攻倒算是被人為誇大了。山西省定襄縣委的一份報告列舉了地方反攻倒算的若干行為，其中包括低價收買農民分下的房子，給農民積極分子起渾號，等等。一位富農因老婆病死做喪事，收了別人送的禮，請人看風水、燒紙，為安葬死者又砍掉了集體 6 顆小松樹和兩捆封山柴，被認定為大搞封建復辟活動，破壞山林等，以抗拒改造罪判處管制三年。

農民分到地主富農的財產之後，心中多多少少有一點忐忑不安，擔心將來這些財產的安全。在河北省一些地區，土改之後，農民把分到的好端端的房子拆除，再去他處重建，原因之一是怕“變天”。因此，1947 年以後的幾年，許多村裏出現一些新房，仍是坯、磚壘砌，但是粗梁大櫟，有瓦擋脊獸，有雕龍刻鳳的窗架、台石。文革中出現的屠殺四類分子的案件，最初往往是傳說四類分子要報復。湖南省新田縣 1967 年秋謠傳四類分子成立 205 師，“貧下中農殺一半，共產黨員要殺光”，因而從 9 月 8 日開始，40 天內殺害四類分子 668 人，因害怕而自殺的 180 人。1979 年給四類分子摘帽時，這種顧慮更加突出。有的地方，土改時的積極分子怕地富摘帽後遭打擊報復，怕地富子女改變成分後起來掌權，自己受到排斥。

農民的擔心并非多餘。四類分子摘帽之後，各地不同程度發生了所謂反攻倒算事件，主要是地富親屬索要甚至搶占土改中被沒收的房屋、土地和山林；有的還圍攻、毆打土改中的黨員、幹部和積極分子及其家屬；為被鎮壓的人搞祭奠活動，樹碑立傳；個別地區發生殘害人命的惡性案件。遼寧省地主子弟柳某某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公開向政府索要土改時被沒收的 2650 畝上地。凌源市四個鄉鎮，有 6 戶地主富農強行搶占并扒毀集體房產，占為己有。

1991 年最高人民法院專門對如何處理反攻倒算案件作了答復，成為處理這類事件的一個準則。到 1995 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曾經批示：“像這類反攻倒算的事，必須嚴肅對待。特別是黨員幹部產生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連鎖反應下去釀成大禍。”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文件指出，反攻倒算是現階段一定範圍內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必須旗幟鮮明地保衛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成果，捍衛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下麵是三個反攻倒算房產的個案：個案一：吳某之父解放初因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吳家原有木屋四間，土改時被國家沒收，後由一個工廠作為倉庫使用，並進行了產權登記。1991 年吳某強行搬進床鋪，讓其母居住，時間長達 20 餘天。1992 年，吳某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 2 年。

個案二：任某，其父土改時被定為地主分子，戴帽管制。其父解放前有幾間房產，長期無人管理，年久失修。1957 年鎮工商聯經組織批准建房時，原房址已變成一塊空地或房底

子。1982 年，此處平房被扒掉，鎮政府在此建了一座餐飲服務樓。1991 年，任在其父去世後，重翻歷史舊帳，對他家那早已不復存在的房產打起主意，從此開始了 4 年的上訪。鎮政府專門給北京司法部寫信進行政策諮詢，司法部回信明確答復：這類情況不予平反，不予返還財物，維持土改時的結果。因要求得不到滿足，任于 1995 年試圖殺死本溪市信訪辦官員，未遂。

個案三：馮某原為富農成分，祖上有 8 間草房。1953 年土改時，陳莊供銷社暫借這 8 間房屋使用。這一暫借就是 40 多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馮提出索回自己的房子。1983 年，馮一家強行搬進來居住。當時政府負責人說馮是富農分子反攻倒算，要批鬥他，于是他嚇得趕快搬了出來。1999 年，法院判馮勝訴。

補白：1971 年夏，雙樓一隊的幾個社員在沈家黃角樹下乘涼。那時家家都挂毛澤東和林彪的大幅照片，一個姓鄧的社員指著沈家門上那幅照片說：“你們看，林彪的樣子，真是勾勾鼻子鷄子眼——吃人心，挖人膽！”社員無意中把這話傳出去了。公社革委會認為這是一樁嚴重的反革命案件，立即令鄧某到公社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交待罪行。鄧社員學習了一個星期，無論怎樣誘供逼供，始終沒承認他有什麼過錯。區公安特派員到雙樓一隊反復偵查。姓鄧的平時沒得罪過人，加之說過林彪是勾勾鼻子鷄子眼的人多的是，所以，都回答：沒聽到鄧說過那樣的錯話。因為姓鄧的是貧農，又無把柄，政法部門無法結案。後來縣裏接到九一三事件的文件，這個反革命案件也就自然了結了。

陳宗培

神佑張乃仁 黎學智

吉林省海龍縣第一中學造反派關押了老師黎學智，為了徹底打倒黎學智，必須除掉他的妻子張乃仁，因為她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經濟來源，而且還為他收集情報證據并郵寄上告信。造反上臺的革委會主任語文教師馬福生，群專負責人數學教師顏世忱，駐校軍訓隊負責人李德銘，多次密謀，決定借刀殺人！他們認為，對於胎兒橫位、即將臨盆的張乃仁來說，剖腹產本身就存在著生命危險，就算她下得了手術臺，沒錢住院，沒人護理，孩子無人喂養，母子肯定性命不保。所以，他們決定派于秀芝押送黎學智反革命冤案家屬張乃仁到沒有任何親屬關係的瀋陽生孩子。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于秀芝押送張乃仁乘火車去瀋陽。一路上革命教師于秀芝與反革命家屬張乃仁基本上沒有語言上的交流。雖然張乃仁意識到她此去凶多吉少，可能已經進入生命倒計時，但她還是反復琢磨獲取情報的方式與途徑。

機會來了。于秀芝上廁所，張乃仁堅決果斷地打開了于秀芝的手提包，迅速抄記并秘密收藏了于秀芝攜帶的海龍縣第一中學革命委員會 1968 年 11 月 4 日(校革介字)第 053 號介紹信的抄件：“茲派于秀芝同志，負責押送并安排反革命家屬張乃仁住院生孩子(橫位)，請予以監督協助為盼。”正當張乃仁把于秀芝的手提包放回原處時，恰好被回到座位的于秀芝發現。于秀芝怒斥：“隨便翻動別人的手提包太不文明，太不禮貌了！”張乃仁回擊：“你知道什麼叫卑鄙無恥嗎？說，你是陪送還是押送？”“陪送。”“誰給我定的反革命家屬？”“學校革委會定的。”“一所鄉鎮初級中學有權定反革命和反革命家屬嗎？”“我是組織派遣，請張老師理解。”

兩人各想心事，不再交鋒。車到瀋陽東站，張乃仁先下車，于秀芝緊隨其後。突然，張乃仁沒有站穩，幾乎摔倒，一位好心的女列車員手急眼快當即扶住了她。與此同時，張乃仁瞬間覺得腹中的胎兒扭動了一下。??????

經瀋陽小河沿婦嬰醫院檢查，張乃仁的待產兒已經由橫位轉成順位，完全可以自然產，不需要剖腹產！此時的于秀芝尚不知手術情況有變，正忙著向醫院革委會、醫生、護士以及部分待產婦交代張乃仁的反革命家屬身份，請大家協助監督。于秀芝完成組織重托之後，認為即將進行剖腹手術的張乃仁已無畏罪潛逃可能，于是甩掉張乃仁，去瀋陽航空學院探親訪友。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八日，張乃仁終於自然產成功，生一個男孩。可憐可敬的張乃仁沒有任何人陪護，每日吃麵包喝白開水度日，無一滴奶水供嬰兒吸吮。張乃仁雖為反屬，但她端莊的容貌，高雅的氣質，鎮定自若的舉止，面對苦難的從容，引起了醫生、護士和同室產婦的極大同情和尊重。于是，醫生送來奶粉，護士送來自製小孩衣服，產婦們輪流為孩子哺乳。人間自有真情在！

張乃仁隨身攜帶的全部家當只有 55 元，去掉住院、醫療等費用已經所剩無幾。產子三天后，張乃仁不得不出院，自己抱著兒子，攜帶日常用品，乘坐三輪車，由瀋陽小河沿到瀋陽東站，坐四個小時火車，到達吉林省海龍縣山城鎮，在東北的隆冬季節回到自己獨居的陋室。

補白：著名翻譯家馮亦代裝作是章伯鈞的知音，有事沒事地到章家蹭吃蹭喝聊天。他把章的談話默記在心，然後向上頭密報。告密得到的好處是馮自己早早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只是為了繼續扮演告密者，馮摘帽之事秘而不宣。有時還可以得到一點告密勞務費，報銷一些費用。還有，有關領導會請馮在有名的飯店吃頓飯，或送給幾張緊張的演出票。

## 桃園釣客 從維熙

桃園裏有一個丁字形水塘。大約 20 米寬的水塘對面，是團河農場的醫院。我們經常看見水塘對岸坐著一個持竿垂釣的老者。這個老人十分孤獨。最初，我們都以為他是個農場裏離退休的老幹部，不久我就覺察這個老者身邊從沒有出現過孩子和家屬，這不太正常。這老人好像是一座時鐘，只要是好天，9 點鐘左右保證坐在河塘的土坡上。農場的頭頭，家都住在城內，難道他的家在農場？如果他是個住院的病號，應穿病號服，而他總是那一身藍色的中山裝。這個水塘裏不能說一條小魚也沒有，可是寸步之外的鳳河，還有鳳河旁邊的團河宮，垂釣方便，風景秀美，他何不去那裏？我站在這岸，從來沒有見他釣上過魚。

我們幾個老右腦袋裏可縳著階級鬥爭這根弦兒，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神秘人物。何群過去是從事會計工作的，有著超凡的縝密推理：“這個年代，關押人的辦法很多；軟禁是對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這老頭是一名要犯。”“怎麼不見警衛？”“這種人是用不著警衛的。就是有警衛，也不會露面。”最後，幾個老右統一了認識：這是個有來頭的人物。

有一次，董維森與總場的女園藝師（姓張）來桃園巡視工作，我趁張不在，曲綫地詢問了董一次：“水塘對面，有個釣魚的老者，他要是場裏的幹部，我們能不能給他送點桃子過去？”董驚奇地看了看我：“你怎麼有這個想法？”“他挺孤獨的，總是一個人。”董維森對我笑笑：“你們別幹越界的事，那可不是開玩笑的事情。”“他是？”董對我搖搖頭：“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亂管閑事。”

董的回答進一步印證了那老人一非農場幹部，二非世上凡人。破譯這個老者的生命密碼，便成了我們幾個同類勞動之餘的“副業”。有時，我站在水塘這邊，向那邊凝神張望，想從那頂草帽下，看清他的五官。他個子不高，行動帶有一點斯文，只有在久久無魚上鉤的



時候，他才抬起頭來，朝對岸的桃林遙望。有一次，我從桃林中回看守房拿工具，正逢他沿著水塘邊漫步。我停步于看守房外，與他的目光第一次碰撞在一起。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揚起頭上的草帽，朝我揮動了一下。我當時只顧看他的臉，一時之間沒有作出反應。當他把草帽重新戴在頭上時，我才朝那老者舉了舉手中的噴槍（給桃樹噴藥的工具）。這是我對他惟一的一次審視與觀察：他好像情緒並不壞，微笑之間流露出老人的善良。我再想看看他那張臉，可是他朝醫院的方向走去了。

有一次我回京去老岳家，無意間談起這件事，他才敏感他說出了一個使我吃驚的名字：是不是潘漢年呀！

老岳丈名叫張宗麟，是 1928 年入黨的上海老地下黨員，後來去了延安。在上海時，他與潘有過不少交往。他告訴我，上海地下黨 30 年代籌劃出版《魯迅全集》，潘做了不少組織工作，而他本人出任出版經理。他之所以想到了這個人可能是潘漢年，不僅僅是根據我說的情況。有黨內的老朋友告訴他，潘目前剛剛從監獄中假釋出來，由公安部在北京市郊的某個地方進行監護，這完全符合我目擊到的情況。老岳丈還告訴我，潘是一個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產黨人，大約在 1955 年春天，毛澤東簽署了對潘的逮捕令，他是在北京飯店被抓走的。

當時我只知道潘曾任上海市的領導工作，對老岳丈講的許多事情一無所知。記得，在當天的飯桌上，老岳丈因多喝了幾杯紹興黃酒，借著酒興對我說了延安“搶救運動”的往事。說到最激動之處，老人竟然涕零淚落。我的老岳母幾次制止他再說下去，怕我在勞改隊內失言惹事生非。在我告辭時，老岳丈對我說道：“你和阿滬受的委屈固然不小，但是你們應當想得開一些。想想那些比你們承受更大冤枉的人，你們就會少一些失意，多一些生活下去的勇氣。”老人的這一席話，我一直銘刻于心，並寫信給張滬，曲裏拐彎地告訴她家中老人的意思。

但是河對岸的那位老者，到底是不是潘漢年，當時沒有可能得到結論。直到我平反以後，去團河農場訪故時，向場方詢及這一問題時，場方才明確地回答了我。在桃園水塘旁邊垂釣的老者，正是潘漢年。當時他和他的妻子董慧，住在桃園對岸醫院旁邊的小院裏。

據接近他的幹部告訴我，當時他除了垂釣之外，還愛擺弄魯迅先生送給他的全套俄國作家果戈裏《死魂靈》的木刻。這是出于對魯迅的懷念，還是那一幅幅《死魂靈》木刻使他對人生產生了什麼聯想，在寸步之外勞動的我，沒有與潘漢年交談的機緣，不能妄自推斷。但是他隔河揚起草帽，對我友好地一笑，也算是我們之間的一種緣分。

由于這塊地方風光不錯，後來林彪出逃之後，涉及到海陸空軍軍種的幾十號人，其中包括被林立果選中的妃子美女張寧，都被弄到團河來接受過審查。那時候他們住在桃園旁邊的雞舍，勞動基地却是在桃園。總場技術員雲照洋告訴我，張寧當時特別愛默默流淚。雲曾詢問她為什麼哭，張寧說她想南京，想念她的媽媽。這麼多歷史風雲的過客，在我勞動過的桃園留下感傷和悲哀，以及苦澀的歷史背影，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補白：毛逝世那年，12 月 26 日廠裏紀念完毛的生日之後，一位根紅苗正的女工向廠領導舉報另一位女工狗膽包天，要求抓出來批鬥，原因是：後者的生日是 12 月 25 日，昨天她過生日了——竟敢比偉大領袖毛主席早一天過生日，這還了得！ 賀承業

富農兒女的婚姻 燕趙客

我的故鄉在冀中大平原的一個極為普通的村子裏，距離北京 150 公里，天津 100 餘公里。

村裏當時 160 戶人家，人口不足 1 千。村裏沒有人家劃成地主，有 9 戶人家被劃成了富農。富農家的人丁興旺，幾乎占了全村人口的 10% 吧！

富農的兒女不能入團入黨，不能參軍升學。到談婚論嫁的時候，他們都想跳出富農家這個火坑，即使找不上貧下中農，起碼也要找個中農或者上中農，沒有一個人甘心情願嫁到富農家去。成分好的人家的女兒，更不會走進一個富農家裏去做媳婦。假如有姑娘看上了富農成分的小夥子，父母和家人也不會同意的，因為參軍或者入黨都要搞外調。如果姐姐或者姑姑的婆家是富農，當兵和入黨也要泡湯。我沒有詳細的調查，只是知道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周邊村莊沒有一個富農的兒子能單獨找上媳婦的。他們的媳婦都是換來的。

我們生產隊有一家富農，共有七個女兒，兩個兒子。大概是 1976 年左右，我高中畢業後回到生產隊裏幹活了。有一天，那家的三女兒沒出工。第二天出工了，我看到她的情緒很是低落，平時她是很愛說愛笑的。過了兩天才知道，家裏想讓她給哥哥換媳婦。她不同意，做父親的就動手打了她。過了一段時間，她的親事說成了，是外村一戶富農人家。她哥哥當年就結婚了，她是一年後才結婚的。就在這一年裏，這個三女兒出了作風問題，曾經懷孕引產。她是不是以此來報復誰，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我大姑家也是富農，一共有兩個表哥和一個表弟，還有兩個表姐。大表姐嫁到了北京郊區。大表哥那時候已經二十五六了，一個說媳婦的也沒有。大姑每次回娘家來，就跟我爺爺和奶奶念叨大表哥的親事，說實在沒招兒就用二閨女給兒子換一個！爺爺認識的人多，就開始張羅著給表哥換媳婦的事。最後成了，是三家轉的。他們陸續結婚，都不付彩禮。大表哥結婚時我去了，婚禮很簡單很寒酸。在婚禮上，我見到二表哥，心想：眼見著他也到了結婚的年齡，大姑家也沒女兒了，將來他的婚事怎麼辦呢？

我大表哥的婚姻是幸福的，可是聽說二表姐對丈夫不是心甜意懇，主要是嫌他個頭稍微矮一些。二表姐曾經對我說過，如果是她自己找婆家，她不會嫁給我表姐夫的。

我是富農後代中最幸運的一個。1973 年，我高中畢業後回鄉，別說找個工作，連小隊的會計和民辦教師也當不上。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眼看也到了找媳婦的年齡。望著茫茫的星空，我不止一次地想過，難道我也要重複大表哥找媳婦的路？難道自己也要用姐姐來換個媳婦？

那一年真有人給我說媳婦來了，說是讓二姐給我換。轉眼已 1978 年，我幸運地考上了一所中專。真是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美事！如果不是改革開放，也許我只能靠二姐來給換個媳婦了。

不管是換親還是轉親，女兒有了婆家，兒子有了媳婦，做父母的總算是了却了一樁心願。可是，實際上換親和轉親給人們帶來許多家庭悲劇。夫妻不和離婚，是夫妻雙方的事情，可換親就不一樣了。結婚以後，雙方過了一兩年，有的兩口子合不來，就折騰著鬧離婚，賭氣回到娘家，說什麼也不想回婆家了。你不是不回婆家嗎？對方的父母也會讓女兒回到娘家來要挾對方。因為媳婦是用女兒給換來的，不能白白搭上一個女兒！最後，媳婦如果不回到婆家去，哥嫂的婚姻也只能告吹。

有女兒的讓女兒給兒子換媳婦，沒女兒的就沒轍了。我姑奶奶家就屬於這種情況。姑爺曾經當過八路軍，解放後當教師，反右時成為右派，只得回農村幹活。他家也是富農。姑奶奶一共生了五個兒子，我的大表叔和二表叔是 60 年代前找上的媳婦。到了 70 年代，三表叔年歲不小了，總也找不上媳婦，後來就找了一個有點傻的女子。三表叔是農村中非常精明而又能吃苦耐劳的人，可惜，生下的兩個兒子智商非常低，看來是遺傳了他母親的基因了。我的四表叔和五表叔，人長得都不錯，到了年歲，連三表叔那樣的傻媳婦都找不上了。後來就去闖了關東，成了盲流人員，落戶在黑龍江省的一個小山溝裏。那裏也許是天高皇帝遠的原因，相當一部分人是從關內搬家去的富農們，政治空氣一點也不濃。富農們多了，誰也就不用歧視誰。四表叔和五表叔都在東北找到了媳婦。改革開放以後，帶著妻子兒女又都搬遷回

來了。

1979 年，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我們縣四十萬人口，錯劃的富農成分達到了七百餘戶。我們鄉里有一個村子，有四分之一的人家被劃成了富農。粗略地統計，一個縣的地主富農就有四五萬人。我真不敢想像，如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晚上五年，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不知有多少人的婚姻是換親或轉親，不知有多少富農的後代要斷子絕孫，不知有多少人會逃往天高皇帝遠的東北山溝裏，不知人世間還要產生多少悲劇。

農村不再講成分了，我大姑家的二表哥和表弟，隨著形勢的變化，沒用換親就找上了媳婦。不但是我大姑家，過去所有富農的後代，也都陸續地找上了媳婦。三十年過去了，我每年都要回幾次故鄉。改革開放幾年後，再也沒有出現過換親或轉親，換親永遠地在中國農村的土地上消失了。

補白：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筆者在一個沒有公路、偏僻貧困的山村插隊。剛到農村時，農民住房的牆壁上還遺留著文革初期“紅海洋”（到處刷毛澤東的語錄）的痕迹。凡是牆上寫著“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這條語錄的，這戶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農。 李若建

## 地主之殤 野 夫

恩施易幟大抵是 1949 年底的事。雖然敏感的人察覺到山雨欲來，但普通平民依舊盼望著亂世結束。多數人總不免認為，從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許新政會帶來好運。

在這新舊交替的一年裏，祖父或許有過一絲忐忑，當保長的大伯則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可以向誰辭職，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畝。他們本身并無罪惡感，因為向未為惡，甚至還幻想自家還有子弟正在服務新政，應該不會買禍吧。

1951 年恩施各縣開始全面土改，許多工作組派往四方，石板村這樣的窮鄉僻野只派去了一個人。這位幹部姓宋，來自北方的老蘇區，熟稔一整套鬥地主的訣竅。那時全村不過幾十戶，貧富強弱幾乎可以一眼觀盡。首先找出最窮的幾個光棍漢，成立農民代表會。曉之以理，許之以利，這樣方可使這些人不怕得罪鄉親。然後組織村民開會，評選各家成分。這地兒實在太窮了，幾乎都是自耕農，連雇農都沒有，只好把我祖父收養的那個族房孤兒劃為雇農——這樣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這會兒就是偽保長了，算國民黨殘渣餘孽。

祖父也算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人，他已經活過了一個花甲又幾年。雖然身歷數朝，看慣朝花夕逝榮辱壽夭，但他多少還是相信無論怎樣虎去狼來，一般不會傷及他這樣一個與世無爭的老農。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孫。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滅地主——這就不僅是財產和階級了，當然還包含生命。因為這麼大批被奪走財產的士紳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隱患。

這裏的土家先民原是漁獵為主的民族，因為生活在蠻荒之地，與獸同處，家家戶戶都備有幾件火器。這種習俗被許多人誤解為這兒的人尚武鬥狠，其實不過是在危險世界中的自衛。

工作組對民間的火銃還是心存畏懼的，這種古老的散彈槍雖難致命，但毀容是足夠的。對少數民族的脾氣尚不摸底，因此先繳槍是必須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選對象，僅有的火槍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幹部依舊沒有安全感。他已經聽說過賀龍攻打鄭永階的故事，他堅信永階伯的槍支還私藏了許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養的那個孤兒逼供，一個十幾歲的鄉下孩子，很快屈招說見過家裏有幾十支快槍。于是，祖父被綁到農會吊打。對於這完

全虛構的武器，祖父實在無從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斷升級。

這是 1951 年的 4 月，初春的高山還籠罩在陰冷裏。幾十戶人家的石板村，連續幾天傾聽著一個六十多歲老人的慘叫，打破了與世隔絕的古老山村的寧靜。但凡瞭解一點中國酷刑歷史的人都可以去想像，其中蘊涵著怎樣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設在一位鄭姓人的家裏。這天夜裏，打累了的幹部民兵歇去了，將祖父捆綁在床上。他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他在深夜無力地哀求那個族裔給他一點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來給他炒了一碗包穀面，端來一瓢冷水，然後鬆綁讓他進食，并說等天快亮時再來幫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經等不到天亮了，他只需要一點糧食來給他自殺的力量，他最後的飽餐在黑暗中退席。他把捆綁他的麻繩拋上屋梁，挽一個結像打條領帶，將自己蒼老的頭顱套了進去。等到他的踢蹬聲驚來房東時，他已經從他的故鄉含冤遠去了。

自殺這一古老的維護尊嚴的死法，在“新中國”向來被視為一種更大的罪過，喚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屍體被拖到他捐建的義學的場壩裏示衆，而且還脫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這種羞辱死亡和屍體的作法，是在恐嚇每一個族親和鄉人。祖父的暴尸儀式維持了幾天，宋幹部自己也覺得無聊時，決定命令永階伯的兒媳將我祖父扔到村邊的天坑中去。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種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個深坑，仿佛被隕石砸出的一口莫測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於此時，對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著開始。災難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樣，似乎永難填滿。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構成——僞保長。二伯則基本就是個普通平民，他的罪惡僅僅是從他的父親手上，分得二十畝山地。而這些地，還有不少是他們自己開荒開出來的生地。新政權的基本國策是要消滅有產階級，諭旨是允許過火行爲，而當時的權力已經下放到執行者之手。也就是說，一個工作組長就可以決定人的生死。那時，還沒有國法，當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兩個伯父同時被抓。他們還年輕，他們沒聽說過這種世道，因此還想講理，對理的最有效回答當然只能是暴力。他們被押解到巴東縣城，然後，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進了長江，尸骨無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農場，29 年後終於釋放回家時，他已經老得記不清他究竟是什麼罪名了。

故事還沒有結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這一連串打擊後，失去了繼續生活的勇氣。在沒有了男人的農家裏，她們深知接踵而來的將是怎樣的侮辱和加害。那時她們各有四個兒女，最大的也才 15 歲，絕望已經使得她們無力面對這一群弱雛。妯娌倆就在兩個伯父押走的那個深夜，選擇了最悲愴的死。她們用同一根繩索，在同一個房梁上，投縊自盡——也許她們還想用這樣的慘烈，來讓那些迫害者發現天良，以求放過她們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兒那時 15 歲，帶著七個弟妹。一夜之間，家裏失去了所有的長輩，我已無法想像她們是如何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當我今年回去找到她問詢時，她只是哭泣，無邊無際的哭啊，老淚縱橫……

對我家所謂武器的追查仍然沒有結束。他們又把我這稍微年長的堂姐抓去，讓她帶著民兵去建始縣官店我們的小姑媽家繼續查抄。今年 80 多歲的小姑媽是如今唯一活著的我們的長輩。我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訴我，幸好那時她嫁的是一個農民。當她見到衣衫襤褸的侄女被幾個持槍的男人帶到她家時，她才從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慘禍。她憤怒地斥責那些人，并找來她們村的工作組證明她家沒有藏槍，她說誰揭發我家有槍，那就是他把那些槍私藏了。她沒有能力救這些侄兒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讓孩子背了一袋包穀回去。

在以後的苦難歲月中，我的這八位堂兄堂姐，餓死了兩個，存活了六個。其中四個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養媳一樣賴以活命。兩個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歷次的運動中繼續承擔無盡的懲罰和歧視。沒有人敢嫁給他們，小姑媽只好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我大堂兄。由于老表開親，他們沒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後，娶了一個節育後的寡婦，無後。

補白：前不久同學聚會，有同學提及文革初期開班會，有人高呼“黑五類滾出去！”幾個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隨即黯然離開教室，于是一聲呼喊就剝奪了同學參加班會的權利。這些同學說到當時的經歷，深感自己的自尊心被侮辱。那是 1966 年的夏季，一群北京紅衛兵來學校來串聯，身穿黃軍裝，腰系武裝帶，肩佩紅袖章，一派耀武揚威殺氣騰騰的架式，自稱是毛主席派來的紅衛兵。大會上叫人報家庭成份，叫到陳校長時，校長報資產階級，北京紅衛兵就叫他滾！這位平時受學生尊敬的陳校長只能黯然離去。學校盛行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反動邏輯，許多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學和老師都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來。

當時我雖是工人家庭出身，但我反對這種出身論。那次班會上究竟是誰喊的“黑五類滾出去”呢？事隔 42 年，我確實想不起來了。因為我是班長，開班會的事與我有關，是否因環境影響沖口而出這句話？我迷糊了，但我想這不可能是我所講，因為我當時反對這種說法……由此一夜無眠。第二天早晨，我惴惴不安地給當事的同學通電話，證實了這話不是我講的，而是一位造反派同學所為。我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

#### 清華老子和牛 瀟 雨

剛到大圍山就有人告訴我們，那個每天趕著一頭牛優哉游哉，別的啥農活也不會的人是個四類分子。此人約摸 60 多歲，刮瘦，勾著背，低著頭，聳著肩，衣服穿在身上好像挂在衣架上，空蕩蕩的。四類分子言語不多，偶與人言，沙啞著喉嚨，細聲細氣，臉上挂著笑容，和顏悅色，從來也不與別人較真，好像生來就沒脾氣。

我們知青組的住處與四類分子對門，經常一開門就打個正照面。每當這時，他就面帶恭謙地退回去，讓我們先走。這倒叫我感覺渾身不自在。我想，可能因為他是四類分子，看到我們這些響應黨的號召從城裏來的知識青年，有點敬而遠之。至于他究竟屬於四類中的哪一類，我一直沒搞清楚。問了袁婆婆和謝大嫂，她們也都含糊其詞講不明白。又問隊長和團支書，始略知一二。他的祖父曾是辦私塾的。他從小跟祖父識字，後來到長沙上學，解放前還當過幾天國民黨的戶籍員。土改時，因土地比別人多，被劃了個富農。劃成富農倒也罷了，他還時常抱著個書本啃。最大問題是他農活幹啥啥不會。因為這些原因，多年前，他的婆娘跟別的男人走了。

四類分子毛筆字寫得極好。逢年過節各家各戶門上的對聯，誰家紅白喜事的帖子，隊裏出個財務公布表格、刷個標語，全是他執筆。只見他熟練地把那些紅紙白紙折好格子，鋪開，瘦長的手指捏著毛筆，一改平時的窩囊相，滿臉自信，叫人刮目相看。那筆在他手裏抑揚頓挫，運籌自如。寫出來的字真是漂亮，圍觀的人連連稱贊。只有這時，他的背才好像伸直了許多。

因為四類分子幹不了別的什麼活，隊長就安排他飼養隊裏的一頭母黃牛。這活他真幹得叫人無話可說，一年四季他的生活中心都在牛身上。每天一大早就牽著黃牛出門去吃露水草，傍晚社員們都收工了，他才跟在牛屁股後面慢慢踱回來。夏天他手裏晃著一個自己用茅草做的撻子，跟在牛屁股後面驅趕牛虻，冬天他會把牛欄鋪得暖暖和和，準備充足過冬的糧草。農忙季節，隊上要使喚牛了，他會心疼得要命，跟著牛到田邊，深怕用牛人的鞭子抽得太重。牛一收工，他就趕緊牽到河邊洗抹乾淨。那牛呀，硬是被他養得膘肥體壯，渾身油光光的緞子一般。隊長常拍著那牛滾瓜溜圓的身子，滿意地點頭。

五月的一天，春插已完，四類分子一早帶著他的寶貝牛出去吃草。他看屋前長得好的草不多，就把牛牽到較遠的坳上山坡。那裏草兒又青又嫩，是個放牛的好地方。這山坳坡多田

少，只有幾丘冷侵田，又深又涼收成低，隊上早已不指望它，只是在秧苗多的時候就來栽上幾兜，隨便收幾粒糧食。

四類分子將那母牛牽到草多的地方，讓它放開肚子吃個飽，自己則在周圍弄幾根茅草做一個新的趕牛蛇的撻子。牛兒吃飽了，路都快走不動了，四類分子的新撻子也做好了。他準備帶著牛兒回家，自己也好吃早飯，可就在過一道田埂的時候，出事了！那母牛一脚滑到了坎下的冷侵田裏，身體重重的摔倒在田坎上。那牛的身子太笨重了，肚子又吃得特別大，兩隻後腳全部陷在了冷侵田裏。不知是折了牛腿還是別的原因，任憑四類分子怎麼用力也拉不起來，而且越拉陷得越深，後半個牛身都快陷進去了。

四類分子急得搖晃著他那瘦長的身子跑回來叫人，可那時隊長已帶著強勞力到東門挑石灰去了。四類分子又晃動著他那瘦長的身子，跑回坳裏看他的母牛。那牛起初自己還死命想往上爬，可是後腳使不上勁，反倒陷得更深了，最後精疲力竭，動彈不了。可憐的傢伙只剩呼哧呼哧喘氣，圓瞪著兩眼看著飼養他的主人，眼裏淚汪汪的。四類分子摸著它的頭，安慰著它，也眼淚汪汪的，早忘了一早起來自己還空著肚子。

傍晚，隊長帶著幾個壯實漢子，拿著飯碗粗的木杠，想把那牛從冷侵田裏抬出來，可是那冷侵田太深，人站在裏面使不上勁。田周圍都是田埂和山坡，往上拖也使不上勁。隊長和社員們挑了一天的石灰，早已累得不行了，忙乎了一陣子，看看沒指望了，只好各自回家歇了。？

那牛在冷侵田裏泡了一天，早已是兩眼無神，渾身哆嗦。四類分子更是像丟了魂一樣，不知所措，對著他的寶貝牛都哭了好多次。那一夜，他就守在那黑咕隆咚的山坳裏陪著那母牛……？？

到了第四天，那牛已奄奄一息。隊委會作決定：宰牛！那日收工後，隊長囑大家到山坳那邊去等著分牛肉。袁婆婆特意關照我們知青組，要拿個大點的籬筐去裝牛肉。每人起碼有四五斤肉分，我們知青組有十一個人，那就有四五十斤肉呀！這對於好長時間沒有開葷的我們來說，興奮的心情不亞于小孩子。各家各戶都點上松油燈，一個個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舉著松油燈排成一條火龍，往那山坳裏去看宰牛，分牛肉。

知青們沒見過這號場合，也跟著去看熱鬧。出門的時候，我看見四類分子家的煤油燈亮著。他是不會去現場的，他怎麼忍心看著人們宰他的寶貝牛啊！寂靜的山坳從來沒有這麼熱鬧過，冷侵田的周圍被松油燈照得通明透亮，燈光把圍觀的人的影子放大好多倍，投到凹凸不平的山壁上。人們都很興奮，大人小孩叫著嚷著。我站在人群後看著，不知為什麼心中頻添了一種壓抑的感覺。母牛躺在那裏一動不動，身體的大部分已陷在田裏，只有頭還擱在田埂邊上，牛角被人系上了一塊紅布條，瞪著一雙牛眼驚恐地看著周圍的人群。隊長拿著一件黑色的衣服朝牛走過去，身後跟著一個拿著斧頭的壯漢。聽他們說這是請來殺牛的人，要用黑布蒙住牛的眼睛，再用斧頭去敲碎它的頭！只見那牛看著隊長，掙扎著晃動了幾下腦袋，竟然淌下一行淚珠！

我心裏感到很難受，不忍再看下去，打著手電筒轉身就走。走不多遠，聽到身後傳來那母牛長長的一聲哀嘶，接著是一聲很重而沉悶的敲擊聲“嘭！”眾人驚嘆“啊—耶！”我的心緊揪著，加快了離去的脚步。很晚了，社員們陸續回來，我們知青組也分到了一大筐牛肉，可是却帶回來一個讓人震驚的消息：那母牛肚子裏竟然有一頭已經夭折的小牛崽！天啦！我不能接受這個事實，那一夜，我失眠了。次日，我在四類分子家門口看到了那只已長成型的小牛犢。它軟軟的躺在地上，緊緊地閉著那沒來得及看一眼世界的雙眼，嬌嫩的身體上有一層淺黃色的捲曲的絨毛，顯得那麼乖巧可愛。我想，如果不是它的母親摔這麼一跤，不久它是會睜開它的雙眼，在他的母親身邊玩耍嬉戲的。

四類分子沒有要牛肉，他只要了那個被斧頭砸碎了的牛頭和已經死了的小牛犢。他把牛頭清洗乾淨，留下頭骨，擺在屋子裏與它為伴，把小牛用背簍背到山上掩埋，然後將自己關

在屋子裏，好多天不見出房門。隊上的社員有人議論，他怎麼連那母牛肚子裏有崽仔都搞不清楚，對這事表示懷疑。隊長在開社員大會時嚴厲的批評了他，後來那四類分子一天到晚神裏神經，好象丟了魂似的。

不久後，我因母親下放七寶山，也轉調到那裏，從此離開了大圍山。多年以後，我們都回城了，有一次知青組的朋友聚會，我問及此事，他們告訴我說，文革開始後，隊上有人說那牛是四類分子蓄意害死的，是他故意將牛推到田坎下的；還說他明知那母牛即將生產，是故意弄死它，破壞農業生產。此事引起公社革委會的重視，特意派來工作組調查，認為這是階級敵人蓄意搞破壞的一種表現。于是他們對四類分子進行批鬥，白天給他戴上高帽子，自己打著銅鑼游鄉；晚上讓他站在一條板凳上，脖裏挂著那母牛的顱骨。他那本來就勾著的背被挂得更加佝僂下去。他們還讓他把自己的罪行用毛筆寫出來，貼在生產隊的牆上。聽說，他貼出來的檢查書，白紙黑字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像字帖。

多年後再回大圍山時，四類分子已不在人世，隊長也老了。我問起四類分子當時怎麼會不知道牛肚子裏有崽仔，老隊長長嘆一聲說：“哎，其實只能怪那個牛獸醫。牛配種後請獸醫看了，那獸醫硬是說沒配上，我們也都以為沒配上。清華老子那時真是冤枉咧！”

四類分子名叫李清華，我在那裏時從未聽到隊長這麼叫過他。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管四類分子叫“清華老子”。四十多年過去了，清華老子那頹瘦的身影，誠惶誠恐的笑容，還有那膘肥體壯的母牛和它那長著一身捲曲黃毛、靜靜躺在地上的小牛犢，總在我眼前晃動，與我那悠悠的大圍山情愫纏繞在一起，難以釋懷。

## 六叔三案 玉壺生

鄧六叔鬥大的字不識一籊筐，文革中却糊裏糊塗犯了三次反革命案，坐了三回牢，差點把命都丟了。一天晚上，全生產隊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祠堂裏評工分。每次評分前都要由公社駐隊幹部帶頭學習毛主席語錄。那天駐隊幹部忘了帶報紙，隨手一指牆上的毛主席語錄說：“我們今天就念這個！”

鄧六叔一看牆上的紅字歪歪扭扭，忍不住說了一句：“寫得這樣馬虎，一個都認不到。”眾人哄的一下笑起來了。原來牆上的語錄是村美術老師完全按照毛主席的草體字原樣畫上去的。那時全國都是那樣，文盲鄧六叔哪知道這個啊。有人告訴鄧叔：“這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寫的呢！”鄧叔不以為然，還要起嘴皮子：“毛主席什麼都好，就是這手字寫得太潦草了，讓我們沒文化的貧下中農看不懂。我們要給他老人家提提意見，請他老人家寫工整點，讓我們貧下中農看得清楚！”眾人更是開懷大笑。

這一下惹禍了。只見駐隊幹部臉色鐵青，憤怒地指著鄧叔的鼻子吼道：“你這是什麼態度，膽敢惡毒攻擊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眾人肅靜下來了。但是駐隊幹部不依不饒，雙手叉腰，突然站到記工分的桌子上喊：“社員同志們，剛才鄧老頭對毛主席的惡讀攻擊你們都聽見了吧？毛主席常常教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就是要我們提高警惕，密切注意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鄧老頭其實就是混在我們貧下中農隊伍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無論鄉親們怎樣向駐隊幹部求情，說鄧叔其實不是敵人，而是世代貧農，只不過是喜歡開玩笑而矣，不可能是隱藏的反革命，都統統沒用，第二天縣公安局就開來了吉普車，把鄧叔帶走了。還順便把村裏的幾個老地主也一同帶走了，說是同夥。鄧叔在牢裏只坐了兩個月，天天被提審，見他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把他放回來了，而反革命的帽子還戴著。

鄧叔坐牢回來後，老實了好幾年，對凡屬與毛主席老人家相關的東西都畢恭畢敬。那時每家各戶都派發毛主席的彩色紙畫像，讓人貼在牆上一天到晚禱告。鄧叔家就兩間泥土房，

一間廚房一間睡房。睡房裏沒窗戶，黑咕隆冬。領到畫像後，鄧叔把它虔誠地貼在廚灶上方，把毛主席像當成灶神一樣的膜拜。後來發覺那裏的位置不好，因為時間久了會把毛主席老人家的臉上熏黑。于是鄧叔立即關了廚房門，小心翼翼地想揭下來，重新貼個地方。當初貼上去時是用稀飯水粘死的，現在想揭下來可不容易。等他又急又怕費老半天終於揭下來時，毛主席像的一隻眼睛還是弄爛了。

儘管他把揭下來的畫像貼在了最黑暗的睡房牆上，但最終還是沒有逃過革命群眾的雪亮眼睛。沒多久，縣公安局的人又來了，他又到牢裏坐了一個多月，罪名是死不悔改的現行反革命。這次坐牢回來後，鄧叔似乎開朗了許多。他說他是政治犯，白天不用幹苦活，而且牢裏有吃有睡，比村子裏過的日子好多了，很舒服的，坐得他都不想出來了，但是牢裏的幹部不允許，說我沒什麼大罪，就要求上面讓我回來。村裏人都笑他，說他光棍一條，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才會說坐牢好。村裏人其實是很忌諱坐牢的，總覺得那是壞人的事。

過了幾年，鄧叔又犯錯誤了。一天中午，全隊人在村中一蔸大樟樹下學習，駐隊幹部拿著一張剛到的報紙傳達蔣介石死了的大好消息。鄧叔一聽，竟咋咋呼呼驚叫一聲“蔣介石死了？”他的本意是想說蔣介石終於死了，但話一出口，別人聽起來好像他很可惜蔣介石死了。駐隊幹部放下手中的報紙，和全村人一起看著鄧叔。鄧叔驚惶失措地說“不是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當天鄧叔又被公安局抓走了。縣革委會討論了半天，有一半人說此人屢教不改，該殺！另一半人說，節省點子彈吧，一個快死的糟老頭了，讓他去坐牢算了！這回坐得最長，足有三年，到 1977 年才放回來。回村後，鄧叔就不再說什麼話了，直至 1984 年死亡。

少年陳丹青 曾慧燕

陳丹青的父親陳兆熾是影響他一生的人。陳兆熾畢業于海關大學，任職財政局。1957 年中了“陽謀”，成為右派分子。在逆境中，他一直教育兒子“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人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先做人，然後才能搞學問事業。

陳丹青的正直正派，很大程度得益于父親的從小教育。陳兆熾提起兒子贊不絕口，他說丹青讀書很用功，聰明超乎他們的想像，他的很多思想超過他的年齡，很敏銳，感情豐富，對父母很孝順，對朋友很好。

陳丹青從小喜歡游泳、音樂、文學、繪畫。1957 年他 4 歲時，父親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此後苦難如影隨形。1967 年文革如火如荼，陳家被紅衛兵抄家，書籍、畫冊全被抄走。14 歲的陳丹青已顯露藝術天分，眼看心愛的畫冊被抄走，難過得整天沒說一句話。陳兆熾勸他別難過，沒有畫冊臨摹，可到公園、馬路去畫。一次，陳兆熾打掃衛生時在垃圾箱拾到一張撲克牌，背面圖案是一幅油畫名作《意大利姑娘》，馬上拿回家送給兒子。陳丹青花了幾個星期臨摹，畫得栩栩如生。

陳丹青成名後，很多人問陳父為何給他取一個代表繪畫所用顏料的名字？陳兆熾說，其實一開始根本沒有想到讓兒子學畫，取這個名字源自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一句詩“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兩個孩子分別叫丹青、丹心。陳丹青的女兒陳夜譚的名字則取自“天方夜譚”。

1968 年陳丹青開始學油畫，白天畫毛主席像，夜裏偷偷臨摹達文西、米開朗基羅的男裸體紙片。“有趣的是，我不覺得畫毛像和臨摹裸體畫有什麼衝突。”1970 年 4 月 4 日，是陳丹青一生中最難忘的兩個日子之一，那一天他被送到江西寧都農村插隊。“上海知青都知道這是變相的勞改，沒人以為是去‘革命’。”另一個對他重要的日子是 1982 年 1 月 6



日，他坐飛機到美國。“這兩個日子對我的改變很大，一個是從此離開家，一個是從此離開祖國。”

1975 年，陳丹青從江西“流竄”到江蘇繼續插隊。期間，只要一有空隙，陳丹青便掏出隨身帶的本子自學繪畫。油畫《在長征路上》獲選參加美術展，令他信心大增。他說，那時沒人知道畫能賣錢，沒有誘惑，他至今懷念那種沒有功利的單純。

陳丹青生命中遇到許多伯樂和貴人，他的妻子黃素寧是其中一位。他在蘇北及皖南農村艱苦的條件下當了八年知青，從沒有放棄對繪畫的追求。當年他得以認識妻子，油畫家陳逸飛無意中為他們牽了線。那時陳逸飛為陳丹青寫了推薦信，要他去南京藝術學院拜訪陳德曦老師。陳德曦設法讓陳丹青到教室做一次示範繪畫，請當時在座的學生幫忙推薦，黃素寧慨然應允，沒想到成就一段姻緣。

黃素寧出身軍區幹部家庭，根正苗紅，却非常同情出身黑五類的陳丹青。她本身很也有藝術才華，出于對陳丹青的賞識，1976 年，她受西藏自治區委托，物色三名畫師幫助籌備美術學習班。她問陳丹青是否願意去？并說他應該去。他一心嚮往藝術創作，同時為了改變當時農村生活的艱苦環境，欣然前往。

1976 年，陳丹青第一次到西藏，這片蒼茫大地的雄奇壯美，帶給他無數藝術靈感。“西藏的遼闊蒼涼，令人太震撼了！我被西藏俘虜了。”久藏在他心中的創作欲望，像洪水般奔瀉而出。當時他只有 23 歲，“西藏居然把我當個人才，文革中年輕人從來不看什麼學歷”。

進藏不久，毛澤東逝世，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繪畫鮮少悲劇題材，更不能畫工農兵哭泣。可由于是“偉大領袖”逝世，全國人民陷入一片沉痛之中。圍繞這一重大事件，陳丹青創作了大型油畫《泪水灑滿豐收田》。畫面上豐收的麥田金燦燦，聽到噩耗停止收割的藏民，穿著深黑色的袍子，表情凝重哀戚。這幅畫入選當年全國美術展覽，成為他的成名作，也是他後來考入中央美院的敲門磚。

整人要用二百五 朱之泓

我第一次參加批鬥四類分子大會是在下鄉到寧夏固原楊郎四隊的第二年冬天。會議一開始，男人女人們就都儘量躲在燈影照不到的暗處。女人們照樣分秒必爭地做著自家的針錢，臉上沒有絲毫的衝動。男人們照樣慢條斯理地卷著旱烟，眼中沒有絲毫的激憤。只有地主保占英的一個侄子態度最嚴厲，高聲叫著自己親叔父的名字：“保占英，你必須老實交代！”其他人對站在中間的被鬥對象，不外乎提一些不著邊際的意見，再進行一番不痛不癢的所謂政治教訓，比如：“保占英，你的剝削思想還沒有改造好，你今後要進一步改造你的剝削思想，好好勞動，聽下（清）了嗎？”保占英恭順地答應著：“聽下（清）了。”批鬥會就這樣平平淡淡結束了。

在楊郎其他生產隊，批鬥的火候可就大不相同了。一隊有個地主分子鄧培勤，白天在隊裏勞動，幹得比別人多，比別人苦，回到家還常常吃不上飯，晚上又被社員們施加車輪戰。一會兒觸及靈魂，一會兒觸及肉體，他終於活不下去，上吊自殺了。死後，貧下中農們揪來他的老婆代替，繼續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

三隊有個叫萬耀宗的地主，每次批鬥時，他夫妻倆雙雙站在會場中間的凳子上。地主婆一雙小腳站立不穩，時常從凳子上掉下來，再遭一頓拳打腳踢，打完後喝令她再站上去，接著鬥爭，再掉下來，就再打。

一隊的地主曹漢武死得早，只有老婆被鬥。貧下中農從外邊搬來一大塊冰，逼她脫光鞋襪，光著一雙小腳站在冰塊上接受大家批鬥。等批鬥結束時，地主婆的兩隻腳將冰塊融化了

兩個腳窩。下一次批鬥時，貧下中農代表又變換花樣，搬來一大塊冰，讓她坐在上面。到結束時，屁股底下融化了一個大窩窩。第三天批鬥，再換一個花樣，讓她跪在冰塊上。批鬥結束，她的膝下化了兩個窩窩。第四天，又將冰塊放到她的胸部，冰塊被體溫融化，水從衣襟底下滴滴答答流在地上……

一隊曹漢英的老婆，被勒令站在碾場的大石滾上，兩肩還放著小威力的兩炮。脚下稍一動，石滾子就滑動，她不是摔下來被石滾子撞了，就是把肩膀上的兩炮弄炸了，被整得當場昏死過去。還有一個地主叫張道方，此人在舊社會比較吝嗇，人們借糧他大多不肯。批鬥他時，那火藥味兒就更濃了，動不動就拳打腳踢擱耳光。

看著我們楊郎四隊批鬥四類分子的方式，聽著其他生產隊的批鬥狀況，我感到納悶。毛主席不是有指示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可我們隊的貧下中農為何對地主階級那麼溫良恭儉讓？而別的生产隊怎麼那樣立場堅定、愛憎分明？

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我們隊裏一些年紀較大的人。他們告訴我：“咱們隊的人都不壞，不欺負地主富農；別的隊都窮得很，壞得很，把地主富農往死裏欺負呢。”我們的隊幹部關國棟甚至說：“那些貧下中農代表都是八成兒人（即二百五），完全不按政策辦事。”我不解地問：“那麼又為啥要選二百五當貧下中農代表呢？”關國棟說：“嗨，你沒有聽過這樣的話嗎？犁地要用爬山虎，搞運動整人要用二百五。”

補白：作家劉紹棠說：“1947年的土改運動，打砸搶抄抓殺十分暴烈。”機械部退休幹部馮志軒撰文回憶土改，稱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地主父親的慘死。作家魯順民描述，鬥爭大會將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蔭冠的鼻子，用鐵環穿起來，令其兒子、黨員牛友蘭牽著游街，把牛蔭冠被活活鬥死。四九年後，牛友蘭官至供銷合作總社主任。學者顧頡剛的日記記載：“浙江崇德，一三等縣耳，而槍斃地主至百余人，則全國二千縣，所殺者當逾二十萬。共產主義本要打倒資本家，無如帝國主義保衛之，打不倒，乃移其禍于我國地主。地主中固有惡霸，亦有好人，今乃一網打盡，詎非冤也？” 冉雲飛

鄧朴方的賤民歲月 張士峰

鄧朴方上八一小學時，學生中流行一種不好的風氣——比誰的爸爸官大。誰的爸爸是團長，誰的爸爸是司令，誰的爸爸是將軍，諸如此類。鄧朴方回憶道：“別人問你爸爸是什麼，我說不知道我爸爸是什麼，當時覺得好像我們比別人低一等似的。直到五年級，11歲了，才有人悄悄告訴我，你爸爸是財政部長，我說是嗎？我上中學的時候，自行車壞了，口袋裏一分錢都沒有。我就找我們班主任借錢去買公共汽車票。我們班主任說，他很奇怪，怎麼總書記的兒子口袋裏一分錢都沒有。”

1966年，鄧朴方上大學四年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很快，鄧朴方和姐姐鄧林、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鄧小平的罪證。造反派對鄧朴方進行了殘酷迫害，把他打成反革命。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鄧朴方選擇了跳樓自殺。

鄧朴方說：“自己不願意說假話，真話也不能說，又希望自己是有人格的，可當時無法保持這種人格。最主要是，如果成為反革命，將來是沒有希望的，沒有前途的。我就想我到頭了，該結束了。現在想來當時太年輕，不是很有彈性。”

鄧朴方受傷後被送到北醫三院，可因為他反革命的身份，不可能給他做手術。“蘇醒過

來以後我已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經無所謂了。”因為得不到及時治療，鄧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覺，造成了無可挽回的高位截癱。半年後，造反派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救濟院。此時鄧小平夫婦已被下放到江西。對於鄧朴方來說，這是最難熬的一段時光。

鄧朴方說：“後來我想，病還是要治，就搖車子從清河搖到中南海。搖到中南海西門，我就同門口的戰士說，我要見一見領導。一個戰士讓我靠邊站，把我放到西門斜對面的馬路邊上，然後把我和三輪車一塊兒抬上一輛吉普車，送回救濟院了。”

1971年6月，經鄧小平多次爭取，鄧朴方被送到江西。在江西這段日子，鄧朴方回憶說：“那個時候我黨籍開除了，沒有職業，也沒有工資，我就修理收音機。媽媽到處搜集收音機來讓我修理，可江西那些工人家家都沒有收音機。那時候多窮啊！後來我就把家裏的照相機拆了，拆了裝，裝了再拆。”

當時照顧鄧朴方的，除了媽媽和奶奶，還有已經69歲的父親。鄧小平雖然是國家領導人，可在文革中却無法保護自己的孩子。他對此是不是很內疚？鄧朴方說：“爸爸自己從來不說這事。我自己覺得我這一生沒對不起任何人，唯一對不起的就是父親和母親。”

普希金詩 焦國標書

- 一、本刊免費贈閱，歡迎來稿。
-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 三、本刊聯絡手機：13240468075。
- 編者 四、願意捐贈資助《憶舊》半月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 提示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北大燕北園  
305 甲樓 110 號陳星宇收，郵編 100091。
-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工商銀行馬連窪支行，  
賬號 0200251101028450741，戶名陳星宇。
- 七、期待讀者朋友的任何意見和建議。

## 《黑五類憶舊》第五期 201010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五穀不止五種谷，黑五類當然也不只五種賤民，那麼中國究竟有多少種政治賤民？迄今還沒見能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人。日前收到一封讀者來信，就指出臺屬這種賤民還可細分為新臺屬和老臺屬。老臺屬是指隨蔣介石國民政府赴台人員的家屬。朝鮮戰爭結束後，有 5-10 萬被俘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軍人選擇去臺灣和美、加各國，他們留在大陸的家屬被稱為新臺屬。這些家庭“立即（被）摘掉了‘光榮軍屬’的紅牌，打入另冊”。

信中寫道：“以我本人（右派）被管制期間目睹的，還有兩類人你忽略了。一是五十年代的一貫道。……還有一類是天主教神職人員。我 1958 年入獄時，同牢就有個猶太人叫‘望光名’的神父，入了中國籍，就只好坐中國牢了。漢語說的不怎麼流利，不久被送往大城市的監獄，說那裏有‘戰犯管理所’通用的翻譯。剩下的幾個農村教堂的神職人員就沒有這個福分了。有的 1980 年才平反，出來也沒有教堂可栖，只好分配成農戶插隊。時隔 30 年，現在又因家庭教會新抓了一些人。”

這封來信還指出：本刊發刊詞中的“黑五類在 1984 年以後均享有國民待遇”之說，與實際不符，是過高地評價了中國的政治平等度。1984 年黑五類摘帽，并不等于全體中國人就都是平等的中國公民。的確，又過了近 30 年，中國至今也沒有實現國民待遇平等，一個月前我還看到一份 2010 年政法類大學的入學政治審查表。中國一直有生生不息地製造新賤民品種的傳統雅好。

---

#### 鐵流捐資百萬設立新聞基金

鐵流原名黃澤榮，是五十年代第一批工農出身的老記者、老作家。幾十年來深受極左路綫以言治罪之害，曾因一篇說實話的小說整整蒙冤 23 年。1980 年末獲改正，重回新聞單位和作家隊伍。此後，響應改革開放號召，放棄公職，舉家北上，成為最早的北漂族。經過 20 多年的艱苦奮鬥勇敢拼搏矢志不渝追求改革，終於成為小康之家。鐵流稱，“本人年已七十有七，來日不多，去時將近，為了國家長治久安，自願拿出多年積蓄的 100 萬元人民幣設立鐵流新聞基金，用于推動新聞出版的立法事業，同時資助那些因揭露貪污腐敗遭黑惡勢迫害或生活遇到暫時困難的記者作家。”這 100 萬元分 10 年支付，每年 10 萬元。如若國家政策允許，將按有關政策法規，正式申報成立鐵流新聞基金會。在未得政府正式批准之前，暫以個人名義進行一對一的捐助。第一筆 5000 元，已捐贈給《大遷徙》作者謝朝平先生。若《大遷徙》一書自費出版，將支持其不足之數。

---

#### 目 錄

草葫蘆血案·····	沈不沉（04）
送父還鄉·····	潘 虹（06）
右派的苦難沒完沒了·····	俞梅蓀（09）
野夫的文革·····	梁文道（15）
哥哥莊彥斌·····	莊曉斌（17）
黑五類的亞類·····	陶渭熊（23）
母親被槍殺·····	甄秀梅（30）
我的童年·····	張耀杰（35）
一個以山作墓的刑滿右派·····	陳 更（37）
國民黨軍官李植榮之死·····	陳世忠（39）
同學閔志强·····	曉 寒（42）

劉光應寫反詩·····	陳宗培（44）
針扎毛眼風波·····	高洪明（46）
與黑五類相關的幾個政治術語·····	李若建（50）
右派大校蔡鐵根·····	方影竹（52）
一對老地主·····	朱之泓（55）
葉企孫、熊大鎮沉冤·····	淳于雁（59）
鄉村告密風·····	梅桑榆（62）
父女情·····	華 夏（67）
女兒悔·····	淡 然（70）
兒媳是這樣娶來的·····	趙仲泉（74）
第一個被平反的右派·····	岳 盟（78）
白娘娘·····	徐卓人（81）
寧陝縣的一打三反·····	佚 名（83）
作為地主崽的童年·····	邢詒心（86）
青澀慘痛的婚戀·····	王譽虎（92）

## 草葫蘆血案 沈不沉

1970 年春，下汪勞改一中隊出了一樁奇案。樂清人周金弟，原在虹橋中學讀書，與同班女同學小玉從小青梅竹馬。小玉是他們學校的校花，是方圓百里出了名的美人。周金弟腦子靈，從毛主席石膏像中獲得啟發，準備別出心裁，利用草葫蘆闖出一條自力更生的新路。反正學校也不上課，乾脆回家種草葫蘆。他的想法得到小玉的支持。

他從集市上買來一個毛澤東木雕頭像，放在一個盒子裏，澆上石膏，拆開後就成了一塊陰模。等到草葫蘆結果時，把石膏陰模套在葫蘆的小頭上。成熟後，草葫蘆就成了一尊毛主席像。再灌進一些水泥，此像就成了不倒翁，憨態可掬，拿到市場上十分搶手。那年秋天，他光是賣草葫蘆毛主席就賺了 300 多元。

二人正籌備結婚，不料大禍臨頭，周金弟被抓了，罪名是醜化偉大領袖，而且走資本主義道路。

醜化偉大領袖是大罪，少說也得判 10 年，小玉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她找到公社治安員，請他設法搭救周金弟。這位錢姓治安員，年齡四十開外，疏眉謝頂，一副長者的模樣。他告訴小玉，此事包在他身上。只要他一句話，周金弟就可以出來。小玉信以為真，千恩萬謝。可是接著這位貌似長者的治安員就對小玉提出性要求。小玉大為意外，斷然拒絕。事後想想，只要自己的心上人能平安無事，就吃點眼前虧吧。不料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案件拖了半年，終於判決。並沒有傳聞中那麼嚴重，周金弟只被判刑三年。最糟糕的是，小玉竟發現自己懷孕了。犧牲自己的貞操，不僅沒有救出自己的心上人，反被人欺騙，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千思萬慮，她覺得對不起周金弟，已無顏活在世上。在一個月黑風高夜，她留下遺書，帶著一個近半年的小生命，跳進村邊的大池塘。

一天，蔣堂農場的一位管教幹事，特地來到下汪勞改隊找周金弟談話，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他，還出示了小玉的遺書，並教育周金弟正確對待此事，不要意氣用事。周金弟始終一言不發。第二天出工時，周金弟逃跑了。蔣堂農場預感此事嚴重，立即派員趕到樂清。但為時已晚，那位錢姓治安員已被捅了 30 多刀，心肝被挖空。次日一早，有人發現周金弟自殺在小玉的墳頭，墳上擺放著一副血肉模糊的心肝。

這是 1970 年我從武林機器廠調到下汪大隊後聽到的第一個如此慘烈的故事。爲了使死者的靈魂得到安息，我隱去了他們的真實姓名。

補白：爺爺當過保長，三個老婆生了六子四女。共產黨來了，爺爺逃跑了。也許是覺得逃無可逃，也許是想念家人了，幾年後爺爺自己回來了。他夜裏先摸到四兒子（我四叔）家，因爲他家獨門獨戶。四叔害怕受連累，開門給他一碗飯，就讓他走了。爺爺很絕望，決定自殺。但是沒死成，又逃到蕭前灣村蕭金的父親家去敲門。蕭金的父親很高興，說：“你不是老保長嗎？”爺爺就這樣被捕了。我父親去看他的時候，他被繩子反綁著，坐在門檻上。十多年了，見到自己的小兒子，爺爺很激動：“是小八嗎？”“是我，大。”爺爺被判刑 4 年，入獄的第二年（1960 年）就死去了。監獄不通知家屬，只給大隊寫了一封信。大隊裏沒人願意給地主捎話，所以我們家的人直到 1961 年別的獄友出來後告知才獲得爺爺的死訊。當時死掉的犯人都被埋在一個地方，上面插上竹條，等人認領。爸爸他們去認領時，那塊地早被別人平整了一遍，麥子都有膝蓋高了。所以現在羅甸子水庫邊爺爺的墳，是空的，衣冠冢。爸爸經常說：“也許你爺爺的骨頭渣子被水沖到一個風水寶地去了，要不然哪里會有你們的今天。”

杜冷丁

#### 送父還鄉 潘虹

前天，是父親的忌日。可真正讓我感知到死亡的，是 26 年前的今天，在龍華火葬場門口。

雕龍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陰霾的天空下，時不時“轟”地一下，冒出一股濃濃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裏，逐漸飄散，變淡。我呆呆地看著它，感覺著死亡。這就是所有人的最後歸途。

頭一天晚上，當我聽到爸爸死訊的時候，心裏就好像有一個結被鬆開了。我沒有哭。我平靜得不像他的女兒，甚至不像一個孩子。作爲一個二類右派的女兒，作爲一個老是聽大人們悄悄議論著哪一個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沒了的十歲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著一種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東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總有破碎崩潰的那一天。

那個晚上，結果來了。這就是結果。一個預料中的結果。

那個夜晚，煤氣爐的水壺上溫著一碗蛋炒飯，那是留給遲遲未歸的母親的。早已過了晚飯的時間，媽媽却連人影也不見，也沒有一個說明她要晚歸的口信請人帶回。我帶著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覷。誰也不敢問會有什麼事發生，可誰的心裏都有預感，一定有什麼事已經發生。

十一點多了，媽媽才回來。表情裏沒有什麼異樣，只是一件本是淡灰色的夾衣，肩頭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我端蛋炒飯給她吃，她動了動筷，就打發我去睡。我剛一轉身，她就對著外婆哭了。她說爸爸死了，是自殺。昨天，吃了過量的安眠藥，死了。她說她今天去了龍華火葬場，想最後看他一眼。她在雨裏站了很久，可他們不讓她進。他們要她劃清界綫。她回過頭來對我說：“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給你爸爸送點東西去好嗎？”“好的，媽媽。我去。你別哭了。”我回答得那麼冷靜，今天回想起來都有些詫異。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媽媽就把我叫起了床。她打開爸爸的箱子，拿出一套柞蠶絲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襯衣，一雙相拼皮鞋，一雙襪子，打成包袱，讓我帶去。她往我兜裏塞了 30 元錢，那是爸爸的一個同事打聽了來告訴媽媽的，是用來收爸爸骨灰的錢。

她送我上了 43 路公交車，把我交給了售票員。

龍華火葬場的門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樣，手裏提著個包袱。沒

有一個大人，只有替他們的父親或母親來承擔一個結果的孩子們。

看門的老頭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過去。我走到他跟前，他問我，“來看誰？”我默默遞上死亡通知單。他接過去。看一眼通知單，又看一眼我，說，“等一下”，轉身進去了。

他進去了很久，寒氣就一點一點侵襲了我的全身。他終於出來了，第一句就問我有沒有給爸爸帶襪子。他說他一個腳光著。我說帶了。“胸前吐得一塌糊塗，吃藥死的，是不是？”他又問。我點點頭。他停了停，又對我說：“回去不要告訴你媽媽，你爸爸的一個耳朵被撕下來一大半，挂在臉上呢。”

這一瞬間，我忽然覺得，爸爸死了，這是解脫。雖然那時的我根本還不懂得苦難的準確含義，也不懂得忍受苦難是一件多麼不易的事，但我的心裏對生和死就有了一種極具體的感覺。與其那樣活著，不如這樣死了。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錢遞給他。他拍拍我的頭，說，“回去聽話一點。”我點點頭。我覺得，那種感覺，不像是一個老人在關照一個孩子什麼，倒像是兩個大人在達成一種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著龍，矗立在陰霾的天空下，真醜陋。濃濃的黑烟時不時地“轟”一下冒出來，在料峭的春寒裏，逐漸飄散，變淡。我一路走，一路扭著頭看它，心裏就想著回去要聽媽媽的話，別做任何讓她失望的事。

父親的死給我的不是悲傷，而是悟性。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徹底失去了我的童年。這樣一種生命層次的飛躍，使我比同齡的任何一個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樣打理自己。因為我知道，只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少給媽媽添麻煩。

于是，就有了一個十歲的小女孩，捧著她父親的骨灰盒，一個人坐硬席火車，從上海到哈爾濱，整整三天二夜。為的，是要替她的母親送她的父親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爾濱，松花江還沒完全解凍。第一次出門，我什麼都不懂，連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這條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媽媽交給我的任務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松花江是冰冷的。哈爾濱是冰冷的。父親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哈爾濱，這個我生疏的城市，這個與我的生命有著一份無法割捨的親緣的地方，讓我冷得徹骨。

補白：有一天我教的一個男學生問我：“老師！你當過兵，可曾打死過人？”“沒有。我當兵之後沒仗可打了，才轉業教你們的。”“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個。”他剛十五歲，手裏提著一條渾圓的皮鞭，已經被血漬浸成烏黑色，說話時悠閑自在，哪里像殺人不眨眼的魔鬼？他描述說，在王府井天主堂，紅衛兵先將十幾個修女驅逐出去（人民日報曾作為紅衛兵的壯舉報導），然後他們住進去。教堂裏儲有罐頭，吃飯不成問題。他們每天到派出所問誰是資產階級，然後根據提名，把這些資產階級帶進教堂，一帶便是一家人。一家進去，立即被紅衛兵分光。三個紅衛兵揪一個，先將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時動手，皮鞭齊下。另有專人拿著秒錶計時，看各組打死人都用了多長時間，用時最少的是冠軍。令我震驚的是，獲冠軍最多的竟是宋彬彬等幾個女生。 艾柏林

---

右派的苦難沒完沒了 俞梅蓀

父親俞彪文，上海滬江大學國際貿易系畢業，原在上海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托局從事保險業。1949年拒絕隨國民政府去臺灣，參加中共開國大典，參與創建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并任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財政部支部副主任，參與制定國家保險政策和業

務規章，組織全國保險工作會議，受到財政部長李先念等領導和同事們的好評。1949 年以後，保險業被一些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不需要保險，致使業務發展時起時落。1957 年 5 月，父親按照財政部副部長胡立教的要求，提出“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是否還需要保險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不能因此影響當前的實際業務工作”，遂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7 月 22 日，不忍受辱，含冤自殺，終年 31 歲。

父親去世後，在北京市保險公司工作的母親鄭珍經批准，携 4 歲的我和 1 歲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錢梅先。祖母是上海人民銀行黃浦區辦事處業務骨幹，老年喪獨子又受株連，被迫退休，工資減半。隨後全國保險業停業，公司全部撤銷，母親被責令回北京，到農村勞動改造，後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紡織廠工作至退休。

我和弟弟由祖母撫養成人，從小被看成狗崽子，備受歧視，文革期間更甚，被抄家被辱罵。1974 年弟弟中學畢業時因受歧視刺激，自殺未遂，患上抑鬱症。1977 年我到北京頂替退休的母親當了鉗工，弟弟則一直在上海與祖母相依為命，30 多年來，每隔七八年就要住院治療。我倆從小怨恨父親帶給我們的不盡劫難和屈辱，平日從不談及父親，連想都不願去想他。

1979 年 4 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複業，母親携我上訪，遇見久違 20 年的父親的同事、詩人北島的父親趙濟年（時任公司國內業務處處長）。他帶我們求見父親當年的頂頭上司林振峰（時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兼副總經理），林在辦公室傳出話說沒空。一周後，趙伯伯又帶我們去見林，林仍說沒空，不予見面。我們上訪公司人事處，半月後人事處長張秀萼查到父親的檔案，做出結論：“俞彪文當時犯有錯誤，定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開除公職，現予改正。”我對此結論不服，她說“現在寬大就算不錯了”。

為搞清父親究竟犯了什麼錯誤，我在北京圖書館查到 1957 年 5 月 19 日《人民日報》題為《像在家裏談心一樣》的報道，其中有父親的發言。父親說：“保險公司現在處在危險狀態。解放以來，保險公司的領導上只滿足于一些方針政策性的問題和一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對當前的實際業務工作不夠重視。1953 年以前，保險公司的業務工作方法都是舊社會的一套。三反以後，這一套全盤被否定了，對蘇聯的一些先進經驗的學習又采取了教條主義的態度。農業合作化以後，公司裏許多人對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是否還需要保險的問題發生了動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業務工作上在執行中也產生了各種意見和矛盾，對工作的影響很大。我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是否還需要保險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絕不能因此影響到當前的實際業務工作。在保險公司裏，黨群關係長期以來是不太協調的，黨員對一些‘老保險’專業人員有諷刺和不尊重的現象。”

父親的發言，切實而中肯，即使在當年也沒有任何錯誤。我據理力爭，幾經爭執與周折，人事處長張秀萼終於在結論中寫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成為突破中共中央對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個例外。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聯合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父親舉行追悼大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胡愈之、財政部副部長戎子和、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徐伯昕等數百人到會。海澱區民政局按照父親的行政 14 級副處級待遇，按 1957 年的標準補發撫恤金 360 元。我提出應該按照 1979 年現行標準 1500 元發給，被拒絕。保險總公司發給 500 元補助款，母親和我用此款把父親的骨灰移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

1994 年，我又遭人栽贓，蒙冤入獄 3 年。

每年 7 月，母親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場。此時我和弟弟都格外小心，但從不關心父親的忌日具體是本月的哪一天。2003 年，母親在最後一個 7 月（半年後去世）告訴我們，當初父親去世時，母親本想把我送給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給西安的二姨，然後自己投河自盡，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宮護城河邊，終因不忍拋下我倆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喪夫，老年時兩個兒子一個進冤獄，一個進精神病院，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難太沒意思。”我每每打斷她的話，安慰她，却從不詢問父親的去世經過。



2007 年初我參與反右派運動 50 周年維權活動，開始思考父親的事。為探求歷史真相，我去拜訪父親的同辦公室同事周慶瑞，可惜的是周已在上個月去世了。根據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我們的舊居——北京市月壇北小街 5 號院（財政部宿舍）1 門，鼓起勇氣登上 4 層樓，查看父親從 5 層陽臺墜樓之處。在底層 101 室的窗前，我徘徊觀望良久，却最終也沒有勇氣叩開“我家”的房門（父親去世後，我家搬走，母親再也沒有來過此院）。

北島在其《三不老胡同 1 號》一文中寫道：“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後留下寡婦和兩個男孩，老大俞梅蓀比我小三四歲，整天跟著我屁股後面轉，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婦半夜在隔壁獨自啜泣。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還有誰能聽見？”北島的回憶撕開我封塵在兒時腦海深處的懵懂記憶：那天中午我從院子裏的托兒所回家吃午飯，烈日下，見到父親躺在地上掙扎，周圍似乎沒有人。後來的一個夜晚，母親帶我到白塔寺人民醫院的昏暗病房看家父，全身綁著白色綑帶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後來，常在夜半聽到母親那撕心裂肺的哭聲。這是我 4 歲開始記事的頭三個瞬間影像。至于父親的長相，在我的記憶中模糊不清。50 年來我從不會想起，也不會說起，更不曾向母親詢問。1979 年在為父親平反時聽說，那天下午原本要召開批判父親的大會，不料他“經不起黨的考驗而走上絕路”。在醫院搶救 3 天，終因內臟被震錯位而去世。之後，父親被以對抗反右派運動、畏罪自殺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開除公職。

2008 年 4 月，我到上海醫院探望弟弟，兄弟倆平生第一次談及自己的父親。弟弟認真地看著北島的文章和舊居照片，提出不少問題。我倆一起尋找那失去的記憶，探求家史真相。父親在給家母的絕命書中寫道，希望她努力把兩個孩子養大。我倆頭一次為慘死的父親落淚。弟弟還提起，1997 年，我獲釋出獄後，母親帶我倆去八寶山革命公墓西 6 室祭奠父親。她要我倆向父親靈位鞠躬，她自己則仔細擦拭父親的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從不理解父親，過去母親要我去為父親掃墓，我一向拒絕。

1997 年，我出獄回上海，把因我入獄受驚嚇而發病住院、仍然滯留在精神病院的弟弟接出院。此時祖母已去世，弟弟到北京與母親暫住養病，上海的祖居閑置起來。我的知青“朋友”惠進德，在弟弟住院期間曾去醫院探視過弟弟，此時提出無償借住我家祖居一年。住滿一年後，他又與我家攀兄弟，要求把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權私下廉價轉讓給他，并以保留我們兄弟倆的永久居住權并永不轉讓，負責代管我弟弟日後回上海住院的監護事宜和出院後安排我弟弟在他的私企工作從而回歸社會為條件。2002 年弟弟回上海住院後，惠進德回避其保留居住權的承諾，多次拒絕醫院的出院通知，并對我隱瞞此事。2007 年底，滯留在市區總醫院 6 年的弟弟，被遣送至郊外閔行區顯橋分院。他深感出院無望，在絕望中尋死自殺，幸被醫生及時發現搶救，施以電休克治療。這種療法每每使弟弟昏死過去，喪失記憶。

為此，我向已擔任長寧區政協委員的私企老闆惠進德討還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拒絕，他還警告我“要識時務”。無奈之下，我只好求助律師調查，竟發現我家祖居（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 480 弄 76 號花園洋房第三層 4 室 1 廳廉租公房）早在 1999 年已被惠進德聯手房管人員冒用我弟弟的名義并偽造其簽名和私章退掉了。他們還偽造《住房調配單》，把我弟弟調配到郊外北新涇平塘路 185 弄 112 號 302 室，而實際上這是別人的住房，根本無法遷入。惠進德又偽造公文，把他全家 4 人從虛擬的 185 弄 100 號 603 室遷入我弟弟的住房，再利用離婚把我弟弟的住房有償轉讓給其“前”妻。到派出所查詢發現，惠進德的兒子已成我弟弟《戶口本》的戶主，惠進德自己則另買房子遷走，完全脫身了。就這樣，我弟弟成了戶口本和身份證上有法定住址，實際却無住房的黑戶。我家三代居住 64 年的祖居，就這樣通過各種盤根錯節的非法手續，“幾經易手”，被悄然“合法”奪走。

2008 年初，為了調查祖居被非法侵吞過程和照顧弟弟，我在故鄉上海流浪，時而住旅

館，時而借住郊外的外地打工仔家。為使弟弟恢復正常回歸社會，我時常把弟弟接出小住幾日。偌大的上海灘，已無我倆的栖身之地。年底回北京，我向我的原單位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反映祖居被占問題。2009 年初，我接到上海市長寧區政府信訪辦公室的通知後，滿懷希望回到上海，把病愈滯留在醫院多年的弟弟接出，一同去上訪。沒想到，長寧區政府信訪接待員一面怪我當初引狼入室，一面却又用惠進德提供的自相矛盾的所謂證據為其辯解，說惠有社會地位，可以搞定事情，還代惠轉告，儘快把弟弟的戶口遷走，另買房子給弟弟住。

在我們的祖居之地，惠進德極為囂張，說他與信訪辦已經溝通，信訪辦相信他、會幫他的，并嘲笑我們上訪無用。惠進德的妻子丁有娣甚至對我弟弟推推搡搡，要把我倆趕出大門，引起周圍鄰居公憤。弟弟拼死要住下，我則因寄希望于繼續依法維權上訪，把弟弟勸回了旅館。

我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繼續上訪市政府信訪辦，處處被非難，無家可歸，貧病交加，生存無著。147 天后，終於盼到市政府信訪辦的《復核意見書》，可是一切虛假手續仍然被認定為真實、有效、合法，予以維持。弟弟屢被刺激，大哭不止。他責怪我當初他回祖居要拼死住下，我不該把他勸回旅館，說我相信依法維權反而被法害了，更把他害慘了。他不願看到我，要以自殺而離開我。我羞愧難言，走投無路，積郁成疾，高燒 40.2 度。弟弟把我送進楊浦區控江醫院。我出院後，弟弟厭食厭世，精神恍惚，臥床不起，極為虛弱。我送他回醫院後，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成危重特護病人，體重下降 15 公斤，入院數月一直要自殺。我們兄弟倆依法維權上訪，求告無門，慘遭加倍侵害，險些喪命。

2010 年初，我到法院諮詢。法官告訴我，惠進德偽造簽字和公文，涉嫌欺詐犯罪，應該報案。我到派出所報案，并請求其糾正惠用非法手段把家人戶口遷入我弟弟的戶籍而成為戶主。兩周後，我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書。我按程序向區公安分局申請復議，兩周後又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我上門請求與警方面談，也被拒絕。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現實！不少法律法規看上去面面俱到，很完善，但一旦人們當真去依法維權時，方知那些執法者并不執法，甚至是反執法，你可能反而遭受更殘酷的迫害，真正是舊債未了，又添新仇。法律不僅是形同虛設，而且有極大的欺騙性，危害公民，危害社會。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輩及其子女，他們至今境況很糟，仍被歧視、被侵權，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訪無效，掙扎于貧困絕望之中。2008 年在上海給我和弟弟以多方關照并支付兩萬元律師費的黃肇川女士，其父原為財政局幹部，1957 年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勞改農場 20 餘年。獲釋後，其祖居住房被親友侵占，無處說理，只能借居他處，不幾年在貧病中客死他鄉。成都 84 歲的右派分子黃紹甫（1943 年赴印緬英勇作戰的抗日遠征軍老兵），勞改 22 年獲釋回原單位，不久又被陷害，判了無期徒刑。12 年後改判獲釋（累計坐牢 34 年），1996 年出獄。祖居住房已被親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長期借居，經常搬家，靠每月 120 元的低保維持生存。

## 野夫的文革 梁文道

野夫四歲時文革開始。當時孩子們沒什麼遊戲可玩，便到田野抓癩蛤蟆。抓癩蛤蟆幹什麼？先用泥巴糊成一個小窑，裏面鋪一層生石灰，然後把癩蛤蟆關進去，用稀泥封住窑口。窑口上留有小洞，把冷水灌進去。生石灰遇水，產生高溫。在蒸汽泥濘中，癩蛤蟆呱呱慘叫，由強變弱，氣散聲絕。扒開這個泥窑，但見癩蛤蟆的醜皮已完全蒸掉，露出新生嬰兒般的晶瑩軀體，顯出一種純淨的美麗。

野夫六歲時，是 1968 年。放學時，一個老師把大竹掃帚拆散，發給每個小孩子一根竹條。幹嗎用？用它打抓來的一個小偷。原來有個小偷，試圖偷裁縫鋪的三尺布。他家裏有個小孩，五六歲大，無衣蔽體，冬天很冷，想偷塊布回去給孩子做衣服。小偷被逮住了，綁了起來，然後讓小學生懲罰這個小偷。他們用竹條拼命打他。小偷的小腿，皮膚粗糙還帶著泥巴，慢慢由紅變紫，漸漸腫大發白，如半透明的蘿蔔。他不停的哀嚎，絕望得手足亂舞，汗如雨下，雙眼現出死亡的寒光。最後，他喉嚨嘶啞，嘴如魚唇般無聲開合，身體搖晃如失去平衡的風箏，在極限的一擊下怦然栽倒。

野夫的父親是小地主的兒子，後來當了繳匪英雄。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須更加殘酷，常設計誘殺一些山野逃難的鄉民。後來他被打到，人也鬥他。有個鬥野夫爸爸的人，老在家裏架著機關槍，威脅要殺野夫爸爸一家。

野夫的父親被打倒後做礦工。這幫人在礦井底下暗無天日，沒有什麼娛樂，便以抓老鼠取樂。抓來老鼠，用生黃豆塞進老鼠的肛門，再用綫把肛門縫起來。黃豆在老鼠體內膨脹，痛不欲生的老鼠被放生之後瘋狂亂躡，闖進它們熟悉的家就撕咬同類。一場大規模的鼠類自相殘殺壯觀而刺激，比任何毒藥更慘絕鼠寰。這就是當時一幫工人平常的休閒生活。

那時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對敵人溫情就是對人民殘忍，對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這樣的教育發展了每個人心裏潛藏的殘忍天性。1982 年，19 歲的野夫當了個中學老師。有天半夜，他在深巷看到了他小時候那個對他家架機關槍的仇人。在路燈下，那人潦倒而蒼老，整個身子佝僂著，但是野夫還是上去把他一頓暴打泄恨。

---

補白：我三哥王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學生，解放前夕隨部隊起義，加入解放軍進軍西藏。幾年後升為副營級幹部，在後藏日喀則擔任班禪活佛的機要秘書，實際是西南公安部門安插的眼綫，負責監控任務。五七年反右，三哥懷著赤誠之心，給高層首長林鐵提意見，批評他重用其曾是三青團骨幹的小舅子。上級領導勸三哥認錯收手，他不聽規勸，固執已見，被打成極右，發配農場勞改。1959 年，因私下說毛澤東先後有四個老婆，江青與毛先孕後婚，不是元配夫人，被揭發檢舉，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九年。後提出申訴，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為四年，刑滿後留場勞動（俗稱二勞改）。文革期間又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判刑七年。七九年平反時，三哥已 52 歲，恢復 18 級幹部待遇。其時軍校編制已撤消，被就地安置工作。讓人欲哭無淚的是，三哥七年冤獄的判決書竟然是偽造的。因沒有存檔底案，政法部門據此不予受理賠償。四哥王古白，1949 年初中畢業即參加解放軍公安部隊，任連級文化教員，復員後在北京一家中心小學任體育教師。五七年大鳴大放，四哥給勞改政策提意見，揭露了耳聞目睹的肅反擴大化和刑訊逼供、草菅人命的事例，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勞動，爾後又在學校燒鍋爐。1979 年改正複職，未獲任何賠償。

王譽虎

---

哥哥莊彥斌      莊曉斌

我的哥哥莊彥斌比我大 9 歲。哥哥很有體育天賦，各項運動都很擅長。他的速滑紀錄，在我家鄉據說至今也沒人打破。15 歲那年，哥哥被選進黑龍江省少年籃球隊。後來又進了黑龍江省青年籃球隊，成了省隊的主力前鋒。為了能和當時在佳木斯評劇團當演員的女友團聚，他放棄了黑龍江師範大學的學業，到佳木斯市隊打球。

文化大革命開始，哥哥隨潮流而起，在佳木斯撐起造反大旗，被該 36 萬工人推舉為紅

色工人造反團的司令。1967 年 4 月，他作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參加五一勞動節觀禮。途經家鄉時，我對哥哥說：“你別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們這個家都已經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幹部，但出身于剝削階級，那可是與生俱來的罪過。我在學校雖然品學兼優，可是作為“可以教育的子女”被打入另冊。學校裏的各個造反團隊都不接納我。我天生要強，斗膽自己挑頭成立了一個名叫“一身是膽”的造反團組織，可是不到一個月便被紅五類子弟砸了。我的情緒極端低落，勸哥哥說：“我們是革命對象，不可能成為革命的動力，你還是適可而止，好自為之吧。”

哥哥真誠聽取了我的規勸，答應從北京回來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騰了。可是從北京回來不久，哥哥被牽進“6.30 反革命凶殺案”。該案是文革期間佳木斯市發生的一起兩派武鬥致死人命事件，死者叫宋勝範，是電機廠的工人，另外一名死者是軍人。案件牽涉到我哥哥，他隨即被軍管會收押入獄。被關押的還有另外兩名凶手，一個叫陳鐵生，佳木斯市第 15 中學的學生，另一個叫魏征明，也是電機廠的工人。這兩人都慘死在牢獄中了，我的哥哥却僥幸熬到出獄。他在看守所整整關押了 3 年，1970 年 6 月獲釋。這 3 年裏，他受到過多次酷刑拷打，有時把他的頭用麻袋罩住，然後再打。

三個年頭，一千多個日日夜夜，母親的一頭秀髮一寸寸發白，最後生成滿頭霜雪。哥哥的變化更大，已由狂熱的巔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經信誓旦旦的真理了。哥哥獲釋之後，被監督改造。單位裏的當權者都是原來的對立面，哥哥當然不甘受這份委屈。此前在獄中，他與各類社會渣滓日夜廝守，良知日益麻木，殘酷的現實迫使他墮落。如今為躲避監督勞改，他逃離單位，想偷渡去香港，然因被人告發而未遂。在押解回佳市的途中，在決意和他一起偷渡的女友的幫助下跳車逃跑，被一夥刑事犯罪分子搭救。從此哥哥與這夥搭救他的人為伍，在遼寧省從事投機倒把活動。兩年之後，他的罪行暴露。為逃避追捕，哥哥秘密潛回到家鄉藏匿。

哥哥從遼寧潛回家時，帶回一部紅旗 803 牌短波收音機。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這部收音機收聽廣播。香港有一家電臺播送一個“聽眾信箱”節目，他聽得著了迷。那是臺灣國民黨在香港設置的，專門面向大陸作反共宣傳，並鼓動大陸人給他們寫信。受這家電臺的蠱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寫了一封匿名信。這封信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的名字，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香港九龍新浦港彩虹道 2 樓 2 號，石艷芬收。因為這封信就是我在黑龍江南叉郵局為哥哥投寄的。這封信闖了天大的禍，一場滅頂之災正向我家襲來。

1973 年 6 月 9 日，全國掛號的“73.2.11”反革命掛勾信案件偵破，我和哥哥、父親相繼被捕入獄。一年半之後，我哥哥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判決書上，我哥哥莊彥斌的所謂“反革命罪行”共有兩條：一是曾因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被拘押教育兩年，釋放後繼續與人民為敵；二是自 1972 年 10 月以來，隱藏在家中地道內，收聽敵臺，並進行反革命宣傳，書寫反革命匿名信件，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陰謀策劃叛國投敵。我父親被判 8 年有期徒刑，我本人則被當成了一個被寬大的典型，免予刑事處分釋放了。但這是個精心編織的騙局，我的自由僅僅有 3 個月。1975 年 2 月 1 日，我又被抓回，重新查究出我新的反革命罪行，最後判我無期徒刑。

1974 年 10 月 31 日是我哥哥被執行死刑的日子。那天全伊春地區召開廣播公判大會，並組織伊春地區所有單位收聽公判會的消息。我是在那次公判會上當場釋放的。但我的哥哥卻沒有與我和父親一樣被押上審判台，因為他在臨刑的前夜，用一個涼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割斷了自己的靜脈，企圖自殺。詳細情形是一個名叫黑小子的刑事犯後來向我講述的，他是在死囚牢房裏監護我哥哥的兩名囚犯之一。“你哥哥在接到終審判決後，曾平靜地對我倆說：‘你倆放心，我是不會走上共產黨的刑場的。’我倆當時沒理解他的意思。臨刑前夜，他讓我倆給他鋪好行李，說要好好地睡一覺。我們當時絕對想不到他能自殺。他身上藏匿著一個

用涼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半夜時分，我們發現他的身體抽搐，趕緊掀開被子。他已經把脖子上的靜脈割開了，血流不止。我們趕緊報告看守，經過緊急搶救，人雖然還沒咽氣，但已奄奄一息。”

開宣判大會時，我哥哥已不能站立了，所以沒能站在臺上。但當局有辦法，他們把我哥哥綁在一扇門板上，立在刑車上。在宣判他時，刑車從會場的主席臺前駛過，然後直接駛往刑場。後來我們家屬去看看守所索要哥哥的行李時，起初獄方不想給，怕家人發現行李上的血迹。我們覺得蹊蹺，執意要領回行李。獄方沒辦法，向上級請示，才給了行李。兩個褥子上均有臉盆大的血痕，可見當時流了很多血。

哥哥留下一封遺書，原文是：“父母恩重，節衣縮食，積銖累寸，育兒三十年，原期詩書成就後，精忠報國，闔家歡顏。何期年方弱冠，浩劫席捲，受人蠱惑，起來造反。雖披肝瀝膽，全拋私念；虔誠篤信此心丹！誰豈料，只落得容顏憔悴，皮開肉綻，身陷囹圄有 3 年。更可恨，那奸佞鬼魅，逼我進退難，異念差，上梁山，鑄成千古大錯。恨海難填，釀成終生憾悔，可謂定數使然。雖死無遺憾！只堪惜，二老霜鬢，稚兒童年，居家牽累，父兄同入監。絲絲縷縷連心肉，撕裂肝腸全拋閃！蒼天兮！怒問不聞語？心似碎，誰見憐？奈何橋頭憤何悔？黃泉路上恨豈單！把筆一曲成絕唱，猶似膝下拜慈顏！兒去也，二老休牽念！”

這封遺書寫在一個裝藥的紙袋上，是在我和妹妹去探視父親時，父親乘獄警不注意，悄悄地塞到妹妹手裏的。遺書上的書寫日期是 74 年 7 月 17 日，也就是我哥哥臨刑的 100 多天前。這封遺書是怎麼輾轉到了我父親手裏的，至今不得而知。被釋當天，我向伊春法院譚一琴審判員提出要為我哥哥收尸。可譚板著臉說：“家屬就不要管了，尸體我們已經妥善處理了。”我當時是剛剛釋放的小反革命，怎敢再爭辯，只能忍氣吞聲，任其“妥善處理”。

我家有個遠方親戚叫趙忠祥，當時是伊春衛校（今伊春市醫學院）的在讀學生。趙後來透露，是他和他的老師親手“妥善處理”了我哥哥的尸體——用大鍋把尸體煮爛，他把骨上爛肉剝掉，他的老師把骨骼做成標本。趙忠祥還把這個標本的編號告訴了我們家屬。起初他并不知道那具尸體是莊彥斌的，事後知道了，又懊悔又噁心，幾乎把腸子都吐出來了。許多年後，我們家屬曾去伊春衛校找尋那件標本。衛校的管理人員拒不配合，讓家屬去找伊春法院交涉。2000 年，我和我的親侄子曾到伊春法院交涉一次。接待人員態度曖昧而蠻橫，說：“這件事（尸骨標本）查無實據。你哥哥有罪這是事實，早有結論，絕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過去的案！”蒼天啊！這就是我那枉死的哥哥的反革命案在已經“海晏河清”了的時代得到的最後的答復啊！

我母親叫丁敏，是抗日戰爭後期參加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國家給他們每人頒發了一枚解放勳章。我母親很少佩戴這枚勳章，也不輕易示人。母親的大衣櫃裏有個紅絨小匣子，這枚勳章和其他幾件母親所鍾愛的物件就珍藏在這個小匣子裏。每逢建軍節和國慶節，母親都把這個小匣子捧出來，用紅綢布一邊精心地揩拭勳章，一邊陷入深深的遐思。每當這時，哥哥和我都靜靜地坐在一旁，看母親凝視那枚勳章。

1974 年 10 月 31 日上午，母親從廣播裏聽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時，竟沒有掉一滴淚，只是痴痴地一聲不響。聽完廣播，母親把她的那枚勳章拿了出來，擺在飯桌上，眼睛死死地盯著那枚勳章，一句話也不說。

哥哥被執行死刑後大約一個星期，幾名身著警裝的公安人員來到我家。那時我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臥病在床的母親和年僅 10 歲的侄兒，靠每月每人 8 元人民幣的社會救濟度日。年過 18 歲的妹妹，每天到家屬生產隊幹活，一天掙 6 角錢。

警員來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決書鄭重地向母親出示，冰冷如鐵地說道：“根據伊春市人民法院 74 刑字第 4 號判決書，你的兒子莊彥斌已于 1974 年 10 月 31 日被執行死刑，現鄭重地將判決書送達給家屬，家屬應簽字。”警員把判決書鋪開，放在母親病床旁的飯桌上。母親用顫抖的手，接過警員遞過來的筆，在簽收回執單上簽好了字。警員又高聲說道：“按

照規定，家屬還要繳納二角錢的執行費。”“什麼？”母親聞言厲問：“什麼執行費？”“執行費就是……”警員不好解釋，只好含糊其詞地說：“這是上級規定的。”母親的眼睛勢若噴火，盯著警員問：“說清楚了，什麼執行費？這是哪個上級規定的？”警員說：“我們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母親冷笑了，顫微微地掙扎著從床上坐起來，走下地，走到大衣櫃前用雙手捧出那小紅匣子。她把那枚金黃色的勳章捧出來，“啪”地摔在桌上，說道：“你看，這個值不值二角錢。如果值，你們拿去，頂你們要的執行費！”處決罪犯的區區二角錢的子彈費，還要向那個已經肝腸寸斷的可憐母親討要，這是令希特勒也望塵莫及的“偉大壯舉”啊！

前些年，中國廢除了反革命罪，許多死去及僥幸存活的反革命罪犯得到了當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反革命分子，諸如遇羅克、林昭、張志新等。然而，中國至今也還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沒有得到平反。對於他們的冤案，當局不但沒認錯，甚至連一句體恤家屬的話語也未曾表示過。

哥哥短促的 32 年人生就這樣匆匆地去了。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是閉不上眼睛的。草菅人命的政府至今沒有為他平反，甚至沒有表示一句歉意。當年那家蠱惑人心的臺灣電臺也早就銷聲匿迹了，主辦者國民黨現在也變得開明了，不僅和大陸通商通郵，而且似乎大有天下一統的誠意。他們都視民如草芥：殺人者，依然故我，拒不認錯；蠱惑人心者，煽動小小百姓往共產黨的槍口上撞，也心安理得。沒有一個人為他們的行為懺悔，整個世界都沉默無語。

---

補白：過去家家戶戶主房當門都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或祖先牌位。文革時，牌位都被當成四舊掃除，代之以供奉毛主席畫像。1967 年，毛主席像章開始風行全國。毛的石膏像和瓷像也逐漸出現於市場，很快全中國幾乎每家每戶都供奉有毛的石膏像。購買毛的石膏像，不叫買，而叫“請”，與請觀音、請財神一樣。石膏像是易碎品，有許多人因不慎打碎毛的石膏像而獲刑。其中最令人捧腹的一例是，有人設下巧計，利用毛的石膏像被弄碎來懲治村中惡棍。陳正滿原是村裏游手好閑、貪吃懶做的小混混，憑著其父在縣裏當官的一個老戰友的關係當上黨支部書記，從此在村裏欺男霸女，無惡不作。村民看在眼裏，却敢怒而不敢言。多行不義必自斃。村裏有個退伍老兵，決定懲治一下這個惡棍。陳正滿為人大大咧咧，不管到哪里都一屁股坐下去。那老兵先在自家堂屋裏放一個籬筐，籬筐裏擺放一尊毛澤東石膏像，籬筐上放塊木板，將石膏像遮住。堂屋內所有的椅子與凳子都搬走，然後讓人去請陳正滿。陳正滿一來，就到處找地方下屁股，可是屋內都沒有可坐之處，就一屁股坐在籬框的木板上，毛像立即被壓得粉碎。此案人證物證俱在，陳正滿被判刑 5 年。沈不沉

---

黑五類的亞類 陶渭熊

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帽子下面各有小類。

地主下面分為惡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劃地主、開明地主和候補地主等。凡戴上惡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鎮反等運動中遭到鎮壓，無一幸免。或者說，凡被鎮壓的地主，頭上一定都戴著一頂惡霸地主的帽子。惡霸地主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詞彙，各種刑律中都沒有明確界定，在具體實施時則以所謂“民憤極大”為標準。但是什麼程度的民憤才是“極大的民憤”，全由一些人的主觀意志決定。

一般地主又被稱為普通地主。他們是土改、鎮反等運動中僥幸存留而沒有被殺的地主。

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判刑勞改，但總算活了下來。這些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大量存在，現在已經死得差不多了。即使個別還在世，也已八九十歲高齡。他們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受盡折磨和迫害，在日常生活中受盡欺凌。他們是毛澤東時代的頭號政治賤民。

所有地主都必須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一旦違犯則被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輕則批鬥捆綁吊打，重則逮捕法辦，判刑勞改。1966 年文化革命開始時，筆者在大巴山下教書。生產隊在學校附近插秧，一個年青地主正和許多社員一起趕趟趟（比賽誰插得快），被路過的公社書記看見了，認為秧苗栽得東倒西歪，是破壞集體生產的行為，馬上追究責任。在公社書記的威逼下，大家把責任推給了那個年青的地主。公社書記當即召開現場批鬥會，把那年青地主定為破壞生產的不法地主，後來竟被逮捕，判刑五年。

在清匪、反霸、土改、鎮反等運動中，有的地主不甚忍受非人折磨，亡命他鄉，躲藏起來，這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絕大多數被清理出來，押回原籍，受到更殘酷的鬥爭和迫害，有的被判刑甚至殺頭。筆者家鄉有一個叫劉佳輝的地主，當過保長抓過壯丁，被定為惡霸地主，決定槍斃。就在槍斃前一天的晚上，他得以脫逃，隱姓埋名躲藏在貴州省的深山老林中，後來被清查出來。此時土改殺人高潮已過，經調查他並無大惡，抓壯丁不過是奉命行事，僅以逃亡地主罪名判刑五年。此人現在還在世，已 95 歲。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摘了帽子的地主能够享受普通人的權利，不再受到社會歧視，也沒人稱他們為摘帽地主。真正的摘帽地主是指 1956 年極少數摘掉了地主帽子的人。名義上他們享有公民權，但仍然是地主，他們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仍然必須規規矩矩夾著尾巴做人，飽受社會歧視，在後來的四清運動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審查和批鬥。他們比沒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

漏劃地主是四清運動和文化革命運動中被清理出來重新劃定的地主。一般都是小土地出租或者比較富裕的農民，被拔高成分而劃定的。

在抗日戰爭年代，地主階級的一部分上層人士作為統戰對象，被共產黨定為開明地主。全國解放初期，在征糧運動中，一部分地主積極上交公糧，也常被征糧工作隊稱為開明地主。但是在土改運動到來時，所有地主都是鬥爭對象，原來定為開明地主的，都殺的殺，關的關，鬥的鬥，開明地主就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犧盟領導人牛冠英的父親，抗日戰爭時期積極支援抗日，定為開明地主。土改時被農民用鐵絲穿著鼻子，強迫他的已是中共幹部的兒子牛冠英牽著游街，後來被折磨致死。

幾年前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說華北某個村莊（記不清具體地名）在土改時把所有地主及其家人都殺光了，最後留下一個三歲小女孩寄養在一戶人家。村委會決定把該小女孩劃為候補地主，等她長大到 18 歲時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與名目繁多的地主帽子相比，富農帽子種類稀少。富農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初期都曾經受到過有限度的保護。當然，許多地方還是把他們和地主一起加以打擊。農業合作化以後，特別是 1963 年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那就要不了多少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之後，富農就上升為反動階級。它的種類大概有舊富農、新富農和漏劃富農幾種。

舊富農指解放前，或共產黨武裝割據掌握政權之前就比較富裕，達到劃分富農條件的人。新富農指土改以後分得了土地，逐漸富裕起來的農民。開始的時候認為他們是受到黨的恩澤而勤勞致富的，因此受到過一定程度的保護。但是到了農業合作化時期，被毛澤東認為他們是在“兩極分化”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是農業合作化的障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敵人，他們的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漏劃富農是四清和文革中被清理出來劃為富農的人。

反革命分子的陣容極其龐大。從解放後各種運動中揪出來的反革命分子，直到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妻子江青變成的反革命分子，其總數恐怕不下數千萬之眾。其種類計有歷史

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新生反革命。

歷史反革命是歷史上曾經反對過共產黨的人，主要指國民黨的軍警憲特人員，以及黨務骨幹、政府官員、三青團骨幹、汪偽漢奸、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等等。現行反革命指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分子，如叛國、叛亂、投敵、越獄、間諜、資敵、煽動等等。現行破壞活動在文化革命中被無限擴大，凡議論、批評過毛澤東、林彪、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都是“惡毒攻擊”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小學生在牆上胡亂塗鴉，也可以構成書寫反標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時口誤說錯某些敏感詞語，也可以說成呼喊反動口號的現行反革命分子。

新生反革命應該是“新產生的反革命分子”，它和現行反革命有什麼區別，筆者不清楚。文化革命中，大巴山腳下的南江縣新店公社，有一個 17 歲小孩叫梁大勇，對於三忠於四無限、早請晚報之類的現代宗教儀式極其厭惡。每次舉行儀式大家山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的時候，他就大聲呼喊“敬祝梁大勇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梁大勇身體健康，身體健康！”1970 年一打三反運動來臨時，這個 17 歲小孩就被逮捕法辦，戴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處管制 5 年。

戴壞分子帽子的人大概有兩類。一類是因政治原因定為壞分子的，如被認為破壞生產、散布謠言等，他們其實應歸入反革命類。另一類就是流氓、盜竊、強姦、搶劫、縱火、詐騙、貪污、扒竊等等犯罪分子。不管是哪類壞分子，都沒有劃分為更小的種類。在民衆心目中，壞分子一般指後者。與其他五類分子比較起來，壞分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犯事以後，也不見黨支部書記上門動員家屬離婚、劃清界限。即使到了勞改勞教農場，也會被管教幹部利用來監督其他犯人。

官方公布的右派人數是 55 萬多人，民間的說法是 300 多萬人。右派的種類有極右派、反革命極右派、一般右派、無案右派、內控右派、中右、漏網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反社會主義分子和右童分子。

什麼是極右派？劃分極右派的標準是什麼？筆者現在也不清楚，只知道極右派對共產黨的缺點錯誤看得最清楚，認識最深刻，批評最尖銳，在被批鬥時拒不認罪，態度最頑固，共產黨最痛恨，所以遭受的處罰最嚴厲——開除，勞教，成為沒有期限的勞改犯人。反革命極右派是頭上戴著極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帽子的人。凡是被定為反革命極右派的人，無一不被逮捕判刑，甚至被殺，如聖女林昭。

一般右派又稱普通右派，是右派的大多數，其生存狀況因具體環境而有很大差異。有的仍然留在單位繼續工作或學習，有的被長期下放當工人農民，有的則被開除回家或遣送農村監督改造。但是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是人人可以踐踏的賤民，政治上被迫害，經濟上遭剝削，生活中受歧視，甚至連婚戀權也被剝奪。這樣的日子整整過了二十餘年。

凡是被正式處理的右派，都有清楚的檔案文本，將其右派言論、組織定性、處分決定、審批機關等等事項記錄在案。但是有一類右派，却無檔案可查，既無右派言論記載，也無組織處分決定，往往是單位頭頭，甚至黨員小組長之類的人物一句話，就當了右派。等到 1979 年給右派改正時，才發現他們的檔案裏無任何有關右派的記載，原來他們根本不是右派，却“享受”了右派分子的一切“待遇”！所以我稱他們為“無案右派”。北大數學力學系學生閻桂助，1957 年為湊足右派指標，班上的小組長（黨員）捏造事實將其劃為右派。雖然未經黨委批准，却將其按右派分子對待，勞動改造二十多年。這種右派各地都有，在落實政策時遇到很大困難，當局說：“你本來不是右派，我憑什麼給你改正？”

有些著名人物或重要的科學家，已被劃為右派，但不宜公開宣布的，此為內控右派。北大校長馬寅初，瀋陽金屬研究所研究員葛庭燧，大連化工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英等，皆為內控右派。著名演員新鳳霞，因被文化部某領導看中，動員她與右派丈夫、著名戲劇家吳祖光離婚。新鳳霞堅決不從，于是被定為內控右派。有些高中學生也被劃為內控右派。四川省自貢三中高 58 級學生鄧爾謙，出身貧苦，品學兼優，被譽為“黨的好苗子”。後來被政治



老師王永瓊惡意動員寫大字報鳴放，終將他定為內控右派。內控右派與其他右派沒有本質區別，也逃不脫批鬥、認罪、檢討之類侮辱與懲罰，在後來的四清、文革中更免不了遭受迫害。蕭光英在文革中不甚忍受迫害而自殺，其妻得知丈夫自殺，毒死了女兒，然後也自殺。中學生被定為內控右派的，升學、就業門路全部被堵死。

反右運動給每個人進行政治定位，劃分左中右。左派、右派營壘分明，中間派又細化為中左和中右。中右指那些有右派言論、思想右傾或同情右派的人，但肥豬還不够秤，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不戴右派分子帽子，但是批判、檢討、認罪是免不了的，是黨團員的還要受留團（黨）察看之類的處分。可以說他們嚇出一身冷汗！他們的檔案中的政治鑒定暗淡無光，走到哪里都不被重用，師範畢業的連當班主任的資格都沒有。有的中右分子還被精減下放，清理回家，在後來的四清、文革等運動中繼續遭受迫害。

有的人在反右運動中僥幸逃脫了右派羅網，但檔案中留下思想右傾、右派言論之類的不良記錄。如果他們再有言語或行為上的不慎，被人抓住把柄，在後來的四清、文革中被人揭發出來，戴上帽子，就成為漏網右派。

自 1959 年國慶節宣布給“確實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之後，陸續有一些右派分子被摘掉帽子，“回到了人民隊伍中”，成為摘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實比戴帽右派好不了多少，政治上仍屬賤民，生活、工作上只有吃苦受累的分兒，婚戀上則是“被愛情遺忘的角落”。雖然平時都謹小慎微夾著尾巴做人，但每次運動還是理所當然的“運動員”。特別是文化革命、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等運動中，他們沒有人能逃脫被批判鬥爭和關牛棚的命運。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給全國 99.999% 以上的右派改正，不再叫他們右派或摘帽右派，基本上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有的還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但是一旦提到他們的過去，仍然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說三道四。一旦這些人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與領導或周圍人群發生利害衝突，則他們還是要被人罵為右派。說穿了，改正右派還是有別于普通人的一個特殊群體。

反社會主義分子指下面兩部分人：工人、農民、城市貧民中的右派分子和未成年的中學生中的右派分子。因為右派分子的全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要把工人、農民和十多歲的中學生劃入資產階級，恐怕于情于理都說不過去，于是發明了“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個名稱。工人農民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有多少？有文章說不下百萬之眾。中學生中的反社會主義分子，據《五八劫》一書記載，1958 年 1 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全省 58 級高三學生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受批鬥并變相勞改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竟超過 3200 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已送勞教和押回農村監督勞動的人！當年四川全省高中畢業生也不過一萬人。雖說這個運動在高三學生中進行，但其他年級也受到影響。被打成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學生，年齡最小的才 13 歲。全國其他地方是否也在中學生中揭批反社會主義分子？目前還不得而知。

享受右派分子“殊榮”的，目前知道的似乎只有張克錦一人。那時他才 12 歲，要和成年人一樣戴右派分子帽子似乎不太適合，于是整人本事出類拔萃的我黨幹部發明了“右派分子”這頂帽子，戴在這個 12 歲少年的頭上。反右運動中，四川達縣帽鞋生產合作社職工冉某，給領導提意見，并請從小就有繪畫天賦的小學生張克錦畫了一幅題為《一手遮天的 xxx》的漫畫。冉某因此事被打成右派，自殺身亡，漫畫被查出是小學 5 年級學生張克錦所作。1958 年 4 月的一天，正在上課的張克錦被叫到城關鎮禮堂。那裏人山人海，還沒等回過神來，他就被人反剪雙手推到臺上。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他嚇得大哭。隨後張克錦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投進監獄，一關就是 7 年。

名目繁多的黑五類帽子，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特色。從專政者來講，便于分類管理，區別對待，分而治之，分化瓦解；便于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把無產階級專政演繹到極致。從被專政的黑五類自身來講，雖然都感受到政治迫害的殘酷，却又有一種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我雖挨整，但是比別人還好一些，于是就默默承受苦難而極少反抗。專

政者與被專政者“配合默契”，共同維護著鐵桶式的強權統治。黑五類帽子系列，是整人學上一大創造發明，值得認真研究。

---

補白：外祖父原是安徽含山縣教育科科長，正直而又認真。正當他滿腔熱忱地工作時，突然被宣布為右派，挨了批判，投河自盡。平反右派時，舅舅得知，外祖父竟不是右派，縣裏從未做過把他打成右派的任何決定。可當時是按右派批判的呀！他自己也是按右派自殺的呀！這樣莫名其妙的右派全國到底有多少！ 李子軍

---

## 母親被槍殺 甄秀梅

1966 年八月紅色恐怖籠罩全國，受我母親的出身和兩個姨媽隨國民黨去臺灣的牽連，我家是我們胡同裏第一個被遣返農村的黑五類，并被抄家破四舊。當時我 15 歲，剛上初二。我爸媽同在一個單位工作。那天他們單位的文革小組，帶著紅衛兵來到我家。我們剛吃完早飯，碗筷不讓收拾，命令我們全家站成一排。他們開始翻查，撕字畫，砸古玩，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破玩藝兒”。我姥爺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一架子珍貴書籍全被搬到院子裏點上火。我母親幾次上前勸說，我們願把這些書捐獻給國家，千萬別燒。他們不聽，還打了我媽，並將我和姐姐的長辮子一律強行剪掉。我們被攆走後，我姥爺在世時買下的那所房子也被沒收了。

到了旅順鄉下，我們又從當地社員手中買下一座一進二的石頭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我姥爺共四個女兒沒兒子。解放前他在大連開了幾家綢緞莊，家境殷實，為人正直厚道。1945 年光復時，我姥娘去世。那時我大姨媽早已從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畢業，與一位同學回國結婚，在國民政府衛生部工作。後來她又將我二姨介紹給一位軍醫。那年兩個姨媽回大連奔喪，臨走時非要帶我們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們這號人的命是中共必定要革的。”

但是姥爺死活不同意。那時日本投降，蘇軍進駐旅大。這一時期的旅大實際上是被蘇軍軍管下的一個特殊的地區，國共兩黨都在發展著自己的勢力。國民黨大連支部幾次派人找到我姥爺，勸他出來為國民黨工作，但我姥爺以“雙目只注堂中經，單口不論是非事”為由回絕了。他的政治立場實際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他經常向孩子們說，“笑到最後的肯定是共產黨”，并讓大姨、二姨規勸自己的丈夫早日認清形勢。為積極響應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的號召，姥爺將自己的店鋪賣了，改做運輸業，將蘇聯從符拉迪沃斯托克通過海路向旅大運送來的糧食、油脂、罐頭、食糖等食品，分運到各地，後來又將全部車輛、騾馬無償交給中共旅大地委領導下的運輸公司，從而獲得地委嘉許。1948 年冬，姥爺病逝，辭世前給我們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個金元寶。

我們在旅順的鄉下住了不到一個月，一天我爸媽單位又來了一卡車的“赤衛隊”二次抄家，并說母親在做會計工作期間貪污公款，最後在一個木箱的底夾層中，搜出了姥爺留下的那十個金元寶。那時家有金貨就等同于窩藏敵特，平日人們對金銀首飾都避之不及，何況金元寶。我們孩子不知內情，頓時嚇傻了。但那些人可樂壞了，根本不聽父母任何解釋，硬說這就是贓物的證據，把爸媽都抓走了。臨走時母親堅定地向我們說：“相信媽媽不會幹那樣的事，媽媽爸爸會很快回來的，你們要聽小姨的話。”

爸媽走後，小姨才將金元寶的來路向我們說清，所以我們更加堅信媽媽無罪，大不了將

元寶沒收了，回家只是時間的問題。不久爸爸被放回，媽媽因“貪污”數額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跑市里多方打探媽媽的情況。起初說是貪污 800 元，後來不斷成倍向上翻，達到上萬元。這個數字在當年可是個天文數，其罪行可想而知。當時我們頭上帶著幾頂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頂壞分子帽子。這頂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盜竊、貪污、殺人放火，凡幹缺德事的都是壞分子，是黑五類中最讓人厭惡的。

此前的 1962 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畢業不讓升學，落下抑鬱症，整日悶悶不樂，不願與外人接觸。現在又攤上這事，病情更重了。有時會突然大哭一場，哭後病情會好很長一段時間。有次幹活後在地頭休息，隊裏的文革主任傳達文件，不知怎麼的，哥哥突然咧開大嘴要哭。主任看到了，大喝一聲，上前就是一腳，將哥哥踢翻，哥哥頓時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員趕緊給他捏人中，對前胸後背又拍又打，才緩上一口氣。從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裏人外，見到任何人都害怕。我們知道這是那次的哭給嚇回去所致，所以就盼著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場。但他從此不再哭，也不會哭了，成了個不能下地幹活的廢人。

那幾年，窮，大家是一樣的，而我們還要加上低賤。秋後社員到地裏翻檢土裏餘下的小地瓜頭、小蘿蔔頭，我們得等人家都撿完了才可以進去。

1968 年 8 月，我家附近的老營房，又被大批的大連公檢法人員住滿，據說是按照中央的“徹底砸爛公檢法”指示在這裏辦學習班。市公檢法被全面軍管，法院檢察院都被撤銷，合并到市革委會的人保組。我爸說：“這回你媽的案子被解放軍接去了，可要出頭啦。”時不時他還去偷偷打聽老營房裏的人。一天，他高興地告訴我們，一位老公安告訴他：“你老婆的案子爭議很大。第一、單位財務賬目確實顯示有貪污，但沒有證據證明就是你老婆幹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寶價值硬套貪污數額。第三、黃金是被國家禁止買賣的，即使貪污了足夠的資金也無處購買十個金元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也好一陣高興，認為見到媽媽的日子不遠了。

1970 年，全國又掀起一打三反運動。那年農曆臘月初十，我們看到一張貼到我家院門上的公審大會布告，其中有媽媽的名字，打著紅勾，被判死刑。當時我們都被震暈了，爸爸臉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時死刑核准權下放到各省革委會，判死刑後不准上訴，立即執行，都是中央文件裏明文規定的。不通知家屬，不發給家屬判決書，也不准家人參加那天的公判大會。

我們打聽到，兩天後由市公安局軍管會主持，在市人民體育場召開公判大會。估計游街路綫肯定經過中山路，爸爸決定除了哥哥外，帶著我們一早就等候在長春路商店門口。此時霏霏細雨下個不停，進入會場的卡車開過來時，我們看到了媽媽。她高高的個子，昂著頭，還是那身洗得發白的勞動服，雙眼在人群中急速搜索著什麼。我知道，她是在尋找丟不下的我們。我們不敢喊，只能讓泉涌般的泪水混在雨水中流淌……

一個小時後，公判大會結束，我們又等在體育場外，再次見到媽媽。只見她一出體育場的大門進入街區就大喊：“蒼天呀，冤枉，我冤枉！”那聲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響亮的閃電，直刺每個人的心。緊接著就看到押解人員用繩子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繩子勒上去。汽車在我們模糊的泪水中疾馳而過。後來聽參與處理媽媽後事的姐姐說，媽媽遍體鱗傷，新傷壓舊痕。她的頸椎骨在刑車上就被勒斷了，到刑場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補了一槍。她的獄友們也說這個女人真剛烈，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只是畫了個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陽……

三個月後，有個穿便裝的人到家裏來，說是市革委會人保組派來的，拿了一張表格似的紙張，要父親簽字，沒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沒有開庭審判，更沒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別，不允許媽媽留下遺言。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帝王都為被刑者保留有留下遺言的權利。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共和國卻沒有這一切，人命如草芥，媽媽就這樣成了一縷西去的冤魂。

1973 年有人給我們轉來一封信，是爸媽單位的一個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陸的會計，在臨終前寫給我們的。信中說那筆去向不明的 800 元款項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現了我媽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了。至于以後那些天文數字的貪污款，全是上面讓她編造的假賬，并叮囑我們以此信為據為我媽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為據到市里申訴多次，但結果都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1977 年 5 月 22 日，以黑田壽男為團長的“日中友協會員之船”訪華團一行 340 人，來大連進行友好訪問。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媽之托打聽到我們，由此我們才知道大姨媽和姨夫現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東北大學任教，二姨媽全家在美國的聖迭戈開了一家很有名氣的中醫醫院。

1978 年 6 月 25 日，我們接到中共旅大市委為我母親的冤假錯案進行公開平反的通知，并由當年公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復查糾正文革期間錯判死刑案件的報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絕大多數死刑是 1970 年前後判的，一打三反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光大連市截至 1978 年 8 月中旬，全市 175 件集團性冤假錯案已平反 159 件，占 90.9%；涉及 7693 人已平反 7489 人，占 99.3%；3437 件個人冤假錯案已平反 2043 件占 59.4%。

1980 年我父親與小姨結婚。同年，我們全家，除我和丈夫為了照顧我哥和年邁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國。這是我堅持的——誰敢擔保這個國家以後不再折騰？2002 年我哥與婆婆先後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後退休，就經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兒子那裏生活，但仍保留中國國籍。

父親經常慰藉我們說：“冤再大也沒有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是文革中死難者的 800 多萬分之一。”是的，我們一個草民百姓只有逆來順受的份，但我從另一個角度不能原諒我姥爺當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的錯誤。若當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過這一劫了嗎？當年那十個金元寶全捐了，不也沒這事了？當年我們那條長福街胡同，南北共 47 戶居民，文革中有 3 戶被趕回農村原籍，4 戶被抄家、批鬥，其中 4 人死亡。

---

補白：河南人口頭不乾淨，動輒愛說“球毛”。因是之故，河南多出一個右派。“毛”是當世最神聖的字眼，與“球”連在一起，那就是褻瀆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個反右積極分子如是向單位領導舉報。于是那個愛說球毛的人被打成右派，送入監獄。到了秋季，單位沒完成打右派的指標，還缺一個。于是領導想，那個能揣度出球毛的褻瀆含義的人，其內心也够褻瀆的了。于是該反右積極分子也被送進監獄，與那個因愛說球毛而被他指控為右派的人共處一牢房。面對著床鋪上的許多球毛，兩人誰都不敢再說球毛一詞。必須說及這個詞的時候，兩人都諱之為“金曲連兒”——金色的彎彎曲曲的小東西。

陳 更

---

我的童年 張耀杰

我的父親和母親，都是 1949 年之後的第一屆師範畢業生。母親是家鄉禹州城裏的大家閨秀。她的二哥曾任職于國民政府，當年是有資格坐飛機去臺灣的，為了照顧數十口親眷，選擇留在大陸。三反五反中，在東北某大學副校長任上被鎮壓，與後來的儲安平一樣不知所終。

父親師範畢業後任小學校長，一直是工作積極分子，反右時曾把一名據說是有作風問題

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 1962 年的下放運動中，他自己遭到報應，妻子兒女與他一起被趕到鄉下務農。從此饑餓像沒有盡頭的噩夢，伴隨我整個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黃不接時，放學回家找不到食物，我只好用賊手到鹹菜缸裏偷大頭菜充饑，並因此挨了一頓毒打。我的瞎了雙眼的奶奶，去世之前總在重複一句話：“等我死後，每個周年給我燒一塊刀頭肉，就一年不饑了。”

我小時候愛說一些不討人喜歡的話，因此經常在家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哭喊。住在同一個院落裏的三伯母說我是“買官兒”，是父親“拉賣煤”時揀來的。“拉賣煤”是一種很缺德的營生，就是把當地煤窑挖出來的煤炭，摻合上發電廠洗出的細煤碴，用架子車拉到東部平原當煤炭賣，從不能夠分辨煤炭質量的當地人手中騙取一些不義之財。每到冬天，村裏的壯勞力就成群結隊去“拉賣煤”，然後用騙來的錢買菜割肉過年。

1971 年春天，剛剛 6 歲的我與哥哥一起進入村辦小學春季班讀書。第一堂課是“毛主席萬歲，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學回家，我興高采烈地詢問父親什麼叫接班人。父親的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話茬說：“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話音沒落，一記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臉上。暈頭轉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親和當紅衛兵、紅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敵愾的眼光。改名為張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臉的殺伐之氣。有了這一次的遭遇，我開始對《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之類歌曲深惡痛絕。

認識幾個字之後，我便于饑寒交迫中自己動手找書讀。其原動力只是父親反復強調的一句老實話：“不好好讀書，長大連媳婦也討不上。”我們村是一個相對貧窮落後的光棍村。村裏一位外號老虎仇的老光棍，因討不上媳婦，在自己的寡母面前總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臉凶相，却偏偏喜歡逗我玩耍。我曾經夢想自己考上大學當上官，不單自己擁有漂亮女人，還能替老虎仇娶來一房媳婦。

---

補白：在土改中，女人也是財富。除了沒收地主富農的一切財富之外，還沒收他們的女人。我的一位本家，也是被鬥戶，有二個待字閨中的女兒，這可饞壞了一些工作組成員和翻身戶中的老光棍。一位劉姓長工老光棍，提出應該把富戶的閨女配給貧雇農，並聲言，他是雇農，更應優先。他想把我本家的姑娘弄到手。為了達到目的，他在村裏顯得特別積極，各項活動都帶頭參加。但他無文化，無靠山，又無手段和能力，在村裏翻不起大浪，成不了氣候，人們對他都很反感。不久，村裏的頭頭和外來工作組便以搬石頭(為運動掃清障礙)為名，把他推上臺批鬥。挨了兩頓打罵之後，劉長工老實了，不再打富戶女兒的主意，並從此退出鄉村政治舞臺。劉光棍的被鬥，其實另有原因——我本家的女兒早已被村基幹民兵惦記上了，同時也被住村工作隊的一個有權勢的成員看中了。他們不敢說配給自己，但同樣是趁火打劫。就在我的這位本家即將被鬥時，村貧協主任去他家說媒了。與其是說媒，不如說是逼婚。本家的兩個女兒日夜啼哭，哭了幾日，最終還是沒有逃出勝利者的手心，成了他們的戰利品。

網 文

---

一個以山作墓的刑滿右派 陳 更

李黽儒，河南西峽人氏。熱愛文學，膽怯而口吃，在西峽縣某鄉糧管所供職。五七年春天，因為說錯一句話，被劃成右派，判了三年徒刑。刑滿釋放後，帶著被子回到糧所，同事們像趕牲口一樣趕他出去。他只好攜帶被子回家，沒想到父母親也不讓他進門，斥罵他說：

“咱們祖祖輩輩可都是貧農，怎麼出了你這個右派？”李黽儒面色煞白，想做解釋，但啥也說不出來。李黽儒又耷拉著腦袋到鄰居家詢問妻子的情况，鄰居告訴他：“你一入獄，你媳婦就回娘家了。”李黽儒抬頭看天，無處可去，只好滿懷慚愧到岳父家尋找妻子。已經正晌午了，岳丈家正在用餐，李黽儒餓得厲害，向妻子討些飯，就著勺子喝起來。岳母奪過勺子，將飯倒在狗盆，罵道：“右派，休來找我女兒麻煩！”李黽儒遭到這樣一連串打擊，痛苦萬分，眼睛直呆呆的，一搖一晃，返回東山的來路。

東山是孩子們放牛砍柴的地方。有一天，放牛兒童突然發現山邊的洞窟被石頭填了起來，而且有人用泥巴從裏邊抹起來，從外往裏什麼也看不到。孩子們感到好奇，決定扒開石塊探個究竟。外邊的陽光照進洞裏，孩子們嚇了一跳：洞中一具尸體，尸旁一堆灰燼，灰燼邊扔著幾片紅薯皮，是那人死前吃剩下的。

孩子們趕緊把這情况告訴了村中的老人。一位老者臨場察看後推斷：“這人是經過一再思考才棄絕生路選擇死路的。洞口壘上石頭，從裏邊抹上泥巴，他是將這山當成自己的墳墓啊！”村裏人向周邊村落放出消息，求主收尸。半個月後，人們弄清楚了：那洞裏的是李黽儒的尸體。一些善心的人重新拿石頭將洞口壘砌起來，這座山就成了李黽儒的墳墓。

李黽儒有一個兒子。二十年之後，他的這個兒子調到西峽做縣長。聽了別人講了父親生前的悲慘故事，心有所動，帶著紙酒到東山祭奠父親。縣長內心悲慟，焚香酹酒，望山膜拜，安慰父親說：“要感謝黨的恩情啊，現在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

話還沒說了，只聽山頂上傳來撲查撲查的聲音，好像鬼嚇得亂栽跟頭。縣長又將此話敘述一邊，山頭上傳來更為瘡人的聲音。這位縣長似乎明白了，他的父親生前受的精神刺激太大，以致于聽到“右”字就害怕極了，根本分不出語意好壞。縣長流著眼淚，把縣政府地名辦公室的負責人叫到面前，吩咐說：“把這座山的名字改為墓山，以警醒後人！”

據說，後來李黽儒的鬼在這一帶不斷出現。西峽縣的人都知道，這鬼聞“右”喪膽，鬼的害怕反過來又導致經行者的驚懼。因此，人們從墓山經過，右、友、有、又等字都不敢說。如果不慎說出這些字，就能聽到十分怕人的鬼的聲音。

補白：我曾經是被批鬥的黑五類，但我知道自己今天沒有資格僅僅扮演一個控訴者。1994年，我第一次通讀《聖經》之後，一個從未有過的自問在心中盤桓：“1966年8月4日我成為被打的學生，是因為別人讓我打人我不打，結果成了被打的，還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夥去革命，人家說我不夠資格，而後成為被打的？”憑良心說，是因為後者。在那個時代，十五歲的我，沒有自主選擇打人與不打人的權利。如果出生在紅五類家庭，所做的與我的紅五類同學不會有什麼兩樣。誰把我們美麗的青春之花撕碎在紅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長的血泊裏？2001年夏天，在美國紐約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討會上，我以《文革與人生》為題做短講：“從那時（紅八月）直到後來的歲月，我們都想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經歷了些什麼？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時代人的心靈與生命中產生了哪些作用和影響？我們有責任如實回憶，翔實記錄，誠實懺悔。” 張 敏

---

## 國民黨軍官李植榮之死 陳世忠

李植榮，河北順義人，被國民黨軍隊抓丁入伍。後當上排長，隨傅作義起義，接受改編，不久復員回家。1957年，李植榮被打成右派，成了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剛剛結婚6天，即被逮捕，判刑10年。他認為自己響應黨的號召提意見，不應該算犯罪，于是上訴。那時，上訴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撤銷原判，改判15年徒刑，發配黑龍江勞改。

李植榮幻想著通過刻苦勞動獲得減刑，以便早日回家與苦等他的妻子胡鳳蘭和從未見面的兒子小早團聚。已經熬過 13 個年頭，滿刑在望，李植榮勞動的勁頭更足了。1969 年 4 月，我們中隊 130 名犯人在兩名勞改隊長和 3 名解放軍的押解下，來到勞動現場執行打草任務。每個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額是 300 斤。李植榮一上午就打了 415 斤草，名列全隊第二，僅次于打了 435 斤的李樹文。午飯後，李植榮一面磨鐮刀，一面笑著對李樹文說，要爭取超過他。

打草是有固定範圍的，以紅旗標示邊界（警戒綫），不能出綫。兩杆紅旗之間的距離是 300-500 米。下午，幹了一小時左右，戰士馬洪才從哨位上走過來，指著一堆草，問是誰打的。正在彎腰打草的李植榮不敢回答。馬洪才又問一遍，李植榮不得不回答說：“報告隊長，是我打的。”馬洪才說：“你出了警戒綫，知道嗎？”越出警戒綫是嚴重的錯誤，要受批鬥、受處罰。李植榮指了指兩端的紅旗，意思是說他並沒有出警戒綫。馬洪才大為不滿，命令李朝前走。李植榮只得說軟話：“報告隊長，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軍的話他又不肯不服從，於是放下鐮刀，乖乖朝前走了幾步。這樣一來，如果他本來沒出警戒綫，現在也站在警戒綫外了；如果他原本出了警戒綫，現在離警戒綫就更遠了。

通常情況下，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許多越出警戒綫的犯人，也都只是被罰站原地半小時到一小時，然後命令他們回去繼續幹活。當天，在李植榮之前，已有三四名犯人打草越警戒綫而被罰站在那裏，然後回來繼續打草，可是這次的李植榮卻沒有那麼幸運。

解放軍的代理班長王忠全巡邏到了李植榮罰站的地方。王說：“你出了警戒綫知道嗎？”李植榮說：“報告隊長，我下次注意。”“你們隊長沒有說不準出警戒綫嗎？”“隊長說了。”“都隨便出警戒綫，要紅旗有什麼用？”“我下次注意。”“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李植榮。”“你犯什麼罪？”“歷史反革命。”“你過去是幹什麼的？”“我是國民黨軍的排長。”“殺過人沒有？”“殺過。”

對話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榮轉身朝前走。李向前走了幾步，王還嫌不夠；又喊再朝前走，李又服從了。重複好幾次，李離警戒綫越來越遠了。王忠全對旁邊的馬洪才說：“開槍打！”馬奉命拉上槍栓，準備射擊。李植榮是軍人出身，聽到槍栓聲，覺得不對，急忙轉過身來，可是子彈已經打中他的腹部，應聲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對馬洪才說：“再開一槍，再開一槍。”慌亂中，子彈掉落在草地裏，馬蹲在地上找到子彈，然後再上膛，朝天開了第二槍。

兩聲槍響驚動了正在草堆裏休息的勞改隊李隊長。李趕到現場，看到被擊中腹部躺在地上的李植榮，便問怎麼回事。王和他嘀咕了幾句，接著他就命令犯人大組長劉德元在離草堆不遠的地方集合犯人隊伍。這期間，李隊長走到李植榮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說了幾句話，然後按王的說法，向全體犯人宣布：“犯人李植榮，非法越過警戒綫。經鳴槍警告不聽，被我解放軍當場擊斃。現在收工回去！”這時李植榮又掙扎著跪起來一條腿，但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馬洪才等帶領犯人隊伍回監舍，留下李隊長和戰士趙明貴看守現場。這期間，受傷的李植榮沒有得到任何搶救。王、馬步行好幾裏路，押送犯人隊伍回到監舍，然後向上級彙報，再由上級派人趕到現場。李植榮仍然還沒死，與趕到現場的排長劉繼賢有對話。這時仍然沒有任何企圖採取任何措施搶救李植榮。在一名犯人用牛車拉回的半路上，李植榮才斷了氣。該犯人將他草草埋葬。事後，按照“犯人企圖越獄逃跑，經鳴槍警告不聽，被解放軍當場擊斃”的結論，通知李植榮的家屬。向各分場犯人傳達時，也都說是嫩江農場七分場有個犯人企圖越獄，跑出警戒綫七十米以外。解放軍鳴槍警告，他不聽，繼續逃跑，不得已開槍將他當場擊斃。

（編者曰：不信神的族類當然可以由著性子撒著歡兒地侮辱、蹂躪、嫁禍于任何有嘴但無話語權的弱者、衰人！中國人的一切罪惡和苦難皆源于心中沒有上帝。）

李植榮的生命被剝奪了，還被扣上企圖越獄逃跑而被擊斃的反革命的帽子，僅結婚 6

天的妻子胡鳳蘭和從未見過父親的小早則背了幾十年反革命分子家屬的黑鍋，無法抬頭做人。

補白：在市郊某村，當地革命群眾為營造出“天是毛澤東思想的天，地是毛澤東思想的地”、“要讓毛澤東思想占領一切陣地”的大好形勢，在水稻田裏遍插畫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畫像或寫有偉大領袖毛主席語錄的大牌子。當時正是禾苗追肥的季節，化肥少，基本還是用人畜糞便作肥料。這一天，社員錢 X 富想進城辦點事，天不亮就起了床，挑幾擔糞便，到生產隊長指定的幾塊田裏去潑肥。中午等他從城裏回來，遠遠看見田頭上站滿了人，有人還對著他施過肥的田塊拍照。他好奇地湊上去往田裏一看，不禁倒抽了口冷氣：那些立在田中的畫像牌和語錄牌上，粘滿了一團團糞便和經紙。這是有人發現了他，立即叫了一聲：“就是他幹的！”專案組人員一擁而上，將一副冰冷的手銬帶到他手上。錢 X 富雖然也犯了反革命大罪，但因出身三代貧農，被從輕判處三年徒刑。服刑期間，他因多次檢舉其他罪犯撕爛印有偉大領袖畫像、語錄的報紙當捲烟紙用，有立功表現，被減刑半年。 史海

—————

同學閔志强 曉 寒

閔志强和我是孩提時代的朋友。從小學到初中，我倆一直是同學、玩伴、近鄰。當時我們兩家都住在解放街，隔青年路相望，拿杭州話說是“一炮仗”的距離。每天早上，我背著書包到他家門口，叫上他一起去上學。到井亭橋右轉彎，沿浣紗河一直朝北，走到學士路，就是我們的五愛小學了。那時，浣紗河綠柳拂岸，碧波蕩漾。放學回家的路上，我們自由自在地沿河游玩。路邊有很多玩雜耍、變魔術、唱小熱昏的賣藝人。我們常常站著看，盡情盡興，忘了回家，花一兩個小時在放學路上是常有的事。那時志强是“小開”，我的家境也不錯，口袋裏總有幾個零用錢。我們互相“請客”，今天買油兜兒，明天買鹵豆腐乾。那時一分錢都可以解解饞。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到志强家門口叫他，好長時間他都沒出來，我便跑進店裏去。他家是前店後屋，住宿在樓上。只見他爺爺一言不發，在悲憤地整理不知被誰翻得亂七八糟的店面。他母親，一個與我母親一樣常常穿旗袍的端莊女人，正坐在屋裏一張小凳子上哭泣。志强茫然地站在母親她身邊。看到我進門，他母親擦了擦眼睛，拉過志强的手說：“去吧，小朋友來叫你啦，讀書不好遲到的！”我們并肩穿過店堂時，我看了看他爺爺怒氣未消的臉色，第一次沒喊“阿爹再會”就匆匆離去。

那天放學，我們各自早早回家。走過志强家門口，覺得比往日冷清了不少。他家門口的大人們戳戳點點，一片肅殺氣氛。原來他父親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被公安局抓走了，家也被抄了。再後來聽說他父親是什麼托派，死在監獄裏。隨著家庭變故，志强的歡笑一天比一天少。沒出三年，我的父親也在下一個運動中被打成右派，一個從不問政治的醫學專家也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還好，沒送進監獄，而是交群眾管制。我們都成了階級鬥爭的犧牲品，被劃入黑五類子女，兩個同學的歡樂童年被紅色恐怖摧毀了。

由于家道中落，志强沒讀到初中畢業就輟學了。他在青年路的一條巷口擺了個小書攤。有一次我路過，他還熱情地招呼我過去看書。志强一個大小夥子，守著這麼一個破爛小書攤。我雖然還算幸運，能繼續升學，却無力幫助背負生活重擔的同齡人，想來真是感到難過。我不忍心再看到志强，有意回避他的書攤。後來我下鄉、支邊，歷盡艱辛，想見也見不著了。就這樣足足 20 多年，再沒與昔日的好朋友見過面。有時想起志强，不禁自問：“一分錢看



一本”的生意是怎樣支撐著志強的生活，伴他捱過那段苦難的歲月？80 年代初我們重新見面時，想不到兩人只有這麼簡短的對白：“別提它了好不？一切都過去了。”“唉，一言難盡啊！”

補白：劉文輝，江蘇省無錫人，因父被誣為歷史反革命而輟學，到上海浦東造船廠當學徒工。57 年整風，因批評中共廠委書記腐敗，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開除團籍，留廠察看 2 年。58 年旁聽判決父親為歷史反革命時，想到父親因愛共愛國而拒絕去臺灣，氣憤難平，與法官爭辯，遂以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黨的領導的罪名被補為右派分子。62 年，主動下放浙江舟山嵎泗修船廠，找尋偷渡出境機會。64 年因偷渡出境計劃被告發，開除廠籍，定為反革命分子，押回上海市街道監督勞動改造。文革開始，因父子都是反革命，連續被抄家 5 次。對毛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寫下萬言書《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複寫 14 份，由弟弟劉文忠帶往杭州分別寄給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大學。一個月後，兄弟同時被捕。1967 年，配合上海市革委會成立，經張春橋、馬天水等批准，劉文輝於 3 月 23 日被公開槍殺，年僅 30 歲，其弟劉文忠被判 13 年徒刑。

五一三

劉光應寫反詩 陳宗培

1970 年深秋的一個早晨，奉節縣朱衣公社機關、中心小學和朱衣區供銷社、區糧站的大門外，都貼有一張用歌謠形式寫的傳單。第一行是“最高指示?? 換新天，扭乾坤”。開頭幾句是：“毬字彎裏去了炎，王字頭上把點添，八人同坐圍一席，說話一句頂萬句。雙木同長視誰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時時高舉紅寶書，真是無毒不丈夫。”這是兩個字謎，即毛主席和林彪。中間幾句記不全了，好像有這樣幾句：“大紅太陽當空照，曬乾水田曬枯苗。滅資興無割尾巴，沒糧下鍋看吃啥。早請示來晚彙報，抱著‘忠’字把舞跳。萬歲萬歲萬萬歲，永遠健康緊跟隨。鬥天鬥地鬥爹媽，夫妻怕說知心話。學校停課鬧革命，小將開口就‘勒令’。”全文都是譏諷毛主席、林彪把國家搞亂了。末尾幾句是：“要問此曲誰人寫？朱衣農中魯國彬。家住何地啥地名？舉目望見單樓村。”

朱衣公社武裝部長陳部長立即向縣公檢法軍管小組報案。陳部長認為，作案人已暴露無餘，現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朱衣農中學生曾國林。第一，曾國林與魯國彬字形相近。第二，他家住雙樓四隊，與單樓村相對應。第三，他是地主的兒子，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懷有階級仇恨。陳部長拿著傳單到雙樓四隊偵查核實，沒想到幾個黨員和積極分子都否定了他的意見。大家認為：第一，曾國林沒有這麼傻；第二，字迹很像生產隊會計劉光應的；第三，劉家與曾家有仇，劉光應想借刀殺人，陷害曾家。陳部長接受了他們的意見。

第二天，縣公安局王局長帶著刑偵組來了。王局長聽了陳部長的彙報後，十分斷然地說：“只有受過管、關、鬥的階級敵人才會這樣反動。劉光應是貧農，不會對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說，我剛才用舌頭舔了一下傳單，是用熟洋芋粘貼的，還帶有鹽味。現在食鹽是憑票供應，哪家農民捨得在洋芋裏放鹽？偵破範圍只能鎖定在區、社所屬單位的階級敵人。”經詢問，王局長決定把區供銷社和公社中心小學的歷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為重點排查對象。但是，經過核對筆迹，誘供逼供，毫無所獲。王局長只得根據陳部長的意見抓劉光應，劉光應當場就招供了，最後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九年徒刑。

補白：李 X 燦十八歲就讀一所中專時，正逢三年大饑荒。一米八個頭的他，每餐吃一個小燉罐，有如老虎吞蒼蠅，饑餓難當。一段時間裏，學校食堂不時發生病號剩飯半夜被盜，屢查無果。有天半夜，老師巡夜，抓到李 X 燦躲在蚊帳裏，抱著飯罐狼吞虎咽。學校當即就把李 X 燦送到派出所，想讓他領個教訓。結果，第二天事情發生了質變化。原來那天食堂炊事員起來做飯時，發現飯廳裏供奉的那尊偉大領袖座像摔破在地下。文革時，各單位規定，所有進食堂就餐人員用餐前，必須到偉大領袖像前高呼三聲“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該校食堂原先在牆上貼了一張領袖畫像，供師生們祝禱。後來有人別出心裁地在飯廳中間擺放一張桌子，供上一尊領袖的石膏像，讓師生成群星拱月狀，圍繞座像祝禱。這既體現了革命師生緊密團結在偉大領袖的身旁，也增加了視覺的審美效果。領袖像被打破，校革委會立刻宣布，這是一起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報到市人保組。關在派出所的李 X 燦，順理成章地成了一號嫌疑人。經過審案人員的一番審問，李 X 燦供認了自己摸黑進食堂時撞倒了桌子的事實。李 X 燦被判勞教兩年。在勞教期間，又因經常偷竊農場瓜果等裹腹充饑，被延長勞教一年。改革開放後，他去了香港，後又定居美國。事業有成回大陸在老家蓋了一座大房子，吩咐家人，遇有饑餓者，請進來免費吃個飽，以永記饑餓的痛苦和“饑寒起盜心”的古訓。

史 海

針扎毛眼風波 高洪明

1970年初春，我從機務排貶到農工排當農工戰士。這個班共有12個知青，大家同吃同住同勞動，相處得很好很團結。連隊有電燈，但經常晚間停電，所以我們差不多每人都有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小柴油燈。當年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訂有《人民日報》。我的鋪靠牆，靠我的是小L，靠小L的是小P。牆面發潮，有時掉土，我用舊報紙糊了半截牆。那天晚上又停電了，我點上油燈，靠著被褥看書。靠我睡的小L湊過來對我說：“老哥，借你個光補補襪子。”“補吧，省得點倆燈噎人。”我頭沒抬。小L盤腿靠牆，坐我邊上補起襪子。一屋子人，各幹各的，說說笑笑，很快活。當時沒手錶，也不知幾點了。這時班長從外邊回來了，說明天還出工，趕緊睡覺吧。于是大家就寢。

早上7點敲鐘，班長已打來熱水，大家你洗臉，他刷牙，各自忙活。小P眼尖，一邊用毛巾擦臉，一邊指著我這邊的牆壁說：“誰把針扎在這兒啦？”屋裏無人搭腔。一會兒小L倒洗臉水回來了，小P又指著牆壁問：“小L，這針是不是你扎這兒的？”小L滿不在乎地說：“我扎的，怎麼啦？扎這兒礙你哪根筋疼啦？”小P一聽勃然大怒，高聲喝道：“好大膽子，你敢拿針扎毛主席的眼睛！”小L也不示弱，梗著脖子反問道：“哪個孫子拿針扎毛主席的眼睛，你別誣陷好人！”小P一個箭步邁到火炕上，指著牆壁上扎著的一根針大聲喊著：“小L，你小子別不認賬，你好好瞧瞧，你的針是不是扎毛主席的眼睛啦？”小L一看傻眼啦，馬上泄氣七分，小聲說：“針是我扎的，但我不是故意的。”這時小P士氣大增，招著手說：“你們幾個過來，看看是不是小L拿針扎毛主席的眼睛啦？”

大家圍過來一看，都明白了。原來，牆壁糊的報紙上有一張毛主席接見外賓的照片，小L的針正巧扎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我問小L這是怎麼回事，小L囁嚅著說：“昨晚班長喊睡覺，我怕針扎著別人，就順手把針插牆上了，誰知道稀裏糊塗地把針插在毛主席的照片上了。”我趕緊打圓場說：“小L不是故意的，我糊報紙時注意點兒就好了。”這時班長一本正經地對小L說：“你平常吊二郎當，天天讀毛選也不認真，別人都不像你那樣，你好好想想吧！”

傍晚收工吃完晚飯，大家像往常一樣在屋裏各幹各的事。我以為小L的事過去了，還

是看我的書。只見小 L 坐在被褥上，一隻手托著下巴，心事重重的在想著什麼。一會兒班長進來，把小 P 叫出了去。過了一會兒小 P 回來了。一會兒班長又進來，把我叫出去。在宿舍過道上，班長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小 L 的事我已經向指導員彙報了。指導員很重視這件事，他要求班裏對小 L 批判幫助一下。你是毛著學習積極分子，你帶一下頭怎麼樣？”我很難為情地對班長說：“小 L 這事的確不是故意的，說說他就算了，批判他怎麼批？”班長啓發式地說：“連部說批咱就批唄！不批怎麼交差？你就上網上綫地批。”

一會兒來電了，屋裏的燈大亮，班長宣布等會兒指導員就來給班裏開會，要求大家踴躍發言。不大一會兒，指導員進屋了。他是個典型的東北漢子，六五年部隊集體轉業來到北大荒，個子不太高，但很健壯，說話嗓門大，土裏土氣的東北味兒。他一進屋就盤腿坐在我這面炕上的正當間，馬上開講：“昨天小 L 的事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上網上綫說就是不三不忠于四無限的問題。每個人就這件事談談自己的認識，批判幫助一下小 L。”班長不愧是班長，他首先帶頭發言：“小 L 的事是個很嚴重的問題。由于他平時不認真學習，特別不認真學習毛選，從而對毛主席缺乏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所以才發生了拿針扎毛主席眼睛的事情。我希望他能深挖思想根源，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徹底改正錯誤。”

班長話音剛落，小 P 搶先發言：“小 L 的錯誤是我最先發現的。我當時就指出了小 L 的錯誤，但他那時不認賬，還罵了我，這是他錯上加錯。我不要求小 L 向我賠禮道歉，但他必須向毛主席賠禮道歉！”冷場一會兒，指導員開始動員啓發：“小 L 的錯誤錯在哪兒，根源在哪里？說多說少是能力問題，說不說是立場問題，希望每個人都談一談。”副班長接著指導員的話茬兒發了言：“我看小 L 的事不是個小錯誤，而是個大錯誤，他敢用針扎毛主席的眼睛，他還能對毛主席有無產階級感情嗎？還能誓死保衛毛主席嗎？我看他必須深刻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才行。”小 L 聽了副班長的發言，心裏不服委屈，但不敢發言，只是嘟嘟囔囔小聲說：“誰拿針扎毛主席的眼睛啦？我也不是故意拿針扎的報紙，當時屋裏黑我沒看見。”指導員厲聲制止了小 L 的嘟囔：“小 L 注意你的態度，犯了錯誤還不讓人說，你老實聽別人的發言！”

此時我也不得不發言了，儘管我和小 L 是北京老鄉，他又是挨著我睡覺，但班長事先已經囑咐了我要我發言，我只好硬著頭皮說：“小 L 的確不認真學習毛選，他的錯誤不好說他是對毛主席沒有階級感情的問題，但他做事馬馬虎虎的確實是個大問題。他是城市貧民出身，對毛主席還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看我們還是要批判幫助他，別一棒子把他打死。”我發言後有些後悔，我辜負了班長對我的囑咐，發言有點輕描淡寫。指導員語重心長地發話了：“今天批判幫助小 L 不要留情面，要上網上綫。”在指導員動員下，班裏其他幾個人也都先後發了言。我認真聽了他們每個人的發言，心裏想，大家都和我差不多，誰也沒有能够上網上綫地批判幫助小 L。如果真的那樣，那麼他豈不成了階級敵人了。最後指導員說：“現在讓小 L 檢討自己的錯誤，要求大家認真地批判地聽。你們有什麼看法，底下找我談，今晚不做結論。”

小 L 本來坐在炕沿邊，他慢慢站起來，低著個頭，哭喪著臉，哭腔檢討：“我的確不認真學習毛選，對毛主席的階級感情沒有同志們深，但我是熱愛毛主席的，是堅決跟毛主席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針扎在報紙上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針扎毛主席眼睛的，我真的是稀裏糊塗、黑燈瞎火地把針扎在報紙上了。請指導員和全班同志原諒我的錯誤，我一定痛改前非，認真學習，認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向毛主席請罪了！我求求指導員了，求求全班同志們了！”說著他嗚咽地抽泣著。我很同情他，他才 17 歲呀！指導員見狀可能也動了惻隱之心，遂用嚴肅但并不嚴厲的口氣說：“小 L 今天的檢討有一定的深度，但還應當深挖犯錯誤的思想根源，還要進一步檢討錯誤，改正錯誤要做脫胎換骨的改造才行。今天會議就開到這兒吧，大家早點兒睡覺吧，明天還出工呢！”指導員走後，全班人沒有一個像平日那樣說說笑笑。大家心情都顯得有點鬱悶沉重，各自洗臉洗腳，不一會兒都鋪被子躺下了，

班長拉燈也睡了。我沒有睡好，一直迷糊到天亮。

幾天過去了，班裏沒有再開小 L 的批判幫助會，指導員也沒有再來班裏，班長也沒有再提及此事，小 P 也沒有對小 L 罵他的事不依不饒。這件可大可小的事情總算過去了，幸虧沒有什麼人非要搞什麼上綱上綫不可，到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小 L 慢慢開始有笑容了。這件事過去 40 年了，寫出來讓人們聽一聽，也好讓年輕人瞭解一點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是什麼樣的社會氣氛。

---

補白：在 1968 年送往下汪大隊的勞改犯中，與毛主席有關的就有 20 來起。有人說領子與袖口最髒，叫老婆洗乾淨一些。領與袖合在一起就是領袖，中國人的領袖就是毛主席，說領袖最髒，實屬惡毒污蔑，判刑 3 年。兩個青年到公園裏談戀愛，公園的石凳很髒，就拿了一張報紙墊在屁股下麵。不料報紙上印著毛澤東頭像，男女各判徒刑 3 年。一位農村的馬大哈，因為偷懶，把炒好的菜連鍋端到桌上，臨時找了張報紙墊在下麵。不料報紙上印有毛的頭像。這一放，毛像面目全非，判刑 4 年。還有兩例，由于在火災中搶救了毛的畫像，證明對毛懷有無比崇敬的心情，于是一名提前釋放，一名減刑兩年。沈不沉

---

與黑五類相關的幾個政治術語 李若建

本人成分：指本人參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會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獨立經濟地位前或參加工作前的家庭階級成份。家庭出身可以追溯到土改前的家庭成分，並且隨血緣向下傳遞。《出身論》作者遇羅克如此界定成分和出身：“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兒子的出身。”遇羅克定義的關鍵在於想切斷出身與成分之間的紐帶，借此打破當年制度設計中的潛在意圖。

管制：中國大陸創造的一種刑罰，對犯罪分子不予關押，在公安機關管束和民衆監督下進行勞動，用於處理最輕度的犯罪或者被認定有罪者。當時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規定，對被管制分子應剝奪下列政治權利：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擔任國家機關行政職務之權；參加人民武裝與人民團體之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居住、遷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權；享受人民榮譽之權。

何人被管制，管制時間多長，理論上（按有關法律）由人民法院判決，由公安機關執行。但是實際上有些基層幹部濫用職權，私自管制他人。大躍進時期不少基層成立“學好隊”，隨意關押不服的民衆，強迫勞動。被管制者的數量相當龐大，沒有全國性資料，只能就局部資料來說明。四川省綿陽縣 1952 年被管制人口占總人口 2.9%，有的公社、大隊和下鄉幹部就可決定將一部分人管制起來，有些地方將一些四類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來。河北定縣 1972 年 4 月統計，全縣有五類分子 7750 人，到當年 12 月猛增到 1.25 萬人。有一個農民，1961 年被認為參與盜竊，判處管制 5 年，宣判時因病未到庭，既沒有審理，也沒有宣判，以後再未處理。1973 年清理專政對象時，發現他曾經被判管制，于是在群眾中宣布。宣布後，此農民不服，提出申訴。1975 年，縣公安局以鬧翻案為由，下達戴帽通知書，並告知按原判管制執行。

監督勞動：雖然沒有被管制，或者已經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衆和基層幹部的監督下從事勞動改造。誰有權對人處以監督勞動，沒有明文規定。這是一個法律上的盲區，然而實際上這個權力操縱在基層幹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語化的政治名詞，雖然經常出現在官方文獻當中，但是筆者從未見過官方定義。根據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異己者，比如四類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叛亂分子等；戴帽就是被貼上政治異己者的標籤（然而誰有權給人戴帽子，沒有明文規定，也是一個法律上的盲區）；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異己者的標籤。誰有權給人戴帽，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權力却是比較明確的，一般基層無權給人摘帽。儘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種標

簽，比如 1979 年以前的摘帽右派，其社會地位高于沒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還無法真正成為普通民衆。

根據上述定義，四類分子可分兩大類：一類是由于本人成分而成為某類分子的，如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這些人的後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富農，並且往後傳遞）；另一類是由于自己的行為而成為某類分子的，屬於這種情況的有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這些人可以是貧下中農，也可以是地主、富農或者其他成分）。從法理的角度講，本人成分并不等于“分子”。嚴格意義上說，四類分子是那些被管制的人，至少要監督勞動的人才够格，但是實際上大多數本人成分是地主、富農的人，或者曾經是反革命的人，儘管沒有管制，也不處於監督勞動狀態，依然被視為四類分子。焦國標書

右派大校蔡鐵根 方影竹

???? 蔡鐵根，曾用名蔡委心、蔡澤生，1911 年 12 月生于河北省蔚縣塔頭村，曾就學于廈門大學。1936 年 12 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9 年入黨。曾任 115 師政治部宣傳幹事，冀熱察挺進軍第九團政治處副主任，解放軍華北軍區軍政大學第一總隊副總隊長。1949 年以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條令處處長，條令局副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教範處處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1955 年被授予大校軍銜。1959 年被劃為右派，1970 年被處死，是反右、文革中被整肅軍人中軍階最高的一個。有人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却是被拉出去槍斃的。

我與蔡鐵根有兩面之緣。第一次是近距離的交談。1949 年 3 月我入華北軍大學習。蔡鐵根是該校青年總隊（從剛解放的北平招收的青年學生）的首長。有一次，蔡鐵根來我所在的中隊講話。休息時，他站在中隊門廊和我們這些小青年閑談。他穿灰色粗布軍裝，還不及我們的綠軍裝平展。他口才很好，平易近人。記得他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中國要是有一百個毛澤東思想，革命就要早成功好多年。”當時他 38 歲，我 17 歲，我不覺得他是總隊長，只覺得他是長輩和老師。他說這句話時，神情專注，目光炯炯，這句話便釘在了我的心上。

不久，再次見到他。那是一次有歷史意義的場合——全總隊集合在大操場上，聽解放軍總司令員朱德動員解放臺灣的講話。蔡鐵根是主持人，在大會的開始和結束都講了話。他接著朱德話茬，教育我們要堅定地跟共產黨走。在談到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時，他走到台前邊沿說：“我們在國統區時候，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那還得了！”我斷定，他一定自身經歷過白色恐怖，才有那樣的神態。但他沒料到後半生歷史對他的捉弄：他逃脫了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却不能逃脫 10 年後的反右恐怖，再過 11 年竟死于紅色恐怖。

當時我感到他在朱德面前侃侃而談，太放肆了。後來才知道，他和朱德是老熟人，還給解放軍副總司令員彭德懷當過秘書，也是劉伯承的愛將。

第二年，蔡鐵根陪同朱德、劉伯承在北京郊區大巡察，旨在找塊合適的地方，辦一所最高軍事學院。這所學校最後選址在南京，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點名要去了蔡鐵根。????

1958 年毛澤東為整肅彭德懷，發動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作為軍事學院首長，含泪登臺檢討。劉帥挨批，作為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的蔡鐵根也逃不掉。他當然可以好好檢討一番，蒙混過關，許多“老運動員”正是這樣成為不倒翁的，但蔡鐵根甘當異類。有人批判他參與編寫的“共同條令”是教條主義產物，他說：“共同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准的……”話未說完，一夥人擁上來，連轟帶扭，高呼“大右派”，當場扒下他的帽徽領章，帶出會場，關押起來。1959 年 4 月，他被明令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軍籍，下放江蘇常州。??

剛到常州，適逢國民黨叫喊反攻大陸。他說怕什麼，大不了上山打游擊。他還給一個叫巢爾穀的人寫過 19 封信。文革一來，巢爾谷賣友求榮，把信交了出來。紅衛兵抄了蔡的家，掠走了他 40 多本日記。信和日記的內容自然成了反革命罪證。他交友是搞反革命組織活動，談打游擊對付國民黨成為要成立反革命游擊隊推翻共產黨政權，與巢爾谷曾同游常州名勝善卷洞是為打游擊先去察看地形。于是被捕入獄。

蔡鐵根無處申冤，便決定越獄上訪。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越獄行動。第一次是青年時代參加東北軍，在部隊開拔剿共時，他串聯 30 多個弟兄，準備携槍投共，不料事機泄露，被捕入獄。他趁風雪夜隻身脫逃，幾經周折，找到紅軍。第二次是七七事變後，他赤手空拳，成功策反一支土匪武裝，又因部隊叛變，身陷日寇之手。他在獄中飽受酷刑，却以凜然氣節折服難友，組織暴動，逃出魔窟歸隊。這第三次的越獄設想暴露了他的天真。捕回後，手銬之外，還砸上了腳鐐！

1970 年 3 月 11 日凌晨，常州西門外一處公墓空地上，響起沉悶的槍聲，蔡鐵根高大的身軀應聲倒地。朱德、彭德懷、劉伯承三個元帥的愛將，越獄、越獄、再越獄的傳奇英雄，喪命于他為之效命的政權之手。後來平反昭雪，開追悼會，骨灰入八寶山。蔡鐵根的日記，聽說現在保存在他孩子的手中。那裏面定有珍貴史料和真知灼見。如果說在今天恐懼未除的環境中不便公開，我相信終會有與世人見面的一天。????

---

補白：林 X 媛大姐是工廠一名技術人員，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單位每次大型活動，標語橫幅都出自她手。這天一大早，她剛起床，就被緊急叫到單位布置會場，說上午要召開學毛選經驗交流大會。她到單位三下五除二把一應標語橫幅搞定，就回家吃飯去了。吃完飯她捧著紅寶書正要跨出家門，迎面撞上在單位支左的解放軍帶領幾個紅衛兵向她撲來。他們揪著她的頭髮，別過她的雙手，以當時最流行的噴氣式形狀把她押走。任憑她怎麼喊叫、質問、爭辯，都無用。到了單位，原定的學毛選交流會已改作批鬥會，批鬥的對象就是她。小禮堂裏已站滿人，見了她都高喊“打倒現行反革分子林 X 媛！”開始林大姐沒弄明白怎麼回事，原來是自己一早寫的標語字闖下了大禍。“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面的四個字，她寫顛倒了兩個，變成“萬無壽疆”。“四個偉大”中的“偉大舵手”，她寫成“偉大蛇手”。在審查期間，這個 50 年代大學生，一個充滿才氣的女技術員，一個善良純樸的賢妻良母，尋機沖向行駛的汽車，就這樣結束了自己三十五年的生命。史 海

---

????

一對老地主 朱之泓

我們生產隊的貧下中農似乎并不仇恨地主分子保占英，對此我一直感到奇怪。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生產隊磚瓦窑上幹活時，我單獨保占英有了一次近距離的接觸。

爲了趕時間交貨，常常不等磚瓦窑完全冷却就開始出窑。新燒制的磚瓦，粗糙堅硬，火辣燙人。有時熱磚灰還會被吸進完全不設防的口鼻中，嗆得人胸腔刺疼。出窑時我一趟抱七塊磚，下邊用雙手使勁托著，上頭頂著下巴，猶如緊靠我腹部和胸前的一堵小牆。我無法低頭看脚下的路，僅能憑感覺從窑口走向摞磚場。磚灰把我的呼吸器官刺得疼痛咳嗽不止，震動得胸前那一堵磚牆搖搖欲墜。

正在摞磚的保占英看見了，緊走幾步到我面前，把磚塊分兩次接過去。雖然他默默無語，但那眼睛裏充滿著對我的關切和憐憫。這種關切和憐憫讓我驚訝，讓我好奇，也讓我警惕。休息時，保占英躲在磚垛後面避風，我也湊過去避風。這個高個兒清瘦老頭臉上老帶著笑容，絕不像小時從書本上熟知的那種面目猙獰的老地主。我很想揭開他的偽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實面貌是什麼樣子，也很想搞清楚他有著怎樣的罪惡發家史。主意拿定後，我就主動與他拉起了家常。

我問他：“你上幾輩兒也是務農的嗎？”他回答說：“就是的麼，種了幾輩子地了。”我又問他：“你們上輩人手裏土地多嗎？”他說：“上輩人手裏土地不多，窮著呢。”我笑著問他：“到你這輩子咋一下子掙了那麼多土地呢？”保占英說：“攢下一點錢捨不得吃捨不得穿，趕緊去買一點地，這土地就越來越多了嘛。”他轉而問我說：“你家裏老人都好嗎？老家在哪？”我便告訴他，我只有父親，母親早死了。我老家在河南，家裏原先很富有，後來我爺爺死了，莊稼又連續遭災，再加上瘟疫流行，在 40 天內陸續有 6 位家人去世，土地也差不多賣光了，到土改時定成中農。

我是想用這種拋磚引玉的伎倆套出他的罪惡發家史。像普通的老農一樣，他對我似乎不加防範，說話時常常出神地看著自己的脚尖，語氣淡淡的。他說自己一家平日裏捨不得吃細米白麵，只吃黑面和雜糧，省下來的錢都攢起來添置土地；捨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賣掉；捨不得買布做衣服，不論冬夏都光著身子穿氈襖。那氈襖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貼身子，裏邊也沒有襯衣可穿，風一吹透心涼；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風，還毛扎扎的，太陽一曬又熱又癢。就這樣，千方百計省下來的錢都買了土地……

據說解放前地主老財都穿老羊皮大衣，我就問保占英：“那時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嗎？”保占英回答說：“攢上幾張羊皮就趕緊賣了，誰捨得用它給自己縫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襖都是那些大戶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一個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氈襖？他的地主成分真的是靠自己勤奮和節儉掙來的嗎？後來，我裝作不經意地問隊裏的老年人，他們都說保占英是個實在人，說的都是真話。他們一家的確常年穿氈襖，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確實是自己辛苦掙來的。有些好吃懶做抽大烟的人，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折騰光）了，臨解放時家裏爛包了（破敗了），就成了貧農。

保占英有一位親戚是山西人，山西土改搞得早，那親戚看到了有錢人的下場，就將自己在山西的生意變賣，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在楊郎買了 15 畝土地。這位親戚的做法無非是一種觀望，進可以照樣做生意，後退一步可憑藉這 15 畝地維持家人的生計，哪知道很快楊郎和山西一樣也土改了。這 15 畝地無疑又給保占英增加了罪惡，因那地契上寫著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說不清，只能乖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實他們家不光吃穿條件差，連住的房子都是爛棚棚。”

楊郎公社梨家河有個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梨家河一帶的土地絕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是方志强是個敗家子，抽大烟，賭錢，將祖上留下的家業揮霍一空，最後窮得夫妻倆只有一條褲子，誰出門誰穿，土改時他家被劃爲貧農，占了一個大大的便宜。

接觸保占英的老婆是另一次偶然。那時我曾多次在別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在保占英家與他老伴兒同宿了一夜。那天晚上我只覺得有什麼蟲子在咬我，渾身奇癢難忍。我不斷地用手撓著身上被咬過的地方，煩躁地不停翻身。與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驚醒了，說：“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著吧？”聽她這一問，我惱怒地說：“啥東西嘛？快把我咬死

了！”

地主婆爬起來，她點著燈，從小針綫筐裏找出長長的一根針，是縫被子的那種長針。只見她先在牆壁上尋找那幾乎看不見的小洞眼，然後將針尖放到燈上烤熱了，朝牆壁上的小洞眼裏一扎，再快速抽出來，就見一個肥肥的小蟲子已經挑在針尖上了。地主婆說這是臭蟲，它那細小的腿還在掙扎著。老婆子再將長針放到燈火上，只聽吱的一聲，針尖上的臭蟲就成了乾癟的黑點了。如此這般，她竟然燒死了不少臭蟲。儘管這樣，我再次躺下依然睡不著。臭蟲前仆後繼來襲擊，我像烙餅子一樣，在她家土炕上翻來覆去折騰著。

地主婆沒有睡，繼續滿牆壁尋找那可惡的臭蟲，並把它們一個個燒成乾癟的黑點。她邊消滅臭蟲邊念叨說：“看把我狗娃（農村長輩對小輩的愛稱）咬得遭孽（可憐）的，看把我狗娃咬得遭孽的。”看我依然睡不著，她在捉臭蟲和燒臭蟲的同時和我拉家常，打聽著我的家庭情況。聽說我沒媽，她嘆著氣顫聲說：“你的娘母子咋沒得那麼早？唉，遭孽的，遭孽的，娃娃沒有娘母子最遭孽了。”

反正睡不著，她燒她的臭蟲，我就借著那一盞昏暗的煤油燈光，四下裏觀察，想看看這地主的家裏有什麼闊氣的擺設。我失望地發現，她家與隊裏的貧下中農們沒有任何不同，同樣是黑黢黢的土牆壁，同樣是硬邦邦的又髒又破的被子。

看著那黑烟裊裊的煤油燈，注視著那帶著滿臉歉意專心致志捉著臭蟲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複雜。這次借宿經歷之所以給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記憶，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蟲咬得我奇癢難忍，過後永遠不忘；二是她那逮臭蟲滅臭蟲的方法實在使我驚奇，我聞所未聞；三是這地主婆捉臭蟲時的目光中分明充滿著對我的疼愛，那是一種我已經久違了的母親般的眼神。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訴我：“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那麼這個老地主婆為什麼要對我表現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麼思想動機呢？我用我所看過的書面資料和我所聽過口頭資料分析著，思索著，却依然不明就裏。

幾十年後我才懂得，那不過是她身上表現出來的一種很普通的人性罷了。幾十年前我總以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便在否認這老地主婆是一個“人”的前提下，用評判“狼”的準則來看待她的言行，怎能不產生困惑呢？

2006年7月，我再次見到她時，她已經八十四歲了，滿頭銀絲，說話時頭不住地顫動著，已經患某種程度的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著看了她好幾分鐘，她也沒有認出我來，但卻熱情地一疊聲地問我：“你是哪里的親戚啥？你是那裏的親戚啥？”她邊問邊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麼吃食一個勁兒往我手邊推，再三對我說：“你吃啥，吃一點啥。”

他兒子大聲對她報出我的名字，她沒有反應。最後，她兒子再三提示說：“媽：你好好想想，她是當年在咱們這裏插隊的知識青年。”我也提示說：“我還在你們家睡過覺呢。”老太太猛然反應過來了，說：“噢，你那時候住在換兒家那個箍窑（窑洞）裏。”

認出我之後，她對我說：“我已經100歲了，盼望著早點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她兒子在一邊小聲對我糾正說：“我媽胡說呢，她才八十四歲，哪來一百歲！”叙談了一會兒後，我把她扶到院子裏給她照了一張像。告辭的時候，我又回頭看了看她，陽光下，她頭上那所剩無幾的銀絲輕輕地飄動著。哎，你這善良的地主婆，總算不用擔心挨批鬥了。

葉企孫、熊大鎮沉冤 淳于雁

葉企孫教授是清華大學理學院創始人、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楊振寧、李政道



的老師。熊大鎮是葉企孫的高足，葉本勸熊留下協助教學工作，但熊激于救國熱潮，應熟人推薦，毅然奔赴八路軍呂正操部的冀中根據地，為部隊製造炸藥軍火和無線電通訊等軍用器材，備受呂賞識，被委任為軍區的供給部部長。

後來，受熊影響以及葉教授的協助動員，平津等地又有許多知識分子前來冀中根據地投入抗日鬥爭，在熊的指導下建立兵工廠，開設醫院、學校、銀行等機構。

熊大鎮千方百計擴大製造槍支、子彈、手榴彈、地雷等彈藥的生產，源源不斷供應前線作戰和打游擊的需要。對日本侵略軍威脅最大的各種特強爆炸力地雷，就是地道戰、地雷戰中使用的那種炸藥地雷，就是經由他領導建立的技術研究社研製出來的。他們作戰使用的反坦克地雷，把日軍機械化部隊師團的坦克、裝甲車，一輛接著一輛地炸掉，并曾炸毀運送日軍及裝備的軍用列車機頭，以至于日軍司令部驚呼八路擁有了反坦克的新式武器。美國盟軍派來冀中考察的觀察組驚嘆道：“你們真有本事呀，和美國的火箭一樣啊！”

冀中根據地緊靠北平、天津、保定三個被日軍占領的大城市，有三條重要的鐵路線包圍。從軍事實力的對比來看，呂正操率領的一個團兵力是很難站住腳打游擊的。他們正是依靠神出鬼沒的地道戰、地雷戰，硬是把原來“雄赳赳，氣昂昂”的日軍打怕了，不敢輕易出動展開掃蕩，成功地鞏固了根據地，創造了軍事上的一大奇蹟。為此，晉察冀邊區司令員聶榮臻曾在唐縣北大悲村接見熊大鎮，對他的成就和貢獻予以鼓勵表揚。

就在抗戰的緊要關頭，冀中軍區的鋤奸部門突然發動一場肅反運動，揚言根據地內有一個龐大的特務組織，而供給部是特務的大本營。鋤奸隊立即把熊大鎮當作漢奸、特務抓起來，供給部和所屬的炸藥廠、印刷所、衛生部、醫院、電臺、銀行、報社、商店、學校等機構，共有一百多位平津來的知識分子，一律被逮捕審查，製造了一起轟動的特務漢奸大案。據說這場鋤奸運動直接聽命于延安，所以連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更高一級的晉察冀邊區司令員聶榮臻，都不必打招呼，也無權過問。

在根據地部隊轉移途中，負責押解熊大鎮的一個名叫史建勛的幹部，因出言不遜辱罵熊是漢奸、特務，引起抗辯，雙方發生口角。史一氣之下，威脅要槍斃熊大鎮。熊大聲說：“你要打死我，不必開槍，把子彈留下來打日本鬼子！你可以用石塊打死我！”這個毫無人性的劊子手，竟真的揀起一塊大石頭，把熊大鎮活活砸到頭顱爆裂、腦漿迸流而亡。熊被定性為死有餘辜的國民黨特務。據說史建勛因此立了大功，成為鋤奸英雄，解放後官運亨通，當上高級幹部。熊大鎮的特大沉冤則直到 1986 年才由河北省委羞羞答答、輕描淡寫、不痛不癢地做出一紙《關於熊大鎮問題的平反決定》，敷衍了事，不了了之。

得意門生無辜冤死，葉企孫教授多次奔走呼籲，要求調查此案，為熊平反。1967 年 6 月，葉也作為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大學紅衛兵揪鬥、抄家、關押、停發工資，送進黑幫勞改隊，受盡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次年 4 月，中央軍委辦公廳又正式逮捕葉企孫，關進監獄，逼他多次寫筆供承認自己是國民黨 CC 系（中統）在清華大學的核心人物，當年親自介紹熊大鎮加入 CC 系，派遣他打入冀中軍區開展敵特活動。葉在威逼之下違心地在交代材料上寫道：“熊大鎮到了今天，我對他影響很大，我教了他科學，沒有對他進行人格教育，我沒有盡到教育責任。”“熊之被鎮壓，吾認為他是確有應得之罪。”

連續八次提審訊問，逼葉“屈打成招”，可是經專案人員多次反復內查外調，查不出任何真憑實據，連蛛絲馬迹都找不到，當局只得給他扣上中統特務嫌疑的罪名，在折磨監禁一年多以後把他送回北大（1952 年清華物理系歸入北大物理系）。名曰釋放，實際上繼續關押在保密的簡陋斗室內隔離審查，嚴密封鎖，與外面完全隔絕，直到 1975 年才解除變相監禁的隔離審查。

1976 年春節，葉教授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學生陳岱孫、吳有訓、王竹溪、錢偉長等人，被允許來北大探訪。由于遭到長期摧殘，葉企孫過早地衰老了，腰都直不起來。他們彼此見面，恍如隔世，悲感萬千。此時，北大當局給他做出的結論仍然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

盾處理”。

1977 年冬末，近代中國科學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一代宗師葉企孫教授，含冤離開人世，頭上還戴著一頂“特嫌”的大帽子。 ????

補白：文革時期，各地機關、單位、學校推行早請示晚彙報制度。每天上午 8 點正，學校、機關、礦山、工廠甚至火車上，所有人員都必須集中起來，把紅寶書舉在胸前，由一位領頭的高喊“向毛主席敬禮！”然後是高唱《東方紅》，再後是背誦紅六段（六段毛主席語錄）。當時我所在的勞改隊，讀的紅六段包括“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等。再接下去是“老三篇天天讀”，人人手捧紅寶書，逐字逐句念毛澤東的三篇文章，《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和《紀念白求恩》。之後集體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畢，全體肅立，齊誦“敬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中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至此，早請示的儀式程序算是完畢了。晚彙報的程序和內容與此相同。

沈不沉

## 鄉村告密風 梅桑榆

那時我家住在一個鄉鎮上。鎮雖小，却是區委所在地，區直、社直機關不少。運動伊始，許多人因說話挨整，其中以稅務所的楊某最為知名。楊某曾是志願軍，據說還立過功。戰鬥中因遇嚴寒，一支腳的腳趾頭被凍掉，走路有點跛，人稱楊瘸子。喊他瘸子等於宣傳他的功勛，因而對於這一不雅的綽號，他欣然接受。楊瘸子平時愛說俏皮話。廣播裏天天講馬克思，他便說：“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單位天天學毛著，他又說：“學什麼毛竹，還學松杈子呢，毛竹沒松杈子值錢。”

這些話都是背後與人閑扯時說的，本為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稅務所組織人寫他的大字報，并開會批判，說他反動透頂，後來區裏又開大會批鬥，明令他和牛鬼蛇神們一起游街。誰知不批則已，一批驚人，反動透頂的楊瘸子原來就是小鎮名人，現在又有了以前鮮為人知的名言，更是名聲大噪。特別是他的“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一句，竟廣為流傳，引起許多人的感慨、共鳴和引用。當然，引用時必須在前面加上“楊瘸子說”，否則也要挨批鬥。楊瘸子是老黨員、老戰士，立過功，又是殘廢軍人，資格老，本錢大，被批鬥幾場，未戴什麼帽子，仍然當他的收稅員。

????

???? 我的同學陳某，不善言談，父親又被打成投機倒把分子，內心很是自卑。他是回鄉知青，本人并無政治問題，因而生產隊的讀報會、學毛選、批判會，他都有資格參加。一天，生產隊開會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社員們邊批判邊呼口號，其中“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複兩三遍。這句口號，喊上幾遍就成了繞口令。人喊口號時情緒往往很激動，一激動就容易出錯。陳某正是如此，一不留意把兩個大人物喊錯了位，把該打倒的喊成要保衛的，要保衛的喊成該打倒的。上百人一齊喊口號，即便其中一人喊錯了，別人也不會聽出來。不料，坐在他旁邊的小張，會後向大隊告密，說陳某膽大包天，居然在批判會上公開喊反動口號。小張是公社書記的兒子，在陳某所在的生產隊就近插隊落戶。

大隊上報到公社，公社下令生產隊對陳某進行批判。會場是三間空房，內無隔牆。批判會開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請罪。積極分子們爲了豐富鬥人的樂趣，把四面牆都貼上領袖像，令陳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的，轉著圈向四面牆上的領袖像磕頭。那場批判會，我也被喊去參加。看著同學下跪請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會開完，便悄悄溜走。

陳某被批鬥幾次之後，公社革委會給他定了個罪名——現行反革命分子，但是帽子舉而不戴，管制勞動，以觀後效。陳某經此一劫，精神面貌爲之一變，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語。那個告密的小張，却在生產隊入了黨，不久便招工進了城。

因喊口號倒黴的還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幹事，他老婆是裁縫。一天，人們上街游行，歡呼最高指示發表，她也跟著游行。在反復喊打倒劉、保衛毛時，她也把人物喊錯位了。她嗓子好，聲音高，“反動口號”一出口，不少人都聽見，個個嚇得半死。事後曾某的老婆也挨了鬥，但她的運氣要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幹部，暗中爲她活動一番，以後便不了了之。

???

徐某 40 多歲，體魄健壯，是個勞動能手，犁耙揚（場）撒（種），樣樣精通。一日，兒子殺雞，用刀像拉鋸似的在雞脖子上拉了兩下，一鬆手，那公雞在地上扇扇翅膀，掙扎了幾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趕，才將其捉回。徐某見狀，斥責兒子：“一隻雞都殺不死。你把它的頭剝了！”不料，隔牆有耳，徐某被告密爲想謀害毛主席，對兒子說，你殺毛主席要是殺不死，就把他的頭剝了。造反派得到舉報，如臨大敵，當晚把徐某捆起來，押上會場，進行批鬥。

會場就在街邊，發言人幾次引用告密者的話，喝問徐某爲什麼要謀害毛主席？爲什麼這麼惡毒？引起許多人圍觀。那時，咒罵領袖的話是禁止重複的。發言人沒有意識到這個禁忌，竟一再重複，弄得主持批鬥會的人大感難堪。發言的人是革命群眾，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勢、使眼色，但發言者未能明白他的意思。一時間，會場氣氛極爲緊張，“誓死保衛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殺手徐某某！”的呼喊聲此起彼伏。

徐某當然是死不承認，因爲一承認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槍斃，也要坐多年大牢。何況是別人誣告，他根本就沒說過這話。造反派批鬥了幾個晚上，找不到有力證據，加上徐某祖輩貧農，後來不了了之。但徐某從此落下一個綽號——反革命殺手。同輩的人開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輩也開這個玩笑，他便要翻臉開罵：“小狗日的，再敢喊一聲，我把你的嘴撕成褲腰！”

錢某老實巴交，不苟言笑，平時只知悶著頭幹活，掙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園裏挖地，忽然來了兩個肩扛紅棍子的群專隊員，把他押到公社群專指揮部，關了起來，罪名是污辱偉大領袖。原來有人告密，說他用領袖像當手紙，用過後扔進糞坑。

生產隊沒有公廁，社員們都在自留地裏壘一個簡易的小廁所，僅供自用。路人若遇內急，也可就近方便。那一天，錢某的確發現自家廁所糞坑裏有報紙，而且上面有領袖像，嚇得趕緊將報紙撈上來，埋在糞堆裏。當時各級報紙都在右上角印領袖像和一段語錄，天天如此。從生產隊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學習，農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聽人讀報。過期的報紙則被買給商店或賣瓜子的，用來包東西，因此，印有領袖像的報紙隨處可見。公社和街邊的公廁糞坑裏，經常漂著印有領袖頭像的報紙片。因是公廁，誰污辱的偉大領袖，無處可查，也就無人過問。

錢某受審時，開始不承認，說是別人陷害他。群專頭目竟讓人出示證據——原來告密者已經帶人將那張報紙片從糞堆裏挖出，用一張乾淨紙包著，送交群專頭目。于是錢某辯解說，他一家人幾年都沒買過手紙，大便時都是用草團、樹葉解決。又說，報紙都被幹部們收著，他上哪弄到那東西。即使弄到，也捨不得當手紙，還留著包東西哩。他家茅坑裏的報紙，一定是別人進去拉屎時丟下的。但辯解無用。群專頭目說：“你還想抵賴！哪個能證明那報紙

不是你扔在糞坑裏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糞堆裏，可是事實？”證據確鑿，錢某怎麼為自己辯解都沒用，後來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由生產隊管制勞動，並經常被公社大隊強迫幹義務工。

我本人也吃過被人告密的苦頭。村村隊隊大跳忠字舞，生產隊派人到公社學習，然後回來教社員跳。被派去學習的孫某是團員，又是隊幹部，上面一有號召，就積極表現。“學成歸來”教大家時，有的婦女害羞，學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臉面，不願學舞，他便板著臉訓人，說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大忠，不跳不忠。這顯然是一頂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張狂勁，便私下對他說：“跳不跳忠字舞，與忠不忠沒什麼關係嘛。照你這麼說，壞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報告。公社幹部說我對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有抵觸情緒，詆毀全民跳忠字舞的偉大意義，思想有嚴重問題，令生產隊對我進行批判，並且說如果我態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隊召開批判會批鬥。我父親得知此事，著了慌，去找大隊書記董開華，請他從中說情。董到生產隊找到隊長，問他：“東子（他一直這麼稱呼我）到你們隊來幹什麼的？”隊長說：“來當社員的。他還能幹什麼？”董開華說：“他除了來當社員，還是來接受你們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明他們還不成熟，有什麼差池，你們要教育嘛，沒有必要大動干戈，開什麼批判會。隊裏開會教育教育他，讓他做個檢討算了。”隊幹部們一商量，又把批判會改成教育會，並對我說：“你在會上做個檢討，就算了，我們就不追究了。”

會議名稱一改，會議的性質就大不相同了，隊幹部的態度也溫和多了。董開華怕我不願做檢討，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東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說話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說話直的虧嗎？你在會上認個錯，不要硬頂，公社那邊，我去說說，這事就過去了。下次說話可一定要注意呀！”我也擔心事情鬧大。批判大會我見得多了，站在小學操場的臺子上挨鬥，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天晚上，我在隊裏召開的社員會上“低頭認罪”，幾個幹部和黨團員相繼發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算了結了。

被人告密詆毀忠字舞只是小事，畢竟未受什麼處罰。受告密之害最深的是我每遇招工、招生、參軍的機會，便有人大寫“人民來信”，使我一次次被淘汰。那些“人民來信”都以揭發我父親的政治問題為殺手鐮，達到毀滅我的前途的目的。由于自己深受告密之害，參加工作後，我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無論何時，都不向領導打別人的小報告。今天，有人將那個逝去的時代描繪成天堂，說是“民風淳樸，社會和諧”，實在不知是何居心。

---

補白：毛澤東執政 28 年，沒訂過一部民法、刑法。土改時期，縣一級土改工作團就可批准殺人。文革中，公安局的軍管會就可批准殺人。草率殺人，幾同兒戲。追隨毛澤東執行其專政任務的人，往往最終也難逃被毛戲耍凌辱打擊陷害的命運。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越回顧越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重慶大學的地下黨員，49 年隨軍接管湖南衡山縣公安局，留下工作，負責修建監獄。他說“當時重在防止逃跑，獄中生活條件多未考慮”，不料文革中自己蹲進這座監獄，並寫詩記其事：“孰料殘冬入獄時，北風抖索凍難持。當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誰！”那些在政治運動中“少言人道”的人，多半也遭受別人不把他們當人的折磨。 邵燕祥

---

父親是個普通工人，沒什麼文化，但他出生的家庭曾經是很顯赫的。那是江蘇一個大戶人家，書香門第，祖上遺留不少田產。後來日本人來了，家產被搶光，全家逃難到了上海。爲了一家人的生計，父親放棄了學業，不到 14 歲就給人當學徒，做小販，整日在外奔波勞累。解放後，父親爲了獲得一份高收入，瞞著家人，報名到外地當石油工人，從此一別上海 40 餘年。

土改時，父親家被劃爲地主。作爲地主的後代，我也天生低人一等。別的孩子肆意欺負我，我不敢做絲毫抵抗，我怕他們罵我是小地主。每學期開學都要填一份表格，那是我最傷心欲絕的時刻。每次膽顫心驚地填上“地主”二字時，我都有生不如死的感覺。爲此我曾經在心裏恨過父親很長時間，我恨他讓我小小年紀就要承受那麼多的屈辱和難堪！

有一次父親回上海探親，給我帶回一件祖母親手縫製的緞子夾襖，夾襖上還有祖母用金綫精心綉制的花邊。我穿著這件新衣服上學，同伴們嫉妒得眼珠子都要瞪紅了。他們一邊朝我吐口水，一邊罵我是小地主。我一路哭著跑回家，將那件衣服狠狠地扔在地上，再用力踩上幾腳。父親讓我撿起來，我就是不撿，父親氣得揚起手要打我。我一邊哭，一邊叫嚷著：“誰讓你不是貧農？你爲什麼是地主？如果有貧農願意要我，我現在就不做你女兒！”父親揚起的手慢慢地又放了下來。那一時刻，我分明看見父親的眼裏含著眼淚。

父親對我要求非常嚴格，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女孩子從小就要守規矩”。他像培養大家閨秀似的培養我，我說話、走路、坐臥、吃飯乃至端碗的姿勢都必須按他的要求去做。他經常把我關在家裏，讓我背《三字經》、《增廣賢文》、《弟子規》、《千字文》等等。哥哥比我大一歲，父親却放任他在外面自由自在地玩耍。我經常是我一邊背一邊哭。那時我想：我的命怎麼這麼苦啊？有個地主爸爸，讓我守這麼多的臭規矩。如果我有個貧農爸爸，保證我再不會背什麼“養不教，父之過”了。

其實父親很疼愛我。我上技校時，一個冬天的傍晚，寒流來臨，氣溫驟降，父親擔心我被褥太薄，騎著自行車走十幾裏路來給我送厚被褥。途中天降大雨，父親怕被褥淋濕，脫下雨衣蓋在被褥上，自己冒雨前行。他來到我宿舍時，嘴唇都凍烏了，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我當時正沉迷于一本小說中，躺在床上，連句問候的話也沒對父親說，更不用說去送他了。

西諺雲：“年輕時犯的錯，上帝都會原諒。”然而我對父親犯的錯，我想上帝肯定不會原諒。在父親活著的有生之年，我從未給他買過任何東西。我送他的唯一禮物，一雙羊皮手套，還是我在技校參加法律競賽獲得第一名的獎品。我把手套拿給父親時，他眼睛都笑眯了，連聲誇贊：“還是女兒好，女兒有出息。哪像兒子，一點用都沒有。”他戴著那雙手套坐單位的班車，有座位也不坐，偏要站著，故意抓著上面的欄杆，讓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著他戴手套的手。有人誇他的手套漂亮，父親立即得意洋洋地說：“這是我女兒獎的。我那個女兒可有出息了，別人都叫她才女。”父親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而他仍舊興奮地自顧自說：“我女兒文文靜靜的，一點也不像別人家的女兒瘋瘋顛顛的。”母親看不下去了，說他太虛榮了。唉，一雙羊皮手套就能引起父親那麼多的滿足，可惜我對此認識得太晚了！

1997 年，父親到了胃癌晚期。每去一次醫院，我心靈就要受一次煎熬。我後悔自己對父親關愛太少。坐在父親病床前，我問他：“爸爸，我真的不是個好女兒，你怪我嗎？”父親笑著說：“傻孩子，爸爸怎麼會怪你呢？從小到大，你都是爸爸最喜歡的孩子。你哥哥就說爸爸偏心，爸爸是偏心，爸爸就是喜歡你比喜歡他多！”

有一次他還對我說：“你小時候生了一場大病，差點就死了。醫生說你沒救了，不準備管你了，忙著去鬥私批修。你媽媽沒辦法，跑來找我。我正在上班，一聽就急了，跑到醫院逼著醫生搶救你。我說如果你們救不活我女兒，我就跟你們拼命。醫生嚇壞了。後來又說要給你輸血，我二話沒說就讓醫生抽血。那時我剛下夜班，頭昏得厲害。”聽著父親的敘述，

兒時的往事如電影一樣在我腦海裏放映。上小學時，每逢下雨天，父親都會到學校接我。怕雨水濺濕了我的褲腳，就一路背著我回家。路上還邊走邊說：“有誰要小女孩啊？我家賣小女孩。我的女兒又聰明又漂亮，你們買不買呀？”趴在父親背上的我就連聲高叫：“不賣，不賣！要賣就賣哥哥。”父親接著又說：“你哥那個臭小子，沒人要的！”說這話的時候，他根本就沒注意到哥哥就走在他身旁。

還記得有一次，大概是我四五歲的時候，在水渠邊拔野花，一不小心掉進水渠。水流湍急，一下子將我沖出好遠。父親當時正在很遠的地方，他突然感到胸口一陣疼痛，預感到我要出事，就拼命地往前蹬自行車，趕到一把將我從水裏撈上來。我上來時已經昏迷不醒，他再晚來一步，我恐怕就不在人世了。

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裏已經有些神智不清。有時我去看他，他都感覺不到我的存在。在父親的追悼會上，哥哥含淚對我說，父親臨死前兩天，突然回光反照，把哥哥叫到身旁，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一直說爸爸偏心，爸爸是偏你妹妹，所以你妹妹才那麼任性。你妹妹有得罪你的地方，你不要怪她，要怪就怪我，是我把她給寵壞了！以後你一定要多照顧你妹妹，你是哥哥，你妹妹有事你一定不能不管。”啊，父親，我深深摯愛的父親，你讓我怎麼報答你對我那深如海洋般的愛呢？

寫到這裏，我已是泪流滿面。父親是一本書，做女兒的就是一位讀者，我想我只能用一生的時間細心地去讀這本書，才能够品嘗出這本書中的酸甜苦辣，才能够感悟到其中所蘊含的人生真諦！

## 女兒悔 淡 然

父親，您的音容笑貌在我記憶中已經模糊，留下的只是遺像上那張年輕英俊毫無生氣的臉龐定格！多少不眠之夜與您對坐，無言的悲痛充溢我的內心，刻骨的悔恨填滿我的腦海，自責的泪水潸然傾瀉！我知道，無論如何譴責自己，永遠無法饒恕自己對您的誤解鄙視不敬不孝！今天是您的生日，就容女兒在這特殊的日子，借助我的文字知己，傾訴女兒發自肺腑的懺悔，卸去壓在我心坎幾十年的重負吧！

我七歲那年，在城鎮任黨委書記的您，戴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帽子飲彈自盡，我們原本殘缺的家庭破碎了。我心目中慈祥偉大，為怕我受委屈單身多年，深受人們尊敬的父親，轉眼間成了畏罪自殺的現行反革命！我們家門口貼滿列舉了您種種罪狀的花花綠綠的大字報，您的名字被打上了大紅叉！一瞬間，我從備受寵愛、令人羨慕的孩子成了小夥伴譏諷歧視攻擊欺負的狗崽子，一些親近的人突然地躲開了我們。我懵懂不解呀，父親，您為什麼要幹壞事，為什麼當了反革命分子呢？女兒為您這樣的父親感到羞耻！

您單位三天兩頭開著專政車，載來滿車人，在我們門口高喊口號。一些人凶神惡煞一般沖進家裏，翻箱倒櫃搜查黑材料。我好害怕！我哆嗦著依偎在風燭殘年目光呆滯的祖母懷裏，任由這些殺氣騰騰的人把家裏折騰個够！我納悶，何謂黑材料？一定是極其反動的東西了。您從哪弄來的？又把它藏到了哪里？父親啊，我怨您！

家裏人嚴肅緊張的表情使我感到更大的風雨欲來的恐怖。深夜，我被一陣輕聲低語吵醒，幾個親戚圍坐在我和祖母合睡的床前。從他們的片言隻語當中，我多次聽到我的名字。我在驚恐不安、惡夢纏繞中迎來了天亮。

一早，姑媽流著淚幫我穿上表兄那寬大得足以把瘦小的我包裹住的高領厚棉襖，姑丈領我踏上了去您單位的汽車。一路上，姑丈在嘆氣，抱我的手在顫抖，不祥的預感撕咬著我幼小的心靈。我萬萬沒想到自己竟然是作為您的替身去接受批鬥，那厚棉襖是為了保護我瘦弱

的身體！

父親，您能想到 7 歲的女兒細細的脖子上挂著寫著您名字的沉重巨大的牌子被押上審判台，面對台下黑壓壓的人頭，聽著高音喇叭義憤填膺的聲討，被一陣陣此起彼伏的口號聲驚嚇得癱倒在地上小便失禁那慘不忍睹的情景？您可知道這一驚嚇導致了女兒發燒昏迷說胡話幾天幾夜，醒來後開始沉默寡言表情木訥到了近乎痴呆的地步？父親，您做的壞事，我一點都不知道，也茫然不懂，為什麼要我替您承受，代您受過？可惡的父親，我如此倒黴，當了您女兒，我恨您！

學生時代，女兒在您的陰影下痛苦孤獨地煎熬著。學校一出現反動標語，首當其衝的懷疑對象是我！女兒從開始的低頭哭泣恐懼辯解，繼而學會了抵著嘴昂著頭以漠視的眼光與審問者對視，保持倔強的沉默！委屈的泪水只有在放學的路上躲到無人處盡情流淌，回家閉口不談。年邁的祖母知道了又能如何，她只會無奈地抱著我痛哭，聲聲叫我苦命的孩子。這只能如鞭子一樣抽在我鮮血淋漓的胸口上增加痛楚！一個反動透頂的小鬼崽子名聲傳遍了全校，乃至我們居住的周邊，人們像躲瘟疫一樣對我避之唯恐不及！我心裏的痛苦委屈憤怒轉換成了對您刻骨的仇恨！

為了洗刷您帶給我的污點，女兒勤奮讀書，賣力的做好事，勞動課挑最髒最累的活幹，課餘時間幫助孤寡老人做家務，甚至把買文具的錢當成檢到的上交老師，希望以出色的表現來抵罪。可一切都是徒勞，紅小兵的紅袖標永遠與我無緣。學校傳達什麼文件，我被排斥在會場外。同學們在討論什麼，看到我就嘎然停止。“反動仔”、“壞分子”代替了我的名字！這一切，都是因為我有一個畏罪自殺的反革命父親啊！多麼可憐可悲的我！父親，我恨您！

父親，您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你眼中天真可愛嬌柔可人的小女兒，經常在夜深人靜的午夜站在您的遺像前，凶狠地注視您，與您的目光進行著戰鬥；嚴厲地質問您，對您進行審判；惡毒地詛咒您，對您進行心的控訴！無端地受到如此株連，我想不通，我委屈哭訴無門！天哪，這是為什麼？

年復一年，寒暑更迭，女兒長大成人了。經歷了婚姻的挫敗，事業的挫折，歲月風塵的磨礪，幾次生死綫上的徘徊，女兒的心智逐漸成熟，慢慢理解了父親。生命對每個人而言，都彌足珍惜；父親，您也無法免俗啊。在我幼年的印象中，您是一個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外冷內熱的人，是我們這個家族的驕傲。親戚鄰居都尊重您喜歡您，遇到大事都找您商量。

您那麼熱愛生活，每次回家都要把家裏清理一番，使之感到舒適；您是那麼孝順，工作再忙也要抽時間陪祖母聊聊天給祖母捶捶背；對待親戚雖然不是很熱情，但只要親戚有難總是出手相助；對於我這個寶貝女兒，更是寵愛有加。為了我，您拒絕了好多痴情女孩的追求，忍受了一個熱血男兒孤寂難耐的單身生活。父親，您是多麼的不容易，女兒為有您這樣的好父親感到由衷的自豪，女兒敬重您！

當您舉起手槍對著自己的胸膛扣動扳機的時候是多麼勇敢無畏，為了人的尊嚴，您選擇了站著死也不跪著生，使 5 分鐘之後就要您跪著挨批鬥的大會沒有開成；為了人間的正義，您寧可放棄生命，也不做違背良心的事，您的離去使當天下午要您主持的對一個無辜幹部的罷免儀式落了空。您是個錚錚鐵骨的好漢！人們聽到槍響踹開房門，看到的是您那張已經去世、面帶微笑的安詳的臉龐。人們震驚了！父親，您是好樣的，面對死亡毫無恐懼！雖然您的生命只有短暫的 33 歲，可卻留給後人一個正直善良頂天立地的好漢形象，女兒崇拜您！

父親，雖然社會早幾年就還給了您清白，為您平反恢復名譽，撤銷了莫須有的罪名，可女兒到今天才對您深深懺悔，請您原諒女兒的不懂事，包容女兒對您的誤解，饒恕女兒對您的痛恨！您的離去的確給女兒帶來了無盡的災難，那不堪回首的劫難在女兒心裏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陰影，甚至影響了女兒一生的幸福。可那不是您的錯，如果您知道女兒所受的苦難，您會多麼痛心與不舍！如果有預知，我相信您不會選擇這樣的解脫方式，女兒理解您！

父親，今天就讓我把這鬱積在心頭幾十年的沉重心事盡情的對您傾訴，把對您無限的愧

疚盡情表達，也讓我委屈與懺悔的泪水一并傾瀉。父親，您聽到了女兒的心聲了嗎？您接受了女兒這遲到的懺悔了嗎？女兒好想得到您的諒解，聽到您的聲音，哪怕點個頭也好啊！可我知道，這一切已經不可能了，縱使我千呼萬喚痛心疾首，您也不會知道的！我惟有將滿腔的悲痛，萬般的悔恨，匯成虔誠的話語對您說一聲：安息吧，我最最敬愛的父親！如果有來生，我還當您的女兒。讓我用來生來彌補今生對您的不孝，贖還今世大逆不道的罪孽。答應我，好嗎？

---

補白：1949 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不過是湖南農民運動的放大。每次運動中，凡是“稱職”的幹部，都是思想革命化達到了一定高度的人，得毛澤東之真傳，想毛澤東之所想，心中有了一個“小毛澤東”。他們在毛澤東設計的制度框架內，秉承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理念，以人為螺絲釘，為馴服工具，為愚氓，蒙蔽之，利用之，驅使之，奴役之；蒙蔽利用驅使奴役之不足，更戲耍之，凌辱之，打擊之，陷害之，總而言之是敵視之，置之死地而後快。所謂政治運動和走火入魔的政治工作，就是完成這一過程，不斷把百分之五的人樹之為敵。三千六七百萬餓死的人，並沒有定性為敵人，但在毛澤東不把人當人的心目中也是非人，死不足惜。歪打正著，這個死亡數字，大約也正相當於當時全國七八億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消滅了，不叫敵人而遭遇大體與敵人同。邵燕祥

---

兒媳是這樣娶來的 趙仲泉

王印人，昌邑濰河西岸某村人氏，身材魁梧，英俊蕭灑，急公好義，善交朋友，又能言善辯，主持公道，故在村內威望極高。年令剛過 18，就與鄰村于姓女子完婚。生有一子，乳名狗剩，為求好養，拜廣饒縣一起當兵的劉天錄為乾爹。夫婦和諧，恩愛有加。白天倆人下地幹活，晚上男的燈下讀書，女的縫衣作鞋，村人無不羨慕。

????時在 1944 年，日寇侵華已過 7 載，印人已年屆 20，為不當亡國奴，遂棄家投軍。當地沒有別的抗日隊伍，于是投奔國民黨四縱隊當兵。抗戰勝利後，本可解甲歸田，以享民樂。誰料想，國共兩黨又開戰局。高密一戰，印人被俘，遣返歸家。此時印人只想過安穩日子，誰知又被扣上四類分子的帽子，只准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處於無休止的管制監督之下。

到了 1956 年，村幹部找到他說：“你只要老實改造，處處擁護黨的政策、方針、路線，多幹活，做好事，就可以給你摘掉帽子，享受同等社員待遇。”從此，印人整日以汗水來洗刷幹國民黨軍隊的罪惡。可誰知幹了十幾年，力沒少出，禮沒少送，帽子却始終戴在頭上。60 年代初，中央又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凡對四類份子敢下狠手，進行殘酷鬥爭的人，被看成階級覺悟高，可以入黨、當兵、升學，年齡大的還可以在村內當幹部；凡給四類分子摘帽的村幹部，在四清中都被劃為四不清，有的還成了階級異己分子。這樣，給表現好的四類分子摘帽就成了村幹部的一大忌諱。有的村幹部甚至說：“打死四類分子是個方法問題，給四類分子摘帽可是個立場問題！”四類分子的帽子成了鐵帽子，到死都不能摘掉，那滋味比判無期徒刑還難受。

????到了 1971 年，印人年屆 48 歲。其子狗剩，將近 30，因出身不好，雖長得一表人才，可再醜的姑娘也不敢嫁他。大家都知道，一旦進了這樣的家庭，那是永無翻身之日。正在此時，遠在光饒縣的劉天錄寫信來，邀印人參加其子的婚禮。印人盤算：我這 20 多年，頭不敢高抬，氣不敢大喘，話不敢高聲，力不敢少出，時不時還要拉出去上臺示眾，向人民低頭認罪，當年給王豫民司令當警衛員的機敏銳氣早已被磨了個淨光，今天何不借去乾親家賀喜之機出



一出風頭，嘗一嘗做人的滋味？20 多年雖然在家被管制，受欺負，可是到了廣饒，誰還知道我是四類分子呢？

想清楚了，于是便和狗剩去峽山水庫下穿網，忙活一夜，捕了 50 多斤鯉魚，又從中挑那些 2 斤左右的，滿滿裝了一筐子，用紅包袱蓋了，作為禮物，還去供銷社托人走後門買了兩盒大前門烟，去油庫找表弟借了一身嶄新的中山裝和一件小大衣。第二天摸黑早起，穿帶整齊，騎上借來的大金鹿自行車，直奔廣饒而去。走到昌樂境內時，前面來了一輛吉普車，到他面前嘎然而停。車內走下一名解放軍軍官。印人嚇了一跳，急忙下車，弓腰低頭，雙手下垂，兩腿并立，差一點尿濕褲襠。不料這位軍官向他打了一個敬禮，問道：“老大爺，去喬官怎麼走？”印人吱唔半天，竟沒吐出半個字。解放軍以為老大爺是個啞巴，開車遠去。????天將至午，到了廣饒大王村。迎賓者忙接過車子，禮讓進門。與乾親寒暄一陣，將禮品送上。乾親打開包袱一看，見禮品厚重，喜形于色。衆人也皆感嘆：從沒見過有送這麼大禮的，昌邑客好大手！看來日月肯定過得不錯。乾親婆接著說：“光看人家這貌相，幹什麼也錯不了。就是還有個兒沒定親呢。”旁邊的女賓應聲說：“那肯定是挑選多了花了眼了。”????此地風俗，乾親為大客。迎賓者推印人落坐，印人毫不推讓，一屁股就坐在了主客位上。見桌上擺的是兩毛錢的豐收烟，印人不屑一顧，從小大衣口袋中摸出兩盒大前門，一盒放在自己面前，一盒順手放在了後門臺上，然後打開大前門的錫紙包裝，彈出一支，啓動火機點燃，昂首朝天，噴雲吐霧，旁若無人。衆人見其氣派，皆恭維有加。這乾親劉天錄也是此地有影響的人物，雖然幹過國民黨兵，但其叔是 1937 年就參加馬保三牛頭鎮起義的老八路，解放後在省城任要職。人家不但不戴四類分子帽子，還在村內任革命委員會成員。兒子結婚，村內幹部，供銷社主任，公社幹部，帶匣子槍的公安員等要員，都來致喜道賀。

王印人高坐主客位上，陪客者笑臉相迎，阿諛奉承之語不絕于耳。這個叫叔，那個叫爺，吃國庫糧的就叫同志，把個王印人弄得不知道天高地厚。酒至半酣，印人早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時而高談闊論，時而指手劃腳，閱歷和經歷使他的談吐語驚四座，說到絕妙處，高舉酒杯，一碰而幹。衆人皆服其酒量，順其意而迎和。正在此時，上菜的夥計手托傳盤來到席前。他環視一下衆人，說：“今天我昌邑客要點一個菜。你去和大師傅說，給我上一個龍鳳配。”衆人皆驚，從沒聽說有這麼一個菜，如果上不上來，可就丟大人了。

????待了不大一霎，只見做菜大師傅穿帶整齊，兩臂著白色套袖，手托傳盤，進門就說：“哪位是昌邑客？您要的菜我給您上來了。”只見王印人手持湯匙，從湯碗中撈出一個雞頭和魚頭，看看，放下，然後舀了一匙湯，放嘴裏嘗嘗，說：“味道不錯。”隨後一轉身，從後門臺上取下那盒大前門烟，放在大師傅的傳盤上，說：“拿回去抽吧。”

不知不覺，紅日西沉。待天黑席散，劉天錄耳語告知：“今天陪你的那個人，見你氣度不凡，兒子定也錯不了。他家有女，年方妙齡，想與你結為親家。你可在此多住兩天，促其婚事早成。”

話說到了 1979 年，我在王印人所在的村子裏住隊。此時四人幫已被粉碎，但中央還是執行階級鬥爭路線。突然有一天來了中央文件，要給全國的四類分子統一摘帽，叫他們享受同等社員待遇，于是我便召開村民大會。

????會場上，一邊坐的是社員群眾，一邊是十幾名四類分子。宣讀完中央文件，我叫十多名四類分子走到社員一邊，并大聲宣布：“從今天起，你們的帽子已被摘掉，與社員是同等地位，那個時代將永遠過去了！”此時，他們都大聲痛哭，幾個年齡大的還當場昏倒在地，連哭聲都發不出來，其場面就是鐵石心腸也要感動落淚。散會後，狗剩找到我說：“你宣布我爹摘掉帽子，30 年的階級敵人今天成了同志，明天我要設宴慶賀，請你到我家去喝酒。你若去就是真摘了，你若不去就是沒有摘。”我聽後沉思良久，對他說：“別人家我能去，你家我當然也能去。”

後來有一次我問王印人：“人家帶帽分子的兒子都打光棍，你的兒子怎麼還能說上媳婦

呢？”王印人就向我講述了上面的故事。印人已于 2004 年去世，享年 80 歲。其妻于氏今尚健在，年齡 86 歲。狗剩在改革開放後成為著名企業家。兩個孫兒都上了大學，現都供職京門。

此稿寫成後，狗剩閱讀數遍。我問他有什麼意見，他建議隱去村名，文中人物也用化名。只是狗剩之名為狗剩自選，其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補白：某中學紅衛兵頭頭孫 X 東，帶領大家在批鬥走資派大會上喊口號，把該喊“打倒”的喊成“萬歲”，該喊“萬歲”的喊成“打倒”，當場被台下紅衛兵沖上去，五花大綁押送到人保組。其父母害怕受兒子牽連，在他所在的學校和居民社區貼出大字報，宣布與兒子劃清界綫，斷絕父子、母子關係。在關押審訊期間，孫 X 東上吊自殺了，時年十八歲。屍體是被年近古稀的外婆領走的，草草掩埋在郊區荒野中。他的檔案上記載著這樣一段話：“因犯現行反革命罪，畏罪自殺，自絕于人民，死有餘辜。”宣布平反時，有關人員送了三百元“補償金”，其父母接過錢，撲通一聲跪下，感恩戴德地說：“感謝黨，感謝政府！”兒子的一個鮮活生命，換來的只是區區三百元人民幣，還要千恩萬謝！令人悲憤。悲憤之餘細想，也不能全怪他們。誰都想過有尊嚴的生活，但當尊嚴被踩在腳底時，弱小的人只能選擇卑微、卑賤甚至卑鄙。生命畢竟只有一次，敢喊十八年後又是好漢一條的人，畢竟少之又少。史海

## 第一個被平反的右派 岳 盟

1957 年反右時，溫濟澤是中央廣播事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中央廣播電臺副總編和對外廣播的部門負責人。局黨委辦公室的負責人對他說：“你們部門二百幾十人，按平均 5% 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分子。”溫濟澤說：“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會放過；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對外部抓右派未能達到這個規定數。保護了別人的溫濟澤，最後却保護不了自己。在反右鬥爭基本結束 11 個月之後，中央司局級幹部“反右補課”時，他被打成右派，并揪出一個以他為首的反黨小集團。

儘管溫濟澤一直身體瘦弱，又有肺病，也還是被發配到渤海之濱的農場勞動。一年多之後，被調到北京廣播學院工作。起初頭上還戴著右派帽子，他只能搞點資料工作。1960 年 10 月摘帽之後，才開始講些課，并得以在不公開的《廣播業務》上發表點文章。

在廣播學院教書的第六年，文革浩劫開始，溫再遭劫難。他所寫的文稿和出版的書籍，多半被燒毀，甚至連建國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班和北京大學新聞班講授的新聞廣播學講義，以及剛剛出版的《馬恩列斯論報刊·列寧論廣播》，也都被付之一炬。

1967 年“奪權風暴”之後，全國籠罩在恐怖氣氛中，溫濟澤也在廣播學院接受群眾專政。一次他坐 14 路公共汽車去醫院治病，車到某站，門打開，一眼瞅見胡喬木上車。他十分欣喜，連忙點頭致意并起身讓座。但胡喬木只悄沒聲地用眼神向他示意，叫他不要跟他打招呼。兩個人只好都相互當作陌生人，偶爾目光碰到一起，也一句話都不說。最後胡喬木用眼神示意要下車，溫濟澤用注目禮送他。這時他才注意到，一個跟胡喬木上車的人也緊跟著下了車。噢，原來有“尾巴”！

不久前溫濟澤從紅衛兵小報上看到郵電學院揪鬥胡喬木的消息，非常惦念他。沒想到這次車上竟能相遇，却又連一句話都不能說。“我們的國家究竟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1978 年 1 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已結束一年多。一天晚上，胡喬木通過一位中間人

與溫濟澤通電話。因為溫濟澤自從被補為右派之後，家中的電話就被撤去了。胡在電話中告訴溫，他本人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是否願意去。溫說願意，只是黨籍問題還沒有解決。

胡喬木說，先過來，說不定到這裏來還能更快地解決。就這樣，溫濟澤調到社科院，并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科研組織局副局長。一夜之間，溫濟澤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 20 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丁已給他布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裏的同志待他都蠻好。

1978 年 3 月，溫濟澤率團代表社科院參加全國科學大會。會後不久，溫濟澤向胡喬木提出黨籍問題。胡要溫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社科院政治部轉至中組部。

胡喬木在將申訴書交給政治部時，還附了一封自己寫給胡耀邦的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政治部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說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複。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胡耀邦看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複的證明，隨即命人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看看對被搞錯了的情況究竟叫平反還是叫改正。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胡耀邦即刻讓幹審局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復”。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復：“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布，改正溫濟澤被錯劃右派的問題。1958 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處分，也被一併取消。

此時，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的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溫濟澤，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據說胡耀邦在一個專門討論右派問題的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瞭解，他的問題確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就這樣，溫濟澤成為幾十萬右派被平反的第一人。

---

補白：菜農唐 X 杰，每天一早挑菜送到城裏的蔬菜公司。這天，菜送完，經過一商店，看見櫃檯上擺放著許多偉大領袖的座像，便請了一尊。他把座像放進空簸箕裏，座像在裏面滾來滾去，險些要摔出來。他急忙找個僻處，用草繩打個死結，套住座像的脖子，吊在扁擔頭上，再挂上衣服遮擋一下。走到村口時，覺得有點冷，他順手拿下挂在扁擔上的衣服披在身上，哼起小曲進村去了。沒走幾步，迎面走來一隊紅衛兵。他們是到村子裏來砸祠堂的，正高唱革命歌曲凱旋。唐 X 杰用草繩吊毛主席脖子，被紅衛兵抓個正著。關了半個月，沒有查出什麼破綻，加上貧下中農成分，最後從寬處理，批鬥幾場放了。不過村裏人另有說法，說這是唐 X 杰的老婆做功夫的結果。有人親眼看見他老婆幾次半夜三更去找造反派頭頭求情。唐 X 杰的老婆是外地人。大饑荒家鄉餓死人，唐 X 杰的老婆與母親一起出逃。母親腿腳不靈，半路被鄉幹部抓回。她隻身一人躲過抓捕，沿途討飯到唐 X 杰的村子。三十歲的光棍唐 X 杰留住了她，娶做老婆。原來的討飯婆又黑又瘦，很不起眼，後來三餐填飽了地瓜、菜葉，出落得又白又豐潤，很有幾分姿色。救夫心切，唐妻拿自己的身體與造反派頭頭做了交易。

史 海

---

白娘娘 徐卓人

文革之初，我隨母親“發配充軍”到一個偏遠的小村，住在一戶四類分子家的一間舊屋裏。那是一家富農，富農早被鎮壓，剩下富農婆母子兩人相依為命。人家叫富農婆“彭娘娘”，我聽起來倒像是“白娘娘”。這白娘娘是個瘦小又乾癟的老太，經常穿一件黑底小白花的對襟衫。我第一眼看見她，就覺得有一股陰冷的感覺。我們剛搬進她家時，她只看我們一眼，面無表情。白娘娘的兒子是個很高大的小夥子，幹活非常賣力，却從不與別人說話。後來發現，他們母子也很少說話。

村東住著小隊長一家。小隊長對我母親非常關心。他不在乎什麼勞動改造，常常一口一個“王老師”，與村裏所有的人一樣叫。小隊長有個兒子，過繼給他的癩腿光棍堂兄。光棍正當中年，雖然有著重大殘疾，却非常暴戾，打起他這個領養的兒子來毫不手軟，常常拿扁擔、桑樹杆大打出手。男孩已經十幾歲了，常被他打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

這一天，村東又傳來淒慘的嚎叫。我奔出門去，遠遠看見那光棍正舉著一個木桶，劈頭朝男孩頭上猛扣下去。木桶罩在頭顱上發出很響的“嘭”的一聲。這一聲就像撞擊在我的心口上，頓時被嚇出一身冷汗。估計這男孩的頭顱是裂了。這時我聽見旁邊有人說一聲“要死！”回頭一看，是白娘娘。她蒼白的臉色有點紅，眼睛也是紅潤潤的。她說了聲“要死！”便拔腳往村東趕去。

白娘娘是到小隊長家去的。她告訴了小隊長親生兒子正被養父毒打。光棍見小隊長的老婆來勸架，而她前面就走著白娘娘，便明白是這富農婆去報的信。他操起一把鐵鍬朝男孩劈去，邊打邊罵：“我打的是自己的兒子，四類分子挑撥離間搞復辟啊！”

好多天沒見白娘娘的面，他的兒子走進走出也不說話。有一天，我見白娘娘的兒子換了一件比較乾淨的衣服，知道他是要去鎮上了。中午回來時，他手中提著一串中藥，我便知道白娘娘病了。白娘娘的善舉並沒有減弱我對她的那種陰冷的感覺，她的生病也沒有引起我的同情。我認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偽裝出來的，包括她生病。我不止一次聽大人說，裝可憐是四類分子的慣用手段。

離開這個小村後，有一天，當年的小隊長到我家來作客。無意中談起白娘娘，小隊長說白娘娘死了，並嘆口氣說：“她這一輩子很苦啊。”

---

補白：在瀕臨臺灣海峽的一個小鎮上，有個叫孫 X 厚的年輕人。孫父臨解放時赴台談生意，滯台未歸。解放後，他與母親成了鎮中最為忌諱的臺屬，列入無產階級專政對象。好在他父親每年通過香港親友寄回一筆生活費，母子得以苟且偷生，相依為命，過著與世隔絕的蝸居生活。文革期間的一天，他母親被紅衛兵挂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牌子游街，他忍無可忍沖出去和人家理論。紅衛兵毒打了他一頓後，又抄了他的房間，搜繳了他的日記本和一本寫滿評注的《毛主席詩詞》。在日記裏，他傾訴了自己滿腹的心酸、痛苦與屈辱，言辭間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這當然被認定為是“惡毒攻擊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妄想復辟萬惡的舊社會”。更致命的是他寫的那些評注。雖然有褒有貶，但所貶之詞，每個字都够砍他的腦袋，諸如“此詞暴露了作者嚴重的帝王思想，可見其借革命之公器，謀君臨天下之私利”云云。年僅二十八歲的孫 X 厚，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死前，他咬破指頭，在看守所牆壁上留下八個血字：“如此世道，民何以堪！”其母當天收埋了兒子的屍體後，面向那塊讓她母子夢縈魂牽的海外孤島，上吊自盡。若干年後，其父回來，帶走妻兒的骨灰。臨行對族人說：“此生永不再踏祖地一步。”果如其言，次年，其父 87 歲病逝于臺北家中。 史 海

---

## 寧陝縣的一打三反 佚 名

1970 年 1 至 5 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第三、五、六號 3 個中央文件，在全國範圍打擊現行反革命犯罪，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是為一打三反。這場運動來得快去得急，至當年 10 月底結束，是繼揪鬥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和清理階級隊伍後的第三部曲，目標直指普通老姓。當時我在陝西南部的一座小縣城寧陝縣居住。全縣不足 4 萬人口。縣城僅有一條街，二裏長，居民約 4 千人。雖然此前全縣已清理過階級隊伍，縣級各機關幾乎再難找到顯眼的階級敵人，縣軍管組還是在縣電影院召開了近千人的動員大會，號召全縣人民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

動員大會後，我就學的寧陝中學立即行動起來，號召廣大師生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的搗亂和破壞。晚上住校同學扛著自製的紅櫻槍，站崗、值勤、放哨，進行護校活動。3 月下旬，學校召開全校緊急會議，稱階級敵人妄圖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聯絡了臺灣的國民黨反動派，用飛機在秦嶺保山撒下各種反動傳單，現已被基幹民兵繳獲，並抓獲了與臺灣聯繫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周後，縣軍管會召開公判大會，宣布已破獲暗通臺灣的反革命敵特組織，並對已抓獲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宣判。

公判大會那天，天氣陰沉。縣中隊戰士早早就在寧陝中學操場城牆四周制高點架上機關槍（兩人一組），火力可以控制整個大會會場。10 點左右，在一陣陣“打倒反革命分子”、“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激昂口號聲中，縣中隊兩個戰士一組，將 4 名人犯像拎小雞似的提至大會現場。文革時抓捕的階級敵人全部五花大綁，為了防止階級敵人抬頭或呼喊口號，脖子上還要勒一條繩子。行刑的人為了壓倒階級敵人，自己的胳膊要從人犯被綁的胳膊下穿過。一旦犯人想動，他的胳膊一抬，犯人能疼得癱倒在地。若是用勁，犯人的胳膊就會折斷。

宣判大會開始，縣軍管會組長開始宣判這幾人的滔天罪行。他們都是寧東林業局的森林工人或當地農民，年齡 20 多歲。其中一名叫張弟學，此人初中畢業回鄉務農，自製一部礦石半導體收音機，並與其他幾個人一起收聽廣播。有人揭發他們是收聽境外廣播，搞反革命串聯，於是遭到逮捕。這就是所謂敵特分子勾結臺灣敵特組織陰謀顛覆我紅色政權的主要犯罪事實。至于所謂的反動傳單，實際是秦嶺深山裏一個有點文化的人寫的日記，被說成是敵特傳單。大會宣布此 4 人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立即執行。人犯立即被拉到寧陝中學後的河灘，一陣亂槍打死。其中一名青年被擊中腦部，沒有立即斷氣。縣軍管會馬部長當著正在接受教育的小學生的面，站在稻田上，拔出隨身攜帶的手槍，“叭叭”對著還在喘息的犯人頭部又是兩槍。該人犯立即腦漿開花。馬部長又用穿著長筒馬靴的腳踢了人犯兩腳，看是否還有氣息。現場的小學生被此舉嚇得直哭。我也隨學校組織到現場觀看，至今每想起那橫七豎八的屍體現場，仍然毛骨悚然。

此案後不到一個月，軍管會又宣布破獲一起隱藏 20 多年的歷史反革命案，並聲稱這是一打三反深挖暗藏階級敵人所取得的一個重大勝利成果。此案共槍斃 9 人。公判大會在寧陝中學大禮堂舉行。我和其他幾個同學悄悄透過破爛不堪的禮堂窗戶向裏看，十幾個犯人（含有判有期徒刑的）全是農民。在呼呼的冷風之中，他們個個穿著破衣爛衫，五花大綁，全身顫抖，縮在牆角。公判大會之後，9 名被判處死刑的階級敵人被拉到稻田，一陣槍響，全部打死。文革中有個習慣，被槍斃的犯人，不許家屬當場收尸，要展示一天，讓廣大人民群眾從血腥的殺人現場接受觸及靈魂深處的階級教育。一般犯人家屬收尸，都是先就近把死尸埋了，幾星期後再選擇人靜夜深時重新挖出來運回老家。

一個多月後，縣軍管會又第三批槍斃了 6 個反革命分子。這次我沒有參加公判大會。這樣，寧陝縣關口鎮在一打三反運動初期的三個月中，共槍斃了 19 人，判刑幾十人，基本全是農民或沒有文化的普通老百姓。

接下來的幾個月，大規模槍斃人的速度開始放緩，更多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是判處有期徒刑。華嚴公社草溝大隊隊長文德清隆冬季節買了一尊毛主席石膏像，天寒地凍放在背籠怕壓碎了，抱在手裏太冷怕摔碎了，就用繩子一頭綁在石膏像頭上，一頭挂在自己脖子上，走在街上被抓住後關進監獄，然後在各公社輪流批鬥，身心受到極大摧殘。軍管會瞭解到他是生產隊大隊長，又是貧農出身，關押游鬥數月後押回原地監督勞動。

因抓人過多，縣監獄人滿為患，只好抓了人迅速判刑，送往安康地區監獄。1970 年，全縣共抓捕近百人，槍決幾十人。最多一次槍殺 17 人，抓捕 38 人。根據我的記憶，在抓捕及槍決的人中，沒有縣機關、學校及所屬各部門的人員，全是農民、林場工人或普通老百姓。全縣共清理案件 160 起，殺關管 356 人。這一年是寧陝縣有歷史記錄以來殺人最多、關押人最多、縣城監獄最繁忙的一年，也是當地老百姓經歷最恐怖、最血腥的一年。文化大革命不僅讓國家各級部門受到衝擊，讓社會精英與名人志士受到迫害，而且在基層對普通老百姓也採取了野蠻殘酷的大迫害。這種踐踏人權、毀滅人性的罪行，應當給予揭露與批判，這樣才能警示後人，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本人寫的這些都是歷史事實，願意對其負責。

---

補白：1967 年夏秋之交，紅色風暴席捲全國。僅 8 月下旬，北京就有數千牛鬼蛇神死于非命。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因毛澤東隨口一句話而更名宋要武，並開始發狂，一人獨欠下五條以上人命。她深知罪孽深重，害怕高懸的正義之劍落下的那一天，文革結束不久便亡命海外，跑到美國再也不回來了。在崇文門，一個地主婆竟被一壺壺開水(強迫附近居民提供)活活燙死。在東四，一個中學生被脅迫用啞鈴砸碎奄奄待斃的資本家父親的腦袋，他本人也因此精神崩潰成為瘋人。 艾柏林

---

作為地主崽的童年 邢詒心

在五兄弟姐妹中，我排行第四，是父親從內蒙勞改回來後的第二年（1958 年）出生的。母親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工地上孕育了我，並且在沒有醫生護士接生的條件下，獨自一人把我生下來。母親因勞累過度，加上嚴重營養不足，我出生時頭大身小，給人的感覺是個畸嬰。

母親出生于海南文昌縣一林姓有錢人家。外祖父是南洋富商，在馬來西亞有橡膠園和商鋪，在家鄉也置有很多土地房產。母親是林家唯一的女兒，美麗聰明，勤快懂事，深得外公外婆疼愛。父親九歲喪父，十三歲失母，靠哥嫂撫養。那年父親參加文昌縣升中學會考，名列第一，名聲大噪。抗戰期間，父親報考了黃埔軍校，後在國民政府機關工作。五二年海南島土改，外公家被定為惡霸地主，家中財產全部沒收。外公外婆在恐懼中撒手人寰，可憐的小舅舅頂替地主之名，長期管制監督勞動，備受精神和肉體折磨。

我家的命運更慘。雖僅有幾畝地，但因父親在國民政府中做過事，被定為地主，並以反革命罪被捕，押送到遙遠的內蒙古蹲監做苦役。母親當時正懷著我大姐，凶殘的民兵將其雙臂捆綁起來，吊在樹幹上毒打。在此慘酷狀態下，大姐難產出世。自己是地主，娘家也是地主，母親既不敢回娘家，也不敢在孩子面前提外婆家。

我第一次看到父親被鬥是在村子的祠堂裏。那天下午，我和小朋友到祠堂去玩，突然聽到祠堂裏傳出雷鳴般的叫罵聲，我們一窩蜂般擁過去看熱鬧。啊！眼前的一切把我驚呆了，

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兩名民兵揪著父親的胳膊，頭壓得很低，黑壓壓的人群揮著拳頭，憤怒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反革命分子低頭等認罪！”瘋狂的叫聲仿佛要把父親的身軀撕碎。我先呆了一會兒，接著大聲哭叫著沖到臺上，抱著父親的雙腿，一邊哭喊“不要欺負我爸爸！”一邊用力摳開揪著父親胳膊的民兵的手。

祠堂裏的人群一下子被我突然的哭鬧聲弄楞住了，整個會場一時鴉雀無聲。片刻沉寂之後，主持會議的人突然一聲狂叫：“把這狗崽子趕出去！”同村一個高個子民兵走上前來，用力扯開我緊抱著父親雙腿的手，像老鷹拿小雞一般拎著我的胳膊就往祠堂外走。

那民兵把我夾在腋下，我哭喊著，掙扎著，用沙啞了的聲音淒慘地喊著：“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我被那民兵扔在村口的沙堆上。他恫嚇我，如果我再過去，他們就會將我和父親一齊宰了。我跟隨著走進家中，母親正用手巾擦拭自己紅腫的眼睛。我猛地走上前撲在母親懷中，哭訴父親正在祠堂被人欺負。母親緊緊抱著我，一邊為我拭眼淚，一邊安慰我說：“孩子甬怕。爸爸會沒事的，會回來的。”

從此之後，父親幾乎每月都會被背槍的民兵帶到外邊批鬥，回來時總是被打得鼻青臉腫。每當這時，母親就上山採摘苦楝樹葉回來煮水，用毛巾蘸著熱騰騰的苦楝水，流著眼淚，輕輕地敷父親被民兵打的傷口。在我們這個一千多人口的鄉里，就有幾十名像父親這樣被定為五類分子的人。最後能平安捱到今天的，除了父親，似乎已看不到第二個了。父親既是中國那段殘酷歷史的受害者，又是那個畸型時代的見證人。父親能活到今日，那真是上帝的恩典。

我六歲那年的一個夏日，比我小三歲的妹妹突然發高燒，躺在床上。母親中午收工回來，見妹妹病得不輕，想留下來照顧妹妹。下午出工哨響了，母親向生產隊長請假，那凶神惡煞不但不同意，反而氣勢汹汹地訓斥母親：“你這地主婆想不勞動，做夢！我們今天就開會鬥爭你和你的反革命老公！”母親只好將我叫來照顧妹妹，我答應會看好妹妹的。母親用手摸摸妹妹的額頭，噙著眼淚扛上鋤頭走了。我照著母親的囑咐，定時給妹妹喝涼開水和在她額上敷濕毛巾。妹妹的燒退了，起來走動了。我覺得任務已經完成，便跟著小朋友上山騎牛玩去了。

傍晚我從山上回來了，看見一大群人圍在我家大門口，我頓感不妙。進了屋子，只見妹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旁邊是一位脖子上吊著聽筒的醫生模樣的人。二哥和父親一動不動地呆在一邊，楞楞地看著妹妹，母親和姐姐跪在妹妹身邊哭成了泪人。我立即意識到出事了，沖過去緊緊地抱著妹妹，一邊嚎啕大哭叫著妹妹的名字，一邊猛搖著她的頭。我不相信剛剛還下地走動的妹妹真的會這麼快離我而去。我感到妹妹這個樣子是我的責任，我對不起母親，對不起親人，我沒有看好妹妹，是我害了她，我無地自容。

過後才知道，妹妹是在我出門之後，跟幾個小朋友到村頭的水庫邊玩，不小心滑進水裏。其他幾名小朋友也都跌入水庫中，但他們很快被大人救起，而妹妹因為是地主的孩子却始終沒人願救。還是母親聽到呼救聲後，才跑過來撈起妹妹。因落水時間太長，妹妹在撈上岸前已漲著肚皮浮上水面。

在昏黃的煤油燈下，我們一家人低著頭，默默地守在妹妹的身邊。妹妹漲得發圓的肚子上馱壓著一包重重的沙袋，慘白的臉上睜著一雙凝滯的眼珠，一動不動。受沙袋擠壓，肚子裏的水不斷透過她那張開的嘴巴，絲絲往外冒。父親緊緊握著母親的雙手，仿佛在無聲地安慰母親。醫生說，沒希望了，要父母準備後事。可我們怎麼也不甘心就這樣眼巴巴望著妹妹離去，一家人痛苦地在禱告著，希望妹妹能夠醒來。

到了第二天凌晨，嘩啦一聲，妹妹肚子裏的水連同胃中的食物，突然一股腦兒被全部吐出，漲圓的肚子也一下子癟下去了。只見她翕動著嘴巴，嚶嚶了幾聲。不知誰在大喊“醒來了！醒來了！”頓時我們都圍了過去。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迹真的出現了，妹妹一雙圓圓的大

眼睛骨碌碌地滾動著。她醒來的第一聲就是問“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為什麼你們都圍著我？”母親熱淚直涌。窮人家的孩子命最硬，妹妹終於逃出這次大劫難。不然的話，我將會遺憾終生。

1965 年秋，我上小學了。母親用南洋親戚送的澳洲麵粉袋為我縫製了一套新衣。第一次背上書包走進校園，興奮的心情難以形容。來到校園門口，母親叮嚀我要聽老師的話，好好讀書，然後在我額頭上吻了一下，便回家去了。

告別了母親，在我剛跨入校門的時刻，幾塊泥巴突然從側邊向我襲來。我轉身一看，幾名比我稍大的孩子，一邊興災樂禍地拍手稱快，一邊叫喊著：“快來打地主仔呀！”他們也學著自己的父母，用鬥爭我父親的手段欺負我！上學第一天，我便嘗到受人無端侮辱的滋味。我緊攥拳頭，不顧一切地朝罵我最凶的一個小孩撲了過去。那孩子冷不防被我摔倒在地。我倆抱在一起，在地上撕打、翻滾。另外幾個孩子一齊圍攏過來，狠扯我的頭髮，撕我的書包。

正當我寡不敵眾的時候，母親突然了。她一邊大聲喊著：“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一邊張開雙臂護住我。群毆我的頑童忿忿走開，嘴巴不停地嚷“打倒地主婆！”

我臉上被抓得道道血痕，胳膊上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新衣服被扯掉鈕扣，新書包被撕斷帶子。看著受委屈的我，母親一把將我摟在懷裏，冰冷的泪水落在我的額頭。我雖年紀尚小，但完全明白此刻母親內心的痛楚。

小朋友不懂事，很難怪他們，但那些為人師表的先生們却連最起碼的憐憫之心也沒有。從上學第一天起，我尊敬老師甚於自己的父母。在父母親面前，我有時會撒嬌淘氣，可在老師跟前，我却是恭恭敬敬，百依百順。我敬重老師，老師却視我為草芥。在學校老師的心目中，我是天生的下等人，沒有人格，沒有尊嚴，誰都可以肆意凌辱我。記得讀小學二年級時，學校來了個姓林的教師。他得知我是反革命的子女後，把我列入另冊，看不起我，冷落我，把我安排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講課談到階級鬥爭，一定要把我父親作為階級敵人的代表，讓同學們耻笑我。他有個三歲的女兒，常帶到學校來。他講課時，常常叫我到課堂外邊替他看小孩子。有時上課時間，他竟要我出去掃地。有一次這個小女孩在教室門前拉得滿地屎尿。當時我正在聽別的教師講課，可這位林先生却走進教室，要我馬上出去將他兒女拉的屎尿清理乾淨。我明知他是在欺負我、愚弄我，可有什麼辦法呢？我清楚我與其他小朋友的處境不同，不能有絲毫反抗，必須咽下這口氣，必須逆來順受。那時，我幾乎被他當成一名童奴使用，稍有不依，除了遭辱罵，有時還挨耳光。學校曾是我日夜渴望的地方，後來却變成了我懼怕、憎恨之地。初小畢業時，我竟然連乘法口訣也不會。

我二哥性格沉靜，非常聰明。小學畢業時，學校推薦他報考海南最好的中學——海南中學。他考上了，那可是千里挑一，但終因父親是反革命，錄取通知書被大隊幹部扣壓。十二三歲的年紀就被剝奪了讀書的權利，回鄉當了農民，二哥接受不了這個突如其來的現實，關起門來哭了幾天幾夜。限制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後代接受教育，逐漸消滅這個反動階級，是毛澤東的既定圖謀。六十年代初劉少奇掌權時，階級鬥爭暫時淡化，我大哥才得以順利上了中學。相對我們幾位弟妹，大哥是個幸運者。二哥、姐姐和我雖然都有讀書的天資，却也只能讀完農村的小學，被剝奪了繼續上學的權利。

二哥失學後，父親鼓勵他振作自學。二哥給自己定下了一個人生大目標——像高爾基、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樣，在艱難的環境中發憤學習，將來成為作家、詩人。白天參加生產隊繁重的勞動，晚上挑燈夜讀。那時大部分鄉村人都是文盲，要找一本書相當不容易。二哥無論是到親戚朋友家，還是到外鄉修水利，只要看到書就借來讀。有時候偶然在垃圾堆上撿到一張別人包東西扔掉的舊報紙或舊雜誌，也如獲至寶拿回家來慢慢細讀。我家原有不少古書，



父親戴上地主反革命的帽子後，害怕惹上麻煩，除了留下一本王雲五編寫的四角號碼字典外，其他書全都燒掉了。父親留下的這本字典成了二哥的良師益友，也使我受益不少。二哥一有空就捧著那本厚厚的字典翻來翻去，即使被調派到外地當勞工，也把那本字典帶在身邊。這本上千頁的字典，二哥耳熟能詳，無論你問那個漢字，他都能準確無誤地告訴你，那個字在字典的哪一頁，怎樣解釋。直到現在，這本字典還一直陪伴著二哥。

二哥每天都讀書到深夜，寫的讀書筆記可能有幾大箱。二哥每天都堅持寫日記，那記錄著他一生辛酸苦辣在日記本，相信他至今仍收藏著。二哥表面文弱，內心剛強。他不滿社會的黑暗，用手中的筆進行無聲的抗爭。二哥寫過一本反映生活現實的書稿，在床下牆頂藏來躲去，生怕被人發現。我那時年幼，讀不懂他寫的這本書。母親說，主要內容寫的是一對出身反革命家庭和地主家庭的青年男女，不滿血腥的現實統治，沖出樊籠追求真愛的故事。這樣一本書稿若被其他人發現，那可要大禍臨頭，輕則被判罪坐牢，重則會被槍斃，而且株連全家。後來父親常被抓走游街批鬥，形勢越來越緊張，母親害怕民兵抄家時將書稿搜出來，就勸說二哥將書稿焚毀了。二哥花費多年心血的勞動成果，在這一刻間付諸東流。

不知不覺間四年過去了，我在鄉間讀完了初小。這四年與其說是上學，不如說是胡鬧。上頭號召停課鬧革命，我們鄉村小學的校長也野心勃勃想趁機大幹一番事業。他和那位姓林的教師一道，乘我們反革命家屬不敢反抗之機，侵占我家祖宗留下的土地。他們要我們這些小學生開荒，毀掉我們家的果木樹林，強占了我們僅有的幾畝土地。四年的初小，我是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的。老師的教育近乎虐待，同學無端侮辱，我幾乎是在誠恐誠惶中度過每一天。我想永遠離開學校，我不想看老師那凶神惡煞模樣，不想聽同學喚我反革命仔。我將自己不想再上學了的念頭告訴父親，想不到被父親狠狠扇了幾個耳光。父母親把我們五個孩子當作他們的希望，最痛恨的就是我們說不想讀書。儘管他對那個年代那種制度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他堅信讀書必有用。

## 青澀慘痛的婚戀 王譽虎

六十年代初，我連續兩年參加高考，兩次的答卷，都自我感覺良好，却都名落孫山，而那些平時比我學習差的同學，却個個登上高等學府的殿堂。這樣的結果，是我一直琢磨不透的迷團。事隔二十年之後我才解開，原來當時地富反壞右子女考生的錄取率只有百分之五，畢竟我的學習成績不在出類拔萃之列。

我曾經反復讀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阿托爾斯泰的《苦難的歷程》、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等文學巨著，為真理、正義而殉道的英雄情結充斥著我的心靈。我家一門三右派（父兄），我自然地擁有出身原罪感，并伴生出一種背叛本階級利益、改造思想、追求真理、獻身革命的殉道者衝動。1963年10月，我偷走戶口本，瞞著母親，報名去北大荒屯墾戍邊。

1966年底我到佳木斯搞串聯時認識了杜崇姪，我們一見鍾情。她是北大荒852農場三分場的氣象員，苗條又漂亮，曾是總場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小杜出生在香港，1964年初中畢業。父親是中國鐵路建設的先驅杜振遠，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畢業。舉家從香港歸國，任鐵道部部長顧問工程師，1958年初被打成極右派。誠慌誠恐在家三年，寫了不計其數的思想檢查。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三個月後逝世。小杜的母親出身大家閨秀，書香門第，相

夫教子。文革初起，紅衛兵抄了小杜在北京的家，母親慘遭揪鬥。

杜崇婭與我相近，受共產黨洗腦教育，有一種家庭出身的原罪感，思想上追求進步，與右派父親和出身地主的母親劃清界綫，力爭脫胎換骨。1969年初，小杜從70多公里外的三分場到一分場六隊來看我。我獨住一棟茅屋，外間是過道和爐灶，里間是土炕和簡單的陳設。我很愛她，她內心也愛我，可她脫口而出的多是公式化、概念化、革命化的語言。我覺得她的身心與語言有著激烈的矛盾和衝撞。在她的影響下，我原本正常的欲望和衝動也受到了抑制。我精心招待她，在老職工家爲她燉了一隻大母雞。我鄭重其事地向她求婚，她則以當時的標準答案回答我：“結婚成家太早不好。應趁大好年華好好學習，好好工作，改造思想，要求進步。”我無言以對。她當時21歲，我25歲。

冬天的夜晚，村內出奇地安靜，我們在茅屋內無人打擾。接近子夜，杜崇婭蹲在外間灶口最後一次添柴燒炕取暖，火苗映照著她那俊美的臉龐。她有八分之一意大利血統，大眼睛楚楚動人，通天鼻綫條優美。我情不自禁地彎腰輕吻了她的烏髮。她沒有反應，繼續向灶眼添柴。過了一會兒，她站起來，呼吸有急促，說：“我累了，我想睡覺。”

我已把炕上的被褥爲她鋪好，輕攬著她的腰身，扶她坐在炕沿上。我蹲下爲她脫鞋脫襪，然後又爲她寬衣。她穿著秋衣秋褲鑽進了被窩。我坐在炕沿上，撫摸著她纖細的手背，仔細端詳著她，愛情之火在我胸中升騰。杜崇婭突然雙手輕拽我的胳膊，我敏感地接收到了這一信號。正待我準備摟抱親吻她時，她却又把我推開，發出了近似無助地哀求：“你別糟蹋我，你別糟蹋我！”

我像被電擊一樣驚愕，滿懷熱烈真摯的愛情猶如被潑了污水，瞬間聯想起當時的一個時髦詞彙——奸污。在那個年代，婚前性行爲被認爲是不軌行爲，是大耻辱。我真心愛她，本能的肉欲並不強烈，理性的愛情主導著我。我站起來溫存地說：“崇婭，你好好睡吧，扣好門。我到男生宿舍去，明早八點我再來。”我至今懊悔我的放棄。如果我不放棄，門當戶對的我們或許會很幸福美滿，而後的災難或許也會避免。

不久，小杜的特殊身份和經歷，以及與我的親密關係，使她成爲派系鬥爭的犧牲品。革命群眾專政指揮部挂牌游鬥她，大辮子被剪掉，大木牌上寫著“地主右派的狗崽子、壞頭頭杜崇婭”，名字上面還打著叉。我開始對挂牌、戴高帽游街示衆的暴行產生咬牙切齒的憎惡。這種醜化人格、踐踏尊嚴、玷污靈魂的行徑遠比法西斯惡毒和下作！杜崇婭是那樣的美麗、純真和自尊，面對被扭曲、醜化、踐踏的她，我倍感內疚和自責。

幾個月後，我接到杜崇婭的來信，說她已“解放”，在三分場五隊勞動，很想我。我利用休息日，騎著從修配所借來的摩托車，風風火火地趕到了三分場五隊。那時已是深秋，天氣很涼。杜崇婭身穿褪色發白的藍棉衣，腰間扎著繩子，明眸皓齒，風采依舊。我的到來顯然給她帶來了快樂。雖然她很克制，我仍能感受到她對我的深情依戀。我們的時間不多，中午一點還要出工，我們相互噓寒問暖，在宿舍交談了一個多小時，然後去打飯。食堂很大，牆壁貼滿大字報，其中有幾張是批判杜崇婭的，而那張杜崇婭自己批判自己的大字報吸引了我的眼球。

這張自我批判的大字報，字裏行間寫滿與反動家庭決裂、與父母劃清思想界限、立志脫胎換骨改造自己、走革命化道路的誓言和決心，甚至罵大地主出身的媽媽是老母狗。爲此，我異常嚴肅地批評了她。杜崇婭懊悔地說：“那一陣子（半個月前）把我鬥暈了，好像天要坍了似的。如果沒有你，我可能就自殺了！”吃完午飯，她要出工去場院幹活，我們戀戀不捨地分開了。從此一別四十二年。

分開不到一星期，我接到了杜崇婭寄來的一封信。她鄭重其事地提出與我分手，並要我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毫無疑問，這封信是迫於壓力違心寫的。

我又開始戀愛了。新的戀人劉某，出身高幹家庭，六六屆高中畢業，六八年八月下鄉，

雖能歌善舞，但不張揚。她愛看書，熟讀雨果、巴爾扎克、大小仲馬、司湯達、海明威等大家的名著。她有一副好嗓子，1960年精神度荒時出版的《外國民歌二百首》幾乎全都會唱。她思想活躍，對極左那一套有一種本能的反感。不論是意識形態還是家庭出身，她與杜崇姬都有著明顯的反差。俄羅斯、蘇聯名著她看的不多，但她贊賞並理解那種殉道般的獻身精神和傷感深沉的情調。我們情趣相投，彌補了我與杜崇姬分手後的空虛與孤寂。幾個月後，我們便從知音、朋友發展成戀人。麥收過後，我向指導員馬吉海申請回京探親結婚。馬表示祝賀和支持。

在北京家裏，媽媽得知劉懷孕了，眉開眼笑，一口承諾將來負責帶孫子。兩個月後，我們回到農場，意想不到的噩夢開始了！我們的結婚申請被工作組扣壓。馬指導無奈地說：“團政委有指示，不經他同意不准王譽虎和劉某結婚登記！”我怒火中燒，去找工作組常駐副組長陳紹儀理論。陳是現役軍人，小個子，黃面皮鼠眼，陰陽怪氣地說：“別著急嘛，先把問題搞清，態度要端正，拖三五個月怕啥呀！”我判斷工作組已經知道劉懷孕的消息。在工作組策動下，對我的揭發批判開始了。

內心無愧加上性格因素，我堅決不肯違心檢查，更不肯低頭認罪。僵持一個多月，工作組仍不批准我們結婚。我與劉商定：請事假回京做人工流產，或分娩後在京滯留不歸，我獨自在這裏與他們周旋到底。

一星期後，劉收到一封電報：“奶奶病危，速歸！”劉找到工作組，副組長陳紹儀說研究一下再答復。晚上開大會，陳紹儀代表工作組宣布：“劉的電報有問題，不予批准。從今天起，劉某離開一分場必須請假，若到總場必須要有人陪同！”工作組一方面限制了劉的人身自由，一方面找劉多次談話，做思想工作，大談階級鬥爭，讓劉不要辜負革命先輩的期許，不要被階級敵人拉下水、站錯隊，並許諾，如果揭發檢舉王譽虎的反動言行，殺他的回馬槍，工作組會安排劉去醫院做人工流產，調到團部中學教書。

一直都沉默不語的劉，在陳紹儀攤牌後，終于一反常態地光火了：“我用不著你來教育！我父母參加革命時還沒有你呢！你們憑什麼限制我人身自由？難道我是黑五類？你們憑什麼違反婚姻法不讓我們結婚？你們違法，違背黨的政策！小心我去告你們！我和王譽虎兩相情願，我們結婚結定了！”

陳紹儀顯然已掌握了劉的身世，知道劉的父母只不過是三七年參加革命的中高級幹部，對他陳紹儀構不成制約，便陰險而強硬地說：“毛主席說重在表現，出身再好，表現不好，站錯隊，也一樣犯錯誤！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我們既不能結婚登記，劉也無法做人工流產。工作組的惡毒和卑劣昭然若揭。我顯然即將成為階級鬥爭的祭品，老婆孩子也將面臨終生的不幸！

憤恨、恐懼、焦慮襲擾著我。未婚生育在當時是讓人無地自容的醜事，孩子成為私生子更是滅頂之災。前思後想沒有出路，我的精神接近崩潰。為了妻子，為了即將降生的孩子，為了避免家庭悲劇，我屈服了，我走進了工作組預設的圈套。我瞞著未婚妻劉某，主動找陳紹儀低頭認錯，狠批自己的資產階級人生觀，甚至主動坦白曾與有夫之婦有過曖昧關係。我一時的脆弱、膽怯讓我悔恨終生，至今都不能原諒自己！

我太天真了，我誤以為我的屈服能換來工作組的赦免。工作組不只需要屈服，更需要的是揪出階級敵人！我的屈服正好給工作組提供了炮彈。他們乘勝追擊，擴大戰果，要置我于死地。懊悔悲憤之下，我狂飲了半斤多70度的北大荒白酒，躺在茅屋土炕上爛醉如泥，大罵工作組，並狂言要拿衝鋒槍嘟嘟了陳紹儀！

工作組威脅利誘劉未果，便在與我接近的北京知青中安插眼線。1968年來場的六六屆北京知青王某某出賣了我。第二天晚上開全體職工大會，我被當場揪鬥羈押，罪名是企圖槍殺解放軍。我因此被看管強制勞動8個月，白天8名六九屆的女知青輪流看管，夜間一名老職工和一名男知青徹夜監視。監管期間，我斷斷續續瞭解到外面的一些情況。團政委王學禮

在大會上親自宣布：“王譽虎與劉某現在不能結婚，將來也永遠不許結婚！我們要對革命幹部的後代負責，時刻不忘階級和階級鬥爭！”

一個雨夜，負責監管我的天津知青趙子玉，帶我偷偷摸摸地來到了妻子獨住的茅屋。第一次看到沉睡在襁褓中的兒子，我心如刀絞。前途未蔔、凶多吉少的我若真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將淪為比印度賤民、比納粹德國的猶太人還不如的專政對象，我的妻、我的兒也將淪為紅色中國的賤民。妻子劉很平靜，沒有半句怨言，只是說孩子剛降生半個月，她父母還不知道。工作組威脅要與她父母聯繫，逼她與我決裂。妻子還說，孩子快出生時，她準備把孩子送人。但當兒子呱呱墜地，看到粉紅的濕漉漉的兒子時，她覺得不能失去兒子，即使再艱難也要把兒子撫養成人。

我極其痛苦地告訴他：“我要是真定為反革命，你就離開我，最好托你爸爸或你在成都軍區的叔叔，走後門參軍。孩子的歸宿你決定，反正不能讓兒子知道有我這樣一個反革命爸爸。”我吻了妻子，又輕吻了熟睡的兒子，便悄然回到“牛棚”。趙子玉，這位天津知青，我和前妻至今都還感激他。

而後，在工作組和她父母的壓力下，在無依無靠的惡劣環境中，劉忍痛把已滿三個月的兒子送給了團部中學的一位教員。幾天之後，在劉送給我的棉被裏發現一張卷緊的紙條，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筆迹抄錄了一首聞一多的詩：

花兒開過了，果子結完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驕陽炙幹了，  
一夏底榮華被一秋的底饑風掃盡了。  
如今敗葉枯枝，便是你的剩餘了。

天寒風緊，凍啞了我的心琴；  
我慣唱的頌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傷心，我的愛，  
琴弦雖不鳴了，音樂依然在。

只要靈魂不滅，記憶不死，縱使  
你的榮華永逝（這原是沒有的事）  
我敢說那已消的春夢餘痕，  
還永遠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況且永繼的榮華，頓刻的雕落——  
兩兩相形，又算得了些什麼？  
今冬底假眠，也不過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殘，果爛，葉敗，枝空，  
那縝密的愛底根網總沒一刻放鬆；  
他總是絆著，抓著，咬著我的心，  
他要抽盡我的生命供給你的生命！

愛啊！上帝不曾因青春的暫退，  
就要將這個世界一齊搗毀，

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兒暫謝，  
就敢失望，想另種一朵來代他！

妻離子散的痛苦像毒蛇一樣噬咬著我的心，工作組的惡毒卑劣殘忍讓我仇恨滿腔，復仇雪恥的念頭逐漸成熟。當時正值中蘇邊境暴發武裝衝突，每個連隊都抽調幾個知青去武裝連集訓。武裝連有幾個哈爾濱知識青年與我關係不錯，有時假借與看管我的知青聊天來看我，給我好烟抽。他們背著衝鋒槍，有時就把槍放在炕上或靠在牆邊。我決定鋌而走險，捨命相拚。工作組辦公室與我相隔一棟房，晚上陳紹儀就睡在那裏。我以寫檢查之名寫了絕命書，準備看準時機，搶槍幹掉陳紹儀，巧遇王學禮政委更好，然後引彈自盡。

有一天晚上，副指導員突然來“牛棚”查崗，看到兩個武裝連的知識青年把衝鋒槍靠在牆邊，申斥道：“槍不離身，身不離槍，你們怎麼這麼隨意！”副指導員剛從部隊轉業，左得出奇，知青反感他，不買他的帳。兩個知青異口同聲地說：“彈夾是空的，沒子彈怕什麼。”真是天不絕我！如今想起來還有些後怕——那時哪怕我搶的只是一支空槍，我也死定了。

兩個月後峰迴路轉，我的監管解除了。在此十天前，我已從小道消息得知未婚妻劉已經走後門參軍（縣團級及以上的幹部子女享有這一特權）。幾個月後，我接到劉的一封信。

“老虎：你被解除看管，讓我驚喜！那個流氓、惡棍政委早晚要遭報應！我沒經受住考驗，爲了離散的兒子，我向你請罪！工作組恫嚇欺騙我，說你是破壞解放軍支左的反革命，政治上已宣判死刑，爲了不斷送我和孩子的前途，爲了不做黑五類的親屬，也爲了維繫與父母的關係，必須讓我與你當機立斷。我太輕信了，也太脆弱了——實在無法忍受那屈辱而又艱難困苦處境，實在忍受不了看不到希望的煎熬！工作組還與我父母串通，不明真相的父親勒令我要麼走後門參軍，要麼斷絕父女關係！參軍，猶如從地獄直奔天堂，自私的本能占勝了羅漫諦克！我再次向你請罪，爲了我們的兒子，也爲我對你的背離！這封信是進城投遞的，你可以回信，但要注意分寸。我愛你，一如既往——如果你還能原諒。”

我沒有責怪她，還爲劉跳出火坑而欣慰。幾經打探，半年後我查到了兒子的下落。我去看望離散的兒子，領養人感到錯愕、驚慌。他們曾被告知，孩子的父親王譽虎是反革命，沒有出頭之日的可能。已滿周歲的兒子顯然營養不良，大腦袋與身子不成比例。兒子似乎認識我，喜歡我的愛撫，依偎在我的懷裏不願分離。我想要回孩子，年逾花甲的老母親也特意從北京趕來與養父母協商。兒子的養母胖胖的，慈眉善目，是學校的炊事員，看來很疼愛孩子。藉口是組織安排，她拒絕了我們母子倆的要求。此後半年，我幾乎每個星期都去看孩子，給他帶糖果和玩具，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資花得所剩無幾。

孩子開始叫我爸爸了，悲喜交集的我再次與收養人進行交涉。養父是一位面目陰沉不苟言笑的轉業軍人，與養母性情迥異，說話不講情理：“你想要回去可以，但有兩個條件：第一是必須徵求生母的同意，第二是要付撫養費。這孩子身體不好，看病、營養沒少花錢，快兩年了，最少要兩千元，包括我們的精神損失費！”

兩千塊錢對於當時月薪 38 元 6 角的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我的媽媽儘管想孫子心切，可她也沒什麼積蓄，愛莫能助。爲此，我與團政治部交涉，說這妻離子散的悲劇事出有因，上級組織應承擔責任，幫助解決，遭到他們婉拒。

三個月後，兒子的養父母舉家搬遷，地址不詳，相關領導聲稱負責爲他們保密。兒子的失蹤給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對兒子的思念噬咬我的心，最終化成對造成這種家

馬克思評普魯士書報檢查令/焦國標書 庭悲劇的制度的仇恨。

一、本刊免費贈閱，歡迎來稿。請用電子郵件寄稿，以免編輯再次錄入。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mailto:xyc1971@gmail.com)。

啓 三、本刊聯絡手機：13240468075。

四、本刊免費贈閱。願資助《憶舊》半月刊的朋友，  
則請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示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305 甲樓 110 號陳星宇收，郵編 100091。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工商銀行馬連窪支行，  
賬號 0200251101028450741，戶名陳星宇。

## 《黑五類憶舊》第六期 20101016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仇恨如何才能消滅 焦國標

周舵先生說：“《黑五類憶舊》把歷史的真相記錄下來，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變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記錄。”這個擔心提得好。在一個崇尚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社會，如何消滅仇恨，確是一個大問題。

最近研讀幾本基督教的書，其中一個現象引起我的注意：耶穌和此後殉道者的死法。面對行刑的羅馬兵丁和猶太同胞的戲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穌竟為他們禱告：“父啊，饒恕他們吧，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個殉道者，死于耶穌死後兩年，在耶路撒冷城外執行極刑。當亂石雨點般砸來時，司提反平靜地跪下祈禱：“主啊，不要將這罪歸于他們！”說完這話，據聖經《使徒行傳》記載，司提反像睡著了一樣死去。耶穌的同母弟雅各，因傳講哥哥耶穌是上帝的兒子，被人用石頭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聖殿門外。死前，他重複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話：“父啊，饒恕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基督耶穌為後世門徒不僅樹立做人的榜樣，也仿佛為他們開啓了一個就死模式。十六世紀，在歐洲各國，私自將聖經翻譯成方言仍是死罪，聖經英文翻譯的開拓者威廉·丁道爾即因此被英王判處火刑。臨死前，丁道爾不是詛咒國王，而是為國王祈禱：“主啊，請你打開英格蘭國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間，臨難時為殺害自己的人禱告成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的就死風度。這堪稱是一個人類奇觀，一個可能是僅發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類奇觀。

中國傳統的主要就死模式有兩個。一個是戲曲野史小說裏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壯語是“二十年之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砍頭不過碗大個疤，要殺要剮悉隨尊便”。另一個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譚嗣同大叫“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國共產黨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號。抗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趙一曼、吉鴻昌、狼牙山五壯士等皆呼此口號。反蔣烈士是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江姐、劉胡蘭、鄧中夏等臨終即喊此口號。瞿秋白是個過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場的路上他唱國際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到刑場，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後盤腿坐下，等待槍響。混合了中國傳統精英和共黨烈士的就義模式。

文革時期，中國推出一種別具新意的就死模式，被動消音模式。代表性的個案是林昭、王佩英、張志新、李九蓮之死。槍決前，林昭、王佩英都是喉管處勒著繩子，李九蓮則是舌頭和下顎被竹簽扎在一起，張志新被按倒在地，頸下墊磚，不消毒不麻醉，一刀把喉管割斷。其中林昭、李九蓮之死還有後續，林家被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九蓮則遭拋尸、奸尸和割去雙乳。

殺戮與仇恨互為因果。可是為什麼耶穌和聖徒被殺戮時卻沒有仇恨？他們過濾、吸收仇恨的力量從何而來？當今西方的社會政治文明與殉道者的就死風格有著怎樣的聯繫？試圖消解仇恨和試圖構建和諧社會的中國人，似應深長思之。

## 目 錄

中國邪火·····	周 舵 (04)
佩英不朽·····	郭宇寬 (09)
我的大學·····	徐化揚 (18)
右派教師歲月·····	顧延齡 (27)
我的母親·····	朱國琳 (33)
作假證·····	衛普安 (38)
戀愛守則·····	李子軍 (43)
父親的背影·····	梅桑榆 (45)
松北土改親歷記·····	馮志軒 (50)
運東的土改復查·····	碧薇萍 (56)
我的高中·····	丁曉宇 (59)
鬥四伯·····	李佐廷 (62)
母親上官雲珠·····	韋 然 (65)
建國後的宋慶齡·····	何 方 (67)
也說侯振亞的兒子·····	心不易 (70)
曾家的寶珠·····	史 海 (73)
地主婆劉大妮·····	張耀杰 (75)
鄉村批鬥會·····	梅桑榆 (80)
新加坡僑生洪氏兄弟·····	佚 名 (83)
按出身殺人·····	姚治邦 (86)
反革命輪奸犯·····	朱之泓 (90)
北大荒片段·····	王譽虎 (92)
我的朋友顧復初·····	朱長超 (97)

我的那篇《自殺——一個案例研究》，是六四之後被關押在昌平一個招待所時寫的。那時正一肚子邪火無處發泄，寫下的東西，“真實”是可以保證的，但畢竟火氣太盛，有失厚道——尤其對我的父親。現在真有不堪複讀之慨。

我母親是相當嚴重的潔癖。我一直以為這很好，以至于在朋友之間我也以潔癖著稱。直到自己得了哮喘，才知道清潔過度原是哮喘的禍根之一。後來娶了太太，她乃一超級潔癖，這時我才恍然大悟：潔癖正是我父母爭吵不斷的戰火之源！我從中合邏輯地得出了凡事不可走極端的結論。從此我改邪歸正，潔而無癖。

父親文革中被關押在單人牢房 6 年，成了躁鬱型精神病人，1973 年出獄，直到 1989 年病故，16 年之間，除去最後幾年有保姆幫忙之外，基本都是我在伺候。洗衣做飯，吃藥看病，洗澡理髮，一切一切，都得我一手照料。你要是沒有親自照料過精神病人，根本就不可能瞭解。那不折不扣，就是一個活地獄。同時我還要上學（讀研究生），上班（在大學教書），等等，真是“二斧劈柴”，心力交瘁。我自己常常納悶，我哪來的忍耐力，居然挺過了這 16 年常人無法想像的非人煎熬？我的神經莫非真的是鋼絲做的不成？話雖如此，畢竟人的神經不是鋼絲做的，心裏鬱積的邪火，也就難免借文字發泄了出來。

由此想到我們中國人這個邪火十足的民族。

邪火不一定是出于邪惡的動機。我指的是憤怒和仇恨這些心理學上明顯屬於負面的不健康的情緒情感及其造成的危害。好動機未必有好結果；事實上，那些有著十分公平正義甚至是崇高道德感支持的邪火，往往反而危害最烈。很簡單，正因為它基于正義衝動和崇高道德，才會對於人類當中那些比較優秀的、自覺“仰望星空”的那一部分成員產生巨大的感召力，而優秀的人才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于是，憤怒和仇恨就被成十倍地放大，其後果也就尤其嚴重。“通往地獄之路，常由善良願望鋪就”，信哉斯言！

焦國標的《黑五類憶舊》把歷史的真相記錄下來，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變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記錄。相反，我們倒是應該下大力氣挖掘 1949 年以來這部人仇恨人的歷史的總根子，以為後代永遠的鑒戒。

有一本好書，《仇恨的本質》，值得大力推薦。美國人寫的，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人類有兩個大腦，低級的和高級的。高級大腦是人類文明化社會生活的產物，低級大腦是我們的爬行動物祖先遺留給我們的，仇恨就是我們低級大腦的一種本能。仇恨本能在我們面對嚴重威脅，尤其是生死關頭時，能調動起身體的自衛潛能，所以是不可少的。只不過，它往往會和高級大腦的某些思維功能結合，轉化成一種初級原始思維，從而把仇恨合理化、理論化。

初級原始思維有以下七大特點：

1，表面聯想式思維。一個人在某月 13 號吃了交通罰單，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車又壞了，于是初級思維馬上得出結論：13 號的星期五注定是個倒黴日子。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簡單概括性思維。初級思維只知道混為一談、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種各樣，有的有毒，有的無毒，應當區別對待。這種思維經常和草率概括結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過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類之敵”的結論，同時伴隨著強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懼和厭惡感。

3，極化思維。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我即敵。

4，個體化思維（主觀化、情緒化思維）。每件事、所有的判斷，都和個人的情感、利益、願望緊緊相連，不能跳出自我做客觀公正與己無關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狹隘經驗式思維。固著于現在和過去的有限經歷當中，既不能對過去進行反思，又



不能通過運用想像力對未來作出預測。

6，選擇性記憶。只記得和“仇恨”有關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場景，而忘記其它成分。

7，刻板反應。一切被歸入“敵人”類的人和事物永遠會本能地引起強烈的仇恨，沒有靈活、從容對待的餘地。

對照一下這份清單，我們馬上就會聯想起那位大鬍子鼻祖，想起他那一套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極左教唆。不管塗上多少理論、學說、科學的油彩，也遮掩不住其你死我活、敵我二分、非黑即白的“初級原始思維”的本色。

請一定注意：我們中華文明當中原本沒有這種東西。儒釋道墨，甚至最嚴酷的法家，也沒有幼稚低劣到這種地步。中國歷史上有無數“初級原始思維”的事例，那些以道德殺人、以理殺人的事例即是。但是，我們絕沒有這樣一種完全建立在初級原始思維地基之上，堂而皇之，成體系并且自稱“科學”的大套理論！我們千萬不要高估一個半世紀以前西方極左派們的水準。他們實在是蠢透了，簡直無可理喻。當今中國的極左派們之不可理喻正是祖傳的。我們中國人原本沒有那麼蠢——我們從來沒有過奴隸制，我們原本不可能幹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一類蠢到遠低於普通百姓常識水平的大蠢事——哪個老百姓的常識會相信畝產十幾萬斤糧？說到底，是近代以來，我們追求富國強兵、現代化，向西方學習卻沒找對樣板。好的沒學，偏偏把最壞的東西學來了，才會有了那個完全是人為建立的，由黑五類的悲慘遭遇所集中體現的，20 世紀的新奴隸制。甚至，比奴隸制還壞，是新種姓制，現代極權政體下的種姓制，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空前殘忍、極其荒唐，全民赤貧（一小撮特權階級除外）、自由等于零的超級專制。把它的根源扯到中華文明頭上，是一樁大冤案。中華文明當中當然也有最壞的東西，那就是自秦以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但那也比當代自西方輸入的極權奴隸制好過一千倍！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相輔相成的，前述初級原始思維就是和極權主義制度相適配的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能够有效保障個人自由的制度（法治和憲政下的民主）必須有相應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支持。至于什麼是公民文化，請看另一部好書，東方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公民文化一定不允許煽邪火，即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對立和鬥爭，一定不能搞黑白二分、善惡是非敵我截然對立那一套。相反，一定要牢牢樹立起普適人權的核心觀念。只要是人，不是阿貓阿狗，不是桌椅板凳，不論階級出身、性別年齡、貧富強弱、智愚賢不肖，哪怕他是個白痴，也必須享有憲法載明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人格尊嚴，身體、財產和生命安全，思想觀點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等自由。就連“十惡不赦”的罪犯，除去依照公平正義的法律審判限制其部分自由權利之外，仍然必須享有其它基本權利。普適人權的意思是，基本自由權利適用於每一人，絕無例外；當然，更是絕對不允許把“人”區分為敵我，什麼“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

公民文化強調“恕道”，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恨罪行，不恨罪人”，反對自封為道德審判官，專門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審判別人，就是不審判自己。我們必須認識到，極權主義是非常複雜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這段空前慘痛的歷史，不是單單靠道德審判就能够清算的。極權主義犯下了駭人聽聞的嚴重罪行，但是，我們仍然要“恨罪行不恨罪人”，“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更要認識到，極權主義的罪行是集體犯罪。儘管責任有大小，但是，除了像王佩英、林昭這樣的極少數人之外（我不是指她們的一切言行，是指她們的精神），應負的責任我們人人有份！

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Jaspers）曾經區分過四種責任：1，確有違法行為的人應負刑事責任；2，幫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責任者獲得權力的人負政治責任；3，聽任罪行發生的人負道義責任；4，一切沒有盡到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人負抽象責任。按照這一標準，對於

絕大多數人，責任的界限劃在何處，勢必是個大有爭議的問題。即便是身為“黑五類”，我們仍然不妨反躬自省：我們沒有打罵、侮辱、迫害過其他人(犯刑事罪)嗎？我們沒有追隨和支持過那個壞制度（幫助犯有刑事罪的責任者獲得權力）嗎？我們沒有“聽任（默認）罪行發生”嗎？我們曾經像王佩英、林昭那樣挺身反抗過嗎？我們盡到了“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責任了嗎？進而，假定我們不是“黑五類”，而是“紅五類”，在那種恐怖的制度之下，我們真的能够保持作為“人”與生俱來的仁慈和良知，如焦國標所說，“扎緊我們的籬笆”，或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善盡“捍衛人類文明標準的責任”嗎？

我想，仔細反思過自己以上的種種責任之後，我們的邪火一定會少得多吧。

補白：遇羅克進監獄後對難友說：“何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後人的共鳴。”當局向遇羅克宣布將被處決的消息，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轉達給家人，他挖苦地說：“我想要一枝牙膏。”臨刑的前夜，遇羅克跟死囚牢裏的難友們舉辦了一次特殊的晚會，各自在單人牢房裏唱起自己喜愛的歌，有合唱也有獨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說了許多勉勵的話。1970年3月5日，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年僅27歲。遇羅克在獄中的時候，有個名叫張郎郎的幹部子弟，很佩服遇羅克的才學和膽識，問他：“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遇回答：“值得。”他對張說：“你過去一直生活優越，對家庭出身問題沒有體會。而我幾次高考，成績優異，都不予錄取，像我這樣的並不是一兩個。可以說，我們從初通人事那天起就是被社會歧視的。你不瞭解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心情。”？

## 佩英不朽 郭宇寬

1959年初的一天，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托兒所的小孩們被帶到戶外活動，王佩英和高淑琴打掃室內衛生。王佩英燒了一鍋熱水，為了擦臥具或者消毒。在她端著一臉盆熱水經過一個光綫幽暗的過道時，一個小孩突然沖了進來。王佩英毫無準備，避讓不及，一些水潑到了孩子身上。小孩衣服脫下來，肚皮上燙了一小塊紅。有些人借此整人，“狠挖思想根源”。會上，有人反復責問王佩英：“當時你腦子到底在想什麼啊？”同時也有人開始挖她的出身問題，說她是“地主丫頭”。此事不久，王佩英被調離托兒所，轉到單身宿舍當清潔工。以幹部身份被安排當清潔工，顯然這是一種政治打擊。

1961年，王佩英買了一尊白瓷的毛主席像放在家裏。那時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氛圍還不像後來文革時期那麼濃厚，買毛像的家庭還是比較少的。兒子張大中記得，母親剛買來這尊像之後還對孩子們說：“毛主席可是我們的恩人啊。”同時王佩英對劉少奇也非常崇敬，在1959年單位辦的慶祝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的會上，她不稱劉主席，而稱少奇同志，非常有感情的樣子。在家裏，王佩英有時一邊帶孩子們洗腳，一邊捧著《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聲閱讀。

大約是1962年，大饑荒之後，王佩英的思想發生變化，從把毛視為恩人轉變到直接批評。她公開表示，劉少奇是對的。“毛主席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不然他以後沒有退路。”“領導共產黨變質的就是毛澤東。”1963年3月，單位用車把王佩英送到精神病院看病，但並沒有看出什麼病來。她的檔案中記載，1965年以來，王佩英“多次瘋狂攻擊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還寫了13條反動口號惡毒的攻擊我們偉大領袖”，“吹捧世界上最大的叛徒修正主義頭子赫魯曉夫和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以及右傾機會主義者陳獨秀。”到這個時候，在單位已經沒有人敢和王佩英講話。她甚至激烈到去天安門廣場和靈境胡同散發傳單。靈境胡同是中組部所在地，她大概此時還寄希望共產黨的組織程序能糾正這

種不正常的政治走向。但是毛澤東此時連劉少奇都要消滅，組織部又能起什麼作用呢？

1965 年 4 月，王佩英做出了今天看來驚世駭俗的舉動——要求退黨。“我不願當人民的罪人，我要退黨。共產黨雖然前一段革命有功，但現在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停滯不前了，已經站在人民頭上壓迫人了。”“共產黨員都有特殊待遇，過去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是為了解放人類，而現在共產黨是高官厚祿，養尊處優。”“我再不退黨，我的罪就更大了。我堅決退黨，從現在起我不參加你們的會了，不交黨費，你們也管不了我了。”“共產黨官越大，越騎在人民頭上，那些坐小汽車的都够勁。”

1965 年 7 月，王佩英又提出書面退黨申請。“誓死不信不信，一定堅決不信仰共產黨，速辦退黨手續交我本人。”“一人做事一人當，甘心情願，願為六億人民利益出發，絕不改變自己，絕不顧惜自己的一切。”不久，王佩英被單位強制送進安定精神病院，幾個月之後轉至回龍觀分院。

大多數友人對王佩英是非常同情的，但很少有人能理解她的思想，也很少有人敢去理解她的思想。曾潔光聽說王佩英住院了，買了蛋糕去看望。那天王佩英非常清醒，很動感情，回憶了當年地下黨在開封戰鬥的很多情景。許多細節曾潔光都忘了，王佩英却記得一清二楚。講到當下，她開始批評毛澤東。曾潔光不敢接話，匆匆告辭。回到家裏，曾潔光難過得留下了眼淚，對妻子說：“王佩英真的是瘋了，她連毛主席都敢罵。”

這個階段王佩英有很多言論譴責共產黨、毛澤東變質了。“共產黨員不管老百姓饑與渴。”“共黨居世，鐵打江山。共產黨員，著上馬衣。升官發財，耀武揚威，騎在民身，作威作福。只顧自己，不顧人民。”“四大家族都逃走。五大家族毛澤東，人民財產歸你手。”“陳獨秀是好人，應該永遠紀念他。”

王佩英在看透了高層政治的醜陋之後，在單位和社會上挺身而出，在家裏卻從來沒跟孩子們提過這方面的問題，也沒表露過這方面的想法。在王佩英堅決要求退黨的時候，她的孩子們都還在積極的向黨組織靠攏。那段時間，王佩英經常給兒子大江講一個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的故事：一個國王臨死前，把孩子們召集到床前，給每人一支箭，讓他們折，兒子們輕輕鬆鬆就折斷了。老國王又拿出來一把箭，讓他們折。他們用盡力氣，誰也折不斷。大江對政治毫不關心，但對朋友很講義氣。想來母親是希望大江日後能照拂兄弟姐妹。文革期間，作為黑五類子女，王佩英的孩子們的確沒有受過紅衛兵多少欺負。

最小的孩子女兒張可心記得，1965 年前後，春夏之交的一天，晚飯後，媽媽專門拉著她一個人出去散步，別的孩子都沒帶。走到大約是軍事博物館附近，母親摟著開心，很認真地說：“媽以後要是不在了，你一定要懂事，學會自己照顧自己。”可心當時就哭了，摟著母親說：“媽媽別瞎說，不會的。”

王佩英住在精神病院那幾年，大中每隔一段時間都在周末去探望母親。每次去都帶大約 1 元錢的營養品，比如藕粉之類。母親從不和他談自己政治觀點，只問候一些最普通的家常，母子常常是相對無語。有一次大中去醫院要走的時候，一個好像是工友的中年婦女攔住他說：“你媽平時可想你們了，整天念叨你們，特別是你們的小妹妹可心。你還不回去拍張合影，讓你媽能看到你們。”1967 年夏天，兄妹們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合影。最小的三個孩子，扎著紅領巾，在前排，笑容純真燦爛；身後的四個哥哥，表情都是嚴肅的。

有一次，大去看母親，時間到了，在他準備告辭的時候，王佩英突然說了一句讓他當時毫無思想準備，之後終身刻骨銘心的話：“孩子，媽做的事可能會拖累你們，媽對不住你們啊。”

被關在精神病院的王佩英，每天都被喂服或注射大量鎮靜藥物，導致反映遲緩、口角流涎，但她的基本信念始終非常清晰。1965 年 12 月 20 日的病歷中記載：“治療已達五個月，病情不見好轉，若令其出院對社會影響不好。”

1967 年 1 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凡是投寄反革

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爲，應當依法懲辦。”至7月，北京已組織了公開批鬥劉少奇的批判大會。

已經沒有理由再把王佩英作爲精神病人看管了。1968年6月6日，主治醫師吳志長寫了王佩英出院診斷證明：“經過住院期間觀察，除高血壓病外，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無精神異常，在住院期間思想反動，對黨不滿，經過思想教育仍不改，故由機關接出處理。”

那是初夏的一天，大中正在家中，母親單位的王世彥書記在樓下喊：“王佩英的孩子快下來。”那天王的態度非常嚴厲，是公事公辦的表情，告訴張大中：“你準備一個洗臉盆、一塊肥皂、一個毛巾，拿點兒你母親的衣服送來。”王世彥的態度讓他感到脊背發涼。出于潛意識中的恐懼，大中收拾好這幾樣東西，却不敢去送，叫小妹可心送去。

被從精神病院押回單位的王佩英，開始接受更殘酷的群眾專政。關押的地方離家不遠，懵懵懂懂的小可心拎著給母親物品，來到了關押母親的地方。敲門，開門的是一個凶狠、面無表情的男人。可心說給母親送東西，那人接了過去，門就砰的關上了。

這只有幾秒鐘的一幕，永遠印進了張可心的腦海。房間裏，對門有一張桌子，一個人坐在桌後，一個背影像是母親的女人，手被綁在身後，雙膝跪在桌前，身後還站著人。也許是聽見了可心的聲音，這個女人掙扎著扭過身來。在她側臉時，可心看清她嘴上戴了一副像是口罩的東西。這個女人應該就是王佩英，她應該也聽見了可心的聲音，也許只要再有電光火石的一剎那，她就可以扭過頭來，和她朝思暮想的小女兒可心見上最後一面，門却無情地關上了。

那副口罩一樣的東西，是中國人最有想像力的發明。“革命者們”在林昭身上也用了，目的就是爲了不讓人說話，更不讓人喊出口號來。

王佩英受到的待遇除了毒打，還包括餓飯，手反綁，上廁所都需要獄友協助。難友回憶，王佩英當時“臉色蠟黃，被折磨得瘦弱不堪”。可是勞動的時候，她却一點兒不偷懶，甚至常常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兒。有一次一連幾天倒騰久存倉庫并已開始腐爛的大白菜。許多菜葉爛得粘糊糊的，散發出一股股刺鼻的臭味。“只見她麻利地捧起一棵棵大白菜，掰掉四周腐爛的幫子，迅速地碼到另一個乾燥的牆角，平平整整的。她又找來長長的木棒，橫在平整的菜上，再把第二層大白菜碼在橫棒上，好讓空氣流通。她碼得又多又好。”清理爐渣，“她把已燒過的煤渣扒開，挑揀出那些略微透黑還沒燒盡的煤塊，堆在一旁，送進爐膛再次燃燒。一上午她不喝一口水，不歇一次工，下午也照幹。歇工時幾乎都在揀未燒盡的煤渣。”

這時，王佩英的選擇很像基督徒的寬恕精神，你打我的左臉，我就把右臉也給你打；又像佛家的以忍辱爲修行，逆來順受，毫無怨瞋。你讓她勞動她就加倍地勞動，但要逼她認罪，她就表現出金剛石一般的堅硬，“不但不低頭認罪，反而變本加厲”。

王佩英在什麼地方藏了筆和紙，寫了很多小紙條。當被看押去食堂的時候，她就偷偷把這些紙條塞到有人能看到的地方。1968年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王佩英甚至在食堂“高喊反動口號，瘋狂攻擊我們的偉大領袖，攻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更可惡的是，她于9月29日寫了大量反動傳單預謀在國慶節散發，真是狗膽包天，猖狂之極。”

王佩英在食堂非常鎮靜，人最多的時候，她起身大聲說：“同志們，我有幾句話要說……”造反派急忙七手八腳堵住她的嘴，把她拖回去，然後餓飯，毒打。有幾次打得太狠了，幾乎是往死裏打，難友們都哭了，齊克琦鼓起勇氣抗議：“你們別打了，她是個病人，打死她也沒有用啊！”最後一次大概是10月4日，她已不可能慢條斯理講話，而直接在食堂喊出口號“劉少奇萬歲，打倒毛澤東”。在那全國上下一片高喊“毛主席萬歲，打倒劉少奇”的瘋狂時刻，王佩英却表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巨大勇氣，與這個癡狂的社會完全徹底地分庭抗禮。

齊克琦、劉克英等難友勸她，不要雞蛋和石頭碰了。王佩英說：“劉少奇是吃人民的飯

的，毛澤東也是吃人民的飯的，爲什麼要打倒劉少奇？我想不通。” “劉少奇犯了什麼錯？要把劉少奇整成這樣，這麼害好人的人能是好人嗎？”

王佩英被打的時候，都是緊咬牙關一聲不吭，從不求饒，甚至沒有掉過一滴眼淚。人家讓她承認劉少奇是叛徒，她頂回去：“誰是叛徒，誰心裏清楚。”有人威脅她要坐牢，她就說“我願意把牢底坐穿”。人家說你不怕死？她答：“到這個時候我還怕死嗎，我不會屈服，你們想好吧！”

最後有一次，只有一次，在審訊人員面前，王佩英哭了。審訊人員威脅她，給她最後一次認罪的機會，否則她就再也見不到她的兒女了。王佩英大概已經感覺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這時她哭了，哭得很傷心。可擦幹了眼淚，還是堅持劉少奇不是叛徒。這時候極權體制在王佩英面前已經展現出最邪惡的面目。一個號稱是革命的政權，已經沒有道義和是非可言。強權在赤裸裸地以人倫情感來脅迫一個女人放棄她的信念。但王佩英不吃那一套。

1969年11月，劉少奇即將走到他生命的盡頭。他被囚禁的地方就是王佩英的家鄉開封。一個國家主席，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尊嚴可言。他躺在一張小床上，“沒有穿衣服，甚至連褲子、鞋襪都沒穿，只是被人用一條粉紅色的棉被裹著，外邊還罩上了一條白床單”。在高牆電網下，對一個垂死的老人重兵看押，他所住的小屋窗戶連玻璃都沒有。此時的毛澤東正在武漢的東湖賓館，住在東湖梅嶺一號這座專爲他修建的行宮式別墅裏。這是在餓殍遍野的1960年爲他建造。

1969年下半年，王佩英參加了無從統計次數的批鬥會，被拉到各個區和農村的大隊游街批鬥。這樣的會上，除了有她這樣的反革命分子，還要有一些地富反壞家庭的代表“陪鬥”。革命群眾強迫被批鬥者以“噴氣式”的方式低頭認罪，另有人扮演“人民群眾”，歇斯底里地在下面高喊口號，以示立場堅定。漢娜阿倫特說，極權主義區別於傳統專制之處在于，它要提供給群眾一種虛妄的參與感。這樣一方面人民被像木偶一樣操縱，另一方面很多人却能找到一種主人翁一樣的自豪感。

王佩英每一次都反抗。大家喊口號的時候，她會掙扎著揚起頭來。全場高呼“毛主席萬歲”，她喊“打倒毛澤東”。一開始，造反派沒有準備，只有拳打腳踢，情急之下用抹布甚至泥巴來堵她的嘴，到後來乾脆批鬥時就拿類似嚼子的東西勒住她的嘴。一個有力的年輕人在後面牽著，使她不能發聲。即使這樣，王佩英依然反抗。“叫她跪她不跪，就用腳踢她。”扭著她手的時候，“她頭髮一甩一甩”，很激烈的掙扎，要好幾個人才能按得住。有一次，在57中操場，舉行包括周邊中小學生和居民參加的批鬥會。王佩英被從囚車上押下來的時候，三個人才能摀住她，因爲劇烈的掙扎，她一個腳上的鞋襪都掉了。

王佩英的大兒媳楊永茹的一個姑姑和姑父是海澱四季青大隊人，因出身不好，經常被拉去“陪鬥”，有一次就是批鬥王佩英的批鬥會。結婚前後，楊永茹曾向家裏人提起婆婆王佩英，他們立刻就想起來“那個女人可真厲害啊，跟造反派對著幹，別人喊口號，她對著喊，搞得批鬥會進行不下去”。王佩英的力氣當然不可能有那些按著她的年輕人大，很多人看來，她簡直小胳膊擰大腿，自討苦吃。但王佩英的掙扎却是在萬人面前一種鮮明的姿態，是對紅色恐怖的徹底蔑視。

1970年1月18日謝富治等向中共中央請示，1970年1月22日得到批復，文革期間的司法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判決書。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公審大會，判處王佩英死刑，立即執行。

1月27日這一天，離除夕夜只有9天了，正是籌備年貨、全家團圓的時光。全北京，包括中小學生，號稱十萬“人民群眾”被召集到工人體育場。工體是1959年全國總工會建設的，是當時國內最好的體育場，能容納的觀眾最多。第一屆全運會就在那裏舉行，那時劉少奇就坐在主席臺上。到了文革，它的主要功能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示衆場，彭德懷、彭真都是在這裏被批鬥後囚禁的。

那個年代沒有大屏幕投影，大多數後排的人民群眾看不到那些反革命分子的面目是不是真的很邪惡。他們只是被教育：臺上這些反革命分子是邪教徒，是魔鬼，唯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他們的救星，是他們的神。

魯迅在日本學醫的時候，看到一張幻燈片。日俄戰爭中，有一個中國人，據說是為沙皇的軍隊當偵察員，被日軍捉住殺頭，周圍站著看熱鬧的也是中國人，面對慘劇，神情麻木。這個場面改變了魯迅一生的軌迹。他發現，“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魯迅可能想不到，日俄戰爭之後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人，在同胞要被殺害的時候，非但必須旁觀，而且十萬人都要整齊劃一地揮舞拳頭，聲嘶力竭地呼喊口號，為慘劇喝彩，以表示自己的忠誠。

王佩英對這一天是有準備的。她曾經說過，自己是有罪的。王佩英也許會想起丈夫張以成第一次向她介紹共產主義時她自己的激動和緊張，會想起地下黨戰友胡俊三等當年出生入死為之奮鬥犧牲的信念和理想，還有她 49 年之後和張以成來到北京看到煥然一新的天安門城樓和五星紅旗時的喜悅和憧憬。難道她所熱愛和獻身的革命事業，到頭來就是要把國家和人民變成現在這樣嗎？！

在會場中央，王佩英還在掙扎。她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她用全身的力氣，想把頭揚起來，又被按下去。大概是既怕她喊出口號，又怕帶上嚼子或拿抹布堵嘴太明顯，原來無產階級專政是如此孱弱，連一個女人死前的幾句話都承受不了，所以他們挖空心思用一根細繩子勒住王佩英的咽喉，讓後面的人拽著。這樣既能使她發不出聲來，遠處的“人民群眾”又看不到陷進肉裏的繩子。後來專案組的人說，王佩英在公審後被押往盧溝橋槍決的囚車上就被發現已經勒死了。

在那麼多年無休止的凌虐折磨中，王佩英沒有放棄，沒有被擊垮，仿佛立于磐石之上。她為自己所看見和所相信的，行動了，完成了，見證了。

這一天，到了傍晚時分，王佩英的兒女們全都知道，母親走了。從今往後，在這個世界上，他們永遠再也見不到媽媽了。但他們還得小心地不能讓別人看出悲傷，他們是王佩英在塵世的念想，生活還要繼續。今天，我們可以確信的是，是王佩英自己選擇了這條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她並不後悔。

補白：趙某家住在一條老街上。老街都是木板房，鄰居間只隔著一層薄薄的木板，板壁縫隙大的連手指都伸得進去。為避免不雅場面被鄰居偷窺，各家就用舊報紙糊住板壁。文革開始後，各家各戶為表現對偉大領袖的無限熱愛，還競相在板壁上貼滿大大小小的偉大領袖畫像。居委會挨家挨戶統計，開展檢查評比。一天，下著大雨，趙某從外面歸來，脫下濕漉漉沉甸甸的蓑衣挂到板壁上。由于釘子太小，挂不住，于是他便找來一根三寸長釘，往木板壁上釘。沒想到，釘子穿透到鄰家，不偏不歪，從那家貼的《毛主席去安源》畫像頭部穿了出去。鄰居素與趙家有隙，立馬報案。人保組辦案人員把趙某叫到鄰居家一看，趙當場嚇尿，癱坐地下，一個勁兒地哭天搶地。趙某解放前曾任過偽職，鎮反時因有立功表現，沒有殺掉。現在舊帳新帳一起算，被以反革命罪判十二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五年。趙沒有熬到“天亮”，病死在勞改農場。農場叫人用幾塊薄板裝一下，拉到後山埋了。家人來收拾遺物時，被告之：“罪有應得，給國家省了 24 斤糧，支援亞非拉。”不過還好，農場沒向其家人索要棺材錢。

1956 年，17 歲，我考進了北京郵電學院，分在無線電通訊工程系，專業是通訊與廣播電視。當時中國還沒有電視臺。日本的一個商品展覽會在北京舉辦，帶來一部小功率電視發射機，架設在西直門城樓上，有效範圍幾公里。學院把教研室的電視機（蘇聯造）搬進大教室，讓大家看電視節目。第一個節目是侯寶林和郭啓儒先生的相聲，然後就實況轉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黃梅戲，嚴鳳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計，當時全北京市的電視接收機不會超過二百台。這是中國第一次有公眾電視信號，我有幸成為中國第一批電視觀眾。

一年級時政治環境很寬鬆，大家對政治也不很關心，還沒有產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欄上貼出一份通知：今晚 7 時，在學生食堂，院長孟貴民同志傳達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自由參加。反正沒事，我拎上一隻馬扎前往。會場裏稀稀拉拉，連通常全院開會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就是後來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孟貴民先生參加了那次國務會議。這麼重要的傳達，這樣可以自由參加的會，我這一生只遇到這一次。這足以表明那時的政治環境的確寬鬆。我想，如果沒有這一階段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整風時也不會一下子冒出那麼多右派。我有個看法，1954 年高校院系調整後，舊大學的結構和體制雖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氣神兒還在。1957 年後就不同了。1957，是劃時代的。我們 1956 級的大學生，可以說是多少有一點自由精神的舊大學的末代大學生。我常對我的學弟們說，聽傳達毛主席的講話，可以自由參加，你享受過這個待遇嗎？

反右是我親歷的第一個政治運動。57 年底 58 年初，開始了定右派運動，即劃定右派分子并作出處理，全面停課。當時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級的革命家強迫給右派學生套上白袖章，黑字書寫外號“大鯊魚”、“白眼狼”等。食堂門口貼出“我們工人不為反黨右派分子做飯”的通知。有的右派就當沒看見，照樣若無其事進食堂。有的右派強勁上來了，拿著餐具去院部要飯吃。

我們班劃了一個右派分子——沈聯志，重慶人，已經因病休學。對沈聯志做的是缺席審判，罪狀似乎是早就擬定好了，安排積極分子一人揭發一條，然後證人附議簽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條是他贊同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有同學看報紙，笑談章伯鈞荒唐，搞什麼政治設計院，沈聯志接過話茬兒，“搞一個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學同情沈聯志，公開認為沈不夠右派。大老蔡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後來痛哭流涕作檢討，稱自己是窮孩子喪失了階級立場。幸虧他出身好，否則很可能就要開除團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幾十年來，沈聯志與我們班的任何人都沒有聯繫。

向党交心運動起初名曰“民主會”，小班三十來人輪流敞開思想，然後互相提意見。開頭氣氛還不錯。我主要講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成名成家思想、個人主義等等。同學們給我提意見，稱我白專道路、驕傲自大、脫離群眾。班會讓我做檢討，繼續交心。幾天後，我以日記的形式交出了一份檢討，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大意是：在哪兒跌倒了我自己爬起來。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場，則必哭無疑；如果誰撫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厲害，在親人面前撒嬌。這更不得了，認為我是拒絕大家幫助。

大班的學生黨支部成員 A，認為我的要害是回避立場問題，必須接受批判。民主會開始變味了。同學 B 偷看了我的日記，於是 A 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學將近五年時間的全部日記和手抄的詩集，唯獨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讀後感言剪掉了，其餘一字不缺，全部上繳。

我赤誠的交心沒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滅頂之災，還帶得幾位也寫日記的同學非將日記交出不可，雖然 A 一再宣稱交心是自覺自願的。同學張有順嚴厲地批評我帶了個壞頭，

“你堅決不交，他們還有啥辦法嗎？”

日記和詩集都還給我了，他們發現了什麼，我不知道。對我的批判會火力更猛了，措辭最尖銳的是班長蔡富山。他說我虛偽、態度惡劣、不近人情、說謊騙人。還有，說我不愛幫助別人，只和吳玉奎等少數幾個同學一起討論功課，其餘時間大多獨往獨來。女同學來請教問題，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給她們看，一言不發，讓人家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還有一次，我病了，兩位女同學特地來宿舍看我，我竟然裝睡著。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學很難堪。還有，走路仰著臉，鼻孔朝天。

黨支部成員們找我談話，批評我不該讀《魯迅全集》，更不該讀《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瞧這書名就不好，你就批評不得？誰損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氣，反駁道：“書是作家協會黨組書記邵荃麟翻譯的，難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談話，告誡我：最好還是不要讀魯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書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揚的書。要認真讀周揚同志的報告《文藝戰綫上的一場大辯論》。“周揚同志說的非常深刻，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你好好認識一下。”

1957年，短短一年時間，我的性格和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或者叫變異，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這個變化是帶有本質性的，即異化。人異化為非人，異化為工具。

蔡富山也是個異化的典型。蔡的父親是老八路，抗戰時期下落不明，可能犧牲了。母親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經討過飯。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時候討飯落下的毛病。他的繼父也是高幹，某軍工廠廠長。蔡富山是個極端熱情、極端直率、極端認真的人。二年級他當了一年班長，到三年級說什麼也不幹了。團支部開會幫助他提高認識，黨支部找他談話，但他蠢牛撞南牆，不回頭。支部說，你是個苦出身，黨把你培養成大學生，不容易，你應該負起責任來。蔡說，我是個討飯娃，黨把我培養成大學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讀書，為人民服務。

要讀書，在當時還無可厚非，千不該萬不該把我給扯進去。他竟然說：“我從小討飯，基礎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讀書，你看徐化揚同學讀了多少書！我要向他學習！”他發了瘋似地看書學習，當我的面揚言：“今後你看什麼書我看什麼書，你看什麼電影我看什麼電影，你幹啥我幹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沒辦法，我可要倒黴了，很害怕。張有順說了一句令我終生難忘的名言：“你怕啥？多這一條罪狀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談起莎士比亞，我向蔡推薦曹禺翻譯的《羅密歐和朱麗葉》，說這是幾種譯本中最好的。他立即進城買了一本，讀到得意處，手舞足蹈，抓耳撓腮。我著迷讀新版《魯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員的批評，稱“魯迅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言下之意現在不合時宜了。蔡富山幫我講話：“你不看書還不讓別人看？那國家出版‘魯迅’幹啥嘞？”

大躍進帶來的巨大災難，已經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北京是“首善之區”，災難也已初見端倪，物資緊張。學校樓前廣場，花園撤了，改種蔬菜，用自來水澆地。北京展覽館附近每株行道樹下一圈土，以前種的是草，現在改種胡蘿蔔——胡蘿蔔纓子也很好看。彭真作報告，勸說大家不要見天排隊。他諷刺一個老太太，見排隊就跟上，到跟前兒才知道是買《紅旗》雜誌。

張有順是河南南陽人，1959年暑假，來京讀書3年後第一次回鄉。開學返校後，學院正開展反右傾教育，讓大家暢談大躍進的大好形勢。張有順不想說假話，他的發言只講了一件事、一句話：水庫修得好，社會主義好。他私下裏却跟我說：“好他老頭鳥！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倆雞蛋。過去咱那裏農村再窮，到誰家做客，沒說拿不出雞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沒見著一片。啥‘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俺那裏農民說，要說這就是共產主義，咱不要。”



所謂畢業鑒定的預備工作，就是在學習小組會上各人自述歷史和家庭情況，要忠誠老實，不得有任何隱瞞。我們的小組長林茂，雖一向很革命，很得勢，可是這却翻了船。

每個人依次發言，不做記錄。個人講完之後，大家可以提問或幫助你提高認識。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親是右派分子。我從來不隱瞞，這次再重複一遍，並再表示一次“與父親劃清界限”。在出身問題上，林茂過去不止一次向我發難，批判我是“喝勞動人民的血長大的”。這次他倒沒有狠咬我，不知什麼緣故。

劉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農。林茂應用階級分析理論（富裕中農是兩面派，腳踏兩隻船，有剝削行為），向劉玉昆發難。劉玉昆決不認賬，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論和終極真理。

林茂最後發言。原來他不是貧下中農，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業兼地主，父親在受管制中病逝，長兄是縣工商聯合會副主任，全縣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瞞著同學，也瞞著組織，如今才不得不說。

於是，劉玉昆帶頭，我和全組同學緊跟，一起向這個無耻之尤開火。平時受林茂白眼、烏眼的同學太多。劉玉昆的言辭很尖銳，漲紅了臉，指著鼻子罵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資產階級寄生蟲，喝勞動人民鮮血長大的野心狼，兩面派，偽裝革命，暗藏的雙料反革命分子子弟，我富裕中農是勞動人民，你打擊我勞動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話語沒有劉玉昆尖銳，但很刻薄。我指責他是假革命，企圖蒙混過關，命令他必須和他父親、哥哥劃清界限。多數人和我的意見一致，指責他不老實，不相信組織。

林茂沒通過畢業鑒定的第一輪工作，哭了。活該！這小王八蛋不是設法取得群眾諒解，而是向黨支部狀告劉玉昆報復。支部找劉玉昆談話，劉玉昆不讓步：“這是林茂搞階級報復！”

無耻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難歲月裏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堅信，現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過得不錯，一定很得勢，因為他下手狠，因為他一生決不會說一句真話，因為執政者太喜愛謊言，太喜愛偽裝了。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會偽裝成極左路線的受害者。從林茂身上，我得出一個結論：黑五類子弟一旦淪為野獸，比極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險。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沒有回過故鄉，父親怎麼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無所知。

父親抗戰前夕畢業于一所著名的中專學校，土木工程專業，一生在水利部門工作，最低一級，八級工程師，科長。解放前，他隨集體加入了國民黨。解放後，交待清楚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過。父親沉默寡言，但相信共產黨，積極要求進步，與地委農工部領導、黨員局長相處都不錯。1957年四五月間，他被安排進了地委黨校學習三個月。非黨員進黨校學習，那就意味著是發展對象，已經有了這樣的先例。離結業不到一個月，學習終止，學員返回原單位，參加反右鬥爭。不料，父親從一名准左派跌進右派隊伍。

父親既沒寫大字報，也沒參加鳴放，由於汛期防汛任務重，從黨校回來也沒參加“反右鬥爭”，就上圩區第一綫去了。僅根據揭發出來的平時閑談的片言隻語，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級，成為九級工程師。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倡導的淮北水網化，破壞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鹽鹼化程度，不可行。這就是父親的右派言論之一。曾的“壯舉”是1950年代中期的事，1960年代初已被鐵定為徹底失敗。曾霸王此時已經被撤職，發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親被批鬥過幾次，挂牌曬過太陽，沒吃什麼大苦頭，算是有驚無險。然而驚魂未定之際，批判他“老國民黨員、老右派”的大字報墨迹未乾，又出現一條大標語：“熱烈歡送革命幹部徐某某同志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綫！”

父親被下放農村。最高指示，幹部下放勞動，老弱病殘者除外，可父親當年已經58歲。

文革後期，我與本單位一位老幹部閑聊。談及父親1957年左右命運之轉換系于一綫，

實在冤枉，且禍及我終生，這位老幹部說：“照你這麼說，你父親肯定是右派。那時安徽省委有規定，誰反對曾希聖的雙改——改水、改種，誰就是右派。沒商量。”

前幾年在網上讀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幾份小右派檔案》一文，證實了這位老幹部的話。茆說：“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中央劃右六條標準之外，另加兩條：一為反對所在單位黨委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右派；二是反對農業三改就是右派。”

嗚呼，無可奈何矣！父親已于 1998 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將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轉發給我的妹妹。

1960 年 10 月，在大饑饉的關頭，我大學畢業，去了武漢，長航局電訊修理室。年 21 歲。

歲末，臨近子夜時分，我踱向武漢關，邁上江堤。始終喧鬧不休的武漢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靜下來。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車輛，也絕少行人。“惟見長江水，無語東流。”

武漢關渾厚的鐘聲敲響了，1961 年來了。

1961 年 8 月，突然把我調出武漢，調去九江，建築材料工業部九江玻璃纖維混凝土造船試驗工廠技工學校。我很高興離開武漢，來了 10 個月，沒有結識一個朋友。長航電信科一位副科長通知我一聲就完了，至多 3 分鐘，沒有說任何理由，我也不問。就這麼走了。似乎新天地裏有什麼東西在等待著我。

到九江報到，我很正常，“船廠”的人卻覺得太不正常了，統統大吃一驚：船廠和學校已經下馬了，沒一個人上班，怎麼這個時候還有人調進來？

辦公室的人找來副校長還是副教導主任，三十多歲，人很和氣。他搖頭，什麼也不問，給我找個房間住下，搬來一張床，完了。房間在教學樓辦公室，套間，里間住著大連海運學院船舶系畢業的兩位大學生。我住外間，沒有桌子，燈——有燈口，沒燈泡。

在九江兩個月沒開過一次會，沒上過一天班，等待命運的裁決。我已經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機要部門，調到一個行將煙消雲散的單位。畢業才十個月，還沒有轉正即調動工作，似乎是違反人事管理規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將我趕出電訊部門，必定有什麼我不知曉的原因。我的畢業鑒定儘管不那麼令人放心，總算還好，也沒給我什麼處分。那麼，唯一的解釋，我想可能就是因為父親是右派了。

文革期間，一打三反，辦了我的學習班。業餘學習，不關押，不武鬥，照常上班，行動自由。一天，黨委辦公室一位幹部，不是辦班成員，平時跟我關係不錯，找到我，很關切地悄悄告訴我：“你沒多大問題，就是給你的大學畢業鑒定——‘屬右派性質，寬大處理，控制使用’，沒別的什麼事。這個問題你不要辯解、交待，等他們拋檔案好了！”

去交心運動已十二年了，我執意忘却，也幾乎忘却了，然而檔案裏清清楚楚，不容忘却。果然，單位機關開了我的批判會（次于批鬥會）。一位工人發言說我崇拜南斯拉夫的鐵托，在 56 年大批修正主義的時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氣讀完了鐵托在普拉發表的演說”。他批判說：“你好個一口氣！愛是有階級性的，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對修正主義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雖然黨辦那位幹部已打了招呼，我還是感到極度震驚。這位工人只有小學文化，他編造不出這條罪證。顯然是我日記裏的話。十二年前交給了 A 同志，A 同志摘錄，塞進了檔案。若不是這位工人此時揭發，我哪里還記得日記裏有這句話，哪里還記得鐵托在普拉發表過演說，哪里還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這個地方！

鐵托的演說公開在人民日報上，是配合學習編輯部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而發表的反面教材。鐵托演說了什麼，編輯部文章寫的什麼，如今早已忘得乾乾淨淨。

在那場批判會上，出乎意外，有人對我的檢查交待進行批判，說我繼續放毒。我在交待

中說，感謝黨把我培養到大學畢業，還公費醫療沒讓我花一分錢治好了我的肺結核。現在一月工資 50 多元，我很滿足。這位批判者批判說：“你肺結核不好的話，就反黨？你 50 多塊錢滿足了，對黨就有感情，那我們大多數人三四十塊錢一個月就該死、就該反黨嗎？”

如今，我檔案中的“屬右派性質，寬大處理，控制使用”之類內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實，不應該清理，應該公開。見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類同胞。銷毀檔案不是在保護我，而是在保護那些嗜血的打手。因為那雖是我的號衣，却更是我另一類同胞的確切罪證和不朽的功勞簿。應珍藏，警後世。

2009 年 4 月 26 日，七十周歲時，我賦詩一首：

死灰復燃無有時，往事如烟鬢如絲。  
身穿號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寫舊詩。  
拿雲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壯嗟也遲。  
白首閑話應更好，晚風落日笑催厄。

北京李先生來信：發來的關於黑五類的數期文章，均已收到，且拜讀了。這件工作極有意義。我也想過搞點這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想說，毛沒有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他就讓人民互相殘殺，永遠生活在不安定之中；暫時的安定，就成了幸福，就要感謝領袖。整人和被整，都需要集中精力，領袖就可以坐山觀虎鬥，就永遠能大位穩固。這個做法十分無耻。是罪惡。

右派教師歲月 顧延齡

現在教師的寒暑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時代，教師被視為資產階知識分子，是改造的對象，假期裏總是安排政治學習和體力勞動。右派教師更是如此，從 1957 年到 1977 年的 20 個暑假，我都在農村勞動，少則半月，多達一月。

1960 年暑假，我跟隨高一某班去嵯州大王廟農場割早稻，種晚稻，時間一個月。我是“跟”學生勞動，而不是“帶”學生勞動。學生由班主任帶領，右派老師被置于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只能叫“跟”學生勞動。

一個月的勞動，每天起早摸黑，實在艱苦。最難忍受的是螞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聲不響地叮在你的腳上吸血。吸得滾圓，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裏。如果剛剛叮上，要想把它拿掉還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腳上拉不動。一雙腳整天浸泡在摻有豬牛糞的水田裏，被螞蝗叮過的瘡疤癢得不得了，一抓就爛，苦不堪言。夜裏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大倉庫裏，學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夾背也照樣呼嚕大睡。我就沒這福氣。腰酸腿軟，渾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別喜歡我，老在耳邊嗡嗡叫，即使點了數支蚊香(蚊香約一米多長，由鋸木粉拌雄黃塞進直徑約 1.5 厘米的紙圈裏壓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兩手抓個不停。螞蝗叮過的紅疤被抓破，潰爛的雙腳更爛了。實在太困了，才不知酸軟疼痛，忘却一切悲傷，深睡幾個小時。睡夢中還惡夢、冷汗不止，實際上已經感染了肺結核病，但我渾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頰潮紅有微熱，這是肺結核發病的徵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動，肚子老有饑餓感。我必須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飯，真的讓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飯量明顯比學生少。

一個月的農忙勞動，飯基本能吃饱，不要糧票，下飯菜一般多是青菜、芋艿、蘿蔔、鹹菜等大鍋菜。好不容易熬到最後一天勞動結束，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說晚上會餐，有肉吃了，健康狀況極差又擔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頓肉吃。

會餐前，一位學生幹部對我說：“今夜會餐你自己到農場員工食堂買飯吃！”我頓時驚呆了！勞動了一個月，最後連會餐的資格也被剝奪了！

一瞬間，我全身的血沸騰了！就算是勞改犯，烈日下一個月田間勞動下來，給一塊肉吃也不為過。就算右派是敵人，我總還在講臺上上課，難道與學生會一次餐就混淆敵我了？耻辱！羞辱！這是對我人格的歧視和侮辱！這件事永遠留在我記憶中，一輩子忘不了。

那天最後的晚餐，在農場的食堂裏，農場幹部、員工、學生、老師吆三喝四，杯盤狼藉，唯我一人從食堂窗口買了三分錢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鉢頭蒸飯，站在食堂的角落裏，默默地吃。在他們眼裏，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這是對右派的懲罰。我教書，雙倍的工作量，却只給我一半工資。我勞動，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却不許我吃。原來我是一頭牛，只配吃草，幹重活！牛幹活雖重，還有主人愛惜它。我幹了兩個人的活，甚至超過兩個，有誰憐惜我呢？

大王廟農場勞動結束時，離開學還有近十天。我顧不得疲勞，顧不得囊中羞澀，立即趕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雖懷疑生了肺結核，可為了不使家人擔心，我一直沒有告訴家人。母親看見我那又黑又爛的雙腳，心裏止不住的哀嘆傷心。我寬慰母親說：“在家休息幾天，很快會好的。”

一轉眼秋收到了，學校組織全校教師去嵯州中愛公社上楊大隊收割晚稻。三人一組，與我同組的是葉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塊稻田。三人事先也沒分工，一直是他們兩位割稻，我一個人用脚踏打稻機打稻。那打稻機用力小一點滾筒就不轉。儘管葉李兩位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人既要接兩個稻把，然後緊握稻把在滾筒上翻動，同時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來，腰酸背痛，手脚發軟。

農忙結束，回校開總結大會，學校書記兼校長諸丹忱熱情贊揚了老師們積極投入秋收勞動。突然，他板起面孔，話題一轉，開始訓斥我：“顧延齡這次勞動不認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懶洋洋，稻穀打得不乾淨，沒有做到顆粒還家。”我一個人踏，葉李兩個人割，等于是二人幹了兩人的活，最後還是落了個出勤不出力！我始終是學校的反面教材，隨時拉我做靶子，殺雞給猴看。

我的精神徹底崩潰了！我的肺結核病被確診。醫生說應當休息兩三個月。我不敢，我不能丟掉“教書”這個飯碗，照樣每周上 24 節課，也不敢告訴任何人。無論精神多差，沒有請過一天病假。萬幸的是，我從沒有掛過鹽水，只自費買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却奇迹般地鈣化了。直到 70 年代末，我 40 多歲了，有了公費醫療，也沒有掛過鹽水。90 年代初快退休時，我才生平第一次掛鹽水。

從 1958 年開始，為了貫徹“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學校除了春季采茶，夏天割稻種田，秋季割晚稻停課下鄉勞動外，還決定在郊區方田山開墾荒地（60 多畝）。方田山原本長滿小松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各班輪流去開荒，每星期勞動半天。

那時我任高二四個班和初二四個班的數學，每周 24 節課。下鄉勞動，我要跟高二學生；半天的開荒，我要跟初二學生。

開荒出發的路上，我拿一把鋤頭，低著頭悶聲不響地跟在學生隊伍後面。許多老師不敢同我接觸，怕被指控立場不穩，與右派分子劃不清界綫，引火燒身。所以我從不與帶隊的班主任講話。

我的這群初二學生，天真，好問，好奇。他們不瞭解人世間的冷暖，不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人。他們判斷一個老師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課學生能不能聽懂，對同學是否一視同仁為標準的。

勞動時，一些男同學喜歡到我旁邊來，七嘴八舌對我講一些他們感興趣的事。我幾乎不插嘴，不發表看法，只在他們問我時才應答一下。小孩子勞動很賣力，但也難以持久，經常盼著休息時間到或收工回家。他們問我：“顧老師，現在幾點了？”我說：“我沒有手錶。”起初他們難以理解，老師怎麼會沒有手錶？後來他們改問：“顧老師，現在大概幾點了？”我根據太陽光綫的位置，根據勞動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約幾點幾分。學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問。一對，基本準確。學生驚奇、開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學生心目中的能人。從此，他們有事無事更喜歡到我旁邊來。

對教師來說，手錶是必需品。當時一塊普通手錶人民幣 100 元左右，相當於一個教師兩個月的工資。我這個右派老師每月只有 25 元生活費，給父母 10 元，自己剩下 15 元維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時就是 1 分錢一顆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買。沒有手錶，給工作帶來諸多不便。一堂課 45 分鐘，我只能憑感覺，憑教課內容，估計還有多少時間下課。我從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學任務，這也是學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 1957 年大學畢業，到 1964 年底才窮盡積蓄，花 91 元買了一塊蘇聯寶石牌手錶。這塊手錶是我家產中最值錢的東西，是我的寶貝。如今這塊笨重的寶石牌手錶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躺在抽屜裏，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後，嵊州一中退休老師倪和欽先生對我講：“當年我們學生稱你顧老師為三個 25，即年齡 25，工資 25，上課 25（實為 24 節課／周）。”他又說：“我們這些初中學生對你很尊重，因為你課上得好。勞動、休息時喜歡到你旁邊，沒有手錶也能準確估算時間。學校領導得知你很受學生尊重，就召集班幹部教育我們，說對右派老師要提高警惕，保持距離。”嵊州剡山小學退休老師馬木芳先生也曾對我說：“當年我們幾個同學非常喜歡與你接近，班團幹部就找與你親近的同學個別談話，要我們學生揭發顧延齡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

可在那個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學生尊重、喜歡右派老師就是錯誤，就要被找去談話，被要求與他們劃清界綫，揭發右派反黨言論。毛澤東執政 27 年，為維護其專制極權統治，一天也沒有停止過人為的階級鬥爭。未成年的學生也隨時被灌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觀念，在孩子純潔的心田裏播種仇恨，製造恐怖。

1960 年國慶節後，學校領導突然宣布停課，動員全校師生立即去北山采茶。茶葉是嵊縣的特產，茶農一般只采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采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縣委哪個人頭腦發昏瞎指揮，可是全校照樣召開了批判“秋天無茶論”的大會。

出發那天清早，我隨高二丁班學生自背鋪蓋動身。步行六七十裏，天快黑了，來到嵊縣與紹興交界的北山橫路坑。晚餐是毛笋鹹菜粥，第一次吃感覺還好。以後天天吃，肚子裏沒有一點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饑。

每天上下午，我跟隨十多個學生在茶山裏轉來轉去。茶蓬光禿禿的，那有什麼茶葉！可是學校領導還要聽從上級指示批判“無茶論”，真是可悲。

采茶任務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麼辦？聰明的學生早就發現不遠處有一個試驗茶園，裏面一排排茶蓬，長得鬱鬱蔥蔥。似乎沒有看見管理員，學生們喜出望外，就大膽去偷摘。當時學生沒有也不會徵求我的意見。他們知道我是隨班監督勞動的右派教師，任何事都由他們自己作主，不會徵求我的意見。

學生嘻嘻嚷嚷進園不久，就聽見一聲吆喝：“誰叫你們來偷的？”學生們被趕到一旁，把我夾在當中。那位管理員大聲問：“誰是老師？”沒有人回應，我也悶聲不敢響。當時我年輕，衣著寒酸，個子不高，又不戴手錶，完全不像一個老師。管理員繼續問：“誰是老師？”這時有幾個學生都一本正經地回答：“我們這裏沒有老師。”那位管理員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掃到一位戴眼鏡、長得有模有樣的童姓同學，說：“你是老師？”瞬時引得同學們哈哈

大笑。這位管理員無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著老師，就這樣平息了。

照理說身為老師的我，應該挺身而出承擔責任，可我沒有這個勇氣。很明顯，一旦承認，後果不堪設想。唆使學生偷茶，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輕則開批判大會，重則送去勞教，甚至判刑。幾年前一次會議，碰到這位童同學。談起他被誤為老師“偷茶”往事，我們都笑了。他說：“我戴了一副眼鏡，就把我當教師了！”感謝這群天真可愛的學生，他們保護了我，使我免遭一劫。

補白：閻連科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有這樣一個情節。文革期間，某部一位老少配的師長，其妻寂寞難守，勾引勤務兵與之偷情。為控制對方，師長妻設下陷阱，讓勤務兵無意間打破偉大領袖的石膏座像，以此要挾對方死心塌地跟自己苟且。我下面要說的這個故事與之異曲同工。且說某沿海小鎮有個漂亮姑娘叫丘翠花，十八歲那年嫁給一個大她十六歲的港客。結婚三天，夫君返港。此後丈夫一年回來一次，來去匆匆。文革開始後，因有海外關係，怕紅衛兵抄家找茬，丘翠花主動與一造反派小頭目勾搭。小頭目不時上門，以宣傳毛澤東思想為名，行偷情之實。港客有所耳聞，傳言要休翠花。翠花急了，眼看自己的赴港簽證就要批下來了，不能在這個節骨眼上斷送前程，于是想與小頭目斷絕關係。小頭目哪里肯依？萬般苦惱，翠花心生一計。這天中午，小頭目又潛入翠花家，欲求雲雨之歡。翠花說：“我要考驗你，看你是不是死心塌地跟我好。”小頭目一陣指天發誓。翠花指著廳堂案桌上的毛澤東石膏像，斬釘截鐵地說：“把它砸了！”欲火中燒的小頭目，此時哪顧得許多，操起一根木棒就對座像橫掃。座像摔下供桌，粉身碎骨。幾乎就在座像落地的同時，她沖著大門外疾呼：“快來呀，他砸毛主席像啦！”手裏拿著木棒皮帶四處游蕩的紅衛兵聞聲而至，逮了個現行。小頭目被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但邱 X 花的一箭雙雕之計也未得逞。港客還是休了她，另娶了一個更年輕、漂亮大陸女。

## 我的母親 朱國琳

我的母親叫年靜甫，排行老二，姊妹三人，陝西漢中人，據說是年羹堯的後裔。母親和大姨上學時，大姨的老師是地下共產黨，把大姨及班上大部分學生偷偷帶去延安。大姨把在延安抗大的照片寄給還在上學的母親。她穿著灰軍裝，戴著灰軍帽，腰上扎著牛皮帶，皮帶上別著一把小手槍，很威風。母親把姐姐的照片給同學們炫耀，後來校方追查共產黨活動，才趕忙收起來。

母親長得很漂亮，後來和在中央軍校第一分校（漢中）當隊長的父親結了婚。據說母親很羨慕父親穿著馬刺走路的樣子，又說是母親在回家的路上被巡警刁難，恰巧父親路過，為母親解了危。

解放後我一直沒再見到父親，也不知他在那，更不知他的死活。有時見母親偷偷包點莫合烟和褲衩之類的東西托人帶走，我就想父親大概沒死。

母親個子高，嘴長得比較大。每當坐在母親對面，望著她把一團十分粗糙的食物放進嘴巴的時候，我就想知道這些粗糙的東西在經過一個坐過飛機，穿過旗袍，做過太太，細皮嫩肉的母親的喉管時，母親的心理是怎樣的。

上小學時，我見別的孩子有鋼筆，就央求母親給我買一隻。母親一聲不吭，嘴抵得緊緊地，泪水從眼眶裏滾出來。我不懂事地繼續央求，鄰居阿姨一把把我拉開，對我說，傻孩子，你媽媽哪有錢呀。後來稍大一點，才知道母親整夜整夜偷著給人家做衣服，很少睡覺。做一

條褲子才 8 毛錢。那個年代是絕對不允許做私活的，也不允許憑個人勞動掙錢糊口。可是，母親一個女人要養活五個孩子呀。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央求簡直就是一種罪過。

我家在草湖，位于疏勒、疏附和阿克陶三縣交界處，解放前叫馬家花園，原是一片長滿蘆葦、紅柳、駱駝刺等多種野生植物的原始荒原，東西長約二十公里，南北寬約十五公里。塔孜洪河和罕南裏克河將草湖分割成三塊，分別是小草湖、大草湖和紅柳戈壁。民國初期，喀什提督馬福興在小草湖爲他建造了一座花園式的豪華公館，占地百畝，當地人稱爲馬家花園。1924 年，新疆都督令馬紹武清除馬福興，馬家花園毀于戰火，成爲一片廢墟。解放後，馬家花園成爲兵團一個團場的駐地。

我上學的地方離家有七十多裏，由于沒有交通工具，很難回一次家。每次回家都是約上幾個家住草湖的同學，星期六放學吃完晚飯後結伴往家走，雙腳在沒腳脖的塵土中移動著。沒有星光的夜晚，大家一邊走一邊唱歌，以消除心中對黑暗的恐懼，每次到家都是半夜了。現在想起來，也不知當時那麼艱難地回一次家是爲了什麼，可能是爲了看一下艱辛的母親，也許是爲了回家能吃一頓飯。

六十年代，吃飯可能是最簡單、最重要的事情。家中沒有吃的，最好的食品是公家配給的一種叫代澱粉的東西。先把玉米芯碾成粉，然後將其發酵，然後再過濾、烘乾、碾成粉，是調代澱粉。這種粉可以做成食品，可以吃，但不好吃。它是優點是可以飽肚子，缺點是吃完後肚子發脹，硬硬的，鼓鼓的，更要命的是大便十分困難。每次回家，母親總是讓我多吃幾個這種代澱粉饅饅。母親說我正在長身體，要多吃點，吃好點。其實我知道，即便是這種東西也是定量配給的，我吃了，母親就沒得吃的了。小時候不懂事，爲了自己的嘴巴，而忘了生我養我的母親。現在長大了，是該自己掌自己的嘴巴。

有一次回家是爲了問如何在初中升高中的履歷表中填寫父親一欄的內容。母親坐在那一聲不吭，好像進入了深深的回憶，又好像什麼也沒想，一動不動。我央求母親說點什麼，結果她什麼也沒說。最後我憑記憶和想像，自作主張填寫了四個字——大官，壞人。

文化大革命中，母親吃盡了苦頭。在批鬥母親的風頭上，我回了一次家，爲的是想告訴母親，我要結婚了。破爛小屋門口的爐灶被踢得稀爛，我以爲母親搬家了。趴在門縫中往小屋裏望去，依稀可以看見床和被褥。我很慌，也很急，開始無目標地尋找母親。突然，我看見幾個人提著鞭子，趕著一長串“牛鬼蛇神”過來了。我從頭到尾仔細看去，發現走在最後面走不動的就是我那可愛又可憐的母親。一個拿鞭子的朝我母親屁股上踢了一腳，母親痛苦地朝前倒下。我沖了上去，可是一個人拉住了我。我回頭一看，並不認識他。等我轉過身時，那幾個拿鞭子的和那一串牛鬼蛇神全不見了。

天漸黑了，我敲了一個阿姨的門。她很害怕的樣子，說了聲不知道，就趕忙把門關死了。我又敲開一個叔叔的門，他也驚慌地說不知道，忙把門關死。

天黑得像一口鍋扣在大地上。我一個門一個門地敲，誰也不給開門。一個門內忽然伸出一隻手把我拽進了進去，像蚊子叫一樣說了聲“你媽在狗屋裏”，隨即把我推出門外。我沒有時間思考，飛一般地向狗屋沖去。狗屋原是一個養軍犬的地方。我一腳踢開狗屋門，十幾雙驚慌的眼睛望著我，小聲說：“你媽回去了。”我急忙跑回那破爛的小屋，一絲燈光從黑簾中透出。我輕輕地敲了一下門，母親驚慌地問是誰。當確信是自己的兒子時，她開門將我一把拉進去。母親告訴我，未成年的小妹已經藏起來了。幾年後一個阿姨告訴我，說這期間母親曾兩次觸電自殺未遂。

母親的後半生也有過幾次微笑。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家養了兩隻兔子，下了一窩小崽。小兔子長大一點時，母親決定殺一隻叫孩子們嘗點肉味。兩個弟弟負責這件令全家人喜出望外的事情。可是兩個弟弟不太積極，因爲兔子主要是他倆拔草喂大的。爲了全家人能吃上一次肉，他倆無可奈何地在兔子頭上敲了一下，把兔子敲死，然後挂在樹杈上開始剝皮。他們先把兔子嘴邊的皮割開，然後是頭，脖子，最後緊緊拉住兔子頭上的皮毛，使勁往下一拽，

整個兔子皮就被脫下來了。就在弟弟把兔子皮從頭到尾往下拽的那一瞬間，母親笑了。這一瞬間，她似乎忘記了貧窮，忘記了煩惱，忘記了曾經受過的羞辱。我想母親的微笑起碼包含著兩個意思：一是自己的孩子今天有肉吃了；二是兩個小傢伙長大了，可以幹活了，不會餓死了。

我上初中時發表過一篇小散文。大妹妹在未成年時就下地幹活了，放暑假時我去大田看她，她正在摘瓜。兵團是條田化作業，大條田裏遍地都是瓜，摘下的瓜堆成小山，香氣四溢，蜜蜂飛舞。那天我吃了好多瓜，大開了瓜的眼界。回校後，瓜的香味依然包圍著我，于是在作文課上我寫了一篇名曰“瓜田小記”的散文。文章不長，但寫得很有生活氣息，老師叫我抄好送報社。文章發表後，草湖的好多人都看到了，他們向母親祝賀說：“老年，你兒子這麼小年紀就發表文章，將來不得了。”母親大概高興了好幾天。這是母親的第二次歡喜。

母親最後一次微笑是在病床上。經過長期批鬥，母親倒下了，任何鞭子也打不起來了，當時我在離家五百公里的農村接受再教育。再教育不是讓你讀研讀博，而是讓你天天干繁重的體力活，滾一身泥巴出一身臭汗，進行觸及靈魂的勞動改造。有一天，有人跑來說，草湖來電話了。我急忙跑到公社，把電話打到草湖總機。總機說，你們家已沒人了，都到毛拉醫院去了。我知道毛拉醫院就是師部醫院，離我這有八百公里。我馬不停蹄，坐汽車，坐拖拉機，坐馬車，再步行，心急如焚地趕到毛拉。母親已不省人事，弟妹們在床前一面呼喚一面哭泣。醫生把我叫出來說，你母親沒有幾天了，準備一下吧。我忍著塌天的悲痛，白天守在病床邊，等待奇迹出現，晚上用縫紉機給母親做老衣。我雖然只跟母親學了一點縫紉技術，但我一定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讓母親穿上兒子親手做的衣服，盡最後一絲孝道。

人急時總有急時的辦法。我們幾個孩子首先央求醫生給母親輸血，醫生說輸也沒用。我們一再央求，醫生最終答應試試。化驗結果，我和二弟的血型與母親的一樣，都是 B 型，于是當場各抽了 500CC 給母親輸進去。第二天奇迹出現了，母親睜開眼睛了，看見了自己的骨肉。我和二弟又各抽 500CC 給母親輸上，更大的奇迹出現了，母親坐起來了，微笑地望著五個孩子。這是母親最後的笑容，這個笑容太美了，太珍貴了。這是戰勝死亡後的微笑，我留下了母親這個最後的微笑，這是母親活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張照片。

醫生用肯定的語氣高興地說：“你母親還可以活半年，你們可以放心地回去工作了。”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母親。五個月以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第八個年頭時，母親死了。她永遠看不見她含辛茹苦養育的孩子了，孩子們再也看不見可愛可敬可憐的母親了。我們把母親埋在草湖的沙丘裏。我們成了孤兒。我的母親只活了四十八歲。

補白：劉某是東南沿海某省會城市一家木器廠的老炊事員，孤寡一人住在廠裏。這天晚上因暑熱難熬，跑到河邊公園納涼。躺到半夜，準備回去，聽見牌樓上有嘰嘰喳喳的麻雀叫。他到河邊抓幾把河泥，向牌樓擲去，想打中幾隻麻雀，回去炒了吃。第二天一早，一個清潔工看見牌樓上的偉大領袖像上粘著什麼東西，便趕忙叫來幾個工友。大家仔細一看，嚇傻了，偉大領袖滿臉污泥。案子立刻報到市革委會，革委會主任拍案而起，下令馬上封鎖道路，嚴禁人員過往，強行通過者和傳播該事者格抓勿論，同時迅速組成專案組。案子很快真相大白。市革委會在廣場上召開萬人宣判大會，劉某五花大綁，奄奄一息，被拉上審判台示眾，嚇得魂不附體，一次次癱倒。大會當場宣判劉某“惡毒醜化世界人民的偉大領袖、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的光輝形象”，實屬滔天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本擬判死刑立即執行，後考慮其出身貧民，認罪態度好，死罪可免，但活罪難饒。服刑期間，劉某因身體極度虛弱，精神崩潰。一天野外勞動時，瘋瘋癲癲地跑出了警戒綫。看押人員抓回來一頓拳打腳踢，當場斷氣。



1969 年春天，由于戰備的需要，要把我們鎮裏通往縣城的沙石公路修成一條柏油路。爲處理路兩邊合抱粗的垂柳，公社革委會請來縣木材公司的晁中哲給古樹作價。晁三十來歲，一米八幾的個頭，與我姑夫是同事。前幾年他在我們鎮上工作時，經常來我們家。忙完作價工作，天晚了，還起了風，晁中哲就沒趕回縣裏，在我家住了一夜。

中秋節後的一天，我正與社員一起幹活，隊裏的民兵排長突然找到我，神神秘秘地告訴我，縣裏來倆人，現在我家，找我調查個情況，還要我小心點兒。那年頭搞外調的特別多，一般都沒好事。我心裏敲起小鼓，趕緊往家跑。

一進門看見院子裏站著兩個人。一個穿便服，白白淨淨的，手裏提著個黑色塑料公幹提包，上面印著“臨猗縣公安局”一行白字。另一個瘦高瘦高，二十幾歲，比我大不了多少，穿著一身深藍色制服，戴著大蓋帽。兩人都挺嚴肅。見我就問：“你是衛普安吧，我們是縣公安局的，今天找你瞭解個情況。”“是，我是衛普安，那咱們屋裏說吧。”進了屋，大蓋帽說：“咱們先學習一段毛主席語錄，我再給你交代一下政策。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這次來主要是落實晁中哲給公路估樹價時在你家收聽敵臺的事。你別著急，好好回憶一下，他在家共收過幾次敵臺，收的什麼內容。”“收聽敵臺？”我一聽，馬上頭就大了。這幾年經常在縣革委會發的布告上看到收聽敵臺的人，名子上不是劃紅叉，就是判無期。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可這是哪有的事呀！連忙說“沒有，沒有”。大蓋帽又說：“你好好想一下。晁中哲收聽敵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他已經承認了，我們今天來就是落實一下。你不要包庇，要老實交代。”我說：“真的沒有，你們讓我交代什麼？”那個提包的說：“衛普安，你要想清楚！你們家是不是地主成分！”

一說到我們家的成分，頓時我就覺得自己矮了幾分。提包的又說：“在這兒問我估計你也不說，那咱們到大隊去。”到大隊就到大隊，沒影子的事，到哪兒都不能胡說。那時大隊叫革委會。到了革委會辦公室，大蓋帽突然從腰裏掏出一幅明晃晃的手銬，“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大聲呵斥道：“你不老實！告訴你，頑抗到底是沒有好下場的！晁中哲都承認啦，你還包庇他，包庇也是沒有好下場的！不說，今天就把你帶到公安局！”提包的那位說：“別急，我提示他一下，中哲是不是給你說林副主席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一顆什麼？”我說：“是不是定時炸彈。”“對，對，就是這一句。他是不是說啦？”大蓋帽搶著問。我說：“沒說過，真的沒說過。”“什麼，什麼，沒說過，你剛才都承認啦，現在又說沒說過。你這個傢伙真不老實，看樣子今天不來點硬的，你就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利害！帶走！”那個大蓋帽看來真是急瘋啦，拿起手銬又“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同時把桌子拍的砰砰響，氣急敗壞地向我吼叫。

“普安，我給你說，雖然你家是地主成分，但你還年輕，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應該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積極地揭發壞人壞事，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綫。現在晁中哲已經被逮捕了，他都承認了在你這兒散布過反動言論，你還保他幹什麼？況且你能保住他嗎？只要把他給你說的那句話給我們寫出來，我們對你是不會追究的。你好好想想，我們等著你的回答。我想你不會讓我們今天給你帶上手銬，把你帶回公安局吧？也不會跟著晁中哲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林副主席，繼續與人民爲敵吧？”提包的在開導我，却每句話都暗藏殺機。

看樣子這兩個傢伙今天不在我身搞出點名堂是決不會放過我的。我頂不住了，說道：“好

吧，我寫。”在公安局的稿紙上，我違心地寫道：晁中哲某年某月某日在公路上估樹價時，給我說林彪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寫完我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他們看了看，從包裏拿出一盒印泥，讓我蓋個手印。望著食指上鮮紅的印油，我眩暈了，我崩潰了，我知道我這手印蓋下去對中哲意味著什麼。中哲叔，小侄對不起您啦！我的手指無情地蓋了下去……

第二天，村子裏流傳起我和縣裏一個反革命分子一起收聽敵臺廣播的消息。晚飯後，掛在村中間那棵歪脖子樹上的破鐘當當一陣亂響，人們三三兩兩提著小板凳，懶懶散散來到村裏那間由破庫房改建的會議室裏。昏黃的燈光下，幾十號人坐在一起。年老的男人抽著難聞的旱烟袋，閉著眼睛打瞌睡。勤快的女人就著燈光吡吡納著好像永遠也納不完的鞋底子。

今晚的社員大會，政治隊長親自挂帥。他先是神采飛揚地講了一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以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如何健康，接著話鋒一轉，義正詞嚴宣告：“最近，咱們生產隊發生了地富子弟收聽敵臺，惡毒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事件。這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這說明一小撮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總是夢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我們廣大貧下中農必須時刻擦亮眼睛，粉碎他們的陰謀詭計。同時，我也警告你們這些人，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是饒不了你們的！”不知為什麼，他竟沒有點我的名子。點不點吧，屁大的村子，誰不知道誰，何況就我們幾個地富子弟。

一入臘月，大隊革委會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把我哥叫去了，原因是我們隊一個積極分子檢舉揭發說我哥和晁中哲在公路旁的一棵古樹下收聽敵臺十多次。我哥爲了減輕我的心理負擔，就把這件事攬到他自己身上，在學習班裏承認晁中哲給他說過那些話，與我無關。臘月二十八下午，我遠遠望見哥哥回來了，背著一個髒兮兮的鋪蓋卷，無精打采的。我快步迎上去，哥哥看見我，馬上打起精神，還咧嘴笑了笑說：“沒事，沒事，你放心，哥沒事。”望著瘦了一圈的哥哥，我的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還好，沒給哥哥戴什麼帽子。

幾個月後的一天下午，一個手裏提著黑色塑料手提包的人徑直進了我家大門。這個人我認識，也是縣木材公司的，姓喬，前幾年也來過我家。喬叔告訴我，他這次來是要我把中哲的事再落實一下。一聽中哲的事，我委屈的眼淚馬上流出來了，把公安局那兩個人如何威逼我，我如何寫下了假證明，仔仔細細說了一遍。喬叔一聽，眼睛瞪的溜圓：“這娃你怎麼能這樣說哪？寫就寫啦，你現在還想翻，你翻得了嗎？中哲反對林副主席，他自己都認啦，公安局都定案啦。你現在這麼說，不怕公安局再尋你？你還不知道你家是個什麼成分啊？可不敢胡說！”又是一個把中哲往死裏整的主。說啥呀！我牙一咬，腳一躁，唰唰幾筆寫好了證明，又啪的一聲蓋了一個鮮紅的指印。

又過一段日子，一天早上，我們幾個地富子弟，每人挑著一對臭哄哄的稀茅罐往地裏送，出巷口迎面碰上兩個騎自行車的人。從穿著打扮上看，像是幹部，四個兜的中山裝乾乾淨淨，脖子上的風紀扣嚴嚴實實，自行車頭上挂著黑提包。看見我們就問：“這是南連村嗎？”我們說：“是啊，找誰。”“請問有個叫衛普安的嗎？我們找他落實個情況。”人家說話柔柔和和的，可一聽找我，我身子一軟，稀茅罐險些從肩上掉下來。我說：“我，我，我是衛普安，啥事？”我戰戰兢兢地問道。“能不能咱們到你家談談？”我只好把稀茅罐放在村口的水渠邊，在同伴們異樣的眼光中，領著他們到我家去。

兩人說他們是縣上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問我是不是打過兩個證明材料，說晁中哲散布反動言論。我說是的，他確實在我這裏說過反動的話，你們也不要再問了，這次來是不是要我再寫個證明，好，我馬上給你們寫。經過上兩次作假見證，現在我已是心如鐵，膽似鋼了。反正說啥都是白搭，乾脆你要我說啥我就說啥，大不了把我也逮去。“你弄錯啦，”那兩個人不緊不慢地說：“我們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但也決不能冤枉一個好人。晁中哲是反對林彪的，反得對，林彪確實是毛主席身邊的一顆定時炸彈。這不，自行爆炸了，證明中哲同志很

早就看出了這一點。對這樣的革命同志，我們一定要給予平反昭雪。” “什麼，什麼？” 我的眼睛瞪得溜圓，頭一下子暈了，腦子一片空白，只看見那兩人的嘴巴一張一合說著什麼。接下來我說了些什麼，幹了些什麼，已全然不知道了，只記得我又給他們蓋了個紅紅的手印，是哆哆嗦嗦蓋下去的……

從 1969 年至今（2008 年），近 40 年了，一直再沒見過中哲叔，是我羞于見到他。這件荒唐事幾十年來我從未向人啓齒，一直深埋心中，每想起就深感不安。聽說中哲叔幾年前已作古，我良心的譴責更重了，總想把此事告知世人，可幾次提筆都未能成文。春節前，我腳骨骨折，女婿見我無聊，送我一台電腦。我不會用，承蒙朋友多次指教，兒子兒媳一旁指導，敲打數日，終成此文，藉以告慰中哲叔的在天之靈。

補白：某紡織廠有一位姓劉的電工，一天夜裏下夜班回家途中突然感到內逼，急著要方便，但身上沒帶紙。急促中，他跑到前面的大字報宣傳欄，看四周無人，撕下一塊紙，躲到後面方便去。第二天當還在睡夢中，專案人員已“光臨”他家。他才知道，被他半夜拿來擦屁股的那塊紙，竟然是半張偉大領袖的頭像。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送到勞改農場不到半年，劉某病死。衣袋裏存著一小本子，上面寫滿了一句話：“毛主席呀，我不是有意的！”

補白：文化革命中我下鄉的地方發生一件事。一張姓農民，妻子長得漂亮，受村支書的引誘，二人發生通奸關係。有天晚上，姓張的外出歸家，看見村支書與妻子正在床上，氣憤極了，要拉支書去政府說理。支書騎在蕩婦身上，根本不當回事，從從容容，繼續行雲作雨。同時還厲聲喝問姓張的：“你啥成分？” 姓張的一聽此問，身子軟了半截，怯怯懦懦回答道：“我是富農。” 書記與蕩婦做完那事兒，氣粗膽壯地拉姓張的到官府說理。見了主事官員，姓張的告支書與她的妻子通奸。村支書反告說，別聽他的，他是富農，他是在搞階級報復。主事官一聽雙方所控罪名，明白了，判姓張的階級報復罪，念其情節較輕，關了兩個月。

陳 更

## 戀愛守則 李子軍

1972 年，無休止的批判有了停息的間歇。疲憊的勞動，無聊的生活，惡劣的“食料”，吃不飽，精神的空虛，讓男女知青看不到盡頭。膽大的知青開始談戀愛，和地下工作者一樣，各種方式爭奇鬥艷。如今想來，仍讓人噴飯。我們班有個知青叫俞寶康，白白的，胖胖的，非常文靜，蘇州人，非常愛乾淨，白球鞋刷得乾乾淨淨。最近一段時間，每逢天黑，他就刷白球鞋，順手就把鞋放在門外的窗臺上，然後，信步向連隊後面走去。我們這些馬大哈根本不在意這些小事。不料，有位有心的知青發現了其中的秘密。每當俞把白球鞋放在窗臺上不久，就有一位女知青也向連隊後邊走去。他向我們公布了他的發現，我們立時來了勁。跟蹤的結果，正是這樣。怎麼辦？第一個辦法是偷偷拿走白球鞋。俞寶康一走，我們立即替他把白球鞋收起來。那位女知青走到我們宿舍附近，一看沒有白球鞋，很快就回去了。不一會兒，俞寶康就快快地回來了。初戰告捷，我們高興地不敢大笑，只能捂著肚子捂著嘴偷笑。

後來，俞寶康放掃帚，我們收掃帚，放什麼收什麼。他恨死我們這些促狹鬼，但又毫無辦法。後來，他改成唱歌，唱樣板戲之類，這樣我們倒毫無辦法了。看著俞寶康天天容光煥發，我們這些癩蛤蟆心裏酸溜溜的，總想給他製造難題，破壞他的心情。這大概就是人類的

陰暗心理吧。有一天晚上，俞寶康又出去了，黔驢技窮的我們只好躺在床上胡思亂想。不知是誰說了一句，告訴連長去。于是，我們班最小的知青（15歲），自告奮勇跑到了連部。連長毛連元正在喝酒，滿臉通紅，醉醺醺的。一聽報告，立即摸了一把鐵鍬，嘴裏一邊大罵，一邊喊著“抓流氓！”向連隊後面沖去。我們班的幾個知青跟在後面助威，只見前方兩個白影條地突然分開，然後向兩個方向跑去。由于連長醉得打晃，我們又不是真的想抓俞寶康，所以無功而返。整個連隊轟動了，笑的，罵的，一晚上沒安靜。

沒幾天連裏出臺了一部談戀愛的規定，由于時間久遠，細節記不清了，但大致內容如下：1.男女知青談戀愛必須年滿 25/23 周歲。2.談戀愛必須向連部彙報，經同意後方可，不然以流氓論處。3.談戀愛的時間，規定每晚 7:00—9:00，其餘時間不許談。4.談戀愛的地點在連部辦公室門前的窗戶下，其他地點不行。5.連部提供條凳，用後歸還，損壞照價賠償。6.男女知青的正常接觸，需有男女知青排的排長在場。

按照這個規定，我們這些未滿 25/23 的知青只好老老實實地在屋裏呆著，年齡大的知青也絕不會跑到連部去談戀愛。俞寶康也歇菜了，再也沒有白球鞋之類的接頭暗號了。在此，我向俞寶康表示歉意，但願經歷過風雨的你們更幸福。沒想到一場惡作劇讓我們剛剛萌芽的愛戀之情遭遇了全面的打壓，致使我們回城探親都不敢為女知青捎東西。因為一旦帶回來，你必須給班長檢查。排長檢查完，還要經女排的排長、班長檢查。然後，六個人站在連隊中間的大路上，才能完成貨物的交接。幽默嗎？今天我們可一點也笑不出來。

補白：“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告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脚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這是一首今天許多過來人都很熟悉，當時在所有知青點都悄然傳唱的《知青之歌》。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此歌曲誕生一年後的 1970 年 5 月 24 日，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裁定，南京知青任毅編寫的這首反動黑歌，流傳甚廣，危害極大，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罪大惡極，判處死刑。後幸得許世友將軍干預，改為 10 年徒刑。

## 父親的背影 梅桑榆

父親于 1996 年 10 月去世，至今已十載有餘。我這個以寫作為業的兒子，却未寫過一行懷念他的文字。每當想起此事，便不免有些愧怍。

這些年來，父親的形象有時浮現于腦海，有時于夢中出現。特別是我 1997 年末初來北京那段時間，也許是父親辭世不久，也許是獨自初到異鄉，也許是我身上穿著他曾經穿過的棉襖，不由得睹物思人，我竟常常夢見父親。父親的神態和談笑，一如生時，並且都是患癌症之前的健康形象。在夢中，我與父親相伴，不再是一個獨闖異鄉的人。但夢醒時分，我却獨自躺在床上，被無邊的黑暗包圍著。每當此時，心裏便會彌散出一種難言的淒涼，嘆息與父親陰暗兩隔，再無相聚之時，嘆息自己到瞭望五之年，仍要背井離鄉，為改變生活境況，為實現理想而拼搏。

父親早年投軍，在新四軍某部從事醫務工作。建國初期，曾在滁縣專員公署門診所和專區醫院任職。1952 年被上級調到當時屬於滁縣專區的江浦縣（今南京市浦口區），任縣醫院院長。1958 年，父親因響應號召，大鳴大放，針對某些地方幹部獨斷專行的工作作風，在會上提了一些意見，并說：“社會主義如果不民主，將來會開倒車的。”結果觸怒了領導，指使整材料的人將“如果”二字去掉，又捏造所謂“反黨言論”，對他進行誣陷，說他“瘋

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結果父親因言獲罪，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被人押送回鄉。我曾經看過他的處理決定，那是一張油印著幾百字的 16 開紙，就是這張發黃的紙，決定了他後來的命運。

父親本可以在當地農場“勞動改造”，但他執意要求回家鄉務農，他認為家鄉人不會拿他當“敵人”看待。但家鄉豈是“桃花源”？他後來的遭遇證明，這只是幻想。那一年，我才 7 歲。父親離開江浦那天，母親帶著我為他送行。我已記不清把他送到了醫院門口還是車站，也記不清當時是春天還是秋天，我只記得父親用扁擔挑著行李，一頭是裝滿醫書的鐵皮箱，一頭是鋪蓋衣物，離我漸漸遠去。我對那只鐵皮箱印象很深，因為後來家中用它盛米多年，而那些醫書，其中有些是我後來學醫時讀過的。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的想像又為這個背影添上了一些細節與背景，好像父親如農夫一樣卷著褲腳，又好像他離開江浦那天正是細雨濛濛。送行時的情景和一些細節，雖然被歲月所漫漶，但是，幾十年來，父親挑擔前行的背影却始終讓我無法忘記。

直到父親去世後多年，我才和母親談起當年為父親送行的記憶。時隔幾十年，母親仍清楚地記得當年送別時的情形。她說，當時是秋天，我和你把你爸送到浦口上火車。你爸挑著擔子，被帶槍的人押著，走在前面，我們在後面跟著，一直送到車站的月臺上。等到你爸上了火車，站在車門口與我們告別時，你揮著小手喊，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當時你爸和我都流淚了。我聽母親這樣說，心中一陣酸楚。算起來，父親那時才 33 歲，按照現在對年齡段的劃分，仍屬青年，但他卻從此失去了做人的尊嚴，踏上了一條前景如同暗夜的人生歧路，再無回頭之日。在這條看不見盡頭的歧路上，他將任人侮辱，任人作踐，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種將入地獄之門的心情啊，我懵懂的問話，怎能不讓父母黯然落淚！

父親回鄉不久，母親便要求調動工作，帶著我和弟弟妹妹回到家鄉。父親因醫術精湛，當一段時間的農民後，便被公社安排在當地診所上班，月工資 20 元。後來父母又被調到總鋪區醫院工作。

大饑荒時期，醫院人滿為患，父親每天拖著浮腫的雙腿，堅持工作，並且經常步行幾裏、十幾裏出診看病。有時遇上重症患者，即便是雨雪天，也要出門。遇到糧罄灶冷的人家，連飯也吃不上，只能忍饑而歸。偶有大隊幹部家人患病，要他出診，倒是可以吃上一頓飽飯，但因父親是“階級敵人”，上不了桌子，人家只是給他幾塊餅，一碗菜，讓他蹲在廚房灶邊，一飽饑腸。父親捨不得吃完那些餅，總是剩下一兩塊，帶回讓我們分享口福。

文革開始後，父親成了革命群眾、造反派批判鬥爭的靶子。他每天早晨挂著“極右分子”的牌子，和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街頭“亮相”，跪下向毛主席請罪。一次又一次挂著牌子，或是戴著高帽游街，被反反覆複地批鬥。一次又一次被侮辱、遭毒打，並且曾被關進群專指揮部的囚室裏，每天被棍子隊押著和難友們一起勞動。後來又被醫院革委會勒令停止工作，停發工資，不得不再次返回黃泥鋪老家，在大隊合作醫療診所工作。災難與打擊，如影隨形，一直伴隨著父親，直到文革結束。

父親是樂觀堅強的人。在被群專關押期間，他開導那些因被侮辱、批鬥、打罵折磨而陷入絕望的人，為他們唱語錄歌“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唱樣板戲《紅燈記》中的“臨行喝媽一碗酒”等唱段，用領袖語錄鼓勵他們：“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看到光明，提高我們的勇氣。”看守被他的歌聲驚動，說他“變相反抗”，惡毒攻擊革命派，把他們比作日本鬼子鳩山，對他進行恫嚇與警告。但父親唱的是語錄歌和樣板戲，又不好扣什麼帽子，看守也只有吼叫幾聲了事。在他的安慰和鼓勵下，這些人精神振作起來，囚室裏也有了笑聲。

父親是勤奮敬業、信奉人道主義的人。他早年只讀過幾年私塾，後來靠著刻苦學習，成為一名醫生。在江浦工作期間，又到南京進修，掌握了內外科、婦產科等醫療技術。做為一名鄉村醫生，正需要比較全面的醫術。他回鄉後，成為當地的名醫，求醫者甚眾，即使被“專

政”期間，醫院其他醫生解決不了的疑難重症，仍要讓棍子隊隊員押著他前往診治。他對官員和百姓一視同仁，凡來求醫者皆認真治療，連迫害他的革命派或其家屬生了病，不得不找他診治時，父親也絲毫不帶個人怨恨。在他眼裏，這些人只是就醫的患者。這種胸襟與職業道德，令有些天良未泯的整人者懷慚，令旁觀者由衷地敬佩。父親在總鋪與黃泥鋪兩地工作 20 多年，救治病情危重的患者無數。直到今天，我回家鄉時，仍有一些人對我說，我父親當年救過他/她的命，他們至今仍對他心懷感激之情。

父親是正直善良的人。早年因言惹禍，使他遭受了多年非人的待遇，但性格并未因此有所改變。即使在尊嚴遭人任意踐踏的日子裏，他也從不向有權勢的人屈服。對於那些處境艱難，生活困窘的朋友，他均盡其所能予以幫助。他鄙視那些對上阿諛諂媚，對下傲氣十足，毫無信用，滿口假話的人，常教育我們兄妹做人要正直善良，待人要不卑不亢；名利皆身外之物，不要妄求，要得之不喜，失之不憂；公家的東西，即使扔掉、爛掉，也不要往家裏拿。

1979 年，父親得以平反，與母親回南京工作。我因已參加工作數年，不能隨他們去南京，獨自一人留在鳳陽。兩年後，父親患了冠心病。在南京某醫院住院治療時，我從鳳陽趕去看他。當時父親的病情已比較穩定，剛輸完液，精神還好。我陪他吃了晚飯，離開醫院時，他堅持要把我送到醫院的大門外。我告別父親，走出幾十米後，情不自禁地回頭看了一眼，見父親竟面對醫院的大門，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急忙跑過去，見父親臉色蒼白。我一時有些慌亂，問他怎麼了。他向我擺了擺手，過了片刻，才淡淡一笑，說：“剛才心絞痛又發作了，我已含過了藥，現在沒事了。”我又把他送回病房，才離開醫院。

我在趕往五弟就讀的南京藥學院借宿時，眼前不時浮現父親站在醫院門前的背影。沿途的街景讓我浮想聯翩：我脚下的路，父親早年也許走過。他那時的身影和步態，不正和我現在一樣年輕嗎？而現在，父親已經老了。父親 20 多年前離開江浦時的模糊的背影，又重現于腦海。他離開江浦時還是青年，再回到這個地方時，已 50 多歲，離退休的年齡不遠。父親離開江浦時年輕的背影和現在病魔纏身已經年老的背影之間，是長達 20 多年的蒙冤受辱艱難曲折的人生歷程，父親精神和肉體遭受長期的折磨和摧殘，是不是患病的原因……

1994 年，父親被查出患了胃癌，已是晚期。至 1996 年去世，做了三次大手術。兩年間所遭受的痛苦，非常人可以想像。

父親原名長髮，參加新四軍後，部隊首長說此名俗氣，為他改名秀，後來他又自己改名雪樵。這本是一個寓意不俗的名字：一個孤獨的樵夫，挑著柴擔在崎嶇的山路上踏雪前行，以自己的艱辛，換得家人的溫飽，且為世人送去溫暖。這個名字，却成了他人生旅途的象徵。

父親沒有給我們兄妹留下什麼物質上的遺產，但精神上的遺產却非常豐厚。我以父親的正直善良，不卑不亢處世待人；以父親的樂觀與堅強，面對人生的坎坷；以父親勤奮敬業的精神從事我所追求的事業，笑對種種歧視與不公，不被任何挫折嚇倒，克服重重困難，從一個半文盲最終成為能够著書撰文的作家。若不是受父親精神力量的影響，即使得到百萬遺產，恐怕也未必能有今天這樣讓我無愧于人生的結果。

補白：在（劉）燕子的童年記憶裏，存有一些類似黑白照片的歷史鏡頭。1965 年的四清運動，她那在北京林業部設計院工作的爺爺，被誣告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鬥而死。爺爺被批鬥時，始終昂著頭不服。一次燕子長大和父親一起回老家，探望爺爺的衣冠冢，因為突發洪水過不了河，白髮蒼蒼的父親哭倒在一堆爛泥裏。

茉莉

補白：劉曉東的媽媽在大會發言時由于緊張，說錯了一句話，把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說成大內奸、大工賊毛澤東，立刻就被打成反革命，打得渾身是血，關押起來。當時父親也作為走資派挨鬥。劉曉東上下奔波了三個月也沒能見到母親，後來終於在下鄉離開北京的前一天得以見到。母親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就是“千萬不要下鄉”。她回答到：“我明天就走。”

母親立刻兩眼含淚，馬上被帶走。

## 松北土改親歷記 馮志軒

一九四七年寒假，我們學生被編成小組，參加土改工作，給農村居民定階級成分。土改分為七個階段：土地調查、土地評級、評定階級成分、挖財寶、流血鬥爭、分浮財、分土地和發土地證。

第一階段是土地調查，分為三個步驟：丈量、畫圖、計算。東北地區的土地計量比較特殊：松花江北每畝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則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來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畝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剛好等於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畝，十五畝即一萬平方米為一頃。江北一畝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畝。丈量土地的工具“弓”，像個大圓規，約一米五高，兩腿間距五市尺。人握住弓的上端，用一腿觸地，另一腿往前翻倒，邊走邊丈量，很方便。我所在的工作隊，剛好負責我家所在的鄉。鄉政府設在寇家屯，管轄附近四屯。其中一個叫雙廟子屯，我家的五十多垧地就在這個屯。我要親自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給農民。

第二階段是土地評級。用弓丈量過的地塊，要畫出地塊圖，算出地塊畝數，然後由貧農團的人根據土壤狀況評出每塊地的等級，共分四個等級。這兩個階段的工作我做得很出色，農會的人對我極為滿意。幾個月後暴行來臨時，我既未受皮肉之苦，更沒有被打死。

第三階段的工作是劃定農戶的階級成分。由貧農團逐家評定階級成分，我做筆錄。我家依靠地租生活，被定為地主成分。

第四階段是挖財寶。怎麼挖？先挖人——毒打地主和他們的子女，毒打子女時還要讓地主親眼目睹。然後是挖地——掘地五尺。毒打地主的方法是把他們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腳趾剛好觸地，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就像在跳芭蕾舞，晃來晃去。毒打其子女的方法是扒光衣服，把兩臂綁在扁擔上，用皮鞭猛抽。此法非常有效，絕大部分地主立即把藏財寶的地點招供了出來。第二天，民兵們威風凜凜地背著套筒子（舊步槍，俗稱燒火棍），跟著幾個農會積極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東西。聚斂的財物有衣服、被褥、首飾、傢具等，一切雜物應有盡有，集中存放在農會的房間裏，由民兵看守。這些日用品和貴重物品當時叫浮財，所以也叫分浮財。簡言之，挖浮財的手段無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牆。

一天夜裏，我也和別的地主子弟一樣，雙臂被綁在扁擔上。但是，我受到了優待，因為我在土改工作隊中工作出色。他們把我拽入另一個房間，用皮帶往桌子上抽，叫我伴著皮帶聲高聲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供出財寶。劈啪劈啪抽打了一會兒，農會的頭兒說話了：“行啦！別打了。他家是在鎮上淨身出戶到這兒的，沒有什麼油水！”所謂淨身出戶，就是僅穿著當時的衣服被趕出家門，此後你的家就不是你的了。

五六天之後就進入了第五階段，即流血鬥爭，後來又叫刮骨鬥爭。報刊上宣傳說這就是階級鬥爭。真正是奪人心魄，血腥殘暴。

## 皮爾斯語 焦國標書

我家淨身出戶後，一家四口人栖身在富農金鳳鳴家的一個小棚子裏。金的妻子比我年長十幾歲，我叫她金三姐，是一位熱心腸的中年婦女。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樣，農會積極分子在金家開會（他家地方寬敞）。已經深夜了，金三姐輕輕地敲開我家屋門，沒頭沒腦、慌慌張

張地悄聲告訴我媽說：“老姨，他們定下了！”“定下什麼啦？”我媽媽反問她。“他們開了半宿會，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銘和老姨夫打死！”寇在國民黨時期任過村長。

“啊？什麼？打死？”媽媽驚異得不知所措，聲音都變了。這時父親還響著鼾聲。事情過了五十八年，如今我已是七十四歲的人了，可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著的草門，媽媽顫抖的聲音，父親的鼾聲，金三姐的傷感語氣，這一切相互交織，仍然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裏。媽媽驚魂不定，我睡意全消。

金三姐說：“那個土改工作隊的隊長是縣裏派下來的，姓胡。他召集那幫人開會，說縣裏的什麼頭頭，叫樹吉（書記）的人說了，這回一定要把貧雇農鼓搗（鼓動）起來，每個村都搞到底，把漢奸地主打死兩三個，說要點著什麼幾幾豆正（階級鬥爭）的火。他說這幾個村子有六個漢奸和地主，得打死兩個，明天打死寇玉銘和馮天祿，一個漢奸，一個地主。趙二混子（雇農，有點文化）插話說不打死行不行，那個隊長急了，說這是縣裏樹吉（書記）定的。別的人就不再敢說什麼了。”金三姐的聲音裏帶著恐懼——通風報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辦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著，躡手躡腳地走出了我們油燈也不敢點的小棚子。

我腦子一片空白，媽媽在抽泣，空氣凝固了。“媽，怎麼辦？我到鎮上去找鹵水吧，免得硬是打死！”父親醒了。他聽了母親的訴說，足有五分鐘未說話，最後自信地說：“不會的，天底下哪會有這種事，把沒有罪的人隨便打死？”父親已經六十五歲了。“可是金三姐說他們定了。”我空白的腦海裏突然冒出這句話。“定了什麼？”父親問。“說要把你打死。孩子說給你找鹵水去。”母親邊說邊抽泣。“不用，不會有這種事。人命關天，共產黨也得講法律。”這句話猶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壓在我心底的鉛塊似乎輕一些了。儘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親說的“共產黨也得講法律”的邏輯，如何解釋幾個月前我們家的淨身出戶呢？

次日早上，我站在村中的大道邊往西望，見從寇家屯方向來了一輛小毛驢車。我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趕快跑回家。不一會兒，兩個民兵進院了，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走吧，貧雇農要鬥爭你，快上車！”兩個民兵不由分說把我父親架上車。“你也走，跟著走吧！”其中一個民兵對我吼叫著。轉眼間我們被拉到了三華裏外的鄉政府所在地寇家屯。屯東頭車道左邊五六米處，橫放著一具屍體，血肉模糊，流著血水，全身的皮膚沒有了，像被剝去了一樣，斷了的肋骨杵在外面。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婦女和兩個女孩在撫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場面我實在看不下去，扭過臉，望著右前方灰濛濛的天空，流下了眼淚，心像被刀扎一樣地難受……

“你看，把寇玉銘給蘸糖葫蘆啦！又紅又亮，挺好看的！”其中一個民兵輕鬆地說著俏皮話。面對如此淒愴血腥的場面，那個民兵竟能說出這句話，其反差之大令我永生難忘！野獸并不可怕，人獸才可怕！我預感到父親要被打死。進鄉政府大院往右拐，民兵拖著父親推著我進到內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十幾個地主家屬被綁著站在炕上。這個房間只有南炕，地下寬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兩根粗繩子，地下留著一灘一灘血迹，角落裏粗繩、馬轡子、皮鞭橫七豎八地堆放著，已被血水染成紅色，抽打時粘下來的皮肉碎屑膩住它們的全部紋絡。一望即知，這是一個典型的殺人現場。一級政府辦公室同時就是殺人現場，歷史上可曾有這樣的先例？

進屋後我被推上炕。那些殺人的積極分子，眼睛充血，叫道：“快，快！吊起來！”顯然，他們要殺人了。他們把父親吊了起來。綁在炕上的所有地主家屬都把頭轉過去，低頭九十度以下。這時我聽到了像是粗繩頭抽打木板的聲音！父親的呻吟聲、叫聲，撕人心肺。僅僅半個多小時，他們就完成了殺人使命！消滅一個活生生的人原來如此簡單，和殺一隻雞一樣。接著就是暴尸田野。傍晚，媽媽找一個破櫃來收尸。我們給父親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來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膚全被抽飛了，像是裹著一層紅布。我坐在他尸體前的血地上，默



默地遙望陰暗的天邊，欲哭無淚。

在松花江北的廣大地區，土改運動中的獸性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縣東部相鄰的幾個屯子，如東海豐屯盧家被打死兩個人，二站鎮尚家被打死一人，自殺一人，南小城子屯邢家被打死兩人，其中一人是用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連的家屬。不論用什麼方式把這些人弄死，不需要任何手續，只要土改工作隊長宣布一下樹吉（書記）講話就可以了。粗麻繩、皮帶、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彈、刀斧、毒氣等殺人凶器相形見绌，前者更直接、更簡單，無需操作知識，且殺人的成本低廉。被打死的地主占多大比例？以寇家屯鄉為例，六個打死兩個，比例為三分之一。據專家估計，土改殺害了3-5百萬人。

小鎮裏的小工商業者也受到打擊。二站鎮一家賣日用雜品的小鋪子，掌櫃的叫馬少波，挨了打，游了街，跳井自殺前，在井沿上留下幾十個烟蒂——他是多麼不願去死啊！其實他頂多算是一個小小業主，可那時候就成了鎮上的資本家、資產階級分子。二站鎮僅有的兩個小作坊，一個油坊、一個燒鍋（釀酒坊），停辦了。所有受打擊的家庭，他們的藏書，包括相當珍貴的木版綫裝本，全被貧雇農當成捲烟紙了。我祖父的全部書籍，就這樣被燒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員和校長，凡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都在劫難逃，縣中學的兩屆校長都自殺了。

土改運動中流血鬥爭階段，還有一個花樣，叫串聯鬥爭。一個區的各個鄉之間相互交換著鬥爭地主，一個鄉的貧雇農可以到任何別的鄉去鬥爭那裏的地主。五十年前的北滿地區要比現在冷得多，剛進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皚皚了。一天早晨，農會幹部鐘義來敲門。“你今天到前邊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豐屯過來人說，他們今天來串聯鬥爭。”他一進屋門就對我說。看到我母親，他接著說：“大孀也到村後黃大姨家去吧。”母親讓他坐下，他說有事要辦，轉身走了。“媽，您快走吧！”我催促母親快走，以躲過這場災難。母親走了，我隨後也出了家門，直奔屯子東南約二裏地的土丘。這裏地勢較高，可以望到屯子裏的情況。

人喊馬嘶，一陣亂噪噪的聲音從屯子裏傳過來。我從高處望過去，只見有幾輛大車，一群一群的人亂嚷亂叫。事後聽說，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頓。這樣的串聯鬥爭以後還有兩次，我都在農會朋友的暗助下躲了過去。

血腥恐怖事件之後就進入了第六階段——分浮財。分浮財有個原則：不平均分。農會給貧雇農定了等級，給浮財定了價錢，每家貧雇農應該分到的錢數我也都計算出來了。瓜分勝利果實那一天，貧雇農早早來到鄉政府大院等著分東西。勝利果實擺得滿滿一大院子。一整天院子裏都是人聲鼎沸，笑語喧嘩。

現在要進入第七階段——分土地了。政策是全行政鄉土地打亂平分。寇家屯鄉平均每九畝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則是每人數量平均，質量不平均。所謂質量不平均，就是最窮的雇農要分給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窮的分給次等的，依此類推。地主、富農、上下中農當然是依次分給土壤不好的土地。

農會決定用三個晚上把土地分下去。頭一天晚上，依順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農、最貧農、次貧農……來選最好的土地。每家選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村西頭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約還剩下十五畝左右，農會主席對我說：“把這一塊地留下，先不分了，再來人分別的地塊。”

我當然只能照辦。以後幾天輪到中農、富農、地主分土地了。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塊都是貧瘠的沙地。等到該我家分地時，農會主席說：“我們農會決定了，你家該分二十七畝九分地，村西頭的十五畝好地分給你，剩下的再分這邊的。”我當時年輕，不懂什麼，反正照做就是了。這樣，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幾乎和貧雇農分到的一樣。

土地分配完以後，最後一道程序就是發土地證。土地證上寫著姓名、地段、畝數、座落和四周鄰居。按照地圖上標注的長寬，到現場釘木樁子，是為地界樁。到一九四八年春天，

松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基本結束。

土地改革還在進行的時候，另一個運動——擴兵支前運動，已經開始了。縣裏直接派出擴兵工作隊。他們先到寇家屯鄉政府，給鄉政府裏的人講解擴兵的目標和做法，接著召開全鄉貧雇農大會，進行擴兵動員。

一九四八年春節剛去，上午十點左右，縣擴兵工作隊就到屯子裏來了。隊長看上去四十幾歲，講話直截了當：“現在人民解放戰爭形勢很緊，前綫需要人。今天開會就是爲了擴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勝仗。大家都來了，我先給你們講一講，爲什麼要擴兵？道理講清楚了，咱們就報名。擴兵就是擴大部隊作戰的士兵。有了拿槍的兵，才能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共產黨來了，你們翻身得解放，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你們要用實際行動報答共產黨毛主席。”

農民們傻呆呆地聽著。“大家報名，快點！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擴兵工作隊隊長著急地催促著，詢問著，焦躁之情溢于言表。農民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會場出奇的靜，好像是一種交易談不成出現的尷尬場面。隊長臉上掠過一絲難堪的表情。農民分土地、分浮財時的那種近乎瘋狂的興奮情緒此刻不見了。

會場仍是鴉雀無聲，看來擴兵任務實在難以完成。隊長又喊叫起來：“我告訴你們，勝利果實你們已經拿到手了，要不要拿起槍來保衛這些勝利果實，你們自己想一想——國民黨來了你們怎麼辦？”接著他赤裸地威脅道：“你們分了人家財產，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們得了這麼大的好處，你們不去當兵？你們說，誰去！你們等著地主家的人回來反攻倒算殺你們嗎？！”

我離講話的人僅四米左右，只見他橫眉立目滿臉通紅，聲音有些顫抖。擴兵動員會已經開到過午了，鄉里的幹部直接點名道姓地動員。最後經過逐家訪問動員，全鄉共有七個人被擴兵。

## 運東的土改復查 碧薇萍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親，一個有8年黨齡，年僅32歲的中共地下黨員的遇難日，至今已過去了整整62年。父親是被土匪的兒子，在土改復查鬥爭的群眾大會上，被拉上“望蔣竿”摔下後活活打死的。

民國初期，我的太爺靠走街串巷賣盆賣碗稍有積蓄，後又與人合夥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點。1939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太爺被土匪綁架。爺爺和父親傾其所有，交了贖金，贖回的却是太爺被肢解的屍體。據說太爺是見到熟人了，所以被殺害。後來土匪又到我家後院的郭家綁架，被村民捉獲。經拷打，土匪供出了他們在我們村的同夥（是兄弟二人，爲土匪當“鉤子”通風報信，開門揖盜）。當時國民政府的部隊迫于日軍的進攻，已經撤退。家鄉處於無政府狀態，土匪如毛。爲保衛家鄉，村村修土圍子，村與村之間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擊土匪的群眾自衛組織，白鳳儀的部隊（後被共產黨收編）即其中之一。我們村那兩個暗通土匪的兩兄弟被白部抓走。我父親當時24歲，年輕氣盛，爲了給爺爺報仇，親手處死了其中一人。

鉤子兄弟，其中的老大有兩個老婆。這在我們村是獨一無二的，可見他們生活並不困難。8年後，1947年，他兒子竟成了搞土改運動的貧下中農。爲了爲他的土匪爹報仇，在群眾大會上打死了中共地下黨員——我的父親。據我母親回憶，當時他的老婆曾當街痛罵他：“你爲你爹報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嗎？你把人家好人打死。”

父親被害一個月後，母親才知道實情。在我們家鄉，像父親這樣的冤案并非個案。東阿縣委組織部當年落實政策的王某就曾經當面對我說過：“像你父親這樣土改復查鬥爭時被打

死的人有的是。”

1996 年我回山東老家，在東阿縣委組織部聽一位部長說，還有一位當時的縣長也是死于土改復查鬥爭。80 年代，在拜會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時，老人家告訴我：運東地區（山東運河東岸）土改復查左傾嚴重，後聊城會議上有過處理，但對受害者却不了了之。

我在黑龍江林業局上班時，認識一位原籍山東齊河的老鄉，姓張，曾任南瓮泉林場黨支部書記。張書記是軍轉幹部，曾隨解放大軍南下廣東。80 年代我告訴他我父親的冤案時，他說他的父母也好險，差點兒被活埋。他的家鄉搞土改時，正趕上他回家探親，再晚回去幾分鐘，父母就沒命了。當時埋人的坑已經挖好了，他是軍人，才救了父母一命。

我們村除了父親遇難之外，還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這一家有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記了一張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單（所謂變天帳），被發現了。後來這個孩子連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劃為富裕中農，她爺爺因不堪驚嚇，在囚禁地上吊自殺。她們村有一戶人家，男人僥幸逃跑，60 多歲的女主人跳坑自殺，被撈上後又被活埋。其年輕的兒媳婦被拉上“望蔣竿”，被喝問要死要活？當時只能說要活。要活就必須聽話，放下來後乖乖地做了當時村幹部的老婆。

我老伴的姑姑老實憨厚，嫁給一個精明伶俐的青年，娘家給買了不少土地。小夥子因精明伶俐，又有土地，于是成為鬥爭對象，不僅丟了命，五臟六腑還被土改積極分子掏出來煎炒當了下酒菜。

更有甚者，一個叫關營的百戶小村，一個大坑活埋了 48 口人，有 80 多歲的老人，也有吃奶的孩子。其原因是一個被囚禁的人打死一個看守逃跑了，被抓回後，連同親屬，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據說當時是夏天，一個月後，這個埋葬 48 口人的大墳竟長高了兩尺！第二年扒墳認尸體時，我老伴（當時 5 歲）去姥姥家正巧路過，被驚嚇得幾天不敢睡覺。

這就是我們家鄉運東地區的土改復查運動！

## 我的高中 丁曉宇

讀完小學一年級要上二年級時，父親對我進行了一次全面測試，最後說：“看來丟不了啦，這學不用再上了，就跟我一塊放羊吧。”母親大吃一驚，問：“為什麼？孩子正當上學的年齡不讓上學，放羊？”父親答道：“能寫自己的名字，能認識地名和常用字就够了。知識越多越苦惱，我不能讓孩子再有我這樣苦惱和不幸的人生了。”父親傷心而無奈，說話聲音都變了，有些顫抖，有些哭腔。我受驚不小。母親說：“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盡然。上學不上學應該取決于孩子的意願。這是他的權力，也是他的快樂所在。你說不是嗎？”媽媽已經哭了，滿臉的淚花，面對著我，很認真，但始終不正看我一眼，問：“珂兒，你喜歡上學不？還想上學嗎？”“想，我喜歡上學！”就這樣我又回到了學校。

小學畢業正趕上實行聯中制，各大隊的十幾所中學全部撤銷，由公社辦三個聯中。五六個大隊的五六個中學合并為一個聯中，一半的孩子將因此上不了初中，我這個右派子女肯定在輟學之列。然而吉人天相，恰逢教育回潮，實行考試和推薦相結合，我考了個第一名，劉堂聯中和山白聯中均給我發了錄取通知書。我選擇了離外婆家較近（家裏常年缺糧吃不飽，可到外婆家蹭飯吃），且校長和副校長都是我母親的老部下的劉堂聯中，還當上了劉堂聯中一四班的班長。

上了一年半初中，反擊右傾翻案風起，父親再次受到批判暴打，臥床不起長達年余，母親近乎失明。家中沒有勞力，大隊書記、生產隊長不讓上學，我不得不輟學回家參加勞動。等父親能起床勞動時，我才重返學校。這已是一年之後了，聯中也解散了，只好回到剛恢復

的大隊辦的初中，并退了一級。不料因禍得福，這一年多的農村勞動和退級，不僅強壯了我的身體，學會了犁地、耙地、耩地、揚場等技術農活，還趕上了本來不可能的上高中的機會。當時縣裏號召大辦教育，大隊也辦高中，我不費吹灰之力連考試都沒參加就直升到隊辦高中了。連教室都沒有換，我已成為高中生了。

1975-78 年的密縣可以說是世界上高中教育最發達的地區，或者說其高中教育的格局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全縣人口近八十萬，分為十幾個公社，社社都辦高中，而且不止一所，通常是兩所，一所叫社辦普通高中，一所叫社辦農業高中，有的公社還有第二農中。公社下面的大隊還有隊辦高中，全縣近 300 個大隊，辦了近百所隊辦高中。

真要感謝這些社辦和隊辦高中了，如果沒有這種高中教育的大普及，像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弟是讀不了高中的。那時父親竭力不讓我到公社高中去上學，理由就是，即便你過了高考分數線，可是作為右派子女，政審通不過，還是上不成，徒然蒙受心靈創傷。當時父親不支持我轉學到白寨高中（密縣第五中學），77 年不讓我參加高考，都是出于這種考慮。

1977 年高考成績揭曉後，我找到考題自考一下，信心大增，完全可以上本科。參加高考的決心已定，于是我果斷離開大隊高中，回家自學，對父親說：“如果沒有公社以上的高中可上，我寧肯在家自學，免得再在隊辦高中耽誤時間。”

1978 年 5 月 20 號，經多方爭取，右派父親終於同意我離開西腰大隊高中，走後門去白寨高中讀完高中階段的最後三個月，然後參加 1978 年的高考。在離高考還有 40 多天的時候，全縣舉行了一次高考摸底統考，我僥幸取得全縣第一名，隨後被選拔到密縣教育局組織的密縣第一高中的 40 天高考強化班學習。這個強化班分為四個班，文科一個班，理科三個班，每班三十多人。老師是從全縣一百多所高中裏選調出來的頂尖老師，學生則是從全縣近五千個應屆高中生裏選來的尖子生，其中許多學生是 77 年 11 份高考達到錄取分數而未被錄取或被錄取但不滿意學校或專業的落榜生和擇校生。理科三個班的應屆生還多一些，約占三分之一，文科班只有兩個是應屆生（年齡最小的我和李志洲），其餘都是參加過 77 年高考的老大哥。

40 天的強化班結束，我離開縣城，回到白寨老家。幾天後，參加 1978 年的全國統一高考，最後以優異的成績被河南大學中文系錄取，成為白寨公社高中和西腰大隊高中辦學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唯一的一名本科生。後來有人調侃說，這兩所高中似乎是專為丁曉宇考大學辦的。

北京陳先生來信：你們發來的第二期《黑五類憶舊》和第三期“父親專號”我都收到了。你們在做一份沉重而有益的工作，把那黑暗而血腥的時代記錄下來。但我以為，時間的磨洗已經削弱了記憶的力量，柔弱的民間之筆，似乎不足以承當記錄那個殘酷、非人性時代的重任。我曾經歷過那個時代，撕心裂肺的創痛、風雨如盤的壓抑，似乎未能在這些記錄裏被充分表達出來。但我仍然以為你們的工作是有益的。你們先做民間收集，等待我們的民族出現如椽巨筆。

北京王先生來信：看了兩期“憶舊”，感到文章的類型過於單一了。回憶性的述說，固不可少，並且這可能是貴刊的創立緣由之一，但就雜誌而言，還是複合型的更好些，以滿足不同口味要求的讀者，并可起到引領作用。比如每期能否讀到一篇具有較高水準的評論性或研究型文章？又如每期能不能上一篇寫域外或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性質相同或相似事件的文章？哪怕是梗概性的介紹也好，這也是一種憶舊。這種橫向和縱向上的打通，有時對讀者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目前我看到的大陸電子刊物有四五種，貴刊作為新軍，希望能後起競秀，越辦越好。

這是長春郊區西湖生產隊審訊鬥爭會的一幕。房梁上吊著一位白髮蒼蒼的七旬老人。兩個凶神惡煞般的群專隊長（姓齊和姓張）一個手操木棒，一個手握牛皮帶，邊審問邊抽打，不時傳來老者撕心裂肺的嚎叫。這吊著被抽打的老人，是本屯唯一的地主分子李景堂。他是我的同族堂伯，排行老四，稱他四伯。

據說有的地方從地主家裏挖出了槍支，爲了擴大戰果，號召各村各屯都要對地主家進行一次土改式的追繳槍支的鬥爭。解放前東北農村土匪多，一般地主家都有槍支。這次追繳槍支的土改式鬥爭，當然少不了四伯。姓齊的群專隊長開始審問。他沖著吊在梁上的四伯問：“吊著舒服嗎？”四伯不敢說不舒服，脫口說了句“舒服”。“看來你還沒吊够，那就繼續吊。”張姓隊長裂嘴奸笑一聲。伯父意識到回答失誤，急忙改口說：“不舒服，確實不舒服！”“還想吊嗎？”齊群專問了一聲。“不想吊了。”“既然不想再吊，問你一個事能說實話嗎？”四伯父急切地說：“能！能！”

“解放前，你家養過槍嗎？”“養過。”“養過幾支？”“養過兩支。”“是什麼槍？”“三八大蓋。”“有匣子槍嗎？”當地人將手槍叫匣子槍。“沒有。”

張群專怒吼一聲：“你他媽的不老實，還得吊起來讓他清醒清醒。”話音剛落，兩個造反派迅速將四伯父重新吊起痛打。幾分鐘後又把他放下來。四伯父兩腿剛落地，齊群專走上前怒吼一聲：“匣子槍有幾支？”“真的一支也沒有。”“是不是還要吊起來再悠一悠。”“再吊起來，就是打死，我也拿不出匣子槍。”

“老東西，那兩支三八大蓋槍藏在哪裡？”“解放前就交給區工作隊了。”“誰能證明？”“當時給了一個字據。”“既然有字據，就交出來吧！”“字據放在夾襖的夾層裏，被老嫂子洗衣服時洗碎了。”“你他媽的不老實，再給我吊起來再幫助幫助他。”

四伯又重新被吊起，一陣暴打。我實在忍不下去了，衝動地喊一聲：“我可以證明。”群眾隊長們以爲我這個串聯大江南北的高中生見過世面，肯定能和地主分子劃清界綫，揭其老底，就很客氣地叫我到前邊來。我走到會場中心。齊群專對我說：“你和他對質吧！”我說：“有一天我三伯母將一個洗碎的紙條拿給我看，問紙上字能看清嗎？我說只能看清一個槍字。三伯母嚇得哭了。這個字條真的洗壞了。”“你這個孝子賢孫，這哪里是證明！是爲地主分子開脫。”齊群專火了，沖著我嚎叫謾罵。

“我是協助群專隊把問題搞清楚，怎麼是爲他開脫呢？”“你這是破壞文化大革命，保護地主分子過關。”“我只是說實話，沒有保護他過關的意思。”“李景堂是地主分子，是階級敵人，你恨不恨他？”“當然恨。”我不敢說不恨。“李佐廷你恨敵人，現在敵人就在你面前。他藏槍要變天，你給我狠狠教訓改造他一下。”齊群專邊說邊將一個手指粗的木條遞給我。“毛主席教導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我不能搞武鬥。”我不能打伯父，只好用毛主席語錄來拒絕。“李佐廷露出了本來面目，是地主的是孝子賢孫，今天來鬧會場，保護地主分子過關，向毛主席請罪！”齊群專一邊喊叫，一邊用力摠我的頭，讓我跪下。我掙扎著不肯下跪，張群專上來助陣，我無可奈何地跪下了。齊群專又摠我的頭，讓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又掙扎又喊叫：“我無罪。”這樣一來，激怒了兩個群專隊長，不容分說，對我劈頭蓋臉一頓打。爲了不再吃眼前虧，我只好老老實實跪下，並自我安慰說：“我李佐廷給父老鄉親下跪，跪得著。”我老老實實的跪著，兩個群專隊長覺得制服了我，獲得到一種內心滿足，趾高氣揚。“李佐廷，今天就要你來幫助幫助這個地主分子，你能不能幫助。”齊群專向我下達打四伯的命令，我還是堅持“只能文鬥，不能武鬥”。

爲了繼續擴大戰果，決定將追繳槍的追查鬥爭會，改爲對地主階級孝子賢孫李佐廷的批判會。群專隊帶著大家念語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然後高喊口號：“李佐廷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打倒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李佐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轉入批判我以後，四伯閑起來了，雖然也跪著，但總比吊著舒服。幾個人都沖著我批呀罵呀，再沒有人理會他。我引火燒身，遭受批判鬥爭，但四伯獲得了解脫，我心裏很痛快。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骨瘦如柴，用繩子吊在房梁上，還有群專頭目的毒打，再折騰幾個小時，不死也要脫層皮。過後，四伯及四伯的家人見我時說：“你救了四伯一條命，叫你受苦了。”

挨鬥後，我返回本來不願意返回的開始派性武鬥的學校。父親受我株連，群專隊繼續折騰我的父親，又派人去學校要把我揪回來。我不能任其揪回去遭受肉體折磨和人格辱侮，無奈之下，我開始浪迹天涯。當時大串聯尚未結束，有學生證在身，坐火車不用買票。

補白：父親說，小時候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姥姥家，因為姥姥家是中農，在那裏不會有人歧視，在那裏也才敢跟小孩打架。這個經歷培養了父親隱忍的性格，不到關鍵時刻絕對不會發威。父親在自己村裏，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八歲那一年，一群小孩圍著逗弄一個殘疾小孩，把那個殘疾孩子逗哭。他老爹過來問誰幹的，那殘疾孩子就賴我父親，結果他老爹一把抓起我父親摔到地上，說這樣的富農崽子，摔死也沒事。父親回家告訴奶奶，奶奶只能說：“以後你自己老實點，離他們遠點。”無奈的奶奶，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這對一個八歲的孩子來說，是多大的心理傷害呀！父親回憶說，當時摔死確實沒事，根本不會有人追究責任。還有一次經歷，父親刻骨銘心。他當時在幼兒園，幼兒園中午有飯，父親和另一個小孩出去看光景回去晚了，那個管幼兒園的老婆子却只給另一個小孩吃飯，不給我父親飯吃。

烟臺山

母親上官雲珠 韋 然

1969年1月初，從北京到山西插隊不到一個月，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這幾年一直災難不斷的家一定出了什麼大事，否則姐姐不會一反常態寫來這樣一封信。一到上海，我立即到音樂學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學習聲樂，再有一年就可以畢業了，可是碰上文革，一切都成了未知數。姐姐在校園裏看到我，臉上的表情喜憂參半，拉著我匆匆來到暫時栖居的琴房，掩上門，抱住我就哭了。

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已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牆壁上全是媽媽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砸得像蜂窩，從上到下布滿了黑洞。半年內連續兩次大手術（乳腺切除術和腦手術）的媽媽，剛剛被醫生從死神手中搶回，腦子有病，正常思維還未恢復，就一癱一拐地被他們趕出醫院。

那時候的母親，人是半傻的，沒有一點力氣，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電影廠上班。其實哪有什麼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報到，在這裏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那時媽媽的身體，還遠沒有恢復到一般健康狀態，連日常家務都做不了，可電影廠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媽媽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裏的造反派輪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的時候搞陰謀。媽媽不承認，他們就打，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媽媽回到“牛棚”時，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裏的黃宗英阿姨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一邊安慰一邊關切地詢問。媽媽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裏，媽媽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但是還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寫的交代。她哪里還拿得動筆，拿起筆來，又能寫什麼呢？她實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

暗的一刻，媽媽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那是 1968 年 11 月 22 日的凌晨。那一年媽媽 48 歲。

媽媽從樓上跳下，落在小菜場準備上市的菜筐裏。當時還可以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裏的門牌號碼，等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去醫院，已經沒救了。姐姐得到學校工宣隊的通知趕到醫院時，連骨灰也沒有見到。媽媽身後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學燕凱一手幫助料理的。燕凱高大英俊，我一直視他為姐夫。多虧有了他，支持姐姐度過媽媽過世後最艱難的一段時間。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個星期，一直是我們三個在一起，燕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姐姐送上去部隊農場的汽車後就回了山西，而燕凱則在媽媽死後一年半，1970 年 3 月 8 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殺身亡，年僅 24 歲。我的叔叔程述銘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為中國天文報時準確性躍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貢獻。1971 年深秋，在上海天文臺的隔離關押地，上吊自殺。那一年他 46 歲。

文革初起，姐姐投身運動，為了表明立場，曾主動提出和媽媽劃清界綫，後來又搬到學校去住。可是在當時，血統論是唯一的一把尺子。姐姐有一個“三名三高”的媽媽，還有一個“賣國主義”的爸爸，無論主觀上怎樣努力，也是紅不起來的。我和姐姐同母異父。她的父親姚克，寫過電影《清宮秘史》，一度被批判為賣國主義影片。

媽媽去世後，姐姐因為家裏的種種“問題”，學校遲遲不予分配工作，直至 1975 年才在親友幫助下獲得浙江歌舞團的工作名額。為了儘快辦理手續，姐姐四處奔波。9 月末一個細雨紛紛的下午，姐姐被一輛大卡車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剛剛過完 31 歲生日。幾天前我倆還相約，要患難與共，相依為命，可她突然就這麼走了。

建國後的宋慶齡 何 方

1950 年 3 月宋慶齡給中共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 年 10 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入黨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1955 年 11 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 年宋又寫信給中共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從 1958 年起，宋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不得不繼續參加。

1959 年 4 月，宋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她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掛個名做樣子，對國家不利。”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

政治局討論時，21 人中 18 人贊成，3 人反對者是毛澤東、林彪和康生。當時毛發言說：“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綫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綫。我們同她是不同的階級。”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 年 8 月，69 年 11 月，76 年 6 月，宋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在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都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道路的迷惘和苦悶。“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做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却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 年 3 月，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他們傳話說：“主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推病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1980 年 11 月，宋給中共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 年 5 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她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 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胡、李問宋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補白：台州人陳某，在沿海部隊某留守處當參謀。戰友多去“支左”，空蕩蕩的辦公室裏只剩他一人，於是心生用舊《解放軍報》練毛筆字的念頭。當時報紙每天都印有套紅的大幅偉大領袖和他最親密的戰友林副統帥的畫像。起初陳某小心翼翼避開領袖像下筆，偶有塗及，及時燒毀。這天中午，書寫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陳參謀，你愛人來了！”他愛人從江蘇老家來部隊探親，本來他要去接站的，結果寫到興頭忘了。聽到叫聲，他扔下筆關了門就沖了出去。這當口，同辦公室去支左的余參謀臨時有事回來，開門見滿桌塗抹墨迹的軍報，翻了翻，皺起眉頭，沉思片刻，最後果斷地揀了幾張，折好放進軍用挎包，離開辦公室。與老婆一番親熱之後，陳某帶著滿臉快意返回辦公室。他發現桌面報紙有人動過，細查一下，發現少了幾張，再向衛兵打聽，頓時大驚，心說“完了！”陳某立刻回宿舍，對老婆說：“部隊臨時有緊急備戰任務，你必須馬上離開回老家去。”沒等老婆反應過來，便拉著她，夾著未解開的行李，叫輛車趕往火車站。妻子上火車前，他千叮萬囑：“回去後，不要再往部隊給我寫信找我。”1972 年，陳被軍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處六年徒刑。隨後他向法院提出與妻子離婚，並放棄對五歲女兒的養護權，免得女兒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陰影中。從此他與一切書寫工具斷絕接觸，除非萬不得已，絕不再寫一個字。與此同時，原本一個身材魁梧、行坐有著標準軍人儀錶的他，自暴自棄，變得猥褻、卑微，常常為半匙菜一瓢湯與其他犯人爭得臉紅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後，陳某獲得平反，恢復了軍籍。有一天，他穿著上校軍銜的軍裝，帶著一個勤衛兵，重游舊地，藉以藉以洗刷在這裏留下的屈辱，找回做人的那份尊嚴。



也說侯振亞的兒子 心不易

世界真小，《黑五類憶舊》第一期的第三篇《侯振亞的兒子》中所記述的，是我在福建師大附中的同一屆同學。只是那位侯振亞的兒子，本是譚力夫一類盛氣凌人的太子黨，並非什麼真正的黑五類子弟。寫這篇文章的海寬先生，不知何人，當是我們附中當時念初一的一位校友。其文對侯氏頗多溢美之詞。其實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侯振亞的這位公子，名叫侯漳林，當時念高三。我當時在附中的高二五班。我們這個班是市里“三二制高中”的試點班，所以我們的高二就相當於高三，與侯漳林算是同屆。當年的附中，有不少省委和省軍區的高幹子弟就讀。除侯漳林外，還有省委秘書長李敏唐的公子李平、李綱等多人。這些貴族子弟，平日裏自稱革幹、革軍子弟，有十分濃厚的優越感，自以為高人一等。但他們讀書都不咋的，所以又覺得在附中沒有得到與他們的家世相當的尊敬。

文革初起，北京的宋要武們被毛接見，遠在福州附中的以侯漳林、李平、李綱為首的權貴子弟們也迅即響應，率先成立了福州第一支高幹子弟紅衛兵——東海前綫紅衛兵（以福一中和附中的高幹子弟為首）。他們認為自己根正苗紅，革命、造反都是他們這些八旗子弟的專利。我們班上的林培高當時也申請加入，但因其父僅是省軍區的一名大尉軍官，不入八旗子弟們的法眼而被斷然拒絕。為了標榜他們血統高貴，是毛的正牌御林軍，侯漳林這夥人在附中操場正式成立東海前綫紅衛兵的時候，竟公然通過校廣播站殺氣騰騰地勒令全校師生要規規矩矩地呆在教室內，在成立儀式完成之前，不得踏出教室一步，也不准透過教室玻璃窗觀看他們的“成軍儀式”。李平、李綱等甚至大白天帶著美制卡賓槍在學校操場打靶，以顯示他們的威風。東海前綫紅衛兵甫一出世，就有當年黑衫黨衝鋒隊那種暴力特徵和囂張氣焰，福州全城的打砸搶風隨之而起。東海前綫紅衛兵成立不久，侯漳林又被錄取為空軍航校飛行員，全校師生歡送，正是烈火烹油，福州宋要武的氣焰一時達到頂點。

誰知好景不長，貓這回的革命，竟是要清算自己黨內的那些高幹。隨著侯振亞被歸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之列，侯漳林也從飛行學員被貶為空軍地勤人員。此案定性之後，侯漳林更被勒令退伍，退回原籍。這位純正高貴血統的紅五類，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戲劇性地完成了鳳凰變烏鴉的全過程，被掃除到黑五類子弟之列。

還有更巧的。我的這位貴同學的妻子，即原文中反復贊美的那位為了愛情，不惜千里迢迢以身相許，隨侯漳林到內蒙插隊的山東姑娘，文革後竟成了我的同事，使我對侯漳林其人其事有了更多的瞭解。這位山東姑娘叫徐曉蘋。74年鄧小平復出後，侯振亞的處境即大有改善。相應的，侯漳林也結束了插隊的苦日子，上調到閩北邵武的一家工廠。文革後，侯父的問題得到徹底平反，侯漳林也就更上層樓。當時省委組織部讓他自己挑一個最好的部門給予安置，他於是挑了省外貿（鞋帽公司）。

改革開放之初，許多高幹子弟都願到外貿部門工作，既有油水又能出國。此時徐曉蘋也妻隨夫貴，被直接安排到省美展館做出納。又過了不到兩年，講文憑學歷之風開始興起，侯漳林被保送到廈大外貿大專班帶薪專修兩年。正當徐曉蘋以為苦盡甘來、寒窯熬盡的時候，災禍也隨之降臨。侯漳林在廈大學習期間，與一位軍隊出身的女高幹子弟舊情復燃，逐漸嫌弃平民出身的徐曉蘋與他門不當戶不對，終至畢業後拋妻棄子，另結新歡。徐受此刺激，後來信了法輪功，並成為我們單位和整個省直機關中的法輪功“死硬分子”。

建國之初，也有許多軍隊和地方領導幹部拋棄農村的糟糠之妻，與城市裏的美麗小姐另結姻緣，成為現代的紅色陳世美。由此可見，是制度之惡使人變惡。當侯氏公子落難時，他也就失了八旗子弟的驕焰，與一般的平民百姓或知青有了平等的交往，並受到他們的庇護。一旦這些舊官僚重回文革期間暫失的“天堂”，他們就很快顯露出人性中見利忘義的邪惡一面。

補白：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日），閩北某山城發生一件驚天大案。深夜，一胡同深處的一座破木屋裏突然傳出了巨大的音響。有人先是用怪模怪樣的喉音，夾雜著敲擊聲，把哀樂演繹得像西方嘻皮士音樂，接著是模仿嗩吶奏喜氣洋洋的《秧歌曲》，後來高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開紅花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呀”，活像在舉行一場狂歡會。這聲響無疑讓本來就生活在極度壓抑與恐懼中的人聞之心驚。驚恐中的鄰居暗中哀嘆道：“老黃家兒子又要犯事了。”果不出所料，幾分鐘後，遠比現在110出警還快，一群紅衛兵破門而入，把還在高歌狂舞的一個衣裳襤褸的男子拖走了。他是老黃家的大兒子，叫黃X德，28歲。這小黃打小就喜歡唱歌，音樂天賦很高，過耳不忘，嗓音宏亮高亢，尤其愛唱“紅歌”。唱到動情處，熱淚盈眶。一次表演唱聖歌《東方紅》，雙眼含淚，走臺步不慎摔下舞臺，腦部受傷，落下間歇性精神病。發作時不分時間、場合，沒完沒了地唱紅歌。文革開始後，以領袖頌歌為主打的歌曲一統天下，黃X德如魚得水到處唱。起初各造反派搶著要他去助陣，後來發現他唱著唱著就亂套了，東一句西一句，成了干擾“鬥爭大方向”的噪音，就把他趕走了。發展到後來，他一唱歌就掏出襠下物，當眾露陰，于是被戴上壞分子的帽子，打入另冊。從此，凡國內外形勢稍有風吹草動，他就被列入重點控制對象。家人怕受牽連，躲走了，留他一人獨居。1976年9月9日晚這一頓亂唱，為黃X德招來現行反革命罪，領刑十四年。在獄中他經常半夜三更高歌，沒少挨揍，最終死于拳腳下。若干年後，其海外親人回來尋找遺骸，想安葬到老家祖墳上。然昔日的埋葬地已變水庫，其骸骨連同他的名字和一肚子的紅歌，永遠沉寂到水底世界了。

## 曾家的寶珠 史 海

1958年炮擊金門時，她八歲，曾經參加慰問團到前沿炮兵陣地慰問演出，是全團年紀最小的演員。一首表現臺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渴望解放的歌曲，小小的她唱得聲情并茂，博得陣陣掌聲。那張演出照，被她視為自己的最高榮譽和驕傲，一直高高地挂在家中最高最顯眼的地方。她立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長大參軍親手把炮彈打到臺灣，把五星紅旗插到寶島，讓水深火熱中的臺灣人民，也過上我們這樣的天堂生活。

一次，教育局長到校視察，瞭解政治教育情況，在她班上出了兩道題：三面紅旗是什麼？周恩來在國家擔任什麼職務？班上大部分同學答“隊旗、團旗、黨旗”和“當很大很大的官”，只有她回答：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國務院總理。校長當場表揚她，並號召大家向她學習，從小關心政治，將來當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然而在後來的拔白旗運動中，她的父親被查出臨解放時曾參加押送一批黃金到臺灣。實際上他當時只是一名普通銀行職員，平時經常往返台海，那次臺灣之行不過是執行公事而已。但政府不這樣認為，最後被定為反動派賣力，與人民為敵，屬於歷史反革命。她的宏偉理想一下子變成了白日夢，連上臺演出的資格也沒有了。她開始恨父親，是他毀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文化大革命來了，或者說機會來了。她決心要和父親劃清界綫，接受黨的考驗，做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紅色接班人。破四舊了，她砸了家裏的一尊古董級的觀音菩薩，把母親脖子上的佛珠扯下扔到大街上。一天，她領著一批紅衛兵到家裏，先是沖著她父親集體高唱“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語錄歌，接著高舉紅寶書喊當時流行的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滾蛋！”隨即她向前走了兩步，大聲喊著她父親的名字，頓指氣使地說：“從今天起，你要繼續把在舊社會做過的壞事，統統交待出來。不然我要和你這個國民黨殘渣餘孽脫離關係，劃清界綫！”一向文弱的父親，短暫的驚愕過後，瘋了似的沖向前，

一巴掌摑過去，伸手扒下她的紅衛兵袖章和軍帽。紅衛兵見狀，怒不可遏，沖上去把她父親架起來拉走，實施無產階級專政。批鬥會上，她當眾宣布與這個反革命的家庭決裂，“一顆紅心永向党”，“永遠跟黨鬧革命”。

她父親經歷了那場女兒造反後，引發神經錯亂，常常滿口胡言亂語，嘮嘮叨叨地說些對“萬壽無疆”與“永遠健康”大不敬的話。每一句若要被人檢舉了，都可以“斬立決”。她母親成天生活在萬般驚恐中，感到身邊的丈夫就像一顆隨時要爆炸的炸彈。與其等待這樣的悲劇出現，不如自己痛快地走。想定後，她弄了一瓶農藥樂果，選擇一個深夜，與丈夫一起喝了。

兩年後她回來了，父母已離開人世，房子被貼上封條。生她養她的家沒有了，親友也不肯接納她，而她心目中追隨的無比神聖的“革命大家庭”也不知道在哪里。這時她，第一批報名，決心到“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後來知青陸續返城，她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嫁給了當地一個生產隊長的兒子。隊長的兒子滿腦子封建思想，把她當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又擔心留不住她，平日對她嚴加看管，稍不順意便棍棒相加。萬念俱滅中，她用樂果把丈夫毒死，被判無期徒刑。服完十二年刑後，她被減刑回家。

她再一次舉目無親，走投無路。她父親在臺灣的一位摯友找到她，幫她嫁給一個臺灣鰥夫。到臺灣後，這段婚姻沒維持多久，她便削髮為尼，遁入空門，終日奉香禮佛，了却餘生。她叫曾寶珠。降生時，其父初為人父，視女兒為最可寶貴的掌上明珠，故取此名，以表達內心的喜悅，寄托長輩的希望。

地主婆劉大妮 張耀杰

地主婆劉大妮是我們村裏的第一美人。她比我奶奶小 10 多歲，比我母親大 10 多歲。劉大妮是個連自己的丈夫都沒有見過一面的老處女。她的丈夫姓蔡，是一戶小地主家的獨生子。白淨秀美的劉大妮取這麼個俗不可耐的土名字，就足以證明她並不是大富大貴的嬌小姐。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地主婆劉大妮總是那麼親切，那麼漂亮，那麼年輕，又那麼聖潔。

劉大妮的未婚夫姓蔡，起初在河南省城開封讀書，後來竟沒有音信了。在兒子沒有音信的情況下，蔡家征得劉家的同意迎娶了劉大妮。代替兒子與新娘子拜堂成親的，是蔡家的小女兒。大嫂子與小姑子拜堂成婚，稱得上是百年不遇的稀罕事。老輩人經常談起，因此很自然地印在了我的記憶中。

到蔡家守了幾年活寡，劉大妮遇上土改。這個連丈夫都沒見過一面的已婚處女，不僅家產田地充公，她自己也成了任人凌辱游鬥的地主婆。不少翻身得解放的地痞光棍打過劉大妮的主意。有位好心人勸劉大妮放棄地主家庭，嫁給貧下中農，說是城裏一個妓女嫁給本村某光棍，不到一年就生下個白胖小子，鄰村地主家的小老婆改嫁給本村的另一個老光棍，現在也過起了幸福生活。劉大妮抄起棍子，把這位好心人趕了出去。此事傳揚出去，成就了一段貞女佳話。後來劉大妮從外鄉抱養了一個男孩兒，像模像樣地度起寡婦生涯。

抗美援朝時期，村裏一輪又一輪強征公糧。年輕漂亮的已婚處女劉大妮，每一次都被拉出來挨第一刀。強征公糧動員會一般安排在晚上進行，從鄉里派來的荷槍實彈的公家人，總是先讓地主富農們帶頭上報要繳納公糧的數目。熱鬧一通之後，公家人劈頭斷喝：“劉大妮站起來！”劉大妮便只好應聲而起。“你家打算繳多少公糧？”劉大妮報上數目後，公家人大發雷霆：“把劉大妮綁起來押鄉里去！”於是人群中沖出兩個彪形大漢，把劉大妮五花大綁拉扯出去。接下來的強征公糧自然是一片踴躍。被綁出去的劉大妮其實並沒有被押送鄉

里，而是走出村口便鬆綁回家去了。劉大妮被工作人員當作革命鬥爭的道具靶子玩弄一番之後，回到家裏補償和慰勞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把平時捨不得吃的土油（棉籽油）拿出來炸油饅吃。

劉大妮留給我的最深印象是與炸油饅有關的游鬥游街。記得那是一個三伏天，我大抵在四五歲之間。我和小夥伴們在村子中央的學校操場旁邊，一邊觀賞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姐們上體育課，一邊拿自製的玩具紅纓槍做著摹仿動作。突然間，一陣鑼鼓聲由遠處傳來。正在操練中的紅衛兵學生失去約束，一窩蜂沖向街頭，向著敲鑼打鼓的聲音迎了過去，嘴裏興奮地叫喊著：“看游街了，看游街了。”

我們幾個光屁股小孩從人縫裏鑽了進去。那天游鬥的對象正是劉大妮。她身上穿的是已經被汗水浸透的大紅緞子的新棉襖和新棉褲，胸前挂的並不是黑牌子，而是一口油糊糊的大鐵鍋，五彩繽紛，汗流浹背，狼狽之狀可想而知。

抓人游街的組織者，照例是村裏的支書、大隊長、民兵營長之類不用下地幹活就可以吃小灶的特殊材料，還有跟隨在他們身邊的骨幹民兵和積極分子。游街隊伍停下來，先是村幹部帶頭高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打倒劉少奇！”之類的革命口號，接著是一個姓姚的男人揭發一些我當時還不能夠完全明白的事情。多少年後我綜合各方面的信息并根據自己的理解，才算整理出了自己的思路。原來，前一天下午村子裏召開群眾大會，劉大妮與村裏的幾個地富反壞右分子，照例被五花大綁拉到主席臺上跪了整整一個下午。晚上回到家裏，她照例拿出自己平時捨不得吃的土油炸油饅慰勞自己，被住在她家上房的姓姚的男人看在眼裏。

這姓姚的男人本是縣城中人，在戰爭年代立過功、負過傷。光榮復員後，在縣城裏當了一名小官。1958 年大躍進時被他妻子的妹夫、村子裏的一名幹部請到村裏，領導全村人進行向共產主義天堂大躍進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他利用控制集體食堂的權力欺男霸女，玩弄過一些稍有姿色的女人，却從來沒有能夠把劉大妮搞到手。大躍進過去，這位姓姚的男人遭受毒打批鬥之後被撤了職，依然不肯放過劉大妮。這天晚上偏巧他的老婆孩子不在家，他便以不讓占便宜就要去告發相要挾，劉大妮却像電影裏的革命英雄人物江姐、劉胡蘭那樣寧死不屈。姓姚的男人惱羞成怒，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大隊部告發劉大妮抗拒改造，同時却隱瞞了自己的性侵犯企圖。

遇到這種與階級鬥爭有關的政治事件，村幹部自然是聞風而動。他們帶上幾個民兵沖到劉大妮家中，找到了她吃剩下的油饅和用來炸油饅的油鍋。姓姚的乾脆從劉大妮的衣櫃裏翻出珍藏在箱底的嫁衣——大紅緞子的棉襖和棉褲。一幫人極其野蠻地扒下劉大妮身上的單衣單褲，把棉襖棉褲裹在她的身上，再把黑糊糊的油鍋扣在她的肚皮上，一條繩子牽著上了街。

拉劉大妮游街，在本村乃至附近各村，一直是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出好戲。附近的幾個村裏除了許多越窮越革命的老光棍之外，還有更多不大甘心娶了醜婆娘的男人們。在他們心目中，這位任誰都搞不到手的老處女，無疑是公開發泄變態性欲的最佳對象。

時近中午，被人們推搡簇擁著往前走的劉大妮，渾身上下冒著熱氣。紅緞子棉襖的扣子早就被人扯開，兩個大白奶子上點綴著一顆顆混濁的汗珠。每當劉大妮支撐不住癱倒在地的时候，總會有幾個壯漢沖上來撕扯一番，捎帶著在她的細皮嫩肉和大白奶子上揉一下或捏一把。湊上來占便宜的，還有一些醜陋不堪的女人們。她們用鐵鍋上的油泥塗在劉大妮粉白透紅的臉蛋上。

劉大妮最後一次癱倒在街道中央時，任憑這些男女怎麼揉捏撕扯，怎麼喊口號吐唾沫，她都是瞪著雙眼不能動彈。一個與我一樣光屁股的小玩伴突然間亢奮起來，舉起小雞開始往劉大妮身上撒野尿尿，沒想到一泡小孩尿救下劉大妮一條性命，心滿意足的大人們喝一聲彩，轟然而散。

到我讀小學時，幾乎天天與劉大妮見面。我的身份是小學生，她的身份是專職打掃學校廁所的地主婆。當年農村人沒錢買衛生紙擦屁股，印著紅頭文件和偉大領袖頭像的報紙就是

他們最好的手紙。有一個貧農出身却又有些痴呆的紅衛兵學生，因擦屁股不知把領袖像折進去，領袖臉上被抹上屎。老師和同學們當即把他從廁所里拉出批鬥游街。

對於我們這些學生娃來說，從作業本裏撕扯下來的廢紙就是最好的手紙。遇到沒有作業本的時候，就只好從廁所牆壁上取下土塊和石塊蹭上幾下，或者沿著廁所牆壁的棱角從上到下蹭下去，這樣就無形中增加了劉大妮的工作量。每天上午，我都能在男廁所裏看到劉大妮一絲不苟地打掃衛生的身影。我當時已經懂得男女有別、授受不親、大防大逆之類的聖人古訓，非常奇怪劉大妮何以面對我們拉屎撒尿而無動于衷？而我們自己又何以能夠在她面前拉屎撒尿而無所顧忌？

對於當年的我來說，答案自然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對劉大妮一臉聖潔的痴迷和敬仰。比起把我連同六個同胞兄妹當猪崽子喝斥喂養的親生母親來，我總覺得劉大妮更加親切也更加聖潔一些，以至于幾天見不到她，心裏就會隱隱地產生一種失落感。直到近年讀到楊絳先生的自傳，我才恍然大悟：劉大妮正是一位與楊絳先生相仿佛的“靈動皎潔、清光照人”的偉大女性，一位在強制异化的殘酷和荒誕中，始終葆有意志的堅定和人性的輝煌的女神般的人物。楊絳先生所說出的，也許就是劉大妮想說而沒有說出或說不出來的心裏話：“可是我雖然每天胸前挂著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眾憤怒而嚴厲的呵罵聲中，認真相信自己是虧負了人民、虧負了黨，但我覺得，即使那是事實，我還是問心無愧，因為——什麼理由就不必細訴了，我也懶得表白，反正‘我自巍然不動’。”“我心想，你們能逼我‘游街’却并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說：‘我雖然游街出醜，我仍然是個有體面的人！’”“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我還依然是故我。”

16 歲離家後，我再沒見過劉大妮，對於劉大妮的那份美好記憶却一直伴隨著我四處漂泊。她最後結局如何，我既無從知道，也不願深究。至少在我個人心目中，地主婆劉大妮是一位美好的受難女神。殘存在沒有人性的變態社會和邪惡年代裏的人性火花，才是人類文明薪火流傳的真正火種。

補白：小溪河公社社員張新蘭，1959 年春因生活困難，全家外流滁縣 2 個月，同年 8 月又帶領兩個小孩外流到娘家。1960 年 3 月回家，丈夫死了，一個婦女帶 4 個孩子生活(最小的 5 歲)。1960 年夏季，當地口糧標準名義上規定 1 斤，因包產不落實，實際僅半斤。秋收結束即斷糧，早秋作物搞一點吃一點，食堂經常停夥。她家因小孩多，吃不飽，不斷偷青，自己交代小孩偷大麥約 100 斤，本人藏小麥 150 斤，還偷小秫秫（高粱）、玉米、穀子等。所偷的糧食大部分被幹部查出。為偷青，張曾被鬥兩次。第一次在會上承認了錯誤，表示不偷，可是第二天就餓了一天，又得去偷。第二次在會上挨鬥時，張新蘭說：“不偷沒辦法，小孩餓得哭。偷了你們看見就拿去，看不見我就吃，今後我還要偷。”最後，張新蘭被逮捕，判了 3 年徒刑。家中丟下 4 個孩子無依無靠，全靠左鄰右舍幫助。

北京馬先生來信：那天你送的刊物，回來後就翻閱，却是一氣讀完，然後是一晚上沒睡好。這個“文化大革命”，怎麼就讓人狂熱到親情不認，人性全失的地步？這決非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一場浩劫。其根源想想恐怕是中西結合的一個怪胎。單是中國文化，怕是結不出這個；單是西方文化也難得到這個果。法國大革命、德國法西斯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間，是不是有著什麼共通的基因？

農村文革起初的批鬥對象是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最常用的鬥爭方式是捆綁、吊打、罰跪。早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一些公社與大隊、生產隊幹部就用這些手段整治社員，農民對這一套熟悉得很。

捆人者抬起腳，從背後照被捆者的腿彎上狠踹一腿，被捆者當即被踹得跪倒在地。捆人者兩人用一根麻繩，從他的頸後勒過，再從其手臂下繞過來，在胳膊上迅速纏繞幾圈，然後將繩頭交叉一系，用膝蓋頂著被困者脊背，猛力系緊繩索，被捆者的雙臂便被緊捆在背後。繩子繞得低于其肘部，且系得較松，被捆者尚能忍受，若繩子繞得高，再勒得緊，使其雙臂幾乎并攏在後背，被捆者就會痛得慘叫倒下。他一倒下，捆人者便狠踢他幾腳，說他裝佯，喝令他起來，或是抓著繩子將其提起。他一提繩子，被捆者又是一聲慘叫。被這樣捆過的人，鬆綁後胳膊要痛上好多天，連端飯碗都困難。（這種捆綁方式應屬中國人的獨家發明，文明國家裏似乎沒有一一編者）

???批鬥時通常要罰跪。跪在地上還好，遇上心腸歹毒的造反派，還要在地上撒些碎碗碴，令其跪在上面。有時，跪者的背後站著兩個漢子，用手揪著他的頭髮，令其把頭抬起，或是一隻腳站在他的小腿上，用力踩踏，使其如受古代一種名為夾棍的酷刑。

有時是吊著鬥。農村房屋，人字形屋架下有一道橫梁，此時這道橫梁便成為吊打人的設施。被批鬥者手腕被捆，繩子從橫梁上甩過來，由兩個漢子抓著，用力一拉，被批鬥者便雙腳懸空。有時是用細麻繩扎緊被批鬥者的兩個大拇指，吊于橫梁上，被吊者痛不欲生。還有一種吊法，稱之為坐飛機。人們通常認為坐飛機是把被批鬥者的兩臂用力向後抬起，令其低下頭去，呈飛機狀。季羨林先生的回憶錄中說，為了在挨批鬥時適應坐飛機的姿勢，且增強耐力，他曾在陽臺上練習坐飛機，其姿勢就是這樣。鄉村的坐飛機更形象：用兩根繩把被批鬥者雙手分別捆起，再用一根繩將其雙腳捆上。捆手的繩甩過屋架下的橫梁，捆腳的繩從另一根屋頂橫木上穿過來；行刑者喊著號子，抓捆手繩的兩個人向兩個方向斜拉，抓捆腳繩的人向下直拉，被批鬥的人便兩臂展開，雙腳後翹，吊在半空，像一架正在飛行的飛機。

罰跪、吊起之外，還有毆打、侮辱，或拳打腳踢，或棍擊棒搗，或用鞋底扇耳光，或用繩子抽打，或往臉上吐唾沫濃痰……總之怎麼殘酷狠毒都不過分，打死人不償命。有的人別出心裁，將盛著屎尿的小桶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令其聞臭，光聞臭還不行，又往桶裏扔石頭，濺得他滿臉屎尿。

四類分子批鬥過了開始批鬥幹部。除了捆吊、罰跪、打罵，又增加了挂牌子、戴高帽游街游鄉等鬥爭手段。古代死刑犯被押赴刑場時，背後插著一個牌子，上書罪犯姓名，并打一紅叉。這一方法也被學用，不過，是直接將牌子的木柄插在衣領裏。有的人脊背被木柄插爛，後腦勺頭皮被木牌磨破，睡覺時只能側著身。有的人用幾十斤重的鐵板，系上一根細鐵絲，掛在被批鬥者的脖子上。細鐵絲直勒進肉裏，痛如刀割。沉重的鐵板，墜得直不起腰，不用按頭也得“低頭認罪”。還有的人令被批鬥者扛一根百餘斤重的大爐條，稍一晃動就要挨打。????四類分子、社隊幹部被鬥過了，運動正值高潮，于是革命造反派便另找批鬥對象，擴大戰果。于是一些發過幾句牢騷，說過一句錯話，幹過一件錯事，或平時有對頭的貧下中農，也遭殃了。????

一個時期，生產隊幾乎天天晚上開大會鬥人。會場設在街邊，靠牆并排擺著兩張八仙桌，算是主席臺。桌上放著兩盞檯燈。主席臺後面坐著運動積極分子或造反派頭目。社員呈半月形在主席臺前或站或坐。主持人宣布批鬥會開始，被批鬥的人便被押了上來。

社員蘆某，30 來歲，平時愛胡扯。有一次在地裏幹活，他與一個婦女開玩笑說：“我跟你講講話，心裏都快活。要是能摸你一把，心裏就像夏天吃了涼西瓜。”于是被拉到會場批鬥，罪狀是“一學《毛選》就打瞌睡，見到女人就來精神，大白天耍流氓，調戲侮辱婦女”。又有人說他侮辱貧下中農，因為那婦女是貧農成分。其實生產隊幹農活時，男女在一起胡扯嬉鬧，婦女幾人聯手把男人的褲子扒掉乃是尋常事。蘆某不過是開開玩笑，當然不服，辯解

道：“說我一學《毛選》就打瞌睡，這我承認，我聽不懂嘛。說我侮辱貧下中農，沒有道理，我家也是貧農成分！”批鬥者便斥他狡辯，說他是“貧下中農隊伍裏的敗類”。蘆某臉上有麻子，批鬥者又叫他“撒泡尿照照鏡子”，說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後來造反派又畫了一些漫畫，貼在街邊牆上。漫畫上畫一人捧著毛著，做朗讀狀，蘆某則垂著頭打呼嚕，又畫他見了女人口水直淌，搞得蘆某沒臉見人。

????社員陳某子女多，生活困難，一個兒子又有慢性病，為生機所迫，販賣了幾趟雞鴨，掙了點錢，給兒子治病，于是被拉到會上批鬥，罪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投機倒把。陳某申辯說，他賣雞鴨不容易，天不亮就起身，半夜才能到家，一天要跑幾十里地，還要像做賊似的，偷偷摸摸，以防被人沒收。批鬥者說：“得了便宜還賣乖，要是人人都像你這樣，隊裏誰來搞生產？”陳某說：“我工分也沒少掙，不信你們看看我的工分本。”批鬥者又說他搞投機倒把玩命，幹隊裏的活磨洋工。革委會成立後，陳某被戴上投機倒把分子的帽子，管制勞動。

????農村的造反派成員有的是好吃懶做的二流子（此類人被稱之為“高級社員”）。這些人多是幹將、打手。有的是想借此出風頭，鬧個幹部當當。有的是運動以前挨過幹部的整，運動一來借機報復。有的與他人有矛盾，吃過別人的虧，借機泄私憤。有的是宗族之間互鬥多年，早有仇恨，借運動之機以報宿仇。總之，大多是懷著個人目的去整別人。有的人勢大，整了別人，沒人敢吡吡牙縫；有的人則剛整過別人，轉眼之間又被人整。

## 新加坡僑生洪氏兄弟 佚 名

1970年2月27日，槍聲響起，一個年輕的生命倒在廈門海灘上。他就是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廈門市革命委員會人保組判處死刑的新加坡歸國僑生洪滄海，死時21周歲。

洪滄海祖籍同安，生于新加坡，小學就讀于新加坡福建會館主辦的崇福小學，中學就讀于新加坡中正中學，是個生性活躍、追求進步的左派學生。祖父為了孫兒生命安全，便帶著他和哥哥洪滄江倆告別父母，離開新加坡，于1967年3月回到祖國，定居廈門。

回國後，哥兒倆雙雙進入集美中學，適逢停課鬧革命，無書可讀。洪滄海大失所望，加上根本不知國內政治鬥爭的深淺，由直抒己見批評文革，書寫日記直指偉大領袖獨裁，發展到書寫張貼反標，在觀看樣板戲的戲票上寫“表演得越出色，暴露得越徹底，江青有女皇夢”，對劉鄧的遭遇表示同情。

1968年11月，洪滄海因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忠孝裏的家被抄。祖孫三人同日被抓，并株連房東夫婦一家被抓。兄弟倆進了電臺山“鴿子龕”拘留所。二個多月後，兩人一道被押送回集美中學，參加現行反革命分子洪滄海的批鬥大會。這是兄弟倆的生離死別。最後一面，却因不准交談，沒說一個字。隨後洪滄海被押往全市各個學校，輪流批鬥，全體學生必須參加。

1970年開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打擊現行反革命活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進入高潮，洪滄海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同批共十二人。廈門工人文化宮廣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全副武裝士兵押送，五花大綁，挂牌，姓名打上血紅叉。處決後棄尸海灘。已上山下鄉的哥哥洪滄江要求回廈收尸安葬，被拒絕。祖父一聽，暈死過去。姑婆（祖父的妹妹）從馬巷來廈門要求收尸，遭到呵斥。後尸體被醫院拉走，作人體解剖材料，直到無法使用後，運往殯葬處火化。三年後，作為無人認領骨灰被處置。

洪滄海死後數年，在新加坡的舅父從當地報紙的一則《昔日親共分子，終成共黨刀下鬼》的新聞中，才得知外甥洪滄海的死訊。十年後，洪案得到平反。1980年6月6日廈門市中

級人民法院的判決書稱：“洪滄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對林彪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不滿，在書寫張貼散發的標語中為劉少奇同志遭誣陷鳴不平，斥責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是正確的。但也寫了錯誤的言辭，這屬於思想認識問題。原判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這是林彪四人幫顛倒敵我關係所致，確屬冤殺。”

所謂“但也寫了錯誤的言辭”，是指洪滄海不但“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甚至“矛頭直指”親手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領袖。

洪滄海被逮捕後，洪滄江在集美中學牛棚繼續關押審查，直到 1969 年 8 月獲釋。此時他身無分文，在學校人保組監督下，向二位親朋好友借了 21 元錢。這張借條洪滄江四十年來一直珍藏著。1969 年上山下鄉，每個下鄉青年都可以領到棉襖、蚊帳、解放鞋、手電之類的東西，居委會的治保主任却對洪滄江說，他是被強制下鄉的，他弟弟是現行反革命，不能領取這些東西。沒人為他置辦任何行裝，沒人送別，洪滄江一無所有，一個人下到離公社三十幾裏的偏遠山村。

1970 年 2 月 28 日到公社趕集的洪滄江，在墟場發現了弟弟被廈門市革委會人保組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的公告，當即來到公社要求請假回廈收尸，被一口回絕，理由是需要大隊同意請假的證明。他趕回大隊，得到的答復是接公社人保組的通知，不能請假外出，必須參加大隊的地富反壞右學習班，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他對外的一切書信包括和遠在海外的父母的通信全部中斷。下鄉前市人保組曾警告他，不準將弟弟的情況告訴海外的親友。否則一經查出，按裏通外國論處。

1977 年恢復高考。洪滄江參加高考，上了分數綫，尤其是英語，更是出類拔萃，但因弟弟的關係，與上學無緣。1978 年，下鄉十個年頭已經成家生子的洪滄江又一次參加了高考，成績仍是不錯。自己從小就會英語，充滿自信，報考了安徽外語學院和福建師大的英語系。高招辦的工作人員找他談話：因弟弟的原故，他無法就讀涉外專業，希望他能改一下專業。這是他最後一次的機會了。洪滄江不得不改專業，得以就讀廈門大學大專班讀財政專業。班上一個全程看了洪滄海公審處決的同學告訴洪滄海，弟弟在最後時刻拒絕下跪，共挨了五槍。

1980 年 6 月 6 日，正在上課的洪滄江被叫到學校辦公室，和兩個穿藍制服的人（一個是省高院的，一個是市中院的）見面，宣布洪滄海平反，並將一份廈門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交給他簽收。洪滄江鬱積了十年的泪掉下來了——人頭都落地了，還能死而復生嗎？

同時洪滄江被告知，作為受害者家屬，如有什麼需要和困難，可向法院提出。法院將在力所能及的權限範圍內，儘量協調有關部門予以解決。洪滄江提了三點：洪滄海被處決時，家屬要求收埋遺骸，被有關部門拒絕，以致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因而要求有關部門找出受害者的遺骸以帶回他的出生地入土為安；洪滄江受株連後被迫在農村結婚成家，要求家屬的戶口從農村遷到廈門市區；發還抄家時被抄走的物品，給予受害者家屬適當的經濟賠償。

三點要求的第二項得到了落實。有關洪滄海的遺骸，有關部門進行了追查，查到了江西。遺體被某醫院作為教學材料解剖使用後，運往火化，最後作為無人認領尸骨處置掉了，沒有下落。至于經濟賠償，法院的答復是當時國家經濟條件無法承擔賠償問題，但法院可以給予人民幣 500 元的困難補助。洪滄江拒絕了。抄家時抄走的私人物品，包括兄弟倆各自從新加坡帶回來的自行車、照相機、收音機等等，已被全部折價賣出，無法查明購買人和去向，無法歸還。個人儲蓄存款已上繳國庫，法院同意申請無息歸還家屬。

1976 年，母親通過一位從新加坡回鄉探親的親戚，聯繫上了洪滄江，才得知洪滄海已被槍決的死訊。在出事後八年時間裏，洪滄江和新加坡的父母完全失去了聯繫，寄出的信沒有一封能收到。在此之前，洪滄江的舅舅從新加坡執政黨的刊物上得知洪滄海的不幸遭遇，



却因耽心他們父母無法接受而始終絕口不提。

洪滄海于 1980 年平反，兩年後祖父去世。1981 年，洪滄江大專畢業，分配到廈門鍛壓機床廠財務部門任職。1984 年，洪滄海的父母從新加坡回國探親。1967 年一同回國的祖孫三人，只剩下洪滄江一人。與闊別多年的父母相見，三人相擁而泣。

附記：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和全校數千名學生一道，席地坐在一中大操場上，批鬥一名五花大綁的二十歲現行反革命僑生洪滄海。十六歲的少年參加批鬥大會，看得心驚膽戰。當時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四十年後會為這名因言論被處死的僑生寫紀念文章。

補白：我考上大學的時候，爺爺很高興。若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怎麼都輪不到我上大學。父親只有小學畢業，連初中都不讓上。有一次寫作文“我的理想”，父親只能寫“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農民”，因為工人、解放軍等行當，那是想都沒資格想的。父親娶母親的時候，是拿著蓋有中農成分證明章的工作合同書給母親看的，等于是連騙帶哄娶回的。母親娘家距離我們老家不近，不易打聽。後來看父親人不錯，也就嫁給他了。曾祖母臨死時告訴孫子（我的父親和叔叔）：“如果能看到你們兩個的媳婦，我死也瞑目了。”那時成分高的人家娶媳婦是個難題。給四類分子摘帽的消息，父親是在縣城聽說的，連夜騎自行車趕回老家，告訴爺爺奶奶成分不管用了。初聽之下，爺爺奶奶根本不敢相信，得到確認以後，全家人哭了一夜。

烟臺山

按出身殺人 姚治邦

有一天我們長江工大宿舍區貼出一幅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橫批是“鬼見愁”，藉以辱罵我校招收了許多出身不好的學生。盛平章同學膽子比較大，寫了“妖風大有我們除，王八多靠我們抓”，橫批是“你們放心”，作為回敬。那時辯論會發言要先報出自己的出身，去醫院看病要先填寫家庭出身，到旅館住宿也要登記自己是什麼出身，真是出身壓死人。

朱增同學文革之初先後碰到兩件倒黴事。一件是她串聯到湖南大學，紅衛兵要她說出自己的家庭出身，生性老實的朱增只能如實相告，後來被紅衛兵押回武漢。另一件是有一次吃中飯，她把一塊肥肉吐在地上，被一個來校串聯的紅衛兵發現。該紅衛兵逼著朱增把地上的肉撿起來吃下去，搞得她非常狼狽。後來食堂一位女師傅出來圓場說：“地上撿起來的肉，不衛生，我來把它洗一下，等下一頓熱一下，再由朱增同學吃掉。”

1966 年 8 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幹警：“好人打壞人活該”，“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這意味著，公安部門不會追究紅衛兵造反派打死黑五類分子這樣的事。

當時傳來一個更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們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後，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黑五類分子進行集體殺戮，宣布黑五類家庭成員要殺光斬絕，一個不留。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凶惡的殺人魔王，親自用鋤刀鋤殺了十六人，被他鋤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快被塞滿了，他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葦塘裏，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將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擴大到二十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特分子、刑滿釋放人員、解除勞動教養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屬。該規定要求，這些人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許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湖南省道縣縣委書記熊丙恩，以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下中農協會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宣稱：“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道縣各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殺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集體進行大殺戮。道縣的縣城和農村到處張貼著“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從1967年8月中旬開始，歷時兩個月，全縣採用槍殺、棍打、刀殺、炸死、活埋、沉水、丟岩洞、繩勒、火燒、摔死等多種殘酷手段，活活殺死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4千多人，被迫自殺的300多人，涉及全縣36個公社、2700多戶。

聳人聽聞的濫殺無辜也遍在道縣所在零陵地區蔓延，全區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寧遠縣共殺掉黑五類分子一千多人，人數在全地區排名第二位。寧遠縣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要求將黑五類分子殺光殺絕，不留隱患，斬草除根。於是，幹部們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來，統統推入地窖活埋，成為零陵地區大隊一級的殺人冠軍。零陵地區其餘各縣市也殺了幾千人，被殺者的年齡，最大的有七十多歲，最小的僅十天，其中被殺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體殺害黑五類和無辜平民的腥風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華縣殺害了近九百人，江永縣先後殺了三百多人，雙牌縣殺害了三百多人，祁陽縣殺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幾天內殺掉一百六十餘人，南山縣殺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縣有十八個公社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四十天內先後殺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這股集體殺人風，很快就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在十月初召集的會議上煽動說：“湖南道縣的黑五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黑五類分子，我縣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黑五類的子女一個也不留下，否則是個禍根。”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帶著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來，押往黃瓜冲山上的萬丈無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這場喪心病狂的行動，集體殺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廣西靈山縣竟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占二千多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多戶。看到這些信息和數字，任何一個善良的人，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其濫殺無辜的瘋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見，超過了當年的希特勒。

反革命輪奸犯 朱之泓

1967年冬天的一天，十幾個北京知青乘坐一輛大卡車前往同心縣（寧夏）。在坑坑窪窪

的河溝中顛簸行進時，遇見一個鄉下老頭帶著女兒徒步趕路。這對父女攔住這輛車，要他們捎帶一段路。本來這夥北京知青不願帶他們，但經不住父女倆人的纏磨，便讓他們上了車。走到馬家灣時，汽車因故障停了下來。有個知青便惡作劇地對那位姑娘開起了玩笑，大意是要她跟他走，給他當老婆之類。同車的其他知青也跟著瞎起哄，當時那姑娘被嚇哭。

回到連隊後，這夥青年又利用這次不同尋常的路遇各自吹牛，互相取笑，事情便因此傳了出去。誰知，過些日子，有人揭發說這十幾個北京知青輪奸了那姑娘，于是很快就成立了專案組。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裏，這個案子反反覆複調查了多次，知青和姑娘都不承認發生輪奸的事。專案組對知青進行刑訊逼供，並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最後認定輪奸案證據確鑿，5個“主犯”中的4個被判處死刑。最先招供的那名“主犯”被判了死緩，其餘4個被處死的主犯都出身不好。“被輪奸”的女方是貧農出身，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黑五類出身的男子強奸了紅五類出身的女子，那就是“階級報復”。

記得這四個人被驗明正身押赴刑場時，大街上到處貼著被紅墨水勾了姓名的布告。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站在布告前都義憤填膺，人人皆曰這種無耻的“反革命輪奸犯”確實該殺。有人還罵罵咧咧地說：“這都是些什麼知識青年啊？北京怎麼淨打發這種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社會垃圾來支援我們西北？”

當時我也挺納悶，來寧知青中怎麼這麼多黑五類子女？數年後我才知道，他們當年正因爲出身不好才在升學中落榜，落榜後報名參加邊疆建設兵團自然是他們走向革命道路的最好途徑了。

一段時間後，這一反革命輪奸案却被平反了。原來那所謂的輪奸純粹是舉報人的推想或者杜撰。當時在“砸爛公、檢、法”的口號聲中，公安機構都癱瘓了，辦此案的人員大多是從各單位抽調來的外行。這一冤案最終能平反，主要是因爲涉案的幾個事主都是北京知青，他們的家長借住在黨中央所在地的便利條件，堅持不懈地申訴和上告，才促成了對案件的復查和平反。

我所在的生產隊有一個姓張的人，在林建三師一團工作。我曾就此案與張某詳談，當時他說：“那幾個輪奸犯很頑固，在專案組強大的攻勢下，終於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承認後又反復翻供。那個受害的女方剛開始有思想顧慮，不敢接受自己曾被輪奸的定案，後來組織上再三給她做‘思想工作’才認可這個結論。”另一個曾在林建三師工作過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對這幾個犯人還上了肩背銬，並加了楔子。有一個人熬不過去了，下了軟蛋（屈打成招），使得案子有了突破。

平反時，首犯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案發時正懷孕在身）都來到了固原，住在當時的固原第一旅社。該旅社一個姓馬的女服務員告訴我，王金洪的母親和妻子也算堅強，平時出來進去都滿臉冷靜不聲不響。有一天，她娘倆照樣平靜地走進房間，關上門後却從房間裏爆發出一陣痛徹心扉的嚎啕哭聲，那哭聲讓前臺上的服務員們聽得清清楚楚。唉！看樣子是在交涉王金洪平反問題時受了什麼刺激。我問小馬：“你怎麼不進去勸慰一下？”小馬邊說邊搖頭：“唉，可憐！可憐呀……我想進去勸解，又覺得不合適。”

嗚呼，四個來建設邊疆的北京知青啊！無論他們出身多麼不好，可都是活生生的人啊！以後每當在楊郎走夜路時，我都會想起那幾個飲彈而亡的年輕生命，我在心裏呼喊著：“你們的陰魂此時還在大西北的曠野中游蕩嗎？”

我們家一門三右派（父親和兩個哥哥），我必須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1963 年 10 月，我偷走戶口本，瞞著母親，報名去北大荒屯墾戍邊。北京市王昆侖副市長親自到北京站為我們送行。在北大荒八五二農場場部，近 200 名知識青年分為 6 個小隊，組成為期半年的學習班。我被委任為第三小隊隊長。

在歡迎晚宴上，我們被招待一頓牛肉餡餃子。不料，當夜，全體知青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中毒症狀。起初誤認為是階級敵人搞破壞，折騰一陣，未見任何證據，最終真相大白，原來包餃子的麵粉有問題。第一次吃有赤穗病的小麥磨成的麵粉，往往出現頭暈、噁心甚至嘔吐的症狀。經常食用者，症狀逐漸轉輕。赤穗病麵食，當地的貓狗都不吃！然而，為了保質保量完成上交國庫的任務指標，好的麥子都上交了。

我們吃這些貓狗不食的麵粉，算不算是一種無私奉獻呢？這樣的疑惑只在腦中盤旋了幾分鐘，我便認定，此時正是身體力行獻身主義的大好時機！生命都可奉獻，何惜頭暈嘔心！這是我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的首次思想實踐。在接下來近兩年小麥赤穗病大爆發的時間裏，在生產隊大食堂，玉米麵或大碴子竟成了病號飯中的首選。我每天吃著赤穗病麵食，扛不住了就用剩餘的工資買月餅，却從來沒有裝病冒領過病號飯。

白雪皚皚，天寒地凍，冰封不住知青的激情。整天除了政治學習、改造思想，就是戰天鬥地、忘我勞動。奮勇向前、激情澎湃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和《勘探隊員之歌》，構成我們知青學習班的主旋律。

1963 年 12 月，學習班全體知青去距總場 50 公里的五分場參加勞動。一望無垠的積雪深可沒膝，康拜因連秆收割的玉米，每隔三四十米就是一堆，遠遠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濤。我們每三四個人一組，圍著茅屋般大小的玉米堆，徒手從積雪中扒出玉米秆，然後掰下玉米穗，堆成一堆，等拖拉機拉著雪耙犁過來再裝車，玉米秆則邊掰邊燒。

嚴冬的北大荒，氣溫往往在零下二三十度。如果刮“烟炮”，則狂風四起，雪霧彌天。而且一刮就是三天，當地俗稱“風三”。我們這些從北京初來乍到的知識青年，根本缺乏起碼的禦寒知識和準備。在短短六七天的奮戰中，加之趕上“風三”，近 200 名男女知青大部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凍傷，可是沒有一個缺勤溜號。第六小隊的馬大力，身高一米八，大眼睛，皮膚白晰（父親是傳作義手下兵工廠廠長兼總工程師，國民黨少將軍銜），右腳雖嚴重凍傷，却發揚戰爭年代“輕傷不下火綫”的精神，站不住了就跪著，一直堅持到最後。回總場當天，他便住進醫院，被確診為二級凍傷！

來年開春，我與另外 3 名知青被分配到離總場 30 公里的一分場六隊。住的是昏暗的草頂土坯房，點的是冒黑烟的柴油燈。早晨起來，鼻腔、口腔裏都是黑的。六隊有百餘戶人家，近 2 萬畝耕地，還有待開墾的一望無邊的荒草地。東邊是逶迤的完達山，南邊有一條蜿蜒的溪流，西邊北邊是鋪向天際的黑土地。

來到這裏後的第一個休息日，一位老職工（山東貧農）殺豬賣肉，我們 4 個知青為改善生活，湊錢買了 4 斤豬肉。回宿舍細看，好豬肉裏竟夾裹著半斤多帶皮的囊腫。這種看來司空見慣、無足輕重的小事，當時竟對我造成極大的震動。從學校到媒體再到學習班，所宣傳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全是純樸真誠、是非分明、立場堅定、道德高尚的模範，我們知識青年要向他們學習，接受他們的再教育，可是眼前的這一幕却讓我錯愕。那時的我，是愚昧、無知、單純而又篤信神祇（毛神）的信徒！被洗腦、被矇騙、被愚弄的，又何止我一人……

我身強力壯，又表現優異，很快被調到機務排。一次開荒時，我的左腳被五鐮犁路輪半軸的鴨鐵壓傷。腳面被壓開，掉了一個小腳指頭。由於感染奇形壞疽，險些截肢。分場領導建議我可因傷殘離場回京。我沒有考慮，認為是小題大做。蘇聯小說《無腳飛將軍》裏的無腳飛行員阿曆克賽的剛毅形象激勵著我。未等傷愈，我便冒著嚴寒，自告奮勇到排水工地挖溝開渠。疼痛、勞累和寒冷磨礪著我的意志，保爾克察金冰雪泥濘中築路的形象是我心中的榜樣。

工地上絕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窖子裏。平地下挖兩米左右，兩面用樹枝、茅草、席子搭成地鋪，中間留一米多寬的過道，安上燒柴取暖的火牆，再用長園木、樹枝茅草搭成人字形封頂，就建成了一個地窖子。每天天不亮，我們就頭頂寒星出工，傍晚才收工。地窖子裏只有幾盞煤油燈。在被窩裏，就著昏暗的燈光，我竟能天天堅持看《毛澤東選集》，寫日記！

年終，我被評為五好職工，并被選為團支部宣傳委員。

在指導員馬吉海的支持下，我為團員和有興趣的老職工宣講哲學基本常識，深入淺出地介紹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在一次團小組會上，我照本宣科地宣講時事政治。談到三面紅旗大躍進時，河南“盲流”來場的孫立國却頗有微詞。我第一次從孫口中聽到“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人吃人，真不止是石破天驚。我還第一次聽到了畝產萬斤的放衛星鬧劇後面的悲慘和血腥，和“反瞞產私藏糧食”運動中對已處於饑餓狀態的農民進行的搶奪和殘害。起初我有些將信將疑，甚至認為孫立國是農民意識，思想偏激落後。此後在勞動閒暇，我又親耳聽到另一個河南“盲流”的兒子狗剩兒講道，他的哥哥吃野菜中毒浮腫而死，妹妹挖野菜時倒斃，母親浮腫不治而死，全村十室九空！

狗剩兒跟著父親，晝伏夜行，逃出了公社民兵的堵截。夜裏偷得縣種馬場的 10 多斤馬料，連吃帶賣，終於得以活著跑到北大荒！孫立國和狗剩兒都是三代貧農。在我眼裏，他們都是老實人，無論如何應該不會故意製造這種只有“階級敵人”才可能製造的謠言。我確信他們講述的都是真實的。但我仍認為，他們說的只是個案，不具有普遍性。在新聞封鎖、輿論蒙騙和暴力鎮壓下，那時的我可能知道全國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其實我自己也親身經歷了京城的大躍進，餓過兩年多肚皮。那時，我們北京分司廳中學在勞動生產基地有半畝實驗田，學校黨委召開“放衛星”大會，誓言要種出畝產 20 萬斤的小麥。我清清楚楚記得，半畝地真的掘地 3 尺，而且是 3 公尺！然後墊一層土鋪一層糞肥，再墊一層土鋪一層肥，最後密播小麥種。因撒種太多，來年小麥密密麻麻全長成了“草”。除了地邊，幾乎顆粒無收！

1958 年的全民大煉鋼鐵，我校領導號召全體師生捐鐵捐柴。我把家中木箱上的銅合頁拆下上交，險遭母親暴打。上千師生上交的廢銅爛鐵和木柴堆在操場，然後放在土爐灶中進行冶煉。我負責拉風箱。操場上火光沖天，煙霧繚繞，喧聲四起，好不熱鬧。大幹夜戰兩天一夜，燒成幾塊合金鐵疙瘩。然後系上紅綢，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簇擁著送到教育局，為年產 1070 萬噸鋼“添磚加瓦”！

聽了孫立國和狗剩兒令人驚厥的“海外奇談”，再結合自身在大躍進時期的親身經歷，我開始獨立思索，並得出一個結論：毛主席黨中央也會犯錯誤。但是對毛主席的英明偉大，我仍然深信不疑。我認為那些錯誤、失誤，大多是由于在執行過程中出了偏差，是前進中的失誤，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何況還遇到亘古未有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我仍然認真學習《毛澤東選集》，《毛選》四卷反復看過多遍，讀書筆記寫了好幾本。毛主席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現在水落石出了。不僅不存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據已解密的蘇聯和中國檔案資料，也壓根兒不存在“蘇聯逼債”問題。實際情況是，赫魯曉夫得知中國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慘劇後，馬上召開蘇聯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 50 萬噸食糖、300 萬噸糧食。同時急令蘇聯駐華大使與周恩來溝通，協商援助事宜。周向毛彙報，却遭毛一口回絕，說哪怕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魯曉夫的一粒糧食，我們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還務必要趕著把欠蘇聯的債還清。毛澤東甚至對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算不了什麼。讓婦女敞開生孩子，餓死幾千萬人，過幾年又能補回來。不能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補白：1969 年初夏的一天，一輛囚車停在了某勞改農場。從囚車陸續走下來的囚犯中，

突然出現一個電影《江姐》中小蘿蔔頭似的囚犯。此犯年僅 12 歲，因犯反革命罪被判 15 年重刑。小蘿蔔頭低著頭，用怯怯的目光偷偷地看著與他同齡的幾個農場幹部的孩子，孩子們則沖他叫“小勞改，小勞改”。小勞改的到來，讓管理幹警傷透了腦筋。第一個晚上就尿床，把下鋪的人淋得叫苦不迭，還引發牢房裏半夜吵鬧。幹部們誤以為哄監鬧事，荷槍實彈地沖進來。小蘿蔔頭平時小錯不斷，還常被大犯人利用幹壞事。打嘛，下不了手；罵嘛，見他哭鼻子也罵不出口，真拿他沒辦法。這個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的小蘿蔔頭叫陳 X。12 歲那年，小學四年級，學校停課鬧革命。小學生們個個佩戴上紅袖章，成天喊“誓死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綫”，平時罰自己做作業、向家長告狀的老師一個個被他們揪了出來，挂上黑幫分子大牌子批鬥。陳 X 在批鬥老師的革命行動中表現最積極，也最有創意。他把從老師家裏抄出的女老師的裙子套在男老師頭上，又把男老師的褲子圍綁在女老師的脖子上，牽著他們在校內“游街示衆”。開始他是跟著大同學“鬧革命”，後來他感到不過癮，拉幾個低年級同學自立門戶，叫“天不怕地不怕戰鬥隊”，自封隊長，每次活動都必喊“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陳 X 感到自己也是頭兒了，也可以享受萬歲待遇了，於是對手下說：“你們也要喊我萬歲。”然後帶頭振臂高呼“陳 X 萬歲！”這還不夠，他又在自己的作業本上寫滿“陳 X 萬歲”的字樣。恨透了這個“革命學生”的老師們把他的作業本交給了學校的支左工作組。陳因此坐了整 10 年大牢，出獄後開的士。

我的朋友顧複初 朱長超

我的朋友顧複初，上海市南匯縣橫沔鄉湯巷村人。他的父親有幾畝土地，還辦了一個碾米廠，屬於亦工亦農能幹的新式農民，但土改時被定為工商業地主。1957 年反右，亂抓階級鬥爭。1958 年 4 月，顧父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刑 7 年，根據是他夢想國民黨反攻大陸。入獄後，顧父不時有信寄到家裏，後來被押到安徽合肥磚瓦廠（勞改工廠）服刑。至 1960 年 2 月，顧父就再也沒有音信了，直到今天（90 年代。幾十年裏，也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給顧家一個解釋。顧複初曾親自到安徽尋找父親的下落。那裏早已沒有磚瓦廠的痕迹，也沒有尋到父親遺留下的任何信息。

顧複初從小喜歡機器，自學了許多技術。父親無緣無故被抓，20 歲的顧複初感到留在家裏很不安全，就跑到杭州浙江工程技術學校幫學生修理機器。顧勤奮肯幹，學校很需要人，便同意他把戶口遷到杭州，成為正式職工。顧複初回鄉遷戶口，文書叫他明天再來。次日再去，幾個穿警服的人立即把他銬住，關進看守所。

看守所裏正在大煉鋼鐵。有一次鼓風機停了，顧複初鼓搗幾下就又呼呼響了起來。在場的南匯縣政法部長宣林芳見這個小青年技術很高明，與他聊了很多。在看守所裏一晃一個月了。這一天，所長對他宣布解除逮捕。宣林芳也在，告訴顧：“你暫時就在看守所工作，晚上睡在縣委招待所，以免再有什麼麻煩。”又過 3 個月，宣林芳又讓顧到下沙機械廠工作，不讓他回家鄉工作。由於技術好，顧複初被介紹到多家機械廠當修理工，後來又被借調到南匯縣物資局工作了一二年。

1968 年，文革初期的大風潮消退了，顧複初回到了離開 10 年的家鄉。當時全國都在大辦化肥，顧複初冒出一個靈感襲。化肥生產多了，一定需要塑料袋。為了節約成本，一定會儘量使用舊塑料。舊塑料再生，變成塑料袋，需要加入增強劑，也需要擠塑機將其擠塑成型。現在別人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自己先研製擠塑機，將來一定很受歡迎。經過了一段時間鑽研琢磨，圖紙全畫好了，機器在他的腦子中成型了。只要有人需要，他就可以將機器造出來。

江蘇丹陽松菊工業公司的一個負責人轉輾聽說了顧的發明，於是請他幫忙。不久，松菊

工業公司造出了擠塑機，也開始生產塑料袋。這家小公司下邊原有個小塑料廠，10 來個工人。機器造出後，迅速增加到 100 多個工人，創造純利潤 100 多萬元。這在文革期間可是個很大的數字。松卜廠對顧充滿感激，給他 4000 元錢作為報酬。顧本人所在的橫沔機械廠却有人寫出大字報，稱他開設地下工廠（當時屬於嚴重犯法行為）。

湖南郴州地委辦的一家工廠，利用顧的圖紙也造出了機器，獲得豐厚利潤。寧波某廠也想生產這種機器，請顧幫忙。所謂幫忙，在今天看來其實就是使用其專利發明，可那時是不能拿報酬或工資的，拿了就是剝削，是犯法。作為變通，該廠願意為他們的一二個家屬到那裏工作（當時找工作非常困難），每月可拿二三十元錢的工資。顧身邊的好幾個技術工人都想讓自己老婆去工作（包括衛金祥和劉子奎）。由于名額限制，最後讓衛妻去了。為此，劉子奎心懷嫉恨，向公安局揭發說，顧造機器的圖紙是抄來的，幫別人設計製造擠出機是詐騙行為，顧所得的那 4000 元錢是詐騙所得。于是，衛金祥、顧復初和顧的妻子等人相繼被捕。最終，顧復初以技術詐騙罪判處 7 年徒刑，衛金祥 3 年，顧妻半年。

在牢裏，顧又成了技術革新能手。囚犯生產手錶，其中一道工序是手工送表殼，每人每天要送 1 萬多隻。一天下來，頭暈眼花，很容易發生工傷事故。顧想辦法設計製造了一條流水綫，讓機械手送，準確及時。獄方非常高興，將這項技術轉讓給了上海幾家手錶廠，為上海手錶工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憑藉這項技術發明，顧復初本可以申請提前釋放，可他拒絕這樣做。獄方問為什麼，顧說要申請提前釋放，就必須認罪，可他壓根就沒犯罪，何來認罪呢？這本就是一件錯案，他寧可坐足 7 年牢。

1983 年出獄前，獄方主動表示想為顧安排工作，留在監獄裏參加技術管理。顧斷然拒絕，稱中國有 960 萬平方公里大，自己能找到立足之地。出獄後，顧得知劉子奎患重病長期躺床，便去探望。劉已不大能說話，臨終前，他讓兒子拿來紙和筆，強支病體寫了幾個字：“很對不起你。”

隨後顧復初在湯巷一家社辦工廠就業，開始生產電纜，并漸漸在此行業闖出點兒名氣。1986 年，中國向陽號南極派考察船需要電纜，需要量不大，但技術要求較高，上海有家國營電纜廠感到不合算，推辭著不肯生產。顧聽說了，向有關方面表示願意接受這個任務。經過技術攻關，名不見經傳的湯巷廠居然造出合乎標準的電纜產品。湯巷廠的名氣響了起來，1987 年被列入上海市星火計劃，1992 年獲得了星火計劃二等獎。同年，顧復初被推選參加全國科技獎授獎大會。

當初顧本無罪，却被判 7 年，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不認為自己犯罪。所得酬謝是勞動所得，且對國家有益，為什麼算犯法？他付出了勞動，對方不付報酬，是不是也算犯罪？他如是責問法院。二是因父枉子。判決書上稱他是反革命子弟。

顧復初無辜蒙冤 7 年，至今沒有得到改正。文革前的中國有大量冤案，後文革的中國仍然有大量冤案。顧在服刑期間曾審訴過不下 40 次，都沒有任何結果。如今他已到古稀之年，回首往事，這件不平事仍然令他耿耿于懷隱隱作痛，希望有生之年得到一個實事求是的交待。顧當初做的一切，包括指控他的那些罪狀，今天看來都是功績。判決書上說顧是個反革命子弟，這對顧案的處理產生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顧父無故被抓、失蹤，本來就是當初錯誤政治的犧牲品，在父親受害的基礎上繼續加害其子，更是天理不容。歷史已經證明，顧復初是個優秀的發明家和企業家。他淡泊名利，拒絕當區政協委員的提議，同時用自己的發明和企業所得為當地辦起了幼兒園、敬老院。他是一個難得一見的好人。

我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華東政法學院法學專業畢業生，已退休，許多年前採訪過顧氏，總覺得顧案判案有誤，顧家父子的遭遇不公。為維護法律的尊嚴，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我鄭重建議有關方面復查顧案，還歷史一個真相，還顧氏一個清白。

- 一、謹請用電子郵件寄稿，以免編輯再次錄入。
-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 提 三、本刊聯絡手機：13240468075。
- 四、願資助《憶舊》半月刊的朋友，  
請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謝謝！
-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示 305 甲樓 110 號陳星宇收，郵編 100091。
-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工商銀行馬連窪支行，  
賬號 0200251101028450741，戶名陳星宇。

## 《黑五類憶舊》第七期 201011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莫忘造文獻 焦國標

因編本期《黑五類憶舊》，瀏覽到陳思和教授的《六十年文學話土改》一文。該文有句話引起我許多聯想。這句話是：“在 1949 年為起點的當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人為此（土改）寫出激動人心的文學作品。六十年的大陸當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產生過土改題材的杰作。”

我的聯想之一是，大陸六十年當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人為此寫出激動人心的文學作品”的“此”這個代詞，實在上不止可以代土改，也可以代這六十年裏的一切重大歷史題材。土改題材固無杰作，鎮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法輪功、拆遷、野蠻計生這些題材又如何呢？有杰作嗎？同樣沒有。

聯想之二是，不止是文學領域“沒有產生過土改題材的杰作”，史學領域有嗎？同樣沒有。中國每一所文科大學和綜合類大學都有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各省市區社科院裏都有歷史所，那裏的歷史學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多如海沙”，可是以土改為題材的歷史杰作又有幾部呢？不止以土改為題材的，以鎮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



法輪功大迫害、野蠻拆遷、野蠻計劃生育為題材的歷史學著作又如何呢？不也同樣影子也不見嗎？

聯想之三是，學者要研究文獻，更要製造文獻。中國是文獻大國，所謂學者就是在文獻裏找食兒的人。這是一個極大的誤區。學者不僅要在文獻裏找食兒，還應該，或者更應該，製造文獻食糧。你研究的文獻都是祖先造的，你也應該製造文獻，留給後人當礦藏，讓他們從中尋寶找食兒。

職是之故，大學裏的教授副教授們，研究所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們，不要單單吃文獻，也要花一些精力把身邊腳下的資料想辦法保存起來，供後來的同行享用。如今是碩導、博導滿街走，可是迄今我沒聽說哪個碩導、博導組織自己的研究生編纂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法輪功、拆遷、計劃生育等等當代最重大題材的文獻。

聯想之四是，當代中國學者分兩大類，一是書齋文獻學者，一是御用歌德學者。這兩類學者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眼睛都是朝上、朝虛，下層民衆不入其目。前者的人格理想是傳統的士大夫，後者的人格理想是政府官員。士大夫不考慮小民生活，他們考慮的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宮廷政治，都是大話語。胡適、魯迅、陳獨秀不談四書五經宮廷政治了，換成談民主談自由談國民性談朋友談文壇對頭談軍閥政客了，仍然一如舊士大夫，作品裏幾乎不見下層人的災難。

因而我建議碩導、博導們組織自己的研究生，搞搞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六四、法輪功、大拆遷、計劃生育等當代重大題材的文獻編纂工作。網上就有很多零散的資料，讓學生分門別類做做收集整理編輯的工作，豐富一下文獻寶庫，也是挺有意義的研究項目。

## 目 錄

土改慘禍·····	呂政天 (04)
粵中土改雜記·····	牧 惠 (13)
爸爸的出身障礙·····	鴨 山 (16)
我家七口親人是這樣被餓死的·····	李發剛 (18)
我在恐懼中長大·····	陳破空 (22)
畢業報到的冷遇·····	黎學智 (25)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廖亦武 (28)
劉文彩水牢真相·····	馬成廣 (34)
康生縱容亂打亂殺·····	佚 名 (36)
道縣殺人一例·····	賈 月 (39)
摘帽前後·····	同 年 (41)
一定把官當到廳級·····	劉加民 (44)
花橋鄉的土改記憶·····	蘇 人 (45)
臺灣的土改·····	康 慨 (51)
晉綏土改暴行種種·····	余 任 (53)
土改如何算剝削賬·····	葉匡政 (56)
地主袁力鋒之死·····	佚 名 (59)
十指點燈·····	張家正 (62)
土改是如何運作鬥地主的·····	李巧寧 (64)
土改的目的和惡果·····	陳沅森 (74)
被鬥的兩個地主婆·····	網 友 (81)
今天我批准你哭·····	王俊義 (83)

一對同案少年·····	南 山 (85)
好地主李元彬·····	江義高 (87)
我認識的地主之家·····	李遺民 (91)
土改暴力的文學反省·····	陳思和 (94)

## 土改慘禍 呂政天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在中國大陸西南山鄉讀小學。我縣是個盆地，周圍是山，中間是偶有丘陵的平原。我村就在平原中部，300 多戶人家。那裏氣候溫和，一年四季樹木長綠，溪水長流，百花盛開，湖光山色，美不勝收，風景十分秀麗。一年稻麥三季收成，人們忙碌勤勞，吃的雖不算好，甚至有時吃不飽，但十分康樂。我從小就會喂豬、養雞、放牛、割草、養魚，稍大一點就下地幹活，拔秧、插秧、耕田、割稻全都幹。雖然很累，却也十分樂意去做。

貧富差異是存在的。我村最富的那一家，有土地幾百畝，房屋幾百間，還有池塘、草地、竹林，還有人在政府當官，也有人經營工商業。1945 年左右，他家就有小汽車。不僅在我村，在全縣也是出名的富家。儘管他家家財萬貫，但很少人妒忌他，更沒有人說要去偷他搶他。大家都知道，他們家人勤快，有文化，會經營，財富是清白做人代代積累的。他們家有錢但不亂花，當官但不腐敗，還出錢在村裏辦很漂亮的小學和氈靴廠，嘉惠一方。我村的孩子上小學、中學均免收學費甚至雜費。所以村人，甚或外村人，一提他們家，都是十分敬仰的。老人教小孩時也都以他家為榜樣。

村裏的貧窮人家，也家家戶戶多少都有一點田地。每個人能力不同，性格旨趣不同，命運經歷不同（比如遭遇疾病、事故之類），導致貧富也有差異。全村 300 多戶人家，分住在幾個小區域。我家居住的那一塊兒，共 15 戶人家，15 戶人家又分前村後莊。家家地畝數和經營方式各不相同。

有一戶是典型的農業戶。戶主和妻子十分能幹，使牛、種田、挑擔什麼都能幹，一天忙到晚，有時還挑燈夜戰。不過，他們一家都沒文化、不識字，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都種田，偶爾做點生意，雖辛苦，但很少偷摸。讓他們幹別的也不會，就這樣平平安安地生活。

還一戶是專門做棺材生意，開小店，不種田。雖然有錢，人們也不願學他，看見他怪膩歪的。還有一戶，做中人，為買牛賣牛者做中間牽綫人，也能賺點錢。他家大兒子還會醫術，在本村一家私人醫院工作，也有錢。但是做中人、行醫也不是人人都能幹的。每只雞都帶倆爪，各刨各的食，各找各的前程。外村還有做豆腐、宰豬、賣肉的專業戶，還有土建專業村、將軍世家等等。

總之那時人與人，人與自然，是和睦和諧的。雖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絕不像共產黨宣傳的那樣充滿階級鬥爭，充滿仇恨，而且是你死我活。

我們那 15 戶人家，多數人勤勤懇懇、辛辛苦苦、早出晚歸，憑力氣和本事吃飯。也有兩戶人家游手好閑、好吃懶做，被人稱作二流子。其中一家兄弟倆，年青時在外經商。老大忠厚肯幹，事業有成；老二吃喝嫖賭，一事無成，未到中年就病死了。老二有二子，文化不高，僅小學或初中畢業。其中一子小名野仔古，奇懶無比，且詭計多端，為人十分奸詐。野仔古之弟火仔性暴狠毒，野蠻刁悍，敢把人活活打死。解放前夕，這一家由外地返回老家，因無文化，也無財產，又好吃懶做，沒個正經，故生活無著。野仔古、火仔兩兄弟經常打人、坑人、蒙人，或耍流氓痞子手段借人東西不還。哥倆也經常互打。1949 年以前，這兄弟倆就對我家的東西十分垂涎，迫于國法，也不敢過分造次，只是暗中偷偷摸摸罷了。

另一家有個兒子叫更夫仔。其父沒文化，靠種田為生，娶有一妻，多年不育。其時我曾祖父自學成才，考取秀才，被委任為我縣縣長。更夫子之父因不想種田，便求我曾祖父給他在縣裏謀點差事。我曾祖父為人甚好，便把他留在縣衙做報信看門之類的事，晚上兼任更夫。後因生活好轉，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更夫仔。這更夫仔長到 10 來歲時，其父死。他讀完小學也就不讀了。更夫仔既怕吃苦，又沒別的本事，除了應付著種點地之外，每天摸魚捉蝦、挖笋伐樹，懶懶松松稀裏糊塗過日子，是一個十足的二流子。

我家原是貧寒人家。曾祖父早年，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其父給人當長工。可是曾祖父努力讀書，自強不息，考中秀才，官至縣長。又與鄉人集資辦學，親自授課，成績斐然。他還精通醫術，常免費為鄉人治病。他為官清廉，鄉人許之。曾祖父生有五子，除讓一子外出求學深造外，其餘各子均在家務農或經商。通過艱辛勞苦，蓋了房子，還買了十餘畝土地。

由于操勞過度，除我祖父、五叔公活過 60 歲之外，曾祖父的其他三個兒子均英年早逝。我記事時，我祖父成天放牛、割草、養塘魚、養豬，我祖母、我媽、大媽和幾個叔叔天一亮就下地幹活，挑糞、插秧或車水灌田，沒閒過一時一刻。我也幫他們幹活，種花生大豆時，我媽翻地我放種子。晚上祖母、母親、叔叔們還要紡紗織布，常常累得倒頭就睡。

曾祖父當過四任縣長，死後政府和百姓還為他樹碑立傳。我上小學每天都從他碑旁經過，心中常有一種榮譽感。我叔公（祖父的弟弟）靠著我祖父在家從事農副業勞動支持他念書，最後考入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歷史科。解放前當歷史、文學教授，是當地頗有名氣的歷史學家，并被國民政府委任為省府委員。

我祖父臨近解放時當過近一年的糧食倉庫保管員。我伯父當過中學教員，解放後又考上研究生，當了大學講師。我父親解放後參軍當過部隊文化教員。三叔參軍去過朝鮮，其餘兩個叔叔解放後上中學，後來失去聯繫，幾十年後才知道他們最後當上工程師和大學副教授。

我們是耕讀之家。即使當學生或教師，平時寒暑假只要有空或沒空也要擠時間參加勞動。我的幾個叔叔，一放學就先去地裏收稻子或挑擔子、打場，很忙很累，但農活再累也要念書。中午幹完活很累了，我爸把門板卸下，放在地上躺著睡覺。我們躺下時，即使再困也要先看看英漢字典，學幾個單詞再午睡。

環顧周圍各家，沒有一家像我們家那樣努力、那樣上進。我們家在十多戶人家中真的如鶴立雞群，文化高、作風正派、道德高尚。

解放前那三五年，我母親、我大伯母、我奶奶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還有一個叫外鄉仔的青年也是我們家的主要勞動力。每天在農田幹 10 多個小時，農忙時也有請人或換工的。我祖父、幾個叔叔和姑姑，也都參加勞動，不僅種田，還養豬、養牛、養雞、織布，是個典型的自給自足之家。因有在外做事、教書的，家裏有點活錢，生活略比一般鄰居好一些。

土改那年，來了工作隊。他們摸底調查，扎根串聯，也到我家吃派飯，認為我家是團結對象，還把我媽借到土改工作組，幫助成立農會搞婦女工作，計算成分等，常常深夜開完會才回家。最後，我家被定為中農，村裏那位首戶被劃為地主，房子、土地被分，還有幾戶被定為富農。與此同時，學校、地方劇團大演白毛女。村民對地主黃世仁都很痛恨，但并不往本村聯想。他們認為黃世仁是外地的，外地地主壞，本村地主好。我在學校也很積極，入了少先隊，幫助共產黨宣傳這宣傳那。

土改結束了，過了差不多半年沒有什麼事。可是突然從傳來消息，要搞土改復查。我們家人想，復查就復查，還能咋的？但是形勢越來越緊張。派來的工作隊員也不到我家吃派飯了，更不找我媽開會了。原來鄰居見面都有說有笑的，現在見了，立即收住笑容，把臉一扭就走了。一些要好的鄰居偷偷給我們送信，說工作組要搞你們家。我們一聽都大驚失色，如雷擊頂。

後來得知，我縣土改工作結束後，請來專區、省的檢查團驗收。他們均認為可以通過了，

便呈報中共中央，結束土改。誰知中央報告毛澤東，請其批示，毛竟批示不通過，說這是和平土改，要推倒重來。原來毛心中有個百分比，每個地區地主戶數不能少于這個百分比，否則就要重來。中央抽調大批外省的土改隊員，直下到我縣我村，重新摸底，主要是要增加地主戶數。

我家已被他們圈定了！聽說要定我家地主，我們的二流子、地痞、懶蛋、投機分子鄰居們可高興壞了！第一次土改時，他們知道我家有三個勞動力，定不上地主，他們也就分不到東西，便懶得動彈，不開會不學習。看到臨近小區域的窮人又分田地又分房，還大把大把東西往家拿，都眼紅得不得了。現在聽說來了新的工作隊，要定我家地主，他們就像服了興奮劑一樣，個個都來精神了，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我家一口吞了。

他們經常在我家周圍東張西望，有時還用脚步丈量什麼。看見我們家人，他們眼中噴射出異樣貪婪的目光，像是惡狼見了羔羊，隨時準備撲上去撕咬。他們常常通宵達旦燈火通明地開會串通、挑唆。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氣氛，使我們十分害怕。特別是我爺爺奶奶，原本十分積極樂觀，突然變得眼光凝滯、唉聲嘆氣，常常撫著我們的頭說什麼時候你們能長大一點呀！我和爺爺奶奶睡一個屋，幾乎每夜醒來都看見他們在昏暗的燈光下相對長嘆，有時還掉淚。

災禍終於降臨了。一天，我家突然闖進十來個人，還有四個民兵，用槍口指著我爺爺奶奶和我媽。幾個人上來就把他們按倒，用繩子五花大綁，戴上高帽，背後插上竹簽，拖著就走，我七八歲的妹妹也被拉走（其他家庭成員不在家），最後被推到早已準備好的鬥爭會場。

幾個民兵上前一踢就把他們按跪在地。這時台下一片吶喊，口號聲、鑼鼓聲亂成一片。接著就讓他們事先教唆好的人一個一個上來控訴鬥爭我們。但是說來說去也說不出什麼所以然，最後就把更夫仔父親的前妻，90多歲的老太太，扶上來控訴我們。老太太說我祖父乘她房子著火之際，迫她賣房欺壓她，還動手要打我爺爺。實際是，更夫仔父親過世後，他的兩個老婆便分開單過。有一年，大婆住的房子（只一間）失火燒光，十分困難，缺吃少穿無房住，大家就想辦法，安排她住進一個低矮的小房子裏。她想把房子燒後的地基賣掉，就找到我爺爺奶奶。當時我家沒錢，也無此需要，且她的房基地與我家房子也連不起來。可她三天兩頭來說此事，死乞白賴要我爺爺奶奶買下。我奶奶心腸軟，被她纏得沒辦法，就從我們口糧中扣出兩斗米，說是買房，實際是送她兩斗米才算了事。此後地基就放在那裏，誰也沒動。這個老婦，平時我們對她不錯，她還乘機訛詐我們。現在在工作隊教唆下，她非但不感謝我家，反而恩將仇報，欲把我們至于死地。真是人性何在，良心何在！

最後工作隊宣布，從即日起，我家的成分被定為官僚地主！我爺爺本人是官僚地主分子，祖母和我母親均為地主分子，監督改造。我母親、祖母是全村公認的好勞力，天天參加體力勞動，還要你監督改造嗎？說我爺爺是官僚地主分子，他當過什麼官？不就當過幾天糧倉保管員嗎？說我們家從糧倉挑了糧食回家。是挑了，可是是在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挑回來的。當時發不出現金工資，是以糧代薪發給我爺爺的。

更為可笑的是說我們家雇了長工，實在是無稽之談！他們說那個外鄉仔就是我家的長工。那麼那個外鄉仔是怎麼回事呢？那年我叔公外出回家，路經災區，看見不少少婦把孩子丟在路旁。有個三四歲的弃嬰，哇哇哭著向他撲來。他不忍心離去，就把他帶回家。家人也都十分喜歡他，就當自家的孩子養著。因他來自外鄉，小名就叫外鄉仔。大了送他上學，一直養到十五六歲，讀到小學畢業。因他生性好動，天資又不是很高，小學畢業後（當時文化已不算低了）不願再讀書了，就與我家的人一齊幹活，一樣吃穿。身體長得十分健壯，20歲左右，儀錶堂堂，膚色紅中帶黑。我爺爺為了讓他日後成家立業，費心機托朋友特意在一個工廠找到一份他十分勝任又有工資收入的工作。他很高興，和我們家人關係也很密切。

工作隊搞土改復查欲置我家于地主成分，可是很明顯，我家主要勞動力十分充足，達不到定地主的條件。于是，奸刁狡猾又無耻的土改工作隊就和鐵蛋、更夫仔以及詭計多端的野

仔古等人串通一氣，想把外鄉仔作為突破口。他們用盡心機，極力挑唆外鄉仔，並許諾他只要按照他們的要求去做，以後好處大大的，還可以分到好房子好地。可憐又可恨的外鄉仔，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對我家恩將仇報。在一次鬥爭會上竟說他是我家的長工，我們家人如何虐待他、迫害他，不給他飯吃。我家就這樣有了長工，就這樣被硬定為地主。

定了地主之後，全家可就慘了！我在部隊工作的父親，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不宜在部隊工作為由遣送回家。起初還能教書，或給人補習，隨後越來越惡化，至 1957 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勞動改造。

我們這些地主家的狗崽子也遭殃了。我在學校念書，儘管每天要做苦工，但成績十分優異。我經常沒錢交學費買書，老師主動給我墊錢。即使這樣，還不讓我念下去，說我是專政對象。我含淚離開了學校，每天修路、挑石頭、挑沙子。我一個叔父，高中畢業，考的成績很好，但學校拒收地富子弟。他悲憤交加，一天背著家人，拿了一盒火柴跑到後山坡，坐在老祖宗的墳上大哭一場之後，把整盒的火柴往肚裏吞，想以此了却一生。幸而被一位放牛的老漢發現，經灌腸才撿回一條性命。另一個叔叔，解放初參軍，在部隊搞醫療衛生工作。家裏被定為地主後，很快也被送回家。僅有的一點就業費，也被村裏那些流氓無賴騙走。他生活無著，精神失常，瘋了。

但這些都不算什麼，最慘的是我爺爺奶奶！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想祖先吃了多麼苦，我們也辛苦了大半輩子，竟落到如此淒慘境地！可是那些二流子，那些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流氓、地痞，却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一個個入黨升官，當了什麼農會主席、民兵幹部，個個趾高氣昂！他們實在真比土匪強盜卑鄙千倍萬倍。土匪強盜搶了人家東西也就罷了，可是這幫土匪強盜明明自己是土匪強盜，却說自己是最革命、最光榮。土匪強盜搶了人家東西，還放人家一條生路，他們却要害你一輩子，壓榨你到死為止。

他們就住在我家最好的房子裏，每天天一亮就象吆喝牲畜一樣把我爺爺奶奶叫醒，稍晚一點就咚咚亂踢門。爺爺奶奶出來後，就被他們押著出去做苦工，一連幾天十幾天甚至幾十天，非但累如牛馬，還分文不給。想問個究竟，他們把臉一沉，露出可怕又猙獰的面目說：“你們知道嗎？你們是監督改造，還想要工錢！”

種田吧，留下一點田，非但土質不好，不易灌溉，而且季節已過，又無錢買肥料，只好種點雜糧什麼的。這幫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東西，非但不給我爺爺奶奶種田的時間，還把統購統銷分下來應由他們向國家交售糧食的指標壓給別家，而別人的購糧指標却被他們貪占，害得人家沒飯吃。本來我家有幾個學生，可以向國家買糧，可他們就是不開證明。他們有購糧指標，又坑蒙拐騙弄來錢；有了糧，又有錢，就大吃二喝。吃飽喝足了就幹壞事，就大生孩子。那個敢把人活活打死的火仔一連生下七個孩子，前六個都是女孩，最後生下一個男孩。高興得昏了頭，大擺宴席慶賀，共有六七十桌，氣派熱鬧的樣子簡直難以形容，不知道比過去所謂的地主闊氣多少倍。過去他們好吃懶做敗光了家業，一旦有機會，他們鋪張浪費起來比真正的地主不知要厲害多少倍。毛澤東說他們最革命，是革命的主力軍，其實他們最想發財，連做夢都在想怎樣搶人家的東西發財，這幫無聊無恥的東西！

我爺爺既無糧又無錢，還要做苦工，餓昏了，實在沒有辦法，就到人家喂豬的泔水缸裏去偷撿又臭又爛的白菜葉子充饑。一次被我看見了，我眼一黑，鼻子一酸，撲通一聲就跪在地上了。我抱頭大哭！“奶奶，你把我們拉扯大，辛苦一輩子，過去再苦再累你都不怕，怎麼今天竟慘到這等地步啊！當晚輩的不能報答你養育之恩，真是罪該萬死啊！”奶奶只是掉淚，毫無辦法。

爺爺奶奶連累帶餓，還遭那些豬狗不如、忘恩負義、喪盡天良的歹徒們管制，實在抗不住了。一天早晨，爺爺走出家門，跳水塘自殺。等到找到他的屍體時，已被水泡爛了。我奶奶一看，什麼也沒說，過幾天上吊自殺了。家人為她收尸時，眼睛怎麼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在外工作的三伯父一直音訊全無。我們明知凶多吉少，但還是忍悲含淚，竭力不去想他。終於傳來的噩耗是：家庭被定為地主後，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廠勞動，文革挨游鬥，慘不忍睹。在一次批鬥會上，他頭戴高帽，雙手被綁。但他突然掙脫綁繩，推開旁人，越過欄杆，從四樓跳下，腦漿崩裂。

三伯父死後，他們不許我嫂子哭，要批鬥她。人性、天理、良心在他們的字典裏早已是罪惡的東西了。嫂子怕我們傷心，遲遲不肯、不敢把消息告訴我們。最終我一聽到這個信息，當即暈了過去。

我父親早已不想活了，只是忍辱含垢，再掙扎幾年，把孩子養大一點。但是這環境、這形勢，我們這號好人還能活嗎？全身灌滿邪魔的二流子們早已成仙成妖了，他們大辦人民公社多吃多占，大辦食堂頓頓雞鴨魚肉，大刮共產風吃吃喝喝，他們除了吃喝什麼都不知道。那個奸狡詭詐的二流子野仔古，白吃白占成了癮，自己不養雞，竟到公社去誣告我爸偷他的雞。我爸我媽沒有辦法，含著眼淚把唯一能下蛋的母雞給了他。

我爸萬般無奈，滿腹經綸的大學生為了拉扯幾個孩子，最後只好去學理髮。可是那些狗東西連理髮也不讓我爸幹，說我爸利用理髮宣傳封資修，砸了他的理髮挑子。已經活到頭了，我爸心一橫，把幾個小的孩子托人送到江西，給了人家。那幾天，他好像心情好了，有說有笑的，誰知那是在最後安慰我們！那幾天，他收工後總說去挖點野菜，然後就獨自一人背著鋤頭走了。有一天，再也不見爸爸回來，我媽、我和大弟弟都著急了，四處叫喊，不見人。我們連哭帶跪，求人幫忙尋找，黃昏時分才在對面山坡上發現了他。只見他躺在一個墓坑中，旁邊還有一個裝敵敵畏的大瓶子。我一看明白了，原來那幾天他一人背著鋤頭出來是給自己挖墳墓的呀！墓坑挖好，喝下敵敵畏躺下，永遠離開我們去了。我一時急火攻心，哇的吐了一大口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媽一看也一頭栽倒，但很快就爬起來，朝旁邊的池塘一頭栽去，幸被人死死拽出才幸免一死。

我們把父親的屍體收拾好，火化後，我用一個小塑料袋裝了一小撮父親的骨粉藏在身上。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掏出裝著父親骨粉的小塑料袋，放在一塊石頭上，然後退了兩步，趴在地上向它磕頭。我說：“爸爸呀爸，孩兒不孝無能，未能報答你的養育之恩之萬一。今晚望你在天之靈再助孩兒一臂之力，助我逃出魔窟。”說完，泪水雨下，我把父親骨粉重又藏好，然後緊閉眼睛，縱身跳入波濤翻滾的大海，游向茫茫的對岸。我大聲喊：“老天呀，你開開眼吧！真理何在，天理何在？”

## 粵中土改雜憶 牧 惠

1950 年代初期，我在中共粵中地委（現江門市）工作。土改中，那裏發生了好幾宗大冤案，如江門鎮郊的樓山事件，鶴山縣的宋森被逼自殺事件，恩平縣的松仔嶺事件。當時我被調去搞地區直屬機關的三反，不在土改第一綫，對這些案件雖略有所聞却不得其詳。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之後，我幾次動員身歷其境又身受其害的原粵中縱隊司令、粵中地委書記吳有恒抽時間寫一本回憶錄，把他所見所聞的左禍寫下來供後人見識。但是，吳有恒斷然拒絕我的建議，甚至根本不願再同我談當年的土改。作為他的老兵，我很不理解，却又不敢問為什麼。

事後證明，1956 年以前，廣東歷次政治運動錯傷很多幹部，與當時陶鑄為代表的一些南下幹部對廣東地方幹部的看法大有關係。1952 年夏，陶鑄在華南分局黨校對學員講話說：“我到廣東後看出，廣東地近港澳，封建勢力濃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們估計，廣東的幹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們的，縣一級的幹部大部是我們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區以下的幹部則小部分是我們的，

大部分是人家的。”南下幹部這股極左勢力對廣東地方幹部是歧視和蔑視的。

且看樓山事件是怎麼回事。樓山靠近江門，粵西區黨委和粵中地委都設在江門，于是樓山不幸成為領導們的土改試點。這時，粵中地委書記吳有恒已被調到區黨委當秘書長、宣傳部長，新來的地委書記把自己從湖南帶來的一批以廖原為首的土改隊員，派到樓山搞土改試點。廖原到樓山後，原武工隊員、現任樓山鄉長李波熱心向他介紹了該鄉的歷史和現狀，表示積極配合他們的工作，廖却不予理睬，偏要選中兩個參加過同安堂反動組織的人為扎根對象。廖原一夥人依靠這兩個人，用逼供誘供加上酷刑手段，挖出一個 40 餘人的“特務組織”及其“反共救國軍岡州樓山大隊”的番號，李波竟然是該大隊的參謀長，地主蘇東海為司令員（只有解放軍才稱司令員，廖原搞假一眼即可看穿）兼大隊長。不到一個月，就逼供出特務、特嫌 200 多人，逮捕扣押 40 餘人。

廖原于是被請去作典型報告。聽報告後，吳有恒憑自己的經驗判斷說：“廖原這個典型報告是假的。”并指出了破綻所在。可是區黨委領導却仍安排廖原到華南分局機關作報告。吳有恒看了廖的報告文本，發現這些報告是從湖南《土改簡報》上抄來的。縣公安局長龐震也提出懷疑，派出調查組前往調查。經調查，證實廖原提供的材料不可靠，并瞭解到土改隊酷刑逼供情況。在此情況下，地方領導仍批准廖原的做法，稱樓山案民憤很大，群眾要求押解“特務”回鄉鬥爭。由此引發亂打亂鬥，僅木朗村一天便打死 4 人。李波被打得含冤自殺。另有 4 人以特務、地主、惡霸罪名被槍斃。而且槍斃是在專員兼廣東省人民法院粵中分院院長謝創堅決不同意的情况下執行的。

半年後的 1952 年 6 月，粵西區黨委在不斷聽到樓山廣大群眾不滿呼聲的情況下，派吳有恒親自率領檢查組到樓山，終於查清樓山事件純屬混入共產黨內的三青團區隊長廖原製造的假案。廖原和他的合謀者賴志群被正法。然而對此案負有直接間接責任的縣、地、區黨委并沒有一人被處理，甚至連檢討也不必，報紙上更未出現半個樓山事件的文字。李波和其他被害多達 20 余人的幹部、群眾白白地成為犧牲品。在連南縣，副縣長邵良楚捏造縣府內有“反共救國軍”，司令正是縣委書記兼縣長成崇正。三人被槍斃，成崇正入牢，株連了三百多幹部受冤。

陶鑄來廣東搞的兩次反地方主義、土改整隊，不知傷害了多少地方幹部。粵北連縣還發生一樁以老幹部父親的人頭來開展政治攻勢的冤案。這位老幹部的父親，充其量是一般地主，沒有罪惡，可是土改開始就被槍斃了。據他們說，不殺老幹部的父親，聲勢不够大，只有殺老幹部父親才能起到強大“政治攻勢”的作用。

廣東華僑多，許多就是海外打工仔。他們節衣縮食寄錢回鄉蓋起房子，買回三兩畝田，讓在家守活寡的妻子（往往再加一個養女）能過上粗茶淡飯的日子。這些僑眷根本不是地主，但是為了多分果實，仍然把她們劃為地主，房屋被沒收。華僑和僑眷不但身心受到傷害，有的眷屬甚至被鬥死或被迫自殺身亡。恩平君堂鎮石潭村一旅美華僑鄭家宰夫婦，1952 年在土改中被當成地主批鬥，還迫使他們寫信給在海外的兒子鄭 XX 寄 3 千美元回來充作鬥爭果實。鄭家宰夫妻二人，走投無路，一起自縊身亡。鄭 XX 在外聞訊之後，捶胸頓足，悲痛萬分。後來，他家雖被端正了政策，由華僑地主改為僑工，但作為兒子的鄭 XX 一直對父母的慘死耿耿于懷，不但對共產黨滿懷仇恨，而且對自己一位在外地參加土改的親侄也甚為不滿，懷疑他與自己的父母不幸被害有關，足足長達 42 年都拒絕與之來往，音信全無。

補白：文革下放農村，村裏有一地主婆。丈夫死得早，一個小脚女人守寡還帶個兒子。沒勞力，沒技能，只好上大戶人家當傭人。人老實勤勞，和東家的關係好，母子兩人吃穿用住都在東家。當傭的工資沒處用，就積攢下來買點田，再放租出去，收回的租穀積下來也換成田再放租。多年下來滾了些錢，還供了兒子讀書。直到解放，她還在那裏當傭人。可她的田呢，够地主了，就成了地主分子。兒子就要高中畢業了，地主崽子是不該讀書的，就不許

再讀了。雖說高中也算知識分子了，因是地主崽子，也不會讓你幹什麼。另一個地主婆，90歲多時來城市生活。隔壁請了裁縫做衣服，剪下的碎布丟到垃圾桶裏，她都去撿來，成塊的剪好，做鞋墊；成條的剪齊，折起來縫一路，做成帶子以備用。別的地主、地主婆什麼樣不知道，這兩個地主婆肯定不像過去書中或電影中所看到的那樣。

## 爸爸的出身障礙 鴨山

爸爸因為地主崽子的特殊身份，被禁止上高中，最後考進縣農業技術學校。在學校，爸爸人際關係特好，為人仗義，處事能力强，被選為學生會主席，主持學生會日常事務。部隊來縣裏招空軍一名，爸爸被校方保送，經體檢面試，爸爸成為全縣唯一的勝出者。最後政審一關，爸爸因為是地主崽子，被取消了參軍資格。

那時恰好趕上三年大饑荒，家家都沒有糧食吃。秋季，爸爸去挖老鼠洞。老鼠洞與人類的房子布局一樣井然有序，分為臥室、庫房及廁所。鼠洞裏的糧食很多，擺放得很整齊，而且各種食物絕不會混在一起，都是分類擺放。爸爸挖得許多糧食，供自家食用。冬季，爸爸一個人趕著馬拉爬犁，走到幾十里以外的蘆葦塘去打魚。把葦塘上的冰層打破以後，不計其數的野生魚就都爭搶著來呼吸空氣。這時爸爸拿起插撈子（撈魚的用具）直接舀魚就可以了。每次去都可以打幾麻袋的魚，自家吃不完，身為地主崽子，又不敢拿到集市上去“搞投機倒把”，只好悄悄便宜點兒賣給商販，貼補家用。

爸爸畢業後被分在某小學擔任班主任工作，由於與學生年齡相差無幾，工作起來倒也得心應手。後來發生的一件事改變了爸爸的一生。他班裏有個年齡較大的男同學，經常對同學們說學校某未婚年輕女教師不正經（男女作風不好）。該女教師知道後，哭哭啼啼找爸爸告狀。爸爸是個急性子，加之年輕氣盛，把那個說閑話的學生找來對質。他不承認，爸爸一氣之下打了他倆耳光。事後挨打的學生家長知道了，告到校長那裏。校方決定讓爸爸寫檢查，爸爸拒絕寫。本來就不喜歡當孩子王的他借機辭職，校方以不給爸爸戶口為由力挽他。他最後放棄了戶口，選擇了辭職。

爸爸來到雙鴨山市的大伯家，大伯通過關係在雙鴨山給爸爸重新上戶口。爸爸為別人家拉煤，掏火牆，建房子，苦活累活他都忍受。後來縣裏徵兵，全縣只有幾個海軍名額，爸爸報名後，體檢等各項都合格了，等到政審時，因家庭成分是地主，又被拒之門外。

1963年，中鐵二局在雙鴨山等城市招工，爸爸報考後被錄取，從此在中鐵二局工作。那時東北的鐵路網最發達，南方幾乎沒有鐵路，爸爸他們就在貴州一帶修隧道，建橋梁，鋪鐵路，在外漂泊。

1967年，爸爸與當民辦教師的媽媽經媒妁之言結婚了。爸爸努力工作，為人得到領導、同事的認可。中國與坦桑尼亞建交後，援助坦國修建鐵路，爸爸與另一位工程師做為二局十三處的佼佼者，成為預備援坦的技術人員。政審時，爸爸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取消援外資格。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爸爸的單位停工，工人天天打撲克，打麻將。當權派被打倒了，造反派頭頭是爸爸的光腚娃娃朋友，權力都交到爸爸手裏。可是在家中的媽媽，却因為與地主崽子成婚，混淆階級界限，被校方辭退。

補白：小時候我聽母親說過鬥地主的事情。她說有一次，一個造反派頭目，在大隊的批鬥會上喊完口號後，就用有釘子的木板朝已綁住跪在地上的地主頭上拍去，直至地主被打死。後來許多從那裏路過的人說，一到晚上或陰雨天的時候，好像那塊地就有人在哭泣。再後來，我念中學的時候，那個紅極一時的造反派女頭頭被法辦了。我們村本來是沒有地主的，是從鄰村分配了一戶地主，供大家對他進行監督改造和管理。這戶地主人家特好，是兩代相



傳的中醫世家。其父仲光是遠近聞名的中醫，三十年代就著有醫學專著。在一次批鬥會上，我么叔挺身而出，以保護醫生為由，把這戶人家的頂梁柱從死亡綫上救了出來。鬥死的當場死了，沒鬥死的到處游街，有的因此自殺了。剩下的雖然活著，但跟死了的沒什麼區別。沒有被批鬥的，就把標語寫在他們家的牆上，地主看一次標語就像死了一次。 ??

我家七口親人是這樣被餓死的 李發剛

我們一家的變故發生在 1952 年的土地改革。父親接手當家時，家裏有三四十畝地。土改工作隊進村之後，訪貧問苦，扎根串連，很快摸清我們家的底細：當地首屈一指的土牆瓦屋，倉裏有糧，罐裏有油，圈裏有豬，不僅土地多，而且雇長工、請短工。雇工就有剝削，剝削就是地主。工作隊發動群眾訴苦，將我父親批鬥一陣，理所當然劃為地主。更要命的是父親還有二房，便被認定為霸占民女。于是這個只會讀詩文、從不與人紅臉的文弱書生被定性為地主惡霸。

民兵一繩子把父親捆到官渡區公所關了起來。在關押的幾天裏，由家住官渡的一個姑姑每天給父親送飯。老家幹溝自然村的村民，念及我父親樂於助人、興辦學堂，便經過商議，利用送公糧到官渡鎮的機會，聯名具保我父柯大本。區公所派員核查後，居然接受民意，把我父親放了。

可是不久，鄉政府又派民兵到我家，命我們一家人到堂屋集中，將父親單獨另關一個單間，由民兵持戒專人看守。土改工作隊在堂屋向我們一家八口人鄭重宣布：瓦屋房沒收，上山住岩洞去。并要我們只能老老實實，不准亂說亂動。然後民兵從我家拿出一口原來煮猪食的破鍋，一個背簍，一鉢沒吃完的“合渣”，還有一口袋苞穀皮磨成的粉子（我家原來喂豬的），命令我們立即走人。

在民兵的監督之下，我們一家來到離家十幾裏的一個無名山頭。我們離家後，父親在村裏被群眾大會鬥爭過幾次，最終由我母親陪鬥之後，被押送到官渡區公所。不久被判刑，解押到沙洋勞改農場勞改。後來的事實證明，壞事變成了好事，他因沒留在本鄉，却因而留下一條活命。刑滿後父親不想回老家，一則有愧于自己的過去，無顏面對一家 7 條冤魂；二則從心底感激勞改農場依法辦事，讓他保住一條性命并獲得新生，便決意留在“新人隊”。

我媽被攆上山之前設法帶了火種，那口破鍋能把野菜和少量苞穀皮煮熟，一家人就在山上暫活下來。可是沒兩天，又一批民兵上山通知：馬上開群眾大會鬥爭柯大本，柯艾氏（我小媽）下山陪鬥。小媽以自己女兒尚幼，不能久離為由，寧死不下山。民兵們也還通情達理，就要柯曾氏（我媽）下山陪鬥。不幸的是，他們發現我們居然還能生火煮菜、搭棚避風，日子過得還蠻“滋潤”，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們那口破鍋砸了，留下兩個民兵把我們一家攆到一個叫“磨棹地”的更高、更荒涼的山頭上，那裏周圍十幾裏沒有一人。我媽知道那個地方荒涼，已經預知我們家只有死路一條了。被帶走陪鬥前媽媽悄悄對我說：“玉泉，你機靈，懂事，不要一家都餓死在那個山上，悄悄投奔你外婆去吧。他們是貧農，興許會給你一條生路。”說完，我媽按照民兵吩咐，到山下去陪鬥。

那時我雖然只有 11 歲，却有一個堅定信念：活命。在兩天都沒進食熟野菜的情況下，我沿著一條“毛狗路”去尋找下山陪鬥的母親。在一塊莊稼地的小路上，我瞧周圍沒人，用最快的速度揪了幾把菜豌豆角塞到嘴裏，三下五除二把肚子填飽了。至今回想起來，那些生豌豆角真好吃。吃飽之後，恢復了些氣力，再往前走。

突然，發現我母親躺在路上。趕緊過去一看，母親的白眼珠翻出來了，睜得大大的，怎麼叫她都不答應，推她，硬邦邦的。原來媽已經死了。我連眼淚都沒有了，害怕周圍有人發現地主崽子同情地主婆。我深深望了一眼媽媽，為了逃命，朝外婆家的方向一步一回頭地走

去。下坎之前，我屏住呼吸，回頭看了媽媽最後一眼，算是與慈母永別。傍晚我終於到了外婆家。外婆為我媽的慘死，且不得收尸，摟著我哭了又哭。其實，那時“磨棹地”還有外婆的骨肉，是生是死，外婆竟沒有過問，也不敢過問。她把家裏僅有的三個雞蛋煮給我吃，似乎不僅是對我的補償，更是對女兒亡靈的祭奠。我當時幾乎只有生理需要，狼吞虎咽地吃下雞蛋之後，胃裏一會兒就像滿鍋開水在翻騰，難受極了，很快就全部吐了出來。上山之後吃的都是野菜，料想胃裏接受不了這樣多的蛋白。

在外婆家躲了幾天，漫漫調養過來，有了些精神。可是好景不長，一天，互助組輪到在我外婆家幹活，他們發現外婆家藏了她的外孫，一個地主崽子，立即報告村領導。領導不敢馬虎，嚴肅警告外婆：“你是貧農，怎麼能喪失立場，弄一個地主崽子在家裏？趕快走人，否則，後果自負！”外婆一家老實巴交，不敢不聽村長的話，只好要我去投奔家住官渡附近的一個遠房二伯。此後，我成天東躲西藏，或給別人做“抱兒子”（養子），或當零工，或當放牛娃、小豬倌，凡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都幹過。目的就是混口飯吃，我知道我必須活下來。

幾經人生周折，我終於長大成人了。我雖然只讀了兩年書，却見字習字，不斷溫習，一般常用文書、寫個書信之類的，難不倒我。我勤奮老實，一米七五的個子，經人撮合，二十歲便與同為反革命勞改犯的女兒，一個十分可人的姑娘結了婚。

岳父蔡明寶的刑期早滿，已經是“新人隊”的隊長。他得知農場需要新增勞動力，就為遠在家鄉的女兒女婿報了名。在好心人的幫助下，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岳母便從竹山來到千里之外的沙洋農場，並且成為場裏的正式農工，與“新人隊”的父親、岳父同在一場，時有見面。如今一晃將近五十年了。十多年前，我的二兒子從警校畢業後，也分到沙洋農場，當了幹警，現在已是三級警督，副科級幹部。我早已從沙洋農場退休，每月千元退休金，妻子因病已隨父母先我而去。

對於六十年前的有些事，我常常提醒自己去想它，也想不清楚。也許是年紀大了，我總是魂牽夢繞千里之外的那塊“磨棹地”，因為那裏有我一家餓死的七個親人。他們是三十七八歲的母親、三十挂零的小媽、十四五歲的金花和銀花、幼小的奶女兒、六七歲的如意和隨意。

不知道我悄悄離開他們之後，他們在“磨棹地”究竟又撐了幾天。小媽既缺乏山上生活的經驗，又缺乏足夠的勇氣，說不定她在孩子們之前便已離開了人間。如果小媽真的先幼兒而去，在荒無人迹的“磨棹地”，剩下的五個孩子將在怎樣的恐懼和煎熬中度過自己短短的餘生？還在官渡的時候，我曾想知道，他們的尸骨是不是當時就被野獸吃掉，或者有幸被人掩埋？終於我沒敢問。

幾十年之後的上個世紀末，我回到闊別將近五十年的幹溝自然村。依然健在的一位知情人告訴我，包括我母親在內的“磨棹地”七口，很快就在原地餓死，尸臭順風而來，當地政府不幾天就指派地主分子就地掩埋了。我現在甚至想知道，那些利用公權，驅趕婦女和兒童上山，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為，可曾受到過追究？當事人後來對此可有幾分愧疚？執政黨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汶川大地震時，現場指揮爭分奪秒地搶救每一個生命，令我由衷地感動。我衷心擁護當今執政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我覺得過去那段歷史需要如實記錄，因為，我家“磨棹地”的那段遭遇，也是共和國歷史的一橫或者一點。

補白：羅紅從小就是具有領導力的娃娃頭，性格強悍。文革時期，家庭成分不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是地主，有個小朋友常以此欺負他。先是吵架，罵他是地主崽子。小羅紅不服，便動手把對方打得找不著下巴。後來，被打小孩的家長找上門來討個說法，可父親仔細問清楚情況後却說：“你兒子欠揍！我是國家幹部，我兒子是國家幹部的兒子，不是地主崽子的兒子，比工人階級還高一層呢。你沒教好自己的兒子，該打！”父親的撐腰讓站在一旁

的小羅紅眼前一亮，陰雲散盡。此後，每每遇有人欺負，二話不說，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然後記在小本本上，伺機報仇。父親保留了小羅紅身上的野性與自信，這對他以後的人生走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到今天他都沒有真正走出父親的影子。他從父親那裏得到的教誨便是：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不能夾著尾巴做人。

## 我在恐懼中長大 陳破空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只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鬱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父親被毒打，構成我人生的最早記憶。這一切是怎麼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抬石頭用的那種，碗口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釘。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親膝下，血流如水。這一切，就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之後，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控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捲曲著一個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親。母親正為他敷藥療傷。作為從正規院校學成的西醫，在那個小鎮成為罕見，母親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給父親，為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沉睡過去。夢裏，反復上演一幅圖像，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餘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于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隨時似要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

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裏反復出現。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圖像，究竟是什麼意義？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為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為“地主”。從此災厄不斷。我的二伯，畢業于黃埔軍校，曾任國民黨軍官。中共軍隊入川時，他放下武器，“和平起義”。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然而，幾年後，中共搞土改復查，為了湊夠鎮壓名額，二伯竟被算了進去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兒，還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裏，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運動，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屬於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簡單說來，小鎮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對當地領導，與紅衛兵無關。而當地領導，在文革中，如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黨委書記還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卻從未見過、也未聽說他動手打過任何人。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論戰，言必稱“毛主席說”。一句“毛主席說”，就仿佛他掌握了什麼真理。父親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却因長期置身于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之下，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患絕症，驟然離世。雖為名醫，却救治不了自己。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父親又當爹

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對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能謀生的手段，都用盡了，都歷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復一年。沉重的勞役，艱難的生存。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于我的腦際，也將轟鳴于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惡，出言刻薄。

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當我偶有機會成為“孩子王”的時候，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哄的同齡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謾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裏。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的怒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連我都沒有剝削過人，他又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小聲哼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麼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裏有真正的責備，認為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麼，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來說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親，“六四”終於覺醒。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為什麼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為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嶇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親，每隔幾周，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行走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里。或者為了捕魚謀生，或者為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 畢業報到時的冷遇 黎學智

1963年7月27日早晨，東北師範大學畢業生黎學智我從吉林省長春市動身，到通化地區長白縣教育局報到。經過六天五夜的奔波，終於到了縣教育局。我提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畢業生派遣證、共青團員組織關係介紹信、派遣畢業生工資關係介紹信、戶口遷移證明、城鎮居民糧油關係證明，經查驗無誤之後，發給長白朝鮮族自治縣教育局工作安排介紹信。接待的同志看了我的檔案，用一隻尚未削過的鉛筆在我家庭出身“地主”欄裏若有所思地敲打多次，然後陰喪著臉、拖著長音冷冷地說：“熱烈歡迎你到山區工作，到朝鮮族中學報到去吧。”我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寒顫，似有不祥之感。

“請問，到朝鮮族中學怎麼個走法？”我問。“那我給你掛個電話吧，讓他們派人來接你。”陰喪臉拿起話筒，說的是我生平第一次聽到的朝鮮語。不多時，學校黨支部組織委員兼學校第一教導主任金永旺來到教育局，同樣是陰喪著臉，看樣子非常不高興，不冷不熱地說：“歡迎到我校工作，跟我走吧。”

“金主任，請問，學校有多少個班級，多少名學生？”我邊走邊問。“這跟你黎老師大概沒有什麼關係吧，你的任務就是教課！”金主任十分不解地看著我說。

“金主任，請問，學校有多少名教職工，其中有多少名黨員？”我繼續天真地發問。“黎老師是黨員嗎？”金主任這次實在是不耐煩了，不無譏諷地反問我。

“我不是黨員，但我想靠近黨組織，經常找黨員彙報思想和工作。”“噢，原來如此。”

金主任終於明白了。

兩人默默無語地走著。我不知道金主任心裏想的是什麼，而我的內心却充滿了自責，悔不該向領導同志盲目提問。

到校後，金主任把我介紹給出納員小鄭。小鄭也就 20 歲多一點，反正只比我小不比我大。他兩眼對我射出敵視的目光，我十分反感，同時又感到莫名奇妙。他問話的方式和用詞則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姓名，年齡，哪年哪月參加工作，請出示工資關係介紹信！”

我把所有的介紹信和證明都交給他。小鄭首先查看了 my 戶口遷移證明和城鎮居民糧油關係證明，忽然冒出來一句令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話：“看來你是準備在長白落戶了？”我沒吭聲，心裏想：“一個小小的出納員，他有什麼權力審問我？”

當他看到我的共青團員組織關係介紹信時，頓時顯得怒不可遏：“你是共青團員嗎？”  
“是。”

“你們學校畢業生都是共青團員嗎？”“不全是。”

“那你怎麼就是共青團員呢？”“上級批的。”

“哪個上級？”“可能是學校團委吧。”

“你們學校團委有權力批團員嗎？”“我不知道。”

“告訴你，我到現在還不是共青團員呢。”

鄭出納的最後一句話，使我如墜雲霧之中。我入團有我的情況，他沒入團有他的原因，我在長春入團與他在長白沒入團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後來我才知道，他對一個地主能入團和一個貧農不能入團十分氣憤，十分不滿，因此心理失衡。接著，他又審查我的工資關係介紹信：“你是七月下旬報到的，所以只能發給你七月份的半月工資，有意見嗎？”“沒有。”我接過工資後問：“那我的路費呢？”“你來長白的旅差費已經超支，我們不能補發，你得回到長春去原單位報銷！”

我的天哪，我從長春來到長白乘火車坐汽車整整用了六天五夜的時間，讓我回長春再回長白，這長達十幾天的時間誰來准假？這途中的巨額開支由誰負責？

我到二樓教導處找到金主任，向他陳述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畢業生派遣費的報銷規定，原則是多退少補：如果派遣費超過旅差費，剩餘部分退給接收單位；如果派遣費少於旅差費，超出部分由接收單位補發給畢業生本人。金主任說：“你告訴鄭會計，就說我同意報銷。”

我從二樓回到一樓，向小鄭轉達金主任意見，小鄭說：“我不敢肯定這是不是金主任的意見。”我第三次從一樓走到二樓，向金主任轉達鄭出納意見。金主任說：“你叫鄭會計上來，我跟他說。”然後我走到一樓，又第四次同鄭會計一起從一樓走到二樓。金主任與鄭出納用朝鮮語爭論了幾個回合，我第五次從二樓走到一樓的總務處。最後小鄭極不情願地把三十幾元路費錢甩給我，嘴裏嘟囔著：“給你，比我一個月的工資還多。第一天參加工作就學會告狀！”

就這樣，我領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資，報銷了平生第一次旅差費，從此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我的見習工資是每月 49.5 元(一年後轉正工資為 59.5 元)，而初中畢業後留校的出納員小鄭的每月工資為 31.5 元。這本來是國家有關工資政策規定的，與我毫無牽連。

補白：我出生滿月時，我媽抱我回娘家。一進村子，認識我媽的人向我媽打招呼：“生了個兒子還是女兒啊？”我媽說：“是兒子。”我媽的親二孀剛好從旁經過，馬上大聲喊：“生了個兒子有什麼了不起，還不是當女兒養，將來有老婆娶嗎?!”我媽的二孀一向恨我媽不聽話，不和我爸離婚。幾十年來，我媽的娘家人，包括我的兩個舅父，都不停慫恿我媽跟我爸離婚，令我媽幾十年來都在矛盾和不安中度過。我讀小學時，祖母常對我說：“你讀完這幾年小學就會沒書讀了。上中學要推薦，我們出身不好，成分高，就不用想了。你必須在

這幾年儘量學多點東西，等長大了你們自己去找門口，看哪里有純女戶要招郎入舍，你就落腳吧！呆在家裏你們會成爲寡仔的！”地主群體本來是農村的精英，一直以來都有非常優秀的遺傳基因，按理他應該可以獲得最好的婚配。可是現在他們不得不娶一些殘障女子爲妻，累及後代。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廖亦武

老威（廖亦武）：你的電話號碼是張進謙老人給的，他對你念念不忘呢。

????郭正洪：哼哼。

????老威：怎麼啦？

????郭正洪：他肯定提起如何與我分吃生臘肉的故事，將我醜化了一番。你想想，那年頭餓死鬼一片接一片，連粗糧都不好找，到哪兒去弄肉？況且他張進謙就是孫猴子，能折騰上天，也不過是個勞改犯，更不可能從彝胞手中弄肉。

????老威：他描述得活靈活現，不親歷咋個能編得出來？

????郭正洪：見他的鬼！退一萬步，就算他神通廣大，弄到了 9 兩臘肉，依他張大炮餓了連屎都吃的個性，會把比鑽石還稀罕的肉分給別人？那不成雷鋒了？既然是雷鋒，共產黨又何必關你勞改你，搞個神龕將你供起嘛。哼，都是勞改犯，誰也不欠誰，可他張大炮偏偏到處亂吹，我分吃了他的肉，如果不是他的肉潤了我的腸，我就熬不出頭……氣死人了！有一回，我兩個吵著吵著，差點在麗江街頭打起來。他說：姓郭的，狗吃屎還曉得舔老子的屁股，你連狗都不如。小同志你評評理，這叫有文化？這叫老革命？騙子囉。

????老威：都 80 出頭的人了，還記啥子仇嘛。

????郭正洪：活人記，死人就不記，憋著，看那個死在那個前頭。

????老威：那我們不提張進謙了，從現在起，將他一筆勾銷。土改期間你多大？

????郭正洪：我 1925 年生，土改時已 20 好幾了。我們兄弟姐妹 7 人，加父母，全家共 9 人，在石鼓街上還算有名。我家有 10 間鋪面出租，包括兩個院子，所以按當時的土改政策，劃成了地主。

????老威：你家有多少土地？

????郭正洪：你指自家耕地？沒有。祖祖輩輩都沒有。田地屬於喇嘛寺，在麗江地區有 5 大寺，周圍的農民世代都從寺僧手中租地種，然後向他們交租子。當然，直接用新糧交租也可以。拉市壩的指雲寺你可曉得？當年我們就是給指雲寺交租。

????老威：指雲寺的名氣太大了，仲巴活佛經常光顧嘛。去年中共政府指定的轉世班禪由仲巴活佛護駕，也來到指雲寺。當日慘霧愁雲，辟哩啪啦下了好大一陣冰雹，我住的院子裏一片白，櫻桃樹葉子全打沒了。

????郭正洪：我家從指雲寺租賃了六、七畝，另外還在我姐夫（也劃爲地主）手裏佃了幾畝，所以總共有十一、二畝自耕地。

????老威：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積，你家也够不上地主啊。

????郭正洪：但農忙和收割時，我家請過長、短幫工，這又是劃地主和富農的一條杠杠。

????老威：如此推測，石鼓的剝削階級不算少。

????郭正洪：不止 20 多戶吧，幾乎都是世代的石鼓人，辛辛苦苦積累了一點家底的。而貧雇農都是沒住兩年的外來戶，人人都在尋覓發財機會，一土改，果然就雞犬升天了。其實呢，大家都是苦命，地富分子也就是一種上綱上綫的說法，國民黨跑了，共產黨來了，爲了顯示自己的厲害，不是換湯不換藥，就要鬧翻身。我琢磨著，這翻身嘛，跟翻地差不多，原先壓在下面的不太見光的土，一鋤一鋤翻上來，見光過多的土，一鋤一鋤翻下去，要長莊稼，就

得年復一年折騰囉。可婦女鬧翻身是咋回事？幾千年受壓迫？不就是幾千年受壓迫嗎？難道還要翻到男人身上去？

????老威：老人家很幽默。

.....

郭正洪：1951 年，清匪反霸過了，減租退押當中。當時糧食大漲價，政府命令我家交公糧，一年 9000 多斤的定額，給不起，就把家裏所有東西都拿去變賣抵押，值錢的，不值錢的。先是首飾、細軟，後是桌子、板凳、床。櫃子上的銅扣忍痛撬下來交了，過一陣，實在沒法，才交整個櫃子。唉，門檻都交了，農民協會還不罷休，將我母親連鬥三天三夜，跪倒壓杠子，昏過去也打，醒來也打，就是不准合眼。

????老威：當時你母親多大？

????郭正洪：59 歲。

????老威：算老人了。

????郭正洪：管你老不老，擠幹為止。本來按政策，我家是自耕土地，每年要向指雲寺交租，頂破天也就劃個富農。可工作組是外來的，不瞭解情況，一切就任由貧雇農主席團宰割了。地主帽子亂套，你不承認就暴打，還問你：爲啥不老實？人畢竟是血肉之軀嘛。我父親一直關了大半年，等到地主帽子戴實了，才放出來。

????老威：劃階級有硬杠啊。

????郭正洪：不錯，對富農實行徵收，對地主實行沒收。所以多劃地主對大家來說，意味著多分財產。窮人咋能不積極？鬥垮你，你的就變爲我的。毛澤東指示可以過左，啥子叫過左？就是够不著地主，可以通過鬥爭，搞成地主。當時我有個堂妹在區委工作，曾摸黑回家找到我：二哥哟，人家說啥都認賬囉，運動中過左，哪怕弄死人，大方向都是正確的。

????老威：你沒挨鬥吧？

????郭正洪：沒有，上頭有父母頂缸嘛。土改時，我已輪成窮光蛋，家徒四壁了，但作爲地主子女，仍要背整個大家庭的黑鍋。

????老威：聽說你曾被勞改？

????郭正洪：那是 1957 年反右期間了。

????老威：農村也反右嗎？

????郭正洪：城裏反右，農村組織學《人民日報》，沒右派？就把四類分子弄來鬥爭，算解放前的舊帳。我和張進謙就在這個時候被揪出來……

????老威：我記起來了，你就是張進謙提過的那個膽小鬼老表。你經不住恐嚇，把啥子陳穀子爛芝麻都坦白了，政府却沒有從寬……

????郭正洪：這老狗還說了我些啥？

????老威：他還說你一直都在抖，抖，尿都抖褲襠裏了。

????郭正洪：哼，他狗膽包天，他抵賴到頭，差點叫打死逮了，刑也沒見比我少判。

????老威：聽說他扇了法官一耳光？

????郭正洪：可轉過來就多挨了幾百拳頭。

????老威：他的罪名呢？

????郭正洪：除了參加國民黨和“放水淹秧田”，還有他老子張永生縱子行凶，唆使張進謙本人毆打貧農李繼魁致殘。

????老威：張進謙了不得哦。

????郭正洪：那是十幾年前，張進謙十幾歲的時候，他家裏的花牯牛跑丟了，他就山溝鑽來鑽去地尋，急得滿頭大汗。正巧碰上李繼魁坐在路邊石頭上要，他就拉住問牛的下落，不料李繼魁根本不買賬，還開玩笑：這陣你找牛，隔會兒牛找你。張進謙氣慘了，就飛起踢他一脚。

????老威：姓李的滾下溝了？

????郭正洪：沒有。他從小就是個瘸子。

????老威：哪“致殘”罪名咋個貼得上？

????郭正洪：有人揭發，就貼得上。嘿嘿，張進謙這輩子，吃虧就在脾氣壞，強出頭，死不認輸。

????老威：你呢？

????郭正洪：我？罪名比他還嚇人：充壯丁，幫國民黨打共產黨算一條；倒賣槍支彈藥和鴉片烟算一條；通匪算一條。

????老威：如此罪大惡極，該槍斃了。

????郭正洪：瞎雞巴編嘛，不承認就吊起打。我說當壯丁連槍都沒放過，逃回來幾乎就變乞丐了，誰相信？槍支沒販過，匪沒通過，鴉片烟嘛，從麗江到中甸，是人都販過的，因為解放前，這方水土盛產這東西，差不多當作貨幣在流通。可是張進謙稀巴爛的狗頭榜樣在眼前，我的身子骨遠沒他結實，統統不認賬，肯定叫亂棍打死。哎哟，熬不過就認嘛，公審會一開，麗江縣法院判的，他抗拒從嚴，8年；我坦白從寬，7年。

????老威：沒多大區別啊。

????郭正洪：皮肉少吃苦囉。我跟張進謙一起長大，一起當地主子女，一起判刑，一起勞改。日他媽的土改！我在國民黨手頭，受够了窩囊氣，到了共產黨手頭，反而是剝削階級！活到80幾，盡在受剝削，現在都撐起一把老骨頭下苦力。我日他媽的土改！

????老威：你倆的命運差不多，可你們的身板都硬朗。

????郭正洪：張進謙嘛，有時蠢到家，有時又精到頭。我們一道蹲看守所，下勞改隊，在米厘銅廠，狗日的經常裝病，逃避下井；到了長水銅廠，又搞成反改造尖子，人人都不相信他活得出來。嘿嘿，他硬是有9條命呢，現在還搖身一變，享受離休待遇了。

????老威：你似乎還不太服氣。

????郭正洪：我和他都當過國民黨的兵，可他太能折騰，一出來就東跑西顛地告狀，居然撞進邊縱副司令朱家壁家裏去喊冤，去要待遇。臉皮太厚了。

????老威：不能這麼說人哦。

????郭正洪：總之，張進謙是出了名的“八張嘴”，從石鼓到勞改隊，沒有人能辯過他。所以朱家壁一聽他是邊縱7支隊的兵，就同病相憐，親自出頭幫他恢復黨籍，落實組織關係。因為邊縱被打成“土匪武裝”，大夥死的死、亡的亡，朱家壁雖為中將，也含冤幾十年，直到80年代平反，已經風燭殘年了。這張進謙撿了個大便宜，第一個就跑我家來報喜。本是一個槽裏拱食的豬，轉眼間他的級別也高了，水平也高了，硬是飛黃騰達，忘了自己爹媽是誰，也忘了眼前站著知根知底的老郭。還邊喝酒邊給我唾沫橫飛地亂吹，說啥子我的平反也包在他身上！給地富分子摘帽是中央的政策嘛，平反冤假錯案也是中央的政策嘛，毛澤東死了，鄧小平出山嘛，跟你小小張進謙有雞巴關係？你能左右國家的大形勢？

????老威：你沒必要較真嘛。

????郭正洪：窮途潦倒就來找我，還說我沾他的光。這一次，我沒對他客氣，我們大吵了一架。我說：姓張的，我以前咋從來沒聽說你是地下黨？他楞了一下，我又說：你因為作風問題，從維西電臺被部隊資遣回家，啥子都抹光了嘛。他氣瘋了：與自己的娃娃親婆娘約了幾次會，就是作風問題？還不是因為他媽的地主家庭牽連！政治迫害！懂不懂？

????老威：你們翻臉了？

????郭正洪：沒有他張進謙，我也平了反，不實之詞全推倒。

????老威：依你的性格，勞改不會吃啥子虧。

????郭正洪：1964年我就刑滿，遭強迫留場就業。

????老威：勞改犯人和就業人員有啥子區別？



???郭正洪：一個叫犯人一個叫職工。到了文革，又沒區別了，統稱“反動派”。挖煤、修鐵路、搞建築，我換的單位不比張進謙少，直到 1985 年，才算正式退休。

???老威：平反補發了多少錢？

???郭正洪：沒有一文錢。

補白：過去兩年多的下鄉採訪，我們發現一個非常不幸的現象：地主後代的配偶幾乎都有大小不同的殘疾，他們的後代很多也有先天性缺憾。最典型的是阿發，父母是地主，因熬不住日夜批鬥，1952 年雙雙懸梁自盡，留下他們兄妹三人相依為命。1973 年經好心人介紹，阿發娶了一個先天性肢體不全的女子做老婆。生的兩個女兒倒沒什麼，但兒子却是自閉症患者。土改使成千上萬的地主成為階級敵人，他們的後代成為賤民，處處低人一等，受盡侮辱。相同的勞作，得不到相同的工分。購物分配，貧下中農不要了，才有資格分到一點。與人衝突，不管你是對是錯，你是地主出身就是你錯。你想建房子，村裏也不會分配土地給你。

劉文彩水牢真相 馬成廣

在劉文彩地主莊園陳列館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于水牢。水牢解說詞稱：劉文彩在佛堂側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後全部被殺害了。勞動模範冷月英是惟一僥幸從水牢裏活著出來的人。 ???

冷月英演講的水牢故事有多種版本。一時說她是 1943 年被關進劉文彩水牢的，一時說她早在 1937 年就被關進了劉文彩水牢。

從 1981 年開始，陳列館派出專人，採訪了 70 多名知情者，翻閱了大量文史檔案。經過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證一個也沒找到，物證一樣也不見。莊園陳列館向主管部門送呈的《關於“水牢”的報告》稱：綜合我們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據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說，據說是在 1951 年的一次會議上。冷月英說：“1943 年，我因欠了地主劉伯華五鬥租穀，剛生孩子 3 天，就被蒙上眼睛拋進了劉家水牢關了 7 天 7 夜。” 1954 年元月，大邑縣舉辦農業合作化展覽，以實物模型為主，配以圖片解說。他們根據劉伯華是劉文彩的親侄兒，提出了冷月英坐劉文彩家水牢的設計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門認可。籌辦人員按此設想進行“布景”。

1958 年莊園陳列館建館，主管部門全盤照搬 1954 年製作的劉文彩水牢模型，并給本來空空如也的劉文彩老公館西側的那間原本是存放鴉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製作了鐵囚籠、三角釘等刑具，然後向社會開放。冷月英也開始到處聲討劉文彩的滔天罪行。後來有記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絕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脫口而出：“你們追著我問什麼？又不是我要那樣講的，是縣委要我那樣講的。” ???

1988 年，四川有關部門下達了“水牢恢復為鴉片烟庫原狀”的復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幹了，鐵籠搬走了，地下室門口挂上一塊“鴉片烟室”的木牌。 ???

劉文彩莊園是當年曾統管宜賓地區鹽務和稅務的劉文彩巧取豪奪積累的巨額財富之一。與山西的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劉文彩莊園無論是建築面積(加上劉文彩為其弟劉文輝所建的連片莊園共三處)，還是奢華程度(劉文彩的睡床勝過清朝皇帝的龍床)，都創下了地主莊園之最。

最近去參觀泥塑《收租院》，講解員帶我到一個倉庫一樣的地方，說所謂劉文彩的水牢，實際是個潤烟池。劉文彩當年除了當鹽官和稅官撈取大錢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還大肆販賣鴉片烟土。大烟怕乾燥，大批烟貨運進後，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潤著，以確保質量和分量。解放後，中共接管了這座莊園，也沒有聽說這兒有水牢。後來，一部分人在極左思潮影響下，

硬是把潤烟池毀掉，又加深加寬挖了一下，建成一處“水牢”。改革開放後，爲了還原真實的歷史，又把水牢毀掉，恢復了原來潤烟池的模樣。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這處潤烟池，很像農村一家一戶用的菜窖，只不過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

補白：我有個詩友，今年 88 歲。他有過一次驚心動魄的“陪斃”經歷。1950 年，他在地工作，聽說父親在家鄉被定爲惡霸地主，很是驚訝，於是回家鄉打聽情況，結果他自己這個地主仔也莫名其妙被抓了進去。“進監第二天，有三位地主被綁出去槍斃，連我也被綁了去，當時我的心早就死了。沒想到，幾響槍聲過後，我毫髮未傷，原來我是陪斃。”我們家鄉有一個叫林游松的小地主，大約每年有幾十石糧的田租可收。1949 年前夕，他知道變天了，地主沒好日子過了，就跑到香港躲起來。住了一段時間，從一次偶然的談話中得知，香港海關大樓一條水泥柱的價錢就值 30 石糧，他就想：我每年的田租還不值人家一條紅毛土柱（我們家鄉人將水泥叫做紅毛土，意爲外國人的土），算什麼地主呢？於是又從香港跑回來。結果被逮個正著，後來被槍斃了。

康生縱容亂打亂殺 佚 名

1947 年我在山西臨縣擔任縣委副書記。3 月，康生到臨縣搞土地改革試點。一開始他就說：“你們這個黨（指臨縣縣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晉綏分區制定的《劃分階級成分》的小冊子，把本無剝削或只有輕微剝削的大批勞動者定爲地富分子，提出：“群眾要怎樣辦就怎樣辦。”實際上是康生和工作團某些人想怎麼辦就怎麼辦。康生把大批出身農民的幹部扣上“地主的立場，富農的感情”的帽子，對出身剝削階級的黨員幹部，輕則誣爲“立場未變”，重則誣爲“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試點的五區郝家坡，鬥爭小學教師劉榮昌之妻。在扯掉所謂地主婆的劉妻上衣時，康生笑得前仰後合。當地習俗，無論怎樣死的人，死時都要穿上新衣裳。上臺被鬥，等於就死。尤其是女性，被鬥前都把好衣服穿在裏面。

康生大笑，在場的人都不知何故。散會後，他把各村工作組長留下，問大家剛才發現了什麼？誰也回答不上來。康說：“地主婆裏邊穿著又好又新的衣服，說明老區大部分地主土地以減租等鬥爭方式轉移到農民手裏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價把土地賣給農民，一部分白洋投資工商業，換個辦法剝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據康生的這一發現，馬上發明了挖地財。凡定爲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財”，否則將被非刑拷打。當時，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較富裕的幹部也都在劫難逃。這一招，又導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縣共死亡 780 多人，其中地富分子 190 多人，幹部、黨員和群眾 580 多人，爲地富的三倍。

康生在臨縣一手造成了亂打亂殺的嚴重情況，激起群眾抵制。當時如果不是很多有覺悟的農民和堅持原則的幹部對好人設法加以保護，後果會更加嚴重。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時任邊區參議員、行署建設處長（相當於廳長）。還在土改點面結合階段，未經邊區派駐三交鎮土改工作團副團長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關了起來。在不得已的形勢下，我在各組組長會上提出鬥爭會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過了幾天，我被調離。後來副團長康乃爾告訴我：鬥樊的大會開始後，好一陣沒人訴苦，氣得一位小組長跑到人群中，用腳對一位中年婦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她沖上去打鬥。這位婦女把正在納鞋底的針和麻線纏在鞋底上，一隻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亂的頭髮，從從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開，作出打人的架勢，但當鞋底接近樊的臉時，力量大減，輕輕靠了樊的臉一下，同時罵一聲：“你再剝削。”會場上再無動靜，沒等宣布散會，大夥就三三兩兩回家去了。

三專署專員高聞天原為臨縣縣長，在臨縣減租減息和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康生等人斥責高和我是“右得要死”。高聞天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地主，實際應是富農。土改開始後，邊區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長不知聽到什麼人的胡言，在一次大會上說：“三分區專員高聞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幾天，高就身背行李經過臨縣去邊區黨校接受審查去了。後來趙林（時為晉綏分局城工部長，派在臨縣當土改工作團團長）召集縣委、工作團副團長聯席會議討論高的問題。有兩位縣委委員認為，高的問題很嚴重，至少是立場上的嚴重問題。我說要根據事實。

過幾天，趙林單獨問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說：“1942、43 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糧，區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國押送縣府。當時的縣長高聞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糧再釋放。司法科長找我說，照高縣長這麼辦，看守所擴大幾倍也關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糧的人。我說，我們都應理解縣長的難處。”趙聽後點了點頭。

高聞天的老家土改時，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審查。一天，縣委、縣工作團正在開會，高所在村來了四位老農，把我叫出院子，以質問的口氣說：“你們準備把高專員怎麼辦？”我心裏很踏實，對他們說：“聞天同志的事，會按照黨的政策解決，你們放心。”他們握著我的手說：“他為革命坐監時（1935 年冬，閻錫山的省政府說高是共產黨員，把他打入死囚牢，後被各界人士營救出獄），你大概還沒有入黨。對他亂處治，我們心裏……”他們哽咽地說不下去了。高聞天回村後，全村農民對他愛護備至，吃住等事貧農團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審查結果證明，高是一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

1947 年冬，我去五區窑頭村土改。當年徵收夏糧時已把成分劃定，土改鬥爭結束，“挖浮財”果實累累。我幾次向貧農團提議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會決定，却無人表態。不久，趙林叫我回縣，原來是毛主席派胡喬木帶來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小冊子。我仔細閱讀後，心裏有了底。征得喬木、趙林同意，我連夜趕回村裏，在少數貧農代表中宣讀了小冊子，要求審查該村地富分子的成分劃分。大家聽得入了神，有的問：“這樣好的條條，你怎麼不早說呀？”參加會議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對一對。當晚，得出了初步意見，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 28% 按照《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規定降為 8.6%。天快亮了，人們還不走。有的對我說，你幾次提議研究分果實，我們就是不動手，因為心裏不踏實。這說明這批覺悟高的農民，沒有被果實多所動。

補白：2006 年 7 月 13 日，我到廣東某地開會，順便參觀了一個藏在山旮旯裏的村莊。這個村莊裏一大戶人家的老房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房屋主人是一位七十開外的老伯。他說，這座房是他的祖先從南洋背回二十萬塊大洋建造的，至今從這所房子裏走出去的族人就有一千七百多人，有不少後人在海外謀生。我看到房屋的外牆還遺留著文化大革命或土改時期寫的兩條標語。一條是“向地主惡霸總清算”，另一條是“不准地主惡霸抬頭，只許窮苦人民翻身”。老伯告訴我，這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寫的，之所以至今也沒清理，是想把它留住下來做個紀念，警誡後人。

#### 道縣殺人一例 賈 月

1967 年 8 月 26 日，一個漆黑的夜晚，湖南省道縣的源山溝的濫殺無辜在繼續進行。周群，一位有三個孩子的母親，橫嶺中心小學教師。其丈夫蔣漢正原來是她的同事，因為是地主崽子，去年被清理出教師隊伍，回農村勞動改造。丈夫被抓走批鬥，周群一直提心吊膽，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伴著 3 個孩子進入夢鄉。

忽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她驚醒。她還未穿好衣服，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一群人已闖進屋裏。他們凶神惡煞似的吼叫道：“起來，起來，開會去！”“帶好弟弟妹

妹，媽媽一會兒就回來。”離家前，周群又跑回床邊，對被嚇哭的大兒子說。

當她被推到禾場時，只見火光熊熊，幾十個民兵個個手拿馬刀或鳥槍，如狼似虎而立。火光下，她看到了丈夫，被鐵絲緊緊地捆著，還有 14 個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個個戰戰兢兢。

周群聽見有人對支書說：“蔣漢正還有三個崽仔呢。”於是，黨支書又到周群家，把三個哇哇大哭的孩子也拖到了禾場上。

這時開始出發。周群雖然是貧農出身，因為是地主崽子的媳婦，也被捆起了雙手。三個孩子跟在後面不住啼哭。周群以為要被押到區裏去，但到木楓山，支書唐興浩下令停止前進，就地集中。唐興浩威風凜凜，高聲宣布：“我們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判你們死刑！”處決的方法叫做“丟硝眼”，即從洞口推下布滿筍石、深不見底的溶洞。

開始行刑！支書唐興浩點一個名，民兵牽過去一名死囚丟進溶洞。點到蔣漢正，兩個民兵大漢象拖來一隻將要屠宰的羔羊。蔣漢正沒有反抗，也無力反抗，淒楚的眼神望著可憐的妻子、兒女。

“爸爸！爸爸！”兒女們死命地哭喊。周群瘋也似地想撲上去，但被強盜似的大漢惡狠狠地推了回去。

周群是支書唐興浩點到的第八個名字。三個小兒女“媽媽媽媽”的哭喊，淒慘欲絕，令在場的每個人心顫。虎狼惡漢凶狠地推開了孩子。周群沒有哭，她不能在孩子面前哭，她哄孩子說：“媽媽一會就回來。”

硝眼洞口，涼風嗖嗖，黑古隆咚，陰氣瘮人。

“跪下！”兩條惡漢將周群按到地上，對準後腦殼一根鋼釵打下去，跟著飛起一脚，把周群踢進黑洞。

不知過了多久，周群聽見“媽媽”的叫聲，醒了過來。原來，她的三個兒女連同一個四歲的狗崽子小女孩也被扔下了硝眼。因為有人墊底，他們都沒有死。大女兒給中周群解開了捆手的麻繩。

第二天，有人往硝眼裏扔石頭。周群和大女兒連滾帶爬躲避，跌到了底層。周群驚异地發現，丈夫和另兩個孩子都在這裏。在死人堆裏，他們一家竟然都活著！從洞外的地獄移到了洞裏的地獄，一家人又團聚了！

在黑古隆冬的地洞裏，一家人擁在一起，哭啊哭！却又不敢放聲哭。蔣漢正被鐵絲捆住，怎麼也解不開。

孩子不住地喊渴喊餓。周群五內俱焚，却萬般無奈。蔣漢正已精神失常，喉頭不斷蠕動，嘴裏念念有詞。周群抓住丈夫：“漢正，你清醒一點，清醒一點！”蔣漢正立刻默不作聲，直挺挺地倒下去。不知過了幾天，孩子們漸漸不動。

大兒子先去了，小兒子也死了，大女兒也死了。奄奄一息的蔣漢正要水喝。周群脫下一件衣服，在水裏浸濕，擰水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幾下，沒有咽下水，頭一歪，也死了。

在洞中地獄裏團聚的一家五口，只剩下了周群一人。最後，周群被兩個學生救了出來。她在黑洞裏過了整整七天七夜。但是，周群從洞中地獄出來，到洞外仍是地獄，仍然繼續遭到追捕。

摘帽前後 同 年

我有一個小夥伴，名叫李茂，身體健壯，人也聰明，由于出身地主，經常受欺負。有一次大隊發毛主席像章，看到別的小孩都有，他也向民兵排長要。沒想到，民兵排長說他一個

地主羔子哪配戴毛主席像章，還扇他一巴掌。李茂的母親看到孩子挨打，心裏難過，就去找排長說說，結果也被民兵排長羞辱一頓。她說：“俺娘家又不是地主，我也不該隨便受欺負。”排長說：“你嫁給地主你就是地主，我們貧下中農就有權力欺負你，欺負你你也白看著。”李茂的母親氣得大病一場。

有一次隊裏栽的楊樹苗被人折斷幾棵，民兵排長暗中調查，幾個小孩指證說是李茂折的。這下不得了了。李茂先是被捆起來打，又被罰一百多斤糧食。他媽又差點兒氣死。楊樹苗實際上是狗子折斷的。狗子的大爺是民兵營長，村裏不敢惹，就拿李茂當替罪羊。李茂很倔強，打幾頓也沒招認。李茂上初中了，學校裏發展團員。他以為只要表現好就可以入團，沒成想老師說：“地主羔子還想入團？做夢娶媳婦，你想得怪美！”這個老師特別差勁，一到填表時就故意問李茂什麼成分。李茂一說是地主，就會引來一陣哄笑。

于是李茂就恨自己的爺爺，因為爺爺給地主家管過事。後來有老人告訴他：“你爺爺很好。他本人也是長工，只因老實、賣力，地主家就讓他管點事。他也很會過，省吃儉用攢點錢，買了幾十畝地，到解放後就被劃成地主了。他又沒幹過壞事。有的人家本該劃成地主，結果吸上大烟，把地賣完了，解放時反而劃成了貧農。很多人家是不該劃成地主的，像河工弟兄幾個，只因爲他哥當過國民黨的一個小官，結果都被劃進去了，你虧也沒有辦法。你恨你爺爺是不應該的，他是個好人啊！”後來李茂迷上武術，日夜苦練，練得筋骨強壯，力大無窮，一氣能翻幾十個石滾。

地主摘帽以後，地主和貧下中農一下子都適應不了：欺負過地主的人擔心地主報復，地主擔心不老實會重新戴上地主帽子。一時間大家相安無事。後來聽說鄧小平出來工作了，貧下中農接受不了。再後來聽說劉少奇平反了，一些人更是接受不了。他們想：壞人咋能一下子變成了好人呢？看來世道變了，估計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再後來，市場開放了，土地承包了。

李茂看看形勢，估計天不會變了，就開了打面房。生意很好，賺的錢也多了，願意嫁給他的人家也不斷托人說媒。有了錢，李茂不再低三下四。于是有人造謠說，表現不好的地主還會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李茂聽了笑了笑說：“要想再回到過去，除非一個人從棺材裏坐起來。可惜啊，他永遠起不來了。”有一天，羞辱過他的那個老師來打面，李茂不願意給他打。那個老師說：“我打面又不是不給錢。”李茂說：“你給錢我也不給你打。”說罷，李茂掏出一棵烟獨自抽起來了。那個老師臉上很挂不住，恐怕再多說會自找難看，就默默把糧食帶走了。李茂望著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

有一次鄰村放電影，李茂看了半截覺得沒意思，就回來了。走到半路上，他感覺自己的棉花地裏有人。他不知是幹什麼的，就悄悄蹲在地頭。過了一會，他明白了，是有人偷他家的棉花。李茂沖了過去，偷棉花的想跑已經來不及了。結果三個人都被李茂打得躺在地上，李茂的拳頭多硬啊！他苦練多年還從來沒用過呢。他拿出手電筒一照，驚呆了，沒想到偷棉花的竟是我村的人，也沒想到會是原來屢次欺侮他的民兵排長和他的老婆、弟媳婦。李茂這時明白了：怪不得這幾個人挨打不出聲。這時，棉花地裏來了很多，李茂說：“老少爺們都在，我可沒有冤枉你們吧。都是幾十幾的人了，這樣做不合適吧。走吧，把棉花給我背回去。大家都在，其他的我也不說了。”結果，民兵排長回到家十幾天沒出門，丟人啊！回想過去自己做的事，慚愧啊。

後來有人跟李茂說：“像民兵排長這樣的孬貨，你應該狠勁揍。揍過了再送到派出所。想當年他是怎樣欺負你的，你不能忘了。”李茂說：“過去的都算了，這也不能全怪他，這應該是時代的錯誤。想當年，國家主席、開國元勳都能被整死。現在讓他欺負咱他也不敢。像咱三叔做的就不對，過去欺負過他的人都被他揍了一遍，這又何必呢？欺負過我的人，現在我不找他們的事，他們還害怕呢。我就是找藉口一人揍他一頓又有啥意思？過去他們不該這樣做，現在咱也不該這樣做。他們不仁，咱們不能不義。都是同族同宗鄉里鄉親，過去的

都讓它過去吧。你看排長見我那個猥瑣樣，我可以罵他幾句說他幾句，那又有啥意思。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初他要是知道有今天，那時他會那麼猖狂啊？上次咱老師來打面，我就不該搞他難看。他過去沒意思，咱現在不能沒意思。現在，我最遺憾的是當時沒好好學習。不然，也跟勞動（本文作者，我）一起考上大學了。現在咱也不錯，房子蓋起來了，你嫂子也是這幾個莊有名的美人。我已經知足了。原來我就想，咱們肯定和長春、老廣他們一樣，一輩子打光棍——地主羔子，誰敢嫁給咱啊！現在看來，天是不會變了，咱們也好好過日子吧！”

補白：解放了，農會抄家，家裏曾經請過的長工翻身做主後，窮盡其能地折磨我祖父母。我父親考上哈工大，家不敢回，是大伯父偷偷送點錢給他，才有去上學的路費。父親是靠二姑媽接濟讀完大學的。哈爾濱冬天很冷，實在受不了，父親就在身上裹上牛皮紙。大學苦讀四年，又專修一年俄語，可這時中蘇斷交了，父親到蘇聯留學將來當建築師的夢想破滅了。父親身高有 174cm，風華正茂，俊朗儒雅，英氣逼人，是單位絕對的男 1 號。可是一個地主崽子，一頂臭老九的帽子，心儀他的姑娘最後還是離開了他。後經人介紹，和我母親結婚了。母親身高只有 150cm，胖胖的身段，容貌非常普通。她非常愛父親，可結婚不到一年，父親就以專業對口的名義調走了，寧願選擇一個人漂泊在外的生活。

一定把官當到廳級 劉加民

地主羔子一詞始于文革。此詞字面上沒有什麼太大的貶意，實際上却是一種極大的污辱，有著極強的殺傷力，給地富後代造成的心靈傷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 我是個地主羔子，我也有很多地主羔子朋友。其中一位現在北京工作，是有名的教育專家，曾被評為優秀黨員、勞動模範，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過他。文革期間有一天，貧協主任到學校給學生髮桃子，大家全都有，唯獨不給他。當時他不到十歲。不給也就罷了，還指著他的鼻子說：“就是不給你這個地主羔子！”然後領著學生們高喊：“打倒地富反壞右，我們和地主羔子勢不兩立！”

我這位朋友告訴我，那個時代他從來不敢抬頭走路。一抬頭走路，就有同學站出來罵他：“你個地主羔子也敢趾高氣揚？”平時不敢當著別人的面大笑，一笑就有同學站出來說：“你個地主羔子怎麼那麼高興啊？你想反攻倒算是不是？”他說那時他幾乎天天夜裏做惡夢，夢中有很多貧下中農子女不是抬著他往水庫裏扔，就是一齊把他往油鍋裏按，有時候還用刀子一點一點割他的肉。他總是在大聲喊叫中醒來，醒後渾身都是冷汗。

這些受到傷害的地主羔子，後來和貧下中農子女一樣進入到共產黨的機關，成為政府官員，早年遭受的那些心靈創傷一直影響著他們的後來。有個地主羔子對我說，他一定要把官當到地市級，不然對不起在文革中被人打死的爺爺。一個女地主羔子嫁了個當官的男地主羔子，曾經的共同經歷使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感情。但是後來，男的為了進一步高升，周旋于可以給他提供幫助的幾個女人之間；女的為了丈夫把官當大，委身于幾位上級領導，最後這對夫妻發生了悲劇。

花橋鄉的土改 蘇 人

我作為 Z 縣新政府的一名通工作人員，被派到該縣花橋鄉參加土改。前清的舉人兄弟沈韶九、沈修五和實業家沈芷人就是花橋人。沈氏一家兩兄弟都考取舉人，是前不見古人後

不見來者，很了不起。沈芷人是沈韶九的兒子，留學法蘭西和比利時八年，獲兩個博士一個碩士學位，回國後成為著名的實業家，解放前去了馬來西亞。土改期間，我們就住在沈家大院。此時沈家已被劃為地主，逐出本宅，其院作為勝利果實分給了農民。

沈家世代書香，祖祖輩輩的藏書和沈芷人從海外購回的各種書籍不可勝數，藏滿幾大間樓房，抵得過一個圖書館。新搬進沈家院子的二三十戶翻身農民，不知是得了什麼指示，還是遷怒于那些書籍，竟全體總動員以沈家藏書燒鍋做飯、煮豬食。他們用大背篋將書背到灶屋當柴燒，燒完了又去背。那段時間他們像完成任務一樣地燒書，其他燃料都不用了，就燒書。一日三餐，加上煮豬食，完全靠書做燃料。農民的鍋一般都是擔水鍋或三水鍋（能盛一擔水或三桶水的鍋），要把那麼大一鍋水燒沸，把飯和豬食煮熟，是需要很多燃料的。一家每天要燒多少書？一個大院每天要燒多少書？

我在沈家院子住了倆月。在整整兩個月裏，農民們一天不停地燒書，才終於將沈氏世代藏書燒完。為了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我主動到一戶農民家裏去幫忙燒火煮飯，這樣我才知道他們完全在用書做燃料。我實在是太吃驚了！

在灶屋凌亂的書堆裏隨手翻了翻，我發現有《萬有文庫》、《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等重要典籍。隨手又抽出一本，竟是《廣益叢報》，我不禁喜出望外。小時候常聽父親提起《廣益叢報》，說傳世不多，極有收藏價值。想不到第一次見到《廣益叢刊》，竟是在它即將被焚燒的時刻。

趁人不在，我共翻找到四本《廣益叢刊》，記得其中一本上記有溫宗堯出使西藏到達拉薩的新聞。我將四本《廣益叢書》暗暗藏在一邊。這時主人來了，我裝著什麼也沒有發生，繼續往灶里加書。主人很客氣地接過火鉗讓我休息，邊燒書邊笑著說：“這些書燒了好，地主就是把書讀多了才害人，我們要燒掉這些害人的傢伙。只是這些書不亮火，烟子大，還是沒有燒柴好。”後來文革中說“知識越多越反動”，看來直接源于 15 年前的“書讀多了害人”的觀念。

我也是讀書人家出身，看到天天這樣燒書，心裏很難受却又不說。有一次我試著跟村長淡淡地說：“燒書煮飯烟子太大容易熏壞眼睛，怎麼不燒柴呀？”村長呆呆地望著我，一言不發。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說什麼。有什麼法子呢，他是個石匠，目不識丁。

那四本《廣益叢刊》我後來悄悄帶回 Z 縣城家中。父親見了非常高興，如獲至寶，愛不釋手。可惜到了文革，四本《廣益叢刊》依然難逃劫難，和我家的大量藏書一起被付之一炬，化為灰燼。

花橋附近一個村裏，有一個我認識的女人，40 歲左右，叫李善厚，解放前在 Z 縣女子中學任音樂教師。其夫叫沈仲元，其女沈學樸是花橋小學的教師。群眾天天把李善厚拉出去鬥爭，而且是扒下衣服，赤著身子跪在寒風中挨鬥。她的衣服經過反復撕扯，已經破爛不堪，後來她索性就只穿一件單衣來接受鬥爭。

這一天，她又被拉出來跪著挨鬥。農民們涌上去一把將那件破爛單衣扯了下來，李善厚一身白晰的皮膚和兩個乳房便呈現在眾人面前。她早已顧不得羞耻了。此時是數九寒冬，農民們大多提著取暖的烘籠。李善厚本是漂亮、嬌氣的音樂教師，如何受得了這樣的嚴寒！可是他們却惟恐她冷得不够，幾個身強力壯的青年人轉身提來事先準備好的從水田裏撈起的冰冷的稀泥，七手八腳抹到李善厚赤裸的身上。這還不够，另有人抬來一架風車，對準李善厚，抓住手柄一陣狂搖。風呼呼吹向赤身糊滿稀泥的李善厚。這還不够，還有幾個人手執大斗笠前來助戰，將李團團圍住，一起舞動大斗笠向她扇風。

這時口號響起來了，整個院子裏的人都一起狂呼：“打倒頑固地主李善厚！”村長也上前怒喝：“快把金銀交出來，不交是過不了關的！”說也奇怪，這樣反復鬥爭了很多天，李善厚雖然每次都凍得臉青面黑全身哆嗦却竟然沒有病倒。

積極分子們見李善厚一直不交金銀，又心生一計，把她在花橋小學當老師的女兒沈學朴通知過來，讓沈學樸打通她的思想。那時地主子女都必須和父母劃清界限，否則就會遭殃。沈學樸帶著一口箱子（她惟一的財產）回來了。此時院壩裏已坐滿了群眾，鬥爭大會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代表工作組和沈學樸談話，問她母親究竟有沒有金銀。想不到她竟很爽快地一口回答：“有金銀！”我們便要她動員李善厚交出金銀。我這裏正在慢慢給她談話，外邊的群眾却大聲怒吼起來：“把李善厚拖出來！不聽沈學樸的花言巧語！”隨即李善厚就被拖出去跪在地壩裏。

這時驚人的一幕發生了！

只見沈學樸怒目圓睜走出去，指著跪在地下的母親大聲說：“我不是你的女兒，我是農民養大的！”李善厚大驚，仰起頭來用疑惑的目光看著自己的女兒。趁母親抬頭，沈學樸揮手居高臨下啪啪啪連甩母親幾個耳光，然後用腳一陣猛踢。李善厚發出聲聲慘叫，泪水滾滾而下。

沈學樸態度非常堅決地質問母親說：“你的金子為什麼還捨不得拿出來？”李善厚哭著說：“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哪來的金子啊？我以前也是教書的。兒啊，要有良心，不要只圖你自己掙得脫就亂說！”說著癱倒在地大哭起來。

沈學樸見母親在地上哭得滾來滾去，扭頭走了。

????一會兒，幾個積極分子把李善厚從地上拉起來，扒去衣服，又開始了抹稀泥、扇風車的鬥爭。幾天後的一個深夜，開罷大會，積極分子們留下來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已凌晨二三點了，忽然有人報告李善厚跑了。積極分子們急了，李善厚的金銀還沒挖出來，讓她跑了豈不是重大損失。於是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發動全村民兵和積極分子火速出動，開展大搜捕。

四野一片漆黑，李善厚能往哪里跑呢？人們有的打起燈籠火把，有的拿著電筒油燈，鋪天蓋地大搜索。山洞裏摸，河溝裏撈，到處都搜遍了，也沒有找到。

有人在李善厚的後媽的門前高叫：“找到李善厚的衣服了！”大家聞訊跑過去。不用說，肯定是後媽給李善厚換了衣服掩護她跑了。不由分說，後媽被押到辦公室拷問。後媽什麼也不說。由於她是貧農，也不能把她怎麼樣。約一小時後，她說家裏蒸有一籠米包子，準備明天趕場去花橋賣，時間長了怕鍋裏水燒幹，要回去看看。經同意後，她回家去了。

約半小時後，又有人大喊李善厚的後媽吊死了。大家趕去一看，果然已經懸梁自盡。這時天快亮了，隨後叫來幾個地主，草草埋了。她鍋裏果然蒸著一籠米包子，還是熱的，數一數，有 33 個，分給幾個抬尸的地主吃了。

李善厚到底是怎麼跑的，兩年後才真相大白。原來，李善厚見形勢嚴峻氣氛恐怖，總有一天要被凌辱致死。與其如此，不如鋌而走險，便和女兒沈學朴暗中策劃逃往重慶。沈學朴的弟弟那時在重慶公安局工作，到那裏去躲一躲。

女兒哪有不心痛母親的，沈學樸暗地裏早為母親流幹了眼泪。為了成功出逃，沈學樸為母親準備了衣服和路費，又偷偷仿刻了村長的私章，偽造了一張路條。後媽冒著極大的風險，一口答應幫助她們。她是個貧農，不受任何人監督，也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

出逃之夜，李善厚母女二人在後媽家換了衣服，抄小路趕往附近的精華鄉。夜幕沉沉，沒有人發現她們的行踪。惟一的疏忽是倉促之際將破衣服掉在了後媽門前。二人如同驚弓之鳥，一路扶携，在夜色中穿越崇山峻嶺，天亮時已經走出幾十裏路。沿途完全是崎嶇坎坷的羊腸小道，她們歷盡艱險，徒步走了 600 裏到重慶。

沈學樸在會上當眾痛罵踢打李善厚，只不過是母女二人為了掩人耳目上演的一場苦肉計。

????

????沈芷人先生是重慶著名實業家，在 Z 縣老家購置田產甚多。他不能回家理財，就委托花



橋人陳月軒管事。陳是有名的老中醫，精于岐黃之術。土改中，陳也是鬥爭對象，每天晚上照例被拉出來扒光衣服跪在地壩裏潑冷水抹稀泥扇風車。

天寒地凍，誰受得了如此折磨？陳月軒本是精通藥性之人，挨了幾天鬥爭後便心生一計。紅砒可以防禦冷水浸襲，于是便在每次挨鬥之前往身上抹紅砒。潑冷水的時候藥性發作，他正可以借此躲過一劫。積極分子們看陳月軒每次不論怎麼潑冷水都無所謂，也搞不清是怎麼回事。???

這一天，陳月軒照例抹了紅砒上場挨鬥，到該潑冷水的時候，藥性發作了，全身如火燒一般，可誰知積極分子們這天却不潑水了。他們已經感覺到這中間有什麼奧妙，要看個究竟。陳月軒熱不可當，等了很久也無人潑水，心急如焚，于是忍不住大叫：“拿水來呀！”如此一來，積極分子們反而越發不潑水了。一會兒藥性大發，燒得陳月軒皮肉發裂，滿地打滾，苦苦哀求潑水，落得積極分子們看了好一陣熱鬧。

????

????村裏有個地主的兒子叫沈聯航，剛重慶大學畢業。民兵捉拿逃亡地主，莫名其妙地把他也一起押回來了，并罰他交出黃谷 300 石。沈連航從小離家去重慶讀書，對家鄉的事情一無所知。要他交出 300 石黃穀，他看形勢很嚴峻，沒怎麼考慮就一口答應了。

晚上鬥地主，他被民兵帶到會場。看到其他地主跪成一排，他也主動跪下去和地主們一起挨鬥。他去哪裏找 300 石黃穀呢？民兵追得急，他害怕了，就謊稱縣城有熟人可以借錢。聽說能找到錢，馬上由民兵陳以洪押著他進城。從花橋到 Z 縣的漫漫崎嶇路，走了兩天才到。他們在城裏從東到西，又從西到東，哪里找得到熟人借錢。兩個人餓得肚子疼，錢却一分沒找到，只好賣掉衣服換飯吃。沈聯航的好衣服已經被當成勝利果實沒收了，身上穿的衣服破爛不堪，沒有人要。陳以洪不得已把自己稍好一點的棉衣賣了才填飽肚子。沈聯航為什麼要這樣欺騙民兵呢，原來他是想借機逃避鬥爭，得暫時的解脫。最後他因欺騙貧下中農遭到更嚴厲的打擊。

爲了壯聲勢，過一段時間要槍斃一批所謂罪大惡極的地主。這一天，花橋場上召開聲勢浩大的公審會。把幾個死刑犯的罪惡宣布後，行刑的民兵即上前將死刑犯的帽子或者頭巾摘掉，準備推出去執行槍決。死刑犯中有一個姓沈的地主，剛從拔山押解回來。此時他已無話可說，只等一死了。忽然人群中擠出一個人來，徑直走上台去對審判長說，剛才宣布的事實與沈某不符合，請求槍下留人。大家認得此人姓肖，解放前是個道士，成分貧農，爲人比較正直。會場一時鴉雀無聲，全場人都把眼光投向審判長。審判長馬上進行復查，果然查出沈某的案子有誤。原來民兵去拔山解押時搞錯了，被判死刑的是另一個姓沈的地主，關在拔山沒有押回。這一個沈姓的地主是判的五年徒刑，却被押回來執行槍決。由于肖道士挺身而出，在生死關頭將沈姓地主救了出來。不久，上級宣布停止鎮壓，所有死刑犯一律免死，那個被判死刑的沈姓地主也因此躲過一劫。兩個姓沈的地主，一個要斃的沒斃，一個不該斃的差一點斃了。生死之際，命懸一綫，亦屬傳奇。

補白：地主、地主婆一家垂頭喪氣地站著，村民們則自帶凳子圍坐一圈。首先勒令地主老實交代過去如何剝削農民，然後村民站出來揭發。孩子們也沒閑著，把地主的孩子（他們被稱爲地主仔）拉來批鬥，要地主仔趴著讓貧農的孩子當馬騎。過去你們地主把我爺爺爸爸當牛馬，現在我們解放了，輪到你給我們當牛馬了。

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初，占臺灣農村人口 11%的地主擁有土地 56%，88%的農民只占耕地 22%，近 40%的佃農和雇農無地。他們向地主繳納的地租，一般都在收穫總量的 50%以上，有的高達 70%。“封建剝削極其嚴酷，農民生活極端困苦，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農村經濟極其落後。”為了解決農民問題，蔣成立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由陳誠負責操作，于 1949-1953 年在臺灣開展土改運動。

臺灣土改是把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變為事實。蔣研究了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大陸的土改政策後得出結論：太平天國以絕對平均主義均田，是農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實現。大陸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地主土地財產，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陳誠決定“不以暴力手段奪富人之田為己有”，“不搶富濟貧”，“不實行激烈農民革命”，“實行溫和的社會主義改良”。

臺灣土改分三步推進。第一步是“三七五減租”。從法律條例限定租額，地租不得超過全年主產品收穫量的 37.5%，減輕農民的負擔。條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農按時納租，欠繳兩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領。從日本殖民者手中沒收的公地，全部用貸款方式賣給無地農民，土地所有權改變了，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 焦國標撰聯并書

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 年 7 月，臺灣當局大量徵購地主土地。臺灣政府頒布的《實施耕者有其田法條例》規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數額，超過部分一律由政府徵購轉賣給尚未獲得土地的農民。補償地主地價以生產品全年收穫量的 2.5 倍為標準。以實物土地債券（7 成）和公營企業股票（3 成）搭配補償。徵購後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總面積的 5%，自耕農成為臺灣農戶的主體，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臺灣土改最值得稱道的是“階級合作”式的辦法。“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決土地問題的法子，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地主的土地雖被徵收，但從中獲得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工商巨頭。

????70 年代臺灣經濟騰飛，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騰飛的基柱，實得益于 50 年代初之臺灣和平土改的成功。臺灣土改，地主農民各得其利，皆大歡喜；敵對階級握手言歡，實現共贏。反觀大陸土改，貧下中農爭先恐後瓜分地主浮財，無不笑逐顏開，都認為強占地主財產是一種革命行動。這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拿土豪劣紳的可以，不義之財，劫之無礙。”這種仇視地主的言行延續到 70 年代，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四清和文革等政治運動，地主及其子女被仇視和凌辱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很多地主子女在歷次運動中不堪受辱臥軌或投河自盡。

臺灣和平土改的成功，證明了從階級鬥爭到妥協，從階級敵對到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階級利益也并非是不可調和的。臺灣和平土改的成功，也意味著階級鬥爭學說的破產。 柏楊語/錢振選書

## 晉綏土改暴行種種 余 任

晉西北興縣有個出名的開明紳士叫劉象坤，是個熱心腸人，因為有財富，被當作惡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兒子為了表示自己與父親一刀兩斷，竟一把奪下民兵手裏帶刺刀的步槍，在其父尸體上補上兩刀。劉象坤哥哥劉少白（《毛選》第四卷有其名，毛認為的抗戰時期的開明紳士）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也被農民們押回老家鬥爭，撤消一切職務。該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為少白說了幾句公道話，也被打得昏死過去。眾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拖到黃河岸邊，準備扔進河裏，沒想到劉玉明又蘇醒過來。幾個土改積極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兩刀，他最終停止了呼吸為止。

興縣還有個名人叫牛友蘭，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選》，被毛認為是抗日愛國紳士。1948年毛路過晉綏時住的窑洞（即晉綏軍區司令部，現為蔡家崖革命紀念館）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戰中，他把房屋、店鋪、工廠、土地、金錢等值錢的財物全部捐獻出來，土改前已落得身無分文過苦日子。土改來時仍然在劫難逃。他曾是晉西北首富。鬥爭大會上，有人別出心裁，拿一根鐵絲穿過他的鼻子。鮮血直流，會場上人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是，他的兒子牛蔭冠（時任晉綏邊區行署副主任）竟大搖大擺地牽著其父游街示眾。牛友蘭受不了這種污辱打擊，回家後絕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終年 63 歲。

姚依林之妹姚錦女士編著的《姚依林百夕談》一書裏記載：“當時農民仇恨地主，往往一來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厲害。如搭個‘坐蔣台’，讓地主站上去，下邊拆臺，把地主摔下來。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蔭冠的父親是晉西北興縣首富、大地主兼工商業主，在縣城有四萬白洋買賣。他因是開明紳士，曾捐款一萬元抗戰，成為邊區參議會議員。土改到來後，他被鬥，用繩牽鼻，讓他的兒子牛蔭冠拉著游街，牛蔭冠不敢不劃清界綫。”

土改中，對付地主富農的辦法五花八門，慘絕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撲眼、耳朵插沾點燈之外，還有好多種。比如磨地，把棱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鬥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這上面來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

另一種辦法叫坐圪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裏面撒上剝碎的棗樹圪針，把被鬥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裏，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櫃裏的人從這邊滑到那邊，又從那邊滑到這邊，全身被圪針刺得肉腫皮爛。

還有一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長城的烽火臺，有三丈高。墩下鋪滿碎石頭，被鬥的人從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乾脆拿大石子朝他腦袋砸去，直到腦漿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個姓韓的教書先生，其妻被一個姓田的土改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將她摔死。田某還有意在推前鬆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褲子被沒收，轉手分給其他婦女穿。

一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腳朝前，被人拉著一路狂磨。他的身上還坐著一個女人，壓著一個石磨，為的是增加身體與地面的摩擦力。沒多久，後腦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來，一根一根的，腦漿與鮮血一路都是，慘不忍睹。

牛蔭冠晚年編寫的《牛蔭冠紀念集》中這樣寫道：“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

???王若飛的夫人李佩芝，從延安到晉綏邊區從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積極分子，有一個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為小偷小摸，曾被村裏一個富裕中農打過。土改時，此人公報私仇，把那富裕中農打死。

群眾對此不滿，李佩芝却回答說：“你們怎麼不懂得貧雇農的窮苦呢？正因為貧窮，所以才去偷東西。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階級界限。”此人極不爭氣，後又偷了軍區的一匹布，讓軍區給抓了起來，當做鬥爭對象押到會場。李佩芝端著碗飯送到會場給這個人吃，當即遭到群眾圍攻，李又振振有辭地推銷她那套階級界限理論。群眾心裏好壞分明，此事後來鬧得很大。

???鬧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閨女。在分房分地結束之後，土改積極分子又忙著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閨女來。地主都被鬥死了，或逃亡失蹤了。這些女人被農會幹部統統招來，作為財產再分配給村裏討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沒被鬥死，可他的老婆還是被農會幹部強行奪走，再分配給別的男人。《山西日報》記者魯順民在《“左”傾風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說：“不僅僅地富和鬥爭對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農也不例外。富裕中農馮萬禮的閨女就分配給了貧雇農。”

一些地區在 1947 年冬至 1948 年春，挖財寶成爲風潮，還發展成掃堂子運動。開始以村爲單位，即讓地主、富農淨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爲以區甚至以縣爲單位的聯合掃蕩，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子。不僅僅是地主，一些中農也未能幸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并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歷時一年半的土改運動使解放區的整個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許多地區幾乎顆粒無收，餓死的黨員幹部、普通群眾不計其數。《山西歷代紀事本末》于《老區土地改革運動》一文中寫道：“據 1948 年 6 月 22 日統計，興縣 8 個區域 290 個村，打死 1050 人，其中有地主 380 人，富農 382 人、中農 345 人，貧雇農 40 人。自殺共 863 人，其中地主 255 人、富農 285 人、中農 310 人，貧雇農 11 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 63 人。”

???

## 土改如何算剝削賬 葉匡政

新中國的第一門學問應該是土改學。和老人們談起土改，都說像一場夢。後來這場夢醒了，但夢裏的很多事理，我們還是要拿出來琢磨一番的。我們今天所思所想，今天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以及很多潛在的社會心理，追根溯源，從這裏都能尋出一些踪跡。土改對於今天的中國，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數人的理解，我們有必要研究它。

陽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記》，記錄了他當年參加土改的工作。這裏是群眾批鬥地主楊朝達的對話：“你手放下來！我問你，你田從哪里來的？”“從我老子那裏分來的。”“你老子分這樣多給你嗎？”“沒有這樣多，有些是我買的。”“哪來的錢買的？”“靠剝削來的錢呀！”“你爲什麼要剝削人？”“大家還不都一樣嘛，那是從前的潮流！”

剝削是土改的一個關鍵詞，很多讓人不能理解的行動，只有統一到這個詞下，才能讓人理解，才能讓人敢做敢爲。剝削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查了 1989 版的《辭海》，它的解釋是：憑藉私有財產無償地攫取他人勞動成果的行爲。相信剝削的觀點，是要認同“無償”，也即自己的勞動沒有報酬。

本來租地耕種，收了糧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當口糧，在農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幾百年來日子都是這麼過的。突然要把這事說成是壞事，老百姓心裏一開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現在，猛然有人說交房租是剝削，別說房東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時也難接受。看史料記載，果然有農民疑問：“向地主要地，把別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嗎？”也有的猜測：“他們是先甜後苦，現在是先分土地，將來就要多交公糧，多出勞力，要受種種限制。”

當年土改領導者是懂得農民這種心理的，一份冀中區的材料就這樣總結道：“農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麼輕而易舉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窮根吐苦水算總賬是翻心的主要問題。”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開“訴苦會”，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這些人被土改工作隊稱爲“根子”。參加過土改的葉君健認爲：“至于訴苦，這是提醒農民認清自己長年受苦和被剝削的悲慘命運的一種方式，目的是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自覺地起來和地主鬥爭。”

一個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還是埋怨自己，或者埋怨命運。真要這個人把自己的困苦對別人大張旗鼓地說出來，并把對困苦的怨恨轉嫁給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養出對他們的仇恨，應該是有很大難度的。

陽翰笙日記中就記載了這樣的事：“天福的老婆最不覺悟。有人去串她，問她衣服為什麼這樣爛，她很生氣地說：‘你的衣服比我還爛，你為什麼不買？’‘你家連雞籠都沒有，還問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罵豬罵狗，說命不好，羨慕地主生活；說被地主剝削是命裏活該。誰要與她多說就罵誰，嚇得誰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記中還記載了農民訴的苦：“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應該說，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國人的思維。我相信，今天的很多農民合同工依然這麼想，除非工頭克扣他的工資，否則你讓他仇恨工頭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當年的土改工作隊却做到了。

他們的絕招就是算剝削賬。剝削賬各地的算法不一樣，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經濟賬和政治賬。經濟賬主要有農民代地主交的公糧賬、地租賬、勞工賬、貪污勒索賬等。那時的大多數地主並不富裕，這幾個賬一算下來，不僅自己的土地會被算光，甚至算到破產。另一個就是算政治賬，包括漢奸賬、人命賬等，這個賬更是對地主有絕對的震懾力。農民本來就沒什麼文化，被文化人這麼一算沒有不信服的。陽翰笙就記錄了這樣的事：“特別是楊泰木，當大家幫他算了剝削賬，算出他四十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十萬斤穀子的時候，他很激憤地跳了起來說：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談別的問題，他都聽不進去了，他一心就想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當時有一個剝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會把地主捏死！”一個人的階級仇恨，就是這樣被培養起來的。這種仇恨會讓他模糊了“有償”或“無償”的界限，對困苦的怨恨終於被轉移為對另一些人的仇恨上來。

所以那時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堅決拒絕地主自動交出土地。當年的執行者就總結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壞處，如“經過清算分地，農民是理直氣壯的，地主不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處處理虧，不殺他還算便宜”，“不經鬥爭，地主的社會地位不會下降”，“不經清算鬥爭，地主與農民的階級仇恨不會明顯，農民階級覺悟不會提高”。這些策略從鬥爭角度來說，思路非常清晰，也確實有效。所有的商業行為，統統被歸到剝削之下，變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貧窮，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這個邏輯漸漸被大多數人接受了。

剝削可以說是當年支配整個社會運轉的一個基本理念，有了這個理念支撐，每個人即使犯罪（把地主活埋），也犯得心安理得了。碰到繞不過的問題、解不開的疙瘩，誰都可以用這個詞來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順理成章了。

葉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繪聲繪色地描繪了當年真實的場景：“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聲音說：“我犯了罪！我對不起你們！”“你犯了什麼罪？”另一個農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說出來！”“還不是剝削你們唄。”地主又瓮聲瓮氣地說，像是要哭的樣子。“你是怎樣剝削的？”一個婦女也跳上前，指著他的鼻子問。“剝削就是剝削嘛，”地主說，假裝抽咽了一下：“你們知道得比我清楚，因為你們是受剝削的人。”

葉君健寫道：“他這個回答一下子把農民的嘴堵住了，因為農民的腦子沒有他的靈活，反應慢，一時找不出適當的語言來制服他。他們只是本能地舉起拳頭，要上前去捶他那個詭計多端的腦袋。”

## 地主袁力鋒之死 佚 名

家鄉土改中揪鬥不少地主，有的還遭到鎮壓，其中包括袁力鋒。

袁個頭不高，身材瘦削，因煮鹽為業，略有家財，土改中定成地主。那時政治上上綱上線，鬥爭起來殘酷無情，人性扭曲，親戚反目，骨肉相殘，妻子批鬥丈夫，兒子告發老子。袁力鋒運氣太壞，兒子告發老子之類的事也降臨到他身上了。告發他的是他的一個侄兒，說他私藏武器，有一背篋手榴彈，悄悄倒到了水塘，而且是在他授意下，由侄兒親自背出去倒

了的。

土改工作組馬上把袁力鋒抓了起來，由侄兒帶路指認現場。一起到現場的還有其他幾個地主。大冬天，幾個地主下水打撈了半天，連個手榴彈的影子也沒有。接下來，很自然，他受到拷打。一天，有人報告，說他畏罪投水了。工作組帶人趕到事發現場一看，發現他投水是實，但人却還沒有淹死。原來他身材瘦小，又穿了件大棉襖，跳到水塘後怎麼也沉不下去。工作組的人把他打撈上來後，捆到街上的柱頭上示衆，連濕衣服也沒有讓他換一換。他臉凍得鐵青，身起雞皮疙瘩，在柱頭上顫栗。

袁力鋒平時爲人謹慎，待人和氣，給人留下的印象總的還是挺不錯的。在他遭捆綁在街柱饑寒交迫、渾身哆嗦的時候，有一些人心裏對他很同情。我父母親就很想給他端碗飯去，但迫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强大威力，終於沒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在未獲政府許可的情況下給他端半碗飯吃。

袁力鋒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已經快不行了。工作組一合計，認爲讓他就這樣死了，會沒名沒分，不如把他趁早打死（槍斃），還可以教育群眾。到了打他那一天，工作組派人去問他，想吃點什麼，他說想吃碗雞蛋面，馬上遭到一頓臭罵：“狗日的！剝削農民還不嫌不夠，還想吃面！”端到他面前的還是天天端給他的煮紅苕。

袁力鋒是同其他十多個地主一起鎮壓的。那天，全兩河區幾個鄉的群眾都集中到兩河寬寬的河灘上。河灘上臨時搭建了一個臺子，安放了喇叭，工作組的人就坐在上面。下面是群眾，一把草加一墩石頭，就算是座位。程序是先揭發批鬥，然後高呼口號，最後是執行槍決。打袁力鋒那天，他的親戚也是在場的。

1950年代，家鄉農民每家每戶都養狗，無論貧賤富貴，都是這樣。區別在于，富貴人家的狗大一些，貧賤人家的狗小一些。大狗小狗，跑得到處都是。那時的狗是用來看家的，十分凶狠，跟現在城市居民養的寵物狗完全不是一碼事。土改時，凡是遭到鎮壓的地主都是人民的敵人，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因而，一般來說當天是不敢有人去收尸的。袁力鋒也不例外。那天晚上，一大群狗在河灘爭奪食物，廝打之聲遠近可聞，持續了整整一個晚上。

袁力鋒的一個成年的兄弟和一個尚未成年的女兒去收尸的時候，尸體已經所剩無幾了。兩個人走了十多裏路，用繩索捆住殘骸，從兩河抬了回來。等到把殘骸抬到墳山的時候，兩人又餓又累，連挖坑的力氣也沒有了，于是就草草把殘骸放到一個古墓洞穴，撿些石頭封住洞口了事。

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生產隊大規模開挖墳墓，擴大耕地面積。大人開挖墳山，小娃在附近玩耍。陽光灼灼，眼孔、鼻孔、嘴孔，三個圓溜溜的孔洞，一個完整的頭骨就在田地間的小路上。一個肩扛鋤頭的農民路過這裏，一鋤頭下去，只一下，頓時把完整的頭骨敲打成了碎片。

由于生產隊大規模開挖墳墓，袁力鋒的骨骸早已無踪無影，現在他的後人要去祭奠都找不到地方了。

揭發袁力鋒的那個侄兒，土改後不久生個男娃娃，樣兒倒長得很乖，也肯吃喝，喜歡笑，但是有問題。吃喝以後總是要嘔吐，還要放聲大哭，哭得臉青面黑的——他生來沒長屁眼兒。沒屁眼兒就屙不出屎來，實在憋慌了，屎就從小雞雞兒處滲透出來了。當時縣城的醫療條件很差，這樣的病沒法醫治，于是帶到綿陽進行手術。綿陽的醫生在小兒屁溝裏開個口子，口子外安個塑料小漏斗。但是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娃娃還是嘔吐，還是放聲大哭，還是哭得臉青面黑。有時一哭鬧，一掙扎，噗的一聲，塑料小漏斗從屁股上噴出，屎照樣屙不出來。把小漏斗找回，重新安放在人工屁眼兒上，一哭鬧，一掙扎，又噗的一聲從屁溝裏噴出來了。這樣折騰了幾個月，最後娃娃還是在痛苦中夭折了。

袁力鋒有個兒子，那時正在上學。在老子挨整的時候，公開同父親決裂，劃清界限，表現出鮮明的階級立場。不過，有人聽這個兒子私下講，其實對土改中揭發、批判、鎮壓他老

子的人，心頭還是非常仇恨的。

補白：我岳母是學生成分，因其父被劃為地主，她終生只能在一小縣城當營業員。我岳父要求入黨，黨組織從不批准，因岳家是地主。我岳父一生對黨員很崇拜，當初我與他女兒認識，老人家一聽我是黨員，立馬同意。我岳母的大哥，四八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水電系。家鄉在鬥地主，不敢回家，跑到武漢，在一個水庫工作。因地主出身，在單位終身不受重用，七九年後才給他定個工程師。他的大兒子上山下鄉回不了家，招工推薦上大學從來沒他的份。他應該是地主的第三代。他的二兒子後來考入華工大，現任武漢某局局長。我岳母的弟弟，解放時還是個孩子，家鄉還是給他安個地主帽子，從小到大到老都在農村。誰願意把女兒嫁給地主羔子呢，就是地主的女兒也想嫁個貧下中農。老人打了一輩子光棍兒。我見過他，很聰明的一個人，農活什麼都會幹，還會木工。我曾問過他，現在農村的地主後代在幹什麼？他告訴我，這部分人，學習很勤奮，上大學的上大學，沒上大學的也發了財。早年看電影《流浪者》，裏面有句臺詞：“小偷的後代就一定是小偷嗎？”當然不是。可是在中國，政治迫害一直延續到第三代，真是惡政了。

#### 十指點燈 張家正

當時正值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政權的白熱化時期，共產黨急需兵源、糧源、財源。殺人土改絕對不是為農民謀利益，而是把它作為一個手段，用血腥殘暴方法製造民衆分裂，使農村社會自相殘殺，從而達到戰勝國民黨的目地。把農民發動起來，表面是分土地給他們，實際上土地只是誘餌，目的是把農民綁在共產黨的國共內戰的戰車上，跟著共產黨走。農民跟著共產黨分了土地，殺了人，鬥了地主，就只能跟共產黨走了。

1953 年底，我作為文書，參加了雲南省鎮雄縣羅坎區的一個土改工作組。那時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打擊地主。工作組下到農村後首先是訪貧問苦，串聯、扎根子，找一些最窮的人做依靠對象。

我們看哪家衣裳最破，穿得最爛，就進哪家訪貧問苦扎根子。就像毛澤東點撥的，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的，就是我們苦大仇深的階級兄弟，我們就要依靠他了。實際上這些人很多都是二流子，好吃懶做、偷雞摸狗。

當時共產黨利用的是窮人的仇富心裏。最窮的找出來了，最富的也就找出來了，最富的就是打擊對象了。先轟開局面，就是殺人啦，確定這個村第一批殺 20 個、30 個，拉出去啪啪一幹掉了這些人，農民膽子就大了，就不用怕了。

貧雇農高呼的口號是斬草除根，因此殺地主的手段慘絕人寰，有剝皮、砍頭、活埋、石頭砸死、火燒、拖在馬後、樹上吊等等。甚至地主家懷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將嬰兒取出活活摔死。有的把碗敲碎了，放在你的膝蓋頭，跪下來，很多人的兩個膝蓋跪爛了。這個是最起碼的了。還有十指點燈。如果有些地主現在還活著，十個指頭都是光光的，不用問，是土改時被燒掉了。十個指頭纏上棉花，再沾上油，把它點燃，叫十指點燈。

分到土地的農民好景不長。沒兩年，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農民種的糧食歸國有，還增加了戶籍制度，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農民從此成了中國的二等公民。所謂土地收歸國有，其實就是中國只有中共一個大地主。現在中國進行再一次土改，政府把所有的土地都壟斷在自己的手裏。人民要賣地只能賣給政府，要買地也只能從政府那買，政府成了最大的地產商。

補白：我們知識青年點的廚師叫張玉民，生產隊讓他教我做飯。我跟他學會了做河南名

吃胡辣湯，因為張師傅是河南永城人士。生產隊看張師傅特別老實，就想發展他為黨員。有一天他非常靦腆地請求我說：“你能不能幫我個忙，你是戶長，隊長聽你的。”我說什麼事，他說我不夠黨員標準，緩些天再加入共產黨。我很納悶，我們想加入還不夠條件，他怎麼能推辭呢，真是不可理解，因此我沒有答應他。那幾天他特別鬱悶，經常把飯不是做鹹了，就是蒸饅頭把碱放多了。一天聽到生產隊黨支部要給他的老家發外調函，我高興地告訴了他，不料他的臉色特別難看。第二天他沒有來知青點做飯。生產隊通知我說，張師傅老家老人生病了，他請長假回老家了。張師傅一走，我忙了起來，經常要提前起床 2 個多小時，晚上又要遲睡一個小時。春耕開始了，張師傅仍然沒有回來。一天黨支部書記突然通知我們說，張玉民是個地主羔子，已經跑了，外調材料回來了。我們很吃驚，一下子感覺到他已經是個壞人了。大家議論了好多天，我的心情也開始沉重起來。我當時是以貧農和革命軍人子弟的身份下鄉并當了戶長的，可是我清楚，我姥姥家是地主成分，而且全家天主教徒。至今 32 年了，張玉民師傅你可好？我曾經做夢夢見你開了一個非常氣派的飯店，胡辣湯的味道實在美極了，至今讓我回味無窮。但願這都是真的。 戎愛平

## 土改鬥地主的運作模式 李巧寧

土改前，經濟上相對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農村的權威。一定程度上說，土改就是要打破地主階層在經濟上的優勢和在當地農民中的威望，使之名譽掃地，為鄉民所不齒，從而打破他們所代表的鄉村傳統文化。

鬥地主主要先動員。要讓農民普遍起來鬥爭作為鄉村權威的地主，必須從思想上說服他們，打破農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報復和良心、命運等觀念。為此，新政權對農民進行階級教育，告訴農民，人是有階級的，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有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剝削階級，他們是靠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發達起來的；沒田沒地，生活貧苦的人是受剝削階級，他們是因為被人剝削才生活困苦的。地主是剝削階級，為富不仁，游手好閑，窮凶極惡，不僅剝奪了本該屬於貧苦農民的田地，占有了雇農的大部分勞動果實，而且霸占了貧苦農民的妻女。貧苦農民只有在新政權的支持與幫助下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才能翻身做主人，過上好日子。

階級和翻身的話語看似簡單而有邏輯性，但離農民的日常生活（春種秋收、家長里短、生老病死等）太遠，和農民所信奉的社會倫理（有借有還、人各有命、做事憑良心、租地交租天經地義等）大不相同，更何況農民和地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鄰里關係、宗親關係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謹慎、勤勞實在，是公認的本分人或于己有大恩大德的人。因而要讓農民把各種各樣、千差萬別的現象都用階級、翻身這一條綫貫穿起來并不容易。

為了使這套話語儘快融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為農民所接受，土改工作隊主要採取三項措施：反復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

理論講解就是通過大會小會向農民講階級剝削及翻身的道理。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先生 1950 年 10 月至次年 2 月曾先後在安徽五河縣和靈璧縣以土改工作隊成員的身份參加土改。他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向農民講階級理論：10 月 31 日，“下午開貧雇農（即無地少地）農民會，進行階級教育，引苦訴苦”。11 月 12 日，“飯後急回集，召開村幹代表會，講階級，未竟”。11 月 15 日，“開二次代表會（農會會員會）。上午 XXX 致開幕詞，XXX 講階級”。11 月 16 日，“晚召開貧雇中農會，講階級”。12 月 20 日，“至張冉 XXX 寓所開貧雇農中農會，進行階級教育，宣傳農會作用”。

可以看出，講階級不是一蹴而就，是一個反復說明的艱難過程。具體怎麼講呢？通俗地說，就是把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點一點地歸于階級剝削，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作



出解釋。比如在青年會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釋為階級剝削，窮人娶不起媳婦或看財禮嫁女兒是因為貧困，貧困的根源是地主無情地奪走了本該屬於窮人的勞動果實。在老年會上，把老人沒錢看病、遭兒女嫌弃等日常問題和階級緊緊掛鉤，稱這些都源于窮，源于世代代遭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其他階層的會議上亦如此。曾在四川瀘州進行過土改工作的吳茂蓀 1951 年 12 月 2 日在北京介紹土改經驗時就強調：“婦女會上應將一切婦女痛苦歸之于地主，家庭不和亦然。”

理論講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隊成員實施。它面向一定群體的聽眾，有相當的影響面，所講的問題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為每個個體所遇到的現實問題千差萬別。針對個體進行串聯，彌補了理論講解不易深入具體的缺憾。串聯有時是工作隊員入戶發動農民，有時由工作隊培養的根子聯絡進行。所謂“根子”，是土改工作隊下村後，經過瞭解情況，尋找到的苦情大、有熱情、善于團結人、可以為工作隊所依靠的典型群眾。由于根子對當地情況相當瞭解，對每戶的具體情況及每個人的性格都有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們和農民面對面地交談，逐個地啟發動員，既能從每個動員對象的具體問題出發，以農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農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階級問題，又可以用階級觀點把其它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聯繫起來，進行“天下窮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聯有時是在根子和動員對象之間一對一地進行，有時是根子帶著幾個已經串聯好的人一起去和動員對象交談。串聯的內容一般是從農民的窮苦談起，千方百計地把窮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剝削與罪惡，自然地激發起動員對象對地主的仇恨。這樣的串聯對思想單純、思維方式簡單的農民一般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請看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 1952 年 2 月土改串聯的一幕。2 月 7 日晚，一批串聯來的人一起在鄧榮祿家串聯窮苦農民楊泰木。當大家幫他算了剝削賬，算出他四十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十萬斤穀子的時候，他很激憤地跳了起來說：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談別的問題，他都聽不進去了，他一心就想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當時有一個剝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會把他捏死。

????但有時，串聯也不是費一番唇舌就能見效的。同樣是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1952 年土改中就發生了這樣兩件事。一件是：“在鄧旺家碰到鄧榮福。我們圍著火，同他談了很久的家常。在這次談話中才知道，他他會受過下回（屯子名）地主鄔楓先長期的剝削，他曾先後當過鄔家七年的長工。我們幫著他算了剝削賬，可是這個單身漢的感觸却并不大。”另一件是：“天福家窮，根子從現實的苦況出發去串聯天福老婆。……問她衣服為甚麼這樣爛，她很生氣地說：‘你的衣服比我還爛，你為甚麼不買？’‘你家連雞籠都沒有，還問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罵豬罵狗，說命不好，羨慕地主生活；說被地主剝削是命裏活該。誰要與她多說就罵誰，嚇得誰都不敢去串她。”

????遇到鄧榮福和天福老婆這樣的主兒，就需要多次串聯，或用訴苦的方式來啟發。訴苦就是由培養好的苦根在不同規模的會議上飽蘸感情、聲情并茂地訴說地主剝削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巨大苦難，然後由土改幹部或其它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人當眾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標引向具體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階級及其代理人。“不但要算剝削，還要查政治壓迫，不但要追窮根，還要追後臺，由地主階級到帝國主義，由反革命分子到蔣介石到杜魯門。”訴苦是一種煽情，它不僅可以使聽眾由他人之苦聯想到自身之苦，而且會使參與者的苦難感成倍地膨脹。經追查窮苦根源，濃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階級。

????訴苦一般經過如下主要環節：尋找可能的苦主（或稱苦根）→啟發引苦→小會訴苦→幫助總結小會訴苦的經驗教訓，指點一定的訴苦技巧，培養成熟的苦主→大會訴苦→幹部分析苦主的苦情并引伸到階級壓迫。要使訴苦產生預期的效果，尋找人品好、生活苦、會訴苦的苦根很關鍵。找到合適的苦根後，土改幹部對他們進行啟發，引出他們的苦情，并幫助他們根據土改鬥爭的需要對苦情的內容加以取捨，然後給予苦根在小會上訴苦的實踐，并幫助苦主分析總結小會上訴苦活動的經驗教訓，指導一定的訴苦技巧，經過幾次小會訴苦的實踐鍛

煉後，逐漸使之成為成熟的苦根，並選擇其中的突出者到大會上去訴苦，煽起更多群眾的苦情；土改幹部在苦根的訴苦剛剛結束，群情激憤之時，趁熱打鐵，及時地運用階級觀點對苦根的苦情進行分析，並明確地把受苦根的根源指向地主階級，把群眾憤恨的焦點引向地主階級。

陝西南鄭縣十八裏鋪區在總結土改訴苦經驗時所說：“訴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啓發運動，打破顧慮，深入進行講苦、引苦、連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夠意想到自己痛苦，而激發出激烈的訴苦要求。這時即應開始典型訴苦，以苦引苦。在訴苦過程中，領導善于根據情況隨時啓發誘導、深入連苦的教育，使臺上與台下領導群眾的情感完全融合起來，苦苦相連連成一片。在幾個典型的引苦下，爲了普遍訴苦，應速轉向小組訴苦，小組訴苦進行到一定程度時（照顧到面的發展），發現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義的，即可正式轉入大會訴苦，訴苦也必須要和追窮根結合起來。”

????在訴苦活動中，無論苦主還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和情節，都是農民所熟悉的，所以對農民的觸動較大，煽情、發動的效果也相當明顯。很多農民在聽訴苦時都被深深打動，形成了一定的階級認識。

這裏是廣西柳州柳城縣 1952 年土改中幾個屯的根子們小會訴苦的一個場景：“根子們圍著一堆柴火團團地坐著。主席楊坤林（南村人）說了幾句話後，大家漸漸地訴起苦來了，其中四個女的訴得最成功。當關妹說到她被賣到六休不忍離開自己的爹娘及被賣後生活如何困苦的時候，她早已經泣不成聲了；坐在她旁邊的三個婦女也跟著她哭了起來。山脚的桂英對她的苦情還沒有訴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殺死的父親及逃難時被鬼子沖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媽，以及她被地主剝削的苦況時，便放聲號啕痛哭起來。有幾個男的貧雇農也跟著落淚下來。”

????這次訴苦會連在座的土改幹部都被打動了：“這個會不僅教育了農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從訴苦中受了一次階級教育的洗禮。”大多數土改幹部所宣講的階級觀點多來自書本和黨的領導人的講話，自身並沒有多少切身的階級仇恨和感性的階級意識。他們用階級觀點組織農民訴苦，反倒給他們自己所接受的階級理論增添了鮮活內容，強化了他們的階級認識，並更堅定地以之教育農民。土改幹部與農民之間的這種互動，催化了階級意識在農村的成長。

????通過反復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加上在地方戲、歌謠等民間文藝形式中注入階級鬥爭的內容，到處布置“貧雇中農團結緊，消滅地主階級做主人”之類的口號，幾種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大多數貧苦農民對地主階級的罪惡有了一定的認識，爲起來鬥爭地主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和鋪墊。

????

????爲了徹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風，鬥地主一般有兩個主要環節：其一是開鬥爭會，其二是沒收地主財產。

????開鬥爭會是打垮地主威風的重要手段，新區土改中各地幾乎對每個地主都開過鬥爭會。會議的規模有大有小，有以村爲單位的，也有以鄉爲單位的。爲了把鬥爭會開得轟轟烈烈，這類會議一般都與訴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養好的苦根逐個登臺，歷數鬥爭對象的種種罪惡，激起與會者的憤怒情緒，然後在群眾的鬥爭下由地主交待認罪。衡量一次鬥爭會是否開得成功，不僅要看群眾對地主的鬥爭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眾的鬥爭下表現得服服帖帖。

廣西柳州柳城縣山脚鄉 1952 年 2 月 24 日晚上鬥爭地主楊福相的場面：“鬥爭一開始，他（楊福相）就自己承認他的罪惡，痛罵了一頓自己，並且大哭著，自己跪了下去，請求群眾寬大他，給他一個勞動改造的機會。這麼一來，群眾都軟了，泰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

到後邊，榮福（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牽了起來，有的人更表現出憐憫他的樣子，把頭都掉了開去。當然也就沒有人肯面對面地鬥下去了。”

26 日中午鬥爭地主楊富相的場面：“鬥爭大會開始，當楊富相拉到會場來的時候，群眾一齊盯著他，忽然靜下來了。首先跳上去鬥他的是南村的楊火貴。火貴控訴他，解放前強迫各村的人為匪，不去，他就威脅各村的農民說：‘不去，我把你們全村的人殺絕！’當火貴說到這裏，大家都一齊憤吼起來了：‘跪下！’那傢伙只好軟軟地跪下了。接著跳上去控訴的，有楊安泰、楊定坤、龍伯媽、楊五金的老婆，先先後後跳起來鬥爭他的，就有十幾個之多。鬥爭表現得很激烈！可這傢伙却甚麼都不承認，……總之，你要他交待甚麼，他就抵賴甚麼。”

????這兩次鬥爭會都被認為是失敗的，對楊福相的鬥爭會缺乏激烈的群眾鬥爭，對楊富相的鬥爭會缺乏地主的認罪。如果對哪個地主的鬥爭會不成功，土改幹部就會指導群眾總結經驗，反復鬥爭，直到把該地主鬥倒鬥垮為止。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對地主進行說理鬥爭，不允許體罰、打罵。但在實際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現捆、綁、吊、打地主等亂鬥亂打現象。多數土改幹部或鼓勵，或聽之任之，或身體力行。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鬥爭會上，經過訴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憤，難免沖上去對地主又打又罵，甚至泄私憤；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土改幹部認為只說理不足以徹底打掉地主的威風，體罰地主不僅能長群眾的士氣，而且能較快地使地主變得服服帖帖。

陝西安康專區洵陽縣土改初期一個全鄉鬥爭會上，鬥四個地主和一個半地主式富農時，兩個被打，三個頂了石頭，其中一個嘴裏咬一塊石頭，有的村讓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組一個幹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來，動員群眾去打。渭南官路蔡村鬥了六個地主，其中五個被吊打，群眾稱之為“六個地主打了兩雙半，留下一個打得眉眼爛”。蒲城個別鄉鬥地主時把地主吊在梁上，腳下還給垂石頭，還有的用“鳳凰單閃翅”、“猴吃桃”、“站炭渣”、“劃白圈監禁”等方法逼供。褒城縣第一期進行土改的 30 個鄉，計有 18 個鄉發生過打人現象，被吊打地主近 40 人，參加吊打的幹部有 12 人，某工作組長親自打地主的耳光，個別鄉村還製造了不少的新花樣，如挂糞桶、雙手舉起口張開、冷水洗腳等。

????即使經過了土改初期的階級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區群眾都完全接受了階級觀點，在鬥爭會上對地主充滿仇恨。或者說，階級觀點並沒有能夠徹底地消解群眾原有的價值觀念。譚其驤所記安徽五河縣喬集村 1951 年 11 月 20 日鬥地主張學申時，“群眾皆發笑”，因為群眾知道張學申不過是代替其父挨鬥而已。“學申父為惡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學申好人，現家中僅有薄田十四畝，內四畝水澆，生活不及貧雇農。”1952 年 3 月 16 日柳城縣六休屯的幾個農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鬥地主楊成的會上打瞌睡、吃紅薯、發笑、嘰嘰喳喳等；就連在鬥爭被土改幹部認為是最“頑固狡賴的老滑地主”楊朝達時，也有群眾在發笑，還有叫“朝達哥”的。陝西南鄭縣土改鬥地主時，發言的主要限于積極分子，大多數群眾不是理直氣壯，說話時藏在人後邊把頭低下去說。

????開鬥爭會是要從精神上打垮地主，沒收財產是從經濟上打倒地主。1950 年 6 月 30 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沒收地主的財產指的是沒收其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其它財產不予沒收。事實上，各地不僅沒收了土地法許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財上。所有被認為是地主用于過浮華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妝用品、首飾、錢財等，甚至連地主家屬的財產也沒收了，好像舊時犯法人家被抄家一樣，家裏任何東西，工作隊都可隨意搬走。許多地主家裏被搬空。

????這裏是廣西柳城縣六休鄉 1952 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沒收地主財產的生動場景：“沒收地主楊朝達家財產的工作今天開始。中午六休農民開了一個動員大會之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蕩蕩地一齊向楊家進發了。六休農協代表主任鄧旺把楊叫了過來，要他首先交出紅

契。……紅契點交完畢，群眾要楊自報他家的財產。自報不實，大家就起來鬥他，要他把分散的財產交出來。沒收委員會的人却一涌而進，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鍋盞、犁耙鋤頭、碗瓶缸罐，一切大小雜物通通都搬出來了。楊的老婆被捆綁著。……他女和兩個孫女便把群眾帶到左邊的樓上去，大家一搜，便發現了夾牆，從夾牆裏搜出了一堆烟葉，再一搜便從一處樓角邊的小夾壁內搜出一大堆左輪和卡賓槍的子彈來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彈，怒火都燃燒起來了。……這老傢伙看見自己的秘密被發覺了，嚇得面無人色，最後只好承認他知道楊澄（楊朝達的兒子）還有槍支和子彈埋在白洋嶺，他願意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來！……入晚，當白洋嶺又挖出五六百發子彈的消息傳出後，全屯的人都沸沸揚揚地鬧開了。因此到晚上再鬥楊朝達和楊澄的消息傳出後，有幾個從來就不大參加會的老頭子也很早就到會場上來了。”

???對地主的鬥爭除了開鬥爭會和沒收財產之外，還有一些輔助的形式，如公審會的威懾、廣泛製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對地主不斷訓話和傳訊等。人民法庭開公審會就地鎮壓甚至槍斃幾個聲威比較大的地主，對其他的地主產生極大的心理威懾，很容易使他們變得順從；通過標語、口號、民間歌謠等廣泛製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並不斷地對地主傳訊和訓話，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認為土改作為運動不過是一陣風，刮過就風平浪靜，因而想“拖”過關的思想。

??? ???

???鬥地主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對於地主而言，家裏的東西被沒收殆盡，物質生活陷入困境，一些靠勤儉發家的地主變得無心生產。他們昔日在鄉鄰中的聲威一掃而光，不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沒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罵嘲笑的對象。陝西西鄉縣第一期土改工作總結中說：經過土改，“向來農民最敬重的‘張先生’、‘李老爺’等人物，現已在農民口裏隨便叫談著‘張地主’、‘李惡霸’”。在陝西鳳縣，土改還沒徹底結束，群眾就普遍地對地主另眼相看了。雙石鋪地主高 XX 到大坪開會，灰溜溜地一個人圪墩在廟牆根沒人理他。農民們在一邊大說大笑，談論他們的土改，也談論著：“過去地主來坐在咱們屋裏，還得好茶水招待，現在咱不理他了。”地主楊維時的外甥說：“群眾借我的家俱我都借給，要是地主楊維時借，那就不行。”有的貧雇農說：“土改前咱遇見了地主，你得先給人家打招呼，現在路上遇見了地主，他把頭低下，不敢抬起來，要是抬起頭來，也得他先招呼咱，咱還不理他。”有的地主領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綁吊打鬥爭對象的手段，此後一見民兵就嚇得打顫。

也有一些被劃為地主的人對自己的遭遇深感不公，內心不服。陝西洋縣石冠鄉地主楊 XX 罵鬥爭他的群眾：“狗日的鬥爭我，過不了三年國民黨來了，叫我親爹都來不及。”另一個地主靳 XX 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爛，踩在腳底下亂罵：“你把我害扎了。”陝西城固縣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後依然憤憤不平：“我家土改被鬥爭過，房子叫共產黨拆了，土地被窮人分了，共產黨是叫人上望蔣杆，五牛分尸。這是利用窮人整窮人，比土匪搶人還要厲害得多。”

土改時曾作為地主而在家鄉浙江硤石被鬥爭的文人章克標數十年後回憶起自己被劃地主的經歷，心裏仍“有點擺不平”：“慶雲街鎮上，一共評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為我知道評定階級成分的標準是要看藉以為生的主要來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為主，才可以評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來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實在是微乎其微的，哪里能是地主呢？……但這一項桂冠，却無端而來了。”

???在土改結束的總結慶功大會上，章克標作為地主上臺表態接受改造。他以複雜的心情說了一堆反話：“我評到了地主這個名頭，太開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創制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權，多少辛苦慘淡經營，也許還要克勤克儉，尺積寸累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地主。我沒有這樣用過苦工，下過大力，平白得了個地主成分，哪能不開心。……看到家家戶戶的請神祭祖的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請地主太太，甚麼時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總是到處有

飯吃的，這就無論如何也餓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來地主老爺也一樣。所以評到地主分子，想到將來死了之後，可以有這樣的鐵飯碗可吃，實在太好了，就禁不住快活得要哭了。”

???貧苦農民原本處於農村社會的邊緣，經過土改，不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從未享用過的東西，還被新政權當作依靠對象，因而產生了強烈的翻身感，對新政權充滿感激。廣西柳城縣六休鄉 1952 年 5 月慶祝土改勝利大會上，一個農婦說：“十幾年我沒講過話，現在當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膽地講話了。從前我們多苦啊，現在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歡喜啊。”有的男子說：“幾千年來，我們今天算是真正翻身！就我個人來說，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從前，給楊朝達做活，全家勞動還常常餓飯，那日子有多苦啊！現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有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說：“我奶姥今年八十歲了，甚麼時候見到過這樣好的皮袍！現在她分到這件東西了，多好啊。”

???對地主的鬥爭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價值觀念。土改以前，農民以富為貴、為榮。土改中地主被鬥，很多農民認識到新時代是窮人的時代，窮是資本，是出身好。因此土改後農民普遍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產不節約”、“發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為相當流行。許多農民在收穫後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產上的投資與積累，而是上街吃喝、買消費品。有的群眾甚至仇富，認為富就等于壞，等于不仁，人一富就變質，就變得凶殘，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 土改的目的和惡果 陳沅森

### ???一、地主的土地和財富三種來源

???1、祖傳家業。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以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書香世家，幾代沒出“花孫子”，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土改時代這個兒孫手裏。這位繼承者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有些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花孫子”，把萬貫家財賣得乾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

2、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中國幾千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裏，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也不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投資興辦實業。“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有錢之後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

???3、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于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地主。

### 二、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并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上層社會（官場）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于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地方事務的管理權。當年的政府非常弱小，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肩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衆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 地主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恒產者才有恒心。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

### 三、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 年 6 月，中共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 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改。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 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進行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呢？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 200 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諾的提問。毛澤東為什麼不直言相告？顯然有難言之隱。

從 1927 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一直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裏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共產黨占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月黑風高夜到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紅區附近的白區土豪也被打光了，老百姓也跑得精光，最後形成一條 30 多裏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迹的“陰陽地界”。

1949 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新政權入不敷出，捉襟見肘，財政危機相當嚴重。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臺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說，土改的第一大真實目的是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鮮血，鞏固新生的紅色政權。中共建政後，國民黨及其遺留、派遣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反抗相當強烈。自發的民間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個鄉政府給端掉了。新生的紅色政權內外交困，隨時有被顛覆的危險。這時，毛澤東認為，必須把反革命的囂張氣焰鎮壓下去。殺誰呢？很不幸，他選擇了地主。

土改時，批准殺人的權力在區一級，二十來歲的區長或區委書記掌握著全區十多萬人的

生殺大權。深夜，區、鄉幹部會議結束，大家勞累了一天，睡覺去了。年輕的區委書記或區長坐在煤油燈下，根據各鄉上報的材料，勾畫明日的殺人名單。

?? ?如果這位年輕人心地比較善良，他手中的“朱筆”稍稍留情，對於可殺可不殺的人，儘量不劃紅勾，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來。如果這位年輕人“階級鬥爭”觀念比較強，殺紅了眼，“朱筆”一路勾畫下去，則明日刑場上便有多位地主的天靈蓋被打飛。若是這位年輕人打瞌睡，“朱筆”誤點在某個原擬不殺的人的名字上，醒來後又沒有發現這一錯誤，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殺人的權力雖然在區一級，但實際上，某位鄉幹部要殺誰，甚至因私仇某位貧雇農要求殺誰，跟區委書記說一聲，少有不批准的。

鬥爭地主的場面十分野蠻，拳、腳、鞋底、棍棒、皮鞭一齊上，打得皮開肉綻、口吐鮮血、傷筋斷骨，慘叫哀號之聲不絕。對於某些強加的罪名，跪在鬥爭臺上的地主想解釋一下，戰戰兢兢剛開口，台下在積極分子帶領下發出的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立即淹沒了地主那微弱可憐的聲音；臺上的積極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腳踢，打得你根本無法開口。

在這節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別溫和，待人十分寬厚，以前從來沒有得罪過任何人，沒人告他的狀，也許能逃過一劫，留下一條小命。如果幾十年來因某件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說話不小心，得罪過某位貧雇農。在土改幹部的挑唆下，貧雇農指控他是惡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說你是“惡霸地主”，你就是“惡霸地主”，沒得分辯的餘地。

在貧下中農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鬥被殺十分可憐，不記恨往日的小事，寬宏大量，什麼也不說，這位地主的小命也許能保留下來。如果是個生性嫉妒、幸災樂禍的積極分子，見人受罪心裏樂，看到殺人便興奮，告狀時添油加醋，無中生有，一個一個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經不住土改幹部反復勸說，說錯一句話致使某位地主喪命的，事後這位善良的農民良心發現，一輩子追悔莫及！

殺地主，沒有任何標準。每個村子都要殺，不殺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規定：“戶戶（地主家）冒烟，村村見紅。”假如那個村子裏沒有人够資格評上地主，就將富農提升為地主；假如連富農都沒有，就矮子裏面拔將軍，把某位倒黴的富裕中農提上去。總之，至少要殺一個。

當年殺地主是用槍頂著後腦勺，從背後斜著向上開槍。一聲槍響，天靈蓋便被打飛了，紅色的鮮血、白色的腦髓撒滿一地。血腥、殘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渾身顫栗，甚至嚇得好幾個夜晚從惡夢裏尖叫著醒來，掩面而泣。殺多了，嚇怕了，反抗者都縮頭了，新生的紅色政權便鞏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動員廣大農民參軍，上抗美援朝前綫。

???

#### 四、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贊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欲橫流、物欲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于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

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乾淨，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沃的良田，可就是種不出糧食。土改後的第一年，農業生產是倒退的。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把善于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于經營的單人獨戶，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 1906 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于大家都沒了功名，誰都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 1 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 4 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四萬萬五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

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做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簸箕……”不但以沒文化為耻，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却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裏，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的？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 1960 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 3500 多萬農民。

???第四，1953 年土改結束，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發動土改運動的預期目的，毛澤東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絕對權威地位得以確立，為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土改以及此後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幹，後來合作化，到 80 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幹），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于世界農業發展水平。直至今日，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今天使政府頭痛的三農問題，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補白：我的外祖父是地主，那一年被槍斃了，外祖母也隨之上吊自盡了。母親像一片秋天的落葉，瑟瑟發抖著，等待命運的判決。一天夜裏，村裏的幾個年輕人沖進母親的住處，聲稱要把地主的女兒幹了。就在他們要施暴的時候，我父親出現了。父親像一座鐵塔，居高臨下地盯著那幾個傢伙，喝道：“你們要幹什麼？”那幾個傢伙說：“她是地主的女兒。”

“地主的女兒怎麼了？”他們說：“地主幹咱們的女人，我們就幹他的女兒！”父親說不過他們，心裏一急，說道：“她是地主的女兒，可……可她是我的女人！”就這樣，母親後來住進了我父親的屋裏。



文革第一次鬥地主是批鬥一個地主婆老太太。當時我還沒有上學，聽到村裏大喇叭喊要開批鬥會，於是趕緊和幾個小夥伴一路大呼小叫著“看鬥地主嘍”跑到大隊部前面的場院去看熱鬧。擠到了最前面，但見一個老太太拄著拐棍顛巍巍地站在一張桌子前。桌子後面坐著支書，桌子旁邊站著一個民兵，全村的社員包括學生們都席地而坐。批鬥會開始，那民兵領著人們開始一遍遍喊“打倒 XXX”。只聽見學生們呼應，大人們的反響稀稀拉拉。

喊完口號，那民兵突然走到老太太跟前，一脚踢飛了她的拐棍，並大喝一聲：“站好啦！”老太太的拐棍應聲而飛，她一個趔趄，險些摔倒。老太太艱難地彎下腰拾起拐棍，嘴裏還嘟囔了一聲：“看看，差點砸著孩子。”然後努力地站直身子。批鬥會在“打倒 XXX”的口號聲中結束。？

第二次是批鬥老兩口。當時我已經上學了，在學校的組織下親臨現場。批鬥會的布置依然是被批鬥者站在桌子前，桌子後坐著支書，桌子旁站著一個民兵，我們席地坐在對面。老頭兒的罪名是“破壞生產”，老太太的罪名是“攻擊新社會”。

批鬥會照樣是在“打倒 XXX”的口號聲中開始的，跟著賣力氣喊口號的依然是一群學生。聽了支書嚴肅的批判發言，我們才明白，原來老頭兒後半夜澆地時迷糊了一會兒，被隊長抓個正著；老太太是和別人聊天說雞下蛋的事情時說了一句“雞不吃紅高粱不下蛋”，結果被幾個長舌婦七傳八傳傳到了支書耳朵裏。不成想，一件平常事（下半夜澆地的人沒有不睡覺的）和一句平常話（大約是有人說雞不下蛋——可能因沒糧食喂雞，老太太接茬說了句“不吃紅高粱不下蛋”）竟然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兩個六十多歲的老人，不但被打到一回，還被處以扣工分的懲罰。？

這老兩口的孫女和我同班，長得很秀氣，學習也很好，因為家裏成分是地主，所以從來都是老老實實的。但即便如此，班裏一個調皮男生動不動就趁上自習的時間糾集幾個人“批鬥”那女孩子。有一天晚上，那小子閑得無聊，一聲招呼“鬥地主”了，就把一個板凳腿卸下來夾在那女孩子的脖子上，說是“戴枷板”，然後扭著她的胳膊讓她在教室“游街”。那女孩子邊走邊哭，班裏學生的哄笑聲幾乎把房頂掀翻。

十年過後，這兩個人竟然成了兩口子，而且小日子過得很恩愛。某年春節在他們家喝酒，說起往事，男的說：“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回到家給俺爹說起在學校的‘英雄壯舉’，讓我好挨了一頓笞帶疙瘩！”女的說：“呵呵，那時我們都傻乎乎的。”但那時犯傻的豈止是不明事理的小孩子啊！？

後來讀了一些史料，才知道我當年見到的鬥地主還算是“溫柔的”。文革江浙一帶鬥地主，豎起根根高杆，頂置滑輪，讓地主分子坐進筐內，然後向上拉起筐子，一邊拉一邊問地主“看見蔣介石了嗎？”心眼實在的便說沒看見，結果被一直拉到頂端，然後手一松，被重重摔到地面，不少地主分子因此送命。

嗚呼！我們可以把那些在中國燒殺搶掠的日本戰犯施以無產階級的人道改造，然後送回日本，可為什麼對自己的同胞卻不僅僅是精神上打倒，而且甚至要肉體上消滅呢？中國的“外圓內方”策略有時實在不可理解！？

不能否認，世間確實有惡霸存在，但惡霸一定是地主嗎？地主中也出英雄，苦出身裏也有敗類！陳忠實《白鹿原》最後寫到，一幫紅衛兵挖開了大儒朱先生的墳墓，發現一塊磚，一面刻著“天作孽猶可為，人作孽不可恕”，一面刻著“折騰到何時為休”。發人深思！？

今天我批准你哭 王儉義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點左右，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放毛澤東逝世的訃告。從北京到上海，從所有的城市到所有的鄉村，人們都聚集在廣播旁邊傾聽著，流著悲傷的眼淚。那個時刻，公路上正在行走的汽車，司機聽到訃告就將車停了下來，加入到痛哭的行列。騎自行車的人聽到廣播，車子顧不上扎穩，就對著廣播大哭起來。當時的中國人都有聽廣播的習慣，而毛逝世那天，是全中國人聽廣播最多的一天。

有一個住在公路旁邊的民兵營長，跪在村莊的高音喇叭下痛哭，並且對那些哭聲小的人大聲痛罵。有一輛汽車從公路上駛過，司機儼然沒有聽到廣播，民兵營長站起來，對著遠去的司機大聲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車還往哪兒開？”一個騎自行車的人經過，沒有下車聽廣播，民兵營長一脚踹倒車子，拉住騎自行車的人說：“毛主席死了，你的自行車還往哪兒騎？”

騎自行車的人丟下車子，開始大哭起來：“毛主席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中國咋辦啊？你死了中國誰管啊？你死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咋辦啊？你死了右傾翻案風誰整啊？”民兵營長一聽騎自行車的哭出這麼重要的問題，也開始一邊哭一邊說著：“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你死了誰管我們貧下中農啊？你死了誰來收拾地富反壞右啊？你死了誰來收拾走資派啊？”於是兩人一起抱頭痛哭，比死去了親爹親娘哭得還要傷心。

河南西部有一個村莊，老榆樹上掛個高音喇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哀傷的聲音把全村的人震驚了，都集中到老榆樹下聽廣播。廣播在樹上響著，人們在樹下哭著，一個村莊都沉浸在無邊的痛哭裏。

忽然樹下走來一個挑大糞的老頭，是一個經常挨鬥的地主分子。他把糞桶往地上一放，跪在老榆樹下大哭起來，並且哭得驚天動地，比貧下中農還傷心。生產隊的政治隊長站起來，狠狠踢了地主分子一脚，說：“我們貧下中農的偉大領袖，你哭什麼？”

地主分子說：“我傷心啊！”

政治隊長問：“你傷什麼心？狼子野心？”

地主分子說：“毛主席去世了，日本鬼子打來了怎麼辦啊？”政治隊長說：“地主分子閑操心。”

地主分子說：“跑老日的時候，我的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叫日本鬼子機槍掃射死了，我害怕再跑老日啊。”

政治隊長說：“雖然你是個地主分子，今天我批准你哭。”

地主分子重新跪到地上，大哭起來。他的哭聲彙集到村莊所有人的哭聲裏，誰也分不清哪一聲是自己的，哪一聲是別人的。

補白：當知青時我曾經跳到水裏救過一次人。當時我們六個知青救了六個人，一人救一個。我救的那個是地主的女兒銀秀。救完回屋，正為沒米發愁，不料那地主帶著銀秀上門來了，說有救命之恩，要她給我磕個頭，然後送我二十個雞蛋、兩斤麵條。這可是好東西，比磕頭好得多。於是我們知青都盼著其他被救的人家也來送雞蛋送面。可是左等右等，再沒人送。過後我們終於想明白。因為我救的是地主的女兒，其他同學救的都是貧下中農，這就大不相同。用當時流行的話說，有本質上的區別。地主的女兒地位最為低下，大概是可救可不救的，你救了她，所以他必定要來感激的，好像撿了意外的便宜。貧下中農是應該救的，必須救的，你只是做了應該做、必須做的事，當然用不著多說。這件事給我們知青震動很大，從此深刻地曉得，知青的地位雖在地主之上，卻遠在貧下中農之下。

一九七二年十月，江西某縣看守所裏關押著兩個現行反革命。一個是十二歲半的地主分子，一個是十歲的富民分子。他們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筆在多處牆壁上書寫反動口號。十二歲半的地主分子家裏沒有親屬，十歲的富農分子只有一個半失明的母親。

他們雖然犯了大罪，但現實表現卻不錯。十二個號子裏的便桶都是他們提進提出。還幫著送飯，打掃衛生，幫著叫號。叫號就是提審時點名被審對象。幹部（看守所對管教人員統稱幹部）對他們倆另眼相看，相對自由一些，還喜歡看他們在院子裏打打鬧鬧。號子裏那時定量低，他們幫著送飯，從來不會多要。有一次那個富農分子還把自己的口糧偷偷地讓給病號吃。每天他們倆都會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橫幅下早敬、晚敬！口裏叨念著“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永遠健康！”九一三之後，不准他們念了，雖然他們并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都是地主、富農分子嗎？”

“材料報上來寫的就是這樣。家庭成分唄，沒法變。”

“那現行反革命分子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十二歲半撿到半截粉筆，在廁所牆上、會堂邊亂寫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

“那十歲呢？”

“跟著寫唄！問過多次，大的說只寫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歲寫的。十歲說，他什麼也沒寫。又說，只寫了‘打倒’兩個字。好多地方都寫了，就是沒有跟十二歲半寫到一起。這不，一起送進來了。不然，在外面會被紅衛兵打死的。”

“怎麼沒判呢？”“不知道。就這麼關著都快一年半了。他們也不願出去，家裏哪有這裏好？沒得吃，還要天天挨鬥，挨打。農村裏鬥地主可厲害，甯提什麼反革命了。”

九一三之後，批林批孔時有個落實政策的機會。兩個現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的，按理應無條件釋放。可有人看了卷宗之後，提出異議：他們不光反林，還反毛呢。

誰也不敢再吭一聲。就這麼一直關在這裏，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得去呢。

算起來，他們現在也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是在家種田，還是在外打工，他們都過得好嗎？

補白：一九五〇年六月，中共中央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遵循解放區的做法，要求每個村子，無論大小，都要進行土地改革。當年八月，中共公布《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隨後，各村成立農會，按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劃分階級成份。地主一共被劃了第三批：第一批，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土改試點到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土改的那一批。他們大部份都是占有二三十畝耕地，比每戶的平均數多六成左右，通常會請幾個幫工，房屋的漂亮程度一般。由于善于耕作，他們的產量一般要比其他人高，所以積累大量的糧食，故此都有一個釀燒酒作坊或營商，旨求再次增值。除農技知識，他們的其他知識水平都不高。第二批，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六月第二次土改的那一批，多由中農上升地主，他們占有十多畝的耕地，剛好是每戶的平均數。房屋比較上豪華。他不怎麼懂耕作，都有請幫工，家境中上，但都捨得投資教育，出讀書人，為村中紳士，出國也多。第三批，也就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土改復查那一批，也是最冤枉的一批，赤裸裸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因為村中第一、二批的地主都死完了，得重新找一個地主，塘中無魚以蝦為大，他們大都是比別人多出了一畝幾分地，房屋比別人漂亮一點就成了地主。

我插隊落戶到生產隊當天，大隊革委會張主任就指示我說：“江知青，你出生紅五類家庭，根正苗紅，我代表大隊革委會交給你一個光榮的任務。”

原來，經大隊革委會研究，決定把我安排在三隊最偏僻的李家院子住。此前院子裏只有李秀柏和李元彬兩家。李秀柏是貧農，李元彬是地主。大隊革委會本意是指派李秀柏管制李元彬，可李秀柏階級立場不堅定，常常搞階級調和，致使管制不力。我成了管制李元彬的最佳人選。我那時 20 來歲，思想激進，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務，并向張主任表態：“感謝組織的信任，我一定要把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緊緊的，把李元彬這個地主分子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李元彬是個 50 來歲的半拉老頭，背微駝，患有間歇性哮喘。住下的當天，我就把他找來訓話，只許他規規矩矩，不許他亂說亂動。他站在我面前唯唯諾諾地點頭。我足足訓了半個小時才命令他滾蛋。他向我深深地鞠了個躬，轉過身，喘著粗氣，吃力地走下我門前的臺階，蹣跚地往對面自己的屋子走去。看著他那可憐巴巴的背影，我心裏不知怎麼閃過一絲憐憫，可立即又警告自己：對敵人的仁慈是對人民的殘忍，只有對敵人恨得透，才能對人民愛得深。

當晚我設計了一套對李元彬的管制措施：早上令他站在毛主席畫像前低頭向毛主席請罪，念“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 10 遍，給我把水缸挑滿水後再出工；下午收工後把村小操場打掃一遍，再向毛主席畫像三鞠躬，反思自己的罪惡；每個月寫一份書面悔過書，交我審查。我的措施得到了張主任的贊許。

時間長了，我逐漸從社員口中得知一些李元彬的情況。土改前，李元彬一直在縣中學教書。土改前幾個月，他父親病死了，他辭職回來料理家業。評成分，因繼承了父親的田產，被劃為地主。他為此多次申訴過，說按照解放前 3 年實際從事的職業，他的成分應是教師而不是地主。但上級沒有受理他的申訴。

文革期間，造反派抓住他多次申訴的事實，說他想翻天，經常開批鬥會鬥爭他。他不服，可又沒有辦法。他的哮喘病就是這麼落下的。他有個女兒，爲了和他劃清界限，嫁出去後就極少回來。他兩口子的身體都不好，掙的工分很少，連基本口糧都分不回來，欠了生產隊的債，日子過得很苦。李秀柏因爲同情他，偶爾悄悄送他點糧食、蔬菜之類的，大隊知道後取消了他管制李元彬的資格。

爲了站穩階級立場，我決定吸取李秀柏的教訓，絲毫不同情李元彬，嚴格按管制措施把他管嚴、管死，管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威風來。有一天收工後，李元彬累得躺在床上，可村小操場沒有打掃。我沖進他的屋子，掀開被子，把他拉起來，強迫他把操場掃完。還有一天早上，下著雨，他向毛主席畫像請過罪後，站在我門前說：“江知青，等雨停了再挑水吧。”我粗暴地說：“不行！”他只得冒雨去給我挑水，結果淋得像只落湯雞，導致哮喘病發作大病一場。我却認爲這是自己階級立場堅定的表現。在那個人性扭曲的年代，我的這些行爲常常受到張主任的表揚。下鄉半年後，我被評為公社的模範知青，還在區裏召開的模範知青代表大會上介紹對地主分子實行專政的經驗。

這年 9 月，縣革委派出工作小組檢查各公社開展“毛澤東思想宣傳工作”的情況。公社要求各大隊突擊辦一期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壁報。張主任把任務交給了我。我向張主任表態說：“我將辦出全公社最好的壁報。”文革時我就是我們學校《閃電》報的主編，辦一期壁報對我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

只用兩天時間我就把壁報辦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隊革委會主任、民兵連長、婦女主任、貧協主任等七八人，在通往公社的石板路路口敲鑼打鼓地迎接縣革委檢查小組的蒞臨。不多久，縣革委檢查小組的大員們在公社革委會主任的陪同下，神氣十足地來了。張主

任滿臉堆笑，把他們迎到了大隊辦公室，向他們彙報大隊抓毛澤東思想宣傳做的大量工作，然後又把他們引到大隊辦公室門前的宣傳欄前檢查壁報。張主任一手拿個小本本，一手握筆，一臉媚笑地對檢查小組王組長說：“請王組長對我們的壁報做指示。”

檢查小組王組長穿一身舊軍裝，仰頭看著壁報，背著手踱來踱去走了十來分鐘，轉過身慢吞吞地對張主任說：“你們的壁報內容倒是不錯，只是字迹不一致，像是拼湊成的。”我聞言一驚，壁報的策劃、編寫都是我一手包辦，怎麼會字迹不一致呢？可就在那一刻，我發現壁報右上角那段“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毛主席語錄，的確不是我的筆迹。李元彬每月要交給我一份書面檢查，我一眼就看出那段語錄出自他的手！剎那間，一股熱血沖上我的腦頂，這是地主分子在搗亂！可是我沒敢說出來，因為這對我們大隊不利。

張主任滿臉媚笑地對王組長說：“是不一致，是不一致，我們要改，要改……”我不知道張主任是真的發現字迹不一致，還是在敷衍王組長。王組長還指手畫腳地對壁報作了不少“指示”，可我一句都沒聽進去，一門心思盤算著如何去收拾那個搗亂的地主分子李元彬。

中午，大隊辦了兩桌豐盛的酒菜招待檢查小組的成員。我作為壁報的編撰者，也有幸能陪領導們共進午餐。可我對桌上的佳肴美酒絲毫沒有興趣，匆匆扒了兩碗乾飯，便找個藉口溜了出來。

我一溜烟跑回李家院子，一脚踹開李元彬的木門。李元彬正在桌邊和老婆喝菜稀飯。我沖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領，罵道：“李元彬，你活得不耐煩了麼？”他站起身來，忙不迭聲地說：“江知青，小聲點，小聲點。我曉得你要來找我的，我讓你看樣東西，你就明白了。”他老婆飛快地跑進內室，拿出一張疊得皺巴巴的紙來。一時間，我弄不清這是什麼意思，但氣沖牛斗的氣焰頓失，抓著他衣領的手也下意識地鬆開了。

他接過老婆手中的字紙，展開後對我說：“你看。”那皺巴巴的紙上寫的正是從壁報上撕下來的那段毛主席語錄，可我不明白這一切。他見我滿臉疑惑，又低聲說：“你仔細讀一遍。”我仔細一讀，頓時驚得腦袋嗡地一聲。原來，我把那段毛主席語錄寫成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擁護”。天啊！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就憑這一點，完全可以判我3年5年刑！剎那間，我腦子裏一片空白，呆在那裏一動不動……

李元彬叫他老婆把那張紙扔進了灶膛，平靜地說：“今天早上，我喘得睡不著覺，天濛濛亮就出來走一走。路過壁報時，偶爾發現了這個。告訴你又來不及了，又怕張揚出去，才這麼辦的……”

“李叔，你幫了我大忙。”下意識中，我竟一改平時“狗地主”的稱謂，感激得不知說什麼好。良久，我問他：“李叔，我平常那樣對你，你為什麼還要幫我？”他喘了幾口氣，咳了幾聲，微笑著說：“我是受了冤屈的人。我知道你是一時疏忽才把那幾個字寫錯的。如果讓大隊或公社幹部發現了，肯定你也要受冤屈。”聽了他的話，我百思不得其解，這地主分子居然還這麼“心地善良”？然而這就是眼前的事實呀！我滿臉通紅，無地自容。見我尷尬萬分，李元彬端起稀飯碗，依舊平靜地說：“江知青，公社和縣裏的幹部還沒有走，你趕快離開我這兒，免得生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離開他的小屋的。

此後，雖然我依然履行著“管制”李元彬的職責，但力度却大打折扣了。首先，我以防止他下毒為由，取消了他早上為我挑水的資格。不久，又找理由免去了他下午收工後打掃村小操場的苦差。再後來，竟像李秀柏那樣和他搞起“階級調和”來，比如在他哮喘發作時幫他挑水、推磨，把重慶家裏面寄來的怪味胡豆給他品嚐，夜深人靜的時候和他一起在燈下研究書法等等。不知不覺中，我們漸漸成了忘年之交。好在李家院子比較偏僻，李秀柏也從不“裝怪”，這些事從未被“外人”發現。

就這樣，我一面敷衍大隊張主任，一面與李元彬保持著朋友關係，直到 1971 年 3 月我調出農村。

## 我結識的地主一家 李遺民

從接受教育起，地主就被列為黑五類之首。他們的典型形象是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等等。他們集人性醜惡之大成，貪婪、狠毒、奸詐、腐化、墮落，無惡不作，無耻之極。他們的形象，賊眉鼠眼，鬼鬼祟祟。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復辟失去的天堂。因此我從小對地主就有一種本能的仇恨和厭惡。

直到下放農村，我才接觸到真實的地主。我們村有兩個地主，都是五六十歲，兩人是表親。稍年長的那個地主個子矮小，古銅色的臉上皺紋縱橫交錯，永遠一身皺巴巴的破衣裳。村上的年青人告訴我他是地主，我仔細端詳，看他同村裏的農民沒有任何兩樣。但是我仍然害怕，因為我滿腦子“階級敵人還在心不死”的毛主席教導。第一次與他偶然照面，他看著我，臉上似乎想擠出笑容，我則板著臉，警惕而又冷漠地看著他。

多少年來我們被告知，地主都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和剝削分子。隨著對這個地主的逐步瞭解，我簡直不相信他是地主。最重要的一條，他是我們村幹農活的第一能人。當地農活，一個是堆草垛，再一個是篩大篩子，屬於技術活。村上能幹的沒幾個，包括雇農出身的生產隊長，曾經的長工頭，他會堆草垛，但大篩子篩得不怎麼樣。另一個貧農，大篩子篩得好，但草垛堆得不怎樣。就這個地主，兩樣農活樣樣做得漂亮。其他農活，如耕田、耙地等等，他樣樣在行、麻利。一天農活幹下來，身上衣服不帶一點兒泥星子，實在是道地的種田把式。隊長是個種田好手，一般莊稼漢的種田水平他都看不上，但是對這個地主的農活一向誇獎。

更奇怪的是，隊長說這個地主的為人不薄，從來不虧待打工的。他不止一次地介紹說，農忙在地主家幹活，一天五六餐，大魚大肉儘管吃，地主家人也沒有他們吃得好。地主對長工從來沒有斥責，特別對他這個長工頭，工錢也開得最高。

最後我知道了他是遠近聞名的大地主，當年村上有田有地，鎮上有半條街的店鋪。他一生辛勞，是種田的好把式；他是地富反壞右之首，但在村上口碑不錯；他很有眼光，幾個兒子都供在外面念書；他作風正派，沒有妻妾。他的老婆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輕時很是漂亮，解放後成為地主婆，兩人相依為命，苦度餘生。

我下農村那幾年，階級鬥爭之弦繃得正緊。地主作為黑五類之首，遭受的磨難是最多的。三天兩頭階級鬥爭新動向，地主富農們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生活在這樣敵對、仇視的氛圍中。我注意到，地主們從來是上工最早，下工最後，最苦的活肯定派給他們。貧下中農幹活時偷懶耍滑，停下來聊天說笑，地主們不敢停（儘管沒有人監督），而且似乎對這些說笑充耳不聞，臉上沒有什麼反映。貧下中農為自身利益可以吵架甚至打架，但是地主們似乎對個人利益十分淡然，不回嘴，不爭辯，不解釋。我從來看不出他們的喜怒哀樂，從來聽不到他們對生活、對身邊的事物、對個人行為發表看法、做出判斷；他們永遠無聲無息，他們的表情要麼漠然，要麼是微笑，附和著你謙卑地笑。

最底層的普通農民和不識字的婦女沒有學會斥責與吆喝，他們習慣性地稱呼地主夫妻為某某他爸、某某他媽。地主夫妻也同樣稱呼底層的普通農民為某某他爸、某某他媽。

跟著倒黴的是地主的子女。聽說這個地主的大兒子參加過志願軍，因為有技術，回國後成為國家工作人員。二兒子是某廠職工，結婚後育有一女。三兒子學的是獸醫學，畢業後在某農場擔任獸醫。文革一來，因地主成分，二兒子一家和三兒子都被下放回家。四兒子初中畢業後，不得不在家種田。

二兒子不但農活好，而且會駕駛和修理拖拉機。因為有技術，加之見過世面，擅長交往，

雖然成分不好，政治上倒也沒有吃什麼苦。儘管生活艱苦，儘管養的是個女兒，他仍堅持送女兒上學讀書（村上女孩子讀書的很少）。

三兒子獸醫，因成分不好，為人謙和沒架子，非常受鄉人歡迎。遠近農民家裏猪有病，肯定找他，包括村幹部、共產黨員，也不在乎他的地主成分。三兒子外出給猪看病，從來不收人工費，都是搭上自己的休息或工分。他有一技之長，有文化，長得不錯，人緣又好，可是三十出頭了還沒有對象。

地主的四兒子當時也有二十五六歲了，他長得天庭飽滿，濃眉大眼，高鼻梁，身材魁梧而勻稱，幹農活一把好手。他自知出身不好，見人三分笑，客氣、謙和但是絕不顯卑微。他實在是個優秀青年，可是那年頭，沒有人家敢於把女兒嫁給他。

1970年代中期，鄰村遷來一戶蘇北父女。那女孩子高大豐滿而水靈（當地人稱她飛嫩），長得不醜，居然就看上了地主的兒子，並且戀愛上了。

雖然宣傳自由戀愛很多年了，可那一帶基本沿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通常是一場交易，雙方家長通過媒人談判，主要內容是送女方的彩禮多少。談判成功，婚姻就算定下來了。男女本人結婚之前，難得有機會見面，說悄悄話談戀愛更是一種奢侈。

地主兒子的自由戀愛，屬於離經叛道，遭到許多光棍青年的嫉妒，由于不合當時的政治氣候（多少貧下中農的兒子找不到老婆），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地主兒子悶頭幹活，但是不言放棄。那個女孩子遭到她父親的多次打罵，不知哭了多少次。一天晚上趁父親不在家，她偷偷住到了地主兒子的房間裏。女孩子主動投懷送抱，而且公開承認生米煮成了熟飯，她父親氣得半死。村上人也罵女孩子不要臉。兩人就這樣算是結了婚，也沒有辦什麼酒席。

幸虧當時一打三反已經結束，否則地主的兒子可能被判刑。當時的我們，非常講究所謂純潔的愛情，對地主兒子的這種不光彩的同居，不僅沒有一點同情心，反而看不起這一對患難中的男女。現在重新審視往昔，越發覺得我們由于淺薄而顯示出的冷酷。如今應該沒人歧視那個地主兒子了吧。遙祝他們夫妻幸福，安享晚年。

## 土改暴力的文學反省 陳思和

文革後最先反省土改暴力問題的文學作品是山東作家張煒的長篇小說《古船》。山東是革命老區，土改進行得最為慘烈。即使在今天看來，這部小說仍然有經典的意義。

主人公隋抱朴出身地主家庭，親眼目睹了幾十年來暴力不斷的慘烈事件，苦苦思索人性與暴力的關係。他始終警惕在歷史的輪回中暴力會以各種新的名義死灰復燃。他苦讀《天問》與《共產黨宣言》，天問所問的是宇宙最根本的問題，而這一問題的答案則是在《共產黨宣言》裏找到的，那就是人類私有制度和貧富的不均與分化，最終會讓人們在爭奪利益過程中變得冷酷無情，暴力是人性異化的必然產物。張煒是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把土改中的暴力作為一種個案的病例，放在人性的聚光燈下加以解剖和考察。在作家的思維力度所能夠達到的範圍內，他把暴力視為人性異化的結果，超越了政黨與政治的鬥爭。土改暴力的輪回，有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與報復，也有地主還鄉團的反攻倒算的血腥暴力。仇恨激化了人性深處的暴力，每個地主的家族和血統，在長期的貧富不均的社會制度下都犯有罪惡，而苦大仇深的農民在復仇中也情不由己地以惡報惡，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場面：“有一個老漢手持鐮刀，走到杆子下邊，猛然砍斷繩子。‘面臉’（一個地主）倏然落下，跌得七竅出血。一夥人圍上去就踢，老漢揮手擋開，伸著鐮刀問臺上的幹部：‘我兒子給面臉扛了五年活，傷了腰，臥炕不起。我要剝面臉一塊肉煮湯給兒子治腰！這個要求過分不？’幹部還未表態，人群就嚷：‘快割快割！’老漢低下頭去，在一陣慘叫聲裏剝下了巴掌大的一塊肉，高舉過頂，對臺上喊一聲：‘我們的賬結了！’說著跑走了。”

張煒把魯迅在《狂人日記》裏的狼子村佃戶吃了一個惡人的故事重複了一遍，把吃人的民族歷史從古代延續到了現代。他揭示出，土改中的暴力不僅僅是因為農會混進了流氓壞人作祟，真正的階級報復是來自被奴役者集體無意識的創傷記憶。小說裏的批鬥會上，除了一個有姓名的壞人趙多多以外，所有施行暴力的全是沒有姓名的“老漢”、“老婆婆”、“民兵”等等。他們都是苦大仇深，內心深處的火仇恨山一旦爆發，誰也擋不住人性深處的惡魔性因素決堤狂瀉，彌塞他們整個心智。

人性的拷問還沒有結束，緊接著作家又以同樣的筆調描述了地主還鄉團對勞苦群眾和土改幹部的瘋狂報復，照樣是血流成河的屠殺和駭人聽聞的酷刑：“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樂大鬍子在多人的注視下，被繩索套住，縛上了五頭黑牛。樂大鬍子大罵不止。有人喊著號子，另外五人各自鞭打黑牛。黑牛揚脖長嘯，止步不前。又是鞭打，又是長嘯。這樣折騰了半天，五個牛才低下頭去，緩緩地往前拉。樂大鬍子罵著，最後一聲猛地收住。接上著劈劈啪啪的碎裂聲。血水濺得很遠；五條牛身上同時沾了血，於是同時止步。當夜，還鄉團又從碎肉中分離出肝來，炒菜喝酒。”

老漢剝了地主的肉給兒子補身體的細節，對應了《藥》裏華老栓用烈士夏瑜的血來做治療肺癆的藥，對應了狼子村佃戶集體吃了一個惡人的故事，那麼還鄉團的獸性大發的描寫，我們又一次會想到魯迅筆下出現的徐錫麟被殺後清兵的獸性報復。張煒非常尖銳地指出，暴力不盡是農民大眾的本性，也不盡是地主階級的本性，而是幾千年私有制度形成了貧富不均的制度，形成了階級剝削和壓迫，積累了難以消解的仇恨，一代一代以暴易暴的鬥爭彼此交替，終於促使了人性向獸性的倒退。在反省了私有制是仇恨的總根源的基礎之上，張煒把暴力與人的攻擊本能與侵犯性聯繫在一起，從檢討人性的角度給以展示與考察。

《古船》對暴力的反省達到了文學史上的最高水平。他不是一般地揭示人性與暴力傾向的內在關係，而是把人性中的暴力視為階級鬥爭的一個必然後果，是人性在階級社會中異化的產物，這樣，就與一般地從抽象人性角度來探討暴力劃清了界限；同時，他也沒有把土改中的暴力行為僅僅歸結為少數流氓痞子的本性使然，而是把暴力視為一定階級關係下必然性的表現：既是農民的，也是地主的。換句話說，所有的人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都可能產生暴力行為。

張煒對暴力的考察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從進化論的角度看，暴力應該是人類從動物由低級向高級進化過程中殘留的動物本性。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過程中，暴力是動物捕食、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它是以強力破壞另一個生命為主要表現特徵。即使現在，人類對動物仍然在使用各種暴力攫取它們的生命。但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化與發展，人類自身對暴力有了限制，尤其是建立了國家這一階級統治的工具以後，人類個體生命的暴力傾向被法律禁止，但同時又被升華到國家機器的功能。通過國家化的形式，轉移了人類個體生命的暴力傾向。現代社會由國家暴力來轉移個體生命的暴力，一方面是人的攻擊本能和侵犯本能受到了國家機器（法律、軍隊、警察、社會制度、社會風俗、道德宗教教育等意識形態等等）的約束，但另一方面，國家以更大的利益驅動利用了暴力，如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對反抗者實行武裝鎮壓，監獄制度下的“躲猫猫”，法西斯的集中營，滅絕種族的焚尸爐，以及關於英雄主義暴力的渲染和意識形態的教育，等等，都使暴力變得合法。這樣，人類進化中的原始的暴力性，在現代社會中可能轉化為兩種形態：一種是民衆的暴力，它是在國家法律制度的約束一旦鬆弛的情況下，由民衆的集體無意識決定了它的爆發；另外一種是國家暴力，即通過國家機器在現代文明制度下履行使命的暴力，它的前提是維護國家統治者的根本利益，並且以統治者的利益為核心，分出多層的社會階層。當有一部分人被宣布為國家政權的敵人，這部分人不再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那麼，這部分人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家暴力的對象。

張煒的深刻性還表現為對這兩種暴力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充分的描繪。同所有的土改題材



的創作一樣，《古船》對於解放區土改的全過程有準確的把握。首先是暴力與土改的最初宗旨的衝突，小說裏的工作隊王書記被塑造成一個嚴格執行土改政策、反對群眾暴力的人，他甚至說了這樣一句：“發動的是群眾的階級覺悟，不是發動一部分人的獸性！”但問題是，一旦群眾真的發動起來，連王書記也控制不了局面。接著是土改復查中王書記和窪狸鎮的土改工作被批評為右傾，於是左的暴力狂潮開始泛濫，亂打亂殺從此開始，三天裏在非法酷刑下死了十多人，其中最多是五個人有死罪的。王書記帶來了“巡迴人民法庭”，宣布這是違反政策，但有人當場在下面呼喊打倒富農路綫。緊接著，地主還鄉團回來瘋狂報復，更殘酷地殺害了土改幹部和無辜農民，人們又開始後悔：後悔當初沒有把那些傢伙更多宰一些，大家恨不能重新開一次殺戒才好。當這種仇恨被帶到了戰爭，成為大批農民參軍投入解放戰爭的驅動力。

這裏所描寫的場景完全符合後來歷史學家關於土改的研究成果。土改暴力，以前常常被學界認定是事先由土改當局設計好的、為緊接而來的戰爭服務的舉措，但是現代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土改最初是因為抗戰勝利後農民對土地的進一步的要求，這是重新分配國家資源的一個民間自發的舉措。抗戰勝利以後，國共兩黨都考慮過用土改來滿足農民渴望土地、重建家園的願望，尤其是在廣袤的抗日敵後根據地。而中共搶在前面實現土改，是由它一貫地站在民衆的立場的宗旨所決定。當局起先并未使用暴力的動員，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實現和平土改和贖賣政策，但是隨著土改的深入和出現的情況，尤其是當局的長期指導思想是階級鬥爭理論，認為不通過殘酷鬥爭，地主階級是不會輕易放棄田地，他們的經驗是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所以本能上站到了民衆暴力的一邊，結果造成的是國家政權暴力非但沒有升華、轉移和替代民衆的個體暴力，反而由民衆暴力取代了國家政權的意志，國家政權鼓勵了民衆的暴力，最後發展到無法無天不可收拾的慘局。這樣的慘局，在文革中又重演了一遍。由黨的領袖的名義來鼓勵和號召民衆暴力，一旦民衆的集體無意識占領了上風，暴力就變得不可馴服和難以收拾，反過來取代了本來應該由國家暴力來完成的工作。

《古船》以後，關於土改暴力的反省還是在繼續中。尤鳳偉也是山東籍作家，他的小說多次涉及到土改背景，但他更多的是在人性本來的意義上探討暴力的來源。在尤鳳偉看來，暴力是被一種遮蔽人性的仇恨觀念所喚起的。他在小說《諾言》裏描寫土改前的李家莊本來有著千年不變的文化傳統：“世間萬事皆以古訓為道：仁義禮儀、三從四德、忠孝廉恥、種田交租、借債還錢、犯罪交官、老實長在、富貴在天、福禍由命……世世代代，千古不變。”然而，土改使一切都被顛倒過來。

“其實，多少年來住在一個村裏低頭不見抬頭見，彼此并不陌生，可是在知道了這夥人是他們的敵人後就突然感到陌生，並且充滿了仇恨。”於是，“與數千年漫長歲月相比，這一切幾乎是變化于一夜之間，驚喜而迷惘的人們甚至來不及對發生的一切進行思索，只好運用便當的翻轉邏輯來衡量客觀是非：大肚子都是壞蛋，窮兄弟都是好人；有錢是罪惡，赤貧最光榮；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不講仁義。”這些觀念，是一夜之間由土改帶來的根本性的變化。正因為是觀念帶來了暴力，所以，尤鳳偉也天真地相信，只有人性的善良和道德重新被發現，才可能避免人類的暴力行為。《諾言》以地主的女兒李朵為中心而展開，也寫出了殺人如麻的民兵隊長李恩寬良心發現。在一篇叫《小燈》的作品裏，他寫出了一個土改運動中“人性之光在瞬間微弱的一閃”的故事。因為一個窮苦農民出于同情和憐憫私自放走了那些土改中受難者，結果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據說在還鄉團復仇的時候，那些受過那個犧牲者幫助逃命的人阻止了血洗村莊的行為，而且這個村莊從此就沒有發生過非正常死亡事件。在長篇小說《衣鉢》裏，作家又寫了一個老實農民出于同情，幫助一群學生逃出解放區，自己終於被迫害死去的故事。從人性善良的角度來糾正、戰勝土改暴力的還有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作家把人性之美寫到了極致，以至于在更為廣寬的人性的背景上，暴力也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

在另一個度向上，劉震雲與張煒一樣，還是從現代社會歷史的發展中來考察暴力與政權、人性的關係。但是劉震雲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描寫中國的地方政權與民間的痞子運動如何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暴力的民間社會。《天下故鄉黃花》從民國初年孫、李兩家為富不仁爭奪村長位置開始寫起，他們同樣是利用了民間的土匪流氓力量來爭權奪利，故事一直沿伸到“文革”中的兩派武鬥，比《古船》更進一步地揭示了民間的痞子運動是如何與政治鬥爭遙相呼應。這又深入到另一個與土改暴力相關的問題，即群眾運動中的痞子因素。文革後的農村土改小說中對於痞子的揭露仍然繼承了趙樹理的尖銳性，如《古船》裏的趙多多，《天下故鄉黃花》裏的趙刺猬和賴和尚，等等，這是中國農村特有的一種人群，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楊奎松關於土改論文的主要成果是闡述了中共領導人為適應解放區農民在抗戰勝利前後重新分配土地資源的要求，而及時調整政策，全力支持和領導了一場土改運動，設法滿足農民精神和物質的雙重需要的過程。在土改實踐中，本來也是有和平土改的可能性，但在階級鬥爭觀念和支持農民立場等因素的制約下，最後導致了暴力土改的左傾泛濫，結果是付出了沉重的犧牲和代價。這種破壞性是中國民族傳統中特有的。在幾千年歷史的傳統農業社會中，在長期的貧富不均和土地兼併中，必然會出現大量喪失土地的農民，淪落為農村流浪漢，他們可能有機會成為雇工，靠出賣勞動力來養活自己，也可能連正常的打工機會也沒有，迫使他们採取非法的手段來謀取生存機會。這群人，在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裏被稱作游民無產者。在 1926 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剛開展不久，毛澤東就注意到這群人與革命的關係：“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我們要注意，毛澤東在這裏用了“處置”和“引導”一對動詞，既表明了革命政黨與這群人的距離，又抱有熱情的期望。

按照毛的解說，似乎游民無產者可以歸入流氓組織的範圍，其實，是否參加民間秘密組織并非是游民無產者的主要特徵，而無固定職業和收入，無固定居住的社會環境，無固定的社會道德和法律觀念，才是這類社會群體的普遍特徵。他們可以是流氓，土匪，青紅幫，也可以是一般的雇農和工人，而後者的社會身分更加具有影響力，在他們身上，體現出對既成秩序的強烈的仇恨和破壞欲望。這群人在傳統社會裏就是江湖上的流浪者，如《水滸傳》裏的赤發鬼劉唐、混江龍李俊、白日鼠白勝等等，均屬此類。往好裏說是江湖好漢，往壞裏說就是潑皮流氓、亡命之徒，他們擠入了官場就是董超薛霸，蔡福蔡慶，占領了山寨就是吃人心肝的燕順王英，混入黑社會就是惡霸老大如混江龍李俊之流。他們身上並沒有反抗階級壓迫和社會秩序的自覺，因為他們作為個體在社會上是弱者，不可能產生成熟的反抗願望，但是他們具有破壞性，一旦個體匯合成瘋狂的群體，他們馬上就成為最活躍也是最有力量的人物。

王朔語錄/焦國標書

一、請用電子郵件寄稿，以免編輯再次錄入。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提 三、本刊聯絡手機：13240468075。

四、願資助《憶舊》半月刊的朋友，  
請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謝謝！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示 305 甲樓 110 號陳星宇收，郵編 100091。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工商銀行馬連窪支行，  
賬號 0200251101028450741，戶名陳星宇。

## 《黑五類憶舊》第八期 201012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缺乏心靈生活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 焦國標

奧巴馬總統最近製造一句警語，叫做“缺乏自由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這句話可以當做一個公式到處套，比如“缺乏民主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缺乏正義的繁榮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實際上奧氏使用的這個句式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非常“陳腐”修辭法，一千六百年前奧古斯丁說過“缺乏公義的國家不過是一幫強盜”，四百年前帕斯卡爾說過“缺乏正義的武力就是暴政”。今天我把奧巴馬總統的這句話稍微變通一下，也製造一句警語，叫做：“缺乏心靈生活是另一種形式的貧困。”

閱覽、編輯黑五類的故事，一個最大的感受是，故事的當事人，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心靈生活都極度貧乏。施者心靈生活固貧乏，所以只剩毒手段、無心腸；受者心靈生活亦貧乏，所以只剩無奈、麻木和絕望。信神的人遭遇憑一己之力無法抗拒的禍患時，尚可以求告自己的神，心中連神都沒有的人，只能伸脖子等刀落，連求告的對象也沒有，連緩解自己痛苦的“精神鴉片”也沒有。

把思考的範圍再擴大一些，不止是黑五類故事裏的施者和受者，中國人整體說來就是一個缺乏心靈生活的族群。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中國傳統文學作品裏幾乎沒有心理描寫，比如四大名著，有稱得上心理描寫的內容嗎？沒有。人物的心靈是白版一塊。如果說他們的思維還活著，也只是琢磨人，想法子對付人、應付人，想法子害人或逃避被人害。這些心理活動不能叫心靈生活，只不過是厚黑、謀略或心計而已。所謂心靈生活，是思考真理、正義、平等、博愛的生活。相反，西方文學作品中却有大段大段甚至成頁成頁關於真理、正義、平等、博愛的心理描寫。

再一個例子是我們切身的反思。毛澤東有句話：“一事當先，先替自己打算。”我提請我們每個人想想，“一事當先”時，我們自己內心可曾掠過一絲真理、正義的影子？“一事當先”，我們考慮的只是如何托關係，走門子，送禮上供，不擇手段地去解決我們遭遇的問題，從不問這個解決方式是不是公義，是不是合乎道義，是不是對對方太不公平。這種思維和行為方式只有一個結果：勢強時欺負人，勢弱時被人欺，壓根兒不知公平、正義的滋味是甜的鹹的。

比較而言，士大夫群體在中國人中算是心靈生活相對豐富的，比如文天祥死前能寫出《正氣歌》，司馬遷因受刑寫出《報任安書》，可是請看毛澤東時代的士大夫們受難時腦袋裏在琢

磨什麼東西：

鄧拓的遺書這樣寫道：“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鄧拓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你們（妻兒）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够苦了，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傅雷遺書的這一筆是：“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是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該自動推出歷史舞臺了！”

剪伯贊沒要留下正式的遺書，只在他口袋裏搜出兩張字條。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張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三位這麼大的士大夫“大腕兒”，他們的遺書裏有可以稱之為心靈生活的東西嗎？沒有。完全失血，完全脫水，完全蒼白，完全空心化了！西哲有言：“如果我們不願受上帝的統治，我們就必受暴君的統治。”我接著推理這句話：受上帝統治，死前還能考慮真理、正義這些心靈元素；受暴君統治，死前就只剩我罪該萬死、毛理當萬歲這些意識垃圾了。

2010-11-29 北京

## 奧古斯丁語 焦國標書

### 目 錄

紙彈頭殺傷力實驗·····	陶渭熊（06）
上海一家十一口的自殺·····	朱長超（08）
高考歧視·····	袁劍平（15）
王立群的前世·····	飛 天（18）
拉糞過年·····	佚 名（20）
我們村的婚姻故事·····	崔東匯（23）
他屋里根把好·····	哥 巴（28）
李香芝之死·····	魯 民（29）
家庭批鬥會·····	朴女士（32）
丈夫被害之後·····	陸雲芳（35）
祖母曾被共妻·····	王文怡（38）
黃埔八期鄧祖稷·····	趙子法（39）
父親尹煌沉冤·····	尹建雲（41）
西藏的一打三反·····	唯 色（43）
雲龍和雨龍·····	王德邦（45）
刑場觀禮·····	百 姓（50）
興凱湖紀事·····	陳奉孝（53）
開封的鎮反·····	國 亞（57）
重慶 Z 縣的鎮反·····	渝 生（59）
朱自清長子之死·····	佚 名（65）
既然是地主·····	嚴家偉（67）

被鎮反冲走三十年·····	白偉志 (68)
鎮反與肅反·····	信力建 (72)
地主葉老五·····	易文輝 (75)
從血仇到姻親·····	松 北 (77)
父親的冤案·····	薛效凝 (81)
老伴兒進牛棚之後·····	張惠華 (85)
父親的八次創業·····	大 河 (90)
一個右派的餘悸·····	梅桑榆 (94)
父親的骨氣·····	燕 雲 (96)
九歲的反革命翠兒·····	劉 路 (97)
往期訂正·····	徐化揚 (99)

補白：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台”，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她質問：“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還是哪一級幹部爲了獻媚而做的？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扎“忠”字牌樓，挂“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這‘忠’字是地道的個人崇拜。”她們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啓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啓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一雙姐妹也落了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啓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游街示衆後遭槍殺。青海柴達木戈壁灘某鑽井隊的一位來自北京的青年人劉延德，因自辦油印《中國工人報》而被捕。他在《毛澤東選集》書頁空白處加批語、打問號，又偷聽敵臺，被定爲現行反革命分子。大約因其父是高幹，被輕判五年徒刑。另一位四川平民青年，僅評論過中央文革小組的幾位成員，又說過在甘肅見到光著屁股要飯的人，被判死刑，拉到戈壁灘槍決。無人敢爲他收尸，遺體喂了野狼。

## 紙彈頭殺傷力實驗 陶渭熊

把步槍子彈的鉛彈頭搖松、取出，再塞上紙疙瘩做彈頭，能不能打死人？甲說能，乙說不能，這是1968年8月大巴山腳下的四川省南江縣沙河公社兩個重慶知青討論的話題。爲了證明自己的假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想找一個人試一試。

1968年夏天，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今天這裏搶槍，明天那裏武鬥。一些人去外地串聯，一些人到北京上訪。兩個重慶知青搶到真槍實彈後，背著它耀武揚威，好不快活，打飛鳥，射游魚，擊樹幹，穿土牆。他們領教了那花生米似的鉛彈頭的確非同小可，但那紙疙瘩做的彈頭呢？還需要實踐來檢驗。他們想找雞鴨豬狗來試一試，可它們都是有主之物，萬一打死了，主人定會不依不饒惹出麻煩，不如找個地主來試驗。地主大家都可以整，如果打不死，該他走運；打死了，該他龜兒倒黴！誰叫他是地主？打死地主還犯法？全國到處都在打地主，打死了就打死了，有誰犯法？

“對！就找個地主。”在這些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造反派眼裏，地主一條命還不如

一隻雞鴨豬狗。就這樣，他們把沙河街上的地主分子謝澤雲找來，拉到場口，喝道：“跪下！”

那地主天天挨批，日日挨鬥，被捆綁吊打已是家常便飯，早被無產階級專政馴化得比牛馬還要聽話，聽到口令，習慣地、順從地應聲跪下，不知死期已到。其中一個知青模擬法官口氣宣布：“謝澤雲聽著：地主分子謝澤雲，男，現年 47 歲，解放前一貫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罪大惡極。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判處地主謝澤雲死刑，立即執行。”另一知青隨即在背後扣動扳機。

只聽砰的一聲，那可憐的地主只感覺背後一股強大的力量把他掀倒，向前一撲，但馬上又端正過來，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左看看，右瞧瞧，忽然低頭看見自己胸前鼓起碗大一個腫包，一口鮮血噴射而出，轟的一聲倒下去，當即死亡。

“你裝死！你耍賴！起來！”

“地主不老實，地主花樣多！”

他們用腳踢翻他的身體，看見他滿嘴鮮血往外涌，兩眼圓睜，已經死了。兩個知青毫無犯罪感，愧疚感，背著槍大搖大擺地走了，說：“打死個地主，球不疼（沒什麼了不起）！毛主席不是說過好人打壞人，活該嗎？”

果然球不疼！兩個凶手至今逍遙法外，沒有人過問，更無人追查，甚至連姓名都不知道。有說是本地知青，有說是流竄造反的外地知青。謝澤雲的家人有什麼辦法？上告？你是地主，誰受理？示威？那是翻天，你敢！真是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文革中，像謝澤雲這樣不明不白被整死的地主不知有多少！

2005 年夏，我重訪沙河小鎮，謝澤雲被殺一事，早已消失在烟波浩渺的歷史長河中了。年青人不知，老年人也絕少談起，一場絕滅人性的浩劫在有意無意的回避中慢慢褪色、淡化、遺忘。忘記了昨天，昨天的事有誰保證不再重演？

---

補白：四川高縣小寨壩有個丘國軍，家中有幾十畝田，土改一來，被劃為地主。丘國軍還在當地經營一家小旅館，在窮鄉僻壤的痞子們看來，他算是當地的首富了。他們逼他交出浮財，他什麼錢都拿出來了，還是過不了關，說他還有財寶藏在哪裡。實在拿不出，他們也不善罷甘休，將他綁在樹樁上，將其雙手十指全包上棉花，澆上桐油，然後將棉花點燃。丘的十個指頭變成了點燃的“香”，這叫“十指燃香”。丘國軍淒厲慘叫，痛死在樹樁上，還被宣布“與人民頑抗到底”，拉出去又槍斃一回。

嚴家偉

上海一家十一口的自殺 朱長超

南匯路 10 弄 15 號是一棟三層小樓，以前住著黃育申一家。黃曾在沙遜洋行當買辦，1946 年病故，留下妻子謝月仙和 2 子 5 女。長子黃宗南，次子黃宗丙，5 女分別是黃莉菱、黃秀娣、黃秀潤、黃秀珍和黃秀菁。1949 年，黃家已經預感到未來飄搖的命運，決心離開上海，移居香港。在即將離滬去港的最後一刻，長女黃莉菱萌生了留滬觀望的念頭。母親也不想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兒也表示不走了。其他幾個兒女見媽媽不想走，也都不想走了，一家就這麼留在了上海，買好的 7 張去香港的船票全作廢。誰也想不到，這一念之差，十幾年後竟奪去一家 11 口人的性命。

1966 年 9 月 1 日，黨委派來一大群人，高呼口號，將黃家人全部關在一個房間，然後翻箱倒櫃地抄家。抄家抄了兩天，該結束了，也沒抄出什麼反動的東西。黃家對面是著名企業家榮家的宅第，那裏也在抄家。兩支抄家隊伍不時交流信息，交換經驗。抄榮家的人說，他們院子裏有口井，井水掏幹後發現有東西。黃家院子裏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受到啓發，也

開始一桶一桶將水吊起。井水終於幹了，抄家者下了井，一陣摸索，從井底下撈起幾十發子彈，還有兩把小手槍。這給抄家隊伍打了興奮劑，也使黃家面臨著滅頂之災。

子彈和手槍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黃家二女兒黃秀娣與美國醫生麥克萊戀愛結婚，這位美國醫生當過軍醫，有手槍。秀娣與麥克萊 1949 年離開中國去美國時，麥克萊把許多東西都留在了他行醫的衡山飯店。黃家把那些東西運回南匯路宅子，發現裏面有手槍和子彈，就留在家裏了。次子黃宗丙從香港回來，看到手槍，覺得留著會出事，上交又怕說不清楚，遂決定自己把槍和子彈悄悄處理掉。本來順手往外邊河裏一丟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偏偏他們缺乏深謀遠慮，輕易丟進了自家院子的井裏。

黃家井裏發現了手槍和子彈，這在當時實在是一件十分駭人聽聞的事。恰在此時，公安局又發現附近有發送電報的信號，認為必是潛伏的特務在與敵人聯絡。誰是潛伏的特務呢？黃秀菁成為疑點。她有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很小巧，常常聽完節目就放在梳妝檯上。有人懷疑這台收音機是收發報機。

9 月 3 日夜裏，一片狼籍的黃家，老老少少個個皆成驚弓之鳥。大女兒黃莉菱輕聲說：“活著這麼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母親已經 70 多歲，身體不好，也說“活夠了”。就這樣，一家人“稍拍即合”，決定一起去死。深夜，一家 14 口來到樓下灶間裏。母親和長女坐在一起，二嫂石紅玉帶著 4 個小孩子在一起，大嫂李淑屏帶著 2 個孩子在一起，黃秀菁和黃秀潤在一起，還有黃宗南和黃宗丙，一共 14 人。灶間的 6 只煤氣開關全部打開，煤氣絲絲吐著毒氣，大家靜靜地坐著，等待死神的來臨。35 歲的小女兒黃秀菁並不真正想死，坐在灶間門口的她，悄悄打開一個門縫。煤氣很濃，因有新鮮空氣進入，一家人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鄰居肖先生聞到濃濃的煤氣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電話叫救護車。14 口全都救活了。

黃家 14 口自殺未成，又在批鬥和驚恐中熬過一年。1967 年 10 月 18 日，一百多人的一支抄家批鬥隊又浩浩蕩蕩地開到黃家，末了還帶走了黃宗丙和黃宗南兄弟。10 月 22 日是星期天，大哥黃宗南從隔離室裏放了出來，頭髮已被剪成陰陽頭，鞋子、褲腳也剪了，說是奇裝異服。黃宗丙也回來了，監管他的人不給他飯吃，還讓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黃宗南對全家訴說了這幾天受到的污辱，又對母親說他不想活了，活著還會受侮辱。母親響應說：“你要死，媽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黃宗丙也願意自殺。三女兒黃秀潤說她也準備死。黃秀潤對妹妹秀菁說：“你如果想死，就到灶間裏去。下樓的時候輕一點。”黃秀菁也選擇與大家一起死。黃宗南怕這一次又死不了，事先用封膠紙將灶間的窗戶貼得嚴嚴實實的。

灶間排滿了凳子。黃宗南一家 4 口坐在自家的那只煤氣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裏。母親謝月仙身體虛弱，躺在一隻躺椅裏。黃秀潤還準備了一百粒安眠藥。秀菁對姐姐秀潤說：“萬一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麼辦呢？安眠藥還是讓我吃吧。”黃秀潤就將一百粒安眠藥全部給了妹妹。黃秀菁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百粒安眠藥全吞進肚裏。秀菁和秀潤一起坐在煤氣開關旁邊，凳子都沒有靠背。一會兒功夫，姐妹倆皆失去知覺，倒在地上。

黃宗丙最後一個下樓來到灶間的時候，大哥黃宗南已有點昏昏沉沉。他輕聲對弟弟說：“你輕一點，他們幾個已經走了。”他以為母親、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

這次又是鄰居肖先生聞到了煤氣味道。救護車又來了，十來個人全部被抬到弄堂裏，排滿一弄堂。這一次，母親謝月仙死了，長子黃宗南切開喉管搶救，沒救轉，也死了。次子黃宗丙救活了，黃宗南的妻子、兒子、女兒救活了，黃秀潤也救過來了。黃秀菁服了 100 片安眠藥，又吸足了煤氣，雙管齊下，按常理必死無疑。然而恰恰是安眠藥保住了她一條小命。服藥後，她很快進入休克狀態，心跳減慢，呼吸減慢，吸進去的煤氣相對較少，送到醫院，經過洗胃，安眠藥又洗去了一部分，昏睡 42 天之後又醒了過來。

這一次死了母親和大哥，一家人心裏悲傷。自殺是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死有餘辜，黃家不敢表示任何一點哀思，擔心招來橫禍，只在夜深人靜時偷偷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

六七。六七那天，黃宗丙對家裏人說，他準備去上班了。姐姐黃莉菱心裏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車站。他沒有到廠裏，而是獨自悄悄去了杭州，住進杭州華僑飯店。休息一會之後，他對服務員說，他要去理個發。後來服務員來打掃房間，只見其一只鞋，不見其人，檢查房間，發現他已在大衣櫃裏上吊自殺了。幾天後，杭州公安局來人通知，黃宗丙在華僑飯店自殺身亡。他為什麼留下妻子兒女，自己選擇到杭州去死？他為什麼要等到給母親和大哥過完六七？沒有人知道。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黃家再次遭殃。這次災難起因于黃宗南的兒子黃漢華。當時漢華 20 歲，在上海培進中學讀書，同學們經常騎自行車到他家來玩，來了就把車停在弄堂裏。班裏另外兩個同學也希望與他們一起玩，可是大家似乎不歡迎他倆。有一次他倆來敲黃家的門，黃漢華讓家裏的人說他不在家。根據弄堂裏的幾輛自行車斷定，同學們都在黃家，黃漢華也在。這兩個同學感到自己不受歡迎，心裏不高興，由此懷恨在心，于是揭發黃漢華和他周圍的同學私下議論藍平（江青），攻擊中央文革。公安六條明文規定，誰反對中央文革，誰就是反革命。黃漢華和他的同學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這個小集團中的人，有的跳樓自殺，後來處理時，判刑最高的 15 年，其餘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黃漢華被關在學校裏隔離審查，母親李淑屏每天到學校送飯。有一次，專案組的人把李淑屏按在凳子上，舉起棍子、鞋子、木板狠狠打了一頓。專案組還想從黃漢華的妹妹黃以華那裏打開缺口，逼她揭發哥哥的問題。她說她不知道，他們又按住她狠打一頓。

1968 年 7 月 5 日，黃漢華突然逃回來了，告訴母親李淑屏他不想活了。李淑屏也覺得，丈夫已經自殺，兒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自己和女兒也被打傷，活著還有什麼指望？妹妹黃以華見母親和哥哥要自殺，非常害怕。她那年才 19 歲，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又一直是一個受寵的孩子。她哭著說她害怕，母親對她說：“你害怕就躲到櫃子裏。”這個姑娘真的就躲到了櫃子裏。

告別母親，黃漢華從三樓窗口一頭栽了下去。樓下是水泥地，只聽嘭的一聲，黃漢華腦殼破裂，腦漿四濺，當場死去。媽媽看著兒子死去，在房間裏像瘋了一樣轉了一圈又一圈。樓下是死去的兒子，櫃子裏是嚇壞了的女兒，是跟兒子去，還是照顧嬌弱的女兒？最後，她突然沖向窗口，也從三樓窗口跳了下去。這一幕，對面樓上的一家住戶看得一清二楚。李淑屏沒有當場死，3 天后死去。

黃莉菱和丈夫汪銘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兒汪佩未上海師範大學畢業，在膠州中學教數學，1962 年考大學時，數學是滿分。兒子汪君範，高中畢業後沒考取大學，進了羊毛衫四廠工作。黃漢華被隔離審查，汪君範也被捲進這個案子，在廠裏被隔離。君範將母親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條，乘人不備，于 1968 年 10 月 15 日在隔離室上吊而死，25 歲。

黃莉菱強忍悲痛，去火葬場火化了兒子，然後帶著兒子的骨灰來到羊毛衫四廠，藉口說是來拿兒子的相機和手錶，其實是她覺得兒子死得太冤，想為兒子說幾句話。汪君範原來在廠裏表現很好，人們不知道他已經自殺，見了他的母親，都紛紛來問長問短。黃莉菱拿出骨灰箱，流著淚說，汪君範已經死了，變成了骨灰。

汪君範之死引起廠裏很複雜的反應。整他的人大怒，黃莉菱剛回到家，廠革命委員會派的人就來了，說她是對抗運動，向革命委員會示威，為反革命鳴冤叫屈。他們寫她的大字報，列她許多條罪狀，迫她對著群眾讀這些大字報。黃莉菱畢業于復旦大學，後來長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經過一些世面的，最後還是忍痛讀了革命委員會寫的顛倒黑白的大字報。

文革開始一兩年，開始是祖輩自殺，接著是父輩自殺，現在連孫輩 20 歲的青年人都沒了生路。1968 年 10 月 18 日傍晚，兒子死了剛三天，黃莉菱就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飯菜。自 1966 年抄家以來，全家從來沒有好好吃過一頓飯。大家邊吃邊說話，黃莉菱的丈夫汪銘璋開了幾瓶啤酒，悶悶地喝著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黃莉菱對么妹黃秀菁說：“以後你要多聽二嫂（石紅玉）的話。需要什麼，就問二嫂要。”黃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兒園工作，



長久被隔離、批判，一度行為失常。她似乎并未從姐姐的話裏聽出別的意思，也許那一百粒安眠藥已經損害了她的大腦。

吃完晚飯，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黃秀菁醒來，天已經亮了。她要吃了早飯去上班，却發現大姐沒有做早飯，大聲叫，大姐的房間裏一點聲音也沒有。她急忙去敲門，還是沒有聲音，推開房門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53 歲的汪銘璋吊在房門旁，死了，黃莉菱吊在窗口，也死了，女兒汪佩未在離母親不遠的窗口上也吊死了。黃莉菱和汪銘璋的房間裏有兩個紅木大櫃，打開一看，黃宗丙的小女兒黃以華在一個櫃子裏吊死了，黃秀潤吊死在另一個櫃子裏。這一次，在這一個房間裏，一次吊死了 5 個人。

至此，黃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兒子黃漢華和女兒黃以華），全部離開了人間。黃以華正值花季，目睹了奶奶和爸爸煤氣自殺，媽媽和哥哥跳樓自殺，叔叔上吊自殺，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殺，她一次次不想死，但最後她實在無法忍受親人接二連三死去，最後決心與大姑媽一家一起去死。黃莉菱一家 4 口（她和汪銘璋以及子女汪君范、汪佩未）也全部離開了人間。人們在汪佩未的鞋子裏發現一張她寫的字條，說她的弟弟們黃漢華、汪君範都不反對毛主席，為什麼要將他們打成反革命？

黃秀潤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先是在求新造船廠工作，因所謂資產生活方式，要她下鄉勞動鍛煉。她後來要求辭職，得罪了單位領導，幾次申請去香港都沒有被批准。她沒有結過婚，有一個男朋友，原來準備結婚，文革開始了，抄家、批鬥、提心吊膽過日子，婚事就這樣推遲了。她最終沒有披上婚紗。

黃宗南準備自殺時，曾經向大妹黃莉菱托付：他死後，如果她活著，一定把她的孩子帶好；如果她也準備死，一定把他的兒女帶走。自從黃宗南離開這個世界後，黃莉菱小心地保護著黃宗南的一雙兒女，但是侄子黃漢華還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跳樓自殺。她是覺得對不起哥哥，現在她要死了，她不忍心讓哥哥的孤女黃以華一個人留在這個世界上，因此這次她把黃以華也帶走了。

黃家長子黃宗南一家 4 口，長女黃莉菱一家 4 口，全部死絕，加上次子黃宗丙、三女黃秀潤和母親謝月仙，黃家一共死了 11 人。買辦黃育申在大陸的後人只留下次子媳石紅玉和她的 4 個兒女，及最小的女兒黃秀菁。石紅玉與黃宗丙的 4 個兒女分別是女兒黃羚華、兒子黃漢義、女兒黃圳華和黃維華。黃宗丙去世時，黃維華才 5 歲。後來他們四姐弟有一個去了加拿大，還有一個去了澳大利亞。

1972 年，黃秀菁和石紅玉到無錫買了塊墓地，安葬了死去的 11 位親人，在母親、哥嫂、侄兒、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黃秀菁 1972 結婚，丈夫 10 年前已去世，如今只她一個人生活在這座舊宅裏。

我採訪黃秀菁時，她拿出一本他家的影集給我看。她一直沒有勇氣整理親人的遺照，是丈夫主動幫助整理的，還留有題跋。照片并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審美標準，漂亮一點的照片是會被撕碎的，因為那是資產階級情調。

黃秀菁的丈夫在整理這些舊照時曾有一次靈異經歷。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黃家殘照，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見一素衣女郎，飄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遠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纖指蘸茶水疾書桌上，讀之雲：‘拾得殘照貼畫圖，殘陽如血柳如絲。悲歡離合隨風盡，驕骨風流只自知。’餘心驚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漬未幹，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蔭婆娑，天際殘陽一抹，殷紅如血。故此影集，擬題為《殘風影集》。”

夢中那個女郎是誰，那首詩的最後一句又有什麼深意呢？

黃家的子女輩另有兩支到了海外。二女兒黃秀棣嫁給美國醫生麥克萊，現居住于亞利桑那州。三女兒黃秀雲，1953 年到香港，1967 年移居美國，現居波士頓，有一女陳漪琴，一子陳企平。

黃家的案子最終也平反了，但總體上是極不認真、極不人道的。上海國棉二十八廠領導

派人將黃秀菁和石紅玉接到該廠，在會議上宣布黃宗南、黃宗丙兄弟與該廠許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起宣布平反。沒有人對黃宗南全家的死亡負責，沒有人對黃宗丙死後幾個子女的艱難生活負責，沒有任何書面的平反文件，也沒有人向他們表示道歉，沒有人對全家 11 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沒有追查過打人的凶手，沒有追查抄家時物資的流失，沒有追查極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責任。打人抄家時，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實所謂政策時，沒有一個責任人。冤無頭，債無主。領導說是四人幫幹的，告訴他們要正確對待。正確對待的意思說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氣；抄的東西少了，就少了，不要有怨氣；當年批了你、鬥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氣。不僅不應有氣，還要感謝他們為你平了反，給了你第二次生命。

## 高考歧視 袁劍平

我的中學是開封育才中學。我校高 59 屆共 200 餘人，除了不願升學的，其他都考上了大學，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讓人費解。當時人們不敢詢問原因，改革開放後謎團才解開。原來，校方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對每個學生都做了政審。結論分為四類：1、可錄取機密專業；2、可錄取一般專業；3、降格錄取；4、不宜錄取。政審的依據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地富家庭，右派家庭，或有海外關係尤其是港澳臺關係的，基本上都屬不宜錄取或降格錄取。

江雪，志願軍退役，經考試插班到育才中學讀初二，門門功課 5 分，被保送入高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小說，又是校學生會副主席、團支書，多次被評為三好學生、優秀團幹。1959 年高考時，江雪對自己的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都很自信，報了北大、北師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這樣的信：“由于招生名額有限，今年你未被錄取。”那年的文科考生，各科成績都在 85 分以上的，全省只有兩人，江雪是第一名。有 8 所大學都想錄取這位省文科狀元，可是均在不宜錄取的政策面前退却了。

范天成，文理全才，高中時對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盧瑟福的原子結構模型理論、化學中的電離理論、數學中的非歐幾何體系十分著迷。他興趣廣泛、視野開闊，已經在有意識地追尋前代成功學者的科研思路與方法，為升入大學後及早轉入創造性研究做準備，然而因家庭出身被不宜錄取。

呂延梅，初中畢業以全 5 分學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雖出身富農，但自恃學習成績優秀，報了北京大學數學系。他收到的大學錄取通知書，信封右下角印著“北京大學”四字，但被藍水鋼筆劃掉，改寫成“開封師範學院”，又被用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範專科學校”。從北京大學一降再降，落到師專一年制短訓班，呂延梅可謂 1959 年高考“降格錄取”的典型。

這樣做的自然不是開封育才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傷害的也不單是高中生，初中生也因同樣的緣故被剝奪了上高中的資格。而且這種做法不止一年。文革初期開封某中學檔案室被撬，學生們發現正要參加高考的 66 屆應屆畢業生的政審檔案，分類與前述相同，引起轟動。這證實了直到 1966 年，不宜錄取、降格錄取政策仍在執行。檔案顯示，1958 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錄取的比例是 7%，1966 年是 6.1%。自 1958 年至 1966 年，8 年裏全國遭不宜錄取、降格錄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

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記述：“1955 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 90 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却連哭都不敢哭，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

學。”孫穗芳的回憶表明，1958 年以前高考中也有類似的政審條件。

吳祖光有幾篇文章談到自己被打成右派後的遭遇：“什麼反右、批判、檢查、勞動我們都經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親、妻子、子女，我們的 3 個孩子都不許升學。長子吳剛去近郊農村‘鍛煉’，次子吳歡初中讀完送到北大荒作了 7 年兵團通訊員，每天走 70 華里送信。小女兒吳霜初中畢業後，竟被原來最喜歡她的女班主任老師取消了她升學的權利，只能留在家裏。”

馮驥才是天津的一位不宜錄取者。“我 1961 年高中畢業，考中央美術學院。我出身不好，復試完了，教師告訴我：‘你願不願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畫系？’我說：‘願意。’最後我沒有被錄取，原因是我出身資本家家庭。”

遇羅克也有不宜錄取的經歷。遇母解放初期是一家有十幾個工人的小廠的老闆，羅克因此成為資本家出身。1957 年，遇的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1960 年遇羅克高考落榜後，主動報名到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當農業工人。1962 年又參加高考，北師大準備錄取他，但所在大隊却堅決不給檔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大學夢再次落空。

報告文學作品《胡楊泪》裏的主人公錢宗仁也是一位不宜錄取者。1963 年高考，錢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華要錄取他，因家庭出身，公社不給檔案。次年再次參加高考，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3 個月後，公社書記多次到校逼迫學校令其退學。1965 年他又一次要求參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報考。錢被迫到新疆謀生。1984 年《胡楊泪》發表後，引起各方面的重視，錢改行到《人民日報》當記者。1985 年 10 月 1 日凌晨，錢宗仁去世，肝癌晚期，41 歲。

執行不宜錄取政策的年代並不是考生過多，而是考生不足、國家急需高等專門人才的年代。據河南省教育廳的文件，1959 年高考因招生名額不足，部分高校于 1960 年又進行春季招生，還鼓勵在職人員報考或保送大學。1960 年 4 月 25 日，河南省教育廳頒發《關於從今年高中二年級學生中動員部分學生報考高等學校的通知》，指出 1960 年各類高校在河南招生 17300 人，而應屆畢業生僅為 14756 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學的，按 10 % 估算，有 1476 人。把這部分學生扣除後，還缺少 4010 人。經省委同意，從今年高中二年級中動員 4000 多名學生報考高等學校。

不宜錄取政策的執行也有較寬鬆的，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蔣築英就是一例。父親被勞改，蔣築英竟考入北京大學，實在應感謝母校對他網開一面。開封育才中學一位前校長，當年報志願時，老師暗示他不要報機密專業，不要報一流大學。他報了第二批錄取的洛陽農機學院，被錄取。

199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籍華人崔琦，1939 年生于河南寶豐，是我們的同齡人。崔琦有三個姐姐在香港，屬於有嚴重家庭問題者之列。如果崔琦當年不去香港上中學，而留在河南寶豐，難逃不宜錄取的命運。

## 王立群的前世 飛 天

王立群，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史記》研究會常務理事，《百家講壇》著名主講人。

1958 年王立群小學畢業，學習成績全部五分，學校決定保送他到當地最有名的中學讀書。因沒見過面的爺爺的成分，他不能進好中學，最終只收到一家民辦中學的錄取通知書。王立群的父親畢業于齊魯大學英文系，母親畢業于女子師範。母親告訴王立群，學校條件差也能培養出好學生，關鍵是看自己有沒有骨氣。民辦中學經費困難，靠學生打工維持運轉。這些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周三天，自備乾糧步行十幾裏到工地打工。工地向學校支付微薄的

報酬，對學生提供白開水。每天干完八小時活，還得拖著沉重的脚步，步行十幾裏回家。第一天干完活兒，第二天上課渾身都疼，有時連筆都拿不住。第三天一早，又要上路去幹活，風雨無阻。

在《百家講壇》主講人中，王立群是惟一的一位教過小學、中學、專科、本科、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後的教師，還是教過中小學除體育課外所有課程包括音樂課的教師。

王立群初中階段的一半時間被幹活了。高一休學一年，代父回山東故鄉照顧祖父，做了一年農民。十六歲的少年，深夜扛著三八大蓋步槍，揣著從來不上膛的一粒子彈護秋。1965年王立群高中畢業考試，幾門理科主課（幾何、代數、物理、化學、俄語）全部 100 分，所有功課平均 97 分。他品學兼優，高一做班長，高二做校團委委員，高三做學生會主席。可是高考時，爺爺的成分又決定一回孫子的前途——發揮正常的王立群沒接到任何一所大學的錄取通知。他知道複讀無用，便應聘一家國企的教師職位。該企業有兩個學校，一個技工學校，一個小學。他去應試技工學校，考官是兩位臨時抽出來代課的工程師。口試了整整一個下午，考官很滿意。一個月後，備好課即將上講臺的王立群被校長喊去，不做任何解釋，通知他：“你的工作變了，到廠裏的小學教書去。”事後得知，有位主管廠長認為，一個高中生怎能教相當于高中的技工學校？

王立群來到小學，教語文、數學、珠算、大字、自然，甚至有一次在接到學校的任務後一周內學會拉手風琴，教音樂。

1977 年恢復高考，王立群似乎有望實現大學夢了，却被一條規定卡住了：年過 30 歲的考生，必須是 1966、67、68 年畢業，王立群則是 1965 年參加高考的落榜生。

1974 年開始評法批儒，王安石被官方認定為法家。王立群所在國企的“工人理論組”奉命和開封師範學院歷史系合搞《王安石詩文選注》，他被分配去注釋王安石詩詞。此後三年，他天天去開封師範學院歷史系上班。王立群從沒見過這麼豐富的藏書，從沒接觸過這麼多博學的教授。幾何、代數、物理、化學從他的人生中漸漸淡出，左丘明、司馬遷、司馬光、王安石開始進入其視野。

1978 年恢復招研究生，同等學力可以報考。得知信息，當年報考已來不及，準備第二年考。此時他已做了中學教導主任，教兩個畢業班的語文。工作非常繁忙，沒有時間，沒有教材，他一分一秒虎口奪時。家屬院露天放映《望鄉》電影，擠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王立群從自家窗子裏就可看到銀幕，可他不看，跑到清靜的地方看書。王立群的俄語是高中水平，已經荒廢 13 年了。他花了一年死工夫，把大學俄語教程啃下來了。

1979 年，王立群考上開封師範學院（今河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兩漢魏晉南北朝方向的研究生。王立群後來說：“這時，我才真正體會到孟子講的大丈夫人格的核心是自強不息。正如一個氣球能夠升騰是因為它裏面充滿了氫氣，一個人能夠升騰是因為它具有自強不息的強勢人格。這種強勢人格不一定表現在外部，而是內化為數十年自強不息的堅持。”

## 拉糞過年 佚名

公元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辛醜年臘月二十九，除夕，晴。

農民都休息了，但是城市離不開運糞工，這光榮的歷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五類分子身上了。一早就起床，在生產隊的食堂領取一碗紅苕稀飯，倒進肚子，舔淨碗中的剩餘價值，然後拉著借來的糞車，向市區進發。拉架架車，我已是老駕駛員了，但是這運糞的行當卻還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

青羊宮大門左側有一個規模很大的公廁，這是我早已熟知的，所以就十分自信地直奔目

的地。停下車，打開糞桶蓋，抄起糞當（長柄的舀糞工具）開始灌裝了。不多一時，糞桶裝滿，蓋好桶蓋，準備打道回府。

突然一聲巨喝好象從地下冒出來：“逮到偷糞的！”我驚呆了。三個青年農民包圍著我，厲聲質問：“你是哪個公社的？”“蘇波公社。”“哪個喊你來偷糞的？”“我不曉得，我想到是公共廁所。”“這裏是分給我們保和公社的，你們的（舀糞地點）在祠堂街。”

我把糞車退到糞坑邊上，拔下糞桶尾部的木塞，一陣“咚、咚、咚、咚”響過之後，我拉起空糞車就走。可是這時却身不由己了，三個人像押解囚犯似的把我帶走。大約半個小時後，到了他們生產隊的一個院子裏。

“羅隊長，逮到一個偷糞的。這個龜兒子奸得很，把糞又放回茅廁裏去了。”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預設的陷阱：如果逮到“偷糞者”，就迫使其“義務勞動”，把一車糞運送到他們的生產隊。我居然把糞桶放空了，怎能不激起他們的怒火！那羅隊長威嚴地命令：“把車給他砸了”！這不是要我的命嘛！我急忙低三下四地哀告：“我是在外地讀書的學生，放寒假回家，今天第一次出來拉糞，不懂規矩，請羅隊長原諒。”“羅隊長，還鼓隊長呢！給老子跪倒！”

看來，糞車可能是躲過了厄運。于是，我便在天井裏直挺挺地跪了下來。雖然是艷陽高照，我畢竟只穿了兩件單衣一條單褲。這數九寒天，跪在冰冷的泥地上，艷陽的暖意一絲也感受不到。隨著太陽的移動，我投在地面的影子逐漸縮短，達到極限值後，又逐漸延長。我的雙膝不再感到疼痛，整個下肢幾乎失去了知覺。

忽然，響起了一陣鞭炮聲，原來，羅隊長家裏準備吃“團年飯”了。大約三點鐘左右，滿面紅光的羅隊長回來了。一口濃痰夾帶著濃厚的酒味，射到我的面部，緊接著一聲“特赦令”：“給老子爬！”我掙扎著站了起來，問了進城的路，拉起劫後餘生的糞車，搖搖晃晃地起步了。走出大門之後，才敢揩拭羅隊長噴在我臉上的穢物。

我記得將軍衙門附近有一個公共廁所，找起來並不費勁。我在那裏灌滿糞桶，拉著滿載的糞車，出通惠門，沿城牆邊，經十二橋，穿青羊正街，過青羊宮門前，來在送仙橋。當年這裏有一座石拱橋，是我歸途的必經之橋。

已是薄暮時分，十一個小時前吃的一碗紅苕稀飯早已消耗得無踪無影。我在橋頭休息了幾分鐘，便沿著二十多度的坡度向橋頂衝擊。一步，一步，一步，距頂點只有三步之遙了，可是，極度的疲勞和極度的饑餓使我崩潰了。虛汗涌出，眼前火花閃爍，糞車停了下來。我搜刮出最後一點生命之火，盡力使之不要倒退。一旦順坡下滑，必將是罕見的交通事故，後果不堪設想。

正當我已經完全絕望的時候，忽然感覺糞車又在向前行進。啊，有人幫忙推車！車到橋頂，我却控制不住下行之勢。下橋後，又向前沖了二、三十米，才停了下來。回頭往橋上，却不見人影。在這關鍵時刻，是什麼人不顧糞車之污穢，幫我一把，救我一命？我却不得而知！好人哪，願你一生平安！我也暗自立誓：要幫助需要幫助者。我掙扎著拉車前進，過了光華村。還剩下最後幾裏路，已是精疲力竭。

在這除夕之夜，公路上除我之外還能有誰呢？！我把車停在路邊，解下拉車用的絆繩，抄近路回到生產隊，到了食堂。呀！感謝炊事員，因發現我拉糞未歸，竟然還在等著我去領取晚餐。午餐和晚餐并用，胃裏有了一點充實感。

把一車糞卸進生產隊的糞池時，已接近午夜。這一天的經歷折騰得我毫無睡意。乾脆，我也來“守歲”吧，拉起糞車，去完成正月初一的那車任務。又走到將軍衙門公共廁所，裝滿糞車。回程時，再次通過青羊宮拱橋，我不禁又回想起那未曾謀面、也永不知名的恩公。

出城不久，天光大亮。啊，正月初一，新年大吉！一輪紅日冉冉升起，照耀著我的“陽文八字”，在前面拋下長長的陰影。

補白：田棟雲將軍是原國民黨政府交警總隊的總隊長，少將軍銜。共軍入川後，田仍率部與之激戰，後向雲南方向敗退，不知所終。田是四川筠連縣人，有一姐，嫁與高縣天星橋的書生王二先生。王二家境富裕，既未當過官，更從未作惡。1950年，田氏已年過古稀，由于夫家是地主，更由于弟弟與中共持槍對抗結下冤仇，他們便將一腔毒怨發在這個風燭殘年的老婦人身上，定其為惡霸地主婆，決定將她弄出來祭旗，槍斃。但是並不就地槍決，而是先將田氏弄回娘家筠連，美其名曰教育群眾，實則借此羞辱田氏一族。田姐年事既高，又是小脚，根本無法長途行路。那時既無公路，又無汽車，他們就用一個竹籬筐將田姐裝在裏面，叫人抬著，邊走邊打籬，吆喝著游街示眾。當地只有抬動物才用籬筐，所以有罵人的歇後語“狗坐籬筐——不受人抬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就這樣被從天星橋抬到筠連縣的羅場來處死。槍決時用槍指著老人的頭部打，整個腦袋被打得稀巴爛，尸體成了一個樁樁。這種殺人方式，當時有個流行術語，叫敲砂罐。打碎一個人的頭顱，在那些人看來就像敲破一個罐子一樣簡單，一樣無足輕重。嚴家偉

## 我們村的婚姻故事 崔東匯

我們村自古以來就地碱水鹹人苦。窮的最直接結果是盛產光棍，一代一代，層出不窮。過去村與村之間械鬥糾紛，外村人都怕我們村。一聽是杜寨的，外村人立馬就說：“算啦算啦，可別惹他們，光棍漢子多，打架不要命。”與外村打架我沒見過，但有一事足以說明我村光棍之多。那時窮得喂不起牛馬，犁地靠人拉。八人一張犁，我們生產隊的光棍漢組織起來拉兩張犁。隊長說，再湊倆就是十八棵青松了，咱隊也來演《沙家浜》，我就扮演郭建光。光棍們說，那就讓你老婆演阿慶嫂，好好給我們服務服務。一個不足二百口人的小隊尚且如此，全村六個小隊光棍漢該有多少？光棍漢子都火氣大，兩句話不合就捋胳膊光脊梁打架。外村人說我們村人嗓門大，這與光棍多有直接關係。所以在我村，別說一人倆老婆，就是一人一個也有很大缺口。不過，據說清末我村的秀才老代先生就有倆老婆。老代我沒見過，有倆老婆的地主崔滿倉我見過。

我對崔滿倉有記憶的時候，他已成了革命對象，整天低著頭挨批鬥，倆老婆也早已離他而去。兩個老婆沒有留下一男半女，村裏人說崔滿倉的那個傢伙不能用。

雖說是地主，崔滿倉家總共才七十畝地，在外村連個富農也够不上。我們村窮，姪子裏面選高個，崔滿倉就成了地主。我父親說，老滿倉命不好，不舍吃不舍穿，辛辛苦苦攢了七十畝地，到頭來却當上了地主。崔滿倉不奸不狂，基本上還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在我們村幾乎沒有民憤。唯一讓村人，確切地說是村裏光棍漢們，忿忿不平的是崔滿倉有倆老婆。他們連女人半條腿也沒有，所以批鬥崔滿倉時發言最踴躍的是光棍漢們，尤其是崔二興（當然此時崔二興已脫離了光棍行列，解放後年近四十歲的他娶了鄰村的一個寡婦）。二興曾給崔滿倉打短工，有一次趁崔滿倉不在家，在滿倉小老婆屁股上摸了一把，結果讓崔滿倉扇了兩耳光，扣了一半的工錢。所以批起崔滿倉來，崔二興格外賣力。有一次他竟話裏有話地說：“活該你當地主，放著現成的東西自己用不成，也不讓我們貧下中農用。”人們哄堂大笑。旁邊的光棍就逗崔二興：“今晚讓你老婆到我家過夜，要不你就是口頭革命派。”崔二興也笑了，說我就一個，不像崔滿倉那麼多，要不我就成地主了。崔二興私下對一個年輕的光棍說，要讓我有倆老婆，就是當地主我也幹，結果被告發，受到批判，罪名是地主封建主義思想嚴重。

風水輪流轉。老子若干年前的夢想，若干年後讓兒子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崔二興的兒子大頭比我大一歲，讀書一竅不通，初中沒畢業就回生產隊當了社員。後來在城裏打工，又到東北搗騰藥材。一去三年，回來時領了一個東北妞，家裏的老婆尋死

上吊地鬧。財大氣粗的大頭以離婚相威脅，結果家裏的老婆妥協了。大頭在城裏買了房，和東北妞繼續賣藥，城裏鄉下兩個家。有時擺布不開，經常求我幫忙當義務調解員：“老弟，幫幫忙，算我沒本事。”我心裏就發笑：媽的，沒本事還倆老婆，有本事你該多少？礙于面子，不能不幫。一旦兩個老婆相安無事，這小子就會借著酒勁跟我吹：“沒辦法，現在成功男人都腎虛。”氣得我直想用巴掌抽他。

游家在我們村是獨姓，游大麻子是跟著他爹娘逃荒落戶到我們村的。民國三十二年爹娘餓死，游大麻子原來給大戶人家扛長工，後來一貧如洗的他就成了抗日民兵隊長。游大麻子身高力大，作戰勇敢，多次受到永肥縣抗日政府的嘉獎。日本鬼子快投降那陣子，一次縣大隊端了許莊村的炮樓，皇協軍小隊長被打死，留下一個漂亮的媳婦。這媳婦是小隊長從山東帶來的，一雙小腳。千里迢迢遣返她回老家不現實，再說她怕名聲不好也不想回老家。負責善後事宜的科長犯了難，于是就想起了游大麻子。經請示，把這個戰利品獎給了游大麻子，理由是他英勇善戰。民兵排裏好幾個光棍小夥子因此鬧情緒，科長的回答是：“下一次吧，再有了誰勇敢獎勵誰。”

天上掉媳婦，游大麻子那幾天高興得臉上麻子坑都發亮。若干年後，當年曾鬧意見的老光棍三禿子在街頭與老人們聊天說起此事還忿忿不平：“要不是八路軍，狗日的大麻子他憑啥哩。”三禿子為此專門找縣長論理，又與游大麻子大吵一架，二人幾十年面和心不和。

因為曾是皇協軍小隊長的太太，文革中有人抓住此事不放，要批鬥。游大麻子辯論說，她跟著皇協軍是壞人，她現在跟了我這個貧農她就是好人，她是縣政府獎給我的，誰敢動她一指頭老子跟他拼命。這女人既漂亮又聰明，她會背的毛主席語錄在全村婦女中最多，村裏曾把她作為“活學活用”先進典型推薦到公社，後來還是因為曾是皇協軍小隊長老婆這一點而遭淘汰。

雖然游大麻子和妻子一輩子恩愛，可日子過的并不如意，生了三個兒子，兩個到外村倒插門，小兒子雖然不痴不傻，就是因為家窮，四十多歲才花錢買了一個貴州女子。那女子是人販子拐賣來的，過門兩天就開始逃跑。被追回後嚴加看管，在生下兩個女兒回貴州後，再無音信。小兒子氣得整天瘋瘋癲癲不下地幹活，游大麻子不久也撒手人寰。他的妻子顛著小腳既要照顧孫女，還得照顧兒子。今年清明節我回老家給母親上墳，路上遇見老太太背著一捆棉花杆艱難地走著。我給她打招呼，她眯縫著眼好一陣才認出我是誰。我給她一支烟，點燃。她一輩子抽烟，大概是在炮樓上當官太太時養成的習慣。她說我長胖了，感嘆我母親沒福氣死的早，又說自己：“像我這樣活著受罪，還不如跟你娘一樣早早走了好呢。”

在村口曬太陽的三禿子則對我說：“游大麻子是和尚命，命裏不該成家。這不，他早早走了，讓人家一個人受罪。”看來三禿子還耿耿于懷。

如果是在外做官或經商，領回一個老婆，村人不會驚奇。一個窮小子在外給人家扛長工，居然領回一個漂亮媳婦，那就令人驚奇了。這個窮小子就是崔自高。崔自高年輕時是我們村出眾的帥小夥兒，方臉、大眼、高個兒，就是家窮，不得不到山西長治給地主扛長工。崔自高模樣好，人也厚道，深受東家的信任和東家女兒喜愛。崔自高也喜歡東家的女兒，可長工的身份讓他不敢有非分之想。那地主是個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全國即將解放，土改即將開始，他知道就要變天了，開明的他把崔自高和女兒叫在一起，說你們倆都不小了，該成家了，我也知道你倆對脾氣，以後社會也不知道變成啥樣，我給你們點東西，一塊回河北那邊過時光吧。于是，窮漢子一條的崔自高不但有了夢寐以求的心上人，還有了一頭驢子一匹馬一挂大車許多糧食布匹和銀圓的豐厚家產。

那地主沒有看錯人。崔自高回杜寨後憑著這些家底和勤勞的雙手，日子過得一直有滋有味。文革時崔自高的地主丈人在山西老家受到衝擊，兩個兒子被打死，他和妻子就偷偷跑到

我們村的女兒家。雖然我們村都知道崔自高的丈人丈母是大地主，可崔自高是貧農是村幹部，有人悄悄貼過幾張大字報，但不敢動手。這倆老人在我們村一直生活到死，崔自高披麻戴孝打發老人入土。村裏人稱贊老人有眼光，稱贊崔自高有情義。我小時還見過崔自高的丈人，每天坐在崔自高門前的石墩上，有時和人聊天，有時端一把茶壺靜靜地喝茶。有一回老人還用一截樹枝在地上劃著教我認字，具體是什麼字現在早已忘記。老人個頭不高、清瘦，兩眼深邃而滄桑。

如今崔自高生活更滋潤了，兩個大兒子做買賣，三兒子大學畢業留在了省城。去年春節我回老家去給崔自高拜年，他家闊院大屋，家電齊全，比我在城市都舒適。臨出門時崔自高又把我喊住，說：“老侄子，我得求你幫幫忙。”我說啥事。他說開春了我想給孩子的姥爺姥娘立一塊碑，你是文化人，請你給寫幾句話。我說沒問題。然而，我因為忙，一直沒回老家，碑文的事也一直沒幫上忙。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本是兩情相悅的婚姻，突然就有了階級性，時代又讓門當戶對的老習慣演繹出了新內容。親不親，階級分，也是此時婚姻的主旋律。

我村的光棍有兩類，一類是因為窮而打光棍，再一類是因為家庭成分高而成光棍。那個年代，因為窮而打光棍比因為成分高而打光棍似乎好辦一些。窮可以改變，而成分卻帶有遺傳性，所以那些地主富農子弟的婚姻就成為另類。村裏只有崔滿倉一戶地主，而且沒有子弟，發愁的是那些富農和富裕中農的子弟們。雲興在村裏是出類拔萃的年輕人，高個頭，臉白淨，學習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是班裏眾多女生心儀的白馬王子，可因為家庭是富農成分，成績優異的他初中畢業不得不告別書本而回到田野。

可是聰明的雲興回到生產隊同樣讓人高看一眼。農機出了毛病，別人吭哧半天修不好，雲興看看圖紙三兩下就手到病除，高興得隊長直拍雲興肩膀頭。雲興在學校就是文藝骨幹，一支橫笛吹得行雲流水如泣如訴。夜晚生產隊開會前，雲興的橫笛都是保留節目。一曲終了，大家意猶未盡，還支棱著耳朵。自然，出眾的雲興也得到了村裏姑娘們愛慕。大多只放在心裏，可蓮花就不一樣。她也是初中畢業，她就敢把愛慕寫在臉上和行動上，經常藉故找雲興聊天，給雲興買手絹、洗衣服，幹活時也是你幫我我幫你。漸漸，關於二人戀愛的信息就成為村人議論的話題。蓮花家是貧農，她的爹娘不能容忍女兒跟一個富農子弟戀愛。多次勸說和打罵無效，匆匆忙忙把女兒嫁給了鄰村一個貧農子弟。那一陣子，雲興像傻了一樣整日不語，總是一個人默默發呆。晚上一個人坐在院子裏吹橫笛，聲音淒切，令人心酸。

因家庭成分，雲興三十歲才成家，而且是妹妹給換的，妹妹嫁的那個男人是地主子弟。雲興今年六十歲，今春大奶奶過世，我回老家奔喪，在葬禮上見到了滿臉皺紋的雲興。不過他不是來幫助料理喪事的，他是我們家花錢請來的響器班子中的一員。他憑一支爐火純青的橫笛加入了響器班子。休息時我與雲興打了招呼，他說孩子都成家了，就地裏那點活兒，不忙了跟著人家掙個零花錢。

他屋里根把好 哥 巴

X 爹是我們隊的老貧農，有兩個女兒。這兩姊妹雖然沒讀過什麼書，穿得也不怎麼好，但臉龐紅潤，面容姣好，勤勞開朗，渾身上下透了一種健康、淳樸的美。來提親的不少，可是對那些看似條件不錯的人家，X 爹却一概沒應允。

X 爹要把女兒放給什麼人家？一個驚人的消息最終傳來：X 爹把他的大女兒許配給本大隊的地主子弟了。大隊支書坐不住了，跑到 X 爹家說：“你一個老貧農要站穩階級立場啊！



這麼多好人家你不放，爲什麼要放到四類分子家？”大隊支書大道理、利害關係講了一大籮，X 爹就是不聽。問他看上地主家什麼了，他沒啥詞兒，只是說“他屋里根把好”。

過了兩年，二女兒又要放人家了。與上次一樣，X 爹又把女兒放給了一個地主子弟。不消說，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的大隊支書又跑到 X 爹家。做思想工作無效後，支書祭出他的殺手鐮——要開群眾大會鬥他。鬥就鬥，老貧農 X 爹不吃這一套。問他爲什麼要把二女放給地主家，他還是那句話——“他屋里根把好”。

“他屋里根把好”，當時人人都說 X 爹在說胡話。不過這句話幾年後驗證了。改革開放後，X 爹的兩個女婿很快成爲當地富戶，最先砌了新屋，很快又幫岳父和兩個小舅子砌了新屋。什麼是“根把好”？我也大概明白一點了。

## 李香芝之死 魯 民

李香芝，山東陽信人，17 歲參軍入伍，1950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2 年作爲 23 軍文工團員隨軍入朝參戰，1955 年歸國，轉業到地方，先後任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文藝科科員，杭州話劇團演員、副團長，南京歌舞團副團長，江蘇省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

李香芝 1 歲喪父，6 歲時母親改嫁，先後由外祖母和伯父撫養。七八歲時祖父當上本村村長。9 歲時伯父當了漢奸，做到團長，至 1945 年已成爲本地的一個大地主。孤女李香芝，從小就被伯父指派去看地、看樹、撿柴、收割。10 歲時，伯父全家遷到陽信縣城內居住，香芝才得入小學讀書。逐漸懂事的李香芝打聽到母親的下落後，多次要求探望，均遭伯父母拒絕。14 歲時，伯父母強令她與本縣一個區長的兒子結婚，她決心逃出家庭牢籠。1947 年春，在參加革命的同學幫助下，李香芝逃出封建家庭，進入山東抗大文藝系學習，同年 12 月分配到軍大文工團。

從參加革命開始，李香芝就把自己的心毫無保留地交給了共產黨。她曾給共產黨的縣長嚴清泰去過兩封信，揭發其伯父的罪惡，表示和家庭脫離關係，并把所知家中藏浮財的地點報告給組織。

由于表現好，在朝鮮停戰前半年，組織上調李香芝回國，到北京中央歌舞團聲樂訓練班學習音樂。半年後，部隊整編，李香芝轉業至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工作。1958 年秋，李香芝隨在空軍當飛行員的丈夫姚秀琪調到杭州，前任杭州話劇團演員，後任副團長，再後又調到南京工作。李香芝工作勤懇，爲人正直，曾跟友人說過：“1958 年經濟失調，毛主席有沒有責任？不能把什麼過錯都推在劉少奇身上啊！”“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意見書，怎麼能說是反毛主席呀？”“報上說毛主席比馬列還要高明，未免過頭了。”“毛主席爲什麼把自己的老婆捧得這麼高？”

1966 年，李香芝經過一陣迷茫，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被推選爲江蘇省歌舞團紅色造反隊的勤務組成員。要造反就要寫大字報，揭發修正主義路線在省歌舞團的表現。李香芝想來想去沒別的可揭發，只是覺得歌舞團挑選演員爲首長陪舞是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就與一些人商量，聯合寫出了一份大字報，說我們江蘇歌舞團長期以來不務正業，大搞交際舞，光做衣服就花了 6 萬元，買西洋樂器花了 10 萬元，還在江蘇飯店舉辦訓練班，每人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畢業。舞會上的音樂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練功也

搞不成，簡直把我們歌舞團的女同志當成了舞女。

她還寫了一份意見書，準備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長帶頭不要找演員去陪舞。考慮到這樣弄不好會被打成右派——1957 年自己就因為說話走火，被劃為中右，最後她把這份已寫成的意見書燒了。

1967 年 1 月 26 日，南京的造反派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奪取了江蘇省和南京市的黨政大權，大打派仗。李香芝心灰意懶，又生了肝病，退出了造反派組織。

1968 年，江蘇省成立革命委員會以後，開始殘酷迫害幹部群眾。第一個迫害步驟是清理階級隊伍，各機關團體都辦起了非法拘留人的“牛棚”。李香芝被從醫院裏揪出來，關押到南京農學院專設的牛棚。因曾在地主伯父家生活幾年，她被誣稱為地主分子；因轉黨手續不全，她被誣稱是假黨員；因文革初參加一些派性活動，她被說成犯有反黨亂軍罪。有人還揭發她在南京歌舞團用牛奶洗臉，吃包子不吃皮，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事實真相是：“據我所知，（李香芝）用牛奶洗臉有過一次，因為奶沒有吃完，剩了一點擦了一下臉；有一次包子掉在地上怕髒，把皮剝掉了。把這些事說成一貫的，經常的，顯然是有人為的誇張。”經過半年多的關押批鬥，對李香芝的隔離審查取消了。剛從牛棚釋放出來喘口氣，從 1970 年 8 月起，李香芝又作為一打三反的重點對象被關了起來。1972 年 2 月，李香芝被誣為現行反革命分子，正式逮捕入獄。“揪李香芝戰鬥隊”指控她態度惡劣，她却罵戰鬥隊是反革命，隨後發展到拒絕學習毛主席語錄。他們要她站在毛主席像前請罪，她死也不幹，昂首挺立，兩手往口袋裏一插，傲氣不可一世。

堅貞不屈的李香芝最終還是被逼瘋了。在大寒天裏，她脫得只剩內衣，在囚室通宵跳舞，無緣無故地大哭大笑。他們說李香芝裝瘋賣傻。1971 年 4 月 18 日，在神經失常的情況下，李香芝寫出一些瘋話。除寫了一位女演員在陪舞以後發生的一些虛幻故事以外，還說：“到鐵醫以後，操縱我的人污辱我。過了一天，他要我原諒他。到鐵醫樓下時，又來搞我，說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樣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聽毛主席對我講：小香，咱們是為黨工作，受污辱也沒有關係的。并說這確實是工作需要。”“我又想他可能是個壞分子。我就罵他是壞蛋，是德國鬼子，美國鬼子。”“同志們，你們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縱我的神經嗎？真的認為我這樣反毛主席嗎？我相信你們是會幫助我找到這個操縱我的人的。”1971 年 8 月 2 日，江蘇省委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做出批示：“將李犯立即被（逮）捕，關起來，不准任何人提審。”至 23 日，這位負責人又批示：“同意政法組的意見（處以極刑），望力級（立即）執行。”9 月 2 日，林彪出逃前 11 天，李香芝未經任何審判程序，便被倉促拉到江蘇省京劇團禮堂參加公判大會，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李香芝被冤殺後，她的丈夫、資深的人民空軍飛行員，時任南京空軍作戰處作戰參謀的姚秀琪，因受牽連，被下放到南京微分電機廠當工人。兩個女兒也備受歧視，長女姚紅經多次申請也不能入團。姚秀琪不服，多次向黨中央、江蘇省委寫信申訴愛妻蒙受的不白之冤。1979 年 2 月 12 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發文宣布：“李香芝在深挖中無辜被長期隔離審查，在逼供信情況下，造成精神失常，思維紊亂，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應負刑事責任。撤銷原判。”

## 家庭批鬥會 朴女士

我們家是從朝鮮搬到東北的。1952 年我 5 歲，在村子裏玩時，走進一間快要倒的破屋子，門窗都沒了，一進屋就發現幾個人倒在一堆草裏，我認出其中一個是我爸爸。我驚訝地喊了一聲爸爸，爸爸嗯了一聲就不再說話。他們都被反綁著，天氣很冷，只鋪著一堆爛草。我哭著跑回家，問媽媽，爸爸為什麼要在那兒？那兒好冷好破。媽媽趕緊制止我，不讓我哭，

并囑咐我：“你還太小，以後別問這些事了。”看得出，媽媽好怕。1954 年，趕上三反，爸爸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

上初二時我已經寫過十幾次入團申請書。有一次，老師說要跟我談話，我以為是談吸收我入團的問題，沒想到老師竟這樣告訴我：我各方面表現都很好，老師特別喜歡我。如果不是我的家庭成分有問題，我早就能夠入團了。老師叫我以後不要再寫入團申請書了，寫了也不會有結果。放學後，我獨自一人趴在教室裏哭。眼睛哭腫了，我不敢回家，怕被別人看見，也怕家人看到為我傷心，只好等到天黑悄悄往回走。

東北的冬天特別冷。剛到家門口，爸爸早已在門外等我入團的好消息。此前我已告訴家人，老師要跟我談入團的事。爸爸迫不及待地問我談的如何，我強裝笑臉喊了一聲爸，就再也控制不住，撲在爸爸懷裏哭了起來。爸爸極力安慰我：“都怪爸爸的出身不好。”可是我知道，爸爸的心裏比我更難過。

有一次五四青年節，學校排節目，音樂老師安排我打小鼓。忽然得到這種機會，我和全家都高興的不得了。那個年代，孤獨、自卑和歧視牢牢籠罩我們全家。為了我參加節目表演，家人拿出僅有的積蓄，為我做了新衣。五四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著新衣服來到學校。可是因家庭成分，我被臨時取消了演出資格。15 歲的我，心已經死亡。

姑姑那時是街道婦女主任，是幹部培養對象，領導要她必須和自己的親哥哥（我爸爸）劃清界限。我叔叔家的三個孩子，老大是縣武裝部長，老二是工廠廠長，老三是縣政府工作人員，也必須和自己的親伯伯（我爸爸）劃清界限。文革的第二年，姑姑組織我們家族的 30 多名親戚朋友，搞了一次對我爸爸的家庭批鬥會。

那是 7 月的一天，姑姑帶著這一大幫親友，高喊著無產階級專政萬歲、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口號來到我家。爸爸幾乎整天挨鬥，渾身是傷，在家裏躺著。看到姑姑來了，爸爸艱難地爬起來問候了一句：“你來了。”姑姑開口吼道：“樸和均，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告訴你！老老實實交待問題！要不決沒有好下場！”那年爸爸已經 65 歲了，比我姑姑大了整整 35 歲。在我們朝鮮族，年齡小的對年齡大的這樣不敬，那是大逆不道。可是在那個荒謬悖逆的年代，爸爸只好忍氣吞聲：“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文革兩派，無論哪一派搞批鬥會，都要把我爸爸抓去，在他脖子上挂上幾十斤重的濕木板子，上寫“歷史反革命分子樸和均”，名字上還紅筆劃一個大叉號。爸爸的脖子幾乎天天血肉模糊，臉腫得認不出來，脖子和頭一樣粗。姑姑接著吼：“你還坐著幹啥？站起來！”爸爸低著頭，彎著腰，哆哆嗦嗦硬撐著站了起來。爸爸血肉模糊的脖子上再一次被他的親人挂上了那個不知挂了多少回的大濕木板。

姑姑逼爸爸背毛語錄，爸爸全身發抖，結結巴巴背不出來。姑姑再次怒吼：“你連毛主席語錄都背不出來，你有什麼資格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三堂哥掏出手槍對準我爸爸氣汹汹地喊：“你知不知道槍杆子裏面出政權？！你說！你說！”他們邊喊邊靠近我爸爸，已經六親不認。我從五歲開始就親眼看爸爸一次次被抓、被打、被抄家，敢怒不敢言，可是當我看到了我的堂哥和姑姑也變得這樣沒有人性時，我憤怒了。我沖過去，擋在他們面前，一邊保護著我爸爸一邊大聲吼道：“你們來幹啥？！滾出去！”二堂兄啪啪打了我兩個嘴巴，邊打邊罵我：“該死的，你幹啥？！你為什麼還不劃清界限？！”我被重重打倒在地。二堂兄、三堂兄同時用手槍指著我爸爸喊：“你知不知道什麼是垃圾？你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垃圾！”看到我被打倒，我的媽媽和嫂子哭作一團。爸爸只好在自己的親妹妹和親侄子等 30 多位親戚面前連聲說：“是，是，我知道，我知道。”

1967 年 9 月，也就是遭受家庭批鬥會兩個月後，爸爸被抓到林業局農場接受改造。不准家人探望，沒有任何爸爸的消息。一年半以後的 1969 年 4 月 18 日，勞改農場來人通知我們：樸和均已經死了，趕快去辦理後事。

爸爸被扔到一個亂石堆裏，一條破被子裹著。我哭著說：“爸爸，讓我再看看你的臉吧。”

這哪是我的爸爸？臉已被打得認不出模樣了。現場監視的人擔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帽子，連一把鍬都不敢借給我們。我們全家只好一邊哭，一邊用手挖了一個不大的坑，草草掩埋了父親。

補白：川南筠連縣原沐愛區中心鄉，有個李姓女地主，三十來歲，容貌姣好，鄉村痞子對其垂涎三尺却無計可施。該女一直信佛，長期素食，不沾葷腥。土改中，幾個流氓借鬥爭地主之名，對她進行百般侮辱戲弄，一次弄來幾塊肉，叫她當眾吃下，稱：“現在毛主席共產黨來了，要打倒封建迷信，不准你再吃素，馬上給我開葷，把肉吃下去！”李姓女子死也不肯吃。他們先是對她拳打腳踢，後又强行把肉往她嘴裏塞。剛烈的她，把塞進嘴裏的肉吐到痞子們的身上、臉上。一個流氓獸性大發，抓來一條黃鱔，當眾扯下李氏女的褲子，破口大罵：“你上面不吃葷，老子給你下面開個葷！”其他幾個痞子幫著作惡，扯手按腳，將黃鱔塞進了李姓女子的陰道。李姓女子在屈辱、羞憤和極度驚恐中被活活弄死。 嚴家偉

#### 丈夫被害之後 陸雲芳

從反右到文革的 10 年裏，我們的大家庭失去 3 位成員。我丈夫的三妹夫在廣西賓陽縣宣傳部工作，因響應號召給黨提意見被打成右派，妻子（我丈夫的三妹）被逼與他離婚，否則開除黨籍和公職。當時三妹已是 3 個孩子的母親，最小的孩子才 7 個月。爲了孩子將來不被歧視，三妹只好含淚和心愛的丈夫離婚。後來三妹夫被送勞改，折磨致死。我丈夫的四妹夫是共軍的一個團級幹部，文革一開始就被扣上反黨、反革命的帽子，次年含冤去世，丟下 2 個年幼的孤兒和年輕的妻子。

我的丈夫從部隊復員後在縣中學教語文，并擔任語文教研組組長。文革一來，被該校造反組織扣上 34 條罪狀，誣衊他是歷史反革命。1968 年 8 月 15 日，縣革委會把全縣中小學教師集中到我丈夫所在的中學，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主要負責人是縣革委會副主任齊某。當時我是一名小學教師，也被迫參加這個學習班。因人太多，這所中學住不下，就分散到縣城內各小學，每個小學是一個點，每個教師都不能隨便離開住地，違者嚴懲。

第二天，所有教師都被召集起來，聽齊某的動員報告。齊某要各個點的負責人狠抓階級鬥爭，把混在教師隊伍中的階級敵人揪出來，鬥垮鬥臭。我丈夫早已是階級敵人，我也被定爲階級敵人。鬥階級敵人的手段花樣百出，剃十字頭，罰跪，反手綁，拳打腳踢，棍子打，等等。逢集市的時候（三天一集市），白天拴著我們上街游鬥，強令我們敲著口盅、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或“我是反革命分子”。喊聲不够大，跟在後面人就推打。晚上回住地，繼續在學習班批鬥。學習班開班第四天，即 8 月 19 日晚上，我丈夫和他的副校長，被綁著拉到該校的池塘邊，用步槍上的刺刀刺了很多刀，活活刺死，然後扔到池塘。

我們一家 6 口（4 個孩子）原住在丈夫學校的宿舍裏。1967 年我和孩子們被趕出學校宿舍，家庭被拆散。在學習班上，我和丈夫也不在一個點。丈夫慘死的當晚，我一無所知。次日早上，我像往常一樣給丈夫送早餐。他不在宿舍，我感到不妙。在校院內，有人告訴我，丈夫昨晚被革命群眾打死在池塘裏了。我驚呆了，悲憤難抑，立即去找齊某。我質問他：“是誰打死我丈夫？你打算怎樣處理？”他惡狠狠地說，你丈夫幹了很多壞事，被革命群眾打死有什麼好處理，說完轉身就走。我的泪水只有往肚裏咽，悲憤只能埋在心中。這世道那有地方伸冤啊！我回家先把這不幸的消息小聲告訴我媽，以免幼小的孩子聽到哭著要爸爸。我媽聽到噩耗也驚呆了，泪流滿面，說：“冤啊，誰這樣害他啊？”我 4 歲就沒了爸爸，如今運動又把她唯一女兒的丈夫奪走了，剩下母女一門雙寡！在巨大的打擊下，母親幾天之內就像變了一個人，衰老了許多。

埋葬了丈夫的當天，他的學校就勒令我兩天內把丈夫的東西從他的宿舍全部搬走。次日早上，兩個最小的孩子天真地對我說：“媽媽，我們送飯去給爸爸吃吧？”聽到這話，我的心都碎了。丈夫生前很疼愛孩子，一到吃飯時間，孩子們就想起爸爸。丈夫未被隔離前，最小的孩子想睡覺時就叫爸爸抱，摸著爸爸的耳朵才肯睡。我含著淚對他們說：“爸爸永遠不會吃我們的飯了。”他們問為什麼，我說他不在了。他們的臉馬上沉了下來。好長一段時間，他們的臉再也沒有笑容。年邁的公公、婆婆得知兒子的死訊，哭得死去活來。公公泪流滿面，說過去我靠一條扁擔挑在肩上養活一家 14 口，那麼艱難，我沒有流過淚。戰亂年代，我的兒子投奔共產黨的軍隊鬧革命，沒有死在國民黨的槍下，現在竟慘死在他一直為之奮鬥的共產黨手裏，讓我老年喪子，白發送黑髮，真冤啊！

丈夫死後的第三天，他們派人叫我回學習班繼續迫害。他們用繩子綁我、打我，叫我跪下，有時一跪就是三四個小時。丈夫沒死時，我不被挂牌，他死後我挂牌了，上寫“歷史反革命分子某某的臭老婆某某”。晚上我請求他們讓我回家住宿，以便照顧老人和孩子。一個傢伙說，你回去就挂牌回去。我說，請你看在我年老母親面上，不要叫我挂牌回家。她看見這塊牌，打擊太大了，會受不了的。她要是再出什麼問題，就沒人幫我看管這幾個孩子了。他凶狠地回答說：“不行！”無奈，我只好天天挂著這張牌回家，快到門口時就拿下，把字翻過來，放到門背後去，以免母親看到受不了。

在將近 3 個月的學習班裏，他們強加給我莫須有的罪名，說我好大的膽子，丈夫死了竟敢去問齊副主任如何處理，想為反革命分子翻案，誣蔑我參加反共救國軍，是救國軍的聯絡員。他們一共列了八條提綱，圍繞這幾個問題批鬥我，沒有一天不罰跪挨打。

10 月底，血腥的學習班結束了。在我所在的學習點，有 2 個老師被迫害致死。我丈夫學校的那個點，死了 4 個（1 個書記、1 個副校長、我丈夫和 1 位女教師），其他點死多少人，我不得而知。學習班結束後，他們不讓我回學校上課，把我趕到農村生產隊，一邊接受勞動監督，一邊繼續寫交代，交代得好還可以當老師，交代不好就永遠別想當老師了。當時我的工資每月 34 元，他們只發給我 21 元，只夠買 6 個人的口糧，一點多餘的錢都沒有。

我什麼交代也不寫，我沒幹壞事，沒什麼好寫。我恢復工作後，孩子們仍然處處受歧視。一天晚上，媽媽上公廁，兩個最小的孩子在外面等，鄰居的兩個十四五的少年竟用木板鞋把我最小的兒子的頭打得鮮血直流。派出所一位姓石的警察看到了，立即把受傷的孩子送去醫院救治。我趕到醫院，看到小兒子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的兩件衣服都被血滲透了。我的心好疼啊！趕把兒子抱在懷裏。護士拿著藥和繃帶給兒子包扎，說誰把孩子打成這樣，真是太狠心了。

1976 年文革結束。據 1984 年官方透露，我所在的縣，30 萬人口，文革期間就被迫害死了 2200 多人。有一個鄉鎮，一天就死了 160 多人。文革過去 30 多年了，但中國人民的苦難並沒有結束，因為給中國人民帶來苦難的根本原因並沒有消除。

祖母曾被共妻 王文怡

文革開始，父親一夜之間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起初大人瞞著我們姐弟二人，我問奶奶究竟怎麼回事。原來父親早年因爺爺去世，為生活所迫報考了國民黨憲兵軍官學校，因為軍校不用交學費。

被隔離審查的父親天天做檢查，不久安排他為造反派雙方抄寫大字報。父親練得一手端正清秀的正楷毛筆字。每張大字報，開頭都必須寫上“敬祝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有一天父親抄錯一個關鍵字，將“萬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貼出 14 天后才被發現。對父親的迫害陡然升級，動不動就被拉去痛打一頓，成為雙料反革命（歷

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母親也時常被拉去陪鬥。父親最後被送往農場勞改。

父親剛被隔離時，我天天到群眾專政委員會給父親送報紙，路上常被一些半大孩子圍追著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不知如何應對，只會背地抹眼淚。過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顯冷淡了。一次，不到 6 歲的弟弟被一群十幾歲的男孩子圍毆、謾罵，為躲避挨打，嚇得竟爬到樹上躲避。我聞訊趕去解圍，換來的只是譏笑、辱罵。情急之下，我撿起半塊磚頭向領頭的砸去。他們看我真要拼命，一轟而散。驚恐萬分的小弟從樹上下來，嚎啕大哭。

年邁的老奶奶，以前從不談論國事。我常琢磨著問她一些往事，她總閉而不談，有時自己呆坐在窗前，長時間流淚。奶奶雖然裹小腳，却識字，整天拿本《雷鋒的故事》讀。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奶奶震動很大，常常像講故事式地自言自語給我們說過去的事。我們開始對奶奶的經歷有所瞭解。奶奶 27 歲守寡，潔身自好，誓不再嫁。五十年代初，誓約被無情打破，她被分給一個貧雇農做老婆。1956 年父親回到北京家鄉時才將她“贖”了回來。

黃埔八期鄧祖稷 趙子法

鄧祖稷是黃埔軍校南寧分校第八期學員，1941 年在甘肅省福非縣陸軍步兵學校西北分校被授予少校軍銜，1949 年在湖南衡寶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後在湖北省中南軍政大學任教官。學校日漸由新政權的師資充實，1954 年鄧祖稷受到排斥，回到廣西南寧。當地民政部門以種種理由不予安排工作，無奈之下跟隨父親做煤油燈維持生計。

文革開始，鄧祖稷作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被抓，冠以“歷史反革命分子”，五花大綁，挂著黑牌子沿街游鬥，鬥爭會上一跪就是整天整夜，常常被打得遍體鱗傷，口吐鮮血。家被抄，凡值錢的東西，衣物、用具、錢財都被抄走一空，也不留收條，如同被土匪洗劫，幼小的子女戰戰兢兢，哭泣都不敢出聲。

1969 年，鄧祖稷全家 6 口被強迫送回原籍廣西扶綏縣，接受貧下中農的管制勞動。在此期間，一切權利均被剝奪，並經常被社員開會鬥爭，交待歷史反革命罪行。鄧家祖屋後牆的排水溝被鄰人霸占，在上面蓋起廚房，致使鄧家的房屋不能排水，牆基常被水泡，作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鄧祖稷却一直不敢怒也不敢言。

1978 年政治形勢變化，鄧祖稷得以携妻子回到南寧。表面上他的歷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摘去了，暗地裏却仍在接受監督改造。80 年代初，中國處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遺留問題，包括退回被抄財物和補償問題。當地政府告訴鄧祖稷：“當時抄家也不是政府去抄你的家，像你這樣的歷史反革命，屬於敵我矛盾，不在退回被抄財產和補償之列。”文革的十年血泪就這樣不了了之。

1989 年當地政府核發住房宅地使用證，鄧祖稷發現那排水溝的使用權已不屬己有。當時到處都在強調以法治國，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鄧祖稷抱著也許能討回個公道的想法，多次找村委會、鎮政府，要求主持公道，最後得到的調解書竟把 0.93 米寬的排水溝變為 0.3 米。0.3 米寬，無法進去打掃衛生和維修，鄧祖稷多次找發證部門反映，政府工作人員文善威却回答道：“這條水溝從前是你的，但是現在你們相爭，我就收為公用，30 公分寬的排水溝為公用，不服你去告吧。”

1990 年，鄧祖稷到廣西扶綏縣法院起訴。法院遲遲不接訴，接訴後又遲遲不開庭，最後判決又偏袒被告，連這 30 公分寬的水溝地都不承認了。鄧不服判決，又上告到廣西南寧地區中級法院。南寧中院的判決出爾反爾，改了又改。當年捨命抗日保國的鄧祖稷，到頭來連自己家的排水溝也保護不了。1993 年 7 月 25 日，老人昏倒在去南寧扶綏縣法院的路上，一瞑不視，享年 78 歲。

補白：阿興姓楊，人高大魁偉。土改時，其家有四十畝地，另租四十畝，雇工一二人，共耕種此八十畝地，被劃為地主，送浙江安吉勞改。勞改場買來一耕牛，性暴烈，無人能馭，于是打報告請示：牛既不能耕地，當如何處理。指導員批復，留著無用，殺了吃。地主阿興就去跟指導員說，此牛是頭好耕牛，殺了可惜，遭粗聲責斥：“你說是好耕牛，難道你能讓它耕地嗎？”阿興低聲答：“能。”但有一條件，“讓我先放它半月”。指導員答應了。此半月，阿興精心放牧飼養那牛，人牛建立了感情，牛變得很聽話。半月時間到，牛上轆了，拉犁了，很順服地聽阿興使喚。牛一旦能上轆，耕上地，成了習慣，其他人也就能駕馭了。那些很強悍的勞改青壯年，大概有報復牛的心理，超負荷用牛耕地，把牛腿累癱了。牛又不能耕地了，又打報告。指導員無法，批復：“殺！”阿興又去求告：“X 政府（犯人對指導員的稱呼），請你派倆政府監督我上山采找草藥，牛腿可以醫好，千萬不要殺它，它是一頭好耕牛呵！”又經阿興半個月的精心治療調養，牛痊愈了，又可耕地了。

-----

## 父親尹煌沉冤 尹建雲

父親尹煌，1913 年 5 月 8 日出生于湖南湘鄉市育段鄉東塘村王家屋場。1927 年參加國民黨部隊，1934 年在武漢參加地下黨，1939 年考入黃埔軍校，16 期畢業。抗日戰爭時期，父親衝鋒陷陣，先後參加 6 次戰役。在溫州野戰醫院搶救時，從身體的不同部位取出好幾塊彈片。部隊安排回家休養一年，傷未愈又奔赴抗日前線。1948 年 9 月，父親與解放軍四野聯繫，率部投誠，先後被任命為湖南軍區第四縱隊第一團第一營營長、湖南軍區第四縱隊第三支隊第一大隊大隊長，為湖南長沙和平解放做出很大貢獻。後調入 47 軍 145 師，任作戰參謀，參加湘西剿匪。全國解放後進入南岳軍政大學深造，是湖南軍區重點培養和發展的中堅人才。

????不料此時禍從天降。1952 年，湘鄉縣政府通知父親從南岳軍政大學返鄉。人未到家，中途秘密被捕，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未履行任何必備的法律程序，也未通知家人，一張白紙公告（公章都沒一個），就把父親槍斃在湘鄉夏梓橋連水河的沙灘上（農曆七月初十日）。

時隔 3 日，一位在湘鄉街頭做小生意的鄉鄰，冒險到我家告知此事。全家人無法相信事實，我家大門上還挂著“軍屬光榮”的牌匾。當天中午，我和哥哥（15 歲和 16 歲）冒著烈日，步行數十里火速趕到吾父喪生之地。沙灘上插了一塊一米長的竹板，上書“尹俊超，現名尹煌”。見此慘景，兄弟倆頓覺天旋地轉，哀號父親，雙手扒開埋在父親身上的沙土。父親赤著雙腳，身上只穿一件短襯衣和一條內短褲，雙眼圓睜。真是親人血脈相連，扶起父親時，一股鮮紅的鼻血從父親鼻孔噴出，噴到我們兄弟身上。

吾父死後，全家立即陷入滅頂之災。此後的 32 年裏，父親的“反革命”罪名導致親人一個非正常死亡，一個終身致殘，一個失去工作就業權，升學、就業、入黨、入團、參軍收到影響的直系、旁系親屬數十人。

1985 年 3 月，我家等來了湘鄉市有關部門送達的《湖南省湘鄉市人民法院[85]法刑查字第 06 號刑事判決書》和 400 元的補償款。判決書撤銷 1952 年對尹煌判處死刑的決定，恢復起義人員名譽。我們對為父親恢復名譽的草率認定和微不足道的補償款不服，不在送達書上簽字，期待著黨和國家及部隊的有關部門給我父親一個公正的認定。但期望無果，一些腐敗官員多次無理關押我們夫妻倆和兒子。今年（2010 年）6 月 10 日，市委書記李世宏下令市法制辦主持公開聽證。法制辦書記公開承諾，9 月 10 日前一定解決此案。

時間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也是古稀之人了。我父親尹煌，為國為民做出了重大貢獻却如此蒙冤，當地政府不但不安慰功臣之後，反而屢次報復，天理何在？請求上級領導為我

主持公道，讓吾父尹煌在九泉之下安息！

補白：鎮反的最大特點是根據地區人口按比例殺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鎮反的第二個特點是沒有法律程序，定罪殺人依據領導指示和個人體認，追求速度和痛快，根本無視法律。中國傳統法律的長處在於刑法和行政法，受到中外法制史學者的高度評價，不僅為世界各文明國家同時代的法制水平所不及，而且許多內容完全可以達到現代法律的水準。清末民初，汲取西方法制思想，制定了一系列新法。中共建國後廢除已有法律，又不頒布新法，直到 1979 年，全國人大才通過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部刑法。鎮反的第三個特點是濫殺無辜。有上面兩個特點，必然就有這第三個特點，也可以說這第三個特點是前兩個特點的必然結果。

-----

### 西藏的一打三反 唯 色

赤列曲珍是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動分子。1970 年 2 月的一天，拉薩人傾城而出，被帶往公審赤列曲珍的大會現場——拉薩人民體育場和南郊流沙河刑場，接受觸目驚心的階級教育。身穿暗紅色氍毹藏袍的赤列曲珍，身體瘦弱。2001 年，一位曾在西藏當兵、工作 30 多年的漢人老先生告訴我，當時他就站在赤列曲珍的跟前，目睹了赤列曲珍被槍斃：“那簡直比張志新還慘！”“她的喉管也被割了嗎？”“是的。怕她喊口號，擾亂人心。不但把她的喉管割了，還用幾根鐵絲穿透了她的腮幫。從這邊穿到那邊，再緊緊地拴在腦後。結果滿嘴、滿臉都流著血，胸前也是血，慘不忍睹。”“她當時還活著嗎？”“還活著，可是就跟死了差不多。”

當時西藏也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許許多多的西藏人家破人亡。不久又一打三反，其殘酷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人因不堪恐怖與貧困，逃往印度等周邊國家。不幸被抓獲的，以叛國分子的罪名嚴懲。20 歲的圖登晉美是拉薩中學高 66 班的學生，與女朋友華小青（半藏半漢）逃亡時被捕。小青在監獄裏遭到管制人員強姦，當晚自殺，晉美被公審處決。槍斃圖登晉美那天，五花大綁，背上插一塊牌子，脖子上捆著繩子。到刑場時，圖登已經被死了，臉腫得很大，慘白。昔日的貴族官員、文革時的“牛鬼蛇神”桑頗才旺仁增的小兒子也因企圖越境被槍斃。與其一起圖謀逃亡的 3 人，2 人被槍斃，一個女孩被判 20 年徒刑。1958 年被任命為西藏軍區副司令員的桑頗，親眼見兒子喪命於解放軍的槍下。

有外逃的打算也會招致殺身之禍。在山南加查縣與曲松縣之間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時，幾個家庭出身屬於領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輕人，不堪生活艱難和精神壓抑，言談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同伴格桑強久告密。修路隊的領導立即上報，從拉薩派來了數名解放軍，將幾個年輕人全部逮捕。不久，16 歲的東覺和 14 歲的次多被公審槍斃，18 歲的索朗勒扎在獄中被打死，被中共盛贊為愛國上層人士的擦珠活佛的一個 16 歲的外甥，被判刑 20 年。

河壩林居委會的一位瘋尼姑，60 多歲，因將毛像倒貼在牆上被槍斃。曾擔任拉薩市參事委員會委員的群覺，40 年代在某縣當秘書時曾將攝政王熱振活佛手下一個違法的商人施予重刑致死，此時此事也被翻騰出來，判處死刑。1960 年，拉薩穆斯林要求劃歸外籍，發生拒糧事件，一位活躍的回族穆斯林被當作叛亂分子處決。

無論公審還是處決，其親屬必須站在前排“接受教育”，而且既不准收尸，還要上交繩索費和子彈費，並須公開表態感謝黨消滅了階級敵人。很多人在獄中不堪折磨而自殺，也有人被虐待致死。

寬敞的拉薩人民體育場成為集合數萬人的公審大會會場，殺人的刑場則有好幾處，如沙



拉寺天葬台附近、獻多電廠旁邊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邊的天葬台附近、流沙河一帶。在天葬台附近執行死刑，并非爲了將那些被處決者按照西藏傳統葬俗就地天葬。天葬習俗屬於四舊，早已禁絕。在解放軍軍人的槍聲中，一個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一頭栽倒在草草挖就的亂坑中，有的人甚至腳掌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1970 年和 1971 年被槍斃的人之多，僅因 1969 年“再叛亂”被法院判決槍斃的就有 295 人。後來這 295 人有的被認爲殺錯了，予以平反，先後給家人安慰費 200 元和 800 元。很多人認爲，被槍斃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因爲光是邊壩和丁青兩個縣，一次就槍斃過 100 多人。絕大多數被槍斃的人至今沒有獲得平反。漢人陶長松說：“藏族人太老實了，槍斃他們的時時候說突幾切（謝謝），給他們 200 元的時候也說突幾切，給他們 800 元的時候還是說突幾切，這些藏族人實在是可憐啊。”

雲龍和雨龍 王德邦

1972 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快放學時，忽有五六個民兵在一個大隊幹部的帶領下熱熱鬧鬧地從校門口經過，其中兩個民兵還背著步槍，他們中間還跟著兩個個頭跟我們相仿的男孩，老師和學生都來圍觀。兩個男孩一下見來這麼多孩子，儘量往大人後邊靠。那大隊幹部大聲喊：“雲龍、雨龍，你們過來。”兩個本想躲閃的孩子怯怯地走了過去。那幹部告訴老師：“那稍高一點叫雲龍，矮的叫雨龍，是王時仙的仔。”老師恍然大悟：“原來你們是去接他們回來。真是不覺過去四五年了，看他們都長這麼大了。”

去接這兩個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傳一段時間了。有些村民不同意這麼做，認爲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歲，小的不足八歲，接回來以後怎麼生活？然而大隊幹部與村中一些階級覺悟高的群眾的觀點相反，說必須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動權。

王時仙是我們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幾代單傳，積累下來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還算個大村，有兩百多口人，不劃出個地主說不過去，就定了王家。當時王時仙還不足十五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改造多年，比貧農還貧農的王時仙一下成了專政的重點。1968 年，在大隊的一次大批鬥之後，王時仙終於死了。關於他的死，有說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說是把頭按在水中溺死的，還有說是用電電死的。王時仙當時不到三十歲，撇下了五歲多的雲龍、三歲多的雨龍和一歲多的女兒。在極度恐懼中，王時仙的妻子帶著三個孩子逃回離我村有近二十裏山路的娘家。

轉眼六年過去了，村中一些幹部看別村階級鬥爭熱火朝天，深感本村沒地主可鬥的寂寞，于是就要求將地主的兒子帶回村來接受改造。我村屬廣西，雲龍、雨龍的外婆家屬湖南，在那個糧食緊張、戶口管理極嚴的年代，跨省要人回來，手續是很麻煩的。然而當時階級鬥爭掛帥，一切給階級鬥爭讓路。由大隊幹部出面，基幹民兵爲主，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隊，先後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當局積極配合下，工作隊終於如願接回了小地主雲龍、雨龍。

他們原本想將三個地主仔一起接回來，由于那村一批覺悟不高的群眾出來勸阻，更兼地主婆（王時仙的妻子）牽著那六歲的女兒跪地哀求，村裏許多群眾也跟著下跪，工作組就高抬貴手了。不過已經說好，待孩子長到十歲後，還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隊幹部對師生、村民繪聲繪色地講著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輝煌的歷程，兩個地主孩子却在那裏偷偷落淚。故事講完，大隊幹部極爲榮耀地帶著自己的戰利品——兩個地主仔，在村民簇擁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沒人住、也無人管的屋，門半掩著。幹部讓兩個地主仔進去，并說這是你們的

老屋。誰知那兩個孩子一聽到老屋，就驚恐得全身顫抖，想轉身逃走。大隊幹部連推帶拉，硬是把他們塞了進去。進屋後，兩個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并哀求那大隊幹部將他們帶到別處去。大隊幹部根本不理會，也不問原因，只交代身邊一個跟來的老農說：“你也算是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幫著照看一點，可別讓他們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問。”老頭唯唯應著。兩個孩子緊張地瑟縮在一塊，村民在暮色中紛紛散去。

我到家時，父母正悄悄議論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親連連嘆息說：“真是作孽啊！那麼小的孩子，今後怎麼生活？讓他們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願進的鬼屋中，他們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時仙祖上留下的。文革開始，革命群眾沖入老屋鬥地主，將王時仙反綁雙手，高吊在屋梁上，要他交代“變天賬”。在反復拉上拉下的吊罰中，王時仙痛苦的喊叫聲響徹全村。每次吊打王時仙，還將一家老少綁屋中觀看。雲龍、雨龍眼睜睜地看著父親被吊打，多次昏死過去，屎尿并流，嚇得大哭，為此他們也挨了紅衛兵的毒打。後來他們的祖母也吊死在這老屋的梁上，祖父也在這屋中被折磨死。

他們母子去姥姥家以後，這屋中再沒人住。村中傳說，雷雨的夜晚常能聽到屋中傳出淒厲的哭喊。村裏大人都不讓孩子到這屋裏來，隊裏也不敢拿這屋存放東西。雲龍兄弟到他老屋時之所以顫抖、哀哭，顯然與當年刻骨銘心的恐怖記憶有關。後來他們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間小房，從側門出入，從不到堂屋去。

我母親與雲龍的母親是同村人，從小就認識，後來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親跟雲龍的母親總是結伴而行。文革期間，我母親每年回外婆家時，總會偷偷去看雲龍的母親。雲龍、雨龍被抓回村後，我們很快成了朋友。母親經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倆。那時大人是不敢明目張膽關心地主仔的。

雲龍、雨龍兄弟被接回村後，就被那些階級覺悟高的幹部像扔垃圾一樣丟棄了，沒有人會想到關心一下他們的生活。兄弟不到參加集體勞動的年齡，沒法掙工分，就承擔了村中的養豬工作。每年將養的豬送到生產隊，按豬的重量結算工分糧食。那年月，連人都吃不飽，拿什麼喂豬？可是養不出豬，年底就分不到糧食，沒糧食就沒法活。養豬難，不養更難，于是兄弟倆只好起早貪黑，到田間地頭扯豬菜。一個近十歲的孩子牽著個近八歲的孩子，無論風雨，每天都得采幾筐豬菜。幾年下來，兄弟倆竟比村中老人還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豬菜時，他們也在努力尋找自己能吃的東西。

采豬菜不易，砍柴更難。煮豬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須走十來裏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擔柴，孩子砍柴就更難了。豬養得不好，糧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倆一年只能分到四百來斤稻穀，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長身體的年齡，這點糧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飽。至于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著從他母親那裏來時穿的那套秋裝，變化的只是不斷增加的補丁。

兄弟倆被從母親身邊帶離時在上學，大的三年級，小的一年級。接回村後，上學就甬想了。哥兒倆對上學充滿嚮往，每看到同齡的孩子背著書包去上學，都遠遠站在路邊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們熟，別的不是欺侮他們，就是遠離他們。每天放學後，我也常幫家中扯豬菜，我們經常相約在學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個小山坡後見面。我曾多次要求他們到校門口等我，但他們堅決不去。他們常常就在那山坡後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裏有一塊地方被他們兄弟臥得連草也生不出來了。他們趴在那裏等我，能清楚看到學校，學校的師生却看不到他們。他們常常早早采好豬食，就到那裏趴著看學校，順便等我。我每次放學後到那坡後，他們就圍著我問當天的學習。我拿出書本給他們看，兄弟倆輪流看語文、數學。爲了這份友情，兄弟倆經常把好不容易采來的豬菜分一些給我。

有一年兒童節，學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游戲節目，歡度節日。結束時天快黑了，我匆匆趕到山坡後，發現雨龍一個人在那坡上已經睡著了。他滿臉泪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著了。我在他身邊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思地擦擦眼睛問：“你放學了？

今天怎麼這麼晚呢？”其實他知道為什麼這麼晚。他肯定在這偷看我們玩遊戲很久了，也肯定因為觸動太大，太傷心了，所以才哭得睡著了。我奇怪他哥怎麼不在，他告訴我說，哥哥有點感冒，先回去了。正說著，哥哥又來了。他也是雙眼紅腫，好像剛從水邊洗臉回來。他見我也不好意識地說：“今天放學真晚噢。我們回家去吧！”兄弟倆都低著頭，我們一起回村。

每年春節，他們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門，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與孩子的嬉鬧聲中，兄弟倆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們思念母親，也深深挂念著自己的妹妹。有幾次我母親回外婆家，他們偷偷將自己省下的好東西，托我母親給媽媽、妹妹帶去，有一次竟將僅有的一隻雞托我母親帶去。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雲龍、雨龍兄弟喜歡到離村較遠的一個高山上去采豬菜，其實那山上並沒有什麼豬菜。有一個星期天，我要求跟他們到那高山上采豬菜。他們儘管不太樂意，也不好拒絕我。到那山上我才發現，他們是為了能遙望他母親所在村後面的高山，猜想著自己的母親也可能會帶著妹妹在那山上幹活。兄弟倆看著，談著，情不自禁地流著淚。

兄弟倆有時候生病，或受傷，或受村中別的孩子毆打，從來沒哭過。除了我曾見過幾次他們哭泣，村中其他人應該很少看到他們流淚。有幾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鬥，村中那些狂熱的階級鬥爭幹部就把他們兄弟倆拉來陪鬥。每到這時，他們兄弟那滿臉的痛苦，實在讓人不忍多看，但這種時候卻從來沒見過他們流淚。他們只是默默低著頭，緊緊咬著嘴唇。有兩次，被激起階級仇恨的群眾沖上臺，毆打別村的被鬥者，順便將他倆也揍了。被扶回家時，他們沒哭，人都走後，他們才縮在被子裏痛哭。多少年後，兄弟倆只要一聽說開大會，就渾身不自覺地發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對地主的階級鬥爭結束了。兄弟倆唯一的願望是回到自己母親身邊，因為自1972年被帶離母親後，母子就再未見過面。

李先生來信：焦博士你好！謝謝你發來的《地主專號》。感謝你的辛勤耕耘。我對地主二字充滿了恐懼感。我的曾祖父少年喪父，帶領兩個弟弟打拼，到我爺爺這一輩，歷經兩代人，四五十年時間，土改前在青島郊區嶗山縣置下了幾十畝薄田。五零年老家土改，祖父被槍斃，他的一個弟弟被抓起來，在看管的地方死了。我父親嚇破了膽，窩窩囊囊擔驚受怕一輩子直到去世。土改那年我七歲，不論是上學還是工作，儘管自己很老實，也很努力，還是處處受歧視。地主這個詞對我來說是太沉重了。多多保重！

---

丁先生來信：我有一個朋友，曾做過檢察官，一次交談中告訴我，他去下面縣裏和鄉里搞過平反冤假錯案，見到許多被槍斃的人的卷宗中僅有一張記著名字的白紙，具體事實、證人、證詞等等統統沒有。他感慨地說：“沒想到當年竟是如此草菅人命！”

## 刑場觀禮 百 姓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過的。外婆家在遼西的一個小縣城，那地方有好幾所大監獄。聽說有一座監獄還是製造錢幣的工廠，全國的要犯重犯都關押在此。這些犯人都是無期徒刑或死緩，沒有人能活著出去，要他們來造錢幣最可靠最安全。小縣城的郊區有座亂墳山，叫狼山。一條土路直通狼山的一個小山坳，那兒是一處刑場。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殺人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後，全國都處於一級備戰狀態。國慶前夕，各地都殺了一大批政治犯。死刑犯們面色青白，非常可怕，五花大綁，雙腳砸著粗重的鐵鐐，渾身散發出死牢中特有的那種難聞的氣味，脖子上挂著“現行反革命

犯 XXX”或“殺人犯 XXX”的大牌子。宣判完畢，那大牌子就被翻過來，變成打了大紅叉的死刑標志。接著，又在背上插上名字上畫著一串串紅圈的令箭狀的斬頭標，推推搡搡押上解放牌卡車，伴隨著廣大革命群眾高呼的口號聲，游街示眾，赴刑場槍決。

行刑的隊伍陣容很龐大，由警車、刑車、押送車組成車隊，押送人員由解放軍和民兵組成。那時沒有警笛，是由一輛裝著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裝成的宣傳車在前邊開路，一遍一遍重複廣播判決書的內容，高呼“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之類的毛語錄。雖不是警笛，比警笛還恐怖。

有一個死刑犯叫聞占武，是個現行反革命，臉龐長得像個大男孩，穿著一件髒兮兮的棉軍衣，我至今仍記得他可憐的催人泪下的樣子。在宣判過程中，他一直轉動著那雙好看的，充滿盼望的大眼睛，好像在人群中搜索著什麼，眼角似乎還噙著泪水。與其他“現反”一樣，他嘴中塞了一塊木頭，牲畜嚼子似的鉛絲緊緊地勒過脖頸，嘴角凝固著黑血和口水。在那個年月，這種殘忍的待遇是專門用來對付政治犯的，防止他們呼喊反動口號。當然也是故意做給百姓們看的：看清了，膽敢反革命，就是這下場。行刑車隊出發前，我站得離聞占武很近，隱約聽見車上的他喉嚨咕咕響，似乎是要喊出聲來。圍觀者中，有個女人小聲說道：“唉，那個姓聞的，三個孩子啊，大的才十來歲。”我明白了，他的目光可能是在人群中搜尋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人們議論說，聞占武是個有戰功的前志願軍戰士，復員後在一家小鐵工廠當工人，俠義心腸，人緣好，有文化，能說會道，很有號召力。文革初他組織造反派，貼大字報反對林副統帥，被群眾專政，判了十五年大刑。在獄中聽說林彪出事了，他就大呼自己冤枉，要求釋放平反。鬧了半個多月，終於鬧出了結果，不過這結果與他的願望正相反——不僅沒得釋放，反而被槍斃。

狼山刑場早已人山人海，先期到達的民兵們拉起了長長的警戒綫。由于此地是山坳，人們可以像在古羅馬鬥 西湖慕才亭聯 焦國標書  
獸場裏那樣，居高臨下，將殺人過程看

個一清二楚。刑車開進來了，死囚們被架著拉下了刑車，鐵鐐嘩嘩作響。警察把他們按照指定位置，以標準姿勢一一按跪在地。在人世的最後幾分鐘，他們被剝奪了最後的人格，被迫跪在那些觀看他們受死的人們面前。那些正在“開心”的人民大眾，千頭簇動的圍觀者，其實並非他們的仇人，也並非他們的親人。他們與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為了看熱鬧、尋稀奇，就像看宰殺牲畜。不過更多的人一面大飽眼福，一面在靈魂深處發出懦夫的戰栗——這正是他們公開殺人想要達到的目的。

面對死亡，那幾個刑事犯早就嚇癱了。他們是被拖過來的，如果不是警察在旁邊架著，他們不會保持站立。聞占武則仍巴望著能見到自己的妻兒，那雙大男孩的眼睛還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掃來掃去。那七八個老少反革命都還鎮定，似乎對這一天早有預料，直挺挺地跪著，像是在站立。

死刑的執行，不是人們在電影中看到的那種齊射或掃射，而是一個一個排號射殺。這是一種精心的殘酷設計。刑事犯們最先處決，反革命被排在刑事犯之後。

最後時刻到了，行刑隊長看了看手錶，舉起小旗。只見站在第一個死刑犯身後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槍，那刺刀尖幾乎戳著犯人的後腦，推彈上膛。此時的空氣都凝固了，圍觀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長了脖子。唰，隊長小旗一擺，一聲槍響，那死囚的腦袋前立刻噴射出一股長長的血流和一團紅霧，身體沉悶地向前一傾，栽倒在地，兩條戴著鐵鐐的腿蹬了幾下，就嗚呼哀哉了。

第三個刑事死囚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第一聲槍響時，他竟然自己先倒了，被拉起來重新跪好，排在最後處決。

輪到聞占武了。槍聲一響，他的腦袋象西瓜一樣被崩裂成兩半，半張臉散落在一邊。有

人說這是子彈被事先銼過了，變成了“炸子兒”。後來我有個當兵的朋友證實了這種事：很簡單，只須將子彈端頭的銅皮銼開一兩道刻痕，就是炸子兒了，也叫達姆彈。那個用炸子兒的解放軍，不用說，一定是個苦大仇深的五好戰士。他認為他殺的是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應該用炸子兒。

九一三事件期間，這個小縣城共殺十五個人。

## 興凱湖紀事 陳奉孝

八九月間的一個來月，興凱湖的蚊子多得你難以想像。在關內，蚊子白天是不出來叮人的，興凱湖的蚊子可不一樣。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幹活時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變成黑囚服。犯人幹活必須把袖口褲腳扎死，用一塊布把臉包起來，光露著眼睛。眼睫毛真就派上了用場，能擋蚊子。手不停地幹活，蚊子落不上。

那年八月，我們參加修場院。場院裏的雜草半人多高，裏面的蚊子滾成蛋。用鐵鍬一鏟，蚊子像一窩風一樣向你撲來。有一個叫王錦泉的犯人，原綏遠省人，是傅作義部隊的一個連長，歷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和他手下的高級將領董其武等人都作為“功臣”，受到了共產黨的優待，成了新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部隊全部被整編，中、下級軍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罪在鎮反、肅反運動中被送進監獄和勞改隊。傅作義部隊的下級軍官，這樣命運的，我接觸過不下十幾個。王錦泉經常發牢騷說：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傅作義把我們賣了。

在修場院時，不知為什麼，王錦泉跟帶工幹部頂起來了。幹部下令把他捆起來，丟在場院邊的溝裏。蚊子叮得他一邊打滾，一邊象殺豬一樣叫。收工時叫幾個犯人把他拖出來，臉上全是血，腫的像個發麵饅頭，白囚衣成了紅的，全是打滾時壓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王被塞進小號，三天后死了。

興凱湖的蚊子能吃人，沒到過這個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過興凱湖的人都瞭解這一情況。那時晚上犯人都把勞改被子裏的棉絮抽出來，利用被面和被裏做成一個象棺材一樣的小蚊帳，鑽進裏面睡覺。地下還用蒿子點起來熏著，吃晚飯也要鑽進棺材一樣的蚊帳裏去吃。

除了蚊子，還有兩種咬人的東西。一種是牛虻，一叮就是一個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種就是“小咬”。小咬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專門往人的眉毛、頭髮根裏鑽。人被咬以後，腫起來好幾天下去。過去民間有一種順口溜：“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興凱湖的犯人有一個順口溜：“興凱湖有三寶，瞎虻蚊子和小咬。”

修完了場院，我參加了打烏拉草。烏拉草並不長在旱地裏，而是長在水泡子裏的草甸子上，草根連著草根織成一層厚厚的墊子，墊子底下是爛泥。用鐮刀割下來後，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來，小把連成大把，然後用草搓一根繩子，趟著水拖出來，最後背回去。老弱病殘犯人再用木棒子將每把烏拉草砸柔軟了，打成烏拉草繩，秋收時發給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墊在棉膠鞋裏，的確很保暖。冬天鞋裏如果不墊烏拉草，要把腳凍壞。

打烏拉草這個活按說不算累，可我差一點送了命。烏拉草墊子漂在水上，底下是爛泥，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圍好幾米的地方都顫動。有一次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塊腐爛了的草墊子上，一條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來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嚇壞了。我趕緊趴下，以減輕壓力，同時用手抓住周圍的烏拉草大聲喊。幸虧組長楊奎離我不遠（實際上是管教幹部叫他時刻盯著我），趕緊過來把我拉了上來。不然的話，再晚一點我就全陷進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號前後，開始割水稻，割完還要運輸脫穀。運輸全靠人背，最遠的地方離場院

有十多裏路。二百人要把近萬畝的水稻背到場院，勞動強度之大，可想而知。脫穀的時間更長，從十月下旬一直幹到過了元旦。這種活又髒又累，犯人日夜兩班倒，每班十二小時。拖拉機發動起來，帶著十個大脫粒輥子。每個輥子上，四個犯人拿著一把把稻子在飛速旋轉的輥子上脫粒。每個輥子前面有一個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亂草挑出去，把脫下的穀粒用刮板刮出來。這項工作不僅髒累，而且危險。按照操作規程，打料的人是不許背朝脫粒輥的。可是有一個犯人背對著脫粒輥往外推脫下來的穀粒，不小心滑倒了，脫粒輥絞進了他的腳，兩條腿從膝蓋以下全絞爛了。

那一年，種旱田的三分場在脫黃豆時，一個在脫穀機老虎口前管喂機子的犯人，因踩著黃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裏往裏撓豆秸的鐵爪子鉤住了他的包臉布拖了進去。兩邊的兩個犯人趕緊拽住他的兩隻腳，結果整個腦袋被打碎了。不論是在脫粒水稻，還是在脫粒黃豆，犯人年年都有傷亡。工傷致殘不能下地幹活，養好後在監舍裏幹輕活，坐著編筐、打草繩之類，不會讓你白吃飯。工傷死了的，挖個坑埋了拉倒，不論是傷是死，都不會給你一分錢的扶恤金，死傷犯人的家屬沒有一個敢追問。

我的刑期是十五年，我怕熬不出去。這時收到家裏來信，說我父親去世了，臨死還喊我著的名字。我簡直不想活了。我那時才二十四歲，就這樣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不甘心。有一天在水稻田裏平水田，犯人郝志祥找我的麻煩。這傢伙國民黨時期是一個地痞狗腿子，其壞無比，總想拿別人立功，經常向管教幹部打小報告，犯人沒有不恨他的。他說我這裏平的不好，那裏平的不對，還說我幹活投機取巧，把我氣壞了，掄起鐵鍬照他腦袋劈去。犯人的鐵鍬天天用，磨得像刀子似的。這一鍬若劈在他腦袋上，非削去半個不可。他沒想到我這樣一個大學生，身體又瘦又小，竟敢這樣行凶，嚇得趕緊往前跑，可兩隻腳陷在泥裏，挪動不方便，只把身子彎了下去。我的兩隻腳也陷在泥裏，往前挪動不。他彎下身，我的鍬就够不著他的腦袋了。鍬落下去的時候，角度也變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後背上，把他打在泥裏。我的鍬把斷成三截。誰也沒想到我會幹出這種事來，帶工幹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來，押回監舍，帶上手銬腳鐐，塞進小號。小號高一米左右，寬不足一米，長一米五左右，我一米六三，在裏面站不起來，躺下伸不直腿，活像一個棺材。

秋天收割水稻時，犯人普遍偷生稻穀吃。從稻穗上撈下稻粒，在手裏搓搓，吹去芒，帶皮吃，細細嚼，把稻殼嚼的像麵粉一樣細，咽下去不會得闌尾炎。犯人不但在地裏幹活時偷吃生稻穀，脫谷時還用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裝滿稻穀，塞在褲檔裏往回帶。有的把褲腳扎起來，塞在褲腳裏往回帶，半夜裏藏在被窩裏吃。

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減刑的犯人彙報了，於是每天晚上收工站隊時，犯人都要解開棉襖、褲腰帶接受檢查。被檢查出來的犯人除了挨訓挨罵，還扣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帶工隊長，苦大仇深的貧雇農出身，階級覺悟特別高，一提現行反革命就恨得咬牙切齒。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右派，他似乎有一種本能的仇恨。如果他掌了大權，非把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帶生稻穀被他檢查出來，他不但當眾罵我：“你是什麼大學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沒有一個好東西！全都是些黑心狼！”還把我捆起來示眾。回監舍不僅不讓我吃飯，還讓我在院子裏凍了半宿。

我心裏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這條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裏。本來自從父親去世，我就悲觀厭世到了極點，現在又遇到這樣一個惡魔，我上無父母，下無老婆孩子，豁出去了，不過一死。我偷偷預備一根鎬把，藏在監舍的風斗裏，準備對他下手。每天犯人吃過晚飯要盤腿坐在炕上“學習”，大多數時間就是開生活檢討會，讓犯人像狗一樣互相亂咬，有時也找人讀報。他每天晚上都來查看“學習”，我想等他走時，我跟出去，從風斗裏摸起鎬把，一下打死他，然後我撲電網。

那時監舍院子周圍除了有圍牆，上面有解放軍站崗外，圍牆裏側還有一道十米左右寬的水溝，水溝裏側還有一道電網。如果我真的把一個管教幹部打死了，他們絕不會簡單地給我

一個槍子吃就算了。他們肯定會用各種酷刑折磨我，最後才槍斃我。七二年我刑滿後在內蒙扎賚特旗烏蘭農場就業時，就遇到過這樣一個就業人員。這傢伙是福建人，過去當過海匪，因為多次請假回家探親得不到允許，一怒之下殺了一名幹部。槍斃以前不知把他整死過多少回，眼睛、耳朵、舌頭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沒了。可是說來奇怪，一連等三個晚上，姓鞠的都沒來。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隊時，來了一位新隊長，他說鞠隊長調到五分場去了。我心裏忽然一驚：看來我命不該絕，還能活下去。

## 開封的鎮反 國 亞

我父親參加公安部隊時，恰逢鎮反高潮，他所在部隊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與槍決。父親在政治部，沒有親自參與行刑。那時國家專政機器的工作效率真是高，僅一夜之間，所有專政機關一齊出動，一個二十萬人口的小小開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裏放不下，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裏。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事先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

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處死幾十個人。一開始是對著腦袋開槍，那時槍斃了反革命分子都要照相，對著腦袋開槍後，五官血肉模糊，不好辨認，於是後來下通知說要改成對著後心開槍。對後心開槍也有問題，經常打好幾槍還不死。開封郊外的地主方某就是對著後心開槍執行死刑的，槍決時我父親在現場。挨了兩槍後倒地，幾秒鐘後他竟然又一骨碌坐了起來，大口喘著粗氣，眼睛死死瞪著執行死刑的解放軍，把大家看得心裏發毛。正準備補他兩槍，方某喘好幾口氣以後，又倒在地上死了。後來上面又來了通知，說不許對著後心開槍，一律再改成對著腦袋開槍。

開封城裏有一家私人照相館，我父親剛參軍時去裏面照過像。照相館老闆跟人說話特別和氣，但是沒過多久突然被抓走了。原來此人是滑縣一股土匪武裝的頭子，害過不少人命。解放後他畏罪潛逃到開封，開了這家照相館，以為從小地方跑到這個二十多萬人口的省城就算是萬事大吉了。鎮反開始之後，兩次排查都沒有被懷疑到，他不禁忘乎所以，在大街上招搖過市，結果被一個熟人看見，立刻檢舉了。真實面目被暴露，槍斃了。

公安部隊裏有一個經常行刑的劉排長。那時物資匱乏，劉排長在城外槍斃了反革命，還要把死人身上的繩子解下來團成一團，再朝刺刀尖上一挑，帶回去，有時繩子上還沾著血迹。有一次劉排長一幫人槍斃完了犯人，覺得挺熱，就把軍裝脫下來一扎，也挑在槍尖上，光著膀子穿個褲衩回部隊。這樣的軍容軍貌自然不敢走在大街上，就沿著城牆根走。誰知路上還是被首長撞見了，狠狠訓了他一頓，還讓他寫檢討。死刑執行方法改成對後腦開槍以後，劉排長在把犯人拉出去槍斃之前，在每個人後腦勺上都用粉筆畫了個圓圈，指著圓圈對戰士們說：“看見了沒有，過一會兒就往這兒打。”結果還沒出部隊大門，又讓首長給撞見了。首長一見，氣不打一處來，教訓他道：“就你喇咕點子多，擦掉！”劉排長不得不把圓圈擦了，又寫了一份檢討。

有一個國民黨女潛伏特務，明眸皓齒，非常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運動來了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保姆來接孩子，女特務給孩子喂了最後一次奶，平靜地把孩子交給保姆，對她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麼死的。”

在中央發布《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之後，鎮反進一步擴大化。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曾在敵偽機關任文職、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的，早就有了結論沒有問題的，甚至已在新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可無論爭辯還是哀求都沒有任何用處，其中有好幾個是我父親以前的熟人。

鎮反擴大化時，鎮壓的利斧有一次與我們家的家庭成員擦肩而過。當時我的大姑父已經

去了朝鮮，大姑留在開封教書。有一個認識大姑的被抓的特務，誣陷大姑解放前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了特務組織。當時與大姑父音訊不通，于是大姑作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單位也立即將其開除公職。在審訊中，大姑寧死不承認自己參加過特務組織，說自己的身份可以由當時學校地下黨的負責人來證明。幸運的是，這位負責人最終被找到了，立即作證說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務，而且是進步青年。就這樣，大姑被關押了幾個月後獲釋回家。大姑雖然僥幸躲過一劫，但身體從此垮掉了。

## 重慶 Z 縣的鎮反 渝 生

八十年代後期，我在 Z 縣縣志辦公室任編輯。辦公室裏有一位調研員叫範遠茂，曾是 Z 縣第一個農業互助組的創建者，先後任過六個區的區長或副區長。一日與我閑談起當年的鎮反，他說當年他在官壩區主持過多次槍斃人的公審會，那時槍斃人常常有陪斃的。有一次槍斃 12 個人，他一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一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一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發現多了一個，原來把陪斃的殺了一個。這可是人命關天啊！我問老範後來怎麼解決的，他說這在當時不算什麼，補一個手續就行了。所謂補手續，就是寫一張紙條，就這麼簡單。這樣草菅人命的離奇槍斃人事件，Z 縣發生過很多起。

該縣黃金鄉金銀村有一個姓方的青年，在成都某高校讀園藝專業，畢業後娶了一個成都姑娘，回鄉正醉心于自己的田園生活，忽然就被列入了槍斃名單。那時黃金鄉和汝溪鄉同屬一個區，區上要把全區的罪犯都集中到汝溪，一起開公審會槍斃，以壯聲勢。方某被押赴汝溪執行槍決的路有幾十裏遠，要經過一道山溪。這道山溪平常不深，可以涉過，那天却忽然發了山洪，波濤洶湧，無法渡過，解押民兵只好繞道而行。汝溪那邊久等不至，怕誤了大事，就迫不及待地開槍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趕到，早散場了。第二天上面有人來通知，說方某可以不殺。方某就這樣撿回一條小命，他實在是太感謝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40 多年後的 1994 年夏，我在一位當地政府官員的陪同下，前往黃金鄉拜訪這位已經 70 多歲的傳奇老人。他和妻子，當年那位成都姑娘，正在精心料理他的苗圃。一見我和那位官員，他就滿臉堆笑——那種很扭曲的笑。我本來想從他那裏挖點東西出來，誰知他什麼都不說，只是一個勁兒地說：“共產黨好啊，呃，人民政府好啊，呃。”我頓時從心底升起一陣悲涼。

比方某的命運轉機更偶然的是，一位官員在一大疊報批槍斃的名單上蓋章時，不小心夾著翻過了兩頁，這樣就有兩條人命活了下來。槍斃進入高潮時，一些地方樂于將父子、叔侄、兄弟同時槍斃，近乎滅門。石柱縣一對父子臨刑時，其父慷慨賦詩曰：“父子今朝同赴死，黃泉路上我不孤。”

泰來鄉羅家嶺人、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字介仙），被 Z 縣派去的民兵從成都押回執行槍決。羅是國軍 15 兵團司令、著名起義將領羅廣文的堂兄，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據說他編寫的蠶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還在四川大學使用。

解放前夕，羅廣瀛痛感國民黨貪污腐化，以兄長身份，冒險前往羅廣文司令部，勸說堂弟率部起義，投向共產黨。羅廣文後來毅然起義，促成成都和平解放。這樣一個人也要被槍斃，羅廣瀛的妻寫信給政府，請求寬大，稱一家 8 口全靠羅廣瀛養活，望給予寬大處理，給全家人一條生路，但是那些殺紅了眼的人最後還是用一顆子彈結束了羅廣瀛的性命。

更無辜的是馬劍秋。馬是石寶人，臨解放時擔任 Z 縣自衛隊總隊長，掌握著全縣的武裝力量。他接受了許多新思潮，堅信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能夠給中國人民帶來幸福，所以解放大軍進軍西南快到 Z 縣時，他通電 Z 縣 48（？）個鄉宣布起義，命令所有武裝人員，



將槍支彈藥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還派人守衛縣檔案館，使歷史檔案無一卷毀損。一切停當後，他徒步城外數裏，迎接解放軍入城。意想不到的，解放軍入城不久，新政權穩定局勢後，馬劍秋成了階下囚，然後被槍斃。

獄中的馬劍秋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後，心情萬分痛苦，流著淚寫了一份《刑場上的演講》，傾訴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說，他一直在尋找救國之道，對於國民黨他很失望，現在終於盼來了共產黨，終於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槍斃，再也看不到希望了。但是他說他對自己的起義之舉依然不悔，在最後的時刻，他要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毛澤東主席萬歲！斯大林元帥萬歲！

後來我根據檔案材料寫了一篇《馬劍秋傳略》，準備收進 Z 縣志的《人物志》，但這篇傳略後來並沒有收入《Z 縣志》。

關於馬劍秋的死，我問了我父親。父親當時是縣財政科幹部，參加了馬劍秋的公審大會，親睹了馬劍秋被槍斃。父親說，馬劍秋被綁赴西山公園刑場，與梁樹芬、伯永梁（皆國民黨 Z 縣官員）等十數人站成一排。臨刑前，被反綁著的馬劍秋要求講話，所講內容跟我見過的檔案資料《刑場上的演講》差不多。站在旁邊同樣被反綁著的梁樹芬很不耐煩地對馬劍秋說：“馬上就要槍斃了，還說那些做啥子！”但馬劍秋還是喊著“共產黨萬歲”飲彈而亡。馬劍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園草坪，後來長期成為 Z 縣的刑場。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裏倒在槍口下，鮮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塊土地。

最匪夷所思的是槍斃張國錦，那簡直就是一場死亡遊戲。決定人的生死，在這裏就像幼兒園裏的孩子玩過家家。那天，西山公園廣場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又一次公審大會即將舉行。15 個死囚被押了上來，其中一個死囚很多人都認得，是 Z 縣精忠中學（今 Z 縣中學）的教師、陝西人張國錦。

當宣布他的罪名是一貫道成員時，他一口否認。張國錦用嘲諷的口氣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一貫道，更沒有參加過一貫道。今天在場有這麼多群眾認識我，精忠中學的全體師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個人看見我參加過一貫道，或者看見我搞過一貫道活動，請站出來講話。”

近萬人的公審大會頓時一片寂靜，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兒，一些人開始議論：怎麼沒有一點證據就定死罪呢。審判臺上的縣長陳杰、秘書范梓裏等人，似乎有點慌了。此時此刻去哪里找證據呢？議論聲越來越多，嗡嗡響成一片，審判台臨時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最後範梓裏宣布，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一貫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範梓裏的示意下，一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臺前的一張大方桌，揭發張國錦。他說，張國錦肯定是一個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親眼看見他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當時我就想質問他，但怎麼敢呢，因為他有“這話兒（這東西）”。譚一邊說，一邊將右手插進褲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槍。第二個爬上桌子的是天塹鄉（今屬東溪鎮）人鄧覺。鄧說，有一次我和張國錦上南門官茅廁解手，靠得很近，我發現他拿著一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這兩個證據立即為審判臺上的人解了圍，張國錦的反革命罪就這樣坐定了。範梓裏馬上宣布，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立即處決張國錦，一個是帶回去重審後再處決，徵求大家意見，看怎麼辦。

範梓裏走到台前大聲說：“現在只要有一個人——張的直系親屬除外，舉手同意把張國錦帶回去重審，就帶回去。給大家 3 分鐘的時間。”說著，範梓裏很嚴肅地高舉起左手，亮出手錶，開始讀秒報時。全場死一般的沉寂，人們都好像屏住了呼吸，誰也不敢吭一聲。快到 3 分鐘時，張國錦昂起頭，以宏亮的聲音說：“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舉手呢？”

時間到了，沒有一個人舉手。範梓裏又說：“同意立即處決的人請在 3 分鐘內舉手。”說著又舉起左手讀秒報時。譚祥雲和鄧覺首先舉起手來，一會兒全場都陸陸續續地舉起手

來。張國錦怒吼：“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不舉手呢！”主席臺立即以舉手表決為依據，宣布張國錦死刑，立即執行。張國錦等 15 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張國錦慢步徐行，不斷高呼：“實事求是萬歲！毛主席萬歲！”直到槍響倒下。

我父親一直坐在審判台口的石坎上看完了這場曠古未聞的人間醜劇。幾十年來他多次向我講述那一難忘的場面，後來又將此事寫進了他的回憶錄。據父親說，散會後，一路不少群眾為張國錦流淚。為此，公安局連夜到居委會召開群眾大會統一思想，討論張國錦到底該殺不該殺。人都已經殺了，這種討論還有什麼意義呢？而且誰又敢說不該殺呢？

時間一年年過去，轉眼到了文革。這時我已 10 多歲了，槍斃的高潮已經過去，但西山公園依然是刑場。每年仍有幾次公審會在那裏舉行，而且每次都依然搞得聲勢浩大。

1970 年夏季的一天，一個叫彭成的農民在西山公園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是偷越國境。據說他曾先後 3 次偷越國境。那天看熱鬧的人擠滿了整個廣場，反正文革期間大家都沒有正事可幹。彭成其人的罪行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死後所受的凌辱却令人扼腕。

只聽槍一響，人們潮水一般涌過去，一圈圈將屍體團團圍住，像欣賞玩物一樣盯住屍體不轉眼珠。後面的人紛紛往前擠，前面的人被擠得幾乎踩到屍體上。這時一個漢子，分開人群，擠進核心，俯下身去將撲在地上的屍體翻過來，然後呼的一下把死者的褲子扯掉，露出赤裸裸的下半身。眾人不知他要幹什麼，正驚愕時，那漢子從腰間嗖的一下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仰起頭看了看四周的人，伸出左手猛握死者的男根，右手揮動尖刀向下刺去。眾人一下明白了，他原來是要割掉死者的男根！

那漢子動作十分利索，尖刀環著那兒挖了一個大洞，把一大團血肉模糊的東西生生割了下來。他將那東西在手裏掂了掂，血直往下滴。他臉上露出帶著幾分麻木的微笑，提著那東西站了起來。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嘩的一下自動閃開了一條道，那漢子便如入無人之境，提著那團血肉模糊的東西揚長而去。事後聽說，那東西是拿去做藥治療弱症（陽痿）的。

1971 年 3 月 9 日，西山公園又開了一次公審會。那天槍斃的是一個叫樵天珍的僅 24 歲的女犯。據說本來準備 3 月 8 日槍斃，考慮到在婦女節槍斃女犯不大好，就推遲到第二天。樵天珍是因為毒殺丈夫而償命。不幸的是，行刑的槍一響，一個早有準備的男子就飛跑上前，趁潮水般的人群還未到達，就將樵天珍破碎的腦袋裏流出的腦漿全裝進一個大盅子裏。然後他抽出尖刀，刷刷幾刀就挑開了死者的上衣布鈕扣，露出心口來。他舉刀對準心窩，正準備開膛挖心，忽然被一個值勤的軍人喝住了，手中高舉的刀很不情願地放下來，隨後悻悻然端著一盅腦漿走了。過了一會兒，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欣賞女死刑犯屍體的機會不是很多，聽說人們把死尸的褲子都脫光了。

21 世紀初，由于三峽工程，Z 縣沿江許多地方要淹沒，新城要建許多大橋。其中有一座鳴玉大橋，從老縣城跨過鳴玉溪架到西山，西橋頭的位置就在原來的殺人刑場旁邊。施工的人們并不知道那裏曾經發生的一切，心中沒有一點陰影，但是在施工中却意外地發生了許多事故。一些砌好的石壁莫名其妙地垮塌，一些人老是皮肉受傷，事故不斷。施工者認真檢查，找不出什麼原因，後來才聽說這裏曾經是刑場，有無數怨魂積聚在這裏不得超度，工地上屢屢發生事故，可能是那些屈死鬼作祟。

這一說把人嚇一跳，不說不知道，越說越害怕，好象真有那麼回事。從此，工人們每天清晨上工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鬼魂們燒香放鞭炮，請求手下留情，冤有頭債有主，望不要再給工地製造麻煩。不燒香放鞭炮就絕不動工。如此這般，工地上竟風平浪靜，再也沒有事故發生了。

補白：川北某縣朱某，50 多歲，家庭出身富農，是五一小學的教師。1968 年的一天，他與學生在教室裏做遊戲，比賽誰的彈弓打得准。他先在教室的黑板上畫個圓圈，讓同學們

以圓圈爲靶子。那天他正好手腕痛，彈子打偏了，正中黑板上方毛主席語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向字的口上，留下一個小坑。這事被另一個老師知道了，此人一向與朱某有過節，便將此事報告校長，稱朱某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當時鄉里無人管此事，被擱置起來了。一打三反是，此事又被人提起。朱某被抓了典型，以侮辱偉大領袖罪判了 3 年刑。

—————

## 朱自清長子之死 佚 名

朱自清的長子朱邁先，小名阿九。朱自清早年的散文《兒女》裏提到過這個頭生子，說他愛讀故事書。在其名篇《給亡婦》中，

朱自清又提到這個 14 歲的孩子，說：“邁兒長得結實極了，比我高一個頭。”

朱邁先在北平崇德中學讀高中時就秘密參加了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在北平中共地下黨組織下回到揚州老家，一面在省立揚州中學讀書，一面從事救亡活動和地下黨的工作。當年 10 月，19 歲的朱邁先被任命爲中共揚州特支書記。不久，由于戰爭形勢緊迫，他同陳素、江上青等人參加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協會流動宣傳團，離開揚州，前往內地宣傳抗日。

次年，根據中共提出的到友軍中去、到敵人後方去的工作方針，經長江局批准，這個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在桂林、桂平一帶整休。1942 年桂林失守後，朱邁先被派到國民黨新十九師工作，在師長蔣雄手下任政治科中校科長兼政工隊長。

抗戰勝利後，蔣雄部開往海南島三亞，朱邁先因病在海軍醫院住院治療時認識了護士傅麗卿。兩個飄泊天涯的年輕人產生了戀情，1946 年 10 月辦了婚事，生活十分融洽。

1948 年 8 月，朱自清先生去世，朱邁先遠赴北平奔喪。次年由老長官蔣雄師長介紹，朱邁先到蔣雄任專員的廣西桂北第八專署任秘書。年底，朱邁先代表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向共產黨的桂林市政府聯繫起義，獲得成功。隨後，朱邁先進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結業後分配至桂林松坡中學任教。

1950 年 12 月鎮反開始，蔣雄被捕，同時也逮捕了朱邁先。次年 11 月，新寧縣法庭以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立即執行，時年 33 歲，身後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兩男一女三個幼子。

朱邁先被捕後，傅麗卿曾向朱自清遺孀陳竹隱夫人求助。每月工資只有 60 元，膝下也有 3 個兒女的繼婆母陳竹隱，立即寄 30 元給兒媳救急。

傅麗卿堅信丈夫是無辜的，在朱邁先死後的 30 餘年裏，她多方申訴、奔走。1984 年，新寧縣法院認真復查舊案，承認 1951 的判決書純屬錯判，恢復朱邁先起義人員的名譽，澄清事實真相。之後，年近花甲的傅麗卿，帶著兩個兒子和一個媳婦，千里迢迢去北京探親，這是她同朱邁先結婚 36 年來第一次跨進朱家門。

補白：陝西鳳翔有一種小吃叫豆花。點豆花最好的輔料是石膏，一般農家沒有石膏，只好以醋代之。可是董家河鄉喬家堡村有個小夥子却用石膏點豆花，大家都很羨慕他，但不知他的石膏是哪里弄來的，誰問也問不出來。突然有一天，傳來消息，那個用石膏點豆花的小夥子被抓走了，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原來這個喪心病狂的傢伙，竟然偷偷把一個用石膏做的毛主席半身塑像，用刀子一點一點削了，拿去點豆花。儘管他只有十幾歲，但所犯的罪行實在太嚴重了。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震動不小。這傢伙膽子也太大了，竟然在領袖像上打起了主意。對於我們來說，弄點石膏固然是每個人都渴望的，但誰能想到領袖像是石膏做的呢！想不到。我們甚至在一起悄悄議論，他是怎麼用小刀削的？先削哪一塊？削了個半拉的塑像他藏在哪兒呀？同時，我們也在揣測著他會遭到什麼樣的處罰。有的小孩認爲，這傢伙實在

是罪大惡極，能够在毛主席身上下刀子，這次非吃槍子不可。後來，這個爲了吃可口的豆花而不惜犧牲主席塑像的小夥子被判了有期徒刑，具體刑期記得不是很准了，大概是七八年。之所以能够保住性命，是因爲他的年齡過小。如果他是成年人，那就非槍斃不可。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爲吃豆花而坐監獄，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例。？

—————

既然是地主 嚴家偉

川滇交界的雲南省鹽津縣興隆鄉境內，有一個窮山溝叫龍塘溝，是個窮山惡水、地瘠人貧的所在。在這條十來裏路長的狹長地帶裏，全是斜坡地，田就更少。一畝坡地的玉米產量只有四百來斤，一畝田的黃穀產量不過三百多斤。經濟條件稍微好的人都不在那裏居住，幾個擁有一點土地的人都搬到鄰近的四川省境內居住，把田土租給當地的農民耕種。

那時地主收取租子，只收秋天一季，而且只收田租，地裏的出產，糧食、蔬菜、山林以及春夏二季的收成，全歸農民所有，地主分文不沾。因此，龍塘溝不但沒有一個農田的主人居住，而且一年裏當地農民只在秋天才能看見田主人來收租，收了就走。這些所謂的地主，究竟家住何處，農民都不清楚。

土改一開始，住在四川的地主肯定不會再回雲南的龍塘溝去收租了。但土改是政治任務，抓不出地主來，那不成了“和平土改”？那豈不犯了天大的政治錯誤？當地土改工作組，經過深入發動群眾、排查摸底、對比分析，終於在當地普遍窮困的農民中發現了一個地主。

此人名叫劉洪發，40 來歲。他家祖上留給他幾畝斜坡山地，每年可收玉米約 2000 斤。另有一點水田，每年可收稻穀約 300 斤。劉洪發一家 5 口，有幾間破草房，又矮又爛。雖然劉洪發一家自耕自種，但比起當地那些無田無地者，也就成了“拔尖人物”，于是被劃爲地主。既是地主，後續的待遇就沒什麼懸念了，左不過是沒收土地、耕牛、農具，還要勒令他交出金銀浮財。他哪里有什麼金銀！沒金銀就是不老實，捆、鬥、打、吊諸刑伺候，整了 10 多天，活活被打死，死時還捆吊在樹上。

被鎮反沖走三十年 白偉志

1949 年前，姚承霖爲了貼補家用，曾擔任過一個楊姓國民黨軍官女兒的英文家教。1949 年，楊姓軍官獨自去了臺灣，留下妻女在上海，靠收房租爲生。

一天，楊姓少女去收房租，房客們哀求她能緩收一段時間，待找到新工作再補上，換來的却是小姑娘乾淨利落的幾個耳光。沒過幾天，姚承霖被請到公安局。他驚奇地發現，楊姓少女和她的母親都在裏面接受審問。原來房客把他們母女告到了公安局，罪行是勾結人民解放軍進行反革命活動。“人民解放軍”指的就是他姚承霖。姚實際是在公安局工作，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直接管轄，警務人員制服上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

姚承霖莫名其妙地被送進提籃橋監獄關押。幾天後，公安局領導召開大會，向同事們說：“外交管理科的姚承霖，你們曉得他是什麼人嗎？今天我告訴你們，他是臺灣派來的特務！現在他在上海設立電臺，招攬特務，和舟山群島有密切關係，和蔣經國也有密切關係！”

解放初的上海確實進入了多事之秋。新舊政權交替產生的統治真空，導致社會治安惡化，大批散兵游勇和難民涌入上海，與原本就存在的大量底層流氓無產者一道渾水摸魚。據

不完全統計，上海解放的頭 7 個月，共發生強盜案 737 起，盜竊案 11430 起，搶劫案 530 起。1949 年 6 月上海解放的第一個月裏，全市發生盜案 173 件，平均每天有五六起之多；竊案 2205 件，平均每天 70 多起。

1950 年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決定出兵朝鮮，同時毛澤東意識到這是一個徹底清除國內反革命分子的“千載一時之機”。兩天後，毛親自主持通過了“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工作。

“雙十指示”下達 3 個月，上海方面沒有任何行動，毛澤東不滿意，於 1951 年 1 月下旬致電上海市委：“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此後他再三督促上海加大鎮反步伐，並批評上海“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鎮反’工作”。3 月 15 日，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把上海市委的“鎮反”計劃轉報給毛澤東，電文稱：上海決心在已經捕了 1068 人，處死 100 餘人的基礎上，再放手捕 10000 人，關 4000 人，管 3000 人。在此背景下，1951 年 4 月，姚承霖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6 年。

5 月 15 日，毛澤東發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管理幹部對姚講，三年之內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們來的時候是鐵籠子送來的，走的時候淮河人民鑼鼓喧天送你們回去。”

姚承霖並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機會。一年之後，他被轉移到蘇北農場，繼續接受勞動改造，住草棚，每天開荒。姚承霖在這裏結交了兩個好朋友。睡在他左邊的魏風光，是從印度留學歸來的博士。右邊的叫韓文義，是日本留學歸來的博士。這兩個人同樣也是因鎮反擴大化被勞改，沒有具體罪行。兩個老大哥懂好幾國語言，姚承霖跟著他們學習俄文，日子過得平靜自在。

有一天，勞改隊的幹部轉給他一封信。幹部說，這封信治淮的時候就寄到了，一直沒給他。信是妻子寫來的，她說：“承霖，你離開我們的時候，兒子才兩歲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說你爸爸在公安局辦公，他說人家爸爸辦公下班都會回來，我爸爸為什麼不回來？可憐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來？”

妻子寫信的意圖是要和姚承霖離婚。獄友勸他說，鎮壓反革命時候，辦理離婚的人法院門口排隊擠破頭，交通都堵了。姚承霖心裏明白，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屬是不給安排工作的。為了生存，不得不離婚，這樣的人多了。姚承霖最終給妻子寫了回信：“為了你和兒女，找個適當的人嫁了吧。家裏東西我全不要了，統統都給你。”

1955 年，已經服刑 4 年的姚承霖被發配到內蒙古，參與包蘭鐵路的建設。1957 年刑滿後，他還是政治犯，只是有工資了，每月拿著 25 塊人民幣。

1980 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領導的辦公室，領導指著桌上的水果，態度溫和地讓他吃，接著告訴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們是革命同志了。過去不是我們要那麼對你，是上面政策規定的。”

歷經近 30 年的等待，姚承霖終於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鎖，但他卻突然有種失重的感覺，不知道該幹些什麼。他決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宮、天安門，還有毛主席紀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調整自己的心情。30 多年未見的親人，不知道見面該是怎樣的感覺。

回到上海，他才發現這 30 年流逝的不僅僅是自己的青春歲月，同樣也有親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親生孩子由於多年未見，對他也沒什麼感情。更深深刺痛他的是親妹妹的埋怨：“你回來幹什麼？人家農民工人都是光榮的，你個反革命丟人現眼。”姚承霖終於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難擺脫別人的傲慢與偏見。

無奈之下，姚承霖找到了當年的好朋友，時任上海總工會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幾十年未見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噓感慨。在傅老的幫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郵局的郵件打包場工

作，每月工資 200 塊人民幣。

在郵局打包場裏，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外表滄桑、幹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人在乎他。

1987 年中秋節這天，打包場裏突然來了兩個警官，一人拎著一包月餅，指名要找姚承霖。30 多年後，姚承霖終於重新回到了他的單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知道我心裏委屈，想不通，對我說不要和別人比，而是跟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這三個人比——你姚承霖怎麼說也曾是國民黨的人吧。”

這是位于上海市閔行區七寶橋的一戶普通一居，房內的設施樸素得甚至有些簡陋，靠窗的寫字桌上供奉著一尊觀音菩薩像，而房屋正面的牆壁上方，懸挂著象徵公安系統巨大榮譽的藍盾勳章。姚承霖喃喃自語對我說：“我們一起去內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後來回來的可能就我一個人。”

補白：1977 年的高考是文革結束後的第一次高考，儘管上面政策說“重在個人表現”，實際上極左思潮的影響仍很嚴重，直系親屬和重大社會關係的政審結論仍然很關鍵，直接影響錄取結果。我當時在地區招生辦擔任政審組長，發現基層單位的領導如果對考生有意見，就隨便在其檔案中寫上“表現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父親是右派”或“母親是地主分子”等等內容，讓考生背上沉重的枷鎖。有一位考生，初中還未畢業，因出身不好，只好在家務農。恢復高考時，他毅然報名參加考試，成績很不錯。北大想錄取他，但發現其政審材料裏寫著“母親是地主分子”，北大很猶豫。我翻了翻檔案，發現其父竟是我上中學時的語文老師，其母是現職小學教師，怎麼可能是地主分子呢？我趕忙打電話通知該縣招生辦，要求補充調查。然而該縣的同志不知是接了電話就忘了，還是其他原因，遲遲不予答復。至北大招生的最後一天，我和北大的老師商量，認為補材料已來不及，就由我們招生辦出具證明，表明該考生“清白”，最後北大錄取了這位考生。畢業後該生去美國留學，後來定居那裏，事業一片輝煌。還有不少考生，考試時父母仍未落實政策，到錄取時父母的問題才得以平反，我們就很及時地為這些考生補上材料，讓大批考生“翻身得解放”。 黃錦章

-----

## 鎮反與肅反 信力建

鎮反運動持續時間：1950 年 12 月至 1951 年 10 月。

鎮反打擊的對象：土匪（匪首、慣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分子。被鎮壓的國民黨軍隊將領可分如下幾類：1、戡亂戰爭末期“起義”投降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2、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閑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者，此類人數也很多。3、堅持抵抗，打游擊而最終在戰鬥中被俘者，以及屬於國統、軍統和憲兵系統者，此類人數並不算多。4、其他，如因畏懼而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

鎮反放手殺人的目的：從 1950 年至 1952 年，公安部門破獲了刑事案件 20.4 萬件，被殺人數却有數百萬，被關被管的不計其數。毛澤東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僅是為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毛還說：“過去北方土改，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戰爭完全掩蓋了土改空氣。現在基本上已無戰爭，土改就顯得特別突出，給予社會的震動大得重大，地主叫喚的聲音將特別顯得尖銳。”鎮反就是借朝鮮戰爭為掩護，大量殺人，藉以

立威。

鎮反殺了多少人：1950年，根據毛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殺人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明確要求，600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3000人，50萬人口的南京應該殺不止兩百多人。

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玉在其《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國軍被害者約3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法國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1951年2月至1952年5月間，至少有3百萬人被殺害。據1969年4月7日莫斯科電臺廣播，1949年至1952年有280萬人被毛處死；1953年至1957年有350萬人被殺。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透露的：皖浙蘇魯4省一個月之內死了117萬6千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150萬人。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爲了永久的和平，爲了人民民主，在過去3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2百多萬土匪”。

據統計，在鎮反運動中，全國共殲滅土匪240余萬，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127萬，管制23萬，殺掉71萬。以被處決人數71.2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已經達到當時全國5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準了。

肅清反革命運動持續時間：1955年6月至1957年10月。

肅反的範圍：暗藏在黨政機關、革命團體、民主黨派內部的反革命分子、臺灣特務。

肅反的過程：1955年肅反與打擊“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直接相關。1955年初開始批胡風，運動發展到6月底，已經被明確定性爲反革命、反革命集團。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決定以“大約有5%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規模進行卓有成效的肅反（5%成爲以後歷次政治運動的一種經典比例）。全國（除西藏外）城鄉黨政機關、團體、工礦企業、部隊和學校開展的肅反運動，稱作機關肅反或內部肅反，農村、街道和私營企業等方面開展的肅反運動，稱作社會肅反。

冰心後來說：“肅反的時候，我不在國內。也許我來說些話較爲公允。我聽朋友們介紹了情況。那是近乎殘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傷害。我有些朋友，在敵偽時期，蔣介石統治時期，坐過牢，受過苦刑。從敵人的獄門出來，他們的腰板更硬了。肅反運動中，他們無辜地挨了整。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軟體動物，再也直不起來了。學生們鬥爭他，朋友們見了不理他。最殘酷的是，又要他活著，要他教課。不應該那麼做。這太過火了。許多做法是違反憲法的。有些人自殺了。這不是平常的損失，這是我們隊伍，向科學進軍的隊伍中少了幾個人。沒有人可以代替他們的工作。這種做法不合中國傳統。國家喪失了元氣，學術方面倒退了好幾年。再不整風，那真將不堪設想。好的教授沒有了，好的科學家沒有了，好的醫生、好的護士沒有了。”

肅反的成果：根據公安部長羅瑞卿工作報告總結，全國規模的內部肅反在1800多萬職員中開展，查出10萬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中混入黨內的有5000多名，縣級以上領導幹部260名，混入共青團的3000多名。

在國家機關中查出220多名血債累累、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劊子手。歷史上殺害李大釗、陳潭秋、毛澤民、李兆麟、羅世文等同志的凶殺，迫害方志敏、王若飛等同志的特務、反革命分子，都被清查出來了。查出360多名利用各種偽裝埋伏下來的新派遣進來的現行特務分子。查出了65000多名普通的反革命分子、各種反動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自動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大約占總數的20%，即2萬名左右；稍加觸動就坦白交代的大約占25%，即25000名左右。查清了177萬多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其中問題嚴重的占13萬人。全國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有37萬多人。

據解密檔案，肅反運動到1956年底結束，一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53230人。所謂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殺，在鬥爭會上或刑訊逼供中被打死，或在

監獄、勞改中折磨致死等。據朱正《憶鳳翔》一文：人們根據 1957 年 7 月 18 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所提供的數字，很容易推算出這一場打擊了 140 多萬幹部和知識分子，錯案率超過 94%。

地主葉老五 易文輝？

1964 年初冬，我被抽調到貴州省晴隆縣以中央四清工作團的名義參加四清。由于我是從高校抽調來的，所以除了與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堅持日常四清工作外，還多了一項任務——撰寫地主階級剝削史。具體說來，就是撰寫我所在的箐口公社葉家的剝削史。

地處貴州省西南角的晴隆縣，幾乎全在綿延的群山包圍之中。在那種人迹罕至、鳥獸無踪的荒山野嶺裏，即使走一天也難得碰到一兩個行人。咳嗽一聲，四壁回音轟然而至，宛然置身于神奇世界，令人恐怖。就在這樣的自然環境裏，有一個葉姓家族，數百人分布在附近的幾個生產隊裏。據他們自述，祖先于明朝洪武年間從廣東遷徙到這裏。

他們的語言與當地口語并無二致，只是有一個詞很是特殊，就是“哼彭冷”——統統、全部的意思。在我們上海方言裏也有“哼彭冷”一詞，是上海開埠時廣東商人帶來的方言土語。

發貢一隊有一個地主分子，村上人都叫他葉老五。這葉老五 40 出頭，乾瘦、憔悴、病容、氣急，高高的個子因為駝背顯得如秤鉤一般彎曲。兩眼大而無光，牙齒稀疏，說話漏風，發音含糊不清。穿著一件破舊的卡其布中山裝上裝，鈕扣殘缺不全，口袋處脫了綫，一角向外翻卷。褲子是藍色土布縫製，髒得發黑。腳上那雙布鞋脫了後跟，冒著腳趾，裏面沒有襪子。第一次見面，他抖抖索索站立著，右手捂住左手，兩腳不斷輪流踏地，好似在做原地踏步動作。

“工作幹部，你好！”“工作幹部”是當地的地富反壞分子對國家幹部特有的稱呼。“家裏人呢？”我問。“全都出工去了。因為工作幹部要來問話，我等在家裏，要不然也出工幹活了。”

葉老五告訴我，他是附近幾個生產隊僅剩的 3 個地主分子之一。還有兩個老太病倒在床，不能動彈。土改時他還年輕，罪惡不大，得以苟活下來。寨子裏的地主分子，槍斃的槍斃、鬥死的鬥死，有兩個 1962 年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被貧下中農用繩子吊到樹梢上，問看見蔣介石沒有，答沒有，就不放下來。兩個手腕承受不了自己的體重，實在吃不消，只得說看見蔣介石了。于是貧下中農一鬆手，地主分子就從高空摔到地下。要不了幾回，就見了閻王。葉老五的雙腕嚴重殘疾就是那個時候被吊斷的。

葉老五中學學歷，土改時 20 幾歲，寫得一手好字，就是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每逢過年村民們仍舊來求他寫春聯。1962 年斷了手腕，再也無法提筆。現在勞動時鋤地，兩隻手捏在一起舉起鋤頭勉強還能勞動，別的活都幹不了了。

我寫的《葉家剝削史》，雖然短小，四清結束居然得了獎。虧得葉老五幫助，為我提供了不少寫作素材。

補白：2007 年我到河南省某監獄採訪，陪同的警察告訴我，他們那兒還有一個“反革命犯”！我很震驚，因為反革命罪在 97 刑法中已廢除。我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就請求獄警讓我見見，并保證不在報上發稿子。此人犯罪的原因很簡單：1974 年和大隊革委會主任吵架時，被主任痛揍一頓，痛極怒極，高叫要操革委會主任的姥姥，後來變成要操毛主席的奶奶，人民法院判他個無期徒刑。80 年代中期，這名犯人服刑 10 年後伺機脫逃，本世紀初又



回監獄自首。原來的反革命罪已不存在，很多反革命犯人都特赦了，但由于他脫逃，所以要服完最後的余刑。考慮到他是自首的，法院根據監獄的意見，從輕處罰，只加了半年刑（一般脫逃罪加刑三年）。監獄裏的警察對這名犯人很同情，而且他的翻砂技術很精湛，現在在監獄裏基本上當高級技工使用了。

—————

## 從血仇到姻親 松 北

1975 年秋，我岳父二哥的三兒子長盛，帶著他的新娘子進城來探望我岳父全家。長盛一口一個姐夫地叫我，十分親熱。相比之下，那個叫秀秀的弟妹却顯得十分靦腆羞澀，獨自坐在炕角低頭不語。儘管她打扮不俗，還是遮不住鄉下女孩的氣質。岳母看她挺拘束，就拿出錢對長盛說：“你帶秀秀去門口商店逛逛，順便給秀秀選點東西。”他們一走開，岳父就開口罵：“犢子玩意兒，討不起老婆了，找了個仇家的閨女，你說咱家怎麼出了這麼個敗類？”我和妻子一時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岳母便從頭講起那恩怨的由來。

秀秀的爺爺與我妻子的爺爺，也就是長盛的爺爺，原本是吉林山河屯同一個村的人。民國十四年（1925 年），兩家都由吉林山河屯遷到黑龍江的齊齊哈爾。妻子的爺爺叫房香閣，是個中醫郎中，醫術高明，尤擅針灸和骨外傷。幾年來，患者送的木匾、玻璃匾、銅匾挂滿一屋子。秀秀的爺爺姓祁，跟他當學徒。

1940 年，妻子的爺爺 43 歲，正當盛年，竟雙目失明了。那時滿洲國鼓勵百姓遷往北滿，許以減免地稅及各項雜捐。為全家 16 口人的生計，爺爺將半生積蓄投到（松花）江北，買了 70 晌土地（15 畝／晌）。那時土地很便宜。岳父弟兄仨，下地耕作，餘下的土地租出，爺爺仍為鄉親診脈治病。岳母念過國高，字又寫得好，成為老人的助手，負責開方子、抓藥。爺爺還打破世俗，將醫術傳授給兒媳（我的岳母）。他一生積攢的醫書、驗方也都由岳母保管和繕寫。這時秀秀的爺爺已離開這裏。由于跟爺爺學會了中藥知識，他自己單獨在外做起倒運中藥材的生意，也發了一筆財，後因腰痛，落下殘疾，就聽了爺爺的勸告，也置了 40 晌土地，由他的 3 個兒子耕管。可惜這哥仨全抽上大烟，好好一份家業，時間不長就全禍害光了。老爺子氣死後，連下葬的壽材都讓債主收去了，還是我妻子的爺爺出錢辦理的後事。不久，祁家的老大、老二也先後病死。爺爺看在同鄉份上，收留了祁三，并用中藥幫他戒掉烟癮，又租給他幾畝地，并幫他蓋了間土房，後來也娶上媳婦有了後。這祁三就是秀秀的父親。

不久爺爺過世，三個兒子分了家。岳父繼承了老爺子的醫術，分家時就得 8 晌地。那時村子人均耕地是 10 畝多。1947 年冬，村裏開進了土改工作隊。岳父家被定為富農，兩個大伯被定為地主，祁三被定為雇農，還當上了農會主席。他私下對人說：“看咱多有眼光，我家那些地光復前不敗光，今兒能當這農會主席嗎？”

那年冬月，大戶的土地已被分光，但家裏還有金銀手飾、元寶、散碎沙金、貴重衣物等物，于是掀起挖浮財運動。第一次動員會是在村公所開的，30 多歲的徐隊長操著一口山東腔講話：“貧雇農同志們！馬上行動起來，勇敢地向地主惡霸們清算吧！今天有共產黨給你們撐腰，一切都由你們說了算，要讓這幫地主惡霸們過去吃進去的今天全他娘的都給吐出來。”

岳父家三兄弟雖說分了家，但還在一起住。一天傍晚，祁三帶著他的“棒子隊”，背著套筒子槍，破門而入，將全家集中到大伯的正房裏。這個房間只有南炕，地下寬敞。他們在房梁上垂下兩根粗繩子，將大伯、二伯雙手反背捆起，又將帶來的粗繩、馬轡子、皮鞭橫七豎八地扔在地上。全家其他人全都被趕到炕上站立。

祁三發話了：“俗話說，船破還有三千釘，你家少說還有八千多。你們雖然交出了一點，但還差老鼻子了，今晚就是來挖的。怎麼樣二位，是讓我們打出來，還是主動交出來？”兩個伯父急忙哀求道：“祁主席，我們拿腦袋作擔保，全交了，要說還有就是這屋子裏的家什了。”“少廢話，吊起來！”話音剛落就把他倆吊起，腳趾觸地，像跳芭蕾舞，晃來晃去，然後用馬鞭猛抽。二伯母跳下炕，撲向丈夫喊道：“打死我吧，用我的命來抵你們說的那些沒影的事。”

這下激怒了祁三，命令手下人一頓棍棒，把二伯母打個半死。這些人雖是鄰里鄉親，可變臉比脫褲子還快。全家人都下地跪成一圈求饒。然後他們滿院子亂翻，各屋子亂挖，砸牆，敲地，足足折騰到天放亮，也沒找出一點浮財。最後，他們將老爺子行醫時患者送的牌匾統統抱走，全家人身上的棉衣褲都得脫下給人家。每家只留一套棉衣褲和一床被，其餘東西，包括炕上的草席，全部家私都被拉走。

那年冬天，一大家人只好用藍草現編成草衣穿上過冬，那套棉衣褲誰出門誰穿。挖浮財之後是掃堂子運動。讓各屯的農會，互相到對方去掃，也就是再到外村逼打一番。實在掃不出什麼，臨走也不能空手，什麼炕席、鍋碗瓢盆、鐵鍋都揭走。大戶都被掃得家徒四壁，最後遭殃的是中農。他們懊悔說，老鼠不吃，都給貓攢了。甚至貧雇農剛分的土改“勝利果實”也被掃個精光。

幾天之後接著展開更加血腥的“刮骨鬥爭”，凡被認為是惡霸的地主都得打死。岳父所在的屯裏抓起 20 多人，全關在村公所裏。說這樣也沒完成上級規定的比例，就又抓進一批。這些人都是富農和上中農。兩天後，鄉政府所在地東山屯舉行批鬥宣判大會。大會開始了，先將定為惡霸地主的 7 個人五花大綁押上臺來。第一個被批鬥的是老茅頭，偽滿時是屯裏的甲長（相當於村長），沒有民憤。祁三沖台下喊道：“大夥說，對這個大漢奸惡霸地主該怎麼辦？”只聽下麵的農會積極分子們大喊：“打死！”馬上就被拖到樺樹林，由棒子隊一頓亂棍打死。

第二、第三個都是由于平日小氣摳門，得罪了一些人。三五個人一喊，當場也被打死。輪到大伯時，祁三先跳出來一個耳光扇去：“房老大，沒想到你還有今天！”說完對著台下哭訴道：“康德（滿洲國皇帝溥儀的年號）九年我在他家扛活，說我偷懶，被他父子倆捆起來灌辣椒水。對這個大惡霸，怎麼辦？”沒想到台下死一般沉寂。稍待片刻，當年給老爺子當過長工的傅老爺子嘀咕著什麼。徐隊長立刻站起喊道：“你大點聲說。”老頭子嚇得不敢吱聲。這時他身旁一個叫大山的人站起來，大聲說道：“老傅頭說，那是他犯了大烟癮，人家老東家讓兒子幫助將他捆起來給他灌戒烟藥。當初不是老爺子救了你，今天還有你咋呼的份？我說祁三呀，人的良心可不能讓狗叼去！”徐隊長聽後馬上問大家：“是這樣嗎？”台下一片呼應：“是這樣！”“老房家地多不假，但從不欺壓人。那老東家在世時可是個善人，給我們窮人看病都不收錢。”“放了這哥倆吧。”“饒了他們吧。”兩個大伯被當場釋放，撿條老命。祁三則灰頭土臉一時下不來台。

對餘下的兩個地主的批鬥根本拿不出實質性的罪狀。對老李家的批鬥，都冷場了半天。在徐隊長一再鼓動下，秀秀媽站起大聲說道：“康德八年夏天，是你家的大狸貓咬死了我家的母雞，你硬是不認帳，還把我趕出你家，大家說怎麼辦？”看來她今兒要替代丈夫主持大會了。徐隊長一看這也端不上桌呀，就來了個新點子：“這賬我看這麼算吧，那母雞已死 6 年了，按母雞下蛋，蛋再孵化小雞，雞再下蛋……算滿 6 年，折算出價錢讓他賠償。”

岳母的妹夫的哥哥是吞河人，偽滿時也當過甲長，提前逃了。他們屯就拿岳母的妹夫出氣，說他曾幫哥哥催過糧，將他列入死亡名單。這個人平日樂善好施，信佛念經，實在出不起糧的人家都是他代繳，深得村民尊敬，所以農會對他的執行分歧很大。他們屯子裏沒人肯下手，上級決定讓我屯的祁三帶人去執行。

回來後祁三對屯裏人誇耀：“那姓果的小子對我說：‘看在老輩面子的份上求你瞅准

了，一棒子解決，可別讓我遭罪。’咱這手藝，只聽嘩嚓一聲，那腦瓜子就開瓢了，痛快地送他上了路。現在他在九泉之下都得念我的好呢。”

聽完岳母的講述，我問道：“這倆孩子的家長都同意他們的婚事嗎？”“都反對。他倆死活不分，婚禮也沒辦。今年春上他們自己就登記結婚了，搬出去單過。”說實在的，我挺佩服這一對敢于抗衡強大政治世俗的農村年輕人，特別是那個帶有鄉土氣質、羞羞答答的秀秀。後來長盛和秀秀生了兩個兒子，這兩個兒子先後考入齊齊哈爾大學和天津的一個大學。

## 父親的冤案 薛效凝

我的父親薛靖獻屬起義投誠人員，1951 年被潼關縣法院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冤死异地他鄉。

父親生于 1911 年，西安財經學校畢業後，在陝西財政廳、藍田、臨潼等地工作，1946 年調到河南蘭封(今蘭考)工作。1948 年 6、7 月間，父親在蘭封任縣政府主任秘書期間，受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封前綫司令員陳士矩、政委唐亮的接見，伺機接受起義指示。8、9 月間，時任開封代理縣長(只有幾天)并兼自衛總隊長的父親，率國民政府人員及地方武裝在開封北神崗附近起義，對和平解放開封起到了一定作用，受到開封警備司令王其梅、市長吳芝圃和解放軍二野司令員孔從周的表彰，隨後王安排他到軍幹校學習。學習期滿後，他要求回陝西工作，1949 年 8 月身著軍幹校發的呢子軍裝回到故鄉潼關。

父親帶著河南省軍區開具的證明信、介紹信和個人的有關證件，經陝西省軍區到渭南軍分區，見到了軍區司令員王敬齋。王讓他先回家聽候安排。父親帶著證件和介紹信到潼關縣政府找縣長劉仲英，劉態度冷漠，不予安排。為了一家 5 口人的生活，父親到黃河碼頭當了一名裝卸工。1951 年春天的一個夜晚，我們突然被一陣急促地敲門聲驚醒。幾個持槍的便衣闖進我家，不容分說將父親帶走。第二天，一個叫楊炎杰(楊牛)的人帶幾個便衣來抄家，翻箱倒櫃一陣，只找到了幾件軍裝、軍用毯子和解放軍軍事幹校發的衣物等個人用品，另有開封軍區的證件和介紹信等物，一起拿走。當時我們住在第一巷王鳳山家。他家院子很大，前房內有一個彈棉花機。我和弟弟給他家搖棉花機，每天能掙兩三毛錢。母親因受此沉重打擊，神經失常，到處亂走。我和爺爺、弟弟只好由二姑來照顧。二姑家有 3 口人，姑父是個賣醪糟的小生意人，生活也不寬裕。

起初我們在醪糟攤子上收錢、刷碗，過一段又和二姑到北街船委會門前賣開水和熟雞蛋。因維持不了生活，我和弟弟就去山西風陵渡背煤和紅薯，回來擺在街上或挑到巷子裏去賣，有時也給搬運工人拉小推車(木質獨輪車)。從黃河灘拉到西關火車站，一次掙伍分錢，一天能掙兩三毛錢。冬季，黃河結冰，弟弟到一家油條鋪當雜工，燒火、掃地、撥油條(因年令小，站個小板凳才能夠著)，我給山西人秦仰哲開的私人診所當小保姆，看孩子、掃地、燒飯。

父親被關押後一直沒有消息，又不讓家人探視。小小年紀的我每十日半月到縣公安局去給父親送換洗的衣服。有一次那個站崗的讓我站遠點，不耐煩地把取出來的衣服扔到了大街上，我只好一件一件把它撿起來。這種歧視和侮辱極大地傷害了我年幼的心靈。

1951 年 10 月 13 日，街上貼出告示：在潼關縣金陵寺召開公判大會。小小的縣城轟動了。當被押解的 10 個犯人走到第一巷口時，父親停下來對著第一巷口磕了一個頭，隨後被匆匆帶走。在金陵寺召開的公判大會上，執行院長劉仲英、楊樹華宣布：薛靖獻歷任偽職，在開封假投城；在當裝卸工期間，唆使“九弟兄”進行反革命活動，故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從逮捕到判刑，又到外地勞改，家人從未收到過法院任何有文字的東西或口頭的通知。從此，父親音信全無，死活不知。

1953年4月第二屆全國司法會議決議，要求全國各地清理錯捕、錯押、錯判案件，爭取半年內處理完畢。9月25日，潼關法院在呈報省法院的信件中寫道：將“九弟兄”視為反革命組織是不恰當的，因沒有事實和證據，應予以平反。但該案個別被告，除歷史上有罪惡外，還有不同的犯罪事實，故經我們研究，判處薛靖獻八年，沈均海三年，王玉杰五年。判決書寫道：“薛靖獻歷任偽職，偽裝投城，陰謀叛亂；暗示沈均海非法活動對抗工會，唯其陰謀叛亂未成事實，情由可原。故覺原判過重，應改為八年。”（兼院長李克榮、副院長劉克盛）

1954年8月31日，潼關法院收到陝西省人民法院來函：“張兼、劉副院長，本院1953年10月13日刑字416號，令你院調查薛靖獻一案材料，迄今已八月有餘，尚未見複，希接文後迅速辦理。並將調查材料寄本院，以便核辦為荷。”1955年元月28日，陝西省人民法院再次來函“催促希速復查為要”。1955年10月25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第三次來函：關於薛靖獻反革命一案，在前院長會議已給你院院長作了布置，並在電話上催過有關材料，但至今尚未報來，希接函後速報本院。11月20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第四次來函：你院1955年10月12日，判處反革命犯薛靖獻暗示沈均海組織“九弟兄”進行反革命活動一案，業已判決，在案執行。在執行期間發現此案以“九弟兄反革命案”認定屬錯。1953年9月27日刑呈字27號，以部分平反案呈報卷宗材料一并收悉。本院派員調查瞭解，以核閱原卷後提出以下意見：1、被告薛靖獻解放前在開封假投誠，以電報偽政府，誓為蔣效勞死而不渝。反動行為證據仍不充足。且投誠後又無顯著的破壞活動事實。若在此間勞動表現好，可以釋放。2、有關被告確系羈押，家庭受到損失，酌情賠償；3、接文後另作判定，公開宣判，恢復被告政治權利。

1956年4月9日，潼關法院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函，調查薛、沈的情況。7月5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給潼關法院來函：關於詢問薛、沈情況的信件已收悉。經查，薛靖獻在石河子瑪納斯水利工地勞改，陝西潼關人，反革命案，無期徒刑，已于52年6月因病死于新疆原農建師，現農七師軍法，41歲。

1956年10月，據說潼關法院召開了審判員會議，研究“九弟兄”案。會上，劉院長認為薛靖獻在開封假投誠，按潛伏特務，只是沒有機會活動，可以列入反革命，判他個七八年是可以的。省院讓放人，我們意見判八年。10月15日，潼關縣法院又一次在金陵寺召開宣判大會。宣布“九弟兄”案在判決上是錯誤的，該案在押人員全部釋放。當場釋放9人，唯有薛靖獻不在現場。法院又說，薛靖獻解放前一貫任偽職，開封解放時假投誠；又暗示“九弟兄”企圖奪取工會領導權，還是有一定罪惡的，故按以上兩件事判他八年。從1953年到1956年，一個錯案竟用了三年時間！劉院長置上級的函電催促而不顧，一意孤行，把人命關天的大事當兒戲。父親被一再錯判，我和弟弟受此牽連幾十年。

1979年2月20日和9月14日，我兩次向潼關法院寫申訴，要求徹底平反我父的冤案，特別要求對開封起義之事作出符合歷史客觀面目的公正結論；要求公開宣判，恢復政治名譽，並消除幾十年來所造成的政治影響；要求因錯判造成我家破人亡的損失及沒收他個人的全部財產，按政策予以賠償。潼關法院為了應付局面，于1979年11月20日作出裁定：撤銷原判，不以“反革命論處”而了之，但對開封起義投誠之事仍未做出公正的結論。

為此我又多次找縣委、政法委、統戰部等有關單位。1983年12月5日，潼關縣法院再次判決：撤銷1956年和1979年的裁定，“宣告無罪”，並輕描淡寫說“薛靖獻1951年投入勞改後死亡”。我再次找縣委書記宋某，宋于1985年元月25日批示：“著重政治平反，一些實際問題也要解決。”滿書記批示：“法院應系統彙報一下解決的程度。”潼關法院苗某仍無動于衷，一拖再拖。我又找主管政法的嚴書記，嚴書記很重視，派人去開封瞭解。我也給開封寫信詢問當年的情況。開封兩次來信談了情況。1986年4月28日，潼關統戰部通知：“經研究，薛靖獻按投城人員對待，其它問題由法院解決。”1988年5月20日，潼關

縣法院拿出 700 元作為賠償，其中 600 元作為 8 年冤獄賠償，100 元作為財產賠償。

事情就這樣草草了之，既沒有辦案單位或人員對薛靖獻進行正式政治平反，也沒有對因錯判造成的不良影響進行消除，更沒有對錯案給我們身心造成的創傷進行道義上的撫慰。拿著賠償家破人亡錯案的這 700 元錢，我能說什麼呢！最後，我只想對國家最高司法機關說：對於我提出的司法錯誤問責制的建議，請給我一個明確的答復，以安撫死者的靈魂、活者的心願。

## 老伴兒進牛棚之後 張惠華

1968 年 5 月，老伴兒進了“牛棚”，這一下可苦了我。我剛做過肺切除手術不久，由於營養較差，身體一直很弱。大兒子欣欣不滿七周歲，二兒子巍巍不滿四周歲，都在幼兒園全托，每星期接回家一次。老伴兒在家時，自行車都是他幫我搬到三樓，每周還能替我到幼兒園接送孩子，買煤買糧往樓上扛。現在，這些活兒都得我自己幹。往樓上運煤，尤其使我發愁。

老伴兒住牛棚期間還惦念著家裏的事兒，知道我的身體不好，去煤廠給家裏買了一車過冬用的煤球。望著這一大堆煤球，我心想，看來也得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來搬完這座山了。平時學習老三篇，這回可真的要活學活用了。我用洗臉盆一盆一盆地往樓上端，剛端了幾盆，就心跳得厲害，氣喘吁吁，滿頭大汗。不知休息了多少次，整整幹一個下午才把這堆煤運完。這樣的日子何年何月才能算完，老伴兒何時才能回來，想著想著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

老伴兒每月 50 元工資除留下自己的生活費外，其餘都叫別人捎給我。除了給媽媽寄去 10 元外，我一分都不敢動，全部存入儲蓄所。聽小道消息說，被揪出來的人員以後就不發工資了，只發給本人伙食費，我思想上要做最壞的準備。我每月工資只有 41 元，除去兩個孩子每月托兒費 24 元外，剩下的 17 元，除去水電房費、購糧、煤外，就所剩無幾了。儘管我的身體需要加強營養，可是惟恐老伴兒停發工資造成經濟危機，所以平時我一人在家，除了白菜就是蘿蔔，一天三頓窩頭（那時國家供給的糧食指標百分之七十是粗糧），省下的雞蛋票、肉票、糖票都留在周末，等把孩子接回來給他們改善一下生活。最多買一斤雞蛋，二三兩豬肉，再買上點兒餅乾，幾塊水果糖，星期日這一天就算過去了。星期一把孩子送走，剩下我一個人又開始湊合。

我們單位的牛棚裏有一個被迫自殺的，姓何。何某被揪出前，貼了工會常某一張大字報，揭發後者有一天晚上與一個女人在河邊行苟且之事。後何某因歷史問題被揪出，常某借機報復，在批鬥會上經常對何拳打腳踢。又發現何某日記裏有一首詩，寫他與妻子的私事：“香腮頤，酥胸露，摸嫩體，哪有够。解羅裙，半推就，勸君慢動手，且把燈吹就。”造反派將此詩用大字報抄下來，貼到何某的原單位城建局。因這首寫自己夫妻私生活的詩，何某挨了多少打罵，受了多少苦楚。實在受不了折磨，何某下狠心，把一根大鐵釘釘進了自己的耳朵。何某就這樣死了。又過幾天，城建局副局長于某也自殺了，是把一根大鐵釘子釘進了自己的心臟。群眾對何某和于某的死有懷疑。他們到底是自殺還是他殺？為什麼二人一個在城建局，一個在市政公司，却都用鐵釘自殺？

有一個王某，20 多歲，忘了哪個單位的，因罵江青被揪出。帶到我們單位游鬥那天，五花大綁，大牌子挂在後面，牌子用一根鐵絲栓著，鐵絲勒在兩片嘴唇之間，嘴角被鐵絲勒得淌血，目的是怕他喊反動口號。王某被折磨得半死，最後執行槍決。

有一次在工人劇院門前召開公判大會，有一位七十多歲的纏足老太太，嚴重耳聾。她家門口牆上挂著一個木牌子，上面用粉筆寫著毛主席語錄。有一天老太太家的爐火滅了，沒有木柴生火，就把這塊語錄牌用菜刀劈了生火用。鄰居平時與她有點兒矛盾，舉報了她。公判

會上，老太太被判處死刑。造反派揪著背後插著白標的老太太上了汽車。老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沒有一點兒恐慌害怕的樣子。造反派推拉著，她不慌不忙，邁著那雙纏足的小腳，一步一步走向汽車，拉到市外西郊鷄毛山執行了槍決。像這樣屈死的一般老百姓，全國不難道有多少！這些平民百姓的生命簡直不如一隻螞蟥！

這期間，我落下一個毛病。一聽到大喇叭裏傳出把某某揪出來的喝喊聲，一看到把某某揪到臺上的場景，我都感到仿佛心臟馬上就跳出心口，喉嚨立刻堵上一個大疙瘩，精神極度緊張，心裏馬上聯想到，此時此刻老伴兒是否也在批鬥會？是否也正挨造反派的訓斥和鞭打？老伴兒被揪出的消息，不知怎麼傳到了巍巍所在的幼兒園，小朋友都不願和巍巍玩了。那天送巍巍到幼兒園，我找他們的阿姨說：“巍巍爸爸是站錯了隊，可這與孩子有什麼關係？你們對小朋友們說這事，挑撥孩子的關係，搞得都不跟巍巍玩，你們做老師的，這樣做合適嗎？他是個吃屎的孩子，不懂事，難道你們也不懂事嗎？”我因身體很弱，氣得頭不由自主地擺動，手也發顫。那幾個阿姨互相使眼色，一個個都溜走了，沒和我頂一句嘴。

這時，全國各地大小城市掀起修建毛澤東思想展覽館的熱潮。邯鄲市的毛思館設在中華大街，由全市各單位抽出的工人幹部義務勞動建成。中間是主館，兩邊是副館，前面是一片廣場。建館期間，工人三班倒，工地上燈光亮如白晝，大喇叭不知安了多少，整天整夜播放革命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時值盛夏，周圍居民一天到晚無法休息，也不敢抱怨一句。反對修建毛澤東思想展覽館，那罪名大了！

受老伴兒牽連，我由財務科出納員貶到收發室搞收發。那年我 28 歲，參加工作 12 年來，還沒經過大的政治運動。後經觀察周圍廠礦企業的情況，都是如此：一家只要有一人被無產階級專政了，其餘家庭成員都不得安寧。4 歲的巍巍在幼兒園不也因爸爸站錯了隊，受小朋友們的孤立嗎？想來想去，誰都不怨，就怨一個人，那就是毛澤東。從中央到地方，多少老幹部和無辜老百姓受到迫害和誹謗，何況我這個小小的普通幹部。反正就這麼著了，愛咋的咋的，我豁出去了。如果總想不開，病倒了，我的兩個孩子誰來照顧？

從此，每天上班，我先到院子裏看大字報。那段時間，差不多每天都有我的大字報，說我老伴兒是三青團小分隊長，讓我管收發工作不可靠；還說麥收時我沒參加勞動，是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小姐。一開始看到這些大字報，真有點兒接受不了，時間一長也習以為常了。無所謂，任由他們瞎說八道去吧，我都當作耳旁風。

1968 年 9 月 1 日，欣欣已够上學的年齡了，想就近在中軸路小學（現展覽路小學）上學。此時學生起來造老師的反，不少老師被揪鬥。邯鄲三中揪鬥老師最厲害，把挂牌子的鐵絲掛在嘴上，被勒得順嘴角流血，紅衛兵一邊走一邊用木棍打。聽說其中有一位 20 多歲的女教師，因為兩根大辮子過膝長，特別好看，招人喜歡，就把她揪了出來，不但剪去辮子，還給她剃個大光頭。

上了學的欣欣在學校也受孤立，經常被欺負，哭著回家。有一次，那些孩子竟把欣欣的棉帽子搶下來扣在狗屎上。我聽了這些，心裏很窩火，但沒辦法，只能忍氣吞聲，叮囑孩子不要理他們。這一切都不管用，最後發展到每天晚上吃晚飯時，幾個孩子站在對面樓陽臺上，往我家玻璃窗上打彈弓。一共 12 塊玻璃，打碎了 7 塊。幸虧是南邊的窗戶，如果是北邊的窗子，這大冬天的，西北風可著口灌，我們娘兒倆可就受罪了。那些日子，幾乎每天的晚飯我們都是生著氣吃的。沒辦法，只好關上門，叫他們隨便打吧，只要不傷著人就好。

我天天盼老伴兒早一天解放出來，從五一盼到十一，從十一盼到元旦，又從元旦盼到春節，好不容易盼到有解放回家的消息了，我沒告訴孩子，只是暗自積極準備過春節的年貨。到了年根底下，我公司的女汽車司機趙某告訴我，春節前還是不放這些住牛棚的人回家。我心裏罵這些混蛋狗日的簡直不是人，只顧自己高高興興過節，不顧我們這樣的家庭度日如年。老伴兒春節前是回不來了，我想，做幾樣好吃的送去總可以吧！大年三十那天，我一放假（共放 4 天假，正月初五開始上班）就開始準備年飯，一直忙到深夜 12 點多。第二天大

年初一，我把準備好的餃子、炸元宵、紅燒肉、炸丸子等，放在一個長方形的紙盒子裏，用網兜提著，和欣欣一起去給老伴兒送年飯。因路遠，把巍巍鎖在家裏看家。天下著小雪，娘兒倆坐公共汽車到了郊外幹河溝站。下車後，從遠處望著老伴兒的單位，不由得鼻子一酸，泪水像斷了線的珠子往下掉。我盡力克制內心的悲傷，想來想去，還是讓欣欣一人背著東西送去為好。

在路邊等了老半天，才看見欣欣從那大門裏走出來，身後還背著那個紙盒子。欣欣告訴我：“爸爸打開紙盒子，看了裏面的東西，說他那兒沒有爐火，不能吃這些涼的東西，拿回家留你們吃吧。爸爸還給您寫了一張字條。”我接過字條，見上寫著：“你們給我送來好吃的東西，我感到欣慰，但這裏不准家屬送吃的東西，還是帶回家留你們吃吧。我這一切均好，不要挂念。”我連看三遍，頭上像潑了一盆涼水。心想，難道我老伴兒的罪過，比那些入獄的犯人還嚴重嗎？每周犯人的家屬還可以給犯人送吃的東西，獄裏都讓接受，為什麼我送的東西不讓接受呢？難道不讓老伴兒與家裏人有任何聯繫？他們到底想幹什麼？想把我老伴兒怎麼樣？娘兒倆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一回到家，兩個孩子就出去玩了。唉！這兩個吃屎的孩子什麼時候能長大，能分擔我一點憂愁啊！自文革至今，我與親戚幾乎中斷了書信往來（除了給我母親每月寄錢外）。不敢寫，怕招來大禍，也怕老伴兒住牛棚連累別人。當時我家的這種情況，所有的親戚都不知道。兩個孩子小，也不知道爸爸為什麼不回來。我只能獨自把苦水、泪水往肚裏咽。這次送飯回來的路上，我的泪水總想往外涌，覺著泪水、苦水已裝滿了我的胸堂，再也容納不下了。我用最大的毅力克制著自己的感情，不讓泪水流出來。好不容易到了家，把門一關，趁孩子們不在，痛痛快快哭了一場，心裏覺得舒服多了。

大年初一，屋子裏空蕩蕩的，只我一人。有生以來，從不曾有過如此冷清的春節。外面連一個炮竹的響聲都沒有，也聽不到互相拜年、走親訪友的祝福聲和歡笑聲。整個家屬院一片死寂，有不少家庭和我一樣，無法過一個團圓歡樂的春節！我們這個單元，9戶人家有6戶有人住牛棚。以這個比例計算，全國該有多少個這樣不幸的家庭啊！1969年春節，是文化大革命中我最難忘的一個春節，沒有團圓，沒有歡樂，只有泪水和悲傷陪伴著我，終生難忘。

正月十幾，老伴兒終於被解放回家了。他先在外面洗了澡，理了發，還買了半斤牛奶糖，算是給老伴兒和孩子們的見面禮吧！這半斤牛奶糖給我們全家帶來了甜蜜、歡樂和團圓，也給我們全家帶來一種安慰和彌補。

## 父親的八次創業 大 河

我的母親和大姨、小姨三姐妹全都嫁給了同一個男人——我的父親魏家文。三姐妹出生書香門第，日本占領南京時期，外公是無錫《新錫日報》的總編，因寫文章諷刺日偽政府被關進無錫監獄。母親和大姨去探監，認識了典獄長的朋友魏家文。經魏幫忙，外公得保外就醫，最後母親和大姨竟同時嫁給了魏家文。幾年後外公去世，父親魏家文帶著妻小和我的外婆、小姨、小舅，長途跋涉幾個月，舉家搬回父親的家鄉重慶。時值1949年初春。

為養家糊口，父母親在重慶民生路開辦了藝文打字研修學校，為西南地區培訓打字員和維修打字機。母親負責培訓工作，父親負責維修技術，大姨管理財務，生意井井有條，生活富裕祥和。好景不長，三反五反開始，街道盯上了多個老婆、穿著講究、風度翩翩的父親，無緣無故把他定為貪污分子，送監獄勞改2年。

1954年從監獄出來後，父母親和姨媽繼續經營藝文打字研究社。1956年公私合營，父母親積極響應號召，將自己居住的房子貢獻出來，全家另行租房居住，并把設備、流動資金

都捐獻出來，走合作化道路，帶頭與其他 5 家私營打字業同行合併，成立了重慶打字機生產合作社。父母親均在合作社擔任技術工作，父親還兼生產廠長。那時父親每天幹勁十足，打字機廠生產紅紅火火。

當時打字是用字釘撞擊蠟紙，再通過蠟紙印刷。蠟紙越新，打出的字越清晰，印的張數越多。當時全中國只有上海、杭州生產打字蠟紙，父親決定研製重慶自己的品牌打字蠟紙。父母親和大姨媽經過無數次試驗，終於研製成功鋼頭牌打字蠟紙，並逐步占領重慶及西南市場。不到一年，他們的合作社就進入國營行列，成為國營重慶打字機廠。進入國營，上級派人來做行政領導。新來的領導看不慣父親多個老婆的婚姻狀況，父親則對這位不懂業務、不懂管理的上級也看不順眼，相互之間產生了矛盾。1957 年整風反右，父母親積極參加運動，寫大字報，畫漫畫，與大家一樣向領導提意見。領導叫囂“反對我就是反對黨”，最後父親和大姨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公職，送松山化工廠勞動教養。國營打字機廠也因管理不善，沒人能生產打字蠟紙，導致效益退化，回到合作社。當晚抄家時，年老的外婆又氣又急，腦溢血中風發作，癱瘓 4 年後於 1962 年含恨去世。

那年母親也與父親離了婚，結束了 12 年的畸形婚姻。為了孩子們的前途，母親毅然離家去煤礦工作，開始了又一段悲劇人生。

1962 年，勞教回家的父親重操舊業，成立七星崗人民公社打字機廠。父親帶領幾個學徒，為重慶市各機關單位修理打字機。由於父親技術精湛，服務周到，深受各單位歡迎。不久，公社書記換人，新書記無視打字機車間的良好效益和影響，認為一個勞改勞教分子，有多妻的經歷，怎能當負責人，遂要父親的幾個學徒與師傅劃清界限，並調離父親去烘爐車間打鐵。父親與他據理力爭，拒絕其調度，表示此處不用人，自有用人處，準備離開他自己一手創辦的單位。該書記却聲稱：“你孫悟空逃不脫如來佛的手掌，走著瞧。”

1963 年，父親被迫舉家搬遷到成都，與他在成都的學生一起成立集體所有制企業，依然幹他的老本行。此系父親第四次創業。那年我剛入小學，我們的家在成都市南大街一個幽靜的四合院內，裏面有一口井，隔壁圖書館院子裏的參天大樹透過來的縷縷陽光灑落到我們院落裏，簡直是一個寧靜的世外桃源。放學了，我們手牽手上學到父親工作的地方，等到傍晚和父親一起回家。父親推著自行車，我坐在自行車前邊的橫梁上，弟弟坐在後邊行李架上，姐姐哥哥走在父親旁邊。每當經過藝賓苑餐廳，父親就給我們每個孩子買一支鹵鴨脖子作零食。回家之後，我們在有天井的院子裏遙望星空，聽父親講《封神榜》的故事。有時我們感冒生病，父親親自為我們打針拿藥。父親還為我們縫補新衣，為我們理髮，那真是我們童年時期少有的幸福時光。可是這短暫的幸福時光只維持不到兩年，重慶那個公社書記就多次派人來，要求工商局取締父親的店。

1965 年初的一天深夜，一群人突然來我家將父親銬走，稱父親系非法合夥營業，並抄家抄走了父親的勞力士手錶、毛毯、風扇、大衣等所有值錢的東西。第二天關閉了父親的店，甚至抄走了父親的維修工具，兌現了那公社書記“孫悟空逃不出如來佛手掌”的誓言。同時宣判父親為“管制分子”，時效 3 年。成都無法工作，父親無奈於 1966 年初又舉家搬回重慶這個傷心地。在那位書記的授意下，街道辦事處根本不予安排工作，欲置我全家於死地。

文革開始，我們家進入最艱難困苦的時代。由於父親被剝奪工作權利，生活來源斷絕，一大家人吃飯無著。幾個哥哥姐姐只得拿著扁擔去做臨工，到河邊擔河沙、水泥、石灰，參加修路，掙得最基本的活命錢。畢業於上海聖約翰醫科大學的大姨媽也參加洗衣組，洗臥鋪列車上的被子。我的母親曾經就讀於上海商科學校，精通英文和日文，離家之後也只能在煤礦做體力活。她每月將一半工資（40 元）寄回家維持我們的生計。在貴州地質隊的舅舅，也每月寄生活費支持我們。我們食不果腹，一日兩餐稀飯鹹菜。紅衛兵三番五次來抄家，拿走所有值錢的東西，批鬥、游街成為家常便飯。

地段羅大戶以整人為樂，有一天晚上將父親關在地段學習室，用輪胎條子狠命抽打。父



親後背道道血條，半夜裏痛得解不出小便。羅大戶指揮紅衛兵每兩天批鬥父親一次，游街示衆。父親行走困難，服用一顆止痛片後，在我一個姐姐和哥哥攙扶下，在紅衛兵群擁下，頭戴高帽子，游過大街小巷，游到我那唯一有正式工作的一個姐姐的單位示衆。羅不時還要挾小姨去交待問題，要小姨檢舉揭發父親，打得小姨遍體鱗傷。第二天又拿藥來我家給小姨擦，聲稱當時是打在小姨身上，疼在他心裏等等。小姨傷好後，羅又恢復了原來的態度。即便此時，父親仍然不屈服，認為憑手藝掙錢吃飯天經地義，自己根本沒犯法。

已是 70 年代，父親又經好心人介紹，由塗山人民公社出發票，到各單位上門修理打字機，不到半年又被那羅大戶向公社施壓而中止。1976 年初，渝中區交通機械廠聘請父親，拿出門面房讓父親開業幹老本行。才幾個月，地段羅大戶又氣勢汹汹帶人將父親銬走，宣判父親抗拒改造，勞改五年，送長壽菩提山農場。

無奈之下，大姨媽也和父親離婚，帶著她的 5 個孩子離開了家。我和哥哥、姐姐爲了生存也各奔東西，只剩下小姨留守家等候父親歸來。有一天我和兩個姐姐去看看守所看父親，父親蹲在那裏顯得特別瘦弱，我的後背一陣發涼。已是 6 次創業，皆被人毀掉，幾次被勞改的父親，這次恐怕在劫難逃，可是父親仍然不放弃希望，堅信“天下沒有不變的物質，總有一天，問題會解決”。這是父親的口頭禪，我們兄弟姐妹私底下也當笑話來自嘲。

1982 年，父親平反獲釋回家，並得到 360 元的國家賠償。一家國營單位主動聘請父親爲顧問，恢復老字號辦廠，組裝打字機。效益非常好，解決了幾十個職工子女就業。當時父親已近 70 歲，那是父親的第七次創業。

1987 年，74 歲高齡的父親和我們兒女一起開始了他的第八次創業。這次父親遇到一個好領導。我們企業所在區的區長當過知青，非常開明。他佩服父親 70 多歲的創業精神，全力予以支持。父親這個曾經的右派、黑五類、壞分子、特務嫌疑，先後以民建會員的身份當選爲政協委員、工商聯理事。我們的企業口碑良好，多次獲得“十佳企業”、“納稅先進”、“優秀私營企業”、“守合同重信用”等等殊榮。1994 年，80 歲的父親退休，將事業的接力棒交給跟隨他一起創業的三個姐妹，安享晚年。

1997 年，我們三姐妹將企業改名，加進父親的名字“魏家文”，以紀念父親的創業精神。2004 年 4 月的一天，父親已經臥病在床，他欣慰地告訴我們，幸虧鄧小平讓他趕上了幸運末班車，他今生已經沒有遺憾，並囑咐我們在他去世之後將骨灰撒進長江。一個月之後，90 高齡的父親安祥地離開了我們。那年 5 月，我們按父親的遺願，將老人家的骨灰撒進長江，流經忠縣故里，匯入大海。

## 一個右派的餘悸 梅桑榆

1958 年，楊先生所在的單位爲完成指標將他劃爲右派。一無材料，二無批文，他便被送往勞改農場。大煉鋼鐵期間，勞改犯被派去支援煉鋼，楊被高溫烤昏，從高爐上摔下，經醫生搶救，幸而未死。三年大饑荒期間，許多犯人病餓而死，楊因過度饑餓勞累而倒下，人還未死，便被管理人員拋入幹溝。場醫劉某與他有舊，冒著很大風險，悄悄叫人將他抬到一個麥場上，夜間送些稀粥、菜湯喝，並寫信通知其妻前來。在劉場醫和妻子的照顧下，楊先生漸能站立走路，重回勞改農場宿舍。

勞改場因餓死大量減員，總場決定將分場合併。楊先生隨隊轉移，由於身體虛弱，走出幾裏地便暈倒在路旁，管理人員再次把他當死人拋棄，醒來時發現隊伍已不知去向。這本是一個逃走的好時機，但他卻牢記管理人員的訓教：“無論你們逃到哪里，都逃不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逃跑，只能使自己罪加一等。”於是他又拄著樹棍，硬撐病體，趕往總場報到。他每天只走幾裏地，白天乞討，晚上宿在農家的草堆裏。

上世紀 90 年代末，楊先生已成為楊老。楊老向我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之後（我答應將整理發表）不久的一天，我接到母親的一個電話，說她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楊先生寫給我的，信寫得很簡短，說有要事商談。我立刻給楊老打電話，問有什麼要事。他說，他是從我原來的工作單位打聽到南京我母親的地址的。他讓他的老伴告訴我：“你要把老楊的經歷寫出來，我們覺得有些不妥。以後萬一政策有什麼變化，或者再來什麼運動，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不利，我怕老楊說的那些事又要成為罪證。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寫出來沒什麼意思。我們只想平平安安度過晚年，不想再惹禍，我們這個年齡實在經不起什麼打擊了。我請求你不要將老楊那些往事寫出來。老楊的錄音磁帶，請你保存好，千萬不要交給別人。什麼時候回來，請你把磁帶帶回，還給我們。拜托拜托！”

她的話令我十分驚訝，想不到在許多人對那個時代已經淡忘，甚至對那個時代大懷其舊的今天，我竟然還會聽到這樣的語言。想不到時隔 40 年，那個時代的陰影仍未從兩位老人的心頭抹去，當年那非人的折磨與迫害，至今仍使他們心有餘悸！

—————

補白：劉少奇的大兒子劉允斌所在的那個企業不在我家這個區。我們早就聽說“劉賊的大狗崽子”被挖出來了，但是我們這個區的人一直無緣參加鬥爭。忽然有一天，“劉賊的大狗崽”要輪到我們這個區游鬥，大家老早就跑到大街上等候。劉允斌站在大卡車的車門前面，脖子上挂著大牌子，左右兩個帶紅袖標的人用手捉著他的兩個肩膀。所到之處，人群中一片唧唧咕咕議論聲：“像，像，的確是像。”他臉色慘白，像一張紙，沒有一點血色，目光呆呆地看著前方的馬路和人群，一動不動。至今他在我的印象中仍然像是一張靜止的照片，不知道他的眼神和面孔若動一動是什麼樣子。不久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劉允斌在二道沙河臥軌自殺了。兩三天後，我正在樓院裏和一群同齡小朋友們玩耍，突然看到兩架直升機飛過天空，并在天空盤旋了兩三圈。孩子們都沒見過直升飛機，十分興奮，跳著喊著追看了半天。第二天，廣播說周恩來總理飛抵我市，出席我市軌枕製造廠的落成典禮。事後大人們說，周實際上是專為處理劉允斌的後事而來。二道沙河是一個郊外小村，一條從主幹鐵路分出的支綫，從村邊農田穿過，直指北部的中蒙邊境。有一次我乘車路過那裏，突然想起劉允斌臥軌的事，朝著這那條支綫鐵路凝望了很久，心想：他怎麼會在深夜時分走到離市區這麼遠的一個荒涼小村來臥軌呢？他在一步一步走到這裏來的路上想了什麼呢？生命是多麼可貴，難道還有比死亡更不能忍受的事情嗎？

## 父親的骨氣 燕 雲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在街頭偶遇許 XX（建國初期任城關鎮的武裝隊長），他對我說：“你父親這個人不簡單，我服了！”我說：“你認識他嗎？”他說：“有過一次接觸。那是清隊時，我們單位有個幹部，交代自己的經歷不清楚，幾次追問，也沒談具體，最後說方潤先生知道我這一情況。負責專案的同志就決定去找他提到的那個方潤先生取證。

“我和另外一個同志一行兩人，到你家中向你父親調查。他娓娓道來，把來龍去脈說得一清二楚。憑他提供的信息，根本達不到想把那個幹部定為反革命分子的目的。與我同行的那位同志火了，對你父親一再威逼、訓斥，叫他老老實實坦白交代。你父親始終從容不迫，毫不改口。最後那位同志把自己的記錄交給你父親，說這是你說的，我記的，你簽個字！其實他并未按你父親說的記，而是按自己想把那人定為反革命的需要來記的。

“你父親接過細看之後，拒絕簽字，說本人親筆寫的證明更具證明的可靠性，你們不是要求凡本人能寫的就本人親筆書寫嗎？我本人親自寫份證明材料，你們明天來拿！我的這位

同行者平素調查時氣勢汹汹，咄咄逼人，無往不勝，這次都被你父親給鎮住了，只好第二天來取你父親寫的材料。

“我多次搞外調，一般來講，接受調查的人對外調人員都是畢恭畢敬的，外調人員把自己的記錄交其簽字時，大多是說你們記的還會有錯嗎？看都不看就簽字了。你父親非但不在記錄上簽字，還堅持要自己寫，這確實少見。如果那天他在記錄上簽了字，很可能我們又增加了一個冤假錯案，以後又要重新調查平反落實政策。我們當時不知道方潤先生是你父親，是以後才慢慢知道的。”？

## 九歲的反革命翠兒 劉 路

我8歲上小學那年，記得語文課文都是一些“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之類的政治口號。老師教得很認真，反復警告我們，這幾個字絕對不能寫錯，更不能亂寫。說這話時，老師的臉色鐵青，我嚇得大哭，尿了褲子。老師不知所措，只好把我送回家。

回家以後，我堅決拒絕再去上學。父母無奈，就決定讓我第二年再讀。第二年剛上學，我們學校就出了一件政治大案：比我高一個年級，一個叫翠兒的9歲女孩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了！

當時的膠東國貧民窮，學校的辦公費主要依靠學生勤工儉學，高年級的學生養豬種地，低年級的學生養兔子。爲了給兔子提供食物，我們常常要在寒冷的冬天到野外去挖野菜。學生們連棉鞋都穿不上，更不用說戴手套了。一些聰明的學生就挖鼠洞逮老鼠，將老鼠皮剝下來做手套，鼠肉則燒著吃。那時人太窮，田裏沒有糧食可偷，連老鼠也又瘦又小，常常幾個老鼠皮做不成一副手套。

有一次，翠兒和小夥伴們捉到一隻又肥又大的老鼠，剝下皮來竟然可以做一隻完整的手套。翠兒高興極了，脫口說：“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

當時流行一首革命歌曲，其中有兩句歌詞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翠兒一言既出，其他同學也跟著唱起篡改了的歌詞：“天大地大不如老鼠皮大，爹親娘親不如老鼠皮親。”由于新奇、有趣，被篡改的歌詞一時流行校內外。

這兩句歌詞傳唱到我們班時，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唱。後來老師追查的時候，全班54名同學齊刷刷地站起了53名，只有我一個人穩穩地坐著。

翠兒最終因是歌詞的原篡者當上了反革命分子，每次開批鬥會都跟著地主、富農、壞分子以及像我爺爺那樣的“歷史反革命”，一起被押上臺接受群眾批判。那些成年被批鬥的對象都是五花大綁，在台下排山倒海的口號聲中由兩個年輕力壯的大漢兩邊夾著押上臺，翠兒則由一個大漢揪著頭髮，腳不沾地提上臺。久而久之，翠兒的頭髮被揪光了，造反派們就提著她的衣領。有一次，我在露天的主席臺下，親眼看見她被衣襟勒得當場翻白眼昏死過去。

1972年冬，大規模的批鬥會不太開了，不少鬥爭對象都回了家。翠兒因是現行反革命，她的父母和學校都不肯收留，翠兒流落街頭。有一次，好像是年末，學校已經放寒假了，我護校時，在學校影壁後面見過她避雪，衣衫襤褸，像三毛一樣飄零的幾根頭髮，還有一雙驚恐的小老鼠一樣的眼睛。

第二年，我們村裏的人都沒再見過她，她家裏的人也沒有找過她，這個小女孩從此無影無踪。她大約已經死在那個恐怖的年代了。

---

補白：舅舅張振文，桐鄉屠甸人，外公是開米行的，家裏還算殷實。抗戰時，一家人乘一艘腳划船，逃難到海寧。當時還是熱血青年的舅舅，一路唱著《松花江上》，流浪到硤石。初到海寧，人地生疏，一時無以爲生，舅舅只好托人到當地的抗日隊伍（解放後被定性爲土

匪部隊）裏做伙夫，後又經人介紹到國民黨的一個鄉公所當文書。解放後，舅舅開始了新生活，在硤石一所小學裏當了一名教師，並光榮地當選為鎮人民代表。這一段時間裏，舅舅盡心盡力做著他的教師事業，並娶妻生女，生活安定。文革一來，舅舅因歷史問題被學校開除。經母親牽綫，舅舅到建設公社烏船村大隊當了一名小隊會計。1970年，中央發動“一打三反”，因這段歷史，舅舅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公社、大隊輪番批鬥。那時我十五六歲，因父親去世，全家隨教書的母親住在烏船村大隊的小學校舍裏。每當看到舅舅佝僂著背走進大隊部去挨鬥的身影，看到母親一臉的無奈，我心裏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桐鄉人

往期訂正 徐化揚

（一）第一期，焦國標撰《發刊詞》

原文：1984年，四類分子全部平反。

讀者按：“平反”一詞不妥。

（二）第一期第69頁，王佳佳《會六國語又如何》

原文：這樣的會開了一年多，就等著父親說話。我父親一看拖不過去，就提了一條意見，于是被定為右派，

讀者按：什麼會開了“一年多”？似應是“一天多”。

國標回應：“這樣的會”，不是“這個會”，也許有一年多的可能。

（三）第三期第10頁，沈雲彪《我丟棄了父親的骨灰盒》

原文：1953年，父親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

讀者按：胡風案發生于1955年。

（四）第三期第25頁，劉斌夫《父親的一次粗疏》

原文：1953年搞清查，父親被查出涉嫌貪污150多萬元。這是個天文數字，以時價計，可買60萬斤大米。

讀者按：應是舊幣150萬元，即1954年新幣150元，約合1500斤大米。

（五）第三期第98頁，王譽虎《父親王藥雨》

原文：張（錫純）是中西醫學匯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醫結合，有巨著《醫學折衷參西錄》行世。

讀者按：書名可能錯了，應是《醫學中中參西錄》，意思是“以中醫為中心，以西醫為參考”。讀者在一位已故老中醫那裏見過這本書。

（六）第四期第48頁，大隱《憶苦思甜全過程》

原文：“憶苦思甜大會”會台中央的桌子上有一個話筒。會台旁邊設有席位，村革委會成員就坐在那裏。

讀者按：當時無“村革命委員會”一說，應或是大隊革命委員會。

（七）第四期第49頁，大隱《憶苦思甜全過程》

原文：憶苦思甜飯，一般是用糠皮、麩皮和蘿蔔葉子摻一起做成的菜團。

讀者按：似乎全國都叫“蘿蔔纓子”，無論規範還是方言。

國標回應：也許植物學上可以叫蘿蔔葉子。

（八）第四期第98頁，冉雲飛《補白》

原文：鬥爭大會將著名的民主人士牛蔭冠的鼻子，用鐵環穿起來，令其兒子、黨員牛友蘭牽著游街，把牛蔭冠被活活鬥死。四九年後，牛友蘭官至供銷合作總社主任。

讀者按：牛友蘭是父，牛蔭冠是子。牛蔭冠官至供銷合作總社主任。

康德語 焦國標書

- 一、請用電子郵件寄稿，以免編輯再次錄入。
-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mailto:xyc1971@gmail.com)。
- 三、本刊聯絡手機：133 6658 6793。
- 四、有意資助《黑五類憶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 五、郵寄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305 甲樓 110 號 焦國標，郵編 100091。
-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銀行北京北大支行，  
賬號 4080702-0188-038026-9，戶名焦國標。

## 《黑五類憶舊》第九期 201101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現行反革命專號

卷首文——

奉毛的名胡來 焦國標

編輯《黑五類憶舊》，大約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是在午夜之後完成的。根據陰陽學說，此乃一日之內陰氣最重的時期。在這個時段編稿子，有時我恍然覺得身後圍滿了一個個屈死的鬼魂，他們爭相伸著脖子，甚至超過我的肩膀，想看看電腦屏幕上我編裁出來的關於他們的血泪故事。奇怪的是，每當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心裏升起的竟不是恐懼，而是有這些鬼魂圍在背後，反倒覺得可靠、踏實、安全。

本期“憶舊”，是現行反革命專號，故事絕大部分發生在文革期間，其中一些故事與“毛澤東侵權”有關。這些“侵權”行為千奇百怪，比如有人在童話作品裏寫了一個唇邊長個小黑點的毛毛蟲，于是被指控影射下巴長有黑痣的毛；有人在集體廚房裏邊切菜邊高唱毛“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于是被指控“一個萬壽無疆切一刀”，分明是對偉大領袖發泄刻骨仇恨；有人生來口齒不清，跟著大家喊“萬壽無疆”，被指控喊的不是“萬壽無疆”，而是“萬臭無香”；有人應命在五個山頭上寫“毛主席萬歲”，被指控“歲”字上面

的三小豎歪在一旁，寫的不是“毛主席萬歲”，而是“毛主席萬歹”。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就因為諸如此類荒謬絕倫的犯罪指控被剝奪了生命，或自行了斷性命，成為冤魂。

今天回首看來，或在今天的年青人看來，彼時的中國人何以如此野蠻愚昧，何以那些人只要奉毛澤東的名就可以胡來。實際上，不止是彼時，也不止是奉毛的名，歷史上不乏奉任何東西的名胡來的任何先例，君不見民間奉黃大仙（黃鼠狼精）的名或奉小白龍（蛇精）的名也可以胡來嗎？人本質上只是一個電腦硬件，究竟能“顯示”什麼，端看腦子裏裝了什麼軟件。現在有人還想往中國人腦子裏裝毛字號的紅色軟件，好，鄙人樂觀其成。只是我想提醒一句：當初凡奉毛名胡來的人，後來皆被人胡來。

差不多一百年前，梁啟超先生說：“要而言之，信仰是神聖，信仰在一個人為一個人的元氣，在一個社會為一個社會的元氣。中國人現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沒有信仰；因為沒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來做手段……所以和尚廟裏會供關帝、供財神，呂祖、濟公的乩壇日日有釋迦牟尼、耶穌基督來降乩說法，像這樣的國民，說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實在不能不懷疑。我說，現在想給我們國民一種防腐劑，最要緊的是確立信仰。”

一個世紀過去了，這個病根沒去，中國人仍然是信仰真空。不過，我要糾正梁任公先生的是，現在中國最要緊的不是確立信仰，而是確立什麼信仰。黃大仙也是信仰，它不是元氣，是妖氣；毛主席也是信仰，它不是元氣，是邪氣。

## 目 錄

駛進校園的囚車·····	童 話 (05)
迷人的霜花·····	孔慶西 (07)
劉處長的發現·····	佟舒頌 (08)
切菜切出反革命·····	淞 民 (10)
退休的同事·····	阿 啃 (11)
父母瑣憶·····	冷 明 (13)
周有光逸事·····	春 紅 (14)
口號歲月·····	李六和 (17)
妻子因此嫁我·····	易 平 (19)
一封匿名信·····	顧啓明 (20)
南京小屠殺·····	使 者 (25)
僥幸的楞小子·····	李 漢 (27)
透視看大樣的由來·····	李振盛 (28)
當年貼反標·····	鄭植河 (35)
吳風琴，吳獻忠·····	青 苗 (38)
紳士殺人犯·····	孟昭民 (43)
變態的胡老師·····	王 匡 (50)
一組行刑照的由來·····	李振盛 (53)
智鬥會計·····	曉 相 (55)
益陽迎豐事件·····	湘 君 (57)
六個字的惡果·····	嚴建設 (61)
王家灘的嚴打·····	泯 民 (63)
同號五犯人·····	亦 然 (65)
我的老師和同學·····	懷 人 (66)
雲南G市那個女孩·····	馬 馳 (68)

小學同學鄭成功·····	劉 穎 (74)
冬瓜反標·····	江 南 (75)
農場裏的故事·····	汪 輝 (66)
趕形勢的牛老師·····	曠 夫 (77)
工宣隊員的講話·····	草 庵 (78)
劉少太可案·····	福 生 (80)
銀川冤獄·····	寧 屯 (81)
消聲行刑·····	金正月 (82)
他們因劉少奇而死·····	佚 名 (83)
搞雕塑的蔡大哥·····	曹白瑞 (84)
月亮惹的禍·····	蔡勛建 (87)
白老師的師道·····	馬 克 (89)
三十年的上訪·····	漢 風 (91)
大牆內血案·····	俞加深 (92)
作協裏的反革命·····	劉亞偉 (94)
楊繼年奇冤·····	廖亦武 (96)

補白：一位退休教師在街道與人聊天，曾說過以前夜晚的天比當今藍，星星比當今亮，月亮也比當今明淨得多，被人揭發，說是公然誣衊社會主義的月亮沒有封建主義月亮好，被打為現行反革命。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明華在監獄裏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主持會議，將該女醫生  
北島語 國標書  
判處死刑。

## 駛進校園的囚車 童 話

一九六九年底，北京第五十七中學的操場上舉行一次震懾群眾的“鎮壓反革命大會”。囚車是一輛人們俗稱為“悶子車”的龐然大物，車身玄青，不帶窗子，駛入五十七中後，停在校門裏側。車裏囚禁著六七個即將批鬥示眾的犯人，其中有一位戴著鐐銬的女性重囚犯。

那是一個午後，日光毫無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師生和附近的翠微路中學、玉淵潭中學、羊坊店中心小學、鐵路七小、鐵路五小等校數千名中、小學生，列隊進入會場，在嚴寒中席地而坐。現場觀眾還有鐵道部專業設計院職工，北京鐵路局職工，以及羊坊店地區的街道居民，人數多達萬餘。

五十七中的語文教師楊秀媛，那時二十八歲，上午得知被批鬥的女性重犯是班上的學生張大圍的媽媽。“鎮壓反革命大會”時常舉行，她熟悉其陣勢，痛苦便襲上心來：大圍聰明懂事，處處要強，他還不到十五歲，怎能目睹那種現場？又怎能那樣與母親生離死別？慈悲的楊老師決定，由同班的兩個男孩子陪伴大圍，下午留在家裏“復習功課”。

可是，在進入會場的小學生隊列裏却有大圍的妹妹張可心。可心才十二歲，是鐵路五小的學生。那天上午第四節課，老師沒有讓她上，在教師預備室裏，她得到了專門針對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開會批鬥你媽媽，全年級都去參加，你也要去，要站穩立場，跟你媽媽劃清界限。”這位中年女教師，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為什麼老師這樣冷酷？為什麼召開可怖的大會？媽媽，你在哪里？為什麼他們給你加上反革命罪？

大圍和可心的媽媽叫王佩英，曾在鐵道部專業設計院托兒所工作。在五十七中會場上，不少孩子認識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鄰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記得，媽媽與王阿姨常來常往，“三年困難時期”自己還吃過王阿姨給的包著玻璃紙的牛奶糖，家裏還有一件王阿姨送的禮物，是個漂亮的紙制小手風琴。

有人領頭喊起了口號。犯人們都被押上來，會場秩序森嚴，殺氣熏天。大圍和可心的媽媽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軍警扭著、拖著。她胸前挂著大牌子，寫有名字，名字上打著血紅的叉子。她不服，被強摑著頭與其他犯人排成一溜。發言人宣布他們的“罪狀”，喊到“王佩英”時，押她的兩個人突然從身後凶狠地揪住她的頭髮，猛地將她的頭扯起，向觀眾揚了一下。

楊老師看清了大圍的媽媽那張慘白、消瘦的臉。一條肮髒的寬帶子緊緊地勒著她的下頷，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現出凹陷。她不肯低頭，分明是在抗議，掙扎著要說話，可是卻發不出聲音。鏢鏢“嘩啦”一響，楊老師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腳上，一隻腳上沒有鞋，凍得通紅。

恐怖大戲就這樣在眾多中小學生眼前繼續。會場上口號震天。犯人們被押下去時，鏢鏢“嘩啦、嘩啦”的聲音令人聞之悚然，全場突然鴉雀無聲，一片死寂。可心抱住雙膝埋著頭，一直在屏息靜氣地忍耐。聽見鏢鏢的聲音，她知道親愛的媽媽走了，越走越遠，她再也不可能見到她了。這纖弱的女孩一動沒動，悄無聲息的淚滴滴落在地上。

散場時，五十七中的學生們排隊返回教學樓，外校的學生們也都排隊走回自己的學校。那輛囚車從校門裏駛出，在他們身邊揚起一路烟塵，消失在街道盡頭。

元旦過後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鐵道部宿舍一帶貼出了毛澤東語錄打頭的布告：王佩英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十年後，這一冤案得到平反。

## 迷人的霜花 孔慶西

那天晚飯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五師五十六團四營十四連召開班長以上幹部會。由于天氣寒冷，連部窗戶玻璃上結滿霜花。靠窗坐的一個排長，大約對會議內容沒什麼興趣，下意識地用手指甲在那玻璃霜花上亂寫，不知覺間寫了“毛主席”三字，又在下面寫了“大壞蛋”三字，連起來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壞蛋”。坐在旁邊的人發現了，突然大喊起來：“有人寫反標！”

會場頓時炸了鍋，如臨大敵。那排長立即被控制起來，軍務股連夜來人把他拷走。審查幾天，那排長被押解回來開現場批判會，身份變成了現行反革命。該排長原本是個很有前途的知青，下鄉前就入了團，很能幹，文筆口才也很好，聽說不久就要入黨了，可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無論他如何辯解都沒用，沒人同情他，也沒人敢同情他，昨天還是令人尊重的排長，現在卻沒人敢和他說話。

有一天趁人不備，那排長自己跑到離連隊很遠的阿倫河邊，在一個廢棄的漁房子裏上吊自殺了。大家得知他自殺的消息後，也沒有一個人同情他、可憐他，還給他加上自絕于人民和畏罪自殺的惡名。團裏通知他的家人，他父親來處理後事，草草埋了兒子的屍體就走了，也沒敢說什麼。聽說他父親是一個國營大廠的總工程師，可是又有什麼辦法！

---

補白：寧夏綜合地質大隊物探技術員余渭國，一九七〇年寫了一篇文章，說：“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這句話是錯誤的，是唯心主義的東西。他這樣一搞，實際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因為這句話，余渭國被判處死刑，慘遭殺害。



劉處長文革前是市直機關負責政工的幹部，老實、厚道甚至有些木納。處在那樣的年代，又負責這樣的工作，雖然是個老實人，如果不按階級鬥爭的節拍去整人，自己也要被人整。在長期的運動磨練下，劉處長原本敦厚的個性開始變得有棱角，政治嗅覺也一天天變得靈敏。終于有一天，劉處長下鄉做“五七戰士”時，挖出一個真正的歷史反革命。

劉處長下鄉的那個村子，非常貧窮，多年一直靠政府的返銷糧解決吃飯問題。那村有點像世外桃源，外面轟轟烈烈地鬧文革，它那裏却看不到標語口號，更不見批鬥會。公社、大隊稱它是“小臺灣”，那時臺灣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該村不到 30 戶人家，有兩大姓，林姓和高姓。劉處長一到該村就嗅出了問題：30 戶人家竟然沒有一戶地主、富農，中農也只有一戶，而且是外來的獨姓（高）。高姓早先靠織土布襪子掙點兒小錢，勉強劃為中農。至于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村裏更是一個沒有。按照階級鬥爭理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階級鬥爭，劉處長暗中告誡自己：當心，這裏很可能有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

一天，在田間地頭休息時，劉處長與一位林姓青年村民閑聊，問道：“你們姓林的，你這一輩應該是玉字輩，你們家兄弟幾個怎麼都是興輩？”這位青年村民支支吾吾說是他父親定的，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拋開既定的輩分字不用，另用其他字，在一個依靠輩分標識身份地位的家族社會裏，是非常罕見的，劉處長想，其中必有重大問題。從這一天起，劉處長就開始琢磨這個問題，并向其他村民詢問，但村民的回答是超級一致，都是“不知道”。這越發激起劉處長要弄個水落石出的好奇心。最後，劉處長做出一個決定：直接到高家查訪。

劉處長是在一天晚飯後去的，這個時間全家人都在，這樣就可以多瞭解一些信息。他瞭解到，高家老兩口有六個兒子，老大、老二在隊裏幹活，其他三個在讀書，小六還很小，別的也沒瞭解到什麼。劉處長回家與老伴說起此事，老伴說他神經過敏：“你是幹政工幹出了毛病，看誰都可疑，都有問題。”

一天，又到村民領返銷糧的日子，劉處長幫著念花名冊。待念到這一家時，劉處長仔細看這家人所有人的名字，覺得有點兒蹊蹺。過後，劉處長又把這家人的名字按花名冊上的順序自上而下寫了一遍，猛然發現，這家六個兒子的名字的最後一個字分別是中、華、民、國、東、州。謎團一下子打開，原來六兄弟的父親是要“興”中華民國東州。當地人早年稱日本為東州。顯而易見，這六個兒子的父親一定有歷史問題。劉處長連夜趕到公社，向領導報告他的重大發現。

第二天，調查開始。原來，此人在日偽統治期間當過某縣監獄的監獄長，日本戰敗後又成為某縣的警察局副局长，但是不知為何，解放後此人僅被關幾個月就被遣送回鄉。現在這一發現充分說明“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于是立即將其打成歷史反革命，掛上牌子，用拖拉機拉著到全公社各大隊游鬥。他的已上初中的老四、老五兩個兒子也被從學校趕回了家。

---

補白：甘肅靜寧縣農牧站的女技術員毛應星，一九五七年在蘭州農業學校被定為右派，在夾邊溝勞動教養幾年後回到蘭州。當局認為她不配再當教師，便將她送到靜寧縣。文革中，毛應星議論說，現在有一些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于是被判處五年徒刑。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甘肅省革委會討論她的案件時，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國，省委負責人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的。”九天之後，毛應星倒在城外的一塊麥田裏。

## 切菜切出反革命 淞 民

今天和一群離休的老伯伯一起參觀淞滬抗戰紀念館，他們大多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七八十歲的年紀，有的胸前還挂著獎章。參觀後是座談會，座談之後閒聊，一個老伯伯不經意間說道：“我是什麼都經歷過的，打仗，挨餓，差點當烈士，走資派，現行反革命……”旁邊一位老者隨口問道：“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麼戴上的？”那老伯悠然一笑，道出原委。

在奉賢五七幹校期間，老伯伯與其他兩人被派到廚房裏幫廚。一天，老伯伯正在案板上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聽到歌聲，老伯伯不禁隨口跟著唱起來，組成歌曲與切菜的洪亮交響。

一曲未了，突然沖進四個造反派，直斥道：“XXX，你這個現行反革命，竟敢對毛主席懷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說，將他揪出去批鬥毆打。怎麼回事呢？造反派說，他唱最後幾個連續的“萬壽無疆”時，每個“萬壽無疆”後面都跟著一菜刀，這是在發泄對偉大領袖的刻骨仇恨。

造反派通知警備區，說是抓住了一個現行反革命，讓他們帶走。警備區帶走了老伯伯，通知老伯伯的妻子時，只說 XXX 是現行反革命，現已拘捕。至于原因，一字未提。

警備區立即派人來調查，證人們都說這老兄生來喜歡唱歌，想來不過是隨口亂唱，早年也是出生入死，不會有什麼深仇大恨。關了三個月，證據不足，被放出來。

## 退休的同事 阿 啃

剛畢業教書時，經常在學校裏聽人講一個故事。五七年反右，上面規定每個單位必須劃幾個右派，有明確的指標，跟現在生孩子指標一樣。不過，領導最初表達的意思似乎是：只給你這麼一個右派稱號，不影響其他，比如工資待遇什麼的。學校裏通過做廣大教工的工作，總算劃出了幾個右派，但還缺一個不達標。怎麼辦？校長召開全校教工大會，鼓勵大家發揚民主，提名推選。大家都不說話，耗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某年輕教師內急，憋不住，去尿個尿，回來發現自己已被選為右派。

我一直以為故事裏的這個年輕教師是我校的一位退休教師。此人在我開始工作時就已退休，現在 70 多歲了，慈眉善目，酷似彌勒佛，笑起來找不到眼睛，和善得很。如今年老無事，有事沒事總喜歡往學校跑，聚在教師中間講故事，主要是臧否人物窮開心。有一次他嘲笑英語教師水平低，說 80 年代有美國友人訪問我校，其中一男友人想小便，問廁所，可他用的不是 WC，也不是 Toilet，而是一個美國土詞，全校英語教師沒有一個聽懂的，茫然無措。實在溝通不了，美國朋友只得動用人類共通的手勢語，捏著褲襠嗷嗷直叫，大夥這才恍然大悟。

現在此老沒事兒喜歡在街上閒逛，找錯別字，尤其喜歡找《紹興晚報》的錯兒，找到就去跟報社理論。人家都不理他，當他吃飽了撐的。他不屈不撓，一而再而三打電話。有一次，他來我們辦公室打電話，晚報接電話那人一聽是他，沒好氣，出語不遜，雙方在電話上

吵起來，老人家滿臉漲紅，對著話筒咆哮。

我是語文老師，有時候他也問我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一來二去，彼此熟悉起來，我這才知道，當初他並不是右派，而是現行反革命。因此即便後來出獄，他也不能教語數外等主課，叫他教地理，也不給評職稱，最後是中學中級職稱退休的。

事情是這樣的。文革期間，有一天他突然發現《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東方紅》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國際歌》說“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說起來，這個發現沒什麼偉大的地方，很多人都發現了，只是人家都是聰明人，憋在肚子裏不說。這位先生天真得可以，把這個當作天大的發現四處宣揚：“喂，朋友，我發現《東方紅》和《國際歌》有矛盾呢！”

革委會把他抓了起來，勞教，受了不少苦，還連累他的孩子。老爹是反革命，兒子當然是狗崽子，無產階級要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這話不是比喻，是寫實。文印室刻鋼板的一個教工，出身好，有一次真的用皮鞋踩他的小兒子，踩到往外吐食物。

當時去抓他的那個人，現在還健在，二人相安無事，他也不記仇，只是對踩他小兒子的那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老人至今耿耿于懷。改革開放初，冤假錯案都平反了，可是這位老人說，他的現行反革命案至今沒有得到平反。有一天，他把當初判決書的複印件拿給我看，上面某某革委會的公章赫然在目。我問他正本在哪里，他說那是不能給人看的，他要藏起來。

這老反革命多才多藝，會書法、篆刻，還作古體詩。他把整理成冊的獄中詩集拿給我看，新近寫的詩自署“退思居士”。很多人都把這位老人當個笑料，但我知道他不是。我記下他，不是因為他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乃因為他是一個曾經受苦的人，可到現在也沒有一個部門來承擔這個責任。

---

補白：一個同學打靶挖回不少子彈頭，把裏面的鉛燒化，用自製的模具澆注毛像章。鑄的像章不少，但個個呲牙咧嘴，便想趕緊處理掉，不然會惹麻煩。他找來錘子，一個個砸平，以為別人看不見就沒事了。不料還沒砸完，被鄰居發現，舉報了，他成了反革命。

---

## 父母瑣憶 冷 明

1968年8月我到錫盟草原插隊，次年10月第一次匆忙趕回家，因為我的反革命父親與我母親、16歲的弟弟和14歲的妹妹，即將一同被遣回四川老家。草原沒有車，我步行十天到達北京，可是父母和弟弟妹妹已離京。我只得冒著嚴寒返回草原，路上險些凍死。

父母落戶在荒山野嶺中，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沒吃沒燒，陷入前所未有的絕境。弟弟上山打柴，掉下萬丈懸崖，幸被一棵樹擋在半山腰，折斷一條胳膊。妹妹多病，數次病危，鄉民用滑竿抬幾十裏山路到鄉村衛生院搶救。生活如此無望，母親數次自殺未果。

父親曾是中共地下黨，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送情報，策反，刀光劍影血雨腥風，母親跟著沒少擔驚受怕。建國不久，父親從地下走到地上，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反間諜公安戰士，破獲不少大案，美蔣特務一個個落網。母親本以為父親會飛黃騰達，沒想到等來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銬。有人誣父親貪污、通敵，經調查，純屬子虛烏有。領導以父親有歷史問題為由，迫其退出公安隊伍，自謀生路。

父親開了一家鐵工廠，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不久公私合營，父親被分到一個瀕臨倒閉的殘疾人福利廠當工人。他自告奮勇搞革新，搞銷售，福利廠起死回生。廠子有了油水，上級開始安插親信，派個女廠長瞎指揮，廠子迅速陷入虧損。父親看不過，跟廠長吵了幾架。此人的丈夫是宣武區公安分局局長，於是輕而易舉地把父親打成雙料反革命（歷史反革命和現

行反革命)，鋸鐐入獄。

父親在團河、清河、天堂河、新都暖氣機械廠等幾個臭名昭著的勞改場輾轉勞改。大饑荒的三年，母親一人靠加工零活、幹臨時工維持生計。五個孩子要交學費，要穿棉衣，實在沒轍了，母親就去偷著賣血，養活一家八口。

## 周有光逸事 春 紅

有一次，專政隊的人問周有光對倪海曙講了什麼。周想，平時與倪講的話多了，沒什麼反動的呀。兩三個月過去了，周對老伴張允和說，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沒交代的。張允和說，你好好想想，平時有沒有跟人講過不合適的話。“不合適的話”提醒了周，有一年和倪海曙對對子，倪出上聯“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脫口對曰“秦皇漢武毛澤東”。談笑之後，早忘到九霄雲外，從沒想過是對是錯，合不合適。

這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關帶著滿腹狐疑，早早到牛棚把寫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說：“就是要你的這個‘秦皇漢武毛澤東’。倪海曙已經承認上聯，你不交代下聯，行嗎？你們這是反革命語言，是反對偉大領袖，你們兩個是現行反革命。”從此，大字報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邊又增加“現行反革命分子”頭銜。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周的一項工作是撿駱駝糞和野驢糞。荒郊野嶺，一叢一叢的節節草，大的有筷子粗，一兩丈長，瘦小的和牙籤一般細。當地人拿這粗的、長的造屋頂，編簾子、席子，細小短的當柴燒。周有光撿幾根細的節節草帶回來，把包在外邊的一層衣皮剝掉，露出象牙一樣潔白而潤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斷，再斜著剪，一平一斜兩剪刀，就做成一個精美的牙籤。節節草做成的牙籤，不像竹子的偶爾有刺，會刺嘴，也不像木頭的，到嘴裏容易變軟。那段日子，業餘做牙籤成為周有光的一大樂事，自己做，自己用，也送朋友。他至今認為，當地可以建一個節節草牙籤廠。

平羅的蚊子不是天黑出來，而是白天出來。上午十點一過，蚊子就多起來，空中伸手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滿手掌都是蚊尸。過了晌午，天稍晚一點，蚊子還沒退去，小咬的就隨著風像霧一樣地上來了，真是“小咬如霧蚊如烟”。

快到秋收時，周有光和林漢達被派到十幾裏外的土崗子看高粱。看高粱有規矩：不許坐下，不許站立不動，要走來走去，不許聊天，要一人在東，一人在西。土崗子地勢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圍沒有人家，沒有人影兒，沒有人來偷莊稼，也沒人來看守這兩個“看秋”的老頭兒。一連三天，他們規規矩矩，到第四天就不規矩了，走一走，停一停，還坐下聊天，聊著聊著，兩個語言專家還放膽躺下了。

林漢達仰望長空，喃喃自語：“‘攪苗助長’要改成‘拔苗助長’，‘攪’字大眾不認得。‘懲前毖後’不好辦，如果改說以前錯了以後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語了。”過一會，林又問周：“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周回答：“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

林講了一個故事：解放初期，他問掃盲班的學員什麼叫遺孀，一學員說，是一種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麼的。那這個孀字為什麼有女字旁？學員說，女人用的東西嘛。周說，從前有一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譯《風流遺孀》，觀眾可能要減少一半。林說，普通詞典裏都沒有遺孀這個詞，查了幾種都沒有，可是報紙上偏要用它。

談得興起，二人坐了起來，聲音也越來越大，仿佛對著上萬棵高粱講演。天上沒有雲，地上沒有風，宇宙之間只有他們二人。

寧夏人烟稀少，秋天，常有西伯利亞飛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個雁群至少2萬隻。距幹校三十裏，有一個很大的蘆葦塘，是大雁遷徙的中間站，有的雁群直接從這裏飛過，有的

就落在這個蘆葦塘休息幾天再起飛。那時局勢緊張，幹校夜間要值班巡邏。巡邏隊員講，大雁的組織性、紀律性特別強，夜晚的守衛有三道防綫。一旦有人闖入警戒綫，第一道守衛先發出叫聲，聲音不很大，大概有十來隻的樣子；你再走近一點，第二道守衛也開始叫，好像有上百隻；你更靠近時，就有千八百隻一起鳴叫，叫聲嚇人。巡邏隊員打開強光電筒照它們，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飛了，雁群拍打翅膀的聲音驚天動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動，巡邏隊員嚇壞了，趕快離開。

有一天，幹校正在廣場開大會，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鋪天蓋地飛來了。周有光回憶說：“飛到我們頭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只聽頭雁一聲怪叫，傾刻間大雁集體排泄，糞便就像雨一樣落到我們頭上、肩膀上。雁便粘糊糊的，弄到頭髮裏洗也洗不淨。”

---

補白：朱某的老家河北，抗戰勝利後成為解放區，他和同伴白某同時加入了共青團。那時雖曰解放，但國民黨軍隊常來搔擾，形成拉鋸區。有一次國民黨來了，把他們幾個青年抓去，問誰是共產黨，有的說了，有的沒說。朱和白當時都非常年輕，敵人一打，便都說了出去。共產黨一回來，他們照樣當兵、南下。解放後，朱、白都轉業在南昌工作。審幹時，朱向組織交待了拉鋸區的一些情況，並沒有把那時的那些做法理解成是變節行為。文革中，組織審查，認定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其根據就是朱當初的交代。朱某不服，給當時已身任要職的早年同伴白某寫信，要他證明自己的清白。事情反反覆複多次調查，白某從未承認有朱某交代的拉鋸區發生的那種行為。文革後期三結合，白某成了響噹噹的革命領導幹部，朱某成了階下囚。這一正一反的結局令朱某很揪心，他始終不明白：自己坦白向黨交代却成了壞人，而蓄意隱瞞歷史的却成了革命領導幹部。文革結束後，朱某經組織審查，被定為一般歷史問題，摘掉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然後三番五次去找過白某，白拒不接見，當革命領導幹部當到離休。

南 山

---

口號歲月 李六和

文革初，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東方紅》樂曲響徹太空，舉國歡騰。這一天，建築學院召開慶祝大會，主持會議的謝要武振臂領呼口號：“熱烈歡呼我國人造地球衛星爆炸成功！”全場群眾也跟著喊，可是喊至“衛星爆炸”，覺得不對，只有階級敵人才希望我們衛星爆炸，於是謝要武當場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送進牛鬼蛇神隊伍。

謝要武的兒子謝紅兵，在學院的附屬學校讀書。紅小兵頭頭找到他，要他和反革命爸爸劃清界綫。謝紅兵在會上無情揭發和徹底批判爸爸的反革命罪行，舉起小拳頭喊“打倒我爸爸”，全場不懂事的小學生也跟著高呼“打倒我爸爸”。這下完了，學校的紅小兵頭頭說他“哄騙廣大紅小兵戰士稱現行反革命分子為爸爸，惡毒之極，真是老子反動兒混蛋”，勒令謝紅兵當場脫掉“紅小兵”袖標，命他天天打掃學校衛生。

丈夫和兒子都因喊口號被關，急壞了謝要武的妻子冷梅，四下求人說情。學校工宣隊裏有位隊員，是冷梅的同學，上學追求過她，那時她罵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現在人家是有權有勢的工宣隊員，冷梅只好硬著頭皮去見他，求他放自己的丈夫和兒子一馬。

這位同學見昔日的夢中情人求到自己腳下，一本正經地說：“這事不好辦。不過看在過去同學的份上，我試試吧。”此後，他總往冷梅家跑，冷敢怒不敢言，為了丈夫和兒子，有

泪只能往肚裏流。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工宣隊發現此事，要開他的批鬥會，讓冷梅上臺揭發。工宣隊長說，只要冷梅揭發得好，就可以解除對其丈夫和兒子的專政。冷梅又羞又恨，上臺後光張嘴不知該說什麼，工宣隊長急了：“不發言喊句口號也行。”受此啓發，冷梅突然舉起右手，喊“打倒工……”，後面的“宣隊員”三字還沒出口，冷梅就停住了，頭上冷汗直冒，心想，好險呀，我也差點成了反革命。

工宣隊長見狀，問：“你要喊什麼口號？”“打倒工賊。”冷梅急中生智。“對，他就是工賊。”然後工宣隊長帶頭高呼：“打倒工賊！”全場群眾跟著高喊：“打倒工賊！”工宣隊長意猶未盡，又問冷梅：“工賊還跟你說過啥？”“他說過要給俺買一件的確良花襯衣。”隊長氣憤地攥起拳頭喊：“要他買！”台下的群眾也亦步亦趨跟著喊：“要他買！”

補白：一天早晨，突聞高年級一個叫梁夢溪的同學昨天半夜被縣革委會抓走了。幾天後，學校召開公審大會，宣布判處現行反革命分子梁夢溪有期徒刑 15 年。梁平時學習特別好，其他各方面表現也很好，因動手能力強，尤得物理老師劉的賞識，是劉老師組織的無線電興趣小組的成員。他們這個小組的成員，個個都能自己組裝收音機，還經常幫鄰居、同學修理各種小電器、有綫廣播喇叭等等，是個很受歡迎的小集體。因接觸收音機較多，梁夢溪無意間聽到了美國之音、B B C、莫斯科的廣播。若是自己偷偷聽，可能還不會惹那麼大的麻煩，夢溪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按照廣播裏提供的地址，給美國之音發信索要節目時間表！梁夢溪至少被關了 5 年，後來我上大學，他得到平反。他不屬於文革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復查的時間相對較晚。出獄後，梁夢溪還是用自己的專長開了一家電器修理部，賴以為生。

補白：上海一個作曲家，采用越劇曲調譜寫一首歌，歌頌江青，可是江青不喜歡越劇，曾說過越劇是靡靡之音。該作曲家馬屁沒拍成，反被打成反革命，因為“用江青反對的曲調歌頌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

妻子因此嫁我 易 平

一位轉業軍醫，因其父曾是國民黨的上校團長，又因酒後失言，被同事送進監獄。爲了將此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年僅六歲的女兒在廁所寫了“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門配合造反派，成立專案組，將這個六歲的孩子隔離審查。

幾經轉移審查地點，這個不懂人事的小女孩早已嚇得魂不附體，面對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種種問題，除了茫然就是哭著要找爸爸。一個女公安柔聲說：“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謊，你只要承認廁所裏的反動標語是你爸爸叫你寫的，我就帶你去見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訴你，快點承認，承認了你就是好孩子，我還會給你買好多好多的糖糖。”

在好多糖糖的誘惑下，小女孩終於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我、我、我寫不來字。”審訊她的人一下亂了套，可是一個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謀：“沒關係，叔叔來教你，你好聰明喲，一定學得會。”關押半個月，在這位朱叔叔耐心教導下，小女孩終于一筆一畫地寫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鐵證，造反派心花怒放。

一年後，到了讀書的年齡，老師告訴她說：“你是現行反革命，沒有資格讀書。”萬般無奈，小姑娘只好隨親人遠走他鄉入學，直到文革結束才回鄉。這個小女孩後來長成一個美麗的姑娘，再以後成了我的妻子。她嫁我的唯一理由是，雖然我長得很醜，蠻格格的，黑麻

黢黢的，極像梁山好漢黑旋風李逵，但她認定，一旦嫁給我，任何人就不再敢欺負她。她知道我一身正氣，渾身是膽，親見我把好整人的某院長打得滿地找牙。

當年小姑娘失去了十五天的自由，後來那個朱叔叔因犯重罪，剛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 一封匿名信 顧啓明

我原在常熟縣衛生局擔任秘書，文革開始後被推為文革小組長。下面各公社衛生院的年青醫生常常離開工作崗位，到縣城鬧革命，我多次接待他們。我一面歡迎他們送來的大字報，一面又勸他們回原單位鬧革命，不要耽誤醫療工作，但是勸說不僅無效，反被指控為壓制革命。為此，我曾以衛生局文革小組的名義，到郵電局打電報，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上述情況，請示怎麼辦，但沒有回音。

文革繼續迅猛發展，縣委許多領導幹部被圍攻、游街，黨組織癱瘓了，政府機關無法工作，學校停課，有些工廠停產，聽說外地已發生鬥死人的事。如此混亂下去，怎樣收場？至年底，我化名王偉東，憤然命筆，寫信給毛主席，嚴詞直陳混亂情況，強烈要求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復正常秩序。信的內容如下：

毛主席：

驚悉無錫發生“一二.四”武鬥事件，死傷數百人。消息傳來，驚心動魄！近來，各地都發生了武鬥事件，難道是形勢大好？！

現在某些方面，各級黨委都受到炮轟、圍攻，領導人被游街、批鬥，機關癱瘓，學校停課。難道只要保衛你一個人？！

為此，向你提出強烈要求：

一、向人民請罪；

二、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

三、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四、對殺人凶手要嚴加懲處；

五、對死難家屬要適當安置；

六、解放軍要進駐重要單位和學校，加以保護；

七、文化大革命要結合四清搞；

八、要提出“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各級黨委”、“保衛人民”等口號。

常熟人民 王偉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

信發出後，如石沉大海。至1967年春，縣委和縣政府完全癱瘓，軍管會成立，但混亂局面并未好轉，反而越加嚴重。10月15日那天，常熟發生兩派持槍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22人，震驚全縣。1968年春，經軍管會努力，兩派達成聯合協議，成立了三結合的常熟縣革命委員會，局勢漸漸平穩。

6月，運動進入清理階級隊伍階段。7月，縣軍管會、公檢法公布了幾個已列入偵查範圍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號就是王偉東反革命匿名信案。我大吃一驚，恐慌異常，自殺，未成，只好聽天由命，期望僥幸得脫。種種迹象表明，我已被懷疑上。11月初，精神壓力越來越大，終於頂不住，承認了這封匿名信，于是我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抄，個人信件和日記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筆作為作案工具被沒收，一張千元儲蓄存單被凍結。

我被反復批鬥，指控我立場反動，矛頭指向無產階級司令部，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鳴冤叫屈，還逼我交待寫此信是受何人指使。他們點了幾個領導幹部的名，要我指認，勸我何苦一個人擔責，要反戈一擊，交待出首惡，爭取從寬。我反復說明，無人指使，我就是首惡，不會誣陷他人。

不久，我被押到縣工人糾察隊關押，工糾隊員上來對我痛打一頓耳光，眼鏡被打壞落地，罰我手捧紅寶書低頭站立，早晚請罪，有時寒夜裏喝令我站起來恭聽最新指示，有時在我面前毆打其他人以示警懲。

一位後押進來的人告訴我，縣城各條大街都貼有打倒我的橫幅和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有的還貼上我的照片，報紙刊登著揭批我的長篇報導，縣廣播站兩次廣播了這篇報道。滿城風雨，名譽掃地。

1969年1月30日上午，工糾把我押到工人文化宮批鬥，縣革委會領導宣布處理決定：永遠開除出黨，永遠開除出幹部隊伍。縣軍管會、公檢法的幹部宣布了對我的判決：猖狂叫囂要“保劉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布後，我被戴上手銬。

1969年2月27日，我被押送老家支塘公社“就地服刑”。那天上午，雪後陰天，天氣寒冷，上了汽車，我回頭望望虞山，山上白雪皚皚，陰雲濃重，顯得無限淒涼。屈指算來，在虞山腳下的虞山鎮我已工作生活了十八個年頭。虞山，別了！今日一別難再見！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汽車先到支塘公社，再到十九大隊，接受貧下中農大會批鬥。批鬥結束，帶到第五生產隊，把我安排在一間草房裏住下。夜幕降臨，室內無燈，眼前一團漆黑，我倒在稻草鋪上，大哭一場。自第二天起，我天天參加勞動，或田間，或養豬場，不離生產隊一步。

我妻已成為二十二種人的一種——反革命家屬，被趕出工廠，到農村和我一起務農。我領養的女兒，初中畢業了，也插隊來農村和我在一起。一家三口，算是“團聚”了。生產隊要到麥熟才分口糧，我們只能自己出錢憑糧票買糧度日。我在鎮上的五間住房被拆去，在生產隊造了三間房，多餘的材料歸隊裏，還要我付五百元的建造費。

5月，縣軍管會、公檢法來了孫、陳兩個幹部，會同大小隊幹部，在生產隊辦公室厲聲問我：“到農村後，是否有人寄錢給你？是否有人寫信給你？你是否寫了信給別人？”我回答都沒有。他們又對我說：“對你已作了寬大處理。按照你的罪狀，可以判刑十年十五年！”我心想，莫非判死刑也可以？之後，生產隊對我的壓力加重了，要我早出工晚收工，當中不能松，不許“亂說亂動”。有時大隊幹部來，看到我就當眾無端呵斥，甚至打我一拳。

在公社的大喇叭廣播裏，經常聽到公社通知各大小隊和社員“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注意階級敵人的新動向”。每逢節日或階級鬥爭需要，我便被押到大小隊社員大會上，低頭彎腰，亂批一通，翻來覆去就那幾句話：妄想停止文化大革命，要劉少奇上臺，要走資派上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吾儕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吾儕貧下中農堅決不答應，要鬥爭到底。有一次，批鬥後掛黑牌到鎮上游街，黑牌上寫著“反革命分子顧啓明”，并逼我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顧啓明！”還有一次，我被押到支塘小學，由貧下中農宣傳隊主持大會，天真爛漫的紅小兵（小學生）用嬌嫩的小手舉起紅纓槍，對著我的後背一陣亂打。

此時，我妻患了腰椎結核等多種疾病，不能勞動，經常服藥打針，領養的女兒為避免受牽連，和我劃清界綫，由生父母領回，和我們脫離了關係。我每天出工勞動，上面規定，不給計工分。年終分配時，隊裏只給我平均口糧、柴草和二十元錢。我妻有病，很少勞動，所得工分更少，拿到口糧、柴草後，成為透支戶。

有一天，聽到社員在講，附近生產隊有一個南京來的姓範的右派分子投河自殺了，我大受震動。范某是我的小學同學，竟先我而去！我強自鎮定，反復告誡自己：切不可步其後塵，



除非勞瘁病死！

我忍辱偷生，年復一年，到 1972 年 1 月 30 日，三年“就地服刑”期滿了，可是沒有上面幹部來宣布。我天天盼望，焦急萬分，在田間勞動，時常偷看大路上有沒有縣裏來的人。我害怕起來：莫非此刑無期？一天天，一月月，挨過整整四個月，一天早上，隊裏通知我到倉庫場上開會。我趕快到會場，一位大隊幹部叫我聽好，當眾宣讀了縣軍管會、公檢法文件，宣布將我刑滿釋放，不戴“帽子”。讀完後，那幹部對我說：“你當社員了，不能翹尾巴，‘帽子’還在群眾手裏！”我心想，刑期不明不白延長了四個月，還留下一條不能翹的尾巴，又要當心被再次戴上帽子。後來，有的社員稱我是二等社員。

我妻病了七年，就醫服藥，到縣城住院看病，做手術治療，過去積蓄的錢都用完了，就陸續變賣傢具、用品、衣服等，生活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

“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我想起了這句最高指示，就多次到縣革委信訪科和縣公安局，要求“給出路”，給我安排一份適當的工作，但都沒有得到解決。有一次在縣公安局接待室還被訓斥了一頓：“刑釋分子，要老實改造自己！”

1975 年冬，聽說 69、70 年下放農村的工人可以回廠或辦理退休、退職，縣裏還成立了臨時機構五人小組專管此事，我妻便拿了當時廠方所寫的介紹到農村務農的信件，多次到原來做工的工廠要求對她作下放工人處理，但遭到廠方的拒絕。廠方說：“當時縣級機關學習班電話通知廠方，你是隨夫就地服刑，到農村務農，不屬下放。”我也多次到五人小組提出要求，但小組負責人是不詳察情由，以冷酷的態度拒絕受理。

粉碎四人幫，十年動亂結束。1977 年初，五人小組因工作結束而撤銷。我妻以及公社、大隊幹部，分別多次向妻子原單位主管部門要求解決這一問題。她的退職手續終於辦理下來了，月領保養費 15 元。當年下半年，縣衛生局李如寶局長出力疏通，介紹我進支塘公社衛生院當臨時工，月工資 30 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交生產隊記工分。

1978 年 6 月 2 日，支塘衛生院通知我到當地派出所，我去後見到縣人民法院蘇宗德院長和陶高欣、周大鈞兩位幹部，他們請我坐下，喝開水，我一時很感意外。他們對我說：“關於你的問題，你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經復查認為，現在決定撤銷原判，恢復名譽，恢復原幹部待遇，補發工資，還要恢復黨籍，即將在縣裏開大會宣布。暫勿外傳，等待通知。”

過了六天，通知我上城。在縣委第三會議室，在由縣級機關和衛生系統各單位代表參加的會議上，縣人民法院和縣委組織部領導幹部分別宣讀了上述復查判決和復查決定。會議結束，衛生局會計叫我到局先領取當月工資，後再補發。我趕快乘車到支塘，下車後飛快奔回家中，把此事一五一十告訴了我同難共苦的妻子。

## 南京小屠殺 使 者

1970 年 3 月 6 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在五臺山體育場召開 10 萬人大會，判處 11 名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執行，另有幾十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判無期和有期徒刑。

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嚴，交通中斷，商店停業，上百萬人被組織集中到主要幹道兩旁，列隊觀看十幾輛刑車、警車和軍車押解這些反革命游街示眾。所有犯人都被揪住頭髮，仰起面孔，讓廣大革命群眾認清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車隊出體育場北大門，沿廣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東路、大行宮、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門等路段，馳往鳳凰西街盡頭的刑場。11 位死者，其家屬事先未獲任何信息，他們的骨灰後來也全都不知去向。

繼“三·六公判”之後，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相繼又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公判大會，大

張旗鼓地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4月28日殺12人，7月30日殺24人，12月10日殺10人。林舜英、李立榮母子在同一日（12月10日）雙雙被判死刑，同乘一輛刑車游街示衆，同在一個刑場被殺害。

以上四批慘遭處決的57人，罪名幾乎完全一致——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及其親密戰友林副主席，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1980年前後，57名“現反”全部獲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確認為冤案，冤案率100%。

中國近代史上，南京是個多災多難的城市，曾發生過多起屠殺無辜平民百姓的血腥事件，最有名的當數1937年日寇占領南京後的南京大屠殺。如今，每年的12月13日，中國人都在沉痛悼念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日寇屠殺的數十萬同胞，然而1970年幾次南京小屠殺中死難的人們却被徹底遺忘。這是為什麼？難道外國人殺中國人不可遺忘，中國人殺本國無辜百姓就應該忘記嗎？

作為當年在“三·六公判”大會上被判刑的現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為刻骨銘心的日子就是1970年3月6日，它已牢牢嵌進我的記憶神經。四十年來每到這一天，那天親歷的場景總會自動浮現：

在公判大會主席臺上，主持人宣讀死刑判決後，我身旁那11位被綁得面孔紫黑的受難者，臉上的那種憤懣、絕望、恐懼、無奈、痛苦的神色；

從主席臺押往刑車停放處的通道上，受難者們因為捆綁過緊、難以呼吸而發出的那種不忍聽聞的呻吟，那已經不屬於人的聲音，完全是一種動物宰殺前從喉嚨裏擠出的淒慘低嚎；

刑車緩緩行進游街示衆途中，街道上空回蕩的那淒厲的警笛，正在向整個城市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個聽者脆弱的神經；

那插入受難者頸背高高豎起的11支白色亡命標牌，隨著車輛的晃動在緩緩搖曳，就象地獄中伸出來的天綫一樣，向廣袤的人世空間發射死亡的訊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臉上那種混合著驚悸、恐怖、疑慮的神情，刑車經過之處人群中發出的那種由驚呼、嘆息、竊竊私語匯成的低頻聲浪；

……

那時我就在第七部刑車上，這些親目所睹，親耳所聞，親身所感的可怕場景伴隨我一直走到今天，走了四十個年頭！

僥幸的楞小子 李 漢

1968年初，有一次早請示，全體同學循例揮動紅寶書齊聲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身體健康！”俺班一個平時二二乎乎的小子，這時忽然神經錯亂，大聲說：“祝蔣委員長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岡村寧次身體健康！身體健康！”全班愕然，一下子誰都不說話。那傻小子自己楞神兒半分鐘，忽然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他肯定是被自己的胡言亂語嚇哭了。在場沒有老師，都是同學，誰都不敢說話，都楞在那裏。過了一會兒，那小子自己突然喊道：“我是反革命！我是現行反革命！我去自首！”說著驚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我們都覺得，這小子肯定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大家在教室裏等候結果，議論紛紛。過了兩三個小時，校革委會副主任（原是珠算老師）來了，說：某某同學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是他的家庭出身是小資本家，屬於民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團結的對象，他不可能對人民公敵蔣介石有什麼感情，更不會對侵華日軍司令有好感。他的錯誤屬於口誤，而且事發之後立刻主動投案自首，認錯態度好，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假如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出身的，那就另當別論。所以經學校革委會討論，並請示上級南開區教育局革委會領導和駐局軍代表，決定責令該同學作出深刻檢查，並通報全校批評，如有再犯，從嚴處理。另外特別警告，出身于地主、官僚資本家、走資派家庭的同學，由于你們的家庭出身背景，你們如果犯了同類錯誤，將加重處理，給予記過處分！

這事兒，居然就這麼過去了。

### 透視看大樣的由來 李振盛

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陰沉，氣候燥熱。我像往日一樣，早早來到辦公室。多年來，黑龍江日報編輯部形成一個習慣：編輯、記者上班後，第一件事是瀏覽一遍當天的報紙，既瞭解國內外新聞，也找報紙上存在的問題，如有發現，就寫到評報欄上。我拿起散發著油墨味的當天報紙，看著第6版上由我拍攝的一整版“哈爾濱之夏”音樂會圖片，心裏美滋滋的。

哈夏音樂會是在“毛主席親手點燃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開幕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資產階級文藝黑綫猛烈開火”是這屆音樂會的主旋律。報社為突出宣傳這屆有特殊政治意義的音樂會，特地從編輯部各部門抽調記者，組成一個哈夏報道組。我被指派參加該報道組，負責攝影採訪。報紙每天刊發我拍攝的單幅新聞照片，我希望在音樂會閉幕前發個整版的圖片專刊，今天這個願望終於變成了現實。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圖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開始不久，為徹底破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報紙取消了記者的署名，文字記者一律署“本報記者報道”，攝影記者則署“本報記者攝影”。說實話，我從小成名成家思想濃厚，信奉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為一個剛剛走上新聞崗位的年輕人，我心裏整天想的就是儘早成為名記者。現在報紙突然取消記者署名，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誰幹的，怎麼實現我當名記者的夢想呢？心裏雖這麼嘀咕，却不敢說出口。

看著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滿整整一塊版，雖然只署“本報記者攝影”，但社內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這是我李振盛拍攝的作品。想到這一點，也有一種自我滿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編輯部的評報欄上很快貼出了第6版的圖片專刊，評報者在報紙上用紅筆寫出評語，建議給這個照片專版評為“好稿”。

就在這時，有人跑進3樓攝影組辦公室，慌慌張張地對我說：“不好了，哈軍工的紅衛兵把咱們報社包圍了，揭發今天報紙上的哈夏音樂會圖片專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們要求揪出肇事的攝影記者，還要揪出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後策劃者。總編輯讓你先到樓頂平臺上去躲一躲，免得他們沖上樓來把你揪走。”

我還沒弄清今天的報紙上到底出了什麼反革命事件，就被人連推帶拽地弄到樓頂平臺上。躲在樓頂，仍能聽到報社大門口傳上來的喧嚷吵鬧聲。我在樓頂探頭下看，但見黑壓壓的數百名身穿草綠軍裝的紅衛兵，擠滿了報社門前的人行道和那塊不大的綠草地，花草被踐

踏得一片狼藉。看起來，紅衛兵們群情激憤，有的揮動著《黑龍江日報》，比比劃劃地在向過往的行人宣講著什麼，有的又吵又嚷，在與報社職工爭論著什麼。

我獨自一人在樓頂平臺上轉來轉去，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過了許久，有位同事氣喘吁吁地跑上來，對我說：“那些紅衛兵太不講理了，非要讓攝影記者出面交待問題不可，總編輯怎麼解釋，他們都聽不進去，說今天這塊圖片專刊版面的攝影記者不露面，就決不收兵。總編輯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讓你下樓去對紅衛兵講一講發稿的過程。”我問同事，他們究竟抓到了圖片專刊什麼問題，這時才從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時我們的報紙每天4塊版，有重要報道時才臨時增版。8月22日的報紙，為突出文革開始後第一次哈夏音樂會的宣傳，增版兩塊，共出6版。我拍攝的9幅音樂會舞臺照片，發在第6版，通欄大標題是“歌頌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歌頌社會主義新時代”。左上角是革命職工高唱《東方紅》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紅旗，旗杆頂上有一個鋒利的槍頭。背面的第5版，是有關音樂會的文字報道，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勁》，配有哈夏音樂會會徽——毛澤東側面浮雕像。單獨看這兩塊增版，翻來覆去怎麼看都找不出絲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迹，反而會稱贊這一天報紙對哈夏音樂會的宣傳報道實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極好。

然而那時不知是誰發明了“透視看報紙”這一損招兒，一些紅衛兵常拿著報紙對著太陽透亮看，總想從中找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8月22日的報紙，對著陽光一看就發現問題了：第6版面紅旗旗杆頂上的槍頭，正巧從第5版毛澤東側面像的下巴部位刺進去，斜著穿透腦殼，在頭頂上刺出。這樣，“掩藏著的反革命意圖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紅衛兵憤怒地指出：“更為惡毒的是，在這個掩藏的反動圖案旁邊，還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標題——‘越看越有勁’，真是何其毒也！這種反動氣焰何其囂張！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們把此事定性為：“這是以極其險惡的用心來發泄對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這是有意製造的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當誅，罪在不赦！

我聽了同事的介紹，仍不相信天底下會有這等湊巧的事，急忙跑回辦公室，拿起報紙對著窗外的陽光仔細看。天啊！那紅旗的槍頭真的是不偏不斜，正從毛澤東頭像頂上穿過。心中不僅暗暗叫苦：這種倒黴的事兒，怎麼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為馬的荒唐歲月裏，曾聽說過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一幅《你追我趕》油畫，有的人疑神疑鬼，從油畫前景的蘆葦叢中硬是發現了“蔣介石萬歲”的反動標語。有的人從八大山人的國畫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動內涵。國畫大師李苦禪畫的潑墨大寫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惡毒污蔑八個革命樣板戲”。這些傳世之作，都被宣判為黑畫，橫遭批判。

我懷著極為憤懣的情緒走向一樓大廳，想與那些缺乏常識的紅衛兵理論一番。大廳裏擠滿了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其他大專院校的紅衛兵，報社的許多職工也聞訊趕來，與紅衛兵們爭論著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總編王慶功被紅衛兵團團圍住，逼迫他交出與這起反革命事件有關的攝影記者及幕後策劃人。

“這就是拍攝這一版圖片專刊的攝影記者李振盛同志，請他介紹一下哈夏音樂會照片的發稿過程吧。”王副總編見我來到一樓大廳，便向紅衛兵介紹。

紅衛兵一看我是一個比他們大不了幾歲的年輕人，沒等我對發稿情況做出解釋，就七嘴八舌地盤問起來。我如實介紹了這一版圖片選片定稿、版面設計、製版、付印的全過程。他們大概也聽不太懂，仍然不著邊際地問這問那。我有點不耐煩，說話時帶著很不服氣的腔調。

“你就是這起反革命事件的製造者之一，你還敢嘴硬？！”他們大叫起來。“你們沒有調查，不瞭解情況，憑什麼說這是反革命事件？你們有什麼證據？天底下有你們這樣看報紙的嗎？純粹是沒事硬找茬兒！無事生非！”

“這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你們這起反革命事件的證據全都印在報紙上了，這種反革命的伎倆，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新動向，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廣大革命群眾一看就明白，還用去調查嗎？”他們振振有詞地嚷著。

“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地提出問題和認識問題，我們就要犯極大的錯誤。”一個紅衛兵頭頭號令在場的紅衛兵，一起打開人手一冊的《毛主席語錄》，集體朗讀了一段“最高指示”。這分明是把我們報社的編輯、記者都當成是“不拿槍的敵人”。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結論是產生在調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我也不示弱，你們是紅衛兵，咱也是根紅苗正的紅五類，難道還怕你們不成！就順口背誦了一段最高指示。紅衛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頂撞他們，跟他們打語錄仗，更是惱怒，威脅說：“你再不老實，就揪鬥你！”一名小個子紅衛兵沖上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說要拽我到他們造反團總部交待罪行。

“我們報社就他這一個年輕的攝影記者，你們要是把他帶走了，你們明天在哈工大操場上舉行的造反點火大會，我們就派不出記者去採訪了。”在這關鍵時刻，王慶功副總編撥開人群，從容地走到我的身邊，用他那特有的不緊不慢的語氣，對那位揪著我衣領的紅衛兵說。明天的造反點火大會要首次揪鬥省委領導幹部，如果省報沒有記者到場採訪報道，豈不缺少權威性？紅衛兵頭頭一聽王總編這話，就說：“先不用帶走他，讓他戴罪立功！”那小個子紅衛兵極不情願地鬆開手，狠狠地用力一搯，咬牙切齒地說：“你聽見沒有？今天暫時不揪你，是讓你戴罪立功！”

“好漢不吃眼前虧，算了吧，別跟他們這幫小孩子們一般見識。”站在旁邊的報社經理部的小鮑輕聲勸我。

假如我被紅衛兵拉到他們的造反總部，肯定沒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還是抗拒，都會受皮肉之苦。那時紅衛兵打人最常見的招數是掄起軍用皮帶，用那鐵扣子沒頭沒腦地亂抽一頓，不少人就這樣被打傷致殘，有的被打致死。哈爾濱三中的老校長，就被該校的鬼見愁紅色造反團用皮帶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裏。

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向社會大量印發傳單，揭發《黑龍江日報》發生的這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時轟動全省、全國。一位在另一家省報當記者的老同學來信說，當時他看到了紅衛兵郵寄的傳單，說“這是一起公然利用黨報製造的極其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還點了攝影記者的名字，很替我擔憂。

經協商，由前來包圍報社的哈軍工等3個單位的紅衛兵組織和報社印刷廠的工人赤衛隊組成聯合調查組，負責調查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後做出結論，公諸社會。

調查半個多月，9月10日發布一份調查報告，由報社印刷成傳單，有好幾萬張，送各大專院校紅色造反團，散發全省各地市縣，還郵寄到北京及各省兄弟報社，以消除起先紅衛兵廣為散發的透視看報紙發現反革命事件的傳單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我心想，應當保留一張調查報告原件，作為這次痛苦經歷的歷史憑證。幾萬張調查報告傳單都散發、張貼光了，我把報社大門前牆上的一張揭了下來。這張四角有粘貼痕迹的傳單，與一張增刊報紙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將近40年。這份調查報告傳單如今大概僅存世這一張。

現在讀這份調查報告，覺得十分好笑，一個本來明明白白的事兒，却興師動眾地去“認真調查，反復核實”，真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歷史玩笑。

調查報告對紅衛兵圍攻報社、揭發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動給予充分肯定：“廣大革命學生對兩個版面提出質問，是出于對最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階級覺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現，也是出于對黨報的高度的關心。《黑龍江日報》的革命職工，對提出質問的革命群眾表示敬佩和謝意。熱烈希望廣大革命群眾對報紙工作繼續加強監督，經常提出改進工作的批評和建議。今後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

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強政治責任，認真改進報紙的編排校印等工作。”折騰了半個多月的鬧劇總算結束了。

這張傳單的落款是“聯合調查組”，其成員是哈爾濱電機廠四車間紅衛兵、哈爾濱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哈爾濱建築中學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造反團和黑龍江日報社赤衛隊。在這4個造反組織中，有兩個造反組織用了“毛澤東主義”，而不是“毛澤東思想”。當時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公開宣揚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北京，紅衛兵們覺得，馬克思和列寧的理論都可稱為“主義”，毛澤東的理論却被稱為“思想”，這不公平！他們發出一個倡議：要把“毛澤東思想”改稱為“毛澤東主義”！全國紅衛兵紛紛響應這個“偉大倡議”，成立“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據說周恩來曾為此專門請示毛澤東，最後確定還是稱“毛澤東思想”，這場毛澤東思想升格鬧劇最終平息。

調查報告總結的教訓之一是：“過去出版報紙沒有隔紙相望檢查的習慣。因此，在報紙的各個環節上，也就沒有用透視的方法去檢查報紙。所以，在《黑龍江日報》1966年8月22日五、六版上出現了這種情況。”鑒于此，報社領導立即整改，總編輯通知經理部，讓木工房加班趕制幾張燈光台。燈光台有普通辦公桌那麼大，臺面是一塊透光磨砂玻璃，下面裝4支日光燈。一開燈，整個臺面通明透亮，把報紙大樣放在上面，就像醫生看X光片那樣，能看到“透視效果”。各版大樣合到一起，放在燈光臺上隔紙相望，反復透視檢查，一旦發現問題，立即讓排版車間改版，調整版面位置。

那時，報紙的第一版經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澤東照片，其他各版通常都是各種批鬥會的報道或大批判文章。剛開始的時候，要求不得在毛澤東像的背面出現含有“反面內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標題，還是正文中的小號字。這種嚴苛的要求是根本辦不到的事。實在沒有辦法，後來又退了一步，改為不准有“反面意義的大字標題”印在毛澤東像背面，譬如當時批判劉少奇是“大內奸、大叛徒、大工賊”，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大批判中還常用“修正主義，反革命，走資派”等等，這些字眼決不允許疊印在毛澤東像的背面。值夜班的編輯，人人神經高度緊張，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煩。

報紙大樣放在燈光臺上，反復透視看幾遍，改來改去，沒完沒了，如此“整改”，給排版車間額外增加許多麻煩，排版工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改動重排，到下班時間也無法下班，苦不堪言。

據說黑龍江日報社是最早製作燈光台透視檢查報紙大樣的報社，後來中央各大報社以及全國各地方報社也都先後增設了燈光台，供夜班編輯透視看大樣。

當年貼反標 鄭植河

我初高中都在韶關北江中學度過。文革開始，中學停課，學生造反，1972年後教育秩序一度恢復正常。記得讀初一、二年級時，所有考試都是開卷，到初三年和高中，就實行閉卷考試了。1973年出個“白卷英雄”張鐵生，我們這些想讀書的人都絕望了。

同學李小益，出生在廣州一個幹部家庭，初二時隨父母調到韶關。他音樂、數學、英文都很不錯，詩詞寫得特別好。我倆和另一位同學原滿韶，三人關係很好，喜歡看書，經常互相借書看，其中有些是受批判的禁書，如《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三家巷》等。那時因反蘇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讓唱，但我們偷著學唱，成為我們高中時代的流行歌

曲。

在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有想法的年輕人都變得很叛逆，總想幹點什麼出格的事情，我們三個就特憤青。1975 年，我們高中畢業，想考大學根本不可能。那時，想成為工農兵大學生，要工作幾年後由組織推薦。我被分到韶關耐火材料廠，原滿韶去了韶關柴油機廠，李小益去曲江縣大塘公社一個知青點務農。雖然分開了，三個人還經常聚在一起。

1976 年，大約是 4 月 7 日，我們從廣播裏聽到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四五運動。8 日，李小益從知青農場回來找我，說起四五運動，明明是群眾悼念周總理的革命行動，却被誣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們非常氣憤，覺得要做點什麼，表示對北京的支持。

4 月 11 日晚上 10 點多，我和李小益騎著單車出來。天下著雨，街上行人很少。在韶關市區幾個人流較多的地方，我倆一人迅速往牆上貼標語，一個人用雨衣遮擋，一個半小時內貼出 20 多張標語，

內容有“伸出醫國的手，重整山河”，“XX 反動命難逃，掙扎徒勞，革命巨浪比天高，試看江南與江北，滾滾波濤”等。

第二天一早，這些言辭大膽的標語立即引起巨大轟動，有關方面迅速開展全市摸查。事發一個月後，我們被捕，三人以“張貼反動標語，破壞反擊右傾翻案風”罪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集團，街頭批鬥二十多天后入獄。李小益被判處死緩，我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貼標語的僅是我和小益二人，原滿韶只參與了議論，但有關部門硬要做成“集團案”，我們三人的一些同學、親友也受到牽連。

在韶關監獄僅關 5 個月，就傳來四人幫倒臺的消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進監獄不久，獄方就把我調入醫訓班，醫訓班結業後乾脆不再讓我去勞動，專心寫申訴材料。1978 年 11 月的一天，獄警通知我：“你可以出獄了。”

整整坐牢兩年半（30 個月），走出監獄那一刻，沒什麼大喜大悲，只是很開心。韶關市為我們三個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平反大會。我們回原廠上班，省裏領導來韶關看望我們，問我們對今後的想法：如果想工作，可以安排條件好一點的工廠，如有別的想法也可以提出來。我們三個想都沒想，立即要求：上大學。當初在獄中聽說 1977 年 10 月恢復高考的消息，我很激動，可是根本沒可能去考試。出獄時，1978 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的機會已經錯過。

省領導談話幾天後，有關方面通知我們：可以參加高考。考前填報志願，我們三個都選擇中山大學，出于政治抱負，而且都選擇了文科，我填報的是中文系，李小益是哲學系，原滿韶是歷史系。我們用了兩天時間關在家拼命復習。

考試安排在韶關市委招待所，一人一個房間，卷子 1978 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統考副題。我現在唯一記得的一道題是“鄭和下西洋”名詞解釋。總體感覺，對我而言，考題不算太難。1975 年高中畢業後，我三年沒碰過課本。幸好，中學基礎還算扎實，在監獄裏我也經常看書看報。大概過了一周，我們就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考試分數沒有告訴我們，我知道這個并不重要。

1978 年 11 月 30 日，《南方日報》報道，鄭植河等四位青年，因支持“四五運動”入獄，平反後被廣東省招生委員會批准進入中山大學學習。報道中說，他們的文化基礎知識掌握得較好，有一定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德智體全面衡量，被破格錄取到中山大學深造。

1978 級中山大學中文系約 100 名學生，分甲乙丙三個班，我在丙班。我是班上唯一被破格錄取的，同學們大多知道我被捕入獄的事情。當年的報紙把我、李小益、原滿韶寫成是“四五英雄”，但同學們並沒有把我當英雄看待，大家關係平等，互相尊重，文革中那種盲目的迷信崇拜已經逐漸在改變。

經過韶關之劫，我在大學裏比較沉默，但骨子裏依然是個憤青，依然很關心時事，有時會為某個政治問題與持不同看法的同學爭個你死我活。班上有不少憤青，當時我們中文系的

教材還是很“左”的，像張愛玲、錢鐘書這些大家，基本不在視野，徐志摩、胡適等是反面批判對象，重點則是魯郭茅巴老曹。記得有一次現代文學課，有個觀點比較激進的同學對老師說，孫犁不能算作家，他根本沒寫出什麼好作品。

1982 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韶鋼，負責宣傳報道。深圳、珠海的活力吸引了我，1987 年，我決意離開國企，到深圳一家報社當記者。80 年代末，我又調到深圳旅游局，成為中國第一批星級酒店檢查員。2005 年，我自己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我的同班同學，有從政、從商、從文的，不少是知名的成功人士，我經歷過種種挫折，現在算是半成功吧。我經常對部下和朋友們說：“如果與發財的同學比，我要跳右邊的河；與升官的同學比，我要跳左邊的河。所以，千萬別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際遇，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其實，大家的處境不同，與大學畢業後各自選擇的人生道路有關，這恰恰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三十年來在日趨多元化。

吳風琴，吳獻忠 青 苗

吳獻忠原名吳風琴，撫順市第十中學學生，品學兼優，能歌善舞，是班長、校革委會副主任。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號召，她二話沒說，扛起行李，毅然到錦州市黑山縣耿屯一隊插隊，並改名吳獻忠——向廣闊天地獻忠心。在那裏，一年之內，吳獻忠學會扶犁、點種、收割等農活，悶著頭揚場，一口氣能揚 1 萬公斤，揚得農村小夥子直咋舌。

1970 年秋，國家開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的貧下中農和知青一致推薦吳獻忠，她却回答得很乾脆：“我不走！”有人說她眼界高，想上大學。不久，大學招生名額下來，全體知青又一致推薦她，她仍然說“我願意留在農村”，把機會讓給別的同學。後來北大、清華也來招生，縣、社領導根據貧下中農的強烈呼籲，把吳獻忠推薦上去，除了個人申請書，其他所有手續全為她辦好了，吳獻忠仍然不走。在日記裏，吳寫下誓言：“鐵下一條心，扎根在農村，甘願吃盡天下苦，樂把青春獻人民。”

一連 9 個春節，吳獻忠沒有回家跟親人團聚，調她去市、縣做專職團委書記，她不去。她說：“如果有人把農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園，那麼，我願做荒山的開拓者，決不做花園的享樂人。”作為全國 19 位知青典型中的典型，吳獻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堅決扎根農村的倡議書，一時名揚全國，成為上山下鄉時代第一號驕女。她的事跡見諸全國各大報，名氣越來越大，榮譽越來越多，可她仍然穿著農田鞋、補丁衣。

作為遼寧知青的唯一代表，吳獻忠坐過三叉戟飛機，到北京參加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不知不覺，吳獻忠的愛情在農村艱苦的環境中萌芽。他是吳的知青同學，也是她的助手——吳是耿屯大隊黨支部書記，他是副書記，二人志同道合。寒風刺骨的冬天，吳獻忠率領社員興修水利，需要有人跳到水裏作業，她只須向他瞟一眼，他就二話不說，跳進齊腰深的冰水裏。秋天打場，他包的活兒幹完了，看到吳獻忠還沒幹完，不管多晚，他都過來幫忙。吳獻忠忙，沒時間洗衣服，他拿過來就洗。吳獻忠出差，他細心地幫她收拾行裝。吳獻忠回來晚了，他守候在灶口，將飯菜熱了又熱。那段日子，吳獻忠認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當二人牽手準備共築愛巢的時候，她出事了。

1976 年 9 月毛澤東去世，華國鋒當上黨主席。在縣裏的一次會議上，吳獻忠說：“新一代領導人能否像毛主席一樣受到人民愛戴，那就要看他的行動了。”1977 年，吳獻忠以現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起初，辦案人員以為吳是四人幫在遼寧的重要骨幹，對她批鬥的力



度很大，挂著現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到處游鬥，每天上午批鬥 4 小時，下午批鬥 4 小時，一批就是兩個月。爲了取得突破，他們決定把吳獻忠拉到她所在的公社揭發批判。

那天本來下著瓢潑大雨，可當吳獻忠被帶到貼滿“打倒吳獻忠”標語的大臺子前時，雨却停了，一束陽光穿過烏雲，照耀大地。台下黑壓壓的一片人，全是她熟悉的鄉親、同學。他們輪流上臺批判發言，可沒有狂熱和激憤，只是冷靜地念批判稿。大會進行了 3 個多小時，沒有人向她吐口水，也沒有人動她一個手指頭，反而有人細心地把她的衣領墊在挂牌的鐵絲下……

直到批判大會結束，吳獻忠沒有聽到他的聲音。他拒絕對吳獻忠作批判發言——他的沉默給苦難中的吳獻忠莫大的安慰。

審查了 3 年多，沒有發現吳獻忠與四人幫有任何瓜葛。1981 年春，吳獻忠被釋放。她的第一個念頭是找到他，馬上見他，撲到他的懷裏痛哭一場，哭出自己這 3 年多磨難裏對他的無窮無盡的思念。通過一位同學，吳獻忠得到了他的確切消息：“他等了你 3 年，實在受不了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就是在這個春天，剛剛經人介紹找了一個女朋友。他請你多多保重。”

在同學的安排下，二人見了最後一面。她對臉色灰白、面帶愧意的他說：“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你沒有批判我，沒有落井下石，這已經對得起我。作爲朋友，我希望你能坦然走好未來的路，祝你生活幸福。”

這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就此結束。吳獻忠跌跌撞撞回到家，兄弟姐妹們與她抱頭痛哭。家人想把吳獻忠留在身邊，試圖用親情溫暖她那顆冰冷的心。他們問她：“爲了扎根農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還想回到那裏嗎？”吳獻忠說：“扎根農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論遇到什麼樣的挫折，我都要堅持。”姐姐說：“連許多偉大人物都會根據環境的變化而改口，你一個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錢？再說，現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農村已毫無意義。”吳獻忠說：“我怎麼說就怎麼做。”全家人不再說什麼。

錦州市有關部門根據吳的意願，將她安排到農業科學研究所當農工。經歷大波大折後，吳獻忠沉寂下來了，渴望過上普通人平靜的日子。然而，作爲當年全國最有影響的知青典型，她留給人們的印象並沒有隨時代的變遷而徹底消失，她的遭際和人格仍然在一些人心中產生影響。這時的吳獻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問候書信外，還陸續收到黑山縣一位農村青年發來的幾十封情書，其中一句話令她無比感動：“我追求吳獻忠，只是想用一顆滾燙的心去溫暖另一顆受傷的冰冷的心。”吳說：“我是政治犯，將來有可能再蹲監獄。”那青年說：“我主動求婚，就說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 20 年監獄，我也等你。”“我比你大 4 歲半。”“農村有句老話，女大三，抱金磚，別說相差 4 歲半，就是相差 10 歲，只要真心相愛就是幸福的。”“我是沒有前途的人，你家裏人沒有意見嗎？”“我與你搞對象，不是我家人與你搞對象。你要相信人間自有真情在！”

他們結婚了，次年有了一個兒子。農科所爲了解決他們婚後夫妻兩地生活的問題，特地出面把吳獻忠丈夫的戶口從黑山縣轉到錦州近郊農村。隨著環境的變化，他產生了新的企求：借助吳獻忠的關係，把自己的戶口從農村遷到城裏。吳告訴他，自己要的是農民丈夫。他不甘心，四處奔走，偷偷找吳獻忠的老朋友、老熟人幫忙。吳獻忠知道後，火了，要他死了這個念頭。從此，他露出了性格中醜陋的一面，對吳獻忠三天兩頭非打即罵，上班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後來乾脆什麼也不幹。

1988 年，小叔子一家 4 口因生活無著，投奔吳獻忠家。8 口人擠在一間半房裏，8 張嘴全靠吳獻忠那一點點微薄的工資維持。吳獻忠每天早晨做好飯才上班，穿的是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藍色中山裝，每天午飯帶的是窩頭鹹菜，下班回來又拖著疲憊的身子再做好晚飯擺上桌子。儘管這樣，她毫無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睦睦。工會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難補助送到她手裏，她都拒絕了：“我現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組織照顧。”

吳獻忠已經無法與丈夫溝通。她做好飯讓他洗過手再吃，他怒火中燒，說她嫌他髒，伸手把桌子掀翻。工會給的補助她不要，他罵她太傻。過春節回娘家，她千囑咐萬叮嚀，要他吃飯說話講文明，他滿口答應，可是一上飯桌喝上酒就原形畢露，知識不多，話頭不少，吆五喝六，喝得酩酊大醉，將灌到肚子裏的酒全嘔出來，從屋裏噴到屋外。1989年1月4日，吳獻忠向法院遞交了離婚起訴書。她說，這次婚姻給她的精神肉體折磨，超過監獄裏那3年多。她的精神有些失常，老忘事兒，身體也徹底垮了，體重從60公斤降到40公斤，風一吹人打晃。吳獻忠已經無法工作，需要將養身體，不得不離開這觸景生情的傷心地，回到闊別20多年的家鄉撫順。

家鄉人向她伸出了熱情的手，告訴她，她可以重新選擇工作。她說，我大半生都給了農業，我已離不開它。吳獻忠被分配到撫順肉雞聯營公司當保管員，先後又在撫順飼料公司當辦公室主任，在撫順鴛鴦養殖中心當副經理，在瀋陽高樓香雞公司任經營經理。

1998年6月，吳獻忠辭去公職，拿出多年積蓄，辦起了自己的遼寧知青食品有限公司。9月28日，瀋陽柳湖賓館宴會廳，沉寂了20多年的吳獻忠出現在公眾面前，身份是遼寧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這一天，與吳獻忠當年下鄉插隊的日子——1968年9月28日，整整相距30年。

吳獻忠親身經歷了大多數同代人的“無奈三部曲”：想讀書趕上下鄉；想工作趕上下崗；40多歲家庭剛剛穩定，又遇上各種變故。如今，吳獻忠已年過半百，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個與她相依為命的兒子，惟一的樂趣就是工作，惟一的追求就是建一座知青大廈，讓老知青能在那裏愉快地工作、生活，為自己的同代人真正做點什麼。

補白：今天我在姐姐家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一連吃了3個。吃過芒果，坐在沙發裏，聯想起發生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荒誕但絕對真實的故事。1968年夏，非洲朋友送給毛澤東兩筐芒果，毛轉手送給駐清華和北大的工人宣傳隊，轟動全國。我所在的兵團2師13團有個北京女知青，其父是工宣隊員，為了讓北京知青也分享毛主席對工人階級的厚愛，他把一個臘制的芒果模型送到我團，供全團指戰員、家屬瞻仰。當時我也去了，頗有幸福感。一個副連長瞻仰回來，對人說，他在雲南當過兵，駐地產芒果，吃過，不是什麼好東西。此言一出，遭人上報團部，副連長被撤職，受到嚴厲批評，成了反革命分子，理由是：非洲朋友送的芒果，一定是稀世珍果，普通水果毛主席怎麼會送給工人階級？再者，這副連長說自己吃過芒果，還說芒果不是好東西，是對偉大領袖的污蔑。今天我撰寫此文，目的很簡單，讓國人、今人特別是年輕人知道這個黑色幽默故事，警醒人們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自己的言論自由。否則，苦澀荒誕的黑暗故事就會重演。 高洪明

—————

紳士殺人犯 孟昭民

運城縣看守所有一條老規矩，每隔兩個月來一次調監，就是把關在各個牢房的犯人們調換一下監房，以防他們在一起待久了陰謀越獄逃跑，或搞什麼反革命暴動。調監一般安排在單月的第一天。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是一個調監日，同牢的其他人全調了，只我一人未調，仍關在坐北朝南的第12號牢房，因為我已充當一年多的牢房記錄員（一個牢房中的犯人頭頭）。

新來12號的反革命殺人犯薛明最引人注意。薛的犯罪事實，我早有所聞，沒想到這次調監竟調到同一牢房。我是個“老犯”，調換過多次監房，與許多縱火、強奸、雞奸、貪污、

偷盜、詐騙、賭博、殺人、教唆、傳播封建迷信等各色犯人同過牢，但和反革命殺人犯還沒打過交道。

調監一結束，看守就把我叫到犯人訓話室，一臉嚴肅地說：“你是國家幹部，又是共產黨員，這次把反革命殺人犯薛明調到你 12 號監房，就是要保證他執行前的安全。你要以黨性作保證，絕對不能出任何差錯，確保即將召開的公判大會圓滿成功！如果出了問題，後果你應該知道！”那時真是一個人妖顛倒、滑稽可笑的年代，我的公職、黨籍都在，只因抵制了極左路線，就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關進監獄，更為可笑的是，看守員還要我這個犯人以黨性作保證。

爲了照拂好這位即將被執行死刑的反革命殺人犯，我特意把他安排在我的身旁，一來易于監督和瞭解他的行爲和思想，二來可以給他一點寬慰。在我們的印象中，反革命殺人犯都是滿臉橫肉、膀大腰圓、蠻橫無理、凶神惡煞，而我身邊的薛明却是眉清目秀，溫文爾雅，衣著整潔，言談舉止透著一種現代文明氣息，雖年近六旬，却身板硬朗、思維敏捷，可以想見，年輕時肯定是一位帥哥。如果不知根底，你絕不會認爲他是一個普通農民（運城縣泓芝驛公社），反倒可能以爲是縣上哪個部門的負責幹部。

薛明安置好自己的床鋪，就向大家作自我介紹，並說：“我雖然是個殺人犯，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沒幾天了，但我絕不會給大家帶來任何一點不愉快，現在我只能以與各位的和睦相處來消愆贖罪。”

大概是調監後的第八天，崗樓上傳來“提反革命殺人犯薛明”的厲聲高叫，緊接著牢房鐵門被打開，兩位獄警進來給薛明帶上手銬，架著他就出去了。牢內的犯人不約而同地說，這回老薛去領取地獄通行證了。

大約兩個小時之後，薛明回來了，除了戴著手銬，還被砸上腳鐐。他頹唐地坐在炕沿，臉色灰白，用沙啞的聲音對我說：“剛才我領了判決書，是死刑，立即執行。我不上訴，已經簽了字畫了押。老天爺只給我十天的活命了……”話未說完，兩行老淚順著白晰的面頰流了下來。

此時此刻我能說些什麼呢，只是說：“老薛，想開點，就是十天也要活好，活滋潤。”同牢的犯人們紛紛用最溫馨的話語來寬慰這位面臨死神的反革命殺人犯。

薛明有三子一女，三兒媳身材高挑，皮膚白晰，有一雙美麗的大眼睛和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再加兩條油亮油亮的大辮子，就像電影演員一樣，小女兒薛雯長得比三嫂更勝幾分。大隊黨支部書記兼大隊長劉誠一直覬覦這姑嫂倆，使盡百般手段都未得逞。有一天晚上，開完社員大會，劉誠點名讓薛家三兒媳和其他幾位社員作爲入黨積極分子留下，他要對他們談話。薛家三兒媳被安排在最後一位談話，就在這天晚上，劉誠強奸了她。

受到污辱的薛家三兒媳，當晚將此事告訴了自己的丈夫。她決心以死來表示對丈夫的忠貞，黎明時分飲下一瓶農藥，頓時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沒過一頓飯工夫，便撒下自己的丈夫和未滿周歲的兒子，撒手西去。悲憤至極的薛家三兒子埋了妻子之後，先後到泓芝驛公社、運城縣和運城地區公安處告狀。公安人員聽完受害人的血淚訴說，不但沒有表示出絲毫的同情，反而極其淡漠地說：你是地主子弟，可別亂咬共產黨的基層幹部，弄不好要你吃不了兜著走！

冤比天大却狀告無門，老三萬般無奈，向父親訴說了實情。他說，既然政府不受理他的案子，還說他是階級報復，不如拼著一死，除了這一害，爲己出氣，爲民伸冤！薛明厲聲阻止兒子：絕對不能幹這樣的蠢事，我托人想想辦法。實際上老薛是怕兒子闖禍，賠了性命，他自己却暗下決心，以老命換取劉誠的狗命。

真是火上澆油，鬼使神差，黨支部書記劉誠不知死之將至，竟然獸性大發，不久又在秋夜天幕的掩飾下強奸了薛明的愛女薛雯！

得此噩耗，薛明怒火滿腔，血脉賁張，決定立即動手除掉這個孽障。那天一早，薛明親自登門找到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劉誠，說：老大老二媳婦鬧分家，鬧了一夏一秋，看來過不到一起了。昨天我到娃他舅家，大舅二舅都同意，讓他們各立門戶，大家都安生。今天晚上他倆舅舅都來，你是一隊之長，一定過來幫助解決一下家務事，拜托了。劉誠對薛家鬧分家的事早有耳聞，依照慣例，村裏這類家務事少不了他這位支書兼隊長的大人物蒞臨指導。他欣然應允，順手掏了一支紙烟遞給老薛，說：沒問題，吃了晚飯我准去！

薛家住在村子的最西頭，五十年代初搭起的七間土坯房已經牆斜頂漏，四壁透風，一家三代十幾口就擁擠在這座破敗不堪的宅院裏。二十幾年前的薛家可不是這個樣子，那時薛家是這一帶頭號大地主，廣有土地，宅院連片，驢馬成群，牛羊滿圈。1941年，22歲的薛明從西北大學畢業後，隨父在西安城經營一座紡織印染廠，1948年因戰亂回到運城師範學校任國文教員。土改中，薛家的土地、房產、農具、車馬全部分給了貧苦農民，薛明也被政府辭退，回鄉務農，沒有住房的薛明在村子最西頭搭起了這幾間土坯房。

且說吃過晚飯，天黑下來，大隊支書劉誠換了一件新上衣，蹬上那雙能顯示身份地位的翻毛皮鞋，騎上永久牌自行車，朝薛家駛去。薛家大門緊閉，劉誠揪動車鈴，大聲叫喊：老薛，開門！手持鐮頭藏在門背後的薛明，聽清楚是劉誠的聲音，拉開門門，就在劉誠進門的剎那，老薛掄起鐮頭，死命朝他頭上砸去，劉誠連人帶車倒在血泊之中。

確認劉誠已經嗚呼，薛明徑直奔到大隊部，一面用力敲擊生產隊的大鐵鐘，一面大聲叫喊：“我殺人了！我殺人了！我殺人了！”然後快步回家，取了鋪蓋、衣物，讓人用麻繩縛住自己的雙手，迅速返回大隊部。當天晚上，薛明被關進運城縣看守所。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法院不看任何具體因果，只以出身論罪（地主出身的人殺了基層黨支部書記），判定薛明搞階級仇殺，是反革命殺人犯。

自從戴上腳鐐，薛明的精神顯然萎靡了一大截，但他仍一步一步在地板上走動。每走一步，腳鐐上的鐵鏈就發出金屬碰撞的聲音。薛明說，很抱歉，打擾各位了，我坐不下來，蹲在床邊更著急。大家都說，不用考慮我們，你想怎麼著就怎麼著。

那天晚上，薛明徹夜未合眼，我也陪他一直熬到天亮。薛明對我說：政府判我死刑，我早有思想準備，也毫無怨言。劉誠這個畜牲，犯的是國法，我砸死他，出了氣，解了恨，殺人償命，歷朝歷代都是如此，我死而無怨。仔細想來，我對不起劉誠一家老少，你以後出去了，一定找到他的妻兒，轉達我的悔意，我到陰間也要向他的家人賠罪。我這個殺人犯，理應償命，但我絕不是反革命殺人犯。解放這麼多年，我擁護共產黨的政策，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是劉誠這個東西害得我家破人亡。我雖然是地主出身，但我和他是單個的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不是地主階級對共產黨的仇恨。判決書上說我是反革命殺人犯，我不服，我只服“殺人犯”三個字。日後你出了監，掌了權（我曾是地委書記的秘書），一定要替我把這個案子中“反革命”三字抹掉，要不然，我這個地主成分，再加上反革命，子孫後輩世代代都不得翻身。我自己赴死并不可惜，我悔恨的是給後輩兒孫帶來無盡無窮的災難，當兵、上學、入團、入黨，都不會有他們的份兒了。

薛明說著，流出兩行老淚。我用手帕為他拭淚，問：“那你怎麼不上訴呢？”“上訴又會有什麼結果，我是地主成分呀！”“我對自己的未來也捉摸不准，只要有機會，我會替你說清楚你的意思的，讓你的子孫後代不要因此受到連累。”“那我就感激不盡了。”他伸出帶銬的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從頭天中午到第二天晚上，整整一天半，薛明水米不沾。犯人們都勸他，哪怕少吃點，吃上一口也行，你不吃飯，所裏會懲罰我們的。薛明說，我的胃翻騰得厲害，一口也吃不下去，我不會絕食的，我絕不會為難你們。

第三天一早，薛明開始進食，整個監房都活躍了起來。中午時分，薛明明顯地振作了許

多。他說，我從小在西安長大，也很喜歡秦腔，大家這兩天爲我操心，喂我吃飯，爲我解褲帶系褲帶，擦屁股，爲了報答各位的相助之情，現在我給大家唱幾段秦腔。說罷，他哼了一段過門，唱起了《火焰駒》、《大登殿》的須生戲。老薛的嗓門真好，一板一眼，字正腔圓，唱得滿牢的犯人都鼓起掌來。薛明說：“年輕時我是秦腔的票友，能唱也能拉，可惜這多年不唱，有些詞都忘了。我這是不是死鬼作樂？”

老薛一開頭，幾個蒲劇戲迷也唱起了《徐策跑城》、《蝴蝶杯》、《回荊州》、《九江口》，殺人未遂犯老趙也即興唱了幾段京劇《十五貫》和《盜禦馬》，本來死氣沉沉的牢房，一下子生氣勃勃，活躍異常。

此後一連兩三天，老薛異常興奮，講自己在西安求學時參加反日大游行的故事，講如何抵制日貨，如何報名參軍抗日，講參加反內戰、反饑餓活動，並且講到解放後他在運城師範教學時，用英語翻譯了《東方紅》歌詞，親自教同學們學唱，說著用英語唱了起來。儘管大家都不懂英語，却用漢語和著他唱到曲終。

第六天下午，老薛的左眼突然斜了起來，左臉歪向一邊，嘴也歪了。同牢的原縣醫院中醫科大夫、奸污病婦犯張純德說，老薛患的是中風，要趕快治療。晚上查監時，我向看守報告了薛明的病情。

次日中午來了一名法醫，帶著聽診器、血壓計，聽了聽薛明的臟腑，量了血壓，又號了一回脈，然後慢條斯理地說：是急性中風，無大妨礙。他讓犯人們把薛明的褲帶解開，在臀部注射了一針，又留下一些丸藥和片劑，囑咐了服藥的時間和辦法，並要張純德大夫按摩治療，說完就起身離去了。

服藥和按摩都不見效，薛明的口、眼、臉歪斜得越來越嚴重了，上下牙齒咬不到一起，飯食從嘴角裏流了出來，吐字發音也越來越含糊不清。所方非常著急，請來地區醫院的幾位大夫會診，經過一番討論，議定了治療方案。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在死刑執行的前一天，老薛的中風症奇迹般地痊愈了，耳鼻口眼都歸了原位。疾病陡消、五官端正的老薛，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開玩笑說，可能閻王爺也不愛見嘴眼歪斜、話語不清的死鬼，所以赴刑場之前全好了。老薛滿含酸楚的玩笑話，激起了大家的話頭，紛紛向他表示慰問，祝賀他神奇康復。

這一夜，是老薛的最後一夜，他未曾合眼，我也同樣陪他一直熬到東方露出魚肚白。老薛說：“我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裏，在許多空白處都寫著給家人和兒孫們的留言。這個本子留給你，以後有機會，一定送到我家，讓他們仔細看看，以我爲鑒，不再做違法亂紀的事，要做一個高尚的人，對大眾有益的人。另外，請你轉告我的家屬，我的尸骨就埋在北坡梁上，絕對不能進祖塋，因爲我是因殺人害命而被政府處決的，是暴死，屬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之列，進了祖墳就玷污了先祖。我要永世做野鬼游魂，以保持薛家墳塋清白。這兩件加上前些天請你轉告劉誠家人賠罪的事，一共三件，承蒙辦妥，我在陰間做鬼也就于心無憾了。”說著，他把此前取出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塞到我的手中。

深夜，全牢房的人都無睡意。薛明掙扎著站在地板上，一字一句地說：“大家都是法繩在身、披枷帶鎖的人，但犯砍頭罪的只我一個，我今日現金身說佛法，大家以後想問題辦事萬萬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逞一時之憤而鑄成千古之恨。我首先是咱們牢房的反面教員，你們可以從我這裏吸取教訓，但我雖然是地主成分，却絕不是反革命，我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殺人犯。”

幾句話說得整個牢房鴉雀無聲，死一般的寂靜。這時，崗樓上傳來哨兵的喝令：“12號！半夜了，還扯什麼淡！”

早上四點半，天還未亮，北院的大鐵門咣當一聲響，伴著急促雜亂的脚步聲，進來一隊全副武裝的警察。一夜未眠的老薛忽地坐了起來，跪在床頭，先作了一個揖，又磕下頭去，用哽咽的聲音說：“感謝大家十天來對我的照顧，我給大家叩頭了。”話音甫落，牢房的鐵

門打開了，幾個警察快速架起他朝門外走。走到當院的水龍頭前，老薛說：“請警察兄弟放開我，允許我給大家告個別。”整個北院的一百多名犯人，都知道薛明要拉出去驗明正身，連衣服也顧不上穿，簇擁在鐵窗前向外張望。但見警察們放開了老薛的胳膊，老薛先拱手作了三個揖，跪在當院磕了個頭，大聲說：“永別了，大家各自保重！”說完他站起身來，又作了三個揖，依舊跪倒在地，面朝著泓芝驛的方向，一連磕了三個頭，大聲說：“老伴，孩子們，我走了，你們多保重！劉誠家的，我對不起你一家老少，告罪了！”

說完，他在警察的攙扶下站了起來，一步一步地朝大鐵門走去，腳鐐上鐵鏈的金屬撞擊聲在黎明前靜寂的夜空裏分外響亮和刺耳。

---

補白：一個退伍兵，年底趕集買一斤豬肉準備過年，又臨時決定買一個很便宜的毛澤東半身石膏像。就騎一輛光自行車，怎麼往回拿呢？有了！掛車把上。這邊挂上一斤豬肉，那邊挂著用一根麻繩拴住脖子的毛石膏像，很結實。可是沒走多遠，被人逮了起來，罪名是想把毛主席吊死，屬於現行反革命。

## 變態的胡老師 王 匡

1974 年那一學期，語文第一課的課文就一句話：“韶山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語文老師姓胡，三十多歲，因她和老公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起從長沙的大機關發配到我們這個湘西小縣城。胡老師書教得好，人也漂亮，同學們都很喜歡她。她的三個女兒，長女 12 歲，次女 9 歲，三女 5 歲，也都長得漂亮，比我們小縣城的同齡人發育得好，也穿得好，在我們的眼裏就像小公主一樣。

期中考試，語文課的考題就是默寫“韶山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看著這麼簡單的試卷，同學們興奮得竊竊私語。我心裏盤算，一交卷就與好友去學校後面的山上掏鳥窩。不到五分鐘，同學們陸續交卷，胡老師坐在講臺上當場改了起來。忽然，胡老師呼地站起身，滿臉怒容，氣衝衝跑下講臺，左手抓著一張試卷，右手向前伸著，直奔我而來。到我桌前，她右手食指指著我的臉上，我若不是本能地往後靠，手指就搗到我眼睛了。

“你，你，你……”胡老師氣得說不出話，“你看看你寫了什麼？！”我戰戰兢兢往我試卷看了一眼，沒發現什麼問題呀。“你，你這個混蛋！你這個對偉大領袖不尊敬的傢伙！打你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也不為過！你看看你寫了什麼呀？把韶山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的‘方’字寫成‘主’字，你念念看，韶山不是成了紅太陽升起的地主？”一連串嚇人的大帽子劈頭蓋腦向我扔來，全班同學也都被嚇傻了，紛紛回頭看著我這個班長，平時我一直偷偷喜歡的學習委員，此時也回頭驚訝地看著我，騰的一下我的臉紅破了，恨不得課桌下有個地洞好鑽進去。

我當時腦子裏一片空白，不知胡老師聲嘶力竭咆哮多久，最後只聽她問同學們誰知道我的家長在哪里，幾個男同學爭著說知道我媽媽在兩公里外的醫院上班。胡老師命令他們幾個去喊我媽媽馬上到學校來。幾個同學飛跑出去，半小時後，媽媽跟著他們跑來了。胡老師嚴肅地對媽媽說，我寫了反動句子，媽媽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不停地給比她還小幾歲的胡老師低頭道歉認錯，仿佛寫錯字的是她而不是我！

平時牽著媽媽的衣角上街買菜，一路都有人親熱地與媽媽打招呼：“吳醫生，買菜呀，你崽長得好好喲！”此刻，媽媽却因我蒙羞。媽媽翻來覆去道歉，好話說了幾籬筐，最後胡

老師終於開恩了：“好在你孩子的爸爸出身三代工人，你又是年年的先進共產黨員，我們也相信孩子不會反黨反毛主席，要是他出生在地主家庭，這次非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媽媽千恩萬謝告別胡老師，臨走還討好地說，胡老師對學生太操勞了，已經有了白髮，請胡老師有空到醫院去看看，給她開點藥。

儘管事情已過去，我還是擔心被同學張揚出去，哪天傳到解放軍叔叔耳朵裏，他們就會背著衝鋒槍來學校抓我坐牢。文革期間，公檢法基本沒有了，抓壞人的差事都由當地駐軍完成。

那些天，腦海裏天天演出解放軍叔叔來抓我的場景：走到我面前，問我是不是叫某某某，然後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掏出牽牛的麻繩將我五花大綁。這些場景我曾無數次看到過，與我家相鄰的那些叔叔伯伯甚至爺爺奶奶們就是被用這種方式抓走的。在趕集的日子，被抓的壞分子還會五花大綁，用一根長繩子串成一串游街，在大太陽下站在中學操場的臺子上低頭認罪。坐牢我不怕，就怕游街和站臺子，游街害羞，站臺子怕給讀中學的哥哥姐姐丟醜。

### 公正與德性 國標書

提心吊膽過了 10 來天，父親見我不像過去那麼頑皮，放學回來就坐在屋門口的青石板上，一坐幾個鐘頭，飯也吃得少了，晚飯時就問我出了什麼事。開始我不肯說，後來一想，反正他們遲早要知道，不如先說：“再過幾天我要去坐班房了……”

“什麼？”父親沒聽清。我重複了一遍，並說了學校的事和我的擔心。父親的臉由疑惑變得紫脹，後來兩條眉毛皺在一塊，放下碗說：“你一個九歲的伢崽，怎麼會是反革命？只是考試寫錯一個字，莫亂想。”我爭辯道：“隔壁周伯上午還在抓別的反革命，中午自己倒被當成反革命抓了，不就是他中午去糧店買面，籃子裏墊了張報紙，報紙上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糧店賣米的人看見了說他不尊敬毛主席，當場就給捆了起來交給解放軍？還有我們學校一個五年級學生，上體育課摔了一跤，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打碎了，不也被公安特派員銬走了嗎？我為什麼不會被抓去坐班房？”

我振振有詞地說完，父親一耳光掄過來：“你才讀了 3 年書，就讀得書呆子一個，告訴你，即使要坐牢也是你老子去坐，你從今後不准再想這事！”外婆急忙把我從地上哄起來，埋怨道：“你不知你的手有好重喲？把他腦子打傻了怎麼辦？要打也只能打屁股。”

幾個月後，一個星期天的早晨，父母都上班了，我一個人賴在被窩裏想：聽人說，心裏喊反動口號，解放軍叔叔都知道，都會被抓，今天我何不試試？于是用被子蒙頭，在心裏喊了一遍“打倒毛主席”。喊過，急忙起床，匆匆吃完早飯，躲在家門外的樹林裏對著家門的方向張望，望了一天也沒見解放軍叔叔露面。提心吊膽過了一星期，見沒事，膽子大起來，心想：看來在心裏喊，解放軍叔叔是肯定知道了；喊出聲，解放軍叔叔會不會知道呢？于是等家裏沒人的時候，我躲在被子裏又小聲喊了 3 遍“打倒毛主席”，結果還是沒有被解放軍叔叔知道。小小年紀，我開始懷疑解放軍叔叔無所不知的神話。

如今人到中年，想起胡老師，想起那個荒唐的年代，她當年那樣小題大做，也是一種人性的扭曲。

### 一組行刑照的由來 李振盛

今天是 4 月 5 日，又是一年的清明節。40 年前的 1968 年清明節，我曾拍攝一組槍斃反革命集團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的照片，現這組照片網上流傳甚廣。

巫、王是哈爾濱電錶儀器廠的技術員，都受過高等教育。1968 年 1 月 1 日，二人在街頭散發、張貼了一批傳單，也可以說是一種用臘紙刻鋼版油印的 16 開小報，名曰“向北

方”。當年的黨報，報眼位置都印毛主席語錄，他倆油印的《向北方》小報也照此辦理，在報眼處印了一段毛主席語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語錄下邊，他們又加上兩句話：“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不允許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認為，這話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的，遂把此事定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發動群眾限期破案。

案件很快告破。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數萬人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宣布巫、王是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實，這張小報從刻鋼版到油印，再到街頭散發張貼，只他們兩人，不存在任何從犯。兩人怎麼能定為集團案？而且還都是主犯，全判死刑？當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時，巫炳源仰天長嘆，大喊一聲：“這個世道太黑暗了！”隨後便緊緊閉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場被槍斃，巫炳源再沒睜眼。

那天共槍斃 8 人，其他 6 人是刑事犯。8 人脖子上都挂著大牌子，押上卡車，穿過市區，開赴哈爾濱西北郊黃山火葬場附近的一片空地。到了刑場，8 人一字排開，雙手反捆，被按跪下。8 名軍人持槍站在十余米外，從腦後開槍將他們打死。行刑者退下之後，幾個負責檢驗的人立即上前，扯著尸體的雙腳向後拉，擺成整齊的一排，一一檢查每個犯人是否斃命。

報紙對這類新聞只發文字消息，絕不發表刑場照片。當時我 27 歲，血氣方剛，出于新聞攝影的職業好奇心，凡有這類事件，我都想前往拍照。那天，軍管會的攝影通訊幹事到我們報社攝影組，說他們將一次處決 8 名犯人，問我們想不想前去採訪。我所在攝影組的另外四位資深記者都說，這類照片不能見報，拍了也沒用。我心裏很想去，但嘴上不敢說。送這位公安攝影通訊員出門時，我悄悄對他說：“我想去，到時候請把車停在報社對面的交警崗亭接我一下。”我背著報社領導和攝影組同仁，自作主張，隨軍管會的車隊到了刑場，從頭到尾完整拍攝了幾十張行刑槍決的連續性畫面，還忍著槍斃後腦漿崩裂的濃烈血腥氣味，近距離拍了剛剛失去鮮活生命的尸體的特寫。我使用的是萊卡 M3 相機，只有 35 毫米的一支廣角鏡頭，必須靠得很近很近才行，因此能聞到刺鼻的血腥味和腦漿的氣味。

我從刑場回到報社，沒敢馬上沖洗膠捲，怕同事看到這些底片會背地裏向主管攝影組的總編室副主任打小報告，說李振盛又去拍沒有用的照片，浪費公家的膠捲。他們當中有的人，每看到我拍那些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沒有用的照片，就會找我談話批評。

後來半年多，我一直無法忘卻這些人的臉。那時我已經結婚三個月，我和妻子還沒有分到房子，兩人仍分住在單身宿舍裏，幾十家人共用一個廁所，在走廊盡頭。半夜起來小便，我不敢睜眼，閉眼走在燈光昏暗的走廊裏，生怕碰到兩邊各家擺在門口的鞋子和雜物，還盡力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被槍斃的人，更害怕想那股讓人噁心的血腥氣味。原先我很喜歡吃報社食堂做的血豆腐，此次刑場經歷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一看到食堂裏的血豆腐就想嘔吐。

後來，每當我在暗室昏暗的紅燈下放大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時，總是默默地對他們說：“如果你們變成鬼魂，請不要來找我。我只是想幫助你們，我拍這些照片是在記錄歷史，我要讓人們知道，你們是被冤枉的。”

智門會計 曉 相

1969 年，我 32 歲，和丈夫生有兩個男孩兒。丈夫是一個高中歷史老師，文質彬彬，很儒雅，在課堂上很風趣，各種鮮活的歷史故事加上他自己的獨特見解，頗受學生們追捧。也正因如此，丈夫不可避免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全家下放到天津南郊一個小村子進行勞動改造。

從市區到農村，無論生活上還是精神上都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那時我任紡織廠的車間副工長，雖不像丈夫博學，但我歷經各種生活磨難，諳熟各種為人處事之道，并練就一張利嘴，



用丈夫的話說：“你做事的膽量和智謀，一般老爺們都比不了。”

到南郊農村之後，丈夫變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時參加生產隊勞動，回家就悶聲看書練字寫文章，隨身帶來的那幾本書早已翻得起了毛邊兒。我以極強的適應能力，在短時間內丟掉思想包袱，成天樂呵呵面對改造。我本以為樂觀的態度可以使我們一家迅速融入這個村子，誰知并非如我所願，在村民眼裏，我們永遠都是外來的可順便欺負一把的賤民。

當時流行一句話：“工分兒工分兒，社員的命根兒。”有一次，丈夫去生產隊結算工分并領錢，會計竟少算我家 25 分，說是有些工作沒有做到位，扣去了。沉悶的丈夫沒有過多詢問，回家告訴我，這不是明擺著欺負人嗎？把我氣得够噲，要找會計理論。丈夫一再阻攔，我暫且認了這個啞巴虧。

事隔兩個月，又到結算工分領錢的日子，我特意再次讓丈夫前往，目的就是看看這會計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負我們一家。丈夫回來後，說這次又扣了 35 分，他生氣了，錢也沒領，直接回來了。

我頓時氣得火冒三丈，一人直接奔向生產隊的會計室。那會計正坐在那張簡陋的辦公桌前喝茶看報紙，我一把奪過他手裏的報紙，指著他問道：“為什麼要扣我們家 35 分？我們是缺了勤了還是短了工了？”他著實被我這話嚇了一跳，操著一口略帶河北口音的天津話說道：“你要幹嘛？”“還問我要幹嘛？上次扣了我家 25 分，就沒找你理論，你還扣上癮了怎麼著？”

只見這時這會計板起臉，嚴肅地對我說：“有什麼問題叫你男人來跟我談，我不跟老娘兒們共事兒！”聽到他說我“老娘兒們”，我變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襯衣領子就往外拽，并故意大聲反問他：“你叫我什麼？老娘兒們？毛主席的話忘了嗎？毛主席說過‘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你敢說不跟老娘兒們共事兒？我今天就替紅衛兵抓你個現行反革命！”

由于我的大嗓門，話還沒說一半兒，生產隊大院裏就已經聚集了很多圍觀看熱鬧的村民，其中當然也有村幹部。我故意重複“老娘兒們”、“現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會計此時也知道自己說錯話了，在旁邊一直低聲央求我。他怕事情鬧大，我可不怕，越大越好。過了一會兒，圍觀的人群中擠進一個中年男人，告訴我先把會計放開，他立馬給我解決問題。

“玩兒”得正起勁兒的我反問他：“你誰啊？你做得了主嗎？你能解決嗎？”那男人一副心平氣和的樣子，說道：“放心，保證讓你滿意！”

原來這人是村長。在他的辦公室裏，他給我補回了兩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動提出以勞動積極為由每天給我加 1 個工分。後來從村民口中得知，會計是村長的小舅子。這每天多加的 1 個工分，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我家調回市區。

時光荏苒，40 年過去了，每當我給身邊人講起這段兒“智鬥現行反革命”的故事，總引得他們開懷大笑，并贊許我當時的智謀和膽量。

益陽迎豐事件 湘 君

1963 年 8 月 30 日，以中共益陽地委書記為隊長，地委辦公室主任為副隊長的四清工作隊，進駐益陽縣迎豐人民公社，益陽縣委派出政府辦主任帶領 20 名幹部，協助工作隊開展工作。

工作隊一到迎豐，立即組織幹部群眾學習中央文件精神，成立貧協組織，層層清理公社、

大隊、生產隊的帳目、倉庫、財務、工分。清理的結果認定：100%的公社幹部、94%的大隊幹部、86%的生產隊幹部有經濟問題。幹部利用職權，多吃多占貪污糧食 181611 公斤，現金 75369 元，此外還有一批實物票證等。有嚴重問題，成為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的幹部 394 人，占幹部總數的 23.7%，成為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的黨員 135 人，占黨員總數的 44%。

工作隊運用土改對待地主的辦法，開展對幹部的鬥爭。有些貧協組織成員，思想素質低下，揭發出來的許多問題，往往與個人的歷史恩怨、意氣和成見糾纏在一起，甚至弄虛作假，誇大事實，無中生有，捕風捉影，而工作隊對這些人揭發出來的問題上綱上線，一律以對敵鬥爭的方式處理，造成了基層幹部與群眾、工作隊、貧協組織之間的尖銳對立。至 11 月 30 日工作隊撤離，整個運動歷時 3 個月，行政開除的幹部 15 人，其他各種行政處分的幹部 3 人，開除黨籍的 46 人，留黨察看的 7 人，撤銷職務的 14 人，受其他黨紀處分的 1 人，受到黨紀處分的黨員占黨員總數的 22%。

工作隊離開後，運動中積聚起來的矛盾開始激化，有些被整的幹部對貧協組織進行報復，實行反清算，進一步加劇了幹部與群眾之間的對立。1964 年 2 月 19 日至 20 日，迎豐公社召開三級幹部會議預備會。會上，公社黨委委員黃月藻因前一段被整，發了一通牢騷，許多有過同樣遭遇的大隊支部書記也借機出怨氣。公社黨委書記匡愛國批評他們說，有意見、有怨氣只能講到今天為止，明天在大會上就不要說了。

21 日至 26 日，連日大雪紛飛，地凍天寒，迎豐公社三級幹部會議召開，參會人員有公社三級幹部、全體黨員和在四清運動中建立起來的貧協會負責人，共 360 人，會議主題是學習中央文件精神，鞏固四清運動成果，掀起春耕生產高潮，匡愛國主持會議。由於前段留下了後遺症，會議開始時普遍存在著厭煩、牢騷情緒，少數幹部擔心又要“洗澡”，放“包袱”，故意躲避。柏蔭村大隊烟墨塘生產隊隊長龔雪枚聽說公社要開會，就躲到岳母家不回來，說：“去年開會搞四清，這次開會恐怕會搞八清，當家三年狗都嫌，從今後我不當隊長了，任你九清十清。”

在會議討論發言中，一些幹部紛紛指出四清運動出現的偏差和問題，對幹部大搞逼供信，整狠了，過頭了，經濟退賠多了。有幾個大隊幹部發牢騷，稱運動中挨整，不願繼續當幹部了。參加會議的貧協組織負責人則認為，這些都是針對自己來的，抵觸情緒也很強烈，雙方形成嚴重的對立局面。匡愛國分別做了幹部和貧協負責人的思想工作。24 日，匡被縣裏抽調去李昌港公社搞四清，26 日的大會總結由社長張錫祺主持。

中共益陽地委和縣委瞭解到迎豐公社三級幹部會議上存在的強烈不滿和抵觸情緒，認為該社的四清運動是不成功的，是嚴重翻案事件。5 月下旬，地委、縣委聯合組成迎豐事件專案組，進駐迎豐公社，開展大規模的調查，搜集整理材料。6 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一位候補書記來益陽，聽取地委有關迎豐四清運動的彙報，認為這一問題十分嚴重，必須嚴肅查明處理，並指示把情況報告省委。6 月中旬，迎豐公社四清工作隊隊長寫出一份關於四清後出現問題的調查報告，供地委領導人參考。一位地委副書記將一份調查報告郵寄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份送中共湖南省委。

7 月 21 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和一位省委候補書記，路經益陽沙頭，中共益陽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向兩人彙報迎豐公社四清運動後出現的問題。兩位省委領導當即指示，迎豐的問題實際上是對四清運動的反撲，一定要嚴肅處理，並責成地委、縣委繼續調查。這時又傳來劉少奇的 7 月“鄭州講話”，說反撲四清的事件要作現行反革命案件處理。迎豐公社發生的事件政治色彩越來越濃，階級鬥爭之弦也越绷越緊。

地委、縣委組織調查組，到迎豐進一步展開調查，最後認為，這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的反撲四清的嚴重事件，公社黨委書記匡愛國是“一個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反撲的典型”。

8月8日，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長沙，專門聽取了中共湖南省委領導關於“迎豐事件”的彙報，並看了相關的材料。10日晚，劉少奇在接見省委常委時，對“迎豐事件”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認為是一起現行反革命事件，是對四清運動的反撲，必須反擊。省委第一書記隨即要求益陽地委書記以地委的名義向省委寫報告，益陽地委書記當即要求有關部門將報告趕快寫出來。8月11日，《中共益陽地委關於處理益陽縣迎豐公社以匡愛國為首的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大反撲的反革命事件的決定》和《關於益陽縣迎豐公社以公社書記匡愛國為首的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大反撲的反革命事件的調查報告》，送到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益陽縣委聽取地、縣委聯合檢查組的調查報告後，縣委常委會進行了3次討論研究，寫出《中共益陽縣委關於迎豐公社黨委書記匡愛國反黨、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報告》，送地委和省委，並且對“迎豐事件”的當事人做出嚴厲處理。

匡愛國是這次反黨、反社會主義革命的首要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定罪法辦。黃月藻是混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工作，追究刑事責任，定罪法辦。張錫祺，開除黨籍，撤銷社長職務，工資降一級。周建秋（原公社黨委委員，公社武裝部長），開除黨籍，開除工作。廖長生（原公社黨委委員，公社副社長），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工資降一級。廖伏生（原公社黨委組織監察委員），撤銷監察委員職務和貧農下中農協會主任職務。9月10日，匡愛國、黃月藻二人被捕入獄。

9月12日，以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為隊長、地委副書記為副隊長的四清運動工作隊共510人，浩浩蕩蕩再次進駐迎豐公社，開展聲勢浩大的“反擊”。10月14日，益陽地委向縣委發文，提出對有關人員加重處罰。在原懲處基礎上，張錫祺，建議法辦；周建秋，建議法辦；廖長生，下放勞動；廖伏生，留黨察看兩年，下放勞動。

11月20日，益陽縣人民法院在迎豐公社公開審理“以匡愛國為首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反撲報復案”，認定匡愛國為反革命集團首犯，判處有期徒刑7年；黃月藻為反革命犯，是混入黨內的壞分子，兩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10年；張錫祺為反革命集團要犯，定為反革命分子，判處管制3年，交公社執行；周建秋為反革命分子，交群眾監督生產。

至次年4月底，“反擊”調查組得勝回朝，戰果如下：徹底鏟除了匡愛國、黃月藻、張錫祺、周建秋等反革命集團，全公社三級幹部清查利用職權貪污多吃多占糧食316570斤，人民幣118666元。公社一級幹部全部定罪法辦和查辦，146個大隊幹部中，問題很多和性質嚴重的80人，占55%。1213名生產隊幹部中，問題很多和性質嚴重的267人，占22%。在大隊、生產隊的幹部中，有3人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64人被定為蛻化變質分子。在“反擊”中，全公社1072名幹部黨員，受處分的有70人，其中法辦23人，黨紀處分31人，行政處分13人，團紀處分3人。

為了進一步擴大“反擊”戰果，省、地、縣委還成立了追根組，對凡是在1963年迎豐公社四清運動後去過迎豐的各級幹部（大約100餘人），一律進行追查，寫出交待材料，其中一些人在捕風捉影、上下株連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處理。

1979年2月，中共益陽縣委和地委公開為“迎豐公社反革命事件”徹底平反，凡因這一事件受到牽連的人員一律恢復名譽。

## 六個字的惡果 嚴建設

全國熱熱鬧鬧迎九大，滿城是如火如荼的游行隊伍，人們扎搭著巨大的紅旗葵花領袖像彩車，敲著喧天鑼鼓，放開喉嚨大唱：“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那年我13歲，一身臭汗擠在人堆裏著急，恨不得立馬長大，向毛主席獻忠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然後去解放臺灣和美國，救出世界上那些水深火熱的人。美國人太可憐了，一年

四季都要飯吃，還得挨鞭子。

那天夜裏，圓大的月亮昏昏昧昧懸掛在西隅。半夜時分，我隨游行隊伍逛累了，也餓了，回到太平巷的家。回家以後，興奮得睡不著，現成從父親枕下抽出一本白皮《共產黨宣言》單行本來看。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上邊一段語錄使我刻骨銘心：“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

我一夜心潮澎湃，人五人六地朗讀了一夜，天一亮，撒丫子飛跑到巷子拐彎處，用粉筆寫下六個大字：“老子要打天下。”寫完也就忘了，或者去荒郊野外拾廢鐵賣了，也可能和女生一起挖野菜去了。——那陣子似乎停課了。

過了一年，巷裏來了一幫工宣隊，其中一個跺脚大叫：“這是一條反標！媽的這兒階級鬥爭的蓋子還沒揭開，太平巷裏不太平！”趕緊給派出所打電話。分局來了一夥穿藍警服的，支起老式照相機，亂拍一陣走了。我嚇得要命，做夢也沒想到，老牌革命導師的思想居然能成反標。後來的我，真像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巷中游蕩。

秋季複課後，我進了西安市 20 中，還當了軍訓幹部，脖子上吊著銅哨子，經常胸脯挺得高高的喊隊。後來我把反標一事給一個鐵哥們說了，幾天後，居委會開會，說有人舉報我寫反標。我被弄到派出所，指導員親自出馬，審了一晚。我既瞌睡，又害怕，捱到天明，感到賴不過去，不如繳槍投降，坦白交代，於是寫了一份檢查，按了十幾個紅指印，心驚肉跳地回家了。

從此，同學們都叫我老現——老現行反革命。軍訓幹部不用說是當不成了，班主任自己爲了入黨，經常組織同學批判我。我自己也愧疚得要死，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不思報答 13 年來的黨恩，打什麼天下？我於是拼命幹活，那陣子成年累月學工學農學軍，搞政治大批判，開會宣傳反修防修，拔麥茬燒戰備磚，挖防空洞，野營訓練。由於我寫檢查太多，語文很出色，還寫得一筆好字，在學校辦了 4 年零 7 個月的黑板報。

那時開我的批判會，先是突然有個粗大嗓子的女生領唱語錄歌，所唱大多是：“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他們自由泛濫。”然後有同學跑到講臺上，把粉筆折斷，橫著寫下“要鬥私批修”。這時那位 6 門功課不及格的班幹部嚴厲地說：“大家把《毛主席語錄》拿出來，翻到 23 面。”那段語錄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是“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那一節。大家朗讀完語錄，班幹部厲聲叫我站起來。我站起身，嫻熟地從腰裏摸出一疊檢查，用沉痛腔調宣讀，之後幾個同學低著頭揭發批判我。

我有個強烈感覺，凡批判我的同學不久就會入團。當初出賣我的那位，是我學生時代最要好的朋友，後來光榮地當上團支部書記。我感到自己像被一頭陰險的野獸冷不防粗暴地一口咬死，屍體還被同類殘酷地蠶食，我的痛苦成爲他們政治生命的營養。那段時間，我變得暴躁而自卑，同學們用戒備的眼神盯著我，經常謾罵、毆打我，沒人跟我玩。

下鄉前，我噙著泪水回首往事，極爲傷感，最大的遺憾是積極了 4 年竟沒入團，也沒打過籃球。籃球是一個集體體育活動，全班同學幾乎全和我不自覺地劃清了界綫，我與誰打球呢？我常做惡夢，夢見凶獸，餓狼或老虎，奇怪的是，這些猛獸偏偏追咬我，任怎麼躲都不行，一直把我咬醒，嚇得我一身冷汗。

王家灘的嚴打 泯 民

這一天，王家灘公社舉行落實公安六條嚴打公捕大會，公社書記谷志高作了《王家灘人民熱烈擁護公安六條》的簡短講話之後，皇大炮便高聲宣布把現行反革命押上場。他們分別是一善橋大隊貧下中農楊四，七角碑大隊面相女大師易觀音，汪家塘大隊副業大隊長錢光祿，月兒壩大隊光棍何其聰。接著，皇大炮向大會宣布四名現行反革命犯的“惡毒攻擊”罪

行。

楊四，男 27 歲，未婚，貧下中農。該犯奉一善橋大隊委派，領了錢和糧票去邑川城購買毛澤東石膏頭像。因楊是童身，所以才被選派去迎請毛像。楊購了七個毛像，一大六小，一個大的將由大隊供奉，六個小的由六個生產隊供奉。如何將七座頭像迎請回家呢？楊四去商店買了三米雞腸帶（一種用棉綫織的筷頭寬的帶子），將七座頭像的脖子拴起來，左右肩各吊三個小的，手裏提一個大的，就這樣走在大街上。邑川城的人見了無不目瞪口呆，立即將楊四扭送公安局。

易觀音原名易枝花，中年婦女，自稱憑人的面部長相即可判斷其過去和未來，好比觀世音轉世，故而號稱易觀音。有一天，易犯在顧客面前賣弄相術，公然以林彪的長相為例，說林一對官刀眉，這是凶眉，一個鷹勾鼻，這是奸鼻，一幅尖下巴，下場不好，這幅長相，完全是奸臣像，不會有好結局。易觀音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這是企圖搞亂無產階級司令部，用心實屬險惡，是最嚴重的現行反革命行爲。

錢光祿，男，30 歲，中共黨員。族譜規定，錢家近兩百年的輩分字依次是承、先、啓、萬、世、光、華、照、幹、坤。錢光祿是光字輩，其下一代是華字輩。光祿 1958 年結婚，當年得一子，起名錢華澤。1964 年，老婆又生一個兒子，起名錢華東。兩個兒子的名字，去掉姓氏字和輩分字，就剩“澤東”兒子。如此一來，就等于錢光祿生了“澤東”，這當然也是對毛的惡毒攻擊。

何其聰，29 歲，准富農分子，口齒不伶俐。生產隊搞“三敬祝”，領呼者呼過“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之後，群眾接呼“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何其聰却呼成“萬臭無香！萬臭無香！萬臭無香！”領呼者呼過“敬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之後，群眾接呼“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何其聰呼成“永遠吃糠！永遠吃糠！永遠吃糠！”紅衛兵負責人讓何單獨再呼一遍，仍然是連呼三個“萬臭無香！”和三個“永遠吃糠！”縱使先天口齒不伶俐，也不得在“三敬祝”上出現大不敬，定爲惡攻罪。

---

補白：程世清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期間，一言九鼎，炙手可熱，很多無辜者死在他手下。1968 年，他緊跟形勢，取悅中央文革，在江西大搞“三查”（查走資派的幕後活動，查叛徒特務，查地富反壞右的破壞活動），以逼供信開路，不到一個星期，五千多人被逼自殺。萬年縣大黃公社衛生院有位女醫生，被誣爲現行反革命，揪出來被革命群眾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慘不忍睹。不少地方搞“民辦槍斃”，僅瑞金縣，兩天之內就槍斃了 120 多人，最大的 70 歲，最小的 11 歲。全省被打死、逼死 2 萬多人。思想犯李九蓮、鍾海源、吳曉飛等，都是在程親自定案後被槍決的。程世清的最後被懲處，不是因爲他殺了那麼多人，而是因他是“林彪死黨”，誣陷許光達同志，構成誣告陷害罪，又因“情節較輕，”“免予起訴，予以釋放”。他頭上的烏紗帽與其治下百姓駭人聽聞的死亡竟基本沒有什麼關係！爲什麼對這些政治元凶總是算政治賬，而不去算人命賬？難道那麼多的人命就不是政治賬嗎？

---

同號五犯人 亦 然

翠屏山專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地 29 號的號子裏關 5 個現行反革命。一個姓陸的中學生，大串連上北京聽了江青講話，回來拿捏著江青的腔調和手勢，扭著屁股說：“大家知道嗎？

我的臀部爲什麼如此漂亮？因爲是工人修補過的！”被抓。

一個姓張的老師，是邑川著名的書法家，爲了迎接“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檢查，地區文革小組決定把萬古山脉中的五座山頭鏟平，請張老師在山頂上書寫“毛主席萬歲”五個特大字，每字直徑 100 米，占山頂平面一萬平方米。檢查團的人坐飛機在空中俯瞰，發現張老師寫的“毛主席萬歲”有問題——“歲”字頭上的三豎垮在一邊，“萬歲”成爲“萬歹”。張老師被判死刑，整天坐在號裏的草窩裏喊“我沒寫毛主席萬歹，我沒寫毛主席萬歹”。

一個姓羅的，撕了《毛主席語錄》給兒子擦屁股，這是對無產階級大法寶的極大的蔑視，當然是嚴重的“惡毒攻擊”。

一個姓牟的青年，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標兵，買回十余幅毛主席像，從家裏正階檐的牆上貼到橫階檐的牆上。橫階檐連著廁所，這最後一張就貼在了廁所門外。人們檢舉小牟讓偉大領袖毛主席守毛坑，構成“惡毒攻擊罪”。

還有個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穀糊，每當家人端起飯碗站在飯桌前搞“三敬祝”時，洛某就把包穀糊塗在毛像的嘴上，說：“紅太陽呀紅太陽，你吃膩了肉，就喝點這玩意兒吧！”這也反革命罪。

有一次，姓牟的問姓洛的：“我讓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讓毛主席吃包穀糊，我們倆誰的罪惡大？”

## 我的老師和同學 懷 人

教我們音樂課的趙老師，白白淨淨，溫文爾雅，是 50 年代從天津來大西北支邊的知識青年。趙爲人單純直爽，教學認真，深受大家愛戴，可是文革不久却被槍斃了，罪名是偷聽敵臺。

槍斃趙老師那天，看的人很多，我也去了。他被打倒在河灘裏，尸體放了幾天沒人管。後來他家來了一個老漢，據說是趙老師的父親，跑前跑後請當地農民幫忙，可農民怕惹事，不敢出頭幫他，老漢急得直哭。看見兒子的尸體沒哭，這時却急哭了。折騰了幾天，河灘裏趙老師的尸體不見了，不知道埋到哪兒了。

教語文的張老師，有一天被抓了起來，罪名是寫了一部中篇小說，犯了現行反革命罪。這小說大家都沒看過，不知道寫的什麼。人家說反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是不容辯解的。張老師被抓後，公檢法下發材料，讓老百姓進行民主討論、民主判刑。材料後面有一句“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大家據此認定張老師必死無疑。

張老師的愛人（是我們村的人）抱著一綫希望，哭著跑到會場，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討論的結果上報後，張老師還是被殺，不過不是立即執行，是死緩。一個住隊幹部說，死緩是我們國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攔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犯人早就槍斃了，哪有死緩一說，說得大家都喊起“毛主席萬歲”來。

范同學比我高一級，屬于保守派。造反派對頭是一個姓王的同學，瘸腿，滿臉橫肉，飛揚跋扈，凶惡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學心血來潮，在一張紙上寫道：“同學們，聽我言，不要跟著老狗轉，要好好聽你爺爺的言。”老狗指王瘸子，爺爺是范自稱。

王瘸子的一個奸細立即拿著這張報紙去告密。告什麼？那張報紙上有一篇社論《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范同學寫的“老狗”二字與“毛主席”三字連在一起了。這案情實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範，爲了自保，反而馬上開會批鬥他。爲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們下手更狠，將範打得趴在地上起不來，又讓造反派架去繼續批鬥。

群眾專政之後，范同學被送交公檢法。一個星期後，范同學瘋了，嘴上老在說：“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見是個傻子，也不抓了，說繼續群眾專政。鬥來鬥去，群眾也覺得沒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屬的生產隊，讓貧下中農繼續專政。範家有人在生產隊當幹部，不久把他弄到煤礦當工人。他被安排看管一個廢品庫房，嘴裏仍不時叨叨“我沒說毛主席是老狗”。人常說，倒黴的人走到蜜州也不會甜。有一次，一輛汽車倒車，範某傻楞楞地跟在後面看，竟被汽車撞死了。死就死了，家裏人也沒說什麼，叫司機買口棺材埋了完事。

我還有一個高年級同學，姓陳，那時剛開始批判劉少奇，但又不能提“劉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國的赫魯曉夫”代替。陳同學無意中在毛主席畫像後面寫了句“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成了現行反革命。群眾專政期間，陳被打得遍體鱗傷，哀求道，還是對他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送監獄）吧。造反派答應了他的要求，將他送到公檢法。公檢法根據公安六條，判了他八年刑。

坐滿八年，陳獲釋回山溝老家務農，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公家發給他五百塊錢補償金，他激動得熱淚盈眶，雙手捧著錢，一個勁地高呼“共產黨萬歲！”這時候毛澤東已死了，如果毛沒死，他肯定還會喊“毛主席萬歲！”拿到錢的當天，陳將錢捐給大隊黨支部，並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黨申請書。後來他不僅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還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陳當官不幾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不久就死了。

雲南G市那個女孩 馬 馳

1979年，雲南邊境戰火未熄，我奉命到前綫採訪。由北京飛至昆明後，忽然感到胸悶，喘不過氣。有人說這是高原反應，往南走，地勢低了，就會好些，我便馬不停蹄，拉上兩個從北京來的畫家搭伴，乘車離了昆明。達G市，再往南就要翻山越嶺，必須搭軍車。天色已晚，找不到車搭，便在G市過夜。G市已經很有些前綫氣氛，街上有許多軍人，裝滿軍用物資的大卡車，蒙著大網，插滿松枝，停在道邊，人們談話的內容大多也是關於戰爭的。跑了幾家旅店，皆客滿，經市委安排，我們住進市委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飯，服務員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她好勤快，給我們上菜時，每看我必笑。姑娘長得漂亮，一笑更漂亮。她不是城市常見的那種艷麗時髦的漂亮，而像雲南的山水，清亮照人，一無修飾，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鋼琴的高音區敲一下琴鍵。她隨便一笑，就好像把世上最美好的感覺送給了妳，我真是很少看到這樣一雙透亮的眼睛。她不像一般雲南姑娘那麼矮小，倒像北方鄉間的女孩子，臉蛋紅撲撲的，端起菜碟來，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頭都是圓圓的。她的漂亮溶在一種淳厚的氣質裏。

我問她：“你為什麼總笑我？”她說：“你個子太高嘛！”又是一笑。過去我見到的城裏姑娘也許都太會說話了，裝腔作勢繞彎兒。遇到這種純樸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鄉野看樹林、草原、飛鳥、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樣，一片自然，令人歡愉。我同行的那兩位畫家比我對美更敏感，畫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倆向她提出，請她晚上下班後，到我們房間來，為她畫像。姑娘的表情似乎有些為難，可是當兩位畫家告訴她我是個作家時，她專意看我一眼，這回沒笑，竟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了。

她來了，剛剛下班，白布圍裙還沒解下，進屋時用圍裙擦著剛洗過的一雙濕淋淋的白手，滾圓的小手被涼水刺激得通紅。兩位畫家請她坐下，支起畫板，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畫家

說：“老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會放鬆了。”我笑著對她說：“你不怕作家嗎？”不料她挺鄭重其事地說：“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寫寫我。”我大笑起來，說：“你一個小姑娘有什麼好寫？寫你哭鼻子嗎？”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下來，好像烏雲的陰影頃刻籠罩水面，一種憂慮的、愁慘的、苦澀的情緒灌滿了她的眼眶。這決不是一個純真少女應有的神情，倒像一個飽經苦難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語地說：“你不寫，將來我練習，自己寫！”我怔住了，難道這姑娘真有什麼非凡的經歷？我點點頭說：“好，你說，我給你寫。”接著，她說出了自己的一番令人難以置信的經歷：

我當了 10 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文革開始時，我 6 歲，那時什麼也不懂，記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還記錯了。我記得有一次，一群人闖進我家翻東西，打了我一個大耳光，很疼。後來爸爸說，沒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記得的只是一種感覺，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覺。爸爸在文革前是市委組織部幹部處的處長，文革開始時挨批，靠邊站了。後來分兩派，爸爸參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軍隊介入後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黴了。爸爸這一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層幹部，組織性強，文革初他們都被衝擊過，不敢做半點打砸搶那類過火的事情。對立面抓不住爸爸這一派的把柄，很難把他們搞垮。有一次，兩派談判大聯合，爸爸這一派的頭頭沒注意，把一本《紅旗》雜誌坐在屁股下邊。對立面有個精明人，上來一下抽出《紅旗》雜誌，裏邊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時雜誌幾乎全有毛主席像，侮辱偉大領袖毛主席，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這麼一下就被對方揪出來了。

軍宣隊立即宣布爸爸這一派是反動組織，他們馬上就垮了，凡是過去有點問題的都被打成階級報復分子、黑幫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們拿爸爸沒法子，爸爸沒有短兒。他以前當幹部處處長，難免得罪人，有人就恨他，派出不少人內查外調，他們越查不出問題，火氣越大。爸爸本來是不抽烟的，那時却天天抽烟，一天抽烟睡著了，把棉褥燒個大窟窿，多虧媽媽一盆水潑上去，真燒起來，人家會說是放火搞破壞或企圖畏罪自殺。我媽的心臟不好，整天鬧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麼大禍。壓力真是足足的了，可是沒料到有一天出了這樣一件意外……

那天，我們市委宿舍大院的院牆上出現一條反動標語，寫的是“打倒毛主席”。公安局來查，根據現場情況確定，應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寫的。他們的推斷有三條：一是反標的位置離地一米，比成年人蹲著寫高，又比成年人站著寫矮，正好是小孩站著寫高矮正得勁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筆迹；三是成年人寫這種反標不會寫“打倒毛主席”，應該寫成“打倒毛澤東”。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總共十一人，排排隊，確定四個重點，都是父母有問題的。他們的邏輯，只有父母有問題，孩子才可能寫這種反標。這時，爸爸對立面那一派插手了，說是要協助公安系統偵破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我被內定為重點。他們說我爸爸反動，又狡猾，對文化大革命懷恨在心，教唆我寫這反標。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想搞我爸爸。當時我 8 歲了，他們把我弄去，開始是拿糖哄我承認。從小爸爸就教我，絕對不許說瞎話。我說不是我寫的，他們便送我小人書、畫片，還要帶我去看電影，我還是說不是我。他們火了，那群大人圍著我一個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嚇唬我，說我再不承認就去打我爸爸，還說他們要用什麼法子打——說用鋼筆扎爸爸的眼睛，說用繩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東西，活活餓死，還說用刀一塊塊割掉爸爸的肉、手指頭、耳朵、鼻子、舌頭，一樣樣帶著血扔進公園的籠子裏喂老虎，說著真拿起一把刀，裝作馬上就要去的樣子。我嚇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還是沒說瞎話。我那時才 8 歲呀，很容易受騙，很容易被嚇得上當，為什麼始終咬住沒胡說，自己也弄不明白。現在想起來真後怕，萬一上了他們圈套，一句話，爸爸早給槍斃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長大懂事，自己也會悔恨自己而自殺了……

那段時間，他們為了給我增加壓力，把我當作反革命，當作真正的囚犯關起來，不准我和爸爸媽媽見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餓我。每天提審一次，隨後他們好像沒招兒了，就把



我弄到市委大院批鬥，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寫著“現行反革命 XX”，還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批鬥，給我的印象很亂，圍著許多人喊口號，我一眼在人群裏看見媽媽。媽媽睜著大眼睛，全是泪水，頭髮很亂，我大叫一聲“媽——”就昏倒了。後來放出來，媽媽說，那天她並不在場，是通知了她必須去參加我的批鬥會，可是她心臟病突然發作，沒去。

一天，我不想說那一天是幾月幾日——我家永遠記得那日子，我一說，我現在立即就會……就會……好，我就說這天的事吧……這天，他們說今天要槍斃我。我不懂什麼叫槍斃，問他們，他們說，就像電影裏打敵人那樣，開槍打死你。我哭了，我說我再見不到爸爸媽媽了嗎？他們說，永遠也見不到了，而且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知道了。你要承認是你爸爸叫你寫的，就不槍斃你。我說，不是我寫的，我想見爸爸媽媽……我被他們帶到刑場，一片大開闊地，和幾個真要槍斃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後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給綁著，沒捆我，可我嚇呆了。對面一排人拿槍對著我們，其中一杆槍對著我的臉。我忽然看見不遠一群人中有爸爸！後來知道他們在逼爸爸，叫他承認是他叫我寫的反標。我放聲大叫爸爸，要跑過去。這時管執行的人大喊一聲：“放！”“砰”的槍響了，我旁邊那排犯人突然像櫃子一樣“當”全栽倒了。一個腦袋打飛了，像個大血蛋飛得老遠。我嚇得原地沒動，以為自己死了。眨眨眼，動動嘴，好像全沒知覺了。只見爸爸張著大嘴朝我跑來，撲向我，一下把我緊緊抱住。我說：“我死了嗎？”爸爸說：“沒有，孩子，你別怕，他們這是逗你玩呢，這些人都是假死！”我聽了，噗地笑了，腦袋扎在爸爸懷裏。我真的以為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後，我被放回家。回到溫暖的家就以為那一切全過去了，照舊跑出去找小朋友們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還朝我扔石子。一次，一個過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罵我：“打倒小反革命！”氣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講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媽媽出來也罵我：“幹什麼，你還想翻案？”從這句話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這“小反革命”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在我身上背了 10 年！上小學困難，升中學也困難，紅小兵和紅衛兵組織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機關單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語，不敢和同學們說笑和玩，碰到不講理的事也不敢爭一句，天天下課掃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這樣做來換取同學們的好感，哪怕是一個親切的眼神兒也好，可 8 年裏我沒有一個知心的同學，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傳染病菌，人人都避著我。

上中學時，我換了一個較遠的學校，以為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事，會好受一些。一次下鄉勞動，指導員派我去拉糞車，所有同學都不去，只派了我一個人去。我很奇怪，沒等我問，指導員說：“糞雖臭，但靈魂裏的糞更臭，什麼時候你不覺得糞臭了，你的靈魂就徹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大石頭仍舊牢牢壓著我，一輩子也卸不下來。當夜，我跑了出來，撒開腿在野地裏跑了兩天兩夜。後來爸爸在一條大河邊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為了找我，跑了兩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著：“為什麼那次不槍斃我？活著，天天都是在陪綁呀！”

……從那時我退了學，在家幫媽媽做家務事，除去買菜買東西，很少出門，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開除了，生活還有什麼意思？我恨我年輕，前邊的日子太長，沒有頭兒，整天悶悶的。直到粉碎四人幫，爸爸的單位清理文革問題時，發現一份有關我的材料，才說給我平反落實。這時我才 19 歲，又沒有工作、工資、住房和查抄物資的問題，落實能落實什麼呢？政治從來不對人的心靈負責。管落實的那人還不錯，很同情我的遭遇，想了一個安慰我的辦法，也是他能做到的事情。他說，你年紀不小了，不能總呆在家，應該有個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當個服務員吧。我心想，守在家，媽媽心裏總有個負擔，就來了。到今天，才來三個月。三個月裏，我幹的活比誰都多。別人以為我是出自對落實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幹活，其實不然，幹起活才能不想事呀。有時忽然覺得自己現在像當年在學校打掃教室時那樣，總有一種負罪心理糾纏著我，擺脫不開，幹著活就想到勞改，很不是滋味……這心理你們是

很難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頭的，這頭不好揚起來呀……

姑娘講到這裏，喉嚨好像叫什麼東西卡住了，但眼裏并無淚水，臉上也沒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靜得有如陰雲密布的天空，隱隱像要打起響雷，但我明白，她不會再有傾盆大雨、雷電交加的宣泄。年紀輕輕，却早把生活中最難承受的東西都消化過了。我扭頭忽然發現，我那兩位畫家同伴聽得睜圓眼睛，張大嘴，無話可講。畫板上的紙，白白的，沒有一筆，正如我當時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

補白：1970 年前後，社會上反革命標語突然多起來了，有時往往一個地方的反標案還沒破，新的反標又出現了。有一天，居委會的一間女廁所裏發現了反標，公安人員立刻把附近所有會寫字的女人都集中起來進行排查。查來查去查不結果，又請來省裏的筆迹專家，經過鑒定，認定這條反標是男人的筆迹，于是將排查範圍擴大到了附近所有會寫字的男人身上。疑點集中到一個曾經有過流氓罪的男青年身上。此人曾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口罩，去女子浴室偷看女人裸體，行踪敗露，被當場抓獲，判了一年流氓罪，剛剛放出來。公安把他叫到居委會詢問，一連幾天他都死不承認，最後把他帶進到派出所，單獨審問，進去不久就招供了。他承認，因對判他一年刑心懷不滿，就趁天黑跑進女廁寫了反標。現行反革命，證據確鑿，他再次被關進監獄。

佟 平

---

小學同學鄭成功 劉 穎

文革開始，我們一千多人的小學組成幾十個戰鬥隊。我是雷鋒戰鬥隊的副隊長，鄭成功是小老虎戰鬥隊的隊長。那時不上課，整天打打殺殺，發傳單，鬥老師，開展革命大辯論。我們認為所做這一切都有黨中央支持，一天到晚豪情萬丈，鬥志昂揚。

鄭是的班長，游行時要帶頭呼號。那天上午，出了學校大門，我們就一路“萬歲”、“打倒”地喊著。走了幾裏路，人累疲了，隊伍也開始凌亂，但口號照喊。已喊得聲嘶力竭的鄭，這時突然喊了一聲“打倒共產黨！”同學們跟喊一半突然停止了，接著一陣寧靜。

鄭成功突然發現自己犯了一個極其嚴重錯誤——豈止是錯誤，簡直是罪該萬死，一下子亂了方寸，嚇得面如土色，對著游行隊伍連連鞠躬：“我錯了，我錯了！我有罪，我有罪！”又急忙跑到隊伍前面的班主任老師面前，不停地懺悔，嘴裏一個勁兒念叨：“我錯了，我有罪……”但是，班主任也被嚇得手足無措，背對著他，一聲不響地躲開了。

沒過幾天，鄭成功被宣布為新興現行反革命分子。他的主要罪狀有三條：一是當眾高呼反動口號“打倒共產黨”；二是一次在牆上噴印毛的頭像時，他揭開紙模，對著毛的頭像開玩笑，說：“哦，原來你在這兒趴著呢！”三是一次在學校逮到一隻小老鼠，大家要把它放在水缸裏淹死，他說：“看看它能不能暢游長江。”當時全國所有媒體都在熱烈報道毛澤東暢游長江的壯舉。

他成了階級異己分子，被學校開除，回家接受管制。幾年後的一天，我排隊買肉，看見他也在隊列裏。

## 冬瓜反標 江 南

在全南縣紅衛小學讀三年級時，我所在的城廂鎮下圩生產隊發生了一件震驚全縣的現行反革命案。主辦案件的領導是縣公安局季政委，他女兒跟我同班，據說我這位女同學現在在贛州地區政府供職。

案件的具體情況是：生產隊有一小青年想參軍，因種種原因未被選上，鬧情緒。一次，該青年趁給生產隊看冬瓜之際，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澤東”、“劉少奇萬歲”等 19 個字。秋天，生產隊收冬瓜，發現了這些標語。隊長立即上報縣公安局，季政委帶人進駐下圩生產隊破案。季政委當時家住縣糧食局，跟我們生產隊的民宅實際上只一牆之隔。

文盲除外，全隊男社員（包括我父親在內）全部集合到隊部進行審查、詢問。刻字時冬瓜還很小，如今冬瓜已經長大，字迹已變形，破案難度很大。男社員天天到隊部接受審查，也不用出工。有一次午飯，我家隔壁一個小青年跑到我家，用打抖的聲音對我父親說：“他們破不出案會不會亂抓人？”我父說不會的。後來事實證明，不是這個小夥子幹的，他還因禍得福參了軍。午飯時母親問起這事，父親鎮定地說：“在隊部大家寫字時手打抖，說話時聲打顫，查出來要判好幾年。”

記不得過了多久，案子破了。那個小青年以書寫反革命標語罪、收聽敵臺廣播罪被判 7 年，剝奪政治權利 3 年。總共刻了 19 個字，判 7 年，7 年共計 2555 天，平均一字判 134 天。

## 農場裏的故事 汪 輝

農場單身職工住集體宿舍，一天早晨，廣播裏說“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有一個單身職工接嘴說：“祝我身體健康呀，我還沒起床呢！”同宿舍的人立即舉報了他，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

鄉放影隊到村裏放革命樣板戲電影，照例先放一個新聞紀錄片。有一次，由于疏忽，片子放倒了，有人馬上站出來大喊：“快抓住這個現行反革命！”此時放的是毛主席接見外賓。于是，基幹民兵立即把放映員帶走了。

那時流行到處寫標語，一個會寫大字的人經常被安排寫農場領導圈定的標語。有一次他寫了“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幾個字就走了，不到半小時，一塊“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 XXX”的牌子就挂在他的脖子上了。當莫名其妙的他被帶到標語面前時，他立即認罪不諱，原來把“萬”字寫成了“無”字。

鏗鏘每家每戶都要張貼毛主席像。生產隊汪隊長頭天接到大隊通知，說是過年了，大隊替每家配了一張毛主席像，要各生產隊隊長去公社的供銷社去領。第二天，汪隊長起個大早，借了大隊的自行車，火速趕到供銷社。足足有一大捆毛像，汪隊長想把它們放在自行車後坐上，可是紙捆太滑，放上去又溜下來。汪隊長一邊繼續往後坐上塞，一邊自言自語：“豈有此理，還會捉到賊牯冒（沒有）繩吊！”

不料這句話被售貨員聽到了，她立刻竄到生產隊長旁邊，一邊抓住車子把，一邊厲聲喝斥：“你這反動派！竟敢說毛主席是賊牯！快來人啊，抓住他！”眾人齊上前，把他扭到公社派出所。在各大隊游鬥一圈後，汪隊長被勞教二年。

趕形勢的牛老師 曠 夫

牛學言師範學校畢業後，懷著滿腔熱情來邊疆支教，分到某國營工廠子弟學校。他能寫會畫，一手美術字極為漂亮，學校就讓他擔任美術教師。有一次教學生寫美術字，牛老師在黑板上示範幾條標語美術字，“無產階級專政萬歲”，“造反有理”，“打倒黑幫”，這樣既趕形勢，又能傳授技巧。

同學聚精匯神，一筆一劃跟著他寫，這時下課鈴聲響了，牛老師說：“現在下課。”不少同學高聲喊道：“我們還沒有寫‘打倒黑幫’哪！”牛老師順口說“那就不要打倒黑幫了”，隨手把這最後一條標語擦掉了。有個同學腦瓜靈，立即喊道：“牛老師你反動！”在場的同学先是一楞，再一想，覺得牛老師的話就是有原則問題，于是很快反映到學校工宣隊。

牛老師再也不是老師，而成為牛鬼蛇神中的一員，天天被批鬥，剃陰陽頭，臉上塗墨水，半拉臉紅，半拉臉藍，鼻子尖用粉筆畫白，頭上頂著生爐子用的拔火筒，脖子上吊塊黑板，上寫“反革命分子牛學言”，背上披塊麻袋片，上寫“牛還想學人說話，反動之極！”左手提個破臉盆，右手拿著爛掃帚，邊走邊敲邊大聲喊：“我是反革命分子牛學言！”

牛老師本想趕形勢，不料被形勢趕了。

---

補白：一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有一天用長柄糞瓢澆菜，一下子沒掌握好，潑偏了，糞灑到了菜地外。農民隨口罵了句“狗日的，淋颳了”，不料旁邊幹活的人思想覺悟高，馬上跑去向上級反映。這個農民遭殃了，罪名是公然辱罵敬愛的林副主席。

---

工宣隊員的講話 草 庵

一次，學校召開全校大會，傳達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校的工宣隊員是輪換的，每二個月換一批新人。這一批新換的是三輪工人。這些人來源比較複雜，文化水準很低，張口就罵街。在那個年代，罵街是革命勞動人民身份的標志，也是革命傳統，不罵街的反倒成了另類。

今天主席臺上坐著的是一位老三輪工人。一位革命同志念完文件後，領導就請工宣隊員和軍宣隊員表態度。軍代表和工人代表相互謙虛退讓，後來就決定由老工人代表先講。老工宣隊員看一眼台下，先往手掌裏吐口唾沫，然後雙手用力對搓了兩下，拿起話筒開講了：“日你奶奶的，既然叫老子先講，老子就先講，裝什麼洋雞巴，老子沒什麼文化，但日你奶奶的講幾句革命道理還講不壞，保證比那些裝洋逼的書生強，咱大老粗就講大實話，日你奶奶的有什麼就講什麼，直來直去，說日你奶奶的，決不會拖泥帶水。”

老工人喝口水，潤了潤嗓子，繼續講：“同學們，今天我們傳達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又一個最高指示。日你奶奶的，你們知道啥叫最高指示？你們看這天高不高，這天咱够不著，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指示就比天高。”講到這裏，就見軍宣隊代表用力咳嗽了一聲，並私下用腳踢了老工人一脚。老工人馬上瞪一眼軍宣隊員，說道：“日你奶奶的，我一講毛主席，你就咳嗽，你是什麼態度，還踢我！”

軍宣隊員回答說：“你談學習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心得體會，不要老日你奶奶。”老工人一聽，不高興了：“日你奶奶的，我都日了一輩子了，咱這是革命本色，保持革命傳統，誰說不行。”

軍宣隊員一陣臉紅脖子粗，不再理會老工人。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插話了，對老工人說：“請您繼續講”。

老工人看了看大家，繼續說道：“日你奶奶的，老子講話就怕別人打岔，一打岔就壞事，把剛才講的都給忘了。”說著扭頭問軍代表：“日你奶奶的剛到哪了？”軍代表心裏更氣了，別著頭，看也不看老工人，只說：“你自己想，我不知道。”

老工人又喝口茶，想了想說：“日你奶奶的，我剛才講到哪里了呢？”說著撓撓頭，猛一怕桌子：“我想起來了，我剛才講到日你奶奶的毛主席……”

老工人話音未落，全場一片嘩然。這老工人竟敢當眾“日毛主席的奶奶”，這可是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只見老工人剛想繼續講話，那軍代表一個健步就從邊上的椅子上站了起來，一把將老工人拖倒在地，大聲疾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 XXX！”

老工人也毫不示弱，站了起來：“日你奶奶的，我啥時候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了？”軍代表一把又將老工人推倒在地：“你污蔑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老工人一臉的霧水：“我說啥了？我啥時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了？”

軍代表一臉正氣：“你說了，你剛才說了。”老工人還是不服氣：“我剛才說啥了？”軍代表說：“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是不是你說的？”話一說完，軍代表感到不對勁，忙解釋說：“我剛才只是重複反革命分子 XXX 的話。”說時遲，剎時快，旁邊的幾位工宣隊員和軍宣隊員全都站了起來，分別將二人都扭了起來，當眾宣布：“現在開始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 XXX 和 XXX！”

---

補白：貴州榕江縣小學教師莫定欽，剪貼、編輯刊登在報章雜誌上的各類人文資料、圖片，匯成一本集子，作為教學資料供該校教師和學生翻閱。到了一九七〇年，那本資料竟成了反革命罪證。這年九月，莫定欽被五花大綁押到縣人民廣場，宣判二十年徒刑。該校兩位教室寫信抗議，為莫定欽鳴不平，被判勞動管制兩年。

---

#### 劉少太可案 福 生

我們是閩北革命老區的一個小縣。那時全國正鋪天蓋地大貼千篇一律的標語“打倒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而且劉少奇三字要顛三倒四地寫，奇字還要拆成“大”和“可”，歪寫著，以此表示對劉少奇的階級仇恨。

一九七零年前後，全縣小學停課，全體小學教師按學區集中到某個大隊學校，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為期三個月。我們學區有一位年輕男教師，三十歲左右，會寫一手好毛筆字，學習班貼的標語都由他寫。有一天寫到“大可”時，因墨汁太飽，不慎滴下一滴，不偏不倚落在“大”的下邊——“大可”成了“太可”，于是有人把這條標語念成：“打倒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太可……”太可什麼？當然是“太可惜”了。

哇！打倒劉少奇，你感覺太可惜了？不小心滴下的一滴墨汁，瞬間變成一個巨大的政治問題。這是同情劉少奇，是保皇派，是反對毛主席，是反革命，更加上此教師出身地主家庭，更是嚴重的階級鬥爭新動向。軍宣隊成立專案組，處理此案，最終定性為現行反革命。這位教師的妻子也是一位教師，因丈夫被戴上“現反”帽子，夫婦倆在軍宣隊專案組撕心裂肺地抱頭痛哭。

---

補白：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時，他說過“哪里能活一萬歲”，被縣軍管會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

死刑，一九七〇年六月被槍斃。

-----

### 銀川冤獄 寧 屯

一九七〇年二月，銀川市破獲一起重大現行反革命集團案。這是一個以十三名青年學生為成員、名叫“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小團體。成員吳述樟，銀川二中一九六八年畢業生，因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裏“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旁邊寫了“放屁”二字，被定為“惡攻”罪。其他十二位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論政文章。

其中一位叫魯志立，北京農業大學一九七〇屆畢業生，撰寫了《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一文，稱法西斯主義“禁止一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一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種族優劣論、反動血統論，人為地製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一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打倒法西斯！”

公審那天，人口僅三十萬的銀川市，近十萬人擠滿體育館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對“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案”成員的公開宣判。集團案同案犯之一的女生熊曼宜，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吳述森（寧夏大學畢業生）、吳述樟兄弟和魯志立三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餘分別被判無期和有期徒刑。受此案牽連的東北工學院畢業生劉唯勇被判處三年徒刑，後死于獄中。

### 消聲行刑 金正月

蔡鐵根原是南京高等軍事學院的訓練部長，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被撤職。文革初抄家，發現他的日記本裏有為彭德懷鳴不平的話，立即被揪出。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獄方用麻繩將他捆綁後宣讀逮捕令，緊接著宣讀判決書：死刑，不准上訴。他剛要申辯，獄卒便勒緊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繩，使他發不出聲，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場槍斃了。

廣東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裏，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

寧夏銀川市槍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成員”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前，用板子壓住舌頭，不讓他們發聲。

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被處決前已經絕食兩個多月，虛弱得站不起來，當局還是怕她呼喊反動口號，在她嘴裏塞進壓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前，喉管被割斷。

甘肅靜寧縣女技術員毛應星被槍斃前，劊子手割斷其喉管。

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等，批准了對反革命犯施行槍決前予以割喉這一“新生事物”。第一個遭此處置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至一九七五年處死張志新時，遼寧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瀋陽監獄當局割張志新喉管時，不施麻藥，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旁邊一個女管教員見狀，慘叫一聲，嚇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 他們因劉少奇而死 佚名

劉少奇被打到後，全國各地都有因不贊成打倒劉少奇而獲罪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僅浙江淳安縣就有二十八人因受劉少奇冤案株連被判刑，被槍決的全國各地到處都有。

福建福清縣有一位公社黨委委員，堅持自己的觀點，認為“沒有理由發動群眾批判劉少奇主席”，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五日被槍殺。

甘肅寧縣某農場職工朱守忠，不贊成斷章取義地批判劉少奇，拒絕表態同意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被處死。

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報》編輯鍾叔河回憶：“我還曾親眼看到白髮斑斑的老太婆，因為‘為劉少奇翻案’被判處死刑，當場槍斃示眾。”

河北省電信工程隊青年電纜工人張坤豪公開說“劉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檢查。他繼續堅持己見，在紙上寫道：“我熱愛劉少奇主席。”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不通知家屬，尸體無人收埋。

湖北安陸縣財稅所王竟成，認為處理劉少奇是強權代替公理，在巨大壓力下拒不改變觀點，說“砍頭也只矮五寸”，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槍決。

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志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寫下《劉少奇是我們黨杰出的領袖之一》一文，稱：“劉少奇是不是叛徒、內奸、大工賊，我有懷疑。”“對劉少奇問題的決議，我是有疑問、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為此，張志新成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後被割喉槍殺。

## 搞雕塑的蔡大哥 曹白瑞

南京貢院街上大多是平房，二層樓有兩三座，四層樓只有一座，我們叫它“太平洋”。老人們說，這座四層樓解放前是太平洋旅社，只有達官貴人、商賈戲子才住得起。迎街的一面，延伸出的小陽臺，非常雅致。後來，太平洋改為一家國營大廠的職工宿舍，住有七八十戶人家。大人幾乎都穿帆布工作服，左邊的口袋上方印著“為人民服務”五個米黃色字。孩子們也有別于貢院街上的其他孩子，很有優越感，覺得是響噹噹的工人階級後代。

太平洋和我家一溜邊，只隔兩個門牌號，我有好幾個要好的同學住在裏面。我常去他們家串門，進進出出，算得上是半個太平洋人。

太平洋裏有個白面書生，姓蔡，我們都叫他蔡大哥。那時他大約二十三四歲，瘦條條的，頭髮很長，梳理得一絲不亂，有時還打髮蠟，油光光的，很有派頭。蔡大哥戴一副黑邊框眼鏡，平時很少說話，顯得文縐縐的，整天好像都在想著什麼。蔡大哥比我們這群孩子大十多歲，我們一見到他就直著嗓子叫“蔡大哥好！蔡大哥好！”一般他只是出于禮貌，朝我們微

微一笑，並不搭理我們。蔡大哥那時在城南一家工藝製品廠當工人，會畫畫，會寫美術字，有時居委會請他寫標語、黑板報、喜報什麼的，他從來不拒絕。貢院街上貼的好多標語、喜報，還有挂在居委會門口的黑板報，大多出自蔡大哥之手。我們小孩子都熟悉他那如松枝般遒勁的字體，看了後都會說：“這是蔡大哥寫的。”

大約在 1968 年下半年，貢院街上忽然興起一股木刻風，用三夾板刻毛澤東像。先把毛像模子拓印在三夾板上，然後用鋼鋸條打製成的刻刀刻制，刻好後再在作品上塗抹墨汁，像蓋圖章一樣印在紙上，一幅木刻毛像便告完成。我們貢院街上的小孩子無師自通，幾乎個個會刻，還經常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像模像樣地交流各自的木刻作品，看誰刻的刀法細膩，形象生動。

蔡大哥不搞木刻這種小玩意，他搞大的，用油泥或石膏雕塑毛像，結果一舉成功，轟動了一條貢院街。他就在他家門口搞，有時也在太平洋門口搞，從胚子開始，用雕刻刀一刀一刀精雕細刻，還時不時停下，一手托腮，左看右看，嘴裏自言自語，也不知在說些什麼，然後再細細地下刀，直到成像。我曾多次在太平洋門口駐足，觀看他用油泥雕塑毛像的全過程。我也看過他用石膏做成的毛像。蔡大哥雕塑的毛像確實好，半身像綫條生動，形象逼真，全身像英武豪邁，栩栩如生。我總覺得，這一尊尊毛像可是凝聚著他對領袖的一腔忠誠和滿腹愛戴。

有一天晚上，太平洋裏和我玩得最好的玩伴小泉約上我，帶著各自刻制的一幅毛像，一起冒冒失失地到了蔡大哥家，請他直接“面批”我倆的木刻習作。他接過我倆遞上的習作，大致看了一下，搖搖頭，毫不客氣地指出好幾處明顯的“敗筆”。他說，搞藝術的，首先要懂得用情，比如雕塑，木刻，要刀刀用情，刀刀見情，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打動人心，也才能流傳開來。他又當場教了我們幾招，如構圖的合理布局、刀法的具體運用等，還在一塊三夾板上演示一番他的刀功。他那熟練的動作，流暢的刀法，讓我和小泉看得嘖嘖稱奇，驚嘆不已，真有一種豁然開朗的喜悅。

這以後，我按照蔡大哥教我的幾招，很認真地刻制了幾幅毛像，真的感覺自己進步了許多，至少是學會了“刀刀用情，刀刀見情”。有兩幅毛像作品，我認為是我刻得最好的，鄭重地將它們印在我的小學學生成績單空白處，用以永久保存，居然一直保存到如今，成了那個年代最直接、最真實的印記。

可是，沒過多久，蔡大哥因為雕塑毛像出了大事。消息如同驚雷，在貢院街炸響，人人震驚，個個不解。原來，蔡大哥有一天在廠裏用腳將他所雕塑的一尊毛像踩碎了，被人告發到“公檢法軍管會”，于是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一年。

我不相信我們的蔡大哥會是現行反革命，這樣一個無限熱愛毛主席的青年怎麼會是現行反革命？這樣一個“刀刀用情，刀刀見情”的青年怎麼可能是現行反革命？可是他却被實打實地定為現行反革命，名字和罪狀都上了南京市遵義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的布告。一張張白底黑字的布告，就貼在我們貢院街上，就貼在太平洋的大門口，刺人眼目，令人驚愕。

一年後，蔡大哥被放了出來，我們又在貢院街上看到了他，還是瘦條條的，只是面色慘白，顯得很憔悴，還是頭髮很長，只是亂糟糟的，好像從不梳理，還是戴著一副黑邊框眼鏡，只是眼神散淡，怯生生地看人。

我常常站在家門口，遠遠地看著蔡大哥瘦削的身影，心裏一遍遍地問自己：這就是那個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時代青年嗎？這就是那個“刀刀用情，刀刀見情”的藝術青年嗎？是誰，夭折了他的青春？是誰，斷送了他的前程？可是，沒有人能告訴我，也沒有人來回答我。

1979 年夏天，我被組織上選調到剛恢復不久的法院工作，正趕上了撥亂反正，徹底平反冤假錯案。無數在那個特殊年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人被宣告無罪，被洗刷罪名，被平反昭雪。我閱讀了大量現行反革命案件的卷宗，一本卷宗就是一個人的悲劇，一本卷宗就是一個破碎的家庭。一本本卷宗壓得我連氣都喘不過來，一本本卷宗像火一樣燒灼著我的心。在



我面前，一本本卷宗就是一顆顆蒙冤受屈的靈魂的悲傷哭泣，一本本卷宗就是一個個蒙冤受屈的人們的憤怒控訴，而在那時，我第一個想到的是我們的蔡大哥，是我們貢院街搞雕塑的蔡大哥。

## 月亮惹的禍 蔡勛建

那時袁修廣是縣文化館的幹部，風華正茂，躊躇滿志。他非常熟悉農村生活，精心創作了一出地方小戲《牧鴨會》，主題是農村女青年不顧父母反對，沖出陳舊觀念的束縛，與一個看鴨的青年自由戀愛、結婚。《牧鴨會》獲得很大成功，激起袁更大的創作熱情，接著又寫了劇本《黃鶯過崗》，故事取材于我縣東山鄉一帶的範家嶺，主題是反對浮誇風，反映“三年困難時期”的農民生活。

1966年7月，袁修廣被開除公職，其妻鄒氏也被供銷社清洗，雙雙遣回原籍新建鄉曙輝村管制勞動。袁修廣有兩大罪狀，一是他的《黃鶯過崗》有一句臺詞，“吊鍋子裏煮月亮”，諷喻農民貧苦，屬於反黨反社會主義，二是他主編的《沱江文藝》，其作者有不少是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子女，袁也出身于地主家庭，于是造反派說刊物成了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的狗崽子窩。

1968年，《沱江文藝》被定性為反革命刊物，袁修廣則以現行反革命翻案罪被逮捕，判刑20年。袁修廣夫婦育有5子女，最大的七八歲，最小不滿一歲。丈夫入獄，妻子在環境的壓力下，被迫寫下一份離婚協議書。就在袁修廣被押往沅江監獄之際，其妻鄒氏攔住囚車，眼淚汪汪地要丈夫在協議書上簽字。雖然如此，袁妻仍被視為反革命家屬，其子女也仍然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家6口，只有她一人勞動，無論如何無法堅持，最後只得把三女兒送給人。生活仍舊無比艱難，一天，鄒氏來到注滋口的渡船上，待船到河心，她縱身跳下尋死，所幸當即被同船的人救了上來。

1979年1月，袁修廣平反獲釋。11年後再回縣文化館，當年那個瀟灑倜儻、朝氣蓬勃的小袁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成天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呆子。館長段松筠與袁是老同學，有一天，看到袁失魂落魄的樣子，段親切地叫一聲“袁修廣”，他竟馬上起立，畢恭畢敬地回應一聲“到！”然後低頭，弓腰，立正，倆手垂膝，完全一副囚犯模樣。文化館的工作人員劉恒柏將自己創作的小說《蜜祭》送給袁修廣看，說敬請袁老師指教。袁遲遲疑疑不知該不該接過來看，既看，又說不知政府同不同意發表。1979年下半年，文化館派袁修廣隨劉恒柏、肖金城、劉建新到湖北秭歸王昭君故里出差，其他三人在穿戴上都費了一番心思，袁修廣穿的却是監獄裏發給他的囚衣，只是上面沒有字號。

袁修廣先生是我的文學啟蒙老師。1998年7月16日，袁先生久病不治而逝。時值炎夏，全縣人民正在防汛抗洪，我聽到噩耗，從抗洪大堤請假趕到文化館。靈堂前，與袁老師同事多年的劉恒柏先生滿懷深情地給袁老師作了一副挽聯：“從戎習文，從教為文，名以文立，災以文臨，千錘百煉牧鴨會；著戲鍾情，著文傾情，生以情重，死以情別，萬縷千絲鳳凰篇。”追悼會上，我代表所有學生和文學業餘作者作了題為《長風，卷走一片落葉》的即席悼念發言。我噙著眼淚說：“不是落葉的時節，您却霍然雕零了，不是起風的季節，您却被一陣倏然而至的長風卷走了，您像一片落葉在昏暗的天空無奈無助無望地翻滾，翻滾，不知您將流落何方……漫漫黃泉路，何處覓驛館？袁老師，您走好！”

---

補白：上海警備區的師政委徐海濤，擔任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組長後，聽說上海圖書館有不利于張春橋的歷史資料，便于七〇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圖書館召開深挖現行反革命分子全館動員大會。他在臺上念名單，念一個名字，下面馬上就揪出一個反革命，按成噴氣式，宣布對他們隔離審查。此舉後來導致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張春橋當上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後，立即提拔徐，讓他擔任總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

-----

## 白老師的師道 馬 克

事件是由一支“手槍”引起的。大家都玩木頭槍，同學李志平有一支可以射出子彈（黃豆之類）的槍，當然就非常牛逼了。李志平癡頭鼠目，其父是附近空軍基地雷達站的站長，值班時被戰友擊斃，于是志平成了烈士遺孤。我班四五十名同學，李志平就怕我一個，手裏有了槍，他不怕了。我想看看，想玩玩，不行。一番搶奪，槍已在我手。由于興奮，我推彈上膛，舉槍便射，黃豆打在教室後牆馬恩列斯毛像的毛像左下角。

當時我并不害怕，因為壓根兒沒打著毛像。事過很久，李志平向老師舉報。老師姓白，上海人，空軍家屬，長得對得起她的姓，白白胖胖，個不高，一口我們都聽不懂但普通認為很好聽的上海話。

打毛像的舉報立即引起白老師高度的階級覺悟。本來她很喜歡我，班裏組織文藝活動、出板報，都交給我，可是在大事大非面前，白老師首先選擇自己要安全。當時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正在排練革命樣板戲《奇襲白虎團》，我飾演楊偉才。同學道亮，回族人，長得像阿爾巴尼亞人，飾米國顧問。我最喜歡的一個低年級女孩兒，演阿媽妮。排練已近尾聲，衣服、道具都已由學校出面借妥，即將到空軍基地、鎮上會演。李志平一舉報，楊偉才演不成了，班級、學校開始批判我。李志平成了活躍分子，帶頭揭發，同學們也都一反常態，生怕與我這個現行反革命沾邊。

那時我家剛被定性為漏劃地主，我又成了少年現行反革命，一家老小的命運一下變得岌岌可危。白天我在學校挨批，晚上沒文化的父親在街道挨鬥。

李志平實在太“有才”了，指著我的鼻子，讓我交待如何畫軍用地圖，又是如何把軍用地圖交給蘇修的。打毛像是蒙太奇，軍用地圖就蒙太奇得更離譜。我想，一定是身邊的小兄弟，比如道亮之徒，出賣了我，否則李志平怎麼知道我畫地圖？白老師相信了大家的揭發，讓我交代畫軍用地圖的問題：“馬克！我告訴你，你的罪行可大可小，就看你的態度了！你天天放學就跑到你家附近的大壩上，爬上樹畫對面機場的軍用地圖，連多少架飛機、多少個機窩你都詳細畫在地圖上，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不掌握？同學們眼睛是雪亮的！快說地圖哪去了？交給誰了？”

地圖？沒畫過，畫坦克、飛機、大炮倒是我的最愛，可是說了她不信，也沒人信。運動後期，事實終於查明：李志平說了謊，是誣陷我。一俟形勢平靜下來，許多同學都講了真話。起初道亮把阿爾巴尼亞腦袋搖得十分有力，堅決不承認出賣了我，但抗不住我咋唬，點頭了，地圖案是他密告的，他害怕白老師說他跟我分不清階級立場。有人證實，那天我只把黃豆打在了偉人像下的白邊兒上，不是臉上或衣服上。

-----

補白：1967年，全國刮起請領袖像風，家家挂毛像，《毛主席語錄》也是人手一冊。一天早上，弟弟到大院的公廁“出恭”，人在茅房蹲，心在外面飛，因為小夥伴喊他去學校呢。

弟弟匆忙起身，褲兜裏的紅寶書不慎滑出，落入茅坑，絲毫沒有覺察，大聲應答著跑了出去。一會兒功夫，有人發現茅坑裏有《毛主席語錄》，立即向派出所舉報。不一會，民警來了，弟弟被叫回，十歲的孩子，單獨隔離談話，讓他承認是故意扔下去的。弟弟雖小，但父母從沒教過他撒謊，堅決否認故意。民警進一步詢問老師和鄰居，調查我家的政治背景。父親的老八路經歷似乎為弟弟減輕了一點罪責，民警告訴學校，給這學生記過一次。為加入紅小兵，弟弟去新華書店重新“請”回一本《毛主席語錄》，沒有用，他的迫切願望最終成為泡影。如今已是副教授的弟弟，提起當年事，仍然對那個民警耿耿于懷。

-----

### 三十年的上訪 漢 風

江西定南縣人李月新，天生殘疾，9歲上學，14歲下放，小學未畢業。其父曾在國民黨軍隊服役，抗日戰爭期間打過日本鬼子，後來被定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人民公敵、歷史反革命。

文革期間，李月新以現行反革命被捕入獄，罪名是收聽臺灣當局的廣播。在獄中，李堅持認為，臺灣、香港、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人想到哪里生存都不算犯罪。獄方認為他立場反動，繼承了家庭的反革命衣鉢，并向同監犯散布反動言論，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李月新案是一個集團案，首犯是容某，主犯是樊某，李月新與郭某和練某則是同案犯。起初該案被定為臺灣特務案，後來改為現行反革命團夥案，再後來查無實際的反革命行為，于是1979年6月10日被改判。同一案子，改判的結果有很大差別，有的改判為無罪釋放，有的却被定罪判刑，李月新就是被定罪者之一。有關部門對這種荒謬判決給出的解釋是：政策性的反革命案，可改可不改！

如此不公的判決，李月新不服，幾十年來一直不斷上方。有關部門指責他有精神病，他說：“我沒病，是你們有公安職業病。”李月新究竟寫過多少申訴狀，他自己也記不得了，“大約沒有一尺也有八寸高吧”，但所有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2008年9月26日，李月新的冤情在國家信訪局網站被公開，次日轉贛州市信訪局，同日轉定南縣信訪局處理。10月21日，定南縣法院接訪，但稱找不到案卷。李月新再次上訪國家信訪局，2009年2月28日國家信訪局再次將李案作為網上公開案例。3月11日定南縣信訪局給李月新一個答復：當初對他的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屬處理適當。請你停訪息訴。”

### 大牆內血案 俞加深

這天中午，大隊都出工了，個別犯人在院子裏幹雜活，一個叫王大力的中年犯人偷空在牆角吸煙。此時在幾米高的監獄大牆上站崗的，是人稱楞頭青的獄警班長。楞頭青班長有個特點，嫌站崗悶，愛找下面的犯人嘮家常。

他問王大力姓啥叫啥，王大力有氣無力地答道：“王大力。”“不是叫王八蛋吧？”他開始戲謔他。“你怎麼可以隨便罵人？”班長嘿嘿一笑：“這有啥？你們這些地富反壞右沒一個好貨！”又問：“你啥成分？”

“富農。”王大力如實回答。

“你犯的啥罪？”

王大力是反革命犯，但他覺得這些當兵的素質極差，不值當好好回答，便順口一說：“強奸罪！”

班長更覺有趣，急著追問：“你強奸的女人是閨女還是小寡婦？”王大力覺得有些厭惡，問道：“你想聽什麼？”馬上又靈機一動：“既不是閨女，也不是寡婦，是個當兵的老婆。”

“好小子，你還真會搞階級報復，你可知這是犯破壞軍婚罪！”遲疑一下又問：“那當兵的當的什麼兵？”王大力呵呵一笑：“和你一樣，是個軍墾兵，也在農場看押犯人。”

楞頭青似乎聽出了話外音，怒斥道：“混蛋！你在變相罵人，真是膽大包天！”

王大力裝得誠惶誠恐：“報告班長，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是給你逗樂呢！”

楞頭青班長越想越不對勁，急忙端起步槍，拉上了槍栓，喝令王大力：“你給我滾出大門來！”

王大力也覺得自己闖禍了，但轉念一想，自己在警戒區，班長也奈何不了他，便說：“報告班長，我沒出警戒區，你當然不會開槍。”說著慢慢向院子中間退。

楞頭青見他想溜，便將槍口指向王大力，想嚇唬他，不料衝動之下，二拇指一勾，砰的一聲王大力應聲倒下。子彈正好打在胸口，鮮血立即涌了出來。楞頭青班長慌了神兒，急忙放下步槍，從大牆外的階梯上下來，一把拽開大門的鐵栓進來了，慌慌張張拖起王大力的大腿就往大門外拖。

“不許動！你再敢挪動我就要開槍。”大門口值班室的任隊長握著槍從後面對著楞頭青。任隊長是老革命，剛才那一幕他看得很清楚。他果斷地命令楞頭青：“不得將犯人移動半步，必須保護好現場。”並命令楞頭青上大牆取回自己的步槍。片刻，楞頭青取回步槍，任隊長接過來，抗在自己肩上，命令楞頭青進值班室等著。

任隊長又大聲喊來牢裏的犯醫等人，還叫旁邊廚房的犯人用土坯在王大力周圍畫一個圈。部隊連長聽到槍聲，也帶著兩個戰士趕了過來。

老犯醫蹲在王大力身邊，摸一下他的脖子，又翻了翻他的眼皮，報告說，沒救了，便找一塊草簾子蓋在尸體上，等候上級處理。很快，楞頭青被銬上銬子，押往團部。

---

補白：湖南黔陽縣高陽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一心想搞出點成績升官，把自家狗打死，向公社報告說狗被人毒死。公社書記正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馬上批評大隊支部書記右傾，並責成該副書記主持專案組破案。副書記馬上在大隊部架起一挺機槍，將社員抓去過堂，最後聲稱揪出一個 16 人的反革命集團，導致一人被槍殺，2 人被打殘，自縊身亡 2 人，受株連者 115 人。

---

作協裏的反革命 劉亞偉

侯金鏡、馮牧都是《文藝報》的副主編，1968 年初同時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兩人秉性耿直，有一次，侯金鏡指著牆上毛像旁的林彪像，對馮牧說：“這傢伙真像個小丑！”大人們的這些談論，星星點點被未成年的孩子們聽到了，于是也學著大人在小酒館裏關心起國家大事。隔牆有耳朵，這些小孩子被抓去嚴刑拷打，“供出”了侯金鏡、馮牧，還有電影劇作家海默、畫家劉迅，于是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集團。海默拒絕招供，被活活打死，劉迅被投入牢房。作協的革命群眾召開大會，批鬥侯金鏡、馮牧。

批鬥會當晚，侯金鏡回家喝了一瓶敵敵畏。我那時和侯金鏡隔一個單元，第二天一早，聽到呼喊聲，我和幾個人上到侯家，抬他去醫院。侯金鏡已經奄奄一息，翻著白眼，大小便失禁。我抬的正好是他的臀部，弄得一手髒。好在那敵敵畏已過期，毒性減弱，經過洗胃搶救，幸免一死。3年後，侯金鏡在湖北五七幹校勞動，在40度的陽光下擔著沉重的糞桶，當晚因腦溢血昏迷，被同屋人發現，次日晨辭世，匆匆走完僅僅50年的人生。此時離林彪事件的爆發僅僅1個來月。

批鬥馮牧時，作協有個剛畢業分來不久的大學生動手打他耳光。後來在五七幹校，二人正好同屋，此時那年輕大學生已被打成516現行反革命。馮牧原諒了這位年輕人，根本不提這事兒。馮牧複出後，那位年輕人在外地工作，所在單位來人外調其文革中的表現，並指明瞭解他是否打過人。馮牧明確地為那位大學生作了辯解，外調的人也找我瞭解情況，當時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也說了類似的話，最終沒有影響他的提拔。有一年馮牧要去那兒，主動給他寫了封信，可沒有接到那年輕人的回信。

作協另有一個現行反革命，是《人民文學》的女編輯冼寧，解放前夕北大畢業，參加過抗美援朝。1962年冼寧在《人民文學》寫了一篇童話《小黑點兒》，意在不要歧視有缺點的孩子，要相信在親情友情的溫暖下，有缺點的同樣能夠成長得很好。童話裏寫了一條咬過小豆子的毛毛蟲，那毛毛蟲的嘴邊還有一顆黑痣。這就犯忌了！偉大領袖的嘴下不是有一顆痣嘛？冼寧的作品成為無可爭辯的大毒草，惡毒影射和攻擊偉大領袖。冼寧一向開朗樂觀，大大咧咧，就是不承認有罪，在黑幫窩裏照樣嘻嘻哈哈。

---

補白：1967年的10月，我讀小學二年級，親見我的同班同學周進（8歲）被打成反革命，在全校大會上被批鬥。一次，全班同學齊聲高呼“打倒劉少奇”，周進慢一拍，讓大家清清楚楚地聽到他喊的是“打倒毛主席”。就這樣，他成了現行反革命，五花大綁，押上臺批鬥，胸前挂著“現行反革命”黑紙牌，全校的師生齊聲高呼：“堅決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周進！”批鬥之後沒有開除學籍，只被開除出“紅小兵”。其父母都是貧農，也沒受到太大牽連。筆者還清楚記得批鬥兩位校長的情景。他們戴著高帽子，挂著黑紙牌，陪鬥的女壞分子脖子上吊著臭草鞋。姓蔣的校長比較瀟灑，嬉皮笑臉的，姓李的校長則默默流淚。這樣的情形已深深銘刻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之中，永不會忘記，也願它永不在中國大地上重演。

---

補白：一何姓農民，有一次他說了句“社會主義是幽靈”，被住隊幹部告發，打成現行反革命。他辯解說，這話是一個大人物說，人家讓他拿證據，他說記不清了。送進監獄沒蹲幾天，何某被放了，說是縣上有位領導，看了他的材料，說《共產黨宣言》中就有這樣的話。何某雖被放，但不等於徹底平反，因為他說那話的場合不對，誤導革命群眾，而且馬克思說的是“共產主義的幽靈”，歪曲了馬克思的意思。不久，何某死了，父母親悄沒聲就把兒子埋了。

---

楊繼年奇冤 廖亦武

《悲慘世界》裏的冉阿讓，偷了一塊麵包，被判刑5年，4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計刑期19年。但是，雨果認定的悲慘世界對於中國人還不算很悲慘。本文的主人公楊繼年，年僅11歲，什麼都沒偷，却被判10年刑，4次逃跑，加刑24年，累計刑期34年。

當初是，楊繼年的哥哥偷了一隻羊，被判刑10年，全家七八口就都跟著成了“偷羊賊家屬”，管制勞動4年。因受不了國家煽動組織的群眾批鬥，偷羊賊家屬舉家外逃。黑天半

夜，11 歲的楊繼年迷路失散，轉回家中，被警方抓獲，稱他是反革命偷羊賊，關進牢獄，判刑 10 年。其判決書稱：楊繼年，又名楊志遠，男，11 歲，內江縣人，貧農家庭成分，盜竊出身。

1963 年的加刑起訴書稱楊繼年 18 歲，推算回去，楊首次判刑時（1958 年）應為 13 歲。1970 年的加刑判決書稱楊 21 歲，即意味著 1958 年進監獄時楊僅有 9 歲。不管是 11 歲、13 歲還是 9 歲，楊離成年都很遠，都屬於少年入獄。至於出現三個彼此矛盾的年齡，是法院瀆職的明證，悍然將一位少年判刑則是明目張膽的殘暴。

花樣翻新的酷刑，死去活來的種種毒打，土手銬，幾十斤重的腳鐐，假槍斃，陪殺場，槍一響潑半臉半肩紅白腦漿渣子，嘴裏打麻藥塞棉花，嚴防臨刑呼喊“反動口號”，打斷肋骨并撬嘴塞大糞以檢驗是否裝瘋，被關進懲罰小號，不放風，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樣鎖在黑暗中長達四年！

楊繼年如何能在四年小號黑牢後重返人世？也許全憑他 11 歲入獄練就的童子功。還有，讓我們再來看看當時楊繼年的即興式“逃跑”吧：毫無預謀，從審訊室拔腿就跑。本來這不是那種我們一般稱之為逃跑的行為，而完全是一種應該送醫治療的精神現象。但沒有醫生，唯有士兵“趕鴨子一般”追攆。“我抵攏牆了，九米高，牆頭拉了幾道電網，我向後退幾步，再俯衝，一次又一次跌跟鬥，一次又一次上竄下跳。腦殼撞大了，渾身血口子，哨兵懶洋洋地拉槍栓，鳴槍示警。”夠了，貓捉老鼠的遊戲到此該收場了！却不是，雙方都興猶未盡。瘋狂了的楊繼年繼續喊叫著跳躍，一次又一次撞向那九米高的大牆，“哨兵射擊了，左一槍，右一槍”，等楊繼年舞蹈得力竭命盡，虛脫倒地那一刻，“那些追捕的解放軍戰士才笑嘻嘻地圍上前，問我：‘逃夠沒有？’接著拳腳如雨點落下來。”

寫到此，我不禁深情地懷念起《悲慘世界》的反面角色，那位跟踪冉阿讓、迫害孤女寡母的警官沙威，其一舉一動是何等紳士呀！

楊繼年忘不了他被抓進監獄時鄉鄰們的掌聲。警察先拽過他雙手上銬，却不料手腕子太細，銬不住，就用麻繩捆，11 歲的楊繼年嚇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駭不倒人民政府，無產階級江山是鐵打的！”圍觀群眾都鼓掌歡迎，喊：“整得好！”楊繼年賴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攔腰夾在腋下。“我邊哭邊蹬腿，姓肖的警察穩不住，毛了，罵聲狗日的，把我橫擱在膝蓋上，劈裏啪啦打屁股。周圍群眾都被惹笑了，幾個民兵笑得連步槍也背不住。警車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過年一般熱熱鬧鬧‘護送’我上車。”

這一去就是 34 年，真正是闊別了。再回來就應該是賀知章的詩境了吧？“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太自作多情了！

冉阿讓出獄後改名換姓，發財成了大富翁，還當上了市長。我們的楊繼年却没有冉阿讓幸運，他的出獄只意味著生不如死的下半生的開始。

闊別 34 年後，楊繼年回到家鄉，父母、兄嫂、姐姐、侄兒、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已在那場大饑饉中死絕。他殘著半邊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裏晃蕩了幾個來回，不見兒童來“笑問”，却來了一夥人抓賊。楊繼年自證身份，村長不信，叫幾個老人來確認，然後說：“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頭分給各戶了，你家又死得連毛都不剩，你一個孤人挂靠在哪兒？我拿啥子安置你？”

楊繼年哀求說：“無論咋樣今晚你要給我找個住處，能遮雨避風就行。”治保主任說：“你到底滾不滾？”楊繼年熱淚橫流，叫喊道：“我滾不動，我要去你家端碗。”

治保主任叫來幾個人，把他扔出村口，還順手塞過一隻破碗說：“這是我家看門狗老黃用的，免費送給你。”

鄉書記說：“一個大活人還叫尿憋死？楊家沖生不了根，你就回監獄嘛，你在裏頭混了三十幾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說不定還能娶上個女犯人呢。”

楊繼年問：“你開玩笑嗎？”

鄉書記說：“跟你這種人有啥玩笑可開？你回監獄吧。”

于是鄉政府給楊繼年開了回監的路條：“原我xx市東興區鳳天鄉楊家沖村二組村民楊繼年，因勞改釋放，現家裏無一親人、財產等，所以無法生活。根據本人技術特長，故介紹前來xx市第一監獄做工。望貴處給予支持，特證。”

走投無路的楊繼年，一路乞討著走回到監獄，“轟地雙膝跪下”，懇求入獄。“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監獄折磨我大半輩子，但此刻，高牆、電網是那樣親切，我真想長一對翅膀飛進去，我的監舍，我的雙層鋼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個房頂遮著，至少沒人攆你，至少還算暖和。”

楊繼年恭敬地“雙手呈上鄉政府的路條”，并訴說了自己“重返監獄、誓把餘生貢獻給祖國的勞改事業的強烈願望”。監獄方面也對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戶口已遷回原籍，愛莫能助。獄方打電話開證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絕接收，稱“再上門糾纏就打斷你狗腿”。此時的楊繼年，右手右腿已經殘廢，要再打估計就是左面的狗腿了。

當楊繼年再次手捧鄉政府的路條回到監獄時，監獄也對他恩斷義絕了，繞大牆轉了一星期也無人理睬。

他到省裏告狀，勞改局再次“介紹”他回鄉。小小的鄉政府橫蠻依舊，終於把楊繼年逼成“上訪作家”。“從市、省到中央，幾級公檢法，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信訪辦、省政府，我見廟就遞申訴狀。看來，還得告十年狀，這條道走到黑了。”

楊繼年是良善之輩，經常心懷感激地回憶起“坐牢的唯一好處”，那就是爲了寫認罪揭發材料，人人都必須學文化。“我兩三年就脫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別人幫我寫申訴了。這床底下，這幾口紙箱和麻袋裏都是我的杰作，從十幾歲到如今，40 多年，我寫的申訴材料能把人淹死。我無家無室，一條老光棍，所有財產就是申訴。”

楊繼年寫了幾百萬字的各類申冤材料，堪稱世界上創作量最大的“上訪作家”。兩年前，他終於含冤而死，這幾百萬字所記述的荒唐與殘忍，就成了留給我們的遺產。

最後當了市長的冉阿讓居然大字不識，而共產黨的牢房竟然把楊繼年從文盲變成“作家”；冉阿讓因持假釋出獄的“黃色身份證”而不能就業，在中國，所有的楊繼年從出生起就持“農村戶口”，嚴禁脫離農奴地位。

出獄後的冉阿讓偷了米裏哀主教的銀餐具，旋踵被警察拿獲，主教稱那是送給他的禮物，還問他，那一對最值錢的銀燭臺爲何忘記拿走？冉阿讓深受感動，自此開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楊繼年所遭遇的現實中，沒有那樣一位主教，更沒有那一對慈悲的銀燭臺。

在我們的故事裏，永遠不會有米裏哀主教，永遠不會有那一對慈悲的銀燭臺，永遠不會有良心發現而投河自盡的沙威警官。親愛的雨果，如果沒有這一切，你拿什麼來構造你的“悲慘世界”？

我們現在的故事是這樣的了：“冉阿讓”沒有偷一隻羊，判刑 10 年，四次加刑共 24 年，累計刑期 34 年。出獄後，他沒有盜竊，當然米裏哀主教大人就沒想起來送他一對銀燭臺，而送他一隻狗碗，并勸慰他重返監牢。

“冉阿讓”不想發財更不想當市長，而是乞討著走回監獄，流著泪向“政府”傾訴自己“誓把餘生貢獻給祖國的勞改事業的強烈願望”。晚年的“冉阿讓”流落巴黎以乞討和上訪爲生，同時進行篇幅浩繁的開放式史詩寫作：《我沒有在 11 歲偷那只永難消化的羊》。

他常常構思小說中自己的結局，說：“我與這個社會有太多的賬沒算清，哪天感覺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買 10 公斤炸藥，10 支銅雷管，1 公斤鐵沙子，用四副電瓶接起引燃……”如果實現了，那就是行爲藝術結尾。

惜乎沒來得及，在小說之外的真實世界裏，“冉阿讓”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這樣，親愛的雨果，你如何來寫你那部

- 一、歡迎來稿和薦稿，也期待建議和指正。
-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 提 三、本刊聯絡手機：133 6658 6793。
- 四、有意資助《黑五類憶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 五、通訊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示 305 甲 110 號 焦國標，郵編 100091。
-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銀行北京北大支行，  
賬號 4080702-0188-038026-9，戶名焦國標。

## 《黑五類憶舊》第十期 201102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基督徒的苦難觀 焦國標

本期《憶舊》收入五篇關於基督徒黑五類的文章。不同信仰的人，其內心的風景也很不相同。有些信仰的人，其內心風景充滿野蠻、殘忍和殺氣；另有些信仰的人，其內心風景儘是安詳、溫柔和感恩。尤其是在遭遇人生巨大苦難的時候，不同信仰的人，其內心呈現的風景更是全然不同。

在編輯《憶舊》的過程中，為故事中的當事人流淚是經常的，但是編本期《憶舊》中的《這個家是屬於神的》一文時，其中一句話却給我帶來想嚎啕大哭一場的強烈衝動。父親因信仰被判刑坐牢，女兒因車禍致死，二兒子求保父親回來操辦喪事而不被允許，大兒子正逢博士畢業答辯，導師和領導們扣下了噩耗電報，以至于遭遇車禍人亡這麼大的變故，家裏却連一個主事的人都沒有；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此時這個家算是背運到底了。大兒子答辯通過後，導師和領導才把電報和返鄉的火車票交給他，此時他已趕不上妹妹的葬禮了。回到家，面對母親，面對爸爸坐監、妹妹去世，他沒有怨言，只說：“主啊，雖然在人看來家破人亡！但這個家是屬於你的！”無論遭遇怎樣的困厄，永遠相信上帝的看顧，這是一個基督徒內心最深處的精神風景，代表了基督徒對苦難的極致性看法。

倪柝聲可能是中國第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基督徒和基督教神學家，五十年代初被判處無期徒刑，并遭到污名化，稱其政治上無比反動，經濟上偷漏巨額稅款，生活上荒淫無耻。對於這些指控，倪柝聲不予辯解，他說：“我比你們說的還要壞。”每個人都有原罪，人的敗壞無以言表，因而“我比你們說的還要壞”之語，同時也意味著你們絕不比我更好。基督徒



是罪人，誹謗、加害基督徒的人也是罪人；作為基督徒，遭遇誹謗、誤解和各種苦難，是十字架的苦難，是屬靈生命成長的養料，難以避免；牢獄之災是“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榮耀”，不應逃避；自我辯解、自證清白等于主動從十字架上下來，是拒絕“為主受苦”，是逃避“基督徒的榮耀”，是不應該的；最終的審判在上帝那裏，塵世統治者給你的任何加害或平反，都是不必為意的。七十年代末平反冤假錯案，王明道、吳維尊等基督徒却拒絕出獄，或如基督徒藍志一，既出獄，子女再三苦求他向政府要求平反，他却始終不肯，即出于這樣一種苦難觀。1972年，倪柝聲死于勞改營，留下的絕筆是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他的信仰聲明：“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

當今世界的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明、每一個信仰群體所呈現的形態，都是各自觀念之樹、信仰之樹歷經數百千年風霜雪雨結出的一個果子。耶穌說過，憑果子可以認出樹來，結蒺藜的不可能是無花果樹，荊棘上也不可能摘葡萄。同理，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明、一個信仰群體的當下形態（物質文明、私德、公德和社會制度），可以認出該族群內心風景的良窳、優劣。

## 目 錄

同院的桂·····	戴為偉 (04)
我信基督而死·····	百 科 (09)
倪柝聲的絕筆·····	頌 恩 (12)
富農歲月·····	李興濂 (15)
我做過十世班禪的聯絡官·····	焦國標 (18)
引詩賈禍·····	滬 生 (25)
岳父岳母·····	張允若 (27)
父親瑣憶·····	胡迎建 (30)
成都的土改殺人·····	鐵 流 (35)
歷史反革命吳九爹·····	黃振迪 (36)
南陽張建功·····	陳 更 (38)
這個家是屬於神的·····	白受恩 (40)
父親董渭川·····	董乃強 (46)
一次訴苦會·····	王法堯 (60)
想讓黨支部掉到茅坑裏·····	李子軍 (62)
將軍的女兒·····	董婉如 (63)
我親歷的殺人·····	王法堯 (65)
富農郭玉德·····	俞加深 (70)
鄧星杞一家之死·····	林啓山 (72)
故人王文煥·····	段華庭 (74)
在神的帳幕隱秘處·····	袁相忱 (76)
袁相忱被捕·····	李迪雅 (79)
北京三自會·····	李 克 (83)
遙祭六姑媽·····	陳仁德 (89)
兩個壞分子·····	崔光宇 (94)
刑事罪名種種·····	小 閑 (96)
一幅反革命的骨骼·····	黃 芩 (98)
我的祖輩·····	張 健 (99)

同院的桂 戴為偉

我們幾家合住這個小四合院。北屋住的一家被轟回安徽老家後，北屋就空了。不久，北屋住進新鄰居，桂、她男人、婆婆和女兒。桂是機關後勤處的雜役，文革伊始，她由雜役而紅衛兵而機關發稿組成員，修成了革命幹部正果。桂，發麵餅臉，一腦袋黑鋼絲似的自來卷短髮，棕紅色鏡架後面的眼睛，好像總是眯在問號裏蔑視人。院裏除我家之外，其餘人家都在同一個機關裏掙生活。自桂家搬來，原本稀鬆無事的小院，有了些暴風雨前的沉悶。

南屋住著地主婆吳姥姥。一天，吳姥姥的9歲外孫女去街西口副食店打醬油，被桂攔住，說：“哎，給我帶5分錢韭菜來。”夏天菜便宜，5分錢能買2斤韭菜。一個多小時後，貪玩兒的女孩兒拎著醬油瓶回來，早把桂的韭菜忘到爪哇國。眼瞅著婆婆揉好面等菜調餡，胖胖的桂有些氣不順，叉腰立在當院發泄不滿：“什麼點事兒！地主婆也想翻天了！”溫良的吳姥姥原本坐在家門口等外孫女和醬油，這時只得拎起小板凳進屋了。

1970年，我6歲。出生不到2個月的妹妹被送到街道托兒所，我只好被單獨留在家裏。媽每月28塊錢的工資，供不起倆閨女一個上幼兒園，一個上托兒所。小院裏只有桂的閨女燕兒和我一般大，媽上班前叮囑我：“別跟燕兒玩兒，她媽會不高興的。”我鷄啄米似的點頭，可媽前腳剛邁出院門，我後腳就去找燕兒了。媽下班回來打了我：“白天，不許出去玩！在家呆著！”我大聲哭起來。媽的聲音小下來：“你再吵別人！燕兒媽最近有夜班了，白天得睡覺，你不能不懂事。還有，不要找燕兒玩，說了多少遍，聽不進去嗎？聾了嗎？”看著媽手裏的筍帚疙瘩，我糊裏糊塗地點點頭。

我記住了媽的話。媽上班去了，我敞著家門，拿著媽的鋼筆，在有藍白格子的床單上亂畫。畫完，自我欣賞一會兒，在床上蹦起來。唰的一聲！咦？靠牆的床板怎麼塌下去了？我趴到床下看，呦，一隻床腿歪了。我使勁兒往上推那床板，可它吱吱哼唧了兩聲，却並不挪動分毫，只好又爬出來，氣急敗壞地哭了起來。

媽家媽媽過來問怎麼了，我哭著告訴床壞了。不知怎的，這時桂的男人也站到門口了，問：“床壞啦？”我哭著說：“叔叔，這床，我不會弄。”桂的男人很興奮，自告奮勇幫忙，說：“我來。”我心裏高興起來。他一脚跨進屋，把床上的褥子都掀去。咦？他怎麼穿著鞋上了我家的床板，蹲在上面看起褥子下面的那些信來？我楞楞地站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翻看了一會，這男人才站到塌下的床角邊，一手抬床板，另一手扶直下面的床腿，然後說：“好了，沒事了，成了。”說著轉身出了我家。

媽回來後，看著一床亂糟糟的被褥，問了問，皺皺眉：“下回有什麼事，等媽回來再說，不往屋裏招人，好嗎？”

媽為了讓我老實呆在家裏，給我買回一條石雕小魚玩具，手指頭那麼長，能用魚嘴這頭吹出好聽的哨音，我很喜歡。第二天，我拿著小石魚去找燕兒。不一會，我就發現魚頭和魚尾巴分家了。燕兒告訴我：“我沒有（石魚），咱倆一人一半吧。”我生氣、心疼，找到在水房淘米的桂：“阿姨，你賠我魚，燕兒給摔壞了。”桂瞥了我一眼，端起鍋往家走，我攆在她的胖屁股後面，手裏緊緊攥著兩半兒的小石魚。桂開了家門進去，門在我鼻子尖前咣的一聲關上了。

晚上，媽回家又打了我：“讓你長記性！明天給你鎖屋裏，看你再往外跑，自己弄壞了東西，還要別人賠，沒出息！”我哇哇大哭著，聽到桂正在院子裏喊燕回家吃晚飯。

漫長冬季的白天真難熬呵，我站在被鎖了門的屋裏，把臉貼在門玻璃上，無聊地瞪著空蕩蕩的院子。看著看著，我感到有些困，頭沉，勉強爬到床上，嗚嗚哭了起來。倒座房的吳姥姥往屋裏看了看，開了鎖，問我哭什麼，又坐到床上，摸摸我的頭，又看看火爐，說：“可

能中煤氣了，躺著，別動呵。”老太太往爐子裏添塊煤，封好火，敞開房門，走了。一會兒，小脚的吳姥姥把一隻冒著熱氣碗送到我嘴邊：“喝了，孩子。”碗裏，星星點點的麻油很亮，幾根麵條上臥著一個雞蛋。那時每家每月只能買1斤雞蛋。

媽不敢再把我鎖屋裏了。我又惹禍了，用捅爐子的通條戳碎了吳姥姥家的窗玻璃。吳姥姥罵我比野小子還能闖禍，說等我媽下班回來告我媽。我很恐懼，一頓打又跑不掉了。媽下班回來了，吳姥姥走過來，低聲跟我媽說：“街道姜主任來了，問西屋老何家兒子搞對象的事，好像是桂到街道去了，說人家兒子耍流氓，搞男女關係。”媽不滿地回應：“不就是欺負老何是右派嘛！”吳姥姥又說：“你還不知道哩，兩年前，老何的媽就是她給告走的。老何家是四川的地主，又是右派，這可好，雙料啊……”“是右派，怎麼了？！右派人家的孩子不就搞對象？人家屋子那麼小，還有個哥，都二十大幾的了，後院裏背靜地兒和對象拉拉手什麼的，我見過的，人家姑娘看見我還不好意思來著，有什麼呀！”媽很不以為然。

“咳，我和趙奶奶跟姜主任說了，人家孩子是搞對象。老姜也說，既然桂去反映了，街道不能不來調查。這不是階級鬥爭嘛，是提高什麼警惕。咳，小何維搞對象這點兒事，桂先告到機關保衛處來著，人家沒功夫管這閑事，這才又告到街道啦。哎，大夥多注意吧。還問你家哩，別往心裏去啊。我回去了，你做飯吧。不要打孩子啊。”這一次闖這麼大禍，媽還真是沒打我。

那時候，院裏各家都把入冬時賣來的幾百塊蜂窩煤，整齊地碼在自家門口窗沿兒下邊。一天，快中午了，我和燕兒蹲在西屋楊家窗沿外，一邊曬太陽，一邊用撿來的小棍在地上亂畫。燕兒突然想回家去拿新買的化石筆，起身的當口，碰到了身後的蜂窩煤，兩塊煤塊被撞碎在地上。看著碎在地上的，我擔心地叫起來：“呀，碎啦！怎麼辦？你也不看著點兒！”

燕兒看看我，看看碎煤塊，不知所措，走了。燕回家沒再出來。我在心裏告訴自己，反正不是我碰的，可還是有點不安，在院裏溜達了會兒，也訕訕地回了家。

不大會兒，桂突然拉開了我家的門，一手叉腰，一手指著我說：“告訴你呀，趕緊賠人家煤，把人家煤踢碎了，還沒事人似的！”

“不是我，是燕兒！”我爭辯著。“你胡說！叫你賠！不賠，等你媽回來再說！”想到媽又會不明不白地打我，心裏更急了。不知什麼時候，我和桂竟都站在了我家煤堆邊。桂繼續斥責我：“你不大個東西，撒謊，挺能的你，啊？！”

“是燕兒碰的！”我仰視著桂。桂貼得那麼近，我已經只能看到桂粗壯的腰了。“你再嘴硬，你個小右派崽子！想翻天吶你！”桂咬著牙，手已經擰在我的小臉蛋兒上。“我讓你個狗崽子撒謊！”又是一巴掌打過來。我只覺得上嘴唇熱辣辣地厚了起來，下意識抹了一下鼻子，手背上濕乎乎的鼻血。“我今天替你那不懂人事兒的媽教訓教訓你！有娘生沒娘養的東西！”桂那棕黃色的翻毛皮鞋也踹了過來。正吃午飯的鄰居趕緊圍上來勸，我小腦袋裏嗡嗡的，只覺得眼前所有的人臉都變得特大，在晃。

“回吧，桂阿姨，您消消氣。”吳姥姥嘴上說著，緊緊攥起我的小手，拽回家來。桂昂著下巴，甩手回自己家了。

不知桂為何經常上夜班了。我家隔壁原本是老何家的一間東屋，老何兩口子去五七幹校後，房子成了桂家的，桂下夜班後就在這間房裏睡覺。我恨上了桂，見面不再叫她阿姨。有時，午睡的工夫，我不出去亂跑，而是平躺在自家鋪板上，將兩條小腿舉得高高的，對著與桂家相鄰的牆壁使勁兒踹，踹累了就換小拳頭搗，搗疼了再換腳踹。牆那邊睡著的桂也不再出來罵戰，我暗自得意。

這一天，媽工休，又到了院裏人午睡的時候。我乖乖地躺在床上，四合院的街門被木棍之類的東西敲得響了半天，也沒人去開門。媽忍不住跑出去，拉開木門門，桂那得過半身不遂的婆婆拄著拐棍巍巍地進來了。媽關了街門往回走的當口，桂手上抱著還不會走路的兒子，從我家隔壁的房子裏沖了出來：“你想翻天呀，大中午的這麼吵人！”媽一下轉不過彎

來，一邊往家走一邊解釋：“你婆婆叫門，我去開門的。”那跟在後面的老太太也急得啊啊地叫著。可桂不依不饒：“你個右派小老婆，你和右派小崽子想翻天吶，我告訴你，只要有共產黨在，你們永遠也甭想！你們永遠也翻不了天！”

桂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指著天：“我告訴你，你和你的狗崽子只有被人民，知道嗎？人民！踩在腳底下！”桂很忙活地用一隻腳在地上狠狠地碾了兩下。”媽生氣了，說道：“我是給你媽開門去了，你想想清楚，抱好你手裏的孩子吧，孩子都聽著吶，別把孩子再嚇著，摔壞了。”桂聽出媽冷嘲熱諷的，更是氣急敗壞。趙奶奶出來說：“爲偉媽，進家去！”不願惹事的媽就坡下驢進了屋。又告訴桂：“小桂，趕緊扶你媽進屋吧，別再讓她自己上街了。”

桂又去街道告狀了，姜主任又來了，說：“你們院裏右派家屬最近是不是很霸道？桂的工作很重要，上夜班審核稿件，錯一個字就有可能給國家帶來政治上的損失，就有可能出現嚴重的政治事故。這可是國家大事，你們鄰居要保證她能有一個良好的休息環境。”地主出身的吳姥姥和成分不明的趙奶奶這時體現了他們鮮明的“階級立場”：“哪里是人家霸道，這院裏就是這個桂……”

幾年後，爸爸戴煌回來探親，和媽去糧店買米，在街上碰到姜主任。老人很和氣，問：“怎麼樣，你們現在這個院子裏？以前，桂老來告狀，我們也不能不去問問。咳，她那個人就那樣，早晚都會過去的，好好過吧。”1978年，爸回機關工作了，爸被選爲區裏的人民代表了。不久，機關改選黨組成員，爸是候選人之一。一天，中午去食堂的路上，一個同事和爸聊著：“老戴，小桂以前你們住一個院子啊。哎，那天她還跟我說呢，你愛人帶著孩子，那些年真不容易熬啊。她挺同情你家的，她公公去世了，她悄悄把好些舊的棉衣、棉褲放你家門口。哎，你愛人都不動啊，她說你家裏人可要強了。好多年不見了，她讓我給你帶個好，老鄰居嘍。”

1987年，機關院裏蓋宿舍樓。1988年，我家搬了進來，桂一家也搬來了。後來，爸退休了，桂和她丈夫也老了。桂有時會推著她那半身不遂的男人在院裏散步，那眼光裏蔑視的問號已經不見了踪影。

我信基督而死 百 科

倪柝聲，1903年11月4日生，原名倪述祖，英文名字 Henry Nee，福建福州人。被主耶穌基督興起後，中文名字改爲柝聲（柝，打更的梆子），英文名字改爲 Watchman（看守人），自比暗夜的更夫或看守。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祖父倪玉成是福州公理會最早的華人牧師，父親倪文修畢業於福州美以美會所辦的著名學府鶴齡英華書院，母親倪林和平是一位美國傳教士的養女，早年入讀上海中西女中（以英文水準高而著稱的教會學校）。1916年，倪述祖就讀於著名的英國聖公會在福州所辦的三一書院，是該校一位名列前茅的優等生。

1920年，倪述祖17歲，還在三一書院讀書，一位中國自由女布道家餘慈度（Dora Yu）來到福州傳福音，其母林和平接受了福音，行爲方面有令人驚訝的改變，放棄了打麻將的嗜好，且主動爲自己曾向家人發脾氣而認罪悔改，請求家人饒恕。倪述祖對母親的改變非常驚訝，也好奇地去聽餘慈度講道，深受感動，接受了福音，毅然放棄了原來的理想和計劃，決心一生奉神，并且更改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此後幾年間，倪柝聲苦讀《聖經》，同時博覽了大約3000冊基督教歷史名著，同時與一批年輕人一起，到在福州附近白牙潭村隱居多年的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E. Barber）那裏求教，從那裏得到極大的屬靈幫助。倪被她高深的屬靈生活所折服，形容她是“一位發光的基督徒”。

1949年大陸易手前，倪柝聲打發同工李常受去臺灣開展工作，自己於1950年3月從香

港返回上海，照顧大陸的數百處地方教會。1951 年 4 月，朝鮮戰爭爆發不久，倪柝聲被邀請去北京，參加政府召開的全國基督教會議。在控訴大會上，倪柝聲被“揭發”出一連串令人難以想像的罪名。政治上無比反動，1940 年代不贊成學生信徒上街進行反對國民政府的游行示威，因為堅持聖經中順服政府權柄的要求，還讓青年學生移居臺灣這個“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地方，又欺騙政府，雖是中國人自辦的教會，却與外國傳教士來往，同情他們，沒有站在堅決反帝的人民立場上，以及其他很多聳人聽聞的反革命、特務等等罪名。經濟上偷漏巨額稅款，欺騙政府。生活上荒淫無耻，甚至有與女同工私通的電影膠片公開展覽（沒有頭部）。

倪柝聲對於這些指控不予否認，他常說：“我比你說的還要壞。”因為在基督教信仰裏，人的敗壞，無以言表。在許多基督徒看來，誹謗、誤解屬於十字架的苦難，對屬靈生命的成長是有益的，沒有必要主動從十字架上下來（自我白謗、自我辯解）。1980 年代出獄的基督徒藍志一，不顧子女的再三苦求，始終不肯向政府要求平反，因他認定那牢獄之苦是“為主受苦”，是“基督徒的榮耀”。

1971 年 11 月 7 日，倪柝聲的妻子張品蕙，因遭受嚴重迫害在上海病故。1972 年 6 月 1 日凌晨，倪柝聲在安徽省廣德縣白茅嶺監獄逝世。現在倪柝聲與妻子張品蕙一同安葬在江蘇省蘇州市郊外的香山公墓。

2009 年 7 月 30 日，在倪柝聲為主殉道 30 多年之後，美國國會眾議院對倪柝聲這位中國基督教界偉大先驅的浩瀚屬靈成就做出表彰：

“《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雜誌近日將倪柝聲評為 20 世紀百位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之一。倪柝聲雖已逝世 30 多年，但他的為人和事工仍然持續影響著中國上百萬的更正教基督徒。如今中國境外有超過三千處的教會，包括美國國內的幾百處，都將倪柝聲視為他們屬靈和神學上的創始人之一。倪柝聲一生全然奉獻，不遺餘力，這從他的生平簡史可見一斑。他于 1922 年成為基督徒。30 年代，他至歐洲和北美洲訪問，在那裏講道演說。他的信息之後被彙集成冊，出版成書。40 年代晚期，倪柝聲已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基督教作者、宣道者和教會建立者。1952 年，由于信仰的關係，倪柝聲和其他許多基督教領袖遭監禁。儘管如此，他的一些書籍却在六七十年代大受歡迎，影響越發深遠，在美國尤為如此。他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在全球銷售超過 100 萬本，成為 20 世紀的經典著作。1972 年，他死于中國的勞改農場，享年 69 歲。他遺留的數封信函表明，他向神忠信直到路終。

“據估計，中國有一億以上的基督徒，其中有數百萬基督徒認為自己是倪柝聲的屬靈後代，另有幾百萬基督徒因倪柝聲對全球基督教的貢獻（他是第一位對西方基督徒具有影響力的中國基督徒），和他對全球屬靈文化的貢獻為榮。遺憾的是，倪柝聲的著作在中國遭正式查禁；與此同時，其價值却為新一代的西方基督徒重新發掘。我希望有朝一日，倪柝聲的著作能在中國自由地出版發行。

“倪柝聲死後，他的侄女前去領取他的遺物；獄卒交給她一張在他床邊發現的紙條。紙條上所寫的字，可看作是倪柝聲的信仰聲明：‘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

---

補白：中國人民建設銀行重慶分行的方運孚，經與人談論說：“劉少奇是對的。他主張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有什麼錯？”“劉少奇打倒了，但他的這些主張打不倒。”“彭老總的萬言書字字閃金光，他的行為將與日月同光輝，與天地共久長，千秋萬代受人崇拜。”六八年清隊時，公安局曾拒絕銀行革委會報捕方運孚的要求。一打三反中，公安局為配合運動，改變立場，將他收捕。起初擬判十五年，報到市公安局軍管會，加至二十年，送重慶市革委會審批，改成無期，四川省革委會終審改成死刑。本來犯人有十天上訴期，可是十天還沒到，

方運孚就被拉去槍殺了。時爲一九七〇年三月。

---

## 倪柝聲的絕筆 頌 恩

倪柝聲牧師與王明道先生、楊紹唐牧師和宋尚節博士同屬對近代中國教會影響深遠的人。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爲大陸弟兄姊妹預備的一爐煉金的火。倪師母張品惠姊妹是我姨婆，畢業于燕京大學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師的賢內助。公公倪柝聲牧師入獄後，她也曾一度入獄受審，出來後仍一直受監視，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到許多非人折辱。婆婆身體很不好，有非常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但自始至終她一直堅定仰望主，“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無聲”。

1966 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紅衛兵關在一個小房間裏晝夜拷打審問。我們在外面只聽到皮帶一聲聲的抽打，并夾雜謾罵恐嚇聲，却沒有聽見婆婆一聲言語。過了許久，婆婆被押出來，眼睛被打得腫得像青饅頭，身上也多處傷痕。那期間，她的眼鏡被打碎幾副，多次被揪鬥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兩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舉雙手，手上套著鞋子，頭上戴著紙做的尖頂帽子，項上挂著牌子，被責罵、凌辱，站立數小時之久。紅衛兵要她們放棄信仰不再信耶穌，但幾個鐘頭下來，她們三位都一聲不吭。紅衛兵怒不可遏，分別喝問她們：“你們到底還信不信你們的耶穌？”她們個個都堅決說：“信。”紅衛兵氣極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們的身上頭上，說：“帶著你花崗岩的腦袋見上帝去吧！”

感謝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與她們同在，賜力量堅固她們。事後當她們談到這次遭受的逼迫，老覺得很喜樂，因爲她們算是配爲主的名受辱。

紅衛兵把家中所有的《聖經》、讚美詩都抄走了，但婆婆還是千方百計藏下幾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牆，發現屋檐下有兩本《聖經》，婆婆又被定罪一次。我信主之後，一次偶然在大廚櫃後面發現一本小《聖經》，真是歡喜萬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沒有《聖經》的年代裏，這本小小的《聖經》對我實在太珍貴了。每天早晚兩次，婆婆被勒令打掃弄堂。當時她雖在獄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監內的犯人更甚。任何過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隨意過去打她、唾她，因爲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鬥爭她的大會結束後，婆婆對我說：“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聖經》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總是在批鬥她的臺上一直默默祈禱，始終靠主站立，沒有羞辱主的名。

1970 年當我被送去農村插隊落戶時，婆婆每天都爲我祈禱。臨別上海前，婆婆流著淚對我說：“主耶穌是我們最寶貴的救主，你無論如何總要牢牢跟著主。”在插隊期間，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帶領和極大的恩典。我想這一定與婆婆的代禱分不開的。

公公倪柝聲牧師 1952 年被捕前，有機會爲教會的事宜去香港。當時許多人都勸公公不要再回大陸，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回大陸去，與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來後不久即被逮捕，關進上海提藍橋監獄。1967 年，15 年刑期滿了，政府要他公開聲明放棄信仰，因爲他們對外已經公開造謠說倪柝聲放棄信仰了。但這個考驗對他又算得了什麼？主對他實在太寶貴了！爲了對主忠誠，他再一次放棄人間的自由，在獄中 15 年之後，甘心爲主作囚徒。這一次公開表態引來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關在兩位流氓刑事犯當中。流氓的任務就是逼他放棄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 年 11 月婆婆中風去世。自發病至去世，僅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發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別人，也免得自己長時間受苦。感謝主，聽了她的禱告，成就了她的心願，在醫院裏十分平安、全無痛苦地被主接去。婆婆去世後，我們不敢馬上告訴公公，因爲知道他的心臟很衰弱，恐怕一下難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擊。過了一個多月，才斷斷續續寫信告訴

他。婆婆的去世使他萬分痛心，事後同房間的難友告訴我們：公公一直有一個心願，想早點結束刑期出來與婆婆團聚。他知道婆婆身體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還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爲我受了許許多多苦”。

入獄前，公公爲教會的事奉一直奔走於全國各地，入獄後一下又是 20 年，他們夫婦倆在一起的日子實在屈指可數。公公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惡名，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對他最瞭解，她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公公爲主承受了許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 年 6 月，我們接到農場的通知，說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趕去農場，但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們已將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難友告訴我們：公公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他們將他放在一台拖拉機上拖到 40 裏外的農場醫院。這 40 裏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機載著顛簸，就是身體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況是最忌震動的心臟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臨離去前，他留下一張紙在枕頭下面，那是用非常顫抖的手寫下的幾行大字，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經歷，來證明這個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基督是神的兒子，爲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倪柝聲。”當農場幹部將這張紙給我們看時，我禱告主讓我快速將它背下來記在心裏。

公公去世了，他至死忠心地帶著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雖然神沒有成就他最後的心願——能活著出來與他的妻子團聚，但主却預備了更好的一——他們團聚在主前。“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却從遠處望見，且喜歡迎接。”

他們去了，如同許多殉道者一樣，他們是神爲他自己的名呼召出來的一班得勝者，是這個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們安息了，但是他們的禱告、他們的果子，却一直在那裏蒙神悅納，起著不息的功效，他們的腳踪也激勵我們更加忠心向著主。

富農歲月 李興濂

我家是村裏的“首富”，有幾間房，幾十畝地，兩輛馬車，農忙時雇用幾個短工，土改時被劃爲富農。這頂富農的帽子，像一塊石頭，壓在我家每個人頭上整整四十年。這是屈辱的四十年，我們只能彎腰低頭，夾著尾巴做人，村裏人見我們像見了瘟神，遠遠地躲開。反右傾、拔白旗、四清、揭階級鬥爭蓋子、批四舊、刮十二級風暴，哪一次運動，我的叔叔們都逃不了被觸及靈魂皮肉的批鬥。不批鬥他們，村裏的鬥爭就無法搞起來。

我的四叔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莊稼活是一把好手，有一次被派到南山坡地扶犁種豆子。種完豆，還剩下一把豆種，四叔本想揣回家，爲得水腫病的四孀熬水喝，又怕村頭人看到，就偷偷把豆種埋在了地頭上。不知是四叔忘了還是由于害怕，這把豆種就被留在了那裏。若干日子後，人們到南山坡地鋤地，發現地頭上長出一叢茂密的豆苗。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四叔當場被揪出來批鬥。有人從廟裏抬出一口鐵鐘，扣在四叔頭上。四叔，戴著五十多斤的鐵鐘，在熱辣辣的太陽底下，在人們的批鬥聲中，倒地死去。家人匆匆把他埋在南山坡，人們說他私吞公家的豆種，罪有應得。

我作爲富農子弟，中學畢業與大學無緣，回家務農。富農在我心中是一種恐懼，一種恥辱，一種罪過。貧下中農的孩子，有的被保送上了大學，有的進城當了工人，有的參軍當了兵，留在村裏的有當隊長、會計、出納、記工員的，有當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的，就是幹活也是看場院、看瓜地、看菜園、趕馬車等輕活，而最髒最累最苦最危險的活兒都是富農和他

們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幹。

二叔修梯田，三九天抬石頭，雪大坡陡，不慎摔倒，石頭砸在脚上，無錢醫治，落下跛足。初春冰雪剛融，架浮橋、打稻埂這些活就落在五叔六叔身上了。刺骨的河水泥水，凍傷了他們腿上曲曲彎彎的靜脈血管兒，潰爛發膿。

那年冬月，我們幾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派到十裏外的河邊修電站。白天在結冰的河裏打樁攔河，不到一小時就凍得渾身發抖，上岸喝一口老白乾，再跳進河裏繼續幹。夜裏挖機坑，在水裏風裏一直幹到深夜。無論如何賣力幹活，我們還是與家庭劃不清界限，還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爲了表示與家庭決裂，五叔的三兒子也參加了對自己父親的批鬥。他幾次揚起手，終不忍出手，專政頭頭說：“你不會打，我教你。”說著朝五叔臉上打去，五叔的臉立即成了血饅頭，他的三兒子也哭昏了過去。其實富農子女與富農分子沒什麼區別，老一輩富農死了，村裏還得鬥下去，鬥的對象就輪到富農子女。

有一次我和貧農青年丁二在牛棚裏出糞，本來出這一圈牛糞是我倆的任務，可那丁二就是不幹，坐在牛欄幹上抽烟。牛圈出得只剩一角了，我要丁二下圈出糞，他不幹，悠蕩著二郎腿說：“今兒個讓你孝敬俺貧下中農，我來教育你，怎麼？不服氣嗎？”說著站起身，用糞叉揚我一臉牛糞。那時我真的忘記自己是富農了，也用糞叉朝他揚糞，不料那糞叉竟把他的手指劃破了。這下我闖了大禍。“地主富農反了，打貧農了！”丁二大叫著。隊長跑過來，不分皂白，當即叫民兵連長把我押送到公社派出所。所長喝斥一頓後，把我送進小號。我被送走後，媽媽送給隊長五十元錢，又給丁二五十元，還給丁二做了兩碗麵條雞蛋湯。要知道那一百元錢是我家唯一的積蓄啊！這還不算完，後來的批鬥中都少不了我這個活靶子。

富農家最愁的不是苦累，而是娶媳婦。七嬸有三個兒子，身子健壯，五官端正。老大快四十歲了，還沒有成親，七嬸愁白了頭髮。那年月，誰願意嫁給富農的兒子當老婆呀！貧下中農家自不必說，就是地主富農家的子女也不願意，這不是從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嗎！沒有媒人說親，七嬸就去求親戚，親戚也無奈，後來總算找到一個腿腳殘疾比兒子大五歲的姑娘成了親。

秋後打穀場上分口糧，是村裏最高興的事，可是富農高興不起來。上風頭的糧飽滿，下風頭的糧乾癟，貧下中農分的是上風頭好糧，富農分的是乾癟糧。春黃不接時，上邊撥下救濟糧，貧下中農分得米麵，富農分得糠皮。

大年三十晚上，富農家不許放鞭炮快樂，有時我站在窗前看貧下中農放鞭炮，無語流淚。春節期間，村裏照例要扭上幾天秧歌。扭秧歌要吹鎖呐，打大鼓，鼓很大，兩人打，四人抬，抬鼓的人歷來都是富農分子。後來富農年歲大了，抬不動了，就由富農子弟來接班。那時有個笑話，一小夥子到外村相親，女方父親是個教師，假裝斯文，問：“小夥子，台甫怎麼稱呼？”小夥子一時蒙了，答：“俺是貧農，不抬鼓，地主富農抬鼓。”幾十斤的大鼓，綁上鼓架，抬在肩上，從這院抬到那院，從這街抬到那街，從這村抬到那村，從早上抬到晚上，從初一抬到十五，一般人是招架不住的，再加上兩個打鼓人咚咚猛敲，震得耳朵嗡嗡直響，一天下來，抬鼓的就癱在炕上了，真是“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階級敵人難受之時”。

---

補白：一九七〇年夏天，南京市分兩批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先在五臺山體育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宣判後將二十四名犯人分別押上十二台卡車，每台押兩名，開赴江東門刑場。每台卡車前方兩側各架一挺機槍，後面是一二十位全副武裝的軍人，兩名犯人挂牌站立，面朝車尾，游街示衆。革委會嚴密組織沿途街道委員會，命群眾在劃定的地段觀看游街。被通知觀看游街的群眾必須出席，且須自帶板凳，端坐街道兩側，等候游街車隊，接受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當局的組織效率奇高，從五臺山體育場到江東門刑場，沿途安排的觀眾有百萬之衆。被槍決的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馬列主義編譯局俄文翻譯



王同竹、南京市第二中學校長王飛等。

---

我做過十世班禪的聯絡官 焦國標

國標按：此文據王唯先生口述整理而成。

1951 年 11 月，我們的部隊到達拉薩。離開昌都向拉薩開拔時，18 軍統戰部長徐冰把我喊去，交給我一個任務，說這裏有兩個箱子，是毛主席送給達賴的禮物。他沒說是什麼禮物。到了拉薩，打開箱子驗收，是一對金燈和八個玉碗，上有“達賴喇嘛先生惠存？毛澤東贈”字樣，日期是 1951 年。我們私底下議論說，達賴才 19 歲，毛主席還稱他先生，覺得滑稽。玉碗是唐朝的，金燈北京現做的。後來由張經武代表毛澤東把禮物轉交給了達賴喇嘛。張經武原是毛辦主任，他是經香港、印度到的拉薩，不是隨軍進的藏。

不久，我被調到西藏軍區幹部學校第一期學習。當時軍區的幹部說，這個學校是我們的幹部倉庫，從這裏出來的人以後都要有重大的任務擔當。那一期有 30 多人，我的語文、繪畫都是第一名。他們有意把我定為十世班禪的秘書。

1952 年初，班禪從西寧塔爾寺回到拉薩。班禪與達賴歷來有矛盾。大體說，班禪親漢，達賴親英。班禪有 5 個團（兵力），達賴有 12 個團，班禪是被達賴趕到塔爾寺的。共產黨之所以把十世班禪接回拉薩，表面上是希望他們和解，實際是想讓他們互相牽制。

隨後，班禪在解放軍護送下，從拉薩前往日喀則。為提高班禪的地位，北京方面給班禪撥了 20 萬塊袁大頭（銀元），用 4 匹騾子馱著。從拉薩到日喀則的路上，許多藏民聞訊都來朝拜班禪，每個來給班禪磕頭的藏民都賞一個袁大頭。母親背著孩子給班禪磕頭的，就給兩個袁大頭。

到了日喀則，我被正式任命為班禪的聯絡秘書，那時我 20 歲。還有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叫郝家駒，他不懂藏語。班禪那邊有事找（中共）中央，我們就負責傳達給（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那邊有什麼指示，我們就負責傳達給班禪。

我住的樓和班禪所住的樓之間有 50 米的距離。兩個樓一樣高。班禪起床後通常要在樓上曬太陽，我們彼此還能打招呼。那時我們稱他們是達賴集團或班禪集團。班禪集團的官員平常沒什麼工作，上班就是玩麻將。在清朝，班禪屬于一品大員，等級很森嚴。我們日常接觸到的只是他的五品官。比如看藏戲，就是五品官陪我們看。藏人看戲有個規矩，官越高坐的越高，從上往下看戲。我們也算是 5 品官的待遇。有一次我給在北京的母親匯六十塊錢（銀元），北京郵政方面不相信，追蹤到西藏瞭解這幾十塊錢的根底。

我在日喀則待了近兩年，從 1952 年 2 月到 1953 年底。藏人叫我們“甲密”，就是漢人的意思。在此期間，雖然幾乎每天都能在樓上見到班禪，正式的會見却只有一次。那次見班禪是由于慶祝解放軍建軍 35 周年。他們藏人都給班禪磕頭，我們穿著軍裝，敬個禮就算了。

在做班禪的聯絡秘書期間也參與處理過一些危機事件。班禪警衛團裏的西藏兵，脖子裏都帶著一種銀制的配飾，藏語叫嘎烏，裏面放著班禪的像。他們說佩帶嘎烏就可以刀槍不入。解放軍的一個警衛營長就說根本不可能，這都是騙人的，如果不信就試試。于是這個營長就把一幅嘎烏挂在一隻羊的脖子上，然後一槍打去，羊當然被打死。“怎麼樣？沒有刀槍不入吧？”藏人當然非常反感，說這簡直是褻瀆神靈，我們這嘎烏是人帶的，怎麼能戴在羊身上呢？

我和郝家駒聽了他們的控訴，就向上面報告。上面來指示，要我們當著藏人的面宣布處分那個營長，留職察看。當然是做做樣子，背後調到其他部門完事。類似的事情還有。鷹在

西藏是神鳥，不能打。一個營長舉槍打下來一隻鷹，他們就開控訴會，最後也是把這個營長調走了。此外我還親自參加過他們的天葬儀式。

我和郝家駒實際上是受公安部派遣的，但是在那裏不允許這樣講。我們的任務是要在那裏廣交朋友，做聯絡工作。藏人對我們都很客氣，看戲的時候每隔三五分鐘就會送點心過來，說是班禪賞賜的。我們當然吃不了那麼多，看完戲就打包帶著給我們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派來伺候我們的藏人。他們非常感謝，因為這是他們的班禪老佛爺送的點心。

每天清早一起床，他們就送來滿滿一大杯煮開的牛奶，還經常送點心、巧克力給我們。他們上層人士想吃什麼都有，糕點師都是從外國請的。他們很有錢，除了當地的稅收，北京也撥款給他們，下層藏民自己捨不得吃，可是很捨得給他們上供。

1953 年底，西藏公安處要我離開日喀則，到白狼宗（宗就是縣的意思）去做潛伏工作。說要在那裏潛伏 30 年，每 3 年可以晉升 1 級。白狼宗在西藏與尼泊爾、印度的交界處，當時還未“解放”，騎馬有 1 天的路程。為掩人耳目，上面指使我故意跟人打架鬥毆，然後就開大會公開宣布我因打架鬥毆開除軍籍。當時共產黨在日喀則有一個貿易公司，貨物都從那裏運送。上面起初準備派我和胡景福二人一起到白狼宗“做生意”，賠了算共產黨的，主要目的是瞭解當地的情況，看有什麼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胡景福曾是新四軍，1942 年被國民黨俘虜過。這一點共產黨一直不放心，懷疑他是被國民黨派來的。

後來公安處又說不派胡景福了，就派我一個人去。我拒絕了。我說一個人到那完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連個照應的也沒有。處長就給我出主意，讓我就地找一個藏族女人結婚，既可以做幫手，又可以更深的打入。那我哪幹呀！當時我是有女朋友的，也算是青梅竹馬，我們經常有書信來往，感情很不錯的。想找一個藏族女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那時藏族女人臉也不洗，思想上根本無法接受。

最後我與處長鬧翻了，實在難以從命，就給西藏工委社會部部長王華寫了一封信反映情況。進軍拉薩我得雪盲症的時候睜不開眼，王華就把他的馬讓給了我。王部長接到我的信，立即發了一個調令，把我調回拉薩。就這樣，我結束了在日喀則為十世班禪做聯絡秘書的工作。

白狼宗這個潛伏點很重要，怕我無意間洩露出去這個機密，就索性在拉薩也不要再待了，把我從拉薩調回了重慶，在西南公安部的西南幹部學校任職。這時已是 1954 年。

在西南幹校，我和吳瑞珍住在一個房間。彼此熟悉之後，我們各自講了自己的很多事情，其中包括他原先從解放軍裏當逃兵的經歷。吳的叔叔是西南公安部的一位首長，名叫周興（他參加革命後起的化名）。不久，這位叔叔又把侄兒從幹校調到西南公安部。吳走的時候跟我說：“小王，還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啊。”

1957 年反右時間，我說共產黨也同樣搞裙帶關係，比如周興安插提拔歷史上有問題的侄子。我們學校的領導是周興的鐵杆兒，他們先是說我散布流言蜚語，後來又說是惡毒攻擊中央首長——此時周興已經上調到北京公安部任第七副部長。這個結論我不能接受。他們讓我服個軟認個錯，就算了，我不幹。我說道明明是事實嘛，我認什麼錯！最後他們說我態度惡劣，把我關進監裏，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時是 1958 年 6 月。

由于我一貫不認罪，再加上肅反期間有人告密，把我當初想扔手榴彈的事也抖露了出來，於是 1959 年 3 月 2 號宣布逮捕，罪名是組織逃跑集團罪，判刑 5 年。服刑地是四川鹽津縣。我們 4 中隊負責修建鹽津火車站，白天服苦役，晚上認罪學習，最主要的問題是吃不飽。

1959 年 7 月份，我組織 3 個人越獄逃跑成功。那天夜裏，狂風暴雨，雷鳴電閃。我們的那個廁所是平房，趁著大雷雨，我們掀開房頂逃了。當時玉米已熟，可是沒人收，正在大煉鋼鐵，玉米都爛在地裏，逃出去倒是餓不著了。初逃出獄，我們趴在附近的玉米地裏一動

不動，看著人們從四面八方打著松明火把追我們。天亮後我們才走出玉米地。我用肥皂刻了一個章，寫個假證明，說我們是鐵道部門出來采購的。後來我們其中一個逃友偷南瓜時被抓，忍不住酷刑拷打，把我們供了出來。另一個不久也被抓，供出了我的逃亡路綫。我扒卡車逃到自貢，想到那裏一個朋友家取衣服，再借點錢，然後到西藏去。剛到朋友家門口就被埋伏在那裏的人抓住了。這樣又給我加了 4 年刑，加起來就是 9 年，在昭通勞改科服刑。

勞改科有一個叫竇岐山的，是西南設計院的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兼總工程師，後被打成右派。他不服氣，判了 9 年。一般犯人是到不了勞改科的，我也是因為給班禪當過秘書才被調到那裏。那個時候全軍區到處都是勞改隊，一個勞改科科長比一個軍長管的人還多。當時其他地方都吃不飽，只有勞改科可以吃飽。勞改科科長陳景昌是長征過的老紅軍，陳景昌跟一個豆腐廠簽有協議：豆腐廠的機器、汽車什麼的出了故障由勞改科修理，不用付錢。作為交換條件，豆腐廠每天賣 100 公斤豆渣給勞改科。勞改科把豆渣和玉米麵混合起來給我們吃，我們就能吃飽了。勞改科大概有 300 多人，剛到勞改科的人個個都皮包骨，一兩個月後就都吃得白白胖胖的了。陳景昌當時真是救了很多。文革時陳景昌被判 6 年刑，罪名是同情犯人，後來被活活折磨死。他的豆腐渣和玉米麵不知救了多少人！那真是個好人！我們這些犯人出獄後都去給他掃過墓。

我仍然不服罪，1962 年他們就把我調到了羅漢壩，說不把王唯調到羅漢壩就不知道勞改科是天堂。他們本來是想好好餓餓我，不料我命不該絕。羅漢壩因羅漢竹得名。每 60 年開一次花的羅漢竹，我到羅漢壩那一年開花了。開花之後結果，結的果實叫竹米。我到羅漢壩的時候正趕上竹米成熟。生竹米也可以吃，非常好吃。羅漢壩是高寒地區，連玉米都不長，只能生長土豆。我們利用出去割草的機會大量采收竹米，就這樣讀過了那個饑荒時期。

1962 年這一年我還遇到一個好人，是個女右派。這個女右派的工作是每天放牧 9 匹馬。按規定，每匹馬每天有 3 斤豌豆料。她每天放馬時就用報紙包一包豌豆，順路扔給我。當時我的工作是在地裏割草。他扔給我的豌豆是煮過的，還加了鹽，非常香。就這樣，我暗中吃了 3 個月的鹽水煮豌豆。他們都覺得奇怪，說他們都餓得皮包骨，怎麼王唯却啥事沒有。後來我尋找過那個女右派的下落，沒有打聽到關於她的任何消息。

羅漢壩勞改農場有個水牢。並不是建就的水牢，它原先是一座普通的房子，因地基低窪，下雨積水成了“水屋”。有些沒人性的東西就想出這個法子，把死硬頑固的犯人關進去。關進去就等于殺害，也不給吃的，進去就甯想活著出來了。

我受罪最大的地方是魯甸硫磺廠（勞改廠）。一早就被趕到洞裏采石頭，天黑才放回來，整天光著腳踩在礦坑中的水裏。我 26 歲當右派，這時已經 32 歲了。我的身體一向是很棒的，有一天忽然拉肚子了。我去看醫生，醫生問我是什麼罪犯，我說我就是你們所謂的反革命犯。他說，你反革命犯的假我不批。我很生氣，第二天沒有出工。他們說我是違抗改造，要給我戴刑具。

那手銬太小，帶不上硬戴，最後是用鐵錘砸上的串釘。那個勞改中隊的隊長叫陳維芳，是個彝族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做了狗比一般人更惡。帶了 1 周，我開始全身浮腫。一個右派醫生把這個嚴重情況彙報了上去，說王唯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再不給他打開銬子要鬧出人命，到時候我會如實彙報的。當初是用鐵錘砸上的，撬開也是用鐵錘撬開了。那 7 天我幾乎疼得沒合眼，手銬一撬開我立刻睡著了。一睡睡了 3 天 3 夜。我現在手腕上的疤痕就是這次留下的。

沒過多久，法院來了個文件，由 9 年改判為 4 年，可是此時我已經坐滿 5 年了。刑滿了，但仍不放人，怕放虎歸山，強迫“留隊”，在那裏繼續給他們幹活。據說這也是毛澤東的發明。與原先不同的是給發點兒工資了，每月 29 元。留隊實際是變相勞改。從 1963 年起，直到 1979 年，我沒有離開過勞改隊。

有一種人是有人性的，有一種人只有獸性。文革期間，因說江青不是毛的原配夫人，我

被以“污蔑江青同志”的罪名關在會澤縣五星鉛鋅礦（勞改廠）。在那裏，我被單獨關在一個長2米、寬2米、高2米多的一個石頭盒子裏，時間長達4年。頭頂有一個拳頭大的透光孔，陰天裏面什麼也看不見。石盒子裏放一隻馬桶，沒有蓋子，一周才倒一次。一個月出來放一次風。南非的曼德拉坐了27年的牢，我願意用我的這4年換曼德拉的27年。

出了這個石盒子之後，我又被抓了，判刑7年。什麼罪名呢？我說：毛不在之後右派是要平反的。毛比我大40歲，我就不信比不過他，我要跟毛做生命競賽。就因為這句話，把我定為最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判了7年。

滿7年後，四人幫也被粉碎了。全國到處都在平反，可是遲遲不見對我的平反。我3次進京上訪，也不見結果。最後最高法院寫信給雲南高院，雲南高院又寫信給曲靖中院，讓我平反。可是曲靖中院根本沒有我的檔案，又到五星礦找我的檔案和判決書，仍然沒有。中院沒有判決書正本，五星礦也沒有，可是我手裏却有一個判決書副本。我說你們沒有正本，那我手裏的副本是從哪里來的？他們說不知道。我的副本判決書上寫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曲靖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日期是1968年12月28日，可是判決書編號却是1969年軍管行字第68號。這等於說1968年就把1969年的判決書發下來了。他們就說，沒你的檔案怎麼給你平反。最後是把我的判決書拿去作為一個依據，發了一個文，撤銷編號是1969年軍管行字第68號的文件，稱所有言論不構成犯罪。這就算是給我平反了。

？

補白：党治國原是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的學生，被打成右派，在銅川煤礦勞動教養。雖在勞改，却不忘宣傳馬列主義，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輔導煤礦工人學習《共產黨宣言》，結果被控犯了現行反革命罪，銅川市法院判他死刑，上報陝西省待複處決。省法院按指標行事，此次計劃槍斃四名，各地報審死刑犯七名，党治國排第五，活了下來。十多年後，黨出獄，回母校領取了遲到近三十年的清華大學水利系的畢業證。排名前四的現行反革命，雖然也被當局承認是冤殺而平反，却白白成了殺人指標的犧牲品。

---

引詩賈禍 滬 生

柳某從一所工藝美術中專畢業後，被分到市美術工藝廠設計室，創作了不少得獎作品。文革後，美術工藝廠被認定是藏污納垢的地方，紅衛兵幾度沖進去，把陳列室內布展的封資修的美術工藝作品砸燒毀壞殆盡。設計人員大都被挂牌游街，柳也被戴上反動學術權威的牌子，每天洗廁所。負責監督改造柳某的革命群眾，是食堂一個負責洗菜、切菜、打菜的女工，三十出頭，細皮嫩肉，長得有幾分姿色，背地裏人稱蔡文姬。

日子一天天過去。監督與被監督的兩個男女日久生情，關係有點微妙起來。蔡文姬的丈夫，三代貧農，文革時揭竿而起，當上造反派“全無敵戰鬥隊”的頭頭，因肩負“把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全世界”的革命重任，經常是三五天不回家。即便回家，夫妻間也少有昔日的激情，現在讓蔡文姬整天看著這個別樣風流倜儻的人物，心生愛意也是情理中的事。柳某的妻子呢，自丈夫被隔離審查後，帶著孩子回鄉下娘家住了。乾柴遇烈火，燃燒是遲早的事，一次值夜班時，兩人跨過了“階級”鴻溝，實現了兩人唯一的一次最為親密的接觸。這事本來是你情我願，你知我知，可偏偏弄得滿城風雨，并引發一件現行反革命案。

原來這蔡文姬人是長得有模有樣，可腦子有點灌水。一次與“革命豪情萬丈高”的丈夫做完那事後，順口說了句千不該萬不該說的話：“你做得沒柳工做得痛快。”第二天丈夫帶著一批革命群眾，沖進廠裏，揪著柳某先一頓猛揍，然後以勾引腐蝕革命群眾為由，要求廠革委會嚴懲柳某。廠革委會迫于壓力，把柳關在一個小房間裏，勒令他坦白交待犯罪事實，

深挖其犯罪的思想、社會、歷史根源。說也巧，這房間正是他讓蔡文姬苟合之地。

犯罪事實好寫，可挖的這根源那根源總是一次次被斥責寫得不深刻，退回重寫。一天，他又對著一堆白紙發愣，百無聊賴中開始藝癢，思想也開起小差，在紙上寫寫畫畫起來。此時此刻，柳某腦子裏竟閃回起當初與蔡文姬在一起的情形，心到手到，一會功夫，竟鬼使神差地勾畫出一幅蔡文姬的裸體畫。好畫要配好詩，正苦百思不得佳句，却突然想到現成的兩句詩，於是飛快地題寫在畫紙上：“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題完，他很得意地拿著這張詩配畫左看右看，陶然自醉，全然忘記了自己所處的境地。

門突然被推開。柳某被以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七年。前些年，我在一次美展上看到有他署名的一幅人物工筆畫。畫面上的徐娘半老，雖兩鬢染霜，但從那雙撲朔迷離的眼神與五官勻稱的臉龐上，依稀可見她曾經的卓爾不群。我不敢說那就是他當年的蔡文姬，但一定有她的影子，因為她是他生命旅程中一個無法忘記的人。

補白：1969 年我參加學工勞動，到天津國棉三廠筒搖車間當義務童工。我們中學生做半個工人的工作，沒有工資，可是每天下班後可以像工人一樣在澡堂子洗個熱水澡。每個人每天的產量都在車間公布，每天產量最高的是一位姓安的女工。這位女工四十多歲，是我家最早的鄰居，人長得特別文靜。她是戴帽反革命，是接受監督改造的人員，車間裏的人都不與她說話。她是個基督教徒，1949 年以前加入過基督教青年會。清理階級隊伍查檔案時把她揪了出來，說她參加反動會道門，定為反革命，被押上批鬥台。那時廠革委員會給每個有問題的人都做個牌子，一米高，六七十厘米寬，有木柄，刷上白油漆，用黑油漆寫上罪名，下邊寫上每個人的名字，再用紅漆在名字上打一個大叉。那些地富反壞右每天上下班要舉著牌子，若有不從，就是對抗運動，要關進牛棚。這位安姓女工，上白班時一路上舉著牌子，上夜班時走在路上把牌子提在手裏，一進廠就把牌子高高舉起。

-----

岳父岳母 張允若

岳父王德霖，浙江鎮海人，生于 1909 年，幼年喪父，14 歲隻身到上海當學徒。滿師後做了 20 多年店員，積了點錢，開個小店（華德文具儀器店），維持全家生計。岳父早年就信了基督教，一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為人正直，痛恨國民黨腐敗，盼望新政權能帶來一個光明公正的社會。上海解放後，岳父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滿懷熱情地參加中共領導的各項政治活動，先後被推舉為蓬萊區文具儀器同業公會主任、蓬萊區工商聯執行委員、上海市文具儀器同業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委員，還被任命為區勞資調解委員、稅務及經濟委員等，為落實政府的各項政策，密切政府同工商界的聯繫，做了不少工作。

1955 年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前夕，蓬萊區文具儀器行業共有 29 戶從業者，都是夫妻老婆店。岳父召集大小會議數十次，做了大量說服動員工作，終於把這些小店合并為 6 家，1956 年初順利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1957 年反右，同業人員推舉他牽頭，聯名寫信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業內情況，9 月被上級口頭宣布為右派。1958 年 9 月，在參加區工商聯會議時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兩個月後判處 15 年徒刑，送青海勞動改造。15 年徒刑，其實就是無期徒刑。15 年，5500 個日夜，完全與世隔絕，見不到親人，回不了家，好不容易熬過了 15 年，還要被迫“自願留場就業”，繼續流放。15 年刑滿後，岳父曾獲准回一次上海，見到了鬢髮已白的老伴和長大成人的兒女。假期未滿，農場就來電催促，不得不匆匆返回。

“五十歲進去，七十一歲出來。”勞改和留場就業加起來整整 20 個年頭。這是無比慘

烈的 20 年，也是岳父頑強謀求生存的 20 年，儘管落得一身病痛，總算沒有早早去見上帝。岳父有自己的信仰，即便在極其困苦的情況下，他仍然感到上帝在他身邊，心裏默默禱告，祈求上帝保佑，讓黑暗和苦難消退，讓光明和平安到來。這種信仰使他比別人有更強的意志去忍受苦難，有更多的信心去等待明天。他在回望過去時總是說，自己能够活著回來，全靠神的恩典。我們不能不驚嘆這種真誠、純正的信仰，給人帶來的可貴而又巨大的力量。

岳母張主召，浙江奉化人，生于 1916 年。她勤勞善良，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也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一輩子含辛茹苦，協助岳父操持家務，養育了兩子四女。1937 年八一三淞滬戰發，她懷著七八個月的身孕，逃回老家。兩個月後誕生一個新生命，這便是她的大女兒，我的妻子。

岳父被捕，對岳母來說真好像遭遇天塌一樣，不知道今後這個家該怎樣生活下去。當時全家 8 口，上有老，下有小，年紀最大的是 80 多歲經常生病的老祖母，最小的是還沒有上學的 7 歲的小女兒。岳母變賣了部分傢具衣物，還天天幫臨近人家帶小孩、洗衣服、倒馬桶，從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總算沒讓這個不幸的家庭坍塌下來。全家人也都能同心協力，共度難關。二女兒在南京一家工廠當工人，大女兒剛從大學畢業，她們每月三十幾塊錢的工資，除了留下十幾塊伙食費外，其餘全部寄到了家裏。

1979 年，岳父的冤案獲得了平反，但是遺留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當初岳父被整，家裏的三居室有一間被整人的人占了，後又轉手給他人。這個被占的房間始終沒有歸還。22 年被扣發的工資分文未有償還。單位和法院領導在平反時說，勞改時間算工齡，目前國家還比較困難，等國家經濟好轉了，工資一定會補齊。完全是欺騙。二十多年裏全家曾蒙受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沒有一個說法。岳父平反時，小女兒還待業在家，我們要求按當時通行的做法給予“頂替”，也未得同意。

幾十年的折磨和煎熬，極大地傷害了岳父岳母的身體。由于行動不便，無人去醫院護理，岳父只好采用家庭病床方式治療。打針吃藥，動不動就是幾百幾千元。儘管這都是勞保範圍內的費用，可是單位規定每年只能報銷 1500 元。這個數額只够看一二次門診。所以只好東借西湊自籌醫藥費，籌不到錢時就停止治療。面對無錢治病的嚴重局面，岳父不得不把目光轉向政府，當年不是說“等國家經濟好轉了，工資一定會補給你”嗎？現在國家經濟已經好轉，老人希望政府兌現諾言，至少也該對受盡傷害的耄耋老人有所關照，于是決定向人民政府求援。1997 年，岳父特地委托我寫了個申訴報告，請政府對劫後餘生的九旬老人作一點“人性關懷”。我們認真真地口述筆錄、撰寫打印，恭恭敬敬地寄給應該為人民辦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誰知竟石沉大海，杳無音信，直至老人辭世也沒見到一字回音。

1999 年 1 月，岳父病重不起，溘然長逝。對他來說，從此徹底擺脫了人間苦難，來到了日思夜想的上帝的身邊，來到了充滿陽光和愛的天國。我的岳母當時正靜靜地躺在養老院裏，聽候上帝的召喚，她對老伴的離去已經木然無知。這種無意識狀態又維持了多年，2006 年 5 月終於追隨岳父，離我們而去。每當我想起他們晚年的淒涼，想起他們一生的困苦和不幸，心頭總是難以平靜。我只能默默地想念著他們，為他們祈禱，為他們祝願。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多麼盼望真有這麼一個充滿陽光和愛的天國存在，多麼希望我和他們能在這樣一個平等、自由、幸福的世界裏重新相見。我們要努力記下他們經歷的種種苦難，揭示其根源和教訓，引導我們的後人，同億萬受壓迫的民衆一起，為消除苦難的制度根源，為在人間實現民主自由公平正義，不懈努力。

1960年，蔣介石叫嚷反攻大陸，局勢頓現緊張。有一天夜裏，星子縣教育局領導向全校（星子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師生傳達中央文件，我父親與母親都被禁與會，父親叫我去偷聽傳達。我隱隱感到，我們的家庭出身不好，是共產黨不信任的人物。

那時學校時常要學生填表，需填家庭成份，父親說要填地主成分。這使我小時候心靈蒙有羞于出口的恥辱，從此，家庭成分就象黑鍋背在我身上。從父母那裏得知，我老家益溪舍曾有十六畝土地，土改初劃的是中農，土改復查時改為地主，遂牽連二代人。後來聽我初中數學老師說，她家在蓼花鄉，僅五畝地也劃為地主。

父親1945年8月畢業于國立十三中，1946年下半年至次年上半年在星子中學教書，曾報考中央大學，未考上，便由安徽軍醫院院長、姑父劉孟郡介紹，到國防部聯勤總部84醫院（今樟樹市內）當了半年政工幹事。做這半年事，為自己一生留下了歷史污點。

1965年，我升入星子縣中初中部，父親在縣供銷社作主辦會計。有一次父親說：我們的子女再會讀書，將來也上不了大學，你以後就跟我學做會計。我嗯了一聲，心却想，一輩子在星子做會計多乏味。我將來要讀大學，到外面做事，把父母接外地享福。

文革伊始，我母親被揪鬥，戴了漏劃地主的帽子。說是解放前幾年，父親在外，母親嫁到胡家，雖有祖母在，但患偏癱，一定是母親當家，應戴地主帽子。我全家一度被趕出門，讓人挖地三尺，唯恐埋了變天賬，哥哥被反剪著手吊起來。一天晚上，父母將家藏的祖父瓷象等文物全拋到醫院南面的水塘裏。

父親也作為“漏劃歷史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戴上了國民黨軍官的帽子和用鐵絲繞成的眼鏡圈游街。次日，父親跪在批鬥臺上，被人打得眼青鼻肝。家被反復抄過，一天半夜，縣供銷社徐賢達帶了一班戰鬥隊來我家，把磚砌的灶台也翻了，看看有無罪證發現。滑稽的是，第二天，這位革命者也被揪出批鬥。

當時父親在縣西山氣象站一帶種了菜園，都是他在一排排墳墓之間開墾出來的，種得最多的是棉花，因為棉花收購價較高，比較合算。夏日，我們常頂著強烈的太陽光去摘棉花，早晚挑糞澆水。有一次，父親用小玻璃瓶裝了九十元錢，帶我去埋在棉花地，並作了記號，後來差點刨不到，到處挖，才找出來，又埋到墳墓旁邊一棵樹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家反復被抄，怕這點賣棉花的錢也被抄去，埋到野外才放心一些。

我對打打殺殺的文攻武衛不感興趣，就退避三舍作逍遙派。父親為我找來字帖，一本是楷書柳體，一本是草書《千字文》，買來毛筆，要我在家學寫毛筆字。那時羊毫筆很便宜，但好的少，狼毫筆大號、中號貴，小號還算便宜，于是我用羊毫寫大字，用狼毫寫小字。父親的書法很好，在縣城公認排名第三。我初寫時，整個字的結構總向右上方傾斜。有一次父親下班回來，見狀勃然大怒，一巴掌打過來，我頓時眼冒金星，我從此臨摹再不敢苟且。有時父親帶我去他單位，為造反派抄寫大字報。有時父親為母親寫申冤書，要我代為抄寫。

我曾與一同學在縣工會圖書室偷了一批圖書，有小說、散文集，均是解放後出版的書籍。父親發現後，又一批批將其賣給廢品收購門市部。他擔心抄家時被發現，給家裏帶來禍害。他還覺得，對我們而言，讀書再也沒什麼用了。多年以後，我在型砂廠勞動，他勸我不要光看古人的書，要學一些社論文章，說這些東西還有些用，古人的書，讀了沒用。

父親生性高傲，善于講談辯論，但脾氣急躁。歷經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父親變得幾近驚弓之鳥，在外特別謹小慎微，從不多言，所以一直沒有把柄被人抓住。只有一次，當時被管制的舅父徐奠盤從關押中逃出，先到星子，父母留他一晚，被人告發，反復作檢討才過關。文革期間，一有風吹草動，父親就預言對他會有什麼動作。有的預言是對的，有的是過

于著急，有時是近于鑽牛角尖。

我下放在隘口公社大鹿灣作知識青年時，常參加大隊舉行的批鬥地富反壞分子大會。批鬥之後，便有人高呼“地主富農子女滾出去”。我內心打鼓，是否自己也要走出批鬥會場，幸好另有一下放幹部，他家裏也是富農成分，他不走，我也不出去。

我們知青點有個知青，本是造反派參軍，後被開除回來，其父作為漏劃的工商業兼地主在城裏挨鬥，他却在鄉下打地主富家以表現自己進步。我對此很不理解，這種事我做不來。當時一個生產隊長，見我勞動賣勁，人又誠實，說要讓我做赤腳醫生，後來有人到縣裏，得知我父母均為三查對象，只好作罷。星子縣城東有一座梯雲塔，當時縣革委會指揮一批三查對象，腰綁一條繩帶，爬上塔，硬是將七層寶塔一層層折毀。塔上的厚磚是以糯米摻石灰粘合的，非常堅硬，竟被鏟開，廢物利用，用其磚塊建成縣劇院，當時是作農業學大寨展覽館用。星子縣是江西省兩個“大寨縣”之一。

1971年，我上調到石粉廠，其時父親已解放，被安排在食雜品公司商店當營業員。我學了點兒廣告宣傳畫的畫法，父親要我為商店大櫥窗畫廣告，有四特酒、李渡高粱酒等圖案，配以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不久，哥哥也上調到九江搬運公司。父親開始為我們的婚事著急，當時有工作的女性，難得瞧上我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記得父親曾到鄉下為哥哥找過一袁姓女子，未談成。

清理階級隊伍時，父親戰戰兢兢挨過一年，1972年4月被供銷部門開除公職，遣送原籍都昌蘇山益溪舍勞動，不戴帽子，以工分自養。沒有了工資來源，他傷心慟絕，計劃把兩個弟弟也帶回老家種田，但母親不同意，說一旦下去，再想上來就困難了。這年春天，大板車將幾件舊傢具載到船碼頭，一隻小帆船，載著父親與送行的供銷社副食品公司黃主任與我三人，在波浪間顛簸而行。到了都昌蘇山公社馬鞍山，村裏人安排了一些人幫著把傢具行李挑到益溪舍村，我則乘船返回星子。

父親在鄉下獨自一人勞動，有時看守瓜棚，有時在工地上幫助煮飯。一有機會請假回縣城，他的第一要事就是到縣落實政策辦公室上訪。辦公室主任姓萬，原糧食局的局長。父親每次帶著鄉下的土產萬主任，他都說些模稜兩可的敷衍話，讓人覺得，他在盡力辦，事實上却很難，弄得只好一次次送禮，一次次失望與企待。其實，大環境未改變，萬主任也幫不了什麼忙。

因父親的牽連，我于次年春也被發落到型砂礦勞動，理由是石粉廠產品難銷，不需要那麼多人。我在石粉廠是守紀律、有文化的青年，却被排除出去，不禁放聲哭了一場，醉倒在歡送宴席上。

在型砂礦，我受到最繁重體力勞動的折磨，自卑而情緒低落。為了調到縣城一家新創辦的工藝廠，我在回城休假時，不止一次晚上徘徊在輕工局領導的窗外和縣砂石公司領導的窗外，因為公司領導不同意放我走，說那麼多貧下中家子女不調，怎麼能調地主子女，我真恨不得用一顆手榴彈與那一家子人同歸于盡。文革中，凡出身不好的人，無論多麼渴望求知上進，但周圍環境還是要視他們為異類，受到歧視者，失去前途。我們一家人也不例外，見到共產黨員，往往畏而遠之。我對父親有些埋怨，怪他不為我找人。有一次夜深二點醒來，我發覺父親沒有睡，坐在那裏發呆。從此我理解了父親的難處。我學寫舊體詩，也始於此時。我不懂平仄，父親告訴我，音讀得上去為平聲，讀不上去為仄聲。這兩句話點撥了我。

四人幫倒臺，高考恢復，大姑母鼓勵我報考，父親則半信半疑，不相信有這樣的好政策。當時單位不同意我投考，父親叫我去找縣教育局長胡華桐，臨考時才獲單位批准。但此年落榜。次年再準備，臨考前幾天，父親將他上班的菜市場騰出一角，讓我在那裏復習，其時天氣炎熱，父親用涼水把地面淋濕。那年本科綫340分，我考了350多分。一些人已經拿到本科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的通知書卻沒有任何音信。我急得患了大病，父親打聽到省高招辦設在景德鎮，心急火燎乘班車趕到那裏，找到縣教育局長彭青雲。彭答應幫助錄取到九江師



專，但這不是我的心願。爲了脫離苦難的砂山，雖不樂意，我還是去了。

那年我與妹弟均考出了一定的水平，在縣城傳爲佳話。此事改變了父親的工作，1978年8月被調任星子縣中教書。父親不再被視爲一個普通職工，精神抖擻。校領導讓他挑選教語文還是英語，他選擇教英語，認爲語文誰都可教，而外語可因難見能。隨之而來的是緊張的備課，常常忙到半夜，其時是知識份子揚眉吐氣的年代，儘管艱難，父親內心充實，情緒是愉悅的。

我在九江師專讀書時，有一次被小偷偷去錢財衣物，父親聞訊後，急趕到九江探望。當時他身體不好，我陪他去一家醫院檢查了身體。1981年夏，父親參加了高考命題組，在杭州的命題工作完成後，還到紹興游覽一回，這是他1949年後第一次出省觀光。

1983年底，父親退休了，我勸他寫寫毛筆字，頗養性情，但他未能堅持，而是養雞種菜。一年後，縣長段德虞囑我將父親聘至縣志辦，從事縣志的編纂，負責建置沿革、商業、財政金融等卷的統稿工作。1985年我考上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在省古籍辦工作，計劃寫一篇星子出土宋版書的考據文章。急于看到我出成果的父親，到縣文物站，懇求借出此書，送到南昌讓我複印。但我並不領情，反怪父親不必爲我的事情操勞奔忙。父親于次日返回星子，我心中難過，後悔不該責怪父親。

1990年《星子縣志》出版後不久，父親即患帕金森綜合症，時常叫頭痛，但他意志還是異常堅強的，在病榻上寫了二十多首詩抒懷言志。其《病中》詩雲：“藥到病難除，怕死不丈夫。天數既定矣，何必強留乎？”又有《偶成》：“妻子可憐耳深聾，我癱不動若龍鍾。相看默默各流淚，多情言語却難通。”最能說明他個性的的是《無題》詩：“性嫌阿諛憎奉承，生平惹得路難行。多年革命被限制，四載牛欄見實情。運轉瀛寰人德改，成林子女各能行。眉須斑白陽光暖，惡疾罹身人不驚。”父親堅強地熬到八十三歲。父親一生沒有留下多少物質財富，却留下無比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品德、爲人，將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 成都的土改殺人 鐵 流

土改時，工作組組長就有權力批准逮人或殺人。後來逐步收上去，殺人權力控制在縣上，但工作組仍可抓捕人。他們只需動過嘴，武裝（民兵）就去執行，根本無審訊起訴一說，全是根據事先搞好的材料，布告也是手寫，一批一批押出去斃了就是。把他們從監獄拉出來，對上名字、照片，也不脫衣服，也不賞酒飯，立刻五花大綁，插上標子，甩上刑車（不是押上，因爲一部刑車要裝二十餘人，四周還有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只能人重人地堆放著），即向成都郊外二十裏的迴龍寺磨盤山駛去。到了刑場，從車上把他們甩下來，然後由兩個解放軍提著胳膊，飛快地跑向指定地點。二十人爲一批，犯人齊嶄嶄地跪在地上，一聲哨音預備，二聲哨音瞄準，三聲哨音扣動扳機。被殺的人全打腦袋，子彈均是開花彈，一槍一個，真利索。死者雖屬痛快，但半截腦殼不見了，有的還沒有腦袋了，人變成了一個木樁樁。解放前有人說“共產黨來了要開紅山（大肆殺人）”，誰也不相信，現在親眼看見了！殺第一批時，我執內勤（外勤是當地農會的武裝，現稱民兵），那沒頭沒腦的屍體一大片，白的腦花和紅的血水流成一條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綠草，難聞的血腥味直沖鼻孔，真叫慘不忍睹。

按照共產黨一貫的兩頭小中間大的策略（這個策略適用於一切政治運動中對人的劃分與掌控，比如土改，依靠對像爲25%，團結對像爲55-65%，孤立打擊的爲10-15%，依此類推），土改期間全川殺關管門的人應不少於150萬。1978年我被關押在四川雷馬坪勞改農場唐家中隊，馬湖分場一位姓王的管教在一次講話中指著幾棵彎曲的大樹說：“我們雷馬坪農場先後關押改造了幾十萬人，這幾棵樹子就是吊人吊彎的。”

文革時，滿舅是大隊黨支書。那時過年過節的節目有兩個，一是文藝匯演，一是開鬥爭會。鬥爭會上最常見到的人一個是滿舅，再一個是吳九爹。兩人都在臺上，滿舅是主人，作報告，南腔北調地大罵一通，九爹則是批鬥對象。吳九爹和三五個地富反壞右一起，脖子上挂個“歷史反革命”的大牌子，低頭、勾背、彎膝、縮腳，很窩囊地站在台前聽訓，好像沒思維似的。

那是大隊支書耀武揚威、頤指氣使的年代，但滿舅還確實是個老實人。他在臺上訓斥九爹時，沒有多餘的口舌，多半是：“你這個傢伙，老實一點！站好！”這時的吳九爹則是唯唯諾諾，不敢抬頭，以免引起公憤。

有一天上午，開完鬥爭會，幾個民兵提著槍，把這些反革命押回去，我跟在他們後面看。回到滿舅家那個村時，押解的民兵全去大隊部交槍了，最後只剩下我、滿舅和九爹一起向家走。九爹走在最前，滿舅看起來像是還在押解著他一樣，我走在最後。九爹大概六十來歲，平常走路都是腰板直直的，現在則要做出很可憐的樣子，不敢邁大步。三人一起走著，誰也不說話。快到吳九爹家時，滿舅見沒人了，就說：“九爹，我就不送了啊，對不起你老人家了呵。”聽到滿舅這話，我懵懵懂懂的，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我和滿舅繼續往家走，我問他：“怎麼對不起他呢？”滿舅則說：“你不要到外面講就行了。”

後來我爸調到另一個地方工作。有一天，上小學的弟弟因玩鬧腿骨脫臼，老師心情忐忑地把我叫了去。我弄個擔架，把弟弟抬回家，我媽的第一個反應是：“馬上趕車送到吳九爹那裏去！”

吳九爹治好了我弟弟的脫臼，可是我家連個感謝也沒敢說。我媽心裏對此事一直感到歉疚。

後來我知道了吳九爹歷史反革命的來由。他原是一個鐵路工務段的工長兼地區黨委書記（當然是國民黨的），解放後自然就成了歷史反革命。肅反時，他不在本鄉，沒人知道他的歷史。當時他已是一個單位的工程師，本來肅反也過關了，可是他有文化，在技術刊物上發表了論文，一下子被人盯上，就這樣被遣返原籍。

十幾年後，我想起九爹，向滿舅講起當年鬥爭的殘酷，滿舅倒是顯得很平淡，說：“九爹被遣返回鄉那幾年，他們原單位的人來過好幾次，要把他押回去批鬥，都是我給扳住了。假如讓他們狗日的抓回去，你怕現在還有人啊！”

---

補白：暮色蒼茫，我扛著獵槍在生產隊飼料田四周巡繞。突然，我發現離飼料田不遠的地方，有個黑影在晃動。我頓時熱血沸騰，心想，如果打到獵物，那可是英雄壯舉。我抖擻精神，端著獵槍，步步向前逼去。可是那黑影卻直立起來，原來是一位蒙古族老婦在割草。我格外掃興。那老婦背起草蹣跚而去。為這件極為平常的事情，第二天我在知青點會上做了嚴肅而深刻的自我檢查。那割草的老婦是日本特務阿拉坦的老婆，她傍晚在生產隊的莊稼地邊晃動，肯定不懷好意，而我當時卻沒有面對面與她展開鬥爭，說明我的思想覺悟不高，階級鬥爭的弦繃得不緊。其實那個所謂的日本特務阿拉坦，只不過是偽滿時期在外地上學讀書時學過日語，後來當過一段偽滿職員罷了。文革一起來，這種歷史不清白，又懂得日本鬼子話的人，肯定是日本特務、階級敵人，是專政對象了。在批判會上，知青們對阿拉坦的批鬥很激烈，私下裏有時又很欣賞他的才氣。他說話有些口吃，但蒙古語和漢語的發音很清晰，每句話都有分量和分寸。我們平時既不能親近他，又禁不住想與他交談。 軍 鳳

---

南陽張建功 陳 更

張建功先生是小城南陽的知名人士，張氏也是南陽城的名門望族，城中心十字街以東百步之遙有一座高宅闊第，中堂森森，檐牙高聳，氣派異常，就是張家。張先生的父、祖輩曾連出三位進士，民國廢除科舉，張先生繼承祖上文脉，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研西方法律。

1960 年大饑荒，在南陽市商業局任職的父親，將我從偏僻的鄉野帶到南陽。商業局就設在張家大宅裏，商業局的後院正對著小學，打開後門，可以在鈴聲響時趕往課堂而并不遲到。這些屋宇是張先生繼承的遺產，經其手捐獻給國家，後來做了商業局。

進入文革，父親成爲牛鬼蛇神，我隨父親悲慘的足跡，與這所充滿少年溫馨記憶的大院告別。文革第三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與張先生的女兒張穎在南水北調工地（鄧州市陶岔）相遇。她帶著名門望族的書卷氣，暢朗，智慧，健美，給略感卑微的我以強烈的印象衝擊。我與張穎的友誼保持至今，她增進了我的見識，給困厄中的我以溫暖、勇氣和希望。結交張穎，是我一生的福氣。

我是通過另外途徑認識張先生的長子張顯的。張顯是一位儒者，一位極其忠誠的人。相識相交之後，我與他的友誼過于張穎，也許是因爲我們共有男性的胸襟，就更容易惺惺相惜。

我的父親于文革期間死亡于工作崗位，但一直未按因工死亡處理，這加劇了我的青年時代的艱難。八十年代，在市信訪局工作的張顯，力主公道，在我父離世十三年之後，執意按工喪處理我父的死亡，使窮困的母親略有補益。八十年代後期，我開始在南陽開辦律師事務所，從事法律工作，餘暇收集許多當代民間故事，遂效柳泉先生，撰《聊齋新志》，張顯先生即是故事素材的重要提供者。吾以《鬼嚙》一篇壓卷，此故事即由張顯先生提供。文革結束，高考制度恢復，我得入大學。八十年代初，大學校園新潮激蕩，我因此遭難。當彼之時，張顯是我十分重要的慰藉者，我們聊人生，聊歷史，聊先輩人物，幫我解脫。

至此，張先生應該改稱張伯父了。張伯父生于 1916 年，卒于 1985 年，1934 年進入北大讀法律時，正當東三省淪陷，熱血在青年學子張建功身上振蕩激揚。在中共黨員影響下，他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在國民政府社會部供職期間，張伯父曾以社會賢達身份營救過十幾位遭受逮捕的共產黨員。自 1957 年反右至文革結束，張伯父的身份一直是國民黨殘餘人員、反動學術權威，還是叛徒特務。至 1978 年，叛徒特務之冤案方才真相大白。當此之際，張伯父余壽還有七年，一生襟抱，盡化爲黃昏的雲烟。

---

補白：安徽淮北市書記高心泰等二人，一九六七年被中學紅衛兵拷打致死，副市長楊杰等六人被誣爲這件政治謀殺案的幕後黑手，于一九七〇年四月被判處死刑。支左的部隊首長、市革委會主任，在全市幹部大會上宣告：“無產階級專政的槍聲就要打響了！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是，現在有人說我們頭腦發脹，草菅人命，屁話！這是屁話！對於反革命，我們就是要草菅。他們本身就是草，毒草。我們不但要殺，還要斬草除根！他們的頭，殺定了！我們殺定了！”因待殺者中有兩名高級幹部，省裏派人復查，確是一起冤案，這幾位受迫害的人的人頭才沒有被削掉。

---

補白：喬哥是搞階級鬥爭的積極分子，他悄悄告訴我重慶的肅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鎮壓了好幾百。他的絲廠廠長肖淵也給槍斃了，肖是留日的，有繅絲專業技能，槍斃他是有人說他是日本特務。他夫人收的尸體，火化未燒盡，連肉帶骨頭的裝了兩轆子運回浙

江老家。

劉家駒

這個家是屬於神的 白受恩

我出生前，家裏每天燒香祭奠，拜各種偶像。有一次，全家人長瘡，求鬼拜神不靈，藥石無效，弄得傾家蕩產，苦不堪言。我舅舅是位基督教傳道人，在全家人走投無路、求助無門的情形下，他把我們家的偶像全毀掉，無名的毒瘡竟都不藥而愈。從此，我祖母、父親、母親和姑姑們都信了耶穌。

我出生後不久，尚未懂事，祖母和母親就把我奉獻給主，每周日帶我去聽福音。那時人家都把我們當成信洋教的，許多小朋友藉故欺負我，打我罵我。小時候還會還手，長一點才知道這是為主受逼迫。

一九五一年我二十歲，與小我四歲的妻子結婚，她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我們生了兩個女兒後，因我家人口眾多，家族往來複雜，為著能好好服事主，我和妻子帶著孩子搬到了岳母家。我的岳母大半輩子守寡，自個兒吃粗的、穿破的，却給弟兄姊妹最好的，扶助軟弱的，安慰受創的，每天過著不住禱告、親近神的生活。她這樣絕對的愛主，深深影響了我們夫妻和孩子們。

在我們家出入的人，都是來聚會的，從早到晚，少則三五人，多則上百，不管環境多麼艱難，從不間斷。一九六〇年，口糧奇缺，老百姓沒吃的，妻子沒奶水喂兒子，出生不到半歲就死了。一九七二年，十九歲的大女兒得了肺結核，服藥無效離世。若沒有主親自安慰我們，兩次的打擊都讓我們夫妻倆痛不欲生。

一九七五年十月，公安將我抓起來審訊一周，逼人用謊言批判我，又把我送到縣看守所審問了幾個月。審訊時，他們說我很清白，沒有外人送我物質；但群眾控告我，女兒生病不給吃藥，只管禱告，女兒死了又沒有很傷心的哭號，一定是我們故意把女兒謀害的。之後，當然他們也查出了我並沒有不救女兒，只是他們很難明白，這麼個聰明乖巧的女兒，又這麼疼她，怎麼不見像其他人一樣的哀號傷慟呢？因為我們有主，我們知道主已接女兒脫離這地上的苦難，當主再來的時候，我們和女兒還要再見面，同享天上的喜樂！

收取外資與謀殺女兒的罪名都不成立，我被安了什麼罪名呢？因為我愛主，就說我是“小群派”，跟倪柝聲同樣的罪名。其實，我從未見過倪柝聲弟兄，但我讀過他講的信息，那信息完全出自神聖生命，讓我很得著供應。

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每次的批鬥我都有分，因為我被列為黑五類中的壞分子。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我讀的聖經、詩歌、信息，通通都是四舊。我被抓到臺上受批判的次數，大概不下幾百次！有時，正在家中吃飯，紅衛兵站在門外叫一聲，我就得趕快跟他們走。還有一次，那是最炎熱的一天，我身上只穿一件短褲，一群人就把我綁到會場，場中有許多人被批判，但因信耶穌被批判的只我一人。在我身後，有兩個小夥子，一人拎我一隻胳膊，向前挪移一步，就跪在地上，汗水如大雨般淋滿全身！且每移動一次，兩個小夥子的拳頭就往我背上揍！連鄰居都很訝異，這麼重的拳頭，這麼多的毒打，我居然還挨得住？但感謝主，我沒有昏倒，這並不是我能挨，而是主把我帶過來！叫我在這過程中，並不感覺他們是怎麼待我，只知道主在我裏面對我說，一切的辱罵、痛苦，都是落在主身上，主都替我擔當了！

最後，我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送河南省西華縣五二農場強制勞動。但我心裏很平安，因為我沒有作過任何一件觸犯國家法律的事，我只不過是清心愛主罷了！一九八〇年一月，鄧小平上臺後，農場裁定我構不成現行反革命，宣告無罪釋放，結束了第一次的監獄生涯。

一九七九年底，李常受弟兄關於生命與靈等真理的信息經香港傳到內地，我一出監，即

深蒙這些信息的光照。我們開始知道，要用靈呼求主名，操練靈；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爲一靈。我們懂得了運用靈享受主，當時面對如此簡單易懂而又可實際操練的路，內心真是欣喜若狂！我們弟兄姊妹就組成福音隊，不分日夜大傳福音，無論到那裏都操練釋放靈，帶人藉著呼求主名而得著神聖的生命，遷入神愛子的國度。這樣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全縣十六個鄉鎮中，有十四個鄉鎮已點燃了國度福音的烈火。

一九八三年，我們傳揚國度的福音達到高潮，逼迫接踵而來。六月中旬，政府貼出告示，定我們爲呼喊派，并有人上告中央說，若讓我們這些人發展到百分之七十，中國共產黨就要變色了。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再度被抓進監獄。那時，全國因此被抓起來的人無以數計，全縣更何止上百！他們並沒有查出我有什麼反對黨或違反國家人民利益的行爲，但仍然把我判了十二年重刑，罪名是反革命呼喊派。呼喊派是政府強加給我們的名稱，就像小群派，都不是我們應有的稱呼。

我兩次坐監，并無任何違反國家法律的事，就像查不出什麼罪的主耶穌，仍然被彼拉多釘了十字架。第一次我坐監五年，終得平反，宣告無罪釋放；第二次，我雖提出并無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動機，又無推翻的目的，怎能算是反革命呢？但他們仍然關了我九年。在這段高牆內的年日中，不能讀經、不能唱詩，但在我裏面仍感深深的享受，無時無刻不在經歷主。祂在我的呼求和禱告中的同在，是真而又真的。我總是面色和藹，少有苦悶，別人就覺得奇怪，產生羨慕，于是我就趁此把福音傳給同監的犯人，或監獄管理人，讓他們也得著在主裏的喜樂。

爲主坐監，我從來不後悔，因爲祂曾爲我捨命！這許多年獄中生活，譏諷、捆綁、毒打，都不好受！但最苦的是不讓我讀主的話。然而，主還是陪伴我，用祂的大能保守我，不斷地在我裏面加力給我，叫我藉著信成了祂美好的見證人。

事實上，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戴高帽子，被批鬥，游街，不僅是我一人的苦難，我們全家都置身于無理的虐待中。我坐監後，我的妻子就靠整天在農田的勞動來養活六個兒女，夜晚又擔心有壞人闖進我家，怎麼辦呢？只有禱告！一到晚上，她就要到每個孩子的床前，一個個陪他們禱告。念小學的女兒在學校裏遭老師用棍子敲她的頭，一邊打一邊吼著：“你這反動家庭的孩子！”讓她實在無法再讀下去，而成了個不識字的人。兒子在學校裏，也是同樣要被叫起來接受站臺批判，放學回家後還得繼續被迫勞動，參加勞動時被別的小孩子毒打，還要我妻子陪孩子去道歉。雖然如此，我們還爲那些逼迫我們的人禱告，求主釋放他們、拯救他們，脫離黑暗的轄制，顯出祂的大能。果然，打我們的人，一家一家地得救了，福音在這裏展開來，以至于像我們這個不到兩百人的村子，就有三處地方聚會，從早到晚有讀經、禱告，真是喜樂！

一九七六年我大兒子初中畢業，因我們是黑五類家庭，我又是因反革命被判刑，他不能受推薦入高中，就在家裏勞動。後來經親戚介紹，去念了一個離家三公里、師資差、校舍是草屋的村辦高中，每天來回走泥濘路。念了兩年後，各科平均都是九十九點七，又正逢一九七八年高考制度恢復，父母不影響子女的前途，我大兒子就考上了大學。那時真驚動了整個村子，沒人敢相信這鷄窩裏怎能出鳳凰？有些反對我們的人甚至想讓我兒子收不到錄取通知書，好在我妻子無論如何總在主前靜靜禱告，靠主一路引領，才讓兒子順利上了大學。

大兒子大學畢業後，教書兩年考上碩士，兩年半後又考上博士研究生。讀了兩年半，正逢博士畢業答辯的時候，我的四女兒却因車禍離世，噩耗傳來，兒子研究所的領導怕影響他，故在他答辯通過後，才把噩耗電報及返鄉的火車票交給他，但他已經趕不上妹妹的葬禮了。四女兒去世的時候，我正在坐監，二兒子上書保我出去辦女兒的後事，被監獄領導拒絕，而大兒子也不在家，是主內弟兄姊妹親手把我女兒埋了！大兒子回到家，面對母親，看見爸爸坐監，妹妹去世，沒有埋怨，只說：“主啊，雖然在人看來家破人亡！但這個家是屬於你的！”

一九八八年，大兒子博士畢業，許多國家邀他去作博士後研究。在政審時，我坐監的事

被他研究所的政治處知道了，就派人調查，逼我兒子非寫出書面告白不可。他很無奈，就在報告中說：“我父親坐監一事，一直未向組織報告，實屬不忠。但我父親為什麼會被關在監裏呢？因為他是一個相信耶穌的人，在我國信仰自由的政策下，過著敬虔且正確的基督徒生活，按著聖經純正的啓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天天呼求主耶穌的名，但遇上一九八三年政府嚴厲打擊‘呼喊派’，就被抓進了牢裏。我父親是真愛他所信靠的主耶穌，從沒有作過任何不合國家法律的事；他的罪名是反革命，但這種罪名是以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而我父親根本沒有參加過任何與政治有關的團體或活動。事實就是這樣，組織要給我什麼樣的處罰，我都沒有怨言。”

這一關雖然過了，但出國仍有障礙。幾個國家都邀請他去，他最有興趣的是美國，此刻美國也催他趕快過去，他只好拿著邀請函向研究所的領導說：“美國的邀請函來，我該怎麼回話呢？總要顧及國家的聲譽，不好說我不能出國，是我父親因信耶穌還被關在監裏罷？”領導告訴他：“你就回信說，我們國家規定，學生畢業需留在國內工作一年，才可出國。”這樣，到一九八九年八月，大兒子才到美國芝加哥作博士後研究，一年後在紐澤西工作。至今十年來，他天天與弟兄姊妹在一起傳揚福音，過著喜樂的召會生活。如今，我們全家都到了美國，小兒子完成了碩士學位，小女兒仍在讀書，兩個大女兒雖沒受過高等教育，却在召會裏清心服事主。我們夫妻仍然天天把自己及孩子們，奉獻在主前，求主使用我們全家每一位，成為祂的彰顯。

祂的心意從不是叫我受苦。我所見證的這位主，祂是又真又活的神，在那些烽火燒殺、饑寒交迫的日子裏，祂從沒有離開我，不然，誰能經得起這些痛苦、折磨呢？像我這樣的例子，何止千萬？倪柝聲弟兄的同工張愚之弟兄，因信耶穌一九五二年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判刑十五年，到新疆服刑後，因病送回上海，又因傳揚聖經、信息，被拉出監獄槍斃。當時見著的人都說，張愚之被槍斃時，既安詳又榮耀……

我兩次坐監，為主受苦從來不覺得苦，反而覺得榮耀。人說我跟從倪柝聲、李常受，就定罪我，其實我從未見過他們，但他們的信息却讓我能邁開屬靈的步伐，向著標竿竭力奔跑。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主耶穌，但在我的深處，却是愛祂、經歷祂、見證祂，祂真是實實在在，是帶給我喜樂，帶給我無盡豐富的活神。

我只是一個破瓦器，主耶穌才是瓦器裏的寶貝。哈利路亞！我這破瓦器裏有活寶貝，主耶穌是惟一的寶貝，我一切的能力乃是出于這寶貝！神的心意從不是叫我受苦，乃是叫我們在受苦中認識祂的法則，而榮耀祂。我原是一個罪人，一個天然敗壞的人，主却愛了我，讓我盛裝祂的豐富！如今只求主將祂自己的成分再更多地賜給我，叫我能够與弟兄姊妹一同在愛裏，成為祂的彰顯。

---

1958年10月，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以破壞革命秩序罪判處我有期徒刑五年，接著就被塞入鐵悶子火車，押送安徽省治淮總隊勞動改造。最初在皖南山區涇縣陳村水庫服勞役，當地環境衛生惡劣到無可言喻的地步，遍地蒼蠅，好似一層黑色的地毯一般。勞改隊規定，吃飯後休息的短短十幾分鐘時間，每人要滅蠅200只。由于蒼蠅多得出奇，隨便拍拍，俯拾皆是，完成任務十分容易。有一天我捕到蒼蠅500多隻，本待上繳，但想到每天夜以繼日肩頭壓著幾百斤的重擔，過著非人的生活，活著又有什麼意思？于是我將500多隻蒼蠅和水一齊吞了下去。勞改隊裏的廣播立刻狠批、咒罵我，說：“勞改人員陶增烈，為了抗拒改造，將打下的蒼蠅500多隻一氣服下，企圖對抗人民對他的改造。”此時我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豈能懼怕區區批判。食蠅之後，居然沒死，僅患上了阿米巴痢疾。陶增烈

---

父親董渭川 董乃強

我的父親董准，字渭川，是近現代著名教育家，2007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渭川教育文存》是該社“中國近現代教育家文庫”中的一本。

1951 年 2 月，父親應孫瑜、趙丹之邀，觀看了他們創作的影片《武訓傳》，并應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影評，肯定了武訓行乞辦學的義舉。該片劇本經中宣部審查通過，攝製款由國家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撥付。公映後，從中共高層朱德、周恩來到一般觀眾，好評如潮，然而却引起毛澤東極大不滿。5 月 20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兩次修改定稿的社論，點名批判了肯定《武訓傳》的 10 篇文章。父親的那篇影評排在第 11 位，因版面所限，沒有被點名見報。這篇社論立時在全國煽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電影《武訓傳》批判運動，周恩來被迫作了檢討。父親除在北師大和九三學社接受大大小小批判并多次違心檢討外，還根據校黨委的指令，將這些檢討整理成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

1951 年底掀起“三反五反”運動，父親再次挨整，排在北師大被“洗澡”教師行列的頭一名。與此同時，我四姨夫家裏也上演了挖地尋金的鬧劇。四姨夫當時是北京市郵政局的一個小頭頭，他的正讀中學的女兒，聽了學校“五反”鬥爭動員報告，便跑到市郵政局“五反”領導小組，告發她爸爸貪污，她的根據是她爸爸長得胖，外號“胖子”，肯定是常用貪污來的錢背著家人大吃大喝的結果。她爸爸一到節假日就到單位日夜值班，她由此推斷，准是乘單位無人，盜竊公家財物。市郵政局的人在她的帶領下，回家翻箱倒櫃，搜尋她爸爸從單位偷來的金條，屋裏院內刨土挖地，找藏匿的金條。

有親生女兒揭發，我四姨夫馬上被單位關押，日夜輪番審訊，我四姨也被市郵政局多次傳喚詢問。他們的女兒則因政治鬥爭積極，立場堅定，大義滅親，立刻被批准為青年團員。

北京市郵政局對這起案件的調查結論是：我四姨夫經手賬目清楚，并無貪污盜竊行為，“家裏藏有從單位偷的金條”的事根本不存在；我四姨夫領導的小單位裏年輕人較多，有的趁節假日公休時間補習文化，有的利用節假日談戀愛解決婚姻大事，他為了照顧年輕同事，就主動在節假日到單位代為值班。這個調查結論雖然使我四姨夫的冤案得雪，但他精神和皮肉之苦都已受盡，從一個胖子變成了一個瘦子。

1957 年共產黨反右整風時，父親的態度是消極的。直到 5 月 13 日，時為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北師大副教務長的父親，才在教育系教師整風小組會上作了他在共產黨整風中的第一次發言。6 月 8 日，“反右鬥爭”正式開始，校黨委按照早已擬定的計劃，在全校組織“左派”，對包括我父親在內的“待定右派”進行揭發批判。一時間，大字報、批判會鋪天蓋地而來。父親對共產黨由黨內整風突然轉為整黨外人士的作法感到困惑和難以理解，就跑去找國務院參事盧郁文詢問。他與盧早年私交頗好，既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同學，後又同到北伐軍“鐵軍”張發奎部政治部工作，父親任東海中學校長時還聘盧為教務主任。中共建政之初，盧當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

父親此去找他，只是想和他談談心，問問共產黨態度的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料盧郁文只冷冷地講了幾句空話，就打發我父親離開他家。後來得知，盧早在 1957 年 5 月中旬，就在國務院參事室鳴放會上反駁過對中共黨內弊病的指摘，此時他已將我父親視為敵人。

父親又去找時任國務院二辦（文教辦）主任的林楓。林原名鄭伯喬，東北人，1926 年我父親在南開中學任教時他正在南開中學讀書。在南開中學的一次學潮中，林被校方開除，我父親見他無處可去，便把他帶在身邊，并供給衣食。1927 年暑假，我父母帶他到了武漢。1928 年父親任東海中學校長，也安排他在東海中學當事務員。後來他專職革命，改名林楓，

中共建政後一直是黨政高幹。父親找他也只是想和他談心解惑，可林楓竟閉門不見。這時，我父親才親身體會到，共產黨真的是“鐵面無私”。

父親在共產黨整風中的發言，大都是對別人已揭露的事實發表感想或重複別人的意見，都是他個人的感受，并非與某幾個人串聯後商定。單憑這些，遠遠達不到共產黨所擬定的右派標準綫。30 多年後，一位年長的知情者私下告訴我，我父親被劃為右派，全在於我四姨家表姐的揭發，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五反”時大義滅親、誣告自己父親的表姐。此時她正在北師大歷史系讀四年級，面臨畢業分配和加入中國共產黨兩件大事。她體察到校黨委的意圖後，寫了一張大字報，捏造我父親的反黨言論，并說這些惡毒言論是她在我家坐在父親書房裏的沙發上聽我父親親口說的，除她之外，誰也不知道。校黨委得到外甥女揭發姨夫的罪證，如獲至寶，立即將這件過硬材料拋了出來。

父親在會上聽到我表姐的揭發材料，惱怒至極但無從辯解，會後就氣呼呼地回到家中，一進門怒衝衝把身上的錢、物、證件全掏出來放在書桌上，而後就向屋外沖去。當時我正在家裏復習功課備考高中，看到父親舉動異常，便連忙跟了出去。他走得飛快，無論我問他什麼話，他都不搭理，我只好小跑著跟他走出校門，又跟他上了 331 路公共汽車。我掏錢買票，跟他來到頤和園東門口的汽車總站。他下了車，直奔頤和園，當時已經閉園，父親謊稱他是園內教工療養院的休養人員，混進園門。他一進園就朝昆明湖疾走，我突然意識到，父親這是要投湖自盡，以表明自己從未對我表姐說過那些反黨言論。此刻我特別想找人把父親攔住，但四周并無一人，我只得緊緊地跟在父親身旁。來到昆明湖左岸，我就緊護在父親右側，儘量把他推離湖邊。

這時剛巧有一群收工的園林工人經過，我連忙停腳懇求他們把我父親攔出園外，但他們個個毫無表情地盯著我，仿佛在看一個怪物。眼看父親獨自走遠，我顧不得和工人們再說下去，拔腳去追父親。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孔橋頭銅牛脚下，滿湖平靜的水面唯獨在這裏翻滾激蕩，發出陣陣轟鳴并形成一個深深的漏斗漩渦。父親沖過去就要向下跳，我抱住父親，用腳使勁抵住護岸石塊的棱角，死命地把他推離湖邊。我們僵持了一會兒，近 60 歲的父親畢竟沒有我的勁頭大，只好長嘆一聲隨我出了頤和園。但他說什麼也不回北師大宿舍，而是執意要去我四姨家。我怕父親乘公共汽車時再出意外，便叫了兩輛三輪車直奔我四姨家。在那裏，父親當著我四姨的面，要用沾上水的手去觸摸電門，以抗議外甥女的誣陷，但被我四姨制止了。

在我即將升入大學三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得知當初誣告自己的父親和姨夫、時為師大附中黨支部書記的的表姐李毅，被革命小將揪鬥，剃了陰陽頭，我生怕家裏又要遭劫，馬上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勒令”他們辭去照顧父親的保姆（父親 1962 年小中風，1965 年再次中風，臥床不起），暗示他們準備自保。我父親終於還是成了衆矢之的，學生們喊出了官方沒有明說的“摘帽右派還是右派”的口號，大字報、批鬥會接踵而至，連父親在校醫院看病的收據上都注明“右派”二字。

父親被“摘帽”後，主要從事教育史方面的資料工作，同時給教育史專業的研究生開講古代教育典籍課。革命小將抓住他是教授，并在講課中講“士為知己者死”，上綱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狂吠‘士為知己者死’”，大加聲討，并沖來抄家，以獲取罪證。

不但是父母的住房，就連我單獨居住的小屋裏的書櫃、抽屜甚至床下，都被翻動很多遍，家中一批珍貴古籍、明代的幾塊古墨、一批私人照片（主要是父親年青時在北伐軍“鐵軍”張發奎部任職的照片）和集郵冊中的清末大龍郵票等等，都被當做四舊罪證抄走。不久，造反派以“右派和反動權威根本沒有資格住這麼好的房子，只配住豬圈”為由，強迫我父母搬出小紅樓宿舍，遷到一處不足 10 平方米的陰冷朝北的小屋，二人只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桌、一把椅子和一隻做飯用的火爐。

小紅樓宿舍我家門上，交叉貼了兩張封條。我平時住校，一天回家，看到封條，嚇了一



跳，趕快向造反派打聽，才找到父母的栖身之處。年近七旬，且已臥床多年的父親，經此變故，身心又一次受到沉重打擊，話音變得模糊不清，但腦子還很清醒。我每次回家，他總是很認真地閱讀我帶回去的各種小報材料。一次，他用手指點著林彪的照片，費了很大勁說：“奸……奸相。”嚇得我趕緊捂上他的嘴，生怕被負責監視我家的造反派看見聽到。

文革期間“外調”活動極多，目的大多是為整倒對立派的某個人。有的外調人員，為獲得對本派有利的材料，不惜對被調查者使盡威逼利誘手段。我父親因結識人較多，向他瞭解情況的外調者也就很多。他們拿著學校造反派開具的“董渭川務必老實交代清楚”的條子，頻繁來到父親病榻前。對所有外調人員的提問，父親都堅持如實回答，從不任意亂說。

一次，中共中央黨校兩個外調人員，專程來查證時任黨校校長的林楓的歷史，多方引誘我父親說林楓是叛徒，並許諾，只要寫了林楓是叛徒的材料，就此即可在政治上徹底翻身。我父親絕不跟風，也不記恨林楓曾在自己找他時他閉門不見，堅持實話實說。兩個外調人員見我父親這麼“頑固”，惱羞成怒，為泄憤，乘我母親不備，順手偷走了桌上父親的一塊歐米茄手錶。母親當即跑去將此事報告給學校造反派，却受到“你這是誣衊革命造反派”的一頓訓斥。幾個月後，師大革委會突然把我母親叫去，發還了這塊手錶。原來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組織分裂，來我家外調的兩人已分屬兩派，在兩派的互相攻擊中揭出了此事，便把偷去的父親手錶退了回來。

為讓久躺的父親能起來坐坐，稍稍活動，母親和我請求造反派批准我們從查封的家中搬回沙發等幾件傢具。父親看到沙發，掙扎著下床，到沙發上坐了一小會兒，這給母親和我一個極大的安慰。哪知此後不久“反擊二月逆流”，父親竟被誣為“借搬家具大搞翻案的急先鋒”，居所再次被抄，從家中搬來的沙發和我新購的必需傢具物品又被掠一空，居所裏外還貼滿了大字報。

1968年9月15日，我回家告訴父母我的畢業分配方案。母親和我給父親擦了一個澡，我俯身抱起父親，臉對臉地扶著他，父親睜大雙眼緊緊注視著我，好像要說什麼，可是已經虛弱

得發不出聲了。就在我凝

望父親的一瞬間，我對父親“淪為右派”後給我身心造成嚴重創傷的怨恨頓時化為烏有，想到的是他既遭國民黨通緝又被共產黨誣陷、坎坷而又光明磊落的一生。給父親擦完澡，母親和我給他更換了衣服和床單，安排他舒舒服服躺好後，我們才開始吃午飯。寂靜中忽然聽到父親發出輕微的“咯”的一聲，我趕緊起身去看，父親已經永遠睡去了。我馬上到校醫院，請醫生到家裏驗看並開死亡證明，內科主任趙大夫拒絕到“摘帽右派”家出診。我陪笑臉，說好話，央求另一位大夫到我家來，之後又趕緊到駐校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報告。宣傳隊員們正在辦公室午睡，幾個年青隊員剛聽我說了一句，就從床上蹦起來，興奮地大叫：“死了一個人！死了一個人！！”邊穿上衣邊要到我家來看。當看了校醫院開具的自然死亡證明後，他們都泄了氣，

正義與非正義 焦國標書

冷冷地開了個介紹信扔給我。我拿著介紹信，到設在西單的火化廠辦事處，辦理火化和購骨灰盒手續。辦手續的人，用手點著介紹信上注明的“摘帽右派”字樣，同樣冷冷地說：“這樣的人骨灰一律不留。”

當初我是被北師大附小保送上的初中，因而還想繼續在北師大附中讀高中。父親被劃為極右後，我突然感到自卑，覺得能有個學上就謝天謝地了，因此被口碑不佳的北京七中錄取時，我甚至暗自感到慶幸。該校地處城鄉結合部，社會環境和學生成分複雜。

入學不久，七中的校行政和共青團委就把我叫去談話（我一上初中就以少先隊中隊長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團），要我認清形勢，與父親和七中的右派教師劃清界線，至少每兩個星期交一份思想彙報。當時北師大已經停止了父親的一切教務教學工作，改為打掃衛生和抄寫資

料。因曾經自殺，而自殺是“自絕于人民”，于1958年2月又被補劃為“極右派分子”，按五類處理，即送京郊農村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分子有六種處理方式，即免予行政處分、降職降級、撤職、留用查看、監督勞動和勞動教養。母親原在全國婦聯辦公廳任處級科長，本擬1958年底提升副廳長，父親成了“極右”，母親也被迫辦了退休手續。我表姐李毅則因在這場反右鬥爭中大義滅親，被批准入黨，留校當上北師大歷史系的助教，大半年後被派到師大附中歷史組當組長，後來升任師大附中黨支部書記。

我的一位小學女同學，父親被劃“右派”後，母親立刻劃清界限，與其父離了婚，並把她留給父親撫養。高考前，她父親因正接受批判，為讓她能有個安靜環境好好復習，便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寄宿。誰知父親的這位朋友居然強奸了她，奸後還得意地說：“你去告吧，沒人會相信一個右派崽子的話。”這遭遇強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經，後來她考上農業大學，常于晚間突然闖入男生宿舍賴著不走，或睡到半夜爬起來，脫光衣服到水稻田中間站著讓蚊蟲叮咬，諸如此類，令人匪夷所思。大學畢業後，她被分到專業根本不對口的蓄電池廠，廠裏專門安排她做別人不做之危險工作，結果中了很嚴重的鉛毒。

我的三年高中幾乎沒上過什麼文化課，大部分時間是上街叫賣報紙，除四害打麻雀，在鐵道邊挑磚抬煤，為修人民大會堂到前門拆除舊房，到香山植樹造林，修建十三陵水庫，在七中鑄造車間每周翻砂澆鑄四天，等等。香山種樹，我曾背扛著32棵松苗從山脚無路處爬上山腰，一天往返4趟。修建十三陵水庫，因土籃裝得過滿過重，我曾挑斷3根扁擔。在七中鑄造車間，上午蹲在地上做砂型，下午端火、倒火（澆鑄）。一次與同學合抬滿滿一大包鐵水（端火），重達四五十公斤，前邊的同學手一顫，鐵水從包內飛濺出來，熱鐵水一落到濕地上，就“撲”地一聲迸射出無數火花，把在後首抬承重手把的我的手腕燙出一串燎泡。我雖疼痛難忍，又不敢撒手，怕一撒手鐵水包落地爆炸，將我們兩個抬包人都燙成重傷。還有一次，端小包倒火時，因鐵水燙穿包體急淌直下，一片鐵火頓時流到我脚下，燒毀了我的鞋和褲。修十三陵水庫，規定年滿18歲才能去，我當時剛滿17歲。我之所以這樣透支體力地勞動，既是在誠心誠意為父親贖罪，也是自己與父親“反動思想”劃清界綫，可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注意，得到的只是周圍輕蔑不屑的目光和頻繁整團（整頓共青團內錯誤思想）中大家的“批評幫助”。從此我開始學著隱忍，對任何事都保持沉默。

我小學時就展露出表演天賦，初中時是校話劇團導演組成員，到了七中又和一些同學創建了校話劇團，因而高中畢業時，我信心滿滿，準備報考戲劇學院和電影學院。我把這些年我改編的話劇劇本，寫的導演闡述和舞臺設計，平日寫的文學習作，等等，厚厚一摞，都作為報考材料，交到電影學院考點。在藝術初試時，我覺得特別幸運，因為所考內容都比較簡單，特別是在我認為最難的圖畫分析考試中，我抽到的那一幅畫，居然是我前一天請七中美術老師幫我分析過的。

初試榜上，我列名第一。進了復試考場，主考焦老師拿著我的報名表問：“你父親是誰？”我如實回答後，焦老師提高了聲音又問：“是北京師範大學的那個嗎？”我回說是。他點點頭，環視著周圍說：“好了。叫下一個。”在考官和考生眾目睽睽之下，我突感五雷轟頂、無地自容，趕快低頭退出考場。以後的文化課考試，我雖然參加了，但面對試卷，我的思想總是集中不起來，腦海裏反復出現復試考場上的情景。

缺了復試成績和文化課成績，我當然不可能考上藝術院校。半個月後，我又隨同學們參加了普通高校的人學考試，聽說當年（1960年）高校大規模招生，全北京市高中畢業生都被錄取也還招不滿。我想只要有個最差的學校上就行。考後等了一個多月，同學們都接到錄取通知報到了，我的通知却遲遲沒來，我大著膽子去七中打聽，七中讓我去問市教育局，到了市教育局，他們又讓我去問七中。

從市教育局出來時，我無意中聽到兩個消息：一是北京高校因招不滿學生，調進了兩萬

多名外地高中畢業生來京上大學，現在他們就在市教育局辦手續；二是市教育局扣著 200 多名“狗崽子”的考試成績，既不發給錄取通知，又不發給不錄取通知。我心灰意冷往家走時，突然想到當時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正在招生，以前我跟他們聯絡不斷，關係也很好，現在不妨到他們那裏試試。

兒藝的師友們熟悉我的情況，沒考我，只簡單交談了幾句就讓我回家等通知。剛離開時我很興奮，轉過幾個街角就冷靜下來，電影學院復試考場上的情景一再在腦海裏出現。兒藝的談話中沒有提到我的父親是右派，如果被兒藝錄取後再查出父親的右派問題，不僅我會被侮，和我談話的師友們也都會被責備。想到這裏，我馬上在路邊買了紙筆，向這幾位師友寫了封致歉信說明情況。當我把這封信扔進路旁郵政信筒時，心裏真是五味雜陳，既有對師友們說了實話而釋重負的欣然，又有對自己前途未蔔的悲愴。

又了幾天，到電影學院考點取回我的報考材料時，看到了新疆電影製片廠的招生通知，我馬上趕往新疆廠招考點，交上剛取回的全部材料。他們翻了翻材料，當即就給我辦了入廠手續。我興奮已極，這下子總算離開讓我永遠抬不起頭來的家庭了，甚至在和父母話別時，我還用磕磕絆絆的語言批判了一通父親所說的“黨天下”言論。

到了新疆才知道，全國同一個天，而新疆電影製片廠又是收容全國電影界右派分子之地，因此我還得繼續背著父親的“右派”包袱老實改造。冬天夜裏，我常被叫起來，砸開廠邊河溝的冰層，給廠鍋爐房上水，完了回來再接著睡。做了和別人同樣的好事，別人可以得到表揚，而我却無人理會。因不滿國家困難時期某些黨員幹部搞特殊化，偶發一句牢騷，立即引起眾人的注意和組織的批判。三年後，因貫徹國家“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文化部電影局決定新疆電影製片廠下馬，按“哪來哪去”原則遣散全廠人員，于是我又回到北京。

雖然在家吃喝不愁，但我總覺得呆在家裏壓抑，便跑出去找工作，可到處碰壁，最後找到離家最近的東升人民公社，申請當農民，公社一口回絕：“你什麼都不會幹，還得我們養你、教你，等教會了你，這政策一變你就會走，這虧本買賣我們不做。”

連農民都當不成，我的前途何在？這時父母讓我考大學，我不想考，因為大學絕不會收“右派狗崽子”。父親說他已經摘帽，和戴著右派帽子不同，再加上這些日子四處求職而不得的經歷，我就抱著反正無路可走就考考看的心態，第三次走進高考考場。對這次考試，我絲毫不抱希望，却居然被北京大學錄取了。這太出乎意料。事後才知道，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了關於文化工作的會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長的陳毅，在會上脫帽鞠躬，向知識分子認錯賠禮，致使高校錄取時放寬了政審標準。

我抱著對陳毅的感激之情，決心在大學開始新的生活。入學報到沒幾天，班上唯一的中共黨員許錫慶，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當時屋裏還坐著一個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叫孫機，是考古專業的“右派學生”（現在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許用他那結結巴巴說不成句的話把我倆，一個右派，一個右派狗崽子，教訓了一個多小時，要我們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定期向他彙報思想。在開學第一堂政治經濟學課上，老師講了斯大林的一個什麼理論，我因搞不清楚其中的邏輯關係，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向班主任秦文炯請教，誰知他一張口就斥責我的疑問和唯生產力論者的反動言論差不多，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開學之初的這兩記大棒，就此打滅了我開始新生活的夢想和求學熱情。獨往獨來，盡可能地忍辱寡言，做好隨時接受批評或批判的準備，就是我自那時起給自己制訂的生活方式。

文革大串連時期，母親惦念她的三妹，要我借此機會去天津看看。我找到三姨，發現他們全家已很“自覺”地擠在一個小套間裏。我敲門進屋時，全家人的表情都顯緊張。不一會，套間的小門打開，三姨夫和五姨、五姨夫從裏邊走了出來，我吃了一驚。在我印象中，身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要員、河北省副省長的三姨夫，永遠西裝筆挺，正氣凜然；長期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的五姨夫，一向和藹可親；既是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又是鄭州大學

黨委書記的五姨，最喜歡逗我玩，可今天他們都特別尷尬。

交談之中我才知道，時在河南農村當教師的我的小表哥，參加了造反派。他大義滅親，揭發五姨和五姨夫的滔天罪行。造反派組織一面將我的小表哥突擊入黨，突擊提升為縣教育局長（俗稱“雙突”），一面四處抓捕五姨夫婦批鬥。五姨、五姨夫是偷跑出來避禍的。言談中他們千叮嚀萬囑咐，叫我千萬不能把他們藏身天津的事說出去。我回京後把這些事都告訴了母親，她也只是嘆息。

大學畢業那年，送走了辭世的父親，在那只講階級鬥爭、不講人性的年代，我只能告別年邁且身邊無人照料的母親，獨自來到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當年學校畢業分配的原則就是把我這樣的“右派狗崽子”和“問題學生”（我是“反聶元梓派”）發配到長城以北。

在草原上，我從事過多種勞動和工作。我本想一生獨身，以免我的子女重蹈我的經歷，可是又怕生病得不到醫治，或批鬥時被打傷無法治療，就與醫院一位不計較家庭出身的護士結了婚。當時看病必須報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醫院拒絕給“地富反壞右”及與其相關的人看病。因寫獨幕話劇，我被誣指為劉少奇翻案，遭到批鬥。回京探親時，因捲入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險些被捕入獄。

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第八年的時候，我覺得“革命”之風似有減弱的趨勢，就向母親原工作單位全國婦聯提出申請，調我回京照顧老母親。聽說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醫院病床上批示，將我和妻兒一併調回。年近八旬的母親，得知這個消息十分興奮，可是盼了個把月還不見動靜。正疑惑時，母親碰到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康悄悄告訴我母親，說中央文革小組誣譏周總理是“右傾翻案風黨內最大的風源”，而毛澤東沒有表態。這個消息很快傳到科爾沁草原，這下子讓我和“右傾翻案風黨內最大的風源”連到了一起。那段日子，中共幹部又開始用異樣的眼神時時監視我。

1976年10月，毛澤東已死，我所在旗縣的中共縣委宣傳部長，代表中共盟委書記，向我因寫劇本被誣為替劉少奇翻案而遭批鬥的事道了歉。在全國婦聯的幫助下，我和妻子、孩子得以回到北京。為讓我更好地承擔起供養老母的責任，全國婦聯建議北師大安排我們工作。北師大雖然同意接收，但掌權者依然用對付“右派狗崽子”的辦法對待我和我妻子。校人事處的林處長，不顧我們老少三代五口人擠住一間十幾平方米房屋的現狀，要我應允“今後不得提出增加房屋面積”。歷史系的好心人實在看不下去，主動調給我們一間面積較大的宿舍。林處長得知後，竟到歷史系質问我，為什麼又增加了房屋面積。林還不顧我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的事實，安排我做歷史系資料員，“不能當教師上講臺”。我妻子有在旗縣級醫院工作20年的從醫經驗，拖了半年就是不給安排在校醫院工作。當時北師大校園裏並不是沒有空房，歷史系也不是不缺教師，校醫院更不是不缺大夫。

1979年3月初，教育系黨總支突然給我家送來一份“右派改正審批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復件，要母親當即簽字認可。這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父親不是已被“摘帽”了嗎？怎麼現在又來“改正”？冷靜一想，這“戴帽”和“摘帽”還不都是整人的權術嗎！我母親以“右派改正”事過於突然，我們思想上毫無準備為由，對審批表“現在意見”欄中的“經復查董渭川在五七年鳴放期間有錯誤言行”一句話表示反對，認為這是給整人者留下的一個口實。但拖了幾日，母親生怕會影響到我和我妻子在北師大的前程，才在審批表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教育系（中共）黨總支的人對“董渭川在五七年鳴放期間有錯誤言行”的詭辯是“誰都有錯誤言行”。難道有錯誤言行就必須被扣上政治帽子，并接受長達22年的折磨并株連家屬嗎？中共又憑什麼給黨外群眾的錯誤言行定罪呢？更何況我父親在1957年所說的話，至今都找不出半點有錯誤的地方！師大校園裏長期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解放初期，毛澤東請師大教授吃飯，羅志甫、李長之、董渭川幾個人藉故不去，所以1957年就都打成

右派。”是不是沒去吃毛澤東的飯就打成右派我不敢說，但這幾位確實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中共中央宣傳部原部長陸定一概括說，“我們那麼多年的工作，無非是整完一個人再整另一個人！”反右運動已過去 53 年，我父親被“改正”也已 31 年，人們提出，中共應對在反右運動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正式公開道歉，明確宣布反右運動錯誤，并予這批知識分子以精神損失和物質損失賠償，同時開放所有有關反右運動的言論禁區，以提供反思歷史的空間。這些正當、合理的要求迄今無法實現，但我深信這句廣泛流傳且屢試不爽的民諺：“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1979 年 10 月 18 日，北師大在八寶山公墓為我父親補開了追悼會，父親遺像前的骨灰盒裏裝的是他的眼鏡和一方印章。雖然父親沉冤得雪，但“三反”時幫他“搓澡”者，“反右”時批判他最厲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鬥爭他最狠者，當時在學校裏都還握有大大小小的權力。這些有權者仍然視我父親為“右派”，視我為“右派狗崽子”，視我妻子為“右派兒媳”，在那些卑視、不屑、甚至恨不得打殺我們的眼光中，我們一家子過得并不輕鬆。我們在校內的工作極其困難，特別是要辦成一件與自己有關的事，例如職稱問題，更是難于上青天。我的職稱，不但讓我從圖書資料系列的最低一級起算，還整整被壓了 6 年未得晉升。我妻子的職稱，更是因為領導間的互相推諉，不知該進入哪個系列，弄到最後只拿了個行政正科級。

為徹底改變人們心目中我家的“右派”形象，更為讓老母和年幼孩子此後不再遭周圍人們的白眼和閑話而感自卑，我和妻子咬緊牙、忍著汨超負荷地默默工作。

我在歷史系資料室默默而有成績的工作，為心懷嫉妒的龔系主任所不容，逼我離開歷史系到圖書館。雖然同是從事圖書資料工作，但還得從最低層工作做起。我妻子在正常上班和回家照看孩子做家務之外，擠時間到北醫三院進修運動醫學，并參加光明中醫大學的函授，連回家做飯手執鍋鏟時都在背英文和拉丁文單詞。多年後，在人們的白眼和閑話中，我們的艱韌努力得到回報。我在北京市取得了圖書資料系列的最高職稱，并在學校圖書館建立了圖書館學碩士點，發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 13 種工具書和 4 本專著，其中有半數獲得過各種獎勵或再版，成了有權評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國家級專家，還被國外幾個學術團體聘為顧問。我妻子不但成了學校體育代表隊的隨隊醫，而且能融經絡學說與西方體操為一體，創編出獨特的經絡健身操，成書後一版再版。校園裏注視我們的眼光從卑視不屑變成了尊重，對我們的背後指點變成了羨慕。我們不僅做到了沒讓孩子在心靈最脆弱的年紀背上“爺爺是右派”的包袱受到歧視，影響成長，而且出版了歷 30 年搜集整理完成的父親遺著，向世人展現了董渭川一代教育名家的風彩。

## 一次訴苦會 王法堯

我們村的支書叫老三，他弟弟叫老四，可是他爸爸叫老六，大家都叫他六兒爺。全村開訴苦會，都說要讓支書老三他爹六兒爺先訴苦。六兒爺就走上台去，說：“別看俺從小窮，俺窮得有志氣，沒偷過沒摸過，沒坑過沒騙過。俺上蒙古地面去，帶一包針去，換他一群羊回來！別看俺兒女多，俺都養大了！”

“這不對啊！”那個教導員說：“要你訴苦，你這是說的什麼呀？要不你就說現在吧，別說過去了。”六兒爺嘆了口氣說：“唉，你別提了，我這輩子村裏一個仇人都沒有，現在老三當了幹部，把全村的人都給得罪了！”教導員趕忙說：“不對，不對！下來，別說了！”

換別人！”

換上來的是老毛。老毛是外縣人，原先給地主趕大車，做長工。地主去世後，老毛把地主的第四個姨太太拐跑了。當時他趕著三套大騾子車，拉著現大洋，拐著這個四姨太太，跑到我們村來了。老毛一上臺就講當年趕大車怎麼美，“三套大騾子車，我這鞭子啪啪啪一甩，全村老百姓都拍巴掌叫好！”

教導員趕緊提醒：“你說生活上怎麼樣，吃飯怎麼樣，不要說趕車了。”老毛又得意地說：“俺們做活的吃完了，他家娘們才能吃飯呢！”教導員只好說：“別說過去了，你說現在。”老毛不滿地“哼”了一聲說：“現在全村就欺負俺是外鄉人。村幹部專欺負俺，打穀場都歸自己有，就把俺的打穀場沒收了，就欺負俺是外鄉人唄！”教導員急了：“換人換人，不讓他說了！”

海樂被換了上來。海樂是小學教員，小時家真窮，他媽領著他討飯。海樂一上臺就哭，講從小怎麼討飯，怎麼難，有的人家不但不給，還說不好聽的，說他沒出息。他哭著說著，他是真訴苦，又有文化，很會說。

海樂正哭訴村裏人待他如何不好，六兒爺突然站起來了，問他：“你娘怎麼死的？你娘怎麼死的？”教導員傻眼了，不知是怎麼回事。原來這個海樂很不孝順他媽，當了教員掙了錢，可他媽却凍餓而死。他媽凍死了，他不知道，村裏人看他媽好幾天沒出門，進門一看，早凍死在炕席上了。村裏人連炕席帶他媽拉到街上來，村裏人都說，他媽這麼苦，把他拉扯大，他當了教員，不孝順，把他媽給凍死了。

教導員一看這個訴苦會全亂套了，就說：“算了！不開了！散會！”

---

補白：1959 年之後，中國進入三年大饑荒，分散在安徽各地野外幹土方工程的治淮總隊下屬的幾十個勞改支隊粒米皆無。我所在的大隊共有勞改勞教人員 2500 多人，派遣一個由安徽土著勞改人員組成的中隊 200 餘人，每天上山采集野生植物的種子根莖，供全大隊食用。每到一處新工程工地，不論挖河或建壩，第一步就是“清皮”，將表面腐土、雜物去除。清皮無論從湖面開始還是從農田開始，勞改犯們都欣喜若狂，如過節一般，因為可以趁此機會飽餐一頓或多頓。湖水一抽幹，稀泥中有魚蝦，捕到後用杯子盛裝，沖入開水就可生吞大嚼。挖掘幹土農田，雖無魚蝦，每每挖到一尺深時，却會有冬眠的青蛙、癩蛤蟆。掘到以後，剝去外皮，用開水浸泡，連內臟屎尿都不捨得丟棄，全部吞下肚中。夏春秋無青蛙，也可挖到很多野生植物塊莖，邊挖邊吃，大快朵頤。有一次我吃下不明有毒根塊，喉管脹痛異常，數天不能出聲說話。又有一次挖到一隻貯藏豐富的老鼠窩，老鼠逃之夭夭，遺下一窩浸胖了的黃豆、花生，足足裝了一大搪瓷杯，我大嚼了好幾餐。1960 年的冬天，我生食的青蛙、癩蛤蟆有幾十隻之多。

---

想讓黨支部掉到茅坑裏 李子軍

1972 年夏，江蘇生產建設兵團四師二十二團八連發生了一件轟動全團的大事。知青朱德貴將一把南通地區流行那種的坐便木椅的楔子全拔掉，致使坐上去的人立即仰面朝天掉進圓形大糞坑裏。

朱德貴的母親病逝，向黨支部書記張勤幫請假，張藉口農忙，不批准，朱恨得咬牙切齒，尋機報復。朱發現張經常到南通式坐便木椅上大便，就產生了讓張掉下去的念頭。趁無人時，朱德貴悄悄拔掉那把坐便椅的所有楔子，並把它椅推到圓形糞坑的邊緣，然後悄悄躲在窗戶

後面，靜等張勤幫掉下去。當天中午，張去了廁所但沒有大便，朱激動萬分之後又懊喪萬分。他又跑去檢查一次，然後又回到窗戶後面。沒多久，一個南通知青走進廁所，沒過一分鐘，傳了“救命！救命！”的呼聲。大家跑去一看，南通知青正在廁所裏拼命掙扎，身上臉上全是糞便。

廁所裏發生了事故，黨支部書記張勤幫想破解這個問題。他發現坐便木椅的楔子全被拔起過，顯然，這是一起人爲的破壞。階級敵人搞破壞！階級鬥爭新動向！張勤幫在全連進行排查。沒多久，綫索發現了：朱德貴最近很不尋常，平時他根本不去南通知青廁所，這兩天却頻繁進出，有重大嫌疑！一審，朱德貴就全盤交代了。他說，這樣幹的目的就是想讓張勤幫掉下去！張勤幫的臉頓時漲得通紅。全連召開批判大會，張在會上講：有人采用卑鄙手段，想讓黨支部掉到茅坑裏！於是，我們立即“義憤填膺”，“上綱上綫”，痛批朱德貴的狼子野心。但回到宿舍，我們的肚子都笑疼了，很長時間沒有這麼開心了。假如掉下去的是 180 斤的張勤幫，我們都可能像程咬金那樣笑死。

## 將軍的女兒 董婉如

馮天明 60 年代中期出生在越南。父親馮國棟，原名馮中興，是一位國民黨的將軍。母親陶英是記者，曾爲在臺灣的國民黨提供越南情報。天明的爺爺是一個鄉紳，在其子馮國棟面前與妻子一起被共產黨殺害。後來馮國棟參加了國民軍，大陸易手時携家隨蔣介石去臺灣，後又被蔣派往越南。中共一直在追殺馮國棟將軍，最終在 1971 年將其毒殺。孤兒寡母一家人陷入困境，曾經的人脉不復存在，34 歲的母親靠幫人翻譯和做生意賺錢養家。爲了保存將軍血脉，天明的媽媽委托外婆帶著 12 歲的二兒子和兩歲的小兒子先逃，結果輾轉困在柬埔寨，與家裏失去聯繫。後來才知道，將軍的二兒子 14 歲時，在越共逼迫下排除戰時留下來的地雷，被炸身亡。

天明的大哥，16 歲時就因對越共不順服，被抓入獄。不管天明如何嘗試給哥哥送飯，大哥還是因折磨和饑餓而死。媽媽對天明這唯一的女兒說：如果你想逃離，現在就逃命去吧！1978 年，12 歲的馮天明辭別母親，獨自一人登上逃難船。衣領裏縫藏一條鑽石項鍊，還有相當于二百美元的金錢。很多人死于海上，最後船在馬來西亞的一個荒島停泊下來，這一停就是兩年。

那個荒島好像叫巴拉比東（Bolo Bidong），島上生活很苦，都是難民，12 歲的天明成了一名等待某個國家發善心來接收的國際難民。她用相當 150 美元的價格買了一把斧頭和一塊塑料布，給自己搭了一個帳篷擋風遮雨。在那裏，天明經歷月經初潮，沒有人指導，一切都是無師自通。她剪下兩個褲腳，做成幾個月經帶，髒了的就去海邊洗洗，曬乾再用。天明說，那時她哪個國家也不想去，只想回自己家，可是她失去了與所有親人的聯絡。很多次往家寫信，可是從未收到回音。

島上的難民一個個陸續被一些國家接走了，天明屬於剩下來沒人要的一群人中的一個，最後美國將剩下沒人要的難民都接來美國。此時天明 14 歲，隨身攜帶的只剩下那條縫在衣領裏的項鍊。天明說，美國在當時被稱爲“垃圾收集站”，因爲美國當時的政策是“沒人要的難民我都要”。天明到美國後，被加州一個天主教徒家庭收養。這個家庭已經有 10 個孩子。養父是個建築工人，家裏人口多，生活不富裕，孩子們也沒得到很好的教養。離開越南時，天明已有相當于五年級的中文教育，小小年紀嗜書如命，無論媽媽帶回什麼書，她都能看。在美國的最初幾年，無論家庭影響還是學校教育，天明都受到了不好的影響，但收養她的家庭是好人。來美國的第二年，由于經濟蕭條，養父失業，家庭面臨破產而搬家。天明拿

出僅剩的那條鑽石項鍊，估價 5000 美元，欲支持家用，可是養父堅拒不收，讓她保存了下來。

17 歲的天明高中畢業了，想與母親團聚的心更強烈了。由于沒有經濟擔保能力，18 歲那年她參加了海軍陸戰隊，在北卡的軍營裏渡過 4 年艱苦歲月。在教官的魔鬼訓練下，實在受不了時，她會偷偷跑到教堂裏哭。1985 年，在擔保充分的情況下，天明邀請母親、小弟弟和母親後來收養的兩個流浪兒，來到美國定居。

---

補白：合肥市一家無線電廠挖出一個“三民黨”反革命集團，全案二十一人，合肥市中級法院判處其中四人死刑，二人死緩，一人無期徒刑，其餘判有期徒刑。安徽省高院法官汪崇啓接到報審的案卷，沒大筆一揮了事，而是仔細核查案卷，提審被告，查明該反革命集團張貼反革命標語等罪名，全部是辦案者為邀功請賞，通過刑訊逼供誘供編造出來的。案情澄清，被告開釋，汪法官一下救了四條人命。

---

我親歷的殺人 王法堯

1950 年 3 月 25 日共產黨在北京殺第一批人，我親眼目睹。共產黨與歷朝歷代殺人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開會殺人，要殺人了先開會，然後游街，開著大卡車。這一批共殺 53 人，都是糧店老闆，剃了光頭，一輛卡車裝 6 個，一面站 3 個，臉朝外。軍人一手拿著大片刀，一手摀著這些人的脖子，他們的罪名是囤積居奇、操縱糧價，當時叫“打老虎”。

1951 年鎮反，跟國民黨沾邊的人，道會門（包括老和尚），頭疼腦熱時給灶王爺燒個香、磕個頭的山裏人，都算反革命，在可殺之列。你們那裏殺那麼多反革命，我們這裏殺得這麼少，這不落後嗎！殺人也要攀比。這樣一來，燒香的老太太也倒了黴了。

河北易縣抓出一個 30 多人的反革命集團，說是一貫道，但是沒有殺他們。每逢廟會，共產黨就讓他們穿上皇帝的衣服，穿上娘娘的衣服，或者大臣、太監的衣服，讓他們自己說自己的反動思想——“我要當皇帝”，“我要當娘娘”，讓他們充當反動活教材。後來胡耀邦掌權，給他們落實了，說他們不是一貫道，其實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一貫道，都是公安局給他們編的，一套一套怎麼說。那些衣裳也是公安局給的，讓他們去這樣做。

我其實沒有給共產黨提過意見，一次發言也沒有，一張大字報也沒有，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從 1958 年 4 月到 1979 年 10 月，勞改 21 年半，這裏的故事太多了。跟我一塊勞改的有個李健，是共產黨縣級法院審判員。河北農村，五天一個大集，三天一個小集，在鎮反高潮時，共產黨規定，大集殺五人，小集殺三人。縣有大縣，也有小縣，小縣也不甘落後啊，人家殺得多，你殺得少，那哪成啊。鎮反時李健審了一個犯人，姓王，判了死刑。一般殺人布告上最後一句話都是“驗明證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其實此犯根本就沒有驗明證身。監獄裏有兩個姓王的犯人，獄警提人，一叫名，其中一王，也沒聽清楚叫誰，就答應了，站起來往外走，也不知要幹什麼。獄警不問三四，上去把他脖子、嘴拿繩子勒上，怕喊冤啊，綁到了刑場上。

李健走到集上，一看，人錯了，不是他審的那個人。這怎麼辦啊？趕緊告訴法院院長。院長一聽，就罵他，怎麼搞的！李健問現在怎麼辦？布告都已經貼出去了。院長說：“殺錯了就殺錯了，下個集再殺那個人不就得了嘛！”

這件事如果就李健、院長知道，也就完了，可是李健老跟別人說：“哎呀，殺錯人了！”



殺錯人了！”這一來，院長發怒了，把責任都推到李健身上，給他一個處分。李健內部做了檢查，檔案裏也裝上了。李健覺得冤枉，人是我審的，往外叫人可不是我叫的，而且我發現了錯誤，也及時告訴你了，這處分，我不服。越不服越處分，越處分越不服，最後被送進勞改隊。勞改隊裏要認罪，他說：“我怎麼認罪啊，是院長記了我這個仇了！”

和我一起勞改的還有個李省悟，河北河間人，原來是國民黨憲兵營長。國共內戰時期，共產黨對外許諾，凡投降的，官升一級。李省悟見國民黨大勢已去，就和另外兩個營長一起脅迫團長，想起義投降共產黨。團長和另兩個營長最後放棄了起義，覺得這樣做有辱人格。李省悟一意孤行，自己帶著兩把手槍投降了共產黨。李的岳父是國民黨的縣長，曾告誡他：“你不能投降！共產黨對待投降俘虜，當場不殺，以後殺；在前方不殺，在後方殺；現在不殺，將來殺。”李省悟不聽，他認為投降共產黨的人多了，怎麼可能呢？

共產黨一開始還優待他，讓他寫信勸憲兵團投降。憲兵團沒有投降，李省悟功沒立上，共產黨也就沒有給他升官一級。李見沒給自己升官，就去問，主動要升官，他覺得自己怎麼也得當個師級。共產黨就說，你這人是假起義，真李省悟逃跑的時候已經被憲兵團長槍斃了，你根本就是冒名的，還想當師長？

李省悟找來各種材料，證明自己是真的，但沒人理他，軍隊也不留他，給他轉業了。他後悔沒聽岳父的話，看來共產黨明不殺暗殺，今天不殺明天殺，是真的啊。李省悟老是跟人這樣說，他老婆一看這個人完了，可不能把自己和孩子搭上，就和他離了婚。這一來，他更不服氣了，起義了官沒升上，連家也沒了。他不服氣，越鬧越鬧，最後被送進了勞改隊。

勞改隊批判他的反革命思想，說他懷念國民黨，想復仇，就鬥他。其實勞改隊不讓搞文化大革命，因為已經都是被打倒的人了，就不搞了，可是勞改幹部裏有些以整人為樂的壞人，好人也不敢管他們。

有一個王隊長，名叫王震川，老是整李省悟，叫犯人們“幫助”他，一“幫助”就是打，我看見脊背被打得肉都離開骨頭了。打他的時候，他真硬，就是不喊叫，也不出聲。有一次晚上鬥他，罰他站，王隊長叫人架住他的兩隻胳膊，下麵點著原油。原油煙特別大，就用煙熏他。兩邊的人都得輪班換人，誰都受不了那個煙熏火燎。那晚我值班，風很大，風一吹，火一撩，撩到李省悟臉上，頭髮、眉毛一下子就燒著了，臉都是黑的了，李省悟就是不出聲。

我一看，不好，這要出人命，趕緊報告王隊長。王隊長就罵我：“你這個小子真混蛋！你看他的骨頭多硬啊！”接著燒，李省悟臉上的肉皮慢慢燒熟了，他掙扎著，一下子掙脫架他的人的手，往自己的臉上一抹，變成了一個大花臉，黑的黑、紅的紅，這時他才喊出來：“蒼天啊——蒼天啊——蒼天啊——”連喊了三聲。王隊長一擺手，說：“散會！”於是會就這樣散了。從那以後，王隊長就不再鬥他了。

到了新年，我們勞改農場的場長說，要讓大家過個好年，保證吃好，不鬥爭了。過年要交心，談怎麼把年過好，大家都交心。李省悟交心時說：“過年這四天，我保證不殺人。”

李省悟的監管人叫蔣少先，外號大土匪。李上茅房、打飯，他都跟著，監管他。蔣聽到李省悟說“保證不殺人”這話，站起來就對他拳打腳踢又打又罵：“你什麼玩意兒啊，還想殺人！”本來場長都說了，不讓打人，他又打開了。李省悟冷笑，對蔣少先說：“嘿嘿，我不跟你動手，我跟你動手，三個五個你也不行。”李省悟以前是憲兵，會一套武術。

李省悟去打飯，蔣少先後面跟著。打飯回來，李省悟先進門，門自動關上，把後面邁腳進來的蔣少先的菜打翻了。蔣不幹了，說怎麼辦？李省悟說，又不是我給你弄掉的。我那天值班，就把這事報告給隊長。隊長說，多賣給他兩份菜，這件事當時平息了。

晚上李省悟下手了，先殺別人，再自殺。他偷了一把剃頭刀，連割了三個犯人的脖子。被割的第一人叫徐占鰲，挨著李省悟睡，脖子上挨了兩刀，切斷了動脈，血打到天花板上，濺得到處都是，接著又去割其他人的脖子，但都沒割到動脈。當時屋裏 12 人，誰都沒敢出聲，全都嚇傻了，眼睜睜地看著，也動不了了。其中有一個久經戰場的國民黨營長，負傷三

十多次，到這時候也說不出話來。

蔣少先手脚并用逃出去，爬到院子裏，喊了一聲“殺人啦！”聲音很小，都變了聲了。我值班聽見了，一脚揣進門，一看也嚇傻了。徐占鰲的血還在往上打，李省悟正坐那兒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他的手已經軟了，割不到動脈，沒一會兒他也出溜倒了。地上一層血，冬天很冷，我的球鞋抬起來都覺得粘粘的。我強站著沒摔倒，趕緊去找隊長。“李省悟殺人了！”我拍門。隊長沒出聲。我就砸他的門，喊：“李省悟殺人了！”隊長不敢出門，在屋裏說：“知道了。”

因偷竊進勞改隊的徐占鰲死了，24 歲，那一天是他結婚的第十天，李省悟和其他兩位被他割脖子的犯人都被救活了。至于李省悟最後的結局，我就知道了。

王震川隊長讓我去整別人，我不願意，他就認為我對毛澤東不忠，對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罰我站，在勞改隊院子裏立了個毛澤東紙像，大概一米寬，一米三、四高，天天讓我沖著毛澤東像罰站，吃飯也得沖著毛澤東像站著。別的隊長去了讓我下來，他回去了還讓我接著站，就這麼一直站了三四天。

有一天晚上，院子裏又點著了原油。以前點火烤李省悟，現在不烤人了，但天天晚上還要點火，造那個氣焰，在院子裏放火放煙，唱歌，喊口號，又開會又喊，一百度的大燈泡有好幾個。很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不知怎麼，鋪天蓋地的屎殼郎沖著這個光亮飛過來，把院子裏那個毛澤東紙像撞了個稀爛，沒碰倒，把紙都給碰爛了。屎殼郎碰到牆上掉下來，有死的，有半死的，我們掃了掃，一共裝了九大麻袋屎殼郎。屎殼郎救了我，王隊長不罰我站了。沒過幾天，這個王隊長遭了報應，得了癌症，很快就病死了。

---

補白：1961 年冬天某日，我們勞改中隊派遣四十多人，抬了二十多隻大屎桶，去幾十里外的荒山上積肥。途經一處已被當地農民挖掘一清的紅薯地時，和我合抬屎桶的夥伴小朱，無意間在鬆土中踢到一隻農民遺留的紅薯。這是天大的喜事，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前面有帶隊的藍衣幹部，後面跟隨有荷槍實彈的現役軍人，而且還有四十多個饑腸轆轆眼中冒火的勞改犯同夥的八十多顆烏珠盯著。可是機警的小朱不慌不忙停下腳步，放下屎桶，彎腰拾起地上的紅薯，迅速投入屎桶。在小朱停擔彎腰拾取的瞬間，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地投向我們，繼而見拾取物被投進屎桶，眾都釋然。卸屎時，我們蓄意落在最後，等別人倒完才走近坑邊倒屎。稀屎倒盡前，我伸手從尿液中取出紅薯，迅速在泥土上擦一下，一掰兩半，我倆各得一半。回程抬著空桶，踏著輕鬆愉快的步子，在褲子上抹去紅薯上的餘屎，塞入口中大嚼起來。

---

富農郭玉德 俞加深

在零下二十幾度的嚴寒中，勞改人員往地裏放夜班水可不容易。這是一項爭分奪秒的艱巨任務。水從大渠分流向各地塊，立馬凍成白花花薄冰，稍一怠慢或遲疑，地塊就瞎了，低處積水成冰，高處水再也上不去。土壤的水分狀況直接影響開春的播種，地搞砸了，算責任事故，勞改犯就會挨處分。

隊長分派上海人小許值夜班放水。小許視力差，看不出地塊高低，害怕因此惹禍，就向隊長請求調換工作。隊長不耐煩地說：“什麼叫脫胎換骨？！去，我叫郭玉德帶著你，慢慢就學會了。”

當天晚上郭玉德耐心教小許如何打壩，如何閘口，小許一一照辦。兩人忙碌到下班夜，

大約凌晨三四點，任務完成了。兩大排幾十畝地，一片白花花的薄冰，十分勻稱，沒有花斑漏放的。二人披著破羊皮大衣，蹲在地邊吸烟，小許突然好奇地問郭玉德：“我冒昧地問一聲，你啥出身？什麼樣的農活你幹得都很出色。”

郭并不隱瞞，答道：“富農。”小許趁熱打鐵：“當個富農就會判無期徒刑？”郭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咬了咬牙道：“全是這狗日的……”他嗑了一下烟袋又裝了點烟絲：“那時我村還處在國統區，我家對面有個叫吳光的壞蟲，平時游手好閑，好吃懶做。這狗日的還對我家那口子不懷好意，趁我出門做生意，闖入我家，試圖不規矩，事後被我狠狠揍了一頓，打掉他兩顆門牙。”

郭狠狠吐了口痰又道：“不久我村解放了，國民黨軍隊撤退到縣城。土改了，吳光這小子劃個貧農，還在農會裏當了個小幹部，而我家成了富農，我就出去跑生意暫避風頭。過了幾天，那狗日的趁農會主席出去開會，私自召開村裏批鬥會，把幾個婦女拉上臺批鬥，其中有我老婆和我老娘。他命一個民兵上前强行剝我老婆的衣褲，剝得一絲不挂，站在台中央，群眾都說太過分了！有一個民兵小聲提醒吳光，這樣不妥吧？吳光瞪著賊眼斥道：‘怕啥？！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的，富農不殺他們就已經够寬大的了。’我老婆又怕又羞，雙手一直捂著下身。晚上回家，她與我娘痛哭一場之後雙雙上吊自殺了。”郭玉德流出硬漢難得的眼泪。

“消息傳來，我仇恨滿腔，爲了復仇，我就去縣城投了還鄉團。正好解放軍圍攻縣城，國民黨軍寡不敵衆，團長想出一個辦法，抽一個班，帶上還鄉團，去我那個村‘打援救趙’。我爲報私仇，就自告奮勇殺回村裏，親手抓了狗日的吳光兩口子，吊在村口，先示衆後槍斃。”郭玉德終於大吸一口氣說：“咱兩條命換了他家兩條命。解放後我被抓，在判刑時據說我犯的是死罪，但因事出有因，故而判了個無期。”小許感嘆道：“是啊，你這也是逼上梁山。”此後，小許與郭玉德成了知根知底的好難友。

隊裏的邵姓中隊長很信任郭玉德，爲了上山找羊板糞的糞源，邵隊長挑選郭玉德跟他一起趕馬車上山。說起羊板糞，外人不明白。老藏民的家，隨季節流動，夏天逐水草放牧，冬季就在朝陽背風的山溝裏安家。他們的羊圈因而也有冬圈夏圈之分，冬圈是祖輩相傳的老窩，圈裏的羊糞蛋層層積累，有的竟有一兩米厚，是一色發過酵的好肥料，這就叫羊板糞。

當晚隊長和郭玉德就在一處山壩裏歇宿。夜深了，二人準備就寢。郭玉德出帳篷給馬再添一點草料，突聽邵隊長在帳篷裏大喊：“快來呀，有狗熊！”郭聽到叫聲，立即抓起一把鐵鍬沖進帳篷往黑熊背上猛砸，哐嚓一聲鐵鍬把斷了，黑熊齜著牙，用肥厚的熊掌狠狠地拍郭一掌，又一爪將郭肩上連衣服帶皮肉撕下一塊，鮮血頓時淌下。此時邵隊長迅速從枕下掏出手槍，由于人熊抱成一團，隊長怕誤傷人，先朝天開一槍，黑熊一楞，反身逃出帳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邵隊長立刻用枕巾替郭包扎一下，套上馬車，出山送醫院緊急救治。郭見義勇爲營救國家幹部，隊裏爲他上報減刑材料，上級批准由無期徒刑減爲有期徒刑十五年。

## 鄧星杞一家之死 林啓山

鄧星杞，湖南省邵陽縣黃亭市公社金鋒大隊人，1958年湖南師範學院畢業，在本縣任語文教師，多次被評爲優秀教師。1970年秋，鄧被調到縣師訓班教語文。師訓班學員積極要求參觀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韶山，學校領導也大力支持，并具文上報。縣有關領導批示，每期學員可去韶山參觀學習一次，但必須選擇時間，服從安排。前兩期學員都如願以償，可是第三期等了幾個月，多次請示未果。

1971年5月，鄧星杞在語文課上講解《顆顆紅心飛向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韶山》一課，把外國友人無限熱愛毛主席家鄉一草一木的動人情景講得有聲有色，更加激起了學員們

去韶山參觀的強烈願望。有人提問：外國朋友都可以去韶山參觀，我們是毛主席家鄉的兒女，想去參觀為什麼這麼難？鄧老師答復：你們想去韶山參觀是革命行動，我堅決支持，不過上兩次去是經過縣領導批准的，這次要去，還得靠你們的三寸不爛之舌去向縣裏請示。於是學員們選出 9 個代表，帶著報告去縣革委教育組請示。教育組負責人帶他們找主管財經的縣革委副主任 Z 批錢，Z 說現在財政困難。學員們繼續強烈要求，新任縣委書記 C 則嚴詞批評學員們是在搞無政府主義，說：“現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了，你們這是第一次圍攻衝擊新縣委，性質極其嚴重。”他還批評教育組領導不該支持學員鬧事，并當即指示政工組、教育組，聯合組成工作組，去師訓班追查幕後操縱指揮者，宣布師訓班停課辦學習班。

首先是 9 個學員代表遭到輪番審訊，大會揭小會批，圍攻的大字報、小字報、橫幅、標語鋪天蓋地，聲勢搞得特別嚇人。後來查到語文教師鄧星杞頭上，C 書記在全縣區社幹部整風會上說：“師訓班有個鄧星杞，什麼知識分子，打著紅旗反紅旗，利用社會主義講臺販賣封資修的黑貨，煽動學員衝擊新生的紅色政權——縣委，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鄧星杞立即被停職反省，組織學員批鬥圍攻，到處貼滿“鄧星杞攻擊新生的紅色政權罪該萬死！”

“鄧星杞不老實就叫他滅亡！”的大字報。整風學習、批鬥圍攻整整搞了 7 天，工作組請示是否繼續搞？C 書記答：繼續搞。又鬥了 7 天。鄧一邊挨批鬥，一邊寫檢討，越檢討越想不通，明明是政治迫害，還要自己無休止地寫檢討。6 月 7 日下午 3 時，鄧星杞以死抗爭，懸梁自縊。C 書記說他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埋幾塊樓板還便宜了他”。鄧的妻子哭得死去活來，三次自殺身死，未滿周歲的小兒斷奶餓死，鄧的父母也被活活氣死。

---

補白：2010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到來之前的那個夜晚，國家信訪局對面的地下通道裏，74 歲的貴州訪民劉耀明在上訪 40 年之後悄然離開人世。劉耀明文革時期被打成反革命，要求平反，解決冤案，陸陸續續來北京上訪 40 年。最後一次，2010 年 11 月底，老人聽說案子已被最高法院受理了，懷著極大的希望來到北京。多年上訪，極度貧困，老人捨不得住小旅館，就住在國家信訪局南邊的地下橋洞裏。12 月 4 日法制宣傳日和 12 月 10 日人權日前夕，他（們）居住的橋洞多次被警察和城管清理，破爛的被褥和塑料窩棚被強行拆除拖走。死亡前兩三天，劉耀明已經水米不進。同一橋洞照顧他的訪民老楊為他做飯端飯，他拒絕飲食。他可能覺得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給遠在貴州老家的孩子們打電話，希望他們來接他回家。孩子由于家庭困難，和父親說先給匯點錢過來看病，然後他們安排好就過來，沒想到這是他們父子之間最後的通話。9 號夜裏他已近離開人世，10 號早晨，同洞的訪民去看他的時候，身體已經冰涼，兜裏還剩 20 餘元。

許志永

---

故人王文煥 段華庭

文煥王公，碭山縣城北關黃烟廠人，身材修長，體質文弱，原為碭山中學語文教員。其為人，書生氣足，言辭犀利，自以為風趣，人目為異類。1956 年我畢業分配至碭中語文組，與公同事。

一次，學生在禮堂舉行入團儀式，公說：“快去看，那些孩子在賭咒發誓呢！”賭咒發誓本為封建時代締約結盟或者道會門秘密結社所必行儀式，民主社會，信仰自由，一般不興這一套。孫中山先生于東京發起成立同盟會，要求大家舉手宣誓，就曾遭到與會同仁的抵制。解放多年，公尚未見過這種儀式，覺得有趣，隨口之言，日後竟成為“榮膺”右派的主要罪證。

公有肺疾。當上右派後，令其在校看圖書。有人說：“不行，會傳播肺結核病。”遂逐出校門，送城北某生產隊監督勞動。生產隊待其頗寬容，讓公記賬，去城裏搞些採購。我當時尚自由，曾在城裏遇見他兩次，肩挎草帽，卷著褲腿，風塵僕僕，笑嘻嘻的，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白胖了許多。

四清時期，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飛機農場監督改造。吃的不好，勞動強度又大，孱弱的他怎堪承受？據說某監管人員，轉業軍人，突擊刨了十分鐘荒地，然後拉皮尺一量，算出面積，擴展為勞教人員一班四個小時的工作量，作為基本定額。一日兩班，完不成就是“不老實”，就要開展鬥爭，並克扣伙食（就是不扣也不夠吃）。以公之耿介、羸弱，所受際遇，可想而知，批鬥，毒打，血肉模糊，奄奄一息。

監管負責人令幾個右派用擔架把他送到縣公安局，因其拒不接受改造。將息幾日，略有恢復，有關方面就說：“回去吧，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爭取重新做人。”難友們對他十分同情。某日起床後，有人說：“他昨晚很長時間沒入睡，就讓他多睡一會兒吧，等開飯再喊他。”然而，他這一睡就再也沒有醒來。著幾個右派拖到大堤上，挖個坑，草草掩埋。幾個有氣無力的右派，坑挖不了太深，據說不久就被野狗拖出來，啃了。如公尚在，今止八十來歲耳。

其妻李靜，小學教師，年輕無子嗣，另嫁他人。公為獨子，早孤。老母孤身一人，生活無著，又頂著地主分子帽子，憑著給人家拆洗縫補掙錢度日。挨到文革，城鎮居民下放，老人竟被遣放到陳莊公社梅屯大隊去當“候補社員”，北關城裏原有的房產易主。梅屯大隊並無梅花可看，如何能接收這七十多歲的蓮足老嫗？便告之曰：“城裏落實政策了，讓你回去。”于是派一名社員，拉上板車，將老人連人帶行李一起擢到了縣城西關橋頭。萬幸，被公幼年同學劉樹丹發現，接到家中。撥亂反正後，公得平反，老人家由縣民政部門和碭山中學負擔，安度晚年。壽高九十餘，後事由碭中操辦。

劫後餘生，我懷念故人，曾擬前往詢訪劉樹丹，然劉已中風失語多年。半個多世紀之後，有公之學生李叢昕者，往訪母校，問及當年所欽敬之王文煥老師，遍詢碭中師生，物換星移，眾皆茫然。當年曾經風度翩翩、談吐幽默的王文煥公，自從被野狗啃食之後，連同他的名字，早已消失于茫茫塵寰。

補白：一九七〇年三月，湖南長沙召開兩次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原判決為死緩的政治犯，全部從勞改農場拉出，改為死刑，立即執行，包括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而開除學籍的大學生張九龍。長沙中學生楊曦光回憶：“我在勞改隊，親眼看到五十多個從未有犯罪行為和暴力行動的政治犯被處決。”四月某日，當局又宣布次日將判處六十多名反革命分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綫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長沙的這一批反革命分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十五年徒刑。

---

在神的帳幕隱秘處      袁相忱

五十年代中國大陸盛行的邏輯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沒有中間路綫的。由于我們不參加這個運動（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就被官方質問：這個運動是個愛國運動，是政府支持的，你為什麼不參加？不參加就是立場有問題，等等。如此推理，我便被打成反革命份子。王明道先生是 1955 年被捕的，我是 1958 年，我倆都被認為是“首惡”，因此都被判處無期徒刑。

當 1959 年法院宣判我為無期徒刑時，問我上訴不上訴，我想，上訴也沒有用，一切由神安排吧！所以沒上訴，當年夏天就被押解到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服刑。我被捕那年才 44 歲，有 6 個孩子，最大的 17 歲，最小的才 6 歲，還有老母親，家裏的一切擔子全部壓在我內人的身上。我是反革命，他們便成為反革命家屬，處處受到歧視，8 口人要吃要穿，還得讓 6 個孩子繼續求學，把他們培養成人，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我內人忍受了許多不可言狀的痛苦與磨練，但由於神的保守，靠主勝過來了，她現在仍很健康，依然在愉快地服事主。

我被捕遭監禁，從表面上看是極大的不幸，但全能的主不會做錯事，他所許可的都是美好的，我一點也沒有懷疑神的信實和慈愛。廿年的勞改使我得到了很好的學習與鍛煉，因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倘若我沒被監禁，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肯定會被批鬥整死，是神奇妙地保護了我；第二，我的身體絕不會被磨練得這樣健康。在荒無人烟、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勞改犯吃的經常是高粱米和土豆；夏天穿一套單衣，冬天穿一套棉衣；每天要幹 9 個小時的農田體力活。冬季最低氣溫是攝氏零下 30 多度，在零下 20 多度時仍要堅持出工，人們常說的“滴水成冰”我已深有體會，早晨到屋外去倒洗臉水，回來時盆底盆邊都有結冰。奇妙的是，在這麼多年這樣艱苦的生活中，我却沒有生過病，僅得過一次小感冒，這就是神迹。我被捕時身體很瘦弱，還戴著近視眼鏡，人們都背後議論，說我不會活著回來了。在北大荒的勞改犯會出現下面三種結果：一種是投江或上吊自殺；另一種是神經錯亂、精神失常或生病死亡；再一種是通過勞改磨練，體質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強。我就是屬於最後一種。我見到一些勞改犯死在那裏，也曾想過自己是無期犯而且在勞動上又很差，不能立功減刑，做一個殉道者死在東北就算了，但我定意順從主的安排，也是出于主，我每天都愉快地勞動和學習。是主奇妙的保守，使我平安度過那漫長艱苦的歲月，而且能够平安、健康的回來，這又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奇事。我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工作還沒有完，還要使用我。

我在勞改的這些年裏沒有遇過基督徒，只碰到四位天主教神父，他們都是因拒絕參加天主教愛國會而入獄的，有兩位已死在勞改農場，另兩位被釋後還是不參加那個三自愛國會，他們說：我們要聽從羅馬教皇。我雖然沒有遇過基督徒，更沒有聖經閱讀，但有兩首詩歌成為我的力量，激勵我持守到底：一首是詩篇第 27 篇，另一首是十字古架。在每天勞動中的休息時間，別人回到屋裏去喝水吸煙，我就站在屋外向神唱這兩首詩歌，愈唱愈有味道并重新獲得力量。我深信主的保守：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特別是當我唱到“我要高聲稱頌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見父面，那時聽他說：忠心僕人，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我就更甘心順服，等候聽他說“忠心僕人”。神所要的是忠心，我願做個忠心僕人，忠于主所托負。

在我被勞改的時候，其他犯人都說我是個好人，到底為什麼，他們沒有追問，我只引領了劉浩、趙曉岩兩名犯人清楚得救歸向主，現在我們還常通信和寄給他們聖經與福音小冊子等等。坐了多年的監牢，即使能拯救一個靈魂不死也是可貴的。我被釋回家以後，由於精神上愉快、生活環境好，心中也滿有主恩，因此身體恢復較快，目前耳不聾、眼不花、頭髮也沒白，可是在靈性方面確實需要下功夫很好地充實。廿多年沒有讀聖經，記憶力也已衰退，更需抓緊讀經求得啓示和能力。當時自己有個強烈的感覺，已近 67 歲的我還能再活幾年呢！不知哪一天走完在世的路程，而且主來的日子實在近了，該怎樣儆醒等候，又該怎樣利用這短暫的晚年餘生呢？要愛惜光陰，要竭盡全力去贖回已經白白浪費掉的廿多年光陰！要在自己生命的後期單單為主而活，將來不但要去見主，還要交賬。我們不過是主的管家，主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要繼續靠主忠心到底，迎著各種困難和阻力獻出我的餘生，使我將來向主交賬時無愧，歡歡喜喜站在主的榮耀裏。

海外的肢體常常問我，怎樣才能幫助中國的教會？我的回答是“祈禱”。請大家為三件事祈禱 第一，為那些將亡的靈魂禱告，因為全國信徒的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第二，為那些新悔改的肢體禱告，解放後信徒增加十倍以上，他們須栽培，要建立起衆多在恩典中

長進、在逼迫中為主站立得住的信徒。但是，我們缺乏聖書，特別是工具書和培靈書籍，同時傳道人又很少，他們怎能得到牧養呢？請切切為弟兄姊妹們生命成長、靈命造就禱告。第三，請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禱告，“因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祈禱神能使福音的門在中國大大敞開。請為這三件事禱告，神一定垂聽你們的祈禱，在中國拯救更多的靈魂。我們深信世界最大的復興是在中國，十二億人口這麼大的禾場正待你們來收割！

我和太太雖已年邁，但我們堅持活一天就工作一天，直到主來。因每個人都要見主面而且要交賬。願你們不忘為大陸代禱，一直看到大的復興在中國。阿們。

### 袁相忱被捕 李迪雅

天熱了，袁相忱牧師把棉衣換下來，開始穿毛衣。妻子梁惠珍幫他把棉衣洗好後，準備把全家的棉衣一起收在包裹裏，明年再用。袁相忱對妻子說：“你別把我的棉衣收起來，就把它放在我枕頭邊就行了。”梁惠珍問：“你還穿嗎？不穿就收起來吧。我剛洗過了，放在外面會落上灰塵的。”袁相忱猶豫了一會，還是說：“你就放在外面吧，用塊小布包起來，放在我枕頭旁。”梁惠珍就沒再說什麼，把棉衣疊整齊了，用一塊乾淨的布包好，放在袁相忱的枕頭邊。

袁相忱已經預感到自己會在近期內被捕，被捕時就把棉衣一起帶著。又過兩天，袁相忱對梁惠珍說：“你出去給我買雙新布鞋吧，要合腳一點，耐穿一點的。”梁惠珍問他：“怎麼想起來要買新布鞋穿了？”袁相忱平時登臺講道穿皮鞋的時候較多，並且袁相忱一向節儉，衣服鞋子除非穿破，才讓梁惠珍去買。這一次是袁相忱主動提出讓她買鞋，她就覺得很奇怪。袁相忱沉吟了一下說：“買雙布鞋，好在以後勞動的時候穿。”梁惠珍楞了一下，繼而明白，丈夫已經為被捕作準備。梁惠珍楞在原地，泪水在眼眶裏打轉。

被捕的預感越重，袁相忱就越擔憂。他的母親當時已六十多歲，妻子梁惠珍沒有工作，家裏有六個孩子，老大福音剛滿十七歲，小六還只有六歲多。五個孩子在讀書，家中老的老，小的小，正是最需要照顧的時候。他是一家之主，如果他走了，這一家人怎麼辦呢？當時從表面上看，解決的辦法有兩個：一是向政府表態，願意參加三自愛國教會；二是堅持到底不參加三自，聽由他們逮捕。

除這兩條路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嗎？袁相忱忽然想到他要向神求一件事，那就是求神保守他脫離這患難，使他既不用加入三自，又不用被捕與家人分離，他就在這福音堂中事奉神。禱告了十多天，袁相忱感到心中的平安越來越清晰，外面也似乎一片平安，似乎覺得信神與政府也是可以和平相處的。四月十九日（一九五八年）上午，梁惠珍從街上回來，把一雙新的厚底布鞋交給袁相忱，說：“你先試一試，看看合適不合適？”袁相忱當時正在看書，頭也沒抬，也沒細想妻子的話，拿起鞋來套在腳上時才想起來，這是自己前一段時間叫妻子買來準備被捕的時候穿的，而現在，鞋已經買好了。袁相忱心中一驚：“神啊，難道你是藉著這件事來提醒我？”

梁惠珍看袁相忱不說話，以為他在看鞋，就說：“這鞋很結實的，花了四塊八毛錢。我剛才拿了十塊錢出去，找回來五塊多，這五塊多零錢就攔你的兜裏吧。”說完就把錢塞進袁相忱的褲兜裏。他們誰都沒想到，這雙鞋在當天夜裏就派上了用場——袁相忱就是穿著這雙新布鞋，帶著那五塊多錢，進了監獄的門。

四月十九日夜，大約十一點多一點，忽然聽到門外有人敲門，又有一個管戶口的警察在門外門，說“我們所長要請老袁去談話”。袁相忱聽了，說：“好吧，等我一會。”邊說邊趕快起來，下床的時候，順手拿出放在床邊的新布鞋穿上。袁相忱和梁惠珍都意識到要發生什麼事了，但他們想：“不可能是逮捕；要逮捕的話，不會有這麼客氣。”袁相忱走到門口，又回頭望了一眼梁惠珍，但卻沒說什麼，就跟著派出所的人出去了。其中一個派出所的人對梁惠珍說：“你睡覺吧。”但另一個人卻說：“等過一會或許我們還會再來。”梁惠珍聽了覺得很奇怪，心想他們說話怎麼兩個人都不一樣？他們到底把相忱叫去幹什麼？這樣想著，心就咚咚地狂跳起來，趕忙跪下禱告。

袁相忱跟著兩個警察往香家園派出所走，他一邊走一邊想：“叫我去，幹什麼呢？是不是就回不到家裏了？”想到這裏，他心裏後悔剛才沒有去另外一個房間裏與母親道別，也沒有去看一看六個孩子，也後悔還有很多福音堂的工作沒有向同工們交待。走到半路，一個警察問袁相忱：“哎，你是屬於什麼反革命？”袁相忱楞住了，說：“我不知道我是什麼反革命，我也沒有反革命。”警察就不再說什麼。原來，在逮捕袁相忱之前，政府早就把他的罪名定好了一一現行反革命。

到了香家園派出所，剛坐下，就從屋裏出來三個人，是袁相忱不認識的，可能是從市里來的。他們凶巴巴地走過來，呼喝說：“站起來！”袁相忱就站起來，接著其中的一個人又把手上的逮捕證朝袁相忱一晃，就開始宣讀逮捕證，正式宣布逮捕他。讀完逮捕證後，又拿出印泥，指著一處空白的地方，讓袁相忱按手印。袁相忱按過手印後，就有人給他把手銬帶上了。這一切做得乾淨利落，前後不過三五分鐘，顯然是早已布置好的。那時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九日夜裏十一點半，黑暗正濃。從那一刻起，袁相忱那長達二十一年八個月的鐵窗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袁相忱走後約半小時，梁惠珍還在禱告，就聽到轟隆隆好多汽車開過來的聲音。梁惠珍心中一驚：“難道相忱真的被捕了？”緊接著，又有人敲門，梁惠珍打開門，看到門外站滿了警察。站在最前面的警察對她說：“袁相忱已經被捕了，這是逮捕證。”梁惠珍全身一陣發軟，幾乎站立不住。警察又接著說：“現在要把這裏所有的東西都翻出來，我們要徹底搜查。”說完話，一擺手，五六個警察忽拉一下都進了屋。每人手裏都拿著工具，二話不說，先從聚會的福音堂（做禮拜的房間）開始搜起，把東西摔得辟啪作響。

最先被這吵嘈聲驚醒的是袁相忱的母親。她聽到兒子已經被捕，渾身發顫。梁惠珍對她說：“媽，我們一起去把孩子們叫醒吧。”老大福音已經自己起來了，一邊扣衣扣，一邊從房間裏走出來。他看到福音堂裏的椅子已經被推得東倒西歪，所有的聖經、詩歌本、屬靈書籍都被堆在地板當中，連袁相忱布道時敲的鼓也被扔在地上。福音的牙咬得緊緊的，梁惠珍怕福音年紀輕，容易衝動，就對他說：“你進屋裏把弟弟妹妹們都叫起來。”福音就進去把大家都喊起來。孩子們睡眼惺惺地站在那裏，看一群穿制服的人在那裏翻箱倒櫃，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最小的老六被大哥弄出來的時候還閉著眼，滿肚子不高興，但她睜開眼看到一大群人在那裏亂丟東西時，就嚇得一下子哭出聲來。她一哭，所有的孩子就都跟著哭了起來。梁惠珍把小六攬在懷裏，輕輕撫摸著她的背部。她的身旁是年紀老邁的婆婆和六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他們一家人就這樣看著警察在那裏搜尋。

搜完了福音堂又進到每個房間裏搜。每個警察手裏都有一根鐵棍，每走一步都用鐵棍在地下敲一敲，聽到什麼地方有空洞的聲音就撬開。福音堂的地下有一個浸池（洗禮池），警察把浸池的蓋子揭開後，看到裏面什麼也沒有，還不甘心，就把浸池周圍的地都撬開，結果還是一無所獲。搜查從夜裏十二點開始直到凌晨四點多才結束，檢查之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上車帶走，臨走的時候又對梁惠珍說：“你覺得我們的搜查合理不合理？如果覺得合理，就簽個名。”梁惠珍看也沒看，拿過筆來寫下自己的名字。四月二十日凌晨四點半，警察開著車走了，但梁惠珍的家已經不像家了。



補白：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清晨，一輛架著機關槍的卡車拉著長長的警笛，穿過蘭州街頭，緊隨其後是全副武裝的軍人押解著死刑犯的一輛輛卡車。死刑犯後面有一個戴著白手套的軍人，手裏抓著細鐵絲，將反革命分子的頭顱高高拉起。死刑犯們個個被勒得臉色黑紫，眼睛暴突，街道兩邊的人們屏聲靜氣，在肅殺的氣氛裏木然地望著眼前的一切。此次行刑共有二十多個囚犯，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尊敬的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其他還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槍手，後在蘭州大學歷史系上學時被劃為右派，在水北道區跑馬泉公社勞動改造中，與北京大學新聞系的右派學生林昭等蘭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辦地下《星火》刊物被逮捕的張春元，還有因同情辦《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輕人，為彭德懷鳴不平，對大量餓死人的現象極為不滿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獄的原中共地下黨員、甘肅省漳縣原縣委副書記、中共武山縣委常委兼城關公社第一書記杜映華。

北京三自會 李 克

1950年5月，周恩來三次召集以吳耀宗為首的19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向他們攤牌。周說，教會必須獨立自主，割斷與帝國主義的聯繫，建立三自教會。隨後，先後逮捕了最有影響的傳道人倪柝聲、王明道等人，皆以其不參加三自會打成反革命，判處無期徒刑。

1951年4月16日至21日，政務院（國務院）文教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決定對基督教團體進行登記註冊，納入政府領導管理。王明道帶領的教會沒有接受過美國津貼，所以王拒絕參加這個會議。會上，三自會領導人劉良模（地下黨員）指責王明道是反蘇反共分子。大會要求基督教徒參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革命運動。大會期間還開展對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會團體領導人的控訴活動。控訴至高潮時，有人提出：“這些人該殺不該殺？”台下有人喊：“該殺！”從此全國開始基督教控訴運動。

1952年政府對基督教工作人員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全國各地未正式成立三自會組織之前，政府給基督教成立一個臨時性組織——北京基督教保衛世界和平抗美援朝三自籌備會分會。在北京，政府選派王梓仲牧師（日僞、國民黨、共產黨時期的三朝元老）為會長，委派實權人物蕭靜（女）為總幹事，男女青年會的地下中共黨員陳文潤、趙複三、闕學卿等人為骨幹，負責領導教會，對教會工作人員進行思想工作，內容包括組織經常性學習，聽時事報告，瞭解政策法令，動員廣大信徒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和醫藥用品，動員信徒在“革新宣言”上簽名，等等。

1951年夏，在亞斯理堂（崇文堂）第一次組織北京市全體教牧人員和部分信徒集中五周學習班。這是一次試探性的學習，瞭解教牧人員和信徒對三自革新的態度。然後選派一些“思想進步”的人，替換各教會原來的負責人，又選派一些思想積極、有影響的人參加土改工作，培養三自會的骨幹分子。

1952年8月組織北京三自革新集中學習班，全市教牧人員分三批參加學習。這是一次重大的思想改造舉措，由北京市委統戰部、國務院宗教局、團中央、中央統戰部、公安局派出大批幹部成立工作組，直接領導學習。學習內容包括，以愛國主義為主題，認識解放前後的生活變化，認識基督教與帝國主義的關係，認識宗教政策和基督教會的前途以及三自愛國運動的重要意義等等。要聯繫教會和個人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控訴帝國主義傳教士的罪行，解決親美崇美、反蘇反共思想，在大會和小組中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後評估每人的學習成績，進行政治過關。除了以王明道為首的反三自教會人士之外，全市教會及團體工作人員

都先後參加學習，人數總計 346 人。 ??

1953 年 6 月 12 日，在崇文門亞斯理堂正式成立北京基督教三自革新學習委員會（簡稱學委會），會址設在東城府學胡同燕京協和神學院內，政府派王梓仲為學委會主席，蕭靜為總幹事，王毓華（女）為幹部，張應潔牧師為辦公室主任。學委會的主要任務是組織領導全市各教會及團體工作人員，進行經常性的時事政治學習，參加社會各種政治活動。

1954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上海召開全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7 月 22 日，在北京燈市口公理會大教堂召開中國基督教全國代表會議，為了爭取全國教會不同宗派參加三自，決定取消“革新”二字，正式定名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基督教全國會議前後，王明道反三自成為政府的主要矛盾。政府希望王明道參加三自運動，對他採取的政策是“爭取、爭取、再爭取”。全國會議之前，政府選派教會著名的牧長們登門請王明道參加全國會議，均被王拒絕。

1955 年 8 月 7 日，王明道牧師做了最後一次講道，題為《人子被賣在罪人的手裏了》，當晚牧師夫婦與 18 名信徒一同被捕。10 月 29 日，當局宣布三自以外的一切基督教活動均屬非法。隨後，三自會在各地發動聲討王明道的大會，凡支持同情王的信徒，均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逮捕。

王自己在獄中經受 14 個月的折磨之後，終於支持不住，于 1956 年 9 月簽署了警方擬定的一份悔改書，獲得釋放。出獄後，他自覺如彼得一樣背主，在人前否認基督。經過一年多的修養、反思，在一個清晨，王明道這對老夫妻，攜手到公安局，對警察說：“那份悔改書不代表我的信仰和立場，我特來否認我的簽名。”王明道第二次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其妻被判 18 年。

1979 年，很多知識分子希望早日平反，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傳道人却出人意料地拒絕出獄，政府只好用各種欺騙手段，將其拖拉扔出監獄，就像當初把他們扔進監獄一樣。

1979 年鄧小平訪美，美國總統卡特點名要中共釋放王明道，鄧答應年底之前解決。警方告訴王，只要表示一下服從改造的態度，就放他出去。王明道說：“我是無期徒刑，除非政府認錯，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這個監獄。”鄧小平指示：“不管認不認罪，一定要在年底前放出去。”1980 年春節前夕，獄方萬般無奈，只好將王明道強行架出監獄，在他身後關上大門。

因反三自被打成無期徒刑的，在北京還有袁相忱、鄭如崗、陳善理等人。

王明道先生于 1991 年安然歸主。北京有位“三自專家”王某，至 2002 年還繼續寫文章攻擊王明道，將其與李洪志、達賴並列為同樣的罪名。

1957 年 12 月，政府和三自會對基督教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京全體教牧人員、男女青年會、燕京協和神學院全體教職員共 200 多人，集中在府學胡同神學院，每天學習，至次年 7 月 15 日結束，時間長達 7 個月之久。學習期間，明確提出中國基督教在中國近代史中是為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工具，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各方面都屬於剝削階級的範疇，教牧人員和一切工作人員必須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并揪出以三自會主席王梓仲為首的右派 45 人（由政府和三自會內部審定），占全體學習人數的四分之一。

社教運動之後，全體教牧人員馬上被趕到東郊農場勞動改造，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如右派分子）被趕到南苑農場，老弱病殘者下放到城裏工廠勞動。1958 年大躍進，勞動強度極大，他們甚至跪在田地裏爬著勞動，再加吃不飽，很多人身體浮腫，帶病堅持勞動。教牧人員原來都住教會公房，屬於剝削階級，而今不可無償住公房了，都要按規定繳納房租。教會的房產也被沒收。

1958 年以前，北京教會原有 70 多處教會，解放後已經很少有信徒進堂禮拜。運動中提出反浪費，禮拜堂不可閑著無用，教會房產應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于是教會大批房產被移交房管局，無償支援文教和工廠使用。各宗教房產皆如此，佛教的房產最多。許多宗教房產

被政府機關和幹部私人占用、拆除、轉讓。三自幹部認為，帝國主義遺留的房產歸回人民使用理所當然，他們出賣教會財產正是愛國主義的表現。

政府出于外交需要，1958 年之後，北京保留了東西南北四個教堂。東城保留了原燈市口公理會教堂，後因無人進堂，浪費，大堂轉讓給學校。米市大街原聖經會的米市堂，由蔣冀振、趙復三、單天樂負責堂務工作。西城被保留的教堂是原中華基督教會的西四缸瓦市堂，由劉仲和、李克、林祥增負責。南堂即原衛理公會的珠市口堂，由張應潔、楊周懷、闕學卿負責。北堂是寬街教堂，由閻迦勒、石澤生負責。

此四堂負責人，皆由政府選派。他們沒下去勞動，負責各教會的善後清理工作。其中趙復三、蕭靜、陳文潤、闕學卿四人，多年在教會中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其他人則是在教會中有影響，且政治上可靠。

基督教經過社會主義教育的重大變革，北京教會的人事、財產、教務系統已完全納入政府和三自會的一元化領導，徹底成為政府的官辦教會，教會不同宗派的名稱皆被取消，成為統一的“聯合禮拜”。北京燕京協和神學院被取消，合并到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北京保留的四個教堂，都由三自會統一領導管理，每周僅有一次主日禮拜，人數寥寥無幾，四堂的禮拜人數總共有 100 多人。教會就這樣維持到 1966 年 8 月文化大革命。文革破四舊，教會徹底被消滅。

文化大革命消滅宗教，對三自幹部來說那是求之不得，他們覺得三自即將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基督教的歷史終於要在中國結束了。一個三自領導說：“砂鍋搗蒜，一錘子買賣。”基督教在他們手裏死了，他們是有功之臣，一定能撈點政治實惠。他們向紅衛兵極力獻策，成為紅衛兵的參謀。幾個三自幹部甚至組成基督教造反小組，在東單散發反基督教傳單。一位姓王的“三自專家”撰寫《消滅基督教三自運動聲明》傳單，然後叫大家在聲明上簽名，然後叫紅衛兵將此聲明傳單借串連向全國各地散發。王說：“三自運動是給帝國主義保教的保護傘，若沒有三自，基督教早就被消滅了。”王某在教會負責掌管教牧人員的檔案資料，她按教牧人員的姓氏筆劃編號，然後把編序的名單交給紅衛兵，供其按號批鬥。

在米市大街五號，紅衛兵私設公堂，將反動教牧人員和信徒押到三自會進行批鬥，毒打致死，甚至批鬥屍體。在紅衛兵進駐期間，教牧人員除了接受批鬥，還要參加手工勞動，三自和教會皆既被取消，停發工資，每人只按 12 元的標準發給生活費。

1967 年 11 月，政府和三自突然下令，將所有人員趕到郊區西北旺基督教公墓勞動改造。政府在此開闢了天、基、佛、伊四教勞動生產基地，由三自幹部要士璟、林祥增、吳廷萱負責管理。傳統的家庭生活被打亂，有的家庭妻離子散，老幼無人照管，工資停發，貧困交加。初期不許回家，沒有休息日，白天勞動，晚上學習，繼續進行批鬥。勞動首先是削平墳頭，推到石碑，砸碑蓋房，養豬種菜，建食堂，挖墳掘墓，栽種果樹，開水稻田。

1973 年至 1979 年，國內外形勢不斷發展，政府開始恢復宗教活動：一、首先是補發工資，將“四教生產隊”并入民政局西北旺果樹隊，納入農場正式編制，由果樹隊發工資。二、民政局在佛教廣化寺成立宗教人員管理所，將老弱的神父、修女、比丘尼、牧師、傳道人等組織起來，參加手工勞動，由政府統一管理。三、在原木市堂恢復對外宗教活動接待點，只供外國人參加，由三自幹部陳文潤、王毓華、闕學卿和教牧人員殷繼增、劉仲和、石澤生、王耀清等政治可靠的人物負責外事活動。

當時基督教尚未正式恢復活動，我（李克）因病不能繼續在西北旺勞動，就調到廣化寺宗教人員管理所參加手工勞動，1977 年調到天主教南堂工作，參與外事活動。政府認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在天主教工作，政治影響不利，又將我和其他教牧人員調到佛教雍和宮參加管理工作。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文革，對宗教也進行撥亂反正，因反三自被打成反革命遭逮捕判無期的都將無罪釋放。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教會正式複堂。1958年之後，我一直是缸瓦市教會的正式工作人員。文革期間因對政府宗教政策表示異議，在教會恢復之初又發出反三自的言論，引起政府不滿，遂將我排除在教會之外。我向政府幹部據理力爭，稱理當恢復我在缸瓦市教會的工作。將一個基督徒安置在佛教雍和宮工作，顯然有悖當下的宗教政策，政府幹部自覺理虧，終於讓我回到缸瓦市教會。

1981年4月12日，三自會在缸瓦市教會舉行封牧聖典，會上宣布：“按立已經在教會傳道多年，但在劇變的歷史年代裏未獲按立機會的傳道人，特按立石澤生和李克為北京教會牧師。”這是1949年以後北京首次封立聖典。

## 遙祭六姑媽 陳仁德

今天下午4:26分，我正在報社值班，堂弟渝德從西彭打來電話說，他剛接到老家的消息，六姑媽在20分鐘前去世了，享年81歲。剛放下電話，琳姐的電話又來了，說的是同一件事情。我不得不相信，父親的最後一個同胞已經永遠的離我們遠去了，至此，父輩七個兄弟姐妹已經全部謝世。

這是我們家族一個時代的結束。

就在昨天，我和琳姐還在電話上約定，春節一定要去鄉下給六姑媽拜年。沒想到，就在春節還有最後幾天就到來的時候，她却永遠的離開了我們，思之曷勝悲痛。

六姑媽叫陳懋蘅，是我爺爺的么女，可謂出生名門。很小的時候，六姑媽就接受過嚴格的家庭教育，她的女紅技藝十分精巧，剪裁縫紉挑花綉朵無一不精，那時沒有聽說過縫紉機，家裏大人小孩的衣服都是我的幾個姑媽自己手工縫製，所有的枕套帳檐都是她們自己手工刺綉，那真是美麗，現在看來全都是精美的藝術品了。六姑媽的手藝非常好，我還記得，小時家裏吃面，不管是麵條還是餛飩（我們那裏叫包面），都是六姑媽用擀面棒擀成一張張像紙一樣薄的面皮，再疊在一起切成的麵條或者餛飩皮，麵條又細又軟，餛飩皮又勻又薄，比起後來那些機器壓的好吃多了。一大家人，至少十多個人吧，六姑媽從合面到下鍋，好象並沒有要多少時間就全做好了。

有誰願意相信，像六姑媽這樣一個善良能幹的人，一生的大部分歲月竟是在悲劇中度過的。那個荒唐的時代，強加給了她過多的苦難。

在六姑媽還是個少女的時候，我爺爺就將她許配給了天塹鄉著名紳士陶華軒的兒子陶奎，陶奎一表人才，剛從朝陽大學畢業回家，在一所小學當校長。陶家在當地是很有名的，陶華軒有三個弟弟，叫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對這樣的門第，我爺爺當然是滿意的。陶家也為能和我們家聯姻而高興。

1949年，共產黨進城後，一切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地主開始成為階下囚，我的么叔從重慶寫信給我爺爺，說六姑媽的婚約應該作廢，不能嫁到陶家去，否則要受罪。我爺爺却聽不進，他是飽讀詩書之人，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不可失信于人，硬是在1950年正月十二那天將六姑媽嫁給了陶家。那年六姑媽23歲，從此，六姑媽就陷進了萬劫不復的深淵。1962年，我爺爺在臨終前流著淚在遺囑中寫道：“今已無可奈何！惟有死後坐十八層地獄以抵罪

耳。”

六姑媽嫁到陶家的當年，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恐怖已極的運動便殺氣騰騰的開展起來了，他們家的所有財產被搶奪一空，民兵們擁到他們家去分勝利果實，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六姑媽結婚的陪嫁包括箱子、雕花床、罩子（蚊帳）等全被搬走，他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當場從身上剝下來，就連泡鹹菜的轆子都不放過，最後連尿罐都拿走了。陶華軒老大人為自己準備的棺材和一座很氣派的生塋，也都成了民兵們的勝利果實。

這還不算，接下來就是極其殘酷的鬥爭。

民兵們把陶華軒老人的兩個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再往屋梁上吊。寒冬臘月，民兵們把陶老夫人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菲薄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裏，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裏，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那是好冷的天氣呀，天上下雪呢，水缸裏的水冷得像冰，陶老夫人 60 多歲了，怎麼受得了。我六姑媽和全家人被強行押在旁邊看，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抹淚。

陶家的二哥是國民黨時期天塹的鄉長，也挨了不少的鬥。二嫂更慘，她的手被點天燈。什麼叫點天燈？就是在手窩裏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

六姑爺陶奎在學校裏聽說了父母被鬥爭的事，坐立不安，就給天塹鄉的鄉長寫了封信，請鄉長關照一下父母，他和鄉長有舊情。誰知鄉長把這封信交了出去，說陶奎沒有和父母劃清界限，六姑爺就這樣被撤消校長職務開除回家了。民兵們硬要六姑爺去鬥爭會上打自己的父母和哥哥嫂嫂，說是這樣才是劃清界限。六姑爺是知書識禮之人，怎麼能做這種缺德的事呢，但是民兵們用棍棒逼著他，非要他去打，不然就打他。他只有含著眼淚去打，晚上回家後，六姑爺和六姑媽偷偷地相對痛哭。

陶華軒老大人，還有叔公陶馥軒和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據說是罪大惡極的人，被押到烏楊鎮關起，天天吊打。這時已經快要過年了，六姑媽和姑爺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最後終於得到消息，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事前並沒有告知他們三人，只是叫他們背著鋪蓋卷沿河邊走。臨近神溪口時，遠遠的看見河灘上搭起了公審台，陶華軒老大人一下就明白了，不禁仰天長嘆：“今天是我的好日子啊！”隨即父子叔侄同時罹難。六姑媽和姑爺是幾天後才去收尸的，尸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看著父親、叔叔和哥哥無端橫尸江頭，六姑媽和姑爺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裏流。

這年春節，六姑媽家裏沒有一顆米一滴油，夫妻二人就沿著村子去要飯。六姑爺是朝陽大學學生、小學校長，一輩子為人善良，沒有做過虧心事，而且是很顧面子的人，六姑媽也是大家閨秀，過年的時候雙雙去走村要飯，是多麼痛苦的事啊。

六姑媽的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還要經常挨鬥，不久死去。

1961 年，六姑爺在特大饑荒中餓死，丟下六姑媽和只有幾歲的兒子——我的表弟陶新明，那時我六姑媽才 34 歲，許多人給她做媒都被她堅決的拒絕了，她就帶著幼小的孩子艱難度日，我爺爺在日記中對六姑媽有這樣的記述：“蘅女過河來，談及該區隊伙食團已經停止吃紅苕，每人每頓只供應蕎子二兩。此子鳩形鵠面，枯瘦如柴，情實可憫。”“蘅女每日抱病勞作，又出夜工，沒有休息時間，情實可憐，此子將死于是鄉矣，一嘆！”

我爺爺是 1962 年 7 月逝世的，也是死于饑餓。5 月 1 日那天，他已經不行了，他堅持著翻開已經寫好的遺囑，用戰抖的手艱難的握住筆，在後面添上了歪歪斜斜的一段《補抄》：“蘅女身體不強，無力耕作，不足她母子二人之伙食，饑寒之險，在所難逃。我死之後，希望嫂嫂和內侄們大力照顧，我也得瞑目于地下也。1962 年 5 月 1 日寫。”我每次讀到爺爺的這段血淚所成的《補抄》，無不為之感傷。

生活上的艱辛已經難以忍受了，然而更可怕的却是政治迫害。六姑媽是 1950 年結婚到陶家的，根據共產黨的政策，應該以 1949 年以前三年的經濟狀況來劃定成分，六姑媽是無論如何也劃不成地主的，可是中國的事情就有這麼怪，他們硬是把六姑媽定為地主成分，而且“享受”地主的政治待遇，什麼訓話呀鬥爭呀苦役呀，一樣都不少。那真是喊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六姑媽就冤枉當了幾十年地主，表弟陶新明當然從小就“享受”了地主崽的待遇，在歧視中長大，成了文盲一個，除了種田什麼也不會。

我伯父還在我爺爺之前就餓死了，爺爺死後，我父親和我么叔一直牢記著爺爺的遺囑，儘量照顧六姑媽，但是，在漫長的恐怖與饑寒交織的人人自危的年代裏，誰又能救六姑媽出水火呢，父親和么叔也只能盡力而為。2003 年，父親在經歷了一次嚴重的腦中風剛剛好轉後，堅持要到鄉下六姑媽家裏去度過自己的 87 歲生日。到六姑媽那裏有很長一段山路不能通車，我們是請人將父親背過去的。父親和六姑媽一見面，兩人都哭了起來，哭得好傷心，我們勸了好久才勸住了。那天天氣晴朗，我們把酒席擺到屋外的院壩裏，大家一起向父親和六姑媽敬酒，真是喜氣洋洋。誰也沒有想到，歷盡無數苦難後，父親和六姑媽都是如此高壽。

2005 年冬天，父親去世了，我們在電話上將噩耗告訴六姑媽後，六姑媽當即失聲痛哭，要下山渡江來奔喪。那時六姑媽已經很衰弱了，我們害怕她到靈前承受不了痛苦，就沒讓她進城來，結果她在家裏哭了幾天幾夜。現在想起，還是應該讓她來呀。

去年回家過年，初二上午，我就和儲兄瑜妹一起，過江登山，去給六姑媽拜年。她看到我們高興極了，忙著和新明一起去做飯款待我們。新明 50 出頭，滿手硬繭，頭髮花白，還好，他兒子熙忠再沒當“地主崽”，從商校畢業後已經在復興鎮工作多年。我們去了一會，他就騎著摩托趕回來了。這孩子知道他奶奶一生辛苦，對奶奶很孝順。那天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六姑媽，臨別時，她老人家堅持沿著窄窄的田埂走了很遠來送我們，一邊走一邊說：“我這些內侄兒好啊。”

本來說定了 2006 年農曆六月初五我們一起去給六姑媽拜壽，那天是她八十大壽，結果到了那天，我却遠在康藏高原的路上，失去了給她拜壽的機會。

六姑媽永遠的走了，我倒真的希望有傳說中的陰曹地府，那樣的話，她就可以和六姑爺，和我爺爺奶奶，和我父親他們相聚在地下了。

---

補白：朱守中原是上海某師範學校副校長，因反右中“動搖退却”被開除出黨，作為上海支援寧夏大隊的一員，到寧夏中衛縣中學任教。四清運動中，朱被開除教職，下放農場。他一直不服，常有反革命言論，諸如江青妄想以老佛爺慈禧自居，葉群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麼也爬不進中央，他們這樣做豈不是成了夫妻黨？把林彪的名字載進黨章，這還叫什麼共產黨黨章？陳伯達自詡為中央唯一的理論家，看來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國的貝利亞，寧左勿右，不知有多少好人吃了他的大虧，等等。一打三反中，朱守中被槍斃。

---

兩個壞分子 崔光宇

我們的村子很小，文革來了，湊齊四類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壞分子”的頭銜加給誰，當時是頗費了一番工夫的，最後是把村上兩個被認為是最聰明的人定為壞分子。

這兩個人，一個在天津銀行當過職員，一個在天津布店當過學徒。兩人算是村裏的知識分子，見過大世面，人緣也都挺好，自被打為壞分子，仿佛一夜之間老了幾歲，腰也變得彎曲起來，見誰都是一臉卑微，有人從身邊走過，會馬上停下來，謙卑地打過招呼，身子側轉，

將路讓于別人，待人走過後才邁著細碎的步伐小心走過，一臉淒惶。

銀行職員還寫得一手好字，真草隸篆無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個很有造詣的書法家，但那時却成了加深自身罪狀的證明。家中收藏的字畫書籍被全部燒掉，毛筆硯臺被砸爛，雖然後來經常被大隊叫去寫各種大字報，筆下的字迹仍是鐵鉤銀畫、蒼勁有力，但他那誠慌誠恐的樣子，看了讓人揪心。

那時冬天特別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覺醒來，推門一看，已是大雪封門，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掃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們必須早早起來，將雪掃淨，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見不到積雪。

他們的任何一點不慎，都可能為自己招來屈辱。任憑他們怎麼小心，也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不測之禍、不測之辱隨時會降臨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時，生產隊的馬車拉高粱，中途遺落了幾穗，正好被布店學徒發現，便隨手撿起，放在自己的背筐，進村時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一頓暴打，並將高粱穗串成串，挂在脖子上游鬥，自己敲著鑼，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盜分子”，那種對人格的侮辱，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1976 年毛去世時，銀行職員晚上喝了兩盅酒，被人舉報到大隊。這個時候竟敢喝酒，當然是對偉大領袖懷有刻骨仇恨。這不是一般的酒，是慶賀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大隊幹部立即組織民兵抓人，連夜召開批鬥大會，辦了一個多月的學習班，強迫徹底交待自己妄圖變天復辟的險惡用心，並不時招來一頓拳打腳踢，一個月後被放出來時，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

這兩人都有幾個兒子，而且個個聰明帥氣，但因受家庭影響，都找不上媳婦，成了老光棍。文革結束摘帽時，兒子們早已錯過了結婚成家的年齡。前年，銀行職員的最後一個兒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斷了根。布店學徒只有小兒子娶了媳婦，還腦子有毛病，生了個傻兒子。兩個家庭，就這樣輕易地毀掉了。

---

補白：張師亮，河北涑水人，早年留學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抗戰期間與範文瀾、嵇文甫在河南大學并稱進步三教授，後為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西北師範學院（甘肅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前身）教授。抗戰勝利後，張到北平負責軍隊總務工作，後隨傅作義起義，受到共產黨北京市長葉劍英表揚。後到西北師範學院任校辦公室主任、政治課教師，因歷史問題，又調歷史系任教，曾用馬克思的《資本論》學說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在該系世界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上，因批評毛澤東“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阻礙經濟發展時才會發生激烈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有規律的，階級鬥爭不是萬能的，被造反派指控為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後被槍決。

## 刑事罪名種種 小 閑

去外地出差，與一群刑事法官下去調研。山路漫漫，大家說笑話解悶。一位老法官說，他 1975 年剛到法院工作時，國家根本沒有刑法，一本 1950 年代起草的刑法草案就是辦案參考。由于缺乏法律依據，定罪量刑，尤其對罪名的認定，隨意性很大。為了爭取政治正確，那時任何罪名之前都得冠以“反革命”三字，殺人就是反革命殺人罪，強姦就是反革命強姦

罪。有一次，某村發生奸尸案，擱現在，當然定侮辱屍體罪，可是那時這就屬於疑難案件，法官們討論了半天，始終沒有結論。最後承辦人突發奇想，擬定了罪名，曰反革命不講衛生罪。大家哄笑。

另一位法官接著講了另一個罪名故事。“90 年代我們搞案件復查，發現一個案子。有位年輕工人，晚上做夢，夢到和車間一名漂亮女工發生了關係，早上醒來很興奮，到處向廠裏人吹噓，連細節都說得一清二楚。消息很快傳到那女工耳朵裏，姑娘是個烈性子，羞憤難當，居然上吊自殺了。年輕工人很快被保衛科抓了起來。案子到法院，怎麼定罪呢？有人說該定反革命流氓罪，有人反對，認為那年輕工人只是做夢，並沒有真正耍流氓，就算硬說耍流氓，也是口頭耍流氓。最後還是法院院長拍了板，反革命夢奸罪，判刑 10 年。”

一位女法官嫌這些案例惡俗，便講個帶點浪漫色彩的故事。有個村子，許多知青在此下放。有一段時間，女知青們紛紛投訴，說總有人偷看她們洗澡。村裏很重視此事，安排民兵和男知青輪流值班。終於破案，原來是村裏一個二流子所為。案子到法院，定罪又成了問題。有人提議定為反革命流氓罪，可人家只是偷窺，沒有動手啊。最後還是一位軍代表有見地，想了個又貼合實際又浪漫的罪名——反革命偷看青春罪。

大家聊得熱烈，笑得聲大，一位一直閉目養神的老同志開口道：“你們都說完了吧，我給你們說個猛的。一個真實故事，發生在昆明，80 年代平反錯案時，我親手糾正的。兩個年輕工人，其中一個家裏有點小錢，買了塊上海牌手錶。那時候有塊上海手錶，可是很不得了的事情，跟你們女同志現在有個 LV 包包差不多。買表的那哥們兒，有一天無聊，跟朋友打賭說，你如果把路邊那坨屎吃了，我就把手上的上海表扒給你！朋友一聽，還有這麼好的事，二話沒說，就把路邊那坨屎吃了。吃完了，漱了口，就對甲說，把表給我吧。這個時候，那傢伙反悔了，賴賬不給。朋友火了，要打他。那人只好說，那我也吃一坨屎，就當還你了，于是忍著噁心，也吃了路邊另外一坨屎。不同的是，朋友吃的是新拉的屎，沒事兒，那人吃的是陳年舊屎，有毒，當時就不行了，送到醫院，人已經死了。出了人命，單位當然不答應，把吃屎沒事的那位扭到公安機關。怎麼定罪呢？反革命殺人罪？反革命貪婪罪？都不妥，最後定為反革命賭博吃屎致人死亡罪，判刑 15 年。”

---

補白：蘭州農校教師，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死裏逃生回來的毛應門先生的小妹毛應星，因口誅筆伐林彪等人，在甘肅省靜寧縣城西八裏橋畔被槍決。甘肅省人民醫院技術副院長、外科主任，著名外科專家、主任醫師李樹華，給甘肅省皋蘭縣農民做肺葉切除手術，最終病人不治而亡，造反派誣陷他搞階級報復，故意殺害“紅五類”，以反革命殺人犯的罪名判其死刑，執行槍決。槍斃李樹華那天，由于刑車要經過蘭州市郊東崗坡下的五裏埔大橋，甘肅省衛生學校的造反派將全體牛鬼蛇神集中在橋頭，列隊觀看，接受教育。熊如岩、李志橋、王繼光等回到牛棚後，嚇得精神錯亂，其後一個個自殺失蹤，後來只有熊如岩的屍體找到了。

---

## 一幅反革命的骨骼 黃 芩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上初中，學校開設生理衛生課。任課老師是一位北大畢業生，說話細聲慢語，不慌不忙，動作優雅，穿著得體，課講的也很生動，在那個年代是不多見的，因此她成了我最喜歡的一位老師。

有一天，講人體骨骼結構，那位老師推著一個挂著一副骨骼的架子進了教室。到了教室，那骨骼在架子上晃呀晃的，好長時間沒停下來。當時我認為是骨骼模型，不是真人骨骼，因



而看上去雖感不舒服，心裏倒也不太害怕。上課了，老師細聲慢語告訴我們，這是一副真的骨架。我心裏咯噔一下，馬上感到渾身不舒服。可能不止一個人像我這樣流露出害怕的表情，那位老師就面帶微笑地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反革命的骨架，是在鎮壓反革命的時候被槍斃的，一個 50 多歲的男人。

仿佛是一服鎮靜劑，老師的話讓我們安靜下來，我頓時感到心裏踏實多了，不再害怕，認真地上完那堂課。下課時，那副骨架又隨著老師的身影晃呀晃呀的去了。

幾十年之後，我常常回想，多麼可怕的邏輯啊，多麼麻木的人群啊，多麼成功的洗腦運動啊，以至於一個半大的孩子，當聽到那是反革命時，居然就可以不用再害怕他的骨骼，可以心安理得地上課，可以緊盯著那副骨架只想瞭解人體的結構，可以覺得他就應該挂在那裏晃呀晃的給人看。他們不僅僅是殺了那人的肉體，也同時殺死了我們這些孩子和老師的靈魂。

## 我的祖輩 張 健

我媽的爺爺是北京通縣最大的大地主，叫金山，有一萬多畝地，但是人家給他起個外號叫“彎黃瓜”。為什麼叫“彎黃瓜”呢？因為他家種的黃瓜，直的好的拿去賣了，自己吃的都是彎的壞的。他跟長工一起做工，跟長工一起吃飯。他最初是富農，後來到張家口外賣柿子，掙些錢，土地越積越多，成為大地主。

我媽媽的父親叫金志望，是右派。中共剛建國不久，辦個什麼黨校，他作為幹部參加培訓，當時他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劉少奇、朱德等人經常去黨校講話，有一次我外公請劉少奇在他筆記本裏簽字，後來這個簽字就成為他上了劉少奇黑船的證據。外公家庭出身大地主，再加上有劉少奇給他簽過名，黜倒得大了。我小時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看見外公到我們家這邊來掏大糞。他是北京大學農業系畢業呀，但是最後被打倒了，到農村各家掏大糞。我看見他，他也不跟我說話，我問我媽：“為什麼外公不跟我說話呀？”我媽說：“他不行，他成分不好，他跟你說話，別人就去彙報了。”我當時很小，不懂這些東西。有一次，我外公被打得很慘，渾身是傷，身上被人倒了很多氨水，一個農民把他拽到一邊，給他潑上點水，說：“沒有事了。”

我爺爺呢，是地富反壞右裏的壞分子。為什麼是壞分子呢？過去我家在北京城前門有兩家茶葉店，一個叫“大富記”，一個叫“小富記”，我爺爺既是品茶員，又是老闆。我爺爺結交三教九流，不講國民黨、共產黨、土匪、漢奸，都是好朋友。1949 年共產黨打進北平了，我爺爺也舉著旗去歡迎去，然後就成為歡迎解放大軍招待所的所長。在那裏，他做事有過去封建社會老闆的習慣，被刷了下來，于是就毅然會回通縣老家農村，參與土改分地。我爺爺分得十六畝地，不久就把這些地全賣了，吃了喝了玩了。很快就是合作社，許多人苦幹了幾年，掙得家大業大，買了大驢子大馬，此時合作社一來，全被合進去了，我爺爺卻以純無產階級入社。他多次跟我講過這樣的話：“我早知道那毛澤東不會白給我地的，所以我就把分得的地全賣了，然後我光杆兒入社，一點虧沒吃。我走毛澤東前邊。”

阿克頓語 焦國標書

---

一、歡迎來稿和薦稿，也期待建議和指正。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mailto:xyc1971@gmail.com)。

提 三、本刊聯絡手機：133 6658 6793。

四、有意資助《黑五類憶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五、通訊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示 305 甲 110 號 焦國標，郵編 100091。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銀行北京北大支行，  
賬號 4080702-0188-038026-9，戶名焦國標。

## 《黑五類憶舊》第十一期 201103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神農架野人的第三個品種 焦國標

神農架野人的傳說太久太多了，每個中國人的大腦裏都形成了自己關於神農架野人的觀念。在我大腦裏形成的關於神農架野人的印象裏，神農架野人有兩種：一種屬於某種迄今未明的生物，另一種屬於一種超自然的神秘鬼怪。拜讀了本期彭小明先生的大作《神農架日記節選》，我的關於神農架野人的分類知識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即神農架野人還有第三種——因社會政治原因逃進神農架從此與人世隔絕的與我們一模一樣的普通人。

彭小明是復旦大學中文系 78 級的學生，現居德國。三年級（1981 年）暑假期間，他曾去神農架進行民歌采風。此行固然采集到許多“淳樸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更聽到了一些流傳于當地而不為外人所不知的關於神農架野人的故事。他們告訴他，外間傳說的神農架野人，其實並非野人，而是從人間逃入深山的地主富農。日記中馮靜美（化名）的故事，就是林區一個婦女幹部講給小明聽的。“馮靜美的家庭故事梗概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是給我的震撼是難以磨滅的。”小明兄在日前發給我的 Email 中寫道。當時那裏的幹部們特別叮囑小明，這種消息“過去一直不讓泄”，因而告誡小明不要對外講。

漢語裏無主（語）句很多——過去誰不讓外泄？這裏省略了主語，當然是當地政府。小明向他們承諾，保證守口如瓶。“但是我心裏十分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訴人們，決不會永遠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裏總不能平靜。”

小明在另一篇寫給我的 Email 中說：“我一直覺得要把這個真相告訴世人。共產黨的樣板戲《白毛女》是一個關於白毛仙姑的傳說，但是並不排除它的歷史真實性。我聽到的這一傳聞，也很可能是一個真實客觀的存在。”白毛仙姑的故事，事實已經證明確有其原型。我堅信，讓彭小明先生 30 年來一直內心不安的馮家故事，也一定是神農架地區確曾發生的真實的歷史。

神農架野人的傳說比地主富農的歷史長久得多。換言之，在共產黨製造地主富農之前，神農架早已有野人。不用說，那時的第三種野人不是被土改、鎮反等政治運動逼進神農架的地主富農反革命，而是因其他社會政治原因不得不逃進深山、遠離塵世的弃民。我在給小明

兄的回信中寫道：“如此說來，當今傳說的神農架野人有一個另外的來源，即政治賤民；那麼歷史上神農架的野人也完全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社會政治原因變成的野人。公開馮家的故事，意義非同尋常。謝謝你！”

2011-2-28 北京

## 目 錄

父親未享的臨終關懷·····	陳士濂 (04)
範中奎的鋤把·····	俞加深 (08)
上海大抄家·····	劉文忠 (10)
整人專家衣竹林·····	聶步騰 (14)
楊毓東牧師·····	劉鳳鋼 (19)
母親的人民證·····	士 濂 (29)
我經歷的政治迫害·····	李大立 (33)
欽州剖腹食肝風·····	佚 名 (36)
一句話右派·····	華 中 (38)
吳天石的兒子·····	李大立 (40)
我跟蘇東坡不一夥·····	漢 男 (42)
父母拴手一起跳河·····	勞布藏 (45)
武宣吃人肉事件·····	劍 客 (48)
送瘟神·····	武 昌 (50)
小閣樓男女混居記·····	何 爲 (51)
智對紅衛兵·····	漢 陽 (54)
阿爸、叔叔和我·····	秋什江 (55)
惡捧劉戶籍·····	晴 川 (57)
無檔索右派馬叔叔·····	喬海燕 (58)
把交代寫到極致·····	馬 南 (62)
蒙古牧民阿拉坦·····	巴雅古特 (64)
從杭州到青海·····	陳士濂 (65)
父子株連，兄弟反目·····	文 忠 (76)
囂張的右派·····	馬 赫 (83)
學習班往事·····	江 城 (85)
林雲濤復仇記·····	南 周 (91)
神農架日記節選·····	彭小明 (94)
父親的一九四九·····	曾慧燕 (98)

## 父親未享的臨終關懷 陳士濂

我的老家在浙江浦江縣。小叔陳肇英，國民黨元老，蔣介石的結拜兄弟，1926 年中山艦事件時任虎門要塞司令，受蔣之命，帶領親信抓捕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因此被中共定格為反共的國民黨右翼人物。

1949 年，小叔携孀娘去了臺灣，一直在老家管理家務的大叔隻身倉皇出逃。我的父親

1947 年致仕，歸裏後始終固守家園。他雖然供職國民政府多年，曾擔任市縣稅務局局長等職，但自信并無血債，在鄉民中口碑尚好，故抱有僥幸念頭，希望能獲得新政權的寬大，想在與家人的團聚中了此殘生。

1950 年秋末，父親被拘捕入獄。51 年春節後不久的一天，村裏傳出消息，第二天鄉上要召開公審大會，有一批人犯要從縣上押送過來。那時正是鎮反高潮，公審大會常在較大的村鎮舉行，隨後就地槍決被公審者。村裏有關係較近的人偷偷來我家，說明日犯人中很可能有我父親，讓我們做些準備。

大人們除了商議後事，覺得家中最好有個人去參加大會，以見我父親最後一面。誰能進得這森嚴的會場呢？村裏的農會、婦女會、民兵、自衛隊等有組織的隊伍，我家的大人沒一個挨得上邊，唯一可能進會場的只有我。那時我 12 歲，正在村旁的中山中學上初中，于是法場探父的重任就落在我肩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等候在學校去鄉政府的路旁。每逢鄉里有大型集會，學校的軍樂隊都要參加。果然，這天也不例外。當敲著銅鼓吹著軍號的隊伍來到跟前時，我突然從路邊闖了進去，向帶隊的老師說明了原委，希望他們能帶我進入會場。老師很通情達理，答應讓我隨軍樂隊同去，但一再囑咐我：“你可不能在裏面哭喊。”

大會在一個曬穀用的大明堂裏舉行，原來空曠的場地上站滿了人，臨時搭就的主席臺上坐著幾個軍政幹部。宣布開會後，先是奏樂，我的那些同學們急忙吹打起來。接著是一聲威嚴的吆喝：“把犯人押上來！”一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兩人押一個，從場外將犯人帶進會場。

他們就在軍樂隊前經過，一個，又一個，突然，我看見了犯人隊伍中的父親。入獄不到一百天，父親的變化太大了：本已蒼老的臉，現在又瘦削又憔悴，加上滿頭的白髮，滿臉的亂須，真是慘不忍睹。他被推搡著踉踉蹌蹌一閃而過，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混在軍樂隊中的我。

受公審的犯人被押在主席臺的一側，離軍樂隊不遠，我能清楚地看見父親。他一直低著頭，在我眼前晃動的只是他那一頭白髮。

主席臺上有人在宣讀一個個犯人的罪狀和對他們的判決，我多麼希望父親能在這難得的瞬間抬起頭來張望一下，這樣他就可以見到我，他的目光就能和我的目光相接。我是他最小的也是最疼愛的兒子，能見到他對他將是多大的安慰啊。但他沒有抬頭，在我眼前晃動的始終只是那一頭白髮。我想走過去，輕輕地喊他一聲，但我沒敢舉步。我想起了臨來時老師的囑咐，我知道一個佩帶紅領巾的少年，要在會場上喊叫那犯人父親，將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但是，這很可能是最後的一次機會。我怎麼辦？怎麼辦？我現在只能寄微弱的希望于判決。

我注意到，前面的幾次判決都是引用法律的某一條款，隨之傳來的就是無情的槍聲。當宣布父親的罪狀并引用法律條款時，我希望不再是那一條。確實，條款的引用與我所希望的那樣與前邊有了變化，這是否意味著父親與那些有血債的土匪有所區別，因而判決也會不一樣？我正暗自這麼思忖，父親已從主席臺邊被拎出去了。動作是那樣的快捷，我都來不及最後看他一眼，就聽見了一記沉重的槍聲……

作為縣內知名的官僚地主，作為反動陣營中的成員，父親的被處決，在當時是理所當然的事。其時尚年幼的我，也明白這個道理。後來在全校大會上，我在老師的動員下，上臺揭發我父親的反革命罪行。令我遺憾至今的是，父親臨刑前我竟沒能讓他最後看我一眼，沒能讓他聽我最後叫一聲爸爸！兒子對父親的這一特殊臨終關懷，再也無法兌現！

父親的屍體，是由我哥和村裏的親友抬回的。母親哭泣著撫摸屍體時，發現他穿的水獺皮袍子領口處被槍彈打壞一小片。第二天出殯，預定抬棺材的幾位親友却受到駐村土改工作隊董姓隊員的告誡，不許他們為反革命效力。看來只有得到董的同意，父親的靈柩才能抬入墓地。我母親從他人口中得知，董非常屬意我父親那件皮袍，就連忙趕去找他，答應以一擔穀子的價錢將皮袍子拱手相讓。那一擔穀子後來也並沒有抬進我家，因為我家還欠著政府稱為“餘糧”的數額龐大的剝削賬款，那穀子就作為欠款的一部分被扣除了。父親的皮袍被從

身上剝了下來，但遺體總算被恩准由那些親友送進了墳塋。

我的父輩解放後或逃或死或關，我的同輩兄嫂廣受株連。我的二嫂于雪蘭，三歲時由我的大嬸抱養來做我二哥陳述的童養媳。二哥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1925 年欲回家完婚，被我小叔陳肇英止住，參加了東征，在淡水戰役中陣亡。蔣介石曾為此致陳肇英唁函：“若侄即吾侄，為國捐軀，深表淒楚。”作為未亡人的二嫂，從十七歲開始在我家守寡，其職責就是伺候公婆，撫育侄兒侄女，並無惡行，土改時亦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且因婆婆年老體弱，由她頂替婆婆接受批鬥，挨罵被打。婆婆去世後，雖然名義上給她過繼了子女，但都不在身邊。2007 年 90 歲時，二嫂孤苦伶仃地在老屋去世。後來我在 1998 年廣州出版社出版的《黃埔軍校將帥錄》裏查知，二哥陳述在 1924 年軍校學習期間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及火星劇社活動”。可是這位革命烈士的未亡人，竟然在共產黨奪取了政權後，低頭彎腰地當了 30 年的“地主婆”！

我的同父異母兄長陳士琨，畢業于福建師專，曾任教于連江縣中，1947 年回中山中學執教，小叔去臺灣後由他接任校董事長。土改時，他被接管後的校方解聘，驅回鄉村定為地主分子受管制，從 30 歲後就一直在家務農。1987 年，浦江縣法院以錯定成分撤銷其地主分子帽子，但其時的他已近古稀之年，這份遲到的改判書已無實際意義。

2009 年，中山中學舉行 70 周年校慶，他以學校老董事長身份受邀，却被冷落在末席。但他已有一種苦澀的滿足：整整一個甲子了，還能在有生之年重回這所他服務多年的學校，是多麼的難得啊！更可憐的是，因受他牽連，其子女無一人參軍招幹，沒一個有初中以上的學歷，全都務農或打工。有一次回家，在村頭雜貨店裏我遇見正在打牌的他的兒子。只是玩的五毛、一塊的小麻將，竟讓我這位侄子在輸錢後發出慨嘆：“現在我們才是真正的窮人！”聞聽此言我一陣淒然，我最多只能偶爾接濟哥哥，對於他貧困的下一代，實在是無能為力！

---

補白：共產黨對待日軍戰犯相當寬容和人道，撫順戰犯管理所伙食豐富，所關押的日本軍人都是直接負有戰爭罪責或親手虐殺殘害抗日志士和人民的侵略者、法西斯三光政策的罪犯和凶手，但是沒有酷刑和虐待，沒有死刑和無期徒刑，最高刑罰為二十年，而且都沒有服滿刑期，大多在十年左右獲釋。國民黨軍政人員中，不少人是抗日勇士，忽然成為內戰敗將和勞改犯。他們的刑期動輒十年十五年，上訴被認為是對黨和政府不滿，給予加刑。這樣的冤屈至今沒有全面系統的伸張。還有大量默默而死的囚徒，無人為他們申訴，連名義上的平反都沒有得到。

彭小明

---

範中奎的鋤把 俞加深

範中奎是我在青海省剛察縣青海湖勞改農場時的難友，又是江蘇啓東同鄉。老範比我早到這個農場，在農場趕上了那場大饑荒。老範是一個趕牛車的把式，大饑荒那一陣，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早晨套車把餓死的三五個勞改犯尸體拉走，埋掉。每埋掉一個死人，老範就在他的鋤把上刻一道痕。埋掉的人，沒有墓地，也不立墓碑，只是在東山脚下挖個坑，扔下尸體，蓋上幾畝沙土，別讓野狼扒走吃了，就算萬事大吉。

老範常常給我講，那時人人浮腫，很少有人出工，經常有人拉肚子，一拉稀就離鳴呼哀哉不遠了。活著的人，白天曬太陽，天黑後強打精神，在監房牆角架三塊土胚，用破鍋炒青

稞，然後整夜不睡，慢慢嚼著半生不熟的青稞粒。有的人嚼起來無法停止，吃撐了就喝涼水，第二天早晨脹死了。

這些人白天不出工，夜裏監房裏哪來的青稞？老範說，是出工的犯人與不出工的犯人私下交易而來的。出工到打麥場上揚場的，趕馬車拉糧食的，打掃麥場的，都有機會接觸糧食。比如打掃麥場的，把打掃起來的馬糞放在水渠裏淘洗，像淘金那樣，可以淘出許多青稞粒，曬乾後就裝進由勞改服褲腳縫製成的黑色布袋裏。

勞改隊禁止犯人將任何食物帶進大牆內。出工的犯人天黑整隊回監時，爲了查禁青稞，獄方在大門口挂上馬燈。每個犯人報數後，他們還要用手電逐一照其雙手和褲腿，看手裏是否拿有東西，褲腿是否被扎起來。

那麼他們用什麼高招將青稞帶進大牆呢？老範告訴我，玩魔術。預先在黑布袋上栓一根綫，等隊長用手電照著報數時，就將手裏的黑布袋扔在身後。隊長照過，說“進”，犯人就拉緊黑綫，將黑布袋收入腋下或懷裏，列隊進院。出工的犯人就拿這些挖空心思帶進來的青稞，換不出工犯人平時省下來的新勞改服、鞋襪等物。

文革期間，我被卷入獄內一樁冤案，沒日沒夜遭到慘無人道的批鬥。說是批鬥，其實比酷刑還厲害，二十天下來被折磨得體無完膚，真是生不如死。批鬥期間，範中奎從未動我一手指頭。粉碎四人幫後，我提前獲釋，後來托人打聽範中奎的下落，說兩年前因病故世了。我不善罷幹休，親自去東山亂墳崗探望。但見一個個風沙吹成的小丘，沒有木牌和石碑，這就是勞改犯們的最後歸宿。幾十年過去，至今我腦海裏始終忘不掉範中奎的鋤把，上面的刻痕足有數百道之多，那是經他手埋葬的尸體數。

---

補白：那些年，每到歲末，勞累一天之後，不僅要參加單位對我的評審會，還要參加居委會的評審會，因爲誰都可以管我。1971年12月下旬某晚，居委會開我的評審會。居委會主任致開場白之後，一幫街道積極分子紛紛發言，批判我改造不積極主動，甚至抗拒改造。其強詞奪理、無事生非、捕風捉影，我都作恭聽狀，會場氣氛相當嚴肅。最後，居委會治保主任作總結。她先是概括衆人的發言，指出剛才“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都是爲我好，接著告誡我今後要積極主動改造自己，那樣，前途就是很光明的。如果還像以前那樣，不積極主動改造，就不會有好下場。她越說越激動，忽然一拍桌子大吼一聲：“官僚！”指責我平日不把幹部放在眼裏。我一聽這兩個字，就明白了自己平日在這幫人心目中的印象。這是無意間爲我提供一面鏡子，讓我看見了平日的自己。我參加過無數次此類評審會，幾乎每次都令我憤慨，唯獨這回令我欣慰，印象深刻，因爲它讓我看見了自己的人格尊嚴。

---

上海大抄家 劉文忠

1966年紅八月，大上海變成腥風血雨的大海洋。過去整潔的南京路，如今成爲一批批紅衛兵橫行滋事的恐怖之路。許多紅衛兵，手裏拿著剪刀，隨時隨地搶上前去剪過路小姑娘的長辮子，過路人的小褲腳管也在被剪之列，燙髮的婦女更被殘暴地剪成光頭。十裏長街，處處慌亂，處處痛哭，不法之徒、流氓阿飛趁亂調戲凌辱婦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剝光婦女的上衣。淮海路上到處砸招牌，一些著名餐館貼出大字報：“黑九類及其子女不准入內！”有的餐館甚至貼出所謂革命通知書，赫然寫著：“二十種人不得入內：地、富、反、壞、右、

資（本家）、特（務）、警（偽警察）、憲（兵）、團（三青團員）、軍（國民黨軍官）、貸（高利貸者）、小（小老婆、小商、小販）、娼、僧、巫、道、尼。”著名的上海文化廣場上，隔日兩頭召開萬人大會，批鬥一批又一批反動學術權威，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老專家被打倒在地，再用腳踏踹。

我家也遭劫難，幾個中學紅衛兵組織連續到我家抄家。他們拿著派出所提供的“反革命人家”地址，不分白天黑夜，隨時隨地唱著《造反有理》革命歌曲，像跑步衝鋒一般打上門來。一進來就翻箱倒櫃，搜尋金銀財寶。他們認為，我們這樣的反革命人家，過去是地主資本家，一定私藏金銀財寶，搜尋不到，就抽出皮帶兜頭攪腦抽打我父親。

有一次，他們抄到我母親三十多年前的陪嫁品，幾隻手鐲、翡翠、玉片，如獲至寶，你搶我奪。一塊較大的碧玉被打碎在地，紅衛兵在地上搶奪碎片。幾個紅衛兵在我母親的箱櫥裏抄到幾幅珍藏半個多世紀的國畫，那是我太外公、清末江南著名大畫家胡公壽的親筆畫。他們不知其貴，只是好奇地傳觀。一個紅衛兵上來大喊：“封資修四舊，還看什麼！”一把奪過，撕碎擲出窗外，跳著高叫：“大破四舊，徹底砸爛舊世界！”旁邊的紅衛兵們一起跟著呼喊：“砸爛舊世界，建設紅彤彤的新世界！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我的父親劉宗漢曾經當過國民黨專員，紅衛兵逼他交代罪行。老人嚇得哆哆嗦嗦，辯解說：“我是個臨時專員，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他們呵斥他狡賴、頑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條，沖著用皮帶抽他。一個仔細搜查的紅衛兵從一本舊書中搜出幾張發黃的照片，激動得大喊：“抄到了，抄到了！”其中一張照片上，我父親戴著大禮帽，穿著筆挺西裝，與聯合國救濟總署派來的外國軍官握手，背後是巨大的萬噸輪，還有一張是父親和陳納德將軍在機場的合影。

紅衛兵指著照片，點戳著我父親的臉，大聲喝問：“你這個老反革命，還不老實交代！你自己看看，當年你耀武揚威的反革命樣子！老實交代，這是在哪里？幹了什麼反革命勾當？”面對他們的吼叫亂罵，父親定了定神，認真地回答：“這是我代表當時政府和人民，去蘇聯和美國接受抗戰勝利後聯合國發給中國的戰後慈善救濟物資。”

????“老反革命還在騙人！當時的政府是蔣介石反動政府，怎麼代表人民？還在放毒！”

“蘇聯是蘇修，美國是美帝，怎會發善心向中國撥救濟物資？你又在耍花樣，欺騙我們紅衛兵小將！”

往昔的榮耀使老人勇氣倍增，他伸手揀出張照片，說道：“喏，這一張，是在秦皇島碼頭，我指揮工人把國際救援物資搬運去解放區，旁邊站立的有伍修權同志。”又指著另一張說：“這個美國人，是抗日英雄、飛虎將軍陳納德。”

那個仔細搜查的紅衛兵又從另一本書中找到一張大照片，驚叫道：“不得了，這個老反革命還拿槍！”那是一張父親當年做京劇票友，化裝演出國民革命軍與北洋軍閥作戰的劇照。幾個紅衛兵立即揪住老人，勒令他低頭認罪。父親唯唯諾諾，任憑他們摠頭按背，彎腰90度，雙肩後翻，疼得大叫。

三哥文輝堆放在床下紙箱裏的中外名著，被他們一本本翻出來，翻一本撕一本。他們認為好看的，就扔進一隻大紙箱，準備帶走。三個愛書如命，抄搶他的書等於搶劫他的寶貝，撕書聲猶似刀割在他心上。他急忙上前解釋，阻止他們的惡行。四五個紅衛兵沖上來，對三哥拳打腳踢，皮帶亂舞，罵道：“媽的，這傢伙多反動，家裏藏了這麼多封資修的書籍，不是外國的，就是孔孟之道的，沒有一本是革命書籍。全部燒掉，看他今後怎麼看！”

臨走時，一個紅衛兵頭頭已出門，又返回來，強行搶走了我家的一台六管紅燈牌收音機。我上前攔阻：“收音機不是四舊，為什麼要拿走？”那個小強盜蠻橫地瞪著眼說：“有人反映劉文輝深夜收聽美國之音，我們要沒收，拿回去檢查。如有問題，回來總算帳，當心你們的狗命！”說完抱起收音機揚長而去。

那年月人人自危，平時的積怨、妒忌，同事、鄰居裏的不和，隨時都會變成暗箭和誣告，

再由此造成被鬥爭、抄家。有一天，一個鄰居到派出所密告，說歷史反革命劉宗漢半夜在屋後花園裏藏東西。一批紅衛兵很快沖進來，在我家花園內亂掘猛挖，花木全被毀。

與我們同住的 4 個外甥，大的 16 歲，小的 8 歲，嚇得哇哇大叫，圍在老外婆身邊痛哭發抖，有的甚至鑽到床下。

我家對面住著我的一位中學老師。這位老師姓高，出身資產階級，平時同學們背後都誇她漂亮，有氣質。那天紅衛兵抄她的家，我看到一個流裏流氣的學生用掃帚挑起一件粉紅色柔軟衣物，在她家門口吆喝，引來大家看熱鬧。那是一件胸罩連內褲的女用內衣，里弄的阿姨媽媽們看到後，神情異常，嘖嘖連聲，仿佛那是很淫邪的東西，只有蕩婦才會穿。有的學生指著被批鬥的高教師罵：“不要臉，淫婦！”圍觀的一些革命群眾也叫喊起哄：“給她剪了，剪了，剪成條條片片，看她怎麼穿！”有人罵道：“騷貨，看上去那麼漂亮，想不到思想這麼骯髒！”有人叫著出主意：“狠狠批鬥！把骯東西挂她脖子上拉出去游街！”

紅衛兵們聽到起哄人群的惡作劇創意，立即把那件胸罩內衣剪成七八條碎片，挂在高老師頭頸上，推搡著、作踐著在里弄周圍的街道上游鬥，後面跟著一長串看熱鬧的人。高老師低著頭，泪流滿臉，泣不成聲，忍受著愚昧人群的肆意凌辱。一位哲人說：人類有個共同的暴君，它的名字叫愚昧。文化大革命將萬萬千千人推向愚昧的深淵，又使千千萬萬人遭受愚昧暴君的殘酷踐踏。

有一天，我拿回家一迭宣傳材料，其中有一份北京來的紅衛兵戰報，說北京大興縣殺害 300 多名四類分子，最大的 80 歲，最小的 38 天，有 22 家被殺絕。三哥讀了這份簡報，憤恨地指著牆上貼的毛像說：“將來總有一天，歷史和人民會向這位禍國殃民的暴君清算血債，否則天理不容！”

---

補白：1966 年 9 月某日下午，剛上班，忽聽一聲哨子急響，接著聽見積極分子丘某高聲喊道：“全廠緊急集合！”然後激動地宣布：“剛才，劉書記發現了一起嚴重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在鐵塔牌香烟盒子上印的鐵塔裏邊看見了蔣介石的像，還發現一個英文字母和一個俄文字母，這就是要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主宰（宰）世界，已經派小丁去報案了。”這幫人把“主宰”讀作“主牢”。小丁是廠裏為數不多的男工之一，一個流氓無產者。平時我就抽開封生產的鐵塔牌香烟，便宜，一毛幾分錢一盒。當晚回家，我把那烟盒拆開，撫平，仔細察看，却什麼也沒發現。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從今以後再不抽鐵塔烟了。次日一早，我剛踏進廠門，丁某就攔住我：“把烟拿出來！”我立馬掏出本地生產的廉價烟“大公雞”，微笑著遞給他一支。他接受了，看去來有點失望。此後他們沒再提這次階級鬥爭新動向。

---

整人專家衣竹林 聶步騰

1966 年，四清工作團團長李恩普和副團長衣竹林，帶領 1436 名工作隊員，進駐祁連縣各機關、企事業單位、農村和牧區。衣是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兼四清工作團副團長，四清期間，以他為首的工作團捏造了一個驚天大冤案——郭振國反革命集團案。

郭振國是門源蘇吉灘的藏族，當時是祁連縣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我是副縣長。這個冤案從縣長到各公社書記、主任和通信員，牽連了 414 人，涉及全縣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各公社、學校，好多幹部被整掉。四清工作團專審我 15 天。審訊小組把爐火燒得旺旺的，再



給我們穿上皮大衣、皮帽子在火上烤，汗像水一樣直淌。用的酷刑有 10 多種，脖子上吊磨盤石，拔頭髮，火烤，烟熏，用燒開的酥油往頭和脖子裏倒，開水往褲襠裏倒，有些人被屈打成招。

衣竹林原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廳長，因搞假案遭撤職，調到公安部當副科長，後來不知怎麼調到青海省公安廳當起副廳長來。那幾年，他在尖扎縣搞出反革命集團案，在化隆縣搞出反革命集團案，去循化縣又搞出反革命集團案。四清時他來祁連縣，又把祁連縣搞成反革命集團。他是個典型的搞反革命集團假案的專家。

因為我過去對 1958 年叛亂和海晏搬遷說了些意見，四清運動工作團就說我是反革命，給我定了 14 條罪狀。當時我想，我肯定有小錯誤，但沒有大錯誤，更沒有反革命和叛亂罪，衣竹林却說我在 1958 年搞了叛亂。我說：“我沒有參加叛亂，沒有這樣的事。”我對他說：“58 年你帶我們公安廳工作組，你是帶隊的，誰去了誰沒有去，你清清楚楚。循化叛亂了，我在哪兒？我在澤庫，在河南蒙旗，你在循化，你難道忘了嗎？你忘了我給你提醒。”他戴著眼鏡，扶了扶眼鏡說：“哦！1958 年，對對對，我想起來了。”我的血直往頭上涌，如果他再把 58 年叛亂的帽子扣我頭上，我就真想把他殺掉。我說：“你想起來就對了！”他又說：“那你這一次是第二次叛亂。”唉！叫我說什麼好。

他又把我叫去談話，說：“我們本來不相信你搞叛亂，你是公安廳的人哪！但是現在證明你搞叛亂的人有多少？有 80 多個！你就是參加叛亂了。”他又說：“你暗地裏參加了海晏叛亂，一開始你就知道。你說過，海晏搬遷，一戶人家 3 頭牛，半個帳房，武裝押解，黑天半夜遷移，路上很苦，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餓死了多少。你還說過，1958 年判的人抓的人太多，1958 年的叛亂是漢族鎮壓少數民族。這些都是你說的吧？還有，你為什麼從馬場趕了那麼多的馬？你為什麼跑到那裏去要馬？這些都是你第二次叛亂的證據。”

噫！就這麼給我定了 14 條罪狀，一條一條地審問。我說：“叛亂我沒有參加，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說：“你是個不簡單的人，為啥沒有（參加）？你還準備請國民黨。”我說：“請國民黨是沒有的事。”他們說：“你那時候從海晏拿來了個電臺，你還拿來好多槍。”天哪！我到哪里去拿電臺拿槍呢？

他們說的電臺是怎麼回事呢？我慢慢想起來了。我妻子有個小木箱，上面有個老虎圖案，裏面裝些梳妝用的東西。那小木箱是我從海晏拿來的，放在多倫我妻子的姐姐家了。後來姐姐讓我拿回去，我就拿到我家了。有幾個人見了這個小木箱，張 XX 和杜加都見了。唉！就這麼個小木箱嘛！還能有啥？真真讓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這個小木箱成了反革命罪證，他們審問我：“你的電臺呢？你是怎麼聯繫的？”哎呀！白天整，晚上整，7 個人看守我。白天開批鬥會，晚上睡下後，半夜整起來再審問。

托萊牧場場社分家時，我們把部分蒙古族和藏族群眾安置到了祁連縣的默勒、多倫一帶，這也成了一條罪狀。他們說：“你把你的反革命集團安置到默勒、多倫，你說那個地方地形好，攻不進來，守能守，打也能打。”我說：“那麼我對誰說過這樣的話？”他們說：“是下麵的人說的。胡某某說了，某某某的妹夫也說了。”他們指名道姓，說張某某怎麼說了，鄧某某怎麼說了，呵呀！整得凶啊。我說：“這個事情根本沒有，你們好好查查。”

衣竹林、張光漢（音）和公安廳一處的科長，都硬要讓我承認參加叛亂了。很多人被打得無法忍受，就按衣竹林的要求胡亂說了。他們讓我看了一些說我參加叛亂的材料。一個材料上歪歪扭扭地寫著：“聶步騰是我們的頭是哩，郭振國是比他大的頭是哩。我們叛亂過了。”這是哈爾蓋貝子王爺的媳婦寫的。另一份材料是郭正海（音）寫的：“他（聶步騰）是海晏的縣長，我們的妹夫是岡察的縣長，久美是祁連的縣長。”“這些是誰說的？”“聶步騰說了，是他任命的。”後來我問郭正海：“在部隊上的時候，你是給我當過班長的，你怎麼胡日鬼，你怎胡說哩？”他說：“唉！打得我實在忍受不住，我就編了這麼個事，不說你再沒有別人啊。”後來，青羊溝的大隊書記羅羅對我說：“阿格瑪（藏語感嘆詞）！審訊

的時候把我打得實在是堅持不住了，我就說你是叛亂的頭子。實在對不起啊。”我說：“你現在道歉有啥用啊？”當時審訊一個人，不僅要逼得他承認自己參加了反革命叛亂，還要讓他拉上別的人，必須讓他承認有別的人參加。

我算了一下，當時衣竹林等人搞刑訊逼供，吊死的幹部就有十二三個，死掉的群眾還不算。扎馬什公社的書記王春龍（音），是從山東逃荒到這裏的，在側所裏上吊死了，公社主任跳河死了。法院院長卓瑪是札薩的蒙古人，也上吊死了。不少啊！整天說是少數民族幹部搞叛亂，最後把一些漢族幹部也整了。

這些所謂搞叛亂的材料是怎麼來的？當時的工作開會全部成了叛亂的依據。我們曾在野牛溝的大泉開會，商量安置托萊搬遷過來的群眾，劃分草場和小隊。就這麼個事，硬編造出大泉北山叛亂會議，還有豹子崖會議。豹子崖會議在阿日開，我從來沒有去過，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沒有去過也可以編造出你去過，而且是叛亂會議。嚴刑拷打下，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些就害怕了，就說我參加叛亂了，他參加叛亂了，胡說在哪里開會了，在哪里叛亂了。那些會議本來都是安排生產、傳達文件的會議。那時是人民公社時期，會議多，安排生產的事情多。唉！最後都成了什麼反革命叛亂會議。

當時托萊牧場七分場牲口不夠，每家安排了（分給）1只羊，共25只，後來就給那裏的老根托定了個以宰殺牲口為名搞反革命叛亂，整老根托，逼大泉的勞布桑和先巴招供，說我們吃肉搞叛亂了，我們的頭頭是誰誰誰。這樣又牽連了一大批人。

查來查去，這些人啥事也沒有，根本就沒有叛亂，都是刑訊逼供搞出來的。他們是怎麼整人的？比如整根托老頭的時候，他們挖了個坑，把老根托推到坑裏，然後用沙土埋他，埋得只剩下頭，然後讓他交待，不交待就要活埋。

工作團要撤掉的時候，他們要我在材料上簽名。我沒有簽。他們不答應。我又寫了個材料，說我有重大錯誤，但死都沒有承認他們說的叛亂。因為這個材料，又把我批鬥了兩天。

衣竹林親自把材料拿到海北州之後，州委書記王風（音）發火了：“你們這次搞的這些案子，這麼大的反革命集團，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公社主任、法院院長、公安局長……全部搞反革命，那我們海北州是幹啥的？我們州委是幹啥的？這個材料我們不同意、不研究。”實際上就是這樣，海北州10個縣的縣長都搞反革命，那你州委失職不失職？你州委在幹啥呢？

州委說話了，最終我沒有去勞改。文革開始後說我不老實，又和當權派們一起挨批鬥。我一直做臨時工，在自來水廠、水泥廠、磚瓦廠幹，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才正式安排了我的工作。

郭振國最慘，1958年被捕，後來又釋放，恢復了縣長的職務。67年四清，又被逮捕，整整坐了14年的牢。

那個時候，縣武裝部一個幹事到山裏去打野牲，不知怎麼就上吊死了。他的馬背著馬鞍跑到小八寶，郭振國的媳婦在那裏的奶廠當工人。海北州軍分區的兩個幹部來祁連調查，說這人是被人殺死的，把這個人命案毫無根據地扣到郭振國頭上，說他搞反革命叛亂殺了人。整來整去，最後憑空捏造一個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集團，逮捕審訊群眾和基層幹部。祁連縣全縣7個公社的28個公社書記和主任，除了一個牛春發以外，全部打成了反革命。當時人們說“四七二十八，剩下個牛春發”，說的就是這事。牛春發是個外地人，是默勒的公社書記。其他的人，不管你是蒙古族還是藏族、漢族和回族，都是郭振國反革命集團的成員。

1978年，郭振國搞第二次反革命叛亂集團案平反了，郭被釋放，安排個州政協秘書長的工作，兩三年後就患癌去世了。他們一家冤死了多少人啊！他的父親抓掉了，在監獄裏折磨得只剩一口氣，出來就死了。他的一個堂哥抓掉了，釋放後在岡察沒處去，走到阿日開，連病帶餓死掉了。他的兄弟們和家裏的其他人都被當成反革命家屬，整慘了。

過了幾年，省上和州上派工作組來查，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司令員、州委書記和州軍分區副司令員都來了。查了以後，沒有叛亂這回事。有個啥呢？都是開會喝酒的事，哪有啥搞叛亂活動的事啊！那個在山上上吊死了的人也查清了，和郭振國沒有絲毫關係。

一個衣竹林就整死了多少人！

我最後一次見到衣竹林是在西寧文化街，公安廳家屬院門口。我說：“廳長好著啥！”他說：“你好著啥！”我說：“我好著哩。”他說：“你平反了沒有？”我說：“沒有平反。你不（給我）平反誰給我平反哩？”他說：“你沒有事。我給調查組說過，你沒有事。郭振國是反革命。”我說：“你怎麼知道郭振國是反革命？路擺在你的面前，你怎麼就不看一看啊？你有啥人證物證？”他說：“人證有吧。”我說：“人證他見了（郭振國搞反革命叛亂）嗎？是怎麼個情況？是參加會了還是做了啥？”他說：“這……這……，這個說來也傷腦筋得很。啊，好好好……你忙去。啊！再見！”然後他就急忙走了。你看，他還在堅持郭振國是反革命！這麼一個人，他害了多少人啊！

楊毓東牧師 劉鳳鋼

北京西單缸瓦市教堂牧師楊毓東，生于 1920 年，遼寧遼陽人，三代蒙主恩。祖父楊鳳翔，19 世紀 80 年代領洗歸主。1948 年，28 歲的楊毓東，東北神學院畢業後到北京實習。1949 年初，共軍兵臨城下，長老、牧師都嚇跑了，教會禮拜自動停止。共產黨接管政權初，黨政軍都想占教會的房子，教會無人伸頭。楊毓東認為教會是屬於主的，自己有責任站出來，于是就主動出來應酬交涉。共產政權漸穩，聚會開始恢復，長老、牧師看這個年輕人能扛事，還能講道，就請求區會，批准他在新街口教會主持工作。

1957 年夏，反右突起。為配合運動，北京市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于 12 月 26 日開始舉辦北京市基督教界社會主義學習會。會議期間，45 名基督徒被打成右派，楊第一個被揪出來，判勞動教養。

1962 年，勞教期滿，不得獲釋，被押往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不久又被送到吉林白城子以北的北大荒。在那裏，楊受盡折磨，生活艱難，甚至連吃鹽都須家裏寄；住的也很簡陋，每人只有一個蚊帳，睡在帳篷裏的草地上，與蛤蟆、昆蟲同眠。環境惡劣，超強勞動，嚴重營養不良，楊毓東終於病倒。楊師母向政府請求丈夫回家養病，不被批准。後來，楊師母因病住院做手術，需要照顧，官方經過核實，才允許楊毓東回家看顧病妻和 3 個月的幼子，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是 1962 年聖誕節的早晨。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開始，楊毓東屬於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中的一員，信耶穌、傳過道、讀過神學更是罪上加罪。那時凡與教會有過關係的人都被打成帝國主義走狗、特務，批倒批臭。楊毓東被趕至鄉下，直到 1978 年才重返北京。

回北京後，三自會不想讓他講道，把他分到佛教的廣化寺幹手工活，一個月 20 幾塊錢，實際上還是被看管。楊毓東沒有去，後來按退休處理，每月領退休金 40 幾塊。這一年楊毓東 58 歲。為了養家，他什麼活都幹，給建工部刻蠟板。這事並不輕鬆，每次來活，都是急的，有時連續幾天黑天白日刻。也到過建築工地，開混凝土攪拌機。

1980 年胡耀邦當政，政治環境寬鬆了，北京市宗教處為讓楊毓東參加教會工作，重新給他發放平反書面決定，去掉了思想不好等內容。楊牧師回教會工作似乎指日可待，可是北京三自會比他的主子還左，堅決反對楊毓東重返教會。他們說，楊毓東不順服，難以駕馭。

1986 年，政府決定請楊毓東出任牧師，原因是，教堂開放了而教牧人才奇缺，楊毓東則受過正規的神學教育，且工作能力强，最重要的是他沒有海外關係。楊毓東提出條件：我

只做宗教工作，不搞政治。我講道不按人的意思講，只按聖經神的意思講。你們要是接受，我就這麼講；要不同意，現在就罷，免得日後麻煩。他們同意了。

主內一些弟兄姊妹反對他去三自工作，認為不能與三自同流。楊認為，去三自教會不等於為三自工作，耶穌和使徒都曾利用猶太會堂傳道。于是他開始了三自教堂事奉。首先建立堂務管理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從而改變了以往政府通過控制主任牧師實現控制整個教會的局面。楊毓東宣布，堂委會是本堂最高權力組織，代表廣大信徒對教會實施民主管理。第二，恢復缸瓦市教會青年團契，由年輕信徒自己管理。這是北京各教堂最早恢復的青年團契。年輕人是教會的未來，要在耶穌基督裏得到愛護、培養和建造。第三，組織家庭聚會，把那些離教會遠、年老體弱的信徒組織起來，形成聚會點，定期派義工到那裏領會，培養他們的信仰和靈性。這是其他教會所沒有的。政府多次找楊牧師談話，表示不許這樣做，并要求交出家庭聚會的地點和信徒名單。楊牧師斷然拒絕：“給了你們，不等於出賣信徒嗎？你們若要，找派出所交涉去，我無可奉告。”

楊牧師還大張旗鼓辦聖誕節，認為這是傳福音的好機會。他說：“人們看見這裏有個禮拜堂，正過聖誕節，就會對基督教產生一個初步印象。”1986年聖誕節，堂內、院內、大門外都張燈結彩，同時播放聖誕歌曲，一片喜氣洋洋，來參加慶祝聖誕節活動的人達到12000人次。此後，年年都不少于1萬人次。這在其他各堂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楊牧師還增加主日禮拜的次數，政府對此也很不滿意。

1988年12月13日，中國基督教兩會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常委擴大會議。有代表提出，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引導中國教徒愛國愛教，自傳自養自治，功勞和成績是巨大的；但是，教會被洗淨後，水就沒有必要存在了，教會不是運動，到一定時間，三自運動就應該結束。這個會議精神傳到北京，楊毓東很受鼓舞，以為三自不會存在多久了，于是采取措施，查三自的賬目，清查教會房地產。李克牧師擔任查賬小組組長，楊毓東牧師負責查房地產。查了若干年，查不下去，樁樁件件都與政府有關。通過查帳和清理教產，那些老牧師和信徒終於明白，三自會拿教會房產送禮討好政府，實際上就是出賣教會與世界聯合。

查賬查房之舉引起政府極大不滿，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中缸瓦市教會的年輕人是宗教界第一個打著橫幅，走上街頭，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的，于是三自和宗教局多次找楊牧師，催逼他辭職。他不得不同意。

1991年9月5日青年聚會，楊牧師講道，突然接到三自負責人的通知，說有外國記者到堂裏採訪，不讓楊牧師辭職了。當時，有幾個國家的9名記者在教堂門前等待楊牧師，宗教局的郭處長在街上攔住楊牧師，要他不要見記者，并派人“護送”他到教會，會後又用小車送他回家，外國記者始終沒有機會訪問楊牧師。

10月15日至17日，市宗教處在西城區政府召開學習會，播放東歐政變等內容的錄像。討論時，政府幹部和三自骨幹認為，東歐劇變就是由牧師引起的，中國牧師也可能引發中國劇變。鑒于缸瓦市教會青年團契六四事件中的表現，政府認定，缸瓦市教會是不安定因素，楊毓東不是一個令人放心的牧師。

他們多次尋找理由逼楊牧師退休，理由之一是主任牧師70歲必須退下來。楊牧師對政府代表闕學卿說：“你們這樣決定，既不合情，又不合理，還不合法。所謂不合情，是一般工作調動之前，要跟本人談，我們還有堂管會，應找信徒代表談一談，但你們沒有任何表示，突然命令撤職，這在任何世俗組織中都是少見的，是為不合情。做重要工作的人，是否年滿70歲都要撤下來？比我大的是不是要撤？我們的主席殷繼增，比我大10歲，是不是要撤？全國兩會那些幹部，大多比我年紀大，是不是要撤？北京宗教界，伊斯蘭教、天主教和佛教界，是否也推行這個70歲綫？是為不合理。中國教會的任何章程，均無滿70歲不能做主任牧師、領導教會的規定，國家也沒有這樣的法律，是為不合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因此我不能執行。”

楊牧師回絕了三自會的決定。與此同時，缸瓦市教堂堂管會也于 1993 年 8 月 29 日向有關部門正式遞交《致基督教北京市兩會書》，內容如下：近來北京兩會針對缸瓦市堂製造了一個決議，近日又急于強制執行此決議，我們缸瓦市堂堂務管理委員會全體成員受聖靈感動，本著對基督教北京缸瓦市堂全體信徒負責的原則，經過鄭重討論，將我們的意見提交北京市兩會。根據《聖經》和基督教原則，根據基督教全國兩會最新制定的組織章程，根據我們缸瓦市堂的具體情況，根據國家有關法規和有關宗教管理政策，我們認為：1、基督教會的主權屬於教會全體信徒，北京缸瓦市教會全體信徒的代表是本堂堂務管理委員會。2、北京市兩會背著本堂信徒和本堂堂務管理委員會，擅自決定本堂事務和人事安排等重大堂務管理問題，是違背基督教會組織原則的，甚至是非法的。3、本堂信徒承認楊毓東牧師的靈性修養和他對主的忠誠，承認他的組織才幹和他幾年來對本堂的貢獻。事實證明，上帝祝福楊牧師，他完全能夠繼續承擔本堂主任牧師的工作。4、北京兩會越過本堂堂務委員會和本堂信徒所做的針對本堂的決定和決議是無效的。如果北京兩會強行對本堂採取侵犯本堂權利的行動，北京兩會將對其後果承擔全部責任。

在廣大信徒的支持下，楊牧師頂住了三自會、宗教處撤換牧師的決定。

1994 年 1 月 31 日政府頒布 145 號國務院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4 月 13 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發布《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力圖將宗教事務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北京市宗教處和兩會認為，撤換楊毓東牧師的最好時機到來了。他們首先認定缸瓦市堂堂務委員會是沒有登記的非法組織，應予取締。隨後，9 月 4 日（禮拜日）上午，北京兩會工作人員劉學軍，携妻子兒女，以兩會郊區工作辦公室的名義，搶占缸瓦市教會準備擴充為小禮拜堂用的一間空房，引起很多信徒的強烈抗議。堂委會當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堂委會委員李德全弟兄，帶劉鳳鋼弟兄、高峰弟兄、于立為弟兄等，制止劉學軍的強占行為，並立即著手完成該小禮拜堂的擴建工作。下午，劉鳳鋼、高峰、于立為等弟兄搬出了兩會工作人員劉學軍的傢具，封閉房門，並打通了原小禮拜堂與該房之間的隔牆。整個過程都被劉學軍用相機拍了照，並及時報告給政府。次日，市宗教處和兩會，以北京基督教兩會的名義，炮製一個要求公安機關嚴懲教會李德全、劉鳳鋼、高峰等有關人員的呼籲書。

9 月 9 日夜，市宗教處、市公安局和市兩會，聯合出動百餘人和數輛警車，携帶施工人員，連夜強行破壞了剛剛擴建好的小禮拜堂，重新隔出那間房屋并予以強占。11 日至 13 日，市公安局又以傳喚為名，連續三天拘禁李德全弟兄。該弟兄有嚴重的哮喘病，身體因此受到極大損害，一度因體力不支而昏倒，獲釋後被送進中日友好醫院。

10 月 13 日，北京基督教兩會召開常委會，決定解除楊牧師的職務，任命于新粒接任。當天，于新粒正式向缸瓦市教會下達最後通牒，聲稱：為了落實缸瓦市教會的法人代表人選問題，他將於近期全面接管缸瓦市教會，並要求楊毓東牧師必須自動向其移交主任牧師職權。“否則，注意後果！”24 日，于新粒自己來堂上任。27 日，于新粒、邵文、吳巍三人工作小組來教會，向楊牧師發出最後通牒，限 3 日交權。28 日，市宗教處處長季文淵，區宗教、民委辦公室主任楊廣宏，找楊牧師談話，逼其按期交權。

30 日（禮拜日）上午，楊毓東在他侍奉 8 年的缸瓦市教堂做最後一場布道。他根據路加福音第七章，告誡信徒，教會必須把根基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如此雖經風吹雨打，房子卻不會倒塌；反之，若建立在沙土上，就會被水沖塌。如今我們的教會，正遭受風吹雨打和水沖。風吹雨打就是上面來的壓力，水沖就是下面的顛覆。這場講道刺痛了政府和三自會，禮拜一結束，兩會工作人員即向會眾大量散發兩會五屆會議專集，以此表示他們的權威。不少信徒將其當場撕碎，弄得滿院子都是。

9 點 30 分，楊毓東牧師做完第一堂禮拜，與宗教幹部司永成說話，華慧奇弟兄拿照像機給楊牧師拍照留念。這時，司永成突然撲向華弟兄，聲稱華侵犯了他們的肖像權。隨即又上來十幾個便衣圍打華弟兄，並搶走照像機。在場的信徒紛紛抗議，華弟兄得以脫險。

次日，即 31 日，兩會在缸瓦市堂布告欄裏張貼三張布告，一是北京基督教教務委員會撤換主任牧師的決定，二是于新粒的委任書，三是廢除公章，接管權力。

11 月 4 日，根據宗教處的通知，楊牧師上午 10 點到兩會辦公室。除了宗教處和區政府的幹部外，還有三自的部分人員，如于新粒、邵文、馮應生等人在場，宗教處的華副處長代表政府向楊毓東宣布：1、宗教必須接受政府領導；2、主任牧師不是選舉產生，教會內部兩會有權處理；3、教堂不是教會，要在當地教會領導下開展活動；4、蓋有公章的傳單外地散發，要追究責任；7、宗教局與有關部門要對外國記者不屬實的報道予以警告，中國教會不受外國干涉。

堂委會就此事向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和全國基督教兩會提出申訴，未得任何答復。之後，劉鳳鋼、許永海、高峰、華慧奇等弟兄向國際媒體發出呼籲，請求全世界主內弟兄姊妹為他們代禱。

6 日，于新粒以兩會的名義，在缸瓦市堂院貼出布告，說現在缸瓦市教堂信徒已陷入政治泥潭，予以警告。當天上午，有外國記者架著攝像機在院內採訪，教堂外邊的廳道上有警車和警察，教堂院內有市、區幹部、便衣警察，還有兩會的追隨者，人數眾多，形勢緊張，宗教局和三自兩會還動用警方對缸瓦市堂義工進行跟踪。

19 日晚 9 點半左右，劉鳳鋼、徐永海、華慧奇、高峰、湯偉等弟兄，從燕京神學院講師勾慶慧家聚完會，分頭回家時發現被跟踪。劉、徐同路，身後有十幾個身穿皮夾克的騎車人尾隨。起初他們以為是下中班的工人，後來發現那些人身上的步話機在響，並且他們到那里，他們就跟到哪里。劉、徐用電話尋呼高峰、華慧奇弟兄，得知他們也正被跟踪。

第二天是禮拜日，劉鳳鋼弟兄準備騎車到教會，發現自行車胎被扎。他把自行車放到修車鋪，改坐公共汽車到教會。這期間，便衣一直跟踪。中午，劉鳳鋼弟兄禮拜完回到修車鋪，把修好的自行車放到他家樓門口，下午騎車時發現自行車又被扎了。到修車鋪查看，前後車胎共扎 8 刀，氣門嘴也不見了。

23 日下午，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北，七八個跟踪便衣中的一個故意用肩膀撞正在步行的劉鳳鋼弟兄一下，并說：“你為什麼撞我？”劉弟兄說：“不是我撞你，而是你撞我。”話音未落，身後的便衣們一擁而上，把劉打倒在路旁一排自行車上。劉爬起來，他們又把他從便道上打躺在馬路上。劉再一次爬起，他們又將他打躺在路旁的電綫杆底下。劉又一次站起，一名便衣揪住他的衣領喝道：“回家去！不許出來！告訴你們那幫傻 B，老實點兒！！！”

劉弟兄質問對方是幹什麼的？為什麼打人？他們再次一擁而上，把他打倒在便道旁一個副食店的櫃檯前。其中一位跟踪劉鳳鋼多日的便衣跑過來，飛起一脚，重重踢在劉的眼眶上。隨後，他們手握步話機，驅散圍觀的人群。過了 10 分鐘左右，劉弟兄慢慢從地上爬起來，自己到醫院治療。

與此同時，跟踪華慧奇弟兄的便衣，在其從公共廁所回家的路上用手卡他的脖子。華母上前質問便衣：“華慧奇犯了什麼法，為什麼跟踪打罵他？”便衣說：“我們不是警察，我們是流氓，華慧奇拿了我們大哥的東西。”華母問：“拿了你們大哥什麼東西？”便衣們回答不上來。第二天，華慧奇弟兄陪同路透社記者到劉鳳鋼弟兄家探望，警方將這位女記者帶走。

12 月 3 日，市宗教局通知楊毓東到市宗教局，民委主任沙之源與楊牧師談話，態度傲慢，說：“你雖然被撤，但還是兩會的常委，還是缸瓦市二綫的牧師，你的工資待遇還是照常的。”又說：“反對三自，不聽政府的話，在別的地方都行，南方沿海都可以，但北京是首都，這裏不行。天主教他們在河北省反對三自行，在北京不行。我知道你的身體很好，再幹 10 年沒問題。我也知道你有學問，我還知道你受廣大信徒的尊敬和擁護……”楊牧師問道：“你找我就是談這些嗎？”沙繼續說道：“當然不是，你明天正式退下來。儘管如此，

你孩子、房子的問題，有什麼困難，可以找政府，找我我會給你解決。即使我退休了，我也告訴接班的人，繼續幫助你。”楊牧師回絕說：“我告訴你沙主任，我不會找你的。”沙接著說：“對，從你的個性來看，你不會來找我的。”

4日（禮拜日），是缸瓦市教堂信徒永遠難忘的日子。當局動用了近200名便衣警察，身帶步話機，混在信徒當中，分工明確，誰負責哪里，管哪個入口，布置周密。附近一個工廠中還安排500名防暴警察，以防信徒反抗，上街游行。他們還預備很多警車，只要有上街游行的，出來一個抓一個。他們甚至命令急救中心，若缸瓦市教堂呼叫急救車，一概不許來。

這一天，楊牧師凌晨4點起床，向師母告別說：“今天很可能被捕入獄。”師母含淚說：“穿上羽絨服，監獄裏冷。”然後他帶上講稿《耶穌的路》離開家，騎上車，直奔缸瓦市教堂。到了教堂，楊牧師藏進鍋爐房。

禮拜還沒有開始，楊牧師提前6分鐘穿上禮服，與王美真姊妹從北門提前上了講臺。不一會兒，三自的殷繼增、石澤生、邵文也穿著禮服登上講臺，坐在臨時擺的坐椅上。堂內氣氛十分緊張，一位老姊妹突然從會眾中起來，大聲哭著做起禱告。這下氣氛更緊張了。三自的人叫來杜鳳英，要她上臺與堂裏安排的王美真姊妹爭奪麥克風。信徒幾乎全都從坐椅上站起來，大聲喊著讓三自的人下臺。于新粒上了兩級臺階，不敢再往上走，政府的人對他說：“我們為你奪權，你怎麼後退？”于新粒最終上了講臺。

三自兩會主席殷繼增以主席身份來到講臺前，拿起麥克風向信徒喊話，讓大家安靜，可是台下喊他下臺的聲音此起彼伏。楊牧師來到講臺前，堂內馬上安靜下來。他剛要講道，市宗教局副局長季文淵從側門進來，在台下對楊毓東牧師說：“快下來，形勢非常緊張，你應該考慮信徒的安全。作為政府官員，我的烏紗帽可以不要，可以幹別的，但是你作為牧師，應該保護信徒的安全。”楊毓東牧師遲疑一下，走下講臺。緊接著，台下上來幾個三自的人，把王美真姊妹也拉下講臺。

楊牧師從臺上下來，季文淵副局長在辦公室和楊毓東談話，衆多信徒圍在外面。他們怕楊牧師被抓走，舉手禱告。季拿著自己的名片，對衆人說：“我叫季文淵，是宗教局的副局長，我保證楊毓東牧師的安全，你們不信可以到我家找我。”可是信徒還是在辦公室外面舉手禱告。這時殷繼增終於可以發言了，他沒有講道，拿著麥克風沖著信徒喊：“這禮拜堂是三自的，你們不同意，你們愛到那裏就到那裏去，可以上袁相忱那裏去嘛！”這話引起信徒更大的反感。殷繼增從臺上下來後，受到信徒當面譴責，說他破壞教會，抵擋基督，離棄信徒。之後，很多信徒打電話或寫信給殷，對他的講話表示不滿。

就這樣，楊毓東牧師離開了他侍奉8年零8個月的缸瓦市教堂。

此後，楊牧師3個月沒出家門，每天有幾十位信徒來看望他。通過此次奪權事件，廣大信徒徹底認清了三自的本來面目，紛紛退出教堂，自己成立家庭教會。以前一些信徒對三自認識不清，連楊毓東牧師都認為，教堂只是傳播主道的載體，利用政府批准的合法場所為主做工，既安全又能擋避風雨，何樂而不為。事實告訴他們，三自不是教會，而是跟共青團、婦聯、工會一樣，是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的一個外圍組織。

從1958年到1980年，楊牧師整整被壓制22年。他不像袁相忱牧師那樣與三自不相往來，而是儘量與三自合作。1986年複出，服侍缸瓦市教堂8年餘，最終被政府和三自的人驅逐下臺。臨歸主前，楊牧師對我說：“有許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與三自合作），這是正常的，因為我不可能向衆人逐一解釋。我想告訴所有關心我的人，22年的壓制並沒有使我放棄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侍也沒有將我變成披著羊皮的狼。現在我仍然是個愛主的信徒，我願服侍我的主，直到他接我走的那一刻。”如今他被主接走了，正如經上所說：“一粒麥子死掉了，會結出子粒來。”

---

補白：1963 年，我成為反革命，當時人的態度，就象我得了薩斯病；文革後，對我這個反革命，人們的態度，像我只是得了感冒。對反革命，從談虎變色到熟視無睹，是因為文革中反革命的大普及，上至國家主席，下至十三四歲的孩子，都成為反革命，走馬燈似的，你上我下輪流當反革命，反革命貶值了。過去因為人人都可能變成反革命，所以反革命的帽子具有極大的威懾力；當人人真的都已經當了反革命或反革命親屬後，反革命的威懾力反而消失了。我的朋友于基，做了十幾年反革命，他的妻子頂著單位和社會的巨大壓力，沒有與他劃清界綫，做了十幾年反革命家屬。四人幫倒臺後，于妻總算出了一口氣。我不會忘記當年她的幽默：“毛澤東也成了反革命家屬了。”

張鶴慈???

---

## 母親的人民證 士 濂

還在上初中時，我就知道唯有不斷要求進步，才能削弱家庭出身對我前程的負面影響。1953 年，我考入杭州師範摘下紅領巾後，就一遍一遍遞交入團申請，一次一次參加團支部組織的活動，竭盡所能為自己塑造一個良好的形象。當時雖然還沒有“學雷鋒”，可是做好事是提倡的。平平常常的生活，哪有那麼多好事等你去做呢？我挖空心思找到了一個切入點：每天清晨，我都要比別人早起一會，同室同學起床時，我已替他們每人的臉盆裏打好了洗臉水。如此持之以恆，終於感動上帝，團支部將我列為發展對象。經過莊嚴的支部大會極為認真的討論，我和其他幾位寫了申請的同學都以絕對多數票獲得通過。

那一陣，我很注意學校的布告欄。終於有一天，校團委的新團員名單公布了，我滿懷興奮地擠入人群。目光急切地掃過一個個名字，沒有，沒有我的名字。與我同時被支部大會批准的另幾位同學都榜上有名，只單單將我一人排除在外。我好像覺得周圍的人都或憐憫或鄙夷地在看我，我狼狽萬分，鑽出人圈。

那時師範生普遍都有一個隱藏在心靈深處的願望，希望被保送上師範學院，以改變畢業後充當小學教師的必然命運。要獲得保送，身為青年團員是首要條件。保送的概率很低，但終究是個渺茫的希望，成了不少學生的前進動力，我也一樣。

我悶悶不樂之，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來了。他素來就像個兄長，愛護我，幫助我，這次也不例外，還是一番熱情鼓勵：“別灰心，繼續努力嘛！對家庭要加強認識，用行動來劃清界限。”我內心又充滿了熱力，決心按他的話做。

加強認識還好辦，多從理論書籍中摘抄有關章句就可以了；用行動來表現，就大不容易。我能做些什麼呢？保爾與資產階級嬌小姐女友冬尼婭絕交，牛虻書寫揭露他生身之父大主教的傳單，女紅軍戰士向白匪情人射出“第四十一顆”致命的子彈，等等，這些都是在革命鬥爭極為激烈時的行為，今天的我，實在無法照搬。

帶著無計實施“好表現”的悵惘，1954 年暑期我回到家鄉。母親那兩年常去上海幫傭，以掙取微薄的傭金養家糊口，後因身體不好，數次血崩，才中止了保姆生涯，回到家鄉。母親見我放假回來，很高興，病情也減輕許多。談話中，她忽然壓低聲音，顯出很神秘的模樣：“我也有那個證啦！”“什麼證？”“人，人民證。”“人民證？”我從來沒聽說過還有這麼一種證。母親看我對這事有懷疑，就拿來板凳，顫顫巍巍地踩上去，從碗櫃的最高一格裏摸索了一陣，取了張小紙片，莊重地遞給我。我打開那紙片，原來是一張選民證，蓋著紅色的政府印章，還寫有媽的名字。

“媽，你從哪兒弄來的？”

“上海，我做保姆那裏。他們說，保姆是勞動人民，就給了我這個。”媽媽欣喜地說。



她將那張選民證拿回去，仍然顫顫巍巍地踩上板凳，小心翼翼地把它放進碗櫃的最高層，又遺憾地補充道：“本來還要我去參加選舉，聽說很熱鬧的，就是我的病太重，等不及，只能回來了。”

這張選民證其實並沒有履行其選舉權利，媽媽為什麼把它看得這麼重呢？

“這幾回去上海，老生病，錢沒掙多少，不過拿了這張證也值得。人民證，人民證，我也當上了人民啊！”我明白了媽媽為何這麼寶貴這張薄薄的紙片。多年來，作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在村裏只有低頭認罪挨批受訓的份，何曾被人視為同類？雖然媽媽是被村農會特別恩准去上海幫傭，並因此偶然得到了這張選民證，雖然這張選民證從未使用，以後也絕沒有機會再使用，雖然這張選民證並沒有帶給媽媽政治生命任何實質性變化，但媽媽已感到非常滿足了。一字不識的媽媽把選民證誤說為人民證，其實是她內心願望的一種特殊表述方式，她多想成為一個和其他人同樣的人民啊。

媽媽內心小小的滿足却成了我思想重重的負擔。我知道，這張選民證不應該屬於媽媽，她是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管制分子，她是由于對方不明情況稀裏糊塗得到的。這是對人民選舉的褻瀆，是事關原則問題的失誤。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我想起了團支部書記語重心長的囑咐，要劃清界限，要有實際行動表現。現在，不正是考驗的時候、表現的時機嗎？但事情如何做才好？面對慈愛的母親，我能像那些大義凜然的英雄一樣，指著她的臉如此斥責嗎？——“你隱瞞了罪惡的身份，你竊取了人民的權利！”

不，我做不到，我實在做不到。思慮再三，我想出了一個自以為兩全其美的辦法。我決定偷偷把這張選民證拿走，反正它對媽已經沒什麼用了，她會誤以為是自己不慎丟失，而我將這不應得的選民證交給團支部，由他們退還發放單位。這樣，媽媽不會因此而難過，原則性的失誤又因我的檢舉而得到了糾正，我豈不有了與家庭劃清界限的實際行動嗎！

做出此決定後，我就暗暗等待下手的時機。媽媽是很願意和在外地求學的兒子多呆在一起的，加上身體不好，就更少外出。我因心裏懷著鬼胎，竟顧不上媽媽這份摯愛之情，反而內心怨懟她怎麼總不出門。好不容易有一回她離開了家，我急急搬來板凳爬到碗櫃的最高處在裏邊翻個不停。那裏亂糟糟的，情急中我一時沒找到那紙片。正在此時，房門被推開，媽媽回了家。她見我又著急又慌亂的模樣，不禁發問：“你要找什麼？”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能支支吾吾地說：“不找什麼，隨便翻翻。”媽媽的眼裏閃過一絲疑問，但隨即以一句淒涼的話語岔開：“那裏就是一些破爛，家裏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了！”

我仿佛覺得媽媽已識破了我的用心，再不敢正視媽媽的眼睛。我于心有愧，因為我并非真正在捍衛什麼原則，而是受一種卑賤的利益願望所驅使。

那次行動的受挫，使我“努力表現”的熱度大為降低，媽媽疑問的眼神，淒涼的語句，總縈繞著我。直到暑期終了，我再沒去動那碗櫃的最高層，甚至連看都沒勇氣往那裏看。自然，在家庭出身這個關鍵問題上，我也依然停留在原來的水平，並無突出的劃清界線的表現。因此，我的又一次入團申請，在支部大會又一次通過後，仍然被團委——據說，這回是報到了市團委——否決了。

母親是在那件事過去後十多年去世的。其時，我剛步出牛棚，沒回去參加葬禮，故不清楚那張選民證有沒有讓她帶走，但留在我心中的一份歉疚是：為了所謂的劃清界限，我曾精心策劃過一場極可能傷害母親的舉動。

---

補白：現代詩人、現代漢語典範語文的代表人物穆旦，1942年作為英文專業的大學生，毅然從軍抗戰，擔任了中國遠征軍的翻譯官。抗戰勝利後，穆旦赴美留學，1952年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告別李政道等學友，輾轉回國。因曾經是國軍軍官，後來穆旦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其軍旅詩篇被誣指為“歷史罪行的自供與罪證”。1977年，穆旦含冤去世。空軍英

雄王延周，曾擊落日軍飛機立功。某次因氣候原因迷航，誤入解放區迫降，受到八路軍接納。恰逢國共分裂，內戰爆發，不能歸隊，王被接納為解放軍飛行教官，是解放軍空軍早期將領的啓蒙之師。抗美援朝中，他入朝參戰，擊落美軍飛機再立新功。1958 年肅反中，王延周成為反革命，判刑入獄，後遣送原籍，1984 年獲平反。抗戰時期，上海銀行界高級職員池步洲，比英美情報機構更早地破譯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密碼。他只是協助重慶的電訊機構完成破譯日軍密碼的工作，并未加入過軍統組織。1952 年鎮反運動中，池步洲仍然因此項業績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二年。

彭小明

### 我目睹的政治迫害 李大立

1952 年我 7 歲。一天放學回家，我看見家門口站著民兵，身穿藍制服，斜挎帆布子彈帶，肩背步槍。他們來幹什麼？原來是鄉下老家來人抓“地主婆”外婆回去批鬥。舅父和母親通過華僑事務委員會，多方交涉，營救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來。外婆在香港住 40 年，一直委托鄉下親戚打理那裏的田產，并未親身參與“剝削”。

我的父親是普通知識分子，國民黨時期做過廣州火車站、佛山火車站站長。1949 年後，父親被視作階級異己分子，無端被撤職降薪。文革期間，我的父母雙雙被隔離審查批鬥，父親被罰跪和毆打。每當想起無辜父母所受到的屈辱，至今仍然心有餘痛。在每個民主、正義的國家，個人的生命和尊嚴都是至高無上的，任何人不得侵犯，為什麼我們中國就要例外？

我的伯父也是留用的舊職員，1949 年至 1952 年曾任廣州機務段副主任，後改任廣州鐵路第一職工學校副校長和廣東交通學院總務主任。1956 年肅反時，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處分，以致影響到女兒的入黨和留學蘇聯。1961 年至 1963 年，伯父被送到三水農場勞動改造。文革期，在海南島生產建設兵團插隊落戶的兒子不慎溺水身亡，伯父趕去辦理後事，哭昏在兒子的墳前。因是刑滿釋放的勞改犯，大伯不但沒有拿到分毫撫恤金，還備受軍隊幹部野蠻無禮的對待。

我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家大機構做事，因誤信馬列，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1938 年曾發起組織香港華員會，并首任會長。在中共指揮下，舅父領導了九龍海關起義，并以接收大員的身份接管廣州海關。只因他是地方地下黨，又是知識分子，不獲北方信任，備受歧視。

三年大饑荒時期，我們學校食堂讓學生吃甘蔗渣做的“蔗渣包子”，吃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吃用米糠做的“糠餅”，甚至吃用尿培養出來的小球藻。我的年近六旬的姑母，每次從香港回廣州，都要帶一大鋁鍋紅燒肉。

1967 年夏天，我的中學母校，著名的廣州廣雅中學，發生一起血案。那天，參加學校造反派組織“四一〇”的學生丘成昆（我的一位高中同學的弟弟），在廣雅河邊被主要由高幹、軍幹子弟組成的另一派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人從背後開槍射殺，屍體跌落河裏，年僅 17 歲。作家秦牧先生有一篇回憶文革的文章，其中寫道：“人們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等字眼。”秦文所寫的，大約就是廣雅中學的丘成昆。??????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我是上海同濟大學城市建設系四年級學生。清隊期間，同濟大學 40 多人自殺，我親見的就有五六個，如同濟大學副校長蔣梯雲、數學教授孫國楹等。同濟大學學生宿舍西北一樓後面的小路上，我親眼看見一個二年級高個子學生跳樓而死，腦漿流入水泥地磚縫。我班班長周文德，是 1962 年江西省高考狀元，階級鬥爭的毒中得太深，

把穿衣戴帽等生活細節都上綱為資產階級思想，整天以整人為樂。1968 年清隊時，周文德因說了幾句對毛不敬的話，最後被逼得跳樓自殺，半途身體翻個身，落地沒有摔死，摔個終生殘廢。我們 28 個人的小班，揪出 4 個反動學生。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張潔華，23 歲，也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跳樓自殺，未遂，遭到極其殘忍的折磨。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西南大山區。當地人告訴我，不久前，廣西“聯指”派得到軍隊支持，將邕江水灌入下水道和防空洞，超過千名“四二二”派的人被活活淹死。屍體腐爛發臭，整個城市的自來水都帶腐尸味。有一次，我隨車路經賓陽縣，司機告訴我，不久前這裏是一個殺人屠場。當時賓陽縣被殺的五類分子達 5000 多人，很多地主富農家庭被滅門，連七八十歲的老人和吃奶的嬰兒都不得幸免，許多人被石頭活活砸死，屍體沿西江一直流到珠江口的廣州和香港。

文革期間，香港不但接納了數以萬計的大陸偷渡來港躲避政治迫害的人，還安葬了數以萬計沿珠江漂流下來的浮尸。當年在賓陽縣指揮大屠殺的一個解放軍副師長，後來升任廣州警備區副司令，雖經賓陽縣政府代表全縣人民數次向中央要求追究其責任，却仍然在廣州逍遙法外。據說在北京郊區大興縣，大莘莊公社中心大隊貧協主席一個人獨闕十六條命，直至刀刀卷口，最後自己癱倒在地上。活埋奶奶和孫子兩人時，凶手揚起第一畝土，黃發稚孫不知死之將至，哭著說：“奶奶，眯眼睛。”白髮老人淒愴無力地哄他：“好乖乖，一會兒就不眯了。”

---

補白：1968 年 3 月 23 日晚九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該區高峰鄉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委支書隆秀佳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愛玉、韋倍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剖腹取肝煮食，為了滅迹，還將屍體丟下深洞。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 400 多人到南寧市圍剿“四.二二”。武鬥中，上林“聯指”4 人陣亡。此後上林“聯指”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打死“四.二二”四類分子 103 人。16 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聯指”陣亡民兵潘連標的墓地槍斃陪祭。喬賢大隊的豪光忠被打死後，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 4 人被打死後，不准家屬收尸埋葬，還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 500 斤，黃豆 5 斤，火油 5 斤，并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的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燒邊哭，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凶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牆壁上致死。

---

## 欽州剖腹食肝風 佚名

文革期間廣西濫殺無辜，數字驚人，手段殘忍。欽州地區最先流行剖腹食肝風，靈山縣壇墟、新墟兩公社發生 22 起，合浦縣石康公社 18 起，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 19 起，欽州縣小董茶場 3 起。武宣縣、靈山、貴縣和武鳴華僑農場有 100 多幹部群眾被凶手挖肝割肉，吃個精光。貴縣有個凶手藏兩個人肝，直到 1983 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才被迫交出來。

1968 年 1 月 26 日，欽州縣發生大規模武鬥，縣“聯指”調民兵 1000 多人進城武鬥，雙方共打死 8 人，“四二二”被俘 300 多人，其中 87 人被殺。縣委書記王劍東，總工會主席馬懷忠，舉白旗當了俘虜，也被打死在食品公司門市部。副縣長周中權，被打死在總工

會西側。縣委副書記、農業局長等，被押出打死。

4 月 25 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打死劉振堅後，又對其未滿 14 歲的女兒實施輪奸然後打死，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定更大隊分 4 批殺了 24 人，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剩下的寡婦、女兒被勒令改嫁，並徵收改嫁費。東興縣那勒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然後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9 月 7 日至 17 日，上思縣革委會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 12 人，並將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食。食人肝者包括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召騰，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凶手一起煮食，還勉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大。次日，王召騰又布置殺害 4 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此來“共同專政”。

殺人者辱尸毀尸。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殺後，凶手又用棍棒插入陰道，將尸體裸陳路旁。欽州縣城“聯指”圍剿“四二二”，“四二二”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凶手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

當局對殺人凶手進行種種嘉獎，因而不少人以殺人邀功。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為安排工作，為立新功，殺了 3 人，然後得意洋洋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合浦縣某大隊文革組長，怕別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全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有 1153 人，殺人後提幹的有 458 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 637 人（不含北海市），還有不少殺人凶手被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

---

補白：美國南北戰爭歷時四年，南軍失敗。雙方簽署和平協議，南軍將士獲得了北軍司令官格蘭特將軍頒令印製並親手簽署的證明書，然後平靜地重歸田園，從事和平勞動。北軍和政府信守諾言，對南軍官兵沒有任何後續懲治，人民安居樂業，迅速彌合了戰爭創傷，繁榮了國家經濟。中共建政後則違背諾言，濫殺濫捕前軍政人員，政治運動不斷，人民長期不得安寧，戕害大量經營人才，貽誤了整個民族經濟文化重新繁榮發展的時間。執政黨和領導人是否誠信，關係到民族的生存和幸福。言而無信，食言自肥，崇尚厚黑，愛耍陽謀，文過飾非，到頭來，不僅貽害民族整體，而且自身的命運也不配有比蘇共領導集團垮臺、齊奧塞斯庫斃命更好的下場。

---

一句話右派 華 中

我 1949 年“參加革命工作”，51 年入團，56 年以在職幹部身份參加高考，被某師範學院錄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過硬的。斯大林去世時，心情非常沉重，兩天茶飯不思。當時我在 XX 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對班上一些照舊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的同學橫眉以對。

考上大學前，我是一名公安幹部。一年之後，因在班上調侃一句，被打成“反黨、反人

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次課間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順口插一句嘴：“你以為死比活著更可怕嗎？”當時我自鳴得意，以為這句話很俏皮。反右時，這句話被揭露，指控我對現實不滿，說“現在活著還不如死了好”。就因為這句話，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辯白，哪知越辯越糟，說我狡辯，囂張，態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氣焰，于是我成為全校第一個被拋出來遭公開批判的學生。開我的批判大會那天，事前沒有通知我，直到“上燈戌時”，我班團支書突然叫我到某地開會。到那裏一看，我暗暗吃驚，因為此前全校還沒弄出過這麼大的動靜。只見廣場上臨時牽綫裝了三四盞電燈，擺了許多靠背椅和條凳，會標是“XX 反動言行辯論會”。“XX”是我的名字。

那時的批判會還比較文明，讓我坐在會場最前面的長條凳上，不低頭不彎腰，只在別人都發完言之後，指令我上臺“做深刻檢查”。不是辯論會嗎？怎麼未辯論就先給我的言行定性為反動呢？但是我無比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既然黨和毛主席說我錯了，那肯定是我錯了。因此，儘管對這個大會有意見，我還是揮淚泣血檢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會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開始得早，1957 年 6 月《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發表不幾天，我就不能參加團員大會了。暑假回家，居委會的幹部也很“關照”我，時不時找些雞毛蒜皮的事到我家來監看我。最後，給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動骨幹分子”，處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時，我未滿 22 周歲，1979 年拿到母校華師那張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書》時，已經 44 歲了，兩鬢斑白，22 年最寶貴的黃金年華盡付東流。

---

補白：劉章新，1923 年加入國民黨，27 年任國民黨縣黨改組委員會常委，28 年任嵊縣教育局長，53 年任浙江嵊縣中學副校長。喻元周是劉章新的老同學、好朋友、老同事，反右時，揭批喻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喻原本希望作為校領導的劉能伸出援手，不料劉也上臺揭發批判，宣布與他劃清界綫。喻元周最後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街道監督勞動。那時我也是嵊中的一名右派教師，時為主管教學的副校長劉章新，視我如瘟神，避之猶恐不及，安排我雙倍的工作量（每周 24 節課），不發參考書，不發備課筆記本，故意刁難我，也不許我到外校聽課交流。我與劉共事整整 22 年，他沒有喊過我一聲“顧老師”，即使狹路相逢也視而不見。在他眼裏，我只是一個右派分子，不是一個有名有姓、有人格尊嚴的人。四十多年後，嵊中退休教師鄭祖杰于《嵊州日報》發文懷念劉章新，稱 劉從 1957 年到 1961 年，前後 4 年，每月從自己 105 元工資中勻出 15 元，無償資助一位新來的右派大學生。後來劉章新的女兒劉紫薇也以此為據，撰文紀念其父。筆者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名嵊中見證者，必須指出，鄭祖杰提到的事實純屬子虛烏有，劉章新絕不可能幫助嵊中的任何右派。

顧海齡

---

吳天石的兒子 李大立

江蘇省教育廳長吳天石和夫人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李敬儀，是文革中全國最早被暴力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南京師院學生沖進吳李家，把他們拉到學校批鬥。有人動手打他們，有人把裝垃圾的鐵絲簍扣在李敬儀的頭上，拉到大街游街示眾。開始時李和吳被人架著走，不久李昏迷過去，被人拖了一裏路，氣絕身亡。吳在游街後又被拉回學校

繼續批鬥，雙臂被扭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于八月五日死亡。兩人的年齡分別是五十三和五十六歲。

吳天石夫婦被打死時，其子吳晴正在郊區農村勞動，偶然聽到兩個同學談論師範學院打死人，不料死者竟是自己的父母。十五歲的吳晴立刻進城回家。他的姐姐也是中學生，教他這樣回應此事：就說母親死于高血壓，父親死于慢性肝炎，姐弟兩人都不要哭。

一九七一年林彪死後，一些老幹部複職，一些被打死的人（包括吳天石）得到平反，吳晴得以參軍離開農村。後來，吳晴在軍中入黨，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學。畢業後，他被分到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書。父母就是在這所學校被人打死，吳晴常常與當年毆打父母的凶手擦肩而過。

文革學者王友琴女士曾經幾次托人與吳晴聯絡，希望瞭解其父母之死的更多情況，請他至少把王已寫好放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網站中關於他父母的文章校讀一遍。可是幾年過去了，王的請求沒有得到吳的任何回應。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潘文就此感慨道：“假使我的父母被政權殺害了，我會投入我的生命來復仇，來從事政治活動。至少，要把省公安局秘藏的證據都挖掘公布出來。為什麼吳晴不這樣做？他的正義感在哪里？為什麼在中國這種事情的結局總是壞人，準確地說是謀殺者，得以脫身？”

自古以來，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多少英雄豪傑為報父仇，臥薪嘗膽矢志不忘，最後得以伸張正義。我真為吳晴感到難過。我不是鼓勵吳去報私仇，而是希望他盡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把父母慘死的經過公之于眾，讓大家知道那段慘無人道的歷史，汲取歷史教訓，避免災難重臨。在父母之死上如此沉默、回避，連批判一聲都不敢，實在枉為人子！ ????

????正是由于像吳晴這樣的中國人怯懦地選擇沉默和回避，任憑當局篡改歷史、教育洗腦，才導致他們的子女晚輩認賊作父，將迫害自己父輩、祖輩的人當作歷史偉人來崇拜，甚至肆意謾罵敢于披露歷史真相的勇敢者。中國現實的荒謬真是莫此為甚！

---

補白之一：在中華民國的 38 年間，湖南常寧縣先後有 65 人擔任縣長。他們中間，除了解放前去世的和去了臺灣、香港的 10 人之外，幾乎全部被中共殺掉或關管後死去。這 65 位縣長，早期的有科舉功名，後來的絕大多數受過高等教育，大學畢業，還有 8 位留學生。從 1949 年中共建國到 1998 年的 49 年間，該縣共有縣長 19 人，只有建國初的一位縣長是高中生，此後就一直是農民和當兵的當縣長，直到 1984 年中共建政 35 年，才開始有一位大學畢業生當縣長。

彭小明

補白之二：陳思和論土改文學，是典型的各打五十大板。張煒的小說，說穿了僅是為了脫出俗套而已。既能吸引市場，又不至于完全得罪官方口徑。還鄉團的報復行為正是暴力土改的血腥反應。如果沒有鬥地主的殘虐，還鄉團怎麼可能施用酷刑！還鄉團的行為是局部的，暴力土改却是遍布全國的。如此評說，不分前因後果，不看比例多少，如何對得起天下屈死的冤魂！

彭小明

---

我跟蘇東坡不一夥 漢 男

大學畢業時，作為右派學生，我選擇了自謀職業，并很快在我家所屬居委會辦的一間小工廠找到一份工作。這個小廠由本居委會轄區內的一些家庭婦女及社會閑雜人員組成，居委會書記兼主任就是廠裏的書記兼廠長，管段戶籍（片警）則是廠裏的最高權威。

我被分配在鑄造車間，月薪 18 元。幾個月後，有人知道我是大學生，日用五金車間就把我要去做保管員。由於我做事謹慎，人也勤快，受到工人師傅的普遍好評。一年後，廠裏和轄區派出所打算給我摘掉右派帽子，要我填寫一份摘帽申請表。表中最主要的一欄是彙報思想。在填這一欄時，我不改說話調侃的積習，寫道：“每有人問我每月拿多少工資，我都不說兩個 9 塊（那時每半月發一次工資），而說 6 個 3 塊，因為六比兩多嘛！”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生產小組長通知我到食堂開大會。我以為是摘帽會，便把散放的工具歸置一下，立即趕往食堂。到食堂一看，群眾都到齊了，幾個積極分子還在往牆上貼標語。我瞥一眼標語，傻眼了。“XX，你的陰謀我們全都掌握了！”“XX 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食堂大門外面擺一張方桌，屋檐下貼的會標是“鬥爭右派分子 XX 大會”。“XX”是我的名字。

不過我一點也沒驚慌，因為我心裏沒有鬼。一會兒，管段戶籍來了，廠裏的書記也走上前，站到方桌後面，環視一下圍坐在食堂門口的工人師傅，習慣性地問一句：“人都到齊了吧？”然後面容嚴峻地宣布：“現在開會！”緊接著一聲斷喝：“把右派分子 XX 帶上來！”兩個積極分子立即閃出來，把我架到方桌前，命我低頭彎腰。事先通了氣的積極分子一個接一個怒目金剛似的，帶著那麼一股狠勁兒上臺發言，痛批我抗拒改造，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每人發言的最後一句話都是“今天，我是很氣憤的！”

第一輪批鬥高潮呈現疲態之際，一個重量級女積極分子丘某跳了出來，大聲質問我：“XX，你還有哪些問題沒有向組織上交代？”我說：“我所有的社會關係都向組織交代過了。”她說：“那好，我問你：有一個姓蘇的，你交代沒有？”我肯定地說：“我認識的人裏沒有姓蘇的。”她這時面向群眾大聲喊道：“XX 老實不老實？”眾人齊聲應答：“不老實！”“不老實怎麼辦？”“鬥！”立馬上來兩人，將我本已低著的頭狠狠往下按。接著丘某說：“好，既然你不老實，我給你點一下：蘇東坡是不是你們一夥的？”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要求她重複一遍，確認之後，我說“蘇東坡是古人”。這時，一位會計手拿一張紙譏諷地問我：“XX，你說他是古人，那你們混在一起寫反動歪詩，說現在不是在人間，污蔑新社會，你從哪里謀得的這樣一個古人？只怕你也是個古人吧？啊？”我再次說蘇東坡確實與我毫不相干，他是宋朝的大文學家。

這時我已完全明白了這場誤會的由來，我也同樣明白此時不是解釋的時候。丘某又站起來，正準備喊口號，說時遲，那時快，這時不知從哪里突然沖來兩個小青年兒，一下子坐到方桌上，其中一個的兩腿還吊在方桌前面晃悠了兩下。然後，倆小夥子大叫一聲：“回家吃飯囉！”說著飛奔而去，一拐彎，很快消失在小巷中。

此時，會場變得鬧哄哄的，眾人都散了神，會開不下去了。書記到底是書記，處變不驚，站到方桌後面，拍兩下巴掌：“安靜點，都安靜點！今天的會暫時告一段落。XX 今天的態度很不老實，回去以後要把你與蘇東坡……啊蘇東坡的關係寫成書面材料，明天早上上班之前交給我。聽見沒有？”我諾諾應了。接著他宣布散會，眾人一哄而散。

次日上班前，我遵命向書記交出了連夜寫的深刻檢查，無非是自我痛罵一頓。對於勒令我老實交代的與蘇東坡的關係，我交給書記一本《唐宋名家詞選》，並告訴他蘇東坡就在書中折疊的那一頁。此後，組織未再追查此事。

半年後，年底了，一天傍晚，我到轄區派出所辦事，遇到管段戶籍。他對我說：“你來得蠻好，你等我一下。”說著走進後面一間辦公室。我聽見一大串鑰匙開了幾次櫃子鎖的聲音。戶籍拿著一張紙出來，我立馬認出是我默寫蘇詞的那張紙，也就是鬥爭大會上我廠會計手裏拿的那張紙。戶籍的態度很平和，讓我給他講了蘇軾這首詞的基本內容，然後又收回了那張紙。

這張紙的來歷是這樣的。那天在公事房等客戶的電話，辦公桌上有一張皺巴巴的白紙，我便拉過來，將我喜愛的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默寫一遍。接完客戶電話後，

我忘了帶走或撕掉那張紙。公事房的什麼人撿到了，報了案。

---

補白：40 年代後期，解放區地方政府以極端過激的做法進行土地改革。鬥爭波及到地主的家庭或親戚，窮途末路的地主爲了逃避打擊，把女兒嫁給共產黨的幹部或農民。與地主結親的共產黨幹部中，也有在土改中庇護地主的，甚至以武力反對土改。爲了掃除這些土改中的障礙，太岳區共產黨委員會在 1947 年 8 月 11 日發表了《爲堵塞地主階級防空洞的四項決定》，其中有一條規定：嚴禁黨員幹部與地主的女人、女兒結婚，已結婚者應嚴格審查其有無政治問題，如有，可強制離婚。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也發布決定，幹部一律不准與地主惡霸土豪劣紳等的女兒或離婚媳婦及僞屬女人結婚。在土改政策下，婚姻成了政治問題，而非私人的事情。土地革命的浪潮波及革命組織內部，地主出身的人或被清除出黨，或被迫寫自我反省材料。

林鮮明

---

父母拴手一起跳河 勞布藏

1953 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區成立，我父親當了區長。我帶 20 多戶人家，全都是一些牲口少的窮人，在海宴縣成立了第一個互助組。一年後，我們又成立了第一個初級社團結社，我當社長。

1958 年秋，鬥爭開始了，部落頭人、區鄉幹部被召去開會，扣留下來。部落裏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勞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我那當社長的父親也被逮捕了。上級也不讓我們說蒙古話或藏話，說那是黑人黑話，不能說。我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我們搬到祁連縣的托萊牧場，天一亮就要走。上級宣傳說，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戶只准趕三頭牛，其餘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們背著娃娃走不動，男人們先趕上牲口走，到宿營地後，晚上再回頭去找女人娃娃們。我們趕著牛馬和羊走，有馬也不許騎，抱著娃娃的女人、走不動路的老人也不讓騎馬。幹部們很凶，很牛 B，哪一個營地上的茶燒得遲一點就一脚踢翻，那一天你就別想吃飯。一句話，人不如牲口，我們不在人的數字裏。

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在雪地裏趕著牲口走，駱駝回頭望著家鄉“嗷爾嗷爾”叫，眼裏淌著淚。走不動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來，我們蒙古人也罷，藏民也罷，牲口就是我們大家的夥伴，是朋友，也是賴以生存的依靠。牛、馬、羊和駱駝在雪地上淒慘地哭叫著，我們的那些孤兒寡婦們悄悄地哭，沒人敢大聲哭啊。

到了托萊，除了一頂空蕩蕩的帳篷外啥也沒有，沒有吃飯的鍋碗，要買我們沒有錢。最難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沒有幹活的人，沒有勞動力。我們在蘇勒、托萊、天峻一帶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麼冷，一個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風刮走了，七天還要再壘一個羊圈。人死掉不要緊，公家的羊死掉咋辦？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辦的。一部分人被趕到農業隊了，農業上的生活更緊張，餓死的人數都數不過來。男男女女餓得走不動路，後來我們也有了經驗，餓極了走不動時，背著手還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動。牧場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絕對不讓我們吃。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個別人餓得實在沒辦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眾大會上批鬥，然後去勞改。



開會的時候，會跳秧歌的漢族土族男女一邊跳一邊唱：“1958 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快快來。”會上批鬥活佛、阿訇，還要讓回族養豬。

祁連縣有漢、回、藏、蒙古、土好幾個民族，幹部們天天宣傳：“揭掉蓋頭辮子化，不戴頂帽分頭化，脫掉皮褂棉布化，不燒牛糞衛生化，回藏漢蒙通婚大衆化，牧區帳子房街道化，鄉村住宅城鎮化。”趕過來趕過去折騰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兒寡女。

1960 年，蘭州軍區的人在托萊草原上大規模圍獵，成群的野馬被打死，然後用車拉走。

後來，我們又被趕到默勒灘，從默勒灘又趕到野牛溝。每個人一個月只供應九斤糧，我家有三個娃娃，我的兩個，我妹妹的一個，娃娃們吃不飽。大米熬成湯，每人舀上一碗，幾粒米沉到碗底，娃娃們用手撈也撈不上。吃的糧食不夠，穿的衣服也沒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們沒有鞋。我們在灘上拾那些被部隊打死的野馬，把皮剝下來泡在水裏，給娃娃們縫鞋。

1958 到 1960 年死了多少人啊！岡察、祁連、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兒寡女算是活過來了，總算沒有死絕，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地方了，沒有自己的部落了，我們還是流浪的人。

1962 年我父親被釋放回來，但是還戴著反革命帽子。四清運動來了，接著文革又來了，1966 年我的父親和母親都給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因為我們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黨籍也被開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學，我的姊妹們都沒有上成學，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讓措，1980 年我們家平反後上了個學。

我的父親和母親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見的時候圈好羊，拴好牛，來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會場上彙報，然後挨批鬥、挨打。每天都要批鬥，用繩子捆住打。他們在我的父親脖子上用鐵絲吊石頭，然後又吊在帳篷裏，用烟熏，用棍子打，嘴裏灌辣椒、薑粉，我父親滿臉都是眼泪鼻涕。

1968 年 11 月份，我在紅土溝、哈薩墳一帶放羊。有一天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回家，我問別人，說是批鬥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紅土溝的黑河邊，看見父親母親的衣裳扔在那裏，却不見人。我們找了好多天，怎麼找也找不到。當時河面已經結冰了，天越來越冷，冰越結越厚。到第二年開春，冰層化掉，我才在河水邊找到父母的尸體，他倆是用繩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給鄉上彙報，公安上的人來了，說這是畏罪自殺。1980 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親叫達爾基，母親叫仁青措。

---

補白之一：草台鄉鬥爭偽鄉長張麻子和便衣隊長謝八。鬥爭大會結束，民兵把張麻子綁在街心的大柳樹上示衆。張麻子渾身上下被冷水澆透，一宿凍成個冰坨子，後來用鐵鎬才把尸體從柳樹上刨下來。謝八是被石頭砸死的。民兵把他推下土坑，他還在破口大罵：“奶奶的！二十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一會兒，他就被石頭砸成一堆肉泥。  
碧薇萍

補白之二：我上中學的時候，老實巴交的學校木匠突然變成了壞分子，原因是他在往木板牆上釘釘子的時候，不小心釘穿到了背面，而背面恰好是一幅領袖像。  
張 曉

---

武宣吃人肉事件 劍 客

柳州地區武宣縣，距柳州市 90 公里。1968 年 5 月 13 日，武宣縣“聯指”攻打“四

二二”，原因是 5 月 4 日“四二二”抓獲桐嶺公社的“聯指”成員梁達堅，并搜走 120 多元錢和一些衣物。數日後，“四二二”釋放了梁達堅，未退錢物。“聯指”總部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 600 人，并請貴縣“聯指”300 多人支援，共 900 多人，武裝包圍北樓、北街武宣小學的“四二二”據點，打死 97 人，毀掉房屋 67 間，37 戶被抄家。

“聯指”派自命為無產階級革命派，把“四二二”派當成反革命、土匪、右派翻天進行鎮壓。

1968 年 6 月 15 日，武宣縣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四二二”的劉業龍、陳天掌等 4 人拉到三裏圩游鬥，于車縫社門口將劉、陳等 4 人打死。李坤壽等拔出尖刀挖肝割肉，拿回大隊部會餐品嘗。自是日起，至 8 月底止，該縣“四二二”一派共有 75 人的心肝和肌肉被吃掉。吃人的人，男女老少工人農民國家幹部中共黨員全有。

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早年參加革命，中共建政後擔任蒼梧縣副縣長，文革初被打成叛徒。因同情“四二二”，黃于 7 月 1 日晚被校革委副主任謝東主持批鬥殺死。次日晨，黃佩農、張繼鋒等將他的肝挖去，肉割去，在學校宿舍區用瓦片點火烘烤。

7 月 17 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四二二”的廖金福、鐘振權、鐘少廷等 4 人。一幫凶手把廖天龍等 4 人殺死，將尸體拉到平昭碼頭，由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拳喝酒會餐，陳達財等 23 人參加了這次人肉會餐。

當時在武宣縣被管制勞改的南下幹部王祖賢，親眼目睹了“聯指”當街打死人就地割肉取肝的暴行，于是幾經周折寫信給周恩來，報告武宣吃人事件。周恩來電令廣西軍區司令員區致富，派部隊進駐武宣，吃人肉事件得以制止。但是區致富本人就支持“聯指”派，對揭露武宣吃人事件真相的王祖賢進行打擊報復。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各地積極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廣西自治區黨委却繼續堅持派性，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事件。中央幾次追查過問，自治區黨委韋國清、劉重桂等回應說，武宣歷來有吃人的習慣，公然袒護。這樣，靈山縣、貴縣、武鳴華僑農場“聯指”吃人肉的野蠻事件的蓋子一直被捂著。1983 年，廣西自治區黨委被改組，武宣等縣吃人肉的事件才得到一定處理。

---

補白：土改時期，地主被掃地出門後，各村鎮又掀起鬥爭地主的浪潮。大會控訴地主的罪行，小會追逼地主埋藏的金銀財寶，牽著地主游街示眾更成了各個村鎮的一道景觀。地主們戴著紙糊的高高的尖頂帽子，穿著包括壽衣在內的花花綠綠的奇裝異服，男人被塗畫了鬼怪或馬戲小丑的臉譜，女人則被弄得披頭散髮。他們或是一個人，或是幾個人排成一串，或被綁著讓人牽著走，或被人趕著走。一群貧農團員監押著他們，敲鑼打鼓、高呼口號，也讓地主們喊口號：“我是地主某某某！”“我是地主婆！”“我剝削窮人我有罪！”誰不喊或喊得不響亮，就要挨上幾拳幾腳或幾個大耳光。男女老少像正月看秧歌一樣圍追著看。看到這些昔日威風體面的人物變得如此狼狽醜陋，他們有的嘆息，有的覺得解恨，有的開心，有的落淚，有的幸災樂禍，有的合掌念佛。半大孩子嬉笑著在人群裏鑽來鑽去，有的鑽過人群，對狗地主打上兩拳或踢上幾腳，然後又嘻嘻哈哈地從人群裏鑽出來。

---

1963 年夏，我被街道的一間小噴漆廠臨時借調去拉板車。該廠有一輛人力三輪車和一輛板車，三輪車由一名歷史反革命餘某專蹬，我只拉板車。某日晨一上班，車間主任就給我下達任務，要我把一個毛澤東半身像送還區法院。那像的體積比毛的真身小許多，但比瘦削的我的上半身還要大。我一人小心翼翼地將“老人家”抱到板車上，卻發現它太富態，板車中間盛不下，只能放在接近板車把手處。可是我一提起把手，“老人家”就往前栽。一旦栽了，輕則撞破腦袋，重則粉身碎骨。一籌莫展之際，一位老工人走過來，我問她這像是怎麼運來的。她告訴我，昨晚廠裏開新黨員入黨宣誓和表彰勞模大會，由餘某用三輪車從法院拖來的。我說板車太小，裝不下，怎麼辦？她說，用繩子把它捆起來不就行了？她是個老黨員，說話底氣十足。“黨給我智慧給我膽”，我用板車配備的比大拇指還粗的繩子往毛像脖子上繞兩圈，又在前胸後背交叉纏繞，再在中間走一道，最後將兩個繩頭固定在板車兩邊的掛鉤上。一番料理之後，老像近似五花大綁，被穩穩捆在板車上。

一切停當，我推車上路，為了安全，我不敢背對它拉車前進。路面坑坑窪窪，加上推著走，平常不需半小時的路程，這回却走了一個多小時。太陽很毒，行至半途，我在路邊樹蔭下歇了歇。再上路時，我擔心把“老人家”曬壞了，就把自己戴的一頂破草帽扣在它頭上。它腦袋大，我的草帽小，戴上去搖搖晃晃的。一路不時有人朝這邊看，也只是一瞥而已。那時是文革前，毛還不像後來那般神化。在脫胎換骨的 21 年裏，我的主要活計就是拉板車。我拉過無數東西，別的都沒留下什麼印象，唯有這次拉毛像令我終生難忘。

#### 小閣樓男女混居記 何 爲

1969 年 1 月下旬某日下午，廠裏造反派頭頭突然把我叫去，說是有外調人員來廠找我外調。到那裏一看，兩個陌生男人正等著我。廠裏陪見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我說：“這兩個同志是果品公司來的，找你瞭解若 X 的情況，你要老老實實交代，爭取立功。”說完向來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問了。

來人中一戴眼鏡者單刀直入，問我：“你和若 X 以及你們那一夥人平時都說了些什麼？”“我們平時聊天也就是些閑話，見面也不多。”我答。眼鏡緊接著問：“你們那年的抱冰堂會議也是閑話嗎？”我一時竟沒反應過來，不知他在說什麼。一會兒，我明白了，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會議。我是去過一次抱冰堂，幾十年也就那一次，是 1966 年春節期間，若 X 帶著老婆，我帶著老婆孩子，還有宮 XX、艾 XX 和王 XX，一道去的。那天我們去晚了，不到一小時茶館就收場了。怎麼能說成是什麼會議呢？”

??? 眼鏡質問道：“你能對你今天說的話負責嗎？”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對我今天說的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負責。”“那好，我們走。”兩個外調人員悻悻起身走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問題出在王 XX 身上。他是若 X 單位的一個小青年，年齡和學識上與我們這些人有代溝。不過，他在單位對若 X 不錯，有空還到若家坐坐，於是與我們這幾個右派朋友都混熟了。

王 XX 一度是單位保守派的頭頭，掌過一點權。武漢 7?20 事件後，造反派掌權，就尋機報復他。一天，人家把他弄到群眾專政指揮部一頓好打，逼問他與若某的來往。他一通胡編亂說，把 1966 年春節那次抱冰堂茶館喝茶說成“抱冰堂會議”。當天打完，王 XX 被放，他的交代也未被當回事。到 1969 年清隊時，派性鬥爭更錯綜複雜，3 年前的那次喝茶又被提出來調查。除王 XX 和婦女、孩子外，我們幾個右派都被各自的單位關起來了，追問我們在一起有哪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

某日下午臨下班時，我剛卸完板車上的材料，一個小組長就對我說：“XX，你今天不

要回家了。”這時，忽聽又傳來一聲斷喝：“把 XX 看起來！”是我廠造反派總頭頭、社會游民出身的劉某。當晚我就未能回家。一個街道小廠裏的一個社會游民的一句無法無天的話，竟限制我人身自由長達 3 個月。

在此期間，無數次開我的鬥爭會。有一次，一個積極分子氣鼓鼓地上臺說：“我今天要揭發批判 XX 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們那一夥牛鬼蛇神放毒時，惡毒地稱偉大領袖毛主席為‘最高’，稱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為‘次高’，稱周總理為‘台柱’，大家說，XX 是不是一隻花面狐狸？”下麵齊聲應答：“是花面狐狸！”接下來的一個積極分子，一上來就把我的頭狠狠按了幾下，同時怒吼一聲“低頭！”接著直截了當地質问我：“XX，你是不是說過‘現在 8 億人看 8 個戲’？”我承認道：“說過。”會場頓時群情激憤，口號聲聲。

被關期間，我白天照常上班，但不能回家吃飯，晚上不能回家睡覺，而且有兩三個人看守。廠外有一間堆放鐵板和雜物的板房，上面有個小閣樓，他們就把我安頓在那裏。小閣樓約有 10 平米，人在中間可以直立，兩邊坡頂處就不能直立了。在一邊的坡頂下安放一張單人床，是我睡的；另一邊的坡頂下搭了一個雙人床（可 3 人橫臥），是看守我的人睡的。兩床中間放一張方桌，既供我晚上寫交代材料，也是我與看守之間的漢界楚河，因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廠男人很少）。

在這麼狹窄的空間裏男女混居一室，很是尷尬。也沒有衛生間，上下閣樓靠一個活動的木單梯，半夜方便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總是先乾咳兩聲，并拉亮電燈，以免被栽贓或誤認為我想逃跑或行刺，然後從方桌下面拉出一隻小木桶，面向我的床小解。至于水聲嘩嘩，我就實在沒有法子了。“嫂子”們要起夜，總是輕手輕腳，一般不開燈，至于“泉水叮咚”，也只好橫心由它“叮咚”了。每天夜裏，她們幾人次“叮咚”，我就幾次夢回。

中共九大後，天氣漸漸熱起來，不便之處更多。夜間既不用蓋被子，長褲也不能穿了，即便關了燈，也能模糊顯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之毒太深，始終恪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之道，不把她們放在眼裏。可是“嫂子”們終於忍不住了，一天晚飯後，我親耳聽見一個“嫂子”小聲對頭頭講：“你與若 X 單位聯繫一下，問他們單位幾時放人。你就說，你們不放人，我們單位可要放了，我們小廠條件有限，不能與你們國營大單位比。”兩天後，廠裏放我回家了，沒有給我任何說法。若 X 單位大，條件好，比我多關了大半年。

---

補白：中共建政初，廣東省委書記葉劍英，調來陳泊、陳坤主持廣東公安工作。陳泊在延安時期從事安全保衛和情報工作，有“延安的福爾摩斯”之稱。陳坤負責中共華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報工作。當時廣州治安形勢異常混亂，為恢復社會秩序，二陳報請省委批准，錄用一批國民黨特工和數百名舊警察參加治安工作。由于領導得法，加之國民黨人員熟悉情況，廣州治安迅速得到改善。不久鎮反，公安部長羅瑞卿認定二陳是混進黨內的英國特務、中統特務集團的黑後臺，親自到廣州逮捕他們，二陳案成為公安部門的反革命大案。廣州市公安局被逮捕了 300 多人，廣東省公安部門被逮捕 700 多人。1952 年，陳坤被迫害致死。1953 年，陳泊被判刑 10 年，1961 年刑滿釋放，未來得及與妻子見面，又被莫名其妙地抓走。1972 年，陳泊死于勞改農場。

---

1966 年 5?16 通知和 6 月 1 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之後，武漢各單位紛紛召開批判大會，聲討武漢大學以校長李達為首的“三家村”，我所在的街道小廠也召開幾次聲討大會。

在政治運動中歷練了 10 多年的我，預感到將有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來臨。早上出門上班，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因此我將幾件替換衣服和一小袋人丹，放在枕頭下麵，準備隨時被帶走。9 月 3 日，預料中的政治風暴終於來了。下午一上班，廠裏的幾個紅衛兵就逼問我：“XX，我們紅衛兵昨天貼出的‘勒令’，你看見沒有？為什麼你今天還不佩戴‘牛鬼蛇神’的黑符號？”我回答說：“5?16 通知中沒有這一條。”

我話音剛落，骨幹丘某立即掏出哨子吹起來，大喊：“全廠緊急集合！”大家都放下手裏的工具，來到現場。丘某發號施令道：“把高帽子給他戴上！”幾個戴著紅衛兵袖箍的男女立馬擁上來，從兩邊抓住我的胳膊，另有二三人將一頂硬紙糊的兩尺多高的高帽，强行扣在我頭上。他們一鬆手，我就飛快將高帽摘下撕毀。這大大刺激了他們，立刻又拿來一頂給我扣上，我又撕毀。丘某面紅耳赤，帶頭高呼口號，同時衆人又將第三頂高帽扣在我頭上。3 個男工緊緊抓住我，示衆批鬥，一直折騰到晚上 6 點。

當晚，這批“毛主席的紅衛兵”明火執仗地抄了我的家，糧票也被抄走。抄家中，他們又發現了我新的罪行：我家板房的板壁上沒挂毛像，而挂西斯廷聖母。他們憤怒地質問我，不挂毛主席像是什麼狼子野心。我回答說，怕板房失火把毛主席像燒了。他們抓不住把柄了。

??

阿爸、叔叔和我 秋什江

1958 年，海晏縣（青海省）全縣被打成反革命縣，我的阿爸被抓走，三叔叔也被抓走。那年 10 月，上級命令將海晏縣一帶的蒙、藏牧民火速搬遷到祁連縣、剛察縣、湟源縣等地。我抱著哥哥的腰，騎在他的馬後到了蘇勒。到蘇勒後我就跟阿媽去放馬放羊，兩年後我八九歲了，就一個人放牧一群母羊。我整天想我的阿爸，不知他在哪里。

過了幾年，聽人說一部分勞改的人要釋放了，我就去找會算卦的仁青爺爺，算我阿爸活著沒有？回來沒有？仁青爺爺算了以後對我說：“你的阿爸正在路上，很快就會到。”我一直站在羊群邊上等到天黑，也沒有見到我的阿爸。我又跑去讓仁青爺爺算，他算了後說：“咦？來了，來了。”我急忙回到帳篷等著阿爸，等著等著就睡著了。第二天天亮，還是沒有看見阿爸。我去放羊的時候，又去讓仁青爺爺算，他算了後對我說：“你的阿爸來了，今天肯定要來。”我站在羊群邊，看著遠處的大路。很久很久了，看到運輸隊的人馬趕著牛從那裏走過。我跑上去問他們看見我的阿爸沒有，他們說沒有看見。天又黑了，我的哥哥來了，他和我一起站在破帳篷邊等阿爸。我們倆一起去趕羊，看見運輸隊的人趕著牛走過來。仁青爺爺和一個奶奶一邊跑一邊喊我的名字：“秋什江，秋什江。”我跑到他們旁邊時，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對我和哥哥說：“你的阿爸回來了。”

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終於看到阿爸活著回來了。那時候，幾個娃娃能看到自己的阿爸能活著回來啊！所以，不管怎麼說，我還算是個幸運的娃娃吧。可是我的三叔叔就沒有回來，他死在賽什克勞改農場了。三叔叔只是個一輩子放羊的老實巴交的牧民。

我阿爸回來時間不長，就又開始挨批鬥了。我看到一些人把他的鞋脫了讓他站在雪地裏，然後又拾來牛糞和鞭麻（一種灌木）燒著後熏他，又把一個石磨挂在他的脖子上，腳上還上了馬絆。有一天我阿爸放羊回來，把羊趕到帳篷旁邊後不見了。我哥哥騎著馬正好過來，看見阿爸在一個土崖上釘了一個大木橛子，把自己的布腰帶拴在上面正在上吊，哥哥急忙跑

上去把阿爸救下了。

我的叔叔被關在野牛溝公社幾天了，天天批鬥挨打。有一天，叔叔懇求說要回去看一下自己的娃娃，幹部們開恩讓他快去快回。叔叔到家裏後一句話也不說，只是抱著自己的小娃娃哭。我哥哥對我說：“叔叔的樣子怪怪的，我們去看看他吧。”我就和哥哥去叔叔家帳篷了。嬸嬸把刀子和繩子都藏起來了。我們倆就在叔叔的帳篷裏住下了。到了後半夜，嬸嬸說：“天快亮了，你們回去睡覺吧。”我和哥哥就回來了。月亮很亮，微微飄著點雪。我們回來剛躺下時間不長，就聽見嬸嬸在叫我哥哥的名子“亞凡，亞凡”，哥哥爬起來就跑出去了，我也跟著出去了。嬸嬸說叔叔不見了。我們幾個人去找，找到一個水邊上，看見叔叔在水裏，我們跳進水裏把他拉出來。他腿上全是血。原來他跳進水裏沒有淹死，又拿石塊砸斷了自己的腿，又爬到水裏。我們救下了叔叔，可是他成了殘廢。

1967年，上面組織基幹民兵去修路，我們生產隊裏有那麼多小夥子都去了，我也想去，我才十七八歲嘛！那時我們那裏有一條政策：表現好的牧主子女可以考慮吸收到民兵隊伍裏。我跑去報名，第二天就批准了，第三天就去修路，第四天炸藥炸傷了我的胳膊。我抱著胳膊回來找生產隊長請假，隊長說：“我們貧下中農的子女上前綫犧牲了咋辦？你的胳膊殘廢了算個啥？”隊長不給假，讓我去放羊。就這樣，我的胳膊一直沒有得到治療，後來成了殘廢。

惡棒劉戶籍 晴 川

1971年12月某日，居委會開我的年終評審會。恰好那天我病了，發高燒，實在走不動，就讓我妻代我去居委會請假。過了兩三天，12月30日，我在上班路上遇見管我的片警劉某。劉某叫住我，問我為什麼不參加年終評審會（其實他知道我病了），我如實作了簡要說明。接著，他說：“你沒有參加這次年終評審會，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機會，是很大的損失。”同時對我宣布，從現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彙報材料。

我原本每周向單位交一份思想彙報材料，現在片警也要，又不能照抄交給廠裏的那份材料，怎麼辦？再寫一份最好，可問題是，哪有那麼多思想好回報的？

經過一番冥思苦想，我不禁大喜，決定就寫劉片警對我的“教導”。我緊緊抓住12月30日他在街上對我的那番“教導”——“沒有參加這次評審會……是很大的損失”，反復敷衍成文，為劉片警“立言”，並把他的“教導”上升到“劉片警的哲學”的高度。每周呈送的那份思想彙報，主標題不同，副標題則有定式——“學習劉片警‘12?30’重要講話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每周彙報的起句和尾句都是“劉戶籍的哲學很重要”，文字也使用得相當考究，儘量選用我手頭留存的人民日報出版社文革前出版的一本《難字表》上的字。

此後，我與劉戶籍相安無事近兩個月。一天，我又在路上與劉戶籍相遇，他叫住我，未等我開口問他有何指示，他就先開口了：“你的思想彙報材料不要寫了，算了！”

無檔案右派馬叔叔 喬海燕

馬叔叔家與我家是同住一院的鄰居。馬叔叔北大中文系畢業，在報社當記者，不愛說話，見人只點頭，有時略笑笑。馬叔叔的愛人馬阿姨，是我的小學老師，比馬叔叔略胖，但行走快捷，左手總是端著，像周恩來，她說是拿作業本養成的習慣。他們有三個兒子，是我兒時的玩伴。

五七年反右，馬叔叔既不是運動對象，也不是骨幹分子，屬於牽著走的那種人。報社頭頭看中了，認為可樹為典型，百般動員他發言。可他總是不吭，逼急了，就說，我再想想。這一想，又過去了好幾天。

馬叔叔在報社肩負宣傳大政方針的重任。單位的頭頭屬於抓業務不行、抓運動在行的那種，一有運動，積極而又創意迭出，總是設法超額完成上級布置的工作。劃右派這事，任務是完成了，但是，如果再增加一個名額，就可以超標了。完成任務叫“工作”，超標才叫“成績”。可是這個超標的名額從哪里搞來？實在沒有可選之人，頭頭帶領幾個下屬，坐在辦公室抽悶烟。正在這時，馬叔叔進來送稿件，指點兩句稿子上的事。也是他好事兒，看見領導都在，隨口就說，那邊正有討論，發言人不多。他的本意是想如實告訴領導，希望領導去指導討論。

等馬叔叔出門，頭頭長舒一口氣，其他幾個人眼中也放出异彩。老馬這句話很重要，不發言就是抵觸，就是對運動不滿，老馬一向不發言，正符合右派條件啊！

馬叔叔當右派了，開始沒有下鄉，在報社幹些粗活，喂豬、幫廚、做煤餅、燒鍋爐、幫木匠拉大鋸。六零年經濟困難，馬叔叔就從單位離開了，聽說全家發配鄉下。

以後又有幾次聽到馬叔叔的消息，說他在一個公社拖拉機站工作，後又到縣文化館，馬阿姨從此操持家務，三個兒子逐漸長大。

1978年下半年，中央為右派平反，文件下達到當地，全省一片哭聲。79年初，馬叔叔攜帶全家從農村來到報社，滿懷喜悅，笑逐顏開，逢人就誇黨的政策好，贊揚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報社對馬叔叔、馬阿姨們關懷備至，殷勤招待，吃住免費，早上稀飯、油條隨便吃，不許拿；中午一家一桌，四涼四熱八個碟，主食有花卷、窩頭、包子，窩頭可以隨便拿，包子和花卷限量；晚上麵條，不限量，每人再發一個花卷。我去看馬叔叔、馬阿姨，恭恭敬敬叫“馬叔叔”，叫馬阿姨“老師”。馬叔叔誇獎我，說我趕上了好時機，囑咐我為四化貢獻青春。

每到星期天，報社派大轎車，拉右派們出去游玩，參觀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去三門峽水電站，洛陽八大廠，燕莊毛主席視察過的地方，鞏縣地主莊園。每到一地，馬叔叔都認真聽講，認真記筆記。在報社組織的座談會上，馬叔叔積極發言，每每熱淚盈眶，以至泣不成聲。

報社領導找馬叔叔談話，百般道歉、解釋，稱他是好幹部、好記者，寫過許多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的報道，人民沒有忘記你，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沒有忘記你。吃好了，玩好了，平反工作開始。所謂平反，那時不叫平反，叫改正，意思是反右運動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所以要改正。運動時光榮且正確，現在改正，仍要體現光榮和正確。

改正進入操作程序，每天都要填許多表格，單位的、公安的(右派屬五類分子之末，列公安管制範圍)、民政的、原單位的、農村單位的、現單位的，還有各種談話。右派們提出各種條件，報社也要討價還價，補貼多少錢(從57年到79年，凡22年，最高補貼540塊，平均每年24塊5毛多一點)，工作安排，職務，還有子女安排，上學，就業，等等，等等。

一切辦完，所有條件談妥，單位、個人基本滿意，檔案材料從省委組織部提回。激動人心的一刻就要到了！報社將右派的檔案材料與個人見面，將改正材料附上，右派簽字畫押，寫上意見，這22年的歷史，就算了結。至于後人如何評說，管他呢，反正農村戶口轉城市戶口了，吃商品糧，單位分房了，老婆孩子住一塊，有自來水，星期六洗熱水澡，出門有公

共汽車，每天上班下班，月底領工資，單位門口就是郵局、商店、糧店、電影院……還有什麼比現實更叫人滿意！

報社辦公室主任親自主持，抽出馬叔叔的檔案，一頁、兩頁、三頁……白紙黑字，歷歷在目。滄桑歲月，白馬過隙。“啊——”主任倒抽一口涼氣，渾身的冷汗刷的冒出來——馬叔叔的檔案袋裏，根本沒有劃右派的材料！

馬叔叔也緊張了，連連翻動檔案，嘴裏喃喃：“怎麼會沒有呢，怎麼會沒有呢，我是右派啊，我確實是右派啊……”可是，沒有就是沒有。辦公室主任急得幾乎哭出聲，用剪刀把檔案袋剪成條條，也沒有發現馬叔叔是右派的任何官方證據，甚至連一張簡單的紙片都沒有。

按照政策，不是右派的問題，不在此次改正範圍。辦公室主任急忙抓電話，向上級“改辦”請示。電話裏一陣哄堂大笑，回答是無情的：“沒有辦法。”辦公室主任只好找領導彙報。報社倒是很認真，馬上組織人員尋找當年的相關人員，辦事的人都說馬叔叔是右派，人人都看見他參加到右派隊伍裏勞動改造，喂豬，燒鍋爐。最後找到當年劃右派時報社的頭頭。頭頭因兒子車禍身故，自己又是晚期癌症，躺在床上只有倒氣兒的工夫，一句話都說不成了。辦公室主任把情況告訴他，問究竟是怎麼回事，頭頭渾濁的眼睛裏慢慢淌下幾滴淚，死活不說一句話。情急之中，辦公室主任又問馬叔叔：“你記得辦理過右派手續嗎？”馬叔叔想了半天，嚶嚶說：“不知道，就談過一次話，說我是右派。”

情況基本清楚了，當年，根本就沒有給馬叔叔定性為右派，既沒有報社頭頭簽字、運動辦評語、單位蓋章，也沒有個人簽字。可是，為什麼就有人給馬叔叔辦了開除公職、遷移戶口的手續呢？真是一盆糊塗漿了。

在報社大門外等候喜訊的馬阿姨和三個兒子，依然在低聲商量今後的生活，憧憬著那無限美好的明天。然而，他們看到的却是泪流滿面、步履踉蹌的馬叔叔。馬阿姨急切迎上去詢問，馬叔叔只喃喃說：“我是右派啊，我確實是右派啊……”

馬阿姨忙問跟隨的辦公室主任。當她聽說馬叔叔沒有右派檔案，又聽說馬叔叔不在這次改正範圍之內，呆住了！馬叔叔的大兒子張張嘴，眼淚就涌出來，悲憤地喊叫著：“你們不能這樣啊！”

馬阿姨和三個兒子緊緊抱在一起，放聲大哭。街上的行人不知道怎麼回事，紛紛圍攏來看，不住地打聽。馬阿姨和三個兒子哭得聲嘶力竭，渾身抽搐。他們此時想的什麼？哭的什麼？沒有經歷的人，沒有經歷那個時代的人很難理解——低矮的茅舍，昏暗的油燈，苦熬的歲月，青春年華，漏斷人稀的長夜苦苦等待天明，對父親的經歷心存的最後一絲絲希望，如今，全破滅了。

馬叔叔站在一旁，要不是幾個老相識攙扶，幾乎不能自立。好半天，他流著眼淚，顫顫地伸出兩個手指，說：“22 年啊，22 年啊！”

---

補白：每天早上我們勞改人員去工地，都要經過鳳陽縣城門口，再取道向北，直至臨淮關。爲了適應長途跋涉，不再採取籬筐摺疊、鍬杠捆扎由專人扛抬的方法，改爲每人自帶籬、鍬、杠各一件行軍。一次走到鳳陽城外一處人迹罕至的山間曲徑處，我看到一隻一尺上下發出陣陣微臭的死小豬。一連三天，死小豬都在，無人處理。第四天，我實在忍耐不住，奔前拎起豬腳，將豬尸丟入背上背的籬筐中。不料後面押送的軍人竟大聲吆喝起來。不得已，在惡罵聲之下，我只好把豬尸扔掉。那時餓呀！

---



一天，單位裏來兩個外調人員，頗有點來者不善。其中那個戴眼鏡的，先泛泛地問了幾個一般性的問題，比如你想不想爭取早日回到人民群眾懷抱裏來呀，你覺得自己的態度老不老實呀，等等，接著追問：“你認為自己的問題交代完了嗎？還隱瞞了哪些問題？”不等我回答完，他猛一拍桌子，怒吼道：“你太不老實了，交代問題避重就輕！我問你，我單位有人舉報你說過打算到銀行搶兩千塊錢的事，究竟有沒有？”我一聽，覺得好笑。世上哪有搶銀行之前先預定好搶劫數額的？倘若銀行裏只有一千九呢？或者倘若銀行有兩千一，是不是還要留下一百元？

我明確答復他們，我從來沒有說過這話。當天的外調不歡而散。來人走後，我仔細考慮這個空穴來風究竟是怎麼刮起來的，一點頭緒也想不起來。他們逼我寫交代材料，我不知從何寫起，僵持了幾天。後來，我終於想起一件可能沾邊的事。當時是文革初期，報紙報道雲南邊境某縣發生一起搶劫案，劫匪搶走兩千塊錢。我和幾位朋友似乎談論過這個熱點新聞，可能如今被演繹成我打算搶銀行了。我說明原委，他們不信，說我狡辯，逼我寫交代材料。無奈之下，我決定編一個包含有“說搶銀行”和“兩千塊錢”兩個元素的故事。

他們看了我的第一篇交代材料（亦即第一篇小故事）後，對我說：“開始交代自己的問題了，說明你還是不想與人民頑抗到底的，我們歡迎。不過，這兩千塊錢，還不是那兩千塊錢，你再好好考慮考慮，要深挖，爭取主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臨走時特別強調：“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材料寫出來，我們明天下午來拿。”當晚，我又以“說搶銀行”和“兩千塊錢”為元素，發揮想像力，編一份交代材料。次日，來人看了材料，不滿地說：“這還不是那兩千塊錢，重新交代。”

接下來幾天，我又一連編了幾份材料，但都“還不是那兩千塊錢”。我漸漸琢磨透了，他們是想逼我編出與他們炮製的材料對口的材料。這怎麼可能呢？我交出第六份材料時，他們仍說“還不是那兩千塊錢”。我實在忍無可忍了，就斗膽索性說出自己的想法。我說：“本來，您只要兩千塊錢，現在我都開出一萬二了，您還要。如果您繼續要，我還可以開。”聽我這番話，他們若有所悟，那天臨走時只說“你再考慮考慮”，沒有說“重新交待”。當晚我就自作主張沒再寫材料，他們也“心有靈犀”，居然沒再追究。

---

補白：1958年9月，上面通知我到政訓班學習。剛到兩天，公安局就來抓人。一起抓61人，縣長、書記、公安局長全部被抓。公安局的人說我們是叛亂分子，用麻繩把我和蔡巴阿拉格連在一起。我們被交到西寧勞改局，我被判15年，押到德令哈農場勞改。那時我26歲。農場裏犯人打犯人很厲害，公安局的人讓刑事犯打我們。那些犯人一邊打我一邊問我：“你搞叛亂殺了多少人，老實交待。公安說你殺了人了。”公安的人站在旁邊看刑事犯打我們。再後來就開始餓肚子了，柴達木勞改農場有13萬人，死得只剩七八萬人。我們吃了三年茴條、苦苦菜和鎖陽。我算是活著回來了。回來剛一年，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又給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批鬥的時候你一拳我一腳，到現在我耳朵裏還在嗡嗡地響：“屢教不改，死路一條。屢教不改，死路一條。”1980年我被平反，祁連縣的縣長、海北州法院的人、祁連縣法院的人都來了。我對他們說：“過去人的數字裏沒有我，現在我好歹算是個人了。”公安局的人給我們每人發了幾個錢，就算平反了。

藍 白

---

蒙古牧民阿拉坦 巴雅古特

阿拉坦呼亞戈，1909 年生，內蒙古昭烏達盟阿魯科爾沁旗人。20 世紀 30 年代滿洲國建立，阿拉坦被招為警察，在當地服役，主要負責偵查和查禁鴉片的吸嗜販賣活動。1945 年 8 月，蘇蒙聯軍向日本宣戰，滿洲國隨之滅亡。阿拉坦等 500 名蒙古青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人民軍的勸導下，決定去蒙古國。

一入蒙古境，這批蒙古青年就受到非人道待遇，黑布帶蒙眼，押到烏蘭巴托。阿拉坦因曾在滿洲國當警察，被指控為日本特務，重判有期徒刑 25 年。1954 年，阿拉坦被引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呼和浩特監獄繼續服刑，接受勞動改造。1956 年，先後在蒙、中兩國被關押近 10 年之久的阿拉坦，被“寬大釋放”，但必須回原籍繼續接受監督勞動。最後，他被安排到阿魯科爾沁旗的巴彥花公社希巴爾泰生產隊，作為五類分子接受改造。

1967 年 7 月，阿拉坦的家鄉來了兩名造反派人員，在希巴爾泰生產隊的隊務室鬥爭阿拉坦一天一夜。次日早晨，阿拉坦當場死去。當天中午，同為五類分子的難友阿爾比吉呼、達瓦林琴等人，把阿拉坦的屍體裹在生產隊的炕席內，用牛車拉到離生產隊隊部稍遠的哈布塔蓋小崗下，挖坑下葬。阿拉坦死後，他的女兒拉姆，以及拉姆的兒子莫爾根，在文革前後都受到牽連。

1975 年，阿魯科爾沁旗民政部門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和被鬥致殘人員進行一次統計，阿拉坦被統計為“偽滿警察、特務”，在“死亡經過”一欄中填有“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巴彥塔拉公社前來兩人鬥五類分子阿拉坦呼亞戈，他在當晚自斃”等語，在“公社意見”一欄中寫著“畏罪服毒自殺”。

???

從杭州到青海 陳士濂

也許是我的運氣還不錯，1956 年我從杭師畢業時，正遇上全國高等教育大發展，特許在職的中小學教師和應屆師範畢業生報考高等師範院校。就這樣，我考入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這說明那時的高考政審相對還算寬鬆，除軍事院校以及保密性較強的專業外，普通高校還能接納地富子女。記得當時與我同一個小班的，還有一位來自上海的資本家沈世禮同學。

因入團要求屢屢被否，當時我在政治上已不思進取，只想低眉順眼做個不生事的順民。即使在似乎最自由的 1957 年春天，不少同學熱衷於集會演講貼大字報，我仍然埋頭在心愛的文學書籍中，與那些轟轟烈烈的活動隔著一條鴻溝。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我像鴛鴦般將頭深深地埋進故紙堆裏，從書籍的閱讀中取得愉悅的同時，也期望“書中自有黃金屋”，能以“學問”為自己築個安身立命的小巢。也正因如此，後來反右時，我這樣不左不右的邊緣人物得以僥幸躲過那頂帽子。

然而到 1958 年，形勢不同了。隨著大躍進口號的提出，校園的革命也在往縱深發展，連大人物康生都到我們學校來視察過。整風、交心、拔白旗插紅旗、紅專辯論、教學革命……一環扣一環，一浪接一浪。課程基本停止，無論師生員工不管你願意與否，在上邊統一布置下，全都得投入運動。在這種革命形勢感召下，我再次萌發了要求進步之心。我想給自己以徹底的清算，擺脫地主家庭在思想、感情上加于我的羈絆，否定舊我，生出個新我。恰逢此時整風運動進入向党交心階段，我向團支部提出了引火燒身自我檢查的要求。

起初支部沒有答復，大概是憐我年幼，並非他們認為的問題學生。禁不住我再三請求，由團支部主持，1958 年早春的一天，我向全班同學作了思想檢查《暮氣之根在哪里》，將我的官僚地主家庭情況，我對反動親屬的依戀之情，我在反右中對右派言論在思想上的附和與

同情，以及自己的個人主義等等和盤托出。聽完我的檢查，同學們幾乎楞住了：這小傢伙，怎麼那麼複雜啊？但他們還是紛紛表了態，以最大的熱情歡迎我的進步。那一陣，我確實覺得輕鬆了許多。我想，我這麼赤誠地交了心，組織上肯定會信任我，我將如鳳凰涅槃獲得新生。

然而，事情的發展，并不如我期望的那樣。我并未獲得新生，反而從原來的邊緣人墜落為異類。我明顯地感覺到了接踵而來的排斥歧視。在當時要求的全民健身二級勞衛制測試時，我被剝奪了打靶的權利——儘管只是一般的小口徑步槍，我也得到了不許持槍的通知。

政治上的歧視，我可以俯身承受，但隨之而來的經濟打擊，却是我無法解決的。從 1958 年開始，我就讀的浙江師院改為杭州大學。作為普通高校，收費在所難免，如果想繼續享受原來的免交學雜費、膳宿費優待，就得另外申請。這種申請并不困難，一般學生都會被批准。但家境特別困難的我却成了例外，學校拒絕給我發放困難補助。我只能硬著頭皮不交膳費，每日裹腹顏捧著飯碗進餐廳，吃著“嗟來之食”。

這麼熬了幾個月，我終於產生了離校的念頭。除經濟的窘迫外，潛藏在深層次的是內心的恐懼。我比以前更害怕了。因為在此期間，我又目睹了幾個同學的被迫遣返。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鄰班的“青年作家”葉宗軾，據說老家有農民來信，揭發他解放前曾參與家裏的收租，應是地主分子。於是作為階級異己分子，他被開除回家。走的那天，我見他坐在一輛三輪車上，身旁堆著行李書籍，沒有任何人相送，蹣跚而去。他的遭遇，給我敲響了警鐘。我不禁猜想，下一個被趕回農村的可能就是我。明知頭頂懸著達克摩利劍，却不知這利劍何時掉下來，這種戰戰兢兢等待宰割的滋味實在難受。

我決心擺脫它，就向校方打了休學一年的報告，表示要自己出去掙學費。這個報告很快被批准，也許它正符合校方清退異類的需要。與我談話的是學生科一位姓趙的科長，以前從未接觸過。他神色嚴峻，沉著臉告誡我：“像你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原籍去接受農民監督改造。”在辦理例行休學手續時，他在我填就的表格上揮筆寫下了一行類似判決的文字：“該生出身反動家庭，本人表現不好。”說實話，對於這樣的判詞我是很難接受的。出身反動是事實，這“表現不好”實屬莫須有。大學期間，我并未犯過任何錯誤，還不時在報刊上發表些詩歌散文，屬於成績優秀的學生。但在趙科長的權力話語鉗制下，我只有默默忍受。

拿著這張鐫有罪孽“紅字”的表格，去校內各部門辦理離校手續時，我多次遭到白眼。在醫務室，一位年輕護士以奚落的口氣念出了那行字，我聽後哼了一聲，她立即責問道：“怎麼？還不服氣！”我沒敢再出聲，只盼望她快快把章子給我蓋了。其時我恐懼已極，生怕他們真的把我押解回鄉，我只求速速離開這所曾經是我夢寐以求的大學。我害怕再次見到那位趙科長，又擔心給我的正式文本上會附有我的“罪狀”，於是連休學證明都沒有領取，只帶著一枚校徽匆匆登上西去青海的列車。這時，1959 年新年的鐘聲正敲響，我剛滿 20 歲。我的大學生涯，從此戛然而止。

在青海，先我一年退學的姜君夫婦，已為我聯繫好去省衛生學校教課。學校人事科長聽取了的情況介紹後，竟立即將我拒之門外，只撻給我幾句冷冷的訓誡：“像你這樣家庭出身的人，不能自己出來工作，應該回農村接受監督改造。”兩位不同地區不同單位的政工幹部，話語竟是如此相似，我不禁為自己的命運打了個冷戰。失望之餘，倒也生出另一種逆反心理：既然你們都認為我只能發配回原籍改造，我却偏要拼一拼，寧死也不回去！

有了這般破釜沉舟的勇氣，我就穿街走巷，遍叩西寧地區各學校大門，到處推銷自己，想憑藉那枚單薄的校徽去另闢個天地。在最無望之時，我曾混迹農場招工處，準備出賣體力，當個農工，也遐想過像有些盲流那樣，弄個鎬頭背篋，到山上挖石膏謀生。總算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我惶惶然四處奔走覓食時，經同學請求，省衛生廳的領導居然直接干預了我的工作之事，逼得衛生學校做出承諾，留下我充當語文代課老師，只是月薪僅給 36 元，相當於當

地一個剛畢業大學生半個月的工資。三個月後，我就離開了那所勉強收留我的學校，到一所小學找了個同樣是代課老師的職位。從中專下降至小學任職，月薪反而提高到 42 元。

青海地處偏遠，古來就是囚犯發配之地，1957 年後各單位接收了全國各地為數不少的右派和所謂有歷史污點的人員。相比之下，像我這樣僅僅是家庭問題的大學生，竟可算是清白之身。于是在 1959 年夏，憑著自己在杭州師範求學時向名師顧西林先生習得的二胡薄藝，被青海廣播文工團錄用為二胡演奏員，後又併入省民族歌舞劇團，成為該團的樂手。這期間，因為自己常有文學作品見諸報刊，遂被劇團領導賞識，調入創研室擔任編劇。位置的漸行穩固，使我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不僅脫籍盲流，還已擺脫家庭出身的羈絆，儼然真成了與他人同樣的“革命文藝戰士”。

讓我重新意識到自己原罪在身，是在 1964 年四清時。我作為主要執筆人撰寫的劇本《達爾龍山下》，在省內現代劇會演一度走紅，然而很快隨著全國性的批判文藝黑綫被定為毒草。在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後，隨之而來的處理就是遣返回家。劇團領導在與我談話時，一再強調這與劇本之事無關，因為我屬於盲流，按政策不得不如此辦理。其實，這時困難時期已過，對待盲流已比較寬鬆。以盲流攆我回去，無非是在階級鬥爭這根弦又绷紧時清除成分不好者的一種藉口。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雙重不光彩來歷帶給我的沉重負擔。但我依然劣性不改，不願俯首帖耳地接受這樣的組織安排，就使出了一個盲流可用的種種求生手段，四處奔走，腆顏求人。那時我心理上已做了準備，大不了再次去尋個代課教師職位，在偌大的青海總不至于凍餒而死。

這番奮鬥，果然有了效果。我的一位記者朋友，帶領我夜闖省委宣傳部部長午人的住所。該部長在劇團排演《達爾龍山下》時，曾經來團視察并捎帶問起過劇本作者，對我有所瞭解。他認同了我的聲訴，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得以化解這次大難，留在劇團。由此我想到，即使在共產黨內，由于個人的素質涵養之不同，在執行同樣的階級政策時也寬嚴有別，有時也不乏頗濃的人性化處理。午人後來在陝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任內離休，我曾去西安探望過他。如今斯人已逝，但援手之恩從不敢忘。

雖然逃過了“遣返盲流”之劫，名義上仍留在劇團擔任編劇，但我自己心知肚明，已再次淪落為三等公民。外地來演出內部話劇《葉爾紹夫兄弟》，沒給我發觀摩票，原來聯繫密切的幾個報刊，停發我的作品，後來乾脆將我編入團內臨時組成的勞動隊，去農村與社員“四同”。這時團內已有一些幹部作為四清工作團成員下鄉。同為下鄉，兩者性質却是迥異。他們是去領導、整頓基層組織，也就是改造客觀世界的，而我們則是純粹的幹活和向貧下中農學習，亦即改造主觀世界。

勞動隊的組成人員，或歷史有污點，或出身反動階級，總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生活作風算是其中較輕的。有位黨員副領隊，就是犯了生活作風錯誤的舞蹈演員。也許是在勞動中“惺惺相惜”吧，待這期勞動結束，我竟與已離婚的她悄悄建立了戀愛關係。但這段感情還不到一年就被她單方面地停止了，告吹的緣起竟是我殷勤地請她看了一場電影。

那是老片子《白毛女》。她是跳舞的，我認為請她看舞劇是最合適的表達情意方式。去影院的時候，我用自行車載她。車輪疾轉，她緊緊地摟著我的腰，還真有點鴛鴦雙飛的感覺。但“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等到影片結束時，她的情緒突然不對了，堅決不肯與我同車而歸，兩人默默無語地返回團內。

我知道事情有變，但不明白這麼短時間內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幾天後，她終於道出了拒絕我的理由。原來是她在看《白毛女》時受了刺激，想起自己將有一個像黃世仁母親一樣的婆婆，實在無法忍受。聽完她的表白，我黯然無語。革命文藝的力量實在強大，我為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感到苦澀的自豪。

1966 年五一前夕發生的一件事，也是令我終身難忘的。那時候每逢五一、十一，全國各大城市都要組織游行。節日前夕，劇團創研室的負責人向我打了個看似很不在意的招呼：

“明天的游行，你不用去了！”我聽後，心裏一陣冰冷。當我回到房內時，發現與我同室的孟犁野也在發呆。他是在《中國電影》編輯任上被打成右派的，下放到青海人民出版社摘帽後調來我團，與我均為編劇。我見他的神情異樣，猜到他也與我接到了同樣的指令。我們沒有多說什麼，也不敢多說什麼。

第二天，他早早地躲出去了，不知道上哪兒獨自發呆，而我則蜷縮在屋內，聆聽著外面熱鬧的人聲鑼鼓聲，沒有踏出房門。我害怕遇見別人，游行都不去，這算是怎麼回事？難怪我的母親將那份偶然得到的“人民證”珍藏起來。我這個“國家幹部”，不是也同樣享受不到勞動者的節日權利嗎？這一年的國際勞動節，是我過的最黯淡的一個節日。本世紀初，在犁野君已調回北京并擔任了中國影協書記處書記後，我倆相聚時還曾提及那次“非我族類”之辱。就是事到今日，我們也沒搞明白，像那樣一個無絲毫保密意義的群眾集會游行，有什麼必要禁止我們參加？除了人為地製造冷漠歧視仇恨分裂，它于社會又有什麼好處？

進入文革後，我更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西寧人民劇院召開批鬥大會，我混迹其內想一看究竟，只聽主席臺上一聲大喝：“黑五類子女滾出去！”儘管并無人指名道姓地指證我，我自己却仿佛已被公示于眾，連忙裝作上廁所匆匆逃離會場。從此我對於那些革命造反派總是敬而遠之，從不敢覬覦光彩奪目的紅色袖章。就這樣小心翼翼，還是未能免除派仗之累。在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發起“二.二三”事件，槍殺“八.一八”戰士三百余人，開創了全國以武裝鎮壓反對派的首例後，我受命參與了妖魔化對立面的派性戲《二月風暴》的創作，在半個月時間內就完成了該戲的排演稿。雖然這是違心之舉，我絕非趙副司令支持的“捍衛隊”一派的信徒，但主觀上確有諂媚手持武器的掌權者以避禍自保的成分。

正當這個派戲緊鑼密鼓地排練當中，事情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向，黨中央、中央文革等最高權威部門于3月22日發布了為“八.一八”平反的公告。“二.二三”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趙副司令固然成了階下囚，底下的“捍衛隊”大小頭目也難逃程度不同的懲罰。按理說，我并非“捍衛隊”成員，《二月風暴》這個派戲的始作俑者，其實是從北影調來青海的演員張亮夫婦。張亮曾出演過電影《林家鋪子》、《革命家庭》，在社會上有些影響。他們夫婦雖在“八.一八”平反初期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到了文革清理階級隊伍階段，由于出身沒問題，已轉化為“革命群眾”；我則因為原罪在身，就成為主要的清算對象。1968年4月30日，《紅宣兵戰報》發出配有我漫畫頭像的戰鬥檄文《揪出〈二月風暴〉的黑筆杆陳士濂》，署名《紅宣兵》編輯部。

在徹底擊潰“二月逆流”新反撲的鬥爭中，省話劇團革命委員會率領八.一八紅宣兵和廣大革命群眾，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進攻，揪出了反革命黑戲《二月風暴》的黑主筆、周揚黑綫、黑網上的小爬蟲——陳士濂。

揪得准！揪得好！

陳士濂何許人也？乃一貫利用小說及文藝作品進行反黨活動的反革命分子。

陳士濂出身于反動的官僚地主家庭，狗父是雙手沾滿勞動人民鮮血、罪惡累累的偽官僚，解放後繼續與人民為敵，1951年被我鎮壓；其母地主分子，被管制；一個狗叔是反革命分子，已被我人民政府判處死刑；另一個狗叔陳肇英是偽國民黨中央委員，解放前夕潛逃臺灣；一個狗表兄是國民黨偽縣長，解放後被捕入獄（已死）；另一個也是地主分子，被管制。陳士濂就是被殺、關、管、鬥的反革命家庭之犬。

接著列舉了“陳賊用手中的黑筆，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陰謀復辟資本主義大造反革命輿論，大書特書其反革命父兄的遺囑，大幹反革命罪惡勾當”的種種罪行。

那一陣，我不僅要參加團內的批鬥會，還得像如今的大明星趕場子一樣，“出席”外單位組織的批判會。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省市文藝系統批鬥會，“八.一八”造反派的司令、

擔任過省革委會副主任要職的馬集文親臨指導，作了長篇講話。那天發言的人很多，其中京劇團的紅宣兵頭頭張學文，開得口來就是一連串的謾罵，什麼“狗崽子、狼崽子、蛇崽子、王八崽子”，一口氣罵了十幾個“X 崽子”。這說明，在他們的眼中，我罪惡中最“昭彰”者，還是出身異類，乃某種最可惡動物的崽子！

批鬥會後，我被編入劇團的牛鬼蛇神組，組長就是後來蜚聲影視兩壇的李丁。我們將近二十人被集中到一個大房間裏，門上大書“牛棚”兩字，讓過往行人更有力地監督并可從敞開的窗戶像參觀動物園般觀賞這些醜陋的“人體動物”。在群眾雪亮眼睛的注視下，我在靠床頭供自己面壁思過的那一小方牆壁上，端端正正地貼了一幅自撰自書對聯：“一定老老實實，絕不亂說亂動。”其時猶如罪人歸位，我已定下心來，等待最後的處理。我知道，兩位政工幹部早先的預言這回要實現了，我肯定得乖乖地滾出文藝隊伍，回去接受農民的監督改造。于是，我未雨綢繆，先將我唯一的一塊手錶托人賣了，準備沒薪水領時可以頂兩個月的生活費。我還趁跟隨團裏木工汪師傅做道具的機會，努力學習手藝，以便將來被趕回農村後能掙得一碗飯吃。

想不到百日之後，1968 年的 8 月 31 日，我意外地等來了青海話劇團專政小組、專案小組聯合頒發的《公告》。

在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的關鍵時刻，在億萬革命人民徹底批判反動的“多中心論”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中，我們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對革命群眾揪出的陳士濂反復的交代了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指明出路，進行教育。現陳士濂對其自己的反動家庭、本人罪行、大毒草“二月風暴”等問題，都有較好的認識，交待的較為徹底，與我專政小組、專案小組反復調查研究核實的材料基本相符合。

根據這一情況，我專政小組、專案小組認為，陳士濂確有徹底低頭認罪、悔改自新的誠意，根據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及毛主席親自批示的“北京新華印刷廠對敵鬥爭經驗”，我們將此情況上報文化局革命領導小組、群眾專政小組，要求將陳士濂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解除群眾專政。現上級有關部門已經批復，同意我們的意見。

現出公告，正式宣布解除對陳的群眾專政。我們熱烈地歡迎陳士濂同志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一邊邁進了一大步。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是黨的政策的大勝利！

在院牆上發布此公告的同時，已從歌舞劇團分離出來的話劇團革委會還在大會上，宣讀了對我解除專政決定的有關材料。這份材料寫得非常詳細，還很有點辯證意味：既指出我的家庭、社會關係很複雜，又說明我並無隱瞞；雖沒有與家庭劃清界限，但還不是堅持反動立場；既指出我在大學時思想落後右傾，又說明材料來源于“向党交心”，不能作為罪證；既指出我在《達爾龍山下》、《二月風暴》等劇中的問題，又說明其炮製的責任主要不在我，而我自己的文章只是屬於資產階級世界觀範疇。

說實話，當時我對這份材料及其結論是心服口服的。我甚至覺得，在我所在的這個小單位裏，那些從無執政經驗的演職員，其認識問題處理問題的水平較之于我前邊遇見的兩位政工科科長要高過一籌。而且，我對為解決我的問題千里迢迢外出的調查者和那些被調查的同學、鄉親都心懷感激。只要他們其中任何一人加我以某項似是而非之罪狀，以那個時代的政治氣候，我的遭遇就會很慘。當然，我當時更為感激的還是領袖，是政策。我在當天的日記裏極其真誠地寫道：我要千遍萬遍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文革中對黑五類及其子女家屬的打擊，此時達到了高峰。從我切身體驗看，自“清理階級隊伍”以後，由于執政者的矛盾指向所謂的走資派，對黑五類的壓力反而有所減弱。待到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普遍地給地富分子摘帽後，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一個人不被歧視、不再受壓是何等的舒暢。也就在那時候，素來令我心生畏懼的政工幹部居然主動來找我，動員我寫入黨申請並主動做我的介紹人。其時我對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的舉措心悅誠服，覺得黨大有希望，故而寫了申請並很快地得到批准。1983年，正值重用知識分子、提拔年輕幹部之際，省委一紙調令，將我從話劇團的普通編劇，一下子提升為青海省文聯副主席，任職至1998年提前退休。

作為一個社會關係極為複雜的“狗崽子”，能在階級政策如此嚴酷的情境下，從夾縫裏求生，從盲流轉入體制內還獲得了一定的地位，這是什麼原因呢？步入晚年後，我也曾反躬自問。我覺得除了機緣巧遇，以及自己有些微弱的抗爭意識，在那個聽任組織安排的年代敢于自謀職業越級上訴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總體上服從了階級政策的需要，已經從“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演變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裏有一個從被迫到主動、從認罪自保到自覺配合的過程。

從上初中開始，我就不斷地被灌輸要與家庭劃清界限，其後又是與此相關的一連串運動。經過多次打壓不斷地自辱、自貶後，我已磨盡了曾經有過的不平，認可了原罪，接受了不公正待遇，將其視為合法合理的差別對待。記得文革初期血統論甚囂塵上之時，像遇羅克那樣的熱血青年正奮起反擊，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卻將登載在小報上宣揚血統謬論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階級路線萬歲”抄錄在日記本上，承認該文的立論“老子反動兒混蛋”適合于自己。既然自我矮化到極致，對於組織上偶爾恩賜的“賞識”、“重用”與後來“牛棚中的解放”自然會感恩戴德山呼萬歲。

我的這種滲透于血液中的“脫胎換骨”改造，更明顯地表現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其實，我的處女作、發表在1957年6月號《東海》雜誌上的散文《孩提之愛》，顧名思義還是寫童真童趣屬於人性範疇。但後來的作品，特別是那些需要更多人參與的劇作，則完全是為具體的政治目的服務，杜撰出一些所謂的階級鬥爭。像《達爾龍山下》，就編造了一個妄圖復辟的牧主頭人和貧苦牧民鬥爭的故事，它與現實的牧區，除生活細節有所相似，其他都是克裏空的產物。《二月風暴》更是從“八·一八”是反革命這概念出發，按“捍衛隊”一方所提供的點滴材料，加以無限的生髮虛構，編造出一場血淋淋的階級報復奪權鬥爭。

這說明，經過多年自覺或不自覺的磨練，我已做到自覺聽命于當權者的政治指揮，完成了從一名純真的文學愛好者到為權勢者秉筆的蛻變。這種內傷是致命的，有時甚至不可逆轉。即使在“四人幫”粉碎後我重新握筆時，也始終擺脫不了“階級鬥爭”的思維定勢。像我重續兒童文學前緣編寫的童話《白唇鹿青青》，明明寫的動物，也要硬塞進個千戶和管家，有意妖魔化我并不瞭解的藏族上層人士，生硬地將階級鬥爭搬進天真無邪的孩子生活中去。

上個世紀末，思想解放之大潮汹涌澎湃。在屢獲啟蒙，人權意識、民主意識漸次浸淫于腦際之後，我對自己已凝固于腦中的“階級觀點”產生了懷疑。首先是我到底有什麼罪？出身不好，能成為受歧視、遭打壓的緣由嗎？人生來就是平等的，“免于恐懼的自由”更是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之一。那種將黑五類的子女長期置于被壓制地位，讓他們始終誠惶誠恐地生活，是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所不能允許的。既然我本無罪，那麼就不應該被作為非類、打入所謂的“牛鬼蛇神”，不應該接受超乎法律之外的“群眾專政”，更沒必要為這樣的“解放”而感激涕零。

我的父親劉宗漢是歷史反革命，第一個被株連的是我大哥劉文德。大哥非父母親生，但與其他八位兄弟姐妹手足情深，父母視同己出。解放前夕國民黨潰敗之際，善後救濟總署搬遷臺灣，同事勸我父同往，父親斷然拒絕。有好心人勸父親，自己不去臺灣，可把大兒子送去，父親還是謝絕了。父子倆出于對共產黨的熱愛和對國民黨的失望，絕了去臺灣的念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共決定派軍赴朝參戰。位于鴨綠江邊，與朝鮮一江之隔的安東市，急需大批有經驗的人員為軍隊提供給養。安東市市長親到上海招聘，在父親支持下，大哥毅然去了安東，就職于安東市百貨公司。在安東鴨綠江橋頭，大哥親切送別二弟文兵赴朝參戰，後又在那裏迎來負傷的弟弟回國。

1956年，父親在上海被內定為歷史反革命。57年反右開始，遠在安東的大哥隨即被揪出來審查。安東市百貨公司黨總支書記王宣傳和保衛科長潘長符，從內查外調中增長了歷史知識，瞭解到當年浙江實業銀行支持蔣介石發動4?12政變，而劉文德的父親、歷史反革命劉宗漢曾在該行當過高級職員；還有大右派章乃器，當年也是浙江實業銀行的高級職員，後升經理，并與劉漢宗關係密切；更要害的是，當年章乃器離商從政脫離浙江實業銀行後，接替他位子的楊彭年恰好是劉文德的岳父，于是認定大哥劉文德毋庸置疑就是這條藤上的黑瓜。父親是反革命，岳父是反動資本家，章乃器是我家的世交，劉文德本人又在國民黨善後救濟總署做過事——歷史反革命，絕不冤枉。

王書記與潘科長如此順藤摸瓜，挖出一個隱藏極深的歷史反革命，興奮無比，于是立即組織一批打手，把大哥押上臺，連續作戰鬥了六個下午。大哥堅定站立，橫眉冷對，一再申辯自己從未參與過任何反革命活動，也絕無任何反動言行，自己是愛國愛黨的。硬的不行，就用軟的，潘科長出面與大哥個別談話，誘騙他：“劉文德，只要你交代了同章乃器的關係，就可以提拔你，給你加工資。”大哥回答說：“提拔我、加工資當然好，可惜我與章乃器實在不認識，他與家父、岳父同在實業銀行時，我還是個小孩子，怎麼可能與他有什麼關係？”

王、潘又風塵僕僕從東北趕來上海，徑直找到此時已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的我父親，逼令他交代是怎樣把大兒子送進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的。老父知道抗拒無用處，于是違心胡亂寫了幾句顯而易見破綻百出的東西應付他們。安東市百貨公司黨組織借著這份牛頭不對馬嘴的材料，對大哥狠批惡鬥，逼令他交代與國民黨軍統特務管丕誠的黑關係。大哥堅持無可奉告，結果不了了之。但是大哥的工作崗位變了，每天打掃衛生，檔案裏注上“內控改造”。????1961年發生大饑荒，城市工礦企業動員廣大職工“為國家分憂解難”，下鄉務農。名義上是自覺自願寫申請回鄉支持農業生產，實際內部早已定了名單，上名單的人不寫申請就個別動員。凡“內控對象”、“歷史問題待查對象”和平時向領導提意見的人，統統列入下鄉名單，大哥自然也在首批名單上。大哥拿著發給他的400元安家費，從東北安東市回到江蘇無錫老家鄉下。當時老家房無一間不漏雨的，地無一分可以自己耕種的，拿到的所謂安家費，不够大哥一家6口幾個月的口糧。

????二哥劉文兵，1949年秘密離家出走，參軍入黨，赴朝作戰，負傷立功，回國時已是少尉軍官。憑他的功績與才華，原本可以升級重用，由于父親是歷史反革命，二哥成了無前途的軍校教官，最後退役復員，到蘇州地方基層工廠當領導幹部，文革中慘遭造反派批鬥，差一點被扔進太湖淹死。三哥劉文輝，先被戴上右派帽子，繼而戴上現行反革命帽子，很快被殺害。

????我這個父母最小的兒子，父親出事戴帽時僅僅12歲，親見父親日夜被監督管制，含泪掃垃圾、掏陰溝，兄長接連出事遭難。在學校裏和社會上，我屢遭侮辱、欺凌。我當時怨恨父親，何不當初一走了之，如今害得家破人亡。隨著年齡漸長，特別是親歷文革之後，對父親，我由怨恨轉為同情，既深為父親的遭遇感到不平，更為自己曾怨恨父親而深感內疚。

我家是階級鬥爭的重災區。三哥文輝是右派分子，二哥文兵是共產黨員，飽經朝鮮戰爭



烽火の錘煉，是毛的好戰士，目光敏銳覺悟高，能于自己家中發現階級鬥爭新動向。于是，二哥、三哥之間的思想交鋒就不可避免了。平日二哥在蘇州，三哥在舟山嵎泗島，很少見面，但每逢春節合家團圓，二哥、三哥便唇槍舌戰，攪得家中不得安寧。

1963 年寒假，三哥叫我到無錫老家鄉下大哥家體驗生活。大哥家住房破舊簡陋。晚上，大嫂與三個侄女睡在一間七八平方米的破屋裏，我與侄子睡在柴房草堆上，大哥一個人去一個荒無人烟的半島看夜。白天，14 歲的大侄女帶著三個幼小弟妹，去鐵路邊撿煤渣，去荒地挖野菜。大哥不斷上訴無錫縣委，申請困難補助，但是大哥檔案裏塞著“特嫌”的結論，是內控改造的對象，不屬於政策補助對象。

自大哥家回到上海，我將所見所聞寫了一份《無錫農村南劉巷農民窮困生活考察報告》，如實反映了當地農民貧困、饑餓、潦倒的生活境況，不少人詛罵人民公社、大躍進，甚至怨罵共產黨。二哥得悉此事後，把我叫到蘇州，嚴肅批評一頓，說我小小年紀，中三哥的毒太深，并警告我，這樣下去，總有一天毀了自己。

三哥知道了大哥的境況，趁返滬探親期間帶我回老家看望大哥，與大哥共榻徹夜傾談，鼓勵大哥設法開墾荒地，生產自救，不要對上面的政策存什麼幻想。看著像豬圈一樣的農舍，看著侄子侄女們吃的山芋、南瓜、野菜粥，我們兄弟都掉了泪。三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棉大衣脫下來留給大哥，寒冬裏穿著單薄的夾衫趕回上海。在擁擠的車廂裏，他主動將座位讓給一個孕婦，自己站著全神貫注地讀英語書，四個多小時站到上海。

春節期間，二哥也返滬探親，同三哥一見面就提起我寫報告的事。那天午飯後，二哥、三哥與我相聚在內室，各泡一杯茶，關上房門，鄭重其事地討論起來。

二哥說：“三弟，你叫小弟去無錫老家體驗農村生活，做點調查研究，我不反對。可是調查研究首先要遵循毛澤東思想，要吃透黨的政策精神，不該單憑個別事例偏聽偏信，把新中國的農村，特別是人民公社化了的現代農村抹得一團黑，把農民生活說得這樣貧窮潦倒。這是否定國家大好形勢，是嚴肅的政治立場問題。我們兄弟在家看看還可以，一旦傳出去，必定會闖大禍！”

三哥聽了，平心靜氣地回答說：“調查研究，確實要觀點正確，而最正確的觀點不是別的，就是毛澤東思想倡導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小弟到老家，親眼目睹那裏的實際情況，如實記錄下來，這怎麼是人為的給農村、農民抹黑呢？家鄉群眾生活那麼苦，那麼窮，怎能昧著良心喊‘形勢一片大好’呢？從實際出發寫調查報告，讓組織知道實情，怎可說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呢？”

“你這是在強辯！”二哥不讓三哥說完，迫不及待地打斷話頭，神氣嚴肅地教訓道：“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剛召開不久，毛主席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現在社會上有些人借著自然災害發生的困難，全盤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優越性，猖狂地向黨反攻倒算。你指使小弟去暴露農村的陰暗面，不正是迎合了這股反動思潮向黨進攻嗎？豈不是犯了政治立場錯誤？”

三哥不以為然，譏笑道：“你是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做慣了黨的馴服工具，毫不懂得人有自己的腦袋，應該獨立思考。請問二哥，你瞭解老家鄉下嗎？你去看過大哥家的情況嗎？沒有。你根本不瞭解當今農村與農民的實際苦境，只聽信黨的教導，不准老百姓說真話。客觀事實是無錫鄉下農村貧苦萬分，如果說是陰暗面，也是客觀存在，為什麼不能暴露出來，向當局者進諫呢？這不是向黨進攻，而是愛護黨，愛護新社會的積極行動。”

“愛護黨、愛護新社會，就應該事事跟共產黨走，句句聽毛主席的話！”二哥提高了聲調，指著三哥和我的臉，嚴肅正經地說：“一切服從黨的領導，做黨的馴服工具，這不僅是每個共產黨員的天職，也是每個革命青年應具有的品質！”

三哥急起打斷他，大聲駁道：“跟黨走，聽毛澤東的話，父親不正是這樣嗎？他不當漢奸，不去臺灣，送你去參軍，支持你去抗美援朝，結果呢？他不還是被黨、被毛澤東極左路

錢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大哥不去臺灣，響應黨的號召，支持邊區建設，做好抗美援朝後方給養工作，去安東鴨綠江邊工作，結果呢？還不是受迫害，打成了內控分子？！再說二哥你本人，是黨的基層幹部，明知毛澤東要陷害廣大知識分子，號召給黨整風實際上完全是引蛇出洞，你為什麼不提醒自己的兄弟我一聲，眼看著我成為出洞之蛇？！難道你當了黨的馴服工具，站穩了階級立場，連兄弟手足之情、父子養育之恩都忘了嗎？你是盲目地跟黨走，盲目地聽毛澤東的話，是全然的愚昧、盲從、奴隸相！”

二哥擺出一副兄長的威勢，斷然剎住三哥激昂慷慨的申訴：“大弟，家中發生這些事情，我作哥哥的不同你辯論。我只說你一點，你這個人，自小調皮搗蛋，當年江陰街弄堂裏鄰居都說你是搗蛋鬼、小強盜，向來強詞奪理，自作主張，從小挨父親打最多，父親怕教育不好你，強迫把你送進寶山教會學校住讀，不准回家，你忘了嗎？小時候你爬上屋頂，奔上奔下，故意唬人，一貫不聽大人的教導，從小叛逆反抗，長大後老脾氣不改，處處別出心裁，樣樣自由主義，你戴上右派帽子怪誰，怪你自己喜歡給領導提意見，反抗上級，懷疑黨的政策。你就吃虧在性格倔強好勝，自以為是，你這種叛逆精神早晚害死自己。我對你早已失望了，問題是你在影響、毒害四弟、五弟和小弟他們。這樣下去，我們一家人都會壞在你手裏！”

二哥越說越生氣，越說越擔憂，不由自主地把手捧的茶杯重重地往桌子上一放，咣啷一聲，嚇得我目瞪口呆，連忙打圓場：“二哥、三哥，你們不要吵了，都是我那份調查報告惹的禍。其實我那只是一篇習作，練練筆，實在沒有二哥說的那樣嚴重。”二哥轉向我，教訓道：“小弟，你還年輕，十六七歲中學生，千萬別學你三哥的樣子，毀了自己的前途！”

二哥鐵板著臉孔，三哥激憤得雙眼通紅，我吞吞吐吐辯白道：“我至今不覺得三哥有什麼錯。”“什麼？你還不清楚？你三哥的階級立場十分危險，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走向自取毀滅的道路！”

????三哥嘖嘖連拍兩下桌子，憤怒地跳立起來：“不錯，我小時候是調皮搗蛋，但我不會做馴服工具。我是個堂堂正正的青年人，我相信事實，相信真話，相信獨立思考！我不相信任何人的謊話，也不考慮個人的前途，更不貪生怕死！四弟、五弟都已長大成人，小弟也已是中學生了，他們都有自己的頭腦，不需要你去教訓。究竟是你馴服工具好，還是我獨立思考對，他們會在事實面前辨別清楚！”說完，三哥獨自狠狠拉開房門沖了出去。二哥氣得連連搖頭。

二哥與三哥，見面就爭，一談時事就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家人都稱他倆是冤家對頭。二哥一再表明，這是兩個階級、兩條不同路線觀念的爭論，屬於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場問題，他做哥哥的，有責任向弟弟妹妹們交代清楚，免得其他弟妹受錯誤思想的影響和毒害。三哥則公開鄙視二哥的愚昧、盲從、奴才相，認為他早給共產黨、毛澤東的愚民政策俘虜過去了，是他自己中毒太深，失去了自由獨立的做人的品性。二哥開口馬列主義，閉口毛澤東思想，三哥就把建國以來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搞四清一場又一場運動所造成的社會不公、人為災難滔滔不絕信手拈來，反問二哥：“這叫馬列的什麼主義？這是毛澤東的什麼思想？”

對於二哥與三哥的長年爭論，戴著歷史反革命帽子的老父親連聲嘆息，明智倔強的老母親則默默不語。老人家只擔心骨肉反目，兄弟分裂。我與四哥、五哥嘴上不說，心裏却佩服三哥敢想敢說、敢作敢為、實事求是的正義態度，一次又一次被他獨立思考、大義凜然、剛正不阿的精神所感染，自覺不自覺地照他說的那樣去做。表面上看，二哥這位朝鮮戰場上的功臣，給我家帶來榮譽的黨員幹部，代表著黨的路線，千方百計教化我們，而在內心深處，我們兄弟姐妹多數是同情父親、大哥與三哥的不幸遭遇的，在思想上站在三哥一邊。

????二哥是共產黨、解放軍部隊多年培養出來的幹部，長期對毛的極左路線執迷不悟，不理解經歷苦難的弟弟文輝的切身感受，不認同民主自由思想，不允許有激烈的反抗精神，赤膽愚忠甘願做一個馴服工具。十年浩劫之後，二哥的認識也起了變化。文革期間，我們敬愛的

三哥慘遭殺害，平反昭雪後，全家人到三哥墳上燒香磕頭，沉痛悼念這位剛正不屈、忠烈獻身的義士，二哥也終於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愚忠錯誤，誤解了這位為國為民而“桀驁不馴”的大弟弟。年近花甲的二哥，顫抖地拿起毛筆，飽蘸紅色顏料，修復了三哥墓碑上的遺詩：“一生坎坷修真身，抗暴敢作普魯米。今赴屠場眺晨曦，共和繁榮真民主。”他一筆一劃地描著，神情肅然，內心沉痛，他被自己的這位光明磊落、坦蕩一生的同胞兄弟折服了。

-----

補白：我的父親叫熱桑，剛解放時，我阿爸打土匪中了彈，自己用刀子把腿上的子彈取出來。那時候我的阿爸有功勞，也很有名，後來到北京開會還給他獎，還有獎金。他當了海晏縣大玉藏族區的區長。1958 年夏天，上面通知他去海北州開會。他從區上到我們的夏牧場的帳篷，然後就騎上馬走了，再也沒有回來。那時我 8 歲，妹妹 6 歲。後來我的母親也給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我的阿爸哪里去了不知道，阿爸活著還是死了也不知道。1980 年給了我們一張阿爸的平反證。阿爸留下的東西早就沒收得一個不剩，現在就那一張平反證是給我阿爸的，再啥也沒有了。 尕玉巴

-----

## 囂張的右派 馬 赫

1964 年下半年，四清工作組來了，廠裏準備給我摘掉右派帽子。職工評審大會上，一開始氣氛不錯，工作組長態度平和。一個積極分子上臺發言：“XX，有一回，我們幾個人去五金公司送貨，五金的一個人問你是不是帶隊的幹部，你指著板車說：‘我是車前工。’你會車鉗工嗎？你是車鉗工嗎？你這不是在外面騙人嗎？今天你說說你是什麼意思？”我說：“我說的不是車鉗工，是車前工，拽著繩子走在板車前面的工人。”這一下炸鍋了，紛紛怒斥我抗拒改造，對政府不滿。

另一積極分子站起來說：“我來揭發一點！前幾天 XX 理髮，說是理了一個泰山頭。大家看看，分明是風涼頭，他偏說泰山頭。他這是想說我們工人階級頭上還壓著三座大山，污蔑我們黨，污蔑新社會，挑撥革命群眾和黨的關係。”於是，會場氣氛陡變，群情激憤，高呼“打倒 XX！”

我當場拒絕了這一指控。我說：“從一種髮型做出這樣牽強附會的分析，我不能接受。”各種指控紛紛嚷嚷，義憤填膺，聒噪了好一陣，工作組長開口了：“今天，我很受教育。看來，我們廠的工人同志們的政治嗅覺是很靈敏的，政治覺悟是很高的，也是敢于鬥爭的。XX，你不要以為你是大學生，我們工人文化低，但是，我們有毛澤東思想這個武器，還有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你是鬥不贏我們的。聽說你平時話不多，但放的毒不少，把風涼頭說成泰山頭，話不在多，一句話就挑撥了黨和工人群眾的血肉關係，很惡毒。”我終於忍無可忍了，不等他說完就頂了過去：“照這樣分析，可以把任何人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往反革命上靠。”

四清工作組長是何等身份，連廠裏的書記在他面前都俯首帖耳，今天我一個五類分子竟敢在群眾大會上頂撞他，這還了得！他把桌子一拍：“囂張！”我也豁出去了，據理力爭，毫不示弱。我始終堅守一點：即泰山頭推導不出挑撥群眾和黨的關係。我和工作組長吵起來，會議不歡而散。一連幾天，我等他們出招，準備承擔後果，奇怪的是，四清工作組和組長再也沒有露面。此事雖沒惡化，摘帽的事泡湯了。14 年後，即到 1978 年，我的右派帽子才摘下來。

補白：共產黨接管東北，地主崽林楓成爲東北 2 號人物。他衣錦還鄉，乘專機去會雙親。故鄉望奎縣不敢怠慢，派出縣大隊長護送其雙親，到有機場的綏化縣同林楓見面。縣委書記、縣大隊政委左右陪同，一個連的士兵前呼後擁，鄉間地主風光一時。歸途中，國民黨殘兵襲擊了林楓父母一行。東北千歲爺的雙親，連同護送的一百多號武裝人員，全部死于非命。林楓聞訊大怒，要求東北軍司令林彪爲他的地主雙親報仇。同是地主崽的林彪，派出整整一個師，却沒逮著肇事的國軍殘餘部隊。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林彪的部隊來了個大搜捕，方圓幾十裏雞犬不寧，二千多人被殺，其中大多數與事件沒有任何關係。小革命家、普通革命者的神氣就沒有這麼大，他們的地主父母只有被鬥殺的下場。趙紫陽的父親，土改時被劃爲地主，遭到殺害。趙當時是地委書記，地位沒有林楓高。毛澤東、劉少奇家也是地主，他們的父母誰敢動一根毫毛？土改中，地主崽身份的革命幹部，在無情鬥殺地主的同時也常常背著人流淚，因爲他們的父母親正在遭難。當時爲避免心慈手軟，他們的黨讓他們只能在外鄉搞土改，叫“回避政策”。毛王朝的建立，千百萬窮人“翻身做主”，組織領導這場巨變的地主崽們成就了事業，但他們的事業是用自己父母的鮮血、淚水和生命鑄成的。他們的極端殘忍自私，天底下罕見。地主被定爲有罪階級，乃千古奇冤，萬古荒唐。

## 學習班往事 江城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後，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展開，各級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接著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爲配合運動，高頭公社革委會先後辦了三期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一期在 7 月，爲期 25 天，地點是高頭市場南邊的天后宮。第二期自 1970 年 2 月中旬至次年 1 月下旬，爲期 11 個多月，地點在高北村圓土樓（紹明樓）。第三期在 1971 年 4 月，爲期 1 個月，地點在高東村永源樓（崩蓬樓）。三期學習班我都參加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期，時間長，鬥得狠。

那年頭，人們談學習班色變。學習班不是什麼學習場所，而是非正式的拘留所或牢獄。借學習班的名義，革委會憑一紙通知，把被疑爲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的人關押起來，集中整治。人一旦進學習班，便魂飛魄散，惶惶不可終日。

第二期學習班很具規模，參加學員 70 余人，由一位公安特派員主管，下設專案組，由 6 位幹部成員組成，其中一位是省公安廳下放的，專事內查外調，整理學員的材料，另有 10 多位社會上雇來的壯漢擔任執勤，日夜輪流嚴把門戶，并察看班上動靜，稍有異常即迅速處理。學員的來源，部分由公社革委會圈定，部分由群眾密告“推薦”。他們必須按公社通知上規定的時間，攜帶鋪蓋、米菜、日常生活用品，準時到紹明樓“入學”。

紹明樓是一座大圓土樓，絕大部分樓房還是空架子，沒有裝修，僅住四五家人，空蕩蕩的。樓內沒有廁所，臨時在底層一角擺幾口大陶缸，胡亂搭上木架，圍上竹席，便成臨時廁所。報到學員在四樓指定的位置席地而坐或臥，除了吃飯、大小便，絕不許走動，更不准交頭接耳，否則“惡果自負”。

學員有這幾類人。一類是“不務正業，死心塌地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有一位果農，向人傳授嫁接技術，“接梨接柿，莫叫雨水知”，雨水（節氣）前嫁接果苗成活率高，被人檢舉，說是與最高指示“以糧爲綱”唱反調，煽動社員走歪門邪道，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有一位社員，攜帶烟刀，串門走戶替人切烟絲賺些家庭零用錢，被說成是開地下工廠。一位 70

多歲的老人，經常背上一二十斤烤烟步行到漳州去做小買賣，被指為投機倒把分子。有許多社員未經生產隊長許可，擅自到外地打工賺取家庭日用使費，被打成不務正業走資本主義道路。

另一類是“現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屬於鬥爭和打擊的重點對象。一位社員，寫春聯磨墨時，不慎將一點墨汁濺在旁邊毛澤東石膏像的眼睛上。他恐懼萬分，趕忙用小刀把那點墨汁輕輕刮掉，不料刮出一個小窟窿。因家庭成分是富農，于是有人指控其“懷著刻骨階級仇恨挖取偉大領袖的眼睛”。一位社員，其子跟別家孩子爭奪一枚毛澤東像章打架，他一怒之下奪過像章罵道：“你搶什麼死尸，我砸了它！”于是被指控咒罵毛澤東。一位社員，用彩紙剪“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貼在牆上，後來“疆”字被風吹掉，被人舉報“惡毒詛咒毛主席無壽”。一位中學職員，無意間把雙腳架在辦公桌上，桌上剛好放著一張毛澤東畫像，于是被告密膽大包天。有一位會看相的，說林彪鷹鼻，相書說，這種人居心叵測，靠不住，被誣為“詆毀我們最最最偉大領袖毛主席最最最親密戰友林副統帥”。

還有一類，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站錯隊”的頭頭和骨幹分子，他們也是重點鬥爭和打擊的對象。

我之所以被通知到學習班學習，原因有二：一是春節家門口貼了“犯上”春聯，二是寫了有政治問題的新詩。春聯是“山花爛漫時可待；懸崖百丈冰易消”，他們認為我這號人不配集毛澤東詞語作對聯，還任意加減字，屬於犯上。當時我三天兩頭遭抄家，古字畫、珍貴書籍、文稿、筆記，凡有字的，悉被抄沒，連一張紙片也不放過。一個小筆記本裏有我寫的60多首小詩，被認定全是抒發資產階級感情，尤以《駱駝》和《柳笛》最為反動，含沙射影，不滿現實。《駱駝》詩曰：“無邊無際的戈壁，寬不過駱駝的四隻蹄；不斷移動的沙丘，移不動駝群的意志。任狂風呼嘯怒卷，飛沙走石鋪地遮天；駱駝，沙漠的船，自有它堅定的航綫！”《柳笛》詩曰：“黃河沿插下的柳枝啊，彈指間已林蔭一抹。一根根嫩綠的情思，系住了高原的春色。我往昔插柳的夥伴，可記得當日的心願——我今折一個柳笛，誰來和一曲《江南》？”他們指控，“戈壁”是誣蔑如火如荼的現實生活，“狂風”映射轟轟烈烈的歷次運動，“駝群”即反動組織，“航綫”即路綫，“夥伴”即死黨，“高原的春色”即失去的天堂。文革後，我給《駱駝》加一個副標題“寫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裏”，在1979年11月號《福建文藝》上發表了。

“開學典禮”那天一早，全體學員被集中到土樓大廳，坐在一排排長板凳上，聆聽公社首長訓話。末了，一位神氣十足的巡視員，板著鐵青臉孔，聲色俱厲地給學員們交代政策：“這一次學習班非同尋常，你們必須徹底交代罪行，對於敢于藐視政府、負隅頑抗者，一打到底，該抓的抓，該關的關，該判的判，”然後再提高嗓門：“該殺的——殺！！！”凶惡的聲音在土樓震蕩，恐怖氣氛籠罩全樓。

巡視員訓話結束時，又大聲問一句：“你們在坐的有誰沒有罪被叫到這裏來？”“我就是。”一位姓江的學員沖著應道。巡視員一時尷尬，瞟一眼旁邊的社長。社長被這突如其來的沖犯激怒了，厲聲斥道：“你開地下工廠，還不認罪！”江學員也不示弱，立即反駁說：“既然我開地下工廠，請問，我的廠址在哪里？招收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資金？我只帶一把烟刀，農閑時出去替人切些烟絲，賺個零花錢罷了，這叫開地下工廠？”社長一時語塞，尋思一會兒，改口說：“你種三千株烤烟，走資本主義道路。”那年頭種那麼多烤烟實為罕見，被斥為走資本主義道路，似乎天經地義。江學員語塞了。

學習班第一階段的“學習”是相互揭發罪行，寫檢舉材料。檢舉和告密是可怕的，它使學員間失去理智，產生猜忌以至仇怨。大家都像患了神經過敏症，警惕著，只怕稍有不慎，被當作邀功求賞進而“贖罪”的材料。人們有如刺猬，彼此以刺相向，保持距離。有一個學員，是第一次進學習班，才來二三天就撐不住了，暗暗叫苦：“哟，這樣子下去，會被‘鹵’死，會被‘鹵’死！”一位“老運動員”不屑地搶白他：“哼，早著呢，你‘鹵’了什麼？

才下鹽缸的魚，還新鮮著呢。像我，早成鹹魚了，才真正算‘鹵’著！”

那位江學員，與社長家同住一樓。一天，他突然舉報社長犯有反革命罪行，並帶領公安特派員來到社長家的窗底下。那裏有一張從小學課本裏撕下來的毛澤東彩色像，上面不僅滿布針孔，還有擦屁股的便迹。江學員指著毛像，大聲說道：“這不是反革命罪證是什麼？”特派員將這一“罪證”用報紙包裹起來，帶回去偵查。社長聞訊著慌了，第二天一早忙帶著小兒子到特派員跟前說明情況。他是，像上的針孔是無知的婦道人家平時做針綫別針時留下的，便迹是不懂事的小兒晚上摸黑應急留下的，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並沒有惡意。事情發生在社長家裏，自然跟一般群眾有別，不必認真，最終不了了之。

半個月後，學習班進入了第二階段——批鬥。既然進了學習班，按當時的邏輯，不是罪也是過。每個學員必須反反覆複、老老實實寫檢查材料，深刻反省並徹底批判自己。為了爭取早日得到較為寬鬆的處理，離開這是非之地，一些學員寢食不安、絞盡腦汁編造自己的“罪行”。為了擴大“戰果”，革委會還精心安排幾場群眾鬥爭大會，在高頭市場等處揪鬥重點對象，一方面借此教化廣大群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和“階級嗅覺”，永葆旺盛的戰鬥力；另一方面則殺雞給猴看，對全體學員和社會上的危險分子收殺一儆百之效。

那時習慣於“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旦被揪鬥，往往是五花大綁押上批鬥台，雙膝跪地，低著頭但前額又必須稍仰，如此尊嚴喪盡地恭聽辱罵式的批判，而且一跪就是二三個鐘頭。有個學員，是醫生，入學習班以前就被鬥了好幾次，已摸索出一些挨鬥的經驗。他探索出一種比較“舒服”的跪法：雙膝跪定，額頭抵在地上，類似佛教徒五體投地。這種跪法的優點在於，一方面表示自己老實認罪，態度至誠，說不定能僥倖感動“上帝”，提前獲得寬恕，另一方面由於加上額頭支撐，可以分散身軀重心，減輕兩個膝蓋和腳大指的負荷，會“輕鬆”一些。

在學習班裏，前兩次挨鬥，他都用此法蒙蔽過關，第三次挨鬥欲故伎重演，被一位執勤的壯漢看穿。那壯漢快步向前，提起他頸背的綁繩，接著又狠狠把他手脚朝天攆翻在地，罵道：“噯，還想舒服，用頭做腳！”醫生登時休克，好一會才蘇醒過來。現場的群眾看客個個咋舌，學員們則無不惶恐萬狀。

經過 50 多天批鬥，學員們大都被狠狠“鹵”了一陣，一些被認為問題較輕，所謂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而又有悔改表現的，如小商小販、私自外出賺錢的木工泥工等，能積極退賠“非法所得”，便陸續獲得“結業”，離開紹明土樓。

學員減少大半，剩下的都是些“現行反革命”和文革前期“站錯隊”的學員，共約 30 餘人，進入學習班的第三段——勞動改造。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自帶一盒飯和些許鹹菜，就地風餐。活是幹不完的。公社要修醫院、修養豬場了，我們便去清基、抬石頭、砌石基、夯牆、挑磚、運木板、蓋瓦。公社沒柴燒了，我們便到深山砍樹、劈柴、挑柴。夏收夏種大忙季節，我們輪流到勞力短缺的生產隊割稻、耙田、踩稻茬、插秧。饑餓是難以忍受的，那時高頭公社各生產隊每人每年平均口糧少，多的 120 斤，少的低於 60 斤，還是原糧。我們多麼希望有個好心的生產隊長，中午能管上一頓粗茶便飯，緩解一下輾轉饑腸。無償勞動，連飯也自帶，幹活時又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認真踏實，有些群眾便戲稱我們是一群不用喂草又好使的牛，也有群眾稱我們是全能義務專業隊，人才齊全，什麼活都能幹。這樣我們又熬了 9 個月。

年關逼近，專案組早在幾個月前就撤掉了，只留下幾個雇用的壯漢每天監督我們勞動。大家盼歸心切，特別像我家，5 口人只有一個勞動力，一年到頭賺不到工分，口糧被扣，此時已處在欲生不能、欲死不成的絕境。終於，放我們回家的這一天到來了。公安特派員召開會議，對現有每個學員的罪行逐個作了簡要總結，然後歷時 11 個多月的學習班宣告暫停。這不是“結業”，以後“隨傳隨到”。

七年之後的 1979 年 4 月，我已在金豐中學執教兩個月，古竹公社（高頭公社已併入古

竹公社）竟給我送來 50 元人民幣，說是對我在文革中受左傾思潮衝擊、屢遭抄家和入學習班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的補償，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

補白：共產黨各級地方政府爲了土改徹底，把鬥爭對象擴大到地主出身的共產黨幹部及其家庭。《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找對象也要看階級》，稱要不講究點階級，就要吃大虧，娶了成分不好的女人麻煩大。第一，要當心地主搗鬼！你要想想，在舊社會，哪個地主女人願意隨便嫁給窮人？窮人看上了地主閨女，她還要罵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難道現在她忽然相中了咱窮人嗎？當心了！恐怕他是要利用你逃避鬥爭哩，或者是他還有些包袱，想找你當防空洞哩！防人之心不可無啊。第二，要當心脫離群眾！咱窮人一夥子鬧鬥爭，現在有的當了幹部，有的當上民兵，起碼也是農會會員，咱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要是隨便搞上個地主女人，大家叫你開會，老婆子叫你在家里；大家叫你鬥爭，老婆子叫你別得罪人；要商量點啥事，不敢在你家裏談，怕你老婆子走了風聲；一肚子高興，不敢對老婆子講，兩口子扯不在一搭！人總不要脫離了群眾，大家認爲他是鬥爭對象，你倒扯進懷裏當老婆，不脫離群眾嗎？第三，要當心地主女人思想轉變不好。本來你該知道，地主的思想就是不好轉變，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地主的本性就是他的剝削思想，瞧不起農民的敵對思想，你要改造他這個思想，是不容易的。第四，要當心地主女人沒勞動習慣，不會過時光。 申順芬

---

林雲濤復仇記 南 周

1970 年，林雲濤出生在莆田秀嶼的溪邊村。母親是不識字的鄉村婦女，父親林建陽在國企莆田罐頭廠當文書。1977 年秋的一天，溪邊村後厝大隊的壩子裏聚滿了人。林雲濤鑽進人群，看見爸爸直挺挺躺在地上，脖子上一圈紫黑的勒痕。周圍的人告訴他：“你爸爸給人害死了。”父親的樣子讓他渾身發抖，上下牙咯咯相撞。從前的父親是大學生、共產黨員、援越軍人、國企罐頭廠的文書，前途無量，如今的父親却是一具死尸，榮光灰飛烟滅。

林建陽是硬骨頭復員軍人，幾天前廠裏有人經不住批鬥自殺了，他還感慨別人太傻。罐頭廠說是畏罪自殺，村裏人都不接受。林家招集幾十個親戚，差點抬尸到縣裏鬧。赤腳醫生做了尸檢，認定是他殺，最終却不了了之。

1981 年，林雲濤小學二年級沒畢業，還是個傻裏傻氣的農村娃，就補員進罐頭廠當了工人。這是家人上訪四年的結果。他們每天寫信伸冤，有的信還寄給中央領導，總數超過 500 封，得到的是：撫養費 606 元、安葬費 90 元和一個罐頭廠的補員名額。罐頭廠人數逾千，11 歲的林雲濤比所有的人都小出一大截。廠裏開了後門，在戶籍年齡上加了 5 歲。進廠後，林雲濤試圖撥開父親自殺的迷霧。聽說父親是因爲得罪了紅派的人，被勒死後丟進井裏，林雲濤去看了那口黑洞洞的機井。廠裏還有人偷偷告訴林雲濤，殺父的仇人是紅派活躍分子黃文美、傅玉炳(音)、翁元鑠。那是他第一次聽說翁元鑠的名字。

1966 年文革初起，罐頭廠也分爲紅派和新派，不願站隊的叫逍遙派，林建陽是逍遙派。武鬥最厲害時，街上槍戰不息，罐頭廠死了多少人，沒有統計。1977 年粉碎四人幫，紅派上臺，上頭說“除惡務盡”，於是罐頭廠的領導班子被紅派一鍋端，有的蹲了監獄，有的進了學習班，林建陽進了學習班。

學習班實際是由車間、澡堂改造成的隔離審查室，跟集中營無異。那一屆學習班裏究竟

發生了什麼，如今已無人說得清楚。只是人們至今還記得的是，班裏有人用石頭猛砸自己的頭試圖自殺，有人把棉被撕成條在宿舍自縊，連一貫的樂天派林建陽也死在井裏。

林雲濤這個不懂事的孩子，把仇家鎖定在黃文美、傅玉炳和翁元鏢。許多人提起翁元鏢就恨，說他那時上躡下跳，整人的事沒少幹，屬於典型的投機分子。林雲濤還瞭解到，父親林建陽曾經揭發過翁元鏢，說他底子臭，因此得罪了翁元鏢，而那時候翁是得罪不起的。還有人告訴林雲濤，翁元鏢的前妻曾威脅他說：“要把林建陽的事情抖擻出去。”翁的前妻曾尋死，不上吊，不吃藥，偏往井裏跳，衆人說是林建陽冤魂不死。紅派頭子傅玉炳死于溺水，尸體被發現時，草帽繩勒在脖子上，人們傳言，這是林建陽在復仇。

當初罐頭廠在福建省光芒萬丈，出口的枇杷罐頭遠銷西歐。進入新世紀，大國企罐頭廠越發不景氣，大批工人停薪留職，翁元鏢是留下的中老年之一。多數年輕人覺得呆在廠裏沒奔頭，陸續離開，其中包括 25 歲的林雲濤。不久，林雲濤結了婚，當了上門女婿。對福建男人而言，入贅並不光彩。身邊的人陸續發了大財，林雲濤還是普通工人，一月掙三四千塊錢。

林雲濤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每天上班、加班、帶孩子，從不向妻子提父親的事，只是錢包裏永遠放著父親年輕時的三寸照片，如影隨形。林雲濤總愛和上年紀的人，尤其是罐頭廠的師傅閑聊，泡一壺茶，聊聊罐頭廠的往事，一個上午慢悠悠地就過去了。妻子不解，林雲濤說，同齡人只談掙錢和泡妞，沒意思。

每碰見翁元鏢，林雲濤都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他直勾勾地盯翁，他覺得翁總躲閃他的目光，眼睛往外，從不看他。30 年來，他和翁沒有說過一句話。

林雲濤三姐弟，姐姐是農村婦女，一次意外，脊椎折斷，從此癱在生鏽的輪椅上，妹妹沒上過學，常年在廣東打工。林雲濤努力想撐起這個家，但他時常感到被看不見的權力和傾軋包圍著。偶爾喝醉酒給妹妹打電話，說起爸爸和四分五裂的家，林雲濤說著說著就會哭起來。這些年，“如果林建陽還在……”成了林家的口頭禪，他們反復說，如果林建陽還在，起碼是個縣級以上幹部。

2005 年，因為風水，林雲濤遷葬父親。林家人看到林建陽腐骨發黑，使勁一捏成灰。在林雲濤看來，這是父親死不瞑目。林雲濤記起在罐頭廠圖書館裏讀到的伍子胥復仇的故事。父兄被楚王殺害後，伍子胥出逃吳國，後借吳國之力回國復仇，“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這個故事激勵了林雲濤。

2010 年 11 月 13 日凌晨，福建莆田涵江區，牌局散去，71 歲的翁元鏢晃晃悠悠回家。大約一個小時後，有人借著月光，看見他仰面躺著，滿臉是血，已經氣絕。

起初人們推測是賊娃子幹的，又有人懷疑是翁的親生兒子幹的。翁是二婚，孩子跟了前妻，多年斷絕往來。最終謎底揭曉，殺人者是罐頭廠下崗職工林雲濤。

---

補白：鎮反期間，雲南發生一起復興黨暴動案，查出黨員 1300 多人，包括 80 多名中共幹部，縣委書記、縣公安局副局長也被牽扯進去。實際上這是普洱縣磨黑鎮公安局以刑訊逼供製造的一起假案。當時雲南省委書記宋任窮明確表示：“普洱地區的復興案我不相信，你們給我好好去查。”省公安廳調查後，發現是假案，起于一名小學教師在刑訊逼供下的供詞。宋任窮爲了保官，不對該案及時糾正，只同意公安部門內部保密處理，致使該案 126 人被槍決，37 人被判死緩，669 人被判坐牢，133 人被管制，168 人被關押和審查。此案 1981 年平反。

---



這是我大學三年級時的日記節選。我到神農架去的目的只是爲了民歌，那些淳樸的、醉人的、痴迷的、狂放的歌，偏偏我又有了如此的巧遇。我承諾過守口如瓶，但是我心裏十分明白，到了適當的時候，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訴人們，決不會永遠沉默到底。沉默下去，我的心裏總不能平靜。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日 晴

午飯時間，左蘇告訴我一件有趣的事。湖北省委的老爺子喜歡打獵過癮，就讓交際處的小幹部們物色一兩個真會打獵的槍手，一起到深山老林裏去嘗嘗野味。郭健是省委機關職工的孩子，當兵的時候槍法好，就被借調來省直機關工作，隔三差五陪著老爺子上神農架打獵。神農架那邊的農民，老人們穿的仍是古式的衣服，男女老少依舊保持傳統的風俗，隔山對話不方便，唱一首民歌，表一份情。這樣的地方如今只怕不多了，或許我應該去一趟。既然我選擇了民間文學專業，怎能沒有一次田野作業的經驗呢？於是我們組織了一個考察隊，郭健是隊員之一。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 晴

今天到了板倉，遇到司法處的年輕人譚邦道。他回木魚坪探親時，聽見幾位老人在談野人的事，原以爲是講古代的事，一問原來是上個月的事。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 晴

晚上，我正準備洗澡，一位女青年來敲門。她自我介紹，是林區會計科的職員。她說她的媽媽聽到我中午在唱民歌，很想見見我。她的母親是林區婦聯的幹部，有病在家休養。她低聲說，母親可能患的是癌，盼我能儘量滿足她。我跟著這位打扮入時的姑娘走進機關宿舍。

她的母親叫馮靜美，看上去不到五十歲，一口當地方言，膚色却明顯比一般婦女白淨。她問我爲什麼收集民歌，我說了民間文學的價值。她聽了，眼睛裏露出興奮的光。她說，她有一本舊時的贊本。當地人把他們的民歌手抄本叫做贊本。她告訴我，這是她父親留下的。她打開一個布包，裏面是一本毛邊紙的抄本，抄的都是本地的民歌。工整的繁體毛筆字，幾首民歌都是五句子，旁邊還寫著工尺譜。第一首是《戒指》：“遠望姐兒穿身黃，十指戒箍擺成行。一不是娘家陪嫁的禮，二不是婆家攢私房，一個戒箍子一個郎。”看來老人當年也是個行家，可惜內容並不多，我已搜集到的民歌比他的更多、更詳細。

馮靜美起先說“我父親不在了”，後來又說“或許還活著”。我聽了一驚：“他在哪兒呢？”她遲疑了片刻說：“這話我多年都不敢說啊。當年野人的事，不許人說的。土改的時候，有的地主受不了鬥爭、挨打，就跑進了深山老林。我父親他也走了，從此沒有回來。我父親當年在鄰縣教書，解放時我才十五歲。父親是長子，爺爺死了，他三十歲出頭，地主帽子就戴到他頭上。他發現太可怕，逃出村子。過了十多天，我媽媽也上了山。民兵上山打土匪，開了槍，母親被抬回來，已經咽了氣。我當時很害怕，土改工作隊的崔政委把我接去。我識字，能給工作隊寫文書，一年以後，我就跟他結了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老崔是林區公路局長。兩派武鬥雙方扔石頭，他去勸架，不知誰扔的石頭不巧剛好打中他的腦袋，當場遍地是鮮血，送到醫院已經不行了。他死以後，我翻出他的一些遺物，意外地發現他收藏了一本贊本，我認得出是我父親當年留下的。我聽說你是上海的大學生，專門來收民歌，就想給你看。”

我很快抄下了我沒有收集到的幾首，以及樂譜。她的女兒跟許多時髦年輕人一樣，對農

民的土語民歌不屑一顧，早已轉身出去了。

我問她當年爲什麼不去找父親，她嘆息一聲，說：“是啊，我哪里沒有想過。可是他是地主，我嫁給了老崔，老崔不讓。他說了，就是他願意找，找回來也沒有好結果啊。我好容易入了共青團，一直要靠攏組織。階級鬥爭，路綫鬥爭，沒人時已經鬥得死去活來，真找出個大活人來，不是找死嗎？或許他在山林裏住著，雖然衣食不周，倒還悠閒著點兒。文革那一陣，各生產隊的地主富農被打得那麼慘，我反而多少覺得他還是走了乾淨。”

她的眼淚不住地流，我對她說：“事情都過去了，你不要太傷心，我給你唱一首民歌吧。”我翻開她的贊本，有一首《青山》，我唱到：“每日開門見青山，山上青色不改換。我問青山何日老，青山問我幾時閑？人學青山難上難。”聽我輕輕地唱，她又忍不住老淚縱橫，說她依稀記得當年鄉親們和父親也唱過這首歌，仿佛今天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含義。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晴

昨天晚上聽了馮靜美的故事，聯想起神農架野人的信息，我心頭煩亂，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既入睡，我做了一個夢。這裏離譚邦道說的老人們發現野人的地方不遠。夢中，我背上背囊，信步朝山裏走去。離開公路，走進深山，天氣很好，草地也鬆軟。據說當年薛丁山在這裏養馬屯兵，果然是一片好草場。

穿過草場，又是叢林和山坡。忽然，我看見林中好象有一個人影。是的，一個身材高大的背影。紅棕的毛，沒有衣服。野人？我驚呆了。是的，沒有錯。可是太遠，看不清楚。我想去接近他，可是踩著雜草，脚下發出嘩嘩的響聲，那背影立刻向山裏奔去。我想去追，可是我明白，奔跑登山，穿越荊棘林莽，我絕不是他的對手，幾秒鐘後他就會無影無踪，解開背囊拿照相機也根本來不及。

我該怎麼辦？有了。遠離人間的人會眷戀人間的歌，我深深喘了一口氣，放開歌喉，唱起了五句子《戒指》。我唱的是地道的本地方言，旋律也模仿得盡可能準確。那個背影忽然停住了。我一面唱歌，一面向他接近，《戒指》唱完了，接著唱《青山》，唱《花鞋花傘》：“姐兒住在花樹坪，看倒（著）看倒長成人。腳穿花鞋花樹下走，手拿花傘花樹上行，花上加花愛煞人。”我還唱出了“穿聲號子”的穿插技巧。

他似乎已經轉過身來，躲在一叢灌木的背後。我跟他只相距十米左右了，他又開始退却。爲了不讓他害怕，我停住不動，唱完所有我能背得下歌詞的十來首民歌。他靜靜地聽，沒有任何回應。我開始講話，我說我是來收集民歌的學生，我喜愛民歌，我看過你抄寫的民歌，馮靜美想念你。我不知道還應該說什麼，冷場了幾秒鐘。我聽到一種蒼老濃重的聲音，因爲是方言，我很難立刻明白。忽然，我覺得我懂了，他說的是“不足爲外人道也”。那聲音又重複了一遍，我相信我是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放心！”我答應他。忽然那身影向後一躍，鑽入了叢林。我走上前，穿過灌木叢，眼前是一片林海。

夢醒來，夢中林間的松濤還在耳畔迴響。我不禁陷入思索：馮靜美的父親今天是否可能真的還活著，以我夢中的這位野人的方式活著？或者，他就是馮靜美的父親？我希望他是。昔日的語言他已經不再使用，幾十年孤獨的光陰裏，或許他只是在反復吟咏他少年時讀過和青年時教過的古文和他摯愛過的民歌。土地、房屋都已被分去，妻子被槍殺，女兒跟人而去，人間萬物他已無心眷戀，竟把山林當作了他的桃花源。

自此以後，除了民歌，我怕談神農架，更絕口不談野人。我希望今後的考察隊裏也絕對不要再有郭健那樣的神槍手。

父親曾匡南，生于 1919 年，畢業于廣東省文理教育學院（現華南師範大學）。1948 年 2 月，經吳川縣縣長歐鐘岳極力推薦下，28 歲的父親成為吳川中學歷史上最年輕的校長。1949 年，父親應邀到香港辦學，因嚮往“新中國”，更加上廣州女子師範學院向他招手，遂從香港回廣州，從此開始長達 40 年的苦難人生。

二叔曾嘉南讀中學時，班主任叫全班學生一起填表加入三青團，後來中共指三青團是國民黨反共的工具。肅反運動時期，有人勸嘉南叔外出避風頭，但他自恃沒有任何反共行為，最後突然在他任教的學校被抓走。我的奶奶托人求情，對方回說他沒事，過兩天便會放人回家。那天，我爺爺正在自家診所給人看病，突然門外馬路上有人掙扎突圍而出，撲通一聲跪在地上。爺爺定睛一看，心膽俱裂，原來是他最心愛的兒子被人五花大綁即將押赴刑場，奶奶當場昏死過去。念高中的小姑姑正在學校上課，有同學告知看見她的二哥被處決，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淚，後來竟因此被批“立場不穩”。

嘉南叔慘死七年後，我才出世。從小我就納悶，為何我家的日曆總是少一頁？到了那一天，爺爺就禁食，粒米不進，獨自垂淚。我曾好奇地詢問，被奶奶阻止，警告小孩子不要多言，否則大人將大禍臨頭。這個謎團，直到文革結束，四人幫倒臺，我才從小姑姑口中得知真相，原來那天是嘉南叔的忌日。在那個黑暗年代，悼念“反革命”即是“階級立場有問題”，“陰謀階級報復”，只能偷偷紀念。嘉南叔臨刑前在家門前向爺爺下跪，文革期間成了爺爺被批鬥的一條罪狀，“反革命孝子賢孫，死到臨頭還要下跪，可見你們都是一丘之貉”。

因嘉南叔是被槍決的“反革命”，家人不敢保留他的照片，他在這個世界上留下的唯一遺物，是一幅用毛筆隸書抄錄的岳飛《滿江紅》詞句“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落款是“弟嘉南亂塗于民國卅五年六月”。文革紅衛兵抄家前夕，我在一本綫裝書中無意間翻看到這一幅字，好奇地問奶奶嘉南是誰？奶奶大驚失色，叫我以後千萬不要提這個名字。我實在太喜歡這幅書法了，偷偷珍藏起來，使之得以逃過紅衛兵抄家之厄，留存于世，後被我帶到香港，再帶到美國珍藏至今。父親不止一次自責，假如當時他留在香港辦學，嘉南叔一定前往香港投靠，就不至于被當成反革命遭槍決。

父親在廣州女子師範學校任教期間，本來已與一李姓女同學訂婚，并準備在 1952 年底舉行婚禮。誰知禍從天降，曾與父親共事過的一名英語教師，在肅反運動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審查，要他檢舉揭發別人。英語教師為了“立功贖罪”，胡亂招供。他以為父親去了香港，不會再回“新中國”，故把父親扯出來“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傳訊審查我父親。父親的未婚妻當時已有身孕，父親成了“特嫌”，她以為父親性命不保，絕望之餘，做了人工流產，隨後投向另一位追求者。八個月後，父親的冤案證實子虛烏有，但未婚妻已琵琶別抱。

父親獲釋後，到廣東臺山縣鬥山任遠中學任教。周末假日，經常到廣州圖書館翻查資料，邂逅當時就讀華僑補習學校的母親。她是澳洲華僑，在 1954 年的回歸熱潮中返國，與父親一見鍾情，不顧家人反對嫁給父親，婚後一年生下我。不久，父親被打成右派，送往人迹罕至的青海柴達木盆地勞動教養。他所在學校共去了三名教師右派，另兩人都未能活著回來。母親因受不了周圍的社會輿論壓力，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頭，決定離開傷心地，遂要求離婚。由于當初父母家人堅決反對這門親事，此時她感到“無顏見江東父老”，便不再回澳洲，而在香港居住下來。

我出生一個多月，就被送回老家跟隨爺爺奶奶生活，奶奶常戲稱我是吃百家奶長大的。

文革爆發，我家落入苦難深淵。歷次政治運動，爺爺、父親都是“運動員”，抄家、批鬥、游街示眾、關押……無日無之，真的生不如死。父親曾先後自殺兩次，一次試圖在江水中溺斃自己，但由于他是游泳健將，雖然強迫自己喝了一肚子水，仍淹不死；另一次是試圖用吃飯的瓦缸敲碎自己的腦袋，儘管頭破血流，最終及時獲救。那時我們經常要填寫履歷表，每次填到“家庭成員中是否有人被殺、被關、被管制”等，我就神經緊張，害怕得不得了。

晚年的父親，先是創辦明德書屋，後又興辦梅山中學。父親在歷次政治浩劫中都大難不死，沒想到 1996 年却死于醫療事故。我盡其所能，在父親生前奉獻的梅山中學，捐款成立曾匡南獎教、獎學金和匡南圖書館，希望藉此告慰父親在天之靈。

---

一、歡迎來稿和薦稿，也期待您的建議和指正。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三、本刊聯絡手機：133 6658 6793。

四、有意資助《黑五類憶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五、通訊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305 甲 110 號 焦國標，郵編 100091。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銀行北京北大支行，  
賬號 4080702-0188-038026-9，戶名焦國標。

## 《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 201104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誰是公義的原動力 焦國標

《黑五類憶舊》如今編到第十二期，收到的肯定、鼓勵、好評無數。對此，我是一則一喜，一則一懼。喜不說了，只說懼。仿佛我是公義的原動力，為社會爭公義這事就拜托我一人了，別人，包括肯定、鼓勵、好評我的人士，都與此不大相干；不是天下公義，人人有責，而是天下公義，人人無責，唯焦國標有責似的。面對這樣的潛在語境，我能不懼嗎？

那位問了：你憑什麼說存在這一潛在語境？我的直接證據有兩個：一是有的朋友來郵件肯定、鼓勵、好評我，却不留自己的名字；二是有的朋友來郵件要我發《黑五類憶舊》的電

子文檔，却不留自己的名字。有時我興之所至，隨手回曰：“敢問先生尊姓大名？”常常得不到回音。當然，其中一部分是習慣了寫郵件不留名字，我想必有另一部分是心有莫名的餘悸，不敢留名字。這後一部分朋友的心理可能是：黑五類的歷史確屬不公義，至于爭公義，自己還是離遠一點，只做個匿名的拉拉隊員比較安全。

我還有一個間接證據。一些朋友來信，除了肯定、鼓勵、好評，還提出需要什麼幫助，有時口氣近乎兩肋插刀，可是每每我實言告以需要經濟上的幫助之後，就再也得不到他們的任何回聲。

有些讀者朋友以為，編《黑五類憶舊》可能得到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或臺灣民主基金會的經濟支持。沒有。有朋友建議我申請它們資助，我迄今沒有提出。我在想，中國大陸經濟這些牛逼，富人這麼多，再去申請美國、臺灣的資助，不是我情何以堪，而是國何以堪，民何以堪，中國的富人情何以堪。還有一些讀者朋友以為我是一個退休的北大教授，與幾個退休同事老來無事，領著退休金，編個《黑五類憶舊》發揮餘熱。有一次我信手回信道：“《憶舊》就我一個人編，不存在一個北大退休教授編輯團隊。我 1963 年生，雖現已享年 48 歲，到底尚未到退休年齡，故無退休金可拿。”

我的憂慮，還有一種情形。有朋友發來一篇記述女地主 X 氏的文章，附函寫交代道：“因為當前毛澤東沒有徹底否定，共產黨也沒轉變成社會民主黨，土改也沒重新評定，為了不影響其後輩的生存環境，因此對 X 氏的遭遇，只提供姓氏和情節，不公布人名和施展迫害人的名字。”關於 X 氏的居地，該朋友建議，只公開到市就行了，“原先所在的區和居委會也不要公開”。這位朋友也相信，有必要完全公開這一切，只是“前提是要把毛澤東的那一套歪理全否定掉。到中國也是社會民主黨執政的時候，以後有的是申訴揭露的機會。不否定暴力革命論，不否定土改政策，毛派人物隨時可以操起階級成分的大棒，迫害她的後代，因為到現在為止，沒人來像反右一樣，承認土改中劃分的成分有搞錯的。”

與這封附函中傳達的考量相似的一個現象：網上許多回憶黑五類的博客文章，不見作者的真實姓名。為什麼？恐懼。

這些考量和恐懼是可以理解的，可問題是誰來“把毛澤東的那一套歪理全否定掉”，共產黨如何才能轉變成社會民主黨，重評土改如何才能實現。顯然，大家都在等共產黨把毛的那一套歪理否定了，等共產黨自己轉變成社會民主黨了，等共產黨重評土改了，然後再毫不遮掩地“申訴揭露”。如此說來，共產黨就是公義的原動力，大家都在等著搭乘共產黨的公義順風車。這太令人憂慮了！

我必須糾正大家，公義的原動力不是共產黨，而是我們每一個人。上帝造人的時候，已公義機理安裝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這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就是公義的原動力。當年的黑五類摘帽，仿佛胡耀邦是公義的原動力，實際上胡只是發了上帝安裝在每個中國人（包括胡自己）內心的公義機理之源而已。所以，不要等別人恩賜我們公義，我們只須放膽發出自己的公義吶喊。不是有人說嗎，“如果沒有勇氣，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同樣，如果沒有追求公義的勇氣，其他的算計都將化為泡影。

2011-3-30 北京

---

總有一種力量，  
讓我們泪流滿面。  
長平語 國標書

---

## 目 錄

紹興徐氏·····	丁箴冒 (06)
爺爺的一次變臉·····	美 妹 (10)
關於地主的記憶·····	衆網友 (13)
我爸是貧農·····	祝念祖 (17)
爺爺的兩個兒子·····	新 年 (18)
挂千頃牌的地主·····	濰 客 (20)
一支鋼筆·····	晋 英 (22)
臨終的致歉·····	侯欽民 (23)
我和哥哥的童年·····	海 川 (25)
師生情·····	王 波 (27)
父親的日記·····	周 方 (31)
姑爸舅的三角親·····	瓜外蟲 (33)
三個兒子三顆星·····	王昌鵬 (37)
地主家的喜酒·····	余 姚 (39)
不識數的婉英·····	鯉 紫 (41)
我的曾外公·····	張燕燕 (43)
插隊時的地主鄰居·····	京 生 (46)
一塊玻璃一條命·····	鳳 翔 (47)
我的臺胞父親·····	李亞蓮 (49)
父親正直而善良·····	木 子 (52)
父親與淄博六中·····	張肖文 (54)
血腥海豐·····	京 晨 (57)
瀋陽鎮反目擊記·····	俊 杰 (60)
我的三個舅舅·····	皖 水 (63)
父親糜藕池·····	糜蓮子 (64)
一個閨友的身世·····	丫 丫 (69)
父親是這樣被殺的·····	鐘茂昌 (71)
澄海殘害人八十七式·····	餘少鐺 (72)
博斯騰湖大捕殺·····	李 金 (78)
父親的夢想·····	李興濂 (81)
貧協主席蔣大杆·····	興 濂 (82)
地主家的女子·····	秦 漢 (85)
黑皮人格·····	山 道 (86)
孫中山的孫女·····	孫穗芳 (89)
一件誣陷案·····	曹 爲 (91)
五六十年代的職業歧視·····	曲 子 (93)
點天燈·····	碧薇萍 (94)
嵇根醜之死·····	秦 腔 (96)

毛像遺棄記……………漢陽（98）

梁羽生的故鄉心……………南都（99）

---

補白：我小時候聽爺爺講，他過去給地主打短工，地主給他們吃細糧加肉，地主家裏人吃粗糧加野菜。一次，地主家的一個小女兒悄悄地跟我爺爺要肉和饅，結果還被地主打了一頓。過去的地主並不是都剝削和壓迫農民，他們家的財產是用仔細和汗水積累的。今天，我們有一部分人富了，確實富了！家產不光是幾十套房子、幾輛豪華轎車、幾億資產、幾個傭人、幾個保鏢、幾群狼狗的事了，有的還擁有幾大公司、幾座礦山、幾條專用鐵路，幾乎富可敵國，可這些富人心眼沒有當年的地主好。我以前在報上看過一個報道，有一次一個專門喂狗的女傭，由于餓得難挨，偷吃了富人家的狗食，被富人看見，命左右幾個保鏢將這個農村來的，年僅 19 歲的女孩活活打死。今天的富人他們忘記了，他們的富有，其實是私有化了全民的工廠、礦山、河流、湖泊，是以犧牲千千萬萬個溫飽職工和家庭為代價的。

---

紹興徐氏 丁箴冒

紹興塔山區有徐氏者，與夫同庚，十八歲完婚，十九歲生子。二十三歲那年，天降惡運，出嫁不久的三姑姐的丈夫因失業，兼三姐又懷了孕，迫于生活壓力，于農曆七月大伏天投河自盡。一家六兄弟，沒人關心老五的自殺；倒是妻弟，即徐氏的丈夫，連續幾天沒日沒夜到各處荒郊河道打撈尸首。姐夫的尸首是找到了，因暑熱、疲勞再加悲傷，妻弟却病倒了，上吐下瀉。本來城中有西醫，吊上鹽水，打上幾針，諒不會有大礙，可是家中老人思想保守，說西醫是洋鬼子開的，吸人血，不去看，只看中醫，不幾日一命嗚呼。徐氏夫與潘天壽同門，師弟亡故，師兄潘天壽還送了挽聯。

徐氏與丈夫生有二子一女，此時大兒子五歲，二兒子三歲，女兒半歲多，家裏還有公婆、公婆的兄嫂和徐氏的母親五位老人。公婆的兄嫂，因子女相繼夭亡，兄弟未分家，一直吃住在一起。二十三歲花季年齡的徐氏成了寡婦，兼家裏的頂梁柱。

日本人來了。為避戰亂，徐氏帶著兒女逃難到鄉下。十二歲的二兒子患痢疾，受醫療條件所限，病死鄉下。徐氏自認命運不好，便吃齋信佛，積善積德，定期到庵堂做功課，希望通過自己念佛修行，使惡運不再降臨這個家庭。

徐氏夫家祖上（康熙年間）有五房兄弟，徐氏夫家屬於第五房。二房在外做官，定居外地，出資在老家買了一百二十畝田，留給家中兄弟及其後輩，輪流收租，接濟生活。繁衍到徐氏的丈夫這一代，這個家族已有一百五十多戶族人。二房留下的田地，成為這個大家族的公田，每年一家，輪流經管、受益。徐氏一個婦道人家，無論自己家的田，還是輪到的公田，都托夫家一位做過師爺的族兄代管。自家的田，與租地的農民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有些年景不好，只收倒四六，租戶得六，她得四。街坊鄰里有口皆碑，稱贊徐氏好心腸。

好不容易把幾位老人送走（送終），熬到兒女長大，土改來了。土改工作組根據實情將她劃為小土地出租，并且也告訴了她。

問題出在家族的公田上。

1948 年，家族公田輪到徐氏收租。起初，土改工作組將 1949 年收租的那一戶劃成地主。地主不就是土地的主人嗎？劃作地主就做地主，那一戶也沒爭辯。土改工作組要槍斃地主了，將其他被劃為地主的人員也被綁去法場“觀禮”。1949 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位也陪綁

去了法場，嚇壞了，開始醒悟：“地主是當不得！”于是就提出申訴，說這個公堂地主不該由他當。土改工作組決定，那就由 1947 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家頂替這個地主名額。可是 1947 年那一家頂門立戶的也是男人，會爭，會辯，去鬧，逃掉了這個地主名額。最後，這頂地主帽子落在不諳世事、與世無爭、處處小心退讓的寡婦徐氏頭上。

隨著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的強調，到了 1961 年，居委會又重新給徐氏戴上地主帽子。當時重新戴帽的據說有六到八人，包括國家級統戰人物邵力子的侄子、民國時期當律師的邵堂。徐氏因與鄰居關係不錯，在給她戴地主帽子的居民鬥爭大會上，沒人鬥她。三裏外另一個居民小組的蓮香，是一個姓王的理髮師的老婆，拎住徐氏的頭髮將她揪上臺，並發表鬥爭演說：“你在舊社會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壓迫我們窮人。”

徐氏的鄰居陶阿鳳大嫂和朱愛愛姑娘，主動上臺保護她，責問理髮師的老婆：“你知不知道她的情況？她穿過綾羅綢緞？吃過山珍海味？對老人怎麼這麼沒有禮貌，沒有規矩？”坐在台下的派出所長急眼了，把大嫂和姑娘攔了下來，責問她們怎麼這麼沒有覺悟，並問愛愛在哪個學校讀書。得知姑娘這一年剛好小學畢業，要升初中時，他立即交待：“告訴她的學校，不准給她升學！”

愛愛的父親知道情況後，將她接去省城，脫離了遭受迫害的環境，但這位姑娘從此中斷了學業。後來個人問題也未解決，至今是個六十三歲的老姑娘。居委會委員陳阿寶（其子後任該市的農委主任）認為徐氏為人忠厚，膽子小，沒劣迹，堅決不同意給她戴地主帽子，但居委會主任不聽她的意見，堅持要給徐氏重新戴帽子。陳阿寶以辭職抗議，從此與主任分道揚鑣。

徐氏的一兒一女都很爭氣，入了黨。女兒護校畢業，分配到政府療養院，後又調去中央保健局，在陳雲家工作過三年，在陳伯達家工作了六年，直到六十年代查出肝功能數值不正常，才回到省屬醫院。兒子 1949 年考上華東軍大，1959 年立有戰功，一直在部隊工作，退休後進了幹休所。那些年，居委會每年慰問軍屬送燈籠，徐氏重戴帽子前大部分年份不來她家，重戴帽子後就根本不來了。五十年代安排年青人參加工作，其兒媳有小學文化，貧農出身，本應作為真正的軍屬安排工作，但到街道開身份證明，因是地主家庭，不給安排，直至隨軍後才有了工作。

重新戴上地主帽子的徐氏，收到的所有信件，要拿到居委會當著治保主任的面才能拆開，治保主任看完後，她才能看。寄出的信，要經治保主任檢查才能寄出。她也做了一點小小的抗爭，說兒子的信不是寄給她的，是寄給媳婦的，才使兒子的信在當時免遭檢查。徐氏每天白天掃馬路，每周晚上各去幾裏路外的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學習”一次，年終上臺一次，接受革命群眾的鬥爭。孫子也被人罵作四類分子，為了不影響晚輩的前程，徐氏主動提出要兒子將孫子、媳婦接走，讓她獨自生活。

1966 年，徐氏的女兒在寧波地區搞四清，原定四清結束自寧波返杭州途中在紹興下車來看望母親，徐氏也向居委會作了彙報，告訴女兒將要來看她，但女兒最後沒下車來看她。女兒的解釋是，當時大串聯，車上很擠，很難下車，就沒下來。現在她自己老了，每聽電視中唱起“常回家看看”就後悔不已。

徐氏生病了，但她不告訴子女，而且堅持每天掃馬路和每周兩個晚上的“學習”。實在堅持不下去了，1967 年春，徐氏上吊自盡。兒子單位的政工部門見到死訊電報，却不立即告訴本人，壓了三天才把電報交給他，且不准他回去發殯母親。徐氏是陽曆 3 月 1 日自盡的，趕來處理喪事的女兒發現，徐氏的購糧本上，2 月份的指標還未買，1 月份購的米，在米罐裏還剩十幾斤。當時成人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這意味著，徐氏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裏只吃了不足十斤米。

徐氏自殺後，街坊中有一位原先開棺材店的師傅王長榮，公私合營後已改行，提出願重操舊業，用徐家的門板連夜為徐氏趕制一具棺材。居委會和居民小組長說，你們鄰居同意，



他們沒意見。其女兒則說，這是人民的財產，我不能動。最後，徐氏僅得以棉被裹尸于當天下午下葬。其女也沒陪送到下葬地，而由其嫂的姐姐送至大禹陵附近草草泥葬了事。後來徐氏的女兒解釋說，從四清回單位後，不少大字報寫她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所以不敢再為母親做什麼了。

徐氏的女兒離家回杭州時，被街對面一個老石匠攔住罵了一頓：“你這個地主的女兒XXX，你要弄清楚，你不是人民養大的，你是由地主養大的，你娘一生多麼艱辛！多麼不容易！你娘把你從一草紙長養大到今天，你為了自己少受罪，竟這麼對待她，你良心到哪里去了？你們不回來，我們還可以把她的喪事辦得體面一點，你怎麼能這麼對待她？”面對壽頭腦的責備，她只好眼淚往肚裏流。如果說她不孝，可她自參加工作，每月都寄十元錢給母親，這在當時不能算少。

居委會主任、治保主任、居民小組長對鄰居們說：“四類分子學習時，我們不到場，由他們自己組織，但我們稍稍站在窗外天井裏監聽他們的談吐言行。其他人都有過一些牢騷話，但從未聽徐氏發表過不滿言論。我們本打算文革結束時給她摘帽子，但她現在自絕于人民。”徐氏一過世，居委會即來霸占房子，將傢具用品拍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徐氏被霸占的房產才得退還。

## 爺爺的一次變臉 美 妹

“貧農張大爺，身上有塊疤。大爺告訴我，這是仇恨疤。”這是七十年代末我在萬壽上小學時一篇課文中的幾句。全班同學一齊背誦，場面很壯觀。下午放學後，我和幾個夥伴還饒有興趣地邊往家走邊齊聲背誦，惹得路人頻頻側目，有的忍不住誇我們幾句，說我們聰明伶俐，我們背得更起勁了。

回到家時，母親正在灶門前拉風箱燒火，爺爺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個粗糙木板凳上，邊抽長烟袋邊和我母親說著什麼。也許背興未盡，也許是想在他們面前顯擺一下，我站在門口搖頭晃腦地大聲背起來。模糊聽見爺爺嚴厲地說了句什麼，站起身氣憤地走了，媽媽立即大聲呵斥我停下。？

我從沒見爺爺這麼嚴厲地對待過我，更沒想到會招來媽媽的呵斥，我傷心地閉著眼仰頭大哭起來。媽媽咬緊牙小跑過來，揚起手給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大聲了。媽媽咬緊牙厲聲說：“你還好意思哭？你剛才都背了些什麼？你不知道你爺爺就是地主嗎？”我突然猶如五雷轟頂，止住哭聲，嚇得呆站在那裏。

“地主”這個令所有好人都仇恨的壞蛋的代名詞，怎麼會和我爺爺挂上鉤呢？全世界公認的好人雷鋒，小時候上山砍柴，被狠毒的地主婆奪下柴刀砍傷。小學生劉文學放學回家路過辣椒地，看見地主偷辣椒，劉文學大喊地主偷辣椒，那地主把劉文學掐死。地主太狠毒了，我和夥伴們看小人書，看電影，每看到窮人鬥地主、殺地主，無不拍手稱快。

????可是現在，媽媽却說我爺爺就是個地主，我幼小的心裏怎能不翻江倒海呢？我一直認為我們全家都是好人，爺爺在生產隊喂牲口，每次看到我，也像別人的爺爺那樣，有時摸摸我的頭，有時抱抱我，有時還從懷裏掏出一塊糖給我，那糖常常都化得和糖紙粘在一起，上面沾著草屑塵土。難道爺爺曾經是壞人？曾經像其他地主那樣欺壓百姓？只是現在迫于壓力裝好人？如果爺爺是地主，那麼我呢？難道是地主羔子？我不敢往下想了，我的階級路線開始混亂了。從那以後，再看見爺爺，我就遠遠地躲著，看著爺爺那張瘦長、嚴肅的臉，越發覺得他神秘，可怕。在學校裏，同學們再說鬥地主的故事，我都嚇得不敢作聲，害怕同學們知道我家的底細。

??? 後來媽媽告訴我，當年爺爺跟著他的父親開染坊，攢下點錢，置了幾十畝地，蓋起了東西兩個跨院，一個大門樓。平時地裏的活都是自己打理，農忙時才雇傭幾個短工。這些短工中有一個後來當了村裏的支書，我家就倒黴了。本來我家地不多，也沒雇長工，是沒資格定為地主的，就是因為這個短工支書，讓我家享受到了地主待遇。

每當村裏開憶苦思甜大會，我爺爺、奶奶、父親就會被揪到臺上，像罪人那樣彎腰站著，接受全村貧下中農的控訴。他們控訴爺爺的最大罪行有兩個。一個是爺爺讓短工幹很多活，給的工錢却很少。母親說，其實那時雇人幹活都是按行市來的。另一個罪行就是爺爺曾經先後娶回了四房太太，而很多窮人却打光棍兒。爺爺雖然娶了四個太太，但並不是同時存在的。那時醫療條件差，不用什麼大病就會死人。爺爺同時存在的只有東西兩個跨院的兩房太太，而且除了大家閨秀四奶奶，其他幾位太太都下地幹活。我小時候見到的就是四奶奶，總是幹頭淨臉的，收拾得很清爽，衣服平平整整一絲褶皺也沒有，真的沒見她下過地，具有閨秀的風範。

最可憐的是三奶奶，她第一次被拉去批鬥的時候，正在坐月子，小寶寶才下生三四天。被批鬥一天，晚上也沒放回來，關在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快天明的時候，三奶奶心急如焚，偷偷跑回家，看到心愛的小寶寶已氣絕身亡。三奶奶又急又怕又傷心，受不了站在臺上接受批判的屈辱，懸梁自盡。

我家成分不好，三個哥哥不好娶媳婦，我從小就常常聽媽媽和父親嘮叨：你大哥只要有姑娘願意跟，不管花多少彩禮錢咱都願意。你二哥和三哥就不用發愁了，就用你和你妹妹換媳婦。我那時候還小，不大懂事，但是我知道那不是什麼好事，每聽見媽媽如此嘮叨，心裏就灰灰的，覺得自己的未來很暗淡。父母本來是不打算讓我上學讀書的，那時候女孩兒上學的本來就不多，但是，考慮到我未來換親的悲慘命運，他們心懷愧疚，為了表示補償，就讓我去讀幾年書，少下幾年地。？

多虧父母的愧疚之情，否則，我怎麼會敲出今天的文字來呢？就在我讀書的那幾年，一切運動都結束了，全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的哥哥們都那麼勤快能幹，很快就娶上了媳婦。謝天謝地，我和妹妹不用為他們換媳婦了。

---

補白：父親原是貴州德江縣高山鄉供銷社的營業員。有一天，供銷社被偷走幾斤白糖、幾張糧票和幾十元錢。父親懷疑是張某偷的，為了拿到真憑實據，父親千方百計套近張某，稱兄道弟，虛與委蛇，甚至在張某要求下寫了一份莫名其妙的向臺灣的求救書。張某後怕了，就拿著那份求救書到德江縣公安局報案，誣告父親從事反革命活動，并聲稱供銷社被偷的東西是父親拿去支援臺灣了。德江縣公安局急于立功，于是製造了包括我父親、張某在內的華南總隊反革命集團案。父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可從在獄中到今天，一直不服判決，不斷申訴。在獄中申訴，當局說他不老實；出獄申訴到今天，當局長期卡壓，隨時監控，甚至連我們做子女的也不放過。為什麼父親的案子到現在不得平反？為什麼當局長期對父親和我們進行壓制監控？因為一旦平反，就要處理一些人，就要賠償受害人損失，這是當局極不願面對的。家父為伸冤，幾十年耗盡心血財力，如今身心俱碎，一貧如洗。 安泰甫

---

聽父親說，我們老家有兩個地主。一個是當地最大的地主，其子是國民黨的軍長，後來被共產黨鎮壓。另一個地主，他的田包圍了一戶人家唯一的一塊田，爲了逼該戶人家賣田，不給人家放水，把人家逼上絕路，上山當了土匪，後來領人殺了回來。我老家離老蔣（介石）家不遠，那時土匪成群。

我外公家原來是挺大的地主，還收了許多“徒弟”，每年從初一到十五，要開流水席招待這些來拜年的徒弟。要是土匪搶了誰家的東西，只要求到他們家老太爺一張條子，立馬放人。陳毅在蘇浙皖一帶打游擊時，也經常到他家做客。老爺子後來在上海被槍決了，我外公也在我媽媽很小時被迫害死。舅舅就更慘了，大舅死得早，二舅、小舅都打了一輩子光棍，現在老無所依，就靠我們這些外甥照顧了。

聽我爺爺講，我家前面的鄰居，解放前是我們村最大的地主。用一根筷子插在銅錢孔裏，製成一個工具，一大家子幾十口人，每次炒菜放油，就用這個工具提兩次。一家人減省節約，辛勤勞動，置辦了土地。一解放，家產全部沒收。冬天，村裏道路上的雪，都是他們家的人去打掃，還經常被批鬥。

我奶奶講過一個故事。我們那裏一個貧苦農民，很會幹活，也很節儉，省下一點錢就買地買牛。解放了，被評爲富農，後來想不開，傻掉了。

聽老爸、老伯說，我家鄉的地主還沒有現在的一般人富裕，所謂富農也就是晚上有一頓飯吃。地主可能不種田，但富農還是要自己耕田的。課本上說什麼大門入小門出，那是不可能的，因爲地主的田一般也是租給自家的叔侄或同村同族的人，有事大家還得相互幫忙，不可能做出那些欺心的事，但在貧農面前有時比較強勢，那是一定的。

我外公他爸，早年在碼頭扛包，做體力活，後來用這些錢走船，賺了一些錢，回家買地，蓋大厝。蓋完第二個大厝，第三個大厝還沒有完工，解放了，被評爲地主，大厝全部被分，土地也被分。

我們鎮上的孫家曾經是大地主，號稱孫百頃。有一次，一個要飯的去他家乞討，他老婆不樂意給，他就說：“給他一口吃的吧。吃咱一口飯，給咱拉一泡屎，不損失什麼。”他的意思是，他家地多，乞丐肚裏帶著的這泡屎必定拉在他家田地裏。這個要飯的聽了這話，很不服氣，心想我不信一天走不出你家的地。走到最後，實在憋不住，就近蹲在莊稼地解決。一打聽，還是孫百頃家的地。

我爺爺家是那種小地主。當年用幾根金條買來一些地，憑證就是地契。國民政府承認清朝政府的地契，國民政府那時候也有地契，解放後共產黨就不認地契了，說土地都是國有的。問題是，你不認地契，爲什麼認地主呢？

某鎮一個大地主，愛國，抗戰時任縣自衛委員會鎮分會的會長，做了很多好事。1938年他還在鎮上建亭立碑，書寫碑文，紀念本鎮一位陣亡的國民黨少將，碑上落著他的名字。解放後，這個地主被槍決。幾十年後，這個少將被共產黨追認爲烈士，並舉行隆重的重新下葬儀式。當年那個塊石碑也找到了，重樹在墳前。可是石碑上的落款不知何時被何人鑿去了，這個被共產黨鎮壓的地主會長再也無人知道。

我家上四代以前都是地主，還是很超級大的那種大地主，周邊幾個村子的地都是我們家的。後來我二祖爺爺把家底敗光，到解放時，俺家變成貧農了。二祖爺爺是個瞎子，會算命。一是他瞎，看不見，下人都把東西偷光拿光了；二是他算出來要變天了，窮可以保命，敗光就敗光吧。

我奶奶是大地主，平時省吃簡用，買房買地，後來全部沒收了。我們小時候，哥哥成績好，可是評選三好學生總是評不上。每次評選時，總說不看成分，可是我哥哥的名字被報上去，總是因成分不好打回來。為此，班主任與校長不知吵過多少次架。

我爸爸原來成績很好，可是初中畢業了，連升高中的考試都沒參加。爸爸總在喝了酒的時候提起他的學生時代，說他的好多同學後來都做了校長什麼的。每次給婆婆、爺爺上墳，爸爸就說，有錢就自己用，不要再拿去買田買地了。小時在村裏玩，爸爸總讓我們讓著貧農的孩子，鬥地主把爸爸鬥怕了。

我奶奶說，那時村裏有一戶窮人，窮到全家只有一身衣服，誰出門誰穿。鬥地主的時候，這家人蹦得最歡，還鬥過奶奶家的人。我奶奶到老還一直笑話他家，說他家以前就最窮，鬥這個，鬥那個，鬥到了別人家的東西又怎麼著，現在還不是他家最窮？

我們那裏鬥地主鬥得厲害呀，帶高帽，敲銅鑼，扯邊豬。知道什麼是扯邊豬嗎？就是用繩子拴住左手左脚或右手右脚的大指，往橫梁上拉，人被提了起來，輕的指頭斷掉，重的指頭直接被扯掉。想想一個人百多斤的重量就壓在那小小手指頭上，能不斷嗎？

我奶奶說，她小時候，村裏的地主婆到過年的時候就挎著籃子挨家去分發白麵饅頭。

我爺爺沒出息，不是地主，是個自耕農，有空也去地主家裏做短工，去打短工的時候有酒有肉，比在自己家吃得好。本地最大的地主姓母，人稱母舵爺，聽上去比較霸道，其實人很公道和善。這位母舵爺的父親，人稱母善人，信佛，本鄉的火神廟就是他牽頭掏錢修的，如今仍在。母舵爺有一子一女，兒子被拉去當兵，出川抗日死了，女兒嫁到另外一個縣。鬥地主的時候，政府發動了很多次，人們都不好意思鬥母舵爺，最後還是發動起來，把他打死了。

我奶奶老家的地主對人很和氣的，吃完飯不洗碗，把自己的盤子呱嗒呱嗒舔乾淨，也節約水了。想像一下他們一家人圍著桌子抱著碗一起舔啊舔的美妙景象吧。土改後他們地被沒收了，舔飯碗的傳統因而更加發揚光大。

聽爺爺說，以前俺村裏有個地主，他家小孩子結婚的時候，剛好碰上下大雨，由于道路泥濘，那地主就從家裏把稻穀一擔一擔地撒在路上。

小時候聽媽媽說，她家的鄰居是地主，吃穿和村裏人沒什麼區別，夏天搬張小桌子在外面吃晚飯，充分利用自然光綫，省下燈油。有一天傍晚，吃完晚飯，地主婆收走碗筷，眼神不太好的地主發現地上有一個小黑點，便一邊嘟囔著說誰掉了醬豆也不撿起來吃了，一邊用手捏起來放進嘴裏——“呸，雞屎！”

## 我爸是貧農 祝念祖

我爺爺是地主，我伯父是地主，我叔叔是地主，可我爸爸是貧農，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爺爺的爺爺家在遼寧開源，11歲那年冬天，去水井擔水，腳下一滑，把(木)水桶摔壞了。他早就領教了他爸爸的大脾氣，嚇得離家出走，到了遼寧清原，後被一個做烏拉鞋的人收了，學得一手好手藝。做烏拉鞋的人只有一女，與我爺爺的爺爺日久生情。做烏拉鞋的病危時，把家和女兒托付給了我爺爺的爺爺。爺爺的爺爺和他的後輩們努力工作，掙了錢就買房子買地，到我爺爺那一輩，已經有 600 多畝地，34 間房子了。後來分家，爺爺分得幾間房子，幾十畝地。爺爺有三個兒子，次子就是我爸。

爺爺是個生意人，他的土地，有的租給不相干的人耕種，有的借給熟人好友耕種。生意人講人緣，任跟誰都是客客氣氣的，所以無論租借，都不是太認真。有的租地人或借地人，幾年也不給一點錢糧，說是收成不好。電影裏收租用大車，我父親和我伯伯出去收租等于要飯。趕上家裏沒吃的了，他們哥倆就拿個瓢管人家要，得說小話求人家。

土改時，我爺爺就成了地主。爺爺一生一直在勞動，按土改的另一個政策，爺爺是手工業者。當時我伯伯、叔叔 20 多歲，都是成人了，一直與爺爺在一起生活，也是地主。我爸呢，11 歲就去跟別人當學徒，土改時屬於身無分文為人打工的無產者，成了貧農。

到了我們這一輩，要入團，入伍，入黨，一外調，爺爺是地主，伯父是地主，叔叔是地主，儘管爸爸是貧農，可是社會關係有問題，那就別入伍入團入黨了，大好前程就這樣耽誤了！

## 爺爺的兩個兒子 新 年

爺爺有三兄弟，早年失去父母，到山裏投靠叔叔，叔叔收養了他們。爺爺十幾歲的時候，他叔叔給他們三兄弟三畝田，算是分了家。為生計，爺爺開始做點小生意，經常凌晨一更起床，挑著擔子走兩個小時路到縣城進貨，然後再走兩個小時路，趕回家吃早飯，不管颶風下雨，都是如此。據說有一次走夜路遇到鬼，大病一場。

爺爺非常和善，從不得罪任何人。我奶奶是信佛的人，從不說人壞話，不刁難人，一輩子吃齋念佛，誰有困難都儘量幫助。我們那一帶的人，都喜歡買他們東西，漸漸地生意好起來，成為當地的有錢人。

爺爺捨不得吃，捨不得穿，全家一天只吃兩頓飯，平時菜裏沒肉，只有客人來時才買點肉燉豆腐。父親那時候很小，有肉吃是最高興的了，爺爺有時會夾點肉給他，說：“好了，肉是客人吃的。”那時經常有土匪來，幾個人端著槍，放兩槍，把門踹開，叫把錢交出來，好在他們求財不害命。爺爺有了點錢就買田，一是為了生活，也怕下一代沒本事，有了田就有保障了。

1949 年，爺爺有三十多畝田，被劃為地主，田分給他人。據說也沒分給外人，分給了他的兩個弟弟。爺爺還有一個商店，又算個民族工商者，所以還可以經營自己的商店。那時鬥地主，爺爺經常被批鬥。有時批鬥完，拉出去槍斃幾個，爺爺僥幸活下來了。

轉眼公司合營，爺爺變成了國家工作人員，每個月有固定工資，爺爺的店鋪被國家租去

開店，每月都有房租。以前爺爺捨不得吃捨不得穿，現在看透了，捨得吃了，只是不明目張膽吃，是關起門來偷偷地吃。父親說，他小時候比一般小孩生活要好得多，很早就有了收音機。

爺爺退休後，有兩個頂替名額。那時我父親在外面讀書，我母親帶幾個小孩，上不了班，所以兩個名額都被我大伯家拿去了。大伯一家人都在供銷社上班，全變成了城鎮居民，而我們一家隨母親仍然是農村戶口。那時城鎮戶口，國家每年分給糧油，而我們家不但要種田，要交公糧，養豬還要無償交給國家，只能分到一點點豬肉。所以雖然同住在爺爺留下的房子裏，但我家與大伯家貧富懸殊。我們小時候穿得破破爛爛，而大伯家的人穿得很好。他們關起門來吃各種水果，而我們撿他們拋掉的殼吃。

這件事對我父親刺激很大，發誓要讓我們全家離開農村。父親一直讀到研究生，畢業後分到研究飛機的單位工作。現在父親已經退休了，過著快樂的日子。父親說，有一次，一個老農民對我大伯講，現在地主的後代翻身了，跑到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前面去了。我大伯說，你這個共產黨員算什麼，我們一家都是共產黨員。確實，我們這一代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共產黨。

---

補白：我的一個本家姥爺，解放前有七畝地，家裏人口不多，七畝地够生活了。同村有個沒出五服的本家，男人得病死了，留下一個臥病在床的妻子和一雙年幼的兒女姐弟，生活極其窮困。我那本家姥爺看他家可憐，就把自己家的二畝地租給他家種，每年才要五十斤地瓜幹作租子。後來那個姐姐嫁給一個外村人，那外村人參加革命，她也隨夫參加了革命。土改時，我那個本家姥爺因租地給別人種，被劃成地主，天天挨批鬥，鬥得最狠的就是那個弟弟。後來姐姐回家探親，從老娘那裏得知這事，一脚將弟弟踹出大門，坐在炕上哭著罵弟弟忘恩負義，說如果當時我那個姥爺不租地給他們種，他們家早就餓死光了，哪里還有現在。那姐姐拉著弟弟，到我那個姥爺家磕頭賠罪，並親自到縣裏把地主成分改為中農成分。

---

## 挂千頃牌的地主 濰 客

我們家鄉有個挂千頃牌的大地主。這個大地主，家裏雖然有錢，自己却極為節儉。一家人在一起吃飯，有些菜味道不好，大家都不愛吃，他就先撿大家都不愛吃的菜吃。他說，大家都不吃，菜就剩下了，再溫一頓，大家還不吃，菜就要倒掉浪費了，所以他要先吃那些菜。這老頭有很多長工和佃戶村，自己却很愛幹活，是個閑不住的人，經常穿上破衣，背上糞筐，拿上糞叉，滿世界轉悠著撿糞。過去農村人串門，憋著大便往家跑，就是為了攢肥料。用牲口套車出門，要在牲口屁股上兜一個糞兜子，不是講衛生，是攢肥。

那地主老頭出去撿糞，有時走很遠，就捎著飯，在外邊吃。這一天，老頭又穿個破襖，背個糞筐，出去撿糞了。中午走到一個村，看見十幾個用獨輪車推糞的長工在吃飯，老頭自己帶著飯，可是沒帶水，就湊過去要口水喝，順便也把飯吃了。那些長工們吃的是煎餅就鹹菜，這已經是很不錯的飯了，可是看那撿糞的老頭，吃的却是單餅卷雞蛋就香椿芽。

煎餅是用粗糧烙成的，單餅是白麵烙的，粗糧做不成。長工們就問這老頭，你一個撿糞的窮老頭，還能吃上單餅卷雞蛋？那老頭說，什麼人什麼福，這你們比不了。老頭聊開了，說自己家裏很有錢。那些長工都不信，說你那麼有錢還出來撿糞，還穿那麼破舊，都笑話他。老頭說，不是我吹，俺錢庫裏的錢，就你們這十幾個人，拿你們推糞的車子推，一天都推不

完。長工們當然不信，老頭就和他們打賭：如果他們一天能把他家錢庫裏的錢推完，那錢就全歸他們；如果推不完，他們就得給他白乾三個月的活。長工們給老頭打賭，果真一整天都沒推完。

一支鋼筆 晉 英

1970 年夏，歷史加現行雙料反革命父親被判無期徒刑，在山西省第二監獄（汾陽）服刑。父親在原籍本來有爺爺留下的老屋子，可是在那個年代，父親在老家的同胞兄弟們沒有一個願意收留我們母子三人。母親在老家雖然有爹娘、姊妹，却是地主成分，自顧不暇。萬般無奈，母親將十六歲的哥哥送回他的生父母家，然後與父親離婚，帶著我改嫁劉姓工人。有了工人繼父這棵大樹庇護，我搖身一變成爲根正苗紅的工人階級後代，轉學到新地方，沒人知道我的過去。

冬天來了，母親提出帶我去探監。當時我十歲，受大環境影響，對於有這樣一位父親，感到非常羞愧，並不想去。母親說，你爸爸來信說，特別想你，還要送你一樣東西。我不想讓學校知道此事，請假時就撒了個謊。

監獄的大門是黑色的，很高大，兩側有背槍的解放軍站崗。在接待室登了記，等了大約十分鐘，父親出來了，穿著灰色囚服，帶著灰色有檐帽子，樣子很難看，一點也看不出原來的模樣了。父親英俊的面龐消瘦得很厲害，整齊的頭髮也不見了，從帽子周邊看，好像被剃了光頭。父親勉強擠出一絲笑意：“你來啦？”母親也是很不自然的表情：“來了。”“幹活累嗎？”“不累。在車間只幹半天，剩下的時間他們讓我做會計。”母親默然遞去一個小包袱。父親解開包袱皮，裏面是母親親手做的父親愛吃的東西，幾個燒餅，老鹹菜，鹹雞蛋，還有一包香烟和一本稿紙。

母親對父親說：“事情已經這樣了，在這裏好好改造，不用再寫那些東西了！”“還是得寫哩，總有人能幫助弄清楚這件事。”母親嘆口氣，不再說什麼。

“秀秀，過來，爸爸給你一樣東西。”我很不情願地往前挪了挪，離父親還是有老遠的距離。父親從上衣口袋裏取下一隻鋼筆，遞給我：“秀秀，好好學習，以後好好做人，不要做對不起人民的事。”“聽爸爸的話，快拿上。”母親催促著。我手伸出去，接過筆，心裏老大不滿意，不明白一個反革命分子，還有什麼資格教育別人。我更不明白的是，在監獄裏，有什麼好寫的，用那麼多的稿紙。

十分鐘的探視，我覺得好漫長。終於時間到了，有人提醒要爸爸回獄舍，要我們出去。父親默默起身走了，母親也默然拉著我離開。整個探視過程，我沒說一個字，只是從監獄出來手裏多了一支鋼筆。

出了監獄，走在冬日的陽光下，我才仔細看手裏握著的鋼筆。這是一支老式鋼筆，我認出來了，是父親用了許多年的那支鋼筆。我一直想要的這支鋼筆，曾經多少次，我趁爸爸不注意，偷偷用它寫字。爸爸說過，等我上小學三年級，就給我買一支鋼筆。明年我就要上三年級了，爸爸還記著這個許諾。雖然鋼筆是我久已想要的，可是我對父親給的禮物並沒有什麼表示，甚至連一聲爸爸也沒叫，我只是怨恨他爲什麼成了一個反革命。

1975 年，父親的冤案得到平反，我才明白那些稿紙是父親用來在監獄裏寫申訴書的。父親送我的那支筆，陪伴著我。現在父親的那支筆就存放在我的鉛筆盒裏，鉛筆盒就放在我梳妝檯的抽屜裏，每每我會拿出來看看。—————

在惡面前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是惡。 焦國標書

—————

那天我提著竹籃子到鄉糧管所找我父親拿鑰匙，臉上長滿肉刺的老田看到我竹籃子底上墊有一張印有“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語錄，就說我是小反革命。我頂他一句，他便拉著我去公社，邊走邊說：“你把最高指示墊在籃子底下，你可知道犯的是啥罪？”

我說：“犯啥罪啦？竹籃子沒有底了，我去地裏挖野菜，墊張紙防漏，犯啥罪啦？”老田眼一瞪說：“你是現行反革命！”他過來奪我的竹籃子，我拼命往後退。他一把抓住我，把我和竹籃子一起提了起來。他把我拖到公社革命委員會門口，我忍無可忍地罵了他一句。這時父親跑了過來，邊跑邊喊：“田主任！田主任！孩子小不懂事，你不要和他一般見識！”

老田放下我，質問父親：“你孩子敢用最高指示墊竹籃子，是不是你指使的？”我趁機逃脫，站在不遠處，抹著眼淚罵老田。正罵著，我從指縫間看到父親突然扭過頭，直奔我來。我感到不妙，轉身就跑。我當時才七歲，怎能跑過父親？跑出不足二十米，父親已經到了我身後。我回頭看到父親凶神惡煞般的面孔，我絕望了，不跑了。父親拽住我的耳朵，我疼痛難忍，大罵老田！我感覺耳朵要被父親擰掉，大叫求饒，父親却不鬆手，越擰越緊，我昏厥過去。

時光荏苒，我上學、當兵、參加工作，一直對父親耿耿于懷，不願和父親多說一句話，父子感情一直不融洽。歲月無情，父親一天天變老，也變得越來越想和我接近，但一種有形無形的力量一直橫亘在我與父親之間。父親，我的親生父親，竟那樣對我，我實在想不通。多少個日夜，我輾轉反側，心裏在問：“父親，你是我的親生父親嗎？對我下那麼狠的手！”

臨終前的那天晚上，父親說：“我這一生最對不起你的就是在你七歲的時候，你罵糧管所的老田，我打了你。”這時的我不吃驚，但心顫了一下，說：“你還記得？”父親說：“記得！是我錯了！”父親流著眼淚解釋說：“那時老田是造反派，我在他手下上班，我如果不那樣打你，咱家就可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我無語。幾十年的父子恩怨在父親臨終前解開了。但願那樣的年代永不再來，那樣的事情永不再發生！

---

補白：一九五二年鎮反時，我在天津鐵路中學讀初二。一次，學校組織學生參加區裏組織的公審反革命分子大會，程序是先由武警把五花大綁的幾個反革命分子押到主席臺前，面對觀眾站立，然後分別宣布其罪行和判決，最後在就近的空地上立即執行，並組織群眾參觀。不久，我班楊同學的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關入牢獄。父親被關後，楊母帶著四個子女，沒有生活來源，靠親朋接濟和幫人洗衣維生。後來楊同學在京走讀，升高中時考入北京八中（北京名校）。高考時，其分數可入北大、清華，因其父的問題，只讀了個不知名的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畢業後分到農業口工作。時隔五十五年，校友集會，得見楊，並聽他講了其父的結局。楊父原是國民黨軍隊的下級政治教官，解放戰爭臨結束時提前轉業，由山西回到北京，在鐵路中學當教師，五二年鎮反時被捕，判刑十五年。出獄後不到兩年，文革開始，鬥爭黑五類，楊父自覺挺不過這一關，服毒自殺。鎮反涉及人數達二百萬，其中殺七十多萬，關押一百二十多萬。近年媒體上常看到鎮反時被殺的一些名人或名人親屬得到平反昭雪，如朱自清之子，金庸之父，以及三十八名國民黨將官。平民百姓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我那個楊姓同學的父親只是國民黨下層政工人員，誰替他平反昭雪？

曲老爺子

---



1952 年春，災難突然降臨到我們這個原本幸福的四口之家。在四川川南人民法院任審判員的父親，因曾在原中央大學上學和在民國法院工作期間參加過國民黨、青年軍，並擔任一定職務，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判處勞教 5 年。父親被判刑後，母親成為反革命家屬，在四川舉目無親，兩個幼子又經常生病，無奈之下，只好辭掉川南法院書記員的職務，回到鎮江我外祖父家。當時哥哥 3 歲，我 3 個月。

外祖父是鎮江的開明人士、商會理事，五進的房產都作為藥材行公私合營了。母親帶著我和哥哥投靠外祖父，全家 8 口人住在一個 50 多平米的屋子裏。1956 年，外祖父因腦溢血突然去世，兩個小舅舅與我弟兄倆年齡相仿，外祖母和我母親成了家中的頂梁柱。

當時鎮江小學教師奇缺，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的母親就當了一名小學教師，且一干就是 26 年。1956 年，她的工資定為 44 元 5 角，因丈夫是反革命，直至 1979 年退休，幹了 20 多年，還是 44 元 5 角。父親 5 年勞教期滿後，仍然不得回家與親人團聚，又在原勞教農場工作了 5 年，每月近有 20 元的生活補貼。

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母親都不可能也不敢帶我和哥哥去四川看望反革命父親。為了滿足父親渴望見到孩子的心願，每年兒童節期間，母親都帶我們弟兄倆到照相館拍照片，寄給父親。父親在四川的 10 年中，也給我們寄過兩張照片。這就是 10 年裏母親和我弟兄倆能夠看到的父親形象。

反革命父親給我弟兄倆的童年帶來說不盡的痛苦，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和同學罵我們是野孩子、狗崽子，我們沒有資格當班幹部。童年的逆境和母親的教誨也給了我和哥哥上進的動力，從小學到中學，我倆始終是班級和學校品學兼優、特長明顯的好學生。因父親是反革命，小學畢業時，我倆都不敢報考重點中學，先後報考了不太重視家庭出身、以升學考試成績排學號的鎮江二中，我和哥哥的學號分別是班級的 1 號和 5 號。

1965 年，哥哥連普通高中都不許上，只能到鎮江蠶桑耕讀學校半工半讀。1969 年，我和哥哥一起上山下鄉，上學、招工、參軍皆與我們無緣。粉碎四人幫後，哥哥和我才先後回城，入黨。

---

補白：1958 年 10 月，上級命令下來了，讓海晏縣（青海省）成分不好的幾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 600 公里外祁連縣的蘇勒托萊（今屬天峻縣和祁連縣，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壞人，牲口被沒收了，每一戶只讓趕五頭牛，到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戶只趕兩頭牛。幹部們拿著槍來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別的啥也不讓拿，說到了那裏啥都有哩。誰要是回頭看一下，幹部就舉著槍問：“你看啥哩？”哪個不走，就威脅要就地槍斃。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茶吃點什麼，他們就拔出槍唰唰唰地壓上子彈。走到一個大坂上的時候，人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從庫庫淖爾（青海湖）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蒙古老人們一個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坐著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孩子們也習慣了，在老人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就把老人扔下了。到了祁連縣後，海晏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溝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親人不能相見。每天食堂裏隊長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第二天肯定就能在灘上看見他的屍體。有的人頭枕石頭死掉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裏死掉了，滿灘都是死人。

洛布丹

---

## 師生情 王 波

安徽省太和縣李興鎮南謝莊村北新立一塊墓碑，上刻“恩師謝玉璧師母王興榮之墓”。立碑那天，陽光下的綠色麥田裏，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年紀最小的也已 68 歲，站在墓前發出一片此起彼伏的啜泣聲。

謝玉璧的兒子謝樹秋是個農民，從來沒想過要給父親立碑。“已經死了 50 多年了，沒必要了。”兒媳孟玉華，對公公謝玉璧幾乎一無所知。1974 年嫁到謝家時，謝玉璧已去世 16 個年頭。

朱守仁老人第一次找到孟玉華，告訴她想給謝老師立碑，遭到拒絕。“俺不認識他，俺沒同意。”沒幾天，朱老頭又來了，說這個碑一定得立，孟玉華依舊沒同意。鄰居勸她，學生給老師立碑是好事，讓他們立。

這位 73 歲的立碑發起人朱守仁，退休前是付集小學的語文老師。他在悼詞裏寫道：謝老師是“偉大中的偉大，一流中的一流，不是慈父，勝似慈父”。59 年前，小學四年級學生朱守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班主任，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謝老師，教語文和體育，個子不高，皮膚黑裏透紅，穿著一身天藍色中山裝，不苟言笑，講起課來却非常生動。“教《小英雄雨來》時，他還給我們示範雨來捉鬼子的動作。”

有一天朱守仁病了，謝老師提著一兜雞蛋到他家探望，用手撫摸他的額頭，還吩咐他媽趕緊給他做雞蛋湯。50 多年裏，關公眉、大眼睛的謝老師多次進入朱守仁的夢裏。

班裏一個男生沒錢理髮，謝老師馬上從口袋裏掏出兩毛錢，讓他去理髮。但是一毛七一塊的肥皂，謝玉璧卻捨不得買。學生孫光亮至今記得，謝老師把草木灰裝在籃子裏，從上面澆水，下面接住，沉澱後用來洗衣服。

體育課有 3 個項目，籃球、跳遠和單杠。籃球架是謝老師找木匠做的，單杠是把打兔子用的土槍上的鐵管抽出來，固定在兩個木樁上，跳遠用的沙坑，謝老師自己挖，自己從河裏挑來沙子。“這些都是謝老師自己設計自己弄，他在黃埔軍校讀過書，知道怎麼弄，別人都不會。

謝玉璧原來叫謝玉備（當地 bi、bei 不分，謝玉備死後慢慢被寫成謝玉璧），生于 1924 年，1943 年進入黃埔軍校西安分校，1946 年 6 月畢業，分配到國民黨 36 軍 28 師 83 團三營九連任少尉排長、中尉副連長，代理連長 3 天即被“解放”。在解放軍裏學習 6 個月後，留在四川部隊。1950 年回鄉，在二郎小學任教，兩年後調到付集小學。就是在這所小學，謝老師在他的學生們心目中留下了永生難忘的印記。1955 年，付集小學有 7 名學生考上縣重點中學，而此前 3 年，該校考上縣重點中學的學生才有 6 個。1956 年，謝老師的學生有 11 人考上縣重點中學。1957 年，這個數字增加到 12 個，超過了李興小學。

因教學成績顯著，區書記點名把謝玉璧從鄉小學付集小學調到李興區中心小學李興小學。這似乎是一件好事，可是也可能埋下了日後的禍根。“他要是還在付集教書，可能就不會被打成歷史反革命。他在付集威信高，把他打成反革命，學生不願意，學生家長肯定也不願意。”孫光亮分析說。

謝玉璧到區裏工作僅一年，太和縣的一個領導就說，謝玉璧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副連長，還代理過 3 天連長，不能當老師。這個深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就這樣被開除回家。1958 年 8 月，太和縣法院判謝玉璧為歷史反革命，管制 3 年。“那時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在部隊是連長，在地方上是區長。那時區長相當於現在的正科級。”

謝樹秋不願多提“黃埔軍校”這四個字：“我父親如果上的不是黃埔軍校，也不會這個樣子。”父親辭世時，謝樹秋7歲。他至今記得，父親每天跟在犁後揀犁出來的紅薯，還有人專門看著，防止愛面子的他自殺。

1958年農曆九月的一天早上，丈夫不見了，妻子王興榮問女兒謝樹英：“你爹人呢？”家人趕緊找，找一圈沒找到人，謝樹英却找到了父親留給母親的一份遺書：“小周(謝樹秋的小名)他娘，你是個苦命的人。我死後，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響社會主義拖拉機犁地。也別燒紙錢，把錢省下來給孩子們生活。”把遺書交給母親，樹英繼續找，最後在屋後大坑邊桃樹上看到父親吊在上面。

謝樹秋當時在李興小學一年級教室裏上課，比他大3歲的一個堂哥把他叫出來。“他告訴俺，俺大死了。俺當時就哭了，覺得自己沒大了。”

謝玉備自盡後，王興榮從鄰家買來一口棺材將他下葬。謝老師去世的消息陸續傳到付集的學生們那裏。謝明義、劉泮廷、劉泮修等幾個學生，一起走了20多裏路，到老師墳上燒紙，哭了一場。朱守仁當時已上中學了，幾個月後得到老師的死訊，一邊往學校走一邊哭。孫光亮正擔任青年團的書記，不敢有任何表示。謝老師自盡並沒有引起太大震動，因為那時被管制的人太多，自盡的也不只謝玉璧一人。

丈夫死了，妻子和4個兒女都成了反革命遺屬，在家接受管制。王興榮的弟弟王興華，在姐夫死後跟姐姐家很少來往，可是每次填表，在社會關係那一欄都得寫上“姐夫當過國民黨連長”。謝樹秋發現，父親生前為村裏人家用正楷寫的中堂對子“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建設祖國錦綉河山”，也悄悄被撕掉了。

文革中，人們敲著鑼鼓打著鑼在集鎮上游行。有人告訴謝樹秋，那些東西是他父親活著時親自去買的。那一刻，他突然覺得特別想念父親。父親的音容在謝樹秋的記憶裏已經模糊，父親留在家裏的照片和書早被母親扔了，與父親有關的一切幾乎都被清除，甚至包括父親的名字。

家裏沒捨得扔的是謝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鋼筆。那時公社成立搜查突擊隊，不管家裏有人沒人，隨時進家，打開房門亂翻。謝樹秋把父親遺留的那身洗得發白的中山服穿在裏面，得以逃過搜查，父親留下的那支筆却眼睜睜看著被“突擊”走了。

1980年開始甄別平反，29歲的謝樹秋隨即寫了申訴書。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檔案，沒有父親的檔案。6年後，他們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檔案查一遍，仍然沒有，後來最終在縣法院的檔案裏找到了。這年9月1日，太和縣法院下達判決書，認定謝玉備“雖代理連長3天，仍是副連長職務”，“當不構成反革命身份，屬一般歷史問題”。謝樹秋用藍墨水鋼筆抄下了這份判決書。憑著這份判決書，母親每個月有了25元的遺屬補助金，直至2007年去世，當時補助金已漲到120多元。

父親被平反後，謝樹秋從姐姐謝樹英家裏找到了父親留下的最後一張照片，平頭，穿著白襯衫。謝樹秋用相框把照片夾起來，掛在中堂。後來母親王興榮悄悄把這張照片毀掉了，謝樹秋不知何故。謝玉備或謝玉璧的形象，從此在這個世界不復存在了。不過，在謝玉璧那些年邁的學生眼裏，他們心中那個謝老師的形象，50多年來一直不曾模糊。

---

補白：1949年春，村裏（河北魏縣）劃分農村階級成分，採取“自報公議，三榜定案”的辦法。我叔叔把他家報成破產地主（當時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把我家也報成了破產地主。1940年初，父親患急病，才30多歲就去世了，當時我不滿5周歲。同年，叔叔與我們分了家。土改時，我不滿14歲，正在離我村八裏遠的回隆鎮住校讀高小，我和有病的母親都不懂得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政策界限。就這樣，我家就定成了破產地主，也成了我的家庭出身。

祝偉坡

---

## 父親的日記 周 方

父親記日記不是每日必錄，而是只記錄重大事件。因此，他的日記斷斷續續，往往隔很久才寫一次。我也記過一些日記，但大多是換了新環境開始記幾天，之後就停止了。我記的最長的日記是在駐新華社達卡分社期間，當時急于學習孟加拉語，大多數日記是用孟語寫的，現在我再看自己那個時期的日記，還得依賴孟語詞典。

父親 56-68 年期間的那本日記給我印象太深了，其中記載著太多的鬱悶、憂愁和痛苦。父親曾經是個熱血青年，40 年代初高中畢業後，曾計劃去大後方重慶讀大學。過長江時，錢全弄丟了，只得作罷。1943 年，父親考取金陵農學院，不久發現是汪精衛政權辦的學校，遂領頭鬧事，結果被開除、通緝，落荒而逃。46 年父親同時考取北大和復旦，上了北大司法組。48 年底，父親嚮往革命，毅然放棄北大，投奔哈外專。49 年參加工作後，父親曾長期陪同蘇聯專家建設一汽、南汽等大型項目。父親工作勤奮，很快受到重用，成為專家翻譯組負責人。

父親曾長期積極要求入黨。因申請入黨，父親把自己的歷史交代個底朝天，於是組織上從雞蛋中發現了骨頭，認定他是歷史反革命，交群眾監督。父親政治上一落千丈，每次政治運動都跑不了。父親日記裏認為，一汽的這個結論太不負責，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1957 年反右，父親 34 歲。大鳴大放一開始，他就注意到一些人的言論過於右傾，認為“有問題”。反右開始，父親上臺揭發一位老同學、老同事的右派言論。起初他心裏也覺得把那位老同學打成右派太重了，但後來很快自我批評，對階級敵人不能太溫情。政治太可怕了，連我父親這樣善良、一直遭人欺負的羔羊都會咬人了。反右運動之後，父親的心情徹底灰暗了，從此再沒“神氣”過。

1960 年，父親對我的出生給予“亦喜亦憂”的評價。憂什麼呢？遺憾的是這篇日記的後幾頁撕掉了，想必是當年父親被政治運動搞怕了，擔心別人看到什麼，自己主動撕了。我 6-7 歲時，有一天半夜來了一大堆紅衛兵，戴著袖章，要抄我們的家。我驚恐地站在床上，看著他們翻箱倒櫃，把許多書和照片都拿走了。

父親的日記顯示出他對政治運動並不反對，而且還積極投入其中，認為自己應該加強政治思想改造。似乎到了 1963 年，他還對入黨抱有幻想。他的日記中充滿了自我批評，一再批評自己太消極，沒能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云云。

文革結束後，父親成為離休幹部，政治待遇與過去有了天壤之別。但他仍然是個極其低調的人，對政治上的事情輕易不發表看法，偶爾講兩句，大多輕描淡寫，只是從他的日記裏仍能感覺到知識分子臭老九不服軟、不迷信的那種倔強勁兒。90 年代時，父親還經常說自己要寫一本回憶錄，名字叫作“一個知識分子的經歷”，我也曾鼓勵他寫。不知為什麼，他始終沒有完成這個心願。現在看他的日記，我發現他似乎一直在準備寫這本書，做一些基礎資料準備，但一直沒有真正動筆。

---

補白：1968 年 7 月，我妻子到醫院生孩子，填登記表要寫家庭出身和個人成分，醫生和護士一看是“富農”，就冷眼相待。我拿著孩子的出生證到派出所上戶口，工作人員把孩子的家庭出身填寫成“地主”。我說我參加革命工作和加入中國共產黨都 10 多年了，共產黨員怎麼能生出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兒子？那個工作人員回答很乾脆，而且理直氣壯：

姑爸舅的三角親 瓜外蟲

一天晚飯的時候，哭成泪人的姑姑突然出現在我家廚房門口。還沒等奶奶問明白，姑姑就對著父親罵個狗血噴頭：“都是爲了給你死娃子換個媳婦，讓我嫁給那個邇邇鬼、窩囊廢。你死娃子好了，一家子高高興興過日子，把姐我一個人扔到火坑裏！”姑姑邊哭邊罵，越罵越哭。父親端著一碗剛盛的紅薯稀飯，站在廚房門口楞楞的，低著頭一言不發。母親趕忙放下碗筷，張羅著勸阻姑姑的怒氣。

姑姑的一頓怒吼把我嚇得萎縮到堂屋門後不敢露頭。剛有朦朧意識的我，似乎明白了肯定是姑姑和姑父吵架了，肯定吵得很凶，姑姑委屈到了極點，不然她不會在很晚的這個時候回娘家，並且無緣無故地把怒氣撒在我父親頭上。害怕之餘，我有些迷惑，爲什麼姑姑和姑父吵架了來罵我爹？還說我媽是她換來的？我媽就是我媽，還用姑姑換？她拿什麼給我換回的媽媽？是雞蛋還是黃豆？我當時的常識是，想吃西瓜或是冰棍，就用家裏的雞蛋或糧食去換，有時候是自己帶著弟弟妹妹瞞著大人偷偷拿雞蛋去換冰棍。

有一年臨近春節，姑姑的公公去世，我隨爹媽去吊唁。當時我最喜歡參加這些婚喪嫁娶的活動，有白饅頭吃，有茶葉水喝，還可以燃放鞭炮，有很多小夥伴在一起玩耍。在孩子眼裏，哪管它是紅喜還是白喪，有得玩就是天堂。更讓我高興的是，那次我不僅見到了姑姑家的表姐和表弟，也見到了大舅家的兩個表姐。

年齡稍長一歲的大舅家大表姐帶著我們這幫烏合之衆瘋狂玩耍，或圍觀噴吶班子聽哀樂，覺得沒意思後又去撿拾鞭炮點放，看大人們誇張的哭，我們在邊上竊喜。大表姐突然下令讓我們按高矮排隊，她兩手舉著兩個大白麵饅，要給大家分白饅。我當然不會聽從命令，我認爲我和大表姐最親，她應該先分給我。可是鬼機靈的小表弟不聽話，搶先抱著大表姐的胳膊說：“先給我，因爲姑姑最喜歡我。”我說：“應先給我分，大舅最喜歡我。”我和小表弟開始推搡起來，小表弟急哭了：“她是我親姑姑家的表姐，我們最親，你是我大舅家的孩子她不親你。”我也當仁不讓：“她是我親大舅家的表姐，她最親我，你是我姑姑家的孩子，不會親你的。”大表姐這時候也楞那裏了，雙手舉著饅頭不敢放下，也不知道如何分是好。

喪禮完畢回來的路上，我問我媽誰是小表弟的姑姑，媽媽回答說，我大妗子就是小表弟的姑姑。這很奇怪，我大妗子是小表弟的姑姑，我姑姑是大表姐的大妗子，我媽媽又是小表弟的大妗子？這個問題像是一道高難度的應用題困惑了我很多年。之後我多次向媽媽提出這個困惑，老媽每次總是慚慚的避開。這是爲什麼呢？

我上學了，也讀了些書，壓在童年心靈上的問題恍然有些解答：可能因爲家窮，爹到了結婚年齡沒有姑娘願意嫁給他，外婆家也很窮，姑父的爹家也是窮鬼，不但爹不能娶媳婦，大舅和姑父也娶不到媳婦；當然，窮不殺情，天不斷愛；爹有個姐姐，大舅有個妹妹，姑父有個姐姐，經媒人撮合，成了這六人同喜的三樁婚事。後來就有了我們表兄妹九人：大舅家大表姐、二表姐和表弟，姑姑家大表姐、二表妹和小表弟，我和我的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再回想姑姑痛罵父親那件事，我也就明白了爲什麼姑姑說我媽是她換來的，是拿她自己換來的，不是拿雞蛋黃豆換來的，也解開了小表弟和我在大表姐面前爭寵的困惑。

自己解開了這個曾經壓在自己小小心靈上的迷惑，我感覺很了不起。有一年暑假，和爹在棉花地裏逮蟲子，我把答案告訴爹，一方面是向爹展示自己，通過讀書學習，我可以推理

解決問題了，另一方面想讓爹證實一下我的推理是否真確。爹說我說的對，但不完全對。他說確是因為家裏窮，娶不到媳婦，才走這換親的渠道把我媽娶進門的。之後爹便不再說話了，他說他要到地頭喝口水，走了。爹說話的口氣裏略顯一絲驚悸。

爹的回答讓我剛剛自覺聰明驕傲的情緒一下子涼了下來，爹媽的婚姻在我心裏更增一層神秘。因了媽曾經的慚慚的神態和爹的一絲驚悸的口氣，我再也不敢有從他們那裏把這層神秘面紗揭開的妄想了。

讀完中學，我到北京讀大學，然後工作，結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一晃 20 年過去了。但是關於爹和媽婚姻的神秘，一直藏在我心裏，我一直試圖弄明白當年他們三角大換親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你家的成分是地主。”這是大一寒假回家鄰家二爺告訴我的。“你爹小時候上學可聰明哩，可是上到小學三年級就死活不去了，他害怕每天遭同學們叫他‘小地主’。他們經常成群打他，還偷他的文具。你爹發現後，那幫孩子明目張膽地說：‘地主家的東西都是剝削來的，就應該瓜分掉。’你爹受不了那個氣，就死活不讀書了，可惜了他。”我突然明白了媽的慚慚和爹的驚悸，那可是地主帽子摘掉六年之後的事了，我不諳世事的冒昧曾經讓他們一想到當年的地主身份仍然內心顫栗。

2009 年初，爹大病治癒後，我把他接到北京來，好好飲食調養。爹每天在家看電視，說是把前半輩子的電視都補回來了。“從鄧小平上臺後，國家變化可真大。”爹說“從鄧小平上臺”時，我看到他眼中有喜悅閃亮。我明白爹說這句話的意思，爹想說的是他那頂小地主的帽子也在那時被摘掉了。

我從爹喜悅閃亮的眼神裏得到鼓舞，我想這個時候我可以求證他和母親及姑姑和大舅他們三角大換親是否與地主成分有關。于是我試探地問他：“我外婆家和姑父家以前也是地主？”爹這次沒有躲閃，只輕輕看我一眼就回答說“是”。“不過他們兩家都是小地主，解放前有半公頃地。你外爺和你姑父他爹都是獨苗，家裏人丁單薄，就請人種地，解放後就給扣了個地主帽子。咱們家雖然土地也不多，有那麼兩三公頃吧，你老爺（曾祖父）身體不好，做不動農活，你大爺（伯父）又在外當兵，你爺爺在保裏做副保長，所以自己家的田地只能請人耕種，土改時就把你爺劃成地主了。”

這可是爹第一次講到我們的家史。也許爹懂我這麼多年的心事，他把話題直接轉到我媽身上了，他要給我解開我幾十年的迷惑。

“那時候我和你大舅還有你姑父都該結婚了，可是沒有人願意把女兒嫁給地主家的。後來經過和這三家都沾邊的遠方親戚說媒，促成了我和你媽、你姑姑和你姑父，還有你大舅和你姑父的姐姐，就是你大妗子，我們六人的婚事。那說媒的親戚也是地主成分，根紅苗正的人家不會管地主家的事情，那些人躲閃地主都來不及。”我插問道：“那時，是不是這三家也很窮？”“窮得很，地主家有再多的產業也早被瓜分完了。那時候家裏都靠掙工分，你爺爺他們經常被拉出去批鬥，哪還有時間和精力掙工分，所以那個時候地主家更窮。”

困擾我二十多年的關於爹和媽的婚姻迷惑終於得到了最正確的解答，我輕舒了一口氣。然而父親的話還沒有結束：

“我和你媽結婚的時候，所有的嫁妝只有那個紅漆木盒子，你姑姑和你大妗子的嫁妝也是這同一個木盒子。”我有些吃驚，問：“怎麼回事？”父親解釋道：“媒人和這三家都說好，結婚的時候都不要彩禮，也不陪嫁妝，都用你外婆家新做的一個木盒子作為三家女兒唯一的陪嫁品撐面子。你大舅和你姑父的姐姐先結婚，因為他倆歲數大，他們就用這個紅漆木盒子作陪嫁品。半月之後你姑姑和你姑父結婚，你姑姑的嫁妝仍舊是那個木盒子。到了 1975 年臘八節那天，我和你媽結婚，你媽的嫁妝依舊是那個紅木盒子。我們最後結婚，那個木盒子就落在咱家，成了咱家的財產了。”

我還記得那個紅漆木盒子，小時候我用它養過白兔。

這是一個與自己如此貼近的辛酸、真實故事，這也是一個幸福的時刻，一位年過半百的老父親在給他的三十大幾的兒子講他的婚姻故事。

### 三個兒子三顆星 王昌鵬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給三個兒子起的乳名都帶“星”字，期盼他們將來都能發光。但那時地主成分壓得我抬不起頭，我的願望只不過是個白日夢。

1979年1月29日，我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這一天，報紙上說國家會儘快解決地富分子摘帽的問題和地富子女的成分問題。聽到這個好消息，我高興得兩宿沒睡著覺。2月22日，我摘掉了地主帽子，從此一身輕鬆。現在，我的三個兒子一起組建的山東三星集團，利稅近2億元。2008年3月25日，他們集團還在美國上市了。我盼兒子都能發光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我原來是泥瓦匠，是踩百家門的手藝人，威信很高，所以鄉里鄉親不好意思鬥我。苦累咱都不怕，就怕別人另眼看。開會的時候，我總是蹲在最後頭，從不敢多說一句話。因為家庭成分高，我岳父家的成分也高，親戚都不敢跟我們走動。

我的大兒子王明峰，僅上到小學就不能再上了，14歲就到生產隊勞動，什麼髒活累活都搶著幹，只是期望人家給個好評價。至今他一有時間就自學，看到不明白的原理什麼的就難受，做夢還是在聽課呢。我的二兒子王明星當兵體檢，身體合格了，可是政審家庭成分高，被刷下來了。

沒摘帽時，我愁三個兒子找不到媳婦打光棍。1982年，王明峰找上了媳婦。他揚眉吐氣，渾身有使不完的勁，一門心思儘快富裕，找生產隊隊長擔保貸600塊錢，冒雨跟他二弟到張店去買電焊機。在公路邊，用四根棍子支起一個棚子，就開起了維修部。掙了錢就買工具，擴大再生產，到1994年，他們一年能掙20多萬。

三個兒子甩開膀子大幹的時候，我還提醒他們：“够吃够喝就行了，別再鋪攤子了，政策說變就變，不是有句話說十年再來一次嗎？再來場文革，還不得挨鬥啊。”兒子們却認定，政策不會變了。

我現在一家16口人，四世同堂沒分家。孩子們的生意做得挺好，企業固定資產將近30億，老大是集團董事長，老二是總經理，老三是常務總經理，孫子、孫子媳婦一共有6個是留學生，真是夢都夢不到啊！

現在王明峰還對我念叨說，他想搞個“三星博物館”，把他們發展的艱難歷程記錄下來，大家吃了不少苦，都十分珍惜現在的機會。三兄弟趕上了好時代，我一直跟他們說，回報社會是我們應該的。他們做得很好，汶川大地震，他們公司員工捐款捐物30多萬，給慈善機構捐款200萬元，每年老人節都為村裏老人捐款10萬元。看著三個兒子三顆星，我高興啊。

---

補白：解放初，共產黨在金華縣馬安山村設立管訓處，收容從四面八方送來的各色人等，住在金氏祠堂和地主家的木樓上，不准與外界接觸，當地百姓統稱這批人為“地匪”。起初，上午這些人被帶到小山坡上開荒種糧，下午在規定範圍內自由活動。不久，自由活動取消，

改為集中訓話，然後就宣布幾個重犯死刑，就地槍斃。後來，這些人白天被押解去挖坑，夜裏解送死囚，用機槍掃殺掩埋在挖好的坑裏。因槍斃的犯人太多，埋得太淺，致使狼群成災。那時我在距該村六七華里的寺後王小學教書，夜裏經常聽到槍殺地匪的聲音。再後來，我做了該村的女婿，接著又在該村監督勞動二十年，直到 1996 年離開。我在該村勞動期間常碰到狼，有一天夜裏，單獨到小山坳裏放水，竟遇到四隻狼。據說馬安山管訓處大概槍斃了一千五百名左右地匪。一位婦女探得丈夫已死，當晚在村西饅頭山上的柏子樹上縊死。

鄭明桂

---

## 地主家的喜酒 余 姚

楊柳村農民楊老漢，解放前勤勞致富，買了幾畝地，土改時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背上了沉重的黑鍋。膝下一兒一女，兒子長大後，白面書生，一表人才，耕犁鋤耙，無所不會，成了村裏種田的好把式，上門提親的人與日俱增。文革初期，當局頒發公安六條，楊老漢一下子被劃進反革命隊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造反派，在楊老漢的大門兩旁用黑漆刷上一副對聯：“只許你規規矩矩，不許你亂說亂動。”前來相親的人一見黑漆標語，扭頭就走了。那年頭，誰還敢跟地富反壞右結親啊。

到了 1969 年，楊老漢的兒子三十出頭了，仍然是光棍一根，楊老漢心急如焚。然而就在此時，鄰村一個富農的女兒竟看上了楊老漢的兒子。經過一段時間戀愛，婚事很快定了下來。這年臘月，他們選定一個黃道吉日，給兒女完親。

“楊柳村地主楊老漢兒子結婚大辦喜酒，朝南坐的全是一夥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一個個劃拳行令，喝得正得意忘形呢！”消息立即傳到公社革委會，造反派起家的汪副主任從沙發上一躍而起：“大批判小分隊馬上集中，跟我走！”

熱烈的喜宴被叫停，所有親友都被趕到村裏的社場上，一場革命大批判開始了。三代貧下中農出身的汪副主任不愧為階級鬥爭的老手，他別出心裁地下令每一個參加酒宴的親友將自己的成分報將出來，如有隱瞞，嚴懲不貸！都是附近三裏五村的，誰敢隱瞞自己的成分啊。耷拉著腦袋的幾排人一一報過去，參加酒宴的親友十之八九十都有成分問題。

“這叫魚親魚，蝦親蝦，烏龜親王八！我早就料到，地主家辦喜酒，來喝喜酒的沒有好東西！現在貧下中農都移風易俗，你地主富農成親憑什麼大吃大喝大辦宴席？烏龜王八蛋憑什麼一個個朝南坐？來人，給我把所有的飯菜酒全都倒入浴缸，叫他們吃個屁！”

一聲令下，大批判小分隊成員個個動手，五六桌的雞鴨魚肉，熱炒冷盤，白酒黃酒，全被倒進大浴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辦了這麼幾桌酒席的楊老漢一家和所有的親友們，無不目瞪口呆。

五六十位親友在接受一場羞辱至極的批鬥後，喜酒沒吃成，餓著肚子一個個灰溜溜地離開了楊柳村。新媳婦雖然賢慧，怎忍得住這般打擊，一氣之下，也跟著父母跑回了娘家。

---

補白：我的曾祖父是山東章丘的地主。有一年春天，青黃不接鬧災荒，很多人餓得活不下去。我家門口有兩棵榆樹，樹上長出榆錢。那天，曾祖出門，看見有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正往樹上爬。他喊道：“下來！”那女人嚇壞了，灰灰的來到曾祖父面前等候責罵。曾祖問她：“你啊，幾天沒吃飯了？”“兩天了。”“你爬這麼高，萬一暈了掉下來怎麼辦啊！”曾祖讓人回家拿了兩個餅子，遞給她，說：“吃了再上樹，這樣就不會暈了。”我家當時是



生產布匹的，從外地購來棉紗，分給家鄉的一些個體戶做外加工，付給加工費，最後銷售。那一年也是個災荒年，外加工的一些個體戶甚至不得不賣兒賣女度日。有一天，我曾祖準備了幾桌酒菜，把那些個體戶請到家裏來。大家都以為是鴻門宴，不知有什麼壞事等著自己，沒一個敢動筷子。曾祖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便說：“你們放心吧，今天請大家來，沒有別的事，只告訴大家，前面各位欠的棉紗錢今天一筆勾銷，走的時候每人再帶走一斗米，咱們共同度過災荒。”大家聽了，紛紛給我曾祖跪下磕頭。災荒過後，那些個體戶又重新振作起來。他們欠老掌櫃的棉紗錢，不但不一筆勾銷，反而加倍送了回來。直到今天，家鄉的老人們還談我曾祖父的這些事。

---

不識數的婉英 鯉 紫

志財家過去是地主。我爸說，他們家是苦地主，種田比長工下力，吃的比長工還差，省死省活買田置地。志財弟兄仨，爹是地主，兒子是地主家的崽子。崽子們紛紛與父親劃清界綫，但是劃得再清還是地主家的崽子，照樣娶不上媳婦。我懵懂記事的時候，常見志財他爹老地主，戴著尖尖的白紙糊的高帽子，與另一個地主婆、一個富農，還有一個壞分子，在村子裏無聲無息地走過，面無表情，現在想起來，倒是有點鄭重其事的樣子。村子裏的人照常做他們手裏的活，老地主的孫子孫女和我們一起好奇地看，嘻嘻哈哈地拍手。

我家竹林後面，一個茅屋，住著志財他爹老地主一人。紅衛兵偏愛這茅屋，常在四周挖寶，說老地主藏了幾大罐子金元寶銀元寶。元寶沒有挖到，倒是那竹林，因為經常鬆土，竹筍出得出奇的多。有一次，老地主的茅屋像神仙煉丹的地方，飄出裊裊青烟。老地主吭吭吭跑出來，有點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的杜甫，拄著杖，只呼哧，却不敢高聲呵斥，更不會吟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如果沒有紅衛兵的訪問，老地主可以說是個隱士，像活在唐詩裏一樣。他家的踏埠頭，弄得很清爽，石級兩旁植月月紅，五六月的時候，又香又好看。我們常常在老地主不在家的時候，偷偷去摘幾朵。我們認為老地主像周扒皮一樣壞，那時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相信書上寫的、電影裏看的。後來老地主病了，雙腳粗得像水桶。他的那些劃清界綫的子女還是沒有劃清界限，最終還是薄葬了他們的父親。

志財是老地主的二兒子，娶了一個不識數、不知道自己名字的女人，志財的媽媽叫她婉英。婉英有一次想娘了，娘家在西北方向，婉英就朝西北走，轉了倆彎，就不知道西北是哪里了。婉英走了一個禮拜之後，志財才想到可能自己的老婆丟了，不是生氣躲起來了。

婉英與志財生過一次氣，她的耳朵被志財咬掉半隻。她撩起頭髮，給村裏的人看。村裏的男人就教她，不要陪志財困覺了。她真的不陪了，後來志財在他們家的柴垛裏找到了她。

這一次，柴垛裏找不到婉英，哪里也找不到，志財急了。村裏也急了，隊長居然派工找婉英。我爸就被派去找婉英了。婉英後來被找到了，她餓得走不動，就坐在一個機埠頭，等著別人發現她。

村裏人不說婉英傻，都說是因為志財“逮”。平湖人說“壞”字，壞是指那些腐爛的東西。志財這個傢伙，居然能把老婆的耳朵咬掉，還不“逮”嗎？

志財是前年走的，癌，瘦得像根竹竿。他的老婆，也不知道哭。村裏的人教她：“你哭呀，你男客走了，你要哭呀！”婉英婉拒了村裏人的指點：“哭點啥呀，伊逮天逮地。”志財走後，人們發現，婉英有點不對了。兒子叫她去田裏拔草，她就一直拔。日午了，她在田裏；日薄西山了，她還在田裏。這時人們發現，婉英這個人，簡直像只羊，你把她牽到竹林

裏，她是不會跑到田頭去的。她啥事都不操心，她的心放在心窩裏，就負責撲通撲通跳。這下，人們開始理解志財的“迷”了——誰都沒有這個性子啊！

婉英生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子生在這樣的家庭，專講門當戶對的媒人，自然也就給她門當戶對地做媒。女孩子一氣，去上海打工了，做裁縫。裁縫老闆有個不會生育的太太，女孩子生了個老闆的兒子，于是名正言順地做了老闆太太。女孩子年年都要婉英養些土雞、草鴨、山羊，婉英說，養這些要花鈔票的，女婿就一張一張地把鈔票數給婉英。過年了，女婿來抓雞鴨送人，婉英就挑最小的，女婿就再數鈔票給婉英。男孩子也跟著姐姐去了上海，找了個安徽來的打工妹。今年過年的時候，跟著打工妹去安徽了，家裏就剩婉英一個人。

## 我的曾外公 張燕燕

曾外公于世富，是大連旅順口的大地主。土改後，曾外公一無所有，正房也分給別人。他們讓他去放羊，一個人住在四下透風的牲畜棚裏。他放的羊正是他家原先的羊群，雖然現在是別人的了，可他對這群羊是有感情的，不會搞破壞。

有一天，我姥姥一家無米下鍋，孩子們餓得爬不起炕，姥姥忽然想起供桌上還有一碗陳米，就拿來給孩子們煮了一鍋粥。我姥姥一口沒捨得喝，正給孩子們穿衣服，住在正房裏的林君升的母親過來，不吭不哈把粥端走了。她一雙小腳，可走得比我姥姥陳大腳還快。姥姥一句話也沒敢說，老地主于世富更不敢說。孩子們眼看著到嘴的粥讓人端走了，急得哭起來。老地主心疼孫子孫女，帶著兩個大孩子去他的二女兒家，也就是孩子們的二姑家，想要點吃的。走到二女兒家門外，就聞到了貼餅子的香味，曾外公對兩個孩子說：“別哭了，有東西吃了。”

曾外公領著兩個孩子進了屋，在灶下燒火的二姑站起來說：“你們來幹什麼？”曾外公說：“孩子們餓，我帶他們來跟二姑要點吃的。”二姑說：“誰是他們二姑啊，你們趕快走，我早跟你們劃清界綫了，你們別來給我找事，你還嫌我事少啊。”老地主曾外公氣得說：“你真沒有良心，你的孩子不都是我給養大的，現在你跟我劃清界綫了，你早咋不跟我劃清界綫呢。陳大腳對你的孩子多好啊，就像親娘一樣，如今她的孩子吃不上飯，你都不給一口嗎？”二姑說：“此一時彼一時，親爹顧不上後娘，你們快走吧。”說著把祖孫仨推出門外，還把大門插上了。

老地主只好把饑腸轆轆地孫子們領回家，對兒媳也就是我姥姥說：“他二姑沒有良心啊。”我姥姥也挺傷心，自己把二姑姐的兩個孩子養大了，還換不來她一塊餅子。曾外公不甘心，放羊時故意往他二女兒家走，希望她能可憐父親，給他一口吃的。可是二女兒家的大門總是關得緊緊的，有時等到天黑也見不到女兒女婿。這位二小姐，一心想和娘家劃清界綫，以逃脫厄運。她的丈夫家是貧農，多麼值得驕傲的成分啊。可是後來，她還是沒有逃脫。有人看見她在土改前，從娘家拉走了一大車東西，便斷定老于家的金銀細軟都被她拿走了，結果把她家抄了個底朝天，定為壞分子，每天掃大街。

剛解放時，政府賣公債，只要是政府號召的，我姥姥都積極響應。那時家裏已沒錢，她便把結婚時娘家陪送的套碗拿到集市上賣掉，到鄉公所交了公債。鄉公所的人對買公債的人很熱情，對我姥姥也不例外，這讓我姥姥非常高興。有人給她一個笑臉不容易，一個笑臉足夠她高興幾天的。

一年後，公債返回來了，家裏只有放羊的老地主。領到公債後，老地主來到趙家坊我姥姥的娘家，把公債錢遞給我姥姥，說：“公債發下來了，全給你吧，你帶孩子住在娘家不容易，手裏有倆錢，娘家人還能待見你。”我姥姥沒有接錢，看著衣衫襤褸的老公公，心酸地

說：“還是你留著吧，你一個人，日子不好過。”老地主說：“我老了，要錢沒有用，給孩子們吧。”我姥姥死活不要，說：“你留著會有用的，等孩子們長大，我們的日子就好過了。”老地主只好把錢揣起來走了。

回去不久，老地主就病倒了，不能放羊了。姥姥知道後，領著孩子們回去看他。他有氣無力地躺在門板上，看見我姥姥來了，便用瘦骨嶙峋的手從懷裏掏出那筆錢放到我姥姥手裏，說：“我有千頃地，孩子們沒得著，只有這點錢了，你一定給孩子們留著。你把錢收好了，別讓人看見，這是我們家的全部財產了。”我姥姥只好收下。老地主又說：“你一個人的日子不好過啊，你得想法把顯龍（我的姥爺）找回來。他走時不是說去打日本嗎，這小日本打跑好幾年了，他咋還不回來呢，還打誰呀。實在找不著人，你就去奉天找他大姑，他大姑興許能知道顯龍在哪。”我姥姥說：“爹，我脫不開身哪，我要是去奉天，他們會說我逃跑了，去抓我的。不如你找他二姑，讓他二姑去奉天。”老地主傷心地說：“別提她了，她是不會去的，就算我這輩子白養她了，我沒這個閨女。”

老地主不再說話，孩子們叫了幾聲爺爺，兩行老淚從他混濁的眼裏流出來，在他溝壑縱橫的臉上反射出兩道泪光。老地主，我的曾外公，就這樣死了。

---

補白：我弟弟在魏縣初中學習時，曾任少先隊大隊長，1956 年初中畢業，各科成績都是 A，因品學兼優，被保送到省立邯鄲中學（後為邯鄲四中）。1958 年，弟弟在學校黑板報上寫了一首小詩，其中寫道：“他姍姍來遲，走向隊伍，真像閱兵的軍官一樣。”校團委書記看了，對號入座，認為這是諷刺他的，於是借整團之機，說我弟弟祝俊坡出身地主，思想反動，並誣陷其參加過反革命小組，將俊坡開除團籍。所謂“反革命小組”，實際情況是學校的一名老師想成立一個學習小組，讓我弟弟參加，學習小組尚未成立，那名教師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這個未成立的學習小組，就被認定為反革命小組。1959 年弟弟高中畢業，第一次參加高考，志願是北京外國語學院。當時高校招生，先看政審結論，後看考試分數。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錄取”，弟弟被迫回農村勞動。1962 年，邯鄲四中給俊坡來信說，經審查，參加所謂“反革命小組”問題是不存在的，是錯案，予以甄別平反，恢復團籍。恢復高考，在農村勞動了將近 20 年的弟弟，于 1978 年第二次參加高考，成績出人意料，全縣兩千多名考生中，他竟是第八名。

祝偉坡

---

## 插隊時的地主鄰居 京 生

上山下鄉時，我與村裏唯一的一戶地主是鄰居。這個地主分子，沉默寡言，膽小怕事，見任何人都低頭而行。生產隊在土牆上寫宣傳標語，只有他能寫。寫標語前，他總要讓別人核實要寫的究竟是什麼標語，生怕寫錯了被打成反革命。他幹活從不敢偷懶，無論隊長安排什麼活，總要想辦法加班加點幹完。誰家有病，誰家就“命令”他去給人家先看看。到了春節，全村的對聯都是他一個人沒日沒夜地寫。後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走起路來咳嗽不停。他雖然被全村人瞧不起，可他是全村唯一懂政策的人。

大夥都把地主家的女主人叫地主婆。地主婆幹活也很老實，從來沒有投機取巧的現象。鄰居一潑婦不知什麼原因整天指桑罵槐，地主婆明知罵的是自己，却裝作什麼也沒聽見。這個潑婦罵人不解恨，就跑過去撕地主婆的頭髮。一起幹活的人都不敢勸解，地主婆就只有讓對方撕打够了痛哭的份兒。她上工最早來，收工最遲回，憂傷的臉上從沒見過笑容。

這對地主夫妻有兩兒兩女。大兒子，大夥都叫他“地主家的”，初中畢業上不了高中，就回村勞動。他和他家裏人一樣，上下衣服破爛不堪，也很少和別人一起說話，總是不停地幹活。他一米七八的身高，全身很瘦，面容看起來很清秀，但頭髮很亂、很長。他數學、物理特別好，歷史事件也知道很多，會吹笛子，還會寫詩詞，在他們村絕對是人才，但他的才能從來沒有機會施展出來。他不被人瞭解時看起來很冷漠，瞭解他之後就知道他有太多的委屈和無可奈何。小兒子初中畢業，大女兒小學沒讀完就回家勞動了，小女兒托改革開放的福上了大學。

## 一塊玻璃一條命 鳳 翔

老楊是西北農學院分配到陝西鳳翔縣畜牧獸醫站的大學生，戴副眼鏡，說話慢條斯理，顯得文質彬彬。文革開始後，鳳翔縣獸醫站的戰鬥隊突然把老楊專政了。當時叫群眾專政，簡稱群專。群專現象是個新生事物，其專政對象是那些被排除在人民群眾之外，但還稱不上是敵人的人。群眾專政完全沒有章法，有的地方嚴酷程度超過勞改農場。

群專對象每天早上給戰鬥隊（1969 年之後變為革委會）的頭頭請示，由頭頭安排當天的勞動改造任務；下班時再由頭頭檢查一天的勞動情況，訓示幾句；隔幾天寫份檢查或思想彙報，表明你心悅誠服接受改造，正在不斷提高覺悟。過一段時間，頭頭覺得你改造得差不多了，大發慈悲，經群眾討論，認為你已經改造好了，可以重回革命群眾的行列，就宣布對你解除群專。

老楊被群專後，主要的改造方式是當清潔工打掃衛生。同他一起被群專的，還有一個老陳。文革初老陳很風光，是最早的戰鬥隊的頭頭，但好景不長，自己也成了改造對象。當時正值“全國山河一片紅”，到處是用紅漆刷出來的毛像、毛語錄等，紅油漆都賣脫銷了。鳳翔縣獸醫站牆上也一樣，有毛語錄，有摹仿毛手迹的詩詞，有《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之類的宣傳畫，窗戶玻璃上都用紅漆噴上了剪紙毛頭像。頭像剪得有的精緻，有的粗糙，鋪天蓋地，就像今天泛濫的廉價廣告招貼畫。

有一天，老楊打掃完獸醫站的長廊，推著裝垃圾的架子車向外走。一不留神，車軸挂了一下門，門一震，一塊玻璃嘩啦從上面掉下來，摔成碎片。這塊玻璃上有個毛頭像，如今一碎，老楊受驚不小，趕緊把玻璃碎片拾進垃圾車。這一切恰巧被老陳看在眼裏，便大叫起來：“好哇，你竟敢打碎主席像，還想偷偷摸摸地掩蓋，是何居心？”老陳這麼一嚷，整個獸醫站的人就知道了。老楊更加惶恐，怯怯躲回宿舍。

嚷歸嚷，一般人對於這種事並不較真，除非他想挾私報復，或是被毛崇拜徹底洗了腦。同事們並沒誰計較這事，可是第二天卻發現老楊自殺了。對於老楊的死因（無意間打碎一塊上有毛頭像的玻璃），人們很少談論，仿佛是很自然的事，談論更多的是他的自殺方式。在鳳翔，自殺往往是上吊、跳樓、服毒之類，老楊的自殺却不同凡響。老楊的宿舍裏滿地是血，可是老楊的屍體上卻看不見任何傷口。清洗屍體時，在他的頸動脈處發現一個指甲蓋大的傷口，幾乎看不出來。人們竊竊議論，他竟然採用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死法，而且割得那麼准。

---

補白：小時候我很納悶，為什麼我們的院子有一畝地大？父親後來告訴我，說我們這院子是從地主家分來的。我的曾祖父是老革命，領導家鄉的土地改革運動。當時我們家十來口人住在三間舊房子裏。我們村有一戶地主，是爺爺的乾親，就是他把自己的兒子認給我爺爺當乾兒子。土改要分他家的新房子和大院子了，可是沒人敢要，怕哪天地主翻過身來。我曾

祖父就對我祖父說：“這兩畝多的院子，外加新房子，別人不敢要，你們就帶頭先要了吧。有我呢，你們別怕。”爺爺的那位地主乾親也是說，他這房子、院子早晚得讓共產黨分了，你們要了也算肥水沒流外人田。就這樣，我家沒花一分錢就拿到了三間嶄新的房子外加兩畝多的大院子。那房子的木料都是最好的落葉松木，樣式也是最新的，那院子是當年地主家的菜園子和種大烟的園子，裏面還有十幾種果樹。後來再分地時，我們的大院子一大半又分給附近沒房子的農民蓋房了。

-----

## 我的臺胞父親 李亞蓮

父親李升是家中的長子。爺爺李飛鴻，精于經商，辦食品加工廠，承包建築工程，盤下不少商鋪，家境富裕。爺爺非常重視教育，父親先在家念私塾，後到南昌、上海等地讀書，是德安縣第一個到上海求學的人。工作後，父親擔任過德安縣國民黨黨部秘書科長、中學校長、區黨部書記。1947年，父親到崇仁縣任縣長，不久離開崇仁，到江西省教育廳任職。共產黨接管政權時，父親原沒打算隨國民政府到臺灣去，因家有父母兒女，還有年邁的爺爺奶奶。

不久，當地幹部需要抓典型，就把我爺爺抓起來鎮壓了，一家人驚恐異常。1949年底，母親變賣了首飾，讓父親帶著當路費，忍痛離家潛逃了，當時我尚在母腹中。父親先逃到高安，準備輾轉到美國繼續求學，可中途出現變數，最後還是去了臺灣。

父親一走，家裏頓失頂梁柱，母親隻身帶著我們兄妹四人生活。土改後的地主之家，沒有一分田地，好在母親心靈手巧又天性樂觀，幫人做些針綫活維持生計。生活仍然難以為繼，無耐之下，母親將姐姐瑞兒送人，帶著我們兄妹三人回到外婆家，在舅舅的幫扶下勉強度日。

文革時期，母親和我們兄妹成天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受盡侮辱。那時我最怕天亮，因為天一亮我們就要受侮辱被折磨，晚上我可以靜靜地想念父親，想像父親的模樣。那時我多麼想得到父親的疼愛、父親的呵護，多麼渴望有父親的一點點兒消息啊。在對父親的無盡思念中，我一天天長大，從襁褓中的嬰兒到為人妻，為人母，我想這一輩子也許永遠見不到父親了。

1979年元旦，葉劍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臺胞的來信陸續得以進入大陸。我開始一天天地盼望等待父親書信的到來，在煎熬度過了幾年。1985年，父親托人給我們帶來了第一封書信。父親在信中告訴我們，他在臺灣，一切都好，且是一所中學的校長。那封信，我和母親、哥哥、姐姐不知看了多少遍！父親後來的來信告訴我們，他1988年退休，一退休，第二年春天一定回家鄉。

1989年3月17日，是我終身難忘的一天。當時我在德安縣城工作。那天，陰霾的天空飄著絲絲細雨，初春時節仍然寒氣逼人。下午剛上班，我便收到哥哥由南昌發來的加急電報：“父已到昌，十八日到縣。”頃刻之間，我的激動和喜悅無以言表。四十年，漫長的四十年啊，終於盼來了朝思暮想的父親。此時此刻，我恨不能立刻飛到父親身邊。不能再等了，別說等到明天，一刻也不能再等。我隨手抓起包和傘，狂奔火車站，趕上開往南昌的火車。

南昌站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撥開蜂擁的人群一路前奔，不知道是怎樣沖上六樓哥哥家的。推開虛掩的門，見一位慈祥的老人正從內室出來。我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就是我的父親？我四十年未曾謀面的父親？老人面露溫和的笑容，哽咽道：“是亞蓮吧，我的兒，你受苦了。”說罷，一把將我摟在懷中。此時的我，兩腿攣抖著抱著父親發不出聲來，手中的包和傘是怎樣掉在地上的，全然不知，只感覺泪水順頰而下，是委屈，是激動，還是喜悅，我想都有吧。

我有太多太多的話想說，却一句也說不出來。哥哥輕輕走過來，撫了撫我的肩：“不要哭了，和爸爸好好聊聊。”父親邊撫摸著我邊流淚說：“讓她哭吧，四十年啦！把四十年的苦水全哭出來吧！”巨大的父愛向我襲來，將我淹沒……

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徜徉在無比的幸福快樂之中，和父親談天說地，回憶往事。

父親淡泊名利，博古通今，談吐高雅，又不失風趣，深深感染著家裏的每一個人。父親說，在臺灣，他無時無刻不在牽挂大陸的親人。每次吃飯時，父親都告誡我們的臺灣弟弟李安和李崗，不能將碗裏的飯吃完，要留一些與大陸的哥哥和姐姐們吃。聽父親說這些，我們兄妹激動不已。

短短六天，一晃而過，父親回到了臺灣。沒想到，這成了我們的永訣。因健康和政策原因，父親此後再未回大陸，我們通過寫信、打電話傾訴思念。這種相思之苦時刻折磨著我們，可我們無能為力。我們的經濟條件還不允許我們兄妹到臺灣去看望父親，政策層面赴台省父也是難上加難。直到 2003 年父親去逝，我們也沒再能見他一面，成為我們終身的憾事。

---

補白：劉廷秀，字紫奎，廣東海豐人，無黨派人士，曾任海豐縣公平日興市商業聯合會理事長（半官方性質），是全國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府創建者和主要領導者劉廷波的胞弟。1915 年六月生于海豐縣公平鎮新盛塘一個工商業地主家庭。他繼承了父親劉江的田地 200 餘畝，並且開設了喜豐、彩記和茂利等商行，主營大米批發，營業網遍及汕頭、汕尾及東江一帶。1951 年土改，縣委書記高增全指使工作隊，將劉廷秀誣陷為“惡霸地主”、參加過特務組織等等，土地和房產契約全部被沒收，掃地出門，並對他和家人進行批鬥。他的子孫也受此牽連，“地主子弟”被喊了半個多世紀。1952 年秋，海豐縣土改復查，他遠在印度尼西亞的兄長劉廷波，給廣東省委、海豐縣委各發來一份報告，要求將劉廷秀成分改為華僑小商，最後劃為華僑工商業。1970 年 11 月文革中，劉廷秀受到非人待遇和人身迫害，投水自盡。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 1982 年，最後剩下的沒有平反的地主，全部恢復了名譽，被冤枉 31 年的劉廷秀和全家得到昭雪。

---

父親正直而善良 木 子

我的父親生于 1931 年，六歲入讀私塾，十歲時由他的親哥哥教導他。父親說，伯父教他許多中國古代文化知識，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穫的時光。

1953 年鎮反時，我的這位伯父被鎮壓了。為什麼呢？與大家庭內訌有關。伯父本是一個正派人，他有一個堂兄弟不務正業，娶了一個妓女做老婆。伯父為為此很憤怒，認為有傷門風，經常教訓他們夫婦。我的這位孀娘就對我伯父記恨在心。鎮反一來，這位孀娘拼命教唆自己的男人寫狀紙告我伯父，編造他有人命血案。我的這位堂叔在婆娘逼迫下，就寫了一張狀紙，告到軍法處。軍法處領導看了狀紙，事關人命，而且是自己家的人舉報告狀，那還有假？就把我伯父槍斃了。

父親非常尊敬自己的這位兄長。兄長被槍決，我父親無法接受，跑到軍法處吵鬧。軍法處領導認為他已不適合留在部隊了，便把他下放到農村，安排到一個小學裏任教。父親到農村任教後，不服當地領導，說他們沒有文化。地方領導說這人不服管，就給他戴上了四類分

子的帽子。

父親始終認為，1953 年鎮壓他的哥哥是一個錯誤，他一沒有命案，二不是惡霸。父親一生剛正不阿，在部隊與團政委拍過桌子，回農村後與地方鎮委書記拍過桌，始終沒向任何個人認過錯或做過檢討。父親說，他一生只做過一件錯事，就是 1959 年秋與村裏其他年輕人一起到鄰村地裏偷紅苕。雖沒被人抓住，但父親內心愧疚一生，說這是他今生做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975 年夏天，河南省南部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災，大批難民紛紛南下，到湖北、湖南來討飯。當時農村大部分家庭都生活在溫飽綫以下，我們一家八口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八口人每天圍桌吃飯時，常有河南難民來要飯。每當這時，我們兄弟姐妹個個都氣鼓鼓的，父親却總不嫌他們，慷慨解囊。兄弟姐妹紛起指責父親，父親就對家人說：“我們一餐不吃沒什麼，人家可能兩三天都沒有吃一點飯了。我們家的日子雖然不好過，可總比他們強。你們如果連這一點都想不到，那你們還作人幹什麼？”

當時父親還頂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學校老師們還一再強調我們要與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可是從此以後，我們兄弟對學校老師的看法改變了，對父親的敵意態度也改變了。

---

補白：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派給黨總支書記貼大字報，說祝偉坡出身地主（“破產”二字早已省略），却被重用為政治輔導員，是階級路綫問題。1969 年，中共九大前後，進行整黨，恢復黨的組織活動，成立黨小組時，有幾個多年黨齡的黨員，因家庭出身不好，都不能當小組長，而指定一個出身好的預備黨員當小組長。可是黨章明文規定，預備黨員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這位預備黨員小組長當面對我說，出身好的黨員和出身不好的黨員，對黨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樣的。1969 年冬，我們河北師大響應中央軍委“一號命令”，戰備疏散到束鹿縣（現辛集市）。為加強戰備，從師生中挑選骨幹分子組織基幹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黨員編入了基幹民兵，我是黨員，身體和年齡都符合條件，却未編入。可見，關鍵時刻出身不好的黨員，還不如出身好的非黨員受到信任。

祝偉坡

---

## 父親與淄博六中 張尚文

淄博六中的前身是周村中學，周村中學的前身是教會學校光被中學。1949 年前後，父親張文敷是光被中學的校長。

共產黨接管光被中學以後，開始組織學習文件，如《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1949 年秋季開學不久即是建國大慶，學校組織多次慶祝游行，敲鑼打鼓，腰鼓隊、秧歌隊走街串巷製造氣氛。作為一校之長，父親工作繁忙，社會活動很多，不時應付上級教育管理部门來人檢查指導。

1950 年的鎮反、土改，與學校關涉不大，只有極個別教師受到衝擊。小學部主任趙竹青老師，寒假前還在上課，過了寒假卻沒再來。聽我父母講，趙是長山縣人，原為共產黨工作，後叛變投敵，且有血債，寒假回家就被長山縣鎮壓了。

抗美援朝，全校師生集會游行，演活報劇，出壁報畫、漫畫，揭露美帝的罪惡歷史、侵略罪行。父親過去與教會裏的外籍人士有接觸，因而此時行事更加謹小慎微。學校積極組織

一些實際活動，比如讓小學生登門徵集呼籲和平的簽名，或去各家各戶募集鹹菜乾菜支援志願軍。光被中學還選送一批學生到軍事幹校學習，與我同村的兩位同學王立儉、王立誠，後來一個成了軍醫，一個當了海軍。

在捐獻飛機大炮的活動中，師生們紛紛捐款，父親帶頭捐了 50 萬，這個數字比他的月薪還多。1951 年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組織報告團，在水膠場開歡迎大會，父親還被請上主席臺，他的筆記本裏還有那位人民軍代表用朝文寫的題辭。

此時共產黨對學校的控制加強了，派來了教導主任，充實了骨幹青年教師。母親個性很強，對解放後共產黨的這些做法無法適應，又考慮到父親所處的地位，所以 1950 年初母親就離開學校，回基督教會工作，接著受教會委派，到齊魯大學神學系進修一年。一年之後，母親開始在周村、鄒平、淄川、博山、益都等地的教會巡迴服侍，不常在家。

光被中學雖為私立中學，但沒有哪個人是實際擁有者，房產設施是教會的，父親只是一個拿薪金的管理者。1952 年三反五反，父親成了替罪羊，要他反省有哪些貪污行為。父親幾次交待都不得過關，後來他們就組織打虎隊，要打我父親這只老虎。

打虎隊日夜出入我們的住屋，監督父親反省、交待問題。有一天晚上，我已上床睡覺，父親在屋子裏踱來踱去，突然問我一句：“你怕不怕？”我支支吾吾無以為答，迷迷糊糊睡著了。半夜裏，我被嘈雜聲驚醒，睜眼一看，父親渾身濕透，學生們正在給他脫去濕衣。原來父親一直沒睡，乘值班學生不注意，跑到屋外附近跳井了。井水深僅及腰，學生們又把他救了上來。

自殺是對抗運動，是自絕于人民的表現，于是連續幾天幾夜，除了吃飯、解手之外，日夜有人圍著問他同一個問題：“你貪污了多少？”幾天下來，父親腿腳腫了，嗓子充血，嘴角流血。在辦公樓前，全校師生開批鬥大會，先讓父親交待，接著是大會批判發言，口號聲不絕于耳，還算斯文，沒有施以拳腳。

後來上面來了指示，運動嘎然而止，學校恢復正常。父親的校長職務就此被停，不久去市里參加學習，然後調到張店中學當教師。父親到張店後，母親也辭去教會工作，于 1952 年下半年來到張店，先住保安街，後在火車站下麵的北泰康街 17 號定居。父親在五中教過地理，後來轉數學組，教過三屆初中代數。母親後來去小學當了教師，一家人過了幾年平靜的生活。

1957 年反右，波及到淄博。春節寒假，老師們不得回家，留在學校搞運動。父親所在的數學組，青年教師金銳波，浙江人，時年 26 歲，年青氣盛，一時想不開，在數學組的門楣上上吊身亡。這一下激化了矛盾，數學組被他們看成右派窩，多名老師被劃為右派，我的父親被稱為黑後臺。1958 年上半年，對右派還沒做組織處理，父親還繼續教課。從下半年開始，全民大煉鋼鐵，對右派的處理也下來了，幾名年輕教師送去勞教，外地的遣回原籍，父親則留校勞動。大煉鋼鐵要用礮子壓粘土做坩堝，學校買了一頭牛一頭驢拉礮子。父親被責令當飼養員，每天手持鐮刀，去附近野地裏割草喂牛驢。大煉鋼鐵結束後，父親在教職工食堂打雜。1960 年，父親已 64 歲，開始有心腦血管病症狀，以“隱瞞義教身份”的名義被開除公職，在街道接受管制。

1965 年，父親突發中風，行動不便，語言不清，情緒不穩，但尚能自理生活。多虧母親已退休，在家日夜陪護照料。1966 年 9 月 5 日，街道造反派抄家封門，父母在外露宿一夜。9 月 6 日，母親被造反派在居委會糾纏。是日傍晚，父親大叫幾聲，突發腦溢血，大小便失禁，于當晚 11 時去世，終年 70 歲。1978 年，父親被改正。2005 年淄博六中舉行百年校慶紀念，父親成為六中校史上被打撈的文物。

---

補白：從 1953 年初參加工作到 1956 年上大學，每年都漲工資，我從親身經歷中，深切



感到新中國成立後，黨風正，幹部廉潔奉公，社會風氣好，處處都是明媚陽光，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經過 1955 年至 1956 年一年的“肅反”，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前夕，根據七大黨章，我未經黨支部大會討論，由中共魏縣縣委直接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對要求入黨人員的家庭出身、個人經歷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政治審查，還是相當嚴格的。但是，我入團入黨、讀師範、上大學、當學生幹部，並沒有因為破產地主家庭出身而受影響。所以在那段時間內，我絲毫沒有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來的政治包袱。

祝偉坡

-----

## 血腥海豐 京 晨

彭洪是彭湃與妻子蔡素屏的第三個兒子，出生僅兩個月，母親即在海豐縣城被敵人槍決，一歲時，父親壯烈犧牲。鄉親彭承訓冒著殺頭的危險，將彭洪隱姓埋名哺育成人。15 歲那年，彭洪成為海豐中學地下黨組織的一名黨員。

中共建政後，彭洪先後擔任海豐縣委組織部長、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1957 年底，廣東大搞反地方主義，彭洪受到衝擊，被撤銷縣長職務，一年多後重新啓用。1963 年，彭洪給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廖似光寫信，申請調動工作。在組織的安排下，次年春，彭洪改任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水稻生態研究所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全家從海豐遷到廣州。

1966 年文革爆發，海豐刮起反澎湃風。彭洪被從華農校園拉回海豐批鬥。這次批鬥長達 100 多天，回到廣州後，彭洪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到學院農場放牛。

彭洪的祖母，即彭湃的母親周鳳老人，在此期間也一度被監禁。後經周恩來關照，廣東省革委會負責人通過省民政廳，在海豐駐軍幫助下，將周鳳老人從海豐接到廣州治病。

1967 年，海豐爆發慘案，半個月內 100 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800 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3000 多人被打傷。是年 8 月 26 日，海豐幾個公社組織了 5000 多人的武裝隊伍，攜帶機槍、衝鋒槍、步槍等進入海城鎮，沿途任意開槍，群眾紛紛上山躲藏。

8 月 29 日下午，彭湃的侄兒彭科隨著逃難的人群躲到郊外的將軍帽山，被搜山的一夥人發現。在場一個姓洪的中年男人，聽到彭科的名字，立即沖到他跟前，大聲喊道：“我要報仇！”舉起篋刀，連砍帶割砍下彭科的頭顱，然後將這血淋淋的頭顱挂在身上，拿回城去。當晚，彭科的頭顱被挂在城東門的電綫杆上示衆，三天后才取下。

彭科被殺後，彭湃的堂弟彭勁、堂侄彭株等彭家親屬相繼遇害。彭湃著、周恩來題名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書，新華書店發行的宣傳彭湃和海陸豐農民運動的書籍，都被誣為黑書予以沒收。與海陸豐農民運動密切相關、被國務院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紅宮、紅場也被改了名，大門被搗毀，紅色圍牆被塗成黃色。

此時有親友為彭洪安排逃港之路，彭洪謝絕了。他叫妻子把所有較粗的褲帶都換成細細的紅頭繩，還把自己平時隨身攜帶的鑰匙、指甲鉗、小剪刀交兒子彭丹和女兒彭伊娜，一再告訴孩子：“有人要說爸爸自殺了，你們一定不要信，爸爸是絕對不會那樣做的。”

1968 年 7 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兩個年輕人來到彭家，他們是彭洪的同事、華農的造反派，將彭洪帶走抓走。第二天，彭洪被送到廣州警備區司令部關押。不久，彭洪被轉移到海豐批鬥。他被打得遍體鱗傷，還被緊綁在一輛汽車上，頭戴用鐵條、鐵絲做的幾十斤重的大高帽，全身塗上黑油墨，在烈日下游鬥。

有一天，彭科的兒子彭伊林在海豐街頭看到寫著彭洪“畏罪自殺”、“自絕于黨和人

民”的大字報，給暫居在廣州彭洪家中的姐姐彭小真寄來一封信，信中說道：“你不要忘記你死去的爸爸，更不要忘記你死去的叔叔。”

海豐方面始終沒有正式將彭洪的死訊告知其家人親屬。親人們不相信大字報上說的彭洪是自殺的。此後十年間，彭洪的妻子陳平通過各種途徑，數次上書省委、省革委會，要求調查丈夫的死因，但是一次次石沉大海。

1978 年，習仲勛主政廣東，提出要為海豐駭人聽聞血案中的死難者平反昭雪。有人堅決反對，說如果平反昭雪，就上告黨中央，習仲勛勃然大怒：“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在習仲勛力主之下，廣東省委、省革委會同廣州軍區黨委派出聯合工作組，協助汕頭地委，徹底清查海豐反彭湃烈士事件。

據與彭洪一起關押的老幹部們回憶，1968 年 9 月 1 日晚，彭洪從牢房被押走。接著，聽到公安局大樓內的吆喝、毒打、慘叫、呻吟聲音持續到深夜。安靜一會兒之後，傳來一陣雜亂、急促的脚步聲。一老幹部偷偷爬上窗口，只見幾個人用床板抬著不能動彈的彭洪，把他扔回牢房。9 月 2 日深夜，兩個農民抬走了包裹著的彭洪屍體。

1978 年 11 月，為查明彭洪的死因，工作組決定提棺驗尸。通過走訪，他們找到一個曾參與拖尸、埋尸的農民。十年前這個農民挖坑埋下彭洪的尸體後，順手在墳裏埋下一塊紅磚。根據這一線索，工作組在海豐縣中醫院（現海豐彭湃中學）後面一片荒郊野地找到一具遺骸。據彭妻陳平描述，調查人員判定，這正是彭洪的遺骸。

11 月 10 日，海豐縣委為彭洪舉行追悼大會，省委、省革委會、汕頭地委、地區革委會，都送花圈，並派代表參加追悼會。接著，海豐全縣 3200 多人得到平反，被開除或被迫退職的幹部、教師、職工 1300 多人獲重新安排工作。在反彭湃事件中犯有嚴重罪行的原汕頭地委副書記孫某，由國家專政機關逮捕，殘酷殺害彭湃侄兒彭科的洪某和其他幾個民憤極大的殺人凶手，交由專政機關依法懲處。

---

補白：趁中午休息，三杠子拿起柴刀上山，家裏還等他砍柴做飯呢。三杠子遠遠看見一棵樹，葉子已枯萎落掉。那時生產隊規定，社員見到死樹，可以砍去當柴燒。三杠子的父親是被管制的四類分子，他怕砍樹惹出麻煩，便想找個人證明那樹已死。憨牛大爹在附近放牛，三杠子便走前去，問那樹是不是死了。憨牛乜眼看了看那樹，笑道：“三杠子，那樹別人砍就死了；你砍，它就沒死。”三杠子只好去撿樹下的葉子。不一會兒，那棵死樹被別人砍去了。

---

瀋陽鎮反目擊記 俊 杰

1951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時，我們赴朝慰問團正忙於準備回京，被邀去參加瀋陽鎮反鬥爭大會。會場在日居時代建築新式體育場，可容六七萬人。會場裏插滿旗幟，時而是歌頌共產黨的歌聲，時而是“殺絕反革命分子！”“共產黨萬歲！”的震天呼聲。

主席臺坐北向南，主席臺前又伸出一個可容二三十人站立的小台，是臨時用木板搭成的。小臺上有一隻八仙桌。小台前是用木板圍成的一塊牛圈式的場地，約有 2 千平方，包圍在廣場的群眾當中。小場裏站著 19 個人，個個胸前挂著一尺多長、五寸多寬的白布條，上寫姓名，姓名上冠以罪名，如惡霸某某之類。這 19 人分東西兩排靠木板站立，身上穿著不同的衣服，有的短襖長褲，有的長袍短褂，深深低著頭，每人左右各站一個槍上刺刀的武裝人員。

主席臺的擴音器送來一個聲音：“現在開會了！”排山倒海的群眾呼聲立時停止。隨著大會主席、瀋陽市長朱其文宣布把罪犯某某提上臺來，牛圈裏的兩個武裝人員就押著一個矮矮的猴子似的人，一步一跚地走上主席臺前的小台。猴子被指示跪在八仙桌前，低頭面向群眾。

接著，主席宣布帶訴苦人上臺。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兩手捧著臉，由人攙扶著上了台，走到八仙後站立。這女人身穿青襖，短髮蓬亂，面龐瘦瘦的。她一上臺就哭，哭了一刻鐘，接著開始述說：前面跪著的這個人，是她的父親，是一個裁縫匠。她小時死了母親，和父親同住，九歲時父親把她強姦了，直到十四歲還不斷被奸污。

群眾怒吼了：“槍斃禽獸某某某！”會場上一時掀起激昂的空氣。群眾臺上負責指揮喊口號的人，不斷揮拳領頭高呼口號。主席臺上宣布判處此人死刑，群眾高呼：“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然後這個被判處死刑的人被帶下臺，回到牛圈。

主席臺上又命令把惡霸某某某帶上來。兩個荷槍的士兵把一個年約三十的男子帶上小台。押解他的士兵叫他跪在八仙桌前，他掙扎著不肯，兩個武裝人員強按下去，他的一條腿跪下時還在掙扎，似乎要罵人的樣子。一個士兵在他脖後緊拉一下，那掙扎的人就範了。我有點莫名其妙，問坐我旁邊的一個地方官員：“方才那人想掙扎，士兵在脖後一拉，他就老實了，這是怎回事？”他回答說：“犯人的脖子套著鐵絲，防備他叫罵。他一反抗，士兵一拉鐵絲，他就被勒住氣管透不過氣來，就不能叫罵了！”

一個被帶上臺的男人，站在八仙桌後向群眾訴苦，說這個惡霸欺壓良善，害了幾條人命。群眾中又喊起槍斃惡霸的呼聲。主席臺上宣布判處此人死刑，群眾又高呼：“共產黨萬歲！”“鎮壓反革命勝利萬歲！”

其他十七人，都是這個模式。下午三點左右，鬥爭大會勝利結束。群眾的嗓子已經啞了，整隊出場，人人臉上灰暗無光。

當天晚上，我們下榻的東北人民政府交際處招待所裏（日居時代瀋陽最高貴的大和旅館）舉行舞會，政府首長和幹部三四百人，樂聲悠揚，舞步曼妙，人們臉上流露著無限春意，熱鬧而快樂的天堂直到午夜一時才告關張。

第二天，瀋陽市萬人空巷，迎接驚心動魄的大殺戮。這一天天氣悶熱，太陽光很強烈。從早八時起，街上開始過有組織的大隊行人，馬路上涌動的人海好似波浪。為看看整個城市的情況，我邀一個共產黨員乘著招待我們的汽車巡視全城一遍。由新市區（原日本租界）到張作霖時代繁華一時的舊城四平街，一路上，鋪子關門，飯館停業。留守的人們告訴我們，每家每戶都得派人參加示威。如果你是生客，一定以為是過勞動節或國慶節。

上午十時，我們回到招待所，服務員報告我們：公安局就要押解犯人去刑場了。我們幾人走出客廳，趕到二樓涼臺上。此樓位於廣場南邊，公安局在廣場西北角，距離不到一百碼。街上，人群站在馬路邊，萬頭有如秋收前的高粱穗子。擴音器先放送一陣革命歌曲，接著傳出聲音：“市民們！我們就要把罪犯押赴刑場，在他們償還血債之前，先行一個賠罪禮！”

公安局的大門開啓了，“忽”的一聲開出一輛警車，大約有二十個持槍的警察站在卡車裏，接著是二十輛左右的卡車，上邊裝滿罪犯。車隊開得很慢，向西轉彎時，離我們所站的涼臺最近。我看見卡車上的罪犯都沒穿上衣，光著膀子，綁著兩手，俯在車廂裏，乍看好似堆積一些去過毛的肥豬。這些堆積物，毫無生命迹象，他們的身體沒有任何動彈。擴音器裏高呼“槍斃反革命分子”的口號，我身邊的其他看客有說有笑，街上的群眾鼓掌吶喊，人海跟著車隊涌向刑場。

這一天，瀋陽槍斃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魯迅先生在《阿 Q 正傳》中描寫阿 Q 押赴刑場時的情形，阿 Q 自己有說有笑，群眾在後邊喝彩。幾十年之後，中國仍然以看殺人為樂。與阿 Q 時代不同的是，共產黨有組織地強迫每家出人參觀殺人場面。

在瀋陽期間，我還看到共產黨在瀋陽故宮“展覽皇帝”的一幕。故宮進門南廊下拘著幾

個人，個個帶腳鐐，旁邊站著看守。廊前有一個說明牌子，大意是：白雲天，某地人，糾合一般無知之徒想造反，自命為皇帝，還封某某為護國八千歲，某某為護國大將軍。白雲天有正宮娘娘一人，妃子一人。

我近前一看，皇帝白雲天將近五十歲，身體很結實，一看就像個不安分的鄉下人。八千歲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老態龍鍾。大將軍是一個十足的鄉下佬。皇后是農村婦女，妃子是一個十八九歲的農村女孩。

“皇帝展覽”頗能吸引群眾，來參觀的人很多。這是真人真物的反革命，不鎮壓能行嗎？這個展覽等於搞一個宣傳行為藝術，其不言自明的含義是鎮反有理。

### 我的三個舅舅 皖 水

舅舅家世代為農，臨解放時買些田地，蓋了幾間房子。土改時，外祖父、二舅、三舅被劃為地主，房子被沒收，人被掃地出門。1960 年大饑荒時，外祖父母和二舅先後餓死。大舅之死是我家諱莫如深的話題。隱約聽村裏老人們說，大舅是被槍斃的。我曾多次追問母親和三舅，皆不得確答。九十年代我上大學後，母親和三舅才陸續告訴我大舅之死的真相。

大舅自幼聰明，好學上進，弟兄三人，外祖父只供他一人上學，一直念到大學，加入國民黨。大舅畢業後回鄉任公職，不久當上鄉長。1949 年，大舅被捕判刑，50 年秋鎮反時被拉到鄉里學校操場，在群情激憤中“就地正法”。外祖父一家事後才得消息，強忍泪水（反革命家屬不得公開表達感情）去收尸。大舅橫尸操場邊的田埂上，身下一灘血。外祖父把大舅的尸體拉回來，連夜掩埋，不敢留有墳頭。大舅是個書生，當了很短時間的鄉長，是舊政權最基層的公職人員，不是惡霸，也無命案，更未暴力反抗新政權，却未經審判，被群眾大會執行槍斃，真是冤哉。

舊政權的高級官員，大多被製成統戰標本，不但不殺，還被安排成政協委員之類。當時定反革命罪非常草率，不經任何審判，鄉里某個頭子甚至村裏小頭目都可以決定槍斃鎮壓反革命分子，往往在學校操場之類開闊地上開個群眾大會，就予以正法，濫殺妄殺非常普遍。許多無辜的人被殺，還給親人留下屈辱的反革命家屬帽子。鎮反已過去半個世紀，反右、文革都予以平反，至今却仍未給鎮反一個說法。

### 父親糜藕池 糜蓮子

1950 年秋，一天晚上，父親晚飯後出門訪友。10 點多，父親捧著一包熱騰騰的包子回家，推門就喊：“祖英，拿包子，娃娃明早吃。”母親應聲走過來，却見父親身後站著一個頭戴鴨舌帽的生人。“啊，有客人，請進！”她誤以為是父親的朋友。一聽這話，父親轉過身，問：“請問，你找誰？”見有人跟上樓來，父親有些詫異。“啊，糜先生，區長有請……”“區長找我？有何貴幹？”“沒什麼事，區長請糜先生過去閑坐，想請教一下先生。”

父親接過那人遞上的公函看了，說：“那好，請稍等。”便轉向母親：“祖英，你把我那包東西翻出來，讓我帶著。”母親翻出一個布包，遞給父親。包裏是父親在抗戰期間獲得的獎章、獎品和一些證件，還有忻口戰事之後衛立煌、蔣介石等人授予他的金獎章、懷錶、鋼筆等。“祖英，你先睡下，我一會就來。”父親接過布包對母親說，便與鴨舌帽一同下樓

而去。

幾經周折才打聽到父親這是被暗捕了。母親趕緊去找貴陽市市長秦天真、副省長周素園。秦是父親的同鄉，搞地下工作時被捕過，父親曾保他出獄。周是父親的故舊。見到我母親，秦市長誠懇地說：“糜二哥爲和平大義，放下武裝，以獨立第一師師長的身份參加西南綏靖區起義，來省城居住後，又參加市政府組織的學習，應不會是被捕，恐有誤會，待我打聽清楚，讓糜二哥儘早回家。”周也這樣說。

不久，秦市長回母親：“軍中不放人，說糜二哥態度強硬，請他說降他的學生曹紹華，他推說曹與他不和，請他帶兵攻打曹，他說年事已高，可是在下面，他對朋友說：‘我不能勸說我的學生去背叛我的校長啊！我自己加入起義，已對不住……’說著還流淚。軍中說他死心塌地效忠老蔣，拒絕與我們合作！”

母親一聽，急了，趕忙說：“秦市長，請您爲藕池說說話，你知道他這脾氣，一輩子就講忠孝節義。只是他沒有犯法，請省裏看重這點，釋放他。”秦市長答應再去說情，不久告訴母親，上邊堅持不放人。這時秦的夫人，也是母親少年時的老師熊老師走了出來，母親便上前跪下，說：“請老師救救藕池！”熊夫人扶起她，說：“糜二哥太反動了，我們想盡辦法，都通融不了。你回去好好照顧娃娃吧。”母親只好寫請告書，遞到省政府，陳述丈夫沒有觸犯國法，抗戰建國有功，請無罪釋放他。他若犯罪，請法律庭審。可是母親的請告書，和父親的身影一樣，石沉大海。

母親一邊奔波救人，一邊變賣舊衣度日。父親忻口戰役時的老上司陳弦秋師長，見自己的部下遭難，妻兒無著，便暗中送錢給我母親。陳師長對我母親說：“糜藕池一輩子不喝兵血，人又豪爽，總幫親友，所以他一點積蓄都沒有，這我知道。”母親聽了十分感激。父親不喝兵血，是指他帶兵從不克扣士兵的軍餉。

到了 1952 年，母親才聽說父親已于 1951 年 5 月 1 日作爲歷史反革命被鎮壓了。父親像三國人物那樣豪義，保釋救援不少共產黨人，然而他自己竟被共產黨視爲不共戴天之敵遭到槍決，母親哭得昏厥過去。

母親只將噩耗告訴了大哥，大哥捧著一幅鉛筆畫大哭。我們跟著大哥哭，却不知道畫這幅畫的父親已不在人世。那幅鉛筆畫，是父親在監獄暗淡的光綫中用心畫下的，輾轉數人才送達我們手裏。畫面上漫天風雪飛舞，一株老松被大雪壓倒在地；一隻幼小的松鼠蹲在樹上，眼睛大而驚疑，蓬鬆的尾巴在身後高高翹起；小松鼠的上方，有一枝昂然綻放的梅花。畫的背面留有父親的絕筆：“我心愛的寶貝們：爸爸就要出遠門了，好多年、好多年回不來呢！但你們可要記住啊，一定要努力學習，孝順媽媽，德和智雙佳，讓爸爸在遠方爲你們高興！堯兒，煩勞你了，幫助媽媽帶好弟妹。這幅畫，是爸爸爲你和弟妹畫下的。你看，小松鼠多可愛，它單純、無知，想知道天下的一切。永遠愛你們！爸爸 一九五〇年冬天”

另有一信，是寫給母親的：“祖英，我對不起你，丟這麼多兒女給你！你的性格我知道，善良、重情義。但請你聽我的話：你才 35 歲，這樣年輕，務必改嫁，過新生活；也請你給娃娃，找一個好心的繼父！永遠愛你！你的夫君 九泉保佑你”

成爲反革命家屬的母親，無法找到工作，只能給人洗衣、打掃衛生。親戚勸她說：“以後娃娃都是國家的下一代，何必跟著你餓飯？”于是母親忍痛將兩個最小的妹妹送人。

1955 年，陸築坡（父親在湖南收養的一個孤兒，後讀軍幹校，留在父親身邊工作）找到母親，講述父親在貞豐被害的經過，以及他掩埋父親的情況。

“我穿著農民衣服，跟著看鬥爭教育長。他們問他：‘你老實交代，貪污的錢在哪里？’教育長指著肚皮說：‘在這裏！’我馬上明白教育長的意思。他一生多在軍校任職，七七抗戰爆發上前綫作戰，從未當過父母官。他奉命任師長兼貞豐縣長時，也是委托秘書王均全權代理縣長職務，他只負責軍隊。他指著肚皮說‘在這裏’，是憤慨地表達他除了吃飯，沒有貪污。那個時候天天鬥人，縣長、保長、甲長、鎮長、地主、富農、讀書人、紳士，不經司

法審判，草草鬥完就推到不遠處槍斃。農民被發動起來鬥人，跑著看槍斃人，我跟在他們中間，聽有人指揮：‘子彈磨薄，這一位，要腦袋開花，不見面目！’就見人磨子彈，磨好，就要開打教育長。只聽教育長說：‘看見成立共和國，我參加起義。不曾想，你們至今還是土匪！’槍就響了，他老人家的頭，就遭打開花，面目全非。我難過得沒法看，死死記住教育長的裝束，半夜跑去背他的遺體，朝白天看好的隱蔽地方背去，深挖一個坑，將他老人家埋了。我眼淚八撒，跪下叩頭，就趕快逃出貞豐。”

陸大哥說：“教育長冤枉啊，他一輩子不貪污，不收老百姓的禮物，規定我們也這樣，說國家有難，發財就是犯罪。他窮一輩子，我們也跟著窮，可解放後，我們反而成了‘蔣匪軍’。”陸大哥走後，母親悲痛萬分，不斷地說：“為什麼？他死得這樣慘，他究竟做了什麼壞事！”

父親青年時代一心保衛共和，17歲隻身奔雲南，一路賣畫求生，晚上睡人家屋頂，到講武堂學軍事。3年後父親在雲南加入倒袁護國軍，被蔡鍔將軍派作偵探，遠赴四川偵察敵情時被俘。在綁赴殺場途中，父親慷慨作絕命詩，打動仁人志士，撿回一條命。

1981年，我開始為父“落實政策”奔走，不想程奎朗却提出異議，說：“糜藕池是反對起義的。作出起義決議的當晚，他獨自喝悶酒、流淚，寫反詩哀悼蔣介石！”當事人蕭開訊參謀長當面激烈地批駁程：“我真想說你狗嘴吐不出象牙！糜師長丟不下對蔣校長的情義，一時間反對起義，起義後流淚寫詩，都是人之常情！難道要他有奶便是娘才好？他最後服從集體，加入起義，已是改變不了的事實。何況，他抗戰立了怎樣的功勞，你不知道？這樣的人怎該被殺，你說？”

1982年，父親和陳弦秋師長抗戰時的老上司陳鐵軍長多次在政協會議發言：“糜藕池是抗戰功臣，不給他落實政策實在說不過去！”我和弟弟去見陳軍長。看到我們，陳軍長很興奮，拉著我的手，一個字一個字地大聲說：“見到你們，我又想起糜藕池，他是一個英勇善戰、熱情助人的人，他讓人喜歡、信任。”陳軍長講了一個父親飛奔上馬，前去營救下屬的故事給我們聽。我聽著，眼淚不斷地流。

198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際，陳弦秋師長給貴州省政協寫了一個提案，倡議為國民黨起義師長糜藕池被鎮壓平反。1987年3月，貴州貞豐（1949年父親師部所在地）法院來省城找到我，告訴我已給糜藕池平反，把《刑事改判書》遞給我，要我簽字。讀完改判書後，我無法接受以下內容了：“一、撤消本院一九五一年度特刑字第99號刑事處分書對糜藕池的量刑判決。二、對原判宣布沒收財產予以維持。三、對糜藕池按起義人員對待。”我向來人申明：“這份改判書我不能接受，原因有二：一、承認他為起義人員，又維持‘沒收財產’原判，說得過去嗎？二、我父無房無地，一生未置不動產，所謂‘原判決書’‘沒收財產’，對我家不起作用（我們也從未見過什麼‘判決書’）。你們現在的改判書第二條，‘對原判宣布沒收財產予以維持’，是再度侮辱我的父親，也辱沒你們自己——沒有誠意，不怕人耻笑。試問，如果家父擁有財產，那是他的權利與自由，誰也無權沒收，不是嗎？然而，他被非法奪去生命，妻兒在痛苦與饑寒中掙扎，挺到今天，最珍貴的，難道不是精神上的道歉嗎？可你們却為可憐的所謂財產，繼續凌辱被殺害的英魂，欺負他的親人。請想一想，我能簽字，將這份‘改判書’交給悲苦一生、現已七十多歲的老母，讓她再次接受你們的欺侮嗎？”

我拒絕簽字，複印改判書後，將原件退到貴州省統戰部。我對統戰部長重申了上述申明，他接過改判書，沒說任何話。

後來我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山西省忻州市委1985年8月出版的《忻口戰役親歷記》一書中，看到宋思一將軍寫的《陳鐵八十五師忻口抗戰見聞》，其中寫道：“于是陳鐵即命糜藕池團拂曉向突破口之敵進攻，經過激烈的白刃戰後，一下恢復了幾天來被敵奪去的原陣地。天明後，敵不斷反攻，均被擊退，敵連續反攻幾天均未得逞。”這時我才理解，為

什麼陳鐵軍長和陳弦秋師長那樣慷慨激昂，倡導爲我父“平反”，那樣一憶起家父糜藕池，就感情飽滿、激情四射。

二位將軍的心願被打折扣，被褻瀆了，可是我仍然感激二位將軍，他們沒有忘記糜藕池不怕犧牲、神勇抗敵的愛國壯舉，這就夠了。我奔波致力於爲家父“落實政策”，唯一目的，是想看到加害于他的同胞今天能有道歉的誠意。儘管我的這一良好願望，在貴州省貞豐縣的《改正判決書》上破滅殆盡，但我並沒有悲傷。父親和千百萬國軍將士抗擊倭寇的沸騰熱血早已永載史冊，決不會因別人的態度發生絲毫而改變或減色！

## 一個閨友的身世      丫   丫

土改那年，父親還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那一天，村公所裏又抓了人，父親跟著人流跑到那裏。村公所擠滿了人，父親奮力擠到人群前面，看到兩男一女五花大綁跪在那裏，一個幾個月大的嬰兒躺在地上嗷嗷大哭。父親認得他們：那五十多歲的男人是這家的長者，二十多歲的男子是他的兒子，那年輕女子是他的兒媳，那哇哇大哭的嬰兒是他的孫兒。

父親跟這家人沾點兒親，知道他家的底細。那長者的父輩從外地逃難而來，開墾了別人不種的荒地，沒日沒夜勞作幾十年，有些積蓄之後又買了一些好田地。一家人憑著肯下力氣、會過日子，到長者這一輩，置下幾十畝地。但是日子過得仍然很仔細，這麼多地，只在農忙時才雇個幫工，與雇工同吃同勞作。

今天爲什麼把他們一家抓來？父親不明白。抬頭看見村裏的民兵隊長，父親就更明白了。那個好吃懶做沒掙得一分地，靠偷雞摸狗混日子的流氓，現在當著工作組的面，竟成了被眼前這一家逼得走投無路、苦大仇深的受壓迫階級的代表。

父親後來得知，如今這個當上民兵隊長的流氓，看上了這家的兒媳婦，幾次調戲不成，就懷恨在心，尋機坑害他們一家。

“把惡霸地主 XXX，惡霸地主的狗崽子 XXX 和他的狗婆娘 XXX 立即拉出去鎮壓！這個小狗崽子有沒有人要？沒有人要一起鎮壓了！”民兵隊長叫道。村民們鴉雀無聲。年輕的母親愛子心切，匍匐在地祈求著：“大爺大媽大叔大嬸，請看在幼兒無辜，煩勞收養，大恩大德，來世再報！”

鄉親們發出隱隱的抽泣聲。嬰兒似乎明白了些什麼，嗷嗷的哭聲漸漸弱了，變成斷斷續續地呢喃，聽來仿佛是一聲一聲的“恩-媽-恩-媽”的叫聲。純良的村民終於抵不住那幼兒的一聲聲呢喃，一位年輕女子走了出來，彎腰輕輕抱起地上的嬰兒，似在說給衆人，又像說給嬰兒：“我們沒有孩子，你今後就是我們家的孩子！”

一聲不吭跪著的父子二人幾乎同時硬生生地叩頭致謝。“押下去！”民兵隊長嘶豪著，幾個持槍的民兵拖起老少三人，拉到村外亂葬崗執行槍決。

不久之後，工作組被調離。民兵隊長失去工作組的支持，恢復了流氓無產者的原形，後來打了一輩子光棍。那個嬰兒被撫養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後來，他的女兒成爲我的閨中密友，但是直到父親告訴我這一切，我才知道她的身世。

---

補白：張秀山在 1947 年土改期間是東北松江省委書記，他所領導的土改，曾對當地的地主富農造成了極爲嚴重的打擊。當年他公開主張，鬥爭地主不要受任何條文限制，打擊得越激烈就越人道。然而到了晚年，在回憶自己父親的發家史時，張秀山顯然再不認爲地主都是應該打殺的惡人了。他寫道，他父親原本貧窮，12 歲時還在給富人家攬工、放羊，連糠

窩窩也不够吃。但因為好學，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幹，莊稼種得好，家境就逐漸好起來了。又趕上光緒末年陝北大旱，許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賦，被迫出讓河灘地，轉讓給了他父親家。他父親一家把石灘地改造成了水澆地，因而很快發了財，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辦下幾百畝地，雇了一兩個長工，還出租了一部分土地，“這樣就成了小地主”。“那時買地，一畝好地也就一塊銀圓，不好的地只值幾毛錢。”因此，父親省吃儉用，常常跑幾裏路進城去忙活一天連花個銅板買個燒餅都捨不得，而是“有了錢就買地”。不僅如此，他父親還十分同情革命，給了他很大幫助。

張雲初

父親是這樣被殺的 鐘茂昌

我是黑五類的兒子，是被錯評為“反動富農”的兒子。我家根本沒有富農的財物和田地，土改時每村都要評出一個靶子，作為批判對象，不然土改不下去，田分下去沒人敢要，于是我家就被定為富農，作為土改的靶子。

我父親名叫古子，民國時期任過甲長（村長），鎮反時被解放軍抓去，關在長汀縣城大牢，與一個土匪頭子關在一起。這個土匪頭子也叫古子。1958年正月十八，槍斃土匪頭子那天，行刑者到牢房提人，叫一聲“古子”。我父親以為是要釋放他，他認為當甲長沒有大罪，就大聲應了一聲：“到。我是古子。”執行者就把我父親五花大綁，插上斬標，一共18個犯人，一起押赴長汀縣去四都路旁一個小山崗上，用機槍掃射。當時沒有法院，縣長或看守所長說拉出去槍斃就可殺人，沒有審判，沒有驗明正身。

父親被抓被殺後，我家成為反動富農。1957年我考取武漢航空學院，鄉黨支部書記說：“戶口不能遷，不能讓反動富農的兒子上大學。”就這樣，害了我一輩子。

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疼不癢之世界。 曾國藩論清末 焦國標書

澄海殘害人八十七式 餘少鐺

文革期間，廣東潮汕地區殘害人瘋狂至極。這裏的八十多種殘害人的招式，已被汕頭澄海塔園首座民間文革博物館勒石記下。當年不少害人者和被害者，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鄰、同事或姻親，而且雙方都堅信自己是革命派，是擁護毛主席的，對方才是反革命。這跟張志新、林昭等人的被害有本質的不同。

1、活埋。公安特派員、派出所長餘再苞，被抓去假活埋，逼他承認反黨反毛主席。餘說沒有這回事，結果被革命派一鍬一鍬加土活埋而死。

2、大石壓尸。人被打死，還用大石頭壓其尸身，稱讓其永世不得翻身，也不得投胎轉世。

3、尸奸尸：把一男尸一女尸剝光，女尸置下，男尸置上，成交媾狀。

4、打風爐窗：原省農業廳長、全國模範地委書記余錫渠的長子余俊生，被用利器刺死，死後用衝鋒槍掃射，尸體打成“風爐窗”。



- 5、挑面腺：用大頭針挑刺手掌靜脈邊緣和神經末梢。
- 6、石塊砸頭：機關幹部許漢味，被用石塊砸頭死于樓下街口。
- 7、壓大石：在被批鬥者身上壓大石頭。
- 8、活人展覽：教師杜良克看不慣某些人造謠惑眾，抨擊了幾句，便被關進一個木籠，作為反革命展品陳列，任人侮辱，最後被開水澆死。
- 9、懸粽子：把人捆成粽子，架于兩隻水桶中間，用一根大竹棍穿過，四面挨打。年邁的副縣長王鼎新，民主人士，曾受周恩來委派改組國民黨澄海縣黨部，即遭此刑慘死。
- 10、擦亮眼睛：抓起頭髮，用槍尖準星拖擦兩眼。
- 11、獎白蘭地：把人打傷，再灌冷水，使傷口難以愈合。
- 12、獎食魚骨：誇被鬥者硬骨頭，強迫他吃魚骨頭補鈣。
- 13、獎食大蕉：強迫人吃屎。
- 14、毛擦捅喉、十指扎針。
- 15、牛頭相答：用力推兩個人，使頭與頭相撞，以此取樂。
- 16、狗舂碓：打人後八卦（背部正中）。縣潮劇團支部書記林錦榮，即被打得當場吐一便壺血。
- 17、施肥：副區長杜之基被用刀在身上“放圈”，多處澆上硫酸，最後在“中國共產黨萬歲”聲中斃命。
- 18、田塗破：用刀在身上插四邊，挖一小方塊肉。肉沒挖成，人已昏死。（田塗破，潮汕話挖土塊的意思。）
- 19、開水利溝：用刀在被批鬥者身上劃刀痕。
- 20、竹梢打屙：用刺勾竹竹梢抽打男人生殖器。
- 21、碎石塞陰：光天化日下，在公路邊、工廠、村頭剝光婦女褲子，將碎石塞入陰道。
- 22、煤釘穿肛：用燒紅的長柄煤釘穿肛門，插入大腸。抗美援朝立過功的縣飲食公司經理歐宏在樓下街口受過此刑。
- 23、梭標穿陰：用梭標或鐵釘捅婦女陰道。
- 24、趁熱打鐵：像鍛鋤頭一樣，亂棍狠打。永新大隊一總支委在批鬥臺上遭此毒打，吐血而死。
- 25、踏菜脯：把人打倒在地，用腳猛踩其腹，造成腸粘連，當場窒息，經救治復活。原縣公安局副局長余岳雲即遭此刑。（菜脯，蘿蔔幹。潮汕人製作蘿蔔幹，先用腳踩去水分，再用鹽漬。）
- 26、舂膏藥：用槍托又捅又舂，把人全身舂爛。某公社黨委書記姚秋龍，在押往潮安的汽車上，被此刑舂爛致死。平反時，在竹竿山挖出其尸骨，26條肋骨全被打斷，無一完整。
- 27、架雙巴掌：父被批鬥，十二歲的小女兒給父送飯，也被拖上雙巴掌，嚇得神經錯亂，不久死亡。（雙巴掌，可能是批鬥台的名稱。）
- 28、飛毛腿：喝令被批鬥者成排低頭站直，施刑者轉身飛足踢其下身，使人倒地翻滾，痛不欲生。縣影劇管理站站長陳錫藩在縣城新會堂遭受此刑。
- 29、點尿穴：曾在解放戰爭中搶救過受傷游擊隊員的中醫師黃煉石，在縣城新會堂被懂拳腳穴位的打人者點打尿穴，致其此後小便失禁，一年後死亡。
- 30、扣搖琴：將男性被批鬥者剝光衣服，用竹片輕搖重打其生殖器。
- 31、喝狗咬：吆喝軍犬或土狗撕咬被批鬥者。
- 32、拔河：用粗繩子捆住被鬥者腰部，兩隊人從相反方向拉。
- 33、舉重：讓被批鬥者手托 50 斤重鐵塊接受批鬥。
- 34、縛鉛綫：用鉛綫捆綁被批鬥者胳膊或手掌。
- 35、抽鉛鞭：用幾根 8 號鉛綫扎成鉛鞭，抽打被批鬥者。

- 36、長跪炙日：連續從早上日初出，跪至日落燈上。
- 37、長跪請罪：令被鬥者長跪于毛像前，稍有搖擺即遭毒打。
- 38、玩小皮球：將一個才兩歲的男童在地上甩。
- 39、踢皮球：強令被鬥者跪于庭院或房子中間，或者黑布幕後，打人者站于四周，把人當球來回滾踢。
- 40、敲布鼓：敲打孕婦肚皮取樂。
- 41、和尚撞鐘：將舊式長凳平懸于被批鬥者前面，再將被批鬥者兩手反綁于身後，然後用力猛推長凳，使其撞擊被批鬥者胸部。
- 42、獨木難支：將一片七寸見方小木板釘在一根椅腿上，成爲一隻獨腿凳子，強令被批鬥者“坐”在上面，施刑者冷不防抽打被批鬥者，使其栽倒。
- 43、聽耳機：把未熄滅的烟蒂猛地塞進被批鬥者耳窩，致使耳窩被燙傷。
- 44、和尚背米：強迫人背著大石頭接受批鬥，直到被石頭壓倒。
- 45、請佛祖：用器物點打男人陰囊，不打死，只打得他翻滾哭叫，從中取樂。（潮汕話稱辜丸爲卵核，核音同佛。）
- 46、敲木魚：用大烟斗猛擊被批鬥者腦袋。
- 47、榴彈滾身：用木柄手榴彈擊打被批鬥者全身，重點是肝區、肋骨，致多處重傷。
- 48、榴彈擊腦：全國勞動模範杜美宗，被用木柄手榴彈錘擊腦部，死于潮安縣監獄門外。
- 49、鎖喉扣：用板指掐住聲帶，被批鬥者聲音嘶啞，有口難言。
- 50、打喉結：縣潮劇團副團長黃延臣被打喉結。
- 51、穩扎穩打：鐵扎包布打肺部、肝區、心腎，傷在內臟，外不見紅。受刑者過後即出現血尿、吐血，或形成內臟粘連，長期傷痛或并發其他疾病。
- 52、數鐘點：在被批鬥者脖子上挂秤砣，每 10 分鐘撞擊胸部一次，然後慢慢加速，至每 60 秒砸一次，先輕後重，直至受刑者不省人事。
- 53、流星錘：將自行車鏈綁上秤砣，甩打全身。
- 54、九紋龍：用自行車鏈條抽打全身，致全身遍布龍狀傷痕。
- 55、挖黑名單：誣說被批鬥者心中藏有黑名單不交代，要劈開胸腔取出。
- 56、四人打夯：四個大漢各拉被批鬥者四肢，高高舉起，再用力摔下。縣委副書記吳仁秀即被當場夯死。
- 57、烏魚泡肚：把被批鬥者長時間浸泡在水中。
- 58、水上飛機：把被批鬥者懸于大榕樹丫，墜入池塘，然後用竹竿敲打，讓他自己掙扎滾動，自喝池水。
- 59、空中飛人：把被批鬥者懸吊起來，一人用刀割斷繩子，另一人在繩斷的剎那用力推被吊者，讓其飛摔。
- 60、倒吊金鐘：使被批鬥者長時間倒懸。
- 61、皮革踩腎：逼被批鬥者跪下，在其後用響底皮鞋猛踩其腰，致腎部內臟受傷，當場撒血尿。澄海縣文化館、新會堂、大眾戲院、財貿辦等地多處使用此招打人。
- 62、板指啄肝：乘批鬥者不備，從右側用板指啄其肝區，造成內傷。
- 63、長凳直劈：在逼被批鬥者承認莫須有罪名的訊問中，遭到說理抗辯，即舉起一公尺長的長凳向被批鬥者腦門直劈擊砸。據幸存者回憶，幸及時閃避，僅致左肩脫垂，手和左身多處受傷，皮綻肉裂，血流滿身。
- 64、敲欽錠：用鐵錘敲擊被批鬥者的耳上腦門，如敲欽錠鑼一樣，致被批鬥者腦殼凹裂而死。
- 65、破西瓜：用木片當刀劈腦，雖沒劈開，可致腦部傷痕累累。
- 66、船釘錐腦：某公社社長余慶，被革命派用船釘從腦部錐入，當場斃命。

67、打開天窗：用釘鉚打腦部。中學歷史老師章文，被制耐火磚用的釘鉚擊打腦部，致頭部千瘡百孔，傷愈後仍神志恍惚，天天向江青寫信求救。1976年，“四人幫”在權鬥中失敗倒臺，中央專案組從江青辦公室抄出一疊章文寫的信，疑章為江青爪牙，特意從北京派員調查。

68、練活靶：將被批鬥者吊起，用凳子腿、石塊或其他短器瞄準其胸部，用力投去，看誰投得准。

69、飛機吊及跪鐵釘板：兩臂被往後吊起，雙腳離地，長時間吊著，直到被吊者不省人事。汕頭市某處處長陳若山，潮安黃金塘人，剛宣布調任某縣縣委書記，還沒上任，文革開始，遭批鬥，被施以飛機吊和跪鐵釘板刑罰，膝蓋扎傷多處，長期傷痛。

70、跪碎玻璃、跪碎蛤殼、跪碎石、跪香糊罐。香糊罐（木糖椗包裝罐大小，瓷的）是完好的，讓被批鬥者跪在上面，兩膝各一。鬥人者使勁打被鬥者，直到香糊罐破裂，碎片插入膝蓋骨。

71、扳鵠翅：把人的手反扳，用力打其肩，使其肩胛脫垂。

72、吊沙包：用小鉛絲把二三十斤重的沙包挂在脖子上，鉛絲會嵌進肉裏。

73、沉廁池：把被批鬥者推進廁池，說把他“徹底搞臭”。

74、披荊斬棘：強迫被批鬥者俯身穿過荊棘叢，不斷來回，直到傷痕累累為止。

75、清醒頭腦：大冷天，讓被批鬥者站著，將冷水一瓢瓢從他頭上澆下，直到內外衣服濕透為止。

76、爬陰溝：強迫被批鬥者從臭水溝爬進爬出取樂。

77、擔椅枷：用辦公椅把跪著的被批鬥者籠住，上面再層層疊加椅子，似表演雜技。

78、頂腎：喝令被批鬥者跪下，鬥人者用膝蓋猛頂被批鬥者腎部，致其當場失禁撒尿。

79、畫黑臉，塗黑手：用鍋頭、烟囟灰或墨汁亂畫臉和手。

80、戴破笠，戴破籃：教師籃繼權，被紅衛兵改名籃破舊，又改名舊破籃，令其經常戴破籃接受批鬥。

81、燙電爐：電爐燒紅後斷電源，用以燙被批鬥者。

82、吃狗食、舐貓槽：強令被批鬥者吃狗吃過的東西，用舌頭將貓的食槽舐乾淨。

83、戴馬桶：著名潮劇演員姚璇秋，技藝精湛，曾出國演出，被戴馬桶開大會批鬥。

84、戴鐵帽：用鋼條焊成三四十斤重的鐵帽，游街或批鬥時，讓反革命分子戴上，一戴就昏厥。

85、雷公電母：用三節手電筒擊打腦部。地委副書記、專區公署專員陳煥新，被車輪戰批鬥幾十個小時，並加雷公電母多次，巡迴批鬥中被擊打死。

86、抹紅粉、塗五色釉、剃壽桃發、著彩羅裙：澄海縣委書記余錫希被剃成幾歲小孩子的壽桃發，面塗釉彩，並著彩羅裙侮辱，外加毒打。

87、剃瘋狗頭：將頭髮剔一部分，留一部分，扮成瘋狗的樣子。澄海縣保健院院長林道輝即遭此打扮侮辱，外加毒打。

博斯騰湖大捕殺 李 金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紅色恐怖登峰造極。我和我初中時的老師張樹人，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從塔里木荒原上的一個國營牧場向烏魯木齊逃亡。那時南疆尚無鐵路，

我們坐班車途經庫爾勒，當晚住在庫爾勒火車站候車室。班車到達庫爾勒車站時，離天黑尚早，張樹人老師呆在候車室休息，照看簡陋的行李，我就到車站附近的街道上轉游。突然，我看到牆上有一張新貼出來的布告，一些人圍著看，我也走上前去看。

這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貼出的一張布告。布告上大約有 20 多人被判處死刑，每個被判處死刑的罪犯的名字都被劃上一道血淋淋的紅杠杠。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罪犯名叫徐長生，四川長壽人，25 歲。布告上說，該犯系盲流出身，在博斯騰湖打魚為業，其罪狀是撕毀了一張毛主席像，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我的腦子“轟”的一聲，就像晴天起霹靂，立刻把我震懵了。這個年輕人我認識，我們有過一兩次交往。文革初我也曾流浪到博斯騰湖，在湖中打魚割葦抓水老鼠，因而認識一些在博湖謀生的盲流。這個徐長生，為人忠厚，仗義，怎麼會有意撕毀一張毛像而被判處死刑呢？一個年紀輕輕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因為這樣一件事被隨意槍斃了。他才 25 歲，正是生命的黃金季節啊！

接著看下去，布告上所有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幾乎都是在博斯騰湖打魚割葦捉水老鼠謀生的盲流。其中一部分人，我都見過，認識。那些被判處死刑的罪犯，沒有一個有殺人放火，行凶搶劫，或顛覆政府的確鑿罪行。他們的罪名幾乎全是因為說了幾句對現實不滿的話，就隨便找個藉口，處以極刑。其中有個姓杜的，名字記不起了，四川人，也是在博湖打魚、賣魚為生，判處他死刑的理由是他的一個舅父是國民黨軍官，一個姑父是右派分子，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以社會關係複雜而判人死刑，全世界恐怕絕無僅有。這張布告上所判的幾十人，全是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其中有一位四川自貢人，叫羅緒剛，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雇工剝削。他在大河口（開都河流入博斯騰湖入口處）打魚，兩名從關內進疆的盲流小夥來投奔他。出于同情，他收留了這兩個盲流，就被安個雇工剝削的罪名。

這張布告給我打下終身難忘的烙印，眼睜睜看著自己認識的一些人被無緣無故地殺戮，我只覺得自己實實在在是生活在非人間，生活在人間地獄。

博斯騰湖是新疆戈壁荒漠中的一個大淡水湖，位于和碩、焉耆、尉犁幾縣之間。湖區面積近千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新加坡和兩個澳門。湖中烟波浩渺，蘆葦叢生，幾十個大小島嶼散布其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那場舉世罕見的大饑荒中，關內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謀生，許多人就逃到當時還相當荒涼、人迹罕至的博斯騰湖，以打魚割葦捉水老鼠為生。文革時又有許多內地逃亡到新疆的盲流，為了躲避公安部門、造反組織和收容站的抓捕，陸續聚集到博斯騰湖。他們藏身在蘆葦叢生的小島上，劃著卡版（獨木舟），或捕魚，或割葦，或捉水老鼠，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當時全中國階級鬥爭白熱化，這兒是盲流的樂園。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掀起空前慘酷的紅色恐怖，當局決心端掉這個盲流樂園。他們調集正規部隊、兵團值班連和沿湖各縣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博湖結冰的機會，對整個湖區進行大包圍，大搜捕。據傳公安部門發現湖中有敵特的電臺活動，當局判斷那裏隱藏著蘇修特務或美蔣特務。興師動眾大搜捕的結果，一個蘇修特務、美蔣特務也未抓獲，抓的全是在湖中打魚割葦抓水老鼠的盲流。這些無辜的盲流成了美蔣特務、蘇修特務的替罪羊，當局隨便找個莫須有的罪名任意殺戮判刑。

當年發生在博斯騰湖的慘絕人寰的盲流大捕殺已過去四十多年了，當年那張草菅人命、濫殺無辜同胞的布告却刻骨銘心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時時在我眼前出現，讓我寢食不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的開篇題辭說：“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我是僥幸逃脫被捕殺命運的進疆盲流幸存者，我有責任把我所見所聞所曆的告訴後來人。

盲流是當年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是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打工仔和農民工的前

身。由于其分散性，文化素質相對低下，他們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今天我將這件至今仍被深深掩蓋的歷史事件披露出來，以慰死者，以警來者。

---

補白：有一對父女，父親是反革命分子，女兒是小學三年級學生。有一天，學校召開批鬥大會，父親被同學們揪進會場。班長命令父親站在條凳上，低頭彎腰，雙臂向後伸直，又點名讓他女兒上臺發言。女兒慢慢走向講臺，眼含泪水，背了一段毛主席語錄，然後便是沉默。班長無法忍受這種長時間沉默，帶領同學們一遍遍地高呼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林之清！”然後催促女兒徹底揭發林之清的反革命罪行。女兒被逼無奈，終於一步步走向父親。同學們息聲屏氣，等待一場更加刺激的好戲，有的甚至激動得站了起來。只見女兒走近父親，踮起脚尖，把父親脖子上挂的反革命木牌正了正，並順手在父親的下巴上迅速地摸了一把。父親是個講究儀錶的人，他的習慣就是撫摸自己的下巴。那一場批鬥對父親來說既是一種痛苦，也是一種幸福。從此，無論面對怎樣的折磨，父親總能平靜地接受。文革後有人問他是什麼力量支撐他熬過了那段時光，他回答：“是女兒的愛。”這個女兒後來成了我的妻子。

鄭伯秋

---

#### 父親的夢想 李興濂

我三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人世，聽母親說，父親身材高大魁梧，是個好莊稼把式，扶犁、打場、趕車樣樣農活都幹得麻利。他犁的地，田壟直得跟綫打的一樣，一個犁花兒壓著一個犁花兒，從北道口到南山根，一條壟有一裏地長，壟與壟之間距離勻稱得簡直分毫不差。三伏天，父親頂著烈日，下地鋤草，汗水浸濕一寸寸土地。秋收時節，父親堆的谷垛，齊整整像刀切的一樣。穀場上不見一絲風，別人家的穀，堆在場上等來風，而父親操起木鍬，不緊不慢，一堆穀子就揚出來了，別人說他鍬下生風。

父親下地從不穿鞋，儘管穀茬扎腳，父親似乎全然不覺，幹完活才穿上放在地頭的鞋。父親忠厚老實，很少說話，但是嘮起土地，說起莊稼，如數家珍。父親最傾心的是土地，站在自家的土地上，就感到心裏踏實。他常跟家人講地主張秧子的故事。有一年，一個乞丐到張秧子家討飯，張秧子叫家人給他幾張餅吃。二少爺不高興，心疼那幾張餅。張秧子說，讓他吃吧，吃完了，反正拉屎也拉在咱家地裏。乞丐聽了，心裏說道，這泡屎絕不拉這家地裏。乞丐吃飽了，憋著一泡屎，走了五裏地，心想，這裏該不是他家的地了，脫褲子就拉，拉完了朝別人一問，這地仍是他家的。

父親的夢想就是做張秧子這麼大的地主。為了買地，我們全家吃稀飯，穿舊衣，糠糠菜菜，縫縫補補，終於攢錢買了七棵樹和土地廟那兩塊地。這兩塊地是地主丁山賣給父親的。丁山有個兒子，在瀋陽幹事，告訴他爹，一定把地賣了。父親買了地，不久却去世了。接著就是土改，因了這兩塊地，我家被定為富農，丁山却成了貧農。

#### 貧協主席蔣大杆 興 濂

一條大河把大地分成兩半。河東土質肥沃，抓一把能攥出油；河西土質瘠薄，除了沙子

就是石頭。河東山勢平緩，土層深厚，長著茂密的林子；河西山勢陡峭，怪石粼粼，像凶神惡煞。河東的住戶大都是富裕人家，河西的住戶大都是貧困人家。

河東最大的財主叫姜六，有瓦房三處，土地八百多畝，長工十多個。他原來住在河西，後來富了才在河東置家業。日俄戰爭那一年，從外面跑來一匹白馬，身上馱著一個口袋。姜六兄弟幾個正當青壯年，沖上去把馬攔住，卸下口袋一看，裏邊裝的全是白花花銀子。他們把銀子倒出來，裝上石頭，馱在馬背上，把馬打跑了。後來才知道，那馬馱的是日軍的軍餉，炮火一響，馬驚了。

薑六有錢了，買了土地，蓋了瓦房，置了馬車。土地多了，兄弟們幹不過來，便雇了長工。姜六對窮人仁義，家人吃稀，長工吃幹；家裏來客，長工陪客吃飯。河西的窮人沒米下鍋，薑六就讓人到他家倉裏裝幾斗米。就這樣，河東河西，窮人富人，幾十年相安無事。

平地起春雷。一個天黑風高的雨夜，河西的窮人被鼓動起來了，拿起扎槍、木棒，趟過河，分了薑六的土地、房屋、家產。姜六一夜之間成了窮光蛋，由於平時積善，沒被亂棒打死，全家被攆出河東，住在原來河西的破草房裏，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姜六有個兒子，叫邦子。邦子八歲那年，一撥鬍子（土匪）到河東薑六家搶劫。姜家大人把財寶帶走，騾馬藏進後山密林裏，來不及帶走邦子。邦子奶奶就把孫子藏在衣櫃裏，自己坐在炕上，緊依櫃門。鬍子翻箱倒櫃，沒找到錢財，又不見男人，見邦子奶奶在炕上神色慌張，便一把把她拽下炕，打開櫃子，把邦子撈了出來。鬍子頭見邦子虎頭虎腦，甚是可愛，就說：“沒得錢財，得到一個乾兒子也成！”便把邦子帶走了。

姜六知道兒子被綁票了，想拿錢贖兒子，派人四處打聽，沒任何消息。幾年後，邦子竟奇迹般回家了，原來那撥鬍子被人打散了。邦子人瘦了，個高了，野性十足，暴躁凶狠。土改一來，邦子領著河西的窮人打開自家的大門，叫窮人抬這抬那，把家裏的東西全抬光了。貧協主席蔣大杆還是不依，要挖薑家的浮財。他讓姜六夫妻對打嘴巴，說出浮財，薑六不忍打，姜六妻子更不忍打。邦子說：“不會打？我教你們！”便甩開手臂朝父母臉上打去。幾個耳光下去，姜六夫婦臉像血饅頭。因為大義滅親，邦子受到表揚。那年冬天，邦子過河，掉進冰窟窿裏，屍體也沒找到。

蔣大杆原是河西最窮的人，地無一壟，房無一瓦，光杆一人，靠偷雞摸狗為生。此人長得矮小，膽子特大，鼠眉鼠眼，經常到薑六家偷東西，還常當內綫，把鬍子領到薑六家。土改時，蔣大杆當上貧協會長，騎著高頭大馬，跨著盒子槍，揚眉吐氣，威風凜凜。分地分財時，蔣大杆不僅分得薑六的土地、房屋、財產，更痛快的是還分到了薑六的小老婆。

那天，蔣大杆帶領河西的窮人來到姜六家，分完浮產後，蔣大杆看著薑六的小老婆心裏癢癢，就對薑六說：“你有兩個老婆，我一個沒有，你一個雞巴操倆x，我一個雞巴幹閑著，這公平嗎？分我一個。你是要腦袋，還是要小老婆！”說完把盒子槍往桌子上一摔。薑六嚇得兩腿亂顫，渾身哆嗦，眼睜睜看著小老婆被眾人扶上馬。儘管姜六小老婆又哭又罵，無奈人多勢眾，當夜她投河而死。

這個蔣大杆，命大，死幾次沒死掉。一天夜裏，他在東山被人用棒擊倒，第二天早上又活過來。當了貧協會長後，他把婦救會的女人都睡遍了。後來工作隊來了，婦女們告他，工作隊說打死他，於是婦女們用亂棒將他打死在路邊，可是後來他又活過來了。有人來告工作隊，工作隊說，留他一條狗命吧。蔣大杆活到八十三歲。

土改一完，蔣大杆就“響應黨的號召”，動員翻身的窮人參軍，“保衛勝利果實”。他的動員手段很有創意：讓婦救會的女人把大炕燒得火熱，邀來二十多名青壯小夥子坐在熱炕上，蔣大杆坐在屋中央八仙桌邊，屋外是扎槍隊。蔣大杆講話，先講參軍的意義，解放天下受苦人，接著公布參軍的指標，全村共二十五人，還強調說參軍要自覺自願。剛分完勝利果實的人們，本來是喜氣洋洋的，一聽參軍，神情緊張起來，誰也不言語。十分鐘，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半天過去了，屋內靜悄悄的。蔣大杆急了：“還不好意思報名呢，這好辦，只要動一動彈，就算報名參軍了！”

此時是三九天，屋子熱得像蒸籠，炕熱得像鍋底，小夥子們臉上流汗，坐不住了。王山想換半個屁股，蔣大杆看見了，說：“王山覺悟高，第一個報名了。”兩個民兵把王山拉下炕。這一拉碰了張五，張五也被拉下炕。不到兩小時，炕上二十幾名小夥子一個個被拉下炕。炕上只剩下劉七，身上的棉襖都浸濕了，還是一動不動。蔣大杆等不及了，說：“好個劉七，我看看你的屁股是不是鐵屁股！”上炕一把把劉七拽下炕，發現劉七褲襠裏鼓囊囊的，扒開一看，襠裏墊了鞋底子。“你小子破壞徵兵工作，我第一個就讓你去堵槍眼！”劉七嚇得面如土色，叩頭說：“我報名，我報名！”蔣大杆徵兵經驗受到表揚，全鄉推廣。

---

補白：兒子剛上初中時，有一次我帶著情緒批評他，他氣衝衝地說：“你別來地主這一套作風！”我怒火中燒，舉手打了他一巴掌。他毫不示弱，動手反抗，在家裏（僅一間屋）父子爆發了武鬥。幸虧他媽媽盡力勸阻，才制止了。兒子在外邊因家庭出身受到歧視和欺侮，一肚子冤氣只好對我發泄。這場父子武鬥的根源，就是因為我出身破產地主家庭。祝偉坡

---

地主家的女子 秦 漢

1956年正月初一，郭亞玲出生在涇陽縣小寺郭村。解放前，郭家有土地160畝，擁有牛拉轎車。文革前，群眾高唱革命歌曲涌進郭家大門開會，她爺正吃粘面，氣得生病，次年死亡。又一年，婆氣死。房子被拆，沒地方住，幹部讓父親伐樹，又法辦了父親。

外婆是鄉村裏少見的女人，領人在地裏幹活，揮動木鍬揚場，麥粒流騰空舞成彩虹。母親善良膽小，走在街上不敢直看人。她相貌好，故意蓬頭亂髮。走親戚，半路上才敢換衣裳，地主家的媳婦，沒有打扮的權利。她家門前寫的語錄是“在階級社會，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烙印”，她羨慕貧下中農門前寫的語錄。

她寫大字“黨是太陽照”，太字少一點，被同桌發現，捂著不讓她加，拿起本子飛跑，她哭著攆。工作組老韓看了說：“以後再寫錯，要受批判。”還說：“今後聽到你父母黑了（夜裏）睡覺說反動話，給我報告。”她晚上用被子捂住頭，不敢聽父母發牢騷。生產隊在飼養室開會，她坐在玉米上。隊長到來，瞪著她命令：“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退場！”她低著頭紅著臉跑回家撲在炕上嗚嗚哭。

她愛唱戲，大隊科研站要她，隊長說她是地主家的女子。科研站以排戲為主，她一有時就坐在水渠邊大樹下看短篇小說創作談。自己出身不好，要出人頭地。她學畫畫、寫小說，筆名想叫紅蓮，別人說你是地主家的女子。地主成分像四堵牆，包圍著一個胸懷大志的青年。

父親端著烟袋鍋說：“人一輩子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往前磨。”她想，不死就磨。二十多年後，這個地主家的女子磨成了作家。如今郭亞玲是陝西省作協會員，禮泉縣作協副主席。

黑皮人格 山 道

我鄉黃土高原上把那種恃強凌弱、橫行鄉里的地痞流氓稱為黑皮。鄉人一般不招惹這種人，見面客客氣氣，免得惹禍上身。萬一被黑皮找上麻煩，絕大多數人都寧願相信破財免災，吃點虧完事。

過去黑皮人物並不多，往往幾個村才產一個。如果黑皮實在無法無天，攪得相鄰不得安生，族長或村裏德高望重的長老會站出來說話，把他叫來訓斥一頓。多數黑皮聆聽教訓之後會有所收斂，也有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黑皮，想與鄉里傳統權威較量，到頭來十有八九要吃鞭子。四十年代有個黑皮，被鄉村權威捆起來，吊在驢圈裏用鞭子抽，又吊一天一夜，此黑皮後來改邪歸正，金盆洗手。

實際上，做黑皮也占不了多少便宜。我們那裏民風淳樸，婦孺盡知黑皮不是好東西。某人一旦被鄉民認定是黑皮，就很少有人願意同他打交道。也就是說，一旦背上黑皮的名聲，就進入了良民不屑或不敢與之為伍的行列，類似於進入了鄉村社會黑名單。如此一來，他可能在一些雞毛蒜皮小事上沾點便宜，但在大事上鄉親們就都躲著他，不與往來，這個損失就大了。

但是後來歷次政治運動催生許多鄉村黑皮。政治運動之初，往往本分的農民都不積極，甚至抵觸。黑皮則認為是個機會，就趁風起帆，成為主宰鄉里的顯赫人物。千百年來，鄉親們信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是現在看來失靈了。一些人開始羨慕黑皮，黑皮的作人方式儼然成為一種立身處世的成功標本。如此一來，傳統社會的是非之心垮掉了，橫亘在黑皮與良民之間的道德感、羞恥心的邊界綫消失了。

狗崽曾經是我鄉遠近聞名的一個黑皮。這傢伙從小坑蒙拐騙，腦子够用，惟獨缺少良知。70年代，狗崽同生產隊長老米為一點小事發生衝突，從此下決心把老米整下臺。

當時收拾一個人，無非有三種理由：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好色。幹部們都有一個共識：“只要不站錯隊，裝錯錢，上錯床，誰也拿我沒辦法。”老米作為生產隊長，與政治不沾邊，窮得叮當響，惟一可被鑽的空子只剩女色了。老米在男女之事上很本分，也沒任何把柄可抓。可是天下事難不倒黑皮，狗崽就動員自己的婆姨獻身，準確說是獻出名譽，作為攻擊老米的炮彈。

再窮再賤的女人也不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名聲，不過狗崽的婆姨有點特殊。當初狗崽惡名在外，找不到媳婦，一個親戚可憐他，為他介紹了一個姑娘。後來姑娘的父母打聽到狗崽是一個黑皮，想反悔，可是黑皮好沾不好甩。他先是好言相求未來的丈人丈母，不成又惡言相罵，最後發展到聲稱不給女兒就要同他未來的丈母娘睡覺，再不行就毀掉女方全家。女家實在經不住這樣折騰，本來這女子自身也有殘疾，個子還不到一米四，一直無人提婆家。如今碰上了如此不講理的主兒，最後將就同意了這門親事。

狗崽相信打出來的媳婦揉出來的面，女方過門後，兩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一年後，婆姨服帖了，第一個孩子也出世了。狗崽用自己的方法穩定了家庭，成家立業了。如今狗崽動員老婆“獻身”，已被狗崽的拳頭征服了的殘疾女人，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同意。

狗崽到公社、縣上告狀，說老米搞了他的婆姨。幹部們都不信，心說老米怎麼可能看上狗崽的殘疾婆娘。再說，捉奸捉雙，證據在哪里？沒證據別亂說。狗崽說他有證據，證據就是他的雞雞特別小，而老米的非常大，現在他婆姨的那個地方變大了，他自己非常清楚，是老米給撐大的。狗崽反問幹部：“誰願意拿自己的名譽開玩笑？那老米是我們村的一霸，我都忍氣吞聲這麼多年了，實在是欺負得人沒辦法了。”聲淚俱下，彌天的冤屈。

對這種告狀，幹部沒別的辦法，只能按部就班，記錄，轉交，核實。你要不查，狗崽天天跟著你沒完，弄不好還會追問你為什麼包庇壞人。查的結果，自然是子虛烏有，但是一兩回折騰，老米的名聲可就毀了。沒惡意的人把它當笑料，與老米有過節的則樂得添鹽加醋。老米也曾想打上狗崽的門，但是，他誣告你沒事，你若打他就有事了，說不定狗崽正樂呵呵



地等著聽你被拘留的消息呢。你還沒動他，他可能倒在地上自己蹭掉一塊皮，然後跟你攪和。攤上這種事，老米只有自認倒黴。

鄉里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此後，大姑娘小媳婦見了老米，不由得就低頭繞著走了。最後，無論上面的領導，還是周圍的百姓，都越看老米越像那個偷斧子的人。狗崽的名聲當然不會因此一天天好起來，然而老米的名聲却的確確因此一天天爛下去。不久，老米下臺了，理由當然不是作風問題，但大家都知道，根子還是狗崽那檔事。

現今人們可能不理解：老米怎麼那麼窩囊，不會反告狗崽誣告嗎？問題是當時沒有誣告罪，無論提告你什麼，你只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老米下臺，反而像坐實了謠傳似的。老米只好儘量少出來走動，沒事呆在家裏生悶氣。

後來狗崽當上了村長，憑著他的黑皮勁，他跟鄉、縣的不合理攤派頂牛，鄉民挺擁護他。相當多的年輕人都佩服狗崽有本事，一些外出打工的，出門前還到狗崽家討教怎樣對付城裏那些不講理的人。狗崽在村裏傳經授徒了。

---

補白：我太爺爺被定為大地主，儘管平時行善積德，也行醫救人，村裏人為保護他，把他藏起來，但終究沒逃過追捕，後來死在牢裏，至今都沒找到他的遺骨。爺爺在文革中因大地主出身被批鬥得很慘，全家被隔離，幸好爺爺挺過來了，文革後得到平反，並恢復了名譽和職務。2008年，爺爺在平靜中去世。目前他的後人都過得很好，孫子輩大都已移民。

---

孫中山的孫女 孫穗芳

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三年高中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却在進入大學深造時落選了。在收到不予錄取通知書的前一天，派出所的人把我叫去參加鬥爭地主大會，來接受這個場面教育。會場上，人們對地主拳打腳踢，叫嚷著要槍斃他。有人對我咆哮：“你以為你是誰？你的出身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我被嚇得不知所措。第二天，我接到通知，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此時我對自己的未來悲觀極了，却連哭都不敢哭。

這時我想到了祖母宋慶齡，就從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因風濕病去外地療養了。北京還有我的做建築師的舅舅嚴星華和舅母王婉玲，我就到了舅舅家。舅舅當時在蘇聯，設計莫斯科-北京飯店。舅媽的警惕性非常高，得知我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學錄取，當天就去派出所彙報了。舅舅家我也不能多呆了。當時郵電部部長朱學范的兒子是我的中學同學，他們在上海時與我家曾是鄰居。現在，朱伯伯怕出身不好的我連累他們，吩咐兒子不要和我來往。

我沮喪極了，萬般無奈，就給祖母宋慶齡寫了一封信。祖母很快回了信，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我把祖母給我的信寄給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女幹部來找我，說現在國家的政策是一時左一時右，這個學期入學太遲了，明年我將會獲准進入大學讀書。

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有人說我是花崗岩腦袋，不積極接受改造；有人貼出大字報、小字報，批判我，逼我承認出身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家庭；甚至在公開場合，我也時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濟三年，每學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裏學生黨支部書記旁邊，作業時常被抽查，所有筆記本都要定期交出來，以便他們檢查我的思想。期終考試我得了滿分五分，但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經過重新評分，只給我二分，這是一個不及格的成績。對於做學生

的我，這種待遇無異于想判我死刑。那些政治思想進步的學生，即使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須補考，但系裏又告訴我，所有的教授都說我不用補考了。我並不擔心補考，我寧願補考再拿五分。結果，在成績單上，我的分數被填成三分，勉強及格。

因了出身，我的思想被認為有毒素，于是 1958 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農村勞動。住的地方潮濕陰冷，睡的是泥土地，我患上了全身風濕性關節炎，至今未愈。他們讓我幹最髒最苦的活，說這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方式，我必須用勞動清洗血液中上代傳給我的毒素。當年我經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猶如做了一場噩夢。

---

補白：嘎子是我小學同學，天資聰慧，口齒伶俐，但有個毛病，愛提問題，有時弄得老師張口結舌。小學入學語文課本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老師剛在黑板上寫完，嘎子就提出問題：“老師，聽人說過去皇帝萬歲，怎麼毛主席也萬歲？”後來學習《半夜雞叫》，地主周扒皮半夜起來學雞叫，讓長工們半夜起來到田裏幹活。嘎子又提出問題：“老師，半夜裏黑古隆冬，伸手不見五指，周扒皮讓長工到地裏幹活，那不把田裏的秧苗都鏟掉了嗎？”老師說，這小子將來肯定惹事生非。1957 年，嘎子在他家房門上寫副對聯，上聯是“二四六八”，下聯是“三五七九”，橫批是“南北”。一日，縣裏工作隊路過他家，見這副聯，說這是污蔑大好形勢，于是將他打成壞分子，因為這幅聯缺衣少食沒東西。 李興瀛

---

## 一件誣陷案 曹 爲

霍進義與焦墨林同住在太原遠郊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土改時，霍被劃為惡霸地主。1951 年鎮反時，焦墨林檢舉霍進義有燒毀山林、反攻倒算和殺害我方工作人員的罪行，霍因此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霍死後，其妻改嫁，不滿 8 歲的兒子流落街頭。土改復查時，發現霍進義不是地主，而是中農。既不是地主，就不構成反攻倒算。有關部門把此案送公安局處理，由公檢法聯合組成工作組進行調查，我代表太原市人民法院參加調查。

小組成員共七八個人，我任組長。我們調查的第一個對象，是指證霍進義殺害我工作人員的證人。這是鎮反時判霍死刑的主要罪證。證人進屋時，我們幾個人都有些吃驚，竟然是一個抱著吃奶娃娃的年輕婦女，20 歲左右。我工作人員被殺是 1948 年，已經是 5 年前的事了，這位婦女那時不過十五六歲。她是如何在大雪紛飛的除夕夜發現村外那具屍體的？未成年的她又怎麼可以做證人呢？

問訊開始後，這位婦女一直低頭不言語，或撫摸孩子的小臉兒，或強按著孩子吃奶，面部表情很複雜。我們問她是怎樣發現那個死者的，經反復解釋，她終於開口了：“那是我舅舅焦墨林讓我在一張紙條上按了個手印，我就不知道那上邊寫的是啥！”之後就再也沒話了。這麼一件致人于死地的大事，她只說了一句話就完了。

我們調查的第二個問題是，發現那具屍體前後，霍進義在什麼地方，幹什麼，有無人證？經瞭解，那幾天村裏有一戶人家辦喪事，有幾個人去幫忙，其中就有霍進義。據這幾個人證明，當時霍進義一直和他們在一起，根本沒出去過。那幾天下著大雪，從村裏到村外，殺一個人還抱了東西，不是短時間可以幹成的。隨後我們又查清，原來那個死者是國民黨軍營裏的一個通訊員，那天他搶了一些財物，用自行車推著往家走，走到村外，被另外幾個散兵劫持打死。有人認識這個死者是焦墨林的親戚。

再一個問題是反攻倒算，燒毀山林。儘管霍進義不是地主，但燒毀山林也不是小事。當

地人家有在院子裏做飯的習慣，霍在院子裏做飯時，身旁有棵剛剛長起來不高的樹苗被火燒著，隨即撲滅，根本不是什麼燒毀山林。

還有一個問題，焦墨林為何編造這麼多事害霍進義？其意圖是什麼？犯罪動機何在？

恩怨起于土改時期。焦、霍兩家土改以前多年來都有矛盾，土改時工作隊隊長住在焦家，和焦的女兒有染，焦利用這點關係，把霍劃為地主，因兩家時常發生打鬥，又據此把霍劃為惡霸地主。

焦墨林誣告霍進義的來龍去脉終於查證清楚，隨後檢察院以誣陷罪提起公訴，建議法院判處焦墨林十年有期徒刑。

第一次開庭時，焦墨林一進法庭就一屁股坐在地中間，大聲嚷著說：“你們憑什麼扣押我？快放我回家，我養著兩箱蜜蜂呢！再不回去，蜜蜂死了，你們得賠我。”氣勢汹汹，似乎認定自己根本沒罪，是我們抓錯了他。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了罪，還是故作姿態迷惑人？我不敢斷定，他為非作惡，必有靠山，不然不會連法院都不放在眼裏，公然擺出一副撒潑的架勢。經過事實對證，最終他蔫了。經審判委員會討論，擬判處 5 年徒刑。委員會認為，除土改中錯劃霍的成分外，鎮反時沒有認真查證就判處霍死刑，司法部門也應該承擔一定責任。

如此一來，此案涉及土改、鎮反，我們又報請省院復核。省院改為 3 年徒刑，認為此案主要責任應由國家承擔，不僅減輕刑期，還對被誣陷致死的霍進義做了善後處理。霍妻已改嫁，霍的兒子由國家供其上學到 18 歲，此後再為他安排生活出路。

## 五六十年代的職業歧視 曲 子

一九五六年我高中畢業時，國家規定，報考留蘇預備生及軍事院校的學生，首先要通過政治審查，經保送後再參加統考。當時政審不算太嚴，我們天津鐵路中學，有三個學生被錄取為留蘇預備生，十個被北京航空學院錄取，十個被哈軍工錄取，其中考入哈軍工的十人有兩人出身地主家庭。隨著階級鬥爭的弦繃得越來越緊，那兩個上了哈軍工的地主子弟被清理出軍人隊伍，一個分到農機廠，一個當了煉油廠工人。

我有兩個出身于歷史反革命家庭的中學校友，一個上了北京農業大學的畜牧專業，另一個儘管考分可上北大，由于出身不濟，不得不就讀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高出該學院錄取綫近百分。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學習成績優秀，非常喜歡航空專業，由北京四中保送，考入航院。畢業時，由于有海外關係（其父在印尼經商），被分配到北京精密機床研究所，從事機床設計。

六十年代，我岳母在北京東城區演樂胡同的一個集體制小工廠工作。這裏的工人大部分是街道上沒有文化的大爺大媽，工資很低，少的二十多元，多的三四十元，廠長五十多元。一次，我在該廠遇到一位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年歲和我差不多。她怎麼會在一個街道小廠工作呢？經瞭解，原來她地質學院畢業後分到外地一個地質隊，因丈夫在北京工作，家住北京，有兩個孩子，就沒有“服從國家分配”去地質隊，而留在了北京。“不服從國家分配”那還了得！從此她再沒有進入國家企事業單位工作的機會，只能在街道小廠當工人，或在商店、菜市場作售貨員。

農曆十一月二十，鎮裏鬥爭偽鎮長李杰，會場設在鎮西北角的露天劇場。石砌的戲臺搭個大席棚作爲主席臺，席棚正面懸著橫幅，上寫“大漢奸大惡霸大地主李杰鬥爭大會”。席棚和牆壁上貼著紅紅綠綠的標語口號，戲臺正面坐著一排威嚴的主席團成員——十幾個貧農團的幹部，戲臺兩側站著十幾個威武的持槍民兵。

台前左側站著十幾個低頭彎腰戴著紙糊高帽的地主，每個地主身後站著兩名彪形大漢，各用一隻手把地主的兩隻胳膊擰到身後，另一隻手按住地主的脖子。這些地主都是陪鬥，被鬥的主角李杰五花大綁跪在台中間，兩名彪形大漢威風凜凜地站在他身後。李杰戴著紙糊的高高的尖頂帽，胸前挂著一塊沉重的大木牌，寫著“大漢奸大惡霸大地主李杰”。李杰兩字故意寫得東倒西歪，還用紅筆劃了一個很大的叉。李杰緊閉雙目，吊著嘴角，一副桀驁不遜的神態。這天是大集，戲臺下面人山人海，人們擁擠著，喧嘩著，伸長脖子爭看戲臺上的主角李杰。

控訴鬥爭的積極分子們，一個接一個跑到臺上控訴。他們怒目圓睜，義憤填膺，聲嘶力竭，控訴到傷心處，有的痛哭呼號，對主角手撕嘴咬，拳打腳踢。這時就有人領著高呼口號：“打倒大漢奸大惡霸大地主李杰！”“徹底消滅封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貧農團萬歲！”“土改運動勝利萬歲！”台下呼應如雷，震天撼地。鬥爭進入白熱化，台下爆發出一片吶喊聲：“打死他！”“剮了他！”“活埋！”“掌天燈！”有一群人不顧順序，蜂擁著跳到臺上，爭打李杰和陪鬥的地主們。

會場大亂，民兵們急忙維持秩序，主席也跳了起來，大喊：“不要亂！不要亂！要遵守大會秩序！秩序！我們一定滿足大家的要求！要求！”人們已經瘋狂，會場無法恢復秩序。主席急忙命令民兵把被打得頭破血流的陪鬥的地主們帶走，把被打得半死的李杰從憤怒的群眾手裏搶出來。

“把大漢奸大惡霸大地主李杰點天燈！”主席下達命令。幾個民兵立即用鐵鎖鏈把李杰拴牢，又把一大桶煤油澆到半死的李杰的身上，然後就把李杰往戲臺傍邊的高竿上吊。吊起後，民兵用點燃的麻秸秆向李杰的身上一捅，那火就騰地熊熊燃燒起來。會場沸騰了，人們望著那團徐徐上升的熊熊烈火，瘋狂地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貧農團萬歲！”“土改運動勝利萬歲！”

---

補白：二癩子土改時很窮，分得地主穆老人家三間房子。幾十年了，還是窮，三間房快塌了，仍然無錢翻修。不得已，二癩子從城裏親戚家借一些錢來，重新翻蓋。拆老房大梁時，二癩子發現大梁上有一塊堵木。把堵木挖開，裏面有一個牛皮紙包，打開一看，是塊金元寶。二癩子沒聲張，連老婆也沒告訴，把小元寶揣在懷裏。穆老大這個地主，土改前也就那三間房，另有二十多畝地。由于家裏沒人幹活，就雇了個長工，就是二癩子。二癩子很清楚當年他的東家是怎樣省吃儉用置辦家業的，更知道這顆金元寶是怎麼來的。那一年，穆老大從山上挖人參，運氣很好，用挖來的人參換了這顆金元寶。晚上，二癩子吃完飯，偷偷來到穆老人家。穆老大已因病臥床多日，二癩子從懷裏掏出元寶，穆老大的眼淚簌簌從老臉上落了下來。他沒有伸手去拿那元寶，甚至連看也沒看，緊緊握住二癩子的手，嘴角顫抖著，想說什麼又說不出，腦袋一歪，便永遠離開了人世。

李興濂

---

## 嵇根醜之死 秦腔

陝西省鳳翔縣範家寨鄉有個農民叫嵇根醜，與老母親相依為命。根醜的運氣不錯，當兵很吃香的時候，根醜竟被選上當兵去了，不久還入了黨，當了班長。現在他夢寐以求的是能當上排長。排長與班長雖差一級，却是軍官與士兵的分界綫。士兵服兩個兜，一當上排長就能穿四個兜。四個兜是幹部服，一當上幹部，後半輩子就不愁了。

根醜是個老實人，老實人不可能升得太高。此後一次次提幹的機會竟都從根醜眼皮底下溜走了，自己毫無辦法。那些比他表現差的戰友都提拔了，惟獨他，年年受表揚，年年原地不動，還是班長，只有幹活的份，沒有提拔的命。根醜心裏雖窩火，却不敢流露絲毫，惟恐得罪了那些掌握他命運的人。

1972年，根醜復員了。政府對復員軍人有安置政策，可是三年過去了，沒人安置根醜。那些比他復原晚的，因與大隊幹部沾親帶故，或因心眼靈活，靠手榴彈（酒）、炸藥包（點心）和二十響（烟）之類開路，陸續都安排了。惟有根醜，依然戰天鬥地，奮鬥在農業學大寨的第一綫。

在根醜的村子裏，一個勞動日的價值只合六分錢。當時陝西最便宜的羊群牌香烟，一盒九分錢，勞動一天還買不到一盒最便宜的香烟。當時國家實行統購統銷，所有的糧食，留下口糧、種子和牲畜飼料，其餘必須全部以極便宜的價格“賣”給國家，這叫統購。糧食被統購走以後，如果不够吃或發生災荒，再由國家把糧食賣給農民，是為統銷，又叫返銷。統購指標按預先估計的產量下達，地方幹部貪功，往往虛報產量，結果，年年先高統購，再吃返銷糧。根醜一年的勞動所得，有時連買返銷糧的錢都不够。有一年春節，想給老娘買半斤肉，可是沒錢，根醜絕望透了。

從此根醜變了，愛發脾氣，動不動就上火，故意找幹部的茬。隊長派工挑水抗旱，根醜一條扁擔挑兩個墨水瓶來了。隊長當然來氣：“根醜，你這叫抗旱？”根醜振振有詞：“毛主席說了，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隊長哭笑不得，無可奈何。

終於有一天，隊長忍無可忍，大罵根醜。任何把自己看作別人的根醜也爆發了，掄起鐵鍬將隊長打傷。

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隸。公安來了，把根醜帶走，關進牢裏。根

費希特句 焦國標書 醜認為，沒什麼大事，關幾天就出來了。——提審時，牢房外高喊：“稽根醜，出來！”牢房內，根醜可嗓子吼起秦腔《紅燈記》裏李玉和的唱詞：“獄警傳，似狼嚎，我邁步出監。”

最後，根醜沒有判傷害罪，而被判破壞農業學大寨罪，刑期五年。寶雞地區軍分區政委兼寶雞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知道了，發出指示：“這個案件不同一般。這傢伙曲解毛主席語錄，為自己的反動行為作掩護，污蔑大好形勢，審訊時還說農民吃不飽，糟蹋樣板戲中李玉和的形象，這是嚴重的現行反革命，我看要判處死刑。”

槍斃根醜那天，幹部、社員奉命去縣城觀看公判大會。縣城離我家十五裏，參加大會給記半天工分，我去了。根醜被五花大綁，眼裏充滿憤怒，臉上寫著不屈。

幾十年過去了，許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根醜之死震撼至今。我對這個社會的質疑，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1971 年十一前後，片警三天兩頭深更半夜帶一大幫人上門查戶口。後來很久才知道是發生了“9?13”事件。我家是他們查的重點，床鋪底下都要用手電筒反復照過。開始我覺得，查就查，沒什麼可怕的。思考再三，感到還是有懈可擊。我家有一尊小型毛半身像，夜裏若明若暗能發光。那材料非常輕，很容易倒，于是我想，若哪天夜裏老鼠把它絆倒了，甚至鼻子被咬破，我又沒有發現，恰巧半夜查戶口的來了，被發現，我這個右派豈不罪上加罪？

于是我暗下決心，儘快把“瘟神”送走。用什麼方式送，送往何處，才安全呢？我絞盡腦汁，一連幾夜失眠，也未找到好辦法。不過，最後還是想出一個萬全之策。

按“老人家”的高度和厚度，我先準備 4 塊馬糞紙板和七八張沒有弄皺的報紙。趁某日休息，我關好房門，先在地上鋪兩張報紙，并使之重疊，再讓它仰臥報紙重疊處，繼而將 4 塊紙板輕輕立于四周，最後用繩子纏繞之。如此固定之後，再以其下的報紙將其包好，并用飯粒將報紙邊沿粘牢。接下去再包第二、第三、第四層，最後用紅頭繩十字交叉系好。

一切就緒，我又到門外觀察四鄰是否有人坐在大門口。斷定無人，我便飛快出門，直奔一路電車起點站。至武昌大東門，又登上往郊區花山方向的汽車。我選擇最後一排坐下，然後將手裏的“東西”假裝漫不經心地放在身邊。距終點站還有兩站路，我作匆忙狀空手下車，將“東西”留在車上，接著乘車原路返回大東門，再改乘公汽返回。車過武漢長江大橋時，我望著橋下東去的江水，感到那種恐懼感及其製造者正隨大江東去，不可逆轉。

## 梁羽生的故鄉心 南 都

梁羽生原名陳文統，1924 年出生于廣西蒙山縣文圩鄉，是當地望族。1950 年秋，同學彭榮康在蒙山的鄰縣荔浦碰到陳文統，陳說父親因被人誣告而遭羈押，家人寫信喚他回鄉救人。彭說：“現在到處都在剿匪反霸，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親，只怕自身難保。”他聽從勸告，逃到香港。不久，其父陳信玉被殺。

陳信玉本是和善鄉紳，抗戰期間，日寇入侵蒙山，陳曾組織鄉團抗日保鄉，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一批到蒙山避難的文化名人。中國著名太平天國史專家、曾任馮玉祥軍中政治部主任、廣州社會局局長簡又文，舉家逃亡蒙山，便是陳信玉接濟。簡在回憶錄中寫道：“想起陳家的大恩大德，真令我全家沒齒難忘。我們一家遇到大難，流落在異鄉為異客，正在途窮忘絕、不知死所之際，忽有愛徒體念師生之誼，全族人居然肯接待、供養、庇蔭、護衛我全家十口，卒得平安歸來。”

土改後幾十年裏，梁羽生沒回過蒙山。1978 年鄧小平南下廣州調研經濟特區事務，國務院向香港一些機構送請柬，邀請香港同胞一聚。梁羽生赴宴，同時約侄子陳強中自廣西來廣州見面。梁羽生與鄧小平、廖承志等在一個大廳宴畢，出來就把請柬交給了侄子。侄子在故鄉被人懷疑私通海外特務，梁羽生叮囑他把請柬拿回去當護身符。陳強中回鄉之後，別人看到請柬上有國務院印章，嚇得不再敢騷擾。

所謂故鄉，多是勢利之鄉。上世紀 80 年代，蒙山縣重修文筆塔，照例要向本籍達人游子化緣，梁羽生捐了幾百元，頗被當地人非議，認為他孤寒吝嗇。其實梁羽生捐幾百元已算很給面子了，你

把人家的爹殺掉了，他還捐錢給你，你還有什麼話說！

梁羽生對父親之死始終心結深重。80 年代中期，廣西要員多次邀請梁羽生回鄉省親，

梁要求對其父一案重新甄別，隱然有父不平反則已不回鄉之意。蒙山縣政府經過調查，下文平反。梁給縣政府復信：“先父一事終獲平反，埋于心中幾十年的死結終於解開了。”此時的梁羽生，想必心中無限感慨：若非他一支禿筆打出天下，諒不會成為統戰對象，老父的荒墳也許要永世蒙辱。

1987年，梁羽生四十年第一次返鄉。時值蒙山文筆塔竣工，梁羽生題獻藏頭詩一首，同年移居澳洲。正如《七劍下天山》劈頭那句話：“把劍淒然望，何處招歸舟。”

---

哪里有正義，哪里就是聖地。 培根語 國標書

---

- 一、歡迎來稿和薦稿，也期待您的建議和指正。
- 二、本刊電子信箱：xyc1971@gmail.com。
- 三、本刊聯絡手機：133 6658 6793。
- 四、有意資助《黑五類憶舊》的朋友，  
可通過郵局或銀行匯款。
- 五、通訊地址：北京圓明園西路 北京大學燕北園  
305 甲 110 號 焦國標，郵編 100091。
- 六、銀行卡信息：中國銀行北京北大支行，  
賬號 4080702-0188-038026-9，戶名焦國標。
- 

## 《黑五類憶舊》第十三期 201106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我的歷史真實觀 焦國標

《黑五類憶舊》的文章有兩個來源：一個是來稿，一個是我通過關鍵字檢索得來的。無論哪個來源，每篇都經我改寫，甚或重寫，文章重新命名，無作者名字的臨時起個安上。文字的精准洗練，當然趕不上司馬遷編的《史記》或班固編的《漢書》，但起碼不低于當下任何正式出版物。我是把這些憶舊文字當成日後的經典歷史文獻對待的。

對於檢索來的文章，我掌握一個大致的取舍標準：一、盡可能不選名人寫的或寫名人的；二、盡可能不選已出版或已發表的。因而，個人博客裏的野生文章，漂流在網絡大海上漂丟了作者姓名的穉生文章，是我的最愛。我不是編傳統意義上的正史，也不是編傳統意義上的野史，而是編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史。將來，百年後，千年後，後人若想知道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面貌，只讀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東西是看不到毛時代的社會面貌的，起碼看不到全貌；要看全貌，必須讀我編的《黑五類憶舊》。我一個人平衡一個中央文獻研究室，我一個

人平衡闖中國大陸的幾百家官家出版社和幾千家官家報刊。孔子愛幹“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事，我也是。

有朋友問：你如何確保這些文字的真實性？我說：這個問題從沒有困擾過我。凡存在的都是真實的。謠言所傳的內容是子虛烏有的，可是謠言本身畢竟是真實存在的。同樣，這些憶舊文字，所記內容未必件件真實，可畢竟這些憶舊文字本身是確實存在的。

實際上，真實性本身非常複雜。這個問題我早就想透了，曾寫過專門的長篇研究文章。感性一點說，雙胞胎同時回憶母親的同一件事都會有出入，同一個人兩次回憶同一件往事都會有差異，正如古希臘哲人說的，“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當然這只是一面之理。真實性還有另一面，雙胞胎對母親的回憶不管有多大出入，回憶的都是自己的母親，而不是別人的母親。

歷史真實是無數人通過各種傳播媒介拼接出的一大塊公共信息馬賽克，而且每個後人對這塊碩大無比的公共信息馬賽克擇取放進自己記憶裏的內容都不完全相同，因而任何一件歷史事實在後人的記憶裏都是像被狗啃過一樣豁豁牙牙、參差不齊。我所做的就是盡可能多地貼出新的、與官史不同的馬賽克碎片。

《清明上河圖》是一幅畫，《金瓶梅》是一本小说，《資治通鑑》是一部正統的史書，但它們實際上都是組成中國歷史（包括社會史）的馬賽克碎片。二百年後，後人再說起中國的歷史學家，順口就來的是司馬遷、司馬光、焦國標……。其實，《黑五類憶舊》不僅平衡中央文獻研究室，平衡闖中國大陸全部官家出版社和報刊社，也平衡全部的二十四家正史。

## 目 錄

冷漠的親情·····	王 毅 (04)
父子恩怨·····	宏 昌 (07)
土改惡夢·····	陳懋衡 (10)
當年的貧農團·····	張六和 (13)
那個箭頭是誰畫的·····	白 榆 (18)
摘帽時刻·····	黃家鋪 (20)
小反革命張量冠·····	湖 人 (26)
我的初中·····	馬 青 (27)
父親這一生·····	西 風 (32)
厦大張弘昌·····	江 城 (35)
那時我九歲·····	路 忠 (38)
一生沒笑過的五姑·····	陳仁德 (40)
金庸之父·····	淮 海 (45)
我的第一次婚姻·····	滬 英 (46)
姨婆祖·····	浙 士 (48)
變態的爺爺·····	村 晴 (49)
鬥爭哈密王·····	沈俊杰 (51)
鬥地主酷刑種種·····	薇 萍 (53)
我家被清算·····	曲 爺 (55)
海晏移民泪·····	鐵穆耳 (58)
血腥南京·····	方子奮 (67)



## 冷漠的親情 王 毅

祖母去世，在殯儀館看到了表哥。說不上我們有多少年沒見面了，十年，八年或許更長一點。隔著別的親人，我們眼光相遇，彼此點點頭，算是打了招呼。記憶中，我們好像從來就是這樣偶爾打一下招呼，却不講話。原因，說不清。

表哥小時候性格靦腆，比較內向。當年他考中學時，還到我家來，讓我的做教師的父母給他輔導，成績不算太出色的表哥順利上了一所普通中學。文革期間，剛上初中，只讀了一年中學的表哥，隨著上山下鄉的洪流到農村插隊。我家因父親有“歷史問題”，全家被遣送到農村。

父親的命運決定我的命運，體力勞動以外，還要受精神上的被唾棄、被輕視，被劃歸狗崽子。表哥則不同，他到農村後，由於表現好，成為知識青年標兵，經常到各地去“講用”（文革中先進分子講述自己的先進事迹），入黨、提幹，成為公社黨委書記，是他那個縣的著名人物，“電臺有聲，報紙有名”，只是沒有像當時的知青典型張鐵生、吳獻忠那樣紅遍全國。文革後期，表哥又被推薦上大學，成為工農兵學員大學生，一路走紅，一路走高。

那個時期，表哥是我們這個家族最有出息、最有能耐，給家族帶來極大榮譽的人。我偶爾從農村回城市看望祖父、祖母，總能從他們和姑姑嘴裏聽到表哥的各種各樣先進事迹。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是遼寧知識青年的頭，接見過表哥，與他握手，還吃過一次飯。表哥經常上北京、省裏、市里開會，這樣的榮光是我想也不敢想的。

有一次祖母對我講，表哥對“階級敵人”是決不手軟的。一年冬天，大雪紛紛，表哥召集他們大隊的“階級敵人”，讓他們赤腳在雪地裏跑步，不准停，反反覆複地跑。有的人很老了，跑不動，表哥就上前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拳打腳踢。所以，他們大隊的“階級敵人”一聽到表哥的名字就打哆嗦，非常害怕。祖母說著，嘆口氣。我聽得毛骨悚然，想不出靦腆的表哥怎麼變得如此狠毒，心中暗暗慶幸：我們幸好沒有和表哥下放到同一個地方，如果父親和表哥在一個大隊，他該怎樣對待我家呢？

文革結束後，表哥大學還沒有畢業，我在新的招生制度下走進了大學校門。惡夢終於過去，一切都回歸正常，包括家族、家庭生活。每年大年初一，我們又開始去給祖父、祖母拜年。這樣，和表哥又見面了。當年那個靦腆、內向、矮矮胖胖的男孩，已經是一米八高的大男人了。說來奇怪，十幾年沒見，再相見時，互相看看，點點頭，竟沒有半點驚喜和寒暄，甚至一句話沒說！

文革結束後，表哥曾經的輝煌也變了味道，大家不再談起，倒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家族關注的焦點。尤其祖父，歷來崇尚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對我上大學，不斷表揚，說我有毅力，有出息。我感到好笑：當年他不是也一樣對我們一家視如瘟疫，躲之唯恐不及，而對表哥却津津樂道嗎！但他是我的長輩，我不能像對待表哥那樣對待他。

好多年裏，和表哥年節在祖母家偶遇，都是點點頭，永遠不說話。後來，我畢業、工作、結婚，過年的方式也變了，要隨先生到婆婆家過年，等從婆婆家回來以後再去看祖父、祖母。時間表的錯位讓我再也沒看到表哥，倒是祖母這個我們家族的信息批發站，總要絮絮叨叨說表哥提處長了，分房子了，而且因為工作忙，還把孩子送給祖母照看。表哥的那個小女兒，如表哥當年一樣，矮矮的、胖胖的，有點靦腆，有點木訥。我知道，這個孩子永遠不會有表

哥那樣短暫輝煌的命運了，那個時代永遠過去，成為歷史了。

祖母病重，我開始頻繁探望她老人家。祖父走後，我對祖母突然依戀起來。上帝給我的機會不太多了，我要讓祖母在最後的時間裏感受到親情的溫暖。每次去看祖母，坐在她身邊，給她剪指甲、按摩，老人家都歡喜異常。祖母表示了對表哥的不滿，說她這一輩子最喜歡的是表哥，可如今自己躺在床上，沒有用了，表哥竟然不來看她！我想起表哥雪地裏讓“階級敵人”赤腳跑步的情景——有那樣驚世駭俗的表現，表哥再有什麼樣的行為我都不會奇怪。

祖母以 96 歲高齡離開這個世界。祖母對我們這個家族是有功勞的，她不但撫養大自己的兒女，又為兒女照顧孩子，還為兒女的兒女照顧孩子，她的重孫、重外孫。所以，祖母的葬禮，她所有的後輩都到了。我和表哥又見了一次面，仍然沒有說話。祖母離世，維繫我和表哥之間那細細的、淡淡的血緣之繩徹底斷掉了。我知道，我和表哥從此沒有再見面的理由和可能，更談不上說話了。如果在街上偶遇，也只是擦肩而過的陌生了，儘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城市，有同一個老祖宗。

1969 年春，我開始在核工業 404 廠子弟第五小學上小學，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年底轉到蘭州後，發生一件冤假錯案。一次課間休息，我發現一間空教室裏，不知誰在牆上寫的“毛主席萬歲”上劃了一個叉子。我將自己的發現告訴了最先遇到的同學，那位同學立刻判斷為反標，迅速報告老師。老師問明情況，廠保衛科、軍代表、公安人員很快齊集我校。我被當成了重點懷疑對象，理由是：第一、我先發現了反標，却沒報告老師；第二、經驗證筆迹，那牆上的字體與我的字體很像。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威逼誘惑，一個不到 8 歲的孩子的心靈被徹底擊潰。我終於在承認了沒事的誘導下，違心說謊，承認那是我寫的。接著便是一系列的辦學習班，不僅我自己，還包括家人，都受到牽連。每次在學校受到侮辱，我總要在心裏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哭訴：“毛主席呀毛主席，這反標真的不是我幹的。”但我仍然逃脫不了小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文革結束。

—————

## 父子恩怨 宏 昌

孟樹亘曾任國民黨 144 師副師長。台兒莊大戰時，他浴血奮戰，獲“抗日英杰”獎章。文革開始後，孟樹亘因歷史問題受到衝擊，其子孟凡民宣布與父決裂，並成為造反猛將。

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團體準備召開一場批鬥會，批鬥對象包括其父孟樹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學教師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將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發現他失蹤了，到處查找。孟凡民知道內情，通報給造反派，李湛功很快被揪了出來。1966 年 12 月，李湛功被折磨致死。孟樹亘知悉兒子告密後，手持木棒等在家門口，把回家的兒子擋在門外，大吼“滾”，掄棒就打。此後，孟凡民再也沒有回過家。

1980 年，孟凡民和呂瑞芬結婚。父子間矛盾仍在，孟樹亘對兒子的婚事一無所知，呂瑞芬也沒有去拜見公公。1988 年秋，孟父心臟病發，臥倒在床。由於政策一直未落實，孟父每月只能領取極微薄的薪金。他病倒後，保姆負擔加重而工資卻無法提高，走了。呂瑞芬對孟凡民說：“爸爸不認識我，就讓我去他那兒當保姆吧。”

第二天一早，呂瑞芬來到公公家，說：“聽說您這裏需要保姆，我想得到這份工作。”

老人說：“我收入有限，工資不高，你願意嗎？”呂瑞芬說：“我是外地人，無依無靠，在您這兒有吃有住就心滿意足了。”老人說：“那你就留下吧，什麼時候你找到合適的工作，想走就走。”這是呂瑞芬第一回面對自己的公公。

一天晚上，呂瑞芬向老人提及他的兒子，說：“二十多年的事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親人到底是親人啊。”老人眼裏滿是淒愴，說：“凡民犯的不是小錯，手裏有人命啊！當年李湛功被我兒子害死，他妻子也自殺了，這是兩條人命啊！我若原諒了凡民，人家九泉之下也不會原諒我呀。”老人老淚縱橫，呂瑞芬不好再說下去了。

1990年冬，70多歲的孟樹亘突發心肌梗塞住進醫院。醫生說，最好的辦法是做心臟搭橋手術。孟凡民夫婦商量後，決定用自己的鋪面作抵押，籌措資金，把老人送到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做心臟搭橋手術，通常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靜脈血管做材料。醫生檢查時發現，孟樹亘的血管已缺乏彈性。爲了不影響手術效果，孟凡民要求醫生從他的腿上取血管。父親的手術非常成功，孟凡民放下了心頭石。

第二天晚上，呂瑞芬用輪椅將孟凡民推到孟樹亘的病床前，父親安詳地沉睡著。二十多年過去了，孟凡民第一次如此親近地看著父親，眼淚刷刷地往下淌。住院期間，爲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時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聽到老人在夢中竟念叨著他的小名：“凡凡，凡凡。”回到病房，孟凡民不禁失聲痛哭。

有一天，呂瑞芬在自己家中呆了很久，回去時已近午夜。外面飄著大雪，遠處的景象使她驚呆了：老人拄著拐杖站在風雪中，滿身雪花。呂瑞芬攙扶住老人說：“這麼冷的天，您怎麼出來啦？”老人說：“夜深雪大，你不回來，我不放心啊！”聽了這話，呂瑞芬的泪水直往下掉。

1993年春，孟老背負了數十年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有關部門對他的工資待遇做了調整，醫療費全額報銷，還分給他一套兩居室的住房。生活安定了，孟樹亘卻沒有輕鬆下來，爲搶救歷史資料日夜忙碌。由於操勞過度，老人的眼角膜發炎，且久治不愈，漸漸失明，呂瑞芬成了他須臾難離的拐杖。

父親失明後，孟凡民常去幫呂瑞芬照料父親。他怕父親聽出自己的聲音，和呂瑞芬說話時儘量壓低聲音，或者乾脆打手語。孟老也只當此人是呂瑞芬的家人，對他十分感激。

1996年，孟凡民感到身體不適，去醫院檢查，診斷結果幾乎將他擊垮：肺癌晚期。孟凡民做手術的那段日子裏，呂瑞芬心力交瘁，兩頭奔波，用柔弱的肩扛起了兩個家。

孟凡民雖然做了手術，却難以挽留生命。在生命的最後時光裏，他總結一生的得失，感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最大的錯誤是文革中犯的劣行，最大的遺憾是不能得到父親的寬恕。他給父親留下了一封絕筆信：“親愛的爸爸：我要先您一步去了。此生此世我不管用怎樣的方式都難以洗刷掉我留在您心頭的陰影。假如還有來世，我仍將盡最大努力清洗自己的過錯。我不奢望得到您的諒解，但我會永遠愛著您……瑞芬是我的愛人、您的兒媳，她也會永遠愛著您……”

彌留之際，孟凡民拉著妻子的手深沉地道了一聲“辛苦”，兩行熱淚表達了他的敬意。他向醫院和公證人員交待了最後的心願：把眼角膜捐給父親。孟樹亘的眼角膜移植手術做得很成功，重新見到了光明。老人心臟不好，受不得一點兒刺激，呂瑞芬一直沒有把孟凡民的遺書給老人看，所以孟老在生命的最後四年裏，始終不知道是兒子的眼角膜讓他重回光明世界。

1997年元月3日，孟樹亘溘然長逝。守候在他身邊長達12年之久的兒媳呂瑞芬購置了一塊墓地，將老人與丈夫合葬。從此，孟家父子便永遠相伴在一起。

---

??? 我爺爺起初是一個窮人，但他太勤奮，太能吃苦了，所以成了人上人。我的村子在汶河

岸邊，連接沂蒙山區與河北的富庶之地，自古以來就是官家的驛站和商賈的必經之地。小時候下河抓魚，我曾在村邊清澈的小溪裏摸出過銀圓、銅錢、女人的銀簪子等等。父親說：“爲了成爲人上人，你爺爺沒白沒黑地忙，種了莊稼，再種蔬菜，替人幹活，趕集賣貨，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經過多年的積累，他一點點買下一些好賭之徒的土地，最後將自己兼幷成一個富甲一方的地主。

-----

## 土改惡夢 陳懋衡

我是忠縣城裏“春華秋實”的人。“春華秋實”是我家大門上石刻的四個大字，人們都這樣叫我的人。我家是書香世家，父親民國時當過縣長，主編過《忠縣志》，在地方上很有聲譽。父母做主，很早就將我許配給天塹鄉陶大老爺的兒子陶奎。陶大老爺叫陶華軒，是有名的鄉紳。他有三個弟弟，陶吉軒、陶馥軒、陶南軒，都是滿腹文章的人，陶吉軒還當過四川省參議員。

陶奎朝陽大學畢業，在磨子鄉完小當校長，人很不錯。我們的婚期定在 1950 年正月十二。我在重慶讀書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東西，多次寫信說，我的婚事不能辦：明明已經解放了，還去嫁給一個地主做啥子。我父親堅決履行婚約，說君子不能悔言。我是個孝順女，就聽從父親的話，嫁到天塹鄉陶家，那年我 23 歲。

新婚之初，我父親到陶家來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華軒在亭子樓上把酒談詩論文，非常投機，晚上在燈下暢談到深夜。但是，這種日子很快就過去了，因爲土改開始了。土改是 1950 年冬天開始的。忽然之間，情況就變了，我公公陶華軒兄弟四個，包括陶奎這一輩的兄弟好幾個，都被劃爲地主。陶華軒是個省吃儉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產都是他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

土改分地主的財產，開始人們不大相信，怎麼能把別人的財產拿來分呢？後來看確是如此，很多人就積極起來了。民兵們擁到我們家，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強行搬走。我剛結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帳等全部搬走，泡鹹菜的罇子也不放過。我們身上穿的稍好一點的衣服，被當場從身上剝下來，不准你多說一句話，最後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貴重的東西悄悄帶進城，藏在懋貞大姐家，民兵追進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東西，全拿走了。我公公爲自己準備的生塋，好大一座墳，修得很氣派，也作勝利果實分了。墳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給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開會鬥地主。一說開會，我就害怕。我剛到陶家，與人沒有什麼仇怨，積極分子們拿完我的東西就了事，沒有鬥爭我，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慘了。他們把我公公吊起來打，先把老人的兩個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鉗把兩個拇指夾住，再用繩子把火鉗捆緊，往屋梁上吊。寒冬臘月，民兵們把我婆母的衣服脫光，只留一件薄單衣，然後把她丟進一個盛滿了水的大水缸裏，再把她的頭壓到水裏，過一陣又提起來，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裏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 60 多歲了，怎麼受得了，造孽呀！我們全都被押在旁邊看著，不敢哭，只有背過身去悄悄流淚。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國時期天塹鄉的鄉長，也挨了不少鬥。我二嫂更慘，手被點天燈。什麼叫點天燈？在手窩裏裝上油，然後放上燈芯點燈。她還被大針穿進指甲縫，痛得昏死過去。

村裏有個好吃懶做的人叫陶文鬥，不做農活，在外面要飯混日子。土改工作組說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給他分勝利果實。他做夢也沒想到一分錢不花就會忽然得到這麼多財產，一下就來了精神，成了最積極的民兵，天天提著棍子在村裏走來走去打人。這個人後來培養

成幹部，送到部隊當兵，轉業後在天塹公社當武裝部長。

地主們起先在各自村子裏挨鬥，後來集中關到我們附近龍洞村的一個大崖洞裏，不准回家。那個大崖洞是一個大岩腔，現在還是老樣子。後來我從那裏過都怕，那裏發生的那些事情太嚇人了。我被強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飯給洞子裏送。那些民兵冷，還要我送柴給他們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許多悲慘的場面。

縣商會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關在大崖洞。這個女人長得高高長長，挨的打多，說不完。民兵們要她把金銀財寶交出來，她早就交完，再也沒有了。民兵就把一條蛇放進她的褲襠裏，再把褲腰和褲腳系緊，讓蛇在她的下身亂鑽。積極分子還發明一種叫“舞轉轉”的刑罰，由一個身強力壯的大漢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勁舞圈子，讓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轉。這個女人是個小腳，本來就不容易站穩，加上已經上了年紀，哪里經得住這樣“舞轉轉”，一會兒就昏倒了。民兵們還不放過她，過一會兒又把她提起來舞。

朱耀庭的小女兒不到 20 歲，還是個閨女沒過門，你猜民兵們怎麼整她？他們把她脫光衣服，捏住她的兩個乳房，把又粗又硬的豬脊毛往她乳頭裏刺，刺一下那個女兒就慘叫一聲。人家還是個黃花閨女啊！這個女兒活著出來，後來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殺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華軒、叔公陶馥軒，還有我那個當過天塹鄉長的二哥，後來他們被押到烏楊鎮，天天吊打。已經快過年了，不管日子怎麼艱難，年總還是要過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著他們回來過年。到了臘月三十，家家都在團年了，他們卻沒有回來。最後終於得到他們的消息，在臘月三十那天，正是萬家團圓的時候，他們父子叔侄三人被綁到神溪口，就是縣城對面的河壩，和另外幾十個地主一起槍斃了。幾天後才去收尸，他們的尸體在河邊暴露了幾天，已經變顏色了。我們不敢哭，眼淚往肚子裏流，心裏比刀絞還痛。一家三個同時被槍斃，暴尸河灘，這是個什麼年頭？

家裏沒有一顆米一滴油，過年什麼吃的也沒有，我夫妻二人就沿著村子去要飯。我家陶奎是朝陽大學學生、小學校長，一輩子為人善良，沒有做過虧心事，怎麼落到這個田地呢？陶奎很顧面子，大年下走村要飯，是多麼難受的事！在鄰村趙大發家門口，我好一陣都不敢進去。趙大發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員，我怕他劃清界限不認我。哪曉得他是個善良人，見到我們親熱得很，說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趙大發煮臘肉招待我，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婦，經常挨鬥，不久死去。1961 年，陶奎餓死，我和惟一的兒子相依為命，直到今天。土改時我 23 歲，現在我已經 80 了，將近 60 年來，我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說起傷心。

當年的貧農團 張六和

我六歲就沒了娘，叫日本人炸死的。爹弟兄三個，我弟兄兩個。弟弟過繼給三叔，我們父子倆過活。父親主要做紙札，給死人剃頭，油棺材，我跟他學這門手藝。家裏沒有地，住的是上輩留下的房子。土改時我還小，十二三歲。我三叔當時是農會成員，與我爹商量讓我入少先隊，跟他鬧土改。我爹剛開始不同意，三叔怪爹覺悟低，就教訓他：“你說你半路打光棍，收拾不下個老婆，這是為什麼？是地主封建剝削的呀！”“你說你這每天辛辛苦苦做紙札做些下三濫營生，還得給人低聲下氣，和死人打交道，這是為什麼？是地主封建剝削的呀！”“這一回輪到咱們出頭出氣了，窮人要翻身！”不知是爹的覺悟一下提高了，還是爹給嚇住了，反正最後同意了。

那時候給公家幹事沒報酬，三叔說，革命成功後一併給。爹問：“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該咋辦？”三叔說：“休說這些破楔子話！”

有一天，和我父親成天打交道的呂品賢哭喪著臉來我家，一進門就哭喊：“叔呀，不能活了，我現在是地主成分！”我爹一看他那副樣子，呼哧一下笑起來，說：“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紳。”這呂品賢也是成天在死人攤子上混飯吃的，一個吹鼓手。他家祖上本有好幾家商號，但他游手好閑不學好，先抽大烟，後吸料面，一份好端端的家業生生在他手裏敗落下來，後來連老婆都賣了。給他定下的成分確實是地主，定成分不獨看你現在的生活狀況，還要上追三代。呂品賢走進我家時，身上紅一道紫一道，鼻青臉腫。我爹問怎麼了，他說他正在街上吃羊雜碎，民兵張全喜看見了，說狗日的，還吃雜碎呢，上去按倒就打。

說起定成分，分得特別細。地主分為地主、化形地主和破產地主。地主是有房有地有長工，平時不捏一根柴，靠吃租子過活。化形地主是裝酸哭窮，小裏巴氣，其實有家有資。呂品賢這一類人屬於破產地主。富農分為富農、生產富農。生產富農平時也在地裏幹活，農忙時臨時雇人幫工。中農分富裕中農、中農和下中農。最後一種，不管有地沒地，只要為人不好，就叫惡霸。地主惡而霸，當然是惡霸地主；窮鬼惡霸，則叫窮惡霸。

參加農會、貧農團的人，都是貧農、雇農，中農以上不讓參加。有一次，沙口貧農團正開會，過去的村警喬蘭湊進來聽。大家一見他進來，就不說話了。他還要村警的威風，說：“大家說呀，咋我一進來就不說了？”貧農團的人厲聲讓他出去，他還是不走。他說：“你們又不是開黑賭場，我在一會兒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怎麼著？”貧農團的人說：“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怎麼著。”說著上前來，手裏早已預備一把生石灰，一把撲在喬蘭的眼窩上。喬蘭扭頭就跑，捂住臉嗚哇亂叫。貧農團群情激憤，說：“正要定他個惡霸鬥爭他，沒想到他自己送上門來了。”一夥人一路追到喬蘭家，幾個後生七手八腳將喬蘭按倒在炕上，又往眼裏揉石灰，揉得喬蘭嚎叫得不像人。喬蘭的眼睛當下就瞎了，文革前還瞎著個眼到處轉。

貧農團成員蘇醜梆子，有一次看見我跟在後面看人家鬥地，說：“娃娃，可不敢看，那可是動真的哩！”蘇醜梆子說著話，腿直打戰，渾身軟得嗓子哆嗦。

我們少先隊參加過幾次鬥地主，主要方式有幾種：一種是磨地。地上鋪些料炭（煤渣），沒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黃豆大，鋪在地上跟鏗似的，有時將料炭和菠菜籽攪和在一起。然後將人一把推倒，兩個人提住腳跟在上面來回拉。被鬥的那些地主富農，上衣脫掉，赤了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媽媽老子直叫喚。一般人根本經不起這麼折騰，三下五除二就將埋洋錢的地方交待出來了。

住在東門的周二幹幹，有錢，在藥鋪裏有股份，能沒錢？可他平時裝窮，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來，背個驢毛黑口袋挨家挨戶討一回吃的，說是吃上百家飯，福氣自臨門。貧農團對他的底細一清二楚，知道他有兩個錢，但他就是不說。不說，好，拉你一磨。

鬥爭周二幹幹的時候，婦女會也參加了。周二幹幹周掌櫃，當下被兩三個婦女會唾了個風雨不漏，臨了還被脫光上衣磨了地。頭朝後，腳朝前，兩個貧農團手提腳後跟拉著周二掌櫃磨了一圈。拉得風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還不過癮，誰又扔進兩塊青石蛋，周二掌櫃的腦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響。拉一圈，乞告一回，說哪里哪里藏著洋錢呢。貧農團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婦女會張毛女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盤小石磨。放上之後，她又一屁股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馬車似的，指揮說：“拉上走，看他說不說。”

女人都這樣堅決，後生們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城門，繞城圈子轉。最後周二掌櫃臉白得像一張紙，在半路就承認他把洋錢全部藏在園子地的藍池底下了。底財果然起出不少，讓大家參觀。好傢伙，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那麼洋錢，總共二十四個木頭盒子，白花花的一共有三千多塊。這樣一打一拉，沒有一個不說的。

後來，張毛女從磨子上下來，發現周二幹幹早幾輩子就咽了氣，後腦勺被磨塌，腦漿拉了一路，後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場的鏈枷。那張毛女也沒得好死——死的前幾年就癱在炕上，流膿壞水，蒼蠅動地，生生流死。

再一種就是坐圪針櫃。這法子厲害。將家裏放衣物存糧食的躺櫃抬出來，抽去中間的檔板，像個長方形棺材。底子上均勻地放些剝碎的棗樹圪針，被鬥的人不由分說被脫成個赤紅棍扔進裏頭，蓋上蓋。櫃子底上撐一根橛子，兩頭上下晃動，就像幼兒園裏娃娃們耍翹翹板似的。晃兩下問一句，直至說出窩金藏銀的地方為止。

七十多歲的老漢余務本，當舖雜、貨鋪、糧倉有好幾處，耳朵有些背，看不起貧農團。貧農團問他，他連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將他抬進了圪針櫃。搖來搖去不做聲，打開櫃子一看，老東西死球了。

還有一種叫扔四方墩。四方墩是邊牆上的烽火臺，三丈來高，對那些頑固不化死活不說的，或者鬥爭上了火的，將他拉上四方墩一推，只死無活。爲了保險起見，貧農團的人在四方墩下麵鋪滿石頭蛋子。開始還扔一兩次，直到摔死；後來扔下去不死的，乾脆用石頭蛋子往腦袋上砸，一砸就沒命了。

有一回鬥爭韓聘衛的老婆，韓聘衛是個教書先生，人也不錯，但還是劃成地主，算是化形地主。貧農團見他老婆每天提個籃子撿料炭，氣不打一處來，捆起來就打，說你那麼有錢還裝窮，快快交出來。韓家師娘打死打活一句話：“打死也沒錢。”貧農團最後將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時候已經受過百般刑罰，磨地，坐圪針櫃，火燙鉗子夾，上身被剝光。往下推的時候，田 XX 將她的褲帶鬆開，揪往褲腰，上手將她推下去的時候，人和衣服輕易地分離開來。第二天，田 XX 就將她那褲子賣在估衣攤子上。

大冬天，滴水成冰，冰天雪地，鬥死的人都不允許去收尸，誰收尸就認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鬥爭起來比真正的地主還厲害。後來那些被鬥死的，被搶斃的，都赤紅溜棍扔在野地裏，遠遠地就看見一群狗圍著尸首爭搶，屁股在雪地裏露出來很搶眼，尸體上的衣服早被人脫光了。

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慘。一個寡婦人家守著一攤子家業，有磨房、當舖、百貨生意，還養兩支大船，經營著糧庫，常年雇工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來打過，火柱燙過，還在耳朵裏鑽上拈子點燈，最後在人民法庭上槍崩了。那時的人民法庭，和文革時的批鬥大會差不多，由幾個人控訴，底下是人山人海。控訴罷，土改工作團的人問：“貧雇農弟兄們，大家說，這個人，該怎麼辦？”只要底下有一個人說：“打死他！”壞了，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許多平時爲人不好，脾氣不好，得罪過人的民兵、農會幹部，也被這樣槍崩了。這叫貧雇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妻姥娘被槍崩後兩天，也就是臘八後那幾天，說是槍崩錯了。不僅僅是她，許多人都槍崩錯了，要糾正。球，人死了怎麼糾？這種混亂局面大概持續了三個多月。打死多少地主，沒稽究，不知道，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個。有好幾次，貧農團開控訴大會，說著說著把縣委書記、縣長就揪上臺鬥開了。後來糾偏，錯打死槍斃的，給補一石糧食、幾匹布了事。

在衙門裏當劊子手的三板漢，曾教我一種整人的方法，叫小鬼搬磚。把人捆在太師椅上，把腳平放在另一隻凳子上，再將兩條腿從膝蓋那裏綁一道，然後沖腳底襯磚。我把這個方法給我三叔說了，三叔馬上運用到實踐中。最多的時候能往裏襯七塊磚，聽見骨節圪叭叭響，是那種碎裂的聲音。

有個張虎堂，年輕時就開始跑小生意，風吹得兩眼通紅，看著嚇人。做生意通常五六人結夥而行，他怕別人吃他的乾糧，就把乾糧裝在臭襪子裏。大年初一有個風俗，家家戶戶在這一天都要到外頭擔一擔水回來，稱爲財水。張虎堂老漢年年大年初一給人送財水，靠著這樣節節儉儉，掙下一進四合院。土改一來，定爲地主，坐圪針櫃也交不出底財。後來說他過河西給國民黨報信，抓住槍斃了。

前幾年，我要給大小子弄一進院的宅基地，村裏左拖右拖，都三四年了也沒有批下來。人們給我遞話，說得往上送黑錢才能辦。我就找到村主任家裏，一進院，不說話，先看他那幾間大正房。他看我來者不善，說六叔你有事進屋裏說，站在外頭能看出個靈芝牡丹？我說我是看你這房子，什麼時候土改我該分哪一間。一句話嚇得他臉都白了。沒幾天，宅基地就順利地撥下來了。哈哈。

---

在我的故鄉華北山區，有十畝平地就被定為地主；有一架雙輪手推車就被定為富農。這樣的財富，豈不讓今天的大款齒冷三天？這樣的收入，怎能維持“剝削階級的天堂”生活？高玉寶曾應邀訪問深圳，主人把他接到酒店，被他拒絕。高老堅持吃住在一家小招待所，說：“我現在的吃住條件，是地主周扒皮都想不到的！”

---

那個箭頭是誰畫的 白 榆

1966 年文革開始時我 9 歲，當時我家住在成都中醫學院內。學校停課了，到處貼滿標語大字報。有一天，我和一個同伴來到一間空空蕩蕩的階梯教室，見講臺上放著一個剩下一點點墨汁的小桶，裏面還有一柄很大的毛筆，就抓起毛筆，蘸上墨汁，耍弄起來。

我先在講臺地上劃了一個閃閃發光的紅太陽，那是當時最流行的圖案，然後開始練書法，寫了五個大字“打到劉少奇！”那是當時最流行的口號。講臺的地上被塗得差不多了，我們才乘興而去。

第二天，聽說出了反標，我就跟著去看。地點正好在我前一天去過的教室，裏面有不少人。我擠到前面一看，所謂反標就是有人在我寫的“打倒劉少奇”的“打倒”二字旁邊的牆上畫了一個朝上的箭頭，而上面是毛的畫像。

我天生耿直，就對旁邊的人說，那字是我寫的，只是那箭頭不是我畫的。我當即被人帶去盤問。沒想到，第二天，院內就有小孩朝我喊：“小反革命分子！”

學院成立了專案組，我被叫去審問。我重複講我的經過，他們不信，拿出毛筆，讓我寫給他們看，直到他們相信是我寫的，於是便問我，是不是誰教唆我這麼做的。我回答，沒有，是我自己這麼玩的。那人說，有這麼好玩嗎，是要掉腦袋的。這時我才知道這麼玩的嚴重性。

此時我父親因民國時期做過警察，已經被作為牛鬼蛇神抓了起來。我母親很害怕，就對我說，人家問你，你千萬不要因為害怕就說是你爸教你的。我媽這一說，我反倒被嚇哭了。我媽就去找專案小組的人說，不要對孩子搞逼供。

專案組的人起初懷疑是一個大學生所為，這人不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他們問我，當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圍看到別的什麼人。我說，沒有。我的確沒看見。後來學校開始複課鬧革命，老師對我另眼相看。有一次我遲到了，老師就說，讓這個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講臺上，給毛主席請罪。

我常常回到家就哭，我媽沒辦法，見我哭，她也汨眼花花的。那頂小反革命的帽子很沉很沉，壓在一個孩子稚嫩的心上。那件反革命事件一直沒查出結果。好多年過去了，已沒有人再喊我小反革命，但我仍感到壓力，心頭始終有一團恐怖的陰影。每有老師或學校領導找我，我就擔心是不是我又犯了什麼錯誤。

我很想知道那個畫箭頭的人，他的大手筆與我的命運緊緊相連。他是那個時代張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時被抓住了，中國可能又多一個被割喉的英雄。那個製造那場史無前例大



災難的惡人，如今還安穩地躺在中國人民的心臟地帶睡大覺，其幽靈仍在神州大地游蕩。

---

我老家所在的村，幾十年前是遠近聞名的紅旗村，曾經以我們村發生的故事為原本，拍過一部電影《沂河兩岸稻花香》。劇情以地主和貧農的鬥爭為主綫，其中一件事是地主搞破壞，看生產隊的稻子長得好，晚上偷偷往生產隊的稻田裏撒稗草種，被貧下中農發現。這個故事有原型，但却不自然發生的事實。當時的大隊書記想搞宣傳，找一個唯唯諾諾的人，說讓他演個戲，就是準備一些稗草種，讓他撒到稻田裏。正在他撒稗草種的時候，安排幾個貧農出現，揪住他開批鬥會。當時講好只是演戲，只做宣傳用，絕對不影響他的政治待遇。可是，這個典型實在好，被上邊知道了，于是有人寫了劇本，拍成了電影。這個撒稗草種的人成了真正的壞分子，經常被揪出來批鬥，兒女也不能上學。

---

摘帽時刻 黃家鋪

我母親因姥爺的問題，文革中黨籍被挂了將近 10 年。她堅韌地挺著，一直工作在第一綫，不服軟，不檢查。有一次被單位頭頭整得太慘，母親回來向父親訴苦。父親是個除了工作別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點事不關己，總說一句話：“要降溫，你要降溫。”母親終於急了，當著我的面大叫：“你還知道什麼！你就知道管你自己，降什麼溫，他娘的……”

母親的組織生活是 1977 年恢復的。那天我記得很清楚，她從單位回來，第一句話咬著牙對父親說：“那姓曹的宣布恢復我組織生活了，今後我看他還能把我怎麼樣。”一種說不出的怨憤。

朋友林虹的父親當年在 XX 部計劃司工作，1957 年打成右派。1960 年摘帽後，她父親從改造的地方回北京的火車票已經買好，行裝也收拾完畢，因情緒激動，竟引發心臟病猝逝。宣布平反是 1979 年的冬天或 1980 年初的某一天。那天林虹陪著媽媽來到父親生前所在單位的右安門招待所的一間辦公室，計劃司一位副司長和人事司一位處長宣讀了“改正”文件，內容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 XX 部（79X 政字 303 號）

改正 XX 同志右派問題的決定

本部計劃司黨支部：

根據中央（78）55 號文件精神，對 XX 同志 1957 年整風反右運動中的問題進行了復查。經研究，同意計劃司黨支部關於“改正 XX 同志右派問題的報告”，撤銷原 XX 部“對右派分子 XX 右派定案結論”，並恢復名義，以消除影響。附改正結論報告二份，存部文書檔案和發給 XX 的家屬，並望做好家屬的思想工作。

XX 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所附改正結論報告，全文如下：

關於改正 XX 同志右派問題的報告

XX 部政治部：

XX，男，現年五十八歲，湖南省湘潭縣人。家庭出身富裕中農，本人成分學生。一九五〇年參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加入共青團。一九五五年肅反時被清洗出團。原為 XX 部計劃

司十八級科員。一九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分子。一九六〇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由于過於興奮，激動至死。

XX 同志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的主要依據是：

XX 說：“肅反時中央提出百分之五的口號是主觀臆測，因此下邊排隊湊數，不該鬥的鬥了，不該肅的肅了，徒傷感情，這個問題中央應檢查。”并認為“肅反採取群眾性運動，好處是公安部門省點事，壞處是形成以黨代政”，“肅反調查人員是捕風捉影，抱著主觀臆測的意圖，一定要找到某人政治尾巴，回來邀功受賞”。他說：“機關必須有一個較完整的紀律，不能隨便給一個人停職反省，不給工作權和勞動權，因此，我希望今後應有機關紀律，社會應有法制。”

XX 說：“忠恕之道是可貴的。”認為“黨沒有充分估計到知識分子的作用和進步，這包括他們的事業心和自尊心。”認為“士可殺不可辱”。并說黨對知識分子“不是當同志看待，而是多多少少當敵人處理，特別表現在肅反中”。說黨的幹部政策是“任人唯黨”，“無黨不長”。主張“肅反以後可以以才為主”。認為儲安平“黨天下”謬論是“打中了黨的要害”。認為“章乃器的言論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反擊右派的文章則大罵“他媽的，愈看愈生氣”。

根據中共中央（1978）55 號文件，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精神，經過復查，認為 XX 同志在整風反右運動中主要是對肅反、審幹、提級、評工資等有不同看法，所提意見帶有偏激、不滿情緒。他希望今後應有機關紀律，社會應有法制的意見，從現在看是正確的。他對儲安平“黨天下”的看法是錯誤的，但屬於思想認識問題，構不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應從正面進行教育。因此，我們認為，劃 XX 同志右派是屬於錯劃的。對某某同志右派的政治結論，應予改正，并恢復名義，以消除影響。

以上報告當否，請批示。

XX 部計劃司黨支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文件宣讀完畢，交到林虹媽媽的手上。林媽媽看上去很平靜，沒有哭。1957 年林父錯劃時，林母才 32 歲，現在已是兩鬢斑白了。她用 37 塊錢的工資和一個人的愛，養活著兩個女兒。她等來了“改正”，却已經沒有人了。“但是我注意到了，在接那張紙時，媽媽的手在哆嗦。”林虹當時哭了：“那張紙我看得很重，我覺得多少年來，終于一塊石頭落了地，終于有人想到我們了，我終于可以抬頭了。多少年了，現在我終于可以和別人談我爸爸了。以前，我絕口不和任何人談我的家。分工作我堅決不去我爸爸工作的系統，因為我知道，我沒有希望，無論多麼努力，單位也不會照顧你，我和那些現任幹部的子女永遠也不會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談朋友時，我有一種自私的想法，想找一個出身好的，不為別的，只為將來有了孩子，讓他填表時可以好過一些，別像我那樣自卑。我不求嫁個有錢的，從小我就沒錢，我相信都有兩隻手，生活不會有問題，只是將來如果有運動再來，別讓我孩子再遭罪。直到我們接到那張紙的時候，我都不敢相信中國不會再搞政治運動了。謝晉去世了，我大老遠去給他送行，只為感謝他當年拍了《牧馬人》、《天雲山傳奇》和《芙蓉鎮》，都是給右派平反的，至今還記得《芙蓉鎮》結尾那個瘋子喊著‘運動嘍，運動嘍’，那麼慘人。”

大莊比我大一歲，是獨子。他父親是“叛徒”，問題複雜，據說因他當年叛變還犧牲了同志。他被押整整 11 年，從 1967 年一直到 1977 年，出獄後仍然沒有結論。大莊說：“他出獄時，我根本都不認識他了。以前他回家就少，我長那麼大，很少叫他爸。他整天在外面忙，被抓前我都不知道，等我們家被抄，我天天挨揍，才知道他是叛徒。”1980 年被平反時，宣布給他平反的人就是當年揭發他是叛徒的人。那人自己後來也被整，多少年沒得好，老了老了可能是良心發現，組織調查時，他承認揭發的事實很多都是猜測。大莊說：“平反

時我挺高興，房子已經被人占了，又給了一套，但原來我住的那一小間沒收回，還給我留著。我跟我爹本來就認生，文革這些年我跟野狗似的到處亂跑，平反後不願意受人約束，所以我還住我那一小間。最實惠的是補發了工資，小兩萬塊錢，我媽早死了，錢都給了我，呵，我那時候真他媽叫闊。”

長期失去親情，所以也不渴望親情，在冰河剛解凍時期，像大莊這樣的人并不在少數。他們很少考慮自己遭難的父母究竟是否真有罪，因為他們弄不清楚，也沒有判別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他們不少人有著強烈的被扭曲的“是非感”。在無產階級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們相信黨和毛主席不會有錯，就是自己的親老子做了對黨和人民有害的事情，也應該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子女，所要做的，就是要和他們劃清界綫，“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心靈的扭曲，價值觀的錯亂，造就了一批像大莊這樣和父親“認生”的孩子。一位朋友（女性）對我很委婉地提出的這個話題很敏感，立刻說：“你不用繞彎子，我知道你想問什麼，不就是當初對父母的態度嗎，當時我們能怎麼樣，他們被抓起來了，但我們還得活下去，不劃清界綫能行嗎，不寫批判稿能行嗎，不當著衆人罵他們能行嗎，你不革命你能活嗎，不打死你才怪呢。等懂點事了，我還真從心裏冤恨他們，不是他們，我們能成那樣嗎，人不人鬼不鬼的。”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指出：“除極少數堅持反動立場至今還沒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來遵守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富、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審，縣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給予人民公社社員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員，他們本人成分一律定為公社社員，與其他社員一樣待遇。凡入學、招工、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現。”

貧下中農對這一決定的反應最開始是震驚，然後是不適應：多少年被他們踩在脚下的地主和地主崽子也成了正式社員，和貧下中農平起平坐，這對窮得只剩最後一點政治優越感的“正式社員”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尤其是農村的基層幹部，他們對地富反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打罵慣了，看慣了他們恭順的樣子，忽然要給他們摘帽，給這些馴服的家奴們都脫掉賤籍，于心理，于實惠，都有不小的損失。

然而對於那些從一“解放”就被壓在十八層地獄，一壓就是30年的賤民們來說，那實在是久旱盼雲霓，急不可待。對知道已經上面有了精神而下面拖著不辦的基層幹部，他們的那種反彈情緒十分激烈。我的一個戰友，叫傳富。傳富有個比他小幾個月的遠房表弟，叫有富，地主出身，就演了一出“拳打鎮關西”的鬧劇，差點被送進公安局。

有富自小定下一門親，是鄰村一位富農的女兒。那時地主找富農，是門當戶對。小時他們同在一起上學，玩得也很好。長大後，這女孩兒出落得很漂亮，竟然被隊長兒子看上了。三人在小學都是同學。隊長覺得，自家是貧農家庭，又是隊長，與富農家結親，那是女方高攀，根本不在意有富兩家原有的約定；再說，有富的定親，只是家長口頭承諾，這種“封建做法”，如今在“社會主義新農村”根本擺不上臺面，說有就有，說沒有就沒有。女孩兒的富農家長也想攀隊長這個高枝，有這棵大樹蔭蔽著女兒，有這麼個親家為自己遮風擋雨，那是既實惠又風光的事。

女兒很順利就出嫁了，但從此有富心裏就種下了仇恨。這事兩個村的年輕人都知道，但事後誰也沒再當回事。兩年後，地富摘帽的精神下來了，有富很快找茬把隊長打了一頓。不管怎麼說，隊長是長輩，這種以小犯上的事，除去“階級”因素，也有悖農村的公序良俗，不得人心。不過大家心裏都明白，有富出這口惡氣也情有可原。這一頓打得不輕，隊長趴了好幾天。幾天後，隊長大約也想明白了：大勢所趨，世道要變了。自己的兒子是個軟骨頭，個子矮，沒力氣，不是有富的對手，在娶兒媳的問題上自己也確有理虧之處，所以他沒聽一些人把有富送公安局的撻弄，反倒最早把有富家的地主帽子給摘了。

-----

文革那年我十三歲，初中上了一年半就回來了。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吊到梁上拷打，政治、經濟上都落入社會最底層。我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輩子沒戲了，人世間的世態炎涼我體會得特別多。什麼都沒有了，糧也分不下來，沒人再到我家來，包括親戚、朋友也不敢。父親有一兩個月不出門，覺得抬不起頭來。我姨要來看也不敢進屋，拿了幾顆雞蛋用毛巾包起來，給我一個本家堂兄，讓把這雞蛋捎回來。我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要開始養活家了，一天掙6分錢，也吃不飽。幾十年過去了，回顧那段歷史，覺得它是各種原因湊成的，慢慢就沒有了仇恨，覺得用不著再抒發更多的怨氣，而是應該更深刻地反思。有一次我回我們那個村子，看見兩個老漢背著柴草過河。極瘦，頭髮全白了，水流沖得他們站不穩。爲了不跌倒，他們手拉扯著手，趑趄趑趄走過來，場面很感人。他們二人是有仇的，文革中他們派別不一樣，一個曾打得另一個頭破血流，而他們現在竟是那樣平和敦厚。 賈平凹

#### 小反革命張量冠 湖 人

張量冠，湖北隨州人，生來嗓門奇大。兒時，哭鬧是他“懲治”長輩的法寶，誰招惹他，他就大哭大喊，叫得你不得不掩耳走開。量冠4歲時，就會唱《社會主義好》之類的歌曲，後來還會唱黃梅戲，常常從這個山頭唱到那一個山頭。此時他的語言天賦也顯露出來，能隨口將一些革命歌曲改頭換面，重新填詞唱出。爲此，他受到大隊幹部的嚴厲批判，其父母還在大隊會上做過檢查。

小學三年級時，張量冠9歲，偷偷看家裏的藏書《青春之歌》，看後詩性大發，在扉頁上寫了一首打油詩：“天茫茫，地茫茫，雨霧遮蓋似圍牆，天間禾苗沒頭頂，渴盼天上出太陽。”當時正值文革期間，縣、公社、大隊聯合召開批判大會，批鬥張量冠，將他定性爲“根紅苗不正的小反革命”。

11歲小學畢業時，張量冠被取消推薦讀初中的機會。之後兩年，他有時間就偷看各種毒書。那是其母任大隊婦聯主任，負責管理破四舊收上來的各種毒草書籍。母親發現後，將他暴打一頓，燒毀了他的全部詩作。

兩年後，13歲的張量冠重返課堂。他特別珍惜讀書的機會，加倍用功。高中時接觸英語後，他通過各種途徑自學英語。他所讀的中學，英語師資缺乏，英語老師生病或有事，便由他代英語老師上課。1977年恢復高考後，張量冠以優異成績考入南開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初中。學校初建，只蓋起辦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與教室、宿舍與宿舍之間，隔著大大的土堆。開學伊始，學校為每個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杠，我們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鏟高墊低工作。接著是大煉鋼鐵，我們班被分去背鐵礦石。每天一早出發，翻過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才到有礦石的地方，往返幾十裏，走山間崎嶇小道。每天背兩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力不從心。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放衛星”，誰背的多，大喇叭上便會表揚誰。我那時身體瘦小，體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在九、十點鐘，日子一長，瞌睡難熬。有一次邊走邊打盹，竟栽進一個小溝裏。還有一次，天已晚了，才開始從山根向上爬，雙腿實在僵硬得不聽使喚，渾身像散了架，腦袋發脹，便把背上的礦石卸去大半，回來時剩下二十幾斤，為此受到批評。這樣背了一個多月，才允許返回學校，進行正式大煉鋼鐵。

起先，每煉出一批鐵疙瘩要過磅。後來眼見我們班落後了，其他班級已經上萬斤，班幹部們一合計，決定也跟著“放衛星”。我們班也一萬、兩萬甚至十幾萬地報了上去。果然，學校的大紅喜報也送到我們的場地上。大家都很興奮，覺得好玩極了，爭“放衛星”成了吹牛比賽。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覺，實在困得撐不住，靠牆打個盹兒，接著再幹。從校內到校外河堤上，平爐一座接著一座，火光映紅夜空，高音喇叭不斷傳來新的喜報，比過元宵節還熱鬧。

大煉鋼鐵一結束，學校又讓深翻土地。說是深翻的土地，種的山藥蛋可以結二十多層，每畝可收幾十萬斤。學校要求我們必須確保挖一米深。幾個人一組，先挖一條一米寬、一米深的長壕，班幹部量過尺寸，再挖同樣一道長壕，將先前的長壕填滿。這樣深挖過的土地，人行走起來十分困難。第二年播種時，牛一進到地裏，四條腿深陷下去，肚皮挨著地面，人們費了很大勁才將牛抬了出來。那個村的農民氣憤極了，說這簡直是在破壞他們種地。

從背鐵礦的工地上回來，正式的大煉鋼鐵尚未開始，學校在做準備工作。利用這短暫的休整期，我請了兩天假，回村看望家人。一進門，炕上亂七八糟，八歲的妹妹照看著四歲的二弟和兩歲的三弟。他們緊緊把我圍起來，問我為什麼很久沒有回來，爭著和我親熱。傍晚，母親從地裏回來，一臉疲憊。從她口中得知，父親到東南山上大煉鋼鐵去了，村裏男勞力全走光，地裏的莊稼全靠女人，無法弄回，有的已經爛在那裏。母親還告訴我，近日祖父和伯祖父被人從口外押回，關在公社裏，聽說每天只給幾兩糧，餓得厲害。第二天，母親特意蒸些窩窩頭，要我帶著到十五裏外的公社看看兩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麼事。

走進公社大院，首先看到烈日下跪著一排老頭。我的心格登一下，急忙走上前，中間有我的祖父和伯祖父。他們都低著頭，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褲腿挽起，膝蓋下面是碎玻璃渣子。我走到爺爺面前，低聲叫著，問他：“這是咋啦，你因為啥又被押回來？”他擺擺手，示意我別問，大爺（伯祖父）也不住地搖頭。這時從房間裏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幹部，招手讓我進去。他問了姓名，然後告訴我：“你爺爺他們是因為土改時未鬥垮，現在押回來重新鬥爭。”並要我和他劃清界限。我本是給老人家送點吃的，那人把窩窩頭留下，示意我趕快離開。

爺爺他們當年土改時淨身離家，房子、土地都被分了，奶奶和母親領著三叔和我討吃要飯過了一年多，還有什麼沒有鬥垮呢？爺爺走時，還是托我母親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塊錢作的盤纏，沒帶走任何東西，怎麼過了十幾年又重新鬥爭呢？要我和他劃清界限，也要講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麼罪？後來得知，當時人民公社剛成立，資金極度匱乏，購置農具沒有錢，蓋

大隊辦公室、修建糧倉、籌辦飼養處都沒有材料。隊裏先是動員人們入股，經過幾年高級社的折騰，多數人早已一貧如洗，誰有資金？我村爲了蓋辦公室和庫房，曾幾次動員一戶徐姓人家獻出閑著的房子，徐家不同意。後又動員其入股，說是要作價，將來償還，徐家還是高低不答應。最後村幹部夥同一個下鄉幹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報到縣裏，徐家很快被定成漏網富農。于是，他家的那幾間閑房被順理成章地沒收。重新鬥地主富農，就是希望藉以解決資金問題。

公社想從我爺爺身上鬥出兩千元，村裏又給我父親加上五百元。那天晚上，父親被叫去，逼他交錢，他交不出，被五花大綁捆了一繩，又被吊在房梁上，昏死過去，幾次用涼水噴醒。次日上午，我正在街上和幾位本家叔叔閑聊，支部書記邢耀龍走過來，劈口問我：“你爹躲在家裏幹啥，爲啥不出去幹活？”我正在氣頭上，粗聲回應他：“被你們打得快死了，還能幹活！”“啊，誰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說八道！”“你知道還裝啥洋蒜！”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雙手叉著腰，大聲訓斥道：“不要以爲你上了中學有啥了不起，還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爲當了支書想幹啥就幹啥，國有國法哩！”他惱羞成怒，伸手打我兩個耳光，氣急敗壞地叫道：“敢教訓老子，你個小地主崽子，還反了哩！”我正要還擊，被幾位叔叔硬是拉著推回了家。父親和母親把我訓斥一頓，說我不懂事，在村裏誰敢得罪支書啊！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平，這兩記耳光是我終身難以忘記的耻辱。

回到學校後，心情很久不能平靜。後來，周圍的同學，有的入團，有的加入基幹民兵，得到老師的信任，這些都沒我的份兒。有時班裏召開積極分子座談會，我也無緣參加。我處處不如人，唯有努力學習，把別人遠遠甩在後面，才能讓我受傷的心得到些許安慰。

不久，遠在集寧的二叔來了一封信，說他把年初和一位老鄉合買的馬車賣了，將賣得的七百元錢寄回了公社，匯款單上的收款人是我，要我去查問一下。本來到公社問一下就完事了，可我却怎麼也想不通。他們當年流落到口外，十幾年的艱辛，就積攢下這麼一點財產，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掙來的，憑什麼要交給公社，這是土改時未鬥淨的財產嗎？這是靠剝削得來的嗎？那時我也常常看報紙，哪有這樣的政策！照此下去，再過十年，還要重新鬥爭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沒完沒了嗎？

我走進公社辦公室，直接向他們要匯款單。一位三十多歲模樣的幹部問我：“你憑什麼要，那是寄給我們的！”我說：“匯款單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權要！”“給你個球！”這位幹部粗野地罵道：“我們已經把錢取回，匯款單在郵局，你到郵局去看吧！”“那你們也得給我個收據。”“給你收據，以後想算賬咋的？”另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幹部也來幫腔，並且用諷刺的目光看著我說：“你算個球，給你兩個耳光還差不多！”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開會時支書談到了打我的事。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傷害，非要他們開個收據不可。那年輕幹部把我推出門外，我又一次沖進去。那個三十多歲的幹部吩咐旁邊幾個人：“給我取根繩子，把這個小地主捆起來，我就不信你小子還反了哩！”

正在這時，我們村的彭聚財老漢走了進來。土改後，彭曾當過二年村長，後來到鄉里工作，公社成立時擔任信用社主任。一見這情景，彭老漢死拉硬拽將我弄出公社大院，並一直推出村外，大聲喝喊道：“快回去吧，這是你說理的地方，捆一繩子還不是白挨，年紀輕輕的，別瞎鬧，這是政策，你能抗得過！”彭聚財和我爺爺年齡差不多，過去農忙時曾給爺爺打過短工，和爺爺關係一向比較好。父親說：“你彭大爺真是爲你好，捆你一繩子還不是白挨，今後凡事要忍耐點。”聽著父親的教誨，我心裏總是難以接受。人們爲什麼這樣不講道理？這年放寒假，新來的紅旗班主任，給我的操行鑒定表上寫道：“該生思想反動，抵觸現實。”我去問他，他說：“你曾經大鬧公社，還以爲我們不知道，以後要放老實點。”

初中三年很快結束了。在班裏，學習方面，我始終是第一名，可是從思想方面來看，又是全班最落後的，屬於倒數第一名。特別是一九五八年後半年，班主任由呂國瑞換成元子忠以後，對我的嫌棄更顯突出。元當兵出身，轉業後先在勞改農場管理犯人，鬥大的字不識幾

個，竟到中學當班主任，還被稱為紅旗班主任。他與班裏大多數學生都不融洽，動輒吹鬍子瞪眼睛罵人，同學們很討厭他。

臨畢業時，班長提議，在自願的情況下，每人出兩元錢，湊起來給原班主任兼數學老師呂國瑞買點禮品，以表示對他三年來辛勤教導的感謝。我也交了錢。班長他們幾個年齡較大的同學，張羅著綉了一面錦旗，還買了些禮品。離校那一天，小雨，家在農村的同學無法成行，我們便把行李存放在劉桂棟同學家裏。劉三年來一直和我是同桌，他很小父親去世，母親靠給人們做針錢維持生活。次日雨停，我們各自回家，等待升學錄取通知書。

回家只住三天，我便去集寧看望爺爺奶奶。爺爺在張家河公社被關至年底。二叔賣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車，又借了點錢，湊足五百元寄回，總算把爺爺贖了出來。父親對爺爺的情況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由于請不准假，只好委托我去。

一個月後從集寧返回時，錄取通知書早已發完。我到學校去問，回答是未被錄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師不無惋惜地說：“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區考取了第一名，唉，唉……”我問他我為什麼，他只是搖頭，示意我別再問了。我隨即到和我要好的同學雒義家，雒告訴我，原來是那兩元錢闖的禍。我們送給呂國瑞老師一面錦旗，惹惱了元子忠。他指令團支書整理一份材料，說我們放假後，在劉桂棟家裏以存放行李為名開黑會，密謀反對他。于是，以班長為首的一個反動小集團便被製造出來了。儘管我們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學達到了錄取分數綫，可最後只錄取了寥寥數名，也就是靠近團支書的那幾個人。凡出兩元錢的人，統統被視為這個反動小集團的成員，全部落榜。雒義講完後，我突然問他：“招生委員會為什麼不來調查一下？情況不是這樣的嘛！”“你說人家是相信組織，還是相信你個人？”我無言以對，只覺得自己完了，到頭來還得回村受窮受欺負。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情緒，久久地瀰漫在心頭，真是懷喪極了。我雖然拿到了初中畢業證，却從此失學了。

## 父親這一生 西 風

我的祖父是米店的幫工，我的父親學習成績優異，受一位陳姓教授的資助，考上了北京大學。這位陳教授與魯迅先生關係較好，常帶父親到北京中山公園與他喝茶。當時趕上孫中山先生去世，北京大街夾道送行，父親這時加入了國民黨。

四一二政變前，父親去上海，在火車站附近一間小書店買了《共產黨宣言》等書籍，進租界時被巡捕查到，拘留一天，押送出租界。四一二政變中，父親也被捕關押，幾個月後獲釋，回到家鄉溫州。祖母認為他在家中呆不住，就給他娶了一個蔡姓女子，想拴住他。蔡氏有肺病，不久去世，父親又離開老家，到了寧波。當時我母親在寧波教書，經校長介紹，與我父親結識。婚後兩人長期住在杭州，父親任杭高教員五年，任浙江省教育廳科長十二年。1946年8月，省長任命父親為景寧縣縣長。1948年3月，調任建德縣縣長，因剿共不力，年底被免職。

父親失業後，母親又因胃病不能工作，家裏沒有積蓄，生活陷入絕境，常常只能用半斤玉米粉煮成糊供全家度日，甚至靠手工卷香烟去賣賴以維持一家生計。一位戚姓朋友，把造了一半的房子的一個房間臨時安上一個門，借給我們居住。

1950年，母親經同學蔡梅英介紹，到上海龍華兒童教養院任教，從此一家人就拆散了。大哥大姐在部隊，二哥考上衛校，母親帶我一人到上海工作，其他三個孩子，或在親戚家寄居，或托人撫養。1951年，經母親介紹，父親也來到龍華兒童教養院任教。不久，鎮反運動開始，父親如實交了自己的歷史，最後以歷史反革命罪被捕。1952年在瑞安獲釋，管制三年，我們幾個年幼的子女也從分散的各處被送到瑞安，由父親照料。

父親除了有時參加居民區組織的學習和義務勞動，每天的生活就是幹家務，給我們梳辮子、洗頭、洗衣服。他還讓母親從上海寄來一台縫紉機，自己學著做衣服。那時男女學生的制服都是四個口袋，很難做，但父親也學會了。有時和父親一起出門，父親看到居民區幹部，都彎腰鞠躬，使我們感到沒有一點自尊。鄰居小孩經常欺負我們，懦弱的弟弟走在街上，有時會被人無緣無故地打一拳。脾氣比較倔強的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時會與人廝打。每當這時，我們却得不到家人的庇護，最多就是被拉回家。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使不懂事的我對父親有些怨恨，有時發起脾氣會罵他“反革命”，但是父親從不回應打罵我們。

我們偶爾也有快樂的時候。晚飯後，父親帶著我們到南門外的飛雲江邊看潮起潮落。有時買上幾分錢的香瓜子，每人分上一小撮，算是很奢侈的享受。散步回來，我們圍坐在煤油燈下學習，父親滔滔不絕地為我們輔導他最熟悉的中國歷史。偶爾他也唱吟他熟悉的詩詞，此時滿腹經綸似乎有了些許用武之地，臉上顯出少有的神采。

這樣的生活過了幾年，1958 年開始“肅殘運動”，父親被叫去集中學習。我每星期要為父親送些菜，最後一次去送菜那天，大雨傾盆，我和妹妹打著傘，手裏拿著一瓶菜，兜裏揣著父親前次要我給他帶去的一毛二毛的零錢。路上不慎摔了一跤，菜瓶被打碎，我從地上撿起上面較乾淨的菜，放到只剩半截的瓶子裏，帶著一臉驚慌走到目的地。管門的告訴我，這裏已經沒有人了。過了幾天，有幾個公安局的人到我家搜查，對我說：“你是少先隊員，要老實說，你父親有沒有槍啊什麼的武器藏起來的？”我說：“沒有。”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知道，不知什麼原因父親又被捕了，被判十年勞教。在十裏坪農場放牛時，父親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十年勞教之後，又留場兩年，被釋放回到瑞安。

文革結束，反革命帽子摘除後，父親才于 1979 年 1 月回到杭州，與家人團聚，結束了長期的獨居生活。這時他已年屆八十，滿頭白髮，背駝得厲害。過去的二十幾年，一次次的政治運動，我們這些反革命的子女個個如驚弓之鳥，自顧不暇，唯恐與反革命劃不清界限，所以都沒有去看過他，也沒有書信往來。現在想起來，真是太不近人情了，完全違背了人性。

夏天，母親浸一些楊梅酒，父親喝上一口，就算最大的享受了。有一次，大姐的孩子搞活動，買了些麵包和飲料，父親看到吃剩的麵包和飲料瓶，非常生氣，說：“出去玩還要帶這麼好的東西，我們一輩子也沒這麼浪費過，像什麼樣子！”

父親不享受公費醫療，住了兩次醫院，醫藥費不堪負擔，只能在家臥床吃藥，全身疼痛，還生了褥瘡，腰部爛了一個大洞。最後幾天，他胸悶痰塞，只想吃辣椒把痰吐出來。臨終前，父親用顫抖的手給母親留下四個字：“先來先走。”

1986 年 11 月 26 日正午，父親與世長辭。

---

我爺爺的父親弟兄四人，土地比較多，忙不過來就找一些人幫忙。這些幫工多是本村的外姓人或剛從外地遷來的，他們主雇之間相處的都很好。我很小的時候，一位替我們家做過工的老人，從地裏回來，路過我家門口，常常在我家大門口的牆頭上留下一把豆角或幾根黃瓜什麼的，然後高喊我父親的名字。我的祖輩和父輩都是非常勤勞、頗能吃苦的人。我的二爺（爺爺的堂弟），年輕時是一個趕牲口種地的好把式。我的另一位爺爺，很老的時候還下地給牲口割草，天天見他騎著一輛破自行車，載著兩大捆草從地裏回來。土改時，我們家族的四門人，有一門被劃成地主，兩門劃成富農，我爺爺這一門因家人多病而家道中落，被劃成中農。實際上在家族經營中，出力最少的恰恰是我爺爺這一門。

---



1955年5月,《人民日報》開始批胡風,張弘昌看了,私下對同學說,這些材料不足以證實胡風和他的同夥是反革命分子。告密者馬上向黨組織舉報,張弘昌立即被隔離審查。審查過程中,又牽涉到他的摯友范京增、黃鳳良等,說他們在永定中學讀書時結成反革命組織焚火社,愛穿黃衣黃褲,是黃衣黨。弘昌當然不承認,黨組織就加大火力,每日三班倒,不分晝夜輪番批鬥。本來他是面臨畢業的大學生,現在一切都泡湯了。經一年多的內查外調,查不出與胡風反革命集團有任何聯繫,僅屬言論問題,1956年秋,便把他派到泉州市機關職工業餘學校任教。

既是業餘學校,課程自然安排在晚上。有個晚上,一位已婚女同事下課較遲,怕走夜路,要求弘昌送她回家,他慨然應諾。告密者舉報他們有曖昧關係,黨組織把此事與他的家庭出身和父親的歷史(其父張松齋,民國時期擔任過永定縣田糧處處長和前起義人員永定縣縣長賴作梁的秘書)掛起鉤來,給他扣上不純分子的帽子,開除公職,送往大田縣勞改農場。

經過近5年的改造煎熬,1962年張弘昌被遣回原籍生產隊監督勞動,動輒被五花大綁押上批鬥台。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要跟農民拼體力糊口,養活自己已是力不從心,何況還有一個癱瘓在床的庶母,一個殘疾的小弟,一個幼小的妹妹,都要靠他供養。在生產隊勞動,貧下中農根正苗紅,不幹活每天也可以拿10分,黑五類及其家屬,累死累活,一天僅能拿8分。每人每年平均口糧才100來斤,年終分紅時,每10分往往不值0.5元錢,買油買鹽的使費都成了問題。弘昌多才多藝,會畫畫,便做起油漆工藝活。他跟生產隊簽訂副業合同,每天向生產隊交2元副業款,以換取出門從事油漆行當。他挑著油漆擔子,走村串戶,給人畫新娘床兼油漆。一次,他跟夥計下鄉幹活,歸途中因為衣衫襤褸,漆迹斑斑,被幾個盛裝打扮的少女嘲笑。入夜,張弘昌感慨自己英年虛度,智不獲展,便填了一首破陣子《和李煜原韻》:“三十韶華虛度,平生萬事蹉跎。壯志雄心連霄漢,玉葉金枝笑殘柯,長途盡坎坷!半路出家學藝,隨君千里奔波,最是饕餮難繼日,猶索枯腸作俚歌,含淚共吟哦。”

已逾不惑之年,張弘昌仍然孤身一人。1975年,經好心朋友牽綫,弘昌跟一個被遺棄且神經受嚴重刺激的中年婦人結婚,不著婚紗,不辦婚禮,不擺婚宴。婚事太簡單了,弘昌過意不去,相約銀婚之日再好好補辦一番。第二年,張弘昌提心吊膽外出幹活,怕紅衛兵抓人,走夜路時,不慎摔斷了小腿骨,造成終生殘疾,他寫詩自嘲:“平生多失足,未老已身殘。覓食常羈旅,售工只懼閑。常勞老母念,難霽怨妻顏。愧悚驚長夜,秋風客舍寒。”

幾年後,殘疾的小弟悲觀厭世服毒自殺,接著愛妻又命斷庸醫之手,銀婚之約將至而其人已萎,弘昌聲淚俱下,寫下一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詩:“近二周星共困危,舔甘吞苦歲華萎。尚期銀日婚紗試,忽剪烏巾玉照圍。敢有文章憎命達,却無緣份老齊眉。九泉憔悴舒些否?劍外嬌雛正始飛。”

1978年秋,他老家的五湖小學增辦初中班,却找不到一位語文教師。校長闕昌平,經請示後大膽雇用張弘昌作語文代課教師。儘管薪給十分微薄,每月28元,弘昌教得還是很起勁,年終被大隊和公社評為先進工作者。次年秋,撫市中學張唐彬校長把他從五湖小學調入撫市中學,初教英語,後轉語文,薪給待遇不變。

張弘昌的教學效果獲得廣泛好評。1980年10月,縣進修學校語文組派人到撫市中學聽他的課,覺得很有新意,予以肯定,並約他為即將在1981年春舉行的龍岩地區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首屆年會撰寫有關教學改革的論文。他寫成《中國語文教材隨想》,寄給龍岩地區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引起關注,被邀請參加這次年會,並宣讀此文。福建省教育學院教研

部負責人、省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會長程力夫，在會上熱情贊揚這篇文章。會後，程力夫感慨道：“張弘昌是個人才呀，你們怎麼不懂得用呢。”不久，張弘昌又帶著文章出席省中學語文教學會議，並在會上宣讀，同樣引起關注。

廈門大學中文系主任鄭朝宗，錯案改正復職後，一直記挂自己最得意的門生張弘昌。在一次省級教育會議上，他得知張弘昌還是一個民辦教師，不禁憤然，痛心地對在座的龍岩地區教育局局長張正說：“你們閩西就這樣糟蹋人才啊，你們不要張弘昌，我們廈門大學要！”張正局長這才知道張弘昌的分量，便積極地與永定縣當局傳話，催促給他落實政策，儘快正式啓用他。

1981年，向來以求才若渴著稱的永定一中校長鄭友誼，在本校名師羅選才、範京增、范德華力薦下，一面把張弘昌調入永定一中，並安置其家屬，一面會同縣委組織部、公安局、教育局，派人到泉州爲他落實政策。這年9月，晉江行政公署發文爲張弘昌平反昭雪，恢復其政治名譽和公職。

---

曹禹被定爲反動學術權威，14歲的女兒萬方成了黑五類，沒資格進教室，只能蹲在臺階上看《毛選》。即便如此，萬方從沒懷疑過父親，“我和他從沒有過對立，一絲一毫都沒有，他一直是崇拜的人”。萬方回憶說：“大冬天，一幫人就沖進我家，說，曹禹，跟我們走！我父親就必須跟他們走。我們動都不敢動，稍一動彈，紅衛兵啪一鞭子就抽過來。文革後我爸很快恢復了名譽，又是院長，又是主席，但這對他是另外一種摧毀。他晚年的痛苦在於想寫，却怎麼也寫不出來。他不知道怎麼寫好了。老覺得，這麼寫對嗎？這麼寫行嗎？他的腦子已經不自由了。”

---

那時我九歲 路 忠

我的父親路梅村，五七年反右前是許昌師專的教師，而且是全地區僅有的兩位二級教師之一，在許昌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風時，他作爲地區教師代表到省城參加會議，會上他談了三條意見：一、學校考核學生成績，由百分制改爲蘇聯的五分制不恰當，五分制沒有百分制科學；二、統購統銷，統購得過火，以致好多農民吃不飽飯；三、個別幹部官僚主義嚴重，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這三條意見分別被扣上攻擊蘇聯老大哥，攻擊黨的政策，挑撥黨與農民的關係，攻擊醜化黨的領導三頂大帽子。父親生性耿直，憂國憂民，抗戰時就曾因揭發、抨擊地方官員貪污腐敗、魚肉百姓，被關進監牢。此次自認爲是抱著愛國愛黨的信念實話實說，因而拒不低頭認錯，爲此招來滅頂之災。

那時我九歲，記得父親天天被鬥爭到很晚才回家。衣服上的扣子常常被揪的這兒少一個，那兒少一個。黑棉襖背上，不是被粉筆畫只蛇，就是畫只鱉，天天花樣變換。後來父親連家也不能回了，一家人爲他提心吊膽，揪著心度日。不久，我母親，一個相夫教子的普通家庭婦女，也被街道居民委員會拉到批鬥會場，逼她與父親劃清界限，揭發父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哭泣的母親哽咽著告訴我們，父親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到黃河以北修武縣勞教了。

我們兄弟姐妹在學校學習都很優秀。哥哥剛上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團，姐姐一直是學校少

先隊大隊長。五八年春，全市語文統考，三年級的我，是全校唯一的一個 100 分學生，試卷裏的作文被各班拿去宣讀。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哥哥的團籍被開除，尚在小學就讀的我和姐姐再也得不到老師的青睞。我們如不祥的幽靈，對我們曾經青眼相加的師長們，如今是避之唯恐不及。

五八年暑假後，我升入四年級，新班主任是一個剛從師範畢業的老師，姓翟。這個老師是在反右運動中入黨的學生積極分子。每到預備鈴響，翟就站在教室裏大聲招呼班長領唱：“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當面他說好呀背地來破壞。”歌聲在全班響起後，他總站在我旁邊大聲呵斥我：“XX，咋聽不見你唱？大聲唱！”天天如此。有時，他讓全班停下來，單單讓我站起來給全班唱。儘管我已聲嘶力竭，他還是呵斥我聲音小。放學前，翟老師點評全班當天發生的事，總要先讓我站起來，斥責我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天天如此。如此以來，預備鈴聲響起與放學前最後一課下課鈴響起的時間，都成了我遭受羞辱的“單兵教練”時間，學校大門在我腦海裏變成恐怖的象徵。

開學三個月後的一天，最後一節下課鈴響，我習慣性地忐忑不安，準備進入耻辱的“單兵教練”，意外的是班主任竟放過了我。在他點評班裏當天情況的時候，我心中暗自僥幸，今天可能被免去“單兵教練”了，儘量低下頭，企圖讓他看不到我，忘掉我。隨著他點評結束，我腦海裏正為意外免去一次羞辱而慶幸時，猛然，驚天動地，炸雷般的一串話，把低頭“潛伏”的我震暈了：“路梅村！大右派！”我的腦海霎時一片空白，隨著這聲吼叫，教室和天地一起旋轉，周圍的一切都旋轉著，旋轉著，離開了我。清醒過來時，教室裏已空無一人。我下意識地背上書包，含著滿眼淚花離開學校。

到家後，母親發覺我神情不對，問我怎麼了。遲疑一會兒，我說：“我不想上學了！”母親聞聲大怒，拿著棍子顫抖著問我為什麼。我哭泣著將放學前發生的事告訴了她，并把這學期開始後我經歷的一切都告訴了她。母親聽後愁苦地思索了許久，說：“那就不上吧！”從此，9 歲的我永遠離開了學堂，開始了為家庭分擔負擔的艱難歷程。

## 一生沒笑過的五姑 陳仁德

在我的印象中，五姑一生從來沒有笑過，總是滿臉的憂傷，眼角永遠噙滿淚水，好像隨時都會奪眶而出。她住在離城 60 裏的大山上，每次翻山越嶺來到我家，跨進門見到我父親，叫一聲五哥，眼淚就滾滾而下，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我媽媽在一旁勸她“別哭，別哭了”，但五姑的眼淚依然像斷綫珍珠一般往下掉。在那漫長的 30 年，五姑一直都是這樣。

五姑不僅是我的姑媽，還是我的奶媽。我出生時，正趕上三反洗劫，月子裏的母親天天以淚洗面，靠吃豆腐渣充饑，哪有奶水！五姑就斷了他兒子、我表哥秦宗文的奶哺育我。靠著五姑的奶水，我才幸運地活下來。

五姑陳懋藩生于 1923 年，是我們老家所在的小城裏最早接受現代教育的女性之一，能演奏風琴，愛唱歌跳舞。由我祖父做主，五姑被許配給望水鄉桐梓園秦家大少爺秦大德。秦家是忠縣名門望族，姑父的祖父秦肅三，博學多才且有政治抱負，是辛亥革命時的風雲人物，曾作為國會議員（忠縣僅其一人），赴北京參加大總統選舉，親眼見證了中國選舉史上的那段醜聞。1914 年 1 月 10 日，袁世凱悍然宣布解散國會，廢除《臨時約法》，秦肅三與在京的莫德惠、蒲殿俊等 194 名國會議員聯名上書怒斥袁世凱。後來，秦肅三等 13 名國會議員又冒死 10 次聯名上書。有一次，秦肅三與袁世凱當庭爭辯，舉起桌上的硯臺砸向袁世凱。袁視其為眼中釘，曾通緝捉拿。1938 年，秦肅三因不滿蔣介石，撰寫《討賊民黨蔣介石檄

文》，被當局以侮辱領袖罪逮捕。入獄當天，秦肅三從容寫好遺書，視死如歸，後被判刑三年。

秦家富甲一方，家中的器具極其考究，高大精美的玻璃鏡是從遙遠的北京購回的。秦肅三在北京客居久了，喜歡吃北京糕點，返鄉時帶回一個北京糕點師，專為他製作北京糕點。

祖父為五姑選定的婆家，全家都滿意，惟有我父親堅決反對，曾坐著轎子到桐梓園大鬧，不准五姑出嫁。秦家雖是名門望族，可我們那位姑爺却是紈袴子弟，打牌吃鴉片，不務正業，相貌也不大中看。父親的反對以失敗告終，一切由我爺爺說了算。這也是後來幾十年五姑一見到我父親就大哭的原因之一。

五姑嫁到秦家，開始幾年過得還是不錯的。1949年，滅頂之災降臨，五姑家是大地主，一家幾代被掃地出門，住進以前的柴草屋。有一次父親到五姑家去，寒冬臘月沒有床，五姑的婆母年老體衰，就蜷縮在一堆草灰裏，像一隻老羊。

五姑偶爾回娘家來，我媽媽會找一些破舊衣服給她。一天晚上，我在爺爺床上翻筋斗，五姑坐在床頭，奶奶逗我說：“陳七兒，你長大了怎麼孝敬五姑啊？”我想都沒想就站起來大聲說：“我給五姑做蘇聯花布衣服。”那時中蘇親密，蘇聯花布是最時尚的布料。我大約只有兩歲多，但我一直記著這句話，從不忘懷。18年後，我結束知青生涯，終於有了一份低賤的工作，每月工資24.5元。我想起童年的承諾，但蘇聯已經成為中國天天咒罵的敵人，蘇聯花布也從中國人的生活中消失，我無法再給五姑做蘇聯花布衣服，就選用另外的布料給五姑做了一套衣服。

我小時生活在城裏，對山裏的五姑一無所知。小學四年級那年（1963）暑假，父親叫我無論如何要去看五姑，於是11歲的我翻越崇山峻嶺第一次去五姑家。

桐梓園秦家大院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揚眉山上，大院下面是連綿起伏的青山，再往下就是滾滾長江。站在大院，俯瞰幾十里外的山水，白雲繚繞，清風吹拂，氣象萬千。正對著大院，是一座獨立突出的錐形山峰，滿山是鬱鬱蔥蔥的松柏，最頂上一棵大樹筆直挺拔，正好形成山尖。

此時的桐梓園秦家大院，當年氣勢恢宏的莊園已經面目全非。大院作為勝利果實分給貧下中農居住，新主人根本不知養護，雕梁畫棟被破壞殆盡。大院的格局被打亂，有些地方已經垮塌，院壩裏雜草叢生。雖然如此，仍依稀可見當年的雄渾莊嚴與典雅古樸，一道石門上刻著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的句子：“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五姑一家住在大院一個過道裏，天穿地漏，四壁透風，滿屋烟漬，舊木板架起的床上堆著漁網一樣破爛不堪的發黑的棉絮。我忽然到來，五姑又驚又喜，想買點什麼招待我，就急急地把一個破藤包倒過來，裏面滾出一些零碎的針頭麻線之類各種雜物。印象最深的是裏面竟有一顆牙齒，五姑告訴我是我奶奶掉下的牙齒，她一直珍藏著。那時我奶奶還健在。五姑撥開那些零碎雜物，底下露出幾枚硬幣。她小心翼翼地將硬幣一枚枚撿起來放到手裏清點，一共是一角七分錢。這是五姑一家的所有積蓄，那一刻我被徹底震撼！

後來我多次向父親講起這一角七分錢，父親都悶著不說話，不知他心裏有多難受。

五姑留我住了幾天才讓我走。我每天和表弟宗武（八九歲）一起上山玩，看他飛快地揮舞鐮刀割苦蒿。晚上宗武在屋子裏點燃一大堆苦蒿，用竹扇使勁扇，濃濃的烟霧在屋裏瀰漫，成群結隊聲的蚊子便紛紛散去。濃烟散盡，蚊陣又重新襲來。

那天我跟著宗武正準備上山，院子裏一群小孩忽然將我圍住。領頭的一個，年齡和我差不多，其他小孩叫他川湘，赤著上身，滿身被太陽曬得黝黑，頭髮淺淺的，眼睛很亮。我開始以為是鄉下孩子見到城裏孩子好奇，接下來的發生的事實却并非如此。

川湘瞪著眼睛說：“今天不准你從這裏過。”我莫名其妙，堅持要過去。川湘伸手攔我，我把他的手擋開。兩三個回合後，川湘忽然大叫一聲：“你這個地主！”然後像獅子一樣猛撲過來，把我往地上按。我也不客氣，當下就和他扭打起來。旁邊的孩子一起沖著我大喊：

“地主！地主！”宗武在旁邊臉色發白，不敢吭聲。這場“階級鬥爭”，直到生產隊長出動才解了圍。

從此我記住了川湘的名字，據說他現在還住在那座山上。我由此想到，五姑一家在那裏是何等受歧視！一個小不點孩子，可以任意欺負五姑的客人，對五姑本人的欺負可想而知。極具歧視性的地主二字挂在小孩嘴上，莫名其妙的仇恨寫在小孩臉上，年僅八九歲的宗武已經習慣了面對侮辱不吭聲。五姑一家在那裏實際上已被判了無期徒刑。

姑父從小過著極為優裕的生活，一下淪為賤民，猶如墜入地獄，可是很快習慣了逆來順受，適應了千奇百怪的殘酷鬥爭，也學會了各種笨重的農活，面對任何苦難都能安之若素。幾十年裏，姑父從來不唉聲嘆氣，和五姑的哭啼完全不同。他總是高挺著身子，鼻子像鷹一樣，眼睛半眯著向下看，好像什麼都不放在眼裏。當年天天沉溺於麻將桌上的他，幾十年的煉獄生活中與麻將徹底絕緣。文革浩劫結束後，麻將首先在城市裏出現。一天，姑父因事來我家，進門就意外地看見我父母在打麻將。父母邀他參戰，他毫不推辭就上陣，大顯身手，連連獲勝。

八十年代初，五姑的地主帽子摘掉了。由于幾十年遭受非人折磨，她已經失去應有的神采，極度的貧困依然壓迫著她。一次，鄉里找她收什麼名目的款項，她實在交不出，他們威脅她，限令幾日內交出，否則要拆掉那間破房子。五姑立馬進城，見到我父親，一聲五哥都沒來得及叫就大哭起來，傷心至極。我父母雖然自己也困難，總比五姑好得多，當即想法湊錢給五姑解了燃眉之急。我當時在場，目睹五姑痛哭，曾寫五古詩一首《五姑》：“工者操機具，耕者守田畝。田薄稻麥稀，耕者一何苦。嗟哉吾五姑，貧居山深處。衰顏敝衣單，破壁朔風舞。今年天大旱，丘巒成赤土。缺糧少菜蔬，將何充腸肚。鄉丁催款來，呵呵猛如虎。囊底探欲穿，唯唯不敢怒。入城求舅親，相見淚如雨。百年總憂貧，不得半日富。一生辛且勞，到老仍襤褸。對之久歔歔，愴然傷肺腑。”

五姑一天天老了，病了，已沒能力進城回娘家。我們給她送過多次藥品，但都無法挽留住她的生命。2001年的一天，五姑病危，我從重慶回老家，和八十多歲的父親一起到桐梓園看她。靜臥在床的五姑，非常憔悴，臉色蠟黃，眼光黯淡，頭髮散亂。她睜開渾濁的眼睛，忽然看到我和父親站在床前，頓時淚珠滾滾而下，從蓋裏伸出兩隻蒼老的手，父親趕緊握住。兩兄妹歷經風霜的手握在一起，是人間最感人的一幅畫。泪水也從父親的眼中涌出，滴到五姑床上。

我父親是那麼心疼他的妹妹，從少年到暮年，一直沒有改變。雖然父親自己也屢經患難，但是從未忘記盡微薄之力去幫助五姑。現在，兄妹兩人今生訣別就在眼前，怎不令人肝腸寸斷。五姑已失音，看著親人却不能說一句話，只是張開嘴哇哇地叫。我猜想她一定是在喊：“五哥！五哥！”父親大聲地對五姑說：“五妹，你要想說的話我都知道，你莫著急。”五姑聽後直點頭，眼淚簌簌地流。父親坐在床頭給五姑一口一口地喂飯，五姑像個小孩一樣乖乖地吃著，眼淚仍然不停地流淌。

分別的時候到了，父親要趕回城，我要趕回《重慶商報》上班。我們最後一次握住五姑的手，五姑死死地抓住我們不肯鬆開，嘴裏嗚嗚地叫，我們狠著心把手縮回。轉身出門時，我看見五姑的兩隻手一直高高地伸著，眼淚流過整個面頰。幾天後傳來噩耗，五姑走了，去了一個沒有貧困也沒有歧視更沒有鬥爭的地方。

---

我們大隊第三生產隊的生產老是上不去，挨大隊長批評。三隊長叫苦不迭，說：“不是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嗎？可我們隊裏一個地主富農都沒有，你叫我怎麼抓？沒法抓階級鬥爭，這生產怎麼能上去？這樣吧，你能不能跟別的生產隊說說，把他們隊裏的地主借幾個我

們鬥鬥？保不准生產就上去了。”其他幾個隊長不願意了，他們的寶貝怎麼能隨便借呢？一時間地主富農成了緊俏貨。

—————

## 金庸之父 淮 海

金庸的父親叫查樞卿。金庸出生時，查家有 3600 畝田地，租戶上百戶。查樞卿受過西洋教育，與徐志摩、張愛玲的父親一樣，不是那種土地主，屬於過渡時代中西文化混雜的人物。

1951 年土改、鎮反運動中，查樞卿被中共地方政府判處死刑槍決了。這對金庸來說實在是難以想像和接受的，他說：“逃往臺灣的絕大部分人，血債累累，而今回到祖國却倍受政府和人民的歡迎。抗日戰爭結束後，日本在中國犯下滔天大罪，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 830 多名日本大戰犯，從蘇聯押解回中國撫順，不僅一個沒處死，反而都得到上等待遇。在今天，羈押錯一個老百姓都要賠償，而父親的壯舉，難道都不如這些罪惡累累的劊子手？那是一條寶貴的生命啊！就這樣被輕易奪去了，難道就這樣不了了之嗎？”

30 年之後，1981 年 7 月 18 日上午，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會見香港《明報》社長金庸，並同金庸的妻子和子女合影。談話中，鄧小平主動與金庸談起他父親被殺的事情，說“團結起來向前看”。金庸點點頭，說：“人入黃泉不能復生，算了吧！”這次接見之後，浙江省海寧縣委、縣政府與嘉興市委統戰部、市僑辦，聯合組織調查組，對金庸之父查樞卿的案件進行復查，最後由海寧縣人民法院撤銷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給予平反昭雪。

金庸得知後，專門寫信給海寧縣委領導，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

## 我的第一次婚姻 滬 英

我出身在一個地主家庭，但打小也沒覺得我家生活怎麼富裕。家中兩兒五女，負擔自然是比較重。母親好不容易供我讀完小學，剛好趕上解放。小學畢業之後我就沒學可上了，很長一段時間都只能白天上山割野草，晚上回家燒飯菜。當時我只有十四五歲，日子過得非常苦，每天睡在樓梯下的走廊裏，被蚊子叮咬不說，半夜經常有四五十歲的中年男子路過，我不敢熟睡，時時提防著，生怕一睡著被人家占了便宜。後來哥哥從村裏出來了，他給了我一點錢，我就努力學習，終於考上上海的一所女子中學。當時我的學習成績還是不錯的，上中學的頭兩年我都是學習委員，後來還當了班長。爲了早點畢業，參加工作，我報考了上海機械學校。

1960 年畢業，我和四個男生因成分不好，被分配到西安郊區的一家國防工廠。我的一個上海同學，被分配到上海交大，一隻追求我。我開始不依，父母說他成分好，又在上海交大工作，希望我和他交往。我遵循了父母的意思，去西安後一直與他保持書信聯繫。此時另一位成分也不好的同學，因父母逃去香港，來不及把他帶走，也被分配到西安，和我同一個單位。他非常喜歡我，追我追得很緊。後來他的在香港的父母知道了，就寫信叫他把我帶出

去探親。我們廠似乎發現了這個意圖，就把我下放回上海農村。回上海後，我便和在交大的男朋友草草把婚事辦了。

結婚一年多，丈夫就提出和我分手。我在上海農村，和他父母一起幹農活。他在信裏告訴他父母，我是地主小姐，從小嬌生慣養，吃不起苦，希望和我儘早分手，讓他父母逼我早點離開。他父母總是把最粗最重的活兒丟給我，讓我紡紗、割豬草，一日三頓都只能吃地瓜，還一毛錢不給我。

我看了他的信，又難過又生氣，決定去上海找他。他父親不允，我又是被下放到農村的，怕組織認為我不重視勞動，也不敢執意去。既已知道了真相，我實在無法忍受，就跑到上海交大的黨支部，反映我的委屈。領導給他做思想工作，不行，我只好告到工宣隊。我只想與他複合，並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要求他每月給我 15 元的生活費，先和我回家去。丈夫翻臉無情，說我是反革命。我成分不好，可我是清白的。回到農村以後，丈夫先是到處說，已經查清，我是反革命，要批鬥我。一大幫人跑到家裏質問我，我當然不認。他們都不相信，還要我交出工分錢。我連工作都沒有，哪來的工分錢啊！

這樣過了好幾天，鄉政府領導來了，他們安慰我，說事情會查清楚的。我哭著拿出一疊信，這是我寫給丈夫單位黨支部領導的，希望能夠證明我的清白。寄信要走好幾裏路，我一直沒能把信寄出。我把信交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幫我正名。三天后，鄉政府叫我過去，丈夫單位的領導們也來了，我一見他們就哭了。原來他們一星期前就來了，一直在觀察丈夫是怎麼對待我的，暗地裏也派人保護我。領導們批評了他，讓他繼續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鄉政府領導看我雖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人蠻老實，就委托大隊幫我安排了工作。領導告訴我，這次丈夫因為亂散謠言被處分得不輕，要和他複合是不可能了。我的第一次婚姻就這麼結束了。

---

當時我讀小學一年級，哥哥讀四年級，哥哥本想在乒乓球桌上寫“踏平人民公敵”，却寫成了“踏平人民公社”。不得了嘍，鬥得死去活來，打成殘廢！

---

姨婆祖 浙 土

??????

奶奶的姐姐，我們叫姨婆祖。土改時，姨婆祖被劃為地主，姨公祖和他的大兒子被打被鬥，先後死去。大兒媳因受不了種種折磨和別人的勸說，改嫁了。姨婆祖的其他三個兒子，已到結婚年齡，沒有姑娘肯嫁。姨婆祖整天以淚洗臉，到晚年雙眼失明。改革開放時，最小的兒子三十多歲了，在我爸的幫助下娶了個媳婦。二兒子沒有結婚，三兒子在近五十歲時娶了個越南女子。

1983 年新年，我們一家人去姨婆祖家作客，奶奶、姨婆祖兩人相見後不久就大哭起來，那時她們都 70 多歲了。姨婆祖回憶說：“那一年，我們被關在祠堂裏，幾天都不能去外面一次。晚上蚊子特別多，妹子拿來蚊帳和紅薯。若沒有三妹子，我這個作姐姐的早就餓死了。”奶奶接著回憶說：“大姐，那次我也被鬥了。那些人發現我給你們帶東西，叫我以後不要再帶東西給你們。我的口糧也被減了一半多，有一段時間不發給我口糧，我也差點被餓死。”

說到娘家，姨婆祖說：“我沒臉回去了，如果當年不是娘家人的指告，我也不會被害得這麼慘。”“哥哥他們來過嗎？”奶奶問。“沒有，十幾二十年了沒來過。”“年前我去了

一趟看哥哥。幾十年了，一切都變了，很多後生我都不認識了。哥說了，他們這輩子做了一件最對不起妹子的事，沒臉來見你，也不知該怎麼和你說。”奶奶流著淚說。

姨婆祖說：“不管怎麼樣，他們都不該指證我是地主成分。現在這家不成家，人不成人。”姨婆祖又哭了。奶奶說：“誰知道會造成今天這個樣子，如果知道誰都不會那樣做。”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姨婆祖一家肯定走向滅亡。

## 變態的爺爺 村 晴

爺爺與別人不同的地方，是他脖子上從早到晚都戴著一個用破布匝的圓圈圈。那東西壓在肩上，很耐磨，很適合他每天挑大糞的工作。我至今想不明白，不挑大糞時，為什麼他也總戴著那個破圈圈，以至于那東西在我的記憶成為他的標志。

我稍微懂事時，爺爺拉著我的手在村中溜達，告訴我，誰家住的房子曾是我們家的牲口屋，哪片林地曾是我們家的菜園子，別看某某現在耀武揚威，過去像騾子一樣給我們家拉犁推磨。夕陽的餘輝照在這個老地主的臉上，他完全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和留戀中，哪料叛逆的種子早已在他這個新社會出生的孫子心中生根發芽。

爺爺的許多行事實在讓人難以接受。有一次，爺爺喂的母狗生了一窩小崽，通常這些狗仔要送給左鄰右舍，誰家上門討要，主人也不拒絕。爺爺不然，他的狗仔一個也不送人，而是找來一個大木盆，燒一鍋開水，倒在盆中，在盆子上放一個很窄的木板，讓小狗一個個從木板的這頭往那頭爬，哪個爬不過去，掉在開水中斃命，便成爺爺的一頓美餐。爺爺口中還念念有詞：“怎麼，不怪我吧，誰讓你爬不過去呢？”那小狗仔剛生下沒幾天，眼睛還沒睜開，怎能走好這樣的獨木橋？老地主的凶殘和虛偽，在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面前暴露得一覽無餘。

爺爺並不親我這個小孫子，這一點我很小時就感覺到了。別人的爺爺有什麼好吃的，都給孫子留著，而他從不。爺爺愛趕集，每次從集上回來，總愛帶幾根油條。那油條黃黃的，泛著亮光，用一根紙繩子系著，散發著誘人的香味。爺爺提著油條從我眼前踱過，好像一點也沒聽見我一聲聲喊“爺爺”。

爺爺患了癌症，在我上初中二年級時去世，死前幾乎吃光了家裏所有能變賣的東西。臨死的前幾天，他還把一棵只有碗口粗的棟樹砍掉換成吃的。一輩子對老子逆來順受的父親這次制止了他，這個老地主對這個帶給他痛苦和屈辱的世界再沒有任何留戀。臨閉眼時，他已不能說話，但仍用眼神示意請享受無法回避的痛苦。 焦國標書 我的母親，枕——頭下面有什麼東西。母親伸手摸出一個白布包著的小包，層層打開，是一顆放了很長時間已經有些融化的水果糖。母親把糖剝開，放到他的嘴裏，他的眼睛在眾人一片唏噓聲中安心地閉上了。

爺爺已離去二十多年了，他留給我和我們家族的，是曾經背負著“在成分”這個枷鎖的我們這幾代人心中永遠的傷痛！

## 鬥爭哈密王 沈俊杰

赴朝慰問團回國後，我被指派到西北五省作宣傳報告，八月中旬到了新疆哈密市。8月13日，哈密市舉行鬥爭大會，地點在城外小河邊。這天天氣很好，太陽烤人。鬥爭大會采



用訴苦會的形式，沒有主席臺那樣的擺設。鬥爭對象是哈密王十一世伯錫爾及其家族，還有一個地主玉素圃。

鬥爭哈密王伯錫爾的場地在河右岸沙灘上。伯錫爾四十多歲，身體強壯，著短衫短褲，足上帶鐐，踝骨處有模糊血迹，腳鐐上有濕潤的血痕。站在炎熱的太陽下面對鬥爭的人群，呼喊之聲四處傳來，哈密王對此顯得心情平靜，若無其事。

最熱烈的鬥爭場面在河的左岸，鬥的對象是哈密王的弟弟及其岳父岳母，還有地主玉素圃，他們也站在太陽下。王弟很瘦弱，可能吸食鴉片，哭喪著臉，其岳父母看上去就是兩個可憐的老人，地主玉素圃七十歲左右，一張瘦臉，長滿白鬚鬚。他們站在那裏一動不許動，一動，武裝人員的刺刀就沖向他們的胸膛。

群眾坐在堤岸上、沙灘上，穿著紅紅綠綠的維吾爾族服裝，手中搖著一尺大小的旗幟，不斷呼叫。維族人的呼喊聲清脆，不像漢人口音那樣重濁。我不懂喊什麼，翻譯告訴我，他們在呼喊槍斃哈密王。群眾呼聲稍停，就聽到有人在被鬥者面前述說他們的罪惡。

據說哈密王是這裏的惡霸，他家受清朝冊封，至今已十一世。民國時期，哈密王是個軍官。全新疆有幾個這樣的王，其他如鄯善王、和闐王。我到鄯善時，曾到過鄯善王的王宮，一座極落後的土制二層樓，革命後已被拆毀。王被鬥爭，破樓中還有王妃(一個四十多歲衰弱不堪的婦人)居住。

通過翻譯，我在會場上親口問哈密王弟弟的妻子：“你們是怎麼回事？”她說：“他們向我們要錢，我們已經把所有的交出去了，但是還是逼著要！”說著，這個神經衰弱之極的婦人滴下兩顆淚珠。

未待鬥爭大會結束，我就離開了會場。幾天後，我去了吐魯番。我們完成在新疆的宣傳報告任務返回北京時，飛機在哈密停了一夜，我又去城內訪問。無意中我問哈密專員一句：“哈密王怎樣處置了？”他回答說：“爲了團結少數民族，哈密王病死在獄中了！”

---

表叔小時候家很窮，讀小學時，別人不用交學費，他這些地主富農子弟就要交兩塊八。吃飯的時候，同學會說：“你們這些地主富農，不用吃。”表叔現在很有錢，在跟一個曾經的貧農爭一塊地。那塊地本來是表叔家的，因爲是地主，那時認爲不會有錢蓋房子，就給了那個人蓋了房。現在那人不在那裏住了，就剩一間爛泥屋子。表叔說給他一萬塊，把那房子鈎了，打算蓋別墅，一千二百多平方。那人不要錢，也不讓地。表叔說再鬧要落他面子，把他兒子的網吧關了，塞他去監獄。表叔有一次問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症，沒有就這樣整到他，讓他吃不好，睡不好。

---

文革初期我遇到一件事。在怡安街商場，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滿頭白髮，穿著一身黑色中山服，左胸前別著一個 6x8 公分的黑牌，上面用白漆寫兩個字“地主”，站在櫃檯前賣布。周圍的人對他指指劃劃，他尷尬地站在那裏，不安地左顧右盼，晃動著兩條腿，兩隻手不知道放在什麼位置才能掩蓋被人奚落的難堪。看得出來，他真想找個地縫鑽進去。看見刺目的這兩個字挂在老人胸前的剎那，我驚愕地低下頭，心裏淌血，因爲我是地主家的孩子。

鬥爭地主時，各村鎮的貧農團都追逼地主的地財——埋藏的金銀細軟。貧農團的勇敢分子們私設公堂，刑訊逼供，所施加的酷刑駭人聽聞。略舉如下：

(1) 壓杠子：把受刑人按趴下，再把一根木棍（扁擔或椽子）壓在受刑人的小腿肚子上，木棍兩端各有一個人向下用力壓。更有甚者，還要在受刑人的小腿兩端墊上磚，兩人坐在木棍兩端玩“蹺蹺板”。(2) 烙鐵烙：火盆裏放炭火把烙鐵燒紅，往受刑人身上烙。更為凶狠下流的是剝光婦女的衣服，烙乳房，燙陰部。(3) 刺手指：摠住或綁住受刑人，用納鞋底的錐子從手指甲縫裏刺入。(4) 跪碗渣：讓受刑人露出膝蓋，跪在尖銳的碎碗渣或玻璃渣上。(5) 披麻戴孝：剝光受刑人上衣，在背部或胸部塗上熬好的膠，然後纏裹上麻，等麻粘牢後再用力撕麻，連同皮肉一起撕下。(6) 鴨子晃水：把受刑人兩腳兩手擰在後背捆在一起，吊在房梁上，或用木棍皮鞭打，或用鞋底打嘴巴。(7) 倒挂拔毛：把受刑人的兩隻腳脖子捆在一起，頭朝下吊在房梁上，一撮撮拔掉受刑人的頭髮或鬍鬚。(8) 灌辣椒水：和倒挂拔毛相似，只是不拔頭髮和鬍子，而是向鼻孔裏灌辣椒水，有的用醋代替辣椒水。(9) 蕩秋千：把受刑人的兩手擰到背後捆緊吊在房梁上，推著蕩秋千，難以拷打，有的還在受刑人的腿上挂上重物，更甚者剝光受刑人的半身或全身衣服，用烟袋鍋、香烟頭或燒紅的鐵絲燙著取樂。(10) 榨油（夾棍）：用兩根結實的木棒夾住受刑人的小腿或手指，木棍兩端各有一個人握住棍子用力夾擠壓榨。(11) 凍豆腐：剝光受刑人的半身或全身，手脚捆住扔在雪地上，快要凍僵時再提回屋裏訊問，可反復進行。(12) 腌蘿蔔：把受刑人打得遍體鱗傷後，再向傷口裏灑食鹽。(13) 壓麵條：受刑人仰臥地上，腰部墊上磚，然後一個人摠頭，一個人摠腳，用力向下壓，磚越墊越多，直到受刑人叫饒為止。(14) 搓排骨：剝光受刑人上身，摠倒在地，用洗衣服的搓板用力搓刮肋骨。(15) 烤全豬：剝光受刑人的衣服，四個馬蹄般地綁住，吊在房梁上（如同鴨子晃水），下麵放著盛炭火的火盆，連烤帶熏，雜以錐子扎、鐵絲燙，最為下流的是“烤母豬”，用女人取樂。

常常是多種刑訊方式并用，其野蠻殘酷可想而知！許多人被活活打死或折磨死，還有許多人不堪忍受酷刑而自殺，許多婦女因不堪忍受而投河上吊。

---

爺爺是徽州人，解放前來到江蘇做生意，挑著小貨擔，搖著撥浪鼓走街串巷認識我奶奶。靠著勤勞智慧，爺爺很快成了鎮裏的首富。奶奶家有個遠房，做生意本錢不夠，爺爺鼎力資助。後來那位親戚生意做到上海，就將自己的 120 畝田地抵作當初爺爺借給他的現金。土改時，爺爺被劃為地主，此後半生坎坷。爺爺始終堅信知識改變命運。我姑媽在揚州中學讀高中，寄宿在爺爺的一個朋友家。爺爺每月都背著一大口袋米步行 20 公里送去。後來姑媽成為鎮上第一位女大學生，父親的哥哥、父親也都大學畢業，事業有成。爺爺晚年，生活平靜，喜歡看書看報。他識字不多，不認識的字都要問我。有一天我終於不耐煩起來，決定教爺爺查字典。那時流行四角號碼查字法，我將方法、口訣告訴爺爺。一個星期後，爺爺已經能很熟練地查到生字，看書看報再也不來找我了。爺爺去世 20 年了，每年清明，我都會來到爺爺墓前，清理雜草，擦拭墓碑。每次站在爺爺墓前，我都有一種負疚感。爺爺生前一直希望我能考上政法大學，吃官飯，他說這樣不會被人欺。我沒能實現他老人家的夙願，以後我會讓我的兒子來實現這個願望。 冰之遠

---

## 我家被清算 曲 爺

土改時在農村鬥地主、分田地叫做土改，在小縣城裏鬥爭有錢人家、沒收富人的財產叫做清算。按政策我家不屬清算對象，但最後還是被清算了。

八月的一天下午，縣公安局和榆林村翻身隊聯合行動，派公安三個便衣在縣麵粉廠（父親兼任副廠長）把我父親帶走，關了八個月，從未提審過，也從未說明關押原因。父親被帶走那天，我和三弟本是與父親在一起的，那時我十歲，三弟六歲。我知道公安局的人帶父親沒好事，就藏在一個角落裏，沒跟父親去。與此同時，翻身隊封占了我們家，把母親和三個弟弟用兩輪馬車帶到距縣城 20 裏的榆林村。

這叫异地土改或异地清算。據說這是陳雲的創舉，本村人鬥本村人地主，鄉里鄉親，如果不是橫行鄉里的惡霸地主，人們都下不了手搞流血鬥爭。我村人鬥你村地主，距離遠些，鬥起來下得死手，不擔心秋後報復。鬥爭我家的榆林村，與我家相距 20 裏，我家與該村無任何關係，無土地，沒有認識的人。該村中很多人只知道縣城有個曲老太太及曲老太太之子曲大夫，并無人與曲家人相識。

當時我媽媽 33 歲，三個弟弟，大的 6 歲，小的 2 歲。鬥爭媽媽的大會是在榆林村一個大房間裏進行的，高挂多個煤油吊燈，房間昏暗，看不清人的面貌，氣氛陰森可怕。審問臺上坐著幾個翻身隊的頭頭，台下四周站滿村中的男女老少幾十人，審問台前放置一個條凳。頭頭一聲大喊：“把人帶上來！”幾個年青的翻身隊員手持紅纓槍擁促著母親走到主席臺前。主審官對母親大聲說：“坐下！”媽媽抱著兩歲的小弟坐下，另兩個弟弟站在媽媽跟前。

主審的頭頭開場道：“你曲家是寧安縣有名的富戶！你的婆婆曲老太太遠近有名！今天鬥爭你家，是要你坦白交待埋藏的金銀財寶！你丈夫曲大夫被縣公安局關押，今天只能鬥爭你們母子！只要你老老實實，徹底坦白交出全部金銀財寶，看在你是個女人，孩子又太小，我們不打你，不動你！如果不徹底坦白交待，別怪我們不客氣。”母親嚇得渾身發抖，說不出話來。過了好長時間，母親說：“我徹底坦白交待！千萬別打三個孩子！他們太小，他們不知道金子埋在哪！”母親說出了老宅裏埋藏金銀財寶的地點，他們沒有對母親和弟弟動手。第二天，翻身隊派人在老宅真的挖出了財寶，其中有黃金四十兩。

我大哥當年十四歲，讀中學，幸好那年在長春姑媽家讀書，躲過了被鬥爭，否則會受皮肉之苦。早有耳聞，有一種辦法是在鬥爭會上棍打丈夫，叫妻子在旁觀看，妻子心痛丈夫就會坦白交待藏金地點；丈夫不在時會棍打兒子，叫媽媽在旁觀看。

母子四人被關押半個月後獲釋，然後用兩輪馬車送回縣城，沒送回老宅，而是安排在縣城北面一個大雜院的一間九平米的草房裏。麵粉廠的人知道我母親的下落後，廠長派人把我送回母親身邊。除了每人的隨身單衣之外，翻身隊只給一條被子。晚上睡覺時，我們母子五人共蓋這一條被子。每到吃飯時，到大雜院的前院找村中翻身隊的人（當時每個村的翻身隊都有常駐縣城的人），和他們一起吃大鍋飯！這樣的日子過了半個月。那時共產黨要求任何人必須與清算對象劃清界限，不許接納被鬥地主和清算對象，一些親朋好友只能偷偷接濟我家。這樣勉強度過七個月，直到父親出獄。

父親被關八個月，最後無罪釋放。雖未判刑，清算難免，1948 年 2 月的一個晚上，出獄後的父親直接被縣城東關的翻身隊帶到隊部。當晚十點，鬥爭、清算父親開始，由棒子隊（即翻身隊）執行。母親先前已經徹底交待財寶，父親無金銀財寶可交代了，只能承受棍刑。

我親眼看過一次棍型現場：一個地主被人按住趴在地上，執刑的棒子隊員六人，一邊三

人站在受刑人兩旁。每兩人一組，手持一米長棍，面對面站在受刑人兩側，交換抽打受刑人的屁股。三組人輪換抽打，受刑人開始大喊大叫，很短時間就昏死過去，被人抬走。

次日，母親把父親接回家中，是用人抬回家的！當時人已很微弱，面向下爬著。母親為父親脫掉褲子清洗傷口，我們母子幾人都看到，屁股兩邊血肉模糊。至今六十年過去，當年在場的四兄弟記憶仍存，只有老五沒印象，他當年兩歲，太小了。到底棒子隊打了父親多少軍棍，由多少個棒子隊員參與執刑，父親從未談過。為了不刺痛他的心，我們子女八人也從未問過他。後來偶爾談起清算，父親會說，那些人很多是縣城中的無業游民、二流子、小混混，他們是窮人，但不本分。父親是縣城唯一的一個大學科班出身的醫生，在縣城廣受尊敬與愛戴，本分的縣民對他絕對下不去手。

2007年6月，我和哥哥淨身出戶六十年後第一次回故里。縣已改市，老宅仍在，其主人（產權單位）是寧安市委黨校。大門左上方牆上挂著一個精製木牌，上寫“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曲老太太舊宅遺址”。今人有誰知道曲老太太舊宅是如何變成市委黨校黨產的？曲家後人明白地告訴大家：不是買賣交易！不是捐贈！是用清算改變的所有權！

寧安市的老城舊房大部分被拆除，到處蓋起高樓大廈，作為文物保留下來的兩個老宅民居，除曲老太太舊宅遺址，還有一處是張聞天生活工作舊址。當年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坐鎮寧安指導當地的土改和清算運動。對於寧安清算運動中的極左行徑，張聞天該負什麼責任？對他那一段的工作是歌頌還是批判？是九個指頭還是一個指頭？張聞天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文革後徹底平反，可有誰替那些在土改中受到傷害的平民百姓、商人、知識分子、富裕人家平反？

## 海晏移民泪 鐵穆耳

洛布丹的回憶：

1958年10月，上級命令下來了，讓海晏縣（青海省）成分不好的幾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600公里外祁連縣的蘇勒托萊（今屬天峻縣和祁連縣，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壞人，牲口被沒收了，每戶只讓趕五頭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戶只准趕兩頭。幹部們拿著槍來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別的啥也不讓拿，說到了那裏啥都有。誰要是回頭看一下，幹部就舉著槍問：“你看啥哩？”哪個不走，就威脅要就地槍斃。給我們派來的幹部都是從西寧那邊來的，多半是農墾部隊的。路上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茶吃點什麼，他們就拔出槍嘖嘖嘖地壓上子彈。

人們被趕到一個大坂上，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了好久，路邊有一戶人家，有個老奶奶，給我們餓肚子的人燒了茶，又把僅有的半盆酸奶給我們吃。人世上總是有這樣好心的人。

從庫庫淖爾（青海湖）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老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裏死掉了，有的人坐著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孩子們也習慣了，在老人尸體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連縣後，海晏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溝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親人不能相見。

每天食堂裏的隊長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第二天肯定就能在灘上看見他的

屍體，滿灘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後，審訊時給他上了八段錦（一種酷刑），導致腰椎骨脫臼，後來成了一個醜陋的駝背。獲釋後，他攔一輛卡車到了托萊牧場。下了車，在開闊的草地上看見一個放羊的老大娘。大娘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從前哈爾金鄉的鄉長散白勒。”大娘驚訝地看著這個背已彎曲的畸形人，楞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這個醜陋的人就是從前健壯高大的鄉長散白勒，囁嚅著問：“你還活著嗎？那我們家的藍白還活著嗎？”散白勒告訴她：“你們家的藍白還活著，我見了他。”大娘顧不上和散白勒說話，就掉過頭向遠處一個放羊的年輕女人大聲喊：“藍白還活著，藍白還活著。”散白勒到自己家時，他的媳婦和娃娃們都沒有認出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駝背畸形人。

歐智布的回憶：

搬遷的時間是定死的，一戶只給兩個馱牛，只能馱一點鋪蓋和一點口糧。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馱上，吃的和鋪蓋就馱不上了。有的人家，金銀珠寶之類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還不夠，把狗領上喂啥呀？本來牧區的人家，搬遷轉場一般都要 10 多頭到 20 多頭馱牛才能搬遷，兩個馱牛我們能馱個啥呀？1958 年的冬天雪那麼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麼大，馱上的皮襖不夠用，一家一個破白布帳房，有的只帶著半片帳房。

老人們走不動，娃娃們凍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說是反革命叛亂分子。有一戶人家，有 7 個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來把阿爸和阿媽抓走了。剩下的 7 個娃娃，一個比一個小，大一點的拉著小一點的，一個拉一個，在大雪地裏趕著牲口走。旁邊的鄰居們拉扯了幾個小的，就這麼走，算是沒有死掉，活下來了。1982 年我去那裏時，那 7 個娃娃中最大的已經是 40 歲的婦女了。

有一家的兒子被民兵叫去了，說有個事情。小夥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來給老阿爺說，他的兒子死掉了，讓他去取屍體。噫！兒子好好地跟上他們走了，怎麼就死掉了呢？民兵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死掉了。老阿爺跟上取屍體的時候，看見兒子後腦勺有一個斧頭或槍托之類的東西砸下的傷。原來是民兵叫上去審問，讓他承認偷了什麼東西。他不承認，就被民兵一斧頭或槍托砸在後腦勺上，死了。老阿爺哭得噎著說不出話來。當時你給誰說呀？給誰說也是白說。死一個反革命家屬還不如死了個羊，就這麼完了。

乃志布的回憶：

1958 年上級把海晏縣打成反革命縣，15 歲以上的男人全部鎮壓了，手銬都不夠了，就用繩子捆。上面說，要鎮壓 1000 個男人，海晏縣就叛亂不了啦，其實海晏哪有叛亂啊？就我們所知，整個海北州也沒有什麼叛亂。海北州公安局命令，1000 個男人如果抓不夠，就抓女的來頂替。州監獄裏女犯很多，影響實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縣的縣長劉義（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裡？勞改農場多的是，德令哈、格爾木、浩門、化隆，活著回來的沒幾個。

我們成分高的牧民，財產全部沒收，被趕到公私合營牧場。那是 1958 年秋，10 月 10 日，我記得很清楚，晚上來的通知，早晨就要走。蒙古包扔下了，鍋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幹部們背著槍趕著我們走，誰走遲了誰就是反革命叛亂分子。一戶只准趕自己的 3 頭牛，一頂帳篷往馬上一放就走了。50 個牧民一個食堂，沒有自己的鍋碗，來遲了吃不上。600 公里路走了 45 天，一路上病死的，餓死的，因氣候不適應和絕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炎、痢疾，死尸只能扔掉。我們趕上 21 萬頭牲口走，上級只統計路上死的牲口有 2 萬多頭，說是國家的財產，人死了多少沒有誰統計，人沒有牲口重要啊。唉！600 公里走了 45 天，死了多少人啊！托萊牧場的一個坑裏堆滿了人的屍體，春夏時候臭得人頭暈。

到了天峻、蘇勒托萊，隆冬時節，氣候寒冷，帳篷扎不起來。有的一個帳篷裏住四戶人家，一個角裏住一戶。沒有鍋碗，找個臉盆做了點炒麵糊糊。每個人一月九斤糧，哪够吃啊，餓死了多少人。有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啊，因為那全是國家的，連幹部也沒有權力宰。偷宰一隻羊，是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產，要逮捕法辦，後來打下一些野牲，人活下來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員，可以偷偷摸摸吃一點，算是沒有餓死。

1980 年海晏縣的反革命帽子脫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經死了，財產全沒了，家鄉沒有了。幾十年來批鬥、挨打過來了，我們也老了。2003 年要撤場，牧場的牧工每人給了 3000 元打發了。從 1958 年到 2003 年，一輩子都在牧場放牧，一輩子隻掙了 3000 元。一輩子啊！沒有工資的家屬、牧工最可憐。

穆智勒的回憶：

我是貝子家（水峽貝子旗）的，我的父親叫久格西，是哈勒景鄉的副鄉長。那時候他有兩匹好馬，一匹是青馬，一匹是棗騮馬。縣上叫我父親去開會，他騎上那匹青馬去開會，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人們說我父親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時候我還小，男人們都抓走了。我的阿舅，是宗貝子家（宗貝子旗）的王爺，1958 年前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長，也被抓走了。我的父親有胃病，1961 年死在德令哈勞改農場。

我的父親剛抓走不久，1958 年 9 月我們就被趕離家園，一路上又是風又是雪。路上，我們看見，剛察縣搬走的牧民的營盤上火塘還在冒烟。我們從老家海晏的哈勒景鄉出發，一家人只准趕 3 個馱東西用的牦牛，三四十戶人家被編到一個食堂裏。我們一家 5 個人，早晨天剛亮就趕著集體的三四百隻牛羊走。路上到處都是牛羊和趕牛羊的牧民，牛羊亂跑，人也亂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只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給路上的礦區了。一路上，好一點的馬、犏牛又跑回我們的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麼戀自己的草原，我們人呢？公安局的、民兵們在後面趕著我們，我們還能怎樣呢？我們用火皮袋子打火，吃點死面餅子就走。路上沒有帳篷，隨便躺在灘上打個盹。到則熱恩塊勒，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們到庫庫熱，到托萊，又從托萊到天峻，整整走了 49 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說不完。到天峻後，在哈拉淖爾（哈拉湖，面積僅次于青海湖）湖邊，又和天峻的牧民們打架爭草原。我被趕去挖煤，那時我才 16 歲。反屬的子女不讓放牧，只能到農業點開荒種地。肚子餓的呀，有早上沒晚上，餓得快死了，讓我們回家。我背上一塊氈去找家，家已經搬走了。一路上碰到個帳篷就去討個饅頭，找了好長時間才找到家。

才寶的回憶：

我們兄妹共五個。我的爺爺是貝勒家（爾裏克貝勒旗）的王爺。我父親叫龍周，解放前是國民黨縣團級軍官，解放後任青海省人民政府民委副秘書長，青海省人民政府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當時我們家在西寧市。1958 年我還在西寧上學。有一天晚上，我醒來看見家裏有很多人，腰裏別著手槍，但穿的都是便衣，原來是公安上的人來我們家搜查。他們翻來翻去有兩三個小時，所有的書、本子、紙全部拿走了。他們讓我母親簽字，母親不識字，我的姐姐簽了字。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里不知道。再後來聽說在公安五處，原來公安五處就是看守所。我們只給送了點衣服，看守不讓我們和父親見面。

我在西寧的街上看見一隊隊押著走的藏民。我的學也不能上了，我們就回了海晏縣，從海晏又被趕到剛察縣的哈爾蓋鄉，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爾蓋，我們又被第二次沒收，剩下的箱箱櫃櫃全部沒收了，家裏啥也沒有了。我在哈爾蓋草原趕了 15 年的馬車。我們和會說話的牲口一樣，哪里趕就到哪里去，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病了請個假還要找一個人替你趕馬車。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會趕馬車。每個人一個月供應

18 斤青稞，兩斤白麵。我是年輕小夥子，哪里够吃啊，餓極了，跑到人家借兩碗青稞拌著吃。我們一起的四類分子，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上面把沒有的事硬扣在你頭上，逼得沒有辦法，實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這一輩子咋就這麼倒黴啊！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我的母親勸慰我們說：“千萬不能自殺。”母親是柯柯貝勒旗王爺的公主，雖不識字，道理懂得多。

就這麼忍著，到 1975 年，聽人說中央文件來了，要釋放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他已經 68 歲了。抓走時才 50 出頭，正是年富力强的時候，在監獄裏熬了十七八年。1980 年父親被平反，恢復了工作，父親讓我趕快寫入黨申請書。我們都明白，我們一家就因為被定為封建主，就因為不是貧下中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吃了幾十年的虧，忍受了幾十年的痛苦，現在想起那幾十年來我渾身發涼。我們要想和別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趕快入黨。

羅布藏仙巴的回憶：

縣上通知我的父親要去開會，去了就被抓起來了。有的是在家裏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點的全被抓法辦了。大伯也被抓走，兩個舅舅也被抓走，說他們造反叛亂。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啊！”20 歲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沒剩幾個，只留下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乾二淨，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的東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

到陰曆九月，上面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只給三頭牦牛，一點點行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帳篷前，帳篷就扎在那裏，就那麼都被扔走了。幹部們拿著槍跟在我們後面，像押犯人一樣趕著牲口走，動不動就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翻大阪的時候，有的人被烟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阪，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裏生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

1960 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幹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革命家屬占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帳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裏。又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場裏發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上再用。每個人一月 15 斤青稞，生產隊裏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裏，然後再分，一個人只能分個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夏天我們主要是拾騰格裏吃，是沼澤地水裏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這種野菜救了命啊！

1961 年我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成殘廢，脊梁打斷了，直不起腰，馬上要死了。我們把他背到廠裏搶救，才活下來，但已經是嚴重殘廢。唉！那時候的事說起來就想哭。那麼多的親人抓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死到哪里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心裏實在是過不去啊！

現在想起來就像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幹部坐在高臺上，前面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在前排站了。王團長拍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們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髮老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靜靜地聽。王團長在那裏又喊又拍桌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

後來，海晏移民每戶只給 100 元的安置費。本來可以分 300 元的，上面扣去了，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 15 萬元建的工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聶步騰的回憶：

1958 年青海“平叛”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事後群眾對平叛事件很有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去調查海晏叛亂，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就去瞭解當初常委們判案子的情況。他們是怎麼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25 歲嘛是 35 歲。”主管領導說：“好，判 20 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答：“這個 70 歲了。”主管領導就說：“判 18 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等等，全是這樣的罪名。

有個叫六六（音）的副書記，我問他們說：“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麼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麼把十幾個人、幾十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麼思想？小聶，你不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學習，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

1961 年開始部分復查 1958 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高中（音），解放後他在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很老練。我對他說：“1958 年的這個事情……”我一句話沒說完，他就急忙說：“你是民族幹部，說這個幹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噫！他又要想叛亂？”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區 1958 年的那個叛亂呀，全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區根本沒有發生過叛亂。為啥要把抓剩下的婦孺老人遷那麼遠（600 公里外）呢？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剛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營盤上的情況怎樣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帳房和財產呢？一座座帳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裏面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堆著。有的帳房和蒙古包裏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裏煮著肉，火也沒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幹部們，他們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哄搶那些帳房、蒙古包裏的東西。那時候海晏全縣有 19000 人，“平叛、反封建”抓了 800 人，搬遷走 10000 多人，最後剩下 7000 多人。

搬遷的群眾是 1961 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後才有好轉的。當時西北局得到消息，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派了兩個幹部，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鄧雲（譯音），從甘肅的鏡鐵山到了托萊牧場。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腿嚎啕大哭，哭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倆到了祁連縣，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在看書，進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瞭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沒住縣政府招待所。我去談了情況，他們做了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

後來我們去托萊調查，進了一座帳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嚇得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裏呵呵叫。我們問這是咋了？牧民們說她是在 1958 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幹部們驚嚇成病了，平常只要聽見幹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要來。這叫後驚病，不能見幹部，看見下鄉幹部來就犯病。



---

在海南呆了十五年，《紅色娘子軍》中的南霸天純粹是人造的。當年爲了拍電影，攝製組曾想讓娘子軍與日本人打仗，無奈與歷史不符。好不容易在瓊海縣找到一處老宅，最後電影是拍成了，可是這個老宅的主人張某一家從此倒了大黴，先被定爲四類分子，後又上升爲地主惡霸，最後真的變成了子虛烏有的南霸天，受盡磨難。謝晉導演若知此，應會爲當年選外景的副產品難過。

---

## 血腥南京 方子奮

南京白下區慧園裏 6 號有一棟殘敗小樓，曾住著一戶李姓人家。戶主李劍文，1950 年逃往臺灣。其妻林舜英，在太平路一家小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長子李蔚榮，因家庭成分，無法在城內就業，18 歲那年到南京東流農場當了農工。次子李立榮，在三山街緊鄰劉長興麵館的一家早餐店做大餅、炸油條。長女兒婚後隨夫在武漢教書，次女在銼刀廠當工人，幼女在讀中學。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帶領下，老老實實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觸，日子過得倒也平靜。

李劍文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讀於蘇聯莫斯科大學。兩年學業期滿後，李回國去了桂系部隊（李劍文是李宗仁的遠房堂兄弟）。到李宗仁麾下後，李劍文先後任安徽無爲縣長、鳳陽縣長、蚌埠市長、皖南專署專員等職務，爲官清廉，政聲極好。李劍文同情共產黨，利用職務幫過一些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朋友。在抗戰爭前夕國民黨搞清黨，李劍文被中統密捕，關在合肥，列入處決名單。幸得一位朋友熱心相救，將此消息疾告林舜英。林立即去面見李宗仁，懇請搭救。程思遠携李宗仁手諭，星夜趕赴合肥。經一番交涉，李劍文被保釋出獄。抗戰勝利後，李劍文一直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參事之類閑職。

1949 年春，南京失守前夕，李劍文、林舜英夫婦携子女五人及保姆舉家南逃。抵廣西境時，解放軍攻陷兩廣。眼看南逃無望，李家決定返程北上，先回南京再說。快出廣西時，一家人不慎走散。保姆背著的老七（男孩），被當地農民強行搶走，從此音訊杳無。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杭州會合，李劍文考慮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認出來，爲了保命，獨自一人去上海朋友處暫避，林舜英則帶四個兒女回到南京慧園裏 6 號。

李劍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裏，安然無事。1950 年全國鎮反運動開始的前十天，李劍文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市軍管會身居要職的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後將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這位朋友過去曾潛伏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秘書，與李劍文私交甚篤。那時李雖知他是中共地下人員，出于私交及對國民黨大勢已去的估計，也就睜眼閉眼認交了這個朋友，并在暗中幫過一些忙。這位朋友囑其立即設法出境，越快越好。李連夜趕到南京與妻兒作別，并在該朋友幫助下設法經香港逃到了臺灣。

林舜英，原籍廣西，書香門第，秀外慧中，溫婉賢惠，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與李劍文結爲夫婦，相夫教子，主持家政。丈夫去台後，林靠舊日的一點積蓄維持家計。偶爾李劍文通過在港澳的親戚朋友寄些錢款，助妻兒度日。

1957 年春，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準備舉家去香港定居。經多次申請，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頒發了林與四個子女的港澳通行證。全家已將一切料理停當，連車票都已買好，就在出發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猶豫起來，經再三考慮，居然決定暫時不走，以後再說。到了 1960 年代初，林舜英眼看全家人天天挨餓，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深悔當年錯過良機，遂決定再次申請全家去香港。然而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公安部門一口回絕了她的要求。任

何離開社會主義天堂到資本主義地獄去的企圖，現在都一律視為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背叛行為。

在林舜英的五個子女中，最聰明、最有個性的是老五李立榮。立榮自幼聰穎過人，悟性極高。初中畢業後，為減輕母親負擔，立榮放棄了升學機會，進大餅店當學徒。大餅店賣的是早點，每天上午九點後就算下班了，這使平時既愛讀書、又酷好西方古典音樂和電影藝術的李立榮有了充分的業餘時間去遨遊他的興趣王國。大量讀書使他迅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也大大開拓了自己的視野。文革前，同他接觸過的大學老師和外國留學生，在談及西方文學、音樂、電影時，無不為這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的博學多識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談吐和每每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使每個初次認識他的人都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由於共同的文學、藝術愛好，李立榮結識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熱血青年。自 1965 年開始學習小提琴後，則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縱談文學、藝術之餘，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權保障，對中國現狀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滿，尤其對當局的高壓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別反感。

1965 年，一位和李立榮一道長大、過從甚密的朋友，因同外國留學生交往密切，犯了當局的大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南京市公安局某處一位警官曾找李談過兩次話，對他進行了一番訓誡。事後，李立榮還是做他的大餅、拉他的琴，業餘時間繼續和朋友們沉浸在貝多芬、莫札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樂裏。中國當時曾上映過很多蘇聯、東歐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西德、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李立榮對這些電影是一場不拉，而對國產影片則從來不屑一顧。

1966 年八、九月份，紅衛兵抄家成風，李家作為反動官僚家庭，免不了紅衛兵小將的光顧，好在家中除了幾張床和一張破沙發外已別無長物。在其後的奪權、派性武鬥中，李家這樣的反動家庭無資格置身事內，一時平安無事。

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在此期間，南京革命大聯委（由雙方造反派和部分軍人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將前綫歌舞團、海軍軍樂隊以及南京各企業的音樂愛好者組織起來，成立一個革命樣板戲芭蕾舞劇《白毛女》劇組。李立榮也報名參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該劇組活動了一年左右，這一年是李立榮短暫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每天與心愛的音樂作伴，更有使青春迸發出神奇光芒、從天而降的愛情。在排練、演出過程中，前綫歌舞團一位歌唱女演員進入了李立榮的生命。從相識到熱戀，急劇升溫，兩人很快達到難分難舍、如膠似漆的地步。

在李立榮的邀約下，我曾見過這位女演員一次。這姑娘不僅貌美清純，一顰一笑楚楚動人，而且居然還是中共正式黨員。那天我們在中山陵水榭亭待了近一個下午，告別時，李立榮靠在她身旁，左臂摟住她的肩，右手提著琴，一臉燦爛的笑容。當我離開好遠再度回頭望他們時，這對相偎的戀人在夕陽的餘輝中依然在向我揮手。那幅動人的畫面幾十年來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裏，直今仍然歷歷在目。

我 1941 年出生在南京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抗戰爆發前在青島輪船上當水手，曾經參加過二七大罷工，是長辛店罷工總指揮部糾察隊成員。解放後，父親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爾做點零碎生意糊口度日。1953 年我母親進了南京織帶廠幹紡織工，每月工資 17 元。同年父親跌傷右腿後，全家四口人就靠母親的微薄工資度日。1954 年小妹妹出生，母親沒有奶水，小妹終日嗷嗷待哺。當時我們全家的主食是 40% 玉米麵摻 60% 的豆腐渣做的餅子，父親只能將餅子嚼碎喂小妹，奶粉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個多月大的小妹拒絕我們全家賴以活命的這種食物。1954 年底一個滴水成冰的寒夜，我這位出生後一直挨餓的小妹妹悄無聲息地死去。母親摟著她那纖小的屍體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鄰居借給我們五角錢，父親用此款托人買了一隻蒲包，裝進我的小小妹妹，送到亂墳崗。

小妹妹死時我十四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從小妹妹餓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類的鬼話，無論這種鬼話如何與時俱進、花樣翻新！

1955年，由于“家庭出身好”，我被保送到武漢湖北機械專科學校（軍工院校）讀書，水雷專業。1957年反右開始時，校長繆忍安在全校動員大會上熱情號召全體師生積極投入“大鳴大放辯論大字報”，踴躍向党向領導向政府提意見，并再三保證，不管提什麼意見，不管言辭多麼激烈，絕對不會秋後算帳。我至今記得當時他的一段精彩講話：“現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黨的政策，心存顧慮，怕秋後算帳，不敢寫大字報，不提意見。我們去動員他向党提意見，他却說共產黨實在英明偉大，想不出還有什麼意見可提。我認爲這部分同志講的不是實話，連我們共產黨自己對自己都有意見，你們就真的一點意見沒有？這分明是對黨不同心不同德嘛。”

經過大大小小的動員會，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鳴大放高潮，一時間到處貼滿大字報。我儘管對共產黨沒什麼好感，畢竟只是一個涉世尚淺的十七歲毛頭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見，只是隨波逐流地寫了十幾張大字報。當時學校對每個人寫大字報的數量有指標規定，爲了完成任務湊足張數，我的字往往要比別人大出一號。這麼熱鬧了一個星期，突然間風向大變！凡意見提得多、問題提得尖銳的師生員工，無一例外都倒了黴，七八個“與黨同心同德”最“積極”的人被戴上右派帽子。那位在會上大聲疾呼要與黨同心同德的校長先生，十余天后就把“決不秋後算帳”的話一口吞了回去，換上一副大義凜然的面孔，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義正詞嚴地痛斥“右派分子向党進攻”。

我寫的十幾張大字報都是人云亦云無關痛癢的廢話，起初倒也安然無事。運動臨近尾聲，我在一次班會上的發言却撞在了槍口上。在那次班會上，有同學借“暴露”自己錯誤思想爲名，提出當初繆校長在鳴放動員大會上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秋後算帳，現在還沒有到秋後，怎麼這麼快就把提意見的打成右派了？這是不是秋後算帳，這算不算領導講話不算數？我不等那位同學把思想“暴露”完，就不假思索地接過那位同學的話茬說：“怎麼不算？這是典型的出爾反爾，這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大騙局，就等人們來上當！”接下來我又引經據典，從《東周列國志》、《孫子兵法》談到楚漢相爭、《三國演義》，列舉了許多兵不厭詐、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戰術戰例，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以至後半場的班級會幾乎被我一人全包了。這番講話很快被整理出來送到了校黨委，黨委反右辦公室審查後，一致認爲“這是一起嚴重的公然爲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將影響我校反右鬥爭的深入”。

1960年畢業，我被分配到杭州船舶專科學校，名義是機械製圖教師，實際上沒教過一天書，原因是學校領導在我檔案中發現我有“右派言論”。雖非右派分子，却有“警告”處分，于是我與那些右派教授、講師們被同類項合併，分在一起從事基建勞動。

當時我天真地以爲，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在一起就安全了，很快我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和我成天一起勞動的右派先生們，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黃沙之類的勞動中賣力幹活，積極表現，在政治學習發言時更是爭先恐後，除了深刻批判自己，還不遺餘力地相互揭批，有時火力甚至比革命群眾批判他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後，我居然成了他們的靶子和邀功對象。平時我信口開河講的話，他們上綱上綫，整理成材料，密報給黨委。

黨委書記魏某，過去一直在部隊當政委，政治嗅覺敏銳，階級鬥爭經驗豐富。當時學校初創，魏書記主政以來，尚無尺寸之功，急于在政治上有所斬獲。看了我的右派同事們的告密材料，魏大感興趣，當即召開專門會議，啓發大家：“右派分子已經够反動了，現在連他們都認爲這個姓方的思想反動，可見姓方的反動到什麼程度了！”他親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對我進行系統的揭發批判。在多次批判會上，右派同事們的發言大義凜然，嫉惡如仇。天哪，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純種的無產階級左派啊！三十多年後，我從張賢亮的《我的菩提樹》中讀到：“和這種知識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還要危險。”

一個月後，浙江省公安廳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談話。第一次來時，他們從公事包裹掏出一疊材料，邊看邊問，似乎在核實我的一些言論。一周後，這二位又來了，開始沒怎麼提問

題，只是東拉西扯聊我平時的勞動和生活。一位有絡腮胡的大個子忽然問我：“你同你們領導是不是有什麼矛盾？”我說沒有啊，我不過是剛分配來的一個青年教師，平時跟書記、校長連話都沒有說過，哪來的矛盾？另一位則自言自語說“這就怪了”，他揚了揚手中的材料說：“我們認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進行了接觸，我們覺得你有些言論是有點問題，不過還不屬於敵我矛盾。你們學校兩次堅持要送你去勞動教養，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最後他挺誠懇地說：“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評教育也不是壞事，以後說話注意點就行了。你是知識分子，不用我們多說你也會明白。”就在兩位已經起身出門時，絡腮鬍子忽然又蹺進屋內低聲對我說：“在可能的情況下，你最好還是調一個工作單位吧！”

折騰了一個多月左右，對我的揭發批判總算告一段落。又隔十幾天，魏書記單獨找我談話，說原來要送你去勞動教養的，但考慮到你出身好、年紀輕，組織上決定還是要幫助、挽救你，希望今後好好改造世界觀，努力做好工作。儘管我心裏透亮，表面上還是裝出一副感恩不盡、痛心懺悔的樣子，表示今後一定聽書記話，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絡腮鬍子那句臨別贈言一直在我腦海裏回旋。這個學校環境實在太險惡，不能再待，我決定辭職回南京。主意打定，第二天我就把辭職報告送到人事處。三天後，學校下文批准。臨走前一天晚上，我狠狠揍了老右派姓某一頓。有一次我和鄭某一同如廁，蹲著無聊，東拉西扯說了一些閑話，其中提及到處餓死人的事。開我批判會時，他添油加醋揭發批判我“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造謠到處餓死人”。當時廁內只我們兩人，他的反動言論比我還多；現在我倒楣了，他却落井下石，聲色俱厲、唾沫四濺地把所有髒水往我身上潑！這口氣我此時不出更待何時？

他鼻青眼腫告到保衛處，保衛處大概認為這屬於壞人打壞人活該，不了了之。在我記憶中，我從未主動打過人。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個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像吳晗這樣的正人君子，反右中居然也出賣過朋友，嚴酷的政治環境扭曲人心靈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像！

1961 年秋辭職回到南京，作為漏劃右派，我跑遍了有關部門，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 年，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我不得以待業青年的身份，隨同一批中學畢業生到南京東流農場當農業工人，主要從事果木種植，月工資 16 元。兩年之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到一月 19 元。

1966 年文革開始後，領導們無一例外成了走資派，農場同全國其他單位一樣，呈現出泛自由化狀態。領導們手中的階級鬥爭權杖，一夜之間全被偉大領袖收繳了。權沒有了，架子隨著也小了许多，見面時居然也會恭維我幾句。生產無人過問，上不上班根本無人管，這使我這個天生好逸惡勞的人有了許多看書、拉琴、練字的時間，日子過得十分逍遙。從 1967 到 1968 年，我還曾積極投身風靡全國的“三忠于”活動中，應邀到各處繪製偉大領袖的紅寶像油畫。每到一處，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時間，因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兩人吃得紅光滿面。後來我被抓後，不少革命群眾揭發我，說我在畫偉大領袖紅寶像時，從來沒有一氣畫完，今天畫個頭，明天畫身子，故意讓偉大領袖身首異處，用意惡毒至極。

1968 年秋，農場創建閥門廠，負責技術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幹部（兩名講師，一名八級技師），理論、技術均屬一流。經他們推薦，我被調入閥門廠做他們的助手。進廠後我認識了車工李蔚榮，然後通過他認識了他的弟弟李立榮。

初次在李家見到李立榮并與之交談，我就被他不凡的氣質所征服。他關於政治、文學、藝術的獨到見解，使我既佩服又吃驚，同時表露出的真誠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動不已。我在農場埋了五年，每天與黃土為伴，同階級鬥爭打交道，現在陡然出現一個倍感親切的知音，原來那顆冷漠孤寂的心頓時充滿了溫暖。那一次我們談到凌晨一點，握手告別時我哭了。相見恨晚，我們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此後兩年多時間裏，我們共同經歷了歡樂和憂患。在他失去

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對他的情誼，絕不亞于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儘管後來發生了那麼可怕的事，却絲毫未能動搖我們之間的信任和關心。在我出事之後，我根據辦案人員的口氣和種種迹象判斷，他把我們之間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帶到了刑場。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後稍微供出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 年春夏之交，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單從運動的冠名看，運動的目標只是將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無產階級隊伍，純粹是這個隊伍自己的內部事務，與他人無關。實際上這次清理階級隊伍的真正內涵是把非我的族類，即異己分子，亦即階級敵人，從無產階級的人世間清理出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殺，或關，或管，或判！李家的厄運正式開始了。

有一天，李立榮從單位朋友處打探到一個消息：大餅店的上級革委會正在整他的材料，準備辦他的個人專題學習班。1968 年 6 月 1 日，我和李立榮一同到建鄴路小學，觀看朋友 W 的批鬥會。會上，有人揭發 W 和李立榮關係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榮談過哪些反動言論。W 因為態度不好，會後即被關進南京建鄴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來的路上，李立榮說他可能會有大麻煩了，我也同樣表示了憂慮。之後的一段日子，我幾乎天天和立榮在一起，幫他回憶同哪些人說過什麼話，有無涉及政治，尤其是有無“矛頭直指”的言論，同時商量萬一我們各自都被隔離審查，如何應付辦案人員的訊問，也就是訂立攻守同盟。

6 月 20 日，李立榮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將被隔離審查。那天我和他單獨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點。我們對即將面對的一切做了各種估計，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我們判斷，他和我，以及我們的一班朋友，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談論時政，對紅衛兵造反、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行為進行抨擊議論，還有過一些對當局幾個最高領導人的不恭之辭。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落實到頭上，判個幾年徒刑恐怕難免，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就憑這些言論會有掉腦袋的事。是我們太年輕、太單純？還是這個民族太年老、太複雜？

那天臨別前，他一再囑咐我小心、保重，並希望我幫助照顧他的母親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樓，在樓梯口我們擁抱後揮淚告別。

第二天上午九點，李立榮被帶走，下午被關進太平路楊公井清真寺內的白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此機構名為群眾專政，實乃公檢法軍管會的編外看守所，關押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不安分守己的四類分子，造反派中的壞頭頭，有不滿言論的思想反動者，投機倒把分子（個體戶的前身），“亂搞男女關係”的，拒不下放插隊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看守則由各工礦企業選出的一些“思想覺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當，每批幹半個月，輪換著幹。類似于 1793 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時期的民衆法庭。

李立榮初進去的近一個月，倒沒有受什麼罪，只回單位開過兩次批鬥會，一般性的低低頭、彎彎腰而已。當時我通過內綫（我在看守中的熟人）可不斷得知他在裏面的情況。

8 月上旬的一天，內綫傳來消息，第二天下午在白下路海員學校大禮堂召開全白下區“批鬥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大會”。那天下午，我早早去了會場。會有七八個人發言，主要是揭發李立榮的“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言論，籠統地說李立榮和許多現行反革命分子臭氣相投，來往密切，一道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文化大革命。

李立榮自被押上臺起，就有八九個彪形大漢在旁伺候，自始至終被架成“噴氣式”，上半身與地面成 90°角，身後還有專人揪住頭髮，每當責令回答問題時就把頭拉成仰角。在他被抬頭的瞬間，我看見他那張蒼白的臉，嘴緊緊抿著，兩眼噴射怒焰，任憑呵斥怒吼就是不開口。他的倔強招致數番拳腳，最後一次頭被拉起來時，鼻子裏的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淌。台下的人不停地瘋狂叫喊：“頑固到底死路一條！”“打倒反革命分子李立榮！”“強烈要求鎮壓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口號聲震耳欲聾。最後有人聲嘶力竭地高喊：“大家說，對李立榮這種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怎麼辦？”話音剛落，會場上立即爆

發出一片“殺！”“殺！”“殺！”的聲浪。

下午四點半鐘，批鬥大會結束。那幾個彪形大漢把李立榮繼續架成“噴氣式”，頸上用鐵絲吊著一塊二尺多長的大木牌，上書“現行反革命分子李立榮”，由海校出發，經白下路，走向大行宮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那是一個酷熱的下午，毒辣的太陽把瀝青路面都曬化了。被架成“噴氣式”的李立榮，艱難地一步一步挪動著雙腳，頭上的汗不住往下滴，頸上挂的木頭牌子時時擦著地面。從海校到清真寺，我一直推著自行車，夾在隨行的圍觀人群裏伴隨著他。途中有幾次，他趁揪他頭髮的人換手的間隙略微抬頭時看見了我，我乘機做出中指架在食指上并緊貼胸口的手勢（源自一部蘇聯影片，表示忠誠）。從他嘴角漾起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上，我知道他看見我了。

從海校到清真寺最多不過一公里的路程，却走了將近一個小時。進清真寺大門時，押送人鬆開手，他直起了腰。這時他猛然回頭，正好跟五米開外的我四目相對。他眨了眨眼，露出了笑容。緊接著大門在他身後掩上了，這是我在今生今世最後一次見到他，從此我與他生死兩隔！他把在人世間最後一個笑容留給了我，也將這個笑容永遠鑄刻在我的心中。

2005年8月的一天，途經白下路海校門口時，車窗外的陽光陡然間觸動了我的下意識，我叫立即停車，讓司機丟下我自己開走。我從海校沿當年李立榮走過的路綫，一直步行到清真寺。文攻武衛指揮部早就灰飛煙滅，那座清真寺又恢復了它原來的用途，一些虔誠的穆斯林正在進進出出。沒有人記得當年的一幕了。這同樣的炎夏烈日，同樣的天空和街道，37年前，這裏曾經見證過一個平凡善良的青年人，帶著他做一個最普通的“人”的願望，被人架著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不歸之路。

批鬥大會當晚，李立榮被轉押至白下區公安局看守所，按當時的說法這叫升級。自李立榮被隔離後，母親林舜英終日思念兒子，也不知兒子究竟犯了什麼事。立榮升級後，她更是寢食難安，幾乎終日以淚洗面。我兩三天去她家一次，既是踐約照顧安慰李母，同時也很想知道他本人的消息。就這樣幾個月過去，既無什麼動靜，也打聽不到任何消息。

日子很快到了1969年春節。臘月二十八那天，一個自稱姓陳的人晚上悄然到了李家。陳某稱，前段時間他一直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裏，而且睡在李立榮緊側，兩人一見如故，無話不談。他臨釋放前夕，李立榮特意托他帶口信回來，說他在裏面一切都好，望母親和兄妹不要擔心，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幾個好朋友在外面是否遇到麻煩。陳某還重點表示，按李立榮囑托，他必須要同方子奮和曹漢華見一次面，有些事要當面談談。

次日上午我去李家。林舜英覺得，兒子又沒犯什麼大法，這個姓陳的鬼鬼祟祟，形迹頗為可疑，會不會是公安局派來套我們話的？還是不要沒事找事，叫我和曹漢華別去見他為好。李蔚榮也認為不必去接觸這個人，免得節外生枝。

曹漢華在無錫市第二制藥廠當工人，喜歡彈吉他，愛好古典音樂，讀過很多書，為人極其敦厚善良，仗義疏財，非常講交情，和李立榮是知己好友。經立榮介紹，我倆認識，很快成為至交。儘管我們相識僅一年多，但在我這一生中，他在我心裏始終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1970年曹被捕後，面對種種酷刑，始終沒有開過一次口，按現在的法律用語是零口供。審訊人員使盡招數，最後竟用鐵棍撬掉了他的全部牙齒。在公判大會上宣布判處死刑後，他強行掙扎著猛地把頭前傾迅即後仰，使得身後抓著勒在犯人頸子上繩圈尾巴的警察猝不及防，從而讓曹漢華鬆了一口氣。就在這個瞬間，曹漢華用這最後的一口氣噴發出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聲音：“打倒XXX！”“打倒XXX！”

1969年大年初一，我把李立榮從看守所托人帶信，以及來人一定要同我們見面的事告訴了曹漢華。他和我一樣，認為應該見見那個姓陳的。年初三，我、曹漢華一道與陳某在朱雀路（今太平南路）與健康路交界處一座銀行大樓旁見了面。姓陳的大約四十七八歲，瘦瘦的，有兩顆顯眼的金牙，讓人老遠一看就能認出。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街道上雪幕瀰漫，幾乎看不到行人，我們三人撐著傘，踏著

厚厚的積雪沿朱雀路邊走邊談。陳某神情詭秘地告訴我們：“李立榮在裏面一切都好。從目前情況看，上面并沒掌握什麼具體的材料，你二位不必擔心。”他放低聲音接著說：“不過，他最不放心的的是你們二位，他最看重同你們二位的生死感情。”他聲音更低了：“他之所以不放心，主要是怕你們二位因他的被捕而可能命令組織暫停行動。他再三要我轉達你們，不管出什麼事，組織活動必須照常進行。”聽了他這番不著邊際的話，我告訴他：“我們跟李立榮不過是好朋友，大家都愛好音樂和文學，平時最多在一起發發牢騷，從來就沒什麼組織，而且連想都沒想過。”

他對我的話很不滿，說道：“既然二位不願把真情告訴我，我當然也很理解。幹我們這行的，特別是身在組織的，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任何麻痹大意都會有災難性後果。既然二位不願深談，那就到這裏吧！反正我已經把話帶到了。”

見他似乎動了氣，我只得反復向他介紹我們和李立榮認識、交往的經過，并再三告訴他，我們只是好朋友，從來沒打算搞什麼組織，更沒有什麼行動。“既然二位話說到這份上，我也就不為難你們了。看來，我們的上面不是同一條綫的。”曹漢華和我對看了一眼，然後對陳某說：“謝謝你老陳，你冒著風險帶信來，我們真的很感謝你。不過你提到的組織，我們確實沒有，你若不信，我可以賭咒。”大概估計談不出什麼名堂，陳某也就沒再提什麼組織的事。似乎還不死心，他又故作不經意地提到我和曹漢華的家庭、工作單位情況，連一些細節都很準確。他居然連曹漢華女朋友的小名都報得出，還知道我弟弟的乳名。

見面約持續了半小時，雪越下越大，走到白下路口時我們分手了。告別時，陳某很鄭重地對我們說：“再見吧。根據規矩，希望二位不要跟踪我。一旦有什麼情況，我會及時通知你們。”望著他在大雪中很快消失的背影，我和曹漢華有些茫然。

這個陳某，究竟是什麼人呢？他一定和李立榮在一起關過，而且李立榮對他非常信任。但是，這個姓陳的一再追問的“組織”又是怎麼回事呢？我們從來沒成立過什麼組織，難道陳某是個有幻想症的精神病患者？這不對。如果他和李立榮關在一個號子，李必然很瞭解他，他怎麼會托一個精神病人帶信呢？從我們跟他這次接觸來看，陳某思路清晰，語言表達準確，不像有精神病。可能的解釋只能是，公檢法軍管會並沒有從李立榮嘴裏得到想要的東西，于是在他身邊安排了陳某這個臥底的。

分析至此，我和曹漢華不禁倒抽一口冷氣。看來，他們對我們這些人已經不是一般的“關心”，一場巨大的危險正在逼近我們！令我們有點迷惑不解的是，幾個年輕人平時在一起談談文學、藝術，一時興起發泄一下對現實的不滿，可從來沒有真的想要同當局為敵啊！對我們這些人，值得大動干戈嗎？那時我們怎麼也沒想到，人的思想和言論，人的獨立思考和資訊交流，居然會讓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國家”感到如此恐懼！！

陳某究竟何許人也？這個世界真小。1974年我在南京第四機床廠勞改時，有個名叫李海濤的犯人，和我關係不錯，一次他無意中談起一個鄰居。這鄰居不止一次在李海濤面前吹噓，說他在1969年曾經協助白下公安分局打入一個現行反革命組織內，取得這個反革命組織頭頭的信任，從中獲取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最後將這些人一網打盡，其中四人被判死刑。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我當即問他此人是否姓陳，四十來歲且口中鑲有金牙？李海濤頓時驚得目瞪口呆：“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就是那個現行反革命組織的成員。

李海濤又告訴我一些有關陳某的細節。此人確實姓陳，原住洪武路，一直無正當職業，平時免不了幹些投機倒把、偷雞摸狗的事，搞到錢時酒菜滿桌，沒米下鍋了就去居委會鬧救濟。對這種市井無賴，居委會老大媽們也拿他沒辦法。

1968年下半年，江蘇革委會決定下放一部分城市居民去農村，陳某所在的居委會首先把這個光榮任務分給了他。任憑居委會白天黑夜上門動員磨破嘴，他非但拒不領情，還要潑使賴，尋死上吊，決不去農村。居委會同派出所串通好，決定先把陳某關起來殺殺他的威風，藉以殺雞嚇猴。于是，別的下放戶去了“廣闊天地”，他進了看守所。

進去不久，被當時主辦李立榮案子的馮祖福慧眼相中。馮是白下區公安局的專案組成員，以善于審辦現行反革命案件著名。馮一直想安排一個內綫打入我們“內部”，苦于一時沒有合適人選。陳某當時正巧和李立榮關在同一號房，并且緊鄰李的位子。馮看了陳某的檔案後，覺得此人可用，就找他談話。雙方一拍就成，陳某從街頭流浪的癩皮狗一躍而變為體面的警犬。

1982年，我住南京城南鳳游寺。一天下班途中，忽然發覺迎面走來的一個人有些眼熟。他那惹眼的金牙使我立即想起，此人正是十三年前“打入”我們“內部”的那位陳兄。我悄悄尾隨到他的住處。他獨身一人住在一個老宅第二進天井裏搭建的小披屋裏，面積不過七八平米，看樣子混的仍然不景氣。憐憫之心打消了我算舊帳的念頭，再說，這筆舊帳又怎麼算呢？

1969年春節過後，自打同陳某見過面，再也得不到李立榮的任何消息。四月中共九大開過後，在毛澤東“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號召下，中央的爭權奪利密鑼緊鼓，地方上階級鬥爭如火如荼，到處鬥人、抓人、判刑、槍斃人的布告像如今治療性病的廣告一樣隨處可見。平時在人們印象中老實得不能再老實的人，頃刻之間成了反革命。我認識的兩個一輩子識字總數從未達到三位數的農民，居然會是“系統地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現行反革命。

不久，無產階級司令部要人、公安部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謝富治發表講話，全國到處印刷張貼，公然強調對階級敵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我們農場一個姓孫的軍代表，在一次大會上聲色俱厲地叫喊：“我們現在就是要大張旗鼓地鎮壓一切階級敵人，該殺的殺，該抓的抓！蘇修正在妄圖侵犯我們，敵情這麼嚴重，不殺一批人行嗎？我們哪一次同敵人打大仗之前不殺一批人？”我發現我的行動已經受到監視，我的宿舍附近每天都有一些“積極分子”晃來晃去。看來，對我下手只是時間問題了。

1969年6月2日，一個非常美好的初夏夜晚，我同曹漢華在新街口見了一面，坐在環形花園護欄上一直談到天亮。我把自己的處境告訴了他，他並不奇怪，他說他廠裏似乎也有人在注意他。他還告訴我，他打算利用工作便利，在包裝出口藥品時，把事先準備好的小傳單夾在說明書裏發到國外，讓世界瞭解中國現時的政治狀況。我勸他要謹慎一些，他笑著說，人活著總得幹點事。臨別時，他略帶傷感地告訴我，他已經同戀愛三年之久的女友分了手，原因很簡單：他不想連累她。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互道珍重，握手告別。這一別，成了永訣。

1969年6月16日，是個陰天，當局對我下了手。頭天晚上應一個朋友之邀，替他畫了一幅狄更斯小說《奧立弗爾》的封面，睡得很晚。上午8點剛起床，有人來通知，今天上午不上班，在大會議室開全體職工大會。進了會場，直到9點20，會還沒開，書記安排我讀報。9點40時，走廊裏傳來腳步聲。書記在門口笑咪咪地叫我出去一下，說有事找你。我剛出會議室門，七八個民兵一擁而上，把我架進一個小房間。

房間空無一物，只在正中央放了一把椅子，四牆貼著醒目的黑體大字標語：“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必須低頭認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幾個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其中兩人緊緊揪住我的衣領角，仔細檢查裏面有無氰化鉀之類的東西。那時電影裏常有這種鏡頭：特工人員被捕時，只要咬一下藏在衣領角裏的劇毒藥品，立馬就能斃命。緊接著扒光了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鞋襪，給我換上一套全新的勞動布工作服。剛系好扣子，一群人反扭著我的臂膊，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架往辦公室外的露天會場。

我剛在會場露面，一陣震耳欲聾的口號轟然爆發：“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揪出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子奮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一千多支胳膊隨口號聲一伸一屈，場景極為壯觀。

當我被押到台前時，台下前排猛然躡上十幾個人向我撲來。一秒鐘不到，我即被掀翻在



地，身體的各個部位都挨了拳腳。我已分不清上下高低、東西南北，躺在地上只見拳頭和穿著鞋子的腳在我身上運動。後來聽到有人喊：“大家不要動手，大家不要動手！”但拳腳似乎并未停下來，直到會議組織者在喇叭裏高喊：“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們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防止階級敵人殺人滅口！”這些義憤填膺的革命戰士才悻悻而退。我真該“感激”會議組織者的急中生智，否則，那天弄不好我真有可能被“滅了口”。

一陣口號過後，主持人軍代表在麥克風中警告我：“方子奮，今天我們對你們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滬寧綫上全面實行了抓捕，你們的成員一個也沒有跑掉！到這個地步，你唯一的選擇是徹底坦白交代，否則李立榮就是你的鏡子！”聽到這裏，我心一緊：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怎麼了？李立榮到底怎麼了？！

正當我為李立榮憂心如焚時，忽然大會宣布：“現在由李立榮的哥哥李蔚榮發言。”隨即李蔚榮站起來說：“李立榮前天上午已經被白下區公檢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十年，現在你必須老老實實坦白交代問題，爭取從寬處理，否則你的下場是很可悲的。”這消息反而讓我一顆懸著的心頓時放下來了：不就十年嘛，十年又能把我們怎麼樣？李立榮不過判了十年，曹漢華和我，還有其他幾個朋友，諒也重不到哪里。

這第一次批鬥大會開的很短，總共大約 40 分鐘。此後又開過近二十次大小批鬥會。由於我是“要犯”，軍代表們可能真的怕有人對我“殺人滅口”，在後來的批鬥會上倒也沒受過拳腳照顧。我先是被關在農場的一間浴室內，由 16 個民兵分班輪流看守。8 月 24 日轉到白下區看守所，1970 年 1 月初又轉到南京市娃娃橋看守所。我被抓進去不久，李蔚榮也被抓。

南京有句順口溜：“進了娃娃橋，小命就難逃。”娃娃橋看守所的看守，大部分是轉業不久的軍人，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有次我被提審，親見一個身高一米九幾姓穆的女看守（據說是體院排球隊轉業的）正在打一個女犯。這位穆管揮起手中一把鎖號子門的大鐵鎖，對那個雙手已被反銬的女犯人後腦勺就是一下。女犯人登時被砸倒在地，一邊翻滾著身體，一邊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

有一次提訊，我堅決不肯按照提審者的意圖供述。送我回號子時，審訊員同我那個號子（東大院 7 號，編號 2605）的管理員陳“醫生”耳語了幾句。第二天清早起床時，陳忽然打開號子門，一下子把我拎到門外，二話不說將我反銬起來，並且嘎嘎響地把銬齒一直捏到底。我問他我犯了什麼錯誤要戴銬？他罵道：“我\*\*\*的，老子想銬你就銬你！誰叫你起床動作那麼慢？”罵完在我臉上連扇幾個耳光，接著打開號子門從後面一脚把我蹬了進去。20 分鐘過後，緊銬的手腕開始火燒火辣地疼起來，雙手很快腫起，皮膚變成了紫黑色。一連三天晚上，都由於痛徹心肺而無法入睡，吃飯喝水全靠難友喂，大小便只能請別人解褲子擦屁股。直到第六天臨近中午，陳“醫生”總算大慈大悲開恩解了銬。鬆開後，雙手已呈黑色，全無感覺，過了十天才能勉強活動。腕部被銬處，至今幾十年後每逢陰天還隱隱作痛。

八十年代我平反後，曾多次想再去會會這位陳“醫生”，但因各種原因未能實現。我倒不是要去算這筆舊帳，而是想恭恭敬敬請教他一個問題：在人類經過幾萬年的進化之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們，怎麼會把祖先的獸性如此完整地繼承下來？從關押到判刑，對我大會小會批鬥共 19 次。在對我的十餘次審訊中，有三個問題一直被翻來覆去盤問，希望從中找出破綻。

第一個問題是我和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等 4 人在玄武湖、中山陵等地有哪些活動？我非常如實地作了回答。1967 年初夏，我們四人去玩過兩次玄武湖，還去了中山陵水榭亭。躺在如茵的草坪上，我們縱情談論音樂、電影、文學，談論各國風土人情，從玄武湖、中山陵的優美景色扯到瑞士日內瓦湖的風景。我們說，如果能到日內瓦去游覽該有多好，可惜中國人要想出國比登天還難，這輩子看來是沒有指望了。李立榮又談到他舊時一個鄰居，全家遷居香港，前些日子回來探親，說香港那邊自由得不得了，叫我們想都不敢想。談到後來，

都覺得我們這個社會一天都待不下去，如果有機會出國，一分鐘都別耽誤，等等。後來公檢法軍管會對我們這兩次出游作出這樣的結論：“多次在玄武湖、中山陵秘密聚會，策劃叛國投敵事宜，由于其他原因未遂。”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這一夥人（李立榮、曹漢華、我、張稼山以及另外幾位好朋友）在李立榮家開過多少次“會”，研究過哪些“問題”？這個問題實在太離譜，我實在無法回答。我和一些朋友確實在李立榮家常碰在一起，但絕大多數是談音樂、聽唱片、切磋演奏技巧，有時也談文學藝術，間或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時政，免不了對當局頭面人物有所議論，對毛、林、江以及靠文革發迹，一夜之間爬到中央的新貴們進行一些抨擊。至于在李立榮家開會，專門研究問題，這根本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鑒于在這個問題上我的口供同審訊我的人的要求距離太大，為此我吃過不少苦頭。

他們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將我們定成一個斐多菲俱樂部式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李立榮是我們的首領，他的家是我們的秘密活動場所，是召集反革命會議的會場。儘管我們同被關押的朋友們不約而同地嚴守界限，拒絕提供他們希望的口供，他們最終還是作出了以下結論：“張稼山、方子奮、XXX、XXX 等人多次聚集在李立榮家，密謀反革命活動，系統地瘋狂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個問題是要我揭發林舜英的所有“問題”。我最如實、最詳盡供述的正是這第三個問題。根據他們提出的問題，我非常清楚他們想從我嘴裏掏出哪些有關林舜英的內容。林舜英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自小受過正規教育，加入過國民黨，本人又是國民黨官僚的太太，丈夫幾十年來與人民為敵，最後潛逃臺灣。這樣一個女人，她能不恨共產黨，不恨社會主義？再說，她的兩個兒子都是仇恨共產黨、敵視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這能同她沒有關係？他們一直在讓我明白：根據他們分析和掌握的情況，林舜英決不是一個小人物，她有重大的犯罪事實，現在就看你招不招供了。

對林舜英的問題，我寫了幾十頁交代揭發材料，就我所看到、聽到以及瞭解到的有關內容均如實作了供述，甚至連她平時的衣著習慣、菜肴口味這些生活細節都沒有遺漏。不過，這份洋洋數千言的交代材料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林舜英有什麼反動思想、反動言論，更牽涉不到什麼現行反革命活動。這倒不是故意隱瞞、為她開脫，而是確確實實沒有這種事。我在材料中詳細介紹了林舜英如何膽小怕事，如何謹小慎微，並列舉了很多具體事例來說明。例如，有好幾次我和李立榮在小房間交談，她會突然推門而入，怕我們在收聽“敵臺”。有時我們的談話一涉及文化大革命，她會立即岔開話題，意思是叫我們別談政治。如果我們不聽，她則會訓斥李立榮，搞得我都有點下不了臺。有次她給武漢的大女兒寫了封信，信寄出後忽然懷疑自己在信封上寫毛主席語錄時漏寫一個字，急得一夜沒睡，第二天清早趕到郵筒旁等郵遞員開箱取信，直到證實自己信封上沒有漏字後，心上的石頭才落了地。

李立榮被關押後，她同世界上所有做母親的一樣，想兒子，替兒子擔心，但從來沒有為此發牢騷攻擊過誰，更多的是默默流淚、強忍心中的悲傷。在與她認識的幾年中，我時常在李蔚榮、李立榮兄弟面前半開玩笑地譏笑過林舜英，說她是個典型的樹葉落下怕打破頭的老太太。我甚至當面同她開玩笑，說她膽子太小了。她笑著說：“我們不能跟你們比。你們家是工人階級，出身好，有點什麼事別人不會計較。對我們這種家庭可不行。”

交上這份交代揭發材料後的次日，他們提審了我。一開始提審員就拍著桌子警告我：“你寫了些什麼揭發？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我耐心地向他們再三保證，我說的絕對是實話，如有隱瞞，我承擔全部責任。但他們根本不相信，認為我在為林舜英隱瞞、開脫，逼我“深入交代揭發”。最後我也急了，說那你們乾脆列個草稿給我，讓我按你們的意思照抄一遍好了。話音剛落，其中一位繞過桌子到我面前扇我兩耳光，接著按鈴叫人來把我送回了號子。

大約十天后，二位提審又來了，這次態度比上次好了一些。上次打我耳光的那位“啓發”我：“你想過沒有，1957年時，林舜英全家已經拿到去香港的護照了，後來為什麼臨時變卦不走呢？照理說，像他們這種反動家庭，做夢都想去臺灣，現在倒奇怪了，護照發給他們，她居然不願走了，你說這說明什麼問題？”我說她是不放心留在大陸的大女兒，也有些捨不得那棟樓房。他不屑地瞟我一眼然後說：“不知道你是裝傻還是太天真。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她之所以臨時決定放棄去香港，是因為接到了臺灣方面的通知，要她繼續潛伏下來做特務。”話說到這份上，我已實在無話可講。這是我在看守所裏的最後一次提審，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來找過我。

1970年的8月，我已被判刑在南京長江磚瓦廠（後併入南京第四機床廠，統稱江蘇省第十一勞改隊，編號10114）勞改，在瓦窑當出窑工。有一天我正出窑拖板車，值班幹部把我帶到辦公室，說有人來外調提訊。這次來了四個人，自稱是林舜英所在單位紙盒廠革委會的。一開口問話，我立馬感到來者不善。這四個人的所有詢問歸結為下面幾個問題：林舜英是如何幕後操縱你們反革命集團的？林舜英是怎樣把你們拉下水的？林舜英同臺灣、香港特務有哪些聯繫？林舜英在她兒子被捕後是如何指使你們進行內外串供、訂立攻守同盟的？

我把以前交代過的內容重複給他們聽，他們先是怒不可遏，大聲呵斥我“極不老實”。見我一幅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四人一齊沖到我面前將我按倒在地，其中一人一下子掐住我的喉嚨，我頓時感到呼吸困難、眼前發黑。這時幸虧一位姓莫的值班幹部聽到響動闖了進來，見我被按在地上，立即為我解了圍。他先是泛泛批評我幾句，要我端正態度、老實交代問題，然後又對他們說：“不要急不要急，有什麼問題慢慢問他好了。”四人對莫幹事七嘴八舌地抱怨，說我實在太頑固，氣焰太囂張，不整整我的態度（整態度應列為文革術語）肯定不行。希望勞改隊配合一下，先把我的態度好好整一下再說。莫幹事對這個有益的建議并未回應，敷衍幾句後，端把椅子在緊貼門口的樹蔭下坐了下來。經過這番折騰，四位來人大概考慮到畢竟是在人家地盤上，不能像在自己單位專案組裏那樣為所欲為，態度總算緩和了些。其中一位年齡稍大的甚至還關心起我的身體來：活重不重啊，吃不吃得消？家裏有人來看你嗎？要不要我們替你捎個口信？

看到他們的表演，我不禁心裏暗笑。你們也太小看老子了，就憑你們這幾個三腳貓，就能把我擺弄得像只耗子一樣服服貼貼？我倒要看看你們還有哪些高招！于是我不停地揉著剛才被他們卡過的脖子，抬頭死死盯住天花板，任憑怎樣提問，都以“沒有新的補充”，“該交代的都交代了”作答。我這種軟硬不吃的態度很快又激怒了他們，有個皮膚白晰約莫30歲的高個子，火氣特別大，幾次站起來沖我吼道：“你今天不老老實交代，絕不會放過你！”後來還殺氣騰騰向我示威：“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把你們這些反革命斬盡殺絕！特別是像你這種頑固到底的反革命！”面對他的暴跳如雷，我依然盯著天花板不為所動。就這樣一直耗到天黑，四位大概看我們勞改隊並無招待晚餐的誠意，終于一個個背起黃書包悻悻離去。

在送我回監房的路上，莫幹事對我說：“以後有人再來外調提審，態度上好點，省得找苦頭吃。”寥寥數語，頓時像一股暖流注入我僵冷的心。作為一名管教幹部，不僅及時阻止了對犯人施暴，事後還這樣含蓄地安慰我，確實够難為他的了。這位莫幹事生就一副凶神惡煞的黑臉，見者無不生畏，而心地却非常善良，犯人們背地裏都稱他為“莫菩薩”。多年來我一直感念這位莫幹事，1975年時聽說他患癌症不幸去世了，令我唏噓不已。世有“好人無長壽，惡人活千年”之說，有時還真tmd如此！像莫幹事這樣的好人，竟然在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而那些手上沾有無辜者鮮血的傢伙，現在仍然一個個天天坐在老幹部活動室裏打橋牌、搓麻將頤養天年。

號子裏幾乎每天都有新人進來，原來地板上人均二尺寬的鋪位已縮減了將近一半。聽新進來的難友介紹，外面到處在抓人。解放後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方征，不知犯了

什麼事，也關進我們這個號子。他晚上偷偷告訴我：“這種迹象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鎮反時才有過。”這位公檢法老前輩的預感果然很靈，就在他說這話的十來天后，南京市迎來第一場對現行反革命的屠殺。

1970年3月6日，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起床後，管理員撥開號子門上的老虎窗對我們下命令：“各自坐在鋪位上不准走動，等會有重要新聞廣播。”平時早飯前全體起立“早請示”背語錄的常規也宣布暫停。更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往日極為準時的午餐，居然整整提前了一個小時。號子裏的喇叭從早晨起就反復地播放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無間斷，而且聲音大得出奇，少說也在七八十分貝以上。方征悄悄告訴我：“今天恐怕要有大行動。喇叭裏這麼大的聲音是爲了蓋住外面大院裏的什麼響動。”事後證明，這位法院老院長的判斷真 tmd 太准了。起床後的一系列反常現象，令全號子難友驚恐不已。

中飯結束後，一個個惴惴不安，坐在鋪位上胡亂猜測。這時，我們的牢門砰地打開，那位陳“醫生”背著雙手站在門口盯住我說：“2605，把東西帶出來！”我楞了幾秒鐘才反應過來是在喊我，趕緊連聲答應。同室難友一齊過來幫我整理鋪蓋和換洗衣服，一面低聲告別。平時同我最談得來的馬聚塵和那位法院老院長，更是再三叮嚀我多多保重，日後再見。我把牙膏、草紙、肥皂全部留給了難友們，一手拎著褲子，一手夾著鋪蓋，出了號門。

我被身後的陳“醫生”押著，走到東、西大院匯合處一個被犯人們稱之爲“櫃檯”的地方，看到我的幾個朋友已被反銬雙手蹲在那裏。放下鋪蓋，我也立即被反銬雙手命令蹲下。我掃了幾位朋友一眼，有李蔚榮，有張稼雲，還有 Z 和 C。張稼雲和張稼山是同胞兄弟，都是我和李立榮的朋友。張稼山沒在這裏，我還爲之慶幸：總算沒有被一網打盡。

張稼山身材不高，體型魁梧，心地極爲忠厚，爲人樂觀開朗，白淨的臉上似乎總挂著愉快，一雙略帶女性化的大眼睛看人時，總透著親切溫暖，使人特別容易親近。稼山和李立榮是街坊，從小一起長大，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稼山和我有一個共同愛好，喜歡黃梅戲，尤其特別喜歡嚴鳳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駙馬》。1968年嚴鳳英在合肥挨鬥，我曾連寫三信叫她到我們的農場來暫避風頭，張稼山甚至幾次想去合肥把嚴大姐救出來，可惜最終未能去成。後來得悉嚴大姐不幸自殺，我和張稼山一邊喝酒一邊揮淚，發了狂似地詛咒這個罪惡的現實。

20分鐘後，我們五人被押上一輛黑色囚車，另有八九個犯人陸續被押上來。隨著一路淒厲的警笛聲，很快到了五臺山體育場。大約半小時後，我們每人身後由兩名人高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著，彎著腰走到主席臺旁一塊空地上就地蹲下。緊接著，十幾名被繩子緊緊捆綁的犯人押著經過我身邊，這時我看到了張稼山。他被綁著，由于繩索勒得太緊而哎喲哎喲呻吟。片刻之後，當大喇叭裏響起“把罪犯押進會場”時，我像一隻鷄一樣，雙腳懸空被拎上主席臺的邊側。腳剛落地，身後的人一把揪住我的頭髮強迫我抬頭“亮相”，另一人則抽緊勒在我頸項上的繩圈。整個五臺山體育場，除了四百米跑道上沒有人外，看臺、盆地中央的賽場以及其他邊邊角角全部密密麻麻擠滿了人群。我心裏估算了一下，少說也有十萬之衆。就在我稍一分神之際，只聽大會主持者大聲命令：“把張稼山現行反革命集團所有罪犯押過來！”登時我們被反架著在審判席下一字排開，弓著腰低頭聽候宣判。

一段不算太長的罪名念過之後，宣判人提高嗓門宣布：“判處現行反革命集團首犯張稼山死刑，立即執行！”吼聲剛落，陡然間起了一陣騷動，只見好幾個兵一齊向排在左一的張稼山涌去。我聽見張稼山掙扎著要喊什麼，由于喉嚨被繩圈緊緊勒住而只能發出含糊不清的哇哇聲。我彎著腰斜眼看去，七八個人在死命按住張稼山，而他仍在拼命掙扎。三個小時前我蹲在娃娃橋看守所“櫃檯”旁時，還暗自慶幸這次張稼山總算沒被捲進來，做夢也沒想到轉眼間他竟一下子成了我們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執行！接下來是對我們五個人的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張稼雲是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後是李蔚榮，8年。

在我們後面是對另一個現反集團的宣判，首犯名叫厲功友，是個復員軍人。他和六七個下關的小混混經常一起喝酒亂侃，天南海北，無所不吹，最後稀裏糊塗成了現行反革命集團。厲功友獲刑無期，1978 年底第一批被平了反。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馬聚塵。上文提到，就在當天上午 10 點多鐘我在牢房整理鋪蓋時，馬聚塵還熱心地過來幫我收拾鋪蓋并互道珍重。僅僅三小時後，他也被綁上了五臺山公判大會的審判台。他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飛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國投敵”。他原是南京第二鎖廠的出納會計，1968 年秋和姨父王飛從南京飛到昆明，再轉車去雲南邊境，打算從那裏越境到緬甸，中途被當地民兵截獲，押回南京，關進娃娃橋。我剛進 7 號牢房不久，通過簡單交談就看出這是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青年。和我一樣，他愛好文學藝術，寫得一手好字，對當時中國的政治黑暗極為反感。在我被反鏢的六天五夜裏，都是馬聚塵喂飯喂水、料理大小便，並不時悄悄鼓勵安慰我。這份珍貴的情誼多年來我一直銘感在胸，可惜永遠沒有報答的機會了。

3 月 6 日這次公判大會，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11 人。其餘十幾人分別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現行反革命”！公判大會結束後，我們分別被押上十幾輛敞篷軍車游街示衆。南京 30 萬人被組織起來列隊立于市區主幹道兩旁，像歡迎來訪的外國元首一樣夾道觀看長長的刑車隊。前面六輛是死刑車，每車有兩名五花大綁的死刑犯被架在車廂前面，頸背插著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隨著車隊的緩緩行進，11 支白色亡命牌在半空中微微搖曳。我被押在 7 號車上，被判死刑者的頭被緊緊捺住低下，而我們則由身後當兵的揪住頭髮強行仰頭“示衆”。

刑車隊從五臺山體育場北大門開出，沿廣州路轉向中山路，向新街口廣場前行。行至新街口曙光理髮店（南京有名的大理髮店，現已拆掉，位于新街口郵局對面）時，車隊忽然停了下來，只聽人群中有人在喊：“曙光理髮店二樓有人拍照。”頓時，不少軍警和便衣紛紛向曙光理髮店跑去。不知是否找到了那位攝影愛好者。這位攝影者是出于好奇，還是另有考慮，想記錄下這精彩的歷史瞬間，多年來我一直想探個究竟，也很想知道這位攝影愛好者後來的下落，但至今不得而知。

約三分鐘後，車隊繼續前進，經新街口廣場向左拐上中山東路，然後右轉駛入太平路，再右轉進升洲路，行至白下路口，我們後面的車子停了一下，前面六輛死刑車直行往升洲路方向一直去鳳凰西街槍斃人的刑場。看見前面車子直行，我知道張稼山最後的時刻到了，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架我的兩個當兵的見我哭，倒沒怎麼爲難我，只是揪住我頭髮晃了晃我的頭，低聲呵斥我別作聲。死刑車隊去後，我們的車隊由白下路駛回娃娃橋看守所。

這就是 1970 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大會”，也是南京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的首場。此後，4 月 28 日處決 12 名，7 月 24 日處決 24 名，12 月 10 日處決 10 名，另有不少現反被個別處決，具體數字無法統計。上述成批處決的現反中，4 月 28 日處決的張明才反革命集團首犯張明才，7 月 24 日處決的王同竹反革命集團首犯王同竹，與我均有一面之緣。

在這 4 批集體處決中，最震撼人心、最駭人聽聞的當數 12 月 10 日那一場，我情同手足的好友李立榮與他母親一同被判死刑，綁在同一輛刑車上走向刑場。這四批被處決的現反，1980 年經復查後，全部被確定爲冤殺、錯殺，無一例外。也就是說，冤殺率爲百分之百！

三六公判大會的第三天，1970 年 3 月 9 日，我被送往南京長江磚瓦廠，從此開始了漫長的十年鐵窗生涯。

我在投入勞改後，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調林舜英一事外，一直得不到李立榮和林舜英的消息。我一度還在想，等我熬滿十年，畢竟還能再見到李立榮，那時劫後重逢的場景將是何等令人激動！我們都是判的十年，但這十年徒刑是摧毀不了我們意志的。十年之後我們一定會

更成熟更堅強，我們一定會勇敢地面對險惡的後半生。

1970 年是我勞改歲月中最難熬的日子。我被分在八卦窑出窑，窑洞裏的氣溫達到攝氏 70 度，汗水滴在剛剛開窑的瓦片上立馬揮發成一個白點。每天拖著一千多斤的板車從高高的窑頂沿著螺旋形陡坡向下走時，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在顫抖，只要腳下一滑，不死也要脫層皮。瘋狂出汗，需要不斷地大量喝水。我一位極知己的難友曹治平先生，當時和我一同出窑，他曾替我數過，有一次我一口氣喝過 24 竹筒水，加起來相當於 5000 毫升！

一面是極度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面則是極度的饑餓。每頓飯只能管一個小時，其餘時間都在兩眼發青地巴望著下一頓。繁重的勞動所造成的疲勞，加上無休止的饑餓，使人變得極為虛弱。夜晚上廁所，必須手扶牆壁慢慢挪，否則會一下子癱倒在地。我感到自己已經快要退化成低級動物了，每天頭腦裏想的儘是吃、吃、吃，吃飽後能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著。人類的一切情感似乎在我身上都已不復存在，每天早上眼一睜就巴望著開飯，然後又巴望早點收工、早點結束學習、早點躺在鋪上進入夢鄉，忘掉眼前的一切。在這種非人的惡劣環境裏，只有最後一絲人性勉強支撐著我：爲了不讓我慈愛的雙親傷心，我得咬牙活下去。每當想到李立榮此刻也在另一處和我一樣備受折磨，他也會有同樣的感受，也同樣會想到我時，我的心多少又會增加一點活力。我始終記得我們多次在一起說過的話：我們今生唯一的希望只是“時間”。我們畢竟年輕，那個高高在上的獨裁者已到耄耋之年，不管他的嘍羅們怎樣天天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他怎麼也耗不過我們。“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他一翹辮子，中國的一切都會有重大改觀！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咬緊牙關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總有希望。遺憾的是許多人沒能活到那一天，遺憾的是李立榮是其中之一。

1970 年 12 月 11 日，這天是勞改犯家屬接見日。我的老父親在接見時偷偷告訴我，就在前一天的 12 月 10 日，南京又開了公判大會，李立榮和林舜英母子二人一同被判了死刑，並在會後綁到鳳凰西街執行了槍決。這個消息就像五雷轟頂般一下子將我炸昏了，眼前頓時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空虛絕望，像海上的濃霧包圍著我，我感到透不過氣來，窒息的痛苦在吞噬著我的每一個細胞。我已記不清老父親後來是怎麼離開的了，只依稀記得那天我在監房的院子裏像一隻孤獨的狼一樣，反復來回不停地走動，不時仰望電網高牆內狹小的天空，希望蒼天能幻化出林舜英、李立榮母子親切的面容。但我感受到的只是冰冷的細雨，看到的只是絕望的鉛灰色的天空。我的反常舉止引起了一些“勞改積極分子”的注意，當晚管教幹部找我談話，嚴厲斥責了我。

李立榮死了，林舜英死了，曹漢華死了，張稼山死了，我一生中最親愛的朋友都死了！而我居然還活著！我爲什麼還要活著？爲自己？爲父母兄弟？我什麼也說不清，我已失去了爲什麼活下去的明確動機。要說還有點什麼的話，那只是在心靈深處隱隱還保留有一點殘存的信念：總有一天——只要我活著就能看到——眼前的一切都會有一場大改變。到那時，獨裁者和他的爪牙們將會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到那時，民主將取代獨裁，自由將取代專制，光明將取代黑暗，正義將取代邪惡，人們將不再會終日生活在政治恐怖之中，愛情、友誼、人類一切美好的感情，都會在燦爛的陽光下自由地流淌。總有一天，我會用我的方式揭露出在那暗無天日的歲月裏曾經發生過的那些駭人聽聞的罪惡，讓人們瞭解罪惡的真相，罪惡的實質和罪惡的根源。也許正因爲有這麼一點點殘存的信念，我才咬緊牙關苦苦熬了過來，沒有讓自己沉淪爲一具行尸走肉，也沒讓自己的大腦被“洗”成一團漿糊。

有關李立榮和林舜英最後的情況，從 1970 年底直到我刑滿出獄的 1979 年 8 月 23 日，我在裏面一無所知。出獄後，我通過李立榮的妹妹、李蔚榮的夫人、當年曾與李立榮同在溧陽社渚農場勞改過的一位難友、在 1970 年 12 月 10 日公判那天親眼目睹李立榮母子被害經過的幾位熟人，才大致瞭解到事情的梗概。

就在我被判刑之後，李立榮突然從他勞改所在的溧陽社渚農場被押回南京，關進了娃娃橋看守所。他又黑又瘦，原本清瘦的臉上有幾處明顯的傷痕，平時坐在地鋪上一動不動，成

天一聲不吭，兩眼盯住牆壁幾個小時也不轉移一下目光。同號難友問他犯了什麼事，他只是輕輕地搖搖頭。這位難友看著他進號子，又看著他最後被帶走，從來沒有聽到李立榮講過一句話。1970年12月10日那天，上午11點多鐘他被帶出號子，臨走時什麼東西也沒帶，此一去就再也沒有回號子。

1969年初，中蘇多年交惡之後終於在珍寶島爆發了武裝衝突，兩國關係頃刻之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中國當局外部面臨蘇聯的強大軍事威脅，內部是一片分崩離析景象。儘管毛聲嘶力竭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但這絲毫沒能延緩中央內部相互傾軋、爭權奪利的步伐。全國各地生產停頓，財源枯竭，民生雕敝，滿目瘡痍。面對內外交困的局面，要想抵禦蘇聯的軍事進攻，單憑破釜沉舟的決心（毛告誡全黨“要作好打仗的準備，要作好打核大戰的準備，要作好死一半人的準備”）顯然是不夠的。除了在軍事上拼湊力量準備應戰，能打一仗是一仗，動員全體老百姓“深挖洞、廣積糧”，能躲一時是一時之外，剩下來最重要的事就是“攘外必先安內”了。安內的不二法門自然是階級鬥爭，對那些無法被洗腦的人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正是出于這種偉大的戰略部署，中共中央于1970年1月下達了一個三號文件，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一打三反運動。一打是主要目的，三反是在運動中附帶搞點副業創收。這個一打三反，實質上是對全體老百姓實施精神強姦，向任何敢于不滿乃至反抗者廣開殺戒。這就是1970年春李立榮被從勞改場提回南京重新發落的時事背景。

一打三反開始後，當局發現運動前不久對李立榮的判刑過于心慈手軟。李立榮出身反動家庭，長期以來思想極為反動，一貫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如此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僅僅判了十年徒刑，簡直是對黨和人民嚴重的不負責任！那麼，李立榮一案怎樣操作才能將其由十年徒刑變為死刑立即執行呢？根據我十年的勞改經驗，勞改當局如果有心要某個犯人“升級”，只需像喚狗一樣召集幾個勞改積極分子開個小會，秘密布置一下，積極分子們馬上就心領神會，明白該怎麼做。第二天一大早，對當事人的揭發檢舉材料就會像雪片一樣塞滿管教幹部的口袋，要什麼有什麼！就憑這些雪片，就能成為某人加刑乃至槍斃的鐵證！李立榮死刑判決書的罪狀裏就有此類內容：“在勞政期間，堅持反動立場，繼續散布反動言論，為首組織逃跑集團，煽動犯人鬧事。”這些罪狀在1979年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平反判決書中以“經查，并非事實，應予否定”一語推翻。

林舜英被抓進去兩次。第一次是在我被抓後不久，大約榨不出什麼油水，關了兩個月放出來了。第二次是1970年5月，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之際。她在裏面什麼都沒承認，曾經兩次絕食，被送到紅十字醫院強行撬嘴灌食。最後提審時，當聽到提審人員宣布李立榮和她的罪狀，從而明白和兒子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時，這位年屆六旬的老太太竟然像條母狼一樣向審訊者瘋狂撲去。母性和人格的尊嚴，使這個一輩子膽小怕事的女人戰勝了一切恐懼，陡然間變成了一條在絕境中不顧一切護崽的母狼！她的罪狀是：“與XXX、XXX、XXX等多次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支持李立榮猖狂進行反革命活動”。

1970年12月10日這一天，南京市五臺山體育場迎來了本年度最後一次公判大會。林舜英母子一同被綁在第一部刑車上，七八個身材魁梧的軍人緊緊按住捆得死死的母子二人。由于無法正常呼吸，二人的頭都耷拉了下來。周邊的人無法看清他們的臉，母子倆留給人世的最後印象是他們頭頂上那高高豎起的亡命牌，以及林舜英那頭在寒風中飄拂不定凌亂的白髮。

這天上午是多雲天氣，時而還能見到陽光。到了午後，天陡然陰了下來，刺骨的寒風挾著淒厲的警笛聲在陰冷的上空回蕩，驚懼和恐怖籠罩住整個城市。刑車經過的每個路口都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到處可見荷槍實彈的軍警，全城成了一個大刑場。數十萬人列隊夾道來接受“教育”，來親眼看看現行反革命的下場。



長長的刑車隊伍在已實行戒嚴的市區主幹道上緩緩行進。刑車過處，兩旁的人群就出現一陣騷動。人們禁不住交頭接耳，議論第一輛刑車上的那對母子，不時發出聲聲驚嘆，惶恐和驚悸象瘟疫一樣迅速在人群中擴散傳染。一時間人們甚至懷疑起眼前所發生的一切，究竟是身邊的殘酷現實，還是一場可怕的噩夢。人，殺的太多了；反革命，槍斃的太多了；公判大會，判刑布告，刑場斃人，早成了司空見慣的事。對某些人，這些事就像走進電影院看一場革命影片一樣平常，而且連票都不用買。可是，這次畢竟不同以往，六十歲的母親和二十多歲的兒子竟然一同犯了現反大罪，同時殺頭，而且綁在同一部刑車上游街示衆，然後送去刑場，這絕對是史無前例的革命新生事物！這一切，即使對那些見慣了屠殺，見慣了流血，神經已變得麻木的人，在親眼目睹這種人間慘劇時，也身不由己地不寒而栗。革命樣板戲《紅燈記》裏李玉和母子的同被處決，與李立榮母子的同被處決，是虛構情節與客觀事實的偶然巧合，還是後者對前者的刻意效仿？日本鬼子當年殺的可是貨真價實同他們作對的中國人，而如今要殺的這位白髮蒼蒼的母親和他文靜的兒子，真的能像李玉和母子反抗日本人那樣對當今的中國政權構成嚴重的威脅？歷史，難道真的非要時時刻刻祭起種族仇恨、階級鬥爭這些嗜血法寶，以人頭和鮮血為代價，通過永無休止的相互仇殺來開闢自己的道路？

《紅燈記》這部以煽動階級仇和民族恨為主旨的革命樣板戲，幾十年來久演不衰，其中有一個情節上的失誤。鳩山在刑場處決李玉和母子時，事先沒有想到割斷他們母子的喉管或套上一個繩圈，竟讓李玉和母子能在槍口下從容不迫地喊完一長串口號後才慷慨就義。我們這個最講人權、最講人道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槍斃反革命時都會采用各種革命措施，不讓他們臨刑前發出聲來，而凶殘成性的日本鬼子居然允許要處決的犯人臨死時想喊什麼就喊什麼，這豈不是表明日本鬼子竟然比我們還講人道、講人權嗎？這不是美化敵人、詆毀我們自己嗎？我曾多次考慮過這個情節瑕疵，會不會是編導們一時疏忽所致？《紅燈記》可是當年革命文藝的偉大旗手江青女士親自把關的經典革命樣板戲，以她雷厲風行、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是絕不允許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細節上存在差錯的。那麼，這莫非是故意如此安排，以便讓人們看了日本鬼子怎樣殺人、中國的新生紅色政權又是如何殺人後，進行相互對比，從而反襯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愚蠢透頂，中國紅色政權的大智大慧，進而表明中華民族對日本大和民族在智商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南京對所有現行反革命的屠殺都在鳳凰西街盡頭一片墳場裏進行，這條鳳凰西街至今還橫在那裏。在對林舜英母子身後事宜的處理上，當時辦案的公檢法人員表現得頗為寬容：事後他們沒有要李立榮在南京的兩個妹妹補交槍斃她們母親和哥哥的二角錢子彈費，而當年林昭的親屬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林舜英母子行刑的下午，李立榮的兩個妹妹躲在一間門窗緊閉的小屋內抱頭痛哭，這一哭就是三天三夜！這天晚上，我的老父母親在家中黯然垂淚。他們都瞭解林舜英的為人，熟悉她的忠厚慈祥、心地善良，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位阿彌陀佛的老好人會遭如此厄運。父親忿忿不平地對母親說：“當年在長辛店我們那樣罷工鬧事，吳佩孚都不敢開槍，現在對李媽媽（他們就著小輩稱呼林舜英為李媽媽）這種老好人都能殺，成了什麼世道！這些狗日的怎麼下得了手！”這是一個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的樸素評價。

林舜英、李立榮讓南京幾百萬市民從她們母子同時被殺中，親身感受到了紅色恐怖，進一步瞭解了階級鬥爭到底是什麼。血淋淋的事實告訴人們，階級鬥爭這把高懸在每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隨地都有可能落下，叫人身首異處，防不勝防。任何人，不論身居何位，如何小心，力圖自保，都由于絕對不可知明天自己會不會成為這柄劍的犧牲品而終日惶惶不安。全體臣民即使都規規矩矩老老實實俯伏在君王腳下，三拜九叩，山呼萬歲，但為了貫徹他的“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聖旨，還必須從中挑出5%的臣民，先將其製造成鬥爭對象，再用他們的鮮血來塗抹寶劍的鋒口，防止生鏽鈍化。

1970年12月10日的那個晚上，人們坐上飯桌後，首要的話題必然是下午發生的事，



那第一部刑車上的母子，那綁著的花白頭髮的母親和綁在身旁年輕的兒子，那高高豎起的尖角亡命牌，那令人心驚肉跳的警笛。那時已能記事的孩子，現在有四五十歲了，他們應該記得當年父母講述此事時臉上那驚恐不安的神情，以及“要聽大人話，不能在外面瞎講瞎說”之類的忠告。現年五十多歲以上的老南京人，提起那次母子一道被槍斃的事，大部分人還都記憶猶新。2005年，我專門作了一次隨機抽樣調查。在我問的三十個五十五歲以上的人中，有四人曾在當年親眼看到林舜英母子游街，有七人的家中成員（包括親戚）看到過那次游街，有六人聽別人說過此事。遺忘是人類的天性，但有些事是永遠忘不掉的。

林舜英、李立榮母子被槍殺後的第十天，已去臺灣多年的李劍文先生在日本東京舉行了一次一百多名各國記者參加的招待會，聲淚俱下地向記者們披露了妻兒在大陸慘遭殺害的情況。與妻兒永別三十八年後的1989年，兩岸關係有所鬆動，李劍文以九十高齡之軀重返大陸探親。在慧園裏老宅，老人提及驚險的往事唏噓不已。

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親愛的朋友李立榮、曹漢華，我尊敬愛戴的林舜英女士，還有我熟識的坦率直爽、為人仗義的朋友張稼山，在那場瘋狂屠殺中先後慘遭殺害。那一年，林舜英六十歲，李立榮二十六歲，曹漢華二十六歲，張稼山二十九歲。一個花甲老人，三個有為青年，在那個紅色年代，他們殷紅的鮮血和成千上萬無辜者的鮮血匯在一起，染紅了紅色政權，染紅了革命紅旗，染紅了紅色江山，真正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十年後，1980年，林舜英，李立榮，曹漢華，張稼山，先後被平反。林舜英和李立榮平反後，家屬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共領到死亡補償金1400元，每條人命700元。張稼山生前沒有正式職業，死亡補償金只有300元。弟弟張稼峰去法院交涉，問殺一個人怎麼只補這幾個錢，得到的答復是：“我們是嚴格按黨的政策辦的，該給的就給，不該給的不給，該給多少就給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經再三據理力爭，又補了300元。張稼山29歲的年輕生命，作價600元沖抵了賬，一次結清。我們這些未被處決而活下來的人，平反後由原工作單位補發坐牢期間的工資。我勞改十年，農場補發我十年工資，總計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間的伙食費和衣服費1680元，淨落1740元。一個無辜的公民被判刑，而後又被平反出獄，却要補交伙食費，這不是某一部門、某一地區一時心血來潮，當年全國到處都是如此辦理的，這是“黨的政策”。

---

紅日初生，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泄汪洋。 梁啟超語/焦國標書

---

## 《黑五類憶舊》第十四期 20110701

許多人擔心毛左復辟，我不擔心。為什麼？首先它不可能復辟，其次即便它真的能復辟，也輪不到我擔心。

先說為什麼毛左不可能復辟。毛左大本營烏有之鄉“公訴”辛子陵和茅于軾先生，糾集 5 萬人簽名，看起來其聲勢洋洋乎大哉，其實說明不了什麼問題。莫說公訴兩個“人”，在中國，就是公訴偉大的上帝，隨便糾集 50 萬小菜一碟。這是一個生產屎殼郎的族群。

最近有外國記者問我“黑五類憶舊”用英語應該怎麼說，我說大概可以翻為“Black five classes recalling the past”，然後再給 Black five classes 加注：Five types of political pariah during Mao's time（毛時代的五種政治賤民）。有一種國粹叫株連，五種政治賤民加上被株連的親屬，直接被毛左禍害的人不下 1 億人，這 1 億人大約不會參與公訴辛、茅。從毛時代走出來的其他幾億人，政治上雖未遭大傷害，起碼遭受過毛時代的物質匱乏之苦和視覺、聽覺方面的人道、良知傷害。因而如果發起挺辛茅簽名，就不是 5 萬人簽名的問題了。

烏有之鄉的公訴簽名，與其說是倒茅，不如說是練兵。通過簽名，發展下綫，結成一張潛在的網，一旦風吹草動，可以立即全國發起“啤酒館暴動”。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愛權也要取之有道，企圖通過復辟毛左獲得政治紅利，是最邪惡、最醜陋不堪的攫取權力之道。公訴辛茅固然可惡，可是最近上海發生警察毆打“公訴人”的事件也很糟糕，與警察毆打其他訪民一樣糟糕。不該打。當今中國左派右派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毛左常常吆喝政府去殺這個去滅那個，右派卻從來沒說過這樣的話。今天政府終於打你了，有何感想？

再說為什麼即便毛左復辟也輪不到我擔心。輪不到我擔心輪到誰擔心？第一，輪到當今中國最統治集團擔心。為什麼這麼說呢？辟者，君位也；復辟者，恢復原君位也。倘恢復原君位，那麼對現君位怎麼辦？當然只能掃走鏟掉，就像當年毛左狂潮掃走鏟掉劉少奇一千人一樣。毛左的本質是要躍等上位，因而今天倘若毛左復辟，最危機的當數今日處於中國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北京最高權力集團，因而若論擔心，當然是該他們擔心。

第二，輪到企圖借復辟毛左渾水摸魚的人擔心。為什麼這麼說呢？試問當年毛左得勢時的權豪勢要諸君結局如何？無一人得善終。因而可以毫無懸念地說，且不說欲借復辟毛左攫取權力不可能，即便可能，最後的下場也與當年毛左橫行時的橫行分子沒有兩樣。對於這樣的人生結局，他們理應忌憚，理應擔心。即便他們奉行過把癮就死，可問題是世間事是死了也沒完，毛死了，事完了嗎？

毛左是噬人和自噬的妖魔鬼怪，有這兩種人在前面頂著被毀滅或自毀滅，離我毀滅很遙遠，正所謂天塌下來有高個的頂著，末日審判來了有罪大的頂著，我何憂焉？

## 目 錄

我們的父親母親·····	姚蜀平（05）
開明地主爺爺·····	王幹榮（12）
石橋公社的專政隊·····	楊文培（16）
地主崽怒殺隊長·····	楊文培（19）
文革整人術語解·····	張允若（23）
黨員的孩子寫反標·····	楊文培（25）
入社之劫·····	劉 英（28）

海晏叛亂的回憶·····	鐵穆耳 (30)
鄉村大游鬥·····	王俊義 (33)
南京青年陳卓然·····	毅 然 (36)
《知青之歌》案·····	蘇 北 (37)
王亞卓致信黃帥案·····	京 麾 (41)
大興大屠殺·····	京 訛 (44)
道縣大屠殺·····	湘 子 (48)
邵陽大屠殺·····	蓮 清 (67)
全州黃瓜沖坑殺案·····	桂 冠 (71)
常寧大屠殺·····	蕭一湘 (73)

---

亨利八世雖然剝奪了教會的財產，死時還是兩手空空。 英國諺語/焦國標書

## 我們的父親母親 姚蜀平

1966 年 8 月，北京紅衛兵大轟黑五類離京，在錦州部隊工作的三姐來信說，父母不屬於黑五類，不能走。父親姚劍鳴 1948 年隨國民黨 110 師師長廖運周（地下黨員）起義，解放後被安排在湖北省建二公司工作，退休後獲准把戶口遷到北京與兒女一起生活，哥哥所在的中國農機化科學研究院還給父母分了房子。

北京開始出現打死人的情況。一天，雙臂被打得又紅又紫的哥哥從看管室溜出來，偷偷來到大姐家，勸告暫住在那裏的父母立即回武昌原單位，說原機關的人最瞭解父親，不至于拿他的歷史隨意做文章。母親想了想，默默點頭同意了；沒想到，一向沉默寡言的父親突然端起一個方凳，極為憤怒地猛地砸向地面，喊道：“我走！我走！我連累你們！”我們只有沉默。

當天晚上，我和哥哥必須趕回機關接受批鬥，母親拖著她那患小兒麻痺症留下的跛腿，依依不捨地送我們到門口。她撫摸著哥哥的傷臂，從容鎮定，真情、堅決、清晰地說了一句話：“我到時候是會自己解決的……”我們有些茫然，不理解她怎麼會冒出這句無頭無尾的話。我們心裏有些難過，可絕沒想到這句話就是她決心勇敢坦然地面對厄運的最後遺言。

次日，父親執意要回農機院宿舍拿一些日用品和換洗衣服，竟一去不復返。他被居民委員會的造反派和紅衛兵扣住了。父親不回來，母親急得一夜沒睡好。次日早晨天一亮，母親堅持要回去看看，也是一去不復返。下午，我給大姐打電話，問父母的情況，她急迫地要我到她家去。大姐告訴我，她給母親住處打電話（走廊上有個公家的電話），不是鄰居喊“姚大媽”的聲音，而是居委會的人接的，凶極了，根本不准母親接電話。一定是情況不好，大姐不要我回母親處。

過去每到星期六，單身的我都回家陪伴雙親過周末。今天又是一個星期六，我却有家回不得了。後來父親說，當時在鞭抽棒打時，他和母親不是想的痛不痛，而是最擔心小女兒這時回來。晚上，我和大姐面對面坐著，乾著急，苦熬著。突然，在部隊工作的另一位姐身穿軍裝急匆匆地闖進門來，告訴我們：她剛回了農機院宿舍，一進大門就感到氣氛不對，正在開鬥爭會。紅衛兵沒有攔住這個穿軍裝的女解放軍，一位好心的鄰居悄悄地、嚴肅而堅決地告訴她：“趕快走！趕快走！”

我們心裏明白，父母極可能是在鬥爭會上。我們三姐妹在焦急中從傍晚苦熬到清晨。第

二天是星期日，我們想等哥哥來一起商定如何送走父母這個大問題。哥哥應該設法再從 看管室溜出來與我們商議，可是，又是一整天，從早到晚，不見哥哥的影子，父母那邊更是渺無音信。我們心亂如麻，又不敢輕舉妄動。

後來知道，哥哥那天早晨就由農機院的兩個紅衛兵押送給外館中學的紅衛兵，脖子上挂“反革命分子姚監複”的大牌子，與被打得背無完膚的父親分開接受殘酷批鬥。半夜 12 點，農機院的紅衛兵乘卡車來，看哥哥還活著，大罵：“他媽的，老子來收尸，你還活著！滾回去！”這樣的一天，他怎麼還能見我們？

星期一，我必須去機關上班，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在批鬥大會會場，忽然廣播裏叫我的名字，通知我馬上回家。我預感到發生了什麼事故，匆匆向家裏趕去。路上迎面遇到一位婦女，看上去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夫人。她邊走邊強忍著哭泣，臉色痛苦異常，這更增加了我心中的驚慌和擔心。

奔上農機院宿舍北樓二樓，一走廊的人群，緊緊圍在筒子樓廁所對面父母住的那間小房間門外。一個身穿舊黃軍裝，左臂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中學生，坐在房門口的小凳上。他看上去只有十三四歲，驗明我的身份後，准許我進入自己的家門，還說：“你們挑吧！還有什麼要拿的，可以拿走。”

進屋一看，我的心像剎那間被扔進了冰窖，全身都縮緊了。啊！這是什麼景象啊！沒有一樣站立的傢具，沒有一樣完好的東西，沒有一張沒有撕裂的紙片、古畫和照片，沒有一件沒有打碎的器物！從三姐從蘇聯帶回的手風琴到床上的被褥、枕頭，從書報到衣箱，從我放在父母處的每月工資的銀行存摺到母親珍藏幾十年的翡翠結婚戒指……統統抄走了。15 平方米的地面上，滿滿地覆蓋著那些被撕碎、被打爛、被砸壞了的東西，我的一生從沒有見過比這 15 平方米更加凌亂、更加淒涼、更加沮喪、更加慘痛的地方。

我的哥哥、姐姐都先來了，他們蹲在地上翻著、揀著，我也隨著他們漫無目的地在這似乎被千軍萬馬踐踏、蹂躪過的 15 平方米的水泥地上翻找著。我們不敢互相看到對方的眼神，怕充滿眼眶的淚水流出來，怕哽咽在喉嚨裏的哭聲哇的一聲爆發出來，都低下頭來凝視地面。我們翻出父母和參軍的姐姐們的半張軍裝照，盯著我們的紅衛兵立即把它搶過去，再用力地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片。我們又從亂紙堆上發現父母的半張信紙，紅衛兵又奪過去，再撕成更碎更碎的碎紙。這時，突然進來一個可能是重要人物的紅衛兵，是個女的，也只有十幾歲，長得十分清秀。我迷惘了，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如此清秀的面容同如此凌亂、淒慘的 15 平方米的地面聯繫起來！從那天以後，一看見這種類型清秀的臉龐，我就會想到難忘的那 15 平方米地面，心中不自主地湧起一種要嘔吐的感覺。

這位可能是前臺指揮的女紅衛兵正式向我們五兄妹宣布：“賀定華（我的母親）死了，現在第六人民醫院，由你們去處理後事。姚劍鳴在後樓，儘快要他滾回老家農村去。”

我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證實了，泪水一下子充滿眼眶，但我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不！絕不能哭！哭會帶來大禍。我深深地低下頭，翻弄著地下的破碎紙片，可是一切都模糊了。我強忍著，不讓一滴淚流出來。

哥哥胸前挂著“反革命分子姚監複”的大黑紙牌子，立正站著，旁邊還有兩個農機院紅衛兵監押著。哥哥沒有失去冷靜，他似乎忘記了脖子上黑牌子的分量，眼睛盯著女紅衛兵問道：“我母親賀定華是怎麼死的？我們要去派出所銷戶口，要向他們報告死因。”這個最簡單的問題似乎難住了這位清秀的女孩，她沒有也不敢如實回答，而是輕聲地似乎理不直氣不壯又裝作滿不在乎地說：“高血壓。”

母親從來沒有高血壓，但誰敢開口質疑呢？到了這個地步，勇氣、尊嚴、真理、正義、事實，一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哥哥多年後一直後悔，當時沒有請這位清秀的姑娘把她的話“高血壓”和她的名字寫下來，當作是去派出所銷戶口的書面憑證，將來有一天就可以把它送給巴金建議的終將建立的文革博物館保存。

當晚，我們把父親從後樓扶到這間滿目瘡痍、空蕩、雜亂、悲涼的房間，撥開地下的玻璃碎片，把唯一砸不碎的棕床板放在水泥地面上，又費很大勁用酒精分開粘連在父親背上的血衣，用嫂嫂悄悄買來的紅藥水搽抹父親背上幾道深達 1 厘米的傷痕。似乎麻木的父親不喊疼，只關心他的五個子女和陪伴他 34 年的苦命妻子怎麼樣。我們嗯嗯應著，把一包破棉花當枕頭，扶著父親慢慢躺下。

父親不知道自己多長時間只挨批鬥沒有進食了。我們給父親買了一些點心，他沒有心思和胃口吃，而是反復追問：“你姆媽怎麼樣？”我們只好模稜含糊地告訴他：“姆媽在第六醫院。”父親遍體鱗傷，衰弱不堪，精神恍惚，不斷喃喃自責：“我害了你們！我害了你們！”

次日，哥哥繼續被勒令監督檢查，接受批判，無法自由行動，大姐準備送父親去武漢，然後回安徽宿松原籍，只有作為小妹妹的我一個人去醫院處理母親的後事了。

我是一個剛剛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女孩子，從未經歷過人生的重大變故。我戰戰兢兢地找到第六醫院，又心驚膽戰地找到停尸房。管事的老頭惡狠狠地問我：“怎麼死的？”我小心翼翼地按照女紅衛兵的答案說：“高血壓。”他說：“嗯。一會兒火葬場來車。等著吧！”不一會兒，火葬場的大卡車開到了。當工人把母親的屍體抬出來時，我快步跟在旁邊走，急切而悲傷地凝望著母親，心却要哭出血來了。母親穿著一身破舊的陪伴她數十年的雲紗衣褲，黑色已洗成黃色，膝蓋處還打著補丁，赤著腳，手臂和兩腿上都看得出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發根沒有了，有的留下幾絡長髮，被血迹粘連在一起，而她的頭，却偏在一邊……

當她被工人扔上卡車後，我不由自主地蹬上司機駕駛艙旁的踏板，伸頭向卡車裏探望，想最後再看一眼生前是那樣慈祥、和藹、歡樂的母親的臉。不期想，母親被那些這幾天不知抬過多少具屍體的火葬場工人扔到了車廂的最前面；當我從上往下看時，母親的臉孔竟然就在我的眼皮下，離我不到兩尺！啊！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她的頸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

正在我處於極度恐懼和悲慟不已的時候，突然身後傳來了一聲吼叫：“是鬥死的！什麼高血壓！是鬥死的！”我被嚇得一下子從踏板上蹦了下來。停尸房的那個惡老頭兒站在我面前，氣勢汹汹地向我咆哮。突然間，一股怨恨從心底升起，我不知從哪里來的勇氣和力量，一改幾天來的低聲下氣，跳起腳向他聲嘶力竭地吼道：“我怎麼知道？！他們告訴我的！我去問誰！？你說，我去問誰？”本能的憤怒和反抗把我從一隻任人宰割、侮辱的羔羊變成像一只要張口把他吞下去的野獸。惡老頭沒料到這一手，竟往後退回去了，嘴裏不斷咕噥著：“什麼高血壓。鬥死的！”

我懷著滿腔的悲痛和怨恨在醫院送走了母親。沒有親人陪同，母親孤獨地被運到火葬場。那個時代，是不允許我隨車前往送葬的。運尸車遠遠駛去後，我立即轉身向火車站奔去，想最後見父親一面——這果真是最後的一面。在月臺上，我找到去武漢的列車。父親已坐在車廂裏，他傍著窗口，低聲地親切地喚著我的小名，深情地囑咐我：“以後要聽哥哥、姐姐的話啊！”他對自己的命運和前途已經絕望，已將他自己作為父輩的保護之責轉交給我的哥哥、姐姐了。我強忍著淚，默默地點頭，凝望著他。

車窗外，我們旁邊，有幾個十來歲的孩子，像我一樣目不轉睛地盯著車上的一對落難的老人。我猜想，一定是孫子孫女來送和我的父親一樣被轟出首都、遣回原籍的爺爺奶奶。他們的父母親為什麼沒有來送行，是不是也遭到了不幸的打擊。我們這些命運相同的天涯淪落人，都在強忍著眼淚和哭泣，都有無數想說、要說的話，却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或者是一句也不敢說。

汽笛響了，火車開動了，我在車窗外對父親喊：“爸爸，保重——”我隨著慢慢駛離站臺的車廂向前走，死勁盯著是生離但不願是死別的父親的眼睛。在父親依依不捨的目光裏，我看到的是閃著驚恐、膽怯、忐忑不安和為我們擔心的神色，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終生不會

忘記的最後的印象。

走出火車站，我趕回那間似乎已被千軍萬馬報復掃蕩過的 15 平方米的小屋。這裏曾是我的父母親住了 3 年的溫馨、親切的自己的家，現在，我孤單地站在真正是家破人亡的廢墟之中，悲憤、悵惘、茫然……我不期望還能找出一件可以留作紀念的遺物。

小屋散發出陰冷、混濁、悲慘、淒涼和恐怖的氣息，似乎還能依稀看見在毒打、逼供時的母親。她寧死不屈，絕口否認她是特務之類的誣陷之詞。爲了保護自己的清白和子女的命運，母親忍受酷刑和死亡的威脅。整個漫長的文革期間，任何專案組都拿不出一句母親招供的話來打擊她的子女。她以生命保護全家免遭最惡毒的毀滅性的打擊，挫敗了企圖從 66 歲老婦人承認是特務打開缺口，再炮製星期天與子女聚會是“布置特務任務”的惡毒計謀。她只是一個善良、純潔、普通的小學教員，像普天下愛護子女的母親一樣，教育兒女從小做人要像出污泥而不染的素潔的蓮花。

我不敢在這間失去了溫情，却充滿了殺機與恐怖的小屋再停留了。環顧四周，還有一件血衣和一個破木盆是沒有被完全撕爛，砸碎的。這件從父親身上用酒精與傷口剝離開來的血衣，仍放在地面的棕床板上。我沒有膽量把它拿走，但是我把它放在全屋裏最顯眼的地方。不論誰再開門走進來，或者任何人走過這間房門口，都會看到這件血衣，都會想起含冤逝去的老人。然後，我提起扔在牆角的一個破舊不堪的小木盆，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永遠離開了這間終生難忘的小房間。它是母親從南方帶到北京的紅漆脫盡了的一隻舊木盆，也是全屋中唯一歷經劫難尚能保持原狀的傢具。

回到大姐家，我把母親用過多年的小木盆放在旁邊，盡情地洗了洗奔波了整整一天的又髒又疲倦的臉。我抬起頭來，從鏡子中看到自己的那張毫無表情的麻木面孔，從我的眼光裏又看到與母親死別、同父親生離也或即爲死別的悲痛情景，突然按捺不住地哭了，兩肩不停地抽搐，強忍了一整天的眼淚終於再也忍不住了……

父親由大姐送到武漢後，才被告知同他相親相愛 35 年的妻子已不在人間。抱頭痛哭一場後，父親決心離開大城市，孤身一人回到安徽宿松農村老家。老家屋後的小山上，長眠著我們的祖母。

在寂寞、孤獨、膽戰心驚中，父親無時不牽腸挂肚地惦念著仍在被批鬥、下放和不斷接受再教育的 5 個子女。他終生自責：“是我害了你們！”“30 年代白色恐怖，我要求加入共產黨，在我們幫助下逃出南京虎口的黨員對我說：‘你的孩子多，加入組織危險，不入黨也能做很多工作幫助黨。’但是，最後我還是給全家帶來了災禍。”“（爲共產黨）做再多的好事也不行啊！”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高潮中，農機院專案組的兩個人，不遠千里找到大別山脚下的小村莊。他們告訴父親，他唯一的兒子，因朋友、同事揭發他說了江青的壞話，已經被農機院革委會定性爲“現行反革命分子”，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本人也將在次日公社大會上被批鬥。父親終於被壓垮了！在極度恐懼、擔心、絕望與悔恨中，父親自縊身亡。

多年後，哥哥在老家後山的矮松林中，跪在被鄉親們埋葬的沒有碑文的父親的墓前，把我寫的《兒女祭》和五包香烟、五個蘋果，作爲五個子女的祭品，奉獻給父親和母親的在天之靈。鄉親們不忍心把父親最後日子的慘狀告訴哥哥，只有一位 90 多歲的老姑媽一隻手緊緊地握住哥哥的臂膀，另一隻手輕柔地撫摸著已經 60 歲、年齡與當年回老家的父親相仿的哥哥的微禿的頭頂，深情地盯著哥哥的眼睛，不斷地說：“像啊！真像你爸爸！”突然，老姑媽極爲痛苦地抽泣起來，說：“你爸爸真可憐啊！可憐啊！可憐啊！”

父親和母親一樣，沒有爲我們五兄妹留下任何遺言和遺物，也沒有一個子女能在父母遺體前放聲痛哭或低聲抽泣。但願有天堂，使先後離開我們的父母在那裏相會，互相照應，忘却那不公平的痛苦的人間歲月。

父親一生耿直，一貧如洗，因解放前開過一間木匠鋪，惹了大禍。“四清”時，重新清理階級隊伍，對原來的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地富反壞右再次排隊。這是中國各階層的大洗牌，有人因此雞犬升天，有人因此人頭落地。父親因開木匠鋪時雇過短工，并帶了一位長工學徒，這次重洗牌時被定為“資本家”。可憐我的父親，房無半間，地無半壟，居然劃成了資本家，從城市手工業者一下子變為剝削階級。從此，每有運動必要表態，每出大事必先查他，就連街道小脚老太們開個批鬥會，也要我母親去“接受教育”。我們一家十姊妹也從此成了“黑五類”，我的哥哥姐姐們沒有人入黨，沒有人提幹，就連當兵的權利也被剝奪。我的五個哥哥一個姐姐都曾報名當兵，身體條件、文化素質都被相中，但都在政審時被拿了下來。我們街坊鄰居的子女，同我們一樣大，當兵的當兵，進廠的進廠，當官的當官，看得父親眼熱心涼。我高中畢業那年，父親錯劃的成分問題被糾正過來。那段時間，父親總是輕鬆快樂地拄著那根斷拐棍，到街坊四鄰串門，說：“這下好了，我的伢們又可以挺起腰杆子了。”

楊壽清

開明地主爺爺 王幹榮

太爺（曾祖父）和太太（曾祖母）上了歲數，該頤養天年了。爺爺取代太爺成為這個四世同堂大家庭的主事人時，我已經記事了。我清楚記得，我們幾個小曾孫撿了掉在地上的熟杏，給太爺太太吃。爺爺兄弟三個，老三（我三爺）大學畢業在外工作。爺爺有五個兒子，老二（我大）在外邊念大學。除了三爺和我大，那時我家近二十個成年人，都在家務農。家裏有多少地我不知道，只記得有南北兩個大院，牛羊騾馬成群，還有大車。

那時爺爺五十歲左右，中等個兒，面龐微黑，鬚鬚疏朗，高發際綫，頭髮在前額倒寫一個“山”字。爺爺上身總穿一件白色對襟褂子，下面是黑色挽襠褲，足蹬圓口黑布鞋，齊齊整整，清清爽爽，乾乾淨淨，優雅飄逸。爺爺身上還有兩處明顯特徵。右手拇指缺了一截，沒指甲，圓圓的指端長著兩個圓溜溜的角質突起。雙肩各有一塊圓圓的胛子，微凸，對稱，跟他兜裏的袁大頭一樣大小。

每天凌晨鷄叫，爺爺便拿著一根拐棍，跑遍南北兩院，挨個兒去捅兄弟弟媳、兒子兒媳、侄兒侄媳的窗戶，并大聲呼叫各人的名字，催他們趕緊起床，準備下地。捅完各屋窗戶之後，爺爺就提著一隻竹筐去拾糞，拾糞時穿的是一件黑色褂子。等別人穿戴梳洗完畢，爺爺已拾回來滿滿一筐糞，倒在豬圈旁邊的糞堆上了。

拾糞就是四處轉悠撿摸，把馬牛羊雞犬豚拉在村巷田頭的糞便，還有小孩子拉在門口的大便，用木鍬鏟到筐裏。這是每家農戶老少男丁都可以做的小事，一般是零星時間順手幹幹。這也是件大事，“莊稼一枝花，全憑糞當家”，拾糞是村民必不可少的生活和勞動內容。誰家拾的糞多，糞堆高，說明誰家人勤快，莊稼也長得好，家業興旺發達。在爺爺帶領下，我家大人娃娃一有機會就拾糞，我那時三四歲，也跟著大人拾過。

爺爺擅彈三弦，會打磨子，做木工，還能染布，加工羊皮襖、彈羊毛、擀羊毛氈更不在話下。我家每個女人的床頭，都有爺爺打造的雕花樟木箱子；每個女人的身上，都穿著爺爺

染出的印花布褂子。這始終是我家的一道風景，成了我家所有女人的驕傲。

爺爺是一個善人和能人，很受鄉人尊敬。這個善人和能人，雖是一個普通農民，却跟一般農民不大一樣。一般農家漢子不修邊幅，甚至邋邋遢遢，大大咧咧，衣著印著汗漬，喜歡把一條褲腿卷起來，冬天攏著手在牆根下曬太陽，看熱鬧時伸著脖子，直著眼睛，半張著嘴，一副呆相，愛說髒話，好跟女人開粗俗玩笑。爺爺這個農民從不這樣。他生活在偏僻鄉村，身上却隱隱透出一絲書卷氣。他長得不算高大，但在村民中總顯得鶴立雞群。很多年輕人管他叫“大爹”，就是大伯的意思。叫大爹，一因為他是我太爺的長子，二因為他似乎天生一種“大爹的樣子”。很多與爺爺同輩的人，年齡比爺爺大，但是很少人叫他們“大爹”，更多的是喊“老大”、“老二”。爺爺家裏殷實，這是不是人家叫他“大爹”的又一個原因，我不知道。

爺爺骨子裏更不是一個一般農民。他沒上過學，却供出了一個弟弟、一個兒子兩個大學生，這在方圓百里絕無僅有。他還能看懂書報，寫的毛筆字更秀氣。

在孫子輩裏，爺爺最喜歡我，甚至偏愛到可以替我寫大字當作業。那已是解放後，我上學了，老師看到我這個二年級學生的“大仿”，立即猜出是我爺爺的手筆。爺爺的字，村裏識字的人都熟悉。我從小下筆潦草，到現在也寫不出爺爺那一手字。那次老師對我說：“回去給你爺爺說，第一叫他打你一頓屁股，第二叫他給學校寫一個條幅。”我把老師的話學給爺爺，爺爺捋著鬍子直笑，說：“這是你逼著爺爺犯錯誤，再不許了。”後來爺爺給村頭廟裏的小學用宣紙寫了個條幅——“品端上進”。老師姓呂，三十多歲，大概初中程度，一人教著村裏初小的二十幾個娃娃，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都上。那條幅呂老師在城裏裱過，挂在他臥室兼辦公室裏，直到土改時爺爺成了地主，才摘下來。我到現在也不明白，爺爺的文化是啥時學的。

爺爺對我幾乎百依百順，但是我幾次纏著爺爺讓他講他的拇指和肩上的胛子為什麼會那樣，他都笑著敷衍過去。後來我從長輩口中聽說，爺爺的半截拇指，是幹活時給鋤刀鋤掉的，肩上的胛子，是年輕時挑擔販油掙錢被扁擔磨出來的。

土改時，爺爺被劃成開明地主。我家雖然人多地多牛羊騾馬多，但是沒雇過長工，裏外活都是自家人幹。爺爺年輕時是全勞力，上歲數後雖然幹活少了，却還拾糞，連奶奶和二奶奶，也經常拐著小腳下地。爺爺人緣好，沒幹過壞事，沒得罪過人，服從共產黨的政策。村裏有個劉大胖子，據說是惡霸地主，不知具體罪名，被狠鬥過好幾回，還被唾面，上吊死了。爺爺則沒有被公開鬥爭過，相比之下，我家日子還算好過。

家裏良田、牲畜、傢具、浮財被分淨了，空蕩蕩的大瓦房和土窑還在，爺爺又打了一些簡單傢具，各個屋子漸漸重新充實起來。遠處幾畝薄地劃歸我家當口糧田，家裏其他人種地，爺爺張羅著開客棧，辦染坊，抽空給人家打磨子，做木活，不求富裕，但願老老實實把日子一天一天過下去。

土改後，我到城裏父親身邊上學。家裏成分不好，我又年小，關山萬里，進城後，就沒有回過老家。但是家裏的信息，總能斷斷續續傳來一些。爺爺來看過我們，爺爺說，客店和染坊不讓開了，給人打磨子打不動了。慢慢地，一個大家，分成若干小家，二爺和他的兒子兒媳們，我的大伯父和幾位叔叔，都單過了。三年大饑荒時期，我和父親的心揪得緊緊的。不管怎樣，城裏定量供應糧食，可鄉下爺爺奶奶能吃飯嗎？後來聽說，大伯叔叔們都自顧不暇，奶奶也水腫去世了。爺爺和奶奶的家沒了，爺爺和還未成年的我的五叔背井離鄉去逃荒。

忽一日，一個衣衫襤褸，渾身散發著異味的鄉下老頭兒，撞到了爸爸單位，說是找王XX。我爸到傳達室一看，一個名副其實的叫花子，正是爺爺。他還記著大城市裏有一個兒子，一個孫子，千里迢迢來投奔我們了。我放學回家，看到躺在爸爸床上又黑又髒又老的爺爺，嚎啕大哭。爺爺即使在最灰暗時候，也保持著排場、體面形象，這回是真正落魄，淪落



到家了。我扶爺爺起來洗澡，枕巾和床單上留下大片大片黑黢黢的污垢。我從爸爸單位的食堂買來菜團子，爺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

住了幾天，爺爺看我們糧食定量也有限，就說要回到他跟五叔逃難落脚的地方去，哪怕再要飯。我們勸不住，含淚挽留，爺爺還是執意走了。我們能做的，只有在他衣兜裏塞一些錢。這一去，兩年沒有音信。忽然有一天，五叔來信說，爺爺去世了，歿于大骨節病。大骨節病好像多發于少年，爺爺怎麼會得呢？後來五叔說，他和爺爺落脚那地方，雖然水土不好，却獨盛產梨子。爺爺和五叔沒糧食了，撿食熟透了掉在地上的大梨，吃著吃著，爺爺體衰了，腰彎了，骨節大了，最後動不了了……

---

1971年10月的一天，我們照例集中在大棚子裏學毛選。有個同學忽地站起來立正大聲報告：“報告！我發現了一個反革命分子！看！”說著遞上一本8開的《解放軍畫報》。我們伸頭一看，上面戎裝筆挺的林彪副統帥的頭像上被打了叉，旁邊寫著“打倒林禿子”。不料班主任一臉惱怒，叱責道：“住嘴！規矩一點！”我們驚疑不定，接著連長開始宣布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士兵手不離槍，晚上睡覺不准脫衣服脫鞋，然後宣讀中央文件，內容是軍委副主席林彪叛逃，機毀人亡。那天，連長系著武裝帶，挎著盒子槍，喪失了素常的和藹，士兵們也全部人手一槍。

嚴建設

---

石橋公社的專政隊 楊文培

1969年秋天，皖南當塗縣石橋公社團月大隊的農田裏發現一些飄落的花紙片，撿起來細看，上面印有蔣介石的頭像和套框文字。一個過去的國民黨兵痞如同發現定時炸彈似的驚叫：“不得了！這是國民黨的空投傳單！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一石激起千重浪，空投傳單頓時鬧得城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頃刻刮起抓特務、清查反革命的龍捲風。其時正當毛澤東發布八二八命令，“提高警惕，準備打仗”，石橋公社立即指使“群眾專政指揮部”將黑五類集中管理。爲了對付這些階級敵人，他們給專政隊配置柳條帽、三節棍、柘樹棒和鐵皮帶頭等原始武器。

專政隊首先拿開明人士魏建浩開刀。此人國民黨時期曾被委任爲大公圩堤管會董事長（相當于水利主任），解放軍渡江攻打蕪湖官陡門時，他成了粟裕的坐探，爲智取官陡門“立過功”。粟裕認定他是開明人士，爲他簽署了立功證書。土改時期，工作組沒收了他們的證書，還給他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爲了生計，魏建浩走村串戶叫賣自製的土烟，有人則檢舉他賣烟是假，搞反革命串聯、發展特務是真。這一天，公社的打手們把他五花大綁逮進公社大院，按到在地，把雙手擰到背後，與腿搭橋，用繩索把手腳捆綁在一起，像三角架似的懸吊在公社大院的樹杈上。

起初他渾身顫抖，撕心裂肺地哭喊：“啊啣啣啣……我冤枉啊！粟裕將軍呀，你快來救我啊！”他的哀嚎惹得打手們歡心鼓舞，一個打手說：“這老雜種扛大扁嚇寡婦——臨死還想撈個救命稻草哩！”另一個說：“對付老牌反革命咱得玩點新招！”他吩咐打手搬來兩張桌子，放在吊起的魏建浩兩端，然後兩個打手相對站在桌子上，像老和尚撞鐘似的你推過來，他撞過去。老反革命涕淚滿面，發出淒厲的哭喊。隨著打手們放縱的推撞，受害人在空中的

擺幅越來越大，最後繩索斷掉，老反革命象一隻沉重的沙袋摔在地上，腦漿迸裂，四肢痙攣，全身捲縮得像一隻刺猬。

專政隊整死魏建浩，又把矛頭指向他的 18 歲的兒子魏宏浩。他們認為，魏宏浩可能掌握著特務名單。在團月大隊辦公室，革委會主任侯守木讓人扛來一條殺豬凳，派打手把魏宏浩綁來，親自動手將魏面部朝下、用數道繩索將其牢牢綁在殺豬凳上。侯主任泡了一杯茶，坐在椅子上，學著樣板戲裏的模樣開始審訊。他猛拍桌面，尖著嗓子說：“你小子把特務名單藏在哪儿？快交出來，不然叫你不得好死！”被綁在殺豬凳上的小子，頭搖得像貨郎鼓，邊哭邊哀求說：“我不知道有特務名單嘛，我沒有收藏啊，大伯大叔放了我吧！”侯聽得不耐煩，火冒三丈地說：“老子不日你媽，你不喊我爸！來，給他用刑！”他來到殺豬凳前，脫下自己的上衣蒙住魏的腦袋，又將魏的手臂往前拉直，用腳狠勁踩住其手背，使五指張開。這時，另一個打手將事前準備好的篾籤子端過來，主任一手拿篾籤，一手拿棒槌，躬下身子，將竹籤砸入受害人的指甲縫。受害人渾身顫抖，發出殺豬那種淒厲的慘叫。打手們立即用衣服纏住他的頭，用衣角堵住他的嘴。很快，劇痛使受害人喪失知覺，處於昏迷狀態。侯主任認為他裝死，讓人解開繩索，使其仰面朝天，用辣椒水潑臉……

時至深夜，打手們早已作鳥獸散，一陣冷風把魏宏浩從昏迷中吹醒。昏暗的燈光下，他只見一個看公房的老頭伏在桌上打瞌睡。此刻，魏宏浩感到天昏地旋，全身劇痛，雙手腫脹得像滴血的熊掌。他知道出大隊部向東有一口塘，便掙扎著站起身，一步一個血印地向外面的黑暗裏走去……

魏宏浩投水而死的第二天深夜，其母經受不了喪夫失子之痛，在生產隊食堂門口的樹杈上投繯自盡。

大夏大隊抓住地主分子孫文忠，反手吊起，要他承認是特務。孫哀哭求饒，革委會主任夏齊山說他不老實，命人把空心軸承用鐵絲串上挂在他脖子上。老地主承受不了酷刑，夜間以解手為名，跳水自盡。廣建大隊有個叫湯長壽的偽保長，專政隊把他關在大隊部餓飯，逼他承認是特務聯絡員。他餓得要死，怕得要命，夜間趁人不備，打碎玻璃窗，從玻璃洞口爬出，跳水塘自盡。從窗口出逃時，身上被玻璃割得皮開肉綻，屍體經水浸泡，皮肉翻卷，慘不忍睹。

石橋專政隊逮住一個右派、反革命潘祥瑞，潘原是中學歷史教師，知道臥薪償膽的故事，便自作聰明，企圖用吃屎喝尿裝瘋賣傻蒙混過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的打手們不吃他這一套，將他剃成陰陽頭游街示眾，然後關進生產隊的豬圈與豬為伍。一個打手戲謔他說：“聽說你吃屎喝尿啊？這倒是很符合‘節約鬧革命’。好吧，我們就成全你，今後你就吃屎喝尿、自產自銷吧！”就這樣把他活活餓死在豬圈裏。

石橋專政隊還抓來地主工商戶吳保孝，關進黑屋。吳一心尋死，可又怕跳塘後被水嗆得受不了爬上來重新受罪。思來想去，他想出一個作繯自縛的好辦法，在跳水前先在腰上纏幾道繩索。天黑了，他以解手為由走出囚牢，在暗處將雙手狠勁插入腰間的繩索，百米衝刺似的向水深處撲去。家裏人將他的屍體打撈上岸時，他的雙手還被腰間的繩索勒得緊緊的，活人想從繩索中把它抽出來都不容易。

---

文革十年，焦晃被打倒，挨批鬥、關牛棚、下放勞動，其中九年無戲可演，先後有兩任妻子離他而去，家沒了，人瘦得不成樣子。最絕望的時候，焦晃曾一度動過輕生的念頭，幸好母親從北京趕來，天天陪著他，才給他硬撐下去的力量。原本就不太贊同焦晃走演藝道路的父母，這一期間更加憂慮他的未來。有一天，焦母故意裝得很輕鬆的樣子，對焦晃說：“孩子，你以後別幹演戲這行了，其實當個對門商店裏的營業員也挺好。”

---

地主崽怒殺隊長 楊文培

銅山縣東方紅公社有個社員叫陶德寶，出生于地主家庭，父親在刮共產風時被抓去勞改，死于非命，母親帶著弟弟妹妹改嫁他鄉。20 來歲的陶德寶，乾癟得像根蘆柴棒，住一間破屋，年久失修，房頂上的瓦片殘缺不全，屋內唯一的家產是一張木床、一床爛棉絮和一個用碎磚砌成的單口灶。

已經是娶親完婚的年紀，因為出身不好，一沒有父母操持，二沒有親友相助，地主崽子陶德寶仍然是風掃地月點燈孤身一人。在生產勞動中，陶德寶享受不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同樣的重體力活，比如挑重擔，撈塘泥，別的男勞力能記 20 分工，而德寶却只能得 10 分工。為什麼？隊長說：“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地主是剝削貧下中農的死對頭，他們人還在心不死，讓他們子女用勞動償還剝削債務，這叫父債子還、天經地義。”

有一年，春耕時節，隊裏耕牛不足，隊長號令社員以大寨人為榜樣，發揚戰天鬥地的精神，用人力代耕畜完成春耕任務，還明確宣布：用四齒耙翻地達標者，每畝可得 50 分，多勞多得，一視同仁。于是，全隊男女齊上陣，爭先恐後鬧春耕。幹勁最大的是陶德寶，起早摸黑，風雨無阻，吃在田頭，幹在地頭，三天翻了一畝地，成為生產隊刨地最快、質量最高的人。可是，評定工分時，隊長照樣對陶德寶打折扣。一些社員也覺得隊長做得有些過分，拿周恩來的話（出身不由自己，重在政治表現）跟隊長辯駁。隊長堅持說，對待階級敵人就是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

大家都忿忿不平也無濟于事，婦女隊長楊曉美給陶德寶出了個點子：“德寶啊，俗話說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我看你還是破費一點，買些烟酒，請隊長撮一頓——對頭也怕三餐吃哩！”陶德寶言聽計從，把平時省吃省用積攢的錢拿去買來烟酒魚肉，請女隊長操辦了一桌酒菜。副隊長、貧協代表和記工員（生產隊會計）作陪，隊長被讓到上席。別看隊長開口閉口講階級鬥爭，實際是個饞嘴貓，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鑽。酒席上，德寶敬烟斟酒，作陪的人眾星拱月。趁著隊長酒興十足，陪酒的人七嘴八舌地幫德寶說好話。貧協代表說：“隊長啊，德寶這孩子雖然出身不好，可表現還不賴嘛！在隊裏幹活從不投機取巧，從政策上講也是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毛主席說‘不殺頭給飯吃’，今後要搞同工同酬嘛！”婦女隊長也旁敲則擊：“咱隊裏最缺的就是婦女勞力。大夥兒扶持點，幫德寶娶個媳婦，不但德寶添人進口，生產隊還增加了婦女勞力。”眾人開導隊長的同時，陶德寶則像太監侍候皇上一樣不斷地給隊長添酒夾菜。

酒足飯飽，隊長接過婦女隊長拿來的熱毛巾，擦了擦嘴巴，又將桌上的半包飛馬牌香烟裝進口袋，打個飽嗝，離席而去。出門後，隊長寧笑著冒出一句話：“呵呵，沒想到你們串通一起擺鴻門宴，想拉我下水——沒門！”

三天后，陶德寶被公社專政隊捆去，關進黑屋子，白天當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拉到各大隊游村批鬥，罪名是妄圖腐蝕拉攏革命幹部，做四類分子的代理人。一個星期的批鬥之後，待放回生產隊時，陶德寶就像渣子洞集中營裏的華瘋子，被打得衣衫襤褸，身上萬紫千紅。自此以後，陶德寶上工懶懶散散，幹活神不守舍，就像草原上的餓狼，透露著一種讓人膽寒的戾氣。當然，他這樣表現的結果是隊長加倍報復他，工分克扣得更狠，欲置其于死地。

轉眼到了秋天，公社召開生產隊長會議，布置秋耕秋種，把草籽田刨翻遍制綠肥，為明年的水稻育秧墊定基肥。隊長一如既往，鼓勵大家發揚大寨精神，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大

打土地翻身仗。

被隊長逼得走投無路的陶德寶似乎改變了思路。他不再省吃省用，甚至還添置一套新衣服，有時還學著別人的樣子抽一支烟，喝一口小酒。開工刨地這一天，他特意去理一個發，換上新衣服，把刨地用的鐵齒耙的鐵銹刮去，打磨得寒光閃閃，有點像戰士出征拼殺。

陶德寶在隊裏幹活從來不挑肥揀瘦，而是像雷鋒那樣，哪里有困難就往哪里上。隊長宣布了刨地任務後，所有的好地塊都被人搶光了，剩下一塊堅硬的鹽鹼地。德寶來到這塊地頭，脫去上衣，雙手合在嘴巴上哈一口氣，抱起釘耙，大幹起來。別人刨一陣歇一會，德寶却像上足了勁的鬧鐘，一刻不停。中午社員都回家吃飯了，德寶却舀一瓢地溝水，將帶到地頭的飯菜泡一下，風捲殘雲地吃下，接著又幹。

三天後，隊裏對所翻土地進行評比檢查。陶德寶的地塊雖然差，可他深翻細耙，質量上乘，獲得眾口稱贊。評比小組主張給陶德寶同工同酬，超額部分獎勵，可是隊長如死豬不怕開水燙，就是不吱聲。隊長獨裁，社員不滿，德寶更加忿恨。過去隊裏評工分時德寶像幽靈一般遠遠地轉悠，這一次他却與隊長形影不離，甚至敢與隊長較勁。隊長當著大家的面說：“你是地主狗崽，能讓你活著就是寬大，你勞動是改造，得工分想和貧下中農搞平衡沒門！”陶德寶也不甘示弱：“毛主席教導‘不殺頭給飯吃’，你扣我工分是逼我去死！”隊長輕蔑地說：“你去死吧！死一個階級敵人連一條狗都不如！”

隊長與德寶打嘴仗，衆人都不敢攙言。天已黃昏，大地暮色降臨。一陣晚風吹來，兩個鬥嘴的男人打了個寒顫，這才發覺衆人早已收工回家，離他們遠去。隊長也從地頭來到路上，滿臉怒氣地往家走。陶德寶也將四齒耙扛在肩上，上了路，尾追著隊長。突然德寶拽住隊長的衣角，哀求道：“隊長啊，我跟你無仇無怨，你幹嘛和我過不去？你不扣我工分不行嗎？你莫非真的不讓我活啊？”隊長不答理，猛地往前一跨，掰開德寶的糾纏繼續走路。

從地頭到村口有五百米的距離，眼看到村口了，失望之極的陶德寶，迅速貼近隊長身後，雙眼噴火，猛地舉起釘耙，對準隊長的腦殼死命鏟去。“撲哧”一聲悶響，隊長隨聲倒地，本能地雙手抱頭，像刺猬般捲縮成一團。因下手過猛，釘耙的鐵齒有兩根從隊長的頭頂直穿透下頰，隊長的嘴巴像上了鉗釘一般閉合著。陶德寶被自己的狠勁嚇呆了，兩眼直直地看著捲縮在地的隊長，只見他兩條腿還在不服氣似的顫抖著，蹂躪著。

村子裏閃爍著點點昏暗的燈光，黑暗已經吞沒大地。一個女人的呼喚聲從村子裏傳出，那是隊長的老婆在呼喚她的男人回家吃飯。隊長老婆的喚聲把處於麻木狀態的陶德寶驚醒過來，他跌跌撞撞地向呼喚丈夫的女人走去。在女人面前，陶德寶雙膝下跪說：“嫂子你莫喊了，隊長我已經把他殺死了！”

半個月後，銅山縣人民法院將地主崽子陶德寶帶到東方紅公社執行槍決，布告上的罪名是：地主階級報復殺人罪。

---

“四清”之後回鄉的地富子女學生，被當地幹部群眾看作地主富農。一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團員回鄉後，當地領導不許他們擔任生產隊幹部，甚至讓他們只能參加只有地富分子參加的會議。有的黨支部不准團員與地富和反革命子女結婚，以至于回鄉的地富子女找不到對象。山東有個 1956 年即已入團的地富子弟，回鄉後團組織開會從來不通知他，他十分苦惱。湖南衡陽一個高中畢業生說：“我是地主出身，回鄉後隊裏把我和父親同等對待，不讓四類分子參加的會也不讓我參加，這豈不是剝奪了我的政治權利嗎？回鄉後這不讓我參加那不准我進去，等于用一條無形的鎖鏈把我鎖住了，這樣的生活實在無味淒然。再好再忠心的人，轉彎抹角都可能找到一個什麼親族是反人民的，這種做法我想不通。”山西和順縣青年牛成貴，回鄉後別人分得全年口糧 260 斤，分得小片荒地補助糧 40 斤，他却只分得 190 斤。一次下地幹活，一社員將一穗玉米放在牛成貴筐裏，隊長硬說是他偷的，開社員大會鬥爭他。

牛成貴感到走投無路，上吊自殺。

---

## 文革整人術語解 張允若

批鬥：要當事人在群眾大會上雙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低頭彎腰，兩手向後翹起（所謂噴氣式），頸上挂著大塊紙板，或木板，甚至幾十斤重的鐵板，上寫“XX 份子 XXX”。前面的 XX 是給人加的惡名，如“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走資派”、“叛徒”等等，後面的 XXX 是當事人的名字。酷暑烈日下，或臘月寒風中，一跪或一站就是幾個鐘頭，周圍是震耳欲聾的“打倒”口號聲和呵斥聲，身旁的暴徒隨著會場的氣氛，不斷地拳打腳踢，或手執棍棒器械，或揮舞銅頭皮帶鞭子繩索，劈頭蓋臉地抽打……

游街：給當事人套上紙糊的特大高帽子，上寫“XX 分子 XXX”，頸上挂著大牌子，要他邊走邊敲打面盆之類的響器，邊喊“打倒 XXX（自己的名字）”之類的口號，還給他剃陰陽頭（頭髮剃一半留一半），甚至用黑墨汁、藍墨水、紅墨水，滿頭滿臉亂澆一氣，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然後像牲口一樣被架著游街示眾，走遍大街小巷，革命派在後面又呵斥又喊口號，極盡侮辱之能事，往往引來圍觀者的惡弄，吐唾沫、丟石子、潑髒水……

審查：日夜不停無休止地逼供，審訊者吃飽了睡夠了輪番上陣，被審者不讓吃不讓喝不讓睡夜以繼日地接受審問，通過疲勞轟炸，呵斥拷打，甚至吊大梁、坐老虎凳，肆意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體力衰竭，然後逼迫你、誘使你招供，交代“反黨罪行”、“反革命計劃”、“反革命同夥”，甚至強迫在偽造的交代書上簽字按手印，如有不從，照例又是拳打腳踢、鞭棍交加……

蹲牛棚：把被批鬥的“牛鬼蛇神”集中關押，白天做苦役，常見的是打掃廁所，在本單位的農場、車間、菜地、養豬場、養雞場做各種最髒最累的勞役，晚上接受種種批鬥，勒令寫交代、寫檢查。在此期間，有專人看守，把“牛鬼蛇神”視同牛馬，動輒呵斥叫罵、拳打腳踢，隨時遭到種種侮辱，比如勒令下跪、四肢爬行、把廁所用的紙簍套在你頭上，甚至逼你喝髒水、舔屎舔尿……

---

我 35 歲上男人就死了，當時我最小的孩子才七個月。我一個寡婦拉扯四個孩子，立志不嫁人，憑自己的勞動過活，寧可要飯吃也不分地主的一點東西，不吃救濟糧。有一回救濟了我三塊錢，我給他們送回去了。我們公公弟兄四個，大姑姐四個，還有我們倆口子，都給汪地主家做活。人家對我們很好，過節給長工們買帽子和毛巾，長工們吃餅子和幹白菜，他們都沒有我們吃得好。後來鬥地主，讓我們男人上臺訴苦，我男人盡說地主好，人家把他轟下來不讓說了。我就說，人家日子好過是自己過來的，牙縫裏刮的。你種人家的地，為什麼不准人家收租子，現在你不交公糧行嗎？（如果不交）那就是窮有理，耍混。汪地主心眼兒很好的一個人，活生生讓他們刺死了。先是綁在板凳上，灌水，又往死裏打，幾天不給飯吃，後來又用鐮刀割下他的耳朵，就這樣折磨死了。我就說不當這麼幹，都分了人家的家產了，人家又沒害過人，為什麼弄死人家。地主柳士魁更冤枉，成年捨不得醬油醋，沒享過地主的福，還幫八路軍做事。他家閨女沒出閣，有一個八路軍被抓住，這個閨女就認下他做丈夫。

可是後來整得人家多慘，叫柳士魁整天掃大街。我就說好心眼能够看得見，後來人家都平了反，後輩人都在城裏做了事。柳地主死在北京，可是大年初一火葬場關門，他就能夠被運回家裏埋了。這就是好報。他家現在還是好心眼，住他的房白住，種地也白種。 汪 氏

---

## 黨員的孩子寫反標 楊文培

生產隊會計楊衛東是石橋公社學習《毛選》的積極分子。一天，楊衛東背著糞筐撿豬屎糞，在村後大橋邊一堵尚未完工的土坯牆上發現幾個字。蹲下細看，嚇出一身汗，上面寫的竟是“打倒毛主席！”是誰活得不耐煩了！楊衛東渾身一顫，頭皮發麻，丟下糞筐向大隊革委會跑去。革委會主任詹保華聽到報告，臉都嚇變色了，滾下床，趿著鞋，跨上自行車，到公社人保組報案。

1968年4月13日下午，縣公安局組成的專案組殺氣騰騰地進駐楊家村。他們先在進出村子的路口布下崗哨，對所有過往行人進行嚴密盤查，同時對全村的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及其親友進行登記排查。剎那間，楊家村仿佛變成了反革命的大本營，村民人人自危，足不出戶，一種大難來臨的恐懼籠罩全村。

反標大約是用樹枝在未幹的土牆上劃成的，字體鬆散，七歪八扭。專案組由此認定，反標非大人所為，乃出自小學生。一般小學生都是毛澤東思想雨露滋潤下的新少年，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怎麼可能寫“打倒毛主席”呢？肯定是地富反壞分子家的子女所為！

楊家村有三個生產隊，四十來戶，二百多人，有三家地主，一家富農，三個偽政府人員，一個反革命，一個壞分子。在這些階級敵人中，文化水平較高、情況較為複雜的是我們家。我大舅是大刀會堂長，解放後被鎮壓。我二哥是國民黨青年軍教官，被解放軍俘虜後當了解放軍的文化教員，後來被清洗回家。我本人是“叛國投敵分子”，被判三年勞教後轉為管制。二哥有兩個十二歲的雙胞胎男孩，正讀小學。那天，四個公安陰沉著臉來到我住的茅屋，先翻箱倒櫃搜查一番，一無所獲。接著，一個戴墨鏡、拿筆記本的人對我進行挑釁訊問：“你叫楊茂生吧？你住在這裏挺自在啊，你們村上發現反動標語你知道嗎？”我回答說：“挺自在這是你的感覺，我連日來都在鄉里做義務工，哪里知道村上發生的事！”另一個人幫腔說：“你別裝糊塗！村上人說那反動標語是你二哥家的兩個雙胞胎幹的，是你指使他們寫的！”

專案組的專橫跋扈我早就領教過，我沒好氣地回應道：“說這種話的人頭腦過於簡單！如今我們這些分子被整得焦頭爛額，自顧不暇，哪還有心思教別人寫反標來引火燒身？我看寫反標的人未必是地富反壞的子女，說不定是哪家孩子吃飽了撐得慌，信手塗鴉而已。”專案組橫挑鼻子豎挑眼，總想找出與反標有聯繫的破綻，其中一個指著我家大門上的對聯說：“你這‘蒼山勁草，恪守魯風’是什麼意思？不就是變相的反標嗎？”

專案組進住楊家村後，大隊革委會為他們安排吃住，選派一名廚師為他們燒飯做菜。烟酒食品都憑票供應，公社革委會特意給食品站和供銷社打招呼，特別供應。一個星期過去了，專案組沒搞出任何結果，一怒之下，將我二哥家的兩個孩子弄到大隊，分開關押，引誘逼供。一次，專案組酒足飯飽之後，又對兩個孩子進行威嚇逼供。四個男人正襟危坐，陰沉著臉，怒目圓睜，像廟門口的四大天王，他們的對手是一個瘦骨伶仃的孩子。那孩子距他們

二米之外，打著赤腳，兩手不停地搓弄著衣角，一臉的恐懼與無奈。這不是三堂會審，而是貓戲老鼠。四人中那個戴墨鏡的人開腔了：“你小把戲想好了嗎？我早就跟你說過，像你們小孩子做錯事是不負法律責任的，只要你說出背後叫你寫反標的大人就放你回去，你聽懂了嗎？快點說出來吧！”小孩子低著頭惶惑地說：“我真的沒寫，也沒人叫我去寫。”孩子話音未落，坐在旁邊的一個漢子猛拍一下桌子，大聲吼道：“再不老實把你吊起來！還有老虎凳伺候，看你說不說？”孩子哇的一聲嚇哭了。

另一間房裏進行著同樣的遊戲。被誘供的孩子是雙胞胎裏的老小，脾性似乎比老大倔強。誘供者用手指敲擊著桌面，面帶微笑地說：“都說小學生最聽毛主席話，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呀——你哥哥都承認了，你幹嘛不說啊？”這小子挺了挺胸，眨巴著眼睛說：“我有個要求，答應我就說……”專案組的人一陣驚喜，又感到好笑，這小毛猴還提先決條件，便說：“什麼條件你說出來！”小子咧咧嘴巴拍拍肚子說：“我想吃你們吃過的飯菜，最好多給點肉！”專案組的人腰都笑彎了，一邊罵他是饞貓，一邊分付廚房端來飯菜。這小子把好菜好飯吃下肚，往地下一蹲，說是肚子疼，耍起賴皮來。任憑專案組罰跪罰站揪耳朵，他都裝出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振振有詞：“我反正沒有寫，也沒人教我寫。毛主席說‘不殺頭給飯吃’，你們吃魚吃肉我也饞得慌啊！”專案組哭笑不得。

半月過去了，破案工作毫無進展。一天，一個老刑警向專案組建議：“一個小毛賊寫的幾個字就把你們忙得翻江倒海，你們可真是酒囊飯袋，幹嘛不校對筆迹呢？把小學生擄在一起，叫他們寫寫同樣幾個字，不就真相大白了嘛！”專案組如醍醐灌頂，一個個拍著腦袋說該死，居然連這最基本的辦法都忘了。

第二天上午，他們將村裏的學生全部擄進教室，每個學生髮一張紙，讓他們寫“毛主席萬歲”和“打倒劉少奇”。其中一個小學生未進教室便哭哭啼啼，因為是黨員家的孩子，老師還以為他哪里不舒服，不料他進來就跪在老師腳下哇哇大哭。老師問他怎麼了，哪里不舒服，他渾身顫抖著說：“我沒有不舒服……老師我怕我怕呀！”老師鼓勵他說：“你是共產黨員家的孩子，你怕什麼？”孩子結結巴巴地說：“那，那個標語是，是我寫的！”在場的人都驚呆了！老師問他為什麼不喜歡毛主席，孩子漲紅著臉說：“我，我不知道……我是寫著玩兒的……”

一場驚天動地的反標事件，因為是黨員家的子女所為，就烟消雲散不了了之了。

## 入社之劫 劉英

我家是地主，父親保定中學畢業，母親是下河西劉家的姑娘，更是頭號地主，自家有學堂。母親念過私塾，我從小在母親懷抱裏就聽她給我背誦《三字經》、《百家姓》。母親從不燒香拜佛，而是只要有飯吃就施捨，常說“在家敬父母，不必遠燒香”，“受屈人長在”，“好人有好報”。

1958年，我12歲，正上小學。那天放學回家，一進門，我驚呆了，院裏擺滿了大立櫃、八仙桌、條案、鍋碗瓢盆，一片狼藉。屋檐上茅草迎風抖著，門上白紙打著叉，帖了封條，上寫“1958年7月10日封”。鄰居二德告訴我：“你家搬到郎五莊去了。”原來我家被掃地出門了，父親用一對筐挑走了整個家。“郎五莊在哪兒？”我神志有些恍惚。“在那邊，你趕緊走吧！十裏路呢。”我沒有哭，一邊打聽方向一邊走。路上遇見也被掃地出門的田慶，

他說：“你家沒去郎五莊，搬到申莊去了。”我一聽，打了個寒戰，這麼多路白走了，泪水終於流了下來。

我一邊放聲哭，一邊往申莊趕。天漸漸黑下來，路已看不見了，大河攔路，也沒有橋，只能淌水過河。水漫到我的胸口，水很涼，心更寒。不知道怎麼找到我母親，我哇地一聲大哭，越哭越傷心。摸到申莊，我還在哭，房東大嬸折一根甘蔗給我，才勉強止住哭聲。

我們高村一夜成了共產主義，地主富農全趕走了。大街上安了電燈，晝夜通明。老人進了敬老院，小孩子進了托兒所，學生在學校吃住。那年八月初八，母親讓別人給我捎來親筆字條，讓我當晚務必回去見她一面。當時我們雖是上學，但每天必須砸礦石，大煉鋼鐵，衛星上天。我見到母親的字條，沒敢作聲，捱到天黑，奔向申莊。那天天真黑，伸手不見五指，路兩邊全是青紗帳，被風吹得沙沙響，心裏直發毛，遠處還有貓頭鷹哭一般的叫聲，我的額頭上汗珠子直往下滾。

申莊村死寂無聲，人們都睡了，我的家亮著油燈。“媽，”我小聲叫了一聲。“我的寶貝，沒嚇著吧。”母親摸著我的頭說：“媽在這兒呆不下去了，我得逃難去。”“去哪兒？”

“東北，你二姐家。我走後，只剩你一個了，我不放心。”媽掉了眼淚。我安慰她說：“媽你走吧，我不怕，他們能把我怎麼樣呢。”媽沒再說什麼，輕手輕腳地收拾東西，怕房東聽見走不成。令人費解的是，媽把幾個銅碗悄悄地放在坑洞裏。

我們虛掩上門走了。我一邊走一邊想，整個家都完了，幾個銅碗放在人家坑裏幹啥？人家一拆坑，還不是人家的？但我沒說，一輩子都沒提這事。

我們母子深一脚淺一脚，母親是裹腳，哪里走得動。到了固城火車站，天快亮了，我送媽上了火車，灑淚目送，直到看不見為止。

火車站離高林村（學校所在地）還有十裏路，得趕緊回去，露了餡就壞了。趕到學校，剛好趕上開飯。從那以後，我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父親去了北京做苦力，母親去了東北，三姐正上初二，輟學去了青海奔大表姐，大哥在保定上學，一家人各奔東西。他們全走了，地主的帽子壓在我一個 12 歲的孩子身上。我的老師張口閉口“地主崽子”，村裏開四類分子會，我得去參加。會上有人講：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你們這些地富反壞、反革命分子統統到郎五莊、申莊去了，因為現在我們是共產主義新農村，怕你們興風作浪，容不得你們這些壞蛋。

## 海晏叛亂的回憶 鐵穆耳

加布桑昂熱的回憶：

剛解放那陣子，青海湖北邊的沙窩裏狼太多，政府組織二三十歲的年輕牧民成立民兵打狼隊，公安局長、副縣長、副書記都參加了。那時我也是民兵，上面定下任務了，不去不行。到了 1958 年，打狼隊全部被說成是叛亂分子，全部抓了。牧民家裏都有槍，這是牧民的習慣，哪怕窮得騎一匹老馬，也要背一杆槍。1958 年 4 月，牧民家裏的槍全部沒收了，接著開始抓人。大于千戶是 5 月份抓走的，他的幾個兄弟也都抓走了，部落裏的百戶也抓完了，後來他們全部死在勞改農場裏了。財產全部沒收，牲口沒收後全部趕到公家辦的牧場裏。4



月5月6月7月8月一直都在不停地抓人，我們大于部落每家每戶都抓，半個部落抓完了。後來，他們來抓我，幾個小夥子用麻繩捆。就那一捆，多少人被捆成殘廢。麻繩捆得太緊，血脉一點都不通啊，一下子就腫起來了。貝勒旗的佛爺捆死了，哈熱加參亞烏爾的人捆死了。我們兄弟6個，我和兩個哥哥抓走了，叔伯兄弟們都抓走了。我的一個哥哥被捆得胳膊都斷掉了，成了殘廢，後來死在勞改農場。一個兄弟跑的時候被看守用槍打死了，如果活著的話，有78歲了，他屬蛇。我的叔叔也被捆死了。

我是27歲上抓走的。剛開始時，一天到晚用麻繩捆，用柏木棍打，烤箱上烤，整整一個多月，讓你承認叛亂了，把你的槍拿出來。我回答說，我可以不念經，也可以不煨桑，可是我真的沒有槍，再打我我也找不出一杆槍。我們哪有啥叛亂啊？在部落裏我啥官也沒當過，幾輩子就是放羊、放牛，肚子剛剛能吃饱。給我判了10年的刑。

我們被抓掉後，剩下的人也不容易啊！上面逼著他們搬到別處。那時候看樣子我們所有的人都活不成。我們在格切勞改農場、賽什克勞改農場裏掙扎，一個個地死。抓掉的女人們全在西寧的一個女子勞改農場，果洛、玉樹、黃南、海南、海北和海西的女犯全部都在那裏。剩下的沒有抓的人呢，他們在默勒的大雪、蘇勒托萊的大風裏餓肚子，死了多少人啊。千戶家抓得只剩下一個僧阿佛爺和兩個奶奶，佛爺和一個奶奶餓死了。我的大媽、大伯和他們的兩個丫頭，我姐姐的兩個娃娃都餓死了。老漢、女人、娃娃們死得多，那是1959年的二三月份，哈薩墳那裏死了100多人。

我勞改了四五年，31歲時釋放回來了。在勞改農場裏我得上了胃病，眼睛被打壞。和我一起抓的人，我最熟悉的有9個人，回來的就是我和告白，還有一個女的。這個女的回來後死在托萊牧場了。我呢，勞改回來就在托萊當工人，是管制分子，我們的娃娃們也不能上學。

1977年又把我抓到看守所，審問挨打了一兩個月，罪名是不滿共產黨，給佛爺磕頭了，點酥油燈了。打了幾天之後，公安局的高局長說：“看起來我們虧待你了，以後再慢慢照顧你吧。”就這麼給我攔了一輛過路的拉石棉的卡車，把我的鋪蓋扔到卡車上，讓我坐卡車回來了。我挨的打，我心裏的冤枉，給誰說哩？

尼泊的回憶：

我正在夏季牧場上剪羊毛，過來了一群民兵和幹部，喊我和貝利達古、朶木道三個人的名字。我們走過來，幹部喊：“你們把剪子放下。”我們放下剪子，幾個民兵上來，把我們三個人的胳膊擰到背後銬了起來。我不知道我們咋了，衣服也不讓我們取，額濟（母親）也沒有見上就押上走了。

手銬在背後，吃不上飯，我們趴在地上，像狗一樣用舌頭舔著吃。我被抓掉後，整整審問了18天，白天黑夜戴著手銬挨打。當過哈勒景鄉鄉長的散白勒被管教們捆在凳子上，上了八段錦（酷刑名稱），成了殘廢。他們硬說我們參加叛亂，說我們開會吃飯商量要打共產黨，說我們是反革命。天哪！我們老百姓哪有過這個想法？我們窮牧民打共產黨幹啥？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都打不過，我們哪有打共產黨的心啊？我知道啥呀？你看我的手，手腕手指都變形殘廢了。我實在忍不住，他們說啥我就承認啥，我被判了12年的刑。我們海晏的蒙古人老漢們差不多抓完了。怎麼說哩？有100個人的話，要抓90個。

判了刑後，我被趕到賽什克農場，一天二兩稀飯。犯人開始餓死、渴死、病死。後來，又把我們調到伐木隊，40多個犯人在賽什克的頭道溝、二道溝、都蘭貢巴一帶砍伐樹。每個人一天要砍伐三四方木頭。我拼了命地砍伐木頭，用肩扛木頭，兩個肩頭受了傷，到現在活動都不方便。完不成不讓吃飯，飯也就是那二兩稀飯，一個拳頭大的饅饅。一次，有些人去拾人家營盤上的骨頭回來熬湯喝，也不知道那是啥骨頭，吃了喝了的人中毒死了20多個。吃麥草死了一部分人。伐木隊的40個人，死的就剩我和一個叫楊正的人了。這些死掉的人

對上面彙報的時候，都說是病死了。

後來農場讓我放牲口。我有幾個親戚在賽什克農場裏，不知道他們餓死了沒有，我想去看一下他們。我和一個伴兒從早晨 8 點騎著馬走，從額爾德尼熬包的崆帖上去，就看見山脚下灘上埋著餓死的犯人，每個死人的沙堆上插著個木橛子或是扔著一塊磚，上面寫著名字。有的寫名字的木橛子讓犯人們取暖燒火了，所以也就看不出死掉的人是誰。我讓我的伴兒看上面有沒有我們的熟人親戚的名字。我一直走到 12 點還是埋死人的沙堆，前面一堆堆的埋死人的沙堆還看不到頭。

1964 年提前釋放了我，我的命大，算是活著回來了。到托萊牧場時，我看見我的額濟還活著，姐姐餓死了，還有一個妹妹也餓死了，賬篷沒有了。上面讓我去放馬，一開會我就要去挨批鬥挨打。那時候死一個人算個啥呀！我們一起的道爾基、索南措、馬民吉爾、達爾基、仁青措都被逼得自殺了，我算是又活下來了。

## 鄉村大游鬥 王俊義

河南省西峽縣丁河公社木寨大隊，與相鄰的石門、上店、茶峪、奎文、簡村、河南一起，共七個大隊，合成丁河公社東區。簡村大隊的大貴寺學校是丁河公社東區的中心學校，槍斃西峽縣幸福黨頭子李順堂，就是在這所學校開的公判大會，七個大隊的學生都參加了。我們木寨大隊的趙宗堯，也是幸福黨頭子之一，被判處十一年徒刑，後來平反了，說是假案，可是李順堂已被槍斃，再也活不過來了。當時老師讓我們小學生寫作文，題目是“階級敵人就在我們身邊”。老師啟發道：我們大隊就出了一個幸福黨頭子，想想多麼可怕——假若他們成功了，我們就要人頭落地。

那時七個大隊經常搞游鬥運動，游鬥的階級敵人分四類，共有三百多人。第一類是罪大惡極類。游鬥時每人扛一個稻草扎的劉少奇，肚子裏裝滿石頭塊。這樣的劉少奇有八十斤重，抗的時間長了，真是受不了。女階級敵人扛的是王光美稻草人，也有六十多斤重。兩個地主的小老婆本來就瘦弱，扛這樣重的王光美稻草人，壓得歪歪斜斜，不堪重負。他們頭上還戴著一個紙糊的尖帽子，帽子上貼著兩張紙條，上面寫著打倒他們的標語和侮辱她們的稱號。

第二類是抗拒改造類。游鬥時，頭上戴著高帽子，肩上扛著一個內裝較少石頭塊的稻草人劉少奇，有四十多斤重。女階級敵人扛的王光美稻草人，上麵糊一層白紙，畫著各種醜化王光美的圖案。有的大隊別出心裁，在王光美身上畫一條美女毒蛇。第三類是罪惡較輕類。他們不扛劉少奇稻草人和王光美稻草人，只是頭上戴一頂尖帽子，手裏拎一個守法公約牌子，上面寫著必須遵守的規矩：第一，老老實實改造，低頭認罪；第二，家裏來了客人要報告；第三，出門請假。第四類是最沒有民憤的，不戴高帽子，只拎一個守法公約牌子。在階級敵人隊伍裏，能混到這個待遇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些鄉村階級敵人，有來自舊社會的地主富農分子，有當過土匪排長的反革命分子（連長以上的土匪都槍斃了），有強奸犯刑滿之後的壞分子，有判過刑的、開除公職的或保留公職的各種回鄉右派，有牛市上倒賣耕牛的投機倒把分子（經紀人），還有小偷小摸。一些人因愛說牢騷話，或因文化水平不高，不小心說了一句半句毛主席的壞話，也被劃為階級敵人。

走在游行示眾隊伍最前面的是兩個民兵，扛著沒有子彈的步槍，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一二三四類階級敵人跟在民兵後面，走在最後邊的是另外兩個民兵，也扛著沒有子彈的步槍。七個大隊的治安主任是游行隊伍的監督者和管理者，跟在隊伍之外。

游行示眾要進行七天，一天一個大隊。一個大隊有七八個生產隊，階級敵人每到一個生產隊，本大隊的治安主任就拿起廣播筒，對著組織好的人群，把自己大隊的階級敵人逐個介

紹一遍，接著讓第一類階級敵人低頭認罪，把自己在新舊社會犯下的罪惡檢查一遍。扛槍的民兵放下槍，槍托著地，舉起一隻手臂高呼打倒這個敵人的口號，再高呼：“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後，游行示眾的隊伍就去下一個生產隊。

階級敵人都要自帶乾糧，條件好的會帶酸菜玉米餅子，條件差的帶的是蒸紅薯。到了飯時兒，民兵和治安主任吃安排好了的簡單飯菜，階級敵人則放下劉少奇、王光美和高帽子，坐在井臺上啃自帶的乾糧。有時民兵會對某個階級敵人說：“XXX，你的玉米餅子給我一塊。”那階級敵人就給他一塊。假若給玉米餅子的是第一類階級敵人，民兵也會說：“我靠，你都不會把裏面的石頭取一塊扔了。”階級敵人就悄悄取出一塊石頭，扔到看不見的地方。

啃了乾糧，民兵找來水桶，從井裏打出一桶水，讓階級敵人擰著屁股，對著水桶喝一陣。吃了喝了，大家休息一會兒。這時，有些有文化的階級敵人會很有分寸地講講流行的比較文雅的笑話，讓整個敵我群體都輕鬆一會兒。有一回治安主任問群眾：“敵人多不多？”群眾們都說：“多。”“敵人們壞不壞？”大家都答：“壞。”有的階級敵人也跟著回答“壞”，惹得治安主任哈哈大笑，罵道：“我日你們娘，哪有自己跟著說自己壞的？”

七天之後，大游行示眾結束了。四個月之後，接著再來一次。那些本來互相不認識的階級敵人，如今都互相認識了，再一次游行時，他們都能叫出對方的名字。

這一幕已經過去幾十年了，參加游行的人大部分已經不在人世，他們經歷的時代羞辱也成為民間歷史，漸漸淡忘。我們不禁發問：假如歷史重演，下一次參加這樣羞辱游行的會是誰呢？

---

1944 年山西晉城土改非常左。當時在文化單位（主要是小學、初中或師範學校）搞階級清洗運動，學生中成立了各種名目的組織，最主要的一個叫“翻先隊”，查教師三代甚至三代以上，看他們的先人是屬於地富、中農還是貧雇陣營。只要沾上地富，就堅決清洗，于是大量教師被清洗下來，逐回家勞動，有的是胸前挂上“地主”、“惡霸”的牌子監督上課。這種做法在學生中發展得更為惡劣，比如地富子弟要背貧雇農子弟上學，貧雇農子弟可以尿地富子弟的頭上，名曰“洗腦筋”；地富子弟要替貧雇農子弟做作文、演算草、放牛、割草，女的要替他們紡花、做鞋，都有定額，完不成定額者開會鬥爭；考試成績，要根據成分扣分加分，貧雇農子弟加五分，地富子弟減五分，個別地方甚至規定，貧雇農子弟一律八十分，中農子弟四十分，地富子弟十五分；學校出告示，翻先隊隊長（學生）名字在前，校長名字列後。

---

南京青年陳卓然      毅 然

陳卓然，1968 年南京市八中高中畢業，赴江蘇省洪澤縣人河公社插隊落戶。他與插友蘇小彬(蘇曉兵)經常交換對文化大革命和接受再教育的看法。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有人散布說，潛伏在南京的敵人有幾個師，反革命多如牛毛。浦鎮車站某工人因說“毛主席紅光

滿面，林彪骨瘦如柴”，被定為反革命，判刑五年。南京鐵路建築段某工人，在一座土窯西側工作，窯裏冒烟，因為刮東風，弄得他滿身烟灰，他說要刮西風就好了，于是被扣上與“東風壓倒西風”的毛語錄唱反調，判處管教三年。此類冤案，相當普遍。

1970年2月12日，共產黨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新華日報》頭版重新發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語錄，並配發評論員文章《迎頭痛擊階級敵人的進攻》，號召“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陳卓然、蘇小彬決心起來鬥爭。當天夜裏，他們剪下報紙上的字，拼成六條標語，貼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標語的主要內容有：“查金華烈士永垂不朽！”“我們要真正的馬列主義！”“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查金華是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一位殉難者，罪狀是組織馬列小組，用馬列主義的觀點質疑現行政策。

因知情者告密，3月6日，陳、蘇被捕。4月28日公判大會，陳、蘇等人鎮定自若。當看到那個賣友求生的告密者時，陳卓然怒斥道：“總有一天要跟你算賬！”大會宣布陳卓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蘇小彬有期徒刑15年。同案受牽連的還有陳卓然的女友王茂雅、陳卓然的妹妹陳美麗等人。後來，王茂雅精神失常自殺身亡，蘇小彬在勞改期間被機床弄瞎一隻眼睛。

## 《知青之歌》案 蘇 北

1969年，一首歌曲在江蘇省江浦縣一個南京知青的小茅屋裏誕生。從此，它在知青中輾轉流傳，從寒冷的塞北草原到西南的熱帶雨林，從西北的戈壁沙磧到東海之濱的鹽鹼荒灘，哪里有知青栖息的足跡，哪里就可以聽到這首歌的歌聲。這就是曾在全國知識青年中普及最廣的《南京知青之歌》。這首知青之歌帶給作者的不是鵲起的聲譽，而是沉重的鐐銬、無情的批鬥、暗冷潮濕的牢房和死亡的陰影。

歌曲作者任毅，又名任安國，南京市八中六六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12月到江浦縣永寧公社插隊落戶。最初，知青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必要性深信不疑，每天起早貪黑苦幹。不久他們發現，幾乎所有生產隊在給知青蓋房時都偷工減料，農民其實並不歡迎他們的到來。一般農戶蓋房都要七架梁，給知青蓋房時只用五架，剩下的用知青安置費購買的木料被隊幹部私分。

1969年夏收之際，任毅在門上貼了這樣兩段語錄：“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是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場合說過的兩句話。隨著上山下鄉初期狂熱激情的消退，失望情緒在知青中蔓延。1969年5月下旬，任毅在一首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鄉》（詞作者是南京赴新疆的知識青年高世隆，據《豐收農場之歌》的曲調譜成）的知青歌曲基礎上，重新填詞，並對原曲做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創作出一首表達知識青年思鄉情緒的新歌《我的家鄉》：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啊長虹般的大橋直插雲霄橫跨長江，威武的鐘山虎踞在我的家鄉。

辭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載入了青春的史冊一去不復返，啊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多麼漫長，生活的脚步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起伴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而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啊用我們的雙手綉紅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任毅的創作一完成，立即被人拿去傳抄。此時，江浦縣和蘇北寶應縣等地遭遇特大洪水，有些知青返回城市，另有部分知青因經濟上不能自給也倒流回城。各地知青返城後，相互往

來增多，出現了廣泛傳抄、學唱《我的家鄉》的情況。爾後知青又陸續返回農村，這首歌又在未回城的知青中進一步流傳。

8 月，蘇聯莫斯科廣播電臺的華語廣播播放了這首歌，稱之為《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當時正值中蘇兩國邊境爭端和意識形態分歧非常激烈的時期，莫斯科電臺此舉無異于將任毅推入絕境。一個月後，南京街頭的大批判專欄開始口誅筆伐這首歌，將其性為反動歌曲，“說出了帝修反想說的話，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聲音”。

11 月，江浦、寶應等縣開始組織人員對《我的家鄉》進行批判。任毅的母校在組織力量追查歌曲作者的同時，將情況向《新華日報》作了彙報。任毅預感到“自己的青春將要葬送在這莫名其妙的歌聲中了”，就向公社、縣負責知青工作的幹部承認了自己是《我的家鄉》的作者，寫了書面檢查。

1970 年春節前夕，上海市普陀區回滬過春節的部分知青在里弄哼唱這首歌，被逐級彙報到上海市革委會。2 月 12 日，上海、南京兩市公檢法軍管會開始對《我的家鄉》一案進行聯合調查，南京市文教局根據市委書記的指示組織了專案組。2 月 19 日，陰曆正月十五元宵節的當晚，武裝軍人以“創作反動歌曲，破壞知青上山下鄉，干擾破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戰略部署”的罪名，將任毅羈押于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看守所，作為重大反革命專案進行審理。

審訊者逐字逐句審查這首歌曲，極盡牽強附會、上綱上綫、羅織罪狀之能事。“告別了媽媽，再見了家鄉”，是燕雀的啾啾哀鳴，是留戀城市，是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軟抗；“金色的學生時代”，是為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的 17 年鳴冤叫屈；“未來的道路”，是散布悲觀情緒，是對祖國前途的惡意誹謗；“生活的道路”，是對革命者四海為家的反動，是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惡毒攻擊；“跟著太陽起”，是渲染農村勞動的艱苦，是對廣大貧下中農大幹社會主義，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披星戴月勞動場面的惡意中傷；“光榮而神聖的天職，我們的命運”，實質是把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說成無可奈何，形勢所逼，是悲觀情緒的進一步流露，再一次為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用我們的雙手”，是用革命詞藻掩蓋其“憧憬”資本主義復辟；“一定會到來”，即資本主義的明天一定到來，充分暴露了希望資本主義復辟的迫切心情。

任毅下鄉期間曾說過：“現在學生天天學政治學毛主席語錄，學不到文化知識，是挂名的中學畢業生，今後中國科學技術靠他們怎麼行？”“美、蘇宇宙飛船上天，我是十分關心和羨慕的，人家都到月球上去了，我們還在一鋤一鋤地幹活，太落後了。”辦案人員指控他這是攻擊社會主義制度。

3 月 21 日，《新華日報》社革委會向江蘇省委呈送了關於《我的家鄉》出籠的專題報告，並擬定了批判《我的家鄉》的報道計劃。與此同時，南京市組織幾十場批判任毅的大會。從被抓到 8 月 3 日被判決，5 個月裏，任毅 3 次被拉到公判大會上為死刑犯陪綁。在那種恐怖的濫殺氣氛中，所有陪綁者事先并不知道究竟誰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5 月 20 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向市委呈送《關於現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結案處理報告》，稱任犯出身反動家庭，長期收聽敵臺廣播，散布反革命言論，污辱寶書寶像，發展到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流毒深廣，罪大惡極，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經研究決定，判處現行反革命犯任毅死刑，立即執行。6 月 6 日，南京市公檢法軍管會報省委審批。據說省委主要負責人考慮到任毅年紀輕，經歷簡單，親自作了批示，決定判其 10 年徒刑。8 月 3 日，公判大會宣布了這個判決。1979 年，任毅走出牢獄，重見天日。

---

## 王亞卓致信黃帥案 京 麾

1973 年 12 月，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一小五年級學生黃帥，因與班主任有隙，經家長捉刀代筆，給《北京日報》寫了一封信，用誇大的語句敘述了與班主任發生矛盾的緣由，末尾反問：“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12 月 12 日，《北京日報》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發表了黃帥的信和日記摘抄。日記摘抄是報社根據反“師道尊嚴”的需要摘編而成的。12 月 28 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北京日報》發表的黃帥來信和日記摘抄以及編者按，又另加按語，贊揚黃帥“敢于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開火”。此後，各地報刊、電臺、電視臺廣為傳播。國務院科教組用電話通知各省、市、自治區教育局，組織學校師生學習這些材料。全國各地許多教師被迫作檢查、受批判，一些學校桌椅被拆毀，門窗被砸壞，玻璃被打碎，學校財產遭到損壞。

1974 年 1 月，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十九團政治處的三名知識青年王文堯、邢卓、恩亞立，在閑談中共同流露出對黃帥所作所為以及新聞媒介藉此煽風點火的不滿。他們認為，對黃帥的贊揚加劇了師生間的對立，學生動不動就給老師提意見，簡直成了“學道尊嚴”；《北京日報》不應該刊登這封信。三人決定給黃帥寫一封信，闡明自己的觀點，對黃帥進行教育，替老師們說幾句公道話。

1 月 14 日，由邢卓執筆寫了一封給黃帥的信，信末落款是“內蒙古生產建設部隊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王亞卓，系從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1 月 29 日，王亞卓收到了黃帥的回信，信的口吻比較謙和。2 月 21 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了經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圈閱同意的黃帥給王亞卓的公開信。此公開信一反上封回信中的謙和口吻，稱王亞卓的來信是“資產階級老爺的悲哀嚎叫”，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語言”，“把革命師生引向分裂”，“引向劉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邪路”。《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還說這是“教育戰綫兩條路綫兩種思想的鬥爭”。此後一個多月，中央和省市級地方報紙發表近百篇批判文章，甚至連備受侮辱的黃帥所在班的班主任也違心地加入圍剿王亞卓的行列。

隨著公開信的發表，對王亞卓的政治迫害也開始了。2 月 12 日，即公開信發表的第二天，專門處理王亞卓事件的工作組就開到十九團，並且做出“發動群眾，掀起批判王亞卓右傾思潮的高潮”的決定，指出“王亞卓是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急先鋒”，“批林批孔聯繫實際就是批王亞卓”。公開信發表時，王文堯正在天津家中休假，兵團拍發加急電報令其火速歸隊。王文堯一出火車站，立即被工作組用專車接到團裏隔離。邢卓、恩亞立也同時被隔離。給黃帥的信未留底稿，工作組查問信的內容，3 人分別憑記憶追憶，出入很大，多日不能落實。工作組反復查問 3 人之外還有什麼人參與、指使，未得滿意結果。

2 月 16 日，十九團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錯誤思想檢查認識的報告》。同日，兵團黨委擬出《關於二師十九團政治處“王亞卓”寫信攻擊革命小將黃帥問題的報告》。3 月 1

日，二師黨委上報了《關於對王亞卓同志嚴重錯誤的檢查認識》。與此同時，對王亞卓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批判，給他們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攻擊新生事物”，“把矛頭對準黨中央、毛主席”，“氣焰囂張，立場反動”等幾十頂政治大帽子，甚至把他們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論，稱“孔老二要複禮，林彪要復辟，王亞卓要復舊”。

20 多次批判會後，4 月 5 日，王亞卓被分別送到三個條件最差的連隊進行勞動改造。中共黨組織給予王文堯黨內警告處分，恩亞立團內警告處分，邢卓團內嚴重警告處分。王亞卓的家屬也因此遭到種種歧視、打擊。邢卓的妹妹只有 14 歲，正上初中，聽說哥哥被打成反革命，精神受到極大刺激，積郁成疾。1974 年 9 月，邢卓獲准回家探親，妹妹哭著問他“挨整了沒有？”“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該不該同你劃清界限？”說罷昏倒在床，送到醫院一直昏迷，18 天后死去。體弱多病的邢母聽說兒子被打成反革命，痛苦萬分，逢人就講：“邢卓只寫了那麼一封信，怎麼就遭那麼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女兒的死，更是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數日後，邢母悲憤而亡。

---

所謂的抄家，往往要沒收和毀壞所有財產，即使是孤寡老人，家裏的一切也都要搶走，連碗筷、被褥都不剩。抄家還伴隨著打人，手段殘忍至極。抄家時最常見的項目是剃陰陽頭，尤其見了婦女更難放過。說是剃，其實是連剃帶薅，有時甚至乾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連頭皮都撕下來，街上常見耷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在游街。更殘忍的是還要“洗”頭，用濃碱水往傷口上澆。東四一帶有一家“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沙灘街上，一群男紅衛兵用鐵鏈、皮帶把一個老太太打得動彈不得，一個女紅衛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上蹦下，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崇文區欄杆市一帶發生一起“階級報復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李姓“房產主”，據說用菜刀威脅了看押他的紅衛兵，被紅衛兵打死。各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立即瘋狂報復，數千名身著軍裝、手持凶器的打手們乘著公交專車彙集到出事的街道，在這一帶“血洗”七天，無數人慘遭毒打，許多人死于非命。紅衛兵在崇文門附近抄一個“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婦），強迫附近居民每戶拿來一暖瓶開水，從“地主婆”脖領灌下去，直到肉被燙熟。幾天後，被扔在屋裏的“地主婆”的屍體上爬滿了蛆蟲。

---

## 大興大屠殺 京 訖

1966 年 8 月 26 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支持鼓勵殺人的講話。從 8 月 27 日至 9 月 1 日，全縣 13 個公社，48 個大隊，先後殺害 325 人，最大的 80 歲，最小的 38 天，有 22 戶人家被殺絕。屠殺最有名的是大辛莊公社，指揮屠殺的是高福興、胡德福。這兩個人現在還活著，據說在縣城開店鋪。

大辛莊的慘案發生在 8 月 31 日夜裏，一夜殺了 100 餘口人，當地人稱為 831 事件。過來人老韓回憶，大辛莊的殺人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鋤刀鋤的，有用繩子勒的，對嬰幼兒更殘忍，踩住一條腿，劈另一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兒。

屠殺行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的大隊先把要殺的人集中關起來，再一個個叫出去，出去一個殺一個，被關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殺光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上電綫的，人一出來就觸電而亡，沒有任何聲響，順利地將其全家殺害。老人和小孩兒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凶手向他們身上揚土，抱在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有的大隊幹得很隱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許多社員發現來幹活的人突然少了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間死了那麼多黑五類。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葦塘裏，後來乾脆把活人往葦塘拖，用繩子套在脖子上，連拖帶勒，到了葦塘人也斷氣了。靠近公社的好幾個大隊，都把黑五類殺絕了。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用鋤刀鋤了 16 個人，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鋤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裏，直到把井塞滿。後來，井裏往外泛白沫，發著惡臭，村裏人把一部分尸體撈出來埋了，然後把井填了。

那時一個勁兒宣傳毛澤東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麼“打”，什麼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鬥也是“打”，拳打腳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徹底打死也是“倒”。

韓宗信一家五口就慘死在那天晚上。韓家是中心大隊人，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和兩個十多歲的兒子，仨人都是中學生。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為窮，四歲時送給了本公社北賀大隊的一戶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賀村文明一些，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韓宗信地主出身，從小離家，參加國民黨的軍隊，後來投降，1955 年回鄉，有羅榮桓簽發的《起義證書》。韓宗信把證書懸挂在屋內上方，希望它能給自己帶來一點保護。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有人檢舉韓宗信藏槍，拘留了幾十天，被害前幾天才將他放出來。8 月 30 日，老韓的內侄聽說姑父獲釋了，特意去看望他。到了第二天，却得到消息，姑夫全家都被打死了。那些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莊來，怕給宰了。

落實政策時，中心大隊給韓宗信唯一存活的小女兒 1800 塊錢，算是償還當初沒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動產。能得到這點兒錢的人也是極少數。多數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隊想給都沒處給。大辛莊屠殺的主謀高福興、胡德福被關幾年放了，九人小組裏的其他人，該當幹部還當幹部，沒聽說誰受處分。

8 月 31 日那天，大辛莊的黎明大隊、紅升大隊、昕生大隊和中心大隊殺了 106 口人，最老的 80 多歲，最小的還不會走路。黎明殺了 60 餘個，人數最多。中心、昕生各殺 20 餘個。紅升行動慢一些，剛殺死 2 個。

9 月 1 日上午，大興縣副縣長劉英武、傅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堡兩個大隊在 9 月 1 日還在殺，共殺了 20 多人。同一天，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張連和等十餘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有的手持鐵鍬、刀子，不准來人前進一步，否則後果自負。馬村的殺人幹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立三道防綫，不准出入。王振元他們硬沖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場。他們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復強調：“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怎麼辦？”

許多殺人動機都出于個人恩怨，甚至是為了一點兒個人的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是貧農，殺不殺這一家，村幹部很有爭論。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人，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陳家的錢，把陳家一滅，就不用還錢了。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于殺人賴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類家的婦女，還說“給你換換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趕車的把式裝運尸首時發現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就把她藏在車轆底下。在車子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現，過去把她劈成兩半兒。車把勢終于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幹了。



大辛莊公社共管轄 19 個大隊，多數大隊沒有發生大屠殺，西白疃大隊就是一例。西白疃大隊書記李樹清（女），貧協主席李樹珍，是堂兄妹，平時很看重鄰里關係，不愛搞階級鬥爭那一套。土改前李樹珍是村裏最窮的人，生在廟裏，直到土改一直住廟裏。有一年組織上要他當大隊書記，他說什麼也不幹，理由是不願得罪人。

8 月 31 日晚，李樹清被召到公社開會，組織開會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興和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為首的九人小組，該小組還包括公社副書記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書記賀雲喜（音）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組關押，也險些被殺。會上傳達了高、胡從天堂河勞改農場帶回來的新精神，讓各大隊當晚把地富分子及其親屬斬盡殺絕。

李樹清回到大隊，嚇得腿軟，連忙召集大小隊幹部商量辦法。生產隊小隊長張萬義極力反對殺人，說：“咱們大隊的五類分子連同親屬有 280 多人，這麼多人能殺得過來？咱們都沒殺過人，就怕殺一個自己就嚇趴下了。再說 200 多人要是急了，還不一定誰把誰殺了呢。”張萬義是幾代貧農，自己又當過八路，說話硬氣，敢于直接反對。本來隊幹部們對於殺人就很猶豫，又被張萬義潑了冷水，沒有人再主張屠殺。李樹清說，在公社的會議上，有人提議，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動起來人手不夠，外村的打手可以來支援。為了防止外村人闖進西白疃亂殺，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于是大家商定，派村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許外村人員進入。

幸虧第二天（9 月 1 日）縣裏來人制止屠殺，否則西白疃能否頂得住這股殺人狂潮也很難說。9 月 1 日以後，還有外村的人來貼大標語，指責西白疃的村幹部膽小怕事，向階級敵人妥協。西白疃村的五類分子也嚇壞了，好多天都不敢進屋睡覺，生怕被堵在屋裏遭到屠殺。他們也豁出去了，說，要是來人殺他們，就和凶手拼命。

---

錢宗仁是湖南湘鄉縣長豐公社汴洲大隊人，因出身富農，幾次喪失升大學的機會。1962 年，錢宗仁第一次報考大學，成績特別優秀，據說列全省前 10 名。清華大學準備錄取他，母校湘鄉二中的黨支部副書記王壽松却趕到招生辦，將錢的政審結論改為“不宜錄取”，加蓋公章，要回材料，終致落選。1963 年，錢再次參加高考，被哈爾濱工業大學錄取。9 月入學時，在大隊蹲點搞四清的公社副書記指使大隊幹部，不予辦理戶口糧食遷移關係。錢再三請求無效，只好空手赴哈工大。在哈工大入學三個月，錢又被地方追回。1964 年，他第三次報考大學，公社曾書記本已答應，一位姓伍的公社幹部還在錢的筆記本上簽了字，寫了一些勉勵的話。最後討論時，他們覺得不對，說今年錢宗仁若上了大學，不就說明公社以前都做錯了嗎？于是決定對錢的報考申請不予理睬。錢宗仁滿懷希望地奔波了幾個月，最後卻沒有拿到准考證。

---

## 道縣大屠殺 湘 子

1967 年夏末，湖南道縣。

橫貫道縣的瀟水面漂浮著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身裸體，有的僅剩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魚群已把它們的臉啃得糟爛。

道縣各地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

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

道縣古城牆頭，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尸漂過來，懷裏還緊緊抱著一個尺把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各個村頭、渡口，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著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異常，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分？”查路條，搜身，盤問，隨便捆起來刑訊逼供。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查綫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第二天一早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免于被殺。

湖南大學機械系學生蔣曉初，時年 22 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從長沙回到家鄉審章塘公社黃土壩大隊暫避。其父蔣勛，畢業於湖南大學歷史系，1949 年後在道縣當教師，曾擔任過道縣一中的校長，因出身不好，此時被開除回家，與幾十個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關押在大隊部，其次子蔣曉中也關押在裏面。蔣曉初跑到大隊部宣傳毛澤東思想，“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試圖說服那些喪失了理智的基層幹部，結果被關起來。

半夜時分，蔣曉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隊“最高法院”的劊子手們叫出來，五花大綁押往河邊。烏銃響了，蔣曉初身上射滿鐵砂，但他沒有倒下，仍然在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同志們，你們這樣做要犯錯誤的呀！”民兵聶 XX 不耐煩了，沖上前，手起刀落，砍下蔣曉初的頭顱，接著又砍下蔣曉中的頭顱，尸首被踢進河中。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與蔣曉初一樣遭到殺戮。

縣城街道上，氣氛緊張到極點，只要一陣旋風刮起，吹起幾片紙屑和塵沙，或者某人不小心碰翻了一隻洋鐵桶，所有的人立即驚呼著抱頭鼠竄。當地人把這種現象叫作發地皮瘋。一到黃昏，縣城便成一座死城，人們龜縮在家，把門拴抵牢。屋子的橫梁上鋪著棉絮棉衣之類，因為擔心流彈從天而降。

喝慣了河水的道縣人，已無人再敢飲用被尸體污染的河水，縣城僅有的五口水井一時身價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現排隊汲水的長龍。水鄉澤國的道縣發生了水荒，因爭井水而引起的糾紛時有發生。道縣人愛吃豆腐，縣城的豆腐店多開在河邊。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店家挑著米豆腐沿街叫賣：“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仍然無人問津。街上貼出“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報，一些革命闖將現身說法，帶頭飲用河水，希望化解飲水危機。

1967 年，整個中國都已瘋狂。道縣的街頭巷尾，觸目儘是“北京來電”和“特大喜訊”，人們手捧紅寶書，高舉語錄牌，敲鑼打鼓涌上街頭，歡呼毛澤東的最高最新指示，并很快結成兩個對立的派性組織：一派叫毛澤東思想紅戰士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另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改聯合指揮部，簡稱革聯。紅聯稱革聯為革匪，革聯稱紅聯為紅老保。

革聯主要由青年學生、市民、手工業者、下層知識分子及少數幹部組成，成分比較複雜，知識層次較高，不少人過去遭遇過政治迫害，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正更具反抗精神。這一派在縣城勢力較大，以道縣二中為據點，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兩報一刊紀念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一周年的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

紅聯與當地政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大多數人是既得利益者或名義上統治者的依靠對象，更傾向於維護既有的政權和秩序，對那些斗膽犯上作亂、自稱造反派的人極為反感。紅聯擁有現實當權者和幾乎整個鄉村政權及組織的支持，認為殺人是民主革命的補課，地富反壞右以及 21 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再遲疑我們就會像 40 前在武漢、長沙那樣被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兩派在縣城裏相互

攻擊指責，時有小規模武力衝突。“在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8月11日晚，紅聯在清塘公社營樂園大隊部召開各區武裝部長會議，決定第二天集中各區基幹民兵（持槍民兵），攻打革聯總部所在地道縣二中，由清塘區武裝部長關有志等人組成前綫指揮部，關任總指揮。會上強調，必須加強管制四類分子，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

與此同時，縣武裝部長劉世斌、縣委副書記熊炳恩召開全縣各區、社“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組長電話會。熊布置了各區、社抓緊搶收中稻、搶栽紅薯的任務之後，告訴大家，縣武裝部和縣公安局的槍被搶了，階級敵人要翻天了。他憤怒地敲著麥克風說：“各地要發動群眾採取果斷措施，加強對階級敵人的專政，要把民兵組織起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衛好‘雙搶’。”

8月13日，紅聯進攻道縣二中華聯總部的戰鬥失利，被打死2人，打傷多人。紅聯舉行抬尸游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當天，熊炳恩對四馬橋的王甫昌、一區的武裝部長劉善厚、七區副區長宛禮甫，以及由縣裏派去大坪鋪的張望耻和其他各區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負責人說：“告訴下邊，一隊可以先殺一兩個。”

8月13日上午，壽雁公社召開各大隊幹部會議，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紅聯司令徐善明，根據壽雁區“抓革命，促生產”小組組長陳智希的指示，與公社武裝幹事何建錫私下交換意見，決定搞掉曾經當過軍統特務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會上，公社武裝部長又在講話中重點點了朱勉的名，說他與革聯有聯繫，搞反革命組織，要殺貧下中農。當晚，壽雁公社下壩大隊召集四類分子訓話會，趁機找岔子將朱勉拖到山上打死，成為道縣大屠殺的第一個被害人。

四馬橋區楊家公社聞風而動，公社秘書、現已變成區紅聯副司令和公社紅聯司令的蔣文明，召開會議發布命令：第一，從現在起，各大隊要組織人站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聯下鄉串聯；第三，要發動貧下中農管好四類分子；第四，四類分子如果亂說亂動，要搞暴動，各大隊要聯合起來，採取斷然措施。

蔣要大家討論，鄭家大隊黨支部委員、聯絡員鄭逢格第一個發言：“我們大隊地富活動很猖狂，已經組織起來開了幾次秘密會了。歷史反革命鄭元贊的老婆鐘佩英，串聯一些地富子女，去寧遠參加了‘湘江風雷’，已經領了兩個月工資了，還準備領槍回來，跟貧下中農作對。地主崽子鄭生堯已經在支書鄭逢蛟門口睡了好幾晚了，鄭支書害怕被殺，已經躲起來了。階級敵人這樣猖狂，我們貧下中農不知哪一天會死在他們手裏。”周塘管大隊支部書記接著說：“吃虧了，我們已經落到敵人後面了！”前進大隊支書感嘆道：“階級敵人這麼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麼不開口呢？”

蔣文明叫大家翻開隨身攜帶的紅寶書，學習了一段最高指示：“蔣介石對人民是寸土必奪，寸利必得。我們呢？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他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現在蔣介石已經磨刀了，因此，我們也要磨刀。”學完語錄，蔣說：“革命的同志們，其實毛主席早已開口了，只是你們不理解呀！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組織群眾幹！”

鄭家大隊民兵營長鄭會久問：“像鐘佩英這號人，怎麼搞？”蔣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麼時候起來暴動，就什麼時候搞掉她！”接著，他們確定了公社的總聯絡員，議定了各大隊的聯絡暗號，同時策劃了殺害鐘佩英的具體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將鐘佩英偷偷搞掉，或趁她出工時騙到山上搞掉，被否決。

14日晚，蔣司令帶著兩名隨從到富足灣，主持召開富足灣、老屋地兩個大隊黨團員會。會上，除了介紹他的備戰方案外，蔣又增加一項新內容：討論鐘佩英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行。15日晚，鄭會久、鄭逢格按照蔣文明的布置，召開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訓話會。鄭會久喝問鐘佩英：“你到寧遠去，為什麼不請假？”鐘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

爲什麼要請假？黨的政策規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

他們捆鐘佩英時，鐘的兩個兒子，一個 18 歲，一個 20 歲，喊“要文鬥，不要武鬥”。鐘佩英被用鋤頭棍棒打死後，他們想，她的兩個孩子還在，將來肯定要給母親報仇，于是有人提議：“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應湧到鐘佩英家，把她已經上床睡了的两个兒子拖起來，分別拉到後面和對面的山上，一頓鋤頭扁擔，活活將兩條年輕的生命打死。

事畢之後，他們又集中到鐘佩英家，既緊張又亢奮，無意回家安息，便將鐘家喂的幾隻鷄鴨全部殺掉，一鍋燉了，又打來燒酒宵夜。待到鍋裏只剩下一點湯汁的時候，驀地聽到一聲鷄鳴，衆人心裏一驚，趕緊推門而出……

天一亮，鄭會久早飯沒吃就急匆匆趕到公社，將搞掉鐘佩英母子的情况報告給蔣文明。蔣文明說：“好！行動快，有魄力！”鄭會久心底那一點慌亂終於鎮定下來，以後也就不再在乎什麼了。

8 月 17 日上午，蔣文明主持召開各大隊五巨頭會議，再一次高度贊揚了鄭家大隊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散會後，各大隊急起直追，很快在合作、塘坪、早禾田、陳家、三角河等大隊殺了 31 人。

現任鄭家大隊支書鄭逢橋回憶鐘佩英時說：那是一個很體面的女人家，四十來歲，念過書，粗活細活都拿得起，還會做衣裳，聽說是藍山縣那邊一家大戶人家的女兒。那陣子，鐘佩英社會關係不好，老老實實呆在家裏也難保不出事，她又去參加什麼‘湘江風雷’。我那時是支委，那天開會，他們講起鐘佩英的事，我大吃一驚：鐘佩英搞了那麼多活動，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慘，就在路邊那口山塘邊，好幾天沒收尸。還有她兩個兒子，就更慘了。”文革中，大隊在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中秘密安排了幾個耳機（臥底）刺探敵情，定期彙報。鄭家大隊殺第四批的 7 個人時，是命令一些沒有被殺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繩子把這 7 個人勒死的。

楊家公社殺掉鐘佩英母子三人的消息很快傳開，全縣流傳起“四類分子要造反，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地富作骨幹”的謠言，加之在此期間有 4 個區搞出 7 個反革命組織，逼供出一個綱領，即“八月大組織，九月大暴動，十月大屠殺”，氣氛十分緊張。從 8 月 17 日開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區先後召開社隊幹部會議，動員部署殺人。

8 月 13 日，祥霖鋪區的袁禮甫在上渡公社召開殺人大會，殺掉了 7 人。緊接著，他又成立了一個百人殺人團，分赴各個公社和大隊，組織更大規模的屠殺。被殺的人，有的是從床上拖起來的，有的是從田裏叫上來的。從 8 月 13 日到 8 月底，半個多月裏，根據宛禮甫上報的殺人名單，共殺掉了 1 千多人。屠殺的方式駭人聽聞，土槍崩、沉河、斷頭、截肢、開膛、腰斬、投窯火燒、集體爆炸，年輕的婦女則集體輪奸後殺害。

8 月 14 日，橋頭公社公安特派員楊遜卿，到大江洲大隊召開大隊幹部會，督促殺人。第二天，該大隊殺二人：75 歲的秦秀容和她 5 歲的孫子何國新。那麼多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不殺，何以就殺這一老一少兩個階級敵人？楊特派員召集開會時，有人提到，過去秦秀容家裏光洋用鬥量，餐餐煎魚燉肉，還說秦秀容藏有幾本存摺，楊遜卿心裏一動。秦秀容家如今只剩一老一小，某天老的腿一伸走了，那些光洋天曉得會落在誰手裏，說不定就留給蔣介石反攻大陸用了，于是決定把這一老一少抓起來。春秋中文社區 <http://bbs.cqzg.cn> 秦老太太一口咬得釘子斷：光洋一塊沒有，土改時都交出來了，如今祖孫兩個相依爲命，一個勞動力沒有，吃飯都成問題，哪里還有錢存？楊特派員不高興了。

老的死頑固，就威嚇小的：不交出光洋就要上繩（捆起來），再不坦白交代就要判死刑！說著拔出腰間的手槍，嚇唬小孩。5 歲的何國新沒見過這樣恐怖的場面，跪在奶奶腳下，哭得淒惶：“奶奶，你把光洋交出來吧，交出來……”秦秀容如泥塑木雕。何國新又轉向持梭鏢、馬刀的人們：“叔叔伯伯，你們莫殺我，莫殺我。我會做事，我給你們放牛。”“交出

光洋和存摺就不殺你了。”楊公安仍然抱有希望。何國新又轉身抱住奶奶的腿，拼命哀求：“奶奶，你把光洋交出來。光洋是什麼啊，藏起有什麼用？”老人伸出乾枯的手掌，撫摸著孫子的頭說：“好細崽，不要以為活在人世上有好大的味道。我走了，誰來照顧你？不如跟奶奶一起走，路上也好有個伴。”

理家坪公社有個地主分子，60 來歲，解放前做過國民政府的縣糧食局長，雖然活過了土改和鎮反，以後每次運動一來都要被折騰一番。這次逃不過了，群眾大會上被判處死刑。大隊貧協主席兼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院長”宣判後問他：“你知罪不？”他說：“我不知道犯了什麼法。”“你說要先殺黨，後殺幹，貧下中農一掃光，中農殺一半，留下地富當骨幹。”“我好像沒說過這個話。”“你還不老實！說，你這樣想過沒有？”“你讓我想一想我想過沒有。”

春秋中文社區 <http://bbs.cqzg.cn> “你還不老實！”口號聲驟起。“我想，殺黨、殺幹我或許可能想過；但是，殺貧下中農，我確實沒有想過。”“春秋中文社區 <http://bbs.cqzg.cn> 你還不老實！你殺黨、殺幹就不殺我們貧下中農嗎？”“你們貧下中農都是做工的，不是說地主是靠剝削貧下中農生活的嗎？把你們都殺了，我剝削誰去？”“你，你死到臨頭還不老實！”“我正因為死到臨頭才特別老實！”於是群情激憤，一涌而上，讓這個嘴硬的老地主跪下，把他和十幾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捆在十幾根木樁上；黨員、團員、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每人發一根木棍，依次一人打一棍，打一棍問一聲：“還老不老實？”直到把這個老地主打死。

8 月 17 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隊俱樂部禮堂召開清塘區生產隊以上幹部緊急會議。會議由區武裝部長、紅聯營江前綫總指揮關有志主持。關說：道縣革聯為了達到反革命政變的目的，8 月 8 日搶了武裝部的槍支，公開散發反革命傳單，要血洗道縣。8 月 13 號又開槍打死我們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我們區也發現了農民黨和新民黨，八區偽縣長鄭元贊的小老婆還組織了反共救國軍。現在公檢法都癱瘓了，階敵人如果拿刀殺我們，我們就要殺他們，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我們要成立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行使生殺大權。

會後，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員蔣白舉，帶領久佳公社與會人員三四十人，沖到唐玉的家。眾人撲上去，一陣亂棒將其打死，丟在禾坪邊的水塘裏。久佳、新塘兩個公社的 5 個大隊行動迅速，4 天內殺了 13 人。鳳成洞、中文洞大隊殺了 40 多人，數字報給熊丙恩，熊厲聲斥責：“你們那裏就那麼清白？你們的階級立場到那裏去了？”這些地區的幹部為保自身平安，只好回去補殺。蛇壩區是道縣殺人最多的區，8 天殺人 1054 人，全區 50 人中就有 1 人被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8 月 22 日，小甲公社召開了一百多人的革命會，各大隊、生產隊主要幹部參加。公社武裝部長廖龍九號召殺人要越快越好。當晚，洞仿口大隊黨支部計劃殺 5 人，打電話向公社請示，公社秘書楊慶基當即批准。得到批准後，洞仿口大隊民兵將這 5 名四類分子押到村口，用鳥銃、鋤頭打死，丟進一眼廢紅薯窖中。

同一天，蛇壩區主要負責人王盛光坐鎮興橋，下令民兵封鎖所有道路渡口，嚴查行人，不准放走一個階級敵人。晚上又召開宣判大會，叫民兵五花大綁了楊貴清，謊稱要將楊押送道縣公安局勞改。押至上關河邊時，民兵楊飛吉按照指示，從背後一馬刀將楊貴清砍死，拋尸瀟水河。當晚，王盛光又打電話給區武裝部長兼區紅聯司令何昌學，要他以區委和區紅聯的名義打電話給小甲和蛇壩公社，指示每個大隊選一兩個罪大惡極、調皮搗蛋的四類分子宰掉。

何昌學于當晚和第二天把這個指示下達給蛇壩和小甲兩個公社，于是全區 3 個公社和幾乎所有的大隊都相繼召開殺人部署會。到 8 月 30 日，小甲公社的 13 個大隊已有 12 個大隊殺了人。公社副書記楊盛芳和武裝部長廖龍九認為小甲大隊行動不力，幾次向該大隊負責人打招呼，進行教育。楊盛芳召開全公社總結表彰大會，表揚了洞仿口等幾個行動快、成果大

的大隊，重點批評了小甲大隊；會後派出一個排的基幹民兵，帶著槍支、馬刀、炸藥，進駐小甲大隊，當即將 12 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繩索捆起來，捆成一團，中間放一大包開山放炮用的炸藥，點燃導火索，將 12 人炸死，這叫“坐土飛機”。

8 月 23 日，柑子園公社成立了貧下中農高級法院，先後開庭審訊 13 人，其中 8 人被判死刑。在公社武裝部長敬反修、公社貧協副主席、貧下中農高級法院院長梁域指示下，27 日艷旗大隊殺 7 人，28 日紅旗大隊殺 6 人。

8 月 25 日，油鄉公社武裝部李部長嚴厲批評躍進大隊行動慢，拖了全公社的後腿。

8 月 26 日，蛇壩公社河灘大隊將各個生產隊推出的 21 名青壯年四類分子五花大綁，由手持馬刀、梭鏢、鳥銃和鋤頭的民兵和積極分子押解至葫蘆岩的洞口。大隊文革主任、貧下中農最高法院負責人何興盛，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判這些人死刑。何興盛叫一個名字，民兵就牽一個到洞口邊，由負責行刑的人用馬刀或梭鏢、棍棒之類殺倒或打昏，丟下岩洞。有人被丟進洞裏後，居然沒有死，在裏面拼命呼救。何興盛在洞口邊竄來竄去，急得直跺腳，叫民兵不停地往洞裏扔石頭，又叫人搬來成捆稻草，點燃扔下去燒。最後他還是不放心，又打發人跑回村裏，拿來一大包炸藥，挂上導火索，點燃丟進洞裏。轟隆一聲悶響，岩洞內重歸寂靜。

隨後，何興盛回到大隊部，搖電話向區裏和公社彙報，並請示下一步的工作。區委主要負責人葉成虎指示“全部殺掉”，公社黨委書記指示“一個個都給我搞掉”。當晚，何興盛指揮民兵，又將 31 個階級敵人趕上一隻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塊大石頭，將船劃到河的深處，然後一個一個丟進河中，其中最大的 74 歲，最小的才 56 天。張秀華一家 6 口，丈夫、婆婆和 3 個兒子被殺。貧農光棍蔣癩子是殺人積極分子，殺了張秀華才 56 天的小兒子之後，苦苦請求組織，得到允許，強逼張秀華與他成親。當晚，大隊成立財產清理小組，將被害人家中的財物分掉，並從被殺人家中拖出幾頭肥豬殺了，又殺雞宰鴨，在曬穀坪上召開慶功大會餐。

8 月 27 日，躍進大隊黨支部書記何方前指揮各隊幹部、民兵和積極分子，召開大會，將全大隊地富分子及子女 64 人，綁捆得結結實實，押往石頭山水庫。有兩個地富分子年歲太大，走不動，要人拖，大大影響了隊伍前進的速度。押到何家河邊時，幾個民兵拖得不耐煩，請示何支書，用鳥銃將兩個老的打死，扔進河裏。到達石頭山水庫後，因陋就簡開一個群眾大會。大隊貧協主席代表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何光美、左南方等 62 人死刑，然後驗明正身，分別推下三口窖內，將稻草澆上煤油點燃，投入窖裏，熏後，掩土活埋。

道縣殺人的消息傳到長沙，省革委會籌備委員會和支左的 47 軍，派出劉兆豐副參謀長率 6950 部隊於 8 月 29 日趕赴道縣，召開各區、公社幹部會議，宣布命令停止殺人，敦促他們立即趕回去制止屠殺。散會後，熊丙恩却授意這些幹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時間，有的甚至在路上打電話通知劊子手抓緊時間，在一天內把該殺的人殺光。

8 月 29 日，柑子園公社召開各大隊支書、貧協主席、民兵營長等基層幹部會議，傳達解放軍 47 軍制止殺人的電報，強調不准再殺人，誰殺誰負責。緊接著，黨委書記胡化維講話，却表揚了那些殺人多、行動快的大隊，點名批評了那些沒殺人的大隊。挨了批評的那些大隊很不服氣，東風、勝利等大隊散會回去就殺了 15 人。會後，梁域召集衛星大隊的幾個主要幹部碰頭，做出決定，當晚殺掉了朱用進父子等 4 人。

9 月 2 日，47 軍的部隊已進駐道縣三天，制止殺人的精神也貫徹到全縣各大隊。傍晚，梅花公社東風大隊社員何若貝從縣城搞副業（打工）回來，同村的何定信、何若英父子到何若貝家聊天，想聽聽城裏的新鮮事。這事傳到大隊民兵營長何子良那裏，却成了何若貝從革聯窩裏跑回來搞串連。何子良當即吹響緊急集合哨子，帶上十幾個民兵將何定信父子抓起來，並迅速整理出何定信通匪的十條罪狀，還附帶整了一個漏網富農何喜生的材料，一同報

請公社批示，公社同意殺掉何定信。

9月5日上午，何子良召開社員大會，宣布何定信、何喜生的罪行。散會後，他親自帶領民兵20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押至獅子山槽古裏殺害，何若英被綁去陪斬。爲了讓何定信死個明白，殺他時，何子良說：“慢點，我問你，你還砍不砍我屋裏的樟樹？”1950年何定信任區代表時，曾爲一棵樟樹與何子良發生糾紛，此事鬧到區裏。最後，何定信打贏了官司，何子良至今耿耿于懷，伺機復仇。

當天晚上，何子良又以公社來了電話，馬上要把何若英押到公社審訊爲借口，帶領3個民兵把何若英從關押的祠堂裏提出來。何若英向何子良求情：“子良哥，你我都是貧下中農，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你給我提個頭，讓我好好想一想。”何子良說：“你還沒犯錯誤？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樹！”何若英說：“那是我父親的事。我那時還年輕，不能怪到我身上。再說，我父親也死了，算是罪有應得了吧。”何子良聽得心裏煩，心想照你的說法，那些地富子女也就不該殺了，留著以後翻天？“不要講了，話講多了是水。”何子良喝止道。幾個人將何若英押到盤家石灰窑邊時，何子良叫民兵開槍。大家覺得，不是說公社要提人嗎，怎麼在這裏搞掉呢？都不肯動手。何子良生氣了，狠狠罵了一句，親自開槍將何若英打死，又叫一個民兵用馬刀把何的頭割下來示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的何代余支書，嘴巴能說會道，嗜好也多，比如好打人，好女人，好多吃多占。1964年農村搞社教運動，大家都不提對何支書的意見，只有貧農何代井站出來，清了何支書的賬，還打了他一耳光，後來何代餘殺了自家一頭豬用于退賠。

殺人風一起，何支書在會上說：“搞階級鬥爭嘛，一要看成分，二要看思想，不光是搞掉幾個四類分子，那些一貫調皮搗蛋的壞傢伙也要幹掉他個把子，讓毛主席的光輝徹底照耀我們吊高樓大隊！”何支書毛主席的著作學得好，用得活，懂得飯要一口一口吃，仗要一個一個打，要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決定安排苦大仇深的何代井出面請求消滅四類分子。何代井不願意幹殺人的營生，何代餘就語重心長地批評他階級立場不穩，屁股坐歪了，與他一同學習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些最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

何代井的思想工作做通了，仿佛煥發了青春，提著明晃晃的馬刀，村裏村外趕著去殺人，一時成爲令人矚目的殺人英雄，出盡了風頭。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差不多殺乾淨了，上面傳來話：禁止濫殺。何代餘立即召開大隊民兵營長、革委會主任會議，研究如何除掉何代井這坨毒。何支書知道何代井性子暴烈，敢拼命，就想出一個智取的辦法。那天中午，何代井被人叫去大隊部分花生和紅瓜子，何不知是計，早早來了，坐在大隊部的門廊裏抽烟。何支書看准了，一聲令下，三條漢子沖上來，一頓扁擔打斷了何代井的手腳，然後立即召開群眾大會，當場宣布何代井打人殺人，連小孩也不放過的種種惡行。群眾義憤填膺，一致喊殺。人們趕來一頭雄壯的牯牛，把何的雙腳用一根粗索子套住，倒掉在牛背後，像拖犁拖耙那樣，拖到兩裏路外的尖尖嶺上處決。到了尖尖嶺，何代井渾身皮肉全被拖爛，十幾個民兵又用鳥銃打了一陣。

道縣大屠殺中被殺的人，大多是滿門抄斬，有的大隊甚至株連族人。8月24日，楊家公社金獅庵大隊以劉代修爲首的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殺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軍進駐道縣制止殺人的8月29日，劉代修還頂著禁令，又殺害李念德家9口人。李家14口，只剩下李念德一人逃脫性命。

大坪嶺公社土地塘村蔣漢正全家和同村幾十人，被當做反革命一齊趕下岩洞，摔得半死，活活餓死悶死在岩洞裏，淒厲慘烈的哭叫聲持續兩天兩夜。洪塘營公社的殺人團，把兩百多名反革命綁到附近的礦坑旁邊，殺人團的李波清等先用槍打，然後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礦坑活埋。

橋頭鄉橋頭村右派周文棟及其妻陳蓮娥、子周輝在杉木嶺出工，生產隊長指揮青壯勞力

將他們一家三口推進一口多年不用的廢窖裏，搬出早已藏在松樹林子裏的兩捆幹稻草，點燃塞進地窖，見裏面喊得淒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條命就這樣結束了。接著生產隊長又派人到周家，將其另外兩個孩子抓到杉木嶺。隊長接過兩歲大的小弟，丟進火窖裏。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隊長毫不手軟，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過猛，周大妹被推過了窖口，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幾番才將8歲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燒死。

橫嶺公社小路窩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指揮民兵和積極分子，將蔣漢鎮及妻子周軍陽等15個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綁，押至大隊部倉庫邊的禾坪。唐興浩因借了蔣漢鎮100元錢一直不還，遂起殺人滅門之心，吩咐人到蔣家捉來他的三個崽女，一起押至楓木山的天坑邊。唐興浩跳上一塊石頭宣布：“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宣布你們的死刑！”許多被捆著的人，頓時就癱倒了。民兵們圍上來，用烏銃、梭鏢對著他們。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處決，然後推下天坑。周軍陽被推下天坑後蘇醒過來，7天后被人救起，她家其他5口全死于天坑。1985年，唐興浩被開除黨籍，在處理遺留問題工作組的追問下，他才托人將那100元還給周軍陽。

殺人凶手還對受害人妻女進行集體輪奸。8月26日晚，田廣洞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指揮民兵，在大隊部打死陳高肖和另外兩個地富子弟，用馬刀砍下3人腦袋，以示其革命堅決。陳高肖的妻子嚇得逃回娘家朱家灣，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把她押回大隊部。陳高友決定讓參加屠殺的人“開大鍋飯”，說：“朱家灣、倒水洞一帶，地主婆都給貧下中農開了大鍋飯，我們這裏為什麼就不開呢？殺都殺得，哪里還有搞不得的道理。”陳錫位招呼民兵們：“大家吃飽些，攢足精神開大鍋飯啦。”陳登義率11位民兵，在大隊部吃飽喝足，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集體輪奸，還從這個女人的衣袋裏掏走20元錢和4丈布票。次日，他們將氣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光棍陳高月家，強迫她嫁給這個貧下中農。當晚，她又飽受陳高月的蹂躪。女人恢復神智後，乘人不備，逃回娘家。後來，腹中胎兒早產，產後十天死亡。

在大屠殺風潮中，凶手每殺一人，報酬是二、三元或十斤穀，由大隊或公社開支。胡茂昌這個人，一字不識，好吃懶做，手脚不乾淨，平時村裏人就瞧不起他。即便是殺人風起時，大隊也不安排他去殺人。胡茂昌坐不住了，嚷著要去殺，誰都攔不住，你總不能不讓人家殺階級敵人嘛。胡茂昌為什麼爭著去殺人呢？一是他心裏發沖，想殺，二是殺人有補貼。

胡茂昌

所在大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判處21名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死刑。胡茂昌自告奮勇，跳出來說：“我來一個！”待到把一千人犯押上山就地正法時，一些人又感到下不了手，有點畏縮。胡茂昌上前一步，拍著胸膛：“怕什麼，看我的！”他搶過一個民兵手裏的馬刀，揮起來，眼都不眨一下，一氣砍掉7個。砍到第八個時，刀不快了，殺卷口了，他嘴裏不乾不淨地罵著，像用鋤頭挖土一樣，硬是把個腦袋挖斷了，弄得自己渾身是血，頭髮都被血漿糊住了。

殺完人，胡茂昌像凱旋的英雄，模仿起古裝戲裏刀斧手的動作，把滴血的馬刀高舉過頭，向圍觀的人示意，頓時贏得一片嘖嘖贊嘆。這時，其餘13名已經被其他民兵砍掉了。胡茂昌想用馬刀尖挑起一個頭舉起來耍耍，弄了幾下沒挑起來。環顧四周，胡茂昌意猶未盡，陡然想起某個被殺的人家中還有幾個小孩子，便向在場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建議，某某家還有三個毒麻仔（小孩子），也一起搞掉算了。大隊書記已被胡茂昌的作為鎮住了，想不到這傢伙



還真是個人才，沒等支書點頭，胡茂昌就一馬當先殺回村去。

進了那家的門，也不答話，當頭一棒先敲掉了開門的老大。老二嚇得扭頭就跑，被胡茂昌一把抓住，舉起來用力往下一摔，也沒氣了。他從被窩裏抓起最後一個，正要如法炮製，孩子的奶奶（因娘家出身較好，又與大隊主要負責人有點親戚關係，未被殺掉）掂著小腳，母雞一般撲上來，死死拽住小孫子不放。胡茂昌大為惱火，猛一發力，將老奶奶推倒在一丈開外，順手提起孩子的兩隻小腳，朝下使勁一摔，隨著一聲淒厲的慘叫，胡茂昌那青筋凸暴的小腿上濺滿了紅紅白白的孩子的腦漿。

這一天胡茂昌共得殺 11 人，得手續費 55 元，比他去年年底的分紅還多。胡茂昌所在的大隊經濟狀況好一些，每殺一人補貼 5 元。

殺人團不但殺本地人，外地人也不能幸免。出差的，探親訪友的，做生意的，都一一盤問。查出身，查觀點（是湘江風雷派還是紅高司派），查組織，查來道縣的目的，查探訪什麼人，一旦查出嫌疑，不問青紅皂白，交由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登記註冊，拉出去就槍斃了。被殺的外地人多達 700 多人。

軍隊進城的第二天，紅聯和革聯又在縣城發生大規模武鬥。紅聯方面指揮失當，被革聯打死 2 人，打傷 7 人，俘虜 360 餘人，繳槍 120 餘條，梭鏢、大刀、棍棒丟棄無數。紅聯召開 400 人的追悼會，紅聯頭頭關有志、賀霞等人在會上聲稱：“四類分子膽敢翻天，就斬草出根！”

祥林鋪區區長袁禮甫得知要停止殺人的消息後，立刻召開會議，謀劃、布置在祥林鋪區來個“大掃除”。區基幹民兵被緊急集合起來，召開殺人誓師大會。袁在總結發言中說道：“這次任務光榮又艱巨，我相信同志們一定能圓滿地完成。三天后上來會師，我們等待同志們勝利的消息！”會後殺豬勞軍。在震耳欲聾的鑼鼓聲中，袁禮甫帶領幾名區社幹部為 120 名雄赳赳、氣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這 120 名民兵遵照指示，準時回到了區指揮部彙報戰果：三天內共殺 569 人。

9 月 1 日清晨，一架伊二型軍用飛機在道縣上空低低飛行，撒下制止殺人的傳單。次日又撒一次。傳單內容主要有：“禁止殺人！”“殺人犯法！”“要文鬥，不要武鬥！”“不要群眾鬥群眾！”開始制止殺人非常艱難。一天中午，部隊聽說清塘區一個地方要殺人，團政委孫潤清立即派營長劉富安帶人趕去制止。到那裏天已近黑，人也被殺了，尸體擺在一口水井邊，幾個人手持切西瓜的長刀堵在村口，不許軍人進村，經再三宣傳，才讓進村。當晚，他們沒地方住，住進一個小賣部。賣主馬上把能吃的東西全藏起來，不賣給他們，說：“不是不給你們吃，是不敢給；誰給了，上面就會抄誰的家，還會掉腦袋。”

9 月 23 日，革聯將沖入二中的紅聯打死 12 人，打傷多人。這又激起紅聯派的憤怒，將仇恨再次轉移到農村那些無辜的弱者身上，使得部隊制止殺人的工作更加困難。特別在農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手持大刀、長矛、鳥銃等凶器進行圍攻，罵這些制止殺人的部隊是“劉少奇的部隊”，是“為地富反壞右效勞”，揚言要與他們拼到底。

道縣大屠殺好比引爆了一顆“精神原子彈”，衝擊波四下擴散，省會長沙的湖南大學也跟著貼出“斬盡殺絕黑七類”的大幅標語，道縣的幾個鄰縣更是跟風殺人。江華瑤族自治縣，從 8 月 29 日到 10 月 25 日，57 天裏殺了 898 人。寧遠縣 8 月 18 日開始殺人，先是梅崗公社小歐家大隊殺了 4 人，接著麥地公社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王財富指揮民兵把 38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像柳條兒串魚一樣捆成一串，一個個推下荒廢的紅薯窖，放火燒死，蓋上黃土。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研究殺人，有人問他怎麼搞，他笑而不答，很藝術地從地上撿起一根稻草，另一隻手以掌代刀，作了個砍的姿勢。幹部們言聽計從，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 68 人統統推入地窖活埋。這個大隊是零陵地區殺人最多的大隊。

寧遠縣有個彎子裏村，村子不大，多數都姓鄭。中秋節後的第五天清早，該村 50 多人被亂刀砍死，全部丟進地窖。身材高大的鄭工金被砍死後，身子進不了窖眼，殺手們毫不猶豫地用鋤頭將其身子挖成三段。12 歲的少年鄭山藍嚇得跑上山，躲在一棵樹上，被抓了下來。他跪在地上磕頭：“叔叔伯伯莫殺我，我一世替你們做工都要得。”這話成了遺言。剛滿 17 歲，長得十分秀氣的鄭翠雲，被幾個人按在本村小學裏輪奸，然後砍死。12 歲的女孩鄭見品，慌亂中爬進一條又臭又冷的陰溝，在裏面躲了三天三夜，保住一條小命。村裏三個單身漢，趁機將三個有些姿色的女人關起來，殺了她們的丈夫，然後堂堂正正地與她們結婚。春秋中文社區 <http://bbs.cqzg.cn> 寧遠縣殺人的特點是一家家地殺，殺光殺絕，不留隱患，共殺 1092 人，全地區排名第二。

江永縣界牌公社黨委書記楊修玉，大屠殺期間回老家道縣探親，沿途見河裏漂著死尸，樹上挂著死尸，很受啓發，回到自己的公社就開殺人吹風會。第二天一早，文革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劉自進帶著一些人，敲鑼打鼓地來公社報喜，稱該大隊昨晚已殺了 6 人（零陵地區殺人報喜的，僅此一例）。其他公社大隊也紛紛部署殺人，先後殺 325 人。雙牌縣殺人的特點是零星、分散、殘忍，全縣共殺 345 人（含被迫自殺的 48 人）。新田縣 9 月 8 日開始殺人，動手稍晚，其殺人特點是聲勢浩大，開萬人大會，現場殺人。全縣 21 個公社，有 18 個公社先後召開了萬人大會。

零陵縣的永州市，9 月的幾天內殺 158 人，占全縣殺人總數的二分之一強。春秋中文社區 <http://bbs.cqzg.cn> 南山縣共殺 145 人，該縣基層幹部階級鬥爭覺悟高，大隊一級自發追查反革命組織，殺掉其中骨幹，實際上全部都是假案。祁陽縣周塘公社逼供出一個黑殺團，公社組織委員李新明進一步擴大戰果，深挖出 600 多反革命分子，並將追查風擴展到全縣 33 個公社，共殺 218 人。

東安縣距道縣較遠，殺人風期間僅殺 11 人。可是 8 個月之後，該縣有關部門審查一個有作風問題的婦女，引發全縣追查反共救國軍，挖出一個有 2258 人參加的龐大的“反革命組織”。追查、審訊中，打死 141 人，被迫自殺 278 人，致傷殘 1132 人。

道縣殺人事件，從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66 天裏，10 個區，36 個公社，468 個大隊，1590 個生產隊，2778 戶，共被殺和被迫自殺 4519 人。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零陵地區其餘 10 個縣市也都不同程度地殺了人。包含道縣在內，文革期間全地區共有 7696 人被殺，1397 人被迫自殺，致殘 2146 人。按階級成分劃分，死者中四類分子 3576 人，四類分子子女 4057 人，貧下中農 1049 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 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年紀最大的 78 歲，最小的 10 天，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 14000 多人。

殺人手段可歸納為 10 種：1、槍殺：（含步槍、獵槍、鳥銃、三眼炮等）。2、刀殺（含馬刀、大刀、柴刀、梭鏢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稱放排）。4、炸死（又稱坐土飛機）。5、丟岩洞（一般都輔以刀殺）。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廢窖裏，故又稱下窖）。7、棍棒打死（含鋤頭、鐵耙、扁擔等）。8、繩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燒（含熏死）。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當時對道縣慘案進行過三次統計。第一次統計，共殺 4500 人；第二次統計，共殺 6500 人。第三次調查由 47 軍劉副參謀長負責，由原檢察院檢察長閻維勝任組長，調查結果顯示，確切數字是兩萬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在冊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蹤的人。

道縣大屠殺接近尾聲時，閻維勝、周志清、蔣良信、何適、王恩昌、周家豐、周賢維、劉香喜等 8 人，冒著生命危險，走訪了 100 多名當事人和目擊者，走遍了道縣的村村落落，含著熱淚聽那些孤兒寡母敘述他們親人慘遭殺害的經過，最後寫出道縣屠殺大事記 300 多頁，記錄了有名有姓的 6 千多名死者的全部材料。半年之內，他們用多種方式向上級彙報，控訴熊丙恩等殺人魔鬼的罪行。中央令湖南省委調查上報，湖南省委又批轉零陵地區，零陵地區又批轉道縣縣委。材料就像一個皮球，被踢來踢去，最後又踢回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

道縣縣委向零陵地區報告：死人是實，是兩派群眾組織武鬥打死的。零陵返報省委，省委返報中央，花了整整一年時間。

在此期間，8 名上書者遭到殘酷迫害。閻維勝，因為姓閻，又是北方人，被扣上閻錫山特務的帽子，關押一年，受盡毒打和折磨。周賢維、周家豐被關在牢裏，遭受迫害。蔣良信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勞改 10 年。劉香喜被判死刑，後改為 20 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來。

1985 年春，道縣殺人事件調查組詢問一個殺人凶手的殺人動機，該凶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並沒有參加剝削呀？”“人在心不死，遲早要復辟的。毛主席說的哪里會錯？”另一個凶手的回答是：“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

我下鄉插隊期間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生產隊裏幾乎所有技術活的尖子都是地富子女。比如撒種、育秧、大牲畜飼養、農藥配製、化肥用量計算等，甚至包括石匠、木匠、篾匠、水電機械等活計，大都由這些人去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地富子女現象呢？我觀察和分析得到的原因如下：一、當時地富子女政治上受歧視，招兵、招工、招幹沒他們的份兒，只能在身邊這些農用技術領域用心思，求發展。二、地主富農都是一些智力和素質相對較高的人，他們的子女遺傳了這些品質，具有掌握農村各項技術的先天優勢。三、貧下中農在政治上有一種盲目的優越感，在農業技術上不思進取，遇到技術含量較高一點的工作就讓他們的管制對象——地富子女們去幹。久而久之，他們失去了鑽研農業技術的興趣，從而失去了掌握這些技術的能力。

## 邵陽大屠殺 何蓮清

1968 年，我 10 歲。“停課鬧革命”，孩子們無書可讀，每天上街去讀大字報和傳單。一天，邵陽市大街上有一張傳單赫然入目：請中央軍委趕快制止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傳單列舉了發生在道縣的一連串集體屠殺事件，稱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和貧下中農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將 21 種人及其家屬定為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以至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屍體，堆在城牆邊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經腐爛發臭，成堆的蒼蠅在屍體上飛來飛去，一些屍體長滿了蛆蟲。傳單作者說，他本人是一個原籍道縣、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幹部，回鄉看到如此慘狀，經私下調查，瞭解到這些被冠以黑殺隊員名義的人，幾乎都是無辜者，因此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印製了這些傳單，籲請中央軍委趕快出面制止這種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一天晚上，父親的一位朋友悄悄來我家，將我們這些孩子屏退後，告訴我父親，他去道縣出差，所見所聞正如傳單所言，並且預言，這股風說不定什麼時候要刮到我們邵陽這邊來，如果外地有可靠的親戚，還是將孩子們送出去躲一躲，過了風頭再回來，免得斬草除根。我躲在窗外聽壁腳，客人走後却不敢問父親。當天晚上，父親一整晚沒合眼，看著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

確如父親的朋友所預言，道縣屠殺的血腥味很快飄到邵陽。邵陽縣決定效法道縣，有組

織、有計劃地屠殺 21 種人及其家屬，這些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併屠殺。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 20 歲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產隊的農民抓走，路上試圖逃跑，被鋤頭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幾天，最後幾位街坊收了尸，沒錢買棺木，拿一床舊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親那天外出做工，僥幸躲過，後來思兒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變得瘋瘋傻傻，半年不到死去。與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幹部，被老家的農民從家裏五花大綁地抓走。其妻姚某聞訊，從其上班的商店趕回，騎單車尾隨其後。來抓人的農民不認識她，故無提防。到了南門口，農民們將覃某捆在路邊的電綫杆上，自己進店裏吃面。姚某趁機從一家肉鋪裏拿一把屠刀，將繩子割斷，讓丈夫騎上單車逃走，她本人則被農民抓住將腿打斷。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獲悉後，派人將其抬送到醫院。市運輸局一位劉司機，住在運輸局家屬院，老家幾十位農民來家抓人時，劉妻見勢不對，立刻跑到鄰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劉司機的大徒弟正好是運輸局工人造反派的頭頭，馬上帶幾個工人，拿上棍棒，到劉家阻攔，另派人召集大隊人馬增援。老家來的農民強龍不敵地頭蛇，被打得狼狽逃竄，劉司機得以保住一條命。

邵陽市一些大型國營單位，爲了保住老家在邵陽縣的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屬不受殺害，騰出房子或招待所，讓這些人全家住到單位裏來。老家的農民無法進入單位找人，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我家的另一位朱姓鄰居，在運輸公司工作，劉司機事件發生之後，全家搬到單位避難，直到半年後殺人風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這種被單位保護起來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人只能自己想辦法投靠與邵陽縣毫無瓜葛的親友。

由于被殺的黑殺隊員實在太多，掩埋尸體成了一大麻煩，靠近河流的村莊就將尸體棄置河中“水葬”。資江河流經邵陽縣與邵陽市，邵陽市地處河流下游，于是邵陽市境內的資江中，每天都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尸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狀奇特。一時間邵陽市萬人空巷，傾城出動，每天河岸上站滿黑壓壓的人群，等著觀看從上游陸陸續續漂下來的尸體。邵陽市當局發了惻隱之心，下令邵陽市公安局處理掩埋這些無名尸體。市公安局招募邵陽市郊區的農民打撈，每撈得一具尸體，發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 10 元人民幣作爲打撈的報酬。當時國營企業工人絕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資 36 元，集體企業只有 34 元，三年學徒工期間每月工資 20 元，五保戶每月生活補助僅 5 元，所以這 10 元打撈費還是比較誘人的。

當時資江正當汛期，河面濁浪滔滔，一些農民站在河岸打撈，有的將船駛至河心打撈。邵陽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齊出動，據說掙了好幾千元的撈尸費，事後各蓋了一棟瓦房。當時一千幾百元就可以蓋一棟簡陋的磚瓦房。

我曾跟著大人去看過兩次打撈尸體，留下的恐怖印象終身難忘。那些打撈上來的尸體，千奇百怪，有的用繩子捆綁成粽子狀，有的捆成四足攢蹄，再在脖子上套根繩索，有的面部血肉模糊，難于辨認。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尸體，一串是用粗鐵絲串起五個死者的兩耳，兩女三男，一個老年婦女，一個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個 30 多歲的婦女與一個 10 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的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隻，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這兩串尸體被撈上岸時，不少圍觀者爲之落淚。我看了之後一連幾天做惡夢，吃不下飯，再也不敢去看撈尸。

尸體大量漂流延續半個月左右。當時各種傳言四起，有人說自來水廠從河中抽上來的水裏有人的斷腿，嚇得邵陽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飲用自來水。我家院中有口水井，每天擠滿了提水的人。那井本來水很旺，每天都被提得見底，過一晚才又蓄滿。我們這些井的主人，不得不趁天未亮時提水，否則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體日見稀少，自來水廠又在廠門口貼出公告，說水質已經恢復至衛生標準，前來我家提水的人才隨之減少。

到了這時，邵陽縣大屠殺的傳聞才漸漸具體起來。我曾聽一位親眼見證大屠殺的中年男子敘述邵陽縣大屠殺的起因和他所瞭解的全過程。這位男子是個公社幹部，據他說，屠殺黑

殺隊員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但是現在已經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這點，具體的殺人行動則由生產大隊黨支書和民兵營長牽頭，出身于貧下中農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參加。殺人的方式五花八門，有用鋤頭、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悶死的，還有活埋的，也有將被害者的頭按到水缸裏活活噏死的。殺到後來，這些普通方式已經無法激起殺人者的快感，便有種種翻新的花樣，如割乳房，挖舌頭，將一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丟到河裏。最殘忍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湖南幾十年前用的一種煮飯鍋，呈圓錐狀）燒紅，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面部肌肉成塊狀脫落。這種屍體曾經被撈上來過，其面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當時邵陽市的圍觀者無人知道是這種“鐵板燒”酷刑所致。不少女人死前受到各種凌辱。這位中年男子親眼見過一個女中學生被凌辱後處死的場面，他說：“將那女學生抓進裏屋去的時候人還水靈靈的，兩個多小時後拖出去處死時，渾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氣了。”我問這位男子為什麼不勸阻？他心有餘悸地說：“那種場合，人都象瘋了一樣，誰要勸阻，誰就被當作和地主富農一路人，不殺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動手，有時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膽子去勸阻。”

一些遲遲不動手殺人的生產大隊被視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門代為殺人，報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財產，生產隊還要付出公有的糧食和豬等。到後來，一些地主富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種凌辱與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斷。

---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透露，他的親屬有六七人死于文革。他的母親范瑾被打倒、蹲監獄，精神失常，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他的妹妹文革開始時是一個高中生，在學校裏被批鬥，後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了。

---

## 全州黃瓜沖坑殺案 桂 冠

一九六八年九月，湖南道縣的殺人風刮到廣西全州縣東山區，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兩次召集會議策劃殺人。晚上在群眾組織負責人和民兵班排長以上骨幹會議上，黃天輝煽動說：“湖南道縣、紅華的四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四類分子。我區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斬草除根。”

治保主任楊隆義強調要講政策和策略。兩種意見都有支持者，爭論非常激烈。黃天輝最後威脅道：“哪個不同意（大屠殺），就是和地主有聯繫！”有的幹部提出打電話向上級請示，黃天輝大包大攬：“我在區裏開了會，難道連這點都不曉得？一切責任由我負。”公社會計黃天爰又提出：“有的貧下中農到地富家招親，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貧下中農家招親落戶，殺完恐怕不好，貧下中農有意見，會引起動亂的。”議決的結果是分別對待：貧下中農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殺，地富到貧下中農家的女的不殺，男的要殺。最後黃天輝公布紀律：“不管是親戚還是朋友，不能通風報信。誰走漏消息，走脫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樣對待！”

會議結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點。黃天輝帶著民兵挨門挨戶把地富各家從睡夢中喊醒，捆起來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有的人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聲不吭地奮身跳下，有的求饒，有的講理，民兵槍托棍棒齊下，打得哭聲震天，最後被民兵用叉子叉下洞去。凶手們獸性大作，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

過。

地主女兒蔣鸞英高中畢業後當過民辦教師，不願這樣糊裏糊塗死去。她跪在洞口質問黃天輝：“你們這樣做，有無這樣的政策？”黃天輝凶狠地說：“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講話！”舉起木棒便打。蔣自己不跳，黃天輝將她推下坑去。蔣鸞英之母蔣老秀懷裏抱個孩子，也被木棒打倒，推進深坑。六十五歲的地主蔣佐卿也照此辦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大宅村地主劉香元在坑口邊向黃求情，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一個，我老婆（貧農）也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坑，留下一個給我老婆。”黃天輝斷然拒絕，毫無商量餘地：“那不行！”劉香元頓時泪水縱橫，一左一右懷抱一個三歲、一個一歲的兩個幼子縱身跳下萬丈洞。宅樂坪村地主王紹榮正要被推下坑，被民兵楊雨生叫住：“慢點推下去，等我打一槍才推！”王紹榮飲彈身亡。楊雨生過足了殺人癮，才把尸體推下坑去。

已到外地入贅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幸免。三江村蔣能奇已到黃龍公社弄岩村入贅，那天正好到公社來抓中藥，被民兵發現，抓來扔下坑去。黃天輝還布置民兵到湖南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頭和長家灣入贅的地主兒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殺。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等共坑殺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是唐正伯一家，摔死九人，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

我考高中報名時，需要公社大隊開介紹信。大隊韓書記說：“你已經是初中生了，大隊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才呢！”介紹信死活不給開。當時生產隊最需要知識的工作崗位是會計，生產隊寧肯用小學生，也不用黑五類家庭的中學生，連趕馬車、放牛、放馬也沒有黑五類子孫的份，怕他們害死牛馬。大隊書記說農村需要人才是假，不讓地富子女繼續受教育是真。多虧我讀小學時的張魁元校長，調到公社當文教主任，私下給我開了同意報考高中的介紹信，我這才有機會上高中。

---

## 常寧大屠殺 蕭一湘

1968 年的湖南大屠殺由道縣開始，禍延江永、雙牌、東安、新田、桂陽、嘉禾、常寧、郴州等地。這時有 13 位義士，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組成反屠殺代表團，進京告禦狀，沿途散發傳單。這個反屠殺代表團的第一個發起人是桂陽二中高級教師周家雄。代表團在北京呼籲，湖南屠殺簡報，中央首長人手一份，中南海震動。周恩來擠出十多分鐘接見了他們，次日，駐湖南 47 軍軍長黎原即奉召飛往北京，接受指示：亂殺人就是反革命，湖南殺人問題嚴重，裏面有壞人操縱。黎原馬上返湘，派飛機散發傳單，派軍隊進駐湘南各縣。

上京告禦狀的人中有一個王永和，教師，是一個死裏逃生的人。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裏，裏面已經有幾個死尸。天黑時分，王永和五花大綁地跪在薯窖邊，只聽一個凶手說，吃了晚飯再來殺，另一個說殺了再吃晚飯，第三個凶手二話不說，一馬刀從背後砍來，王永和順勢倒下薯窖裏。當時薯窖裏的弟弟還未死，但傷勢嚴重，已無生望，他呻吟著叮囑哥哥，踩在他和其他人死尸身上，爬出去。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隊的老支書家喊門，老支書以為鬼上門，嚇得忙說：“王老師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經沒有權了，無法制止了。他們知道我一向對你兄弟倆好，就背著我來殺你們兄弟。”王說：“我還沒死，求你救救我。”老支書開門見他滿身是血，連忙扶他進去，扎住傷口，背他到公路上，搭過路車送到桂陽縣醫院。周家雄得知此消息，就扶王永和一同上了北京。他們還從雙牌水庫和瀟湘河裏取了被血染紅的水

標本帶到北京，經化驗含血量千分之三。

據說道縣殺人的起因是道縣民兵從一戶地主子弟家搜查出辦公食堂時發給的早已作廢的豆腐票一團二團（該地稱一塊爲一團），後被逼供爲組織了反共救國軍一團二團，由此大開殺戒。由殺地富反壞右及其沾親帶故的 12 種人、21 種人，擴大到不服從安排的、不聽話的、出工不積極的各色人等，最後演變成一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白水的李作才，廣西大學畢業後參加國民黨軍隊，軍訓一年後從教，從桂陽流峰中學教導主任位上開除回家，老老實實在生產隊勞動。凶手對他要用鋤頭挖，他本人要求用槍打，因未擊中要害，凶手硬逼他兩個兒子用石頭把父親活活砸死。中山大學外語教師尹禮幹，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被殺，凶手以“父病危速歸”的電報騙他回去，未到家門，就被鋤頭挖得半死，然後活埋。有的被木棍插進陰戶、肛門致死，有的被捆綁跪地，看著老母、妻、妹被強姦、輪姦，然後用繩子牽著手脚，逼到水庫淹死，有的強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邊，再逼迫親人挖死。老的年已 80，小的才兩三歲，強令一家人坐好，用鋤頭一個一個挖得半死，再拖出丟在水庫或土窖裏。慘絕人寰，罄竹難書。

常寧縣殺人，是廟前公社開的第一刀，很快傳到東鄉、北鄉，延及大半個縣。據政府後來統計，常寧此次共被殺 83 人。廟前公社武裝部長和一批造反派，仿效鄰縣道縣，私立“人民最高法庭”，一次就殺死 25 人。被殺者中有個李明番，常寧解放時，此人還在念大學，因上有父兄，土改時未遭大磨難。可是後來的各種運動，他一次也未得幸免。這次殺人風一起，李明番在劫難逃。他問殺人凶手：“我犯了什麼錯誤？”“什麼錯都沒有呀！”“那爲什麼要殺我？”“因爲你家從前有很多田地！”

樟塘大隊的王書記聽到廟前公社殺人了，也興奮起來。爲表達對毛主席的忠心，王書記決定拿大隊的幾個地主開刀。他召集大隊治安主任陳主任，民兵營長張營長，貧協會段主席開會，大夥立即通過了書記的決定。他們先從外地遷來的地主廖常吉、張靖光和本地壞分子段綿祚開刀，再來收拾這些人的子女。

1968 年 11 月 3 日夜，張營長率領一支基幹民兵，手持梭標，來到廖常吉家。廖家土改時被劃爲地主分子，掃地出門，遷到樟塘鄉。前幾年老婆死了，廖常吉帶著 15 歲兒子過活，老老實實，埋頭苦幹。一陣猛烈的捶門聲把廖常吉從夢中驚醒。他從床上爬起，才撥開門門，一夥民兵擁進來，把廖常吉和他的兒子廖樹聲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沒有犯法，爲什麼捆我？”民兵也不聽他叫喊，到處亂搜。搜了一陣，忽然一個民兵猛地扯下蚊帳，抽出帳竿一抖，從地上拾起一個紙卷，用手電筒一晃，說：“這不就是黑殺隊的黑名冊嗎？”說著狠狠一拳，打在廖常吉臉上：“黑名冊都找到了，還有什麼話說？”“把他們帶到大隊部去。”民兵營長下令。廖常吉父子一路哭喊：“我不是黑殺隊！我不是黑殺隊！”

大隊部牆上打個木樁，梁上懸一根棕繩，地上放著紅磚、木棍等等。王書記升堂審案，幾個大隊主要幹部圍坐兩旁。“你組織黑殺隊，要殺共產黨和幹部，參加的還有哪些人，從實招來！”廖常吉脆著哀求道：“王書記呀！我沒有參加黑殺隊呀！”王書記在桌上猛擊一拳：“廖常吉，你要老實！”又揚起手裏的紙卷：“你看，這是什麼？”“我不知道！”“頑抗！”所有幹部和民兵都怒吼起來。“到底招不招？”王書記咬牙切齒。廖常吉始終一句話：“我不曉得呀！”“不曉得？”王書記獰笑著：“好！大刑伺候，扳繯！”

幾個民兵如狼似虎把廖常吉雙手一剪，用繩子一捆，把他吊在梁上垂下的粗繩子上，往上一拉，廖常吉雙腳離地，升到半空。王書記撈著一根木棒，對著廖常吉腰部、腿部一陣亂打，邊打邊問：“你招還是不招？”

廖常吉身子像打秋千一樣在空中搖晃，再也忍不住了：“我招！我招！”王書記命令民兵放下。幹部們齊聲喊叫：“快招！”廖常吉換了一口氣說：“我實在不曉得。”幹部和民兵又一陣怒吼。王書記發令：“擰面。”幾個民兵把廖常吉架到另一間屋，開始還聽到淒厲的慘叫，漸漸地聲音轉弱，直至沒了。一個民兵驚慌地跑來報告：“廖常吉死了！”書記似

乎非常老練地說：“不會死的，用冷水潑他頭上，會醒過來的。”

這時段綿祚、張靖光也帶到了。王書記命令把段綿祚拉上來。五花大綁的段綿祚立刻被拉來跪在王書記的公案前。王書記揚起手中的紙卷道：“這是黑殺隊的綱領和名單，快認了吧，免遭皮肉之痛！”段綿祚被民兵抓來還不知是怎麼回事，這一問才知道要追查黑殺隊，搖頭說：“是還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明白，因與王書記有宿嫌，自己雖然不是地主分子，也掛號“壞分子”，這回是有死無生了。

“廖常吉已認招了，你不招？”王書記轉臉命令民兵：“給我扳繯！”段綿祚痛得受不了，只得說招，待放下來，又不說了。治安主任把段綿祚拖去坐老虎凳，淒厲之聲，在寂寞的夜空，鑽山刺心，毛骨悚然。

下一個押進來的是張靖光，王書記開門見山對他說：“廖常吉已經供你參加黑殺隊，不信你和他對質。”張靖光沖到廖常吉面前喊道：“你說我參加黑殺隊，我在哪里和你參加了？你死還要把我搭進去嗎？”廖常吉直挺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經是一具僵尸。王書記把一份黑殺隊名單抖出來給張靖光看，張靖光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目瞪口呆，嚇得魂不附體，說道：“我不知道。”“胡說！花名冊上分明寫著你的名字，不由你不承認。在你的名字下打個指模！”幾個民兵抓住他的右手拇指，強按了指模。王書記接著問：“張靖光，你們組織黑殺隊要抓哪些人？”張靖光這時哭了：“我根本不曉得什麼叫黑殺隊，更不曉得要殺哪些人。”“死到臨頭還不老實，扳繯！”王書記又下命令了。

最後，王書記命令民兵把廖、段、張三人押到廂房裏禁閉起來，接著召開群眾大會。全大隊男女老少在大隊部前空地上圍成一個圓圈，所有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都跪在圈子外面，廖常吉、段綿祚、張靖光一字排開跪在圈子中心。王書記威風凜凜，咆哮走來，給張靖光當頭一棒，然後喝道：“你還裝什麼蒜？開門爭會啦！”轉過身，把木棒交給治安主任說：“這些傢伙不老實，給我狠狠地打。”治安主任接過大棒，對準張靖光又是一棒，張當即昏倒。治安主任逐個審問，無人承認參加黑殺隊，每人挨了一棒。弄了半夜，沒弄出個眉目，王書記下令：“接原計劃辦，拉出去算了。”

民兵們如臨大敵，全副武裝，手持鳥銃、梭鏢、鋤刀、棍棒，殺氣騰騰，押著四類分子，連拖帶推，向殺牛皂走去，群眾跟在後面。殺牛皂是個亂石山崗，因曾常在這裏殺牛，故得此名。民兵先令四人朝北跪下，向毛主席請罪，四個背鳥銃的民兵站在他們後面，四類分子們跪在死囚側面，群眾圍成半個圈子。治安主任扯開嗓門喊：“大家不要吵了，聽王書記宣判！”

王書記站在一塊高高的石頭上，亮開嗓門高喊：“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南省常寧縣樟塘公社樟塘大隊人民法院，宣判廖常吉父子和段綿祚、張靖光等四犯死刑，立即執行！”話音剛落，治安主任喊：“開銃！”貧協主席的鳥銃對準廖常吉的頭，啪的一聲，人應聲倒，腦漿四迸，鮮血亂濺。接著，十幾歲的廖樹聲也隨著爸爸離開人間。

“打段綿祚！”銃聲響處，段綿祚應聲倒地，但沒有斷氣，人在地上翻滾、掙扎。馬上加藥，上彈子，再填兩銃，仍沒斷氣。“再填銃！”凶手已經雙手發抖，再也不敢動手了。幾個民兵拾起亂石，對著三具尸體一陣亂砸，頭顱都被砸得稀巴爛，認不清是誰了，慘不忍睹。有人開始偷偷地走了，治安主任大喊：“會沒開完，誰也不准走。”王書記急喊：“民兵營長！民兵營長！打張靖光！”

這時民兵營長也嚇得魂不附體，周身發軟，手脚無力，聽到王書記叫喚，銃都舉不起來，群眾三三兩兩向殺牛皂山下散去，幹部們再也無法阻住。有人向王書記示意，張靖光再也不能殺了。書記見勢不妙，連忙改口：“把張靖光押回，下次再處決。”後來樟塘公社朱書記來到樟塘大隊，與王書記談話，又開大隊幹部會，命令張靖光與其他幾個四類分子掩埋尸體。

廖常吉的弟弟廖常美，常寧師範畢業，不到 20 歲就于 1950 年投身小學教育，已有 10 多年教齡，教學認真，熱愛學生，深受群眾歡迎。11 月 3 日，廖常美回家，妻子彭延秀告



訴他：“你哥哥挨打了一頓。”常美說：“一個四類分子在生產隊挨打挨鬥，是家常便飯，有什麼奇怪的。”吃完晚飯便睡覺了。

半夜時分，忽然有人捶門，廖常美被驚醒。彭延秀急忙披衣起床，剛點了燈去開門，一條漢子已經衝開門闖了進來，後面跟著幾個手執梭鏢的紅衛兵。常美匆忙爬起，一條漢子搶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服前襟，喝道：“自己拿繩索來！”“半夜三更拿繩子幹什麼？”“你還裝蒜？”一個紅衛兵自己動手，從穀籬上扯出一根綜繩，把廖常美雙手一剪綁了起來，押往大隊部。

次日一早，消息傳來，哥哥、侄兒昨晚已被烏銃打死。11月5日上午，廖常美被提審。“你交出黑殺隊的團夥，想殺哪些人，快快從實招來。”“我不曉得什麼黑殺隊，更沒有想過殺人。”“看來不打不招，給我扳繮！”廖常美和他哥哥一樣，被懸升到半空，邊打邊問：“招不招？不招再加土磚。”一塊60多斤重的土磚吊在他脚下，上懸下墜，一身骨頭全被拉裂。慘叫聲中，砰的一聲，人從半空掉了下來，繩子斷了。審訊者還用梭鏢狠擊常美的頭，鮮血直流。

下午，大塘學校來了9位教師，其中的兩位，曹得億和黃國成，到大隊找到審訊的人說：“廖常美是我公社的教師，他的問題由我們來處決。”審訊人不答應。曹老師叫人把牢門打開，進去看廖常美。看見這麼多同事來看望他，廖常美淚如雨下。曹老師忍不住雙淚直流，問他還能不能走。“我的腿已經斷了，不行了。”紅衛兵連聲催促：“快出！快出！我要鎖門了。”同事們眼見無法救出，只得返回。

6日早晨，一隊紅衛兵到廖常美家抄家，以為還可撈點油水，可是滿屋搜遍，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便把豬圈裏一頭還沒長成的豬殺了，每人分了一塊肉，臨走對常美的兒子石居說：“你背條梯子到大隊部來。”石居問用梯子做什麼，他們沒回答。石居去大隊部給父親送飯，沒背梯子。走到門邊喊：“爸爸，送飯來了。”裏面沒動靜，從窗口探頭一望，只見爸爸正準備上吊。石居急得哭喊：“快開門呀！我爸爸上吊了！”紅衛兵急打門，門却是門著的。一個人把門衝開，拖住廖常美。紅衛兵從他手裏搶過繩子，騙他說：“你莫自殺，我幫你想辦法。”廖常美不相信這時候還有誰要救他。一場驚恐，飯當然也吃不下去了，兒子只得一步一回頭望著快死的爸爸告別而去。

上午，紅衛兵持馬刀到廖常美家，喊石居趕快背梯子去。梯子背到，紅衛兵把廖常美綁在梯子上，手持烏銃、梭鏢、馬刀列隊夾道簇擁而行，徑直抬到烟州嶺。一個劊子手將烏銃對準廖常美後腦殼，開銃，彈子從後腦打進，從額骨出來，另一銃對準肚子再補一次。廖常美鮮血橫流，氣絕身亡。“石居！把你父親拖去埋了。”常家慘劇就這樣收場了。

樟塘大隊有個青年貧農，嚇得手腳顫抖，雙膝跪在大隊王書記面前請罪求饒：“書記，我該死！我該死！討了個地主女兒做老婆，立場不穩，背叛了本階級。我老婆是地主子女，該殺，但是我請求留下我那一半！”“你這話是什麼意義？”書記莫明其妙，反問他。“她肚子裏的胎兒有我貧下中農一半的血脉。”“這個？不好處理，沒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說吧！”不久殺人風得到制止，這個地主子女的命總算留了下來。

衡頭斛林村，曾經當過甲長的貧農尹修士，請了一個篾工在家裏織籬筐，羅橋公社突然來人將篾匠抓走，說他是地主，參加了黑殺隊，尹修士本人也以窩藏黑殺隊的罪名被公社來人抓了起來。一個基幹民兵揮舞著梭鏢，村前屋後轉個不停，防止黑殺隊進村。轉到自家門口時，這個基幹民兵似乎看到一個人影鑽進了自己家。他非常警覺，認定必是黑殺隊無疑，趕緊往家追。追到屋裏，他聽到床底下有響動，二話沒說，猛地一梭鏢往床底下捅去，只聽哎呦一慘叫。拖出來一看，這個基幹民兵立即暈倒，原來竟然是自己的親妹妹。他妹妹聽說黑殺隊進了村，嚇得躲到自家床底下。這一梭鏢用力好猛，妹妹立即身亡。

龍門洞聽說地主富農組成黑殺隊要殺貧農，立即將兩戶地主全家老小11口抓起來活埋。新力公社一個被改造了近20年的地主兒子，因黑殺隊嫌疑，被造反派活埋，剩下一個12歲的

女兒和一個9歲的兒子。中午，兒子扯豬草回來，姐姐早已把飯做好，叫弟弟來吃。弟弟看姐姐停筷不吃，吃了半碗也不吃了。姐姐忍著泪水央求弟弟說：“好好吃飽，這是最後一餐了！”弟弟不懂得姐姐是什麼意思，胡亂把那半碗吃完了。

紅衛兵早就守候門口了，一看飯吃完了，立即闖進來，對兩個小孩說：“帶你們看爸爸去。”姐弟倆默默跟著紅衛兵走出家門。走進一座荒山，一個小洞早已挖好，紅衛兵叫姐弟倆自己跳下去。姐姐早知爸爸已死，活著也沒希望，不喊也不哭，帶著弟弟往下跳，弟弟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大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幾個紅衛兵順勢一推，其他幾個紅衛兵趕緊填土，不一刻，土平音滅。

---

生命比任何教條更神聖。 焦國標書

---

## 《黑五類憶舊》第十五期 20110901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推薦邪靈說 焦國標

大家都有一個感覺，中國有太多的事，常人根本無法理解，遠的如毛時代黑五類的遭遇，近的如向朝鮮、古巴學習控制輿論或溫州動車慘案的處理步驟。然而最近我找到一個理論，可以輕鬆解釋這些費解的事，就是邪靈說——之所以中國會發生這些事，是因為邪靈穿上人的皮囊作祟。

隨著真相越來越多的公開，對毛的評價也越來越兩極化：一極是歷史偉人，另一極是超希特勒、超斯大林的罪人。然而長期以來，這兩極評價都不能熨帖我對毛的感覺。找到邪靈說之後，我對毛的感覺著地了——毛是偉人，也是罪人，更是犧牲品。他一生，打敗了一切政治對手，害死幾千萬人的性命，真正做到了莫之與京、莫之與毒，登峰造極，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儼然一個十足的偉人；然而他的登峰造極是倒向的——頭朝下地登峰造極，最後他的頭卡在漏斗狀地獄的尖角裏拔不下來，仿佛成為罪人中的罪魁。中國歷史上不乏罪魁，可是毛號罪魁却是唯一的，諸如土改鎮反按比例殺人，正常年景下餓幾千萬人，大躍進放畝產幾十萬斤的衛星，文化大革命毀滅一切既有文化，莫不是蝎子放屁——獨（毒）一份。問題是，毛的頭為什麼會倒著卡在那個尖

角裏？他的統治為什麼會那麼遠地背離普通的人性、理性、常識和倫理？把這一切都歸到他個人的心思意念上實在是太表像了。終極的解釋應是有一個比他本人強大得多的邪靈附體于他，邪靈穿著毛澤東統治中國，給中國人帶來一場曠古未有的摧枯拉朽、玉石俱焚和腥風血雨，害了毛自己，也害了他的人民。

一個土改時被殺地主的女兒，父親被三槍兩刀殺害後，衆目睽睽之下把帶余溫的父親的屍體背回家，葬在後山，年方十九歲的她，一個黃花閨女，因此壯舉被土改流氓脫光衣服乳頭挂上石頭批鬥，想了大半輩子也想不通毛時代的種種違背起碼理性和人性的做法。晚年她有一個解釋，說毛可能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只是他是一個愛胡亂試驗的理想主義者。這個解釋很膚淺，很虛飄，實際上是毛和他的同志都被邪靈充滿，他們滿口胡言，行為癲狂，成為專門實踐歪理邪說的群體。一個土改時全身多處被紡錘打傷，腐爛生蛆，最後活活痛死，終年 49 歲的地主，幾十年後他的孫子對於爺爺的遭遇有這個一個解釋：“我不相信共產黨這麼壞，也不相信毛主席知道我們村有個地主，應該是我們本地人心黑（害了我爺爺）吧。”實際上你爺爺被打死時，無論共產黨、毛主席，還是害你爺爺的本地黑心人，都處於邪靈附體的狀態。

每個 60 前的中國人都認識幾個地主，因為幾乎村村都有地主，地主就是他們的親戚鄰居，地主是怎麼發家的，地主的日常生活什麼樣，他們都很熟悉——地主實在就是他們身邊的普通農民，是他三舅二大爺，可是毛却說：“地主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試問地主附屬於哪一個帝國主義？是英帝國主義還是美帝國主義？抑或日本帝國主義？如此基本的事實都已不講，毛已不是毛，完全是邪靈在發話，他的嘴已不是他的嘴，而是邪靈的出口。

曹禺的女兒萬方有一次提及父親時寫道：“他晚年的痛苦在於想寫，却怎麼也寫不出來。他不知道怎麼寫好了。老覺得，這麼寫對嗎？這麼寫行嗎？他的腦子已經不自由了。”對於曹禺這種現象，有種種解釋，然而最終極的解釋是儘管他政治上翻身了，但邪靈還住在他裏面。西諺雲：“弄髒自己窩的鳥不是好鳥。”當下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高級裸官，一面在中國拼命撈錢，糟蹋中國，一面隨時準備棄窩逃跑？無他，邪靈附體了。還有張召忠先生評伊拉克和利比亞，不也是被邪靈穿上了嗎？

發現邪靈說以後，我以前的許多體驗變得透明了。比如在華盛頓看白宮，在倫敦看白金漢宮，我都感覺好似在看一個大熊貓籠子，有趣、輕鬆、無危險；可是每次我走在北京的府右街上，感覺却完全不同，非常壓抑，仿佛危險隨時會從門裏竄出來，從牆上翻過來，撲向路人，令人毛骨悚然、栗栗危懼。為什麼會給我這個體驗？過去說不清，很混沌，現在很容易解釋，因為幾十年來海裏盛滿高濃度的邪靈，氤氳，駘蕩，涌動，其氣場攫人魂魄，如《聖經》所言：“魔鬼如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再如北京大學，多美的校園啊！可是從來每次在園子裏走，我都有一種被某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籠禁著的感覺，使我不得開心舒展。過去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現在我知道了，是邪靈。日前李克強副總理訪問香港，去一趟香港大學，引起軒然大波，校長一再出面道歉，讓人覺得港大真陽光，人氣真旺啊！反觀北大，前不久一個老右派校友 70 多歲的閻桂助在校長辦公樓竟被保安打傷，如此陰行惡狀，沒有人的影子，實在不好解釋，現在很容易解釋了，是邪靈穿著北大校長在北大做主做王。

2011-8-30 北京

## 目 錄

鋼琴教授許路加……………許濟華（05）

地主婆之死·····	賈 芝 (08)
向劉文學哥哥學習·····	李雲亭 (09)
我是地主的孫子·····	王振武 (11)
同學賈菊紅·····	楓 語 (15)
一個地主分子的檔案·····	齋 主 (17)
北京的高幹子弟·····	杜晶晶 (20)
紅河州勞教所·····	李 斌 (22)
劉少奇夫婦稻草人陪我示衆·····	楊文培 (30)
瀋陽皮鞋二廠吳杰·····	薑萬里 (32)
我的姨媽·····	李 金 (33)
大難大忍唐賢輝·····	朱健國 (37)
歷史反革命大伯·····	布 忙 (48)

---

## 西風頌 焦國標書

---

鋼琴教授許路加 許濟華

許路加 1931 年 6 月出生在南昌一個牧師家庭。三歲那年隨父母湖邊游玩，不小心落水，父母急忙跪下向神禱告，一陣南風吹來，把他吹到湖邊。許路加從小喜歡彈鋼琴，可是家窮沒錢支持他學琴。一位鋼琴老師覺得他有鋼琴天份，免費教他。

許路加嚮往到蘇聯深造琴藝，以出色的成績考入瀋陽魯迅文藝學院（後改爲瀋陽音樂學院），這是通往蘇聯的最佳捷途徑。由于基督徒身份和家庭背境，他不能出國深造，也不能代表國家出國表演。在該院任教的蕭邦第十代傳人學生，波蘭華沙音樂學院的霍爾諾夫斯卡主任教授非常欣賞徐路加，收爲門徒。1956 年，許路加獲得瀋陽音樂學院授予的鋼琴碩士學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培養的第一屆鋼琴音樂碩士，并被霍教授授爲蕭邦第十一代傳人學生，隨霍教授到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巡迴演奏西方經典鋼琴名曲。？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教會被封，教堂改爲倉庫、廁所或學校，許路加的父親被抓去挂牌批鬥，勞動改造，放羊，陪人槍斃，槍聲響後，他人死了，他的父親却活著，如此多達十次，父親嚇瘋了，得了精神錯亂症。許路加因是牧師的兒子，又是基督徒，被學院的紅衛兵捉出來揪鬥。家被抄，樂譜被一頁一頁檢查，看看有沒有發電報符號，琴鍵被一根一根抽出來，看是否可以發電報，院子被掘地三尺。那年冬天，學院搞軍訓，行軍路上批鬥他，不許穿衣服，赤裸身體在火堆上批鬥。紅衛兵拿出燒得通紅的火鉗挨近他的身體，他聞到了汗毛燒焦的氣味。

一次學院舉行公開批鬥大會，紅衛兵要他在毛像前下跪敬拜低頭認罪。這是不可能的事，毛不是全能的耶穌基督，我絕不下跪。紅衛兵被激怒了，死按他下跪毛像，許教授寧死不從。他們用腳踢他的腿腰，用拳頭打他。許教授心裏祈禱：“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憑你的公義搭救我。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爲你名的緣故，引導我，指點我。求你救我脫離人爲我暗設的網羅，因爲你是我的保障。”一個紅衛兵學生從地上拾起一支一寸半長的生鐵釘子，和幾個紅衛兵把他按倒在地，要把釘子釘在他的人中穴上。一個工宣隊的領導擔心若釘不死許教授，留下疤痕，于他不利，就叫紅衛兵把釘子從他

右鼻孔釘下去。許教授心裏禱告：“神啊，假如我死了，讓你接我去。不死，贊美神。”這個紅衛兵學生就從地上拾起一塊磚頭，將釘子從他的右鼻孔釘了下去，在兩顆門牙的牙根之間穿過。牙根破斷了，許教授暈死過去。

不知經過多長時間，許教授蘇醒了，嘴紅腫，滿身血，也不知那裏來的勇氣，看到釘在鼻孔上的釘子，竟然自己伸手用力拔了出來，也不知痛疼。他伸手捏一捏自己的大腿，感覺有點痛，知道自己還沒有死。披著滿身鮮血，腫脹著鼻嘴，許教授爬回自己的家，太太一見，立即暈倒了。？

嘴腫不能吃東西，不能說話，牙根破斷，他去找一位牙醫友人醫治。牙醫被抓去下鄉勞動，只有兩個赤腳醫生在那裏。一看許教授的情形，二人認定他是反革命分子，用綑帶把他綁在椅子上，也不打麻藥，用鉗子拔出兩顆門牙的斷根，塞塊棉花就叫他走。後來那位牙醫朋友知道了，說兩位赤腳醫生用的鉗子是錯的，拔牙的方法也是錯的，很容易發炎，得破傷風死亡。許教授居然沒有發炎，兩二個星期後，嘴好了。

惡徒還沒完，又將他抓回學院裏的“牛棚”。許教授在牛棚裏繼續唱詩贊美神，基督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紅衛兵就每天打他，捏他，向他吐痰，不准唱。久而久之，紅衛兵一天不打他，他反而更害怕，不知又有什麼刑罰對付他；打了，心裏反而舒服，一天就安然了。許教授仍然贊美神，紅衛兵用膠布十字形封他的口，他就在心裏哼唱。每天兩餐吃飯時，膠布被撕下，如此下來，嘴破了，嘴上的汗毛沒有了，嘴上留下血紅的十字架。？

紅衛兵要他改名，不准叫許路加，因為這是美帝國主義的名字，要改為許文革。許教授堅持不改，紅衛兵就用彈琵琶的指甲捏他赤裸的背脊，每捏一下就出現一個血泡。他強忍住不出聲，心裏哼著“我是基督的精兵”抵擋痛楚。每捏一次，血泡就多一個，強忍著，嘴唇也咬破了，後來有二十多個血泡，也不覺痛。神經已經麻木了，只是不能躺在床上，只能俯臥在床上，也不能穿衣，穿上衣服會痛。那時是冬天，不穿衣服，沒有發炎，也沒凍壞，而漸漸康復。

許教授不屈服，紅衛兵知道彈鋼琴離不開手指，就想把他的手弄斷，要他以後再不能彈鋼琴。許教授有一種軟弱的衝動，想自殺，但這時似有聲音在耳邊響起，“身體是神的殿”，不可損壞，不能自殺，他跪下向神禱告，求神饒恕。紅衛兵用五根竹筷子夾在他的手指之間，先用手捶下去。竹筷子不斷，他們手痛，就改用紅磚捶。紅衛兵哈哈大笑，每捶斷一根筷子就唱一句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許路加的手指被捶腫，皮破血流，發紫見骨，指尖指甲也爛了，血肉模糊。紅衛兵恐嚇說，這事別讓人知道，否則殺了你全家。沒有醫藥綑帶包扎，太太只能用又髒又破的舊褲子為他包扎，沒有上藥，血皮與布連在一起。筷子斷了，但他的指骨沒有斷，而且在這種情形下手指最後竟完全痊愈了。今天他還可以利用神賜給他再生的手指，以美麗的鋼琴音符贊美神。？

1983年，許教授和太太調到北京中國音樂學院任教，後來兩次在北京崇文門基督教堂任司琴，為原駐中國大使、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布什先生彈奏《恩友歌》贊美神。1989年8月，許教授在神的恩典下出國，旅居菲律賓，並在北美地區作巡迴表演贊美神。1997年10月，許教授以音樂家資格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許教授說：“我前半生所發生的一切，只是神對我信仰上的考驗。耶穌基督說，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蝎子，又勝過仇敵的一切能力，斷沒有什麼能害你們，我的一切乃是基督勝利的宣告。”

地主婆之死 賈 芝

土改期間，廣西發生一起地主婆凶殺案。這個地主婆有一個公公，四個孩子。工作組進

村土改後，有一天她拴好大門，拿了菜刀，到上房去殺公公。公公說：“你不要殺我，我自己死！”說罷老頭立刻懸梁自盡。這時她的大女兒發現她媽要殺人，就開門逃了出去，邊跑邊喊叫：“救命啊！救命啊！地主婆殺人啦！地主婆殺人啦！”

地主婆追出門外，沒有追上女兒，返回頭又把門反扣上，從櫃子裏把家裏的幾床新棉被都拿出來，一條條鋪在地上，然後動手把自己的三個孩子一個個殺死。孩子嚇得亂哭亂叫，她全然不顧。殺死一個孩子，她便把屍體倒拎起來，把血澆在新被子上，箱子上，到處灑。連殺三個孩子，把屍體并排平放在被子上，還把牆上挂的烟葉取下來，在烟葉上也灑滿血。她的意思是：你們窮人休想蓋我的新被子，我的烟葉也叫你們抽不成！我什麼也不能給你們留下！最後，她用小刀抹了自己的脖子，躺在被子上。

廣西土改工作隊幹部宋景山接到凶殺案緊急報告，立即趕到肇事地點。村土改工作組缺乏鬥爭經驗，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宋景山帶一個勤務員到現場看了看，立即下令把全村的地主分子都集中起來，村幹部和土改隊員也都到場。宋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擺，說：“你們看看，這個地主婆竟然下手殺自己的孩子，自絕于人民。誰要願意學她，願意自殺的站出來，老子立刻槍斃他！”沒有動靜。宋接著說：“現在分兩邊站，誰要自絕于人民的站過去，不願頑抗到底的留下別動！”結果沒有一個人站過去。

向劉文學哥哥學習 李雲亭

“渠江水呀彎又長，有顆紅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劉文學，他是我們的好榜樣。”我讀小學二年級時，劉文學的事迹傳遍全國。他是新中國誕生的第一個少年英雄。1959年11月18日晚，劉文學幫隊裏幹活回家的路上，發現地主分子王雲學正在偷摘集體的辣椒。他當即大叫一聲：“地主偷辣椒啦！”王見事情敗露，拿出一塊錢想收買他。劉文學立場堅定，高聲叫道：“誰要你的臭錢！”在與王雲學的搏鬥，劉文學終因年幼力薄被活活掐死，年僅14歲。

劉文學哥哥爲了保護集體的辣椒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假如有一天國家和集體財產遭受侵害，我們也應該像他那樣捨生忘死！國家和集體的東西再小，也比我們個人的生命珍貴。哪天生產隊裏的馬駒或羊羔掉井裏了，我們少先隊員就應該毫不猶豫跳進井裏去搭救，這叫學英雄見行動。

劉文學是被老地主害死的，其實這老地主并不老，被槍斃時只有37歲。我家所在的生產隊有個名副其實的老地主，老得走不了路，躺在炕上下不了地，開批鬥會時沒有精力擔當活靶子，由兒子“代父出征”。後來老地主的兒子死了，我們生產隊就沒有地主分子了，可是到學習劉文學時，老地主的孫子竟又成了被鬥的地主分子。他那時20歲出頭，剛剛娶了媳婦。我和他弟弟是同學，原來叫他大哥，自他接了爺爺班成了小地主，我們就認定他是壞人，不再叫他大哥了。

現在孩子們過六一，鮮花環繞，鼓樂齊鳴，我們那一年的六一節是在階級鬥爭中度過的。“毛主席萬歲！”“不忘階級苦！”“打到小地主！”在這些口號聲中，小地主被押進來。也沒搭臺子，他就站在我們前邊，嚇得渾身哆嗦。我們低年級同學跟著喊口號，高年級的少先隊代表發言，都是念老師寫好的稿子，多半是問小地主想不想復辟資本主義。

在學習劉文學的活動中，我們幾個小夥伴合計：要看住小地主，一旦他去偷摘生產隊的辣椒，我們就喊：“小地主偷辣椒啦！”他要是拿出錢來收買我們，我們當然就說：“不要

你的臭錢！”寧肯被他打死，也不讓他把辣椒拿回家！這樣我們就成了劉文學那樣的小英雄！可是小地主並沒有給我們創造當英雄的機會，他從來不偷公家的東西。我的同伴們並沒有因為他規規矩矩而放過他，在參加隊裏勞動時，走在路上時，只要一碰面，就有孩子喊：“小地主，大壞蛋！”

懂事後，我心裏納悶：我的這位小地主大哥，土改時還不到 10 歲，怎樣能讓他接著戴他爺爺的地主分子帽子呢？後來得知，那一年生產隊裏餓死了人，是他的親戚，他這樣哭訴：“怎麼就活活餓死了，你死得冤哪！”這話傳到大隊黨支部書記耳朵裏，書記把他叫去警告：“以後不許說餓死了人，就說病死的！”他和大隊書記發生爭執，情急之下出言不遜，竟說書記“沒有人味兒”。就因這句話，書記讓他繼承了他爺爺的地主分子帽子。

1979 年小地主被摘帽，書記怎麼也想不通，沒了階級鬥爭這根弦，壞人頭上沒了帽子，隊伍還怎麼帶？“地主富農解放了，咱貧下中農還吃香嗎？”可是他阻擋不住改革的洪流。如今老書記已過世，他的孫女嫁給了小地主的兒子，兩家成了親家。鄉親們說：“兩家原本就不是仇家，是叫階級鬥爭把人忽悠暈了。”

---

我爺爺是地主，多次遭受殘酷批鬥，全身多處被紡錘打的方塊腐爛生蛆，最後活活痛死，終年 49 歲。以前學歷史，說地主如何如何壞，我便恨起自己的爺爺來，後來多次與當年貧佃農閑聊，得出的結論是爺爺是個好人，死得很冤枉。

網 友

---

我是地主的孫子 王振武

我出生在祁連山脚下洪水河畔的上柴村，爺爺和一位小奶奶是地主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他們幹最艱最苦的活，開群眾大會時被立在主席臺前遭人批鬥唾罵，她們的子子孫孫也是理所當然的地主狗崽子，任人欺侮，任人咒罵，任人驅使。

爺爺是清末廩生，地道的讀書人，民國時與他的父親一起捐出家裏多年集聚的錢糧物資，折合資金三萬圓，建修了上柴村最早的學校（鹿上號保第二國民學校）。民樂縣縣長張聲偉專門樹立一塊“鹿上號保第二國民學校建修紀念碑”，以褒其功德。爺爺先後在金山書院（洪水小學）、五聖宮等學校教過書，擔任過民樂建縣以來的第一任督學。土改時，教書的爺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從此以後，爺爺再沒進過學堂，更不用說執教傳道授業解惑了。他本來寫得一手好書法，如今也派不上用場子，連給自家門上寫對聯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有一年春節，我家大門上的春聯橫額是“提高警惕”四字，這是毛語錄中的話。駐村工作組的人責難說：“地主分子提高警惕想幹什麼？要反攻倒算？”爺爺只好自己臭罵自己一頓表示悔改，並摘除了“提高警惕”門額。解放後的二十多年，爺爺寫了一份接一份的檢討書和決心書。他不僅要把自己的檢討書和決心書寫得工工整整，還要把不識字的小奶奶的檢討書和決心書代寫得工工整整，以此表明自己接受勞動改造的誠懇態度。

下雨下雪，年頭節日，冬季農閑，廣大貧下中農都在家睡大覺，諛閑傳，玩牛九牌，地主分子們還要幹永遠也幹不完的活，使東不敢往西。爺爺奶奶們不但要把莊戶大院裏的院落打掃乾淨，把垃圾或積雪清理掉，還要冒著嚴寒帶上工具，把大隊辦公室和院落裏的垃圾和積雪清理乾淨。大隊裏所有碼煤塊、掏廁所的工作都是地主分子盡義務完成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洪水公社遷新址，我爺爺六十多歲了，照例是做義務工挑重擔的勞動力。有一天推架子車，冷不防被撞住胸口，頓時口吐鮮血。實在無法支撐了，才請假到醫

院做檢查，結果是肺葉破裂，急需住院治療。錢花了一大堆，都是親戚想辦法解決，公家沒給一分錢，連起碼的關心和問候都沒有。七十年代中期，上柴學校遷新址，小奶奶已六十多歲了，一個小脚老太婆，有一天義務給學校刮椽子，突然幾十根椽條和椽子倒下來，壓在她身上，疼得哀號不止。後經醫生檢查，腰椎砸斷，下肢癱瘓，成了廢人。家裏窮得無錢醫治，大隊學校又不給一分錢，奶奶忍著劇痛和心酸，在病榻上艱難地度過五六年，最後抱憾終生鬱悶謝世。

爺爺的一個遠房堂弟是大隊貧協主席，家裏窮得叮嚀響。他沒文化，人又愚鈍，缺乏主見，閒暇時常到爺爺家喧謊聊天，少不了在爺爺家抽煙吃飯。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他貧協主席的烏紗帽不明不白被擄掉了。也許是受別有用心的人的教唆，我爺爺在主席臺上過堂挨鬥時，這個弄丟貧協主席烏紗帽的堂弟打得最狠鬥得最凶，說因受我爺爺拉攏腐蝕才丟了貧協主席的烏紗帽。

作為一位拿出家產三萬圓為村上建修學校并親自執過教鞭的善人、師長，爺爺理應受到莊戶人的尊敬。可是在那年月，爺爺却遭到自己的學生的毆打和唾罵。每次挨批鬥時，一位姓張的學生除了給我爺爺戴高帽子、打鬥，還往爺爺身上抹糞子，吐唾液，打鬥得最狠毒，辱罵得最厲害。他給我爺爺造成的心理創傷，爺爺至死都沒忘，不肯原諒。

當時生產隊大力號召積肥，冬閑時家家戶戶都把平時起早貪黑撿到的牲畜糞用筐運到肥料場，論斤計工分。滴水成冰的季節，一些貧農家庭運來的積肥冰塊多糞便少，生產隊長却不敢說一句斥責的話。我爺爺運來的肥料很少有冰塊，可是生產隊長還是挑剔責難，說潑了水了，凍成冰塊了。無論你幹多好，他們總能找藉口挑毛病數落你，斥責你。

我的父輩和年齡大一些的哥哥們也同樣遭受不公正對待。我的一個伯父，本是民樂縣第一個大學畢業生，最初在民樂一中教書，由于成分不好，被劃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一個叔父，大學畢業後由于成分不好，沒敢回老家，遠走玉門教書。在玉門，叔叔的教學水平和書法藝術都是頂呱呱的，可是因成分不好，雖然身材高大一表人才，却找不到對象。他曾經教過的一個女生，非常崇拜他，死活要嫁他，最終還是被父母棒打鴛鴦散。直到過了不惑之年，這個叔叔才與一個死了丈夫的小學教師成家。由于二人性格不和，加之文革期間遭受折磨，叔叔英年患上肝硬化，過早辭世了。

另一個叔叔天性倔強，不願忍受責難，常與生產隊長頂牛，難免招來隊長詛咒和臭罵。悲憤和鬱悶忍無可忍，這個叔叔便大著膽子犯了一次不可饒恕的錯誤，案發後被公安局逮捕法辦，遣送到一個石膏礦接受勞動改造。叔叔有文化，新技術接受消化快，改造時間不長便成了礦上的挖掘機操作能手，贏得了管教部門的重用，立功減刑。刑滿釋放後，礦管委留下他，錄用為正式技術工人。不久，老大不小的叔叔還找了一位年輕有文化的姑娘為妻。

我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同樣飽嘗了地主狗崽子的辛酸和屈辱。小時候我就不清楚地主這個概念是怎麼回事，更搞不清自己怎麼就糊裏糊塗地生在地主這個倒黴的破家。隨著年齡增長，加之地主狗崽子時不時遭受嘲笑和謾罵，我才深深感到地主家庭是十分不光彩的。到了上學年齡，每當開校報到時，老師照例要問出身成分，我就不由自主地將頭耷拉得低低的，不敢正眼看一眼老師，有氣無力地從口中擠出“地主”一詞。聲音之低，老師幾乎聽不清楚，甚至要問兩三遍我才能將“地主”二字發清楚。每到開學報到時，我是多麼希望老師不問我的成分就把“地主”二字寫在報到冊上啊！可是這點可憐的願望實現起來實在太難。

最讓我難以承受的是我爺爺和小奶奶在臺上佝僂著身子挨批鬥而我們學生在台下坐著受教育的那種不光彩的場面。每當爺爺和小奶奶等分子們佝僂著腰耷拉著頭被立在臺上挨批鬥時，全校學生的眼光幾乎全都聚焦在我臉上，頓時我也變得狼狽不堪，腦袋幾乎要耷拉到褲襠裏，恨不得找個老鼠洞鑽進去。這樣難堪的場面每學年都要經受兩三次，久而久之我變得膽小如鼠，幾乎不敢和其他同學吵口打架。偶爾與人吵了打了，讓老師評理，十有八九是我沒理。偶爾不小心出點差錯，老師批評時總忘不了要罵一聲“地主家的壞蛋”。讀三年級



時，從上海插隊來的一位女知青給我們上音樂課。有一天，我不小心把自己的板凳弄得咯吱咯吱響，知青老師氣憤地走到我面前，順手打我兩巴掌，並命令我立起來受訓。當得知我是地主狗崽子時，她訓斥得更凶了，甚至說：“我說你怎麼這麼搗蛋，原來是個地主娃。”這一經歷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迹，到死都不會忘記。

去年冬天，村裏最後一名地主，79 歲的曹玉林，死了。至此，我們村裏作為“分子”的地主當事人就全部死完了。曹玉林是多大一個地主？每年收租 8 石稻穀的地主。在我們家鄉，1 石黃穀大約重 330 到 350 斤，8 石穀最多也不過 2800 斤。曹玉林的父親在外謀生，曹玉林尚小，家裏就把 8 石谷的田地租給別人耕種，土改時被劃為地主，屬於“不勞而獲的寄生蟲”階級。年收入 2800 斤穀這樣的家庭，你可以想像他家的衣食住行、生活習慣、思想意識是怎樣的，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他能吃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嗎？根本不可能。實際是，他不節衣縮食精打細算隨時就有斷炊挨餓的危險。說白了，他過的就是一個普通農民的生活。土改時曹玉林 18 歲，按政策剛達到劃為地主分子的年齡綫。他的父親因參加土匪被鎮壓，共產黨對地主分子的一切待遇，清算、沒收、鬥爭、繩索、捆綁、棍棒、挂黑牌、游街、訓斥、辱罵，都由這個剛剛够格的地主來“享受”。大救星給他的就是這樣的日子，而且一過就是將近 30 年。8 石租害他一生又禍及子孫，這究竟是地主的罪惡？還是共產黨實行的制度的罪惡？

陶渭熊

同學賈菊紅 楓 語

我的同學賈菊紅大我一歲，她有個弟弟，叫賈曉紅，小我一歲，從小我們兩家就住鄰居。文革期間，她家因是地主，她的爺爺每天被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戴上一頂用鋼筋做骨架、白紙糊的一尺多高的高帽子，上寫“打到地主分子賈 XX”，拉到村裏狹窄的街巷游鬥。街巷牆壁上貼滿紅紙、白紙標語口號：“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地富反壞右！”“社會主義好！”“打倒萬惡的舊社會！”她的爺爺周圍擁擠著很多人，一邊推搡一邊高呼：“打到地主分子賈 XX！”“讓賈 XX 永世不得翻身！”呼聲震天，群情激奮，有人甚至朝她爺爺扔砸磚頭瓦塊。游鬥完了，又被拉到學校教室繼續批鬥。教室的講臺上放一個凳子，“站上去！”紅衛兵和造反派厲聲喝道。她爺爺有點倔強，站在那裏不動，有人便解下身上的武裝帶狠狠抽打他，另有幾個人把他架上凳子。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紅衛兵高聲朗誦毛語錄話音未落，就有人狠狠用腳把凳子踢倒。撲通一聲，她爺爺摔倒在地。人們再次把他架上凳子，腿在凳子上顫抖，有人再次把凳子踢倒。如此幾番站上去摔下來，六十多歲的老人被摔得鼻青臉腫，已站立不起來。看著爺爺遭受如此折磨，她和她的父母都不敢哭出聲。

那時年幼，賈菊紅沒發現她的爺爺和父母同其他孩子的家長有什麼兩樣，可單單為什麼自己的爺爺挨批被鬥，自己的父母要受欺侮？她搞不明白這是為什麼。如果爺爺是那種欺男霸女，橫行鄉里，無惡不作的惡霸地主，就像課本裏半夜雞叫的周扒皮，是該狠狠批鬥，讓他永世不得翻身，可是自己的爺爺是個善眉慈目的老人，聽人說從沒欺負過窮人，為什麼還要這樣對待他呢？

賈菊紅上小學時，文革餘風在延續，出身于地主富農家庭的孩子還在承受政治帶給他們的屈辱。賈菊紅和她弟弟經常遭受同學欺負，被他們攆著喊：“打死你個地主狗崽子！”我

們的學校離村三四裏，在一座破廟裏。晚自習放學回家時，那些壞學生鼓動其他學生不能和她姐弟結伴回家，而且要他們姐弟不得和同學走同一條路回家，他們必須繞道走更遠的路回家。兩個只有十歲左右的孩子，在黑咕隆咚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裏常常害怕得哭著回家。也許是看他們被人欺負于心不忍，也許是同病相憐，而且我們倆家還住鄰居，後來我不顧那些壞學生的恐嚇，成為姐弟倆回家路上的夥伴。我們相伴上下學，直到讀初中時學校搬到我們家門前。

賈菊紅的姑夫是河南省焦作市毛巾廠的勞資科長，學校畢業後她被招工到這個毛巾廠，成為同學中第一個參加工作成為吃商品糧的城裏人。幾年以後，賈菊紅全家都遷到焦作市，離開了這塊曾經讓家飽受欺凌、傷痕累累的地方。

---

曹繼先土改前是我們村的一個地主，和我家有點親戚關係。其實他是一個機匠，用古老織布機織布的工人，時常扛著笨重的木制織布機走東家串西家上門服務，靠著“唧唧複唧唧”的日夜操勞，收取血汗錢養家糊口。由於他經常在外織布，就把祖上留下的 20 石田地出租，這就成為“剝削者”，土改時劃為地主。農民們認為他還是靠勞動為生的，因而給他一個“勞動地主”的稱呼，想叫他少受一些皮肉之苦。理論高深的土改工作隊長却予堅決批駁：“所有地主都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蟲，哪有什麼‘勞動地主’？”於是這位作手工的地主就不能不與一切地主一樣照單全收大救星毛主席賜予地主階級的一切“幸福”了。

陶渭熊

---

## 一個地主分子的檔案 齋 主

三年前我從網上買一份原始檔案，是一位名叫李德貴的地主分子的摘帽檔案。檔案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申報材料和法律文書，包括：1、摘帽、撤管呈批表（1979 年 2 月）；2、五類分子等級表（1978 年 3 月）；3、地富反壞分子摘帽通知書（1979 年 3 月）；4、紅星大隊第一生產隊關於四類分子的評審材料，其中有 1965 年的《新劃、新戴內部審批簽》、關於逃亡地主分子李德貴的材料綜合報告（6 頁，1965 年 4 月 15 日）、關於李德貴材料中尚需查補的幾個問題（2 頁，1965 年 4 月 26 日）和補充說明（1965 年 4 月 30 日）。

第二部分是調查證明材料，包括：1、關於紅星一隊地主分子李德貴的摘帽鑒定（1979 年 2 月 8 日）；2、關於地主分子李德貴評審摘帽座談會記錄（1979 年 2 月 6 日）；3、1978 年 3 月紅星大隊給公社黨委的鑒定書；4、1978 年 3 月座談記錄；5、1965 年 4 月至 6 月給李德貴戴上地主帽子的各種證明十五份；6、1965 年 4 月對李德貴鬥爭大會記錄（5 頁）；7、1965 年紅星大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階級調查登記卡片；8、農村機關四清運動退賠清單（1965 年 4 月）；9、審訊筆錄（3 頁，1965 年 4 月 13 日）；10、本人歷次交代，共有從 1964 年到 1979 年的交代書、坦白書、認罪書、自傳、檢討書 8 份。

第三部分是其他材料，包括：1、關於剝奪李德貴的選舉權利的材料（1978 年 5 月）；2、1978 年 5 月《選舉權呈批表》（剝奪選舉權）；3、1976 年《四類分子年終評審登記表》；4、1965 年《四類分子登記表》（2 份）；5、1974 年《五類分子評審登記表》；6、1973 年《五類分子評審登記表》；7、1965 年“紅星大隊對四類分子的包夾名單”；8、1965 年紅星一隊平

(貧)下中農關於地主分子謝代秀(李德貴之妻)評審材料(1頁);9、1965年紅星一隊平(貧)下中農關於地主分子張家炳評審材料(1頁);10、1965年紅星一隊平(貧)下中農關於地主分子李德貴評審材料(1頁)。

檔案很詳細，根據其內容，主人公李德貴的生平(1979年以前)大體如下：

1918年李德貴生于沙市文星樓，本姓劉，兄弟5人。父母無法養活衆多孩子，被送給李茂珍，改名李德貴。七歲至九歲讀書，九歲至十五歲在家幫養父幹活。1934年16歲，開始在沙市許多地方打小工。1938年20歲，經人介紹到松滋縣上陳鄉郭上昌家做上門女婿。到郭家時，郭家只有母女倆，未完婚，郭家女兒病逝，被收爲兒子，改名郭雄九。郭家有地水田20余畝、田10畝，雇人耕地。1939年21歲，由郭家做主，娶楊林市謝代秀爲妻。1939年至1944年做生意，主要是打燒餅、扎(炸)麻花、油條，請過一個師傅和一個小工，日本人來後做生意的房屋被燒。1944年至1946年，繼續租房做打燒餅、炸油條的生意。1947年至1949年，由妻子謝代秀之兄介紹，到松滋縣紙廠河鎮當徵收員，後又在楊林市鎮當稅收徵收員和稅務主任。1950年回沙市張家溝(即後來的紅星大隊)父親家(養父)，土改時被劃爲小商販。1951年在家幫父親搞小生意，是年，入贅的郭家的叔伯兄弟郭錫九、郭恒九、郭平九，以及妻子的兄長謝代美、謝代玉被共產黨鎮壓。1952年在當地白廟子小學教書。1953年在江陵縣糧食局做統購統銷、收糧工作。1954年當地發大水，在沙市做小菜販子。1955年至1956年，在張家溝生產。1956年下半年起當初級社會計。1957至1959年當高級社會計。1960年到和平漁場做會計。1961年調回大隊做會計。1962年起下放回家生產。1964年，四清運動查出有貪污問題。1965年，47歲，被劃爲地主分子，戴上地主分子帽子。1965年至1978年被管制勞動。1979年3月，61歲，被摘掉地主分子帽子。

縱觀李德貴的前六十年，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入贅到郭家做上門女婿，是導致其後來被劃爲地主的主因。1951年鎮反運動，郭家有三人被殺，郭氏家族顯然是當地的“惡霸地主”。第二，李德貴在郭母張羅下，娶謝代秀爲妻。謝家也是地主，鎮反時兩個妻兄被殺。第三，1950年李德貴携家人回到養父家，姓名也由郭雄九改回李德貴，劃分成分時被劃爲小商販。第四，六十年代階級鬥爭擴大化，1965年李德貴被江陵縣人民政府劃爲地主分子，妻子謝代秀也一同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第五，1979年，李德貴經群眾評議，沙市市革命委員會批准，于3月2日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開始過上平常人的生活。李德貴這六十年，兩次改姓，輾轉三地，當過小工、做過生意、幹過國共兩黨政府的幹部(稅收主任、會計)，最後被戴帽、摘帽。

---

中共軍隊開進成都時，沒有鮮花、口號、標語的夾道歡迎，春熙路上的商鋪生意興隆，茶館裏人聲鼎沸，電影院前人頭攢動。人們普遍以爲，就像從滿清到民國，日子照舊過。大北茶廳的胡老闆就說：“國民黨在這兒，我喊蔣委員長萬歲；共產黨來了，我喊毛主席萬歲，有啥子害怕的嘛！”不久開始鎮反，胡老闆被拉到昭覺寺牆外的樹林裏敲了“砂罐”(槍斃)。當年的鎮反積極分子、作家鐵流目睹了胡老闆的被殺：半邊腦袋不見了，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昭覺寺的老和尚告訴我，每天一批批地槍決，白花花的腦漿濺滿草地，鮮血把泥土變了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沖鼻孔，根本沒法念經打坐。鎮反被害者幾乎都是無辜的人，胡老闆就是一個。他爲了過當官的癮，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頭銜。中共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自首，胡老闆第一時間跑到派出所登記。他誤以爲這樣就解脫了。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時也是一個。夏曾任成都革命軍總指揮，蜀軍總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家鄉合江，潛心研究佛學。中共殺他，爲的是湊够毛澤東下達的殺人指標。 ???

張 樸

---

北京的高幹子弟 杜晶晶

1966年7月的一天早上，幾個“紅孩子”突然雄赳赳氣昂昂地闖進學校播音室，通過廣播殺氣騰騰地向全校的狗崽子宣戰：“狗崽子們，豎起你們的狗耳朵聽著，今天，我們紅五類革命後代，不僅要專你們老子的政，現在還要專你們的政，要把你們老子和你們統統打翻在地并踏上一萬隻腳，讓你們永世不得翻身！”你很難相信那些充滿愚昧狂妄和血腥氣味的話語竟出自這些十幾歲中學生之口，而他辱罵的對象竟是昨天還在一起學習、玩耍的自己的同學！

宣戰書通過擴音器傳到每個教室，紅五類們開始左顧右盼，尋找自己的盟友和鬥爭對象；黑五類學生則人人面有懼色，惶恐不知所措。後來，教室黑板上塗滿辱罵黑五類學生的口號、漫畫，他們的課桌也被人寫上“狗崽子”并打上叉。他們必須接受紅五類同學的質問、斥責、嘲諷、謾罵，站在人前交代自己父母和家庭的“反動罪行”，甚至被剝奪了上學校的權利。有幾次，紅五類學生圍堵在我們學校門口，僅留一個小縫隙，每一個進校的學生必須報出自己的出身。如果是黑五類同學，就在一片“滾蛋”的哄罵中被轟出門外。我出身於職員家庭，雖不在黑五類之列，但我很理解那些黑五類同學們的境遇和心情。那種在眾人面前被斥罵却不能有任何辯解的人格侮辱，必將深深烙在那些孩子幼小的心靈裏，永難磨滅。

北京一些中學生裏的高幹子弟組建了東城糾察隊、西城糾察隊等，是類似於希特勒的衝鋒隊的法西斯組織。他們在學校裏設立“勞改所”，隨意將一些黑五類學生抓到那裏關押折磨，施以慘絕人寰的酷刑，很多人死于非命。北京六中的勞改所最為可怖，糾察隊員們蘸著受害者的鮮血，在牆上寫出“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每個字有拳頭大，殷紅的人血順著牆向下滴淌，讓人不寒而栗。在那裏第一個被活活打死的是曾對血統論提出異議的該校高三（2）班學生王光華。打死王光華的人，有的如今已經身居要職

魯迅在《爲了忘却的紀念》裏告誡我們：“一個忘却自己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讓我們永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認真思索它爲什麼會那樣發生的社會政治根源，并最終將這根源鏟掉。

---

我讀小學和初中時，有一個同學叫陳隆富，比我大7歲，個頭也高我許多，已經是一個青年。那時小學生都穿草綠色童子軍裝，中學生流行麻灰色學生服，頭上戴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腳穿白底青布鞋，可是陳隆富却剃光頭，打赤腳，穿著將土白布用土法染成藍色的粗布長衫，即使最寒冷的冬天也只穿一雙竹麻鞋（用嫩慈竹在火上烤軟後撕下表層纖維織成的）。這樣的打扮在同學中顯得有些另類，但大家並不嫌棄他，因爲他人很好，和氣，力氣大，愛勞動，使用鋤頭能夠左右開弓，挖土又快又平。上勞作課時，他代我等小同學和女同學完成任務，大家都很喜欢他，并且同情他家境貧寒。

有一次他父親到學校來看他，我一眼認定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農民。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粗手大腳，頭上包著家鄉農民長年包著的冬季禦寒、夏天擦汗的白布帕，身上穿的也是藍色粗布衣，腳上一雙草鞋，一副面孔長年累月臉朝黃土背朝天勤勞耕作的農民模樣。1951年冬天土改鬥地主，有一天我看見臺子上跪著一個衣衫襤褸神情淒慘的地主，雙手姆指被細麻繩密密匝匝地捆著，姆指中間楔著一個木楔子，一個農民正用石塊狠狠向下打擊楔子，痛得那地主撕心裂肺跪地求饒。我大驚失色：那不是陳隆富的父親嗎？後來才知道，陳隆富家竟是地主，因有10多石田地出租。 陶渭熊

??

??

紅河州勞教所 李 斌

反右運動中，我在屏邊縣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且“情節嚴重”，加“態度惡劣”，被開除公職，押送建水縣王家莊紅河州勞動教養所勞動改造。幾個刑滿留隊人員被安上“生產委員”的頭銜，負責監督新來的勞教右派。生產委員黃應東滿嘴髒話，女勞教右派肖 XX 實在難忍，抗議道：“黃委員，請你說話乾淨些！”黃應東立即暴跳起來，指著肖的腦門大吼：“什麼乾淨不乾淨？你媽的 B，爛婆娘，你還敢這樣對老子講話？老子今天就抹抹雞巴甩你兩巴掌！”肖受到極大侮辱，壓不住心頭怒火，大聲斥責對方：“流氓！”黃沖上去揚起巴掌重重打在肖的臉上，接著還想打第二、第三下，其他勞教人員紛紛大聲喊：“不能打人！”黃才將揚起的手放下。

黃應東惡人先告狀，管教幹部白中隊長為黃撐腰，立即召開田間地頭批鬥會。肖被叫出來，站在人群中央，黃當面撒謊：“勞教人員肖 XX，天天幹活磨洋工，今天挑水澆苗，一桶只裝一瓢多一點點，我批評她幾句，她不服，還出口罵人，我忍無可忍給她一巴掌，旁邊幾個勞教員就大喊大叫地為她幫腔，他們就這樣不服管教。”未等黃說完，白中隊長便怒氣衝天搶過話頭吼道：“他媽的 B！挑水一桶只裝一瓢多一點點，我把雞巴打打脹都挑得起來，還批評不得，有人還敢幫腔！你們想幹什麼，是不是想造反，嗯？”勞教人員深感受到極大人身侮辱，肖則臉色發白，呼吸急促，全身痙攣，倒在地上。那些生產委員們聲嘶力竭地叫道：“她裝死！”“耍死皮！”“站起來！”

肖 XX 是“新中國”培養的大學生，才貌雙全，從此變成瘋子，不知梳洗，語無倫次，時笑時哭，時而狂吼亂叫：“我要到北京天安門！”“毛主席萬歲！”“蔣委員長萬歲！”勞教當局、婦女分隊長和生產委員們繼續加害肖，說她裝瘋，呼喊反動口號，唆使人隨心所欲地拳打腳踢她，捆綁吊打她，懸在空中蕩秋千，最後竟將她逮捕“法辦”。神志不清的肖 XX，在宣布逮捕她的大會上還對著提繩子來捆她的公安人員發笑，而且笑得那麼自然，那麼甜，直到被繩索捆綁得本能地感到疼了，才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

為了配合社會上開展的各種運動，或為了掀起生產高潮，更主要是為了迫使勞教人員接受“脫胎換骨”的改造，勞教當局常常用逮捕法辦“讓你升級”的辦法製造高壓氣氛。在被逮捕的勞教人員中，有肚子餓得實在受不了偷吃食物而被認為是蓄意破壞黨的糧食政策的，有鋤草不小心鋤斷禾苗或走路摔跤將水桶摔壞而被認為是破壞生產的，有實在太累太困倒在地上一時起不來幹活而被認為是抗拒改造的，有對勞教所的惡劣處境忍不住發幾句怨言而被認為是煽動反對共產黨的。被逮捕法辦的反剪雙手被帶走，其他勞教人員則陷入無休止的心靈折磨之中，人人都要觸及靈魂做自我檢查，坦白交待，深挖思想根源，然後展開相互檢舉揭發，批判鬥爭。肖 XX 被逮捕之後，當局嚴令為肖 XX 幫腔、頂撞黃委員不服管教的，所謂“同情現行反革命分子肖 XX”的，不僅要坦白交待，還要寫書面反省，反省書必須經小組、大組通過，認識不深刻的打回重寫。

沒完沒了的坦白交待、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都伴隨著人格侮辱，肉體傷害，而且以權力迫使勞教人員是非不分，皂白不辯，善惡顛倒。如此心靈折磨、精神摧殘，使得一個個還

想守住做人底線的勞教人員深感生不如死！段躍文原是河口縣衛生院的醫生，因醫術精湛，為人誠實，被發配勞教，在勞教所仍被安排做醫務工作。段醫生在勞教所處境相對較好，却在一個夜晚睡在床上，蒙頭蓋好被子，用刀片切斷動脈自殺。第二天，人們抬尸體時發現，他用水筆在自己的肚皮上清楚寫下兩行字：“是非不分斷難同流，含冤負屈了此一生。”

在紅河州勞教所這座人間地獄裏，被迫自殺的不止一個段醫生，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我不懂使用刀片切腕自殺，而是搶過一位監督我寫反省交待的專案人員的水果刀，往自己脖子上狠刺了兩刀，欲刺第三刀，被那位專案人員死死抓住，雖血流如注，最終被搶救過來。

在荒誕的大躍進時期，紅河州勞教所當局責令所有勞教人員必須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到“頭可斷，血可流，雙千斤不可丟”。為放農業衛星，他們把勞教人員趕出去，連續一個又一個的“苦戰八天八夜”，大造肥料，深翻土地，播種包穀、大豆、花生，務要實現“開門紅、日日紅、月月紅、滿堂紅、紅到底”。勞教人員們用汗水種出各種農作物的禾苗，當局命令通通鏟掉，要“挖掉窮根栽富苗”，改種紅薯，說是紅薯能高產，可以確保農業衛星上天。于是勞教人員不得不“苦戰十天十夜”又一個“苦戰十天十夜”，去鏟除上千畝的禾苗，重新翻整土地，大造肥料，再到處去採摘貴如金子般的紅薯秧。

翻整土地時，先深挖地，施厚厚一層肥料，蓋上熟土，再理成紅薯壟子。大造肥料時，勞教人員被趕上山鏟草皮、燒火土，滿山煙霧騰騰，一座座山被燒成光頭。這時不知哪位權威專家說，用頭髮作肥料其肥效無與倫比，于是勞教人員不管男女，都不得不將頭髮剃下來作肥料：“願不願意將頭髮剃下來作肥料，這是對放農業衛星、對大躍進的態度問題。”勞教人員們，包括那些向來十分珍愛自己長髮的女勞教人員，誰敢在“態度問題”上犯錯，于是通通成了尼姑和尚。

如此折騰了大半年，勞教人員又奉命開赴石屏燕子洞礦山開采鐵礦，說是要與全國統一步調，響應全國大戰鋼鐵的號召，放了農業衛星，再放鋼鐵衛星。開采鐵礦，全靠人挖人挑，這邊剝離的土方搬去覆蓋那邊的礦脈，過幾天又將搬過去的土方搬過來，去開采那邊的鐵礦。反復折騰，拿不到礦石，就轉入坑道開采。坑道開采，并無規範的安全防護設施，頻繁發生的坍塌、漏頂等事故，坑采人員非死即傷，有的終身殘廢。有一次礦井坍塌，三個摘帽右派死于非命，五個重傷，當局對死難者不作任何撫恤。煉鋼煉鐵沒有爐子，就到處刨人家的祖墳，不管現代的古代的，見墳就刨，取出磚來造爐子。沒有燃料就去亂砍濫伐森林，一片片茂密森林統統送入爐子燒為灰燼，一座座青山變成光禿禿的荒坡。

在大幹苦戰的漫長過程中，最為不幸和悲慘的是嚴重的饑餓折磨。沒有一天能真正吃飽肚子的嚴重饑餓，釀成一幕幕人間悲劇。每天臨近早晚兩餐飯前都有人倒下，昏死過去。最先死的還有一口用床板拼成的“棺材”，後來死的多了，連這種棺材也沒有了，誰死了就用誰的被子、墊單一包，抬出去一埋了之，更慘絕人寰的是把死難者的骨頭燒成灰，用作種蘿蔔的肥料。死難者的遺物，不許家屬認領，而是按照先幹部、後民警、再摘帽人員的順序，廉價拍賣。一支派克水筆，價值六、七十元，僅賣十元。一隻金殼瑞士手錶價值五、六百元，僅賣一百元左右。一些質地上乘的毛呢西服，通通以低得不可再低的價格處理。

一時未死的嚴重饑餓者，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得了水腫病。得了水腫，仍然還要出工，走在路上，只要風稍大一些，隨時會被吹倒。評上“先進生產者”的水腫病人，上臺去領三元錢的獎金時，二十公分高的臺階都抬不上腿，需要兩個人在那裏攙扶，幫助抬腿。水腫特別嚴重的人，被集中到臨時用茅草搭建的急救病房進行治療。凡昏死過去的病號，每天可以得到一碗紅糖稀飯（病號飯）。這碗病號飯成了嚴重水腫病人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昏死者，一碗紅糖稀飯下肚，十之八九都能重新活回來。

有一位水腫嚴重的患者，已經不省人事，當醫生將一碗紅糖稀飯端到床前喊他，并告訴他有他的病號飯時，他竟神奇地睜開眼睛，用盡渾身力氣，掙扎著將那碗紅糖稀飯吞下肚去。終因病情太重，他的腸胃再也容不得勉強食入的東西，“哇”的一下全吐了出來。鄰床的一

個病人立即掙扎起來，趴在地上，用手快速將那伴有灰土的嘔吐物，一把把抓了喂進自己嘴裏。

被饑餓嚴重折磨的人們，毫無衛生與文明可言，掉在路上的一片黃菜葉，雨水中泡得發脹的皮條，食堂丟在糞草堆上的一個爛紅薯，僥幸抓到的一個老鼠、一隻蟲子，都會毫不猶豫地放進嘴裏吃掉。與我一道來自屏邊縣的萬某，出身書香門第，讀過很多書，是一位有著良好教養和遠大抱負的知識分子，因饑餓難擋，一天在出工的路上碰見一條正快速爬行的麻蛇，立即緊追不捨。麻蛇被追得慌忙，爬進路邊一個石縫，萬某緊步上前，一把逮住還露在石縫外的麻蛇尾巴。麻蛇拼命往裏掙，他竭盡全力往外拽，不知是麻蛇力太大，還是害水腫的萬某力氣太小，相持好一陣都未將麻蛇逮出來。最後咯嘣一聲，麻蛇尾巴被逮斷了，萬某立即將那截攥在手裏的血淋淋的麻蛇尾巴放進嘴裏嚼了起來。萬某病重期間，我去病房看他，他以微弱的聲音對我說：“李斌，我現在什麼都不想了，就只想能飽飽地吃上一餐飽飯。如果現在在我面前，一邊是我日夜思念的妻子兒女，一邊是一餐能夠真正填飽肚子的飽飯，我只會選擇那餐飽飯了！”

一位來自機關的大個子勞教人員，體重原為一百多公斤，後來患了水腫病，體重下降了一半多，最輕時只有三十多公斤。由于個子大，食量大，每餐分得的那點點飯實在填不飽肚子，整天餓得發慌，終因饑餓難當，無可奈何學著去偷。一天夜間，他從幹部食堂後窗翻進去，偷吃一些冷飯。勞改當局很快找到他，給他帶上一副特別加工的二十多公斤重的大腳鐐，還把他關在長、寬、高都不到一公尺的一個地洞——勞教所特設的“禁閉室”，既抬不起頭，也伸不開腳，每天收工回來只能像狗一樣蜷縮在裏面。

兩個來自農村的勞教人員，因偷被關在勞教所搭舞臺時自然形成的一個地下室，裏面既無光綫，空氣也不怎麼流通。不知有多少天，他們既沒有飯吃，也沒有水喝，因為當局把他們關進去後就把他們忘記了。等到當局突然想起那兩個人時，打開門進去，兩人都已經死了。後死的那一個，竟將那已經發臭的先死者屁股上的肉啃吃了許多。我和另一個勞教人員奉命進去抬他倆，出來時發現死者嘴裏還含著一口沒有咽下去的人肉。

一個嚴重水腫病患者，已經病得起不了床，管教幹部硬說他要死皮，強行將他拖起來，準備拖上工地，結果拖到路上便斷了氣。有一次我們奉命去抬埋一個天亮前就已經硬在床上的死者，鄰床的一個病人向我們講了死者臨終前的一些情況。我們將那死者抬出去埋了回來，向我們講死者情況的那個病人又成了死者。

比嚴重饑餓更為殘酷、更為惡毒的是，勞教當局採取各種扭曲人性、磨泯良知的手段，迫使勞教人員箕豆相煎。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魔咒蠱惑下，在他們的欺騙、唆使和逼迫下，人們的理性和良知消磨漸盡，完全失去自決與平衡的能力。管教當局用“爭取早日摘掉帽子”，“爭取早日回到黨的懷抱”等言辭，誘使一個個勞教人員搶啃他們丟出來的一塊塊“骨頭”，讓他們為這一塊塊骨頭去撕人，咬人，啃人，直至鮮血淋漓……

勞教所的最高權力者，教導員兼所長劉發奎，是來自公安系統的幹部。此人表面溫文爾雅，道貌岸然，一派正人君子模樣，內心之卑劣與肮髒却令人髮指。正當全國人民都在餓肚子的時候，這位劉所長在勞教所裏却養尊處優。每天吃飽喝足後，他就背著手到處轉悠，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常常盯女勞教員，目光在那幾個有幾分姿色的女勞教人員的臉蛋或乳房上滾來滾去。他常隱身在通往女廁所的黑暗角落，或供女勞教人員沖澡的屋後高處，偷看女人。每天夜裏，勞累了一天的這些女人熟睡之後，他總要藉口查夜進入女勞教人員宿舍。一走進宿舍，他先輕輕喊一聲：“蓋好被子，小心著涼。”藉以表示他是堂而皇之查夜來的，即使有人醒著，也不會喊叫。隨後他便輕腳輕手走到他心中要“關愛”的對象床前，用手將那女人的被子輕輕提起來，捏亮手電筒，貪婪地窺看那女人的軀體。如果此時那女人醒來，他就裝作替她蓋被子，口中又小聲重複那句話：“蓋好被子，小心著涼。”假若那女人一直熟睡，他就在那裏看個夠，久久不肯離開。

有一次，他拿著一件領口有磨損的襯衣，瞄準縫紉室的人下班正準備離開時，大搖大擺走了進去，對他一心想“關愛”的女勞教人員余 XX 說：“我明早要出差，這襯衣領子爛了，你加幾分鐘班替我補補。”余雖已猜到劉的意圖，可是作為勞教人員又怎敢違抗，心想：等他真正動手了，就拿剪刀自衛，大聲喊叫，反正周圍都是人。正當餘把已經放倒的縫紉機頭抬起來，準備開始補衣服時，另一位同在一起搞縫紉的年齡比她大許多的女勞教人員周棟已將此事看在眼里，藉故又返回縫紉室。周棟徑直走到自己的縫紉機前，邊打開縫紉機邊自言自語道：“我還有點活，也要加加班。”直到余將劉的衣裳領子補好交給劉，周還在“加班”，致使他失去一次動手的機會。

周棟來自石屏二中，是一位教師，有一定生活閱歷，早將劉發奎看破，為了同命運的姐妹們的安全，總想找個合適的機會，給這位劉所長一個必要的忠告，希望他能有所收斂，同時也給患難姐妹提個醒。有一次，趁劉發奎到婦女分隊宿舍聽取勞教人員學習發言時，她在發言中說道：“所領導，特別是劉教導員，對我們勞教人員非常關心，有時夜深了還要到宿舍來查夜，擔心有人夜間不蓋好被子涼著，婦女們對此非常感激。但我們有些年輕姑娘，睡覺時最不願讓男人看見，她們認為被男人看見自己的裸體是最不好的事情。所以，為不辜負領導的一片好心，希望到女宿舍查夜的事，最好由婦女分隊長去做。”聽了周的發言，劉發奎一股怒火涌上心頭，但又不便發作，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人性已被扭曲、良知已被磨泯的女勞教人員楊某，從劉發奎那一陣紅一陣白的臉上看出他心中難以遏制的憤怒，當即接著周棟的發言說道：“我認為到女宿舍查夜的事該由誰去做，那是管教幹部的事情，作為勞教人員無權過問。對所領導無微不至的關心，有的人不思報答，反而妄加議論，這明明是不安好心。”從此，楊某得到劉發奎的格外垂青，劉也從楊後來的不少檢舉揭發中獲取許多可以收拾周棟的口實。周的丈夫葉廷贊，也是石屏二中的教師，在整風反右中夫妻雙雙遭難，雙雙被送進紅河州勞教所，身邊還帶一個幼子。夫妻倆雖被處理到一個勞教所，但各在一個隊，平時很難見面，撫養幼兒的擔子完全落在周棟身上。為了照顧孩子，周有時難免會有所拖累，丈夫葉廷贊又患上嚴重水腫，被送到勞教所急救病房治療，她也要抽時間跑去看望。對此，楊某總要當作周棟消極怠工，加油添醋地向劉發奎報告，周因此挨過多次批鬥。不久，葉廷贊因水腫死于非命，周棟忍不住號啕痛哭。已經被馴化成狗的楊某竟喪盡天良，跑去向劉謊報說周棟借哭她丈夫大罵共產黨。劉發奎終於找到置周于死地的機會，立即差人布置任務：“從今天晚上開始，每天晚上都要對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一定要把這個反動透頂、敢于大罵共產黨的反革命分子周棟揭深、批透、鬥臭！”

---

《瀏陽河》的曲作者唐璧光，反右時被劃為右派，開除公職，強迫勞動。1957 年 8 月，唐璧光接到電報，妻子難產，便偷偷翻越高牆，星夜奔赴家中。到家時，妻子已產下一個男孩，但他無法享受初為人父的歡樂，天不亮就趕回長沙接受監視。後來，唐璧光被關押到洞庭湖勞改農場。1970 年，他被遣送原籍湖南東安縣，在師母家中見到自己 13 年沒見面的兒子。妻子已經死去，兒子身有殘疾，拄著拐杖。紅色作曲家李劫夫，創作有《我們走在大路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等歌曲，文革中為毛澤東語錄譜曲，是為語錄歌。林彪事件爆發，李劫夫受牽連被審查，1976 年 12 月 17 日因心臟病發作，猝死于“學習班”。 網 友

---

金堂縣一位大地主的公子，中共請他勸說金堂反共武裝放下武器。可是鎮反時，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武裝和勸降人一起統統被槍決。臨刑時，那位地主公子只說一句話：“你們共產黨不講信用。”詩人流沙河見證，四川土改時，10 多個地主并排跪在少城公園的審判臺



上，挨個被要求交出錢財。誰斗膽回答沒有，身後的解放軍立刻對準其頭部開槍。從未見過的恐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恐懼，夜裏小孩哭鬧不止，父母只消說一聲“解放軍來了”，馬上收汨止聲。

張 樸

劉少奇夫婦稻草人陪我示衆 楊文培

1969 年冬，大隊革委會勒令我們四類分子做義務工（無償勞動），把民工用的衣被、糧食、柴草以及挖土方的工具用船提前運到水利工地。冬季水淺，木船通過閘門時擱淺受阻。

“老四”都是經磨曆劫的賤民，脫掉長褲，跳進冰涼刺骨的閘底水道，背拉推拽將船拖出。木船在逆風中顛簸前進，忽然有人沖我說：“小楊啊，你的腳後跟流血！”我側身一看，跌倒在河岸邊。原來在推船過閘時腳底板被玻璃碴割開一道血口，像孩子嘴似的開著，因雙腿凍得麻木，沒有感覺。苦難的生活已經把我們磨練得像牲畜那樣顧不上疼痛。一個同類說：“快把腳板伸出來！讓我給你的傷口撒泡尿消毒。”

北風呼嘯、寒流刺骨，皖南丹陽湖工地上紅旗招展，民工如潮。那些學毛選積極分子們穿著單衣，挑著二百多斤的重擔，走在隊伍前頭，聲嘶力竭地喊著毛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作為腳板割裂的傷號，我有幸被隊長照顧，免于挑擔，守在圩堤上用鍬將民夫挑上來的土堡鏟高填低，保持圩堤平衡和民工倒土暢通。這種活通常只讓老弱病殘幹。一個叫詹聲和的幹部走上來，奪去我手中的鍬，嚴厲呵斥道：“你個反革命分子！是誰讓你投機取巧？你給我滾下去挑土！”有人為我說話，講明情況，詹橫眉怒斥：“你有沒有階級立場？替一個反革命分子申辯是什麼後果？”隨後這個人就成了水利工地廣播站的批判對象。為了避免有惻隱之心的人因我受牽累，我使用硬紙片做一個牌子，上寫“反革命分子楊文培”，用針綫固定在帽子正面。這樣做有兩種含義：一、我是反革命，請你遠離我；二、破罐子破摔，我是流氓我怕誰。

水利工地上有一個規定：每挑土兩個小時便讓民工休息十五分鐘。休息期間，大部分人攏集成堆，打撲克，抽劣質烟，有些人談工分，評女人，有些體壯如牛的人則比賽挑英雄方，看誰比誰挑的擔子重、土方多。有個叫朱選文的勞模，因挑五百斤上埂頭受到北京老毛的接見，還償給他一床軍用毛毯。有的人爭當勞模，挑斷扁擔，掙裂了血管，死于非命。如果你在工地上看到那種形影孤獨、衣衫破爛、灰頭土臉的人，那無疑就是我們黑四類了。

在如此紛繁的動物世界裏，我通常是找一僻靜處，背風看書。那天我看的是《西游記》，正看得熱鬧，忽然有人來到我面前將書奪走。來人是大隊革委會主任夏齊珊，他以戲謔的口氣挑釁說：“在毛澤東思想水利大學校你為什麼不看紅寶書？”當時像秦始皇拉夫造長城似的把民工趕去圍湖造田被美其名曰興修水利，又曰辦毛澤東思想水利大學校。我冷冷地告訴他：“《西游記》也是毛主席贊揚的好書，你聽‘金猴奮起千鈞棒’……”他立即打斷我的話，無比權威地正告我：“你是個至死不改的反革命！明明是封資修大毒草！你還要狡辯！”說完掏出口哨，滿工地吹，嘴裏嚷嚷：“大家集合！現在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上千民工被召集過來，夏主任派民兵將我雙手背起來，面對民工，宣告道：“反革命分子楊文培不思悔改，膽敢在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看《西游記》，明日張膽宣揚封資修，罪該萬死！打倒叛徒、工賊劉少奇！打倒反革命分子楊文培！”一時間，水利工地上烏雲翻滾，口號聲此起彼落。

夏主任發威之後，又宣布無產階級專政措施：從即日起，每天上工前，休工後，罰反革命分子楊文培在圩堤的埂面上挂牌示衆一個星期，每次示衆一個小時；只能利用上工前和休

工後的時間，不得耽誤正常出工。當天下午，水利工地政工組在民工出入的埂面上，用稻草扎了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模擬像，給劉少奇戴上訪印尼的禮帽，給王光美穿上紙作的旗袍，還用幹部食堂的魚鰾扎成項鏈戴脖子上，最後給挂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牌子。一切就緒後，專政隊給我挂上牌子，讓我站在兩個稻草人中間向老毛請罪。

## 瀋陽皮鞋二廠吳杰 薑萬里

瀋陽市地方國營皮鞋二廠衛生所藥劑師吳杰，原籍上海，從軍隊轉業分配而來。吳本姓沈，因家貧從小被送給一吳姓地主收養，從此改姓。吳氏夫婦無生育能力，視之如同己出，供其讀書學醫，後參加人民解放軍，轉業後安排到該廠做藥劑師。

土改後吳家男人了，剩下吳老太孤身一人，在上海不能生存，1962年從上海來瀋陽投奔養子。老太太為人隨和，愛整潔，鄰里關係也還可以，相安無事。1966年八月末的一天，鞋廠一些人勾引來一群學生紅衛兵，吵吵嚷嚷沖進吳家，把吳老太用繩索捆上，牽到皮鞋廠一間空屋子裏，四肢反綁懸吊到房梁上，距炕面一尺來高。在捆綁和吊起的過程中，吳老太不住叫苦哀求，紅衛兵們却不住地打她，打一下問一聲：“你剝削農民沒有？”吳老太用江浙腔調答道：“是的。”紅衛兵你一拳他一掌，不住地拷問，老太太不停地“是的”，哀嚎聲令人頭皮發麻，心裏打顫。

紅衛兵發泄夠了，打著哈哈走開，臨走時吩咐：“沒我們的命令不准放下。”吳老太一口水喝不到，一口飯沒得吃，屎尿往褲子里拉，不久連呼叫的力氣也沒有了。如此懸吊了兩天，人已經撐不住。一位姓肖的老工人實在看不過，嚷道：“你們誰是管事的？把人吊兩天也不給吃的，不是把人整死了？”這時才有紅衛兵准許家人送來一點吃的，但是仍然不給鬆綁，把吃食放在炕面上，距離嘴巴二寸遠，喝令老太太自己抻長脖頸够著吃。老太太的養子吳杰，眼看著母親受非人折磨而不能相救，能不痛心？却不敢吭一聲！母親被折磨至死後，吳杰承受著人性與人倫的雙重譴責，背負著懦夫、不孝子的罵名，內心痛苦不堪，從此沉默寡言，幾年後患癌症死去。

## 我的姨媽 李 金

文革期間，我給家鄉的縣報投了一篇稿《我的姨媽》，不久居然在頭版刊登了。編輯爲了醒目，還特地加個副題“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過了十來天，正午時分，我收工回來，在門前的稻田邊彎腰洗手，見姨媽拄根棍，從狹窄的田塍顫巍巍地走過來。我立刻迎上去，姨媽望著我，臉上漾開笑容，眼裏却分明閃著淚花。姨媽掏出手絹揩眼泪，同時像端詳一位陌生人似的打量著我。我扶姨媽走進家門，母親從灶屋迎了出來，姨媽一把抓住母親的手，淌著眼淚說：“二妹，咱們的么毛有出息了喲，讓我上了報紙啦！”

我小名么毛，姨媽在誇我呢。然而我的臉却刷地一下紅到耳根，心裏頓時忐忑不安，像騙子一樣感到負疚和羞愧，因為我在文章中編造了謊言。

姨媽是個孤寡老人，住在離我家二十多裏外的平安公社。她唯一的女兒嫁到二百多裏外的大竹縣城，我就成了姨媽最近的親人，常常十天半月去看望她一次。姨媽是五保戶，年紀大了，又是一雙小腳，行動不方便，隊上從不安排她幹農活，讓她在家安度晚年。然而姨媽閑不住，常常一個人到莊稼地裏拔草，到石盤上幫生產隊曬稻穀、搖風車。我每次去看她，

門上總是挂著一把鎖，好多次都是靠隔壁的兩善大叔指點，才找到她正幹活的莊稼地裏。正因如此，我才決定寫一篇表揚姨媽的文章。

文章裏自然而然回憶了姨媽解放前遭遇的種種不幸：姨父被國民黨抓壯丁，戰死在抗日戰場，姨媽無依無靠，帶著剛出世幾個月的兒子沿街乞討，後來流浪到陪都重慶。爲了活命，姨媽忍痛把自己的親骨肉賣給一戶有錢人家，自己以給別人當傭人爲生。解放後，姨媽孤身一人回到故鄉，分得田地房屋，人民公社化以後，姨媽成了五保戶，過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姨媽無限熱愛共產黨和新社會，總是盡力爲集體多做貢獻，以此感謝毛主席、共產黨的大恩大德。

當時報紙上正在開展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這篇文章正好迎合了當時的政治需要，被編輯選中，很快見報。但是我在文章中有兩處說了假話：

一處是姨父的死。姨父姓鮮名治安，四川渠縣三匯人，解放前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在三匯鎮擺小攤作小買賣爲生。抗戰爆發後，國民黨地方政府抓壯丁，姨夫被抓，送到抗日前綫參戰。姨夫不是戰死戰場，而是受了傷，腦神經受損傷，導致大腦失常，被送進四川萬縣的國民黨傷兵療養院，解放後遣返還鄉。丈夫生還不但未給姨媽帶來幸福，反而成了一個累贅。一切的農事家務，全憑姨媽一人操勞，還得時刻爲瘋瘋癲癲的丈夫擔憂。許多次姨父出去拾糞，路過別人院子，往往順手牽羊把人家挂在房檐下的辣椒或玉米棒取下幾串，放在糞筐裏提回來，弄得姨媽很尷尬，只好逐家逐戶去給別人賠禮道歉。

最令姨媽終日爲之提心吊膽的是，姨父一犯神經病就胡言亂語，吹噓自己當年在戰場上如何叱咤風雲，衝鋒陷陣，舉刀一連砍下幾十個鬼子的頭顱，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立下赫赫戰功，連升幾級，由班長而排長，排長而連長，連長而營長，營長而團長……。這時聽的人就像未莊人聽阿 Q 講城裏殺革命黨一樣，誠惶誠恐，瞠目結舌，而坐在家門口納鞋底或是正剝蠶豆的姨媽却被嚇得魂飛魄散，沖進人圈拉起姨父就走。

姨父犯病時的胡言亂語終於招來禍患。肅反時，姨父被當作漏網反革命抓走了。押送縣城途中，姨父突然神經病發作，對著兩個押送人員大吵大鬧，要回家去。兩名押送的民兵認爲是反革命分子氣焰囂張，不服管制，就用槍托揍他，直到把他活活打死。當地農民就在路邊隨便挖個坑，草草把他埋了。姨媽只得到政府的口頭通知，說姨父在押解途中企圖逃跑，被押解人員擊斃，就地掩埋。姨父尸骨埋葬何處，姨媽一直不知道。

姨夫這樣的歷史，自然不能寫進文章，我只好說謊，乾脆說他戰死沙場。

另一處是關於姨媽賣親骨肉。抗日時，我們一家住在重慶，姨媽帶著她的兒子到重慶投奔我們家。正是烽火連天時，日本飛機頻頻轟炸重慶，母親生下我。母親體弱多病，生下我就缺奶。正巧姨媽來了，于是姨媽就承擔起同時哺乳兩個嬰兒的重任。那時我家住在江北區，街坊鄰里有一戶極有錢的大資本家，知道了姨媽的身世和處境，看見姨媽的兒子長得可愛，多次托人來說要抱養姨媽的兒子。我父母自然不從，然而姨媽却斷然同意：“娃兒的父親當兵去了，生死未蔔，我一個婦道人家，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誰知道能不能把娃兒盤大，倒不如讓他跟上個好人家去吧。”從此姨媽就把她的全部母愛傾注到我的身上，常常抱著襁褓中的我跑警報，躲空襲。在我的記憶中，姨媽比母親還親，四歲多了我還在吃奶，每晚都是含著姨媽的奶頭進入夢鄉。直到解放後，姨父從軍隊歸來，姨媽才和我分開。

文章裏說了這樣的假話，我想姨媽是會傷心的，然而姨媽全不計較，似乎完全懂得姨侄這樣寫的良苦用心。

姨媽說，那天他們生產隊長看了報紙，就在會上當衆念了，全隊立刻轟動了。窮鄉僻壤，有人上了報紙，在莊稼人心目中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正巧那天姨媽沒去開會，一個人呆在家中。幾個婦女去給她報信，她們都沒文化，話又說不清楚，只說：“田老母喂，你姨侄給登報啦！”姨媽一聽，驚呆了，突然哇的一聲嚎啕大哭起來，倒把幾個送信的女人嚇壞了。姨媽以爲我犯了什麼法，所以登報了。我中學時幾個同學在新疆兵團找到了工作，曾多次來

信讓我去新疆。那時私自跑新疆被當作流竄犯，是犯法的。姨媽一聽登報，就把這件事聯繫起來了。幾個婦女給她解釋老半天，又把隊長喊來，當著她的面把報紙念了一遍，才把事情弄明白。姨媽破涕為笑，高興得一晚上未睡著覺。

姨父去世那年，我才十來歲。姨媽到我家來，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晚上我睡覺後，聽到姨媽和母親竊竊私語，姊妹倆低聲哭泣。姨媽小聲叮囑母親：“二妹子，這事千萬別告訴么毛知道，娃兒還小，別傷了他的心啊！”以後姨媽一直未把姨父去世的事告訴我，獨自咽下了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姨父在肅反運動中被活活打死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

文革初，我從老家亡命新疆，姨媽送我至巴河邊。臨上渡船時，姨媽和我揮淚泣別，那次分別成了我和姨媽的永訣。姨媽病死于文革中，上世紀 90 年代我回鄉探親，想到姨媽的墳上去燒柱香，却尋不著姨媽的墳墓。逢年過節，我只能面對故鄉，為姨媽燒一沓紙錢，寄托我對姨媽深深的愧疚和哀思，也寄托我對屈死于肅反中的姨父的悼念和對那個黑暗時代的詛咒。

---

石鸞脚板是我兒時的同學石明海的祖父，我記事時他已因積勞成疾死去，但他勤儉發家的故事却廣為人知，至今流傳。他勤勞過人，又極其節儉，靠著身強力壯日夜操勞，耕田種地，喂豬養雞，賣糧賣穀，賣菜賣柴，流血流汗過日子。由于長年赤足行走，又肩負重擔，他的五個腳趾都互相分開，就像柴扒，兩個大腳趾因長期用力過度，向內彎曲變形。大家贈送他一個綽號，叫做石鸞脚板。石鸞脚板精打細算，地裏的出產和山上的柴薪都一挑一挑挑到鎮上變賣，同時拼命節約吃穿用度。他終年不穿鞋襪，夏天赤裸上身，只穿一條短褲，晚上用松明子照明。為節約鹽巴錢，吃鹽蛋時不准家人丟棄蛋殼，必須把蛋殼細細嚼碎吞下，因為蛋殼有鹽味，丟了可惜。挑著貨物去百裏外的城裏，來去三天兩夜，不住旅店，在別人的屋檐下打個盹即可；吃飯時只買飯不買菜，取出隨身帶的一個鹽蛋挑出一些下飯。蛋殼一齊吃下，三天的菜肴就是一個鹽蛋。憑著旁人難以想像的勤儉，他積攢下足夠的銀兩，買了 30 石田地。他死以後，兒子把田地出租，以後就成了地主。 陶渭熊

---

大難大忍唐賢輝 朱健國

1931 年元月 6 日，唐賢輝出生于四川金堂縣隆盛鄉大橋村的書香世家唐家院。祖父唐祖永，清末貢生、會元，入學國子監。民國初年，唐家五世同堂，有土地 500 余畝，唐祖永聘請一個秀才任家教，讓族中子女個個讀書。父親唐重儉，又名唐慎懷，畢業于成都成華聯中，18 歲被推舉為保正（保長），20 歲任聯保主任（鄉長），22 歲任金堂縣第八區區長、縣督學（縣教育長）、第四區督征員及縣參議員等職，同時兼任哥老會三山總舵把子。三山指隆盛鄉的唐姓、鄧姓、陳姓三個山頭。哥老會因推動辛亥革命有功，維持地方治安有力，民國政府曾予以嘉獎，其總舵把子皆由德高望重之人擔任。

大伯唐重介，1924 年廣州黃埔軍校第六期炮兵專業畢業，為楊森部隊新銳，抗日戰爭期間任職南京江陰，與陳毅聯合抗日，詩詞酬唱，合影贈照。三叔唐重黔，畢業于成都私立成公中學，去南京就讀黃埔軍校，途中因水土不適，感染傷寒死亡，時年 19 歲。四叔唐重責，畢業于重慶工業專科學校，曾經營實業，結婚後留在家鄉，出任隆盛鄉長。大姑唐伯賢，出嫁金堂淮口名門尚家，姑父尚季良系劉湘部營長。二姑唐慧雲，成都藝專畢業，曾在金堂

廣興、土橋等地任教。二姑父周愚溪，出生于金堂土橋，畢業于川康農工學院，曾任土橋小學校長、金堂縣銀行行長、金堂縣國大代表、四川省銀行董事會秘書長，1950 年進入成都革大學習，結業後留用于解放軍駐金堂部隊政治部。

1950 年年初，19 歲的唐賢輝拿到成都中華女中的高中畢業證。領取文憑時，她向五星紅旗深深敬禮，立志為新政權奉獻自己的知識和青春。然而新政權却對唐家院拒之千里，各種運動不斷打上門來，征糧要款要批鬥。春節還沒過完，全家就不得不到外祖母家躲難。家裏的糧食、財產全部上交鄉政府，分給農民，仍然不能過關。

三月，父親唐重儉被通知去竹篙區上“學習班”。起初幾天，學習班領導態度友善，竭誠歡迎各位鄉紳對人民政府交心。四月初，又被通知去縣上的“學習”，一去就被關進死牢。1950 年 12 月 10 日，是唐賢輝一生最黑暗的日子。這一天，她親眼目睹了儒雅善良的父親被三槍二刀處決，罪名是沒有任何證據的“反革命罪、惡霸罪”。此時，一個 19 歲的文弱女學生唐賢輝，却在衆多荷槍實彈軍警民兵的虎視眈眈下，將尚有餘溫的父親屍體從刑場搶背到家裏。

1951 年正月，唐賢輝去中江縣永興二姨姑家，求永興小學校長尚遠雲推薦考教師。她優異成績，名列榜首，但區長董念台聽說是金堂大地主唐慎懷的女兒，不予錄取。唐賢輝沒有憎恨抱怨區長，而對尚校長和董區長誠懇地說：我出身複雜，應該接受更艱苦的鍛煉和考驗。三月，永興小學組織宣傳隊，宣傳大生產運動和婚姻法，尚遠雲介紹唐賢輝參加宣傳隊，出演《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劉胡蘭》中的劉胡蘭、《王秀鸞》中的王秀鸞。她的表演逼真，不少觀眾潸然落淚。巡迴演出結束，董區長見唐賢輝色藝雙佳，不斷約她談話，暗示只要順從領導，口頭批判地主家庭，批判父親的惡霸罪行，就可以出來工作。唐賢輝百依百順，如願以償的董區長問她，願當教師還是參加縣文工團，她流著眼淚選擇了前者，她要發揚父親教育興鄉的遺願。九月，唐賢輝終於到永興小學當上義務教師（試用教師）。

1952 年初，唐賢輝轉正，調到中江縣柴山小學任教。暑假期間，她奉命參加遂寧地區第二期教師思想改造班。小組群起圍攻她，逼其交待讀中華女中時是否參加了蔣經國的青年黨。沒日沒夜的车輪戰，實在受不了，只好要什麼說什麼，可是越說越說不清，一會兒承認是青年黨的成員，一會兒說父親是反共救國軍的宣傳員。一天晚上，精神恍惚的唐賢輝哭著從三樓跑下去，徘徊在場子中一口古井旁，準備跳井自殺。住在二樓的吉姓秘書（川北思想改造運動的領導者）聽到哭聲，叫通訊員把她救回來，開導說：這是思想改造運動，自己上綱重一點沒關係，批判一下自己的認識就過關了，并親自給她起草發言提綱，讓其在遂寧地區八縣一市教師集中學習大會上發言。唐賢輝依計而行，從批判家庭剝削，到承認父親參加了反共救國軍，是反動宣傳員，自己給自己加上一頂頂莫須有的罪名。她沒有想到，到頭來她這個“深刻改造的典型”只是幫助吉秘書升了官，至于她自己，雖然暫時過了思想改造關，却為以後肅反、反右、四清運動、文化革命系列運動中被反復批鬥折磨種下禍根。

1955 年，二十四歲的唐賢輝開始考慮成家要孩子，這時她認識了從安岳師範學校畢業分來的青年教師吳應忠。這年寒假，老師集中參加肅反學習，思想改造運動中作為權宜之計胡亂認下的罪（吉秘書對她的誘供），此時成為對她的歷史進行大規模內查外調的原因。唐賢輝成為重點審查對象，早晚睡覺都有人監視。有一天，吳應忠偷偷安慰她，說外調人員去她的母校調查，當年的班主任張淡清說她是個好學生，只喜歡文體活動，沒有參與其他政治活動，更沒有參加青年黨。此時唐賢輝發現，這個自己對他完全沒有感覺的男人，他對自己却是有情意的。吳出身貧農，政治上安全可靠。1957 年 5 月 4 日，唐吳完婚。

1957 年寒假，全縣教師集中縣上參加整風學習，由縣委宣傳部直接領導。運動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動群眾，大字報、大鳴大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第二階段是大辯論、大批判；第三階段是解決敵我矛盾、抓右派，如鎮反一樣，上面按比例分指標到學校；第四階段是人民內部矛盾整改。丈夫出身貧

農，是運動的依靠對象，唐賢輝比一些夫婦雙料反屬要輕鬆一些，加上她已有吉秘書誘供的經驗，堅決不相信“言者無罪”的誘惑。不管領導怎樣鼓勵，她都始終不給黨提意見，而是大唱黨一切皆英明偉大。然而反右一開始，領導就內定她為右派。可是她畢竟沒有任何右派言論，最終把她辦成內控右派，未成正式右派。唐賢輝為此暗暗慶幸，一個殺關管的子女未能成為右派，這在當時是一個遠近驚異的奇迹。

1958 年大躍進，縣裏搞暑假集中學習，對不够右派的唐賢輝進行重點批判，名曰“拔白旗”，要她“向黨交心，要十成”，要她“搶西瓜丟芝麻”，“思想暴露得越多越可受到表揚”。有了吉秘書誘供的經歷，什麼樣的運動盛宴她都知道如何對付。無論是舉“三面紅旗”（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還是大辦食堂，大辦鋼鐵，“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下鄉參加勞動，任何情況下，即使處於餓死的邊緣，她都始終高唱“人民公社好”。

1958 年 5 月 3 日，大兒子吳克勤出生。由于唐賢輝在反右、拔白旗中多次病倒，懷孕期間吃了不少藥，孩子出生後竟是啞巴（一直到 27 歲病逝，一生沒說過一句話，最後幾年更是臥床不起）。唐賢輝對啞巴兒子傾注了全部的母愛，與對其他三個兒女一樣悉心照料，付出數不清的辛勞和泪水。當丈夫不許啞巴兒子上桌吃飯時，她就默默與他在小桌上同吃，許多時候是一口一口喂啞巴兒。在她心中，啞巴兒是一個歷史的見證，見證了反右、拔白旗的慘無人道。1985 年啞巴兒病逝時，唐賢輝痛斷肝腸，心力憔悴，積郁成疾，乳腺癌上又患了肺癌。

1964 年四清運動，工作組說唐賢輝屬於“四不佳人員”，每天開會衝擊、批判她。唐賢輝請孤老太周婆婆帶孩子（二子吳克儉，1962 年 12 月 28 日出生），這個周婆婆常給她死去的男人燒紙錢。熱天曬床穀草時，有人發現其床下有冥紙錢兩張，立即舉報。學校四清小組馬上開批判會，說唐賢輝宣揚封建迷信，為封建王朝招魂，為反革命父親招魂。周婆婆出來作證那冥紙錢是她的，工作組不聽，反而動員周婆婆反戈一擊。

按照當地風俗，唐賢輝為二兒子拜一個村會計鄧雲山為保保，工作組批判她拉攏腐蝕革命群眾。年底女兒出世，她為女兒取名四清，藉以向黨表忠心。四清期間，唐賢輝終日以淚洗面，胡亂吃藥，導致女兒生來即帶先天性心臟病。三個孩子有兩個因運動壓力造成殘疾，這讓唐賢輝終身內疚不已。

1966 年 8 月 14 日，唐賢輝最小的兒子念念（吳學軍）問世。起名念念，有兩個寓意：表面是響應黨的“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號召，暗寓她念念不忘家族歷史真相。10 月大串連開始，各地紅衛兵組織紛紛來到學校串連，唐賢輝靜心忍性，堅決當逍遙派。領導說“要關心國家大事，任何人都不能回避”，她才勉強參加了學校的保皇派組織先鋒戰鬥隊，幫助寫標語，抄大字報。幾天後，因出身黑五類遭到批判，禁止參加各種戰鬥隊。“停課鬧革命”開始，多數班級上不了課，唐賢輝教的班還堅持按時上課，結果又受到批判，說她只抓生產不抓革命，甚至是“收買人心”。唐賢輝抱著剛滿月的念念接受批鬥，打倒她的口號聲一響，她就緊抱念念，讓兒子的哭聲壓倒批鬥聲。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唐賢輝又在劫難逃，成為“三種人”，炮轟她的大字報貼滿大街小巷，將其定罪為反共救國軍的特務、青年黨骨幹、混進革命陣營的反革命分子等等。學校組織批鬥、圍攻，搞車輪戰，要她承認這些罪名，不承認就罰跪、團湯圓、架飛機，不准休息，不准睡覺，只能站和跪，搞了七天七夜。大兒子啞巴吳克勤也一起賠跪。工作組指著十歲的啞巴說，這孩子也很不老實，拒不認錯，一聲不吭，體力還好得很，還要繼續升級鬥！這樣沒完沒了地折磨，逼得唐賢輝只好將啞巴兒放在家裏，帶來剛剛幾個月的念念陪鬥。念念心有靈犀，一聽他們批判就大聲哭鬧，一定程度上為媽媽解了圍。

這次運動一開始，唐賢輝的家就被抄搜。她保留的一張解放初的全家照被當成是反革命的新罪證，她保留的一把象牙折疊扇也成了新罪證，使她成為重點批鬥對象。這把扇是二姑

爺 1948 年去南京參加國大代表會時給她買的禮物，價值不菲，被抄走，運動後期也無人退還。

1972 年，因為林彪事件，政治有所鬆動，中江縣組織部給唐賢輝當時所在的來鳳小學領導下文件，稱：“原中江縣興發小學教師唐賢輝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歷史清楚。”她含淚在這個結論上簽了字，至此，長達 20 年的“青年黨嫌疑”被劃上句號。唐賢輝工作更加任勞任怨，經常給留校補課的學生買飯菜，上門捐助生病的窮學生，許多學生家長感動得熱淚盈眶。1973 年以後，唐賢輝年年被評為縣、區、鄉先進教師，1979 年從縣級模範升級為地市級模範——內江地區八縣一市模範教師。這一年，全國地富反壞右開始摘帽平反，有人建議她為父申冤，要求平反，唐賢輝想了想決定還是繼續忍耐。

1980 年 3 月，唐賢輝被評為內江地區優秀婦女代表，出席縣婦代會，選為主席團成員，暑假參加內江地區組織的模範教師、先進工作者觀光團外出旅游。此後，唐賢輝還被選為安岳縣第七、第八屆縣人民代表。這期間，她創造性地進行小學低年級教學改革創新，其《從農村學生實際出發 努力提高教學質量》一文收入內江地區教學經驗選集一書，她熱心幫助貧困學生入學的事迹上了報紙、電視。

1984 年，兒子念念以全縣文科第一名的高分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兒子要進京讀書了，從家到汽車站，長長的五裏路，灑滿了唐賢輝悲喜交集的淚水，兒子也抱著媽媽放聲痛哭。

1985 年，54 歲的唐賢輝因病提前一年退休，從事小學教育整整 35 年，其中有 22 年戴著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

1986 年 7 月 1 日下午，念念打電話告訴母親，今天他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了，剛剛舉行入黨宣誓，唐賢輝驚喜得目瞪口呆，比聽到兒子高考當了狀元還要高興——兒子入了黨，兒子就徹底安全了！她上街買了一瓶二鍋頭，連喝兩大口——自從父親被冤殺，35 年來她從不碰酒，即使是結婚時，也拒絕了喜酒。可是今天不同，念念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她可以不用為最心愛的兒子憂慮了。“念念安全了！全家安全了！”她一遍又一遍狂喊，最後醉倒在床上。

1989 年，唐賢輝從電視上和念念的電話中知道了六四的槍聲，她慶幸自己當初沒有貿然提出為父親平反。六四的槍聲告訴她，在她有生的之年是看不到為父親平反了。

1994 年 4 月，念念帶母親到北京游覽了人民大會堂，品嚐了釣魚臺國賓館的國宴，住了五星級酒店，吃了山珍海味，最後她還平靜地瞻仰了毛澤東遺容。對於這個給她一家帶來無數冤痛的人，她沒有復仇的心態。她覺得，毛澤東可能有一種喜歡胡亂實驗的病態，也許其目標真的很偉大，但卻偏離實際。以暴易暴，唐賢輝堅決反對。她繞著毛澤東遺體轉了幾圈，非常奇怪，從外貌看，毛澤東確實是一個身材魁梧的人，但是為什麼他就不願當天下人的共主，而只願成為一個階級的領袖？唐賢輝認為是“敵人”和“復仇”這兩個邪念使毛澤東犯了崇拜階級鬥爭的錯誤。

2000 年 9 月，身在海口休養的唐賢輝深感肺癌已到最後時刻。猶豫多日，唐賢輝終於打破五十年的沉默與隱瞞，向兒子吳學軍講出了自己家族蒙受的奇冤。她拿出父親唐重儉那張已泛黃發白的肖像，凝視許久，問兒子學軍：“念念，你知道這照片是誰？”吳學軍奇怪地答道：“媽，你不是多次說過這是你二叔？”唐賢輝雙手捧起兒子的臉，熱淚盈眶：“他不是二叔，是你外公，是我爸爸！媽對不起你，騙了你幾十年！如若不說是二叔，這張照片就留不到今天！”唐賢輝淚如泉涌，第一次向兒子講述了父親被槍殺的真相和家族蒙受的奇冤：

“赴刑場那天，你外公衣冠整齊，昂首挺胸，從容不迫，面帶微笑，若無其事，好像是赴宴會或出門遠行。看到我和賢俊、賢義、賢斌四兄妹，他嘴唇輕輕蠕動，似乎在默誦‘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他臉上毫無怨恨，也沒有喊抗議口號。被關以前，你外

公就告訴我，他沒有錯，只是時代變了，需要一些替罪羊。中國的傳統，以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却進化爲一朝天子一朝民，新朝要大開殺戒，以血洗國，威懾新民。這沒有什麼，如果此舉真能安邦治國，我甘願做此犧牲。人終有一死，歷史將重評這一事件。你外公這樣平心靜氣，大徹大悟，從容不迫，讓那些劊子手也放心了，他們沒有捆綁他，唯獨他沒有捆綁，而是讓他如走進學校講課一樣，信步走向刺刀。在最後一刻，他深深回望了我一眼，充滿了無限依戀與囑托。

“槍響了，一聲又一聲！刀光閃了，一次又一次！鮮血飛濺，一柱又一柱！你外公倒下了，我的四叔倒下了，一瞬間我永遠失去了兩個親人！一陣天旋地轉後，我忽然鎮定自若，心裏念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學著你外公的模樣，從容地一步一步走到你外公身邊，撥開熱血，背起慢慢冰冷的屍體，學著他的聲調，喃喃念誦‘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一路走向家裏。當時區武裝隊都呆了，鄉親們流著淚給我讓道。我萬分悲痛地將你外公的遺體背回老家，掩埋在後山。說來奇怪，你外公的墳墓現在也一直保持完好，大躍進時多數墳山都被開墾種糧，唯有他的墳墓保留完好。

“我在刑場搶父尸，當然受到了報復。全家五口人，母親被關押挨打，大弟也關在鄉上，二弟八歲，小妹兩歲，家中却沒有一粒糧食了。爲求生存，我用舊布做鞋，上街賣了換糧，兩個弟妹幫人推磨、看牛，每天吃點麥麩、粗面。我和一些地主子女一起，由鄉武裝隊帶領，白天集中參加勞動，晚上集中受訓。在給農民車水、割麥子時，我儘量喝稀飯，省下兩個面饅頭帶回家給母親和弟妹。白天勞累精疲力盡，晚上還要受武裝隊流氓的折磨，逼我交出金銀，經常打得遍體鱗傷。天氣變暖，我就脫衣服賣，先賣棉衣，後賣單衣，就這樣勉強維持一家的生活。”

唐賢輝提到“武裝隊流氓的折磨時”語焉不詳，後來唐賢輝的大弟弟唐賢佐回憶說：“父親被鎮壓後，我們家成了重點管制對象，母親受的刑罰難以想像，吊打是常事，一次站在板凳上，頭頂掛石頭，舉手彎腰，突然將凳子一掀，她就從凳子上摔下來，右邊臉摔爛，腫得不像人樣。他們還用海椒熏她，潑大糞在她身上，又灌大糞到她嘴裏，更甚者，還把父親的墳挖開，揭開棺材蓋，將母親的頭按在棺材裏面。與此同時，更是喪心病狂地折磨姐姐（唐賢輝），在姐姐乳頭上吊石塊，手段之殘忍下流，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唐賢輝，一個芳齡 19 歲的未婚少女，竟以在其乳頭上吊石塊的手段折磨她，真是曠世未聞！就在流氓們在她乳頭上吊石塊的那一刻，她心中的男女之愛永遠熄滅了！也就是從那時起，唐賢輝立志隱忍苟活，要結婚，要生下兒子，要讓兒子將來爲她傳承這一切真相。

關於父親被殺時的刑場細節和後來家庭遭受的株連，唐賢佐另有記憶：

“父親被槍決那天，陰沉沉的沒有太陽。被公審者共 8 人，四叔（唐重責）也在其中，時年 35 歲。賢俊哥，姐姐（唐賢輝），賢義，賢斌（四叔的 3 歲兒子）四人親臨刑場。姐姐指點著告訴賢斌，誰是二爸（唐重儉）誰是四爸（唐重責）。父親望著親人，神態自若，面帶微笑，搖頭示意姐姐不要指點。四爸一直低著頭，整個過程父親一直鎮定自若。父親身上共挨三槍，兩刺刀，頭上一槍，眼睛被打掉，身上兩槍、兩刺刀。四爸三槍，頭上洞不大，身上兩槍。這一傷心事大人誰都不願復述，這一慘狀是賢義告訴我的。當時我被關押在鄉政府，剛 15 歲。

“隆盛在不到一月的時間裏，連殺三批‘惡霸’，一次 8 人，二次 21 人，三次 13 人，除第一批外，用開花子彈射擊犯人，人人腦殼開花。臨近春節時（1951 年），又把全區所有地主集中在竹篙，以鄉爲單位，由各村農民代表看押，地主沒有人身自由，農民代表可隨意吊打地主，哀嚎告饒之聲此起彼伏，真是人間地獄。

“1951 年正月十六，我給二娘（母親）送口糧時，隆盛春華村一個叫馬興發的農民代表說，這是大地主唐慎懷的兒子，把他吊起來！我被吊起，之痛難于言表。在一次全區關押地主大會上，竹篙地主雷烈的妻子（雷當過鄉長，被殺）和兒子雷鳴（我小學同學）被打得



遍體鱗傷，又被拉著腳來回拖著走，身上流著血，慘叫不絕。還有唐渭俟，我們同一個高祖，常被吊打拷問金條之事。由于長期被拷打，兩隻手連碗筷也不能拿，大小便不能脫穿褲子。每天喂飯，大小便穿脫褲子擦屁股，都是我給他做，身上虱子一串連串到處都在爬。

“關押我們的地方是兩間屋，外屋睡覺，裏屋大小便。一天天剛微亮，我進裏屋小便，突然發現樓頂上吊著一個人，把我嚇得大叫起來。看押的武裝隊長進屋一看，是唐渭俟，叫我抱著把他放下來。當時已氣絕，但有餘溫，武裝立即把尸體拖在大門外草坪，用一破席蓋住。一些不知事的孩子拿著石子往尸體上扔，說打惡霸地主。隆盛區委書記陳生亮還假惺惺地罵扔石子的孩子，說你們把他頭臉打破了，還以為是我們打死的。

“在我們關押期間，張宏群被拷打致死，一吳姓醬園老闆上吊身亡。唐渭俟家的受刑不過，割喉身亡，賢梅姐（渭俟之女）跳河自殺未遂。九村的胡光，16歲，初中三年級，其父因當過副鄉長，被殺，其母親上吊而死，他被逼跳井自殺未遂（57年又劃成右派）。直到1951年農曆五月初五，運動告一段落，才把我們放回家。我們一家四口生活無著（姐姐唐賢輝已去中江），母親就去向以前受過父親恩惠和救助的人家乞討，每次都滿載而歸，一些老佃戶也偷偷送些糧食來。

“1952年農曆三月土改結束，我們被指令暫住在坡上。按政策沒收五大財產（土地、房屋、耕牛、農具、傢具），我們應分一份生產工具和傢具，但我們沒有，帶著爛鍋破床上坡，三間破爛不堪的草房。坐東向西，北面的牆向外傾斜都快倒了，搬上坡的第四天晚上天降大雨，屋漏得沒法住，一家四口只好躲在門櫃下麵。

“姐姐（唐賢輝）從1952年五月起，每月從18元微薄的工資中給家裏3元錢，姐的恩情我們永世難忘。姐從53年到56年春節都在家過，劫後餘生一家團聚。每年春節姐回家，都協助鄉政府搞文娛宣傳活動，返校時鄉政府給她的假期活動鑒定評價都很好。1956年她的工資從22元漲到36元，並補發了幾月工資，她就給我們買了一匹布（十丈五尺），一個陶瓷臉盆，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從1951年冬我就穿著父親臨刑時的血棉衣，上面有兩個槍眼兩個刺刀洞，母親洗掉血補上洞，這件棉衣我整整穿了6年，到這時我才換上新棉衣。

“父親和四叔被殺幾天後，47歲的大伯唐重介又于1951年正月被以反革命罪鎮壓于金堂竹篙，同時被槍決的還有37歲的二姑父周愚溪，因其曾任金堂縣國大代表，被定為反革命。大伯唐重介和二姑父周愚溪，皆被開花子彈將腦袋打得稀爛。唐重介被冤殺幾天後，陳毅寫信證明他是革命盟友，但為時已晚。辦案者怕追查責任，將其與陳毅的合影照全部燒毀，拒不平反。二姑父周愚溪案5年後被承認‘實屬誤殺’。後來讓其子周隆器當上縣政協委員、常委，兩屆成都市人民代表，擔任金堂中學副校長。”

唐家一門四冤的往事，第一次為兒子念念所知曉。唐賢輝叮囑兒子：唐家沒有敵人，唐家沒有仇恨，唐家只為歷史保存記憶，保存記憶只為避免前車之鑒！

2001年1月10晚8點，唐賢輝以死不瞑目的姿勢停止了70年的心跳。逝前她告訴兒子，你一定能看到外公平反的那一天。她相信，既然她自己的歷史問題可以澄清，父親和家族之冤一定也可以昭雪。需要的是時間！連蘇聯都可以解體，什麼奇迹不會出現！

---

1969年冬，我被抽調到湖南衡山縣農村鬥批改工作隊。每逢公社召開批判大會，五類分子必須上臺站著，低頭恭聽大會批判發言。如果本人不能到場，其子女必須上臺頂替。一天，公社又召開批判大會，我所駐守的大隊有個地主婆，因病臥床多日，她兒子壯著膽子寫個請假條給我。我瞭解情況後，在假條上簽了“情況屬實，可以准假”，沒有要他去頂替。後來大隊幹部說我膽子大，敢給地主分子批假條。我說：“黨的政策是實事求是，她病在床上起不來，難道還要抬著她去開批判會？”說得大家心服口服。 郭豪雄

大伯父原是一家工廠的會計，文革時期他家門上挂著一塊牌子，上寫“歷史反革命分子之家”。那時我已懂事，知道歷史反革命的含義，但這塊牌子並不影響我們弟兄幾個到大伯家去玩。大伯家有許多好看的書，大伯母是小學教師，也喜歡我們到她家玩。大伯一表人才，身材高大，氣度不凡，即使背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包袱，仍然是氣宇軒昂，直到老年都像個大幹部，或一個大學者。

我奶奶一共生了 7 個孩子，只活下來 3 個，大伯、二伯和我父親，其餘都死于貧困和戰亂。大伯排行老大，奶奶 16 歲就生了他，二伯排行老三，父親排行老六。爺爺死的早，奶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大伯身上，想盡辦法讓他念書，一直供到初中畢業，後又進修了會計專業，這在窮人家很罕見。大伯修完會計專業，在鐵路上找份差事，做個小職員，能掙錢貼補家用，奶奶的壓力減輕了。那時是國民黨統治，職員都要加入國民黨，否則就不好混。大伯那時年輕，也被大夥拉著參加了國民黨，因為有文化，上峰器重，不久又被委任為區委書記。其實大伯只想賺錢養家，對政治沒有興趣，並沒有做多少黨務工作，後來共產黨調查大伯這段歷史，也沒有發現大伯有什麼反共反人民的問題。

儘管大伯參加了國民黨，還做了區委書記，也沒有逃脫被國民黨政府抓壯丁。不久大伯就上了東北戰場，在遼沈戰役中被俘，編入解放軍。大伯本是窮人出身，經共產黨教育，表現很積極，加上有文化，很快得到重用，在營裏當了文書。那時窮人隊伍裏初中畢業生算是大知識分子，很快加入了共產黨，成為組織的重點培養對象。全國解放時，大伯已是副營級，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不幸的事情發生了。老家給部隊轉來一封檢舉信，說大伯參加過國民黨，檢舉人是抓了大伯壯丁的地方保長。部隊馬上派人調查，果然不假，還當了區委書記。最要命的是大伯對共產黨組織隱瞞了這段歷史，實在是不可饒恕，于是被開除黨籍、軍籍，戴著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回到原籍。那個舉報我大伯的保長也沒有得到好下場，後來還是被鎮壓了。他之所以要舉報我大伯，據說與我奶奶有關。剛解放那陣兒，我奶奶是個積極分子，又是革命軍屬，鬥地主，分田地，風風火火，幹得起勁，還當上了婦女主任。奶奶檢舉揭發了保長的許多罪行，保長對我奶奶恨之入骨，反咬一口，檢舉了我大伯。？

大伯回原籍後，在文革之前雖然背著一個歷史反革命的包袱，日子過得還算安穩，娶了出身不好，在小學教書的大伯母。大伯母一直體弱，不能生養，後由奶奶作主，把我二伯家的老二過繼給大伯做兒子。文革一開始，大伯就沒好日子過了。造反派翻出陳年老賬，先是把他從會計崗位上趕下來，送到車間勞動，又在他家門上釘上“歷史反革命分子之家”的牌子。每回開鬥爭會，不管鬥誰，都押上大伯作陪鬥。我奶奶當然很心痛，也很著急，四處奔波求人，想讓他們放過我大伯。記得那時有兩個專案組的人員，一到過年過節就到奶奶家來騙吃騙喝，其中一個發展到帶領全家來吃喝，完了還要給他家小孩打發點零錢。從文革開始到 1978 年我大伯平反，這一家人在我們家白吃白喝了 10 多年。我們全家都反感他們，但奶奶為了大伯，仍然熱情接待他們。我們知道奶奶心裏有多苦，我大伯更是愧疚難當，覺得委屈了奶奶。奶奶一生要强，從不求人，唯獨在大伯的事上低聲下氣求人。那兩個專案組成員晚景很慘，領全家來吃喝的那一位患癌症，50 多歲就死了，奶奶仍給他送了花圈和祭幛。另一位，子女不孝，晚年窮困潦倒，奶奶經常接濟他。奶奶過世時，他來了，流著眼淚說“三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1978 年，大伯摘掉了歷史反革命的帽子，恢復了工作，仍當會計，補發了工資。民主黨派恢復建立，“民革”找到大伯，要大伯重新出山，說他是國民黨的老前輩，很符合條件。

大伯拒絕了。國民黨黨員的稱號給他帶來了多少苦難，他真的是怕了。民革很惋惜。其實我們都認為大伯應該參加，以他的資歷，在政協謀個位子是很有可能的，這樣他的晚年會過得更好一些。？

大伯母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一直挺到大伯平了反才去世。後來大伯又找了一個老伴，仍是身體不好，不兩年又去世了。此後大伯身體就大不如以前了，人一下子就蒼老了。兒子要接他一起過，他不肯，要自己單獨過。我們經常去看他。他退休時，我的一個堂妹頂了他的職，所以她經常去照顧他的起居。

退休後的大伯，經常被老闆請去作財務顧問，晚年還能發揮餘熱，就是過得孤獨一點。大伯是突發腦溢血去世的，享年 65 歲。我奶去世後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是去陪奶奶去了，他是到另一個世界為奶奶行孝去了。

我曾向他借過一本書，總是忘記還給他，他生前常念叨這事。在大伯父過世後的一段時間裏，他老是出現在我的夢裏，說賢侄你還借我一本書未還呢。有一年清明節我給他掃墓時，在他墳前我把借他的書燒了，省去了我的一樁心事，他也再沒有在我的夢裏出現。

—————

民主 自由 平等      焦國標書

《黑五類憶舊》聯絡方式：hbw79@hotmail.com

## 《黑五類憶舊》第十六期

作者：焦國標

好幾年前我就發現一個現象：從北京回河南老家，一千五百里，無論坐火車還是乘大巴，沿途幾乎看不到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所見全是小樹、幼樹。近日幾位朋友開車出北京到延慶游玩，跑了二百里山路，除了明十三陵附近有些古樹之外，其他路段的山坡上，仍然幾乎看不見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北京西、北兩面依山，居京近二十年，去過北京的不少山區，不止是延慶，其他山區沿路你也很難看見脫去稚氣的像樣的樹木。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兩次去甘肅天水採訪祭祀伏羲大典，對那裏連綿起伏的大山印象深刻。一座座山頭排向天際，座座山頭全被切削成清晰整齊的梯田，整座整座的山頭上望不見一棵樹，一座連座的大山都是那麼光頭朝天——視覺非常震撼。我不禁感嘆：當年那裏的人們要流多少血汗眼淚，才能把那麼多的山頭全部弄成梯田，才能把那麼連綿群山上的樹木消滅得那麼徹底，執政者需要多麼邪性才能驅使民衆去完成如此浩大的“改天換地”工程！或

者，莫非這一地區自伏羲氏以來就不長樹木？

回顧上述個人經歷，最近我得出一個粗疏的結論：北中國半壁萬里河山，無論山區還是平原，幾乎看不到一棵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木（一些古迹遺址或人家庭院裏除外）。據此繼續推演，我又得出另一個粗疏的結論：中國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若按生長其上的樹木的歲數論，莫說五千年文明古國，實在是一個只有不到二十年歷史的蒙昧新國。

爲什麼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山川之上很難看不到像樣的大樹？以我有限的知識和經歷判斷，最近六十年的共產極權制度乃是導致這種現象的罪魁禍首。請允許以我生長于斯的村子（河南省杞縣焦莊）爲例加以證明：

我們這個村子位于黃淮平原腹地，村裏六七十歲的老人至今神往當年村頭的幾十棵大毛白楊樹。那時，焦莊的大楊樹方圓幾十裏聞名。大楊樹有多大？老人們說：樹身棵棵都有磨盤粗。磨盤有多粗？起碼三四個人合抱。村裏至今流傳一個關於這些大楊樹的故事。我的一個堂伯父（父親的堂兄），少年時期曾被老抬（綁票的土匪）抬走。鑽看守的空子，少年逃出了土匪的掌握。可是家在哪里？此刻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離家多遠。無奈之下，他就近爬上一棵高樹的樹梢，向四面八方瞭望。在東南方向，他看到了我們村頭那些大樹的熟悉的樹冠，還看到了離我們村六裏的瓦崗集（不是山東瓦崗寨）的那座磚塔。少年下得樹來，朝著家鄉大楊樹的方向，一路走一路問，最終回到家裏。後來知道，羈押伯父的那個村子在我村二十多裏以外。

1963 年我降生時，我們村的大楊樹已不存在。自從兒時第一次聽說大楊樹起，直至今天我仍然每每痛惜它們的消失。那麼它們是怎麼消失的呢？是分兩次消失的：第一次是土改時期，長在富裕人家土地上的大楊樹，像土地和其他財產一樣，被分了，被伐了；第二次是 1958 年人民公社化、1959 年大煉鋼鐵時期，長在中等人家田地裏的大楊樹也被伐了，被燒了。從此以後，焦莊的大楊樹已不復存在，只存在于父老的記憶和傳說裏，再過一二百年，恐怕就只存在于筆者的這篇小文裏了。

人民公社的二十年裏，田間地頭是不准長樹的，毛說“以糧爲綱”，可耕地裏長樹違背毛的教導。即便個別樹木命大運好，僥幸活過人民公社的二十年，1979 年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時也都被刨掉。此後這三十年，土地隔幾年一變動，每次變動都是樹木的大劫。誰願意讓自己種的樹木隨土地流轉到別人手裏呢？于是在中國農民是一次動地，在中國大地上的樹木則是一場種族滅絕之災。兩千多年前孟子說無恒產者無恒心，兩千多年後焦子悟到無恒地則無恒樹。

從北京到河南一千五百里幾乎見不到一棵樹齡超過二十年的樹只是問題之一，問題之二是，一千五百里沿途所見的小樹、幼樹，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種速生楊樹。爲什麼千里盡皆速生楊？成材快，變錢快呀。如果種生長緩慢的樹種，土地流轉了，樹才胳膊粗，是刨還是不刨？刨吧，純粹是害性命；不刨呢，不是白忙活嗎？

我們村大體上說是南北對稱，東西向的主幹大街向東延伸就是出村的大路。沿著這條路走三裏地，就是北京至深圳的 106 國道。三裏長的鄉村道路，路北有一條小河相伴始終。出村不遠，臨河有我家一塊地，弟弟在河岸上種了一排速生楊樹，有二三十棵，其中多半已有合抱粗，非常蔥蘢。這裏正是當年我村一些大楊樹生長的地方，我想，百年之後這排楊樹或許也

能棵棵長得磨盤粗。我開始為百年後重現焦莊大楊樹的景象而激動，而憧憬！

去年（2010 年）秋天回家，母親告訴我，楊樹這幾年便宜了，而且越大越不值錢，弟弟栽的大楊樹今後恐怕再也賣不上價錢了。我問，那些楊樹現在估計能賣多少錢？母親說，也就幾千塊吧。我半開玩笑地說，我給他（弟弟）一萬塊，讓它們永遠長在哪里吧。當時我只是順口一說，並未進行這樁交易，也完全沒想到這排楊樹的死期即將到來！

幾個月後的今年四月，我再次回老家，下了 106 國道，發現與通向我村的那條路相伴的小河被重新挖過，新土覆蓋的河岸上一棵樹毛也沒有了。我心頭一沉：弟弟栽的那排楊樹命運如何呢？趕緊放眼往村頭望，三裏長的河岸像天地剛剛開闢一樣乾淨，弟弟栽的那排原本遮住半邊天的楊樹此時視野裏也看不到了。待我心情沉重地走到楊樹們生前生長的地方時，但見幾十個大樹墩晾在河岸上，如同屠場，有的樹墩被挖掘機從中抓開，慘不忍睹。

我的企圖重現焦莊大楊樹景觀的夢想就這樣迅速地悄無聲息地殘酷破滅了！

從記事以來，小五十年了，這條小河隔不幾年就挖一回。河岸上不管長什麼，一旦挖河，全部毀掉，壓根兒不考慮賠償的問題。土地是公家，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無人疼惜，有人疼惜也無用。弟弟正在鄰鎮當鎮長，那天我責問他：“你們這些基層幹部，在動土方工程時，為什麼就不能考慮一下生長在上面的樹木呢？”中原腹地開化有五千年了，我們的村子也有四百年了，出村的這條路上且不说能點綴幾棵千年大樹，若能點綴幾棵百年大樹，也該是多麼體面，多麼福氣，多麼有歷史感，多麼令人心醉啊！

編本期《黑五類憶舊》時，我搜索到潘石屹先生的一篇博文。潘六歲多時，三爺（爺爺的三弟）被村裏的基幹民兵抓走，去辦學習班。家人讓他去給爺爺送饅，民兵班長用槍口對著他，質問他幹什麼，把他嚇哭了，還不敢哭出聲。稍大，潘石屹問父親，那一次為什麼把爺爺抓起來，父親告訴他，縣委書記提出要貫徹“以糧為綱”，地裏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樹都要砍掉，爺爺反對，就抓起來了。

潘接著寫道，于是小時候地裏的參天大樹從此再也不見了。潘石屹是天水人。那一年伏羲文化研究會在北京開會，在京的天水名流應邀與會，我與老潘同桌用餐。看到潘的博客，聯想起十多年前去天水的經歷，原來那裏的連綿群山并非從來一棵樹沒有，而是曾幾何時到處也長著參天大樹！

天水與中原相距幾千里，兩地大樹們的命運完全一樣，遭劫的時間和原因完全一樣。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近百來年，地球生了皮膚病，就是共產極權制度。這個制度不僅是人類的災星，看來也是樹類的災星；不僅是人類之敵，也是樹類之敵。此文完工之際，我又讀到樊建川先生的一條微博：“石漠比沙漠還凶惡，地球的癌症，嚴重到寸草不生。1987 年至 2005 年的十八年間，西南石漠化面積新增四萬平方公里，超過海南島的面積。目前仍以每年吞沒一個縣的速度發展。伐木、燒山、開荒、陡坡種糧、水土流失、土層變薄、再變薄、石頭裸露、大地死亡。僅僅是人口壓力嗎？這幾十年怎麼了？”如此說來，共產極權制度不止是樹類之敵，也是整個生物圈，乃至岩石圈，之敵。

## 目 錄

---

父親的心傷·····	劉 宇 (07)
李樹鳴的烈士證·····	海 鷗 (12)
潘林玉老師·····	博 客 (17)
我要入黨·····	田桂賢 (19)
基督徒忠道·····	馬世光 (20)
蘇南土改亂打殺·····	網 文 (24)
我是地主崽·····	王耀洲 (30)
黃埔五期的大舅·····	博 客 (35)
家史點滴·····	行 人 (37)
爺爺講土改·····	滇 民 (39)
小學校長段紹井·····	霜 天 (42)
童年記憶·····	潘石屹 (46)

---

河北盧龍縣有一位教員，姓吳，家爲富農成分。1947 年土改時，他家的三間正房和三間廂房劃爲他家所有，頒發了土地房產證。1951 年村裏暫借吳老師的 3 間廂房使用。1954 年初，吳因孩子多，又長大了，住得太擠，就向村裏討要這三間廂房。村幹部說：“辦初級社了，這三間廂房要作爲倉庫。”吳老師據理哀求，沒人理睬，就找到縣裏，請求解決。不料，法院逮捕了他，判刑二年，罪名是“反攻倒算，破壞合作化運動”。

《黑五類憶舊》電郵地址：[hbw79@hotmail.com](mailto:hbw79@hotmail.com)

### 父親的心傷 劉 宇

1970 年冬，父親最擔心害怕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單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來，打成歷史反革命，兩歲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來抄家的革命群眾。姐姐後來告訴我，家裏被那些窮凶極惡的人翻得底朝天，母親嚇得瑟瑟發抖，母親懷裏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鬧，只是睜著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著。

父親高中時的一本空白筆記本，扉頁是一幅木刻風景畫，上有一個黃豆大的人影，畫下有幾個字，曰“領袖在廬山”，是為私藏人民公敵蔣介石畫像的反革命鐵證。母親在上海仁濟醫院工作時的一條床單，上有英文“仁濟醫院”字樣，是為美國特務嫌疑罪證。證據確鑿，二人立馬成為鐵板釘釘的階級敵人。

父親的母親楊文蔚，早年留學日本慶應大學，回國後在蘇州開婦科醫院。楊喪偶後，由親戚戴笠介紹，改嫁戴的黃埔同學盛子瑾。盛對兩個拖來的油瓶視如己出，父親和他的哥哥從此有了一個慈愛的國民黨將軍繼父。抗戰時期盛子瑾是安徽六區專員，在皖東北積極組軍抗日，與共產黨，其中包括江上青，有交往。解放前夕，共方對盛做工作，要他留下來為新政權效力。鑒于抗戰期間與共方合作，抗戰後卸甲歸田未曾參與內戰，盛欣然從命，留在上海。1949年之後，盛還遵照潘漢年等人的指示，到香港“為黨工作”，51年鎮反時却以反革命罪被捕，54年12月瘐斃于提籃橋監獄。

上海解放時，我的父親積極參加革命，放棄大學，執意報考華東財政幹部學校，後又與父母劃清界限，徹底決裂。父親的哥哥，同濟大學畢業，為了撇清這個家，主動要求分配到天津教書。繼父盛子瑾死後，我的父親堅決要求他的母親與盛劃清界限，拒絕為其收尸。

1957年，曾是上海市第一屆婦女代表的楊文蔚，因在大鳴大放中“大放厥詞”，老賬加新罪，被正式逮捕判刑入獄。我的母親，1948年加入上海地下黨，抗美援朝期間作為優秀分子，參加全國第一批赴朝慰問代表團，此時也受到牽累，在單位被打入另冊。我的父親自中共上臺以來，為了個人的出路，一直拋棄人性人倫，試圖以這種“大義滅親”的舉動洗淨自身。1959年開始三綫建設，上海的許多企事業單位，或抽調人員或整體搬遷到大西南，父親近乎瘋狂地向單位申請，拼命要求到西南最艱苦最邊遠的地區做貢獻。他固執決絕地廉價賣光了家裏所有的傢具，帶著妻子、岳母和四歲的女兒舉家離滬，徹底斬斷了與上海的一切瓜葛，也斬斷了我們一家的歸鄉路。為此，我的外婆到死都沒有原諒他當年如此孤注一擲的舉動。

父親痴望用“積極表現”洗刷與生俱來的出身污迹，鍥而不捨地寫入黨申請書。他實在太幼稚，好像忘記了有個叫檔案的東西。1949年後的中國，檔案是每個人如影隨形的血型記錄，它在你還是娘胎裏未成形的血塊時就已決定了你這一生的貧富榮辱升沉進退。文革一來，父親因檔案裏的家庭出身和家庭關係，成為單位的重點“關照”對象，家被抄，工作停了，夾著鋪蓋卷住進“牛棚”。母親和這個家卻沒有拋棄父親，對女婿滿腹怨氣的外婆也沒有要女兒拋棄女婿以擺脫無休無止的牽累。兩個女人四隻手臂，苦撐起破碎的家。母親背著不到一歲的我，走十多裏泥濘的土路去探望蹲牛棚的父親，又連夜趕路回家，因為第二天還要準時上班。母親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具備有由“帝國主義侵略者”培養出來的職業倫理精神。儘管家庭和自己被潑污水，但母親以她出眾的資歷（包括革命資歷），和藹可親的人格魅力，以及一貫與人為善的好人緣，沒有受到太大衝擊，仍得以一如既往地工作在第一綫。

1966年8月，姐姐小學畢業。從上學開始，成績總是第一名的姐姐，小升初考試又是全區八縣第一名。然而發錄取通知書的那個下午，姐姐遭遇到終生難忘的屈辱和悲憤，成為姐姐永遠的夢魘。

那天下午，姐姐去學校，遠遠看見班主任徐某（其夫是父親的同事，也是後來將父親打倒的

造反派成員）背著手站在校門口。走近之後，徐老師望著姐姐，那異樣的眼光令姐姐不寒而栗。徐身邊那些已經拿到初中錄取通知單的同學——一個個都是紅五類子女，立即將姐姐和徐老師圍成一個圓圈。他們明白，一場好戲就要開始了！

徐老師以一種得意洋洋的神情，用奚落的口吻問姐姐：“如果你沒有被錄取，你準備怎麼辦？”姐姐漸漸地埋下頭，眼眶裏泪水充盈，不祥的感覺占據大腦，囁嚅道：“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周圍所有的同學都盯著姐姐，帶著好奇、疑問、不屑和鄙夷的眼神。過去老師嘴上的“人尖尖”，同學中品學兼優的佼佼者，今日會是怎樣的下場呢？同學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姐姐身上，此時徐老師像變戲法似地從身後拿出一張紙，高高揚起：“這個是你的——未錄取通知書！”接著以一種無比滿足開心的口吻冷冷地宣布：“你還想讀我們無產階級的學校嗎？別再痴心妄想啦！初中錄取沒你的份！”周圍的人頓時一片嘩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尖叫狂呼：“活該！活該！歡喜！歡喜！”姐姐嚎啕大哭，沖出人堆，哭著跑回家，哭倒在外婆懷裏。

通過自己的老公，徐老師掌握了我們一家的“底細”，親手為姐姐寫下畢業生評語：該生家庭為歷史反革命，其父是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位徐老師，從一年級開始就經常鼓動學生變著法兒作弄侮辱姐姐。也就是說，在文革到來的前五年，徐老師就對姐姐實行起小小的無產階級專政，讓她長期生活在歧視之中，如今終於親手將這個學生徹底毀滅。對一個兒童都能實施如此手段，真不知徐某是否想過自己究竟能不能當得起“老師”二字。

姐姐至今對父親耿耿于懷的一件事是被父親毒打。“一大把頭髮都揪了下來！”姐姐至今講起，仍然忿忿。姐姐在一份登記表的家庭出身欄裏填了“職員”，父親認為姐姐是篡改出身，若被人捏住把柄，不知又要給家裏帶來什麼無妄之災。姐姐反駁說：“你又不是什麼舊官吏，我為什麼要填舊官吏？”父親像瘋了一樣動手打姐姐，姐姐也拼命反抗，大叫著：“和你拼啦！不想活啦！”

從姐姐上學開始，父親數次打她，或因姐姐考試考了 99 分，或因姐姐偷偷借看張恨水的小說。每次之所以打女兒，皆起因於父親的一種擔心禍從天降的驚懼。家中有一張舊照片：外灘人民公園，父親懷裏抱著幼小的姐姐，臉上洋溢著初為人父的喜悅和慈祥。我無法想像後來對姐姐施暴的父親是什麼樣子，更無法想像是一種怎樣的壓力把當年俊朗清秀、英氣逼人的父親扭曲到這般瘋狂的地步。文革十年，父親如此卑微，如此驚栗，如履薄冰，近乎變態；毒打女兒時，父親的內心也一定在哀嚎！

姐姐十六歲時，文革中誕生的“革命新政權”給她一條出路：在一家集體企業和一幫黑五類子女一起，幹起四人抬一塊水泥預製板、在高樓頂扎鋼筋骨架的重活。這份工作足以將一個十六歲少女的身體摧折變形，留下一生的筋骨勞損。姐姐永遠記得上班的第一天，那位嘴角叼著烟蒂、滿臉鄙視神色的領班師傅，對著她們這一群畏縮的少男少女惡狠狠地訓斥：“你們這些黑五類子女，就是拿來勞改的！老老實實幹活！不許偷懶！”從小在母親、外婆呵護中長大的姐姐，此時終於明白自己已被打入另冊，釘在耻辱柱上，對知識的渴望，對青春的期許，已是永遠不能實現的美夢。

我從小就被關在家裏，每天只能從陽臺欄杆中伸頭出來看樓下頑童開心的嬉戲。家人不敢把我放出去，鄰里的孩子都知道我有一個反革命爸爸，一旦放出去，必遭欺負作弄。誰說孩子是純潔的？有一次，剛讀小學的我，被院子裏的幾個大孩子（造反派、當權派的兒子）堵在



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指責我家的種種罪行：你家有蔣介石像，你家搜出發報的電臺，夾壁裏還藏著衝鋒槍，等等。最後，他們把一隻死老鼠放進我的書包，我被嚇得大哭，他們拍手哈哈大笑。

“九一三”之後，父親被戴帽解放，像一條喪家犬，夾起尾巴回單位重新做人，1978 年後徹底平反。一個壓抑許久的心結，如同病灶，悄悄吞噬著父親的心靈，直到臨終前一年，父親才在我面前和著眼淚袒露出來：

文革開始前不久，我的祖母楊文蔚已經刑滿釋放。老人曾分別致信天津、貴州，懇求兩個兒子接納自己，讓晚年有個歸宿。結果是，兩個兒子不約而同地堅決拒絕了她！這個坐够了無產階級專政牢獄的母親，對於她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家庭猶如可怖的瘟疫。孤苦無依的老人最後只得去浙江平湖，投靠自己唯一的弟弟，戴著國民黨特務帽子的楊恭義（父親每月給祖母寄一點生活費）。兩個已成驚弓之鳥的兒子再沒見過自己的母親，幾年後祖母楊文蔚病死，他的兩個兒子無一奔喪……

父親講述著往事，眼淚不住地流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惶恐之餘我感受到了父親心底那種刻骨的傷痛。他的眼淚中飽含著半生的苦痛掙扎和無盡的屈辱悔疚。從青年時期起就承受著難以表述的重壓，內心的糾結最後終於以癌症的方式爆發，1996 年，六十五歲的父親告別人世……

---

1957 年反右針對的是知識界，在窮鄉僻壤，被打成右派的多是小學教師、機關幹部、信用社及商業部門的工作人員。緊隨反右之後，在農村也進行一場運動，主要針對的是沒有文化的農民。我本家的 60 多歲的王大婆(王奶奶)，就在運動中被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王大婆上中農成分，生活比較富裕，5 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由于勞動力強，加上耕牛農具齊全，土改後日子過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長，政府實行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她家的日子越來越差。王大婆對政府政策很不滿，平時與人交談中不免牢騷幾句。有一次征糧幹部強迫她家賣糧，王大婆的丈夫本全大公公不出糧，幹部就讓他在隆冬季節卷起褲腿站在冬水田裏挨凍。六十多歲的本全大公公凍得瑟瑟發抖，不久氣死了。後來幹部認為王大婆對社會主義不滿，就給她戴上了一頂“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

李 金

---

李樹鳴的烈士證      海 鷗

我和李樹鳴是同一個初中畢業的校友，我是 66 屆高三畢業生，他是 66 屆的初三畢業生。我倆都屬於黑七類子女，1969 年 7 月，我們不約而同地來到位于松花江支流小葉河畔的二裏屯插隊落戶。半個月前，公社已按政府規定每個知青安置費 240 元的標準，建了 3 間坐北朝南的土坯草房。西屋南北大炕安排 8 個男生，東屋只有南炕，安置 5 個女生，中間的堂屋作廚房，屋子的東牆上挂著一幅毛像，供我們 13 人每天早請示晚彙報用。

下鄉前，市革委會送我們每人一本三合一的《毛主席語錄》，還有一枚杯口大的毛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在一起的紀念章，公社革委會則送我們每人一套《毛澤東選集》1-4 卷。我被大家推舉為知青點的點長，兼團支書。那時我 22 歲，歲數最大；李樹鳴最小，剛滿 17 歲，個子却有 1.75 米，特別擅長游泳，1965 年獲省青少年游泳賽蝶泳 200 米亞軍。

1970年9月18日，隊長通知我們知青點派5個人到小葉河對面的山上去搞小秋收，我便帶李樹鳴和3個女同學，一大早就隨船工姚大爺，搖著小木船渡過河。在姚大爺指導下，我們用繩子打好防蛇綁腿，提著土籃子，蹦蹦跳跳，哼著小曲鑽進山林。榛子、蘑菇、松樹籽、木耳到處都是，我們捨不得直腰，半天時間就將大小籬筐裝滿了一大半。中午每人啃一個饅頭，顧不上片刻休息，接著幹。下午4點多，老天突然變臉，狂風大作，雨點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籬筐向河邊跑，姚大爺一面解纜，一邊吆喝上船。

只能載6人的小木船，加上一筐筐山貨，有些超載，晃晃悠悠，在風雨中駛向河心。河面風更大，濁浪隨風一排排涌來，小船顛簸得厲害。我們的衣服全被雨水打濕，遠方電閃雷鳴，3個女同學又驚又怕，擠在一起瑟瑟發抖。小船明顯向一邊傾斜，姚大爺厲聲喝道：“不要命啦，趕快回到原位坐好，把住船幫！”我和李樹鳴站起來，幫助將大小籬筐重新擺放，小船平穩了一些。姚大爺站在船尾拼命搖櫓，幾個浪涌的顛簸之後，終於駛出河心危險水域，向東岸靠近。就在這時，只見從上游又漂來一艘同樣大小的木船，船裏擺放著足有半人高的籬筐，上面載著4個人。掌舵的是位小青年，小船搖搖晃晃，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河中心像匹野馬似的上下猛烈顛簸打轉轉。我們都為他們捏一把汗，姚大爺則使勁沖他們喊：“小夥子，往東使勁搖，快點離開水漩子。”話音剛落，一個黑浪打來，那船頃刻翻沉，4人全部落水，在水裏呼喊著、掙扎著、沉浮著……

這一幕把我們驚呆了，只聽李樹鳴說聲：“大爺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搖回來。”話音剛落，他已跳入水中。

我們很快靠了岸，急忙卸下東西，我又跳上船，隨姚大爺向河心駛去。只見那個小船工死死抱著船槳浮出水面，他身邊露出另一名男子，馬上拽住了他的衣襟。樹鳴及時趕到，安置他們都抓住船槳，並指了指我們的小船，喊道：“別慌，朝那兒使勁登水……”說著樹鳴又潛入水中，向不遠處另外兩個忽隱忽現的人頭撲去。

我們的船趕到，急忙將這兩人拉上船，又向樹鳴搖去。遠處，樹鳴又救起一人，小船及時趕到，大家七手八腳把那人拽上船。這時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了。正在萬分焦急時，有人發現不遠處的水面上，樹鳴正與一落水者撕扯，那人拼命要抓樹鳴，樹鳴千方百計躲避他，最後拽住了他的頭髮向小船游來。大家趕忙將船劃向他們，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亂抓的雙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來的木槳，死死抱住再也不肯鬆手。樹鳴在水裏托著他，大家向上拉著他，最後終於將他拽到船上。等我們再向樹鳴伸出船槳時，只見他只伸出了無力的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幾次胳膊肘，然後人就沉入水中，再也沒有浮出水面。船上的人一起大喊：“樹鳴！樹鳴！”岸上的人也同樣狂喊：“樹鳴！樹鳴！”但河面上除了奔騰汹涌的濤聲，就是雨水擊打水面的嘩嘩聲……

李樹鳴落水失蹤的消息傳到村裏，隊長立即帶領大家跑步來到河邊。會游泳的青年撲通撲通跳進河裏，反復潛水撈人。點裏的同學，村裏的老人、婦女和孩子，幾乎所有的人都來了，黑壓壓地站滿河畔，一遍遍地呼喊著李樹鳴的名字。大家不相信這個年輕人會忽然離去，幻想著奇迹的出現，樹鳴會拖著疲憊的身軀，笑呵呵地從下游走過來。為了不讓樹鳴漂走，附近的駐軍戰士在河的下游落下擋網，沿河的漁民都趕來打開網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網搜索。

晚6時半左右，李樹鳴的遺體被找到，他的頭髮有些散亂，神情寧靜安詳，右袖口有個破洞，

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像章上，無法伸展右臂。“樹鳴，你不能走！”我一下子撲上去，嘴對嘴做人工呼吸。半小時過去了，沒有效果，周圍頓時一片慟哭。有人送來了被子，蓋在他的身上。他的遺體用一扇門板抬回大隊部，整整3天，全村人自發為他守靈。被救起的4人是縣造紙廠的職工，他們湊錢買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搖船的小青年送來。小青年叫方正，他說：那3人不能來，因為他們是被廠裏揪鬥的牛鬼蛇神。

加急電報一次次打到樹鳴家裏，不知什麼原因，他的家屬一個都沒有來。9月24日，公社革委會主持召開挺隆重的追悼大會，革委會冉主任說：“李樹鳴同志，用自己捨己救人的行動，證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茁壯成長，我們要為他申報‘革命烈士’稱號。”造紙廠革委會派人送來了花圈，但還是沒允許那3個被救起的人參加追悼會，他們的親屬卻來了5馬車，40多口人。第二天，縣報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樹鳴》。樹鳴實因右胳膊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能逃生而被淹死，這篇文章卻說：“在他生命將要走到盡頭時，還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護著像章安詳地走了。”

一個多月後，樹鳴的妹妹陪著媽媽來了，原來那一封封電報她們根本沒收到，因為全家已隨“叛徒”父親被趕回農村原籍監督勞動，後來是親屬告知了樹鳴的死訊。兒子死了，父親仍然不能來憑吊，因為是“叛徒”。從樹鳴的墳地回來，我們就去了公社，準備將樹鳴的革命烈士證書一并帶走。冉主任說：“所有材料我們已報到縣裏，留下你們的聯繫地址，回去等著吧。”

冬去春來，轉眼到了1971年5月。一天，我接到樹鳴家裏的來信，詢問樹鳴的烈士證書的事。我很吃驚，怎麼都8個月了還沒辦下來！我立即去公社，他們讓我到縣裏問。縣革委會告訴我：上面有的領導對樹鳴救3個牛鬼蛇神有異議，認為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時期，什麼問題都要站在階級立場上分析處理，捨己救人也同樣有它的階級屬性，“親不親，階級分”，否則“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就無從談起。追悼大會公社已開過，縣裏的報紙也宣傳了，此事就這樣了。

這個回答令小葉河兩岸8個知青點的100多號人怒氣衝天，大家紛紛派出代表，由我帶領，去縣革委會質問他們兩個問題：一、李樹鳴在救人時難道還要先查檔案再施救嗎？二、如果事前知道那3個人是牛鬼蛇神，難道在水裏將他們掐死就對嗎？三天後，軍代表出面向我們解釋：“大家先回去，我們一定會把同志們的意見向上級反映。……千萬要紮緊階級鬥爭這根弦，不要被階級敵人利用。”十幾天後，縣民政局通知我們，由省軍管會批准的《因公犧牲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已頒發給了樹鳴的親屬。

未經任何一級領導授意，我們自行決定為樹鳴製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工後，大家都在小院裏忙碌。幾天後，一座高120厘米，寬40厘米的墓碑製成，碑身正面，我一筆一畫鐫刻7個隸書大字“李樹鳴同志之墓”，並塗上紅漆。我們趕著牛車，來到小葉河畔的楊樹林裏，把原來那塊木碑換掉。想想今後將只有無盡流淌小葉河和周圍的青草、野花、小白楊永遠陪伴著這位長眠于白山黑水間同學少年時，我們的心在哀顫、慟哭，不忍離去。

十多年後，1984年5月的一天，樹鳴的妹妹找到我，說：“劉哥，我們接到通知，要我們到民政局，將我哥的光榮紀念證換發為新的革命烈士證明書。人家審核後說，你的這個舊證到此作廢，新證不能換發。你說我們該咋辦呀？”幾天後，我基本搞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給樹鳴妹妹打電話，告訴她，你只需寫個《追烈申請書》交給我，其他的事由我來辦。經過我們幾個同學近半年的奔波努力，民政部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明書最終交到樹鳴媽媽手中（其父 1980 年病故）。

當年縣革委會將樹鳴的死因寫成“為護衛毛主席紀念章而英勇獻身溺水死亡”，並注明是“可教育好子女”。這個死因不符合 1980 年新頒布的《革命烈士褒揚條例》，所以被停發新證。我們找到當地縣政府重新為他辦理“追烈報告”，還找到當年被救的當事人出具證明材料，才將新證辦下來。

張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也不是最後一例，在她之後，還有多人被在行刑前甚至被在公審大會前割了喉管。對行刑犯人割喉管這個超越法西斯的“創舉”，是遼寧公安局的一個法醫根據當時遼寧當權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許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聲呼冤，就是要學革命烈士呼口號，有的反革命犯還高呼“毛主席萬歲”，這被認為影響極壞，割喉管便被設想出來。其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全面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等當權人物同意了這一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創造性的“新生事物”。第一個“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瀋陽皇姑區克儉小學青年教師賈承厚，因為曾給校長提過意見，被校長串通學生誣告他強姦女學生，判處死刑。賈始終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斷喉管後再槍決，死時只有 20 來歲。死後其家屬在獄中拿回他的遺物，發現被子中縫有一張伸冤狀，詳細敘述了冤案經過與伸冤理由。

我的爺爺奶奶是城裏的地主，平時對長工很好。文革時北京批鬥地主，我奶奶逃回老家，當年的長工還趕過來看望，晚上還偷偷送來吃的用的，一點沒受罪，過了 1968 年又回北京了。我奶奶的舅舅家是山裏地主，就沒那麼好命了，一家死了 7 口，兒媳婦被釘在門板上。

潘林玉老師 博 客

我的小學是兩間馬廄改成的教室和辦公室，上下課鈴聲來自樹上挂的一截鐵軌。一個小學，二十多個學生，共用一間教室，一個校長，一個老師。我們上午上課，下午全體師生為生產隊的驢馬割草。有一次，我因為沒鉛筆，被老師趕出了教室，在門口站著。媽媽下地幹活路過教室看到了，問我為什麼，我對媽媽講：“我的鉛筆用完了。”媽媽看著我手中那段捏不住的鉛筆，很發愁。家裏沒有錢買鹽和煤油，哪有錢買鉛筆。潘林玉老師看到後，借給媽媽一毛錢，媽媽跑到村上的供銷社買了三支鉛筆，又借供銷社的削鉛筆刀削好一支，送給我，說：“有了這麼多的鉛筆，今後要好好學習。”我才得以回到教室。

我一直是個好學生，却不能參加紅小兵，因為我爺爺是國民黨，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小學四年級時，在潘老師極力推薦下，我終於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紅小兵，戴上了紅領巾。潘只有小學三年級的文化程度，為了教好課不斷地自學。我們學校裏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個看廁所的老大爺，潘老師不懂的問題總是虛心地向這位老大爺請教。那時大家都吃不飽飯，下課休息和課外活動的時間，大人不讓我們亂跑，以節約糧食，潘就帶我們聽這位看廁所的老大爺講故事。

突然有一天，在教室黑板上看到潘老師給我們寫的一段話，大意是我要離開你們了，你們要好好學習，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潘老師離開我們去任大隊書記了，他不是黨員，却成了書記，是一件怪事，據說是在入黨和任命書記的時間上做了手脚。從此，大隊的高音喇叭裏天

天可以聽到他的聲音，要抓緊抗旱之類。從我有記憶以來，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還動員全村人去川裏村的地裏撿白菜葉子，撿回來的白菜葉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沒有糧食的月份吃。我想，潘老師當了書記，村裏的人一定就不會再挨餓了，不料事與願違，糧食更少了。就在這一年，父母做出決定，爲了生存，把我的兩個妹妹送給糧食比較多的人家。那些年，年年怨天怨地，說是自然災害，可是同樣的天，同樣的地，包產到戶後，糧食都够吃了。

前年，出于對啓蒙老師的感激，我請潘老師來北京在我家住了幾天。我問他當年去當大隊書記是怎麼回事，他告訴我：“一天早晨，天還沒亮，我睡不著了，在村口的大槐樹下看到村上有七戶人家逃荒要飯去了，我就趕到公社，要求當村上的書記，他們就答應了。”村人要面子，去逃荒要飯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話。也是這一年，村上有兩戶人家的兒媳和女兒，餓得不行，去了陝西，等來年糧食下來後才又回來。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飽飯，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沒有火，教室像冰窖。每年班上都要讓同學們打洋槐樹子賣給收購站，換點錢買點柴火過冬。一天，我們四個同學去鄰村打洋槐樹子，被人發現，不讓我們打，還要拿走我們的背簍，最後雙方打了起來。我們被打得鼻青臉腫，滿臉是血。回到村口，遇見潘老師，這時已經是書記，問了我們原委，馬上讓人帶話給那個村的書記，讓他們來給我們道歉，“否則，你們村的人就別想走這條路了”。我們村前有條路，是那個村通向公社唯一的路。沒幾天，那個村的書記給我們道歉來了，第一句話是：“我給你們大隊裝烟來了。”裝烟在我們當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的三爺有十畝地，解放前和解放後一樣吃棒子麵，但我們村沒什麼富人，就劃成了地主。給他打短工的一個人，後來成了村支書，批鬥我三爺最積極，事實上這個人在打短工時吃的比雇主還好一些。

帖 子

我要入黨 田桂賢

1966 年，我爹因在舊社會當過森林警察，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我成了黑五類子女。當時正是我心如一盆火，上進心特強，積極要求進步的時候，曾向黨組織遞交幾十份入黨申請書和思想彙報，組織因我爹的關係一直不批。我找當時的工作隊隊長，向他表示我要求入黨的強烈願望，說：“你們認爲我爹是歷史反革命，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不是，我是團支部書記，團組織是進步青年組織，是黨的助手，再說家庭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要自己選擇的，我就是入黨，我和我哥都是我爹的子女，我哥早就是黨員了，爲什麼就不讓我入黨？”我很激動地說了很多話，隊長沒辦法答復我，就說：“何香凝都是黨外民主人士，爲黨做貢獻的民主人士很多，你爲什麼非要入黨？”我說：“我要革命，所以就要入黨。”

1968 年縣裏召開全縣教師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我被選參會，并準備了在會上的發言稿。我興沖沖領著妹妹去縣裏參加會議，可是還沒到大會發言，校長找我談話，說：“大會經政審說你不能參加這樣的會議。”一句話潑滅了我心中正燃起的激情。我強忍著欲放聲大哭的壓抑心情，灰溜溜地領著我妹妹走出會場。妹妹問我：“咱們怎麼不參加會議了？”我說：“因爲爹在舊社會當過森林警察，他們說爹是歷史反革命，咱們是爹的女兒，就是黑五類子女，不讓咱們參加了。”妹妹說：“爹不是歷史反革命，不是壞人，是好人。”1971 年，我爹的歷史問題被查清，只是一般歷史問題。鄉組織委員王昆說：“田桂賢的入黨申請書寫有一書包了，說明她的入黨願望是很強烈的，經過幾年的培養和考核她已經具備了黨員

標準。” 1971 年 2 月 2 日，我終於入黨了。

基督徒忠道 馬世光

忠道出生在中國大陸一個傳道人家庭，從小就生活在屬靈的環境中，活在神的話語裏。在襁褓中，小忠道就隨母親去聚會。快滿兩周歲的一個主日，聚完會，母親抱著忠道出來，父親隨口問他：“今天你聽了什麼？”“山羊、綿羊。”父親楞住了。這天講的信息是馬太福音第 25 章 31 節至 46 節之經文，不滿兩歲的小忠道竟聽出了信息重點。又一個主日，講臺信息是馬太福音第 24 章 44 節至 51 節。聚會結束，父親又故意問忠道：“今天講道人講的什麼？”小忠道不慌不忙地說：“好僕人、壞僕人。”父親掩不住內心的喜悅，抱起忠道，在他的小臉蛋上使勁親一下，激動地說：“是神給你的屬靈耳朵，但願你不辜負神的恩典，長大後被他使用。”

從小學開始，忠道因品學兼優，深得老師們喜愛。中學時，政治氣氛漸漸濃厚，雖然仍得老師一致好評，忠道卻不像其他同學那樣積極爭取入團入黨，因為他知道不能放棄原則，不能以信仰為交換條件。高中畢業時，他沒有像那些政治成分好的同學一樣雄心勃勃，搶報熱門學科和名校。他心裏明白，這一切都不屬於他，他填報了幾所普通大學。在“宗教信仰”欄裏，他鄭重地填上“基督徒”三字。班主任許老師曾向人說：“我一聽見基督徒三個字，就恨得咬牙切齒！”但忠道願讓基督徒這三個字伴隨他一生，這三個字是他的姓名和身份。

忠道收到福建鐵道學院的入學通知書。這是一所三流大學，許多老師都為他惋惜。高三的蘇老師直率熱情，特地跑到忠道家，勸他放棄信仰。他流著淚說：“讓你的父母兩位老人家去信吧，年輕人何必毀掉自己的前途呢？就算你要做基督徒，可以偷偷做，不要讓人知道，你該懂得珍惜前途啊！”忠道感激老師的好意，說：“我會珍惜寶貴的東西的。”忠道並未嫌棄這所大學，而是懷著感恩的心踏上人生的新里程。

學院的新生報到處懸燈結彩，一派新氣象。教育科科員老劉坐在一旁抽煙，與接待新生的辦事人員閑聊。忠道進來，只顧與接待員交談，全未注意一旁的老劉。待辦完手續，才發現老劉朝他笑。老劉朝他招手，忠道走過去，坐下。“你就是忠道？”老劉神秘地一笑。“你認識我？”“嘿嘿，我是教育科的老劉，我可是你的入學介紹人呢！”老劉半開玩笑地自我介紹說：“今年是我去挑選的新生。我在考生資料表中發現一個高分考生，够清華大學的入學標準。我看了他的資料，沒什麼大問題，不就是宗教問題嘛！沒關係，別人不要，我要，我就把他挑來了。這個學生就是你啊？”

正是“三年自然災害”，大學校園裏常發失竊案，許多男同學宿舍被偷，忠道的衣物却從未遺失。有同學開玩笑地說：“為什麼忠道的東西沒有被偷過？大概是他的上帝在保護他！”另有同學說：“像忠道這麼老實的人，如果有人偷他的東西就太沒道德了！”後來知道，說這話的同學原來正是那個小偷。

在學院食堂的餐桌上，每餐的菜肴是一盤水煮空心菜，八位同學均分，每位只有一筷子的量。每餐大家常常因為分配不均，吵得面紅耳赤。同學推舉忠道負責分菜，餐餐皆大歡喜，從未發生爭執。雖然饑腸轆轆，忠道始終不忘餐前謝飯禱告。謝飯禱告關係到敢不敢在人面前承

認主名的原則問題。主耶穌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認他。”忠道低頭謝飯時，同桌同學好奇地推他：“喂！喂！你是不是餓昏頭了？”個別同學捉弄他，把他的飯盒藏起來或把他的菜吃掉。食堂裏一些激進的同學有時甚至大聲咆哮：“在無產階級的高等學府裏，竟有這種唯心主義的傢伙！”更有人凌空飛來空盤，算是發出嚴重警告。主耶穌的話語在忠道耳畔迴響：“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忠道不改初衷，每日三餐依舊謝飯。

一天，人事科史科長找忠道去談話，先說一套破除迷信，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政治大道理，然後話鋒一轉說：“根據同學反映，你在食堂吃飯時禱告上帝，公然進行迷信活動。我們無產階級高等學府，只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不培養你這種唯心主義者。”忠道試圖解釋，但不被接受。忠道心裏明白，此刻他正面臨一個嚴峻考驗，必須對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擇。權衡的結果，決不能喪失屬靈原則，他仿佛看見保羅手持天平，對忠道說：“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忠道心裏發出一個微小却十分清晰的聲音：基督為我捨棄一切，我為他捨棄什麼？忠道沒有第二個選擇，默默離開了學校。

忠道不明白這件事為何臨到他，曾試圖向主祈求，主沒有給他答案，只給他一句話：“我的恩典够你用。”第二年，福建鐵道學院并入著名的唐山鐵道學院，自己的同學都進入名校，忠道心裏一陣沮喪，難道自己當初的選擇錯了嗎？

離開大學後，忠道只能做臨時工，有時到學校當代課老師，更多時候得去參加街道居委會的義務勞動，打掃居民區環境，挑土、運磚石、推板車、挖防空洞、燒磚窯、挑糞便等等。當時，基督徒被人看為三等公民已是大幸，不少基督徒因主的名被監禁和勞改，正如《聖經》所說：“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忠道的父親是一位忠心的主僕，政府加給他一個特殊“內控分子”的身份。

1966 年文革開始，一批批紅衛兵到他家“掃四舊”，聖經、詩歌、屬靈書籍、照片等付之一炬。忠道的父親心臟病臥床，紅衛兵仍不放過他，多次批鬥，威脅要逮捕他。有時忠道一出家門，就被鄰居孩童譏笑、咒罵、吐口水、丟髒物，正像《聖經》所說：“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

1976 年，忠道離開大學 14 年之後，唐山突然發生驚世大地震。一座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一夕之間夷為平地，死亡人數高達 20 多萬，忠道聽說，畢業後留校工作的同學沒有一個幸免。

1977 年，神帶領忠道離開中國大陸。他不像別人想到國外發財，他只一心希望到一個自由敬拜神的地方。當他在自由的土地上盡情放聲高唱讚美詩時，禁不住熱淚盈眶；神的僕人在臺上傳講福音時，忠道抽泣得更厲害。教會裏一位弟兄關切地問他，是否有什麼傷心事，忠道搖搖頭說：“不是傷心，是太開心了。”他的心在歡騰，他的靈在歌唱。“主啊，我把全人獻給你，由你使用和調度！”

---

我爹曾給地主當長工，文革時鬥地主，他老人家貓在家裏，我問：“你為什麼不去鬥那個地

主？”誰知我爹瞪了我一眼：“人家待我好吃好喝，還給工錢，我憑什麼鬥人家？”是呀，人家好好待你，鬥人家不是缺德嗎？可就有一幫人在一個缺大德的組織鼓動下幹缺德事。

我爺爺是地主，可是，當地人都尊稱他先生，青年人都叫爺爺，九十六歲去世，送葬的人有二千多。我外祖父也是地主，一條江脉幾個縣的人都說他好。我媽一次去外地進貨，有人聽我媽的口音，就問起我外祖父，我媽說“那是我父親”，旁人就圍過來，都說我外祖父的好，告訴我媽：“孩子苦了你了，今後進貨，只管到這來。”我舅公（爸的舅舅）也是地主，那個地方的石橋，就是我舅公帶頭建的，花了好幾千銀元。

溫州永嘉縣橋下鎮，有個地主名叫戚志清。年終結賬時，若佃農無法還租，他反而叫鄉幫趕緊送糧送肉。土改槍斃他時，開公審大會，叫佃農揭發他，佃農說著說著就說他的好處，大會組織者趕緊叫他下去，又一個上來，又是說他好，那個帶頭的就怒問：“你想保他嗎？”回答：“是的。”那個帶頭的向台下喊：“還有多少人想保他？都上來。”台下的嘩上去，連臺上都站不下。

### 蘇南土改亂打殺 網 文

1950 年土改時，蘇南地區亂抓亂打的現象很普遍。武進縣百大區鬥一個婦女燒陰毛，潢裏區鬥一個婦女逼她脫光衣服在臺上爬。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裏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江陰縣鬥爭狗腿子，要狗腿子學狗叫，學狗爬，學狗啃骨頭。嘉定縣馬陸區 7 個鄉鬥爭 36 人，其中 31 人被打，10 人被剝光衣服澆冷水，30 人下跪。上海縣的塘灣鄉鬥爭 4 人，全坐老虎凳。常熟縣發生割婦女乳頭的事。有的地方把石頭放在鬥爭對象頭上，把雪放在鬥爭對象身上或要鬥爭對象吃雪。無錫縣各地，除了綁、打、跪、爬較普遍外，還有戴石臼、吃牛屎、學狗叫、吃雪等。1951 年 9 月江陰縣委在總結時說，上面叫放手，下面變成了撒手，有鬥必打，有鬥必跪，脫衣服、澆冷水、吊打等等。高淳縣龍井鄉鬥爭的 40 人中，有地主 19 人、富農 9 人、中農 8 人、貧農 4 人；安新鄉中農趙仲生因秋徵時拖欠公糧，民兵將其母子綁起來吊了一夜；游子鄉趙公廟抓了 2 個貧農到人民法庭去，說他倆是惡霸，要關到土改結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兒，他去吃了酒；沛橋、雙山、固城等鄉都有鬥婦女“腐化”的。很多小偷、狗腿子都被鬥，有的被送到人民法庭關了起來。

高淳縣游山、北達、漆橋 3 個鄉，鬥了地主 74 人、富農 11 人、小土地出租者 5 人、中農 4 人、狗腿子 4 人、立場不穩的幹部 10 人、游民 10 人，其中被打的人包括地主 61 人、富農 11 人、小土地出租者 3 人、幹部 2 人、游民 8 人；東埃鄉的鬥爭會上，2 名手工業者、3 名中農、1 名貧農被打。丹徒縣葛角鄉、均益鄉鬥爭地主 22 人、中農 17 人、貧農 3 人、工商業者 4 人。武進縣一個鄉所鬥的 32 人中只有 9 人是地主，其餘為富農、中農、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業者。常熟縣鬥了 18 個偽保長，大部分是中農。個別地方還鬥學生，太倉縣浮北鄉地主子弟曹念春不到 17 歲，讀初中三年級，也被抓回鬥爭。溧陽縣南渡區 7 個鄉聯合鬥爭蔣廷監、蔣梅方，2 人均非地主，蔣廷監是國民黨縣黨部書記，材料不實，主要罪行均屬推測，蔣梅方是叛徒，與土改無關，本無必要組織鬥爭；狄貞元按其情形是不應殺的，但幹部及群眾要求殺他，結果在鬥爭會上一口一個殺字。群眾也不是仇恨到如此程度，而是隨便妄動地呼口號。無錫縣鬥錯了 182 人。

遭鬥爭的部分人被打死。鎮江專區被鬥爭者 7,563 人，其中 6,772 人被打，被打者占鬥爭對象的 89.54%。松江專區奉賢縣 5 個鄉鬥爭 245 人，打了其中的 218 人；嘉定縣馬陸區被鬥 36 人，其中被打者 31 人；江陰縣沈舍鄉在 26 次鬥爭中被打死的 3 人，打得半死的 4 人，



被小打的 169 人；宜興縣寺前鄉鬥 72 人；武進縣遙觀鄉鬥了 4 人，打 3 人。有調查顯示，無錫縣遭到跪、凍、打的有 872 人。青浦縣龍固區在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就打死 17 人。蘇南在鬥爭中一共打死 60 人，其中鎮江專區 4 人、常州專區 6 人、松江專區 50 人。實際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數，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 18 人，金壇縣打死 2 人。

土改運動中，一些幹部借機敲詐勒索。句容縣戴亭鄉三村村幹部與部分群眾找一些稍有剝削的人家及過去放高利貸者（多是富農、中農及頑僞人員）鬥爭清算，說：“過去你們放高利貸剝削人家，現在要你們將這些剝削的糧食退出來，不退就要鬥你們，捆你們起來。”段鳳生（僞鄉長）、田慎元（中農）怕遭到鬥爭，首先拿出稻子來，其他 5 戶受此影響也仿效，計有富農賈海拿出 600 斤（被要 2000 斤）、中農段元才 400 斤（被要 800 斤）、段鳳生 1200 斤、田慎元 1312 斤，7 戶共拿出 8198 斤。該村幹部又將過去曾放高利貸者，不論富農、中農共 10 余戶的田契都收走。太倉縣雙鳳區在少數積極分子包辦下，普遍以剝衣、跪、在身上放冰塊、打等野蠻辦法強迫地主承諾多交糧食，不承諾，鬥爭會就不結束。太倉縣太平鄉地主王呂生被吊後自認 140 擔，顧清道被剝衣後認 52.6 擔。太倉縣一些地方選擇鬥爭對象時主要看誰家富裕，能拿出糧食。

土改期間，蘇南共有 293 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 97 人、蘇州專區 81 人、常州專區 59 人、松江專區 22 人、無錫縣 24 人。這些自殺者中，有些地主是畏罪自殺，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財產被沒收了，生活沒有出路了，更多的自殺者是被亂鬥亂打的氣氛所嚇倒，害怕在鬥爭中被折磨而自殺。江陰縣有 2 個女地主因怕鬥爭而上吊自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 20 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 23 人自殺。溧陽縣中有 26 人自殺，其中地主 14 人、小土地出租者 2 人、富農 1 人、中農 3 人、貧農 5 人、其他成分 1 人。溧水縣有 27 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打人者既有幹部也有群眾，往往是幹部指示、默認打，甚至帶頭打，有時還進行鬥爭和打人比賽。許多幹部認為不打就是缺陷，指示並動員農民打人。武進縣一個區提出“幹部不能打，群眾可打”。該縣一個區委副書記在農代會上說：“要打就打，要罵就罵，有苦訴苦，有冤訴冤。”嘉定縣一個區的審判會上，有個幹部吹著口哨要求訴苦人打人，最後喊“不打就是包庇”。主持這次會的區委書記說：“要群眾鬥爭，規規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縣合村鄉鄉長在鬥爭會上喊：“地主老實不老實？”群眾答：“不！”鄉長又喊：“怎麼辦？”群眾說：“打！”這樣就打起來了。嘉定縣北營鄉開庭審判時，一個村幹部在群眾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眾答：“要！”他又喊：“打幾個？”群眾答：“打兩個！”他喊：“要誰打？”群眾答：“要訴苦人打！”臺上的幹部對訴苦人說：“群眾要你打，你就打！”訴苦人說：“我從未打過人，我不打。”幹部繼續喊打，訴苦人才打了地主兩個嘴巴。幹部要求繼續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縣下壩鄉一幹部在鬥爭時號召：“歡迎某某上來鬥爭！歡迎某某上來打！”無錫縣一個區幹部指示群眾吊打僞保長的老婆和 15 歲的兒子，腳上挂石頭，弄得他們死去活來。昆山縣農會主任在鬥爭前布置：我一翻眼，你們就準備；我一合眼，你們就綁；我再一翻眼，你們就動手打；我手一擺，你們就停止。江陰縣的一個區長拿棍子在萬人大會上動員群眾打，要求每個訴苦人都要打，造成群眾不敢上臺訴苦。丹徒縣高橋區三洲鄉幹部提出“鬥爭中有兩條路綫，一條鬥爭地主，一條同情地主”，要挾群眾鬥爭地主，不少地方用“不鬥爭是包庇”、“不鬥爭要吃官司”來強迫群眾鬥爭地主。

江寧縣第四區的幹部奚若有對群眾說：“我們在這裏不要打，走後再打。”無錫縣一些幹部對群眾說：“你們打我不管，只要你們不要說我叫打就行。”有的幹部在群眾會上說：“我

不能布置你們打，你們自發地打，我也不制止。”嘉定縣一次鬥爭會打死 2 人，縣委認為“打得好”。青浦縣群眾對幹部說：“我要打死某某。”幹部認為“不打”是不放手，說“打”又怕犯錯誤，因此，既不點頭也不搖頭，等於默認。無錫縣八士區鬥爭地主徐金龍的媳婦時，派出所幹部暗示地方幹部毒打，結果把一根青竹棍打成了竹絲，被打者痛得昏死過去。昆山縣茜墩區新塘鄉幹部想讓群眾打人，又怕追究責任，就暗示群眾打，並規定了打的暗號。上海縣閔行區群眾打死 2 人，區委書記打報告要求處分，縣委則強調“打得好”，於是區委書記意識到打死人無所謂。

不少區、鄉、村各級幹部親自上陣，帶頭打人。嘉定縣新建鄉鬥爭一個地主，區委宣傳科長首先上臺打，然後是縣委工作隊、區幹部、村幹部、民兵輪流上臺打。總結這次鬥爭會時，區委宣傳科長說：“打人是對的，會議是勝利的。”鄉長說：“我們代表農民，我們打就是農民打。”個別幹部認為，在鬥爭會上打人打得太輕是一種遺憾。嘉定縣南翔區一次鬥爭會，區委書記總結時很不滿意，說“最大的缺點就是打得輕，打得不漂亮”。江寧縣第四區土改工作隊幹部張道福連打 7 個地主。嘉定縣馬陸區動手打人者 150 人，其中區幹部 2 人、鄉幹部 6 人、村幹部 29 人、民兵 12 人、群眾 109 人。無錫縣開源區出現了鬥爭比賽，看誰鬥得凶。

在遍及蘇南鄉村的亂鬥亂打亂殺中，大部分群眾並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著最基本的人性。高淳縣下埃鄉小河村地主跪在那裏被凍打，個別農民掉淚。牆圖村臺上幹部打，下面貧農王小化、陳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凍地主吃不消了。”高淳縣東埃鄉一個老太婆已準備好了控訴的內容，但到會場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憐，沒有訴苦而跑回去了。丹陽縣朝陽鄉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認轉移過糧食，工作隊顧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數百群眾齊聲叫道：“不能打，他是苦出來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隊幹部為追交糧食，將地主韋張氏綁在柱子上不聞不問，韋張氏被綁得大哭大叫，驚動了周圍的群眾，絕大部分群眾覺得她可憐。丹徒縣九呂鄉鬥爭會上，當場有一老太婆低下頭流淚，同情被吊打的人。太倉縣浮北鄉鬥爭會上，有的群眾看到剝地主的衣服，跪在石頭上，就流淚，有的拔腿就跑。奉賢縣張翁廟鬥爭會上打死地主衛春陶，小學教師反映說：“罪應該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該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縣馬陸區新建鄉群眾說：“鬥爭地主是好的，但為什麼要打呢？”嘉定縣南周鄉幹部打鬥爭對象後，群眾很反感，區委書記去該鄉時 300 多群眾圍住他問：“為什麼要打？”嘉定縣長浜鄉打徐嘉如、徐衡人時，大部分民兵將民兵符號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們動手打，婦女小孩都離開了會場。江陰縣長涇區沈舍鄉一次鬥爭 4 個地主，打死 2 個，參加會議的部分群眾不知為什麼要打死，反映說：“有罪應由政府判決，為什麼要打死呢？”高淳縣雙橋鄉鬥爭地主時，鄉幹部用皮帶抽打，致使一些群眾同情地主：“哎呀，還光著身子，打不痛？”江寧縣秦淮鄉鬥爭地主湯萬金的兒媳，對她灌涼水時，80 多到會群眾中嚇走 60 餘人，只剩下幾個民兵和積極分子。湯萬金外出討飯時，群眾給得特別多，標示同情。江寧縣水晶鄉鬥爭地主袁慕鑫時，民兵隊長周大好親自跳到臺上打，農民說：“把他打暈，怎麼和他說理。”

亂鬥亂打現象的出現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 年 11 月華東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試驗會議提出“放手發動群眾，大膽開展運動”的方針，幹部們普遍將此方針理解為中共政策的改變，是糾正過去“和平土改”的偏向。蘇州市有的幹部認為，“放手是不要領導，這樣可痛快了，過去領導抓得太緊，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倉縣一些幹部認為，“過去上級約束太嚴，處處受到限制，現在有辦法了”。一些區允許鬥爭會任由少數農民、村幹部甚至二流子擺布，土改工作隊幹部默不作聲。無錫縣南泉區有些群眾反映：“現在政策大變，可打可殺，

工作同志變成木頭人了。”部分幹部認為：“發動群眾就是開鬥爭會，而鬥爭就是打，只有打過，才是鬥爭過。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頓，群眾發動就是轟轟烈烈的熱鬧。”無錫縣一些幹部認為，放手發動群眾非亂打亂殺不可，“既要放手，為什麼又要遵守八項紀律呢”，“要去掉打、剝、跪、爬，發動群眾是困難的”。有些幹部甚至表示，“不許我們幹部打人，就情緒不高”。無錫縣蕩口區坊橋鄉幹部還認為：“使農民能打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的收穫。”土改初期，有些幹部有所顧慮，怕承擔責任，不敢亂來；當亂鬥亂打的空氣瀰漫蘇南農村時，他們很快就拋棄了顧慮、恐懼和膽怯，如脫韁的野馬，在鬥人打人中大顯身手。

其次，在土改幹部的宣傳、鼓動和引導下，農民對地主的仇恨隨著土改訴苦的展開而加深，加上幹部的慫恿煽動，于是一些農民便一哄而起。另外，北方來的老幹部把在江北土改時亂打亂殺的經驗帶到江南新區，導致了瀰漫蘇南的亂鬥亂打。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中有些人本來是流氓，他們借鬥爭地主公報私仇。再次，先發動群眾批鬥打人，後建立法庭，鬥爭會代替了司法，幹部指導下的群眾代替了執法機構，無法運用人民法庭懲治不法地主。事實上，人民法庭普遍建立之後，蘇南土地分配結束了，但亂鬥亂打仍時有發生。

我是地主崽 王耀洲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樣的地主家庭裏，又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怎一個苦字了得。上小學後，一起光著屁股玩耍長大的夥伴有了階級意識，開始疏遠、打擊、侮辱我，因為我的太爺爺、爺爺是地主。我出生時太爺爺、爺爺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却是世襲制，子子孫孫全是地主。城裏來的一個知識青年，發現鬥地主時有的地主比他的年齡還小，就試探著跟大隊幹部說，地主的孫子都是隔輩人了，怎麼也叫地主？大隊幹部說，土改時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們不繼承，往下階級鬥爭跟誰去鬥？後來聽村裏的老人們說，我太爺爺當年和家裏的長工吃一樣的飯菜，還掏錢給他們買媳婦成家。

我從小學起成績就好，語文老師王永春十分喜歡我，經常當著同學的面表揚、鼓勵我。老師越是課堂上表揚我，同學們課後越是仇視我。放學回家，走到家門前的胡同時，他們就像天降神兵，不知從那裏冒出來，土坷垃像機關炮一樣密集地向我投射，然後喊叫幾聲，勝利歸去。

夏天在水灣裏游泳，我總是和新華、長全兩三個貼心的夥伴躲在角落裏戲水游玩，其他那些孩子就像潛水員一樣，從灣底挖著淤泥，扎著猛子游到我身邊，猛的露出水面，把淤泥狠狠垛在我的頭上，然後哈哈大笑，呼喊口號。放學後，割豬草、挖野菜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幾乎每次割豬草，我都被五六個孩子追著打罵。沒有任何理由，就因為我是地主崽子，應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我永世不得翻身。村南的田野地肥草茂，我幾乎每到這裏就被打得哭著回家，到家門口還得把汨擦幹，否則讓父母知道了還得挨一頓臭罵。多少次，我獨自在西廂房哭得泣不成聲。在上小學和初中的七八年裏，我多少次想離家出走，甚至想到了死。現在我還經常夢裏哭著醒來，成為我今生抹不去的痛。

有一年夏天，我獨自一人躲到付家河西邊的鹽鹼灘裏割豬草。那裏距家有五六裏路遠，本想應該是我自由的天地，可是那些好像和我上輩子就有深仇大恨的小夥伴還是追攆不放，很快找到了我，把我摀倒在地一頓猛揍，直到我發出哀求的聲音，他們才很陽光地歡笑著離去。

上初中時，對欺辱近乎麻木的我，心底燃起了報復的火焰。生命對我這樣的地主崽子沒有意義，如此苟且，不如了結此生。一天下午放學後，我和兩個要好的夥伴，帶著我三叔家的弟

弟，十分反常地去南窪他們的地盤割豬草。那夥“陰魂”又來圍攻我，我先發制人，把領頭的黑蛋摠倒在地，脫下腳上的塑膠涼鞋，朝他的後背狠狠一頓抽打。當時我的鐮刀被弟弟拿走，否則，我可能會要了他的小命。黑蛋像匹無羈無絆的野馬，沒有丁點屈服的意思，我解完恨後，準備離去，他却拿起鐮刀朝我砍來，手無寸鐵的我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到姥姥家的村邊才擺脫了他的追殺。跑到姥姥家村邊，却不敢進姥姥的家門，在村子周圍來回打旋。

天黑了，我往回摸。快到家時，看見家門口圍好多人，仔細一聽，是黑蛋的父親、叔叔一大家人找我父親理論，說地主崽子欺負貧下中農的孩子，真是翻天了。他們的大喊大叫甚至謾罵，引來村裏好多圍觀的人。我知道闖了大禍，沒敢回家，藏到曬麥場的麥秸堆裏睡了一夜。天亮後，我準備離家出走。那時看過一本小說，寫的是東北林場知識青年，經常啃口涼饅饅就接著勞動，有時還靠打獵為生。那是多麼美好的生活，簡直是人間天堂、世外桃源，我就想到東北大森林裏去。我順著徒駭河的堤壩向北方走，走了不到二十裏路，就餓得走不動了，中午躺在樹下休息一會，然後爬起來像個泄了氣的皮球一樣，又跌跌撞撞走回了家。

到家天已黑，我沒敢進家門，鑽進麥秸堆裏睡下。半夜三更，父親和哥哥姐姐們打著燈籠從麥秸堆裏將我扒出。父親一聲沒吭，踢了我兩腳。母親抱著我放聲痛哭，哭聲在漆黑的夜空裏回旋。我經常怨恨我的父親和哥哥，他們作為家裏的大人，為什麼不能保護他弱小的孩子，為什麼我在外面受了欺負，回到家還再挨打挨罵。

長大了才知道，父親和哥哥們也同樣受盡屈辱。父親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來掃大街，春夏秋冬風雨無阻，哥哥們想替父親掃街，大隊書記不允許誰也不敢；晚上還要到大隊部接受貧下中農的批鬥。在我的記憶裏，父親不會笑，也不會說話，像個機器人似的按設定的程序機械運轉。大哥三十多歲的人了，也經常受到無端的欺辱。一年冬天到外鄉挑溝挖河，勞工們集體從食堂把飯打回宿舍吃。下工回來，大家都很累，躺在地鋪上休息，哥哥却還要去食堂打飯。一次，大哥把飯打回，還沒分好，一個貧農子弟就搶飯吃，大哥說了他一句，他就大打出手。大哥連飯也沒撈著吃，晚上躺在地鋪上準備睡覺時又被他踢了幾腳。給生產隊打土坯，大隊書記的兒子無端辱罵大哥，大哥因不服氣哼了幾聲，書記的兒子就拿著鐵耙追打。如今年近七旬的大哥每提起此事還兩眼淚汪汪。

我經常獨自一人在河西的鹽鹼灘上，像個被抽打的陀螺，打著轉轉沖天哭號，問不公的蒼天為什麼把我生在地主家。那哭聲，那呼號，像馬背上的長調一樣在曠野回蕩，像深夜的狼嚎一樣淒慘悲涼。我的記憶裏總是伴著哀哭，吃不飽就哭，哭就挨打，挨打就更哭。三哥比我大五歲，我記事時他已八九歲了，他經常哭得那麼淒慘，父親沒一句溫暖的話，相反總是在三哥身上練拳腳，好像他養育的孩子生來就是供他出氣的布袋。細心的母親問哥哥為何總哭，才知三哥解不下大便，便用細木棒從三哥的肛門裏摳出滿地的糠皮。二哥比我大八歲，從小鼻子經常流血，身體虛弱，家裏沒錢治病，也沒有食物補養。父母不知從那裏得來的偏方，總讓我們到鹽鹼灘挖茅草根給二哥煮著吃，或許茅根裏有些糖分吧。二哥十六歲那年，鼻子一次就淌一兩碗血，經常出現昏迷。母親給二哥縫補了一件粗布衣服，準備著二哥的後事。大哥抓住家裏兩隻救命的母雞，跑了五十多裏土路，到縣醫院換了兩付藥回來，挽留住二哥的性命。

姐姐們更是愛哭，尤其是二姐，經常眼睛哭得跟鈴鐺一樣。母親重男輕女的思想是浸透到骨子裏的，吃飯總是先安排他的兒子們吃飽，剩下的飯才輪到姐姐們吃。那時姐姐和哥哥們都是一起下地幹活，收工回到家，姐姐們還得紡綫織布，做針綫活，餓著肚子夜夜圍著昏暗的

洋油燈縫縫補補。心焦的母親有了委屈或怨氣，就沒有緣由地在姐姐們身上發泄。

母親在外面是個有主見、敢說不的人。那時大隊部每天晚上批鬥五類分子，母親作為地主婆也在批鬥之列，但母親敢不信邪，說：“俺娘家不是地主，兩個弟弟都是共產黨員革命幹部，我進了這個地主家的門，沒享過一天地主家的福，憑什麼批鬥俺？”堅決不去。

在我印象裏，父親一輩子也沒說過幾句話，八個孩子從來也看不出他喜歡哪一個。從剛長出思想萌芽時起，我就認定父親是個欺壓人民、惡貫滿盈的惡霸地主。他那冰冷的臉上從沒有表情，尤其是到了晚上，微弱的洋油燈苗一跳一跳的，他捲縮在土炕上，拉長的臉隨著燈苗的跳動在變形，我總是離他遠遠的，眼睛都不敢多瞅他一眼。上學後，懂得了一點革命道理，我就懷疑起父親是個國民黨特務，家裏可能藏有槍支、電臺。我經常留心父親的舉動，却怎麼也沒發現那些電影裏的故事。

我從來不肯叫父親一聲爹。批鬥地富反壞右時，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樣鬥志昂揚，高呼口號。上高中時，我逐漸認識到，父親就是個老實得屁都不敢放響的農民，除了老實還是老實，除了忍耐還是忍耐，除了吃苦還是吃苦，忍氣吞聲和窩囊廢這樣的詞彙用在父親身上再恰當不過。有一次，父親到學校給我送一布袋地瓜面餅子。他悄悄讓一個陌生的同學把我叫出去，把那袋乾糧交給我，一句話沒說，扭頭就走。看著他骨瘦如柴的身影，看著他弓形的脊梁，我大聲喊了一聲爹，他回頭笑了笑，步履蹣跚地消失在我的視野裏。那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笑……

我的二叔二嬸從小參加革命，參加過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隨軍南下在福建南平國家水利發電工程局工作。文革時期，他們連封信都不敢往這個生養他的地主家庭寄。那時我奶奶還健在，天天盼他這個革命兒子的音信，經常站在門口朝南方眺望。二叔二嬸是我唯一的自豪與驕傲，是我在夥伴面前炫耀的資本。我常想，二叔二嬸若是我的爹娘該多好，遂萌生了讓父親把我過繼給二叔的念頭。可是給二叔寫了一封又一封信，都泥牛入海，想做革命者叔嬸的兒子真是奢望啊。後來知道，那時叔嬸也因家庭成分問題停職審查。

小時候我特別羨慕姐姐們，長大後能找個貧農的孩子嫁出去，雖自己的根不紅，自己的苗今後却是正的。我常和姐姐們說，找婆家一定要找個祖宗八輩都是貧農的家庭，嫁出去就是重新托生，我要是變成個女兒身就好了。姐姐們就和我開玩笑，說弟弟長大了找個殘廢媳婦倒插門，給人家做養老女婿去。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圍在一起包水餃，母親叫我說：“建國，你也過來，學著包餃子——長大了找不上媳婦，娘以後不在了，過年自己會包，也能吃頓餃子。”我的二哥二十歲了過繼給我二舅，就因為在地主家根本找不到媳婦。

一位出身地主的老人告訴我，那年月他在機關工作，隔不多久就讓填一個什麼表，因此落下個一填表就跑廁所拉稀的毛病，後來發展到只要見到帶格的紙就渾身不好受。機關的辦公用紙都帶格子，他一見就起反應，去醫院看醫生，說神經性的，沒法治。

剛解放時，爺爺有兩個男孩，十二畝地，被劃為下中農。家族裏有個遠房伯伯，經常打媳婦，他媳婦經常往爺爺家裏躲，爺爺主持公道，有一次把這位伯伯臭揍一頓。1953年重劃成分時，這位伯伯是村裏劃成分小組的成員，就“公報私仇”將我家化為富農。

帖 子

黃埔五期的大舅 博 客

我的大舅是黃埔五期畢業生，上黃埔是他這輩子做的唯一的牛屁事兒，他一輩子爲此事牛屁著。他家最大屋子最完整的一面牆上沒擺電視，永遠挂著一張巨幅照片，上面密密麻麻或站或坐無數老頭子，比八十七神仙卷寬多了，比八十七多多了，至少有八百七，頂上橫印“黃埔同學會 xxxx 年集體合影”，左右兩側題寫：“貪生怕死請走別路，升官發財莫入此門。”

我大舅說，這些人就是歷史，太重大了，挂照片的釘子必須用進口的水泥膨脹釘子，牆必須是承重牆，否則牆體裂縫。他還說，晚上關了燈，沒有月亮，這上面八百七十雙眼睛都在黑暗中發亮。八十歲之後，每次起夜，他都看得到，死了的發白光，活著的發藍光，快死的在白藍之間。我大舅的眼睛非常亮，腰非常直，坐在大沙發裏打八圈麻將，腰板還是挺挺的。從我長眼睛開始，他就逼我認那八百七十個人中哪個是他。開始的時候，的確難，每個腦袋就是黃豆那麼大，眉眼就是芝麻那麼大。現在，我連肚臍眼和鷄眼和屁眼都認得出哪個是他，即使挂的是底片，我也找得到。

大舅說他是學炮兵的，成績非常好，人品也非常好。“那時候，國民黨是主流，學習好的都跟了國民黨；共產黨在基層做工作，成績差的，覺得和我們拼不過的，沒前途，就跟了共產黨。”這個說法好像不假。我在大舅家和一個退休的共產黨將軍喝過酒，他叫我大舅師兄，并說我大舅腦子好使，會算數，什麼樣的炮，敵人方位如何，立刻就算出來炮口如何擺，其他人就跟在他後面擺。我大舅說，在做那個人生重大決定之前，他看天象，重讀《資治通鑑》，學習《資本論》和《論持久戰》，我舅媽的苦勸起了最後作用，決定不隨國民政府去臺灣，在都江堰和青城山繳械投誠，得了光榮起義證書。後來這個證書丟了，文革來了，沒有起義證書，地方組織不認可，人差點被打死。地方組織說：“如何證明你不是悍匪？如何證明你不是打到只剩三五個副官，一兩顆子彈，看到我們滿山紅旗，逃跑不成，自殺未遂，號稱投降呢？誰能證明你手上沒有沾滿人民的鮮血呢？我們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的手上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你在岷江邊妄圖阻擋歷史的車輪，負隅頑抗，殺了我們多少革命戰士。”

文革之後，我大舅和我舅媽吵架，實在沒詞了，都是如下結尾：“我這輩子就是被你毀的，我這輩子就是被你毀的，你幾乎要了我的命，你幾乎要了我的命。”每次見我大舅，要麼是見我的第一句話，要麼是最後一句，他總要這樣爲我設計未來：“小子，亂世從軍，寧世從商，像我一樣。”

我們村有一戶，姓公，其曾祖父是家道殷實的地主，全盛時擁有百畝良田，家中開榨油坊，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在那個兵荒馬亂思想開放的年代，知識分子往往激進地走到社會最前列。他家的二兒子一躍成爲當時的進步青年，參加了紅軍，後來成爲八路軍。日占時期，鄉公所裏的日僞人員聽說公家老二參加了八路，就逼迫他父母寫信讓他回來，揚言如果不回來就殺他父母全家。接信後，老二風塵僕僕趕回家，但拒絕加入日僞政權，選擇當教書匠。老二利用手中的一點一滴積蓄置辦土地，居然積攢起十幾畝地。教書先生顯然沒時間和精力打理土地，便雇傭一個長工幫他操持農田裏的活計。國民政府接管以後，老二被當地政府聘任爲掌管文化教育的官員。各級國民政府機關南逃時，公老二選擇留下。老二曾開除過一名長工，因爲這個長工好吃懶做偷奸耍滑。土改劃成分，按政策老二本該劃爲中農或下中農，可一直懷恨在心的那個被開除的長工成了革命積極分子，在他的強力堅持下，老二被劃入地主行列。

帖 子

---

家史點滴 行人

太爺爺是哈爾濱鄉下的大地主，1947 年哈爾濱土改時三十歲。當時共產黨對地主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淨身出戶——穿著隨身衣服離開自己的家，放棄一切財產，連針頭線腦都不讓帶走。太爺爺、太奶奶和他們的五個孩子被趕到村裏養馬的房子裏。我的爺爺那時才十一歲，太爺爺太奶奶被關，爺爺帶著四個弟弟妹妹，最小的二歲，沿街要飯，要來的吃的還要送給被關的太爺爺太奶奶，政府不管被關人吃飯。

1948 年初，村與村互換鬥地主的運動開始。本村的人去外村拷問地主，外村的人到本村拷問本村的地主。不論白天黑夜，外村人隨時到地主家，愛拿什麼就拿什麼，來得晚的沒有東西可拿就打地主。太爺爺被用細繩子拴住兩個大拇指，吊起來，馬鞭子抽，竹板子裹上濕布打，打暈了用冷水澆醒繼續打。夏天的晚上，太爺爺被脫得只剩短褲，綁到樹上養蚊子。就在這一年，太爺爺去世了。不是打死的，是後背被打爛，爺爺說爛了個很深的窟窿，苦苦掙扎了很久。太奶奶被用燒紅的烙鐵烙後背。太奶奶去世我上小學 4 年級，我見過她的背，全是疤痕。

太奶奶是小脚女人，身上又有傷，無法勞動，十二歲的爺爺開始和大人一起幹活。他必須加倍工作，才能拿到一個成年人的工分。自 1949 年到 1953 年這四年，爺爺基本上每天只睡六小時，其他時間全是幹活。日子實在過不下去，1953 年，太奶奶只好改嫁。繼太爺爺是娶不上媳婦的人，婚後對太奶奶和她的孩子們還不錯。爺爺的大妹妹十五歲就嫁人了，說是嫁，實是賣，嫁了一個比他大二十歲的人，總算有口飯吃了。爺爺在歧視中長大，用他自己的話說：幹得最多，吃得最差，覺悟最高，地位最低。爺爺說，那三十年（1949-1979），爲了自己的媽媽，爲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他沒敢生過一天病，沒敢誤過一天工。

爺爺結婚後，奶奶跟著受歧視，生了我爸爸，也跟著受歧視。地主崽子還有人願嫁？奶奶的父親是滿族人，半個獵人，打過熊，打過狼，殺過野豬，抓到過二米長的大魚。奶奶的母親去世早，爸爸說了算，他把兩個女兒都嫁給了地主的後代。他有自己的道理，說：地主家讀過書，家教好，家風好，以後肯定有一天能變好。1979 年給地主摘帽時，爺爺說，村裏所有的地主後代都朝北京磕響頭，頭都磕出血。媽媽 1979 年嫁給爸爸。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家四口靠勤勞致富，成爲全村第一個購買電視機的人。當時我三歲，清楚記得來我家看《霍元甲》和《西游記》的人把門都擠壞了。

我慶幸自己出生在這個家庭。太奶奶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要有教養，知書達理。爺爺雖然受了三十多年的罪，但他從不抱怨，告訴我們要靠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無論什麼時候，絕不能害人。

---

我們村裏有一戶地主，其長子不僅吃喝嫖賭蠻橫無理，而且參加過日偽時期的鄉公所，手裏還有幾條人命。解放前夕，這個惡人去了臺灣，他的兩個弟弟却留了下來。兩位弟弟很老實，也沒幹過什麼惡事。沒想到的是，兄弟三人的命運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哥哥在臺灣另娶老婆，生活得有滋有味，兩位弟弟在大陸却備受磨難苟延殘喘。八十年代後，大陸開放臺灣人士返鄉探親，已經七十多歲的哥哥在縣鄉幹部們的簇擁下回到家鄉，令他極爲震驚的

是兩個弟弟居然那麼窮困和淒慘，于是便忍不住責怪他們當初不跟他去臺灣。  
博 客

爺爺講土改 滇 民

我家自明初以來世代開醫館，到我曾祖父是第十八代。乾隆年間，雲南陸涼州鬧瘟疫，我的祖先用大鍋熬藥，救了不少人，皇帝賜匾“陸坪春雨”，還賞銀。我小時候見過那匾，1958年大煉鋼鐵要拿去做燒柴，我叔叔取下藏了，後來不知下落。曾祖父去世時，我爺爺才三歲半。曾祖父把醫術傳給了他的弟弟，後來我爺爺想跟自己的叔叔學醫，可叔叔却不願意把醫術傳給他，遭幾次痛罵之後，他就跟舅舅做起小買賣，當了貨郎。叔曾祖父的兩個兒子，我的三公公和五公公，後來子承父業當醫生，置了田，土改時劃為地主，受了大罪。我爺爺最愛說的話就是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我爸爸十四歲那年考中學，數學全縣第一名。中學錄取了，要四塊大洋的學費，爺爺說：“我那個擔子就值五塊錢，你要上學就拿去賣了吧。”父親失學了，跟著爺爺挑擔子做小買賣。有一次爺爺到馬街鎮賣書，鎮上的狗腿子（城管）說他賣的有共產黨的書，沒收了攤子，打了耳光，扣了人，我三公公花了一塊大洋才把人領出來。父親說那本書他看過，斯諾的《西行漫記》。爺爺這樣的人是盼望“紅星照耀中國的”。

紅星還真盼來了。那年冬天，爺爺到天生關販東西，國民黨部隊敗下陣來，到處搶東西，包括他的貨郎擔，人家還沒有蒸熟的飯也都搶去吃。夜裏，解放軍趕來，打跑了國軍。解放軍把爺爺被搶走的東西找出來還給他，天一亮還坐著解放軍的汽車回了家。此後，爺爺把二兒子送去當解放軍，還跟著一幫窮人搞農會。爺爺說：“農會開始要的是當丫頭、娃子的，幫人做長工的（貧雇農）。我進去是因為識字，能寫寫算算，沒收地主財產，要登記的。我是寫字的，做長工的都是老實人，話都說不圓，土改光靠我們這些人不行。後來工作組把街上的地痞混子也喊進來，就可以鬥人了。邵 XX 過去當過官，待人苛刻，鬥得厲害。申 XX 對人好，誰都沒有摸他一指頭。”我媽媽說，有一次她去邵家，他家正用荊條打丫頭，因為丫頭把他家的金邊碗打破了。我們同一個院子的潘 XX 就是被邵家打傻的。邵家與我外婆家同宗，外公外婆特看不起他家，說他們為富不仁。申家不同，解放前暗中資助游擊隊，解放後把全部財產捐給抗美援朝。

過了一年，發動群眾分土地，土改工作隊說揪出的地主太少，田不夠分，上頭改了文件，說有 20 畝地就算地主。分浮財時，地主不交浮財就打，鄧 XX 就是這樣的打手，專門給人家上老虎凳。我三公公、五公公就是這樣被打的。爺爺回憶說：“那天鬥你三公公，我正好去農會，他喊老六救救我。晚上我連湊帶借，弄了 50 塊錢，悄悄去求情。農會還算給面子，第二天交了錢，算是捐給抗美援朝，把你三公公放了出來。”

有一次鬥地主，有個老大媽上去拿錐子扎人。那個地主是個惡人，過年催債，發現這家的兒子被抓兵了，就把人家的媳婦按住糟蹋了。那個媳婦是雙身子，想不通，上吊死了，一尸兩命。爺爺說：“有些地主是做過虧心事的。國民黨軍長孫渡的弟弟孫玉山，身上有好幾條人命，殺了人把人頭掛在城牆上。共產黨抓他，人人擁護，連一般的富戶都擁護。土改時期殺星重，只要有錢人，區長說查查去，一查欺壓過人，抓來就殺，邵 XX 就是這樣槍斃的，羅鎮長也是。羅鎮長殺過很多人，近解放那幾年，他看哪個不順眼，就說哪個是共產黨，槍斃。冤冤相報，共產黨來了也殺他們。大地主被殺，中號地主被鬥，岳十一他爹就是被佃戶包在蓑衣裏燒死的。”



土改開始打人是出怨氣，報仇，後來打人要東西，地主幾乎家家藏東西，好多東西是打出來的。後來打人打上癮了，貧雇農分了田就忙著種地，農會那幾個打手整天就想著打人。爺爺說：“那時候，農會的打手看哪家地主的姑娘好，拉出來就打，把人吊起來，有的是在奶頭上扎上麻綫，再在下麵加上磚頭，逼你交浮財。真不是人！我想，農會不能再幹了，再幹自己也不是人了。”申家開始定的是開明地主，有人發現他家屋檐下藏個金墜子，工作組就說他不老實，欺騙政府，把他抓起來，上了老虎凳，也沒有打，讓他交浮財。第二天早上，發現他跳盤江了。爺爺說：“我心裏再也受不了，再不幹農會了。工作組要整我，正好你叔叔在部隊立了功，來了喜報，就沒再整我。我有個朋友，本來要劃地主，游了街。游街回來，正好他兒子在朝鮮立了一等功，就改為小土地出租。”

我五公公解放後繼續做醫生，醫術好，待人也好，四清時也被清理，文革時期索性讓他白天看病，晚上掃廁所。挨鬥幾次，五公公病了，醫院革委會說他是地主，不收，只得拉回家，半路上就沒氣了。

爺爺說：“土改燒地契，佃戶不識字，把我們家的家譜也燒了。分地主家的東西，供桌是分給軍屬的，我就挑了個大桌子，好讓你們有個桌子讀書。我們家本來就不是種地的，分給我的地，我一分都沒要，連原有的一畝二分地都交了，就要了一匹馬，免得趕街挑擔子。老了，挑不動擔子了。福兮禍所伏啊，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怕馬餓死，你姑媽買了三升蠶豆喂馬，壞人還說是破壞統購統銷。55年合作化，我索性什麼也不要，就到紡織廠當紡綫工了，我七歲就幫你曾祖母紡綫。入股，我沒有股，我伸伸手說，我就一雙手，十個指頭。你們將來讀書，要當醫生，我家祖祖輩輩都是治病救人的，到我斷了，對不起祖宗啊，也對不起你爸爸，不讓他讀書。窮字壓著，喘不過氣來，沒有辦法。”

土改打手鄧XX，鬥過我爸爸、我五公公，還扎過我一個姑姑麻綫。後來我一個堂妹與鄧的兒子相愛，家人反對無效，我孀告訴全家族，她對不起大家，養了這麼個女兒，她不認這個女兒！

小學校長段紹井 霜 天

1957年我讀小學二年級，學校突如其來地動員大家搞大鳴大放，唐老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唐文質彬彬，高個兒，很清瘦，即使多次上臺挨鬥，也難掩他那文靜閑雅的氣質。唐老師的反動言論有：說統購統銷搞糟了，說我們學校那位從抗美援朝戰場歸來的威風凜凜的校長段紹井不學無術，諸如此類。段校長曾是我父親的學生，身材魁梧，走路邁大步，成天虎著他那張馬臉，好像我們這些小學生全是被他俘虜的美國鬼子。他當初積極報名抗美援朝，凱旋歸來後榮任校長。

有一次公社組織全社小學生搞積肥，段校長親自出馬，帶著幾百名小學生到處找肥料。學生們背著比自己身體大幾倍的大背筐，漫山遍野找青草。山上的大小樹木砍光了，光禿禿的，倒是麥田裏的野草不少，伴著麥苗一起瘋長。大家爭先恐後地鑽進麥田裏扯草，青青的麥苗兒被踩壞不少。段校長走過來，看了看那些被踩倒的麥苗，吼道：“這是誰搞的破壞？嗯？給我站出來！”在他身邊扯草的幾十個小學生個個嚇得四處逃散。

合該我倒黴！我離他很近，偏偏我認為沒有逃跑的必要。“我今天非把你這破壞分子揪出來不可！”段校長厲聲說著，一把揪住我，像老鷹抓小雞似的，輕飄飄地把我提起來，穩穩當

當地按在被踩壞的麥苗旁邊。“站好，不准動！”段校長要對我這個現行破壞分子進行現場批鬥。他說：“惡霸地主周子張壞透了，他的兒子也不是個好東西！”原來他知道我是周子張的兒子。我嚇得全身發抖，從那以後，每見這位大校長我就不由自主地渾身發抖。

學校開始推行普通話教學，先對老師進行短期培訓，很快老師就能用流利的普通話教學了。一天晚上，我父親叫我背誦新學的課文《鑿壁偷光》。背到“在牆上鑿了個洞”，我父親吼道：“什麼個洞？重背！”“在牆上鑿(zao)了個洞。”“把書給我！”我父親更生氣了。

“這個字讀什麼？鑿(co)了個洞嘛！你怎麼亂讀？”說著對我一頓毒打。我解釋說，老師就是這樣教的。他不相信我的語文老師劉老師會這樣“亂教”，連劉老師這樣難得的好教師也亂認字，這個書還有什麼讀頭啊！我說我們老師教的是普通話，你說的是四川話，可是父親却武斷地說，普通話也不該把字完全讀走音！一定是劉老師在亂讀字！我父親自稱他的學識遠在我的老師之上，我也真的懷疑是不是劉老師教錯了。

次日上學，我向劉老師講述了我的委屈和懷疑，討教這個字究竟該怎麼讀才算對。劉老師看著我手上臉上滿是傷痕，就說，我會找周先生講道理的。

過了兩天，學校召開家長會，段校長特意通知我父親與會。父親高高興興來校參加家長會，他很有幾分得意，不僅因為他的兒子在學校成績優異，更因為段校長還曾經是他的學生。

學校的格局還是他當年任校長時的情形，還是那座破廟改的小學校，還是當年他曾經敲擊過的那口大古鐘。見了段校長，他很想主動上前與他打招呼，但轉念一想，若校長主動來招呼自己，豈不更有面子？見了劉老師，父親趕快上前招呼她，他想在會前與她交換一下教育犬子的意見。記得父親剛被釋放回家時，劉老師曾主動約見過他，與他交換意見，稱他周先生。不料今天劉老師對他很是冷淡，看見他竟轉身走開了。更讓他始料未及的是，會議一開始，段校長就把他“請”上主席臺。他以為是他的這位學生尊重他，請他首先發言，不料聽到的却是喝斥他要“老實交代”！

段校長批鬥我父親的理由是他“反對普通話教學”，還批鬥他“暴力教育”，過去曾經打過這位校長的屁股，現在在家還打兒女。那天我父親回到家裏很沮喪，皺著眉頭埋怨我不爭氣，却沒敢再動手打我。

初小升高小的考試中，段校長親自監考我所在的考室。我做考題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不到半小時就做完了，呆坐在教室裏，等過了半小時，我便把試卷交給校長。

我的考試成績無話可說，段校長却出人意料地不錄取我。劉老師據理力爭，堅決不同意將自己認為“有遠大前程”的一個學生無緣無故地逐出校門。她向校長陳說一大堆我的好話，成績優異，品行端正，心性良善，等等，并毫無顧忌地哭求這位大校長不要開除我。“這個地主崽子搞破壞，踩壞麥苗，暑假裏還用石頭打壞學校的黑板！”校長說出了我的罪狀。“他是無辜的，他一定是被冤枉的，他不會幹那些壞事。”劉老師為我辯解。

劉老師是我的班主任，要開除我，形式上須經她簽字同意。在這所小學裏，我的名字幾乎無人不知，老師們聽說要開除我，沒有人不感到意外。一些好心的老師幫著劉老師勸說校長，請他不要開除我。段校長終於手下留情，不再堅持開除我。

發榜的日子，我喜滋滋來到學校，跑到紅榜前一看，傻眼了，從頭到尾，竟然不見我的名字！我急得直冒冷汗，心狂跳不止。最後，我在那張榜的末尾發現了“備取生”三字，我的名字在那裏。我的眼淚嘩嘩流淌！

不知什麼時候，劉老師來到我的身旁，輕聲喚我，要我去她的寢室，她有話要對我說。我把滿腔的憤怒一下子全發泄到她身上：“我是備取生？為什麼？這是為什麼？！”我那狂怒的樣子一定讓老師很害怕，也很為難。她怔怔地瞧著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我流著眼淚，轉過身，頭也不回地走掉了。後來才知道，我的備取生資格來得多麼不易！

文革期間，段校長被鬥得狼狽不堪，每次批鬥會都演變成武鬥，老師們不僅用腳尖拳頭打他，還用板凳、磚頭砸他。每當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時候，他就啞著嗓子高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他的口號聲越高，別人打得越狠；別人打得越狠，他越聲嘶力竭喊口號。

文革後期，他到我家附近的朝陽庵村小當教師。他的妻子已經辭世，他與鄉醫院的一位醫生爭奪我們村的一個年輕寡婦。醫生稍微年輕，人緣好，眼看就要占上風，可是段氏老奸巨猾，又占地利（村小離那女子家近）。有一天，天欲雨，他請那女子吃晚飯。飯後，雨越下越大，“我不留客天留客”，當晚他用暴力占有了那位女子。次日，他宴請全村的幹部，主動向他們“交代”自己一時糊塗所犯下的“嚴重錯誤”。這一招很絕，等于是向眾人宣告了女人的歸屬，斷了那女人的退路。生米已成熟飯，加上村幹部們撮合，那女子和她的家人不得不同意了這門婚事，只有小姨妹還是堅持一家人原來的意見，希望姐姐嫁給醫生。她當著眾人的面，大罵這位未來的姐夫是無恥的流氓。“小姨妹啊，你可別亂罵人哦！從今以後咱們可是親戚了啊！你罵我流氓，我怎麼流氓的呀？你沒有證據吧？我對你從來都是規規矩矩的吧？你說我怎麼流氓的呀？”他又幽默，又調侃，把個小姨妹說得啞口無言。

——  
外婆 83 歲了，給我說過許多她小時候的事。外婆幼年，母親早逝，父親有一年病了，交不起租，地主要外婆的父親把年僅 13 歲的外婆交給地主做填房，地主老頭都 57 了。外婆的父親不願意，但逼得急，就讓外婆跑了。一個 13 歲的女孩，黑燈瞎火孤身一人跑到縣城，又跑到武漢，討飯，孤苦無依，很多次跟狗搶吃的。兩年後，共產黨的隊伍來了，看她可憐，收留她在衛生院洗綑帶。21 歲時，和外公帶工作隊回家鄉。爹早死了，死的時候很慘，餓死的，鄉鄰幫著埋了。外婆小腿上有一大塊凹下去的地方，是狗咬的，潰爛到看見骨頭，流膿長蛆，她自己狠心用竹簽子把爛肉摳出來，在橋下面躺了三天，沒水喝沒吃的，眼看死掉，一個洗衣服的寡婦發現了，背到教堂，洋人給救了。講到這裏，外婆 83 歲的老人哭得像孩子。

#### 童年記憶 潘石屹

我出生在甘肅天水。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國民黨的騎兵學校，養了許多軍馬。據說馬得病死了後，就把它們扔到我們村子對面的山溝裏。馬的屍體吸引了許多狼，方圓幾百里的狼都彙集到我們村子附近。自從有了騎兵學校，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增長。

爺爺年輕時一直跟隨于右任先生搞革命，家裏珍藏著于先生寫的一個條幅，父親記得條幅內容是“自由而有根是生長極快之樹木”。奶奶是外地人，解放後隨爺爺回老家天水。據父親說，爺爺常告訴他，當農民太輕鬆了，太好了，比打仗輕鬆多了，也沒有任何危險。爺爺在我們村子對面的山上開一塊荒地種土豆，這塊地到現在還叫狼窩裏，地邊上有一狼窩，裏面

有許多狼。我父親說，他小時候跟我爺爺在地裏刨土豆，地邊上的狼在跑來跑去，互不侵犯，相安無事。

我們村對面半山坡上有個小村子，叫河溝裏，住著幾戶人。有一戶人家的媳婦是從階州（隴南）娶來的，講話和我們當地人不一樣，大家都叫她階州媳婦。她有一個女兒，女兒很小時，她帶著女兒在地裏幹活兒，狼來把女兒叼走了。階州媳婦看見女兒被狼叼走，一直追狼，狼叼著女兒跳下幾丈高的懸崖，階州媳婦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丟下她女兒跑了。多少年以後，我回老家，很關心這個小女孩的下落，村裏的人說，小女孩長大成人了，已經出嫁了，嫁給了鎮上一戶富裕人家，現在日子過得很好。

我七八歲的時候，家裏養了一頭豬。喂豬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幹，從小就盼望著豬長大，殺豬過年，這是小孩兒最高興的事情。天天喂豬是一件很累的事，似乎和這頭豬沒有多少的感情。一天晚上，一隻狼跑進我家的豬圈，豬大叫，我爸爸沖進豬圈趕走了狼。豬的嘴被狼咬掉一塊肉，豬嚇得全身直打哆嗦，緊緊地靠著牆。我拿著煤油燈給爸爸照亮，看豬的傷口。這件事後，我好像和這頭豬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戰鬥中，我們和豬是一條戰線的。過年了，這頭豬被殺了，讓我們家過了一個高高興興的年。煮好的豬頭上缺了一塊兒肉，媽媽說這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地方。

又過一年，我們村子裏突然出現了一條反標。大隊書記把所有識字的人全都召集起來，要破案，晝夜不能回家。關了許多天，也不在地裏幹活兒了，反標案也沒有結果。最後，大隊書記決定用投票表決的方式來決定誰是寫反標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爸爸突然跑回家跟媽媽說，投票結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訴我媽媽，第一反標不是他寫的，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要給他伸冤；第二，一定要帶著兩個孩子活下去。在睡夢中我被爸爸媽媽叫醒，爸爸又簡單地跟我說了一下事情的經過，說他有可能成為反革命，我是一個男孩兒，一定要像男子漢一樣，幫助媽媽和妹妹一起活下去，無論任何時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復強調反標不是他寫的，要為他伸冤。當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鑽進了我們家的豬圈更恐怖。也是從那天晚上起，我發現我長大了，我身上有許多的責任，要保護我的媽媽和妹妹。最後反標案破了，是我的一位老師寫的。接下來的日子，這位老師被五花大綁游行批鬥。他旁邊總有兩個持槍的民兵，我見到後很害怕，怕民兵用槍把這位老師打死在我面前。

爺爺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地主婆”奶奶一個人在最艱難的時期，在最艱苦的地方，把父親、姑姑、叔叔們帶大，并讓他們都上了學。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開批鬥會，奶奶總是穿好衣服，梳好頭髮，像現在去參加 party 一樣，平靜地去，平靜地回。她回來後，媽媽總是不讓我鬧，好讓奶奶安靜一會。但奶奶見到我，仍是一樣的慈祥，一樣的開心，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一樣。

村裏的人講，奶奶有許多金條和銀元，不知道埋在什麼地方了。我去問奶奶，你是不是有許多金條和銀元，她告訴我：“那東西沒有用，奶奶也沒有埋。這世上還有比那東西更珍貴的東西，你長大就知道了。”我當時並不懂奶奶說的意思，但相信奶奶對我講的是真的，此後我一直在尋找比金條和銀元更珍貴的東西。一九九七年農曆乙亥年九月初二，已經患病不能講話的奶奶去世了。二叔給奶奶寫一幅挽聯，上聯是“既辛亥革命呱呱誕生於中州大地”，下聯是“何乙亥振興悄悄離開了千里隴原”，橫批是“天高地厚”。

那一年，我大約六歲多一點，我三爺（爺爺的三弟）被村裏的基幹民兵抓走了，去辦學習班，

家裏人讓我去給爺爺送饅。到了大隊部門口，民兵班長用槍口對著我，質問我幹什麼，我嚇哭了，但不敢哭出聲來，看到爺爺坐在一間黑屋子的地上。爺爺很慈祥地說：“是我孫子給我送饅來了。”我被放進去，見到爺爺就大聲哭了出來。稍大一點，我問爸爸，為什麼要把爺爺抓起來，爸爸說，縣委書記提出要貫徹“以糧爲綱”的政策，要把在地裏生長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樹都砍掉，爺爺反對，就抓起來了。小時候地裏的參天大樹從此再也不見了，但村裏糧食並不見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飯跑到陝西關中平原的人越來越多。

我上的小學叫耕讀小學，在一座廟裏，只有一位老師，姓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個寫反標的現行反革命，抓走判了三年刑。耕讀小學黃了，房間空了，只剩菩薩了。一天，一位姓吳的同學悄悄告訴我，他在菩薩面前撿了一個蘋果吃了，是有人獻給菩薩的。從那以後，我經常一個人偷偷去菩薩的屋子，看能不能撿點什麼吃的。我的運氣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薩面前什麼也沒有。

三爺在我上小學一年級時去世了，到今天我還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打電話問父親，父親說：“你三爺名叫潘爾廉，字礪齋，逝世于一九六八年。他是餓死的。他死後，我們去他屋裏，發現已經沒有一點糧食了。”

我們小學採用的語言是當地的土話，與天水市里講的話差距很大。鄉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城裏人講的話，覺得他們講話不誠實。我也發現，我們村裏人講話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講得慢，也沒有他們講話那樣輕，與普通話的差距就更大了。當地把普通話稱爲“偏言”，只有來我們生產隊的住隊幹部才講偏言，大部分人聽不懂。我記得有一次開批鬥大會，住隊幹部用普通話講了一大堆，最後讓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檢查，談對自己錯誤的認識，老太太說，你的“偏言子”我沒有聽懂，住隊幹部氣壞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家鄉大旱，糧食收得很少，村子裏許多人翻過秦嶺去陝西要飯。父親常說，我們家的人飯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飯。政府隔幾天發一次救濟糧，是從河南運來的紅薯乾，用開水煮著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饅吃。我們從小吃慣了玉米麵，覺得紅薯面做的饅很難吃，吃了之後胃裏常冒酸水。但無論如何也要感謝河南人，這次大旱，河南人的紅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肅人的命。父親很少與村子裏的人打交道，遇到領救濟糧的事，總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領糧，隊長不發給我，說是有政策，不能發給地主家。我回來跟父親說了原因，父親去與他們交涉，終於搞清楚政策界限，是不發給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經與我們分家了；我們家沒有地主分子，政策是容許我們繼續活下去的。領到紅薯乾，回家的路上，我很高興，但我發現父親一直不高興。回到家，媽媽很高興地告訴我們說，中國的衛星上天了，還會唱《東方紅》，奇怪的是父親一直沒有高興起來。

我的六媽（六孀）是死了第一個丈夫後改嫁六爸（六叔）的。六媽長得特別漂亮，特別喜歡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幾個孩子都病死了。每個孩子的死對六媽的打擊都很大，特別是一個和我同歲的兒子，名字叫克裏。克裏病死後，六媽哭得死去活來。六媽特別喜歡我，有一次，我去問六媽，劉少奇打倒了，他還有飯吃嗎？六媽說，孩子別擔心，毛主席是好人，不會讓劉少奇餓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麵條。我小時候總在想，劉少奇比我們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麵條可比紅薯乾好吃多了。

小學畢業時，公社中學給我們學校的名額很少，照顧貧下中農的孩子還不够，我的家庭是“四類”家庭，更是排不上號。我哭著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學當老師。走後門成功了，

我上了中學。

這所社辦中學叫東泉中學，公社叫東泉公社，現在改叫馬跑泉鄉。許多老師講普通話，我聽起來比較費勁。化學老師就講普通話，他說，物質世界是由分子構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電子構成的，還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原子結構圖。世界是這樣的？我帶著疑惑去問叔叔。叔叔告訴我：“你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瞭解世界是怎麼構成的，重要的是你身體不好，得過腎炎，中學畢業回生產隊已經參加不了重體力勞動，要抓緊中學的時間學習一兩門吃輕閑飯的手藝。現在我們村裏沒有電，但是過幾年一定會有電，所以，你要學電工，會接電燈，會裝開關。還有，現在的社會政治運動多，牆上寫的標語口號多，你要學習寫仿宋體字和黑體字。”苦練過一陣寫標語口號，到現在仿宋字寫得還不錯，但是有了電腦，我的這點優勢也顯不出來了。

爸爸平反後，一輛解放牌卡車把全家的東西拉進城。癱瘓的媽媽沒有擔架，我和爸爸用床單臨時做了一個擔架。到了城裏，我們借住在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家。汽車開不進胡同，我和爸爸用擔架抬著媽媽，一隻手還拖著丟了鞋的弟弟。城裏人都探出頭來看我們這跟難民似的一家人，卻沒有人來幫我們，我感到了城裏人與人存在的距離。從此我們全家開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 14 歲。

## 《黑五類憶舊》第十七期

作者：焦國標（選編）

卷首文——

人人都是暴徒 高行健

文革時人人都受苦，人人都是受害者，但是人人也都是暴徒。現在人人都是正義，什麼因為我為了維護正義，我受了苦，什麼我是無辜受害，這個解釋是錯誤的。在集權專政的壓制下，人人都可能成為暴徒。你沒成暴徒，只不過是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你沒成為暴徒。但是在那個基本環境下，你必須成為暴徒。如果你已被打成反革命，你就談不上是暴徒了；但是你沒被打成反革命的話，要你揭發別人的時候，你就得凶狠地揭發別人。能保持清醒是極難做到的。就算你是裝凶狠，你也得凶狠，哪怕你是偽裝凶狠。

我承認我在當時的情況下就像賭徒和暴徒一樣。我當時是為了我的反壓迫，但是你的反壓迫用的是誰的口號？是毛澤東的口號！壓迫和反壓迫者的人都用了同樣的口號。你能離開毛澤東不喊他的口號嗎？那些口號本身就是暴力，他的口號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最法西斯的暴力，像什麼“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這打到那，都是暴力。“打倒”的意思就是讓人生失去自由。你喊出這個話，打倒某個人，他跟你同一個單位，在這種批鬥會上，你說你喊打倒不喊打倒？每個人只不過是積極的程度不同而已。你說你根本不舉手，不喊打倒，那你馬上就被揪出來，馬上就被打到。

因此，在客觀上，人人都是暴徒。你不是犧牲者，就是暴徒。你扮演不了另一個角色。你自認為犧牲者就擁有正義，但你會發現，犧牲者只不過是這個肮髒的政治鬥爭中的犧牲者。你並不是因為正義而被犧牲的。你要作劉少奇嗎？劉少奇不是劊子手嗎？我們且不說他運動初

期搞了多少人，就說他在以前的革命時期搞了多少人，以及他的左傾路線搞了多少人，他在共產黨內部他又殺了多少人？他現在這個時候好像是個犧牲者、一個正義者。撥亂反正算他正確，他正確什麼呢？他也是絞肉機中的一個機器，只不過他被別的機器絞了，被更強大的機器給絞了，因此沒有正義的犧牲者。誰是正義的？維護劉少奇十七年專政的人是正義的嗎？那個專政仍然是個專政。當然這也不是劉個人的問題，他不是個英雄，是老幹部回過頭來需要他這麼一個英雄、一個烈士。他本身同樣是這個屠殺機器裏的工具。像他那麼極端的人上臺的話，也是可怕的，他對別人也會是殘酷的。

因此，我們一直回避的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也是暴徒？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你是不是也是賭徒？因為這裏沒有一個正義。它並不是一個民主與暴力的鬥爭，這裏都是暴力，是共產黨的甲派和乙派、毛派和周派，或者是毛派和劉派。他們的前提都是無產階級獨裁、專政。暴力，他們都是贊同的，只不過是落在誰的身上而已，用的分寸而已，手段是不是更合法而已。這裏是沒有區別的。所以要有這個認識。你敢不敢對共產主義的暴力置疑？在這個暴力下，你是不是也成為了這個暴力的一分子？你要有這個認識：你并不代表正義，你不可能代表正義，那個時候沒有正義。你只不過是喬裝打扮。如果說我當年是反革命、兩面派，我就是反革命、兩面派。要不然我怎麼生存？我就得是兩面派。我喊著毛澤東，但不信毛澤東。可是，我要不喊，那我馬上就是反革命。

因此在這個集權的政治下，你要逃出這個絞肉機，逃是唯一的辦法。但是中國當時是天網恢恢，連劉少奇他都逃不了，還死在監獄裏，誰還逃得了？然後就是這個戶口制度，你無處可逃。我當時整個的感覺就是要逃，一直在逃。儘管我最後還是逃出來了，但在中國的時候我就要逃。我主動要求下放，就是逃。因為這太恐怖了。但是怎麼逃得了呢？逃了半天你逃不掉，但還得逃。逃不掉，無處可逃。無處可逃，那你怎麼辦？你就必須得偽裝。哪有那麼清白的？我就把“毛主席萬歲”喊得響響的。我不能讓任何人懷疑我還有潛藏，還有什麼別的想法。你跟所有人講話全是冠冕堂皇的，否則人就揭發你，所以你就得裝模做樣。

如果說你手上沒有鮮血，那你要不就是軟弱，天性軟弱，要不就是你還有過去的文化背景，你做不了那種極端的事情。我就做不了那極端的事。叫我打人，我就打不了。除非在對打中，我才會還手。叫我好端端地打個人，我反正打不了。但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人就可以打人。為什麼那些小孩子，像我看到的那個女孩子，那麼文弱的、親切的，怎麼就可以揮著皮鞭子打人？那是因為她沒有一個好的教育背景。你要讓個年記大的人去打，他就打不下去，因為他有個背後的文化。但是，你要叫個工人打，哪怕是叫老工人去打人，他很容易打；但你要叫個老知識分子去打人，他就很難，因為他有另一種文化在裏頭，他打不下來。但是他得偽裝，至少他得喊口號，叫得很響，而且表現得義憤。那這個人的義憤是不是壓力、是不是暴力？同樣是暴力！你同樣構成了暴力。

編者注：此文系據網上一篇高行健先生訪談摘錄而成。

#### 《黑五類憶舊第十七期》目錄

草原小姐妹真相·····	林 輝 (05)
大愛長在，人性永存·····	孫寶鏞 (07)
老李的口誤·····	莫海帆 (15)
入學之難·····	吳家樹 (17)
撥亂反正之後·····	孫正光 (19)

韓盤慶從軍·····	向文龍 (23)
長沙知青大逃亡·····	羅 丹 (25)
從造反少年到楹聯大家·····	方 舟 (29)
我的三座大山·····	楊文華 (33)
母親想下毒·····	李建強 (35)
血泪家史·····	王文怡 (37)
一位政協副主席的誕生·····	胡椒粉 (40)
劉雨濤的土改和反右·····	譚 松 (42)
党一貫反我·····	王淑謙 (45)

## 草原小姐妹真相 林 輝

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 1960 年代家喻戶曉，當時媒體報道的情形是這樣的：1964 年 2 月 9 日早晨，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草原上飄著雪花，11 歲的龍梅和 9 歲的玉榮代父出門放牧。近午，天氣突變，西北風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順著風拚命逃竄，姐妹倆攔堵不住，只好跟著羊群奔跑，越跑越遠。因極度疲乏，姐妹倆在冰天雪地裏睡著了。深夜，龍梅被凍醒，羊群、妹妹都不見了。她爬起來，一路走一路喊，走了兩三裏，才找到玉榮和羊群。姐妹倆跟著羊群繼續前進，同風雪搏鬥。第二天拂曉，她們已走出 70 多裏，離白雲鄂博車站不遠了。這時的玉榮，走丟了一隻氈靴，光著左腳。姐姐剛要脫下自己的氈靴給她穿上，玉榮却顫抖著催促：“羊又走遠啦，我在這兒等著，你快去攔羊呀。”這時龍梅也快凍僵了，掙扎著爬起來，踉踉蹌蹌往車站方向走去。

白雲鄂博火車站出來迎接客車的扳道員王福臣看見了龍梅，連忙把她帶進板道房，用雪替她搓揉兩隻凍僵的手。龍梅漸漸暖和一些，斷斷續續吐出幾個字：“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經沒靴子了。”張仁貞立即電話通知值班員，接著鐵路職工們便四處去尋找孩子。張仁貞、王振山越過兩座雪坡，在離亂石坡不遠處發現了俯伏在雪地裏的小玉榮。兩人輪換背著玉榮跑回車站，又將玉榮送到礦區醫院急救。經過一場搶救，兩人終於醒了。龍梅立即問礦區黨委書記：“我的羊還在不在？”書記回答說：“羊沒事，你放心吧！”

後來，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上了小學課本，被編成京劇、舞劇、動畫片。目前龍梅是內蒙古包頭市東河區政協主席，玉榮是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秘書長。

不過，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與事實真相有一定距離。那天姐妹倆代父放羊，實際上是父親跑出去喝酒，把羊交給了兩個小孩。發現并營救龍梅和玉榮的不是王福臣，而是被管制的牧民哈斯朝祿和他的兒子那仁滿都拉。被救過來的龍梅，還對哈斯朝祿父子說了一些感激的話。由于哈斯朝祿屬於管制分子，媒體報導時就將目睹了這一切的鐵道工人王福臣作為解救小姐妹的功臣，而哈斯朝祿則是被將功折罪，不見報不表揚。隨著文人的加工，草原小姐妹的故事融入了階級鬥爭的內涵，哈斯朝祿從一般管制分子升格為舞臺上的偷羊者、殺人未遂的反動牧主白音（白音，蒙語地主）。

文革期間，哈斯朝祿被根據文人加工後的形象關進監獄，罪名是他要強奸龍梅和偷公社的羊，龍梅甚至還在萬人批鬥大會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榮覺得這樣做愧對良心，選擇了沉默。當時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敢說出實情。直到 1984 年，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宣傳部、區團委才下文將哈斯朝祿確認為搶救小姐妹的第一人，並將所有強加于他身上的不實之詞全部去掉，建議獎勵、表彰。



我家是富農，解放前雇過長工、短工，但雇的人都是親戚、朋友。我爺爺當家的時候，雇的長工都是他的堂兄堂弟，就是說他和長工是一個爺爺的孫子。雖然我爺爺名義上是土地的所有者，但和長工們一起幹活一起吃飯，從來沒有尊卑之說。土改時我家被整慘了，我爺爺都快被折磨成神經病了，一直到現在都膽小怕事。生產隊最苦最累的活都少不了我們家的人，隊長、書記、貧下中農對我們家的人動不動就無端指責漫罵。我父親上學時成績不錯，可惜因為成分問題，加上我爺爺已經被折磨得草木皆兵，堅決不讓已經小學畢業的我父親繼續上學。唐山地震後，我們村接收到的救濟物資，都是貧下中農挑剩下後沒人要的東西才輪到我家。

大愛長在，人性永存 孫寶鏞

1968 年秋，我和交建科砂土石管理所的幾位同事一起進入瀋陽市于洪區五七幹校。我們這個所是一個很邊緣化的股級小事業單位。覺悟高、能力強的不來，來的多是政治不可靠或被認為覺悟不高、能力不強的人。原來不打算讓我們進幹校，後來因為有“鬥批改任務”，我們才“有幸”進幹校。迹象日益明朗，那“鬥批改任務”原來是針對我的。我被禁止參加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文件的全體學員大會，幹校領導小組還發布了一個二號通令，要求有“裏通外國”行為的人立即交待問題，交出電臺等特務工具。

有一天，我吃完晚飯去刷碗，在“自助”刷碗的大鍋上方出現一張大字報：“孫寶鏞，你必須交待，你是不是蘇修特務！”最初的恐懼過後，我反而出奇地平靜。我最害怕的是不知道從哪里下手整我，這張大字報給我報了信，我立刻轉回賣飯口：“再加二兩。”人們奇怪地看著我。高粱米小豆乾飯真香！吊著的心放下來了。——他們的網撒得太大了！當然，若把我打成蘇修特務，那將是一個巨大的政治勝利。我雖然有過兩個蘇聯朋友，可她們都是和我一樣的中學生。莫斯科那個，畢業後就不再通信了。烏克蘭那個，信通到普通百姓知道中蘇關係惡化。那是中蘇友好的年代，通信是學校組織和提倡的，怎能和蘇修特務挨上邊？

這張大字報也是沖著我們的班長（幹校是軍事編制，幹部都稱為班、排、連長）王永山來的，是在給他施加壓力，也是給他一個立功的機會。王永山是我們所的一般幹部，高個，長臉，臉上總是挂著憨厚的笑。他家三代貧農，又是轉業軍人，共產黨員，但不善言談，也不會看領導臉色行事，所以當不上比班長大一點的官。星期一我早早回到幹校，把一包蘇聯來信交給王永山。這時候別人還沒來，我說：“永山，請你把這些信交給幹校領導小組審查。”我壓低聲音說：“你必須揪我，鬥我！我不會怪你的！你為什麼要為我擔這麼大的壓力呢！”他仍舊是憨厚地一笑：“我是班長你是班長？——我心裏有數。”

各連排班清理階級隊伍的鬥爭轟轟烈烈，小號（牛棚）已經人滿為患，王永山好像沒什麼感覺，還是按兵不動，我都有點著急了，反倒替他捏把汗，連領導却等不及了。他們促不動王永山，決定把我們排和二排（衛生科）合在一起開我的批鬥會。二排的主持人要求我交待問題，我就“交待”和蘇聯學生通信的事。那時開批鬥會，很少讓被鬥的人講完話，往往是挨鬥的人只講幾句，“義憤”的革命群眾就大呼口號，接著就開始批判，要求交待問題，觸及靈魂及皮肉。我想，一頓胖揍是躲不過去了。

我們班的人坐在我周圍，也不發言。這在那時候很罕見。每個人的壓力都很大，自保是第一要務。積極揭發和批鬥階級敵人，是自保的最好方法。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又是一條嚴

重罪狀。我們班以王永山爲首，“階級覺悟”太低了，他們對擺在自己身邊的一個大號階級敵人竟無動于衷。我知道，我們班的人雖然都看著自己眼前的炕席或地面，但他們的心都在看王永山。我確切地感覺到我一左一右坐著兩個重量級的人物。

我們班的人態度曖昧，反倒助長了我的氣焰，竟敢反駁革命群眾的發言。二排的史副排長在我交待完蘇修特務問題後發言道：“你說話這麼流利，你受過什麼專門訓練？”我想，這是往特務這條溝裏帶我。我非常平靜地說：“從 1947 年 9 歲開始，我就生活在哈爾濱，那是解放區。我的歷史是連續的，大家可以查。”我的意思是，我哪有時間去受特務訓練。其實，二排多數是醫務工作者出身，知識分子多，他們也不擅長武鬥。這次會無果而終，我再次全身而退。我始終不明白，史排長的發言，是批我，還是誇我？

我身邊的這兩個重量級人物，一個是吳慶升。1937 年，我還沒出生，老吳就參加革命了，所以被稱爲紅軍幹部。老吳中等個兒，紅臉膛，愛說愛笑，唐山口音，總跟人說：“你看，我左腿比右腿短，槍打的。”我們看不出他癩，但他身上疤痕確實不少。據說，解放戰爭時期，他還當過幾天某縣的縣長。革命勝利後，他因爲沒文化、革命意志衰退和階級覺悟不高，只能當砂土石管理員，連股級幹部都不是，但從來沒聽他抱怨過。

對於他的階級覺悟不高，我深有體會。家父解除勞動教養後，在教養院就業，當電影放映員，但還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他利用回市內換片的機會，買了一些廉價材料，給我裝了一台半導體收音機。這可是個稀罕物。我帶著它到單位聽新聞，大家覺得很新奇，老吳也挺喜歡。有一次，他一定要到我家來看看。因爲政治上差距太大，再者我家很寒酸，我不想讓他來。我的工資只有 37.5 元，家父的工資只够他自己吃飯，所以，我們家真的沒什麼好看的。一天下班回家，我下了公共汽車，老吳已經推著自行車在車站等我。我沒有辦法，只好帶他到了我家。恰巧家父也在家。我不知道如何向老吳介紹家父，乾脆不介紹了，只對家父說一句：“你回來了？這是我們單位的老吳。”令我大吃一驚的是，老吳竟然把不比他大多少的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家父叫大叔，並且毫無芥蒂地和家父嘮起了他正在放映的一部電影。臨走時，老吳說：“大叔，小孫這台半導體收音機，我太喜歡了，就賣給我吧。”家父忙說：“喜歡你就拿走！我自己裝的，怎麼能賣呢。”“這是 70 塊錢。”說著他就掏出已經準備好的一卷錢，撂到床上，轉身就走。爲了這個 10 元都不值的半導體收音機，他竟然撂下 70 元，而他每月的工資也只有 78 元。我拿上錢追出去，他正片腿下車，喊一句：“在班上千萬別提這事！”我沒有自行車，追不上他。當時，我只是以爲他同情我經濟上的困窘。幹校的二號通令貼出來要追查我的電臺的時候，我才悟出他的政治動機。

坐在我另一邊的是崔俊高，大高個兒，一張口說話，活脫脫一個山東大漢。他 1944 年參加革命，屬於抗日幹部，原是部隊的營長，後來交個女朋友，是一家地方醫院的大夫，很漂亮。領導以組織的名義找他談話，告訴他，這個家庭出身有問題，他不能找這樣的女人結婚。老崔不肯聽，領導說“你要聽組織的”，老崔說：“我一輩子都聽組織的了，這一把組織就聽我的吧。”這樣的階級覺悟，當然也只配來當砂土石管理員。老崔看我有點萎靡，就對我說：“小孫，把腰挺直了。有什麼了不起，腦袋掉了碗大個疤。天塌了，還有大個兒頂著，你年輕輕的，怕什麼。”

這兩個人雖說不被重用，但他們資歷太老了。他們既不是走資派，又不是黑五類，成份和出身，沒法再乾淨了，所以幹校和連排幹部，誰也不敢得罪他們。有這兩個人和差不多全班人罩著，難怪有人說我態度有點囂張。

我們排另一個班是手工業科。于洪區是農業區，那時手工業份量不重，所以這個科在政府機關裏沒什麼地位。但我覺得他們人都很好，都很年輕。郭書堂例外，他差不多是二班年紀最大的一個，見誰都點頭哈腰，我有點看不慣，甚至覺得他的名字都有點陳舊。

1969年9月，家父母被遣送下鄉，到法庫縣。作為他們的獨子，我不能不送。便向連長請了假，送他們到了目的地。第三天早晨回到幹校，和往常一樣，全排在一起學習，大部分人都坐在板鋪上，背靠著行李捲。郭書堂也爬上板鋪，坐在我的旁邊。過了一會兒，他掏出一個筆記本，翻開，問我：“小孫，你看這個字念啥？”我的心情很不好。父母被安排住在一個老地主婆的北炕上，那老地主婆七十多歲了，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兒子還在監獄裏，生活不能自理也得自理。普通下鄉戶有建房補助，我們是被遣送下鄉的反革命家庭，什麼也沒有，這一冬怎麼過，明年怎麼過。我滿心滿腹都是這些問題，哪有心思告訴老郭那個字念什麼，所以看也沒看，便把他的筆記本一推：“我不認識。”“你看看嘛！”他強把筆記本推到我的眼前。我一看，頭髮都炸起來了。那不是一個生字，而是一段講話記錄：“周副連長：孫寶鏞不請假就離開幹校，還拐跑了一個軍官家屬。”前半句不可怕，連長親自准假，他不會不承認，這後半句可要命了。

周副連長說被我拐走的軍官家屬，是手工業科的任福華，山東大學中文系一年級肄業，圓臉，大眼睛，體態輕盈，待人熱情友好，丈夫是空軍的一位團職幹部。我感覺到她對我確實有一定的同情，但是說我能拐跑她，那也太恭維我了。我是一個找對象都困難的黑五類狗崽子，清理階級隊伍的重點目標！巧的是那天她也離開了幹校，但和我毫無關係。不久，透過幹校辦公室的窗子，我看見任福華向軍代表大發雷霆。聽說周副連長乖乖地給任福華道了歉，而對我，則不了了之。誰能給我道歉？我壓根兒“不知道”。謝謝老郭，冒著極大的危險給我通風報信，使我得以準備應付各種可能，避免和這件事挂上邊，更避免了因衝動而犯錯。

一天，勞動收工後，我到工具房送完工具往宿舍走，身後聽見有人厲聲喊道：“孫寶鏞，站住！”我聽出是任福華。“一會兒，我們宿舍的三個女同志，要開一個批鬥會，批鬥你。你必須在半小時後，準時到場！”

她們這是賣的什麼藥？要報復？也報復不到我的頭上，我是無辜的呀！要對我武鬥？不至于吧。我找到房號，敲門。“請進。”天哪，還用了“請”字！真是深不可測。三個人都在。除了任福華，另一個是統計科的小史。今天看，三人絕對都是美女，但那時思想不敢有一點跑偏。冷靜一下，我注意到，屋裏飄著一股已經久違了的清香。我的鼻炎很嚴重，平常聞不到什麼味道，這次却聞到了，可見香味有多重！屋裏，火炕邊有個地爐子，爐邊有一個家用大號奶鍋，香氣從那裏直奔我的鼻孔。我強制自己把視線挪到地中間，畢恭畢敬地站在門邊，三個女人幾乎同時低聲笑起來。

任福華把唯一的一把椅子挪到炕邊：“還不坐下！”從三個人臉上看不出一點惡意，我便遲疑疑地坐在椅子上。任福華把小鍋從地爐子上端到我面前的炕沿上，揭下鍋蓋，命令道：“把這鍋粥吃光，這是你今天的任務。我知道你是個大肚漢！”我環視三人，她們的臉上全是微笑。我認定這不是夢，也不是惡作劇，便也回應了一個微笑，把炕當飯桌，大口吃起來。我不愛出汗，今天却真的汗流滿面，一是屋子熱人心熱粥熱，一是在三個女人的注視下饕餮，臉也不可能不熱。粥香的誘惑太強烈，那時每人每月只供應二、三斤大米，我上有老下有小，

偶爾喝上一小碗稀溜溜的大米粥，也只能作窩窩頭的佐料。我敢保證，在我的感覺中，這一次的粥香是空前絕後的。我出色地完成任務，一個飯粒也沒剩。

我們每天除了開會鬥批改、學習，就是沉重的勞動。春天，我們的任務是為附近的公社修整排水溝。那是一片高地，為了能讓稻田裏的水排出去，溝很深。在外面看不到溝裏幹活的人，只能看見一坨坨的土飛出來。我們在溝裏的人也看不見岸上的人，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把一畝土甩到岸上，勞動強度非常大。很多人開始的時候還好一點，甩幾畝之後，就再也甩不上去了，或者僅僅甩到岸邊的坡上。我原來是個文弱書生，考上高中那年，體育老師進行四項體力測驗，我竟然三個 2 分，一個 3 分。如今我已有七年農場勞動經歷，多重的活沒幹過？當年大躍進，深翻地，打深井，人拉馬車，夜戰，我的體魄已經鍛煉得相當強健。眼下這點活，對於青春年少的我，已經不算什麼。

我最大的煩惱是特能吃，每月 32 斤怎麼够？吃粗糧好辦，開飯的時候，我只要坐在顯眼的地方，肯定有人過來：“小孫，我吃不下了，幫幫忙。”那時，幹校裏吃不下飯的人很多。糟糕的是星期六這次改善生活，雖然要用細糧票，每人也只限六兩，我根本吃不飽。那些吃不了的人，也留著下頓享用，不肯送人的。我對食堂管理員說：“老張，這也不够吃啊？”他很驚訝：“什麼？這麼大的包子，六個還不够？”“真不够。”“供不起你了！那我可沒辦法。細糧卡得很緊。”我想出一個辦法：“老張，你看這樣行不：你先賣我兩個窩頭，然後我再買六個包子，咱們當場解決戰鬥。”“窩頭可是涼的。”“沒事。”我先用四兩粗糧票買兩個窩頭，吃完後，又用六兩細糧票買六個包子，當場大嚼起來。這包子半個拳頭大，真叫香！就像嗓子裏伸出個小巴掌，不等我細嚼，就把包子拽到肚子裏了，旁觀的人就就像看豬八戒吃人參果，都看傻了。老張對炊事員們說：“今天我說了算。以後星期六改善，小孫主食不限量。但是可得交細糧票啊！”

有一次，收工回到幹校，我因幫助整理工具，到食堂晚了，賣飯口的炊事員已經撤了。“還能賣給我飯嗎？”我問。誰知周副連長也在場，他冲炊事員說：“賣給他，生活上一視同仁嘛！”我說：“周連長把話說全嘛！”他怔怔地看著我。我說：“你這是一副對聯。但你只說出了下半聯。”他還是怔怔地看著我。我說：“這句話完整地說出來，應該是：政治上兩樣待遇，生活上一視同仁。”大家都笑了，紛紛過來給我撥飯，Z 副連長狠狠地瞪我一眼，在一片哄笑聲中轉身走了。其實周副連長並不是根紅苗正的那一類，文革一開始就有大字報揭發他，在農大畢業前被劃為極右。因為他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好”，站隊又站對了，所以在他身上體現了政策，被委以重任。

第二天收工，我又是最後一個爬出深溝。我去拿外衣，這麼重？打開衣服，一個白紙包險些掉到地上。打開紙包一看，天啊，高級點心！我掃一眼四周，見無人注意，趕緊轉過身，穿上外衣，把紙包揣到衣袋裏。那包點心，每塊大約有巴掌長，兩頭寬，當間窄，背面是平的，烤成金色，正面是乳白色，粘了一層晶瑩反光的砂糖。這種點心，在商店見過，但每次從糕點櫃檯過，我總是繞開，因為又饞又沒錢買，那滋味真不好受。給孩子買過點心，但捨不得買這麼好的。我的嘴裏很快變成了萬斛泉源。是誰給我的點心？我首先想到了任福華。“拐跑”事件後，她越來越公開地對我表示同情。也可能是昨天晚上看見我奚落周副連長的人，我確實讓他們很開心。也許是那些從來不對我表示關心但從來不傷害我的人。在那特殊的年代，善良和關懷也不得不掩藏起來。

我所以敢斗膽奚落周副連長，是因為幹校的鬥批改已近尾聲，我已基本安全上岸。我心裏很

清楚，我沒有被打成蘇修特務，並不是因為找不到證據，在那“群眾運動”的年代，定罪是不需要證據的，再說製造任何證據都很容易，而且證據可以無限上綱。那是一個“有罪推定”的年代，你不能證明自己無罪，就等于有罪。即使你能够證明自己無罪，也可以認定你有罪。1982 年家父獲得平反時才知道，定他為軍統特務的證據，竟然是一份明明白白證明他沒有參加特務活動的證詞。我得以逃脫劫難，完全是因為我們班，我們排，甚至我們連的同志們的庇護。

彈指間，已經過去四十年，我從當年的壯小夥變成了古稀老翁。幹校裏那些猙獰，早已淡忘，可是點點溫馨記憶，特別是和吃有關的這幾件事，却越來越清晰。它告訴我：大愛長在，人性永存。

我家是地主，因為我家勤勞節儉，也不抽大烟，慢慢積累了一些財富。有些鄰居好賭，被債主追上門來，願意把土地賣給出價還可以的我們家。到解放時，家裏有幾百畝土地和幾片山林。爺爺臨死前說過，他年輕時，比一般農民都能吃苦，去四川做買賣，他挑的擔子比誰都重，賺點錢從不亂花。農忙時，全家都上土地幹活，捨不得花錢請長工。農閑了，女人們在家紡綫織布，男人出門做小生意。土改一來，那些賭鬼、好吃懶作的，搖身一變成了貧農，我們這種老實從事生產的人家成了地主，子孫後代遭連累。我那可憐的爺爺，解放前為置家業累死累活，解放後為貧農們犁了半輩子水田。但也怪，被鬥爭了幾十年的老人家，越活身體越好，活了 90 多歲。他去世前兩三年，我告訴他，總有一天，土地還會私有化，還會允許買賣，他讓我別亂說，不要讓別人聽到。我外公也是地主。外公有俠義之氣，抗日期間帶領幾百人去陝鄂邊境修公路，一個民工得病死了，外公帶幾個人，把尸體幾百里抬回家。十多年後，外公成了剝削農民的反面典型，差點被整死。我爸爸小學連跳幾級，上到初二，被大隊幹部命令回家勞動，揮泪了告別學堂。地主的子女們大都膽小怕事，被整怕了。

老李的口誤 莫海帆

1969 年春天，中共九大，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定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永遠開除黨籍，同時林彪在新黨章中被確立為毛的接班人。九大結束後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們縣糖烟酒公司召開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大會，上級規定，一個都不准缺席，生病也得參加，否則就是對現實不滿，對毛主席、林副主席不忠。

一個李姓的南下幹部，由于生病，稍遲到，當場受到造反派頭頭嚴厲訓斥，幾乎替代劉少奇成批鬥對象。大會開得熱火朝天，“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打倒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口號聲此伏彼起，一浪高過一浪。滿臉怒氣的革命群眾按照既定的順序一個緊接一個輪番上臺表演，每一個都手舞足蹈、口沫橫飛，歇斯底里地表忠心，聲嘶力竭地呼口號。破舊的會議室屋頂，塵土帶著蜘蛛網不斷震落下來，弄得大家灰頭土臉，好不狼狽。批鬥會本來沒有老李什麼事，他只要跟著大家舉舉手、喊喊口號就行了，誰知他因為遲到，心底不踏實，生怕造反派找他麻煩，為表忠心，未經請示擅自沖上主席臺帶領大家呼喊口號。本來這也沒什麼，當年這種情況很普遍，為了表忠心，大家甚至六親都可以不認，可是老李這次偏偏運交華蓋，臺上口號還沒喊完，就直接被送進監獄。

李某上臺後，按慣例向毛像鞠躬致意，然後振臂高呼革命口號。起初一切都很正常，但不久老李因表忠心切，連連發生口吃，在大喊一聲“打倒劉少奇”之後，停頓了一會，緊接著便喊出一句驚世駭聞的“打倒林彪！”這還了得，頓時會場像炸了鍋。幾位膀大腰圓、凶神惡

煞的群眾立即沖上主席臺，將老李結結實實捆起來，像踢皮球似的拳打腳踢。台下的革命群眾個個怒目圓睜、氣憤填膺，雷鳴般的“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李 XX！”、“千刀萬剮李 XX！”的口號聲響徹夜空。在場的人都知道，老李這明顯是口誤，可當時的環境不允許這樣推斷。當晚，李即以現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幾個月後公檢法以妄圖打倒林副主席，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1971 年 913 事件之後，照理說李應無罪釋放，可是官方却說，林在臺上時，喊打倒他是完全錯誤的。老李仍然被繼續關押，直到四人幫倒臺才得釋放。

---

我家的鄰居姓方，是地主成分。文革期間興起挖地主家銀子的運動，方家院牆外，也是我家院牆外，就像今天的一個形象工程，天天挖，夜夜幹，挑燈夜戰，換人不換班，前後幹了一兩個月，總算有了收穫，挖出一個老罐子，裏面有幾錠銀子，也就是現在電視裏常見的那種銀元寶。罐子當時就被敲碎了。真是可惜了那老罐子，不然到現在也許比那幾錠銀子還值錢。地主們當時埋銀子時，也是費了苦心的，把銀子裝在罐裏，再封起來，埋入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地面上什麼標志也沒有，只記個大致位置。這給挖銀子的人造成很大困難。爲了一罐銀子，往往要挖四五處地方，甚至挖更多的地方才能找見；挖的範圍又很大，往往是 8-10 米見方、深 5-6 米的深坑。社員們也熱衷於幹這些新鮮熱鬧的事，反正有生產隊記工分，幹他幾個月不在話下。挖的大坑也不回填，夏天大雨，水流滿坑，形成一個個小型澇池，我們就在裏面戲水玩鬧。當時大隊李書記從黑色的人造革包裹裏拿出銀錠，站在土堆的高處向圍觀的人群展示。後銀子上交到公社，就再無下落。九十年代後期，一次回家探親，方姓地主還諮詢我這事，問當初挖他家銀子是不是對的，現在能要回來嗎？雖然我是搞法律工作的，我却無法回答這一諮詢。

---

### 入學之難 吳家樹

我家住在芙蓉江邊一個小場鎮上。祖父吳克勛與祖母生五子，在弟兄五個即將成人時，祖父病故。按照祖父臨終前請陰陽先生看的地進行安葬，結果不到一年，二叔、三叔、四叔接連去世。又過一年，兩位大母（丁氏和江氏）先後趕往閻王殿。短短兩年多，家裏死了六口人。父親吳振倫是五兄弟的老大，初長成人，祖母是婦道人家，生活一時難以爲繼，只好靠賣田土和房屋還賬過活。到最後，房產地土全賣光了，就租別人的爛房子住，租人家的土地耕種。父親與母親牟世英結婚後，先後生下哥哥吳家國和我。經父親多年努力，家道重新振興，父親又被推舉當了兩年保長。一九五一年土改，我家被劃爲地主，父親被勞改兩年，五叔吳振虞被劃爲貧農，祖母隨五叔，也是貧農。

一九五一年解放時我未滿八歲。我家被遷往原地主家的破房子住，媽媽安排我天天放牛，割豬草。鄰街大大小小的孩子都陸續到洛龍小學讀書了，只有我還整天在山坡與豬草打交道。我是多麼羨慕那些讀書子弟啊，曾多次請求母親送我上學。後來街上辦夜校，母親看我讀書心切，就去我和哥哥報了名。外祖母東拼西湊找了一點兒桐油和燈草，我和哥哥晚上就可以高高興興端著桐油燈上夜校學習了。後來不知何因，夜校停辦了，我感到有些失望。

一九五三年父親刑滿回家，家庭生活漸漸好轉，我向父母提出上學讀書，他們滿口答應。八月下旬，洛龍小學的招生廣告貼出來了，凡年滿七至十二周歲的兒童，不論家庭成分，均可報名入學。我向父母要了錢，與本街的同伴一道，滿懷信心去洛龍小學報了名。幾天後，招生榜貼出來了，我們一路去的夥伴們名字都上了榜，唯獨沒有我的名字。我跑回家，抱住母親哭了一場。母親毫無辦法，只好安慰我：“今年不行，明年再去吧。”

一九五四年八月下旬，學校的招生廣告又貼出來了，招生條件沒有改變。我還差幾個月才滿十一歲，不超齡。我又向父母要了錢，和鄰居幾個夥伴一道去洛龍小學報了名。幾天後，招生榜貼出來了，我去看，看來看去，榜上仍然找不到吳家樹這個名字。又過幾天，我親眼看到鄉下和本街的地主富農的孩子也都經我家門口去學校讀書去了。為何單單我不能上學讀書呢？

一九五五年八月，學校的招生廣告又貼出來了，父母拿錢叫我去報名讀書。由于前兩次的遭遇，我有些灰心喪氣，只因我讀書太心切，還以為有一線希望，才依父母，接過錢，第三次去洛龍小學報了名。又過幾天，招生榜又貼上街。我急忙跑去看，榜上依舊沒有我的名字。我跑回家，喪心地大哭一場。我想，入學真比上天還難啊！誰知道三進學堂門而不許的滋味？後來，有人來勸我，說是因我超齡，其實，那時我還差幾個月才滿十二周歲，超什麼齡！

由于三進學堂門都未成功，我心靈深處遭受沉重打擊，便基本上安下心來在農村放牛，或勞動。進初級社的時候，生產隊看我人小，安排我每天放一頭牛，一天可得四分。後來到了人民公社，叫我放兩頭牛，每天還是四分。大人一天可以評一個勞動日（十分）。我上學讀書的心仍然未死，常常在夢中呼喊“我要讀書”。母親看到這種情況，才想方設法找親鄰朋友幫忙。一九五七年正月初，趁拜年的機會，母親領我到在南縣溝關口民校教書的三位親朋家，最後商定：先送我到關口民校讀書，一學期後再轉到洛小。

一九五七年正月十九，我讀書的美夢終於實現。我家離學校十多裏路，山村小道，上上下下很難走，雨天山陡路滑就更不用說了。可是由于我求學心切，感到無所謂，只是在路上遇見很多人，聽到不少風言風語，一些人用歧視的眼光看我，議論我：“這個地主兒門口就是學校不去讀書，那麼遠來我們民辦學校讀書。”一九五七年八月底，我終於轉學到洛龍區中心小學（洛龍小學）。

撥亂反正之後 孫正光

1940年，日本鬼子把我們村從老村趕到現在的居住地建立新村，我家分得長28.5米、寬26.5米的宅基地，建有坐北朝南正屋五間，朝西橫屋三間。共產黨搞土改時，祖父孫家梁被劃為地主分子，沒收房屋五間半，留下兩間半居住。1958年大躍進，我八歲，村幹部把我們一家人趕出我們的院子，把我家五間正屋打通，成為一間大廳，用作公共食堂，後又作托兒所、幼兒園，1959年大饑荒又改作水腫病房，此後還作商店、大隊辦公室用。1961年，村幹部讓我們搬回原來的橫屋居住。

1963年我考取鶯歌海初中，平時住校。當時開展四清運動，有一次星期六回家，家裏看不到一個親人，我就到處打聽家人的下落，可是向誰打聽都沒人敢回應，連我的堂兄弟和我外婆家的人都不敢搭話，只好自己滿村找，最後找到父母，遠遠就扔下書包，投進父母親的懷裏放聲大哭。哭著哭著，貧協會來人呵斥：“是你們不服嗎？今晚就點起汽燈打籃球。”打

籃球是批鬥黑五類的一種方式，點上大汽油噴燈，很多人圍成一圈，被鬥的人在中間，批鬥的人你推來我踢去，最後把被批鬥者弄得昏頭轉向，癱軟在地不能動彈。經常有人被踢斷肋骨，甚至被當場弄死。我們嚇得馬上停住哭泣，傷心之極地抽搐。

父親孫樹業在四清期間又被劃為地主分子，全家 12 口人又被趕出家園，強迫住在貧農陳明清 20 平方米的破屋裏，陳明清換住到我家房子裏。

想到被欺侮虐待的家庭，我在學校很爭氣，每次都被評為“三好學生”，并被學校吸收入團。申請表送達大隊審批時，大隊說我是三代地主黑五類，不同意入團審批。

1966 年我初中畢業，文化革命席捲全國，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踏進學校校門，只能回家務農。當時，由於全國各地都組織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宣傳毛主席的豐功偉績，因我從小學到中學畢業積極參加跳舞，在跳舞中長大，因此被推薦為我村宣傳隊的輔導員，多次代表公社文藝宣傳隊，參加樂東縣、保縣、保國農場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慰問團演出。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我帶領宣傳隊大力協助大隊搞農業水利建設、植樹造林等工作，博得大隊幹部的信任，村民也給予很高的評價，區別於其他黑五類子弟。我家房屋居住困難在大隊裏有目共睹，因此，1969 年大隊同意十五生產隊讓出一塊非生產地供我家建房居住使用。

1974 年社會改革，鄉鎮企事業不斷發展擴大，我被推薦到公社采石場當工人兼會計，孫樹熊被提上來當村支部書記。孫樹熊和我是近房侄叔關係，任書記前靠做木匠活謀生，我經常幫助他，關係甚為密切。當時開展“有錯必糾，有反必肅”運動，公安局到我村瞭解我的情況，我把我父親的情況（早年讀書，1953 年回家，30 歲上被評為地主分子）向公安局反映。1975 年，公安局把我從公社采石隊用麻繩五花大捆回我村進行批鬥，說我為父親翻案，是鄧小平的孝子賢孫。1976 年，孫樹熊被縣、公社推薦到大寨參觀學習，吃住車費由政府買單，零用錢自備。我認為他是家族鄉親的光榮，當時普遍家庭經濟都相當困難的情況，我在采石場當會計比普通家庭經濟稍好一些，就把省吃儉用攢下的 150 元積蓄送給他作為大寨參觀學習期間的零用錢。接過我捏得出汗還有體溫的錢，他非常感激。

1979 年撥亂反正開始。1980 年的一天，孫樹熊書記叫我和他一起到他姑丈家，催促孫德聖一家收拾行李，把他姑丈家（地主成分）的房子騰出來，物歸原主，以落實政策。此房是當年被公家占用分給貧農孫德聖住的。孫德聖家搬走後，我對孫樹熊說：“叔叔，你把房屋退還給姑丈家，是否應辦個手續，如果不辦手續，有運動來說是反攻倒算，要被批鬥的。”孫樹熊說：“現在是落實冤枉案，如果辦手續給私人，就認為黨的政策有錯和亂的事實存在，只算物歸原主的話才沒留痕迹，而且以後也不會再有什麼運動了。”黨的支部書記為黨想得真周到，不讓黨的不光彩歷史留有證據。我就對他說：“既然這樣，我父親也同樣是四清運動時錯定的地主，是否也應該給予平反，把宅基地和房子歸還我呢？”孫樹熊回答說：“應該按政策落實平反。71 年拆除你家房屋後，在你家宅基地上建商店，你家東邊的公路也開在你家宅基地上，這些都要落實政策。這樣吧，你給我送一萬塊生磚，但這事只能你我知道，我就把宅基地歸還給你，並劃給你一百棵松樹，作為拆除房屋的賠償費。另外，向公社寫一份申訴書，公社一派人下來就解決了。”

我當即向生產隊買下一塊泥料地，又花三百元雇工人，造了一萬塊生磚送給孫樹熊，并在他指導下，於 1980 年向黃流公社寫了申訴書。申訴書送達後，公社書記符繩富派落實辦的公安員陳運江到我們村調查處理，孫樹熊也積極張羅組織召開會議討論處理。1982 年，懷卷



鄉政府派副書記李彬，劃給我一百棵松樹，作為拆除我家房屋的損失賠償。然而誰知把樹劃給我後的當天夜裏，部分幹部和村民一夜間就把百畝松樹連同我的三百棵樹偷搶個淨光。

不知是否因此事辦得不妥而受到縣政府責備或另有隱情，不久孫樹熊辭去村支部書記職務，由陳運慶接任。孫樹熊任書記時，他的妻妹關連次向陳好央借地辦小食店，孫辭職後，陳好央就不再借給關連次地了。在孫樹熊主持下，關連次在其原小食店對面我的宅基地上建起了小食店。建店施工時，我進行制止，無果。書記陳運慶、公安員陳運江、副區長陳人幹等也出面阻止，關連次不為所動，硬是把小食店建起來。孫忠也趁機起哄，在店旁我的宅地上建起兩間廚房，并說，連次拆時我就拆。

公社看到這種情況，1983年5月15日，中共樂東縣黃流公社黨委會和管理委員會給我按中央決策做出了《關於落實錯定地主成份孫正光房產和宅基地政策的通知》，將土改和四清運動中沒收我家的房屋和宅基地歸還我家使用。其中寫道：“因此我社懷卷大隊社員孫正光被錯定地主成份問題，據調查瞭解，該員在土改時分得的房子和自力更生新建的房子已被拆毀沒收歸集體，這批材料用于建設該大隊供銷門市部，同時這個門市部也占用了本人宅基地的三分之一左右。現孫本人多次要求我社兩委會給他按政策落實這一問題，經過我們派員調查，上述情況屬實，經公社兩委會討論，做出如下處理決定：一、關於孫正光要求房屋和宅基地按政策落實的問題，現按中共中央中辦發（1979）7號文件精神規定：孫正光的房產已拆毀沒收歸集體，材料用于建設供銷門市部，因大隊經濟困難，不作處理補貼等事宜。二、孫正光原受法律保護的宅基地東至供銷門市部後牆，南至陳人義家後牆，西至孫慶武東牆，北至橫公路邊緣。除了供銷社的活動用地外，其餘剩下的空白地按政策落實歸還孫正光本人使用。如果供銷社有變動、拆毀搬走的話，所占的宅基地應歸孫正光使用，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准干涉和侵占。三、凡是在孫正光落實範圍地裏的一切障礙物都要搬走，如果有任何團體或個人侵犯干涉的話，後果自負。”

通知下達後，我在自家宅地上建了三間住屋。關連次、孫忠、孫樹熊等人却不顧兩委會的決定，繼續霸占我的宅地。公社指示我，可以此通知決定向法院起訴，要求判令關、孫等人拆除建築物。1984年11月15日，我向法院起訴，孫樹熊為了達到讓其妻妹關連次長期侵占我宅基地的私心，利用當書記時的人脈關係，使盡手段，重新出任村支部書記。1984年11月25日，孫樹熊以已超過訴訟期限為由，起草《懷卷村黨支部、懷卷鄉人民政府、懷卷村人民代表大會、村民委員會關於孫正光非法強占集體場地蓋私人房屋》控告書，向法院反訴說我非法強占集體場地蓋房屋，黃流區公所把這塊地落實給孫正光是錯誤的。改革開放後，作為地主子弟，我政治上解放了，平等了，可是當年政治迫害的後遺症何時能清除？看來我這一輩也走不出他們給我製造的災難了。

韓盤慶從軍 向文龍

1961年4月18日，韓盤慶出生于陝西省西安市周至縣。其父曾經在國民黨軍隊擔任過小軍官，1949年以後，韓盤慶成為黑五類子弟。由于父母均喜好音樂，耳濡目染，韓盤慶從小就愛上了音樂。村民下地種田，韓盤慶經常跟去聽歌，一聽就是幾個小時，就這樣學會了不少的陝北民歌。他對音樂的愛好打動了父母，父母通過關係，請到國家著名手風琴演奏家薛強國做指導老師，韓盤慶正式踏入音樂殿堂。文革開始後，學校停課鬧革命，父母建議盤慶專心學藝術。那時韓家被歧視，藝術也是很多人看不起的學科，可是韓盤慶却不這樣想。為了學習拉手風琴，他想出各種辦法，田地裏、廁所裏、山頭上都留下他拉琴的腳印。功夫不負有心人，他逐漸成為學校裏拉手風琴的名人。儘管他的家庭成分不好，還是被特許經常參

加學校的各種演出。韓盤慶 10 歲的時候，陝西省廣播電臺就已開始播放他的手風琴獨奏曲了。

文革，父親經常被拉出去游街，他們一家都被劃為反動派，韓盤慶不得不輟學離校。但他沒有墮落，仍然堅持拉琴。一晃到了 1977 年 10 月，一天，陝西省軍區文工團上門來招他入伍。陝西省廣播電臺經常播送他拉的手風琴獨奏曲，陝西省軍區文工團注意上他了。可是由于他是黑五類子弟，當地人武部門拒絕給他辦入伍手續。儘管如此，他最後還是被陝西省軍區文工團的首長當特殊人才接走了。

1978 年 4 月 16 日，蘭州軍區第一政委兼甘肅省委書記尚華等人到陝西省軍區文工團視察，韓盤慶的手風琴獨奏《我為祖國守大橋》吸引了各位首長的注意。當時韓盤慶還未正式入伍，按照規矩是不能穿軍裝的。演出結束後大家一起吃飯，尚華發現只有韓盤慶一個人沒穿軍裝，便問：“這個小鬼怎麼不穿軍裝？”軍區文工團團長翁廣濟便把周至縣相關部門不給韓盤慶辦理入伍手續的情況向尚華進行了彙報，尚華聽後非常生氣，大聲說：“四人幫都打倒了，你們思想還是老一套。”飯沒有吃完，他就扭身走了。臨走之前，尚華給陝西省軍區有關負責人下了一道特殊命令：“限你明天把小鬼的入伍手續辦過來。”隨後，陝西省軍區又給周至縣人武部打電話，也以命令的口氣要求當地把韓盤慶的入伍手續立即辦好。第二天，周至縣人武部按要求把韓盤慶的入伍手續辦好了。1978 年 4 月 18 日，韓盤慶成為一名真正的軍人。這一天正好是他 17 歲生日。

2008 年濟南市科技最高獎得主趙新坤，出身于地主家庭，文革期間時常遭到紅衛兵的侮辱和謾罵。老趙處之泰然，每天到圖書館專心看書。一天，紅衛兵迫到圖書館，圖書管理員是一位老太太，為人和善，紅衛兵質問老太太：“為啥要借書給地主羔子？”老太太反問：“不讓他看書，他怎麼能改造好？”

鬧土改那陣子，村裏響應上面號召開批鬥大會，要苦難的民衆上場揭發地主富農的可惡行徑。大會進行到一半，村裏大丫頭她老爺跑上臺扯著嗓子大喊：“我給地主扛活那陣兒，天天吃的是秫米粥煲鹹魚，現在，糠菜都吃不上！”老爺子還想再囉嗦幾句，馬上被村幹部拽了下來。小學時經常搞憶苦思甜，有一次請來一位據說在萬惡的舊社會裏替地主扛長工的貧農，目前是五保戶，給我們做報告。這位貧民說著說著就說到現在，衣破沒人補，回家沒熱飯吃，還是扛長工時好，只要每天出工幹活，就衣食無憂，自由自在，把我們說得哄堂大笑。

地中海

長沙知青大逃亡 羅 丹

1964 年 9 月，長沙市六千初、高中畢業生被下放到湖南偏僻小縣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類子弟占 85%。在最初的兩年裏，這些 16 歲至 20 歲的年輕人幹得有聲有色，他們積極勞動，辦夜校，組織農民學文化，有知青為病重的農民獻血，有的熱心捐款給生產隊建發電站，還寫詩、寫劇本頌揚村裏的好人好事，很受當地農民的歡迎。江永知青的表現很快影響到省內外，一位中央首長說，希望省省有江永。

1965 年新年剛過，江永的四名長沙知青不幸三死一傷，在知青中掀起不小的波瀾。高澤源林場的男知青汪某，去廣西灌陽招募民工和定做挖山鋤頭，回場路上突遇風雪，迷路凍死。

大遠公社兩名剛滿 17 歲的女知青，在一場大火中，一個喪生，另一個跳窗得以保住性命，却失去了美麗的容貌和健康的體魄。瓦屋下的男知青陳某，身體虛弱又不甘落後，在堅持犁完一塊田後咳血不止，因得不到及時救護，幾個小時之後停止了呼吸。

他們的死凸顯了一些問題。知青下放的生產隊多是貧困隊，本身不具備接收知青的能力，農民只能將老隊屋、豬牛欄屋稍加改造讓知青住進去，沒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體瘦弱，承受不了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患病得不到醫治，意外死亡不斷發生。1966 年以後，隨著知青的年齡增長，不滿情緒悄然滋生。這時，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一場自覺革命，寫大字報，互相批判，互相傷害。這場自覺革命成了日後知青大逃亡的前奏。

1967 年 8 月 13 日，與江永毗鄰的道縣，由派性武鬥瘋狂演變為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的集體打鬥殺戮，周邊地區競相仿效。8 月 29 日，湖南省駐軍解放軍陸軍 47 軍奉中央軍委命令“堅決制止湖南道縣的反革命暴亂”，直到 10 月 17 日，歷時 66 天的打鬥殺戮風才徹底平息。與道縣相鄰的江永縣，一個夜晚，全縣的地富反壞右之家都未能幸免，知青中黑五類子弟不少人也上了黑名單。8 月 17 日，長沙知青王百明和一個知青朋友在飯店吃早餐時，四個端著烏銃的農民沖了進來：“誰是王百明？”王百明回答：“我就是。”“地主崽子王百明！”轟！轟！轟！一連串的鐵砂彈在王百明臉上、身體裏炸響，頓時鮮血噴濺，全身烏黑，當即死亡，年僅 22 歲。

王百明何許人也？長沙市第三中學 62 屆高中畢業生，紅雲詩社主筆，連考三屆大學，因出身問題，皆不被錄取，1964 年下鄉。江永縣成立知青文藝隊時，因才華出眾，成為文藝隊的一員。王百明的父親，解放前夕為岳父買了一張去臺灣的車票并將他送上火車，共產黨接管政權以後被判刑坐牢幾年，以後每逢運動都是鬥爭的靶子，最終癱瘓在家失去工作。下鄉後的王百明對農村生活表現出極大熱情，他的一首長詩《新農民之歌》，寫得激情澎湃，在知青中影響很大。1966 年秋，以零陵地委書記寧生為團長的調查團來到江永，對知青的安置工作進行考察。持正反觀點的人有過幾場大的辯論會，王百明就知青問題發表了個人觀點。他以事實為依據深入闡述，令持反觀點的人瞠目結舌。1967 年春節，江永縣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頭頭為名，將王百明逮捕入獄。

王百明慘死的當天，消息傳遍各大農場、各公社知青點，長沙知青極為震驚，悄悄地聚攏商議，不能坐以待斃，在當時已經荷槍實彈的民兵到來之前，只能逃跑。當晚，六千長沙知青的大逃亡拉開序幕。

8 月 19 日，零陵地區的長沙知青 9 名死于槍殺，15 名受傷，連接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橋被炸毀，對外聯絡中斷，長途汽車停開。江永大橋炸毀以後，從道縣往永州成了一條回長沙的捷徑。白水公社臨近道縣，先有一隊人僥幸混過去了，第二批走的 4 名男生險些丟掉性命。他們搭上一部過路郵車，在暴亂中心壽雁被抓，關了 6 天，每天慘遭一撥一撥民兵毆打。命懸一綫時出現了奇跡，當地人認出了他們，找來一駕馬車，裝滿稻草，將 4 人藏進稻草裏戲劇性地救了出去。獲救後，他們寫信給留在白水的知青：“我們被抓，生死未知，千萬不要再走這條路。”白水知青接信後馬上找到 6950 部隊的政委，請求派人去道縣營救遇難者。一位剛新婚的連長和幾名軍人到達道縣，在制止兩派的鬥爭中，那位新婚的連長不幸罹難。軍人之死堅定了部隊官兵制止暴亂的決心，加強了對知青的保護。

王百明死後的三四天裏，京廣綫沿途的郴州、衡陽、株洲以及廣西的全州等地火車站所有的

月臺上，全被逃難的知青占據了。大逃亡是知青情緒的大爆發，壓抑幾年的原罪意識徹底清醒了：黑五類子弟何罪之有？知識青年何罪之有？他們憤然而起，沖向列車，用石頭、扁擔砸車窗玻璃，不顧死活地往裏爬。火車時開時停，他們被當成暴徒遭驅趕，被機槍團團圍住。知青大逃亡大致分為三路：一路經道縣翻雙牌山去廣西全州；一路走麥嶺；一路翻過都龐五嶺去廣西灌陽。翻越都龐嶺的多是井邊公社和大遠公社的知青，當地人和廣西灌陽的農民有一條往來的山路，因人迹罕至，只有本地人知道，翻過五座山嶺就到了灌陽。井邊知青先是十幾人同行，沿途又彙集各路零散知青四十多人，山上叉路多，走到懸崖絕壁時幸遇灌陽方向來的山民指引，雖幾遭民兵攔截，幾位領頭的知青沉著冷靜、機智應對，又有公社開出的紅頭證明作保，一路算是有驚無險。

走了一天一夜後，隊伍中一個女生虛脫了，說：“我再也走不動了，你們別管我，快走吧。”說著身體直往地上倒。“這哪行？既是一起出來就得一起回去！”領頭的周哥牽起她的手，另一名男生黃哥在她身後護著，倆人一前一後，不管山路多險，都未將她拋下。有一對戀人，女知青體弱，爬上一千多米高的都龐嶺已經拼盡了氣力，再也無力連翻幾座山嶺；男生挑著兩人的行李，還要關照體力不支的女朋友，累得咳血。隊伍中一個不滿周歲的孩子，在母親懷裏不時發出饑餓的啼哭。走其他路綫翻山越嶺的知青并未如此好運，遭遇民兵的突然襲擊挨打之事時有發生。為躲避民兵的搜捕，很多人專抄荒草荊棘小道走，弄得遍體廝傷，衣不遮體。

8 月底，歷經千難萬險的六千知青終於從各路回到長沙。蓬頭垢面，拖著襤褸行李的人，三五人一組，幾十人一隊，既看不出年齡，也難分出性別，爬煤車爬貨車回來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長最初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孩子，看見就落淚。

回城知青為王百明等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會後，上萬人的游行隊伍凝成的巨大悲痛，給動亂中的長沙增添了一層厚厚的陰霾。政府為了安撫知青，每人每月發了 9 元錢、30 斤糧票。10 月 8 日，中央安置辦下達了 10·8 通知，要求知青回農村抓革命促生產，不要逗留城市，各級領導開始勸導知青回鄉，並對其父母施加壓力，長沙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針對知青的巨幅標語：“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各區派出所公開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三四百人，關起來然後用大卡車送回江永。知青家長敢怒不敢言，只能含著眼淚為子女做返鄉的準備。10 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被迫返鄉，部分人躲藏下來，隱藏在長沙的河碼頭、建築工地，有的投親靠友遠走他鄉，如新疆、雲南、貴州。重回江永的知青，不少人被捆綁毆打。1968 年底，江永知青紛紛轉點到沅江、瀏陽等地，匯入 1968 年全國上山下鄉運動的洪流之中。

20 世紀 80 年代初，王百明的母親收到了法院送來的一紙通知：“經重新審查（王百明的父親），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錯案，現予以撤銷。”沒有一句道歉，沒有任何撫恤。

---

1966 年，青島一所中學的師生高呼破四舊的口號，將位於青島李村的“保皇派頭子”康有為的墓刨開，說是要“拉出來示眾”。康有為的骸骨被裝入一輛翻斗車，游街示眾，一邊游街一邊鞭撻。康的頭顱被送進“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標籤上寫著“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康有為的狗頭”。

---

從造反少年到楹聯大家 方 舟

1954 年劉作忠出生在荊州西北 30 公里、沮漳河畔的小城萬城。小城只有一條四五百米長、1 米左右寬的青石板小街，小城四周湖塘溝渠密布，蘆葦叢生，交通極為不便。童年時的劉作忠，見到一輛汽車有如見到天上掉下一顆星星。許多時候，劉作忠獨自坐在河邊發呆：小河呀你流向何方？你的盡頭是什麼模樣？劉作忠自幼聰明，他三年級寫的作文被六年級的同學作為範文。可是因其父解放前輪流當過 3 個月的保長，評三好學生沒份，少先隊也將他拒之門外。有一年冬天，冰天雪地，學校喂養的幾隻羊沒有草吃，餓得直叫。劉作忠和另外一個出身不好的同學從尺把厚的冰雪地裏拔回青草，救活了小羊，學校領導為之感動，“破格”吸收劉作忠為少先隊員。

1966 年文化大革命，12 歲的劉作忠小學沒畢業就失了學。他把一腔仇恨全都傾瀉于自己的“反動家庭”。在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姐的支持下，劉作忠用“萬炮齊轟萬惡的爺爺 XXX！革命烈火燒死反動的父親 XXX！”的大幅標語把自家門封得嚴嚴實實。本家幾位爺爺、伯伯、叔叔氣憤不過，撕掉標語要揍他，他提著破褲子，拖著露腳後跟的棉鞋，邊跑邊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1970 年開始大規模“三綫建設”，16 歲的劉作忠慶僥幸以“基幹民兵”的身份前往焦枝鐵路工地做工。為了洗刷家庭“歷史污點”，他沒命地幹活。一次，營部組織大家到深山扛木料，風雨交加，山路崎嶇，劉作忠扛著一棵兩三米長、20 公分粗的梨樹本來就够艱難的，可他看見一位身體瘦弱（實際年齡比劉大）的同事扛一棵樹十分吃力，就接過來扛上。又一次，劉作忠撬一塊大石頭，不幸折斷了左臂，同事們將他送到醫務室治療。幾天後，傷痛稍減，他就吊著胳膊咬著牙又去挑砂石。雖然劉作忠勤懇工作，但評優總輪不到他，原因很簡單：黑五類子弟能到三綫建設工地已是相當的恩典。

很長一段時期，劉作忠與一位其父曾是黃埔學校 13 期學員的知青同住一所廢窑。每年招工、招生、徵兵之際，別人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兩個黑五類子弟只能躲在一邊偷偷流淚。不過，兩人也有共同樂趣：從廢品收購站偷回一本本殘破不全的書刊，共同閱讀、共同討論，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曹雪芹、魯迅、莎士比亞、高爾基等人的許多作品，就是這樣讀到的。劉作忠在廢窑門口寫了一副對聯：“未能一日寡過；恨不十年讀書。”

1975 年，劉作忠命運發生轉機，被招工到本縣正在籌建的一家工廠。劉作忠一根竹根一頭挑著裝滿書籍的木肥皂箱，一頭是被子衣物，沿著泥濘小路奔向縣城。正是“突出政治”的年代，劉作忠決心書寫得好，朗誦詩歌有感情，于是他的 8 小時以外全部有了用場，後來又從車間調到廠黨辦專門寫寫畫畫。這個廠當權者并不真正重視人才，劉作忠的入團申請直到 27 歲才批准。劉作忠後來說：“11 個月團齡是我半生中唯一的榮譽呀！”這位當權者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手下的人文化水平不能超過他。他本人僅讀 4 年小學就去當了店員，劉作忠利用夜晚和節假日到離廠區 10 多公里的工人文化宮補習文化，這位當權者很反感，說：“工人嘛，應該老老實實做工，學習文化是學生的事，如果繼續下去按曠工處理！”為了保住飯碗，劉作忠屈服了。在此期間，劉作忠精心編纂了廠史，是本縣第一部，也是全省小氮肥戰綫第一部廠史，受到行家們的好評，縣裏決定抽調他編縣志。

進入 80 年代，中國特有的楹聯文化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重視。1983 年，在青海省地質礦產局助理工程師常江（後為中國楹聯學會秘書長、中國地質大學教授）的積極倡導下，通

過上海《八小時以外》雜誌，全國一批楹聯愛好者自發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楹聯學會。劉作忠是發起人之一，他首先發出“搶救國寶（楹聯），振興聯藝”的吶喊。中國楹聯學會以“搶救、發掘、繼承、普及、提高”為宗旨，決心編輯一套《中國楹聯大全》，後稱《中國楹聯集成》，以填補中國文學史一項空白，劉作忠自告奮勇承擔了湖北部分的搜集、整理工作。他騎著自行車，先在本地跑，再到鄰縣市，後來越跑越遠，連準備買棉衣過冬的錢都用完了，直到最後留職停薪。

知子莫如父。尚未脫貧的老父親送來了養雞賣蛋積攢的 100 元錢、90 斤糧票，說因為我的歷史問題你未能讀初中，這點錢，就算給你補交學費吧！做臨時工的妹妹也從嫁妝費中擠出 200 元錢塞到他的口袋裏，說：“人活著，除了吃飯，應該為社會做點有益的事！”劉作忠帶著親人們的深情厚意繼續上路。這是一次前無古人、個人自發、自費搶救、發揚民族文化遺產的萬里長征，創造這個奇迹的是一位僅有小學學歷、月薪僅 30 多元人民幣的普通工人。

前後四年，劉作忠三進三峽，十度漢水，東進大別山，西攀神農架，南登幕阜山，北陟大洪山、桐柏山，足跡遍及湖北全省的每一個角落，行程四萬餘裏，僅鞋子就磨爛了 3 雙。他從高山陡壁、寺觀碑亭上，從 3000 多位各界人士的口述中，從 2800 多卷地方志書、筆記、抄本裏，搶救、發掘出數以萬計的湖北地方楹聯和數千萬字的湖北風情史料。劉作忠談到這次數萬里采聯的艱辛，說：“我沒有死於大別山的毒蛇之口，沒有被荊山的山洪沖走，也沒有從武陵山的懸崖上摔下來，巫山的塌方、大巴山的撞車都能幸免。我承受了自然界的風霜雨雪和人世間的白眼、嘲諷、鄙夷。錢花光了，腳走爛了，我一度彷徨過、猶豫過、後悔過，但終究一一戰勝了。”劉作忠滿載而歸，等待他的不是鮮花，妻子不堪貧困和寂寞，帶著愛女離他而去。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新聞界和廣大楹聯愛好者却一直關注著劉作忠。劉作忠在湖北各地艱難跋涉期間，全省幾乎每個市縣的媒體都報道了他的行踪。《湖北日報》在一年內 6 次報道他，並且專門為他發了《內參》。《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等數十家新聞單位也先後報道了劉作忠的事跡。人們譽之為“一代奇男”、“訪對覓聯第一人”、“楹聯痴士”。許多認識或不認識的同道向劉作忠伸出友誼之手，使他終能從困境中逐步解脫。1986 年，經一批政協委員的舉薦，劉作忠從企業調入沙市市（荊州市）政協擔任專業文史編輯。12 年來，劉作忠主持編輯、出版了 16 本地方史志書刊，個人獨力出版 4 部專著，中國楹聯學會評他為全國“聯壇十秀”，《人民日報》、《臺灣日報》和美國《星島日報》等數十家報刊、電臺、電視臺先後報道過他的事跡，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主編的《國際傳記辭典》和韓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家辭典》均有“劉作忠”專條。

有一次，我們一班小孩子吹牛，都說自己家裏有什麼什麼，一個大概四五歲的男孩子說：“我家裏有個手榴彈！”有小孩回家告訴了家人，第二天他那做鐵匠的爸爸就開始被拉出來批鬥，家裏也被挖地三尺，批鬥整整持續一年多，人也被折磨得幾乎殘廢了，當然也沒在他家裏搜出什麼手榴彈。當年批鬥的情景現在還歷歷在目，給我的心裏帶來極大的陰影，直到今天也無法磨滅。怎麼人性可以扭曲到這種程度：針扎手指，木棍捅肛門，灌辣椒水，無所不用其極！至于拳打腳踢，更不在話下。這絕對是華夏有史以來最史無前例的荒唐歲月。

我的三座大山 楊文華

我出生在一個佃農家庭，是六十年代馬橋中學的優秀學生幹部（團支部書記）。當年成績遠不如我的同學，有的當了縣官，有的去了美國，而我却因社會關係複雜、身背三座大山（大舅是大刀會堂長被槍斃，二哥是國民黨青年軍，三哥是“叛國投敵”勞動教養）而被學校清除。本人原本是一張白紙，可以寫最新的文字、畫最美的畫，可是因政審這道坎，當兵、招工、升學、當民師、做生產隊會計都與我無緣。我沉沒在龐雜的農民隊伍裏，并被農民踩在脚下，過著孤獨、惆悵、被歧視，連遇到貧下中農的豬狗都要讓道的生活。中學時老師上政治課，說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統帥，聽起來如同吃木瓜不知其味，現在終於領教了。

毛時代的農村有個順口溜：“寧跟八十歲手提包，不嫁十八歲扶犁梢。”貧下中農子女的婚姻價值觀尚且如此，黑五類之家配偶就更難了。當時稱黑五類子女嫁娶是“破床墊稻草、歪瓜配裂棗”，許多人家不得不換婚。我們這裏有一個長相很漂亮的地主女兒，被大夏村治保主任夏世良霸占。地方共產黨組織以“階級路線不清”將夏開除出黨，并撤銷其職務。夏世良竟拿地主女兒出氣，用剪刀戳穿她的手掌，逼得她尋死上吊。

我本人有幸從毛時代的十八層地獄裏活了下來，并與一個同病相連的地主女兒結成夫妻，于是災難又危及下一代。如今已是美國公民的女兒，幼時因吃不飽、穿不暖，常常鬧病。有一次發高燒，危在旦夕，夜黑風高，我怕病孩經不起風寒，就去三裏外的醫院請醫生上門出診。醫生剛背上出診箱，就遭到院長當頭呵斥：“是誰讓你出診？不就是一個黑五類家的子女嗎？有這麼高貴？要死就讓她死去，不准出診！”孩子命大沒死，到了上學讀書的年齡，心靈又遭受重創。她的童年如同賣火柴的小女孩，孤單、迷茫、淒涼，常常回家暗自流淚，又耐不住向父母發問：“為什麼我就戴不上紅領巾？”“為什麼老師不罵別的小朋友，總是拿我出氣？”每逢孩子這樣問，我這個父親就心如刀絞，恨不得寫遺書自殺。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俯身貼著英姿颯爽的女紅衛兵宋彬彬輕輕耳語了一句“我看你的名字還是要武的好”，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神州大地迅速刮起一股改名換姓的紅色旋風。短短幾天，凡與所謂封資修搭得上綫、挂得上鉤的名字，都得忍痛割愛順應革命潮流改了。那個把月，派出所戶籍人員忙得連撒泡尿的功夫都沒有。短短一個月時間，新改的名字如同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清一色的全都蒙上厚厚一層革命含義，叫起來格外響亮，聽起來格外清脆，像什麼衛東、護紅、興無、滅資、煉鋼等等，人們仿佛置身于熊熊燃燒的革命大熔爐中。廣西有一位化學老師，姓塗，父母起的名字本來不錯，念起來文縐縐的，給人一種高雅舒心的感受，可對照當時的革命標準，這種名字毫無疑問屬於封資修的殘渣餘孽。為了順應革命潮流，儘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一輩子安分守己，從不趕時髦的塗老師，此時也不得不趕時髦，把自己好端端的名字違心地改成“革命”。姓名連讀，“塗革命”成了“圖革命”。紅衛兵小將不答應了，聲稱要徹底造塗老師的反。他們說，你這改的名字分明就是投機取巧，企圖圖革命之機，投革命之巧，是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再不趕緊改過只有死路一條。塗老師聽了，嚇得屁滾尿流，語無倫次，連水的分子式怎麼寫都忘了。當晚七點，塗老師半正式發表聲明，鄭重宣布恢復原名。塗老師出身絕對赤貧，苦大仇深，“解放前”家徒四壁，是“新中國”乃至全世界無產階級依靠的中堅力量。改名之錯，在全體學生面前檢查交待幾次就過關了。塗老師接受此次改名的教訓後，不久即成為廣西最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一名成員。

母親想下毒 李建強

我出生于大饑饉之後的 1964 年，懂事時文革已呈癡狂之勢，記憶裏最早、最可怕的事是聽

村頭高音喇叭的聲響。喇叭一響，母親便會嚇得臉色蒼白、雙手發抖，菜刀切住自己的手指，指使我“去看看，是不是又要開批鬥會啦”。我常常跑出門去，不用到門口，立即就會驚惶失措的跑回來，後面跟著一幫被當時的老百姓稱為“文攻武衛梆子隊”的人，他們是來揪鬥我爺爺的。

我的家鄉在青島遠郊，大沽河的東岸，膠濟鐵路的北側，內戰時期一直是國共兩黨精銳軍隊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1947 年秋，我爺爺開酒館外出要賬，因為喝醉了酒躲避不及被國軍抓了壯丁，三天后在老鄉幫助下逃回家來。這本來算不得罪過，因為常年戰亂，家鄉兵匪如毛，有的人甚至共軍、國軍、皇協軍還有叫不上名堂的游擊隊統統幹過，村裏沒有當過兵、沒有歷史問題的人就像玉米地裏的高粱一樣，分外現眼，爺爺他們反而“泯然衆人矣”。

可偏偏我父親是村裏最大的走資派——大隊書記，雖然此時已經拱手交權，造反派爲了鞏固勝利果實，不能不拿我爺爺的“歷史問題”開刀，意在批臭老子，株連兒子，將我們李家永遠趕出沙梁村的“政治舞臺”。知識界人士印象中的農民形象一直是憨厚、樸實、最多再加一些頑固和愚昧，其實，在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即便是農民，一旦與權力和政治有染，也立即會變得陰狠狡詐、歹毒凶殘。父親爲人清廉，年輕能幹，群眾威信很高，他們沒辦法搞倒我父親，只好在我爺爺的問題上做文章。

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爺爺的問題突然升級，由歷史反革命變成歷史、現行雙料反革命。原來有人告發我爺爺咒罵毛主席，這在當時是殺頭大罪，而且將株連全家。爺爺是個瘦弱的老頭，個子不高，滿臉皺紋，咳嗽起來驚天動地，母親總擔心他一口氣上不來憋死。每次開批鬥會，爺爺都會被揪到學校操場上的高臺子上，彎著腰，撅著屁股，脖子上挂著木牌子挨批鬥。即使是炎熱的夏天，爺爺開批鬥會也要穿著黑棉襖，母親說，穿棉襖，挨木棍時痛得輕一些。指控爺爺咒罵毛澤東是比他當歷史反革命更冤的冤案。不管是抓壯丁還是自願參加，爺爺畢竟當過三天國軍，說他歷史反革命還有點因由（其實爺爺何嘗知道什麼革命反革命），但說他咒罵毛主席用我們家鄉的話說純屬“沒有鹽做出醬來”。

我伯父五十年代參加了共軍，駐扎北京，常常幾年不能回家探親，爺爺想念兒子，酒後罵街：“當了八路連爹都忘了，什麼東西！”這本是抱怨兒子的話，十年文革，到了別有用心地人嘴裏成了罵八路，後來又成罵共產黨，最後變成罵毛澤東。爺爺被誣陷爲現行反革命，我們家好像一下子陷入了滅頂之災。在學校宣傳隊的姐姐被老師通知不准再演節目了，哭著回家告訴母親，我看見母親一聲不吭，臉色煞白，嘴唇咬出了血印子。後半夜，我在迷迷糊糊的睡夢中被一陣哭泣聲驚醒，聽到母親跟父親商量什麼。性格剛烈、倔強的母親說：“當了反革命家屬，孩子們連地主的子弟都不如，不如一把耗子藥包到餃子裏，全家死了乾淨。”父親沉默不語，埋頭抽煙，在明滅的煙斗火光中我看見了他鐵青的、被痛苦扭曲的臉色。我嚇得不敢發出一點聲響，緊緊咬住被角，只有 5 歲的幼小心靈一下子被巨大的恐懼吞噬了。第二天開始，我拒絕吃任何東西，也拒絕跟母親在一起，我總是緊緊扯著姐姐的衣角，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姐姐覺得奇怪，反復問我，我閉口不言，這個差點吞噬了我的生命的關於恐懼的秘密，我一直保守了 35 年。

後來，雖經造反派反復折磨、拷問，爺爺到死也沒承認自己罵過毛澤東，這頂反革命家屬的帽子也最終沒有給我家戴上。母親多次說，你爺爺做了一輩子糊塗事，臨死的時候做了一件明白事，不然咱全家都完了。

血泪家史 王文怡



我出生于 1958 年。我三個月大的時候，有一天，在外地工作的姥爺突然請假回家了。他囑咐這個要聽話，那個要注意身體，臨走時，姥爺抱著我看了很久，突然說：“這孩子什麼時候才能長大啊？”說完他流下了眼淚。第二天媽媽接到電報，說姥爺喝鹵水自殺了，死時才五十多歲。媽媽和姥姥哭成了泪人，別人說姥爺是“自絕于人民，死有餘辜”。原來 40 年代初，姥爺為養家糊口曾開過鐵匠鋪和器械修理廠，駐扎長春的國民黨部隊曾來他的工廠修過槍。50 年代後，共產黨實行公私合營，姥爺把自己的工廠歸公了，但他的工廠曾替國民黨修過槍支的歷史却被人揭發出來了，于是姥爺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姥爺是個耿直內向的人，別人逼他不停的交待檢討是“如何幫助國民黨殺害共產黨人的”，姥爺說不出來。共產黨整人的時候，就是想用暴力讓人產生恐懼，最後屈從。可憐的姥爺被毒打得受不了了，但他又不願屈從，最後被逼上了絕路。

我三四歲時趕上大饑荒。父母都是國家幹部，忙著大煉鋼鐵，沒時間照顧我，就送我上吉林醫大托寄宿幼兒園。這是一個聞名全省甚至全國的先進單位，經常上報紙、廣播。先進幼兒園的孩子們既要過“豐衣足食”的生活，又要壓縮糧食消費，怎麼辦呢？幼兒園就天天讓孩子們吃麵條和麵湯。我和很多全托班的孩子吃到後來，就這樣吃傷了，一見面條就開始反胃和大吐。最嚴重的時候，一提麵條二字，我就有嘔吐反射，害得自己經常餓肚子，實在沒辦法，幼兒園只好讓我回家。我就此落下不敢吃麵條的毛病，直到上大學，這個嘔吐機制才減弱消失，逐漸恢復正常。

文革開始不久，平靜的家中起了巨瀾。我們一直敬重的父親，一夜間成了歷史反革命，挂上大牌子，接受隔離批判。只有八九歲的我，一下子被父親的遭難弄暈了。父親在工作單位和鄰里鄉親中一直被大家公認是個大好人，為人認真耿直，工作上奉公守法，從不搞歪門邪道，在財務科工作多年，主管報銷。由于他在原則上不退讓，按章辦事，不講情面，因此得罪不少人，朋友同事送給他個綽號“王認真”。

父親剛被隔離時，大人瞞著我們姐弟二人，我就跑到奶奶跟前問究竟。爺爺家以前很有錢，是個掌櫃，爸爸小時候還請老師到家裏來上私塾。後來爺爺不幸去世，家裏的錢很快花光了，奶奶帶著四個孩子，生活非常艱難。27 歲守寡的奶奶，本想把孩子拉扯長大，自己守節從一而終，沒想到 50 年代後，共產黨強制把奶奶分給一個貧農光棍作了媳婦。那時叫“共產共妻”，娶不到媳婦的，共產黨給你分一個。直到 1956 年，奶奶才被爸爸用錢“贖”了出來。在我記憶裏，知書達理的奶奶一向是沉默寡言，拿著一本《雷鋒的日記》讀，更多的時候沉思不語，以泪洗面。

奶奶告訴我，父親小時候上了一段時間私塾，由于爺爺意外死去，家裏生意破產，父親也斷了學業。為了實現繼續上學的願望，他隻身跑到北京西單打短工賺學費。這中間，國民黨憲兵軍官學校到北京招生，父親聽說報考軍校不用交學費，就二話沒說跨進憲兵學校的校門。按照共產黨的邏輯，進過國民黨軍隊的軍校，這就是歷史反革命。

被隔離天天做思想檢查的父親，不久被造反派叫去，說是給個“立功贖罪”的機會，讓他為造反派雙方抄寫大字報。那個年代每張大字報的開頭，都必須寫上“敬祝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抄寫時間長了人有疲勞反應，一天，父親抄寫錯一個關鍵的字，將“萬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大字報被貼出 14 天后被發現，一時間親朋好友都有一種黑雲壓頂，末日來臨的感覺。果然，對父親的迫害陡然升級，動不動就被拉去痛打一頓，很快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母親時常被拉去陪鬥。最後父親被判到農場

勞改，每天除做農活外，還接受群眾的公開批判。

我和年幼的弟弟也經歷許多生活磨難。父親剛被隔離的那段時間，我天天到群眾專政委員會(簡稱群專)給父親送報紙，路上或其他公共場合，經常被一些半大的孩子圍追著喊“反革命狗崽子”。起初我常常不知如何應對，背地裏去抹眼淚。過去常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都明顯冷淡了。一次，不到六歲的弟弟被一群十幾歲的男孩子們圍毆，謾罵，為躲避挨打，嚇的竟爬到樹上躲避。我聞訊趕到想去解圍，換來的只是譏笑，辱罵。情急中，我撿起半塊磚頭，向領頭的砸去。孩子們一轟而散，驚恐萬分的小弟下來後嚎啕大哭。

民兵連長李某人一聲長喝，兩個年輕人把五花大綁的地主崔善和他老婆從後臺帶了上來，架起飛機。民兵連長穿著一雙軍綠色膠鞋，踏住崔善的脖子，讓他低頭。崔善的老婆會意，主動低下頭，她不想有一隻腳再踏上自己的脖子。伴著一陣陣口號，崔善被吊上房梁。崔善開始哼哼唧唧，下面有人開始笑：“還沒打就哼哼了！”人們往他身上扔東西，忽然有人喊：“還有地主婆呢！”民兵立即吊地主婆。她很胖，很白，吊上去的時候，臉上沒一點血色了。崔善這時明顯有些激動，對民兵連長說：“女的，你就放過她吧！”顯然沒有用。那時人們仿佛更恨地主婆，大約是雷鋒的故事鬧的。六十歲的老太婆殺豬似的叫起來，還罵那個吊她的年輕人小毛。崔善哭著說：“小毛小毛，你回去問問你娘，你出生時家裏沒米沒柴，是誰給你家裏送的柴米啊，沒有婆婆去救你，你還能活到今天哪！你放下她來，你這個雜種兒(這是句親切的罵語)！”崔善自己挨打時從來不吱聲，看見老婆這樣受罪，竟說出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話。小毛有點驚慌，不知所措地握著繩子。現場氣氛有點不對，民兵連長怒了，從小毛手裏搶過繩子，猛地扔向天空，大喊一聲：“叫你鬼叫！”地主婆應聲落地，昏死過去。人群立即靜止下來，崔善在空中昏了過去。幾個小孩嘀咕著：“死人了，死人了，快跑！”人們慢慢散了。崔善的兩個兒子來把父母背了回去。崔婆婆因為比較胖，摔傷了，沒死。

#### 一位政協副主席的誕生 胡椒粉

某市政協副主席，退休後隨兒女定居澳洲。這位副主席出生於一個官宦家庭，其兄長是國民黨軍官。父母雙亡後，兄長隨國軍撤到臺灣，陰差陽錯地把他一人留在大陸。由於兄長這個海外關係，他只能小心翼翼過日子，多年來一直是普通職工和基層幹部。改革開放，他們那個偏遠小城突然要引進外資，市委書記說，要充分利用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回國投資的熱情來加快四化建設，于是他因這個海外關係被調到市統戰部，最後當上政協副主席兼統戰部長。在政協當官沒有什麼權力，但養尊處優，比起改革前誠惶誠恐的日子好多了。那時，每當政治運動來時，他就恐懼到極點，好幾次被列為批鬥對象，但每一次都有驚無險地渡過，最終都幸運地從黑名單裏被剔除而免遭批鬥。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有一門特殊的手藝，刻寫鋼板臘紙。他當年刻寫的鋼板臘紙像印刷體一樣，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他不但能刻寫還能畫毛像和寫大標語。那時街頭廣場的大型毛像不是印刷的，而是人工畫出來的。畫毛像是一件難度極高的事，不但要畫得像，還要注意牆壁的質量，灰沙的含量，甚至底色油漆也講究。天長日久，難免油漆剝落，千萬不要先從臉部剝落，出現缺鼻子少眼睛就麻煩大了，弄不好會人頭落地。他努力練就這些手藝，幾乎到了完美的程度。因為他清楚，一旦在這方面有人比他強，或略比他差一點，但對方根正苗紅，他就可能被取代，成為無用的人。一旦無用，命運不言而喻。

二戰時生活在納粹集中營為德軍製造軍需品的猶太人，每天都看到有同胞被拖出去槍斃，只

有那些努力工作的猶太人，儘量顯出自己的技能，才不會被拖出去。每當聽說德軍打勝仗時，他們就高興，因為又要加大生產，他們更被需要了，而每當聽說德軍戰事不利，他們反倒恐慌，雖然這才是他們真正的解放之路。這位副主席當年也與這些猶太人類似。所不同的是，猶太人是被拖出去槍斃，而他們則是被拖出去批鬥。這位副主席至今仍記得，有一次他因蹲廁所蹲歪了一點而僥幸滑過一場批鬥。那次單位要批鬥七、八個人，加上一直需要他刻蠟版的那位領導出差在外，無人“保”他，他被列為其中之一。負責抓他去批鬥的人來到宿舍找他，不見人，同宿舍的人說他上廁所了。來人到廁所找，沒找到，爲了不耽誤，只好先批鬥其他人，下次找到再批。

其實當時他確是在廁所，正蹲在最裏面。當時單身宿舍的廁所和外面的公廁一樣，蹲位是沒有門的，側面的一半有一矮牆，全部蹲位成直行排列，一眼就可以看完。即使蹲在最裏面，探身也能看到。但那天他偏偏蹲得歪一點，大概是小腿疼或什麼原因，這一歪蹲廁所竟躲過了來人的視線。下一次批鬥會，他沒有列入被批鬥名單。大概那位領導出差回來了，抑或革命形勢變了，要批另一類人。

事後得知，因海外關係，他被掃進黑五類中的反革命行列，不是現行反革命，也不是歷史反革命，而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次我被批鬥，我絕不會有今天的地位。”這位副主席說：“那年頭，一旦你被批鬥過一次，之後所有的批鬥都會有你的份。”黑五類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不會有人冒險爲你個人平反，于是你就永遠回不到革命隊伍裏來，更別想提工資或升遷什麼的。即使你有手藝，是革命需要的人，但性質變成“被監督勞動”了。就算熬到“改革開放”，最多也是給你來個摘帽，而不會讓你連越幾級成爲革命幹部的。

---

土改時廣東省潮陽縣棉城鎮的一個池塘，天天有浮尸，地主全家老幼綁著繩子自殺，弄得那個池塘的魚好久無人敢吃。

---

#### 劉雨濤的土改和反右 譚 松

劉雨濤出身在四川省崇慶縣一個耕讀傳家的知識分子家庭。明末清初，劉雨濤的祖輩從湖北麻城縣孝感鄉遷來四川。高祖（爺爺的爺爺）是打長工出身，在一個姓高的地主家幹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兒嫁給他，由此起家，那是家裏瓷碗上還有“高”字。到曾祖父和祖父時，家裏就有點錢了。1940年春，劉雨濤考上成都中學高中部。他很喜歡文史哲方面的書籍，以北宋理學大師張橫渠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作爲自己的座右銘。1943年秋，劉雨濤考上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指導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東美先生、宗白華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還有著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先生。蒙先生文革時是四川大學的教授，紅衛兵把他鬍子剪了，鬥爭、毆打他，臉上被打得青一塊紅一塊，很快被折磨死。

土改時劉雨濤在崇慶縣中學教書，家庭劃爲地主。父母被抓起來關到大隊部，說他們家做了很多違背農民利益的事，要賠償20擔米。一擔米是320斤，值200元，20擔米就是6400斤，4000元錢，父母賠不起。劉雨濤被從學校叫去，剛說一句“農民弟兄們”，馬上被打斷：“不准喊‘農民弟兄’！要喊‘農民老輩子’。過去你喝農民的血汗，農民供養你上了大學，農民是你的老輩子！”劉雨濤只得喊“老輩子”，並答應賠錢。當時教師工資是200斤米一個月，劉雨濤根本賠不起。劉雨濤的妻子很好，把她的100多個銀元，還有金戒指、

金項鏈等等全拿出來折成價，再加上親友們寄來的錢，才把這 4000 元錢交清。但是，他們還不滿足，還要壓榨錢。他們把劉雨濤的父親吊起來打，雙手吊殘；母親也被吊打，右手吊脫臼。土改工作隊挑動農民鬥地主，鼓勵農民動手打。工作隊的那些人，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農民就是他們的幫凶。

劉雨濤有個妹妹高中畢業後在崇慶縣一個小學教書。那天，農民武裝隊背著步槍，押著劉雨濤的母親到小學找劉雨濤的妹妹拿錢。她的手被吊斷了，一路走一路呻喚。剛到那兒，農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劉母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刺激。妹妹沒得錢給她，劉母又被押回來。回來後，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絕望，已經沒得錢了，交不出還要吊，還要打，怎麼辦？

劉雨濤的父親關在大隊部，劉雨濤的妻子每天提個籃子給公爹送飯。那時婆婆喊媳婦喊“女”，那天劉母說：“二女，今天你不要給爸爸送飯，我去送。”天快黑的時候，劉母提著籃子出去了。她穿過幾塊胡豆田，到了小河邊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準備好的一根繩子把自己的手腕綁住，另一頭系在樹枝上，然後身子翻過來，將頭埋在水裏，強迫自己嗆水而死。她用繩綁住手腕，是怕水把屍體沖走。後來他們放了劉雨濤的父親，劉雨濤全家被趕出來，遷到河邊一個農民家裏。劉雨濤的伯父劉祖宣也是地主，土改時被槍殺。

劉雨濤說，四川省土改冤死幾十萬人，這個賬應當算在鄧小平名下。1949 年 12 月至 1952 年 7 月整個土改時期，鄧小平主政西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他的政策很左，四川土改搞得很血腥，有幾十萬冤魂，債主就是鄧小平。1997 年他去世後，美國之音說鄧小平一生有八大罪惡，1949 年前的四個劉雨濤已記不清了，1949 年後的四個中第一就是土改，第二是積極搞反右鬥爭，第三是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鎮壓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如關押魏京生），第四是 1989 年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下令用坦克機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1957 年反右運動時，學校開會叫大家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劉雨濤根本沒敢提母親自殺、伯父被槍斃的事，半點都沒提，只對共產黨要反宗派主義表示了贊同。劉雨濤在崇慶縣中學教書時，學校對教師在政治上分好幾個等級，等級低的，不管他們業務水平如何，都受排擠。學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師，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只因是民盟成員，就把他們統統調走了。劉雨濤提出不該這樣做，把這些有本領的人擠走是教育的損失，也是崇慶縣的損失。劉雨濤因此被劃為右派，說他要分裂共產黨。劉雨濤說：“我一個書生，關心教育，我咋個分裂得了共產黨？”幸好他沒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就會被劃成極右，以後幾十年的日子就更悲慘了。

---

上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我上小學和中學，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折騰最厲害的時候，我們的鄰居是個地主，經常被批鬥。我至今不知道那個地主的大名，只記得大家都叫他汪爪，大概因為他手掌大、指頭長吧。每次批鬥，戴高帽子，掛黑牌子，汪爪一喊即到，老實配合，低頭哈腰，想怎麼折騰就任憑你折騰。可是革命群眾一讓汪爪交代如何剝削貧下中農的罪行，汪爪就吞吞吐吐說不出來了。我外婆是汪爪的老街坊，悄悄告訴我，汪爪這個地主是剛花錢買來，還沒顧得上剝削就土改了，所以說不上來剝削的事。解放前汪爪做小買賣，一家人省吃儉用，是附近有名的老樞。樞到什麼地步？外婆舉了幾個例子，說汪家晚上從不點燈，一天三頓喝粗糧稀飯，也蒸黑窩窩頭，喝了稀飯，每人發一小塊窩窩頭，把碗裏粘的稀飯擦乾淨吃了，衣服更是補丁蓋補丁，過春節也捨不得吃頓餃子。就這樣年復一年，汪爪積下一些

銀圓。1948 年初，有些地主的子女在外上學，往家捎信說北邊解放區已經土改分地，勸說家裏趕快賣地，不管貴賤，越快越好，否則到時候一個錢見不到，還要劃成地主挨鬥，于是地主紛紛低價拋售土地，而汪爪一個做小買賣的，信息不靈通，一看地價這麼便宜，就一下子買了 80 多畝地，想和家人到鄉下種地。誰知道剛買了不久，這裏就解放了。前幾年我們那條街道拆遷，汪爪配合得最好，第一個主動簽協議。也許他還心有餘悸，也許早把財產看淡了。

---

我的一個朋友，有一些英文書，封面有耶穌裸體或半裸體的像，被紅衛兵拿出來批鬥他，因為裸體照片就是腐朽、墮落。

---

党一貫反我 王淑謙

1957 年夏天，開始“鳴放”了，動員鳴放的政策是：“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者改之，無者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相信了這一切，就開始“鳴放”。到了 1958 年元月，反右開始了，原來動員鳴放時說的話都不算數了，鳴放行爲成了想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降三級處分，由 21 級降到 24 級，下放農場勞動。1966 年 5 月 6 日，我調到咸寧縣茶葉公司搞統計。此時四清工作隊已進駐茶葉公司，因我剛到，還沒有觸及我。5.16 一過，地委書記，也就是四清工作隊的頭頭來了，形勢緊張起來，到 6 月就開始向我開炮了。

6 月 26 日早上起來，就看到全公司的會議室、走廊裏所有的地方都貼滿了對我的大字報。我很奇怪，他們怎麼不通知我呢？我又犯什麼罪了呢？原來 1962 年我給毛寫了一封反映情況的信，退了回來，被裝進了我的檔案，他們根據這封信貼我的大字報。他們把我當作大老虎來打，說我反對“三面紅旗”，矛頭直指毛主席，說我這封信也是萬言書，指責毛不瞭解情況。到 8 月份，我的妊娠反應很厲害，不能吃飯喝水，進去就吐。八月初，我到武漢去，住進中醫院。住到 8 月末回來，他們抄了我的家，拿走了我所有的照片、紀念冊、日記，還有一部精裝《紅樓夢》。

到了 9 月份，離生孩子還有一個月，我一點準備都沒有，尿片沒一塊，小衣服沒一件，我就想提前休息。頭一天交待完工作，吐了一痰盂。第二天早上 5 點就發作了，我一直忍著，想等到天亮別人起床後再說。那時大兒子只有 11 歲半，他爸出差了，我只有硬著頭皮去請會計（女的）扶我上醫院。那時公司的人已經都不理我了。到醫院，下午三點一刻才生。生孩子後就要吃，但什麼東西都沒有。那時醫院是不開伙食的，都是由家屬送飯。最簡單就是紅糖水泡麻花，可沒有紅糖，那時紅糖是月女子憑出生證新上的戶口才有，于是我叫兒子去給新生的女兒上戶口。剛生下來，還沒有名字，她哥哥就給她起個名字叫小紅，上了戶口，買回了紅糖。

產假期滿，不給我安排工作，叫我當勤雜工，打掃衛生，清理廁所，倒尿桶，提熱水，打掃廁所。這樣幹了大約 11 個月，我被派到東門茶葉倉庫去制茶，不久又把我弄到柏敦公社茶葉收購站，也是勤雜工，後來當炊事員。1967 年 9 月，我到馬橋茶葉收購站搞出納。1968 年全國掀起三反浪潮，抓現行反革命，到縣茶葉公司開會，他們叫我交待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的過程。這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叫我怎麼交待？不交待就打，在批鬥我的胸前挂一塊松木的黑板，大約有 20 斤重，上面寫上“現行反革命，歷史反革命，老右派”彎腰 90 度，本來彎腰 90 度已經受不了了，還要挂上黑牌，這真是比挨打還難受。每次批鬥完，有

半個小時直不起腰來，很疼，就落下了腰疼病。

因為受不了他們的折磨，6月20日，我跑了，凌晨三點鐘的樣子。原來他們是把我反鎖在房間裏的，這天剛好沒有鎖，我就想跑回馬橋。我覺得馬橋的基礎比較好，可以保護我，但我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到馬橋，天已大亮，我就到衛生所。衛生所的人很害怕，就打電話問縣茶葉公司，結果茶葉公司來人把我押回到公社，交給造反派處理。一些人上來就把我五花大綁，拳打腳踢，把涼鞋也打掉了。他們撿起涼鞋打我的臉，把眼珠子都快打出來了。臉腫得很大，那個眼睛整個就看不見了。

端午節過後，大約是6月28號，把我搞到馬橋，要六中的學生押我游街，約了各單位的人批鬥我。每個上去發言的人都先打我，至少要打幾個嘴巴子。李啓富鬥我的時候，拼命打，地上流了一大灘血。批鬥完了，排起隊伍上街。給我做了一個兩尺高的高帽子，掛上牌子，上寫“cc 特務，老右派”。要我手拿一面鑼，邊走邊喊，我是“cc 特務，老右派”，不喊就打，拳打腳踢。沒走多遠，就把我踢倒在地。由于掛了牌，手不能著地，我起不來，那些學生就上來踢我，踢得我疼得透出不氣，後來一個人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把我提起來。就這樣一路走，一路打，到街上，圍一圈人批鬥我，喊口號。我渾身疼得沒辦法，連出氣都困難，後來都不知道是怎麼走回去的，鞋掉了也不知道。到茶葉站，一下撲在茶葉倉庫墊茶包的枕木上，再也動不了了。他們不讓我回自己的房間，而是租了兩條棉被，在茶葉倉庫裏用枕木搭起一張一尺高的“床”。晚上蚊子多得嚇人，沒有蚊帳，就這樣喂蚊子。

當晚，茶葉站的陳滿香給我洗澡時，看到我的樣子說：“嘖嘖，打得象花蛇，看不得。”站在旁邊的站長孫書躍的女兒大聲說：“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你們不聽毛主席的。”她爸立即把她吼了回去。

過了個把星期，我的傷好了些，他們到馬橋來抓現行反革命，要我交待現形反革命活動。我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他們要的是什麼。要我瞎編也編不來，他們就把我反綁著手吊在茶葉倉庫的梁上，用竹竿打。放下來，再吊上去打。我實在受不了，就說：“我說。你們叫我怎麼寫呀？”他們說，某某已經交待了你們有組織，你還不交待？有了頭緒，我就可以瞎編。這次他們把我的兩個膀子全吊壞了，完全抬不起來，連梳頭都够不著。

1968年4月份在北京的妹妹出差路過，下車到我家，看到小女兒沒人帶，就把她帶到北京，由我媽媽帶。1969年春節剛過，就把我搞到縣裏批鬥。2月2號下大雪，那一天批鬥我時，何安生用一根凳子腿把我的頭打開了，流了好多血，到醫院縫了七針，住了一周醫院。到3月份，我母親身體不好，就把女兒送回來了，這時我愛人已下放五七幹校，女兒只有我來帶。我每天到東門倉庫制茶，女兒就放在小時候帶他們的保姆那兒，晚上接回來。11月份，把我弄到馬橋茶葉站燒火。有一天早晨，徐心秋指著我對我女兒說：她是老黑，你打她，你罵她！我對女兒說：別聽他瞎說，不聽他的。

正月十六過後一兩天，我母親病重。她不願火化，就讓我妹妹送到我這兒來。母親來這裏兩個多月就去世了，是5月30日。那天下午兩點，我妹妹打電話來說，母親去世了，茶葉站的人不告訴我，後來又來電話，才告訴我。班車已經沒有，我走回家已經晚上七點多鐘了。我愛人已經把母親入殮了。我哭了，沒有見母親最後一面。

到9月份，我把女兒送到地區幼兒園全托，這時只剩兒子一個人在家。當時兒子只有十五歲，

每周接妹妹回家，星期一早上送去，那真是兄妹倆相依為命。住在我們後面的小孩，一見到我兒子就罵，說他爸媽是壞人，他是黑五類。有一天，我兒子實在氣不過，打了那小孩。這是我兒子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後一次，後來這小孩再也不罵了。

到了 1971 年，他們內查外調已經搞完了，剛過完年就叫我到縣公司去結案。本來劃定一個老特務的框框，調查期間，找到我所有的同學都說我是好的，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而且是進步的，于是他們就在我的成分上下功夫。我說過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職員，他們不承認，首先到我老家遼寧省遼陽縣大門子調查，查不出來，就把七、八十歲的老人集中到公社來談我家的情况，他們都不認識我父親，後來提起我的祖父，這才知道他有一個小兒子，一直在外，沒有回過家。問他有土地嗎？分家時是分了土地，但不多，都是他的兄弟種了，也沒有回來收過租。我的幾個伯父都是貧下中農。結果他們就搞了一張“放棄地主”的證明，拿到縣專案組。有人說，放棄地主就不是地主。不行，他們再調查，就又到北京市郵政局去翻我父親的檔案。我父親填表時填的家庭出身是富農，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情况。定出身是以解放前三年為准的，此時祖父早死了，家也分了幾十年了，早不存在富農問題了。他們仍然給我定為“一貫隱瞞富農家庭出身”。我當時就反對，說那是解放前三十年的事，他們說這富農成分是北京郵政局開的，是有鋼印的，還有假？你能賴得了嗎？

他們還定我一直隱瞞父親當過軍閥講武堂教官。我莫名其妙，我父親 25 歲在瀋陽考進郵局，一直到死都是在郵局，怎麼會有這個事？我說我不知道。後來到 1982 年，我見到大哥，問他知不知道，他說父親在進郵局前，在張學良的岳母辦的小學裏當過一年的音樂、體育教員，吃的是講武堂的空額。定我的第三條罪是我二哥在臺灣是少將高參。我說我不知道，他們說他們知道。1979 年與二哥聯繫上後，才知道他只是一名中學教員。第四條罪是說我不要共產黨，要走自己的路。我說我沒說過這句話，他們就把我的日記打開，在這句話的下面劃了紅杠。我說還有前面的話呢，我說的是解放前我的思想是既不要國民黨也不要共產黨，我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現在。他們說那些不是我們所要的，我們就要這一句，這一句是不是你寫的？我說這是我寫的，就簽了字。5 月 2 號，宣布我劃為右派，從新戴上右派帽子，開除公職，每月 16 元生活費，交賀勝茶場勞動。

在賀勝茶場，髒活累活都由我幹，沒有節假日，每年只有換季的時候才給我三天假（四月和十一月初）。任何人都可以罵我，就連三歲的小孩都可以罵我，經常是一大群小孩在我身後叫“王淑謙，屁股尖”。

1974 年，我兒子高中畢業後下放，我愛人因為有外遇，受處分下放到五七幹校，家裏只有七歲半的女兒。怎麼辦？于是決定把女兒送給在黑龍江的大妹妹帶。1975 年 11 月底，大妹說身體不好，就把女兒托人帶到北京小妹家。小妹留她在京玩幾天，打算元旦後再送給我。元旦那天，她跟表哥表姐去公園玩，爬杆掉下來，摔斷了大腿。直到 3 月底出院了，小妹才敢寫信告訴我，要我去接她回來。這時女兒拄著雙拐，真是禍不單行。1976 年下半年，我把女兒帶到賀勝，入農場子弟學校。老師同學都欺負她，一吵架就說你媽是右派。我女兒就跟我吵，你為什麼當右派，你要不是右派誰也不會欺負我。

1977 年落實政策，縣裏的人對我說：“你不是沒有錯誤，那些材料都是有疤痕的，是改不了的，不是你沒錯，是現在政策好了，你要感謝黨。”我沒有感謝，我還要求把這些不實之詞都銷毀，并要求把我所有的日記、紀念冊等都歸還我。他們不給我，直到現在他們還不歸還給我。落實政策後填表，家庭出身他們還給我填富農。直到現在，咸寧市委的人還在說：

“王淑謙一貫反黨，她有前科。” 請看看我的這大半輩子，究竟是我一貫反黨，還是黨一貫反我。

- [Chrome 一键翻墙包](#)
- [火狐 firefox 一键翻墙包](#)
- [禁闻代理翻墙](#)
- [动态网](#)
- [无界网](#)
- [手机禁网平台](#)
- [翻墙软件下载](#)
- [安卓手机翻墙](#)